

第 1 卷

小说

趙樹理文集



工人出版社

第2卷

小说

趙樹理文集



工人出版社

趙樹理文集

第 3 卷

戏剧 曲艺 诗歌



工人出版社

第4卷

论述 杂感 书信

趙樹理文集



工人出版社

I217/47



趙樹理文集

第1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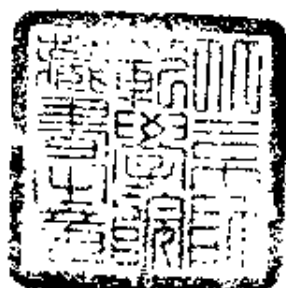
小說

工人出版社 山西大學 合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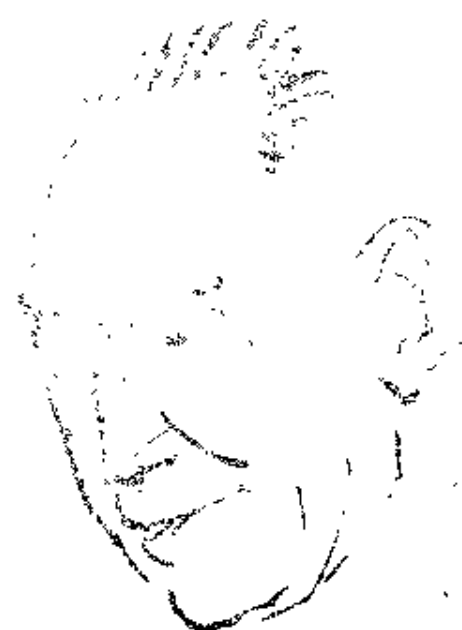
20768762



工人出版社

768762

1217/47



趙樹理文集

第2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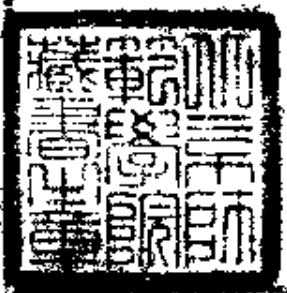
小說

工人出版社 山西大學 台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75016



工人出版社

775016

I217/47



趙樹理文集

第3卷

戏剧 曲艺 诗歌

工人出版社 山西大学 合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77198



工人出版社

777198

I 217/47

出版说明

編輯出版《赵树理文集》，我們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即着手进行的。这不只是因为赵树理是工人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不只是因为赵树理是山西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赵树理留給我們的社会主义文艺硕果，为了滿足广大讀者閱讀赵树理作品的需要；为了紀念赵树理为人民創作的一生。

《文集》所收集的，除了过去出版过的单行本、选集和建国以后报纸杂志发表过的文章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間和抗日战争以前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在华北根据地报刊上登过；有的只在剧团、宣传队唱过演过；有的则是用种种化名投向敌伪报纸刊登的；还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写的属于回忆录性质的从来没有发表过的。

全书共四卷，計小說二卷，戏剧、曲艺、詩歌一卷，論文、杂感、书信一卷。各类作品大致按写作年代先后为序。

赵树理在一九二七年就开始写作，抗战时期，前后办过三次小报，一个人用各种笔名又写又編。但由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次战火的历程和文化大革命的一場浩劫，許多作品未能保存下来，这是十分遺憾的！

《赵树理文集》由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学合編。編輯小組成員，工人出版社为岑铁权、刘談夫；山西大学为部忠武、刘芸灏、崔洪勛。

《文集》編輯过程中，曾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全国文

联主席周揚同志写了序言，湖南省文联主席康濯同志写了跋，中国作家协会张僖同志，山西省委史紀言同志、王中育同志，山西省文联郝力群同志，北京大学王瑤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楊蕉圃同志，工人日报章容同志，中国农民报苗培时同志，山西省晋东南地区文化局栗守田同志；都为《文集》的編选提了宝贵的意見或提供了搜集文稿的重要线索；赵树理同志的女儿赵广建同志把她保存的手稿、手迹送給我們；晋东南报吳向周同志供給我們很多珍贵的照片，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謹此致謝！

对赵树理同志的著作，我們在編輯时除极个别的錯字加以改正外，一般未作变动。赵树理同志的遺稿，远未收集齐全，希望知道的同志繼續提供給我們或告訴我們有关的线索。对遺稿的审訂整理，缺点錯誤也一定不少，希望得到讀者和研究者的指正。

工人出版社
山西大学



赵树理同志（一九五九年）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梅花
岸上水猶香
寂寞無
枝俏
待到
春來
不
管
白
髮
多
少
只
要
人
在
花
開
處
誰
管
白
髮
多
少
書中笑

赵树理手书毛主席词《咏梅》

一九七〇年，赵树理同志正在遭受迫害的时候，偷偷地用破纸片写了毛主席《咏梅》这首词，嘱咐他的女儿赵广建送到周扬同志手中。

趙樹理文集序

周揚

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學合作編輯出版《趙樹理文集》，要我寫幾句話，並希望將我一九四六年寫的《論趙樹理的創作》作為前言。我那篇舊作，作為對趙樹理同志創作的全面評價，當然是遠遠不夠的，他後來還繼續寫了許多出色的作品。我寫那篇文章時，和這位在文壇初露頭角的新星還不相識，只是對他作品的新穎題材和獨特風格以及作者的卓越才能感到驚異。全國解放後，我才認識趙樹理同志。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我每讀他的作品總有一種親切之感。文如其人。他文好人也好，文章有特色，人也有特色。他最熟悉農村，最了解農民心理；他懂世故，但又象農民一樣純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談諧；他有獨到之見，也有偏激之詞；他的才華不外露，而是象藏在深處的珠寶一樣不時閃爍出耀眼的光芒。我喜愛他的為人，甚至對他的某些偏見，也能諒解。他公正無私，對人民忠心耿耿。這是最可貴的。

我沒有把趙樹理同志的作品全部讀完，過去讀過的，有的至今記憶猶新，有的就印象淡漠了。對他作品的全面的正確的評價，就讓那些有專門研究的同志或研究現代文學史的專家們去作吧！凡是真正有價值的作品，總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

我同意重新发表我的那篇旧文章，为的是纪念我们多年的文字之交和革命友谊。至于那篇文章本身，现在重新来读，说的并不充分，也不深刻。记得当时就有人说过，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而我的文章却没有着重指出这点，是一个不足之处。

一九五九年，我们党内发生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赵树理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曾为此受到了一些同志对他的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耿耿于怀，同批判过他的同志还是和睦相处。一九六二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讨论农村题材的创作座谈会上，我曾为此称赞了赵树理同志这种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同志的态度。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赵树理同志就没有能够逃过这一关，终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就在他遭受残酷折磨，面临死亡威胁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屈服，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他在被批斗和监禁的日子里，偷偷地用破纸片写了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词，以表示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对党对领袖的一片忠心。他嘱咐他的爱女赵广建同志将这一有他绝笔手迹的纸片设法送到我的手中。那时我早已失去自由，我的命运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但他还是信任同志，信任我们之间的友谊，相信我们总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相信人民总会重过光明的日子。赵树理同志的信念，也就是我们每个革命者的信念，现在终于实现了。今天，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除了更加紧密团结，更加勇气百倍地工作和斗争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一九八〇、四、五

论赵树理的创作

周扬

在被解放了的广大农村中，经历了而且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农民与地主之间进行了微妙而剧烈的斗争。农民为实行减租减息，为满足民生民主的正当要求而斗争，这个斗争在抗战期间大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地位，因而组织了中国人民抗敌的雄厚力量。抗战胜利以后，减租减息与反奸、复仇、清算的斗争结合起来，斗争正在继续深入发展。这个斗争将摧毁农村封建残余势力，引导农民走上彻底翻身的道路。经过八年抗战，农民已经空前地觉悟和团结起来了。他们认识了他们贫穷的真正原因，他们决心为根本消灭这个原因斗争。他们把斗争会，清算会很正确地叫做“挖穷根”，这就是说，要把贫穷的根子挖出来，将它斩断。农民的革命精力正在被充分地发挥，这个力量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拒抗的，是无穷无尽的。它正在改变农村的面貌，改变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农民自己的面貌。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的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

这个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

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第一篇为人所知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之后，立刻在群众中获得了大量读者，仅在太行一个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群众并自动地将这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接着发表了中篇《李有才板话》，这是一篇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不久以前，又发表了同样主题的长篇《李家庄的变迁》。

我们面前是三幅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

《小二黑结婚》写的是一个农村中恋爱的故事。故事很简单：小二黑，一个特等射手的年轻漂亮的农民，和一位美丽的农家姑娘小芹相好。但是小二黑的父亲二孔明和小芹的母亲三仙姑，这村子里的两位“神仙”，却反对他们的结合。二孔明为他儿子收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作童养媳，但是小二黑不认账，他对父亲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小芹也不认母亲为她定下的婚事，把婚礼扔了一地，对母亲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走！”你看，他们回绝得多么干脆，多么坚决！当村里恶霸金旺兄弟将这对情人双双拿住，企图诬告他们的时候，小二黑一点没有畏怯，他是理直气壮的，因为他“打听过去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结果，自然是小二黑胜利了。作者是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利），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

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作者对“二孔明”与“三仙姑”的描写，算得是够讽刺的了，但当我们看到这两位“神仙”为自己儿女的事情弄得那么狼狈不堪的时候，我们真有点可怜起他们来，待到后来看到他们的转变，简直要喜欢起他们来了。原来作者攻击的对象，并不是他们，而是金旺兄弟，那些横行乡里的恶霸们。

在《李有才板话》中，便正面展开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斗争围绕在改选村政权与减租两个问题上。老户主阎恒元，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描出了地主的老奸巨滑的性格；他把持了村政权，操纵了农救会。关于他，李有才曾经编过一段快板：

“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
自从有村长，一当几十年。
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
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
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
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

李有才，这位农民的天才歌手，用他的快板反映了村子里的事件和人物，表达了农民对于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情绪的反应。这些快板是多么真实，多么畅快，多么锋利呀！正因为这些快板戳穿了阎恒元们的假面，李有才被他们撵出了村子。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被打击，分化，收买。年轻，热情，但是没有经验，犯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章工作员被愚弄着，完全蒙在鼓里，他还说阎恒元是“开明绅士”呢，并且还把阎家山奖为

“模范村”呢。然而农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们唱道：

“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
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

他们继续斗争着。一个小元变坏了，其他许多“小字号的人物”还是积极的。有才老叔撵走了，还是有人编歌子；他们的嘴是封不住的。当县农会主席老杨同志，这位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熟悉群众要求，有群众作风的人物来到村子里的时候，那一伙年轻积极的农民便好象给吸铁石所吸引一样，都团结到他的周围了。他们重新组织起农救会，发动了斗争，改组了村政权，实行了减租法令，斗争胜利了。作者在这里正确地处理了农村斗争的主题，写出了斗争的曲折与复杂性，写出了农村中的各种人物：地主，农民，包括积极的，中间的，与落后的；两种类型的工作干部。他没有把人物与行动简单化；没有只写胜利，不写困难，只写光明的一面，不写阴暗一面。他的笔是那样轻松，那样充满幽默，同时又是那样严肃，那样热情。光明的，新生的东西始终是他作品的支配一切的因素。

《李家庄的变迁》的主题，同样是写的农民与豪绅地主之间的斗争，而且这个斗争范围更广，过程更长，因而也更激烈，更残酷。前两篇作品所特有的幽默的调子在这里被一种沉重的空气所笼罩。农民主人公铁锁的性格也比那些“小字号的人物”更深沉，他有比他们更多的经历，他的活动更带自觉的性质。全书的故事就是以他作中心来展开的。他是李家庄的一个外来户，受尽了当地豪绅地主的剥削压迫，跑到哪里也逃不出他们的魔掌。只有在太原和一个叫做小常的青年共产党员的偶然相识，才第一次在他的生活史上投射了一线光明。这个小常几乎成了他以及后来他的全村的偶象。抗战开始，小常恰好被

派到他们县上来工作，他亲自到了他们的村子里，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牺盟会的工作。铁锁和农民中其他积极分子冷元、白狗都活跃起来了。豪绅地主李如珍一伙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抵抗减租减息，他们想叫牺盟会不起作用。中央军，日本人来了，他们便得志起来，对农民实行了血的报复。小常被活埋了。铁锁、冷元投入了八路军。而当八路军第二次解放这村子的时候，村里剩下的人，连从前的一半都不到了。斗争是残酷的，而且长期的。作者在故事结尾处写到了庆祝抗战胜利大会本来就可以住笔了的吧，然而他却不能不加写一场为自卫战争欢送参战人员的大会，向读者强烈地暗示了：斗争还在前面！他灌输了读者以胜利信心和斗争勇气。

《李家庄的变迁》虽只写的一个村子的事情，但却衬托了十多年来山西政治的背景，涉及了抗战期间山西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包含了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有很大的企图。和作者的企图相比，这篇作品就还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完成的程度，还不及《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在它们各自范围之内所完成的那样成功。它们似乎是更完整，更精练。但是就作品的规模和包含的内容来说，《李家庄的变迁》自有它的为别的两篇作品所不可及的地方。

在巡视了赵树理同志的这三篇小说之后，我想说一说在他的创作中有些什么特点，什么独创的地方，特别值得研究，值得学习呢？我打算说两点：一、是他的人物的创造；二、他的语言的创造。

作者在人物创造上，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将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斗争的环境中，放在这斗争中的一定地位上，这样来展开人物性格的活动。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都决定于他在斗

争中所处的地位的变化，以及他与其他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
变化。他没有在静止的状态上消极地来描写他的人物。

首先，他写了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站在
斗争的最前线。创造积极人物的典型，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一个
伟大而困难的任务。一则因为在我们过去的优秀文学遗产中，
许多作品大都只写了农民消极的落后的方面；二则因为现实生
活中，新的人物，新的个性还在产生和成长之中。作者虽还没
有创造出象阿Q那样的典型，但确实写出了新的人物的真实面
貌，那些“小字号的人物”们可以看作新的农民的集体的形象。
而且，是多么生动的，可爱的形象呵！但是作者也并没有将
他们理想化。这些都不过是普通的农民；他们年轻，热情，有
时甚至冒失；他们所身受的豪绅地主的剥削压迫，迫使他们不
能不走向革命。他们在苦难与斗争中渐渐成长起来，他们渐渐
学会了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们敢说敢干，且又富于机智和幽
默。每个人都在斗争中显示出各自的本领与才能，正如《李有
才板话》中的老杨同志所说的，“老槐树底有能人”。群众的
斗争——这就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斗争教育了农民，培养出了
他们中间的优秀人物。赵树理同志的创作就反映了农民的智慧、
力量和革命乐观主义。在老杨同志这个人物身上，他创造了一个
杰出的农民干部的成功形象。

作者同样出色地描写了地主恶霸和他们的“狗腿”。他的
重点也是放在他们和农民对立，和新政权对立的关系上。他们
对于农民的要求减租与组织农会，改组村政权等等活动，进行
了顽强的坚决的抵抗；这种抵抗在不能使用公开暴力的时候就
凭借狡猾的手腕；他们“一肚子的肮脏计”。他们充分地利用
了农民的自私，落后，和工作干部的没有经验，主观主义，官

僚主义。《李有才板话》中《丈地》一章便提供了关于这一方面的非常出色的描写。

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界线是划分得十分清楚的。农民凭着他们的阶级本能和经验，对于这个分界一点也不含糊。我们只要看看，当小元还是积极分子的时候，那些“小字号的人物”对他多么亲，而一当小元做了武委会主任，被地主同化之后，他们对他就疏远了。他们前后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从心底发出了两种不同的情感。两个农民在被指派给小元锄地的时候有段对话是妙极了，我只引其中的两句：

“小福道：‘头一遍是咱给他锄，第二遍还教咱给他锄！’小顺道：‘那可不一样！头一遍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们大家情愿帮忙，第二遍是人家升了官，不能锄地了，派咱给人家当差。早知道落这个结果，帮忙？省点气力不能睡觉？’”

作者也写了农民中的落后分子，如象《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他“吃亏，怕事，受一辈子穷，可瞧不起穷人”，但他也有个好处，“只要年轻人一发脾气，他就不说话了”，他到底还是善良的。落后的人物在斗争的环境中也不能不起变化。不只这个老秦，还有《小二黑结婚》中的那两位“神仙”，到后来都有些变了。你也许觉得他们的变化太小，而且近乎消极吧，但作者是现实主义的，他不能把一个人物写成一个晚上就完全变了样子，象有些作者写人物转变那样。他只是着重写了环境的力量，他虽没有告诉你他的人物转变得怎样，但却叫你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转变。

作者在描写他的人物上，其次一个特点是：他总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关于人物，他很少做长篇大论的叙述，很少以作者身份出面来

介绍他们，也没有作多少添枝加叶的描写。他还每个人物以本来面目。他写的人物没有“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他写农民就象农民。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简单明了的，没有一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地方。而且，只消几个动作，几句语言，就将农民的真实的情绪、面貌勾画出来了。让我再从《李有才板话》中引用一段，这是写农民们在听到他们村长撤职的消息时的反映：

“一进门，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道：‘什么？什么？’小明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长撤差了！’小顺从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戏！’小福道：‘我也算数！’有才道：‘还有今天？我当他这饭碗是铁箍箍了！谁说的？’小元道：‘真的！章工作人员来了，带着公事！’小福的表兄问小福道：‘你村里跟喜富的仇气就这么大？’”

就这么短短的对话，听来是那样轻松，那样愉快，然而又是多么有力地表示了农民对于地主恶霸的仇恨心理。这种仇恨在《李家庄的变迁》中就成了爆发式的：农民们在龙王庙将汉奸地主李如珍活活打死的那个血淋淋的场面，也许会有人感觉到农民的报复太残忍了吧；但是请听一听农民怎么说的：

“这还算血淋淋的？人家杀我们那时候，庙里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

还有比这更正当，更公平的辩白吗？这些农民都是积极的活动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语言和行动是紧紧结合的。语言表现行动，而又凝成于行动之中；所以总是简练的，生动的。斗争的语言和日常生活的语言完全融合起来了。农民的机智和幽默在斗争的火焰中磨炼得光芒四射。他们把讽刺的话叫做“开心话”，叫做“扔砖头话”；这就是对豪绅地主、官僚、恶霸、

“狗腿”们“扔砖头”，这是斗争的语言。就这样，作者从这些行动和语言中，将新的人物的性格显示出来了。

最后，作者在处理人物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明确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人物的一定的关系。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们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农民的主人公的地位不只表现在农民充当主角的意义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个精神，整个思想。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他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象之外的事件，没有写他们所不感兴趣的问题（当然写别的主题的作品，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把每个人物或事件在群众中的反映及所引起的效果，当作他观察与描写这个人物或事件的主要角度。农村的事情，还有谁比农民了解得更深切，更透彻的吗？就是对于农村中干部们工作的好坏，农民也是最正确的批判者。因为最广大群众的意见总是正确的。在《李有才板话》中，李有才的那些真实反映了群众意见的快板，如果单从形式上看，也许会被看作是中国旧小说所特有的“有诗为证”的一个变体，但我却以为它表现了赵树理同志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精神。这是他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有了这个观点，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

若有人怀疑，赵树理岂不只是一个农民作家吗？他的创作的和思想的水平不是降低到了“农民意识”吗？回答当然不是。他不但歌颂了农民的积极的前进的方面，同时也批判了农民的消极的落后的方面。他写了好的工作干部，这在农村中是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骨干，没有这种骨干，农民的彻底翻身是

不可能的；同时也批判了坏的工作干部。这好与坏的一个主要区别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替他们解决问题。老杨同志和章工作员的区别就在这里。两个人物的对照的描写充满了现实的教育的意义。

关于赵树理同志在人物创造上的基本特点，我所看到的就是如此。现在我就来说一说他在文学语言上的创造。

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新家。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后，学习民间语言，民间形式的努力，产生了很多的优秀成果。就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有成绩。但有些作者却往往只在方言、土话、歇后语的采用与旧形式的表面的模仿上下功夫。赵树理同志却不是那样。他执行了他自己作品的创造的任务。

在他的作品中，他几乎很少用方言、土语、歇后语这些；他决不为了炫耀自己语言的知识，用来装饰自己的作品而滥用它们。他尽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话语，但求每句话都能适合每个人物的特殊身份、状态和心理。有时一句平常的话在一定的场合从一定的人物口中说出来可以产生不平常的效果。同时他又采用了许多从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不断产生出来的新的语言。他的人物的对话是生动的、漂亮的；话一到了他的人物嘴上就

活了，有了生命，发出光辉。

他在作叙述描写时也同样是用的群众的语言，这一点我以为特别重要。写人物的对话应当用口语，应当忠实于人物的身份。这现在是再没有谁作另外主张的了；唯独关于叙述的描写，即如何写景写人等等，却好象可以完全任凭作者自由驰骋，他可以写天上地下，沉潜于所谓美丽的词藻，全不管这些与他所描写的人物与事件是否相称以及有无关系。要创造为工农兵所喜爱的文艺，这文学语言的世界有打扫一番的必要。人物与环境必须相称。如果环境中的甚么事物，在一个人物的心目中是不占地位的，即他对这事物不感兴趣，这事物与他的生活毫不相干，那末，作者为什么要耗费过多的气力去写它呢，难道仅仅为了自己个人的欣赏？我们来看一看赵树理同志怎样描写环境：

“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去，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李有才板话》）

这里，风景画是没有的。然而从西到东一道斜坡不正是农村中阶级的明显的区分吗？

再看一看他如何描写李有才的窑洞：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窑，说也好笑，三面看来有三变：门朝南开，靠西墙正中有个炕，炕的两头还都留着五尺长短的地面。前边靠门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着些水缸、菜瓮、锅、匙、碗、碟；靠后墙摆着些筐子、箩头，里面装的是人家送给他的核桃、柿子（因为他是看庄稼的，大家才给他送这些）；正炕后墙上，就炕那么高，打了个半截套窑，可以铺半条席子，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好象个小山果店，扭转头看西边，好象石菩萨的神龛；回头来看窗下，又好象小村子里的小饭铺。”

这岂只是在写窑洞呵？他把李有才的身份和个性写出来了。

作者在描写人物的时候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也是非常特出的。他往往不从正面来写，而从人物的举止行动在别人身上所发生的效果反衬出来。

他这样描写着小二黑的漂亮：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儿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峡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写小芹，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山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

最精彩的是写小芹的娘三仙姑到区上去的那一幕：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喳喳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了；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

‘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从上面的引用，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作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的魅力呵！这种魅

力是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得的。

不用说，作者在语言上是用过很大功夫的。据赵树理同志自己写给我的自传材料，及杨献珍同志所告诉我的，他一贯努力于通俗化的工作；他在写这三篇作品之前作过许多文字的活动。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写得为大众所懂得。他不满意于新文艺和群众脱离的状态。他在创作上有自己的路线和主张。同时他对于群众的生活是熟悉的。因此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文艺方向的结果。他意识地将他的这些作品通叫做“通俗故事”；当然，这些决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艺术品，它们把艺术性和大众性相当高度地结合起来。

我的文章写到这里该停笔了吧。关于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我还有甚么要说的呢？你或者说，我只说了他的好处而缺点几乎一点也没有讲。是的。我与其说是在批评甚么，不如说是在拥护甚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学艺术各部门都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

一九四六年于张家口



赵树理和老战友、上党梆子名演员段二淼（一九六三年）



赵树理会见山东枣梆剧团演员（一九六五年）



左：赵树理在中国
作家协会院子
里（一九五四
年）



下：赵树理在北京
马家庙寓所书
房里（一九五
七年）

馬山攝影

趙樹理

——訪朝三週畧憶

我自入了朝鮮國境到現在，~~再往~~ 不覺已往過了二十多天了。在這一段時間內，
函領鮮作家同盟的照顧，除了稍許不方便，使
我很多有代表意義的事物，只是想對一個團
家的全面概況，~~却~~不是這二十多天所能完成的
事。只能說是有多少算多少，記得多少算多少。
中國有~~個~~形容粗枝大葉看事物的話，叫「走
馬觀花」。我~~在~~朝鮮~~時~~想~~起~~這些話，~~是~~。

趙樹理手稿（一九五八年）

第一卷目录

- 小二黑结婚..... (1)
- 李有才板话..... (17)
- 地板 (63)
- 李家庄的变迁 (71)
- 孟祥英翻身..... (195)
- 福贵 (211)
- 催粮差 (225)
- 小经理 (235)
- 邪不压正 (241)
- 传家宝 (283)
- 田寡妇看瓜..... (299)
- 登记 (301)
- 求雨 (331)

第二卷目录

三里湾	(337)
刘二和与王继圣	(543)
表明态度	(601)
金字	(631)
灵泉洞	(637)
锻炼锻炼	(763)
老定额	(787)
套不住的手	(801)
实干家潘永福	(813)
杨老太爷	(839)
张家兴	(849)
互作鉴定	(859)
卖烟叶	(881)

第三卷目录

打倒汉奸	(929)
万象楼	(939)
两个世界	(959)
好消息	(997)
巩固和平	(1005)
开渠	(1011)
十里店	(1057)
焦裕禄	(1137)
三关排宴	(1161)
邮宫图	(1199)
茂林恨	(1235)
战斗与生产相结合	(1243)
为啥要组贫农团	(1257)
石不烂赶车	(1261)
王家坡	(1297)
“春”在农村的变化	(1305)
谷子好	(1308)
小经理	(1311)

考神婆	(1319)
山西第四师范同学合影题诗	(1326)
赠盲艺人赵高升师徒	(1327)
贺喜对联	(1329)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1330)
《活人塘》西人赞	(1331)
美帝是人类的公敌	(1334)
花好月圆	(1335)
春日寄战士	(1336)
告艾克	(1339)
告艾森豪威尔	(1341)
微妙的夜半	(1343)
戏为美国总统献策	(1346)
一九六一年到吉林左家特产 研究所参观训化的鸟兽	(1348)
竹枝词二首	(1349)
学雷锋	(1350)
题赠黑山底大队	(1351)
题赠陵川第一山林场	(1352)
咏松	(1353)
在文化大革命初写的大字报以诗为题	(1354)

第四卷目录

- “三”字到“万”字 (1355)
- 平凡的残忍 (1358)
- 艺术与农村 (1360)
- 我们执行土地法不许地主富农管 (1365)
- 休想钻法令空子 (1366)
- 穷苦人要学当家 (1367)
- 干部有错要老实 (1369)
- 中农不要外气 (1371)
- 谁也不能有特权 (1373)
- 不要误解行政命令 (1375)
- 再谈行政命令 (1376)
- 停止假贫农团活动，不能打击贫雇 (1377)
- 发动贫雇要靠民主 (1379)
- “自愿”不是“自流” (1381)
- 从寡妇改嫁说到扭正村风 (1383)
- 躺倒不对，起来怎干？ (1385)
- 介绍一本好小说——《高乾大》 (1388)

对改革农村戏剧几点建议	(1392)
也算经验	(1397)
会师前后	(1400)
农村剧团的地方性与农村性	(1401)
参观之外	(1404)
谈群众创作	(1407)
北京人写什么?	(1411)
《金锁》发表前后	(1416)
北京市文代会闭幕词	(1420)
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	(1421)
杜鲁门的“文化程度”问题	(1425)
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427)
纪念话	(1430)
文艺作品怎样反映美帝侵略的本质	(1431)
关于《邪不压正》	(1436)
《方珍珠》剧本读后感	(1441)
“武训”问题介绍	(1443)
对发表《“武训”问题介绍》的检讨	(1445)
我与《说说唱唱》	(1446)
忆王春同志	(1449)
决心到群众中去	(1451)

郭玉恩小传	(1455)
一张临别的照片	(1458)
“侵略”浅释	(1463)
谈六亿	(1466)
我对戏曲艺术改革的看法	(1470)
论“吃社果”说法的错误	(1477)
《三里湾》写作前后	(1481)
谈课余和业余的文艺创作问题	(1493)
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信	(1505)
和青年作者谈创作	(1506)
给长治地委××的信	(1513)
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各组座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言摘要	(1516)
《买猴儿》讽刺了谁？	(1517)
“百花齐放”声中的上党戏	(1520)
供应群众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	(1522)
我在创作中的一点体会	(1525)
摩勒的妙文	(1528)
“小戏”小谈	(1531)
“出路”杂谈	(1533)
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	(1540)

“普及”工作旧话重提	(1543)
初看蒲剧的时候	(1549)
要挖断可右之根	(1551)
青年与创作	(1554)
我与汉字	(1564)
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	(1566)
“才”和“用”	(1570)
理想的会演“准备”	(1580)
反对八股腔，文风要解放！	(1582)
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	(1584)
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	(1587)
万里同心	(1598)
我爱相声《水兵破迷信》	(1600)
当心棒子	(1603)
曲艺工作者动员起来	(1606)
从曲艺中吸取养料	(1607)
彻底面向群众	(1617)
朝鲜农村印象记	(1620)
开城之行	(1626)
“马上”掠影	(1629)
给邵荃麟的信	(1633)

群众创作的真繁荣	(1638)
新食堂里忆故人	(1643)
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1647)
下乡杂忆	(1659)
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	(1663)
谈文艺卫星	(1670)
曲艺沿着工农兵方向继续前进	(1674)
谈“久”	(1683)
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	(1687)
《三复集》后记	(1691)
对上党戏曲的继承传统与整理改编的看法	(1694)
挤三十	(1705)
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上的发言	(1710)
与读者谈《三里湾》	(1723)
做生活的主人	(1727)
与青年谈文学	(1733)
地方戏和年景	(1739)
谈谈花鼓戏《三里湾》	(1744)
戏外话	(1751)
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1760)

戏剧为农村服务的几个问题·····	(1764)
运用传统形式写现代戏的几点体会·····	(1775)
若干问题的解答·····	(1785)
“起码”与“高深”·····	(1792)
首先要求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1800)
谈“助业作家”·····	(1805)
语言小谈·····	(1811)
前岭人·····	(1815)
回忆历史，认识自己·····	(1825)

附 录

糊涂县长·····	(1845)
到任的第一天·····	(1849)
我也谈谈创作·····	(1851)
神经质的文人·····	(1854)
欧化与大众语·····	(1856)
呜呼，李长之教授！·····	(1863)
给青年作家·····	(1866)
秧歌剧本评选小结·····	(1868)

赵树理谈土改后的故乡	(1878)
赵树理谈“赶任务”	(1880)
与长治市青年文艺爱好者谈创作	(1882)
赵树理同志谈《花好月圆》	(1884)
赵树理谈语文教学	(1893)
赵树理谈评剧《三里湾》	(1903)
《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曲艺》序言	(1905)
和农民剧作者的谈话	(1919)
作家要在生活中作主人	(1924)
不要急于写，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	(1928)
努力繁荣曲艺创作	(1932)
给青年的一封信	(1936)
赵树理著作年表	(1939)
赵树理文集跋	康 濯 (1961)

小二黑结婚

一、神仙的忌讳

刘家蛟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作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

二诸葛忌讳“不宜栽种”，三仙姑忌讳“米烂了”。这里边有两个小故事：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抢着种地，二诸葛看了看历书，又掐指算了一下说：“今日不宜栽种。”初五日是端午，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又不曾种；初六倒是个黄道吉日，可惜地干了，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却没有出够一半。后来直到十五才又下雨，别人家都在地里锄苗，二诸葛却领着两个孩子在地里补空子。邻家有个后生，吃饭时候在街上碰上二诸葛便问道：“老汉！今天宜栽种不宜？”二诸葛翻了他一眼，扭转头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传为笑谈。

三仙姑有个女孩叫小芹。一天，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里问病，三仙姑坐在香案后唱，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听。小芹那年才九岁，晌午做捞饭，把米下进锅里了，听见她娘哼哼得很

中听，站在桌前听了一会，把做饭也忘了。一会，金旺他爹出去小便，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说：“快去捞饭！米烂了！”这句话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听见，回去就传开了。后来有些好玩笑的人，见了三仙姑就故意问别人“米烂了没有？”

二、三仙姑的来历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个爹，父子两个一上了地，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村里的年轻人们觉着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哄伙。于福他爹看见不象个样子，有一天发了脾气，大骂一顿，虽然把外人挡住了，新媳妇却跟他闹起来。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也叫不起来，父子两个没了办法。邻家有个老婆替她请了一个神婆子，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长吾神短，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别人也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

青年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是去问神，还不如说是去看圣象。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她转来转去。

这是三十来年前的事。当时的青年，如今都已留下胡子，家里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群，所以除了几个老光棍，差不多都没

有那些闲情到三仙姑那里去了。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老相好都不来了，几个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满意，三仙姑又团结了一伙孩子们，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更俏皮。

三仙姑有什么本领能团结这伙青年呢？这秘密在她女儿小芹身上。

三、小 芹

三仙姑前后共生过六个孩子，就有五个没有成人，只落了一个女儿，名叫小芹。小芹当两三岁时候，就非常伶俐乖巧，三仙姑的老相好们，这个抱过来说是“我的”，那个抱起来说是“我的”，后来小芹长到五六岁，知道这不是好话，三仙姑教她说：“谁再这么说，你就说‘是你的姑姑’。”说了几回，果然没有人再提了。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

吃饭时候，邻居们端上碗爱到三仙姑那里坐一会，前庄上的人来回一里路，也并不觉得远。这已经是三十年来的老规矩，不过小青年们也这样热心，却是近二三年来才有的事。三仙姑起先还以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领，日子长了，青年们并不真正跟她接近，她才慢慢看出门道来，才知道人家来了为的是

小芹。

不过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样，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点。前年夏天，有一天前晌，于福去地，三仙姑去串门，家里只留下小芹一个人，金旺来了，嘻皮笑脸向小芹说：“这会可算是个空子吧？”小芹板起脸来说：“金旺哥！咱们以后说话要规矩些！你也是娶媳妇大汉了！”金旺撇撇嘴说：“噢！装什么假正经？小二黑一来管保你就软了！有便宜大家讨开点，没事，要正经除非自己锅底没有黑！”说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说：“不用装模作样了！”不料小芹大声喊道：“金旺！”金旺赶紧放手跑出来。一边还咄念道：“等得住你！”说着就悄悄溜走了。

四、金旺兄弟

提起金旺来，刘家蛟没有人不恨他，只有他一个本家兄弟名叫兴旺跟他对劲。

金旺他爹虽是个庄稼人，却是刘家蛟一只虎，当过几十年老社首，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金旺长到十七八岁，就成了他爹的好帮手，兴旺也学会了帮虎吃食，从此金旺他爹想要捆谁，就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下个命令，自有金旺兴旺代办。

抗战初年，汉奸敌探溃兵土匪到处横行，那时金旺他爹已经死了，金旺、兴旺弟兄两个，给一支溃兵作了内线工作，引路绑票，讲价赎人，又做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后来八路军来，打垮溃兵土匪，他两人才又回到刘家蛟。

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经过几个月大混乱，死了许多人，

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别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各救会、武委会，刘家蛟却除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长以外，谁也不愿意当干部。不久，县里派人来刘家蛟工作，要选举村干部，金旺跟兴旺两个人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大家也巴不得有人愿干，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其他各干部，硬捏了几个老头子出来充数。只有青抗先队长，老头子充不得。兴旺看见小二黑这个小孩子漂亮好玩，随便提了一下名就通过了，他爹二诸葛虽然不愿，可是惹不起金旺，也没有敢说什么。

村长是外来的，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从此金旺兴旺比前更厉害了，只要瞒住村长一个人，村里人不论哪个都得由他两个调遣。这几年来，村里别的干部虽然调换了几个，而他两个却好象铁桶江山。大家对他两个虽是恨之入骨，可是谁也不敢说半句话，都恐怕扳不倒他们，自己吃亏。

五、小二黑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蛟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小二黑没有上过学，只是跟着他爹识了几个字。当他六岁时候，他爹就教他识字。识字课本既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从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学起，进一步便学些《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书。小二黑从小

就聪明，象那些算属相、卜六壬课、念大小流年或“甲子乙丑海中金”等口诀，不几天就都弄熟了，二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卖弄。因为他长得伶俐可爱，大人们也都爱跟他玩，这个说：“二黑，算一算十岁属什么？”那个说：“二黑，给我卜一课！”后来二诸葛因为说“不宜栽种”误了种地，老婆也埋怨，大黑也埋怨，庄上人也都传为笑谈，小二黑也跟着这事受了许多奚落。那时候小二黑十三岁，已经懂得好歹了，可是大人们仍把他当成小孩来玩弄，好跟二诸葛开玩笑的，一到了家，常好对着二诸葛问小二黑道：“二黑！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种？”和小二黑年纪相仿的孩子们，一跟小二黑生了气，就连声喊道：“不宜栽种不宜栽种……”小二黑因为这事，好几个月见了人躲着走，从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气，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

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经二三年了。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原不过在冬天夜长时候，跟着些闲人到三仙姑那里凑热闹，后来跟小芹混熟了，好象是一天不见面也不能行。后庄上也有人愿意给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二诸葛不愿意，不愿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声名不好。恰巧在这时候，彰德府来了一伙难民，其中有个老李带来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没有吃的，愿意把姑娘送给人家逃个活命。二诸葛说是个便宜，先问了一下生辰八字，招算了半天说：“千里姻缘使线牵”，就替小二黑收作童养媳。

虽然二诸葛说是千合适万合适，小二黑却不认账。父子俩吵了几天，二诸葛非养不行，小二黑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结果虽把小姑娘留下了，却到底没有说清楚算什么关系。

六、斗争会

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每日怀恨，总想设法报一报仇。有一次武委会训练村干部，恰巧小二黑发疟疾没有去。训练完毕之后，金旺就向兴旺说：“小二黑是装病，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斗争他一顿。”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钉子，自然十分赞成金旺的意见，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说一下，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番。金旺老婆现任妇救会主席，因为金旺好到小芹那里去，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现在金旺回去跟她说要斗争小芹，这才是巴不得的机会，丢下活计，马上就去布置。第二天，村里开了两个斗争会，一个是武委会斗争小二黑，一个是妇救会斗争小芹。

小二黑自己没有错，当然不承认，嘴硬到底，兴旺就下命令，把他捆起来送交政权机关处理。幸而村长脑筋清楚，劝兴旺说：“小二黑发疟是真的，不是装病，至于跟别人恋爱，不是犯法的事，不能捆人家。”兴旺说：“他已是有了女人的。”村长说：“村里谁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认他的童养媳。人家不承认是对的；男不过十六，女不过十五，不到订婚年龄。十来岁小姑娘，长大也不会来认这笔账。小二黑满有资格跟别人恋爱，谁也不能干涉。”兴旺没话说了，小二黑反要问他：“无故捆人犯法不犯？”经村长双方劝解，才算放了完事。

兴旺还没有离村公所，小芹拉着妇救会主席也来找村长，她一进门就说：“村长！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说理了？”兴旺见拉着金旺的老婆，生怕说出这事与自己有关，赶紧溜走。后来村长问了问情由，费了好大一会唇

舌，才给她们调解开。

七、三仙姑许亲

两个斗争会开过以后，事情包也包不住了，小二黑也知道这事是合理合法的，索性就跟小芹公开商量起来。

三仙姑却着了急。她跟小芹虽是母女，近几年来却不对劲。三仙姑爱的是青年们，青年们爱的是小芹。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象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她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可是因为自己声名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开罢斗争会以后，风言风语都说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结婚，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想跟小二黑说句笑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托东家求西家要给小芹找婆家。

“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有个吴先生是在阎锡山部下当过旅长的退职军官，家里很富，才死了老婆。他在奶奶庙大会上见过小芹一面，愿意续她，媒人向三仙姑一说，三仙姑当然愿意。不几天过了礼帖，就算定了，三仙姑以为了却一宗心事。

小芹已经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如何肯听她娘的话？过礼那一天，小芹跟她娘闹起来，把吴先生送来的首饰绸缎扔下一地。媒人走后，小芹跟她娘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

三仙姑愁住了，睡了半天，晚饭以后，说是神上了身，打了两个呵欠就唱起来。她起先责备于福管不了家，后来说小芹跟吴先生是前世姻缘，还唱些什么“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

意活不成……”于福跪在地下哀求，神非教他马上打小芹一顿不可。小芹听了这话，知道跟这个装神弄鬼的娘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干脆躲了出去，让她娘一个人胡说。

小芹一个人悄悄跑到前庄上去找小二黑，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两个就悄悄拉着手到一个大窑里去商量对付三仙姑的法子。

八、拿 双

小芹把她娘怎样主婚怎样装神，唱些什么，从头至尾细细向小二黑说了一遍，小二黑说：“不用理她！我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说到这里，听见外边有脚步声，小二黑伸出头来一看，黑影里站着四五个人，有一个说：“拿双拿双！”他两人都听出是金旺的声音，小二黑起了火，大叫道：“拿？没有犯了法！”兴旺也来了，下命令道：“捉住捉住！我就看你犯法不犯法，给你操了好几天心了！”小二黑说：“你说去哪里咱就去哪里，到边区政府你也不能把谁怎么样！走！”兴旺说：“走？便宜了你！把他捆起来！”小二黑挣扎了一会，无奈没有他们人多，终于被他们七手八脚打了一顿捆起来了。兴旺说：“里边还有个女的，也捆起来！捉奸要双，这是她自己说的！”说着就把小芹也捆起来了。

前庄上的人都还没有睡，听见有人吵架，有些人就跑出来看，麻秆火把下看见捆着的两个人，大家不问就都知道了八九分。二诸葛也出来了，见小二黑被人家捆起来，就跪在兴旺面前哀求道：“兴旺！咱两家没有什么仇！看在我老汉面上，请

你们诸位高高手……”兴旺说：“这事情，我们管不了，送给上级再说吧！”小二黑说：“爹！你不用管！送到哪里也不犯法！我不怕他！”兴旺说：“好小子！要硬你就硬到底！”又逼住三个民兵说：“带他们走！”一个民兵问：“带到村公所？”兴旺说：“还到村公所干什么？上一回不是村长放了的？送给区武委会主任按军法处理！”说着就把他两个人拥上走了。

九、二诸葛的神课

邻居们见是兴旺弟兄们捆人，也没有人敢给小二黑讲情，直等到他们走后，才把二诸葛招呼回家。

二诸葛连连摇头说：“唉！我知道这几天要出事啦！前天早上我上地去，才上到岭上，碰上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我就知道坏了。我今年是罗睺星照运，要谨防带孝的冲了运气，因此哪里也不敢去，谁知躲也躲不过？昨天晚上二黑他娘梦见庙里唱戏。今天早上一个老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唉！反正是时运，躲也躲不过。”他罗哩罗嗦念了一大堆，邻居们听了有些厌烦，又给他说了一会宽心话，就都散了。

有事人哪里睡得着？人散了之后，二诸葛家里除了童养媳之外，三个人谁也没有睡。二诸葛摸了摸脸，取出三个制钱占了一卦，占出之后吓得他面色如土。他说：“了不得呀了不得！丑土的父母动出午火的官鬼，火旺于夏，恐怕有些危险了。唉！人家把他选成青年队长，我就说过不叫他当，小杂种硬要充人物头！人家说要按军法处理，不当队长哪里犯得了军法？”老婆也拍手跺脚道：“小爹呀！谁知道你要闯这么大的事啦？”

大黑劝道：“不怕！事已经出下了，由他去吧！我想这又不是人命事，也犯不了什么大罪！既然他们送到区上了，我先到区上打听打听！你们都睡吧！”说着点了个灯笼就走了。

二诸葛打发大黑去后，仍然低头细细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停了一会，远远听着有个女人哭，越哭越近，不大一会就来到窗下，一推门就进来了。二诸葛还没有看清是谁，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带哭带闹说：“刘修德！还我闺女！你的孩子把我的闺女勾引到哪里了？还我……”二诸葛老婆正气得死去活来，一看见来的是三仙姑，正赶上出气，从炕上跳下来拉住她道：“你来了好！省得我去找你！你母女两个好生生把我个孩子勾引坏，你倒有脸来找我！咱两人就也到区上说说理！”两个女人滚成一团，二诸葛一个人拉也拉不开，也再顾不上研究他的卦。三仙姑见二诸葛老婆已经不顾了命，自己先胆怯了几分，不敢恋战，少闹了一会挣脱出来就走了。二诸葛老婆追出门来，被二诸葛拦回去，还骂个不休。

十、恩典 恩典

二诸葛一夜没有睡，一遍一遍念：“大黑怎么还不回来，大黑怎么还不回来。”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区上走，走到半路，远远看见大黑、三个民兵已都回来了，还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员，一个交通员。他远远就喊叫道：“大黑！怎么样？要紧不要紧？”大黑说：“没有事！不怕！”说着就走到跟前，助理员跟三个民兵先走了。大黑告交通员说：“这就是我爹！”又向二诸葛说：“区上添传你跟于福老婆。你去吧，没有事！二黑跟小芹两个人，一到区上就放开了。区上早就说兴旺跟金

旺两个人不是东西，已经把他两个人押起来了，还派助理员到咱村开大会调查他们横行霸道的证据。我赶到那里人家就问罢了，听说区上还许咱二黑跟小芹结婚。”二诸葛说：“不犯罪就好，结婚可不行，命相不对！你没有听说添传我做什么？”大黑说：“不知道，大约也没有什么大事。你去吧，我先回去告我娘说。”交通员说：“老汉！这就算见了你了！你去吧，我再传那一个去！”说了就跟大黑相跟着走了。

二诸葛到了区上，看见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就指着小二黑骂道：“闯祸东西！放了你你还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吓死了！不要脸！”区长道：“干什么？区公所是骂人的地方？”二诸葛不说话了。区长问：“你就是刘修德？”二诸葛答：“是！”问：“你给刘二黑收了个童养媳？”答：“是！”问：“今年几岁了？”答：“属猴的，十二岁了。”区长说：“女不过十五岁不能订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刘二黑已经跟于小芹订婚了！”二诸葛说：“她只有个爹，也不知逃难逃到哪里去了，退也没处退。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区长说：“凡是不合法的订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都得退！”二诸葛说：“我这是两家情愿！”区长问小二黑道：“刘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小二黑说：“不愿意！”二诸葛的脾气又上来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啦？”区长道：“给他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老汉！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你家养的那个小姑娘，要真是没有娘家，就算成你的闺女好了。”二诸葛道：“那也可以，不过还得请区长恩典恩典，不能叫他跟于福这闺女订婚！”区长说：“这你就管不着了！”二诸葛发急道：“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

这是一辈子的事！”又向小二黑道：“二黑！你不要糊涂了！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区长道：“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气！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就算成你的闺女！”二诸葛还要请区长“恩典恩典”，一个交通员把他推出来了。

十一、看看仙姑

三仙姑去寻二诸葛，一来为的是逞逞闹气的本领，二来为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其实让小芹吃一吃亏她很高兴，所以跟二诸葛老婆闹了一阵之后，回去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她起得很迟，于福虽比她着急，可是自己既没有主意，又不敢叫醒她，只好自己先去做饭；饭快成的时候，三仙姑慢慢起来梳妆。于福问道：“不去打听打听小芹？”她说：“打听她做甚啦？她的本领多大啦？”于福也再没有敢说什么，把饭菜做成了放在炉边等，直等到她梳妆罢了才开饭。

饭还没有吃罢，区上的交通员来传她。她好象很得意，嗓子拉得长长地说：“闺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请区长替咱管教管教！”她吃完了饭，换上新衣服、新首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然后叫于福给她备上驴，她骑上，于福给她赶上，往区上去。

到了区上。交通员把她引到区长房子里，她趴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作主！”区长正伏在桌上写字，见她低着头跪在地下，头上戴了满头银首饰，还以为是前两天跟婆婆生了气的那个年轻媳妇，便说道：“你婆婆不是

有保人吗？为什么不找保人？”三仙姑莫名其妙，抬头看了看区长的脸。区长见是个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认错人了。交通员道：“认错人了！这就是于小芹的娘！”区长打量了她一眼道：“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来！不要装神做鬼！我什么都清楚！起来！”三仙姑站起来了。区长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三仙姑说：“四十五。”区长说：“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象个人不象？”门边站着老乡一个十来岁的小闺女嘻嘻嘻笑了。交通员说：“到外边耍！”小闺女跑了。区长问：“你会下神是不是？”三仙姑不敢答话。区长问：“你给你闺女找了个婆家？”三仙姑答：“找下了！”问：“使了多少钱？”答：“三千五！”问：“还有些什么？”答：“有些首饰布匹！”问：“跟你闺女商量过没有？”答：“没有！”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答：“不知道！”区长道：“我给你叫来你亲自问问她！”又向交通员道：“去叫于小芹！”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啾啾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于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

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区长说：“你不问我替你问！于小芹，你娘给你找的婆家你愿意跟人家结婚不愿意？”小芹说：“不愿意！我知道人家是谁？”区长问三仙姑道：“你听见了吧？”又给她讲了一会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跟小二黑订婚完全合法，还吩咐她把吴家送来的钱和东西原封退了，让小芹跟小二黑结婚。她羞愧之下，一一答应了下来。

十二、怎么到底

三个民兵回到刘家蛟，一说区上把兴旺金旺二人押起来，又派助理员来调查他们的罪恶，真是人人拍手称快。午饭后，庙里开一个群众大会，村长报告了开会宗旨，就请大家举他两个人的作恶事实。起先大家还怕扳不倒人家，人家再返回来报仇，老大一会没有人说话；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还悄悄劝大家说：“忍事者安然。”有个被他两人作践垮了的年轻人说：

“我从前没有忍过？越忍越不得安然！你们不说我说！”他先从金旺领着土匪到他家绑票说起，一连说了四五款，才说道：

“我歇歇再说，先让别人也说几款！”他一说开了头，许多受过害的人也都抢着说起来：有给他们花过钱的，有被他们逼着上过吊的，也有产业被他们霸了的，老婆被他们奸淫过的；他两人还派上民兵给他们自己割柴，拨上民夫给他们自己锄地；浮收粮，私派款，强迫民兵捆人，……你一宗他一宗，从晌午说到太阳落，一共说了五六十款。

区上根据这些罪状把他两人送到县里，县里把罪状一一证实之后，除叫他们赔偿大家损失外，又判了十五年徒刑。

经过这次大会之后，村里人也都敢出头了。不久，村干部又都经过大改选，村里人再也不敢乱投坏人的票了。这期间，金旺老婆自然也落了选。偏她还变了口吻，说：“以后我也要进步了。”

两个神仙也有了变化：

三仙姑那天在区上被一伙妇女围住看了半天，实在觉着不好意思，回去对着镜子研究了一下，真有点打扮得不象话；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卖什么老俏？这才下了个决心，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象个当长辈人的样子，把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

二诸葛那天从区上回去，又向老婆提起二黑跟小芹的命相不对，他老婆道：“把你的鬼八卦收起吧！你不是说二黑这回了不得吗？你一辈子放个屁也要卜一课，究竟抵了些什么事？我看小芹满不错，能跟咱二黑过就很好！什么命相对不对？你就不记得‘不宜栽种’？”二诸葛见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阴阳，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别人跟前卖弄他那一套了。

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见老人们的脾气都有些改变，托邻居们趁势和说和说，两位神仙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他们结婚。后来两家都准备了一下，就过门。过门之后，小两口都十分得意，邻居们都说是村里第一对好夫妻。

夫妻们在自己卧房里有时候免不了说玩话：小二黑好学三仙姑下神时候唱“前世姻缘由天定”，小芹好学二诸葛说“区长恩典，命相不对”。淘气的孩子们去听窗，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加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

（一九四三年五月 写于太行。）

李有才板话

一、书名的来历

阎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

这人现在有五十多岁，没有地，给村里人放牛，夏秋两季捎带看守村里的庄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没有家眷。他常好说两句开心话，说是“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村东头的老槐树底有一孔土窑还有三亩地，是他爹给留下的，后来把地押给阎恒元，土窑就成了他的全部产业。

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中间也有姓阎的也有杂姓，不过都是些在地户；只有东头特别，外来的开荒的占一半，日子过倒霉了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阎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

李有才常说：“老槐树底的人只有两辈——一个‘老’字辈，一个‘小’字辈。”这话也只是取笑：他说的“老”字辈，就是说外来的开荒的，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除了阎长派差派款在条子上开一下以外，别的人很少留意，人叫起来只是把他们的姓上边加个“老”字，象老陈、老秦、老常……等。他说的“小”字辈，就是其余的本地人，因为这地方人起乳名，常把前

边加个“小”字，象小顺、小保……等。可是西头那些大户人家，都用的是官名，有乳名别人也不敢叫——比方老村长阎恒元乳名叫“小囤”，别人对上人家不但不敢叫“小囤”，就是该说“谷囤”也只得说成“谷仓”，谁还好意思说出“囤”字来？一到了老槐树底，风俗大变，活八十岁也只能叫小什么，小什么，你就起上个官名也使不出去——比方陈小元前几年请柿子洼老先生给起了个官名叫“陈万昌”，回来虽然请阎长在阎账上改过了，可是老村长看账时候想不起这“陈万昌”是谁，问了一下阎长，仍然提起笔来给他改成陈小元。因为有这种关系，老槐树底的本地人，终于还都是“小”字辈。李有才自己，也只能算“小”字辈人，不过他父母是大名府人，起乳名不用“小”字，所以从小就把他叫成“有才”。

在老槐树底，李有才是大家欢迎的人物，每天晚上吃饭时候，没有他就不热闹。他会说开心话，虽是几句平常话，从他口里说出来就能引得大家笑个不休。他还有个特别本领是编歌子，不论村里发生件什么事，有个什么特别人，他都能编一大套，念起来特别顺口。这种歌，在阎家山一带叫“圪溜嘴”，官话叫“快板”。

比方说：西头老户主阎恒元，在抗战以前年年连任村长，有一年改选时候，李有才给他编了一段快板道：

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
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
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
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
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

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換，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爛。

恒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学教员，名叫家祥，一九三〇年在县里的简易师范毕业。这人的相貌不大好看，脸象个葫芦瓢子，说一句话映十来次眼皮。不过人不可以貌取，你不要以为他没出息，其实一肚肮脏计，谁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亏。李有才也给他编过一段快板道：

鬼眨眼，閻家祥，
眼睫毛，二寸长，
大腮蛋，塌鼻梁，
說句話儿眼皮忙。
两眼一忽閃，
肚里有主张，
強占三分理，
总要沾些光。
便宜占不足，
气得脸皮黄，
眼一挤，嘴一张，
好像母猪打哼哼！

象这些快板，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编，一方面是他编惯了觉着口顺，另一方面是老槐树底的年轻人吃饭时候常要他念些新的，因此他就越编越多。他的新快板一念出来，东头的年轻

人不用一天就都传遍了，可是想传到西头就不十分容易。西头的人不论老小，没事总不到老槐树底来闲坐，小孩们偶尔去老槐树底玩一玩，大人知道了往往骂道：“下流东西！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树底去住啦！”有这层隔阂，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传到西头。

抗战以来，阎家山有许多变化，李有才也就跟着这些变化作了些新快板，又因为作快板遭过难。我想把这些变化谈一谈，把他在这些变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几段，给大家看看解个闷，结果就写成这本小书。

作诗的人，叫“诗人”；说作诗的话，叫“诗话”。李有才作出来的歌，不是“诗”，明明叫做“快板”，因此不能算“诗人”，只能算“板人”。这本小书既然是说他作快板的话，所以叫做《李有才板话》。

二、有才窑里的晚会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窑，说也好笑，三面看来有三变，门朝南开，靠西墙正中有个炕，炕的两头还都留着五尺长短的地面。前边靠门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着些水缸、菜瓮、锅、匙、碗、碟；靠后墙摆着些筐子、箩头，里面装的是村里人送给他的核桃、柿子（因为他是看庄稼的，大家才给他送这些）；正炕后墙上，就炕那么高，打了半截套窑，可以铺半条席子；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好象个小山果店；扭转头看西边，好象石菩萨的神龛；回头来看窗下，又好象小村子里的小饭铺。

到了冷冻天气，有才好象一炉火——只要他一回家，爱取

笑的人们就围到他这土窑里来闲谈；谈起活来也没有什么题目，扯到哪里算哪里。这年正月二十五日，有才吃罢晚饭，邻家的青年后生小福，领着他的表兄就开开门走进来。有才见有人来了，就点起墙上挂的麻油灯。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绍道：“这就是我们这里的有才叔！”有才在套窑里坐着，先让他们坐到炕上，就向小福道：“这是哪里的客？”小福道：“是我表兄！柿子洼的！”他表兄虽然年轻，却很精干，就谦虚道：“不算客，不算客！我是十六晚上在这里看戏，见你老叔唱焦光普唱的那样好，想来领领教！”有才笑了一笑又问道：“你村的戏今年怎么不唱了？”小福的表兄道：“早了赁不下箱，明天才能唱！”有才见他说起唱戏，劲上来了，就不客气的讲起来。他讲：“这焦光普，虽说是个丑，可是个大脚色，唱就得唱出劲来！”说着就举起他的旱烟袋算马鞭子，下边虽然坐着，上边就抡打起来，一边抡着一边道：“一出场，当当当当当令×令当令×令……当令×各拉打打当！”他煞住第一段家伙，正预备接着打，门“拍”一声开了，走进来个小顺，拿着两个软米糕道：“慢着老叔！防备着把锣打破了！”说着走到炕边把胳膊往套窑里一展道：“老叔！我爹请你尝尝我们的糕！”（阴历正月二十五，此地有个节叫“添仓”，吃黍米糕）有才一边接着一边谦让道：“你们自己吃吧！今天煮的都不多！”说着接过去，随便让了让大家，就吃起来。小顺坐到炕上道：“不多吧总不能象启昌老婆，过个添仓，派给人家小旦两个糕！”小福道：“雇不起长工不雇吧，雇得起管不起吃？”有才道：“启昌也还罢了，老婆不是东西！”小福的表兄问道：“哪个小旦？就是唱国舅爷那个？”小福道：“对！老得贵的孩子给启昌住长工。”小顺道：“那么可比他爹那人强一百二十分！”有才

道：“那还用说？”小福的表兄悄悄问小福道：“老得贵怎么？”他虽说得很低，却被小顺听见了，小顺道：“那是有歌的！”接着就念道：

张得贵，真好汉，
跟着恒元舌头转：
恒元说个“长”，
得贵说“不短”；
恒元说个“方”，
得贵说“不圆”；
恒元说“砂锅能捣蒜”，
得贵就说“打不烂”；
恒元说“公鸡能下蛋”，
得贵就说“亲眼见”。
要干啥，就能干，
只要恒元嘴动弹！

他把这段快板念完，小福听惯了，不很笑。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个不了。

小顺道：“你笑什么？得贵的好事多着哩！那是我们村里有名的吃烙饼干部。”小福的表兄道：“还是干部啦？”小顺道：“农会主席！官也不小。”小福的表兄道：“怎么说是吃烙饼干部？”小顺说：“这村跟别处不同：谁有个事到公所说，先得十几斤面五斤猪肉，在场的每人一斤面烙饼，一大碗菜，吃了才说理。得贵领一份烙饼，总得把每一张烙饼都挑过。”小福的表兄道：“我们村里早二三年前说事就不兴吃喝了。”小

顺道：“人家哪一村也不兴了，就这村怪！这都是老恒元的古规。老恒元今天得个病死了，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

正说着，又来了几个人：老秦^①、小元、小明、小保。一进门，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道：“什么？什么？”小明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长撤差了！”小顺从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戏！”小福道：“我也算数！”有才道：“还有今天？我当他这饭碗是铁箍箍住了！谁说的？”小元道：“真的！章工作人员来了，带着公事！”小福的表兄问小福道：“你村人跟喜富的仇气就这么大？”小顺道：“那也是

一只虎，闹喜富，
吃吃喝喝有来路；
当过兵，卖过土，
又偷牲口又放赌，
当牙行，卖寡妇……
什么事情都敢做。
惹下他，防不住，
人人见了满招呼！

你看仇恨大不大？”小福的表兄听罢才笑了一声，小明又拦住告诉他道：“柿子洼客你是不知道！他念的那还是说从前，抗战以后这东西趁着兵荒马乱抢了个村长，就更了不得了，有恒元那老不死给他撑腰，就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屁大点事弄到

^①即小福的爹。

公所，也是桌面上吃饭，袖筒里过钱，钱淹不住心，说捆就捆，说打就打，说教谁倾家败产谁就没法治。逼得人家破了产，老恒元管‘贱钱二百’，买房买地。老槐树底这些人，进了村公所，谁也不敢走到桌边。三天两头出款，谁敢问问人家派的是什么钱；人家姓阎的一年四季也不见走一回差，有差事都派到老槐树底，谁不是荒着地给人家支？……你是不知道，坏透了坏透了！”有才低声问道：“为什么事撤了的？”小保道：

“这可还不知道，大概是县里调查出来的吧？”有才道：“光撤了差放在村里还是大害，什么时候毁了他才能算干净，可不知道县里还办他不办？”小保道：“只要把他弄下台，攻他的人可多啦！”

远远有人喊道：“明天到庙里选村长啦，十八岁以上的人都得去……”一连声叫喊，声音越来越近，小福听出来了，便向大家道：“是得贵！还听不懂他那贱噪？”进来了，就是得贵。他一进来，除了有才是主人，随便打了个招呼，其余的人都没有说话，小福小顺彼此挤了挤眼。得贵道：“这里倒热闹！省得我跑！明天选村长啦，凡年满十八岁者都去！”又把嗓子放得低低的：“老村长的意思叫选广聚！谁不在这里，你们碰上告诉给他们一声！”说着抽身就走了。他才一出门，小顺抢着道：“吃烙饼去吧！”小元道：“吃屁吧！章工作人员还在这里住着啦，饼恐怕烙不成！”老秦埋怨道：“人家听见了！”小元道：“怕什么？就是故意叫他听啦。”小保道：“他也学会打官腔了：‘凡年满十八岁者’……”小顺道：“还有‘老村长的意思’。”小福道：“假大头这回要变真大头啦呀！”小福的表兄问小福道：“谁是假大头？”小顺抢着道：“这也有歌：

刘广聚，假大头：
一心要当人物头，
抱粗腿，借势头，
拜认恒元干老头。
大小事，强出头，
说起话来歪着头。
从西头，到东头，
放不下广聚这颗头。

一念歌你就清楚了。”小福的表兄觉着很奇怪，也没有顾上笑，又问道：“怎么你村有这么多的歌？”小顺道：“提起西头的人来，没有一个没歌的，连哪一个女人脸上有麻子都有歌。不只是人，每出一件新事，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来了。”又指着有才道：“有我们这位老叔，你想听歌很容易！要多少有多少！”

小元道：“我看咱们也不用管他‘老村长的意思’不意思，明天偏给他放个冷炮，揽上一伙人选别人，偏不选广聚！”老秦道：“不妥不妥，指望咱老槐树底人谁得罪起老恒元？他说选广聚就选广聚，瞎惹那些气有什么好处？”小元道：“你这老汉真见不得事！只怕柿叶掉下来碰破你的头，你不敢得罪人家，也还不是照样替人家支差出款？”老秦这人有点古怪，只要年轻人一发脾气，他就不说话了。小保向小元道：“你说得对，这一回真是该扭扭劲，要是再选上个广聚还不是仍出不了恒元老家伙的手吗？依我说咱们老槐树底的人这回就出出头，就是办不好也比搓在他们脚板底强得多！”小保这么一说，大家都同意，只是决定不了该选谁好。依小元说，小保就可以

办；老陈觉得要是选小明，票数会更多一些；小明却说在大场面上说个话还是小元有两下子。李有才道：“我说个公道话吧，要是选小明老弟，保管票数最多，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办，他这人太好，太直，跟人家老恒元那伙人斗个什么事恐怕没有人家的心眼多。小保领过几年羊①，在外边走的地方也不少，又能写能算，办倒没有什么办不了，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个人吃饭，真也有点顾不上。依我说，小元可以办，小保可以帮他记一记账，写个什么公事……”这个意见大家赞成了。小保向大家道：“要那样咱们出去给他活动活动！”小顺道：“对！宣传宣传！”说着就都往外走。老秦着了急，叫住小福道：“小福！你跟人家逞什么能？给我回去！”小顺拉着小福道：“走吧走吧！”又回头向老秦道：“不怕！丢了你小福我包赔！”说了就把小福拉上走了。老秦赶紧追出来连声喊叫，也没有叫住，只好领上外甥②回去睡觉。

窑里丢下有才一个人，也就睡了。

三、打 虎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有才放出牛来预备往山坡上送，小顺拦住他道：“老叔你不要走了！多一票算一票！今天还许弄成，已经给小元弄到四十多票了。”有才道：“误不了！我把牛送到椒洼就回来。这时候又不怕吃了谁的庄稼！章工作员开会，一讲话还不是一大晌？误不了！”小顺道：“这一回是选举会，又不是讲话会。”有才道：“知道！不论什么会，他在开头总

①就是当羊经理。 ②小福的表兄。

要讲几句‘重要性’啦，‘什么的意义及其价值’啦，光他讲讲这些我就回来了！”小顺道：“那你去吧！可不要叫误了！”说着就往庙里去了。

庙里还跟平常开会一样，章工作员、各干部坐在拜厅上，群众站在院里，不同的只是因为喜富撤了差，大家要看看他还威风不威风，所以人来得特别多。

不大一会，人到齐了，喜富这次当最后一回主席。他虽然沉着气，可是嗓子究竟有点不自然，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请章工作员讲话。章工作员这次也跟从前说话不同了，他没有讲什么“意义”与“重要性”，直截了当说道：“这里的村长，犯了一些错误，上级有命令叫另选。在未选举以前，大家对旧村长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一提。”大家对喜富的意见，提一千条也有，可是一来没有准备，二来碍于老恒元的面子，三来差不多都怕喜富将来记仇，因此没有人敢马上出头来提，只是交头接耳商量。有的说“趁此机会不治他，将来是村上的大害”；有的说“能送死他自然是好事，送不死，一旦放虎归山必然要伤人”……议论纷纷，都没有主意。有个马凤鸣，当年在安徽卖过茶叶，是张启昌的姐夫，在阎家山下了户。这人走过大地方，开通一点，不象阎家山人那么小心小胆。喜富当村长的第一年，随便欺压村民，有一次压迫到他头上，当时惹不过，只好忍过去。这次喜富已经下了台，他想趁势算一下旧账，便悄悄向几个人道：“只要你们大家有意见愿意提，我可以打头一炮！”马凤鸣说愿意打头一炮，小元先给他鼓励道：“提吧！你一提我接住就提，说开头多着哩！”他们正商量着，章工作员在台上等急了，便催道：“有没有？再限一分钟！”马凤鸣站起来道：“我有个意见：我的地上边是阎五的坟地，坟地堰上的荆条、

酸枣树，一直长到我的地后，遮住半块地不长庄稼。前年冬天我去砍了一砍，阎五说出话来，报告到村公所，村长阎喜富给我说的，叫我杀了一口猪给阎五祭祖，又出了二百斤面叫所有的阎家人大吃一顿，罚了我五百块钱，永远不准我在地后砍荆条和酸枣树。猪跟面大家算吃了，钱算我出了，我都能忍过去不追究，只是我种地出着负担永远叫给人家长荆条和酸枣树，我觉着不合理。现在要换村长，我请以后开放这个禁令！”章工作人员好象有点吃惊，问大家道：“真有这事？”除了姓阎的，别人差不多齐声答道：“有！”有才也早回来了，听见是说这事，也在中间发冷话道：“比那更气人的事还多得多！”小元抢着道：“我也有个意见！”接着说了一件派差事。两个人发言以后，意见就多起来，你一款我一款，无论是花黑钱、请吃饭、打板子、罚苦工……只要是喜富出头作的坏事，差不多都说出来了；可是与恒元有关系的事差不多还没人敢提，直到晌午，意见似乎没人提了，章工作人员气得大瞪眼，因为他常在这里工作，从来也不会想到有这么多的问题。他向大家发命令道：“这个好村长！把他捆起来！”一说捆喜富，当然大家很有劲，也不知道上来多少人，七手八脚把他捆成了个倒缚兔。他们问送到哪里，章工作人员道：“且捆到下面的小屋里，拨两个人看守着，大家先回去吃饭，吃了饭选过村长，我把他带回区上去！”小顺、小福还有七八个人抢着道：“我看守！我看守！”小顺道：“迟吃一会饭有什么要紧？”章工作人员又道：“找个人把上午大家提的意见写成个单子作为报告，我带回去！”马凤鸣道：“我写！”小保道：“我帮你！”章工作人员见有了人，就宣布散了会。

这天晌午，最着急的是恒元父子，因为有好多案件虽是喜

富出头，却还是与他们有关的。恒元很想吩咐喜富一下叫他到县里不要乱说，无奈那么许多人看守着，没有空子，也只好罢了。吃过午饭，老恒元说身体有点不舒服，只打发儿子家祥去照应选举的事，自己却没有去。

会又开了，章工作员宣布新的选举办法道：“按正规的选法，应该先选村代表，然后由代表会里产生村长，可是现在来不及了。现在我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大家先提出三个候选人，然后用投票的法子从三个人中选一个。投票的办法，因为不识字的人很多，可以用三个碗，上边画上記号，放到人看不见的地方，每人发一颗豆，愿意选谁，就把豆放到谁的碗里去，这个办法好不好？”大家齐声道：“好！”这又出了家祥意料之外；他仗着一大部分人离不了他写票，谁知章工作员又用了这个办法。办法既然改了，他借着自己是个教育委员，献了个殷勤，去准备了三个碗，顺路想在这碗上想点办法。大家把三个候选人提出来了：刘广聚是经过老恒元的运动的，自然在数，一个是马凤鸣，一个就是陈小元。家祥把一个红碗两个黑碗上贴了名字向大家声明道：“注意！一会把这三个碗放到里边殿里，次序是这样：从东往西，第一个，红碗，是刘广聚！第二个是马凤鸣，第三个是陈小元。再说一遍：从东往西，第一个，红碗，是刘广聚！第二个是马凤鸣，第三个是陈小元。”说了把碗放到殿里的供桌上，然后站东过西每人发了一颗豆，发完了就投起来。一会，投票完了，结果是马凤鸣五十二票，刘广聚八十八票当选，陈小元八十六票，跟刘广聚只差两票。

选举完了，章工作员道：“我还要回区上去。派两个人跟我相跟上把喜富送去！”家祥道：“我派我派！”下边有几个人齐声道：“不用你派，我去！我去！”说着走出十几个人来。

章工作员道：“有两个就行！”小元道：“多去几个保险！”结果有五个去。章工作员又叫人取来了马凤鸣跟小保写的报告，就带着喜富走了。

刘广聚当了村长，送走章工作员之后，歪着头，到恒元家里去——一方面是谢恩，一方面是领教，老恒元听了家祥的报告，知道章工作员把喜富带走，又知道小元跟广聚只差两票，心里着实有点不安，少气无力向广聚道：“孩子！以后要小心点！情况变得有点不妙了！马凤鸣，一个外来户，也要翻眼；老槐树底人也起了反了！”说着伸出两个指头来道：“你看危险不危险？两票！只差两票！”又吩咐他道：“孩子以后要买一买马凤鸣的账，捡那不重要的委员给他当一个——就叫他当个建设委员也好！象小元那些没天没地的东西，以后要找个机会重重治他一下，要不就压不住东头那些东西。不过现在还不敢冒失，等喜富的事有个头尾再说！回去吧孩子！我今天有点不得劲，想早点歇歇！”广聚受完了这番训，也就辞出。

这天晚上，李有才的土窑里自然也是特别热闹，不必细说。第二天便有两段新歌传出来，一段是：

正月二十五，打倒一只虎；
到了二十六，老虎更吃苦，
大家提意见，尾巴藏不住，
咕咚按倒地，打个背绑兔。
家祥干瞪眼，恒元扇一裤。
大家哈哈笑，心里满舒服。

还有一段是：

老恒元，真混賬，
抱住村长死不放。
說选举，是假样，
侄儿下来干儿上。①

四、丈 地

自从把喜富带走以后，老恒元总是放心不下，生怕把他与自己有关的事攀扯出来，可是现在的新政府不比旧衙门，有钱也花不进去，打发家祥去了几次也打听不着，只好算了。过了三个月，县里召集各村村长去开会，老恒元托广聚到县里顺便打听喜富的下落。

隔了两天，广聚回来了，饭也没有吃，歪着头，先到恒元那里报告。恒元躺着，他坐在床头必恭必敬地报告道：“喜富的事，因为案件过多，喜富不愿攀出人来，直拖累了好几个月才算结束。所有麻烦，喜富一个人承认起来了，县政府特别宽大，准他呈递悔过书赔偿大众损失，就算完事。”恒元长长吐了口气道：“也算！能不多牵连别人就好！”又问道：

“这次开会商议了些什么？”广聚道：“一共三件事：第一是确实执行减租，发了个表格，叫填出佃户姓名，地主姓名，租地亩数，原租额多少，减去多少。第二是清丈土地，办法是除了政权、各团体干部参加外，每二十户选个代表共同丈量。第三

①喜富是恒元的本家侄儿，广聚是干儿。

是成立武委会发动民兵，办法是先选派一个人，在阳历六月十五号以前到县受训。”老恒元听说喜富的案件已了，才放心了一点，及至听到这些事，眉头又打起皱来。他等广聚走了，便跟儿子家祥道：“这派人受训没有什么难办，依我看还是巧招兵，跟阎锡山要的在乡军人一样，随便派上个谁就行了。减租和丈地两件事，在阎家山说来，只是对咱不利。不过第一件还好办，只要到各窝铺上说给佃户们一声，就叫他们对外人说是已经减过租了，他们怕夺地，自然不敢不照咱的话说，回头村公所要造表，自然还要经你的手，也不愁造不合适。只有这第二件不好办，丈地时候参加那么多人，如何瞒得过去？”家祥眯着眼道：“我看也好应付！说各干部吧！村长广聚是自己人，民事委员教育委员是咱父子俩，工会主席老范是咱的领工，咱一家就出三个人。农会主席得贵还不是跟着咱转？财政委员启昌，平常打的是不利不害主义，只要不叫他吃亏，他也不说什么。他孩子小林虽然是个青救干部，啥也不懂。只有马凤鸣不好对付，他最精明，又是个外来户，跟咱都不一心，遇事又敢说话，他老婆桂英又是个妇救干部，一家也出着两个人……”老恒元道：“马凤鸣好对付：他们做过生意的人最爱占便宜，叫他占上些便宜他就不说什么了。我觉得最难对付的是每二十户选的那一个代表，人数既多，意见又不一致。”家祥道：“我看不选代表也行。”恒元道：“不妥！章工作人员那小子腿勤，到丈地时候他要来了怎么办？我看代表还是要，不过可以由村长指派，派那些最穷、最爱打小算盘的人，象老槐树底老秦那些人。”家祥道：“这我就不懂了，越是穷人，越出不起负担，越要细丈别人的地……”恒元道：“你们年轻人自然想不通，咱们丈地时候，先尽那最零碎的地方丈起——比

方咱‘椒洼’地，一亩就有七八块，算的时候你执算盘，慢慢细算。这么着丈量，一个椒洼不上十五亩地就得丈两天。他们那些爱打小算盘的穷户，哪里误得起闲工？跟着咱们丈过两三天，自然就都走开了。等把他们熬败了，咱们一方面说他们不积极不热心，一方面还不是由咱自己丈吗？只要做个样子，说多少是多少，谁知道？”家祥道：“可是我见人家丈过的地还插牌子！”恒元道：“山野地，块子很不规矩，每一处只要把牌子上写个数目——比方‘自此以下至崖根共几亩几分’谁知道对不对？要是再用点小艺道买一买小户，小户也就不说话了——比方你看他一块有三亩，你就说‘小户人家，用不着细盘量了，算成二亩吧！’这样一来，他有点小虚数，也怕多量出来，因此也就不想再去量别人的！”

恒元对着家祥训了这一番话，又打发他去请来马凤鸣。马凤鸣的地都是近二十年来新买的，不过因为买得刁巧一点，都是些大亩数——往往完一亩粮的地就有二三亩大。老恒元说：

“你的地既然都是新买的，可以不必丈量，就按原契插牌子。”马凤鸣自然很高兴。恒元又叫家祥叫来了广聚，把自己的计划宣布了一番。广聚一来自己地多，二来当村长就靠的是恒元，当然没有别的话说。

第二天便依着计划先派定了丈地代表，第三天便开始丈地。果不出恒元所料，章工作人员来了，也跟着去参观，恒元说：“先丈我的！”村长广聚领头，民事委员阎恒元、教育委员阎家祥、财政委员张启昌、建设委员马凤鸣、农会主席张得贵、工会主席老范、妇救会主席桂英、青救会主席小林，还有十余个新派的代表们，带着丈地的弓、算盘、木牌、笔砚等，章工作人员也跟在后边，往椒洼去了。

广聚管指划，得贵执弓，家祥打算盘。每块地不够二分，可是东伸一个角西打一个弯，还得分成四五块来算。每丈量完了一块，休息一会，广聚给大家讲方的该怎样算，斜的该怎样折，家祥给大家讲“飞归得亩”之算法。大家原来不是来学习算地亩，也都听不起劲来，只是觉着丈量的太慢。章工作员却觉着这办法很细致，说是“丈地的模范”，说了便往柿子洼编村去了。

果不出恒元所料，两天之后，椒洼地没有丈完，就有许多人不再来了。到了第五天，临出发只集合了七个人：恒元父子带领工老范是三个，广聚一个，得贵一个，还有桂英跟小林，一个没经过事的女人，一个小孩子。恒元摇着芭蕉扇，广聚端着水烟袋，领工老范捎着一张镬，小林捎着个镰预备割柴，桂英肚里怀着孕，想拔些新鲜野菜，也捎着个篮子，只有得贵这几天在恒元家里吃饭，自然要多拿几件东西——丈地弓、算盘、笔砚、木牌，都是他一个人抱着。出发地点是椒洼后沟，也是恒元的地，出发时候，恒元故意发脾气道：“又都不来了！那么多的委员，只说话不办事，好象都成了咱们七八个人的事了！”说着就出发了。这条沟没有别人的地，连样子也不用装，一进了沟就各干各的：桂英吃了几颗青杏，就走了岔道拔菜去了，小林也吃了几颗跟桂英一道割柴去了，家祥见堰上塌了个小壑，指挥着老范去垒，得贵也放下那些家具去帮忙，恒元跟广聚，到麦地边的核桃树底趁凉快说闲话去。

这天有才恰在这山顶上看麦子，见进沟来七八个人，起先还以为是偷麦子的，后来各干其事了，虽然离得远了认不清人，可是做的事也都看得很清楚，只有到核桃树底去的那两个人不知是干什么的。他又往前凑了一凑，能听见说说笑笑，却听不见说什么。他自言自语道：“这是两个什么鬼东西，我总要等

你们出来！”说着就坐在林边等着。直到天快晌午，见有个人从核桃树下钻出来喊道：“家祥！写牌来吧！”这一下听出来了，是恒元。垒堰那三个人也过来了两个，一个是家祥，一个是老范。家祥写了两个木牌，给了老范一块，自己拿着一块。老范那块插在东圪嘴上，家祥那块插在麦地边。牌子插好，就叫来了桂英、小林，七个人相跟着回去了。有才见得贵拿着弓，才想起来人家是丈地，暗自寻思道：“这地原是这样丈的？我总要看看牌上写的是是什么！”一边想，一边绕着路到沟底看牌。两块牌都看了，麦地边那块写的是：“自此至沟掌，大小十五块，共七亩二分二厘。”东圪嘴上那块写的是：“圪嘴上至崖根，共三亩二分八厘。”他看完了牌，觉着好笑。回来在路上编了这样一段歌：

丈地的，真奇怪，
七个人，不一块；
小林去割柴，桂英去拔菜，
老范得贵去垒堰，家祥一旁乱指派，
只有恒元与广聚；核桃树底趁凉快，
芭蕉扇，水烟袋，
说说笑笑真不坏。
坐到小晌午，叫过家祥来，
三人一捏弄，家祥就写牌，
前后共算十亩半，木头牌子插两块。
这些鬼把戏，只能哄小孩；
从沟里到沟外，平地坡地都不坏，
一共算成三十亩，管保恒元他不卖！

五、好怕的“模范村”

过了几天，地丈完了他们果然给小户人家送了些小便宜，有三亩只估二亩，有二亩估作亩半。丈完了地这一晚上，得贵想在小户们面前给恒元卖个好，也给自己卖个好，因此在恒元家吃过晚饭，跟家祥们攀谈了几句，就往老槐树底来。老槐树底人也都吃过了饭，在树下纳凉、谈闲话，说说笑笑，声音很高。他想听一听风头对不对，就远远在路口站住步侧耳细听。只听一个人道：“小且！你不能劝劝你爹以后不要当恒元的尾巴？人家外边说多少闲话……”又听见小且拦住那人的话抢着道：“哪天不劝他？可是他不听有什么法？为这事不知生过多少气？有时候他在老恒元那里拿一根葱、几头蒜，我娘也不吃他的，我也不吃他的，就那他也不改！”他听见是自己的孩子说自己，更不便走进场，可是也想再听听以下还说些什么，所以也舍不得走开。停了一会，听得有才问道：“地丈完了？老恒元的地丈了多少？”小且道：“听说是一百一十多亩。”小元道：“哄鬼也哄不过！不用说他原来的祖业，光近十年来的押地也差不多有那么多！”小保道：“押地可好算，老槐树底的人差不多都是把地押给他才来的！”说着大家就七嘴八舌，三亩二亩给他算起来，算的结果，连老槐树底带村里人，押给恒元的地，一共就有八十四亩。小元道：“他通年雇着三个长工，山上还有六七家窝铺，要是细量起来，丈不够三百亩我不姓陈！”小顺道：“你不说人家是怎样丈的？你就没听有才老叔编的歌？‘丈地的，真奇怪，七个人，不一块……’”接着把那一段歌念了一遍，念得大家哈哈大笑。老秦道：“我看人

家丈得也公道，要宽都宽，象我那地明明是三亩，只算了二亩！”小元道：“那还不是哄小孩？只要把恒元的地丈公道了，咱们这些户，二亩也不出负担，三亩还不出负担；人家把三百亩丈成一百亩，轮到你名下，三亩也得出，二亩也得出！”①

得贵听到这里，知道大家已经猜透了恒元的心事，这个好已经卖不出去，就返回来想再到恒元这里把方才听到的话报告一下。他走到恒元家，恒元已经睡了，只有家祥点着灯造表，他便把方才听到的话和有才的歌报告给家祥，中间还加了一些骂恒元的话。家祥听了，沉不住气，两眼眦得飞快，骂了小元跟有才一顿，得贵很得意地回去睡了。

第二天，不等恒元起床，家祥就去报告昨天晚上的事。恒元听了，倒不在乎骂不骂，只恨他们不该把自己的心事猜得那么透彻，想了一会道：“非重办他几个不行！”吃过了饭，叫来了广聚，数说了小元跟有才一顿罪状，末了吩咐道：“把小元选成什么武委会送到县里受训去，把有才撵走，永远不准他回阎家山来！”

广聚领了命即刻召开了个选人受训的会，仿照章工作人员的办法推了三个候选人，把小元选在三人里边，然后投豆子；可是得贵跟家祥两个人，每人暗暗抓了一把豆子都投在小元的碗里，结果把小元选住了。

村里人，连恒元、广聚都算上，都只说是拔壮丁当兵。小元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又没有吃的，全仗小元养活，一见说把小元选住了，哭着去哀求广聚。广聚奉的是恒元的命令，哀求也没有效。得贵很得意，背地里卖俏说：“谁叫他评论丈地的

①当时行的是累进税制。

事？”这话传到老槐树底，大家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小明见邻居们有点事，最能热心帮助。他见小元他娘哀求也无效，就去找小保、小顺等一千人来想办法。小保道：“我看人家既是有计划的，说好话也无用。依我说就真当了兵也不是坏事，大家在一处都不错，谁还不能帮一把忙？咱们大家可以招呼他老娘几天。”小明向小元道：“你放心吧！也没有多余的事！烧柴吃水，一个人能费多少，你那三亩地，到了忙时候一个人抽一晌工夫就给你捎带了！”小元的叔父老陈为人很痛快，他向大家谢道：“事到头上讲不起，既然不能不去，以后自然免不了麻烦大家照应，我先替小元谢谢！”小元也跟着说了许多道谢的话。

在村公所这方面，减租跟丈地的两份表也造成了，受训的人也选定了，做了一份报告，吃过午饭，拨了个差，连小元一同送往区上。把这三件工作交代过，广聚打发人把李有才叫到村公所，歪着头，拍着桌子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他“造谣生事”，又说“简直象汉奸”，最后下命令道：“即刻给我滚蛋！永远不许回阎家山来！不听我的话我当汉奸送你！”有才无法，只好跟各牛东算了算账，搬到柿子洼编村去住。

隔了两天，章工作人员来了，带着县里来的一张公事，上写道：“据第六区公所报告，阎家山编村各干部工作积极细致，完成任务甚为迅速，堪称各村模范，特传令嘉奖以资鼓励……”自此以后，阎家山就被称为“模范村”了。

六、小元的变化

两礼拜过后，小元受训回来了，一到老槐树底，大家就都

来问询，在地里做活的，虽然没到晌午，听到小元回来的消息的也都赶回来问长问短。小元很得意地道：“依他们看来这一回可算把我害了，他们哪里想得到又给咱们弄了个合适？县里叫咱回来成立武委会，发动民兵，还允许给咱们发枪，发手榴弹。县里说：‘以后武委会主任跟村长是一文一武，是独立系统，不是附属在村公所’；并且给村长下的公事教他给武委会准备一切应用物件。从今以后，村里的事也有咱老槐树底的份了。”小顺道：“试试！看他老恒元还能独霸乾坤不能？”小明道：“你的苗也给你锄出来了。老人家也没有饿了肚，这家送个干粮，那家送碗汤，就够她老人家吃了。”小元自是感谢不提。

吃过午饭，小元到了村公所，把县里的公事取出来给广聚看。广聚一看公事，知道小元有权了，就拿上公事去找恒元。

恒元看了十分后悔道：“想不到给他做了个小合适！”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道：“既然错了，就以错上来——以后把他团弄住，叫他也变成咱的人！”广聚道：“那家伙有那么一股扭劲，恐怕团弄不住吧！”恒元道：“你不懂！这只能慢慢来！咱们都捧他的场，叫他多占点小便宜，‘习惯成自然’，不上几个月工夫，老槐树底的日子他就过不惯了。”

广聚领了恒元的命，把一座庙院分成四部分：东社房上三间是村公所，下三间是学校，西社房上三间是武委会主任室，下三间留作集体训练民兵之用。

民兵动员起来了，差不多是老槐树底那一伙子，常和广聚闹小意见，广聚觉得很难对付。后来广聚常到恒元那里领教去，慢慢就生出法子来。比方广聚有制服，家祥有制服，小元没有，住在一个庙里觉着有点比配不上，广聚便道：“当主任不

可以没制服，回头做一套才行！”隔了不几天，用公款做的新制服给小元拿来了。广聚有水笔，家祥有水笔，小元没有，觉着小口袋上空空的，家祥道：“我还有一支回头送你！”第二天水笔也插起来了。广聚不割柴，家祥不割柴，小元穿着制服来割了一回柴，觉着不好意思，广聚道：“能烧多少？派个民兵去割一点就够了！”

从此以后，小元果然变了，割柴派民兵，担水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当主任。他叔父老陈，见他的地也荒了，一日就骂他道：“小元你看！近一两月来象个什么东西！出来进去架两条胳膊，连水也不能担了，柴也不能割了！你去受训，人家大家给你把苗锄出来，如今秀了一半穗了，你也不锄二遍，草比苗还高，看你秋天吃什么？”小元近来连看也没有到地里看过，经老陈这一骂，也觉得应该到地里看看去。吃过早饭，扛了一把锄，正预备往地里走，走到村里，正碰上家祥吃过饭往学校去。家祥含笑道：“锄地去啦？”小元脸红了，觉着不象个主任身份，便喃喃地道：“我到地里看看去！”家祥道：“歇歇谈一会闲话再去吧！”小元也不反对，跟着家祥走到庙门口，把锄放在门外，就走进去跟家祥、广聚闲谈起来，直谈到晌午才回去吃饭去。吃过饭，总觉着不可以去锄地，结果仍是第二天派了两个民兵去锄。

这次派的是小顺跟小福，这两个青年虽然也不敢不去，可是总觉着不大痛快，走到小元地里，无精打采慢慢锄起来。他两个一边锄一边谈。小顺道：“多一位菩萨多一炉香！成天盼望主任给咱们抵些事，谁知道主任一上了台，就跟人家混得很热，除了多派咱几回差，一点什么好处都没有！”小福道：“头一遍是咱给他锄，第二遍还教咱给他锄！”小顺道：“那可不

一样；头一遍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们大家情愿帮忙，第二遍是人家升了官，不能锄地了，派咱给人家当差。早知道落这个结果，帮忙？省点气力不能睡觉？”小福道：“可惜把个有才老汉也撵走了，老汉要在，一定要给他编个好歌！”小顺道：“咱不能给他编个试试？”小福道：“可以！我帮你！”给小元锄地，他们既然有点不痛快，所以也不管锄到了没有，留下草了没有，只是随手锄过就是，两个人都把心用在编歌子上。小顺编了几句，小福也给他改了一两句，又添了两句，结果编成了这么一段短歌：

陈小元，坏得快，
当了主任耍气派，
改了穿，换了戴，
坐在庙上不下来，
不担水，不割柴，
蹄蹄爪爪不想抬，
锄个地，也派差，
逼着邻居当奴才。

小福晚上悄悄把这个歌念给两三个青年听，第二天传出去，大家都念得烂熟，小元在庙里坐着自然不得知道。

这还都是些小事，最叫人可恨的是把喜富赔偿群众损失这笔款，移到武委会用了。本来喜富早两个月就递了悔过书出来了，只是县政府把他应赔偿群众的款算了一下，就该着三千四百余元，还有几百斤面、几石小米。这些东西有一半是恒元用了，恒元就着人告喜富暂且不要回来，有了机会再说。

恰巧“八一”节要检阅民兵，小元跟广聚说，要做些挂包、子弹袋、炒面袋，还要准备七八个人三天的吃喝。广聚跟恒元一说，恒元觉着机会来了，开了个干部会，说公所没款，就把喜富这笔款移用了。大家虽然听说喜富要赔偿损失，可是谁也没听说赔多少数目。因为马凤鸣的损失也很大，遇了事又能说两句，就有些人怂恿着他去质问村长。马凤鸣跟恒元混熟了，不想得罪人，可是也想得赔偿，因此借着大家的推举也就答应了。但是他知道村长不过是个假样子，所以先去找恒元。他用自己人报告消息的口气说：“大家对这事情很不满意，将来恐怕还要讨这笔款！”老恒元就猜透他的心事，便向他道：“这事怕不好弄，公所真正没款，也没有日子了，四五天就要用，所以干部会上才那么决定，你不是也参加过了吗？不过咱们内里人好商量；你前年那一场事，一共破费了多少，回头叫他另外照数赔偿你！”马凤鸣道：“我也不是说那个啦，不过他们……”恒元拦他的话道：“不不不！他不赔我就不愿意他！不信我可以垫出来！咱们都是个干部，不分个里外如何能行？”马凤鸣见自己落不了空，也就不说什么了；别人再怂恿也怂恿不动他了。

事过之后，第二天喜富就回来了。赔马凤鸣的东西恒元担承了一半，其余应赔全村民众，那么大的数目，做了几条炒面袋、几个挂包、几条子弹袋，又给民兵拿了二十多斤小米就算完事。

“八一”检阅民兵，阎家山的民兵服装最整齐，又是模范，主任又得了奖。

七、恒元广聚把戏露底

过了阴历八月十五日，正是收秋时候，县农会主席老杨同志，被分配到第六区来检查督促秋收工作。老杨同志叫区农会给他介绍一个比较进步的村，区农会常听章工作员说阎家山是模范村，就把他介绍到阎家山去。

老杨同志吃了早饭起程，天不晌午就到了阎家山。他一进公所，正遇着广聚跟小元下棋。他两个因为一步棋争起来，就没有看见老杨同志进去。老杨同志等了一会，还没有人跟他答话，他就在这争吵中间道：“哪一位是村长？”广聚跟小元抬头一看，见他头上箍着块白手巾，白小布衫深蓝裤，脚上穿着半旧的硬鞋至少也有二斤半重。从这服装上看，村长广聚以为他是哪村派来的送信的，就懒洋洋地问道：“哪村来的？”老杨同志答道：“县里！”广聚仍问道：“到这里干什么？”小元棋快输了，在一边催道：“快走棋嘛！”老杨同志有些不耐烦，便道：“你们忙得很！等一会闲了再说吧！”说了把背包往阶台上一丢，坐在上面休息。广聚见他的话头有点不对，也就停住了棋，凑过来答话。老杨同志也看出他是村长，却又故意问了一句“村长哪里去了？”他红着脸答过话，老杨同志才把介绍信给他，信上写的是：

“兹有县农会杨主席，前往阎家山检查督促秋收工作，请予接洽是荷……”

广聚看过了信，把老杨同志让到公所，说了几句客气话，便要请老杨同志到自己家里吃饭。老杨同志道：“还是兑些米到老百姓家里吃吧！”广聚还要讲俗套，老杨同志道：“这是制

度，不能随便破坏！”广聚见他土眉土眼，说话却又那么不随和，一时想不出该怎么对付，便道：“好吧！你且歇歇，我给你出去看看！”说了就出了公所来找恒元。他先把介绍信给恒元看了，然后便说这人是怎样怎样一身土气，恒元道：“前几天听喜富说有这么个人。这人你可小看不得！听喜富说，有些事情县长还得跟他商量着办。”广聚道：“是是是！你一说我想起来了！那一次在县里开会，讨论丈地问题那一天，县干部先开了个会，仿佛有他，穿的是蓝衣服，眉眼就是那样。”恒元道：“去吧！好好应酬，不要冲撞着他！”广聚走出门来又返回去问道：“我请他到家吃饭，他不肯，他叫给他找个老百姓家去吃，怎么办？”恒元不耐烦了，发话道：“这么大一点事也问我？那有什么难办？他要那么执拗，就把他派到个最穷的家——象老槐树底老秦家，两顿糠吃过来，你怕他不再找你想办法啦？”广聚道：“老槐树底那些人跟咱们都不对，不怕他说坏话？”恒元道：“你就不看人？老秦见了生人敢放个屁？每次吃了饭你就把他招待回公所，有什么事？”

广聚碰了一顿钉子讨了这么一点主意，回去就把饭派到老秦家。这样一来，给老秦找下麻烦了！阎家山没有行过这种制度，老秦一来不懂这种管饭只是替做一做，将来还要领米，还以为跟派差款一样；二来也不知道家常饭就行，还以为衙门来的人一定得吃好的。他既是这样想，就把事情弄大了，到东家借盐，到西家借面，老两口忙了一大会，才算做了两三碗汤面条。

晌午，老杨同志到老秦家去吃饭，见小砂锅里是面条，大锅里的饭还没有揭开，一看就知道是把自己当客人待。老秦舀了一碗汤面条，必恭必敬双手捧给老杨同志道：“吃吧先生！”

到咱穷人家吃不上什么好的，喝口汤吧！”他越客气，老杨同志越觉着不舒服，一边接一边道：“我自己舀！唉！老人家！咱们吃一锅饭就对了，为什么还要另做饭？”老秦老婆道：“好先生！啥也没有！只是一口汤！要是前几年这饭就端不出来！这几年把地押了，啥也讲不起了！”老杨同志听她说押了地，正要问她押给谁，老秦先向老婆喝道：“你这老不死，不知道你那一张疯嘴该说什么！可憋不死你！你还记得啥？还记得啥？”老杨同志猜着老秦是怕她说得有妨碍，也就不再追问，随便劝了老秦几句。老秦见老婆不说话了，因为怕再引起话来，也就不再说了。

小福也回来了。见家里有人，便问道：“爹！这是哪村的客？”老秦道：“县里的先生！”老杨同志道：“不要这样称呼吧！哪里是什么‘先生’？我姓杨！是农救会的！你们叫我个‘杨同志’或者‘老杨’都好！”又问小福“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小福一一答应。老秦老婆见孩子也回来了，便揭开大锅开了饭。老秦、老秦老婆，还有个五岁的女孩，连小福，四个人都吃起饭来。老杨同志第一碗饭吃完，不等老秦看见，就走到大锅边，一边舀饭一边说：“我也吃吃这饭，这饭好吃！”老两口赶紧一齐放下碗来招待，老杨同志已把山药蛋南瓜舀到碗里。老秦客气了一会，也就罢了。

小顺来找小福割谷，一进门碰上老杨同志，彼此问询了一下，就向老秦道：“老叔！人家别人的谷都打了，我爹病着，连谷也割不起来，后晌叫你小福给俺割吧？”老秦道：“吃了饭还要打谷！”小顺道：“那我也能帮忙，打下你的来，迟一点去割我的也可以！”老杨同志问道：“你们这里收秋还是各顾各？农救会也没有组织过互助小组？”小顺道：“收秋可不就

是各顾各吧？老农会还管这些事啦？”老杨同志道：“那末你们这里的农会都管些什么事？”小顺道：“咱不知道。”老杨同志自语道：“模范村！这算什么模范？”五岁的小女孩，听见“模范”二字，就想起小顺教她的几句歌来，便顺口念道：

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
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

小孩子虽然是顺口念着玩，老杨同志却听着很有意思，就逗她道：“念得好呀！再念一遍看！”老秦又怕闯祸，瞪了小女孩一眼。老杨同志没有看见老秦的眼色，仍问小女孩道：“谁教给你的？”小女孩指着小顺道：“他！”老秦觉着这一下不只惹了祸，又连累了邻居。他以为自古“官官相卫”，老杨同志要是回到村公所一说，马上就不得了。他气极了，劈头打了小女孩一掌骂道：“可哑不了你！”小顺赶紧一把拉开道：

“你这老叔！小孩们念个那，有什么危险？我编的，我还不怕，就把你怕成那样？那是真的吧是假的？人家吃烙饼有过你的份？你喝的不是稀饭？”老秦就有这样一种习惯，只要年轻人说他几句，他就不说话了。

吃过了饭，老秦跟小福去场里打谷子。老杨同志本来预备吃过饭去找村农会主任，可是听小顺一说，已知道工作不实在，因此又想先在群众里调查一下，便向老秦道：“我给你帮忙去。”老秦虽说“不敢不敢”，老杨同志却扛起木掀扫帚跟他们往场里去。

场子就在窑顶上，是好几家公用的。各家的谷子都不多，这天一场共摊了四家的谷子，中间用谷草隔开了界。

老杨同志到场子里什么都通，拿起什么家具来都会用，特别是好扬家，不只给老秦扬，也给那几家扬了一会，大家都说“真是一张好木揪”^①。一场谷打罢了，打谷的人都坐在老槐树底休息、喝水、吃干粮，蹲成一圈围着老杨同志问长问短，只有老秦仍是必恭必敬站着，不敢随便说话。小顺道：“杨同志！你真是个好把式！家里一定种地很多吧？”老杨同志道：“地不多，可是做得不少！整整给人家住过十年长工！”老秦一听老杨同志是个住长工出身，马上就看不起他了，一屁股坐在墙根下道：“小福！不去场里担糠还等什么？”小福正想听老杨同志谈些新鲜事，不想半路走开，便推托道：“不给人家小顺哥割谷？”老秦道：“担糠回来误得了？小孩子听起闲话来就不想动了！”小福无法，只好去担糠。他才从家里挑起篓来往场里走，老秦也不顾别人谈话，又喊道：“细细扫起来！不要只扫个场心！”他这样子，大家都觉着他不顺眼，小保便向他发话道：“你这老汉真讨厌！人家说个话你偏要乱吵！想听就悄悄听，不想听你不能回去歇歇？”老秦受了年轻人的气自然没有话说，起来回去了。小顺向老杨同志道：“这老汉真讨厌！吃亏、怕事、受了一辈子穷，可瞧不起穷人。你一说你住过长工，他马上就变了个样子。”老杨同志笑了笑：“是的！我也看出来。”

广聚依着恒元的吩咐，一吃过饭就来招呼老杨同志，可是哪里也找不着，虽然有人说在场子里，远远看了一下，又不见一个闲人（他想不到县农会主席还能做起活来）；从东头找到西头，西头又找回东头来，才算找到。他一走过来，大家什么

^①就是说他用木揪用得好。

都不说了。他向老杨同志道：“杨同志！咱们回村公所去吧！”老杨同志道：“好，你且回去，我还要跟他们谈谈。”广聚道：“跟他们这些人能谈个什么？咱们还是回公所去歇歇吧！”老杨同志见他瞧不起大家，又想碰他几句，便半软半硬地发话道：“跟他们谈话就是我的工作，你要有什么话等我闲了再谈吧！”广聚见他的话头又不对了，也不敢强叫，可是又想听听他们谈什么，因此也不愿走开，就站在圈外。大家见他不走，谁也不开口，好象庙里十八罗汉象，一个个都成了哑子。老杨同志见他不走开大家不敢说话，已猜着大家是被他压迫怕了，想赶他走开，便向他道：“你还等谁？”他呶呶唧唧道：“不等谁了！”说着就溜走了。老杨同志等他走了十几步远，故意向大家道：“没有见过这种村长！农教会的人到村里，不跟农民谈话，难道跟你村长去谈？”大家亲眼看见自己惹不起的厉害人受了碰，觉着老杨同志真是自己人。

天气不早了，小顺喊叫小福去割谷，老杨同志见小顺说话很痛快，想多跟他打听一些村里的事，便向他道：“多借个镰，我也给你割去！”小明、小保也想多跟老杨同志谈谈，齐声道：“我也去！”小顺本来只问了个小福，连自己一共两个人，这会却成了五个。这五个人说说话话，一同往地里去了。

八、“老”“小”字辈准备翻身

五个人到了地，一边割谷一边谈话。小顺果然说话痛快，什么也不忌讳。老杨同志提到晌午听的那四句歌，很夸奖小顺编得好。小保道：“他还是徒弟，他师父比他编得更好。”老杨同志笑道：“这还是有师父的？”向小顺道：“把你师父编

出来的给咱念几段听一听吧？”小顺道：“可以！你要想听这，管保听到天黑也听不完！”说着便念起来。他每念一段，先把事实讲清楚了然后才念，这样便把村里近年来的事情翻出来许多。老杨同志越听越觉着有意思，比自己一件一件打听出来的事情又重要又细致，因此想亲自访问他这师父一次，就问小顺道：“这歌编得果然好！我想见见这个人，吃了晚饭你能领上我去他家里闲坐一会吗？”小顺道：“可惜他不在村里了，叫人家广聚把他撵跑了！”接着就把丈地时候的故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一直说到小元被送县受训，有才逃到柿子洼。老杨同志问道：“柿子洼离这里有多么远？”小顺往西南山洼里一指道：“那不是？不远！五里地！”老杨同志道：“我看这三亩谷也割不到黑！你们着个人去把他请回来，咱们晚上跟他谈谈！”小明道：“只要敢回来，叫一声他就回来了！我去！”老杨同志道：“叫他放心回来！我保他无事！”小顺道：“小明叔腿不快，小福你去吧！”小福很高兴地说了个“可以”扔下镰就跑了。小福去后，老杨同志仍然跟大家接着谈话，把近几年来村里的变化差不多都谈完了。最后老杨同志问道：“这些事情，章工作员怎么不知道？”小保道：“章工作员倒是个好人，可惜没经过事，一来就叫人家团弄住了。”他直谈到天快黑，谷也割完了，小福把有才也叫来了，大家仍然相跟着回去吃饭。

小顺家晚饭是谷子面干粮豆面条汤，给他割谷的都在他家吃。小顺硬要请老杨同志也在他家吃，老杨同志见他是一番实意，也就不再谦让，跟大家一齐吃起来。小顺又给有才端了碗汤拿了两个干粮，有才是自己人，当然也不客气。老秦听说老杨同志敢跟村长说硬话，自然又恭敬起来，把晌午剩下的汤面

条热了一热，双手捧了一碗送给老杨同志。

晚饭吃过了，老杨同志问有才道：“你住在哪个窑里？今天晚上咱们大家都到你那里谈一会吧！”有才就坐在自己的门口，顺手指道：“这就是我的窑！”老杨同志抬头一看，见上面还贴着封条，不由他不发怒。他跳起来一把把封条撕破了道：“他妈的！真敢欺负穷人！”又向有才道：“开开进去吧！”有才道：“这锁也是村公所锁的！”老杨同志道：“你去叫村公所人来给你开！就说我把你叫来谈话啦！”有才去了。

有才找着了广聚，说道：“县农会杨同志找我回来谈话，叫你去开门啦！”广聚看这事情越来越硬，弄得自己越得不着主意，有心去找恒元，又怕因为这点小事受恒元的碰。他想了一想，觉着农救会人还是叫农救会干部去应酬，主意一定，就向有才道：“你等等，我去取钥匙去！”他回家取上钥匙，又去把得贵叫来，暗暗嘱咐了一番话，然后把钥匙给了得贵，便向有才道：“叫他给你开去吧！”有才就同得贵一同回到老槐树底。

得贵跟着恒元吃了多年残剩茶饭，半通不通的浮言客套倒也学得了几句。他一见老杨同志，就满面陪笑道：“这位就是县农会主席吗，慢待慢待！我叫张得贵，就是这村的农会主席。晌午我就听说你老人家来了，去公所拜望了好几次也没有见面……”说着又是开门又是点灯，客气话说得既然叫别人撵不上嘴，小殷勤也做得叫别人帮不上手。老杨同志在地里已经听小顺念过有才给他编的歌，知道他的为人，也就不多接他的话。等他忙乱过后，大家坐定，老杨同志慢慢问道：“这村共有多少会员？”他含糊答道：“唉！我这记性很坏，记不得了，有册子，回头查查看！”老杨同志道：“共分几小组？”他道：“这

这这我也记不不清了。”老杨同志放大嗓子道：“连几个小组也记不得？有几个执行委员？”他更莫名其妙，赶紧推托道：“我我是个老粗人，什么也不懂，请你老人家多多包涵！”老杨同志道：“你不懂只说你不懂，什么粗人不粗人？农救会根本没有收过一个细人人会！连组织也不懂，不只不能当主席，也没有资格当委员，今天把你这主席资格会员资格一同取消了吧！以后农救会的事不与你相干！”他一听要取消他的资格，就转了个弯道：“我本来办不了，辞了几次也辞不退，村里只要有点事，想不管也不行！……”老杨同志道：“你跟谁辞过？”他道：“村公所！”老杨同志道：“当日是谁教你当的？”他道：“自然也是村公所！”老杨同志说：“不怨你不懂，原来你就不是由农救会来的！去吧！这一回不用辞就退了！”他还要啰嗦，老杨同志挥着手道：“去吧去吧！我还有别的事啦！”这才算把他赶出去。

这天因为有才回来了，邻居们都去问候，因此人来得特别多，来了又碰上老杨同志取消得贵，大家也就站住看起来了。老杨同志把得贵赶走之后，顺便向大家道：“组织农救会叫受压迫农民反对压迫自己的人。日本鬼子压迫我们，我们就反对日本鬼子；土豪恶霸压迫我们，我们就反对土豪恶霸。张得贵能领导你们反对鬼子吗？能领导着你们反对土豪恶霸吗？他能当个什么主席？……”老杨同志借着评论得贵，顺路给大家讲了讲“农救会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得很起劲。不过忙时候总是忙时候，大家听了一小会，大部分就都回去睡了，窑里只剩下小明、小保、小顺、有才四个人（小福没有来，因为后晌没有担完糠，吃过晚饭又去担去了）。老杨同志道：“请你们把恒元那一伙人做的无理无法的坏事拣大的细细说几件，我把

他记下来。”说着取出钢笔和笔记簿子来道：“说吧！就先从喜富撤差说起！”小明道：“我先说吧，说漏了大家补！”接着便说起来。他才说到喜富赔偿大家损失的事，小顺忽听窗外好象有人，便喊道：“谁？”喊了一声，果然有个人咚咚咚跑了。大家停住了话，小保、小顺出来到门外一看，远远来了一个人，走近了才认得是小福。小顺道：“是你？你不进来怎么跑了？”小福道：“哪里是我跑？是老得贵！我担完了糠一出门就见他跑过去了！”小保道：“老家伙，又去报告去了！”小顺道：“要防备这老家伙坏事！你们回去谈吧，我去站个岗！”小顺说罢往窑顶上的土堆上去了，大家仍旧接着谈。老杨同志把材料记了一大堆，便向大家道：“我看这些材料中，押地、不实行减租、喜富不赔款、村政权不民主，这四件事最大，因为在这四件事上吃亏的是大多数。咱们要斗争他们，就要叫恒元退出押地，退出多收的租米，叫喜富照县里判决的数目赔款，彻底改选了村政干部。其余各人吃亏的事，只要各个人提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这样一来他们就倒台了，受压迫的老百姓就抬起头来了。”

小明道：“能弄成那样，那可真是又一番世界，可惜没有阎家——如今就想不出这么个可出头的人来。有几个能写能算、见过世面、干得了说话的，又差不多跟人家近，跟咱远。”老杨同志道：“现在的事情，要靠大家，不只靠一两个人——这也跟打仗一样，要凭有队伍，不能只凭指挥的人。指挥的人自然也很要紧，可是要从队伍里提拔出来的才能靠得住。你不要说没有人，我看这老槐树底的能人也不少，只要大家抬举，到个大场面上，也能说他几句！”小保道：“这道理是对的，只是说到真事上我就懵懂了。就象咱们要斗争恒元，可该怎样下手？

咱又不是村里的什么干部，怎样去集合人？怎样跟人家去说？人家要说理咱怎么办？人家要翻了脸咱怎么办？……”老杨同志道：“你想得很是路，咱们现在预备就是要预备这些。咱们这些人数目虽然不少，可是散着不能办事，还得组织一下。到人家进步的地方，早就有组织起来的工农妇青各教会，你们这里因为一切大权都在恶霸手里，什么组织也没有。依我说咱们明天先把农教会组织起来，就用农教会出名跟他们说理。咱们只要按法令跟他说，他们使的黑钱、押地、多收了人家的租子，就都得退出来。他要无理混赖，现在的政府可不象从前的衙门，不论他是多么厉害的人，犯了法都敢治他的罪！”小保道：“这农教会该怎么组织？”老杨同志就把《会员手册》取出来，给大家把会员的权利、义务、入会资格、组织章程等大概讲了一些，然后向大家道：“我看现在很好组织，只要说组织起来能打倒恒元那一派，再不受他们的压迫，管保愿意参加的人不少！”小保道：“那么明天你就叫村公所召开个大会，你把这道理先给大家宣传宣传，就叫大家报名参加，咱们就快快组织起来干！”老杨同志道：“那办法使不得！”小保道：“从前章工作员就是那么做的，不过后来没有等大家报名，不知道怎样老得贵就成了主席了！”老杨同志道：“所以我说那办法使不得。那办法还不只是没有人报名，一来在那种大会上讲话，只能笼统讲，不能讲得很透彻；二来既然叫大家来报名，象与恒元有关系那些人想报上名给恒元打听消息，可该收呀不收？我说不用那样做，你们有两个人会编歌，就把‘入了农教会能怎样怎样’编成个歌传出去，凡是真正受压迫的人听了，一定有许多人愿意入会，然后咱们出去几个人跟他们每个人背地谈谈，愿意入会的就介绍他人会。这样组织起来的会，一来

没有恒元那一派的人，二来入会以后都知道会是什么的。”大家齐声道：“这样好，这样好！”小保道：“那么就请有才老叔今天黑夜把歌编成，编成了只要念给小顺，不到明天晌午就能传遍。”老杨同志道：“这样倒很快，不过还得找几个人去跟愿意入会的人谈话，然后介绍他们入会。”小福道：“小明叔交人很宽，只要出去一转还不是一大群？”老杨同志道：“我说老槐树底有能人你们看有没有？”正说着，小顺跑进来道：“站了一会岗又调查出事情来了！广聚、小元、马凤鸣、启昌，都往恒元家里去了，人家恐怕也有什么布置。我到他门口看看，门关了，什么也听不见！”老杨同志道：“听不见由他去吧！咱们谈咱们的。你们这几个人算是由我介绍先入了会，明天你们就可以介绍别人。天气不早了，咱们散了吧！”说了就散了。

九、斗争大胜利

自从老杨同志这天晌碰了广聚一顿，晚上又把有才叫回，又取消张得贵的农会主席，就有许多人十分得意，暗暗道：

“试试！假大头也有不厉害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些人都想看看老杨同志是怎么一个人，因此吃早饭时候，端着碗来老槐树底的特别多。有才应许下的新歌，夜里编成，一早起来就念给小顺了，小顺就把这歌传给大家。歌是这样念：

入了农教会，力量大几倍，
谁敢压迫咱，大家齐反对。
清算老恒元，从头算到尾，

黑钱要他赔，押地要他退；
减租要认真，一颗不许昧。
干部不是人，都叫他退位；
再不吃他亏，再不受他累。
办成这些事，痛快几百倍，
想要早成功，大家快入会！

提起反对老恒元，阎家山没有几个不赞成的，再说到能叫他赔黑款，退押地……大家的劲儿自然更大了，虽然也有许多怕得罪不起人家不敢出头的，可是仇恨太深，愿意干的究竟是多数。还有人说，“只要能打倒他，我情愿再贴上几亩地！”他们听了这入会歌，马上就有二三十个人会的，小保就给他们写上了名。山窝铺的佃户们，无事不到村里来。老杨同志道：“谁可以去组织他们！”有才道：“这我可以去！我常在他们山上放牛，跟他们最熟。”打发有才上了山，小明就到村里去活动，不到晌午就介绍了五十五个会员。小明向老杨同志道：“依我看来，凡是敢说敢干的，差不多都收进来了；还有些胆子小的，虽然也跟咱是一气，可是自己又不想出头，暂且还不愿参加。”老杨同志道：“不少，不少！这么大个小村子，马上说话马上能组织起五十多个人来，在我作过工作的村子里，这还算第一次遇到。从这件事上看，可以看出一般人对他们仇恨太深，斗起来一定容易胜利！事情既然这么顺当，咱们晚上就可以开个成立大会，选举出干部，分开小组，明天就能干事。这村里这么多的问题，区上还不知道，我可以连夜回区上一次，请他们明天来参加群众大会。”正说着，有才回来了，有几家佃户也跟着来了。佃户们见了老杨同志，先问：“要是生起气

来，人家要夺地该怎么办？”老杨同志就把法令上的永佃权给他们讲了一遍，叫他们放心。小明道：“山上人也来了，我看就可以趁着晌午开个会。”老杨同志道：“这样更好！晌午开了会，赶天黑我还能回到区上。”小明道：“这会咱们到什么地方开？”老杨同志道：“介绍会员不叫他们知道，是怕那些坏家伙混进来；开成立大会可不跟他们偷偷摸摸，到大庙里成立去！”吃过了午饭，庙里的大会开了，选举的结果，小保、小明、小顺当了委员。三个人一分工，小保担任主席，小明担任组织，小顺担任宣传。选举完了，又分了小组，阎家山的农教会就算正式成立。

老杨同志向新干部们道：“今天晚上，可以通知各小组，大家搜集老恒元的恶霸材料。”小顺道：“我看连广聚、马凤鸣、张启昌、陈小元的材料都可以搜集。”老杨同志道：“这不大妥当；马凤鸣、张启昌不是真心顾老恒元的人，照你们昨天谈的，这两个人有时候也反对恒元。咱们找个跟他说得来的人去给他说明利害关系，至少斗起恒元来他两人能不说话。小元他原来是你们招呼起来的人，只要恒元一倒，还有法子叫他变过来。把这些人暂且除过，只把劲儿用在恒元跟广聚身上，成功要容易得多。”老杨同志把这道理说完，然后叫他们多布置几个能说会道的人，预备在第二天的大会上提意见。

安顿停当，老杨同志便回到区公所去。他到区上把在阎家山发现的问题大致一谈，区救联会、武委会主任、区长，大家都莫名其妙，章工作员三番五次说不是事实。最后还是区长说：“咱们不敢主观主义，不要以为咱们没有发现问题就算没有问题。依我说咱们明天都可以去参加这个会去，要真有那么大问题，就是在事实上整了我们一次风。”

老恒元也生了些鬼办法：除了用家长资格拉了几户姓阎的，又打发得贵向农救会的个别会员们说：“你不要跟着他们胡闹！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三天调了五天换了，老村长是永远不离阎家山的，等他们走了你还出得了老村长的手心吗？”果然有几个人听了这话，去找小明要退出农救会，小明急了，跟小保小顺们商议。小顺道：“他会说咱也会说，咱们再请有才老叔编上个歌，多多写几张把村里贴满，吓他一吓！”有才编了个短歌，连编带写，小保也会写，小顺、小福管贴，不大一会就把事情办了，连老恒元门上也贴了几张。第二天早上，满街都有人在墙上念歌：

工作人员，换不换，
农教会，永不散，
只要你恒元不說理，
几时也要跟你干！

这样才算把得贵的谣言压住。

吃过早饭，老杨同志跟区长、救联主席、武委会主任、章工作人员一同来了，一来就先到老槐树底遛了一趟，这一着是老恒元、广聚们没有料到的，因此马上慌了手脚。

群众大会开了，恒元的违法事实，大家一天也没有提完。起先提意见的还只是农教会人，后来不是农教会人也提起意见了。恒元最没法巧辩的是押地跟不实行减租，其余捆人、打人，罚钱、吃烙饼……他虽然想尽法子巧辩，只是证据太多，一条也辩不脱。

第二天仍然继续开会，直到晌午才算开完。斗争的结果老

恒元把八十四亩押地全部退回原主，退出多收了的租，退出有证据的黑钱。因为私自减了喜富的赔款，刘广聚由区公所撤职送县查办。喜富的赔款仍然如数赔出。在斗争时候，自然不能十分痛快，象退押契，改租约……也费了很大周折，不过这种斗争，人们差不多都见过，不必细叙。

吃过午饭，又选村长。这次的村长选住了小保，因此农教会又补选了委员。因为斗争胜利，要求加入农教会的人更多起来，经过了审查，又扩充了四十一个新会员。其余村政委员，除了马凤鸣跟张启昌不动外，老恒元父子也被大家罢免了另行选过。

选举完了，天也黑了，区干部连老杨同志都住在村公所。因为村里这么大问题章工作员一点也不知道，还常说老恒元是开明士绅，大家就批评了他一次。老杨同志指出他不会接近群众，一来了就跟恒元们打热闹，群众有了问题自然不敢说。其余的同志，也有说是“思想意识”问题或“思想方法”问题的，叫章同志作一番比较长期的反省。

批评结束了，大家又说起闲话，老杨同志顺便把李有才这个人介绍了一下，大家觉着这人很有趣，都说明天早上去访一下。

十、“扳人”作总结

老杨同志跟区干部们因为晚上多谈了一会话，第二天醒得迟了一点。他们一醒来，听着村里地里到处喊叫，起先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仔细一听，才知道是唱不是喊。老杨同志是本地人，一听就懂，便向大家道：“你听老百姓今天这股高兴劲

儿！‘干梆戏’①唱得多么喧！”

正说着，小顺唱着进公所来。他跳跳蹦蹦向老杨同志跟区干部们道：“都起来了？昨天累了吧？”看神气十分得意。老杨同志问道：“这场斗争老百姓觉着怎样？”小顺道：“你就没有听见‘干梆戏’？真是天大的高兴，比过大年高兴得多啦！地也回来了，钱也回来了，吃人虫也再不敢吃人了，什么事有这事大？”老杨同志道：“李有才还在家吧？”小顺道：“在！他这几天才回来没有什么事，叫他吧？”老杨同志道：“不用！我们一早起好到外边遛一下，顺路就遛到他家了！”小顺道：“那也好！走吧！”小顺领着路，大家就往老槐树底来。

才下了坡，忽然听得有人吵架。区长问道：“这是谁吵架？”小顺道：“老陈骂小元啦！该骂！”区干部们问起底细，小顺道：“他本来是老槐树底人，自己认不得自己，当了个武委会主任，就跟人家老恒元打成一伙，在庙里不下来。这两天斗争起老恒元来了，他没处去，仍然回到老槐树底。老陈是他的叔父，看不上他那样子，就骂起他来。”区干部们听老杨同志说过这事，所以区武委会主任也才来了。区武委会主任道：“趁斗倒了恒元，批评他一下也是个机会。”大家本是出来闲找有才的，遇上了比较正经的事自然先办正经事，因此就先往小元家。老陈正骂得起劲，见他们来了，就停住了骂，把他们招呼进去。武委会主任也不说闲话，直截了当批评起小元来，大家也接着提出些意见，最后的结论分三条：第一是穿衣吃饭跟人家恒元们学样，人家就用这些小利来拉拢自己，自己上了当还不知道；第二是不生产、不劳动、把劳动当成丢人事，忘

①这地方把不打乐器的清唱叫“干梆戏”。

了自己的本分；第三是借着一点小势力就来压迫旧日的患难朋友。区武委会主任最后等小元承认了这些错误，就向他道：“限你一个月把这些毛病完全改过，叫全村干部监视着你。一个月以后倘若还改不完，那就没有什么客气的了！”老陈听完了他们的话，把膝盖一拍道：“好老同志们！真说得对！把我要说的话全说完了！”又回头向小元道：“你也听清楚了，也都承认过了！看你做的那些事以后还能见人不能？”老杨同志道：“你老人家也不要那样生气！一个人做了错，只要能真正改过，以后仍然是好人，我们仍然以好同志看他！从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尽责备他也无益，我看以后不如好好帮助他改过，你常跟他在一处，他的行动你都可以知道，要是见他犯了旧错，常常提醒他一下，也就是帮助了他了……”

谈了一会，已是吃早饭时候，老杨同志跟区干部们就从小元家里走出。他们路过老秦门口，冷不防见老秦出来拦住他们，跪在地下咕咚咕咚磕了几个头道：“你们老先生们真是救命恩人呀！要不是你们诸位，我的地就算白白押死了……”老杨同志把他拉起来道：“你这老人家真是认不得事！斗争老恒元是农教会发动的，说理时候是全村人跟他说的，我们不过是几个调解人。你的真恩人是农教会，是全村民众，哪里是我们？依我说你也不用找人谢恩，只要以后遇着大家的事靠前一点，大家是你的恩人，你也是大家的恩人……”老秦还要让他们到家里吃饭，他们推推让让走开。

李有才见小顺说老杨同志跟区干部们找他，所以一吃了饭，取起他的旱烟袋就往村公所来。从他走路脚步上，可以看出比哪一天也有劲。他一进庙门，见区村干部跟老杨同志都在，便道：“找我吗？我来了！”小保道：“这老叔今天也这么高

兴？”有才道：“十五年不见的老朋友，今天回来了，怎能不高兴？”小明想了一想问道：“你说的是个谁？我怎么想不起来？”有才道：“一说你就想起来了！我那三亩地不是押了十五年了吗？”他一说大家都想起来了，不由得大笑了一阵。

老杨同志向有才道：“最好你也在村里担任点工作干，你很有才干，也很热心！”小明道：“当个民众夜校教员还不是呱呱叫？”大家拍手道：“对！对！最合适！”

老杨同志向有才道：“大家想请你把这次斗争编个纪念歌好不好？”有才道：“可以！”他想了一会，向大家道：“成了成了！”接着念道：

閻家山，翻天地，
群众会，大胜利。
老恒元，洩了气，
退租退款又退地。
刘广聚，大舞弊，
犯了罪，没人替。
全村人，很得意，
再也不受冤枉气，
从村里，到野地，
到处唱起“干梆戏”。

大家听他念了，都说不错，老杨同志道：“这就算这场事情的一个总结吧！”

谈了一小会，区干部回区上去了，老杨同志还暂留在这一带突击秋收工作，同时在工作中健全各教会组织。

（一九四三年十月写于太行。）

地 板

王家庄办理减租。有一天解决地主王老四和佃户们的租佃关系，按法令订过租约后，农会主席问王老四还有什么意见没有，王老四说：“那是法令，我还有什么意见？”村长和他说：“法令是按情理规定的。咱们不只要执行法令，还要打通思想！”王老四叹了口气说：“老实说：思想我是打不通的！我的租是拿地板换的，为什么偏要叫我少得些才能算拉倒？我应该照顾佃户，佃户为什么不应该照顾我？我一大家人就是指那一点租来过活，大前年遭了旱灾，地租没有收一颗，把几颗余粮用了个光，弄得我一年颗不住一年，有谁来照顾我？为什么光该我照顾人？”农会主席给他解释了一会，区干部也给他解释了一会，都说粮食是劳力换的，不是地板换的。解释过后，问他想通了没有，他说：“按法令减租，我没有什么话说；要我说理，我是不赞成你们说那理的。他拿劳力换，叫他把我的地板缴回来，他们到空中生产去！你们是提倡思想自由的，我这么想是我的自由，一千年也不能跟你们思想打通！”

小学教员王老三站起来面对着王老四讲道：——

老四！再不要提地板！不提地板不生气！

你知道！我常家窑那地板都怎么样！从顶到凹，都是红土夹沙地，论亩数，老契上虽写的是荒山一处，可是听上世人说，自从租给人家老常他爷爷，十来年就开出三十多亩好地来；后来老王老孙来了，一个庄上安起三家人来，到老常这一辈三家种

的地合起来已经够一顷了。论打粮食，不知道他们共能打多少，光给我出租，每年就是六十石。如今啦，不说六十石，谁可给我六升呢！

大前年除了日本人和姬镇魁的土匪部队扰乱，又遭了大旱灾，二伏都过了，天不下雨满地红。你知道吧！咱村二百多家人，死的死了，跑的跑了，七零八落丢下了三四十家。就在这时候，老常来找我借粮，说老王和老孙都饿得没了办法，领着家里人逃荒走了。后来老常饿死，他老婆领着孩子回了林县，这庄上就没有人了。——我想起来也很后悔，可该借给人家一点粮。

那年九月间，八路军来打鬼子的碉堡，咱不是还逃到常家窑吗？你可见来：上半年虽没有种上庄稼，下半年下了连阴雨，蒿可长得不低，哪一片地也能藏住人。庄上的房子没人住了，牵牛花穿过窗里去，梁上有了碗口大的马蜂窝。那天晚上大家都困乏了，呼噜呼噜睡下一地，我可一夜也没有睡着。你想：我在咱本村里，就只有南墙外的三亩菜地，那中啥用！每年的吃穿花销，还都不是凭这常家窑的顷把地吗！眼见常家窑的地里，没有粮食光有蒿，我的心就凉了半截。

这年秋天，自然是一颗租子也没有人给。咱们这些家，是太手大脚过惯了的，“钟在寺院音在外”，撑起棚子来落不下；冬天出嫁闺女，回礼物、陪嫁妆、请亲戚、女婿认亲、搬九^①，哪一次也不愿丢了脸，抬脚动手都要花钱。几年来兵荒马乱，鬼子也要，姬镇魁也抢，你想能有几颗余粮？自己吃的是它，办事花的也是它，不几天差不多糟蹋光了。银钱是硬头货，虚棚子能撑几天？谷囤子麦囤子，一个一个都见了底，我有点胆

^①“搬九”，也叫“回九”，结婚后第九天，女儿和婿回娘家探亲，叫“搬九”。

寒，没等过了年就把打杂的、做饭的一齐都打发了。

七岁的孩子能吃不能干，你三嫂活了三四十岁也是个坐在炕上等饭的，我更是出门离马不行的人。这么三个人来过日子，不说生产，生的也做不成熟的。你三嫂做饭扫地就累坏了她，我喂喂马打个油买个菜也顾住了我，两个人一后晌锄不了两个干草，碾磨上还得雇零工。

过了年，接女婿住过了正月十五，囤底上的几颗粮食眼看扫不住了，我跟你三嫂着实发了愁。依我说就搬到常家窑去种我那地，你三嫂不愿意，她说三口人孤零零的去那里不放心。后来正月快过完了，别人都在地里送粪，我跟你三嫂说：“要不咱就把咱那三亩菜地也种成庄稼吧？村边的好地，收成好一点，俭省一点，三亩地也差不多够咱这三口人吃。”她也同意。第二天，我去地里看了一下，辣子茄子秆都还在地里直撅撅长着，我打算收拾一下就往里送粪。

老弟！我把这事情小看了，谁知道种地真不是件简单的事！不信你试试！光几畦茄子秆耽误了一前晌：用镰削，削不下来，用斧砍，你从西边砍，它往东歪，用镢刨，一来根太深，二来枝枝碍事，刨不到根上。回家跑了三趟，拿了三件家具都不合适，后来想了个办法：用镢先把一边刨空了，搬倒，用脚踩住再用斧砍。弄了半晌还没有弄够一畦。邻家小刚，挑着箩头从地里回来，看见我两只手抡着斧剁茄根，笑得合不住口，羞得我不敢抬头。他笑完了，告我说不用那样弄，说着他就放下箩头拿起镢来刨给我看。奇怪！茄秆上的枝枝偏不碍他的事！哪一枝碰镢把，就把哪一枝碰掉了。他给我做了个样子就刨了一畦，跟我半前晌做的一般多。他放下镢担起箩头来走了，我就照着他的样子刨。也行！也刨得起来了，只是人家一

镢两镢就刨一棵，我五镢六镢也刨不下一棵来。刨了不几棵，两手上磨起两溜泡来；咬着牙刨到晌午才算刨完，吃了饭，胳膊腿一齐疼，直直睡了一后晌。

第二天准备送粪。我胳膊疼得不想去插^①，叫你三嫂去，这一下把她难住了。她给她娘守服，穿着白鞋。老弟！我说你可不要笑，你三嫂穿鞋，从新穿到破，底棱上也不准有一点黑，她怎么愿意去插粪呢？可是粪总得用人插，她也没理由推辞，只好拿着铁镢走进马圈里。她走得很慢，看准一个空子才敢往前挪一步，小心谨慎照顾她那一对白鞋，我在她背后看着也没有敢笑。往年往菜地里上的粪，都是打杂的从马圈里倒出来，捣碎了的；这一年把打杂的打发了，自然没人给捣。她拿着一张镢，立插插不下去，一平插就从上面滑过去了，反过镢来往回刮也刮不住多少，却不幸把她一对白鞋也埋住了。老弟！你不要笑！你猜她怎么样？她把镢一扔，三脚两步跑出马圈来，又是顿，又是蹴，又是用手绢擦，我在一旁忍不住笑出来。我越笑，她越气，擦了半天仍然有许多黄麻子点；看看手，已经磨起了一个泡来，气得她咕嘟着嘴跑回去了。得罪了老婆，自然还得自己干，不过我也不比人家强多少，平插立插也都是样插不上，后来用上气力尽在堆上撞，才撞起来些大片子。因为怕弄碎了不好插，就一片一片装进驮子里去。绝没有想起来这一下白搭了：备起马来没人抬——老婆才生了气，自然叫不出来，叫出来也没有用；邻居们也都不在家，干看没办法，后来在门口又等到小刚担粪回来，他抬得起我抬不起，还是不算话。两个人

^①插是往驮子里装的意思。因为用镢插进粪里，才能把粪取起来，所以叫“插”。

想了一会，他有了主意，把粪又倒出半驮，等抬上以后他又一锹一锹替我添满，这才算插出第一驮粪。这一下我又学了一样本领，第二驮我就不把驮子拿下来，只把马拴住往上插。地不够一百步远，一晌只能送三驮，因为插起来费事。

老弟！这么细细给你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还是粗枝大叶告诉你吧！

粪送到地了，也下了雨，自己不会犁种，用个马工换了两个人工才算把谷种上。

村里牲口都叫敌人赶完了，全村连我的马才只有三个牲口。八路军来了，人家都组织起互助组，没牲口的都是人拉犁。也有人劝我加入互助组，我说我不会做活，人家说：“你不能多做少做一点，只要把牲口组织起来就行。”那时候我的脑筋不开，我怕把牲口组织进去给大家支差，就问人家能不参加不能。人家说是自愿的才行，我说：“那啦我不自愿。”隔了不几天，人也没吃的了，马也没有一颗料，瘦干了，就干脆卖了马养起人来了。

谷苗出得很不赖，可惜锄不出来。我跟你三嫂天天去锄，好象尽管锄也只是那么一大片，在北头锄了这院子大一片，南头的草长起来就找不见苗了。四面地邻也都种的是谷，这一年是丰收年，人家四面的谷都长够一人高，我那三亩地夹在中间，好象个长方池子。到了秋收时候，北头锄出来那一小片，比起四邻的自然不如，不过长的还象个谷，穗秀也不大不小，可惜片子太小了。南头太不象话，最高的一层是蒿，第二层是沙蓬，靠地的一层是抓地草。在这些草里也能寻着一些谷：秀了穗的，大的象猪尾巴，小的象纸烟头，高的挂在蒿秆上，低的钻进沙蓬里；没秀穗的，跟抓地草锈成一片，活着的象马鬃，

死了的象鱼刺，三亩地打了五斗。老弟！光我那一圈马粪也不止卖五斗谷吧？我跟你三嫂连马工贴上，一年才落下这点收成，要不连这五斗谷也打不上。这一年，人家都是丰年，我是歉年，收完秋就没有吃的了。

村里人都打下两颗粮食了，就想叫小孩子们识几个字，叫干部来跟我商量拨工——他们给我种那三亩地，我给他们教孩子。我自然很愿意，可惜马上就没有吃的。村里人倒很大方，愿意管我饭，又愿意给你三嫂借一部分粮，来年给我种地还不用我管饭。这一下把我的困难全部解决了，我自然很高兴，马上就开了学。

这是前年冬天的事。去年就这样拨了一年工，还是那三亩地，还种的是谷，到秋天打了八石五。老弟！你看看人家这本领大不大？我虽是四十多的人了，这本领我非学不可！今年村里给学校拨了二亩公地，叫学生们每天练习一会生产啦！我也参加到学生组里，跟小孩子们学习学习。我觉着这才是走遍天下饿不死的真正本领啦！

老弟！在以前我也跟你想的一样，觉着我这轿上来马上去，遇事都要耍个排场，都是凭地板啦，现在才知道是凭人家老常老孙啦！唉，真不该叫把人家老常饿死了来！我看我常家窑那顷把地不行了，地广人稀，虽然有些新来的没地户，可是汽车路两旁的好地还长着蒿啦，谁还去种山地？再迟二年，地边一塌，还不是又变成“荒山一处”了吗！

老弟！再不要跟人家说地板能换粮食。地板什么也不能换，我那三亩菜地，地板不比你的赖，劳力不行了，打的还不够粪钱；常家窑那顷把红土夹沙地，地板也不赖，没有人只能长蒿，想当柴烧还得亲自去割，雇人割回来，不比买柴

便宜。

老弟！人家农会主席跟区上的同志说得一点也不差，粮食确实实是劳力换的，不信你今年自己种上二亩去试试！

（一九四四年）

李家庄的变迁

李家庄有座龙王庙，看庙的叫“老宋”。老宋原来也有名字，可是因为他的年纪老，谁也不提他的名字；又因为他的地位低，谁也不加什么称呼，不论白胡老汉，不论才会说话的小孩，大家一致都叫他“老宋”。

抗战以前的八九年，这龙王庙也办祭祀，也算村公所，修德堂东家李如珍也是村长也是社首，因此老宋也有两份差——是村警也是庙管。

庙里挂着一口钟，老宋最喜欢听见钟响。打这钟也有两种意思：若是只打三声——往往是老宋亲自打，就是有人敬神；若是不住乱打，就是有人说理。有人敬神，老宋可以吃上一份献供；有人说理，老宋可以吃一份烙饼。

一天，老宋正做早饭，听见庙门响了一声，接着就听见那口钟当当地响起来。隔着竹帘子看，打钟的是本村的教书先生春喜。

春喜，就是本村人，官名李耀唐，是修德堂东家的本家侄儿。前几年老宋叫春喜就是“春喜”，这会春喜已经二十好几岁了，又在中学毕过业，又在本村教小学，因此也叫不得“春喜”了。可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汉，把他亲眼看着长大了的年

轻后生硬叫成“先生”，也有点不好意思。老宋看见打钟的是他，一时虽想不起该叫他什么，可是也急忙迎出来，等他打罢了钟，向他招呼道：“屋里坐吧！你跟谁有什么事了？”

春喜对他这招待好象没有看见，一声不哼走进屋里向他下命令道：“你去报告村长，就说铁锁把我的桑树砍了，看几时给我说！”老宋去了。等了一会，老宋回来说：“村长还没有起来。村长说今天晌午开会。”春喜说：“好！”说了站起来，头也不回就走了。

老宋把饭做成，盛在一个串门大碗^①里，端在手里，走出庙来，回手锁住庙门，去通知各项办公人员和事主。他一边吃饭一边找人，饭吃完了人也找遍了，最后走到福顺昌杂货铺，通知了掌柜王安福，又取了二十斤白面回庙里去。这二十斤面，是准备开会时候做烙饼用的。从前没有村公所的时候，村里人有了事是请社首说理。说的时候不论是社首、原被事主、证人、庙管、帮忙，每人吃一斤面烙饼，赶到说完了，原被事主，有理的摊四成，没理的摊六成。民国以来，又成立了村公所；后来阎锡山巧立名目，又成立了息讼会，不论怎样改，在李家庄只是旧规添上新规，在说理方面，只是烙饼增加了几份——除社首、事主、证人、帮忙以外，再加上村长副、闾邻长、调解员等每人一份。

到了晌午，饼也烙成了，人都都来了，有个社首叫小毛的，先给大家派烙饼——修德堂东家李如珍是村长又是社首，李春喜是教员又是事主，照例是两份，其余凡是顶两个名目的也都照例是两份，只有一个名目的照例是一份。不过也有不同，

^①串门大碗，即一碗可以吃饱的大碗。

象老宋，他虽然也是村警兼庙管，却照例又只能得一份。小毛自己虽是一份，可是村长照例只吃一碗鸡蛋炒过的，其余照例是小毛拿回去了。照例还得余三两份，因为怕半路来了什么照例该吃空份子的人。

吃过了饼，桌子并起来了，村长坐在正位上，调解员是福顺昌掌柜王安福，靠着村长坐下，其余的人也都依次坐下。小毛说：“开腔吧，先生！你的原告，你先说！”

春喜说：“好，我就先说！”说着把椅子往前一挪，两只手互相把袖口往上一捋，把脊梁骨挺得直蹶蹶地说道：“张铁锁的南墙外有我一个破茅厕……”

铁锁插嘴道：“你的？”

李如珍喝道：“干什么？一点规矩也不懂！问你时候你再说！”回头又用嘴指了指春喜，“说吧！”

春喜接着道：“茅厕旁边有棵小桑树，每年的桑叶简直轮不着我自己摘，一出来芽就有人摘了。昨天太阳快落的时候，我家里去这桑树下摘叶，张铁锁女人说是偷他们的桑叶，硬拦住不叫走，恰好我放学回去碰上，说了她几句，她才算丢开手，本来我想去找张铁锁，叫他管教他女人，后来一想，些小事走开算了，何必跟她一般计较，因此也没有去找他。今天早上我一出门，看见桑树不在了，我就先去找铁锁。一进门我说：

‘铁锁！谁把茅厕边那小桑树砍了？’他老婆说：‘我！’我说‘你为什么砍我的桑树？’她说‘你的？你去打听打听是谁的！’我想我的东西还要去打听别人？因此我就打了钟，来请大家给我问问他。我说完了，叫他说吧！看他指什么砍树。”

李如珍用嘴指了一下铁锁：“张铁锁！你说吧！你为什么砍人家的树？”

铁锁道：“怎么你也说是他的树？”

李如珍道：“我还没有问你你就先要问我啦是不是？你们这些外路人实在没有规矩！来了两三辈了还是不服教化！”

小毛也教训铁锁道：“你说你的理就对了，为什么先要跟村长顶嘴？”

铁锁道：“对对对，我说我的理：这棵桑树也不是我栽的，是它自己出的，不过长在我的茅厕墙边，总是我的吧？可是哪一年也轮不到我摘叶子，早早地就被人家偷光了……”

李如珍道：“简单些！不要拉那么远！”

铁锁道：“他拉得也不近！”

小毛道：“又顶起来了！你是来说理来了呀，是来顶村长来了？”

铁锁道：“你们为什么不叫我说话？”

福顺昌掌柜王安福道：“算了算了！怨咱们说不了事情。我看双方的争执在这里，就是这茅厕究竟该属谁。我看这样子吧：耀唐！你说这茅厕是你的，你有什么凭据？”

春喜道：“我那是祖业，还有什么凭据？”

王安福又向铁锁道：“铁锁你啦？你有什么凭据？”

铁锁道：“连院子带茅厕，都是他爷爷手卖给我爷爷的，我有契纸。”说着从怀里取出契纸来递给王安福。

大家都围拢着看契，李如珍却只看着春喜。

春喜道：“大家看吧！看他契上是一个茅厕呀，是两个茅厕！”

铁锁道：“那上边自然是一个！俺如今用的那个，谁不知道是俺爹新打的？”

李如珍道：“不是凭你的嘴硬啦！你记得记不得？”

铁锁道：“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我现在才二十岁，自然记不得。可是村里上年纪的人多啦！咱们请出几位来打听一下！”

李如珍道：“怕你嘴硬啦？还用请人？我倒五十多了，可是我就记不得！”

小毛道：“我也四十多了，自我记事，那里就是两个茅厕！”

铁锁道：“小毛叔！咱们说话都要凭良心呀！”

李如珍翻起白眼向铁锁道：“照你说是大家打伙讹你啦，是不是？”

铁锁知道李如珍快撒野了，心里有点慌，只得说道：“那我也不敢那么说！”

窗外有个女人抢着叫道：“为什么不敢说？就是打伙讹人啦！”只见铁锁的老婆二妞当当当跑进来，一手抱着个孩子，一手指划着，大声说道：“你们五十多的记不得，四十多的记得就是两个茅厕，难道村里再没有上年纪的人，就丢下你们两个了？……”

李如珍把桌子一拍道：“混蛋！这样无法无天的东西！滚出去！老宋！撵出她！”

二妞道：“撵我呀？贼是我捉的，树也是我砍的，为什么不叫我说话？”

李如珍道：“叫你来没有？”

二妞道：“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哪有这说理不叫正头事主的？”

小毛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有你男人在场，叫你做什么？走吧走吧！”说着就往外推她。

二妞把小毛的手一拨道：“不行！不是凭你的力气大啦！贼是我捉的，树是我砍的！谁杀人谁偿命！该犯什么罪我都领，不要连累了我的男人。”

在窗外听话的人越挤越多，都暗暗点头，还有些人交头接耳说：“二妞说话把得住理！”

正议论间，又从庙门外走进个人来，有二十多岁年纪，披着一头短发，穿了件青缎夹马褂，手里提了根藤条手杖。人们一见他，跟走路碰上蛇一样，不约而同都吸了一口冷气，给他让开了一条路。这人叫小喜，官名叫继唐，也是李如珍的本家侄子，当年也是中学毕业，后来吸上了金丹，就常和邻近的光棍们来往，当人贩、卖寡妇、贩金丹、挑词讼……无所不为，这时又投上三爷的门子，因为三爷是阎锡山的秘书长的堂弟，小喜抱上这条粗腿，更是威风凛凛，无人不怕。他一进去，正碰着二妞说话，便对二妞发话道：“什么东西唧唧喳喳的！”

除了村长是小喜的叔父，别的人都站起来陪着笑脸招呼小喜，可是二妞偏不挨他的骂，就顶他道：“你管得着？你是公所的什么人？谁请的你？……”

二妞话没落音，小喜劈头就是一棍道：“滚你妈的远远的！反了你！草灰羔子！”

小毛拦道：“继唐！不要跟她一般计较！”又向二妞道：“你还不快走？”

二妞并不哭，也不走，挺起胸膛向小喜道：“你杀了我吧！”

小喜抡转棍子狠狠地又在二妞背上打了两棍道：“杀了你又有何事？”把小孩子的胳膊也打痛了，小孩子大哭起来。

窗外边的人见势头不对，跑进去把二妞拉出来了。二妞仍

不服软，仍回头向里边道：“只有你们活的了！外来户还有命啦？”别的人低声劝道：“少说上句吧！这时候还说什么理？你还占得了他的便宜呀？”

村长在里边发话道：“闲人一概出去！都在外边乱什么？”

小毛揭起帘子道：“你们就没有看见庙门上的虎头牌吗？‘公所重地，闲人免进。’你们乱什么？出去！”

窗外的人们也只得掩护二妞走出去。

小毛见众人退出，赶紧回头招呼小喜：“歇歇，继唐！老宋！饼还热不热了？”

老宋端过一盘烙饼来道：“放在火边来，还不很冷！”说着很小心地放在小喜眼前。

小喜也不谦让，抓起饼子吃着，连吃带说：“我才从三爷那里回来。三爷托我给他买一张好条几，不知道村里有没有？”

小毛道：“回头打听一下看吧，也许有！”

李如珍道：“三爷那里很忙吗？”

“忙，”小喜嘴里嚼着饼子，连连点头说，“事情实在多！三爷也是不想管，可是大家找得不行！凡是县政府管不了的事，差不多都找到三爷那里去了。”老宋又端着汤来，小喜接过来喝了两口，忽然看见铁锁，就放下碗向铁锁道：“铁锁！你那女人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啦！你看那象个什么样子？唧唧喳喳，一点也不识羞！就不怕别人笑话？”

铁锁想：“打了我老婆，还要来教训我，这成什么世界？”可是势头不对，说不得理，也只好不作声。

停了一会，小喜的汤也快喝完了，饼子还没有吃到三分之一。福顺昌掌柜王安福向大家提道：“咱们还是说正事吧！”

小喜站起来道：“你们说吧！我也摸不着，我还要给三爷买条儿去！”

小毛道：“吃了再去吧！”

小喜把盘里的饼一卷，捏在手里道：“好，我就拿上！”说罢，拿着饼子，提起他的藤条手杖，匆匆忙忙地走了。

王安福接着道：“铁锁！你说你现在用的那个茅厕是你父亲后来打的，能找下证人不能？”

铁锁道：“怎么不能？你怕俺邻家陈修福老汉记不得啦？”

春喜道：“他不行！一来他跟你都是林县人，再者他是你女人的爷爷，是你的老丈爷，那还不是只替你说话？”

铁锁道：“咱就不找他！找杨三奎吧？那可是本地人！”

春喜道：“那也不行！白狗是你的小舅，定的是杨三奎的闺女，那也有亲戚关系。”

铁锁道：“这你难不住我！咱村的老年人多啦！”随手指老宋道：“老宋也五六十岁了，跟我没有有什么亲戚关系吧？”

小毛拦道：“老宋他是个穷看庙的，他知道什么？你叫他说说他敢当证人不敢？老宋！你知道不知道？”

老宋自然记得，可是他若说句公道话，这个庙就住不成了，因此他只好推开：“咱从小是个穷人，一天只顾弄着吃，什么闲事也不留心。”

李如珍道：“有契就凭契！契上写一个不能要人家两个，还要找什么证人？村里老年人虽然多，人家谁也不是给你管家务的！”

小毛道：“是这样吧！我看咱们还是背场谈谈吧！这样子结不住口。”

大家似乎同意，有些人就漫散开来交换意见。小毛跟村长

跟春喜互相捏弄了一会手码，王安福也跟闾邻长们谈了一谈事情的真相。后来小毛走到王安福跟前道：“这样吧！他们的意思，叫铁锁包赔出这么个钱来！”说着把袖口对住王安福的袖口一捏，接着道：“你看怎么样？”

王安福悄悄道：“说真理，他们卖给人家就是这个茅厕呀！人家用的那一个，真是他爹老张木匠在世时候打的。我想这你也该记得！”

小毛道：“那不论记得不记得，那样顶真，得罪的人就多了。你想：村长、春喜，意思都是叫他包赔几个钱。还有小喜，不说铁锁，我也惹不起人家呀！”

王安福没有答话，只是摇头。闾邻长们也不敢作什么主张，都是看看王安福，看着村长，看着小毛，直到天黑也没说个结果，就都回家吃饭去了。

晚上，老宋又到各家叫人，福顺昌掌柜王安福说是病了，没有去。其余的人，也有去的，也有不去的。大家在庙里闷了一会，村长下了断语：茅厕是春喜的，铁锁砍了桑树包出二百块现洋来，吃烙饼和开会的费用都由铁锁担任，叫铁锁讨保出庙。

二

陈修福老汉当保人，保证铁锁一月以后还钱，才算放铁锁出了庙。铁锁气得抬不起头来，修福老汉拉着胳膊把他送到家。他一回去，一头睡在床上放声大哭，二妞问他，他也说不出话来，修福老汉也劝不住。一会，邻家们也都听见了，都跑来问询，铁锁仍哭得说不出话来，修福老汉才把公所处理的结果一件件告诉大家说：“茅厕说成人家的了，还叫包人家二

百块钱，再担任开会的花费。”铁锁听老汉又提起来，哭得更喘不过气来，邻家们人人摇头，二妞听了道：“他们说得倒体面！”咕咚一声把孩子放在铁锁眼前道：“给你孩子，这事你不用管！钱给他出不成！茅厕也给他丢不成！事情是我闯的，就是他，就是我！滚到哪里算哪里，反正是不得好活！”一边说，一边跳下床就往外跑，邻家们七八个人才算把她拖住。小孩在炕上直着嗓子号，修福老汉赶紧抱起来。

大家分头解劝，劝的二妞暂息了怒，铁锁也止住了哭。杨三奎向修福老汉道：“太欺人！不只你们外路人，就是本地人也活不了。你看村里一年出多少事，哪一场事不是由着人家捏弄啦？实在没法！”

内中有个叫冷元的小伙子跳起来叫道：“铁锁！到哪个崖头路边等住他，你不敢一镢头把他捣下沟里？”

杨三奎道：“你们年轻人真不识火色①！人家正在气头上啦，说那些冒失话抵什么事？”说得冷元又蹲下去了。年轻人们指着冷元笑道：“冷家伙，冷家伙！”

闷了一小会，修福老汉道：“我看可以上告他！就是到县里把官司打输了，也要比这样子了场合算。”

杨三奎道：“那倒可以！到县里他总不能只说一面理，至少也要问一问证人。”

冷元道：“这事真气死人！可惜我年纪小记不得，要不我情愿给你当证人！”

杨三奎道：“你年纪小，有大的！”有几个三四十岁的人七嘴八舌接着说：“铁锁他爹打茅厕这才几天呀？三十以上的人

①不识火色，即不识时机的意思。

差不多都记得！”“你状上写谁算谁，谁也可以给你证明。”

“多写上几个！哪怕咱都去啦！”

二妞向铁锁道：“胖孩爹！咱就到县里再跟他滚一场！任凭把家当花完也不能叫便宜了他们爷们！”又向修福老汉道：

“爷爷！你不是常说咱们来的时候都是一筐一担来的吗？败兴到底咱也不过一筐一担担着走，还落个够大！怕什么？”

正说话间，二妞的十来岁的小弟弟白狗，跑进来叫道：

“姐姐！妈来了！”二妞正起来去接，她妈已经进来了。她妈悄悄道：“你们正说什么？”冷元抢着大声道：“说告状！”二妞她妈摆手道：“人家春喜媳妇在窗外听啦！”大家都向窗上看。二妞道：“听她听罢，她能堵住我告状？”

大家听说有人听，也就不多说了，都向二妞她妈说：“你好好劝劝她吧。”说着也就慢慢散去。

李如珍叔侄们回去，另是一番气象：春喜、小喜、小毛，都集中在李如珍的大院里，把黑漆大门关起来庆祝胜利。晌午吃过烙饼，肚子都很不饿，因此春喜也就不再备饭，只破费了十块现洋买了一排金丹棒子^①作为礼物。

李如珍的太谷烟灯和宜兴磁烟斗，除了小毛打发他过了瘾以后可以吸口烟灰，别人是不能借用的，因此春喜也把他自己的烟家伙拿来。李如珍住的屋子分为里外间，里间的一盏灯下，是小毛给李如珍打泡，外间的一盏灯下，睡的是春喜和小喜弟兄两个。里间不热闹，因为李如珍觉着小毛只配烧烟，小毛也不敢把自己身分估得过高，也还有些拘束，因此就谈不起话来。小毛把金丹棒子往斗上粘一个，李如珍吸一个，一连吸

^①一排金丹棒子有五十个。

了七八个以后，小毛把斗里烟灰挖出，重新再往上粘。又吸了七八个，小毛又把灰挖出来，把两次的灰合并起来烧着，李如珍便睡着了。等到小毛打好了泡，上在斗上，把烟枪杆向他口边一靠，他才如梦初醒，衔住枪杆吸起来。

外间的一盏灯下虽然也只有小喜和春喜两个人，可是比里间热闹得多，他们谈话的材料很多：起先谈的是三爷怎样阔气，怎样厉害；后来又谈到谁家闺女漂亮，哪个媳妇可以；最后才谈到本天的胜利。他们谈起二妞，春喜说：“你今天那几棍打得真得劲！我正想不出办法来对付她，你一进去就把事情解决了。”小喜道：“什么病要吃什么药！咱们连个草灰媳妇也斗不了，以后还怎么往前闯啦？老哥！你真干不了！我看你也只能教一辈子书。”春喜道：“虽说是个草灰媳妇，倒是个有本领的。很精干！……”小喜摇头道：“嘘……我说你怎么应付不了她，原来是你看到眼里了呀？”说着用烟签指着春喜鼻子道：“叫老嫂听见怕不得跪半夜啦？没出息没出息！没有见过东西！一个小母草灰就把你迷住了！”春喜急得要分辩，也找不着一句适当的话。小喜把头挺在枕头后边哈哈大笑起来，春喜没法，也只好跟着他笑成一团。就在这时，李如珍在里间喊道：“悄悄！听听是谁打门啦？”他两个人听说，都停住了笑，果然又听得门环拍拍地连响了几声。

小毛跑出院里问道：“谁？”外边一个女人声音答道：“我！开开吧！”小喜听出是春喜媳妇的声音，又笑向春喜道：“真是老嫂找来了！”小毛开了门，春喜媳妇进来了。春喜问：“什么事？”春喜媳妇低声道：“你去听听人家二妞在家说什么啦？”一提二妞，小喜又指着春喜大笑起来，春喜也跟着笑。春喜媳妇摸不着头脑，忙问：“笑什么？”小喜道：“这

里有个谜儿，你且不用问。你先说说你听见二姐说什么来？”春喜媳妇坐在小喜背后，两肘按着小喜的腰，面对着春喜，把冷元怎样说冒失话，二姐怎样说要破全部家当到县里告状，详详细细谈了一遍。春喜还未答话，小喜用手一推道：“回去吧回去吧！没有事！她告到县里咬得了谁半截？到崖头上等，问问他哪个是有种的？”春喜也叫他媳妇回去，媳妇走了。小毛又去把大门关上，小喜仍然吹他的大话。

李如珍在里间拉长了声音轻轻叫道：“喜！——来！——”小喜进去了。小毛一见小喜，赶紧起来让开铺子叫他躺，自己坐到床边一个凳子上，听他们谈什么事。李如珍看了小毛一眼，随手拈起三四个金丹棒子递给他道：“你且到外边躺一会。”小毛见人家不叫他听，也只好接住棒子往外间来吸。

小毛吸了第一遍，正烧着灰，小喜就出来了。他一见小喜出来，自然又不得不起来再让小喜躺下。小喜向春喜道：“老哥！叔叔说那东西真要想去告状还不能不理。”小毛站在一边接话道：“那咱也得想个办法呀！”小喜见小毛还在旁边，后悔自己不该说了句软话，就赶紧摆足架子答道：“那自然有办法！”春喜道：“扯淡！一个小土包子，到县里有他的便宜呀？”小喜看了小毛一眼道：“你还到里边去吧！”小毛又只得拿上他的金丹灰回里间去。小喜等他去后，低声向春喜道：“自然不是怕官司上吃了他的亏！叔叔说不可叫他开这个端。不论他告得准告不准，旁人说起来，一个林县草灰告过咱一状，那总是一件丢脸的事。”春喜道：“那咱也不能托人去留他呀？”小喜道：“什么东西？还值得跟他那样客气？想个法叫他告不成就完了！”春喜道：“想个什么法？”小喜道：“不怕！有三爷！明天一早我就找三爷去。”

这天晚上，也不知他们吸到什么时候才散。

第二天早上小喜去找三爷去；铁锁忙着借钱准备告状。阴历四月庄家人一来很忙，二来手头都没有钱，铁锁跑来跑去，直跑到晌午，东一块，西五毛，好不容易才凑了四五块钱。二妞在家也忙着磨面蒸窝窝，给铁锁准备进城的干粮。

晌午，铁锁和二妞正在家吃饭，小喜领了一个人进来，拿着绳，把铁锁的碗夺了，捆起来。二妞道：“作什么！他又犯下什么罪了？”小喜道：“不用问！也跑不了你！”说着把二妞的孩子夺过来丢在地上，把二妞也捆起来。村里人正坐在十字街口吃饭，见小喜和一个陌生的人拿着绳子往铁锁院里去，知道没有好事。杨三奎、修福老汉、冷元……这几个铁锁的近邻，就跟着去看动静。他们看见已经把铁锁两口捆起来，小孩子爬在地上哭，正预备问问为什么，只见小喜又用小棍子指着冷元道：“也有他！捆上捆上！”那个陌生人就也把冷元捆住。

两个人牵着三个人往外走，修福老汉抱起小孩和大家都跟了出来。街上的人，有几个胆小的怕连累自己，都走开了；其余的人跟在后面，也都想不出挽救的办法。二妞的爹娘和兄弟，冷元的爹娘也半路追上来跟着走。大家见小喜和他引来的那个人满脸凶气，都搭不上碴，只有修福老汉和冷元的爹绕着小喜，一边走，一边苦苦哀求。

小喜把人带到庙里，向老宋道：“请村长去！”老宋奉命去了。

修福老汉央告小喜道：“继唐！咱们都是个邻居，我想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他们年轻人有什么言差语错，还得请你高高手，担待着些。”

小喜道：“这事你也清楚！他们一伙人定计，要到崖头路

边谋害村长。村长知道了，打发我去找三爷。我跟三爷一说，三爷说：‘这是响马举动，先把他们捋来再说！’听说人还多，到那里一审你怕不知道还有谁啦？”

二妞听了道：“我捉了一回贼就捉出事来了，连我自己也成了响马了！看我杀了谁了，抢了谁了？”

小喜道：“你听！硬响马！我看你硬到几时？”

修福老汉道：“这闺女！少说上句吧！”

李如珍来了，小毛也跟在后边。小喜向李如珍道：“三爷说叫先把人捆去再说。你先拨几个保卫团丁送他们走。”

修福老汉看见事情急了，把孩子递给他孙子白狗，拉了小毛一把道：“我跟你说话！”小毛跟他走到大门外，他向小毛道：“麻烦你去跟村长跟小喜商量一下，看这事情还能在村里了了一了不能？”小毛素日也摸得着小喜的脾气，知道他有钱万事休，再者如能来村里再说一场，不论能到底不能到底，自己也落不了空，至少总能吃些东西，就满口应承道：“可以！我去给你探探口气！自然我也跟大家一样，只愿咱村里没事。”说着就跑到小喜面前道：“继唐！来！我跟你说话！”小喜道：“说吧！”小毛又点头道：“来！这里！”小喜故意装成很不愿意的样子，跟着小毛走进龙王殿去。

白狗抱着小胖孩站在二妞旁边，小胖孩伸着两只小手向二妞扑。二妞预备去摸他，一动手才想起手被人家反绑着，随着就瞪了瞪眼道：“摔死他！要死死个干净！”口里虽是这么说着，眼里却滚下泪来。二妞她娘看见很伤心，一边哭一边给二妞揩泪。

小喜从龙王殿出来道：“我看说不成！他们这些野草灰不见丧不掉泪，非弄到他们那地方不行！”小毛在后边跟着道：

“不要紧，咱慢慢说！山不转路转，没有说不倒的事！村长！走吧，咱们跟继唐到你那里谈一谈！”小喜吩咐他带来的那个人道：“你看着他们，说不好还要带他们走！”说罢同村长先走了。

小毛悄悄向修福老汉道：“得先买两排棒子！”修福老汉道：“我不知道哪里有卖的。”小毛道：“拿二十块现洋就行，我替你买去！”修福老汉和冷元他爹齐声道：“可以，托你吧！”小毛随着村长和小喜去了。

小喜说三爷那里每人得花一百五十元现洋，三个人共是四百五十元。一边讨价一边还价，小毛也做巫婆也做鬼，里边跑跑外边走走，直到晚饭时候才结了口——三爷那边，三个人共出一百五十元。给小喜和引来那个人五十元小费。铁锁和冷元两家摆酒席请客赔罪，具保状永保村长的安全。前案不动，还照昨天村公所处理的那样子了结。

定死了数目，小毛说一个不能再少了。修福老汉到庙里去跟铁锁商量，铁锁自己知道翻不过了，也只好自认晦气。二妞起先不服，后来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不再作主张。冷元也只是为了铁锁的事说了句谈话，钱还得铁锁出，因此也没有什么意见。修福老汉见他们应允了，才去找杨三奎和自己两个人作保，把他们三个人保出。

这一次保出来和上一次不同，春喜的钱能迟一个月，小喜却非带现钱不可。铁锁托修福老汉和杨三奎到福顺昌借钱，王安福老汉说柜上要收茧，没有钱出放，零的可以，上一百元就不行。杨三奎向修福老汉道：“福顺昌不行，村里再没有道路，那就只好再找小毛，叫他去跟小喜商量，就借六太爷那钱吧！”修福老汉道：“使上二百块那个钱，可就把铁锁那一点

家当挑拆了呀！”杨三奎道：“那再没办法，反正这一关总得过。”修福老汉又去跟铁锁商量去。

原来这六太爷是三爷的堂叔。他这放债与别家不同：利钱是月三分，三个月期满，本利全归。这种高利，在从前也是平常事，特别与人不同的是他的使钱还钱手续；领着他的钱在外边出放的经手人，就是小喜这一类人，叫做“承还保人”。使别人的钱，到期没钱，不过是照着文书下房下地，他这文书上写的是“到期本利不齐者，由承还保人作主将所质之产业变卖归还”，因此他虽没有下过人的地，可是谁也短不下他的钱。小喜这类人往外放钱的时候是八当十，文书上写一百元，实际上只能使八十元，他们从中抽使二十元。“八当十，三分利，三个月一期，到期本利还清，想再使又是八当十，还不了钱由承还保人变卖产业”；这就是六太爷放债的规矩。这种钱除了停尸在地或命在旦夕非钱不行时候，差不多没人敢使，铁锁这会就遇了这样个非使不行。

修福老汉跟铁锁一商量，铁锁也再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托小毛去央告小喜，把他爷他爹受了两辈子苦买下的十五亩地写在文书上，使了六太爷二百五十块钱（实二百块），才算把三爷跟小喜这一头顾住。两次吃的面、酒席钱、金丹棒子钱，一共三十元，是在福顺昌借的。

第三天，请过了客，才算把这场事情结束了。

铁锁欠春喜二百元，欠六太爷二百五十元，欠福顺昌三十元，总共是四百八十元外债。

小喜在八当十里抽了五十元，又得了五十元小费，他引来那个捆人的人，是两块钱雇的，除开了那两块，实际上得了九十八元。

李如珍也不落空：小喜说三爷那里少不了一百五十元，实际上只缴三爷一百元，其余五十元归了李如珍。

小毛只跟着吃了两天好饭，过了两天足瘾。

一月之后，蚕也老了，麦也熟了，铁锁包春喜的二百元钱也到期了，欠福顺昌的三十元也该还了，使六太爷的二百五十元铁锁也觉着后怕了。他想：“背利不如早变产，再迟半年，就把产业全卖了也不够六太爷一户的。”主意一定，咬一咬牙关，先把茧给了福顺昌，又糞了两石麦子把福顺昌的三十元找清；又把地卖给李如珍十亩，还了六太爷的二百五十元八当十；把自己住的一院房子给了春喜，又贴了春喜三石麦抵住二百元钱，自己搬到院门外碾道边一座喂过牲口的房子里去住；这样一来，只剩下五亩地和一座喂过牲口的房子。春喜因为弟兄们多，分到的房子不宽绰，如今得了铁锁这座院子，自是满心欢喜，便雇匠人补檐头、扎仰尘^①、粉墙壁、添门面，不几天把个院子修理得十分雅致，修理好了便和自己的老婆搬到里边去住。铁锁啦？搬到那座喂过牲口的房子里，光锄头犁耙、缸盆瓦罐、锅匙碗筷、箩头筐子……就把三间房子占去了两间，其余一间，中间一个驴槽，槽前修锅台，槽上搭床铺，挤得连水缸也放不下。

铁锁就住在这种房子里，每天起来看看对面的新漆大门和金字牌匾，如何能不气？不几天他便得了病，一病几个月，吃药也无效。俗语说：“心病还须心药治。”后来三爷上了太原，小喜春喜都跟着去了。有人说：“县里有一百多户联名告了一状。省城把他们捉去了。”有人说：“三爷的哥哥是阎锡山的秘书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听说他在家闹得不象

^①当地群众称顶棚为仰尘，扎仰尘，就是糊顶棚。

话，把他叫到省城关起来了。”不论怎么说，都说与三爷不利。铁锁听了这消息，心里觉着痛快了一下，病也就慢慢好起来了。

三

铁锁自从变了产害过病以后，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幸而他自幼跟着他父亲学过木匠和泥水匠，虽然没有领过工，可是给别人做个帮手，也还是个把式，因此他就只好背了家具到外边和别的匠人碰个伙，顾个零花销。

到了民国十九年夏天，阎锡山部下有个李师长，在太原修公馆，包工的是跟铁锁在一块打过伙的，打发人来叫铁锁到太原去。铁锁一来听说太原工价大，二来又想打听一下三爷究竟落了个什么下场，三来小胖孩已经不吃奶了，家里五亩地有二妞满可以种得过来，因此也就答应了。不几天，铁锁便准备下干粮盘缠衣服鞋袜，和几个同行相跟着到太原去。

这时正是阎锡山自称国民革命军第三方面军出兵倒蒋打到北平的时候，因为军事上的胜利，李师长准备将来把公馆建设在北平，因此打电报给太原的管事的说叫把太原的工暂时停了。人家暂时停工，铁锁他们就暂时没事做，只得暂时在会馆找了一间房子住下。会馆的房子可以不出房钱，不凑巧的是住了四五天就不能再住了，来了个人在门外钉了“四十八师留守处”一个牌子，通知他们当天找房子搬家。人家要住，他们也只得另在外边赁了一座房子搬出去。

过了几天，下了一场雨，铁锁想起会馆的床下还丢着自己一对旧鞋，就又跑到那里去找。他一进屋门，看见屋子里完全

变了样子；地扫得很光，桌椅摆得很齐整，桌上放着半尺长的大墨盒、印色盒和好多很精致的文具，床铺也很干净，上边躺着个穿着细布军服的人在那里抽鸦片烟。那个人一抬头看他，他才看见就是小喜。他又和碰上蛇一样，打了个退步，以为又要出什么事，不知该怎样才好，只见小喜不慌不忙向他微微一笑道：“铁锁？我当是谁？你几时到这里？进来吧！”铁锁见他对自己这样客气还是第一次，虽然不知他真意如何，看样子是马上不发脾气的，况且按过去在村里处的关系，他既然叫进去，不进去又怕出什么事，因此也就只好走近他的床边站下。小喜又用嘴指着烟盘旁边放的纸烟道：“吸烟吧！”铁锁觉着跟这种人打交道，不出事就够好，哪里还有心吸烟，便推辞道：“我才吸过！”只见小喜取起一根递给他道：“吸吧！”这样一来，他觉着不吸又不好，就在烟灯上点着，靠床沿站着吸起来。他一边吸烟，一边考虑小喜为什么对他这样客气，但是也想不出个原因来。小喜虽然还是用上等人对一般人的口气，可也好象是亲亲热热地问长问短——问他跟谁来的，现在做什么，住在哪里，有无盘费，……问完以后，知道他现在没有工作，便向他道：“你们这些受苦人，闲住也住不起。论情理，咱们是个乡亲，你遇上了困难我也该照顾你一下，可是又不清楚谁家修工。要不你就来这里给我当个勤务吧？”铁锁觉着自己反正是靠劳力吃饭，做什么都一样，只是见他穿着军人衣服，怕跟上他当了兵，就问道：“当勤务是不是当兵？”小喜见他这样问，已经猜透他的心事，便答道：“兵与兵不同：这个兵一不打仗，二不调动，只是住在这里收拾收拾屋子，有客来倒个茶，跑个街道；论赚钱，一月正饷八块，有个客人打打牌，每次又能弄几块零花钱；这还不是抢也抢不到的事

吗？我这里早有好几个人来运动过，我都还没有答应。叫你来就是因为你没有事，想照顾你一下，你要不愿来也就算了。”

正说着，听见院里自行车扎扎扎皮鞋脱脱脱，车一停下，又进来一个穿军服的，小喜赶快起身让坐，铁锁也从床边退到窗下。那人也不谦让，走到床边便与小喜对面躺下。小喜指着铁锁向那人道：“参谋长，我给咱们留守处收了个勤务！我村子里人，很忠厚，很老实！”那人懒洋洋地道：“也好吧！”小喜又向铁锁道：“铁锁！你回去斟酌一下，要来今天晚上就来，要不来也交代我一声，我好用别人！”铁锁一时虽决定不了该干不该干，可也觉着这是去的时候了，就忙答道：“可以，那我就走了！”小喜并不起身相送，只向他道：“好，去吧！”他便走出来了。

参谋长道：“这孩子倒还精干，只是好象没有胆，见人不敢说响话。”小喜道：“那倒也不见得，不过见了我他不敢怎样放肆，因为过去处的关系不同。”参谋长道：“你怎么想起要用个勤务来？”小喜道：“我正预备报告你！”说着先取出一包料面递给参谋长，并且又取一根纸烟，一边往上缠吸料子用的纸条，一边向他报告道：“前不大一会，有正大饭店①一个伙计在街上找四十八师留守处，说是河南一个客人叫他找，最后问这里警察派出所，才找到这里来。我问明了原由，才推他说今天这里没有负责人，叫他明天来。我正预备吸口烟到你公馆报告去，我村那个人就进来了；还没有说几句话，你就进来了。”

按他两个人的等级来说，小喜是上尉副官，而参谋长是少将。等级相差既然这么远，有什么事小喜应该马上报告，说话也

①正大饭店是省里省外的高级官员等阔人们来了才住的。

应该更尊敬一些，为什么小喜还能慢腾腾地和他躺在一处，说话也那样随便呢？原来这四十八师是阎锡山准备新成立的队伍，起初只委了一个师长，参谋长还是师长介绍的，并没有一个兵，全靠师长的手段来发展。师长姓霍，当初与豫北一带的土匪们有些交道，他就凭这个资本领了师长的委任。他说：“只要有名义，兵是不成问题的。”小喜也懂这一道。参谋长虽然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可是隔行如隔山，和土匪们取联络便不如小喜，况且小喜又是与秘书长那个系统有关系的，因此参谋长便得让他几分。

小喜说明了没有即刻报告他的理由，见他没有说什么，就把手里粘好纸条子的纸烟递给他让他吸料子，然后向他道：

“我想这个客人，一定是老霍去了联络好了以后，才来和咱们正式取联系的。他既然来了就住在正大饭店，派头一定不小，我们也得把我们这留守处弄得象个派头，才不至于被他轻看，因此我才计划找个勤务。”小喜这番话，参谋长听来头头是道，就称赞道：“对！这个是十分必要的。我看不只得个勤务，门上也得有个守卫的。我那里还有几个找事的人，等我回去给你派两个来。下午你就可以训练他们一下，把咱们领来的服装每人给他发一套。”计划已定，参谋长又吸了一会料子，谈了些别的闲话，就回公馆去了。

铁锁从会馆出来，觉着奇怪。他想：“小喜为什么变得那样和气？对自己为什么忽然好起来？说是阴谋吗？看样子也看不出来，况且自己现在是个穷匠人，他谋自己的什么？说是真要顾盼乡亲吗？小喜从来不落无宝之地，与他没有利的事就没有见他干过一件。”最后他想着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小喜要用人，一时找不到个可靠的人，就找到自己头上；第二是小喜

觉着过去对不起自己，一时良心发现，来照顾自己一下，以补他良心上的亏空。他想要是第一种原因，他用人他赚钱，也是一种公平的交易——虽然是给他当差，可是咱这种草木之人就是伺候人的；要是第二种原因那更好，今生的冤仇今生解了，省得来生冤冤相报——因为铁锁还相信来生报应。他想不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都与自己无害，可以干一干。他完全以为小喜已经是变好了。回到住的地方跟几个同事一说，同事以为象小喜这种人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好的，不过现在的事却同意他去干，也就是同意他说的第一种理由。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铁锁便收拾行李搬到会馆去。

铁锁到了会馆，参谋长打发来的两个人也到了，小喜便在医院里分别训练：教那两个人怎样站岗，见了官长怎样敬礼，见了老百姓怎样吆喝，见了哪等客人用哪等话应酬，怎样传递名片；又教铁锁打水、倒茶、点烟等种种动作。他好象教戏一样，一会算客人，一会算差人……直领着三个人练习了一下午，然后发了服装和臂章，准备第二天应客。

第二天早上，参谋长没有吃饭就来了。他进来先问准备得如何，然后就在留守处吃饭。吃过饭，他仍和小喜躺在床上，一边吸料子一边准备应酬这位不识面的绿林豪侠。小喜向他说对付这些人，要几分派头、几分客气、几分豪爽、几分自己，参谋长也十分称赞。他们的计议已经一致，就另谈些闲话，等着站岗的送名片来。

外边两个站岗的，因为没有当过兵，新穿起军服扛起枪来，自己都觉着有点新鲜，因此就免不了打打闹闹——一起先两个人各自练习敬礼，后来轮流着一个算参谋长往里走，另一个

敬礼。有一次，一个敬了礼，当参谋长的那一个没有还礼，两个人便闹起来，当参谋长那个说：“我是参谋长，还礼不还礼自然是由我啦！”另一个说：“连个礼都不知道还，算你妈的什么参谋长？”

就在这时候，一辆洋车拉了个客人，到会馆门外停住，客人跳下车来。两个站岗的见有人来了，赶紧停止了闹，仍然站到岗位上，正待要问客人，只见那客人先问道：“里边有负责人吗？”一个答道：“有！参谋长在！”还没有来得及问客人是哪来的，那客人也不劳传达也不递名片，挺起胸膛呱呱哒哒就走进去了。

小喜正装了一口料子，用洋火点着去吸，听得外边进来了人，还以为是站岗的，没有理，仍然吸下去。烟正进到喉咙，客人也正揭起帘子。小喜见进来的人，穿着纺绸大衫，留着八字胡，知道有些来历，赶紧顺手连纸烟带料子往烟盘里一扔，心里暗暗埋怨站岗的。参谋长也欠身坐起。客人进着门道：

“你们哪一位负责？”小喜见他来得高傲，赶紧指着参谋长用大官衙压他道：“这就是师部参谋长！”哪知那客人丝毫不失威风，用嘴指了一下参谋长问道：“你就是参谋长？”参谋长道：“是的，有事吗？”那客人不等让坐就把桌旁的椅子扭转，面向着参谋长坐了道：“兄弟是从河南来的。老霍跟我们当家的接洽好了，写信派兄弟来领东西！”说着从皮包中取出尺把长一封信来，递给小喜。小喜把信递给参谋长，一边又吩咐铁锁倒茶。

参谋长接住信一看，信是老霍写的，说是已经拉好了一个团，要留守处备文向军需处请领全团官兵服装、臂章、枪械、给养等物，并开一张全团各级军官名单，要留守处填写委状。

参谋长看了道：“你老哥就是团长吗？”客人道：“不！团长是我们这一把子一个当家的，兄弟只是跟着我们当家混饭吃的。”参谋长拿着名单问道：“哪一位是……”客人起身走近参谋长，指着名单上的名字道：“这是我们当家的，这一个就是兄弟我，暂且抵个参谋！”参谋长道：“你贵姓王？”客人道：“是的！兄弟姓王！”参谋长道：“来了住在哪里？”客人道：“住在正大饭店。”参谋长道：“回头搬到这里来住吧！”又向小喜道：“李副官！回头给王参谋准备一间房子！”客人道：“这个不必，兄弟初到太原，想到处观光一番，住在外边随便一点。”参谋长道：“那也好！用着什么东西，尽管到这里来找李副官！”小喜也接着道：“好！用着什么可以跟我要！”客人道：“谢谢你们关心。别的不用什么，只是你们山西的老海很难买。”转向小喜道：“方才见你老兄吸这个，请你帮忙给我买一点！”说着从皮包中取出五百元钞票递给小喜。

小喜接住票子道：“好！这我可以帮忙！”说着就从床上起来让他道：“这里还有一些，你先吸几口！”说了就把烟盘下压着的一个小纸包取出来放在外边。客人倒也很自己，随便谦让了一下，就躺下去吸起来。

小喜接住钱却费了点思索。他想：打发人去买不出来；自己去跑街，又不够派头，怕客人小看。想了一会，最后决定写信打发铁锁去。他坐在桌上写完了信，出到屋门口叫道：“张铁锁！到五爷公馆去一趟！”铁锁问道：“在什么地方？”小喜道：“天地坛门牌十号！”说着把信和钱递给他道：“买料子！”买料子当日在太原，名义上说是杀头罪，铁锁说：“我不敢带！”小喜低声道：“傻瓜！你带着四十八师的臂章，在五爷公馆买料子，难道还有人敢问？”铁锁见他这样说没有危险，也就接住

了信和钱。小喜又吩咐道：“你到他小南房里，把信交给张先生，叫他找姨太太的娘，他就知道。”铁锁答应着去了。

铁锁找到天地坛十号，推了推门，里边关着，打了两下门环，里边走出一个人来道：“谁？”随着门开了一道缝，挤出一颗头来问道：“找谁？”铁锁道：“找张先生！”说了就把手里的信递给他。那人道：“你等一等！”把头一缩，返身回去了。铁锁等了不大工夫，那人又出来喊道：“进来吧！”铁锁就跟了进去。

果然被他引到小南房。铁锁见里边有好多人，就问道：“哪位是张先生？”西北墙角桌边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瘦老汉道：“我！你稍等一等吧！海子老婆^①到火车站上去了。”人既不在，铁锁也只得等，他便坐到门后一个小凳子上，闲看这屋里的人。

靠屋的西南角，有一张床，床中间放着一盏灯。床上躺着两个人，一个是小个子，尖嘴猴；一个是塌眼窝。床边坐着一个人，伸着脖子好象个鸭子，一个肘靠着尖嘴猴的腿，眼睛望着塌眼窝。塌眼窝手里拿着一张纸烟盒里的金箔，还拿着个用硬纸卷成的、指头粗的小纸筒。他把料子挑到金箔上一点，爬起来放在灯头上熏，嘴里衔着小纸筒对住熏的那地方吸。他们三个人，这个吸了传递给那个。房子不大，床往东放着一张茶几两个小凳子，就排到东墙根了。茶几上有个铜盘，盘里放着颗切开了的西瓜。靠东的凳子上，坐着个四方脸大胖子，披着件白大衫，衬衣也不扣扣子，露出一颗大肚。靠西的凳子上，坐着个留着分头的年轻人，穿了件阴丹士林布大衫，把腰束得

^①海子是这个老婆家的村名。

细细地，坐得直挺挺地，象一根柱子。他两个面对面吃西瓜，胖子吃是大块子，呼啦呼啦连吃带吸，连下颌带鼻子都钻在西瓜皮里，西瓜子不住从胸前流下去；柱子不是那样吃法，他把大块切成些小月牙子，拿起来弯着脖子从这一角吃到那一角，看去好象老鼠吃落花生。

不论床上的，不论茶几旁边的，他们谈得都很热闹，不过铁锁听起来有许多话听不懂。他们不知什么时候就谈起来了。铁锁坐下以后，第一句便听着那柱子向胖子道：“最要紧的是归班，我直到现在还没得归了班。”胖子道：“也不在乎，只要出身正，有腿，也快。要说归班，我倒归轮委班二年了，直到如今不是还没有出去吗？按次序轮起来，民国五十多年才能轮到我，那抵什么事？”床上那个塌眼窝向鸭脖子道：“你听！人家都说归班啦！咱们啦？”鸭脖子道：“咱们这些不是学生出身的人，不去找那些麻烦！”大家都笑了。胖子向床上人道：“索性象你们可也快，只要到秘书长那里多挂几次号就行了。”尖嘴猴道：“你们虽说慢一点，可是一出去就是县长科长，我们啦，不是这个税局，就是那个监工。”塌眼窝道：“不论那些，只要钱多！”鸭脖子道：“只要秘书长肯照顾，什么都不在乎！五爷没有上过学校，不是民政厅的科长？三爷也是‘家庭大学’出身^①，不在怀仁县当县长啦？”

铁锁无意中打听三爷的下落，还恐不是，便问道：“哪个三爷？”鸭脖子看了他一眼，鼻子里一哼道：“哪个三爷！咱县有几个三爷？”铁锁便不再问了。

那柱子的话又说回来了，他还说是归班要紧。胖子向他道：

^①“家庭大学”出身，即没有上过学校的意思。

“你老弟有点过迂，现在已经打下了河北，正是用人时候。你还是听上我，咱明天搭车往北平去。到那里只要找上秘书长，个把县长一点都不成问题……”那柱子抢着道：“我不信不归班怎么能得正缺？”胖子道：“你归班是归山西的班，到河北有什么用处？况且你归班也只能归个择委班，有什么用处？不找门路还不是照样出不去吗？”

他们正争吵，外边门又开了，乱七八糟进来许多人。当头是一个戴眼镜的络腮胡大汉，一进门便向茶几上的两个人打招呼。他看见茶几上还有未吃完的西瓜，抓起来一边吃一边又让同来的人。他吃着西瓜问道：“你两位辩论什么？”胖子便把柱子要归班的话说了一遍，那戴眼镜的没有听完，截住便道：“屁！这会正是用人时候，只要找着秘书长，就是扫帚把子戴上顶帽，也照样当县长！什么择委班轮委班，现在咱们先给他凑个抢委班！”一说抢委班，新旧客人同声大笑，都说：“咱们也归了班了！抢委班！”

铁锁虽懂不得什么班，却懂得他们是找事的了，正看他们张牙舞爪大笑，忽然有人在他背后一推道：“这是不是铁锁？”铁锁回头一看，原来是春喜，也是跟着那个戴眼镜的一伙进来的。他一看果然是铁锁，就问道：“你也当了兵？”铁锁正去答话，见他挤到别的人里去，也就算了。春喜挤到床边，向那个鸭脖子道：“让我也坐坐飞机^①！”说了从小草帽中取出一个小纸包，挤到床上去。

那戴眼镜的向张先生道：“你去看看五爷给军需处王科长写那封信写成了没有。”张先生去了。那柱子问道：“把你们

^①在金箔上吸料子就叫坐飞机。

介绍到军需处了？”戴眼镜的道：“不！秘书长打电报叫我们到北平去，因为客车不好买票，准备明天借军需处往北平的专车坐一坐。”胖子道：“是不是能多坐一两个人？”戴眼镜的道：“怕不行！光我们就二三十个人啦！光添你也还马虎得过，再多了就不行了。”说着张先生已经拿出信来，戴眼镜的接住了信，就和同来的那伙人一道又走了，春喜也包起料子赶出去。胖子赶到门边喊道：“一定借光！”外边答道：“可以！只能一两个人！”

他们去了，张先生问铁锁道：“你怎么认得他？”铁锁道：“他跟我是一个村人。”张先生道：“那人很能干，在大同统税局很能弄个钱。秘书长很看得起，这次打电报要的几十个人也有他，昨天他才坐火车从大同赶回来。”正说着，姨太太的娘从火车站上回来了，铁锁便买上料子回去交了差。

打发河南的客人去了，参谋长立刻备了呈文送往总司令部，又叫小喜代理秘书，填写委状，赶印臂章。

四

不几天，街上传说在山东打了败仗，南京的飞机又来太原下过弹，人心惶惶，山西票子也跌价了。又过几天，总司令部给四十八师留守处下了命令，说是叫暂缓发展，请领的东西自然一件也没有发给。参谋长接到了命令，回复了河南来的客人，又打发小喜下豫北去找老霍回来。从这时起，留守处厨房也撤消了，站岗的也打发了，参谋长也不到那里去了，小喜也走了，叫铁锁每天到参谋长那里领一毛五分钱伙食费，住在留守处看门。起先一毛五分钱还够吃，后来山西票一直往下狂

跌，一毛五分钱只能买一斤软米糕，去寻参谋长要求增加，参谋长说：“你找你的事去吧！那里的门也不用看了！”这个留守处就这样结束了。

铁锁当了一个月勤务，没有领过一个钱，小喜走了，参谋长不管，只落了一身单军服，穿不敢穿，卖不敢卖，只好脱下包起来。他想：做别的事自然不能穿军服，包起来暂且放着，以后有人追问衣服，自然可以要他发钱；要是没人追问，军衣也可改造便衣。衣服包好，他仍旧去找同来的匠人们。那些人近来找着了事，自从南京飞机到太原下弹后，各要人公馆抢着打地洞，一天就给一块山西票。铁锁找着他们，也跟着他们到一家周公馆打地洞，晚上仍住在会馆。

一天晚上他下工后走出街上来，见街上的人挤不动，也有军队也有便衣，特别有些太原不常见的衣服和语音，街上也加了岗，好象出了什么事。回到会馆，会馆的人也挤满了，留守处的门也开了，春喜和前几天同去北平的那一伙都住在里边，床上地下都是人，把他的行李给他堆在一个角落上。春喜一见铁锁，便向他道：“你住在这里？今天你再找个地方住吧，我们人太多！”铁锁看那情形，又说不得理，只好去搬自己的行李。春喜又问道：“继唐住在哪个屋里？”铁锁道：“他下河南去了。”铁锁也想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就接着顺便问道：“你们怎么都回来了？”春喜道：“都回来了！阎总司令也回来了！”铁锁听了，仍然不懂他们为什么回来，但也无心再问，就搬了行李仍然去找他的同行。

他的同行人很多，除了和他同来的，和他们新认识的还有几十个，都住在太原新南门外叫做“满洲坟”的一道街。这一带的房子都是些小方块，远处看去和箱子一样；里边又都是土

地，下雨漏得湿湿的，有的有炕，有的是就地铺草。房租不贵，论人不论间，每人每月五毛钱。铁锁搬去的这地方，是一个长条院子，一排四座房，靠东的一座是一间，住着两个学生，其余的三座都是三间，住的就是他们这伙匠人。他搬去的时候，正碰上这些匠人们吃饭。这些人，每人端着一碗小米干饭，围着一个青年学生听话。这个学生，大约有二十上下年纪，穿着个红背心，外边披着件蓝制服，粗粗两条红胳膊，厚墩墩的头发，两只眼睛好象打闪，有时朝这边有时朝那边。围着他的人不断向他发问，他一一答复着。从他的话中，知道山西军败了，阎锡山和汪精卫都跑回太原来了。有人问：“他两家争天下，南京的飞机为什么到太原炸死了拉洋车的和卖烧土的？”有的问：“咱们辛辛苦苦赚得些山西票子，如今票不值钱了，咱们该找谁去？”学生说：“所以这种战争，不论谁胜谁败，咱们都要反对，因为不论他们哪方面都是不顾老百姓利益的……”

铁锁听了一会，虽然不全懂，却觉着这个人说话很公平。他把行李安插下，到外边买着吃了一点东西，回来躺在铺上问一个同行道：“吃饭时候讲话的那个人是哪里来的？”这个同行道：“他也是咱这院子里的房客，在三晋高中上学，姓常，也不知道叫什么。他的同学叫他小常，大家也跟着叫小常先生，他也不计较。这人可好拉！跟咱们这些人很亲热，架子一点也不大，认理很真，说出理来跟别的先生们不一样。”铁锁近来有好多事情不明白，早想找个知书识字的先生问问，可是这些糊涂事情又都偏出在那些知书识字的人们身上，因此只好闷着，现在见他说这位小常先生是这样个好人，倒有心向他领个教，便向这个同行道：“要是咱们一个人去问他个什么，他

答理不答理？”这个同行道：“行！这人很好谈话，只要你不瞌睡，谈到半夜都行！”铁锁道：“那倒可以，只是我跟人家不熟惯。”这个同行道：“这没关系，他倒不讲究这些，你要去，我可以领你去！”铁锁说：“可以！咱们这会就去。”说罢两个人便往小东房里去见小常。

他们进了小东房，见小常已经点上了灯在桌边坐着，他还有一个同学睡在炕上。这个匠人便向小常介绍道：“小常先生！我这个老乡有些事情想问问你，可以不可以？”小常的眼光向他两人一扫，随后看着铁锁道：“可以！坐下！”铁锁便坐在他的对面。铁锁见小常十分漂亮精干，反觉着自己不配跟人家谈话，一时不知该从哪里谈起。小常见他很拘束，便向他道：“咱们住在一处，就跟一家人一样，有什么话随便谈！”铁锁道：“我有些事情不清楚，想领领教，可是，‘从小离娘，到大话长’，说起来就得一大会。”小常道：“不要紧！咱们住在一块，今天说不完还有明天！不用拘什么时候，谈到哪里算哪里。”铁锁想了一会道：“还是从头说吧！”他便先介绍自己是哪里人，在家怎样破了产，怎样来到太原，到太原又经过些什么，见到些什么……一直说到当天晚上搬出会馆。他把自己的遭遇说完了，然后问小常道：“我有这么些事不明白：李如珍怎么能永远不倒？三爷那样胡行怎么除不办罪还能作官？小喜春喜那些人怎么永远吃得开？别人卖料子要杀头，五爷公馆怎么没关系？土匪头子来了怎么也没人捉还要当上等客人看待？师长怎么能去拉土匪？……”他还没有问完，小常笑嘻嘻走到他身边，在他肩上一拍道：“朋友！你真把他们看透了！如今的世界就是这样，一点也不奇怪！”铁锁道：“难道上边人也不说理吗？”小常道：“对对对！要没有上边人给他

们作主，他们怎么敢那样不说理？”铁锁道：“世界要就是这样，象我们这些正经老受苦人活着还有什么盼头？”小常道：“自然不能一直让它是这样，总得把这伙仗势力不说理的家伙们一齐打倒，由我们正正派派的老百姓们出来当家，世界才能有真理。”铁锁道：“谁能打倒人家？”小常道：“只要大家齐心，他们这伙不说理人还是少数。”铁锁道：“大家怎么就齐心了？”小常道：“有个办法。今天太晚了，明天我细细给你讲。”一说天晚了，铁锁听了一听，一院里都睡得静静的了，跟他同来的那个同行不知几时也回去睡了，他便辞了小常也回房睡去。

这晚铁锁回去虽然躺下了，却睡得很晚。他觉着小常是个奇怪人。凡他见过的念过书的人，对自己这种草木之人，总是跟掌柜对伙计一样，一说话就是教训，好的方面是夸奖，坏的方面是责备，从没有见过人家把自己也算成朋友。小常算是第一个把自己当成朋友的人。至于小常说的道理，他也完全懂得，他也觉着不把这些不说理的人一同打倒另换一批说理的人，总不成世界，只是怎样能打倒，他还想不通，只好等第二天再问小常。这天晚上是他近几年来最满意的一天，他觉着世界上有小常这样一个人，总还算象个世界。

第二天，他一边做着工，一边想着小常，好容易熬到天黑，他从地洞里放下家伙钻出来，在街上也顾不得停站，一鼓劲跑回满洲坟来，没有到自己房子里，就先到小东房找小常去。他一进去，不见小常，只见箱笼书籍乱七八糟扔下一地，小常的同学在屋里整叠他自己的行李。他进去便问道：“小常先生还没有回来？”小常那个同学道：“小常叫人家警备司令部捉去了。”他听了，大瞪眼莫名其妙，怔了一会又问道：“因为什么？”小常那个同学抬头看了看他，含糊答道：“谁知道

“是什么事？”说着他把他自己的行李搬出去。铁锁也不便再问，跟到外边，见他叫了个洋车拉起来走了。这时候，铁锁的同行也都陆续从街上回来，一听铁锁报告了这个消息，都抢着到小东房去看，静静的桌凳仍立在那里，地上有几片碎纸，一个人也没有。

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都觉着奇怪。有个常在太原的老木匠道：“恐怕是共产党。这几年可多捉了共产党了，杀了的也不少！真可惜呀！都是二十来岁精精干干的小伙子。”铁锁问道：“共产党是什么人？”那老木匠道：“咱也不清楚，听说总是跟如今的官家不对，不赞成那些大头儿们！”另外有几个人乱说“恐怕就是”，“小常跟他们说是两股理”，“小常是说真理的”……大家研究了半天，最后都说，“唉！可惜小常那个人了！”好多人都替小常忧心，仍和昨天下米一样多，做下的干饭就剩下了半锅。

铁锁吃了半碗饭，再也吃不下去。他才觉着世界上只小常是第一个好人，可是只认识了一天就又不在了。他听老木匠说还有什么共产党，又听说这些人被杀了的很多，他想：既然被杀了的很多，可见这种人不只小常一个；又想：既然被杀了的很多，没有被杀的是不是也很多？又想：既然被杀了的很多，小常是不是也会被杀了呢？要是那样年轻、能干、说真理的好人，昨天晚上还高高兴兴说着话，今天就被人家活生生捉住杀了，呵呀！……他想着想着，眼里流下泪来。这天晚上，他一整夜没有睡着，又去问老木匠，老木匠也不知道更多的事情。

从这天晚上起，他觉着活在这种世界上实在没意思，每天虽然还给人家打地洞，可是做什么也没有劲了，有时想到应该回家去，有时又想着回去还不是一样的。

五

就这样拖延着，一个秋天过去了。飞机不断来，打地洞的家也很多，可是山西票子越来越不值钱，铁锁他们一伙人做得也没有劲，慢慢都走了。后来阎锡山下了野往大连走了。徐永昌当了警备司令来维持秩序，南京的飞机也不来了，各大公馆的地洞也都停了工。人家一停工，铁锁和两三个还没有走了的同行也没有事了，便不得不作回家的计划。

这天铁锁和两个同来的同行，商议回家之事。听说路上很不好行动，庞炳勋部驻沁县，孙殿英部驻晋城，到处有些散兵，说是查路，可是查出钱来就拿走了。他们每人都赚下一百多元山西票，虽说一元只能顶五毛，可是就算五十元钱，在一个当匠人的看起来，也是很大一笔款，自然舍不得丢了。好在他们都是木匠，想出个很好的藏钱办法，就是把合缝用的长刨子挖成空的，把票子塞进去再把枣木底板钉上。他们准备第二天起程，这天就先把票子这样藏了。第二天一早，三个人打好行李，就上了路。走到新南门口，铁锁又想起他那双鞋仍然丢在会馆，鞋还有个半新，丢了也很可惜，就和两个同行商议，请他等一等，自己跑回去取。

这两位同行，给他看着行李，等了差不多一点钟，也不见他来。一辆汽车开出来了，他两人把行李替他往一边搬了一搬。又等了一会，他和另一个人相跟着来了，一边走，一边向他两人道：“等急了吧？真倒霉！鞋也没有找见，又听了一回差！”两个人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春喜去大同取行李回来了，和好多人趁秘书长送亲戚的汽车回去，叫我给人家往车上搬箱

子！”有个同行也认得春喜，问道：“他在大同做什么来？有什么箱子？”铁锁道：“听说在什么统税局。这些人会发财，三四口箱子都很重。”那个同行向他开玩笑道：“你跟他是一村人，还不能叫他的汽车捎上你？”铁锁道：“一百年也轮不着捎咱呀！”随手指着同来的那个人道：“象这位先生，成天在他们公馆里跑，都挤不上啦！”他两个同行看同他来的那个人，长脖子，穿着件黑袍，上面罩着件灰大衫，戴着礼帽，提着个绿绒手提箱。这人就是当日在五爷公馆里的那个鸭脖子，他见铁锁说他挤不上，认为不光荣，便解释道：“挤不上，他们人太多了！到路上要个差也一样，不过走慢一点。”他特别说明他可以要差，来保持他的身份。铁锁在太原住了几个月，也学得点世故，便向鸭脖子道：“先生，我们也想沾沾你的光！听说路上不好走，一路跟你相跟上许就不要紧了吧？”鸭脖子道：“山西的机关部队都有熟人，碰上他们自然可以；要碰上外省的客军，就难说话了，我恐怕只能顾住我。”说着强笑了一笑。

他们就这样相跟着上了路。走了不多远，有个差徭局，鸭脖子要了一头毛驴骑着，他们三个人挑着行李跟在后边。

鸭脖子要的是短差，十里八里就要换一次，走了四五天才到分水岭。一路上虽然是遇到几个查路的，见了鸭脖子果然客气一点，随便看看护照就放过去了。他们三个说是跟鸭脖子一行，也没有怎么被检查。过了分水岭，有一次又遇到两个查路兵，虽然也是山西的，情形和前几次有些不同，把他们三个人的行李抖开，每一件衣服都捏揣过一遍，幸而他们的票子藏得好，没有被寻出来。检查到了铁锁那身军服，铁锁吃了一惊，可是人家也没有追究。后来把鸭脖子的手提箱打开，把二十块

现洋给检查走了。

这一次以后，他们发现鸭脖子并不抵事，跟他一道走徒磨工夫；有心前边走，又不好意思，只好仍跟他走在一起。快到一个叫“崔店”的村子，又碰上查路的，远远用手枪指着喊道：

“站住！”四个人又吓了一跳。站住一看，那个喊“站住”的正是小喜，还有两个穿军服的离得比较远一点。小喜一看鸭脖子，笑道：“是你呀！”又向铁锁道：“你也回去？”铁锁答应着，只见小喜回头向那两个穿军服的道：“自己人自己人！”又向鸭脖子道：“天也黑了，咱们住一块吧！”鸭脖子道：“住哪里？”小喜道：“咱们就住崔店！”又向那两个穿军服的道：

“路上也没人了，拿咱们的行李，咱们也走吧！”说了他便和那两个人跑到一块大石头后边，每人背出一个大包袱来。七个人相跟着来到崔店，天已大黑了。小喜走在前面，找到一家店门口，叫开门，向掌柜下命令道：“找个干净房子！”掌柜看了看他，惹不起，又着了看铁锁他们三个道：“你们都是一事吗？”铁锁道：“我们三个是当匠人的！”掌柜便点着灯把小喜他们四人引到正房，又把铁锁他们三个另引到一个房子里。

他们四个人，高喊低叫，要吃这个要吃那个，崔店是个小地方，掌柜一时应酬不来，挨了许多骂，最后找了几个鸡蛋，给他们做的是炒鸡蛋拉面。打发他们吃过以后，才给铁锁他们三个坐上锅做米饭。赶他们三个吃罢饭，天已经半夜了。

他们三个人住的房子，和正房相隔不远，睡了之后，可以听到正房屋里谈话。他们听得鸭脖子诉说他今天怎样丢了二十块现洋，小喜说：“不要紧，明天可以随便拿些花。”鸭脖子说：“不算话，带多少也不行！听说沁县到晋城一带都查得很紧！”小喜说：“我也要回去。明天跟我相跟上，就没有人查

了。”铁锁一个同行听到这里，悄悄向铁锁道：“你听！小喜明天也回去。咱明天跟他相跟上，也许比那个鸭脖子强，因为他穿的军衣，况且又是做那一行的。”铁锁也悄悄道：“跟他相跟上，应酬查路的那一伙子倒是有办法，可是他们那些人我实在不想看见！”那个同行道：“咱和他相跟啦吧，又不是和他结亲啦！”铁锁一想，又有点世故气出来了。他想：今天和鸭脖子相跟还不是一样的不舒服，可是到底还相跟了，就随和些也好。况且自己又曾给小喜当过一个月勤务，就以这点关系，说出来他也不至于不应允。这样一想，他也就觉着无可无不可了。

第二天早晨，铁锁他们三个起了一个早，先坐锅做饭，吃着饭，正房里那四个才起来洗脸。一会，听着他们吵起来。小喜说：“有福大家享，你们也不能净得现洋，把山西票一齐推给我！”另一个河南口音的道：“这也没有叫你吃了亏。我不过觉着你是山西人，拿上山西票子总还能成个钱，叫我带回河南去有个鸡巴啥用处？把这些衣服都归了你，还不值几百元吗？”小喜道：“咱们也相处了个把月，也走了几百里路，咱姓李的没有对不起朋友的地方吧？如今你们拿上两千多现货，几十个金戒指，拿一堆破山西票跟几包破衣裳来抵我，你们自己看象话不象话？有福大家享，有事大家当，难道我姓李的不是跟你们一样冒着性命呀？”另一个河南口音道：“老李！不要讲了！咱们上场来都是朋友，好合不如好散！这戒指你随便拿上些！山西票要你被屈接住！来！再拿上二百现的！”正说着，掌柜把炒蒸馍端上去，几个人便不吵了，吃起饭来。吃完了饭，那两个穿军服的扛着沉沉两包东西，很客气地辞了小喜和鸭脖子走了。他两个也不远送，就在正房门口一点头，然后回去收拾

他们的行李。

就在这时候，铁锁的两个同行催着铁锁，叫去跟小喜交涉相跟的事，铁锁便去了。他一进到正房，见炕上堆着一大堆山西票子，两包现洋，一大把金戒指，两三大包衣服。小喜正在那里折衣服，见他进去了，便向他道：“你还没有走？”鸭脖子也那样问，铁锁一一答应罢了，便向他道：“听说路上很不好走，想跟你相跟上沾个光，可以不可以？”小喜正在兴头上，笑嘻嘻答道：“行！相跟着吧！没有一点事！”铁锁见他答应了，也没有更多的话跟他说，站在那里看他折衣服。他见铁锁闲着，便指着那些衣服道：“你给我整理一下吧！整理妥包好！”铁锁悔不该不马上出去，只好给他整理。鸭脖子问小喜道：“你从前认得他？”小喜道：“这是我的勤务兵！跟我是一个村子里人。”他已经把衣服推给铁锁整理，自己便去整理炕上的银钱。他把票子整成一叠一叠的，拿起一叠来，大概有一二百元，递给鸭脖子道：“你昨天不是把钱丢了吗？花吧！”鸭脖子还谦让着，小喜道：“给你！这些乱年头，抓到手大家花了就算了。”说着把票子往鸭脖子的怀里一塞，鸭脖子也就接受下了。小喜回头又向铁锁道：“你那身军服还在不在？”铁锁只当他是向自己要那身衣服，便答道：“在！一会我给你去取！不过参谋长却没有给我发过饷。”小喜道：“不是跟你要。你还把它穿上，还算我的勤务兵，这样子到路上更好行动。行李也不用你挑，到差徭局要得差来可以给你捎上。”铁锁说：“我还相跟着两个人啦！”小喜道：“不要紧！就说都是我带的人！”

一会，行李都打好了，铁锁出来和两个同行说明，又把那身单军服套在棉衣外边，铁锁给小喜挑着包袱，五个人相跟着出了店，往差徭局来。小喜南腔北调向办差的道：“拨两个牲

口三个民伕！”办差的隔窗向外一看道：“怎么木匠也要差？”小喜道：“真他妈的土包子！军队就不带木匠？”铁锁的两个同行在窗外道：“我们自己挑着吧！”小喜向窗外看了他们一眼道：“你们就自己挑着！”又向办差的道：“那就两个牲口一个民伕吧！”办差的拨了差，小喜和鸭脖子上驴，赶驴的和铁锁两个人跟着，民伕把铁锁的行李和小喜的包袱捆在一处担着，铁锁的两个同行自己担着行李跟着，一大串七个人两个牲口便又从崔店出发了。

小喜的包袱很重，民伕一路直发喘。铁锁本来不想把自己的行李给民伕加上，可是既然算小喜的勤务，又没法不听小喜的指挥。后来上了个坡，铁锁见民伕喘得很厉害，便赶到他身边道：“担累了？我给你担一会！”民伕道：“好老总！可不敢叫你担！”铁锁道：“这怕啥？我能担！”说着就去接担子。民伕连说不敢，赶驴的抢着跑过来道：“不敢不敢！我给他担一会！”说着便接住担在自己肩上。民伕叹了口气道：“唉！好老总！象你老总这样好的人可真少！”赶驴的也说：“真少！可有那些人，给你担？不打就够好！”

正说话间，前边又有了查路的——一个兵正搜查两个生意人的包袱，见小喜他们走近了，向那两个生意人说了声“包起来吧”，便溜开了。小喜在驴上看得清楚，就故意喝道：“站住！哪一部分？”吓得那个兵，加快了脚步，头也不回便跑了。民伕问那两个生意人道：“没有拿走什么吧？”生意人说，“没有”，并且又向小喜点头道：“谢谢老总！不是碰上你就坏了！”小喜在驴上摇头道：“没有什么。他妈的，好大胆，青天白日就截路抢人啦！”那个赶驴的只当小喜不知道这种情形，便担着担子抢了几步向他道：“好老总，这不算稀罕！这条路一天还

不知道出几回这种事啦！”铁锁在他背后光想笑也不敢笑出来，暗暗想道：“你还要给他讲？你给他担的那些包袱，还不是那样查路查来的！”

铁锁自从又穿上军服，觉着又倒了霉：一路上端水端饭问路换差……又都成了自己的事，小喜和鸭脖子骑着牲口专管指挥。他虽然觉着后悔，却也想不出摆脱办法，又只好这样相跟着走。

过了沁县，路平了，毛驴换成了骡车，走起来比以前痛快了好多。过屯留城的那一天，下了一次雪，有泥水的地方，车不好走。有一次，要过一个土沟，骡子拉不过去，站住了。赶车的请他们下车，小喜和鸭脖子看见下去就要踏着泥走，不愿意，硬叫他赶。他打了骡子两鞭，骡子纵了一下，可是车轮陷得很深，仍拉不动。小喜道：“你们这些支差的干的是什么事？连个牲口也赶不了！”赶车的央告道：“老总，实在赶不过去呀！”小喜喝道：“你捣蛋，我揍你！”又向铁锁下命令道：

“给我揍他！”铁锁从来没有打过人，况且见赶车的并非捣蛋，除没有揍他，反来帮他推车，可是也推不动。赶车的仍然央告他两人下车，小喜夺出鞭子照耳门打了他一鞭杆。赶车的用手去摸耳朵，第二下又打在他手上。手也破了，耳朵也破了，眼泪直往下流，用手擦擦泪，又抹了一脸血。铁锁和他两个同行看见这种情形，十分伤心，可是也没法挽救。人也打了，车仍是赶不动，结果还是赶车的背着鸭脖子，铁锁背着小喜送过去，然后才回来赶空车。

这天晚上住在鲍店镇，铁锁向他两个同行悄悄说：“明天咱们不跟他相跟吧！咱真看不惯那些事！”他两个同行也十分赞成，都说：“哪怕土匪把咱抢了，咱也不跟他相跟了。”吃

过饭以后，铁锁向小喜说他们三个人要走山路回去，小喜向鸭脖子道：“要是那样，你明天就也穿军衣吧！”又向铁锁道：

“那也可以，你就把军衣脱下来给他！”铁锁这时只求得能分手就好，因此便把一个月工夫换来的一身单军服脱下交给他们，第二天彼此就分手了。

春喜是一路汽车坐到家了。小喜是一路官差送到家了。铁锁啦？几天山路也跑到家了，虽然还碰到过一次查路的，不过票子藏得好，没有失了。

山西票子越来越跌价，只能顶两毛钱了。小喜存的山西票，跑到晋城军队上贩成土；铁锁不会干这一套，看着票子往下跌，干急没办法。又迟了多长时间，听说阎锡山又回太原当绥靖主任去了，票子又回涨到两毛五。这时正是阴历年关，福顺昌掌柜王安福以为老阎既然又回太原，票子一定还要上涨，因此就放手接票——讨账也是山西票，卖货也是山西票。这时候，铁锁的一百来元山西票本来很容易推出手，不过他见王安福放手接票子，也以为票子还要涨，舍不得往外推，只拿出十几元来在福顺昌买了一点过年用的零碎东西。不料过了年，公事下来了，山西票子二十元抵一元，王安福自然是大晦气，铁锁更是哭笑不得，半年的气力白费了。

后来铁锁的票子，出了一次粮秣借款就出完了。这粮秣借款是在这以前没有过的摊派；不打仗了，外省的军队驻在山西不走，饭总要吃，阎锡山每隔两个月便给他们收一次粮秣借款，每次每一两粮银收七元五。铁锁是外来户，外来户买下的地当然粮银很重，虽然只剩下五亩沙板地，却纳的是上地粮，银数是五钱七分六，每次粮秣借款该出现洋四元三毛二，合成山西票就得出八十六元四。

自从派出粮秣借款以后，不止铁锁出不起，除了李如珍春喜等几家财主以外，差不多都出不起。小毛是闾长，因为过了期收不起款来，偷跑了。不断有散兵到村找闾长，谁也不想当，本地户一捏弄，就把铁锁选成了闾长。铁锁自戴上这顶愁帽子之后，地也顾不得上，匠人也顾不得当，连明带夜忙着给人家收款。在这时，阎锡山发下官土^①来，在乡下也由闾长卖。象李如珍那些吸家，可以在小喜那里成总买私土，只有破了产的光杆烟鬼，每次只买一分半分，小喜不愿支应，才找闾长买官土。按当时习惯，买官土要用现钱，不过这在别的闾里可以，铁锁这些外来户，不除给谁怕得罪谁，赊出去账又难讨，因此除了收粮秣借款以外还要讨官土账。借款也不易收，土账也不易讨，自己要出的款也没来路；上边借款要得紧了，就把卖官土钱缴了借款；官土钱要得紧了，又把收起来的借款顶了官土钱；两样钱都不现成，上边不论要着哪一样，就到福顺昌先借几块钱缴上。这样子差不多有年把工夫，客军走了，地方上又稍稍平静了一点，小毛看见闾长又可以当了，和李如珍商量了一下，把铁锁的闾长换了，仍旧换成小毛。铁锁把闾长一交代，净欠下福顺昌四十多元借款，算起来有些在自己身上有些在烟鬼们身上，数目也还能碰个差不多，只是没有一个现钱，结果又托着杨三奎和修福老汉去跟福顺昌掌柜王安福商量了一下，给人家写了一张文书。

^①官土又叫“戒烟药饼”，不过那只是官家那样叫，老百姓都叫“官土”。

六

铁锁自从当了一次闰长以后，日子过得更不如从前了，三四年工夫，竟落得家无隔宿之粮，衣服也都是千补万衲，穿着单衣过冬。他虽然是个匠人，可是用得起匠人的家，都怕他这穷人占小便宜，不愿用他，因此成天找不到事，只好这里求三合，那里借半升，弄一顿吃一顿。

到了民国二十四年这一年，在家里实在活不下去了，叫才长到八岁的小胖孩给人家放牛去，自己又和几个同行往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去活动——不过这次却因为没有盘缠，不能再去太原，就跟着几个同行到县城里去。在城里找到一家东家，就是当年在五爷公馆吃着西瓜谈“归班”的那个胖子。这人姓卫，这几年在阎锡山的“禁烟考核处”^①当购料员，在绥远买土发了财，成了县里数一数二的大绅士，要在城里修造府第，因此就要用匠人。铁锁和同去的几个人，和包工头讲了工价，便上了工。

这一年的上半年，铁锁的家里好过一点，下半年秋收以后，虽然除给福顺昌纳了利钱以后不余几颗粮食，可是铁锁和小胖孩都不在家，光二妞一个人在家也不吃什么。

可惜不几天就发生了意外的事：上边公事下来了，说共产党的军队从陕西过河来了，叫各地加紧“防共”，宁错杀一千个老百姓，也不叫放走一个共产党。县长接着这公事，跟疯了一样，撤出防共保卫团和警察到处捉人——凡是身上有一两个铜

^①“禁烟考核处”是卖官土的总机关。

元、一两条线、小镜子或其他不常见的物件，都说成共产党的暗号，逃荒的、卖姜的、货郎担子……一切外来的生人，一天说不定要捉多少、杀多少，有一天就杀了一百五六十个。警察们每夜都打着手电筒到匠人们住的地方查好几遍，因为搜着身上有铜元还杀了两个匠人。这时候，匠人们固然人人怕捉，胖子东家是听说共产党来了要杀他们这些仗势欺过人的人，因此也怀着鬼胎无心修造了；况且天气也冷了些，泥水也快冻了。这样几头赶趁，工也停住了，铁锁和许多匠人们便都解散回家。回到村，村公所里也忙着办“防共”，春喜当了公道团①村团长，小喜当了防共保卫团村团长，所有壮丁一律都得当团丁，由小喜训练。铁锁回去马上就得去受训。

这年冬天，山西军队调动得很忙，中央军也来山西帮忙防共，地方上常有军队来往。老百姓因为经过民国十九年那次混乱，一见过兵自然人人担忧。

杨三奎的闺女巧巧，原来许给二妞的弟弟白狗，这是杨三奎最小的一个闺女，这时已经十八岁了，因为兵荒马乱，杨三奎放心不下，便追着修福老汉给白狗娶亲。修福老汉一来觉着孙子白狗已十九岁，也是娶亲的时候了；二来自己家业不大，趁这荒乱年间，一切可以简单些，也就马上答应，就在这年阴历腊月三十日给白狗娶亲。修福老汉虽然日子过得不怎样好，又是外来户，可是因他为人正直，朋友也还不少。大家也知道他破费不起，自己也都是些对付能过的小户人家，就凑成份子买了些现成的龙凤喜联给他送一送礼；这地方的风俗，凡是送这种对联的，酬客时候都是有酒无饭，一酒待百客。事过之后，修

①公道团原来也是阎锡山组织起来的反共团体。

福老汉备了些酒，在刚过了阴历年的正月初三日酬客。

这天晚上，铁锁也在修福老汉家替他招呼客人。热闹过一番之后，一般的客人都散了，只剩下象冷元他们那些比较亲近一点的邻居们和林县的乡亲们，大家因为才过了年没有什么事，就仍然围着酒桌，喝着剩下来的一壶酒谈闲话。他们谈来谈去，谈到“防共”的事情上，冷元向铁锁道：“小喜成天给咱们讲，说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可是谁也没有真正见过。你是登过大码头走过太原的，你是不是见过啦？”

这一问，勾起铁锁的话来了：铁锁自那年从太原回来之后，直到现在，因为一个“忙”一个“穷”，从没有跟别人谈过心。他并不是没有心病话，只是没有谈过。他自从碰上小常，四五年来一天也没有忘记，永远以为小常是天下第一个好人，每遇上看不过眼的事，就想起小常向他说的话：“总得把这伙仗势力不说理的家伙们一齐打倒，由我们正正派派的老百姓们出来当家，世界才能有真理。”当年他听老木匠说小常是共产党，又听说自从民国十六年阎锡山就杀起共产党来了，他就以为共产党是小常这类人，可惜以后再不听有人说起，直到五六年后的现在，才又听说起这个名字来。他在城里初听说共产党过了河，他非常高兴，以为这一下就可以把那些仗势欺人的坏家伙们一齐打倒了；后来见县里杀人杀得那么多，军队调动得那么忙，他又以为打倒这些坏家伙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坏家伙们有权，有官府的势力给他撑腰。不过他这时候的想法和五六年前不同了：在五六年前他还以为象小常这种人数目总不多，成不了事；这时候他听说共产党能打过黄河来占好几县，又见那些坏家伙们十分惊慌，他想这势力长得也不小了；纵然一时胜不过官府势力，再长几年一定还会更大，因为他还记得小常

说“只要大家齐心，这些坏家伙们还是少数”。他记得小常还说过“有办法能叫大家齐心”，可惜他还没有把这办法告自己说，就叫人家把他捉走了。他想现在打过河来的这些人一定是懂得这个办法的，等打到咱这地方，一定会把这办法也告大家说。他既然有这样一套想法，因此在这年冬天，虽然还过的是穷日子，心里却特别高兴，不论听小喜春喜那些人讲共产党怎样坏，他听得只是暗笑，心里暗暗道：“共产党来了就要杀你们这些家伙们呀！看你还能逞几天霸王？”这些都只是铁锁心上的话，并不曾向人家说过。这天晚上冷元问起他来，他正憋着一肚子话没处说，又是才过了年，又都是些自己人，刚才又多喝了几盅酒，因此说话的兴头就上来了。他说：“我见过一个，不过说起来话长，你们都听不听？”大家叫小喜春喜训了几个月，也没有见过一个共产党，自然都很愿意听，都说：“说吧！反正明天又没有什么事，迟睡一会有什么事要紧？”铁锁一纵身蹲在椅子上，又自己斟得喝了一盅酒，把腰一挺头一扬，说起他在太原时代的事情来。铁锁活了二十七岁，从来也没有这天晚上高兴，说的话也干脆有趣，听的人虽然也听过好多先生们演说，都以为谁也不如铁锁，他把他在太原见的那些文武官员，如参谋长、小喜、河南客、尖嘴猴、鸭脖子、塌眼窝、胖子、柱子等那些人物、故事，跟说评书一样，枝枝叶叶说了个详细；说到满洲坟逞小常，把小常这个人和他讲的话说得更细致，叫听的人听了就跟见了小常一样；说到小常被人家捉去，他自己掉下泪来，听的人也个个掉泪。最后他才说出“听一个老木匠说小常是共产党”。

他的话讲完了，听的人都十分满意。大家成天听小喜说共产党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早就有些不大信，以为太不近情

理,以为世界上哪有这专图杀人的人,现在听铁锁这样一说,才更证明了小喜他们是在那里造谣。冷元又问道:“这么说来,共产党是办好事的呀!为什么还要防共啦?”没有等铁锁开口,就有人替他答道:“你就不看办防共的都是些什么人?象铁锁说的那些参谋长啦,三爷五爷啦,五爷公馆那一伙啦;又象放八当十的六太爷啦,咱村的村长啦,小喜春喜啦……他们自然要防共,因为共产党不来是他们的世界,来了他们就再不得逞威风了,他们怎么能不反对啦?”冷元道:“这么说起来,咱们当防共保卫团,是给人家当了看门狗了吧?”大家齐笑道:“那当然是了!”话谈到这里,夜已深了,大家也就散了。

这几个听了铁锁谈话的人,都以为共产党是好人,虽然人家防范得过严,谁也不敢公开说共产党的好处,可是谁没有个亲近的朋友,一传十,十传百,不几天,村里的好人都知道小喜春喜他们那一套训练是骗人的了。幸而没人跟小喜春喜那些人谈,因此他们不知道这些话,只不过觉着防共团的团丁们越来越松罢了。

“共产党专打小喜他们那一类坏家伙,不杀老百姓。”这个消息越传越普遍,传得久了,小喜春喜他们多少听到些风,着实问起来,谁也听的是流言,都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可惜后来仍然不免惹出事来,这话又是冷元那个冒失鬼说漏了的。

原来杨三奎的小闺女巧巧长得十分清秀,出嫁以后当了新媳妇,穿得更整齐一点,更觉可爱,都说是一村里头一个好媳妇。小喜是个酒色之徒,自己也不讲个大小,见哪家有好媳妇,就有一搭没一搭到人家家里闲坐;自从巧巧出嫁了,他就常到白狗那里去。白狗这小孩子家,对他也没有办法,修福老汉也

惹不起他，他来了，大家也只好一言不发各做各的活，等他坐得没意思了自己走。一天冷元在白狗家，白狗和他谈起小喜怎么轻贱，冷元说：“共产党怎么直到如今还不来？你姐夫不是说来了就要杀小喜他们那些坏家伙吗？”这时候小喜刚刚走到院里，听见这话，就蹑着脚步返回走了。

小喜回去把这话向春喜说了，春喜这几天正因为“防共”没有成绩受了区团长的批评，就马上把这事写成一张报告呈给区团长，算做自己一功。区团报县团，县团转县府，县府便派警察捉去了铁锁。

要是早半年的话，铁锁就没有命了，这时已是民国二十五年的夏天，一来共产党又退回陕西，山西“防共”的那股疯狂劲已经过去；再者这位县长太爷在上一年冬天杀人最凶的时候，共产党在他住的房子门上贴过张传单，吓得他几夜睡不着觉，以后对共产党也稍稍客气了一点，因此对铁锁这个案件也放宽了一点。他问过铁锁一堂之后，觉着虽然也与共产党有过点关系，可是关系也实在太小，也杀不得也放不得。因为公道团向各村要“防共”成绩，各村差不多都有胡乱报告的，象铁锁这样案情的人就有一大群。后来县长请示了一下，给他们开了个训导班，叫他们在里边一面作苦工一面受训——训练的课程，仍是铁锁听小喜春喜说过几千遍的那一套。

办这个训导班的人，见这些受训人都是些老老实实的受苦汉，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不出钱伙计，叫他们做了一年多的苦工。直到“七七”事变以后，省城早经过好多人要求把政治犯都释放了，他们仍连一个也舍不得放出来。后来还是牺盟会①来了要动员群众抗日，才向县府交涉，把这批人放出去。

七

山西的爱国人士组织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在“七七”事变后，派人到县里来发动群众抗日。这时候，八路军已经开到山西打了好多大仗，在平型关消灭了日本的坂垣师团。防共保卫团也已经解散了，铁锁住的这个训导班再没有理由不结束。结束的时候，牺盟会派了个人去给他们讲了一次话，话讲的很简单明白，无非是“国共已经合作了，这种反共训导班早应结束了，以后谁再反共谁就是死顽固”，“大家回去要热心参加抗日工作……”这一类抗战初期动员群众的话，可是听话的人差不多都是因为说闲话提了提共产党，就把人家圈起来做了一年多苦工，在这一年多工夫中，连个“共”字也不敢提了，这时听了这话，自然大大松了一口气，觉着世界变了样子。

铁锁自己，听话还是其次，他注意的是说话的人。当这人初走上讲台，他看见有点象小常——厚墩墩的头发，眼睛好象打闪，虽然隔了六七年，面貌也没有很改变，说话的神情语调，也和他初搬到满洲坟在院子里听他第一次讲话时一样。在这人讲话时候，他没有顾上听他说的是什么，他只是研究人家怎样开口，怎样抬手，怎样转身……越看越象，越听越象。这场讲

①牺盟会是一九三六年至抗日战争初期在山西省成立的一个地方性的群众抗日团体“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该团体和共产党密切合作，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在山西省西部公开发动摧残牺盟，许多共产党员、牺盟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杀害。

话，差不多一点钟工夫就结束了，大家都各自回房收拾行李准备回家，铁锁也顾不得回房里去，挤开众人向这讲话的人赶来。

他赶上来，本来想问一声是不是小常，走到跟前，看见人家穿得一身新军服，自己滚得满身灰土，衣裳上边又满是窟窿，觉着丢人。“倘或不是小常，又该说些什么？”他这样想着，怎么也不好意思开口。可是他又觉着，如果真是小常，也不可当面错过，因此也舍不得放松，就跟着走出街上来。一年多不见街上的景致，他也顾不得细看，只是跟着人家走。跟了一段，他想，不问一下总不得知道，就鼓着勇气抢了几步问道：

“哎！你是不是小常先生？”那人立刻站住，回过头来用那闪电一样的眼睛向他一闪，愣了一愣返回来握住他的手道：“这么面熟，怎么想不起来？”铁锁道：“在太原满洲坟……”那人笑道：“对对对！就是后来才搬去的那一位吧？晚上提了许多问题，是不是？”铁锁道：“就是！”那人的手握得更紧了，一边又道：“好我的老朋友！走，到我那里坐坐去！”他换了左手拉着铁锁的右手跟他并走着，问铁锁的姓名住址，家庭情形。铁锁自然也问了他些被捕以后的事。

铁锁因为酒后说了几句闲话，被人家关起来做了一年多苦工，这时不止自己出了笼，又听说真正的共产党也不许捉了，又碰上自己认为的天下第一个好人，你想他该是怎样高兴呢？他连连点头暗道：“这就又象个世界了！”他虽跟小常拉着手并肩走着，却时时扭转头看小常，好象怕他跑了一样。街上的热闹，象京广杂货、饭馆酒店、粮食集市、菜摊肉铺……人挤人，人碰人，在他看来毫不在意，好象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看见身边有个小常。

不大一会，走到牺盟会，小常请他喝了盅茶以后，就问起他近几年村里的情形来。铁锁自从打太原回来以后，六七年来又满满闷了一肚子气，恨不得找小常这样一个人谈谈，这时见了原人，如何肯不谈？他恐怕事情过长，小常不耐烦听，只从简短处说；小常反要他说得详细一点，听不明的地方还要拦住问个底细，说到人名地名还问他是哪几个字。他一边谈，小常一边用笔记。谈了一会，天晌午了，小常就留他在会里吃饭，吃饭时候又把他介绍给五六个驻会工作的同志们认识。吃过饭，仍然接着谈，把村里谁是村长谁是公道团长谁是防共保卫团长，每天起来都干些什么勾当；自己因什么被关起来作了一年多苦工……详详细细谈了一遍。谈完以后，小常向他道：“我们这里派人到你村去过一次，不过象你说的这些情形，去的人还没有了解。现在你村里也有一点小变动！”说着他又翻出派去的人寄来的报告信看着道：“村长换成外村人了，听说是在太原受过训的。李如珍成了村副。防共保卫团改成抗日自卫队了，不过队长还是小喜，公道团长还是春喜。”

铁锁听了这种变动，叹了一口气道：“难道李如珍小喜春喜这些人的势力是铁钉钉住了吗？为什么换来换去总是他们？你不是说过‘非把这些坏家伙们打倒，世界不能有真理’吗？你不是说过‘有个办法能叫大家齐心’吗？可惜那时候你没有告我说这个办法就叫人家把你捉走了。如今我可要领领这个教！”小常哈哈大笑道：“好我的老朋友！你真是个热心热肠的人！这个办法我今天可以告给你了，这个办法并不奇怪，就是‘要把大家组织起来’。这么说也很笼统，以后我们慢慢谈吧！我们牺盟会就是专门来干这事的，不止要对付这些家伙

们，最重要的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不过 不对付 这些家伙们，大多数的好老百姓被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如何还有心抗日？这些事马上说不明白，一两天我就要到你们那一区的各村里去，也可以先到你们村子里看看，到那时候咱们再详细谈吧！你一年多了还没有回去啦，可以先回去看一下，等几天我就去了。”铁锁又道：“你是不是能先告我说怎样把大家组织起来，我回去先跟几个自己人谈谈。”小常见他这样热心，连声答道：“可以可以！你就先参加我们牺盟会吧！”说着就给他拿出一份牺盟会组织章程和人会志愿书，给他讲解了一下，然后问他会写字不会。他说写不好，小常便一项一项问着替他往上填写，写完又递给他看了一下，问他写得对不对。他看完了完全同意，又递给小常收起来。小常又告他说：“就照这样收会员，以后有什么要作的事，大家开会决定了大家来做，这就叫组织起来了。”又给他拿了几份组织章程道：“你回去见了你自己以为真正的好人，就可以问他愿意入会不；他要愿意，你就可以算他的介绍人，介绍他人会。我们派出去那个同志姓王，还在你们那一带工作，谁想入会，可以找他填志愿书，我可以给他写个信。”说着他便写了个信交给铁锁。

太阳快落的时候，铁锁才辞了小常回自己住了一年多的那个圈子里收拾行李。他回去见人已经走完了，灶也停了，只剩自己一条破被几件破衣服，堆在七零八落的铺草堆里。他把这些东西捆好以后，天已黑了，没钱住店，只好仍到牺盟会找着小常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小常又留他吃过早饭，他便回家去了。

他在回家的路上，一肚子高兴憋得他要说话，可是只有他一个人，想说也没处说，有时唱几句戏，有时仰天大叫道：

“这就又象个世界了！”八十里小跑步，一直跑回村子里去。这时正是收罢秋的时候，村里好多人在打谷场上铡草，太阳虽然落了却还可以做一阵活，见他回来了，就都马上停了工，围着他来询问。孩子们报告了二妞，二妞也到场上来看他。

他第一个消息自然是报告“小常来了”。这个消息刚一出口，一圈子眼睛一下子都睁大了许多，一齐同声问道：“真的？”“在哪里啦？”他便把在县里遇小常的一段事情说了一遍。原来这村里知道小常的，也不过只是上年正月初三在修福老汉家听铁锁谈话的那几个人，可是自铁锁被捕以后，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因为铁锁一被捕，谁也想打听是为什么来，结果就从冷元口中把铁锁那天晚上谈的话原封传出去。后来春喜知道了，又把冷元弄到庙里，叫他当众说了一遍，在春喜是想借冷元的话证明铁锁真与共产党有过关系，以便加重他的罪，可是说了以后，反叫全村人都知道世界上有小常这样一个好人了。大家这会见铁锁说小常不几天要来，都说：“来了可要看看是怎么样一个人啦。”

这天晚上，铁锁又到修福老汉那里问他近来村里办公人的变动，修福老汉说的和小常接到王同志的报告差不多，只是又说这位新来的村长，是春喜一个同学，说是受过训，也不过是嘴上会说几句抗日救国的空话，办起事来还跟李如珍是一股劲，实际上还跟李如珍是村长一样。又谈到牺盟会派来的王同志，修福老汉道：“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子，说话很伶俐，字写得也很好，可借人太年轻，不通世故。他来那几天，正是收秋时候，大家忙得喘不过气来，他偏要在这时候召集大家开会。老宋打了几遍锣，可是人都在地里，只召集了七八个老汉跟几个六七岁的小孩子，他不知道是因为人忙，还说大家不热

心。”铁锁又说到小常叫他回来组织牺盟会，修福老汉道：“已经组织起来了，我看那也没有什么用处。”铁锁觉着奇怪，忙问道：“几时组织的？谁来组织的？”修福老汉道：“还是姓王的那个孩子来的时候，叫村长给他找个能热心为大家办事的人，忙时候，正经人都没工夫，村长给他找了个小毛陪他坐了半天。他走后，小毛跟村里人说人家托他组织牺盟会，前天才挨户造名册，可不知道报上去了没有。”铁锁听罢摇着头道：“想不到这些家伙们这样透脱，哪一个缝子也不误钻！”

他虽然白天跑了八十里路，晚上又谈了一会话，回去仍然没有睡着。自他被捕以后，二妞到城里去探过他三次：第一次人家说还没有判决，不让见面；第二次第三次，虽然见了，又只是隔着门说了不几句话，人家就撵她走了，因此也没有看清自己的丈夫累成了什么样子，只是盼望他能早些出来就是了。这时，人是回来了，可是身上糟蹋得变了样子：头发象贴在头上的毡片子，脸象个黄梨，袖子破得象两把破蒲扇，满身脏得象涂过了漆，两肘、两膝、肩膀、屁股都露着皮，大小虱子从衣服的窟窿里爬进去爬出来。二妞见人家把自己的男人糟蹋成这个样子，自然十分伤心，便问起他在县里是怎么过。听铁锁说到怎样喝六十年的老仓米汤，怎样睡在草堆里，抬多么重的抬杆，挨多么粗的鞭子……惹得她抱住铁锁哭起来。铁锁从小就心软，这几年虽说磨练得硬了一点，可是一年多没有见一个亲人了，这会见有人这样怜惜自己，如何能不心恸，因此也忍不住与她对哭。两口子哭了一会，二妞又说了说近一年来家里的困难，最后铁锁又告她说世界变了，不久就要想法打倒那些坏家伙，说着天就明了。

八

二妞虽然过的是穷日子，却不叫累了身面，虽是补补衲衲的，也要洗得干净一点。铁锁这一身，她以为再也见不得人，马上便要给他洗补。窟窿又多，又没有补钉布，只好盖上被子等。

二妞到河里去洗衣服，家里再没有别人，邻居们来看他，他只好躺着讲话；邻居们走了，他就想他自己的事。他想：“小常说组织起来就是办法，也说的是组织好人，象小毛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那些坏家伙的尾巴，组织进去一定不能有什么好处。”小常给他写的信他还带着，在路上还打算一到家就先去找王同志，到这会看起来这王同志也不行，因此就决定暂且不去找他。小毛既然也在村里组织牺盟会，自己就且不去组织，免得跟他混在一起，还是再到县里去一趟，先把这些情形告给小常知道。晌午吃饭时候，冷元们一伙人又端着碗来跟他闲谈，说到组织牺盟会，大家也说：“要想法子不跟小毛这些人碰伙，免得外人认不清咱们是干什么的。”这样一说，越发帮助他打定了先到县里见小常的主意，他便想等这天补好衣裳，第二天就去。

天气冷了，洗出来的衣服不快干，直等到后半晌才干了，二妞便收回来给他补。衣服太破，直补到快吃晚饭，才补完了个上身。就在这时候，看庙的老宋来了，说庙里来了个牺盟会的特派员要找他。他问老宋道：“是不是二十五六岁一个人，头发厚墩墩的，眼睛象打闪，穿着一身灰军服？”老宋道：“就是！”他一下子从被子里坐起来向二妞道：“小常来了！”

快给我衣裳！”老宋问道：“那就是小常？”他说：“是！”老宋见他还没有穿衣裳，便向他道：“你后边来吧！我先回去招呼人家。”说了便先走了。二妞把补好了的夹袄给他，又拿起裤来看着上面的窟窿道：“这太见不得人了，你等一等我给你去借白狗一条裤子去！”说着她便跑出去了。修福老汉住的院子，虽说离不多远，走起来也得一小会，要找白狗的裤，巧巧自然也得翻一会箱，铁锁去见小常的心切，等了一下等得不耐烦了，就仍然穿起自己的窟窿裤来往庙里去，等到二妞借裤回来，铁锁已经走到庙里了。

裤子虽没有趁上用，“小常来了”的消息却传出去了——巧巧传白狗，白狗传冷元。什么事情只要叫冷元知道了，传起来比电话还快，不大一会就传遍全村，在月光下只听得满街男女都互相询问：“来了？”“来了？”

铁锁到了庙里，见村公所已经点上灯，早有村长、春喜、小毛他们招呼着小常吃过饭，倒上茶。铁锁一进去见他们这些人坐在一块，还跟往日一样，站在门边。村长他们三个人自然没有动，小常却站起来让坐，铁锁很拘束地凑到小毛坐着的板凳尖上，小毛向铁锁道：“这是牺盟会的县特派员，见了面也不知道行个礼？”小常微笑着道：“我们是老朋友！”说着和铁锁握了一下手，让他坐下。铁锁在这种场面上，谈不出话来，村长他们见桌面上插进铁锁这么个气味全不相投的老土，自然也没有什么要谈的话，全场静了一会，只听得窗外有好多人在哼哼唧唧，村长向着窗喊道：“干什么？”窗外的人们花啦啦都跑出庙门外去了。

小常看见这里不是老百姓活动的地方，就站起来向铁锁道：“我上你家里看看去！”铁锁正觉着坐在这里没意思，自

是十分愿意，便领着小常走出来。到了庙门口，被村长喊跑了的那伙人还在庙门口围着，见他两人出来了，就让出一条路来，等他两人走过去，跟正月天看红火一样，便一拥跟上来。到了铁锁门口，铁锁让小常往家里去，小常见人很多，便道：“就在外边坐吧！”说着就坐在门口的碾盘上。看的人挤了一碾道，妇女、小孩、老汉、老婆……什么人都有。有个孩子挤到碾盘上，悄悄在小常背后摸了摸他的皮带。冷元看见小毛也挤在人缝里，便故意向大家喊道：“都来吧！这里的衙门浅！”大家都轰的一声笑起来。小常听了，暗暗佩服这个人的说话本领。铁锁悄悄向小常道：“这说话的就是冷元，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好说冒失话的。”又见大家推着冷元低声道：“去吧去吧！”大家一手接一手把他推到碾盘边，冷元向铁锁道：“大家从前听你说，这位常先生很能讲话，都想叫你请常先生给我们讲讲话！”铁锁顺便向小常道：“这就是冷元。”小常便向冷元握手相认。冷元又直接向小常道：“常先生给我们讲讲话吧？”小常看见有这么多的人，也是个讲话的机会，只是他估量这些人都还没有吃过晚饭，若叫他们吃了饭再来，又怕打断他们听话的兴头，因此就决定只向他们讲一刻钟。主意已定，便回答冷元道：“可以！咱们就谈一谈！”他看见旁边有个簸米台，便算成讲台站上去。听话的人还没有鼓掌的习惯，见他站上去，彼此都小声说：“悄悄！不要乱！听！”马上人都静下来，只听他讲道：

“老乡们！我到这里来是第一次，只认得这位铁锁，我们是前六七年的老朋友。不过我到这里，可也不觉得很生，咱们见一面就都是朋友——比方我跟铁锁，不是见了一面就成朋友了吗？朋友们既然要我讲话，我得先说明我是来做什么的。我

是本县牺盟会的特派员，来这里组织牺盟会。这个会叫‘牺牲救国同盟会’，因为嫌这么叫起麻烦，才叫成‘牺盟会’。大家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救国啦？”

有些说：“知道！因为日本打进来了。”

小常接着道：“好几个月了，我想大家也该知道一点，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这‘打日本救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事，应该大家一齐动起来，有钱的出钱，大家出力。从前是有钱的不肯拿出钱来，只在没钱人的骨头里榨油，这个不对，因为救国是大家的事，日本人来了有钱人受的损失更大，不应该叫大家管看门，有钱人光管睡觉——力是大家出，可是有钱人一定得拿出钱来。”

有人悄悄道：“人家认这个理就是对！”

小常接着道：“至于大家出力，要组织起来才有力量。这个‘组织起来’很不容易。要听空名吧，山西早就组织起来了：总动员委员会、自卫队、运输队、救护队、妇女缝纫队、少年除奸团、老人祈祷会，村村都有，名册能装几汽车，可是我问大家，这些组织究竟干过一点实事没有？”

大家都笑了，因为他们早就觉着这些都没有抵什么事。

小常仍接着一气说下去：“这种空头组织一点也没有用处，总得叫大家都干起实事来，才能算有力量的组织。为什么大家都不干实事啦？这有两个原因，就是大多数人，没有钱，没有权。没有钱，吃穿还顾不住，哪里还能救国？象铁锁吧：你们看他那裤子上的窟窿！抗日要紧，可是也不能说穿裤就不要紧，想动员他去抗日，总得先想法叫他有裤穿。没有权，看见国家大事不是自己的事，哪里还有心思救国？我对别人不熟悉，还说铁锁吧：他因为说了几句闲话，公家就关起他来做了—

年多苦工。这个国家对他是这样，怎么能叫他爱这个国家呢？本来一个国家，跟合伙开店一样，人人都是主人，要是有这么几个人把这座店把持了，不承认大家是主人，大家还有什么心思爱护这座店啦？没钱的人，不是因为懒，他们一年到头不得闲，可是辛辛苦苦一年，弄下的钱都给人家进了贡——完粮、出款、缴租、纳利、被人讹诈，项目很多，剩下的就不够穿裤了。没权的人，不是因为没出息，是因为被那些专权的人打、罚、杀、捉、圈起来做苦工，压得大家都抬不起头来了。想要动员大家抗日，就得叫大家都有钱，都有权。想叫大家都有钱，就要减租减息，执行合理负担，清理旧债，改善群众生活。想叫大家都有权，就要取消少数人的特别权力，保障人民自由，实行民主：这些就是我们牺盟会的主张，我们组织牺盟会就是要做这些事。至于怎样组织，怎样行动，马上也谈不到底，好在我明天还不走，只要大家愿意听，咱们明天还可以细谈。”

十五分钟的讲话结束了，大家特别听得清楚的就是有了裤子才能抗日，有了权才愿救国，至于怎样减租减息，执行合理负担，实行民主……还只好等第二天再听。不过就听了这一点大家也很满意，散了以后，彼此都说“人家认理就是很真”，“就是跟从前衙门派出那些人来说话不同”。

二妞只顾听话，一小锅菜汤滚得只剩下半锅。铁锁见小常讲完了话，就把他招呼到自己家里，一边吃饭，一边向他谈近来村里的情形。白狗冷元们几个特别热心时事的人，不回去吃饭就先凑到铁锁家里来问长问短。当铁锁把王同志来了以后，小毛在村里组织牺盟会的事说出来，小常道：“王同志一来人年轻，二来不了解村里的情形，因此错把小毛当成好人，这我可以给他写个信，提醒他一下。以后他来了，你们也可以再把

村里的情形向他细谈一下。小毛造的那个名册，我们不承认它，我们这牺盟会的组织章程，是要叫入会的人，先了解我们的主张，然后每个人自愿的找上介绍人填上志愿书，才能算我们的会员。”铁锁道：“他造的名册我们可以不承认；可是他自己入会是王同志介绍的，怎么才能把他去了呢？”小常笑道：

“这个我想可以不用吧！他从前为人虽说不好，现在只要他不反对我们的主张，我们能不叫人家救国吗？”冷元抢着道：“不行不行！他跟我们两股劲，怎么能不反对我们的主张？象你说那‘有钱的出钱’，我先知道他就不会实行。他虽是个有钱的，可是进得出不得，跟着李如珍讹人可以！”小常道：“这也不怕他，只要他入了会，就得叫他实行会里的主张；什么时候不实行我们的主张，我们大家就开除他出会。”冷元笑向铁锁道：“这也可以！以后有了出钱的事，就叫他出钱；他不出钱，就撵他出会。”白狗跟另外几个青年都向冷元笑道：“对！这么着管保开除得了他！”小常笑向他们道：“不许人家变好了？”冷元道：“还变什么啦？骨头已经僵硬了！”小常道：“不过咱们既然收下他，还是盼他变好；实在变不过来，那也只好不再要他。”要不要小毛的问题，就谈到这里算了，冷元他们几个人又问了些别的事，也都回家吃饭去。小常写了一封信，交给铁锁，叫他第二天早晨到区上去叫王同志，铁锁便送他回庙里睡去。

当小常在铁锁门口讲话的时候，小毛也在那里听；后来小常讲完了话到铁锁家里去了，小毛赶紧跑到庙里向村长春喜他们报告，说小常说了些什么什么。春喜说：“这样看来，他们跟我们是反对的。不过这牺盟会现在的势力很大，要好好抓住这机会，把它抓到咱们手里。你既然跟那个姓王的孩子接过头，又

造了名册，你自然是这村里第一个会员了，那你今天晚上就向这特派员报告工作。要跟他表示亲近一点！”小毛又跟他计划了一会对付小常的话，小毛就回去了。他一见小常，就站起来低声下气道：“回来了，特派员？我正说去接你啦！老宋！倒茶！”老宋倒上茶来，小毛又接着道：“累了吧，特派员？你讲的话真好，真对！非大家组织起来不能救国！我自从听说日本打进咱中国来，早就急得不行了，可惜有力也使不上，不知道怎样才能救国。那天咱会里的王工作员来了，要找个能热心给大家办事的人，村长就找到我名下。我也办不了什么事，只是好为大家的事跑个腿帮帮忙，村长既然找到我名下，我就来了。一见了王工作员，我们两人就说对了，王工作员就托我在村里组织牺盟会。如今也组织好了，昨天晚上才造好名册，正预备往上报，特派员就来了。”他说到这里，就到村长的桌上取过他新造的名册来递给小常道：“特派员，你看，人还不少！”小常听见他一个“特派员”两个“特派员”，话也说得顺溜溜的，想道：“怨不得王同志上他的当，这家伙嘴上还有两下子！”后来他取出名册，小常接住没有翻开就放在桌上道：“明天再看吧，今天实在累了！”他见小常不愿意再谈下去，也就顺着小常道：“对，特派员跑了路了，就早点歇吧！老宋！给特派员打铺！”说着他便走出来了。

那一边，冷元们从铁锁家里回去吃了饭，又聚到修福老汉家里去谈组织起来的事。他们一致都觉着铁锁说得对，小常就是他们见过的人里边第一个好人。白狗说：“这回可不要错过，赶紧请人家组织咱们一下！”只有小常说的不能不叫小毛人会，他们不赞成。有一个说：“到组织的时候，只要小毛说

话，咱们就碰他。冷元哥！你会说扔砖头话，多多给咱碰小毛几家伙！”又有个说：“是平常时候不敢说吧，会说扔砖头话的人多啦！白狗还不是冷元的大徒弟？”还有几个青年说：“我是二徒弟！”“我是三徒弟！”“……”修福老汉说：“要看势，也不要太过火了！”冷元说：“不怕！你不听小常说以后大家都要有权啦吗？只要说到理上，他能把咱们怎么样？我看这世界已经变了些了，要不小常这些人怎么能大摇大摆来组织咱们来？”有的说：“对，胆子放大些吧！”七嘴八舌吵了一会，都主张痛痛快快碰小毛一顿。

第二天早晨，铁锁到区上叫王工作人员去了，小常在庙里等着。他坐着没事，就在庙里来回游玩。这庙院，上半院仍是神像占着，下半院东西两座大房子，一边是公道团，一边是村公所，正南戏台下边是厨房，东南是大门，西南角房是自卫队队部。左看右看，也没有一个房子能叫牺盟会占。他见大门内还有坐东朝西一间小屋子，开门一看老宋住在里边。老宋问他要什么，他说：“没有事，我是闲玩。”说着随手又给他把门闭住。这时候，大门忽然开了个缝，一个很精干的青年伸进一颗头来。这个青年看见有人，正把脖子往回一缩，忽然认得是小常，便笑道：“我当是村长来！”他又把门缝开大了一点进来了，原来是白狗。小常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却见过他——头天晚上在碾道讲完了话，他也到铁锁家里去，还问长问短。小常笑向他道：“是村长你就不敢进来了？”白狗嘻嘻地笑了。小常问他道：“你找谁？”白狗道：“就找你！”小常道：“找我做什么？”白狗道：“问问你几时还给我们讲话啦。”小常道：“大家这几天还忙不忙？”白狗道：“不很忙了，都杀地

啦。大家都想听你讲话。只要你说定几时讲，谈一晌也不要紧！”小常道：“晌午再决定吧！决定了我通知你们。”白狗答应着去了，小常就仍回公所的房子来。

他叫村长给牺盟会找个办事的地方，村长说庙里没有房子了，村里还有一座公房，从前是打更的住的地方，这会空着，可以用。村长不愿意叫牺盟会到庙里来，怕他们来了以后，自己跟李如珍、春喜、小喜这些人谈起什么来不方便；小常觉着庙里既然有村公所、公道团，平常的老百姓就不愿意进来，这种成见马上还打不破，况且谈起村里的坏家伙们来也不方便，因此也不愿意把地点弄到庙里来。这样两方的心事一凑合，就决定用庙外的地方了。

早饭时候，铁锁也回来了，王工作员也来了，大家先去看那座更坊，决定就在这里。铁锁马上去叫了十几个人来，扫地的扫地，糊窗的糊窗，垒火炉，借桌凳……不多一会就把个房子收拾得象个样子。小毛虽然也在里边手忙脚乱卖弄他的热心，可是大家都不答理他，又故意笑笑闹闹叫他看。

小常跟王工作员谈了一会村情，又叫他以后对哪些人哪些事不明白时候多问铁锁。他们又决定就在当天午饭以后，再开一个群众大会，重新给大家谈一谈牺盟会的行动纲领和组织纲领，然后叫大家自动入会。

晌午白狗又来问小常几时讲话，小常就顺便告他说吃过午饭要开个群众会。他问过以后，端着碗满村跑，一会全村就都知道了。小常吃过饭，向村长说要在下午召开个群众会，村长答应着，正吩咐老宋去打锣，白狗就跑进来向小常道：“特派员，请你到更坊门口去讲话啦！”小常道：“知道了，正说着去打锣集合啦！”白狗道：“不用打了，人都到齐了！”说着

小毛也跑进来请小常去讲话，并且又把那个名册从桌上拿起来道：“拿上咱的名册点点名！”小常正准备处理这个名册的事，见他拿上了，也不禁止。

到了更坊门口，男男女女早已坐下一大群，跟坐在戏台下等开戏一样。不知道是哪几个人懂得鼓掌，当小常走近的时候，有两三个人拍起手来，有些孩子们跟着拍，慢慢全场上也就跟着拍起来了。早有人在更坊阶台上放了一张桌，大家都朝着那里，小常知道那就是讲台，便走上去，王工作人员跟上去，小毛也跟上去把名册恭恭敬敬递给小常。

鼓掌声停了，人都静下来，小常翻开名册。这时小毛看见用起他的名册来了，十分得意。冷元、铁锁他们几个人却都摇头，暗想道：“昨天晚上不是说不承认他那个名册吗？为什么还要用它！”只见小常看着最后一个名字叫道：“崔黑小！”一个三十来岁的人站起来答道：“在！”这人是河南滑县来的一个逃荒的，穿的衣裳，粗看好象挂了几片破布。他好象不敢见人，站起来答了一声就又把头低下。小常问道：“你因为什么人会？”崔黑小用他那豫北话答道：“咱不知道！”小常又问道：“谁介绍你？”他抬起头来反问道：“啥呀？”小常又说了一遍，他仍用他那豫北话道：“咱不懂！”冷元他们那些扔砖头话早就预备好了，这个说“谁也不懂”，那个说“只有小毛一个人懂得”；小毛急了，便向崔黑小发话道：“不是我介绍的你？”崔黑小道：“你问我多大岁数，写了我个名，我也不知道是弄啥啦呀？”扔砖头话跟着又都出来了：“查户口啦！”“挑壮丁啦！”“练习字啦！”……小常便正正经经向小毛道：“同志！这样子发展会员是不对的！你想他们连会里的行动纲领组织纲领都不懂，哪里会有作用啦？”小毛分辩道：

“他是个外路人，不懂话。我不过把他浮记在后边，本来就没有算他。”小常道：“噢，原是这样，那就再问问本地人吧！”小常又翻开名册，从头一名李如珍问起。李如珍答了几句笼统话，也说不出具体要做些什么来。小常挨着一个一个往下问，有的老老实实说“不知道”，有的故意说些风凉话——比方说“为了敬老爷”，“为了娶老婆”……小常问了两张以后，便停住了问，又正正经经向小毛道：“不行！咱们事前的宣传工作不够！”又向大家道：“我也不再往下问了，看样子是谁也不了解。我们这个会，特别要讲究自愿，总得宣传的人先把会的纲领讲明白，谁赞成我们的纲领，自己找两个会员来介绍，再经过当地的分会组织委员准许，然后填了志愿书，才能算本会会员。现在这个名册作为无效，咱们再重新宣传重新组织。”冷元他们几个人齐喊道：“对！”冷元道：“又可惜把好几张纸糟蹋了！”小常接着道：“现在我先把牺盟会的行动纲领给大家谈谈。”接着就本着牺盟会行动纲领的精神，用老百姓的话演义了一番，说得全村男男女女都知道牺盟会是干甚的了。

他讲完了行动纲领以后，又说道：“现在大家既然知道牺盟会是干什么的了，谁想干这些，就可以自动报名。这个名册上的人，都没有按人会的章程入会，按章程入会的，在你们村子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铁锁同志，我介绍的；一个是小毛同志，王同志介绍的……”才提出小毛的名字，大家轰隆轰隆嚷嚷起来：“不要小毛！”“不要狗尾巴！”……白狗故意挤到前边大声道：“为什么不要？特派员说过‘有钱的出钱’，人家很有钱，有了人家，会里花钱不困难！”又有人说：“会里不用什么钱！不娶他！”又有人说：“怎么不用钱？花钱路多啦！打日本能不用枪？教人家老叔给咱买几条枪！”又有人

说：“你怕他不给你买啦？跟着龙王吃贺雨可以，叫他出钱呀？”冷元说：“那可不能由他！你不听特派员说‘会员得照着纲领办事’吗？‘有钱的出钱’是‘纲领’，只要他是个会员！”小毛听到要他出钱，已经有点后悔，却也不好推辞，正在踌躇，又听有个人说“出钱也不要他”，他便就着这句话道：“大家实在跟我过不去，我不算好了！”又向小常道：“特派员，入了会还能退出不能？”小常道：“在咱们的组织章程上看，出入都是自由的，不过能不退还是不退好，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小毛低声道：“不！大家跟我心事不投，不要因为我一个人弄得会里不和气！”他满以为小常不知道他的为人，才找了几句大公无私的话来卖弄，好象真能为大家牺牲自己。小常早已猜着他是被大家叫他出钱的话吓住了才要退出，可是也不揭破他的底，也很和气地低声答道：“那你看吧！完全由你！”他见准他退出，除不以为耻，反而赶紧向大家声明道：“大家不用说了，我已经请准特派员退出了！”全场鼓掌大笑。

小常怕小毛面子上不好看，本不想在当场宣布，这会他自己宣布了，也就宣布道：“小毛同志既然一再要退出，我们以后也只好请他在会外帮忙吧！这么一来，你们村子里现在只剩铁锁一个人是会员了。自今天晚上起，我跟王同志就都住在这新房子里，谁想入会就可以到这里报名。我，王同志，还有铁锁，我们三个都可以当介绍人。我还要到别的村里走走，王同志可以多住几天，帮你们成立村分会。”谈到这里，会就结束了。

当晚，冷元、白狗等六七个热心的人，到村里一转，报名的就有三十多个。小常见事情这样顺利，次日也没有走，当下就开了成立大会，选出负责人——铁锁是秘书，杨三奎老汉的组织委

员，冷元的宣传委员。负责人选出后，小常和王工作员又指导着他们分了小组，选了小组长，定下会议制度，这个会就算成立了。

九

下午开过了村牺盟分会的成立大会，晚上，小常、王工作员，正跟铁锁他们几个热心的青年人们谈话，忽然来了个穿长衣服的中年人，拿着个名片递给小常，说道：“特派员！我爹叫我来请你跟王同志到我们铺里坐一坐！”小常接住片子一着，上边有个名字是“王安福”，便问铁锁道：“这是哪一位？怎么没有听你提过？”冷元在旁抢着道：“是村里福顺昌的老掌柜，年轻时候走过天津，是个很开通的老人家。自从听说日本打进来，他每逢县里区里有人来了，总要打听一下仗打得怎么样。”别的人也都说：“去吧！你给老汉说些打胜仗的消息，老汉可高兴啦，逢人就往外传！”小常说了声“好吧”，便同王工作员，跟着王安福的儿子到福顺昌来。

他们走近铺门，一个苍白胡须的高鼻梁老汉迎出来，规规矩矩摘了他的老花眼镜向他们点过头，又把眼镜戴上，然后把他们让到柜房。柜房的桌子上早摆好了茶盘——一壶酒，几碟子菜——虽不过是个些鸡子豆腐常用之物，却也弄得鲜明干净。小常一见这样子，好象是有甚要求——前些时候，城里有几个士绅，因为想逃避合理负担，就弄过几次这种场面——可是既然来了，也只好坐下。他想如果他提出什么不合理的要求，根据在城里的经验，就是吃了酒饭，仍旧可以推开。

小常这一回可没有猜对。王安福跟那些人不一样，完全没有那个意思。他对别的从县里区里来的人，也没有这样铺张

过，这时对小常，完全是诚心诚意地另眼看待。“七七”事变后，两三个月工夫日本就打进山西的雁门关来，这完全出他意料之外。他每听到一次日本进侵的消息，都要焦急地搔着他的苍白头发说：“这这这中国的军队都到哪里去了？”他不明白这仗究竟是怎样打的，问受过训的村长，村长也说不出道理来；问县里区里来的人，那些人有的只能告诉他些失败的消息，有的连这消息也没有他自己知道的多，道理更说不上；虽然也有人来组织这个“团”那个“会”，又都是小喜、春喜一类人主持的，也不过只造些名册，着样子屁也不抵；他正不知照这样下去将来要弄成个什么局面，忽然听说小常来了，他觉着这一下就可以问个底细了。小常这人，他也是从铁锁被捕以后才听到的。当时是反共时期，他不敢公开赞成，只是暗暗称赞，因为他也早觉着“非把那些仗势欺人的坏家伙一齐打倒，世界不会有真理”，只是听说小常是共产党，这点他不满意。春喜他们说共产党杀人放火他是不信的，他对于共产党，只是从字面上解释，以为共产党一来，产业就不分你的我的，一齐成了大家的。他自己在脑子里制造了这么个共产党影子，他就根据这个想道：“要是那样，大家都想坐着吃，谁还来生产？”他听人说过小常这个人以后，他常想：“那样一个好人，可惜是个共产党！”这次小常来了，他也跟大家一样，黑天半夜拄着棍子到铁锁门口听小常讲话，第二天晌午在更坊门口开群众大会，他也是早早就到，一直瞪着眼睛听到底。听过这两次话以后，他更觉着小常这个人果然名不虚传，认理真，见识远，看得深，说得透。他还特别留心想听听关于共产党的事，可是小常两次都没有提。这次他请小常，除了想问问抗战将来要弄个什么结果，还想问问小常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他陪着小常和王工作人员吃过酒，伙计端上饭来。他们原是吃过饭的，又随便少吃了一点就算了。酒饭过后，王安福老汉便问起抗战的局面来。小常见他问的是这个，觉着这老汉果是热心国事的人，就先把近几个月来敌人的军事部署和各战场的作战情形，很有系统地报告了一番；又把中共毛主席答记者问时说的持久战的道理讲了一下——那时《论持久战》一书还没有出版。王安福老汉是走过大码头的，很愿意知道全面的事，可惜别的从区里县里来的人，只能谈些零星消息，弄得他越听越发急，这会听着小常的话，觉着眉目清醒，也用不着插嘴问长问短。他每听到一个段落，都象醒了一场梦，都要把脖子一弯，用头绕一个圈子道：“唔——是！”他对于打仗，也想得很简单，以为敌人来了最好是挡住，挡不住就退，半路得了手再返回来攻，得不了手就守住现有的原地，现有的原地守不住就还得退；退到个角上再要守不住，那恐怕就算完了。这时他见小常说象自己住的这块地方也可能丢，但就是丢了以后，四面八方都成了日本人，也还能在这圈里圈外抗战，而且中间还不定要跟敌人反复争夺多少次，一直要熬到了相当的时候，才能最后把敌人熬败。这种局面他真没有想到过。他听小常说完，觉着还可能过这种苦日子，实在有些心不甘。他呆了一大会没有说什么，最后皱着眉头道：“照这样看来，熬头长啦呀？”小常见他这样说，就反问道：“你不信吗？”王安福道：“信信信！你说得有凭有据，事实也是这样，我怎能不信？我不过觉着这真是件苦事，可是不熬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最后还能熬败日本，虽吃点苦总还值得。”他又捏着他的苍白胡须道：“我已经六十了，熬得出熬不出也就算了，可是只要后代人落不到鬼子手也好呀！自从日本进攻以来，我一直闷了

几个月，这一下子我才算蹬着底了。”

接着他又道：“常先生，我老汉再跟你领个教：牺盟会是不是共产党啦？”小常觉着他问得有点奇怪，但既然是这样问，也只好照着问题回答道：“这当然不是了！牺盟会是抗日救国的团体，共产党是政党，原来是两回事。”王安福道：

“常听说先生你就是共产党，怎么现在又成了牺盟会特派员呢？”小常道：“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只要愿意牺牲救国，不论是什么党不是什么党都可以参加牺盟会。”王安福道：

“这我也清楚了，不过我对你先生有个劝告，不知道敢说不敢说？”小常还当是他发现了自己的什么错处，马上便很虚心地向他道：“这自然很好，我们是很欢迎人批评的。”安福老汉道：“恕我直爽，象你先生这样的大才大德，为什么参加了共产党呢？我觉着这真是点美中不足。”小常觉着更奇怪，便笑道：“王掌柜一定没有见过共产党人吧？”王安福道：“没有！不过我觉着共产党总是不好的，都吃起现成来谁生产啦？”小常见他对共产党是这样了解，觉着非给他解释不行了，便给他讲了一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最后告他说共产也不是共现在这几亩地几间房子，非到了一切生产都使用机器的时候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告他说共产主义是共产党最后才要建设的社会制度。又把社会主义苏联的情形讲了一些。说了好久，才算打破他自己脑子里制造的那个共产党影子。他想了一会，自言自语道：“我常想，象你先生这样一个人，该不至于还有糊涂的地方啦呀？看来还是我糊涂，我只当把产业打乱了不分你我就是共产。照你说象在苏联那社会上当个工人，比我老汉当这个掌柜要舒服得多。”他又想了一下道：“不过建设那样个社会不是件容易事，我老汉见不上了，咱们且谈眼前的

吧，眼看鬼子就打到这里来了，第一要紧的自然救国。我老汉也是个中国人，自然也该尽一分力。不过我老汉是主张干实事的，前些时候也见些宣传救国的人，不论他说得怎么漂亮，我一看人不对，就不愿去理他，知道他不过说说算了。你先生一来，我觉着跟他们不同，听了你的话，觉着没有一句不是干实事的话。要是不嫌我老汉老病无能，我也想加入你们的牺盟会尽一点力量，虽然不济大事，总也许比没有强一点，可不知道行不行？”小常和王工作员齐声道：“这自然欢迎！”小常道：“象你老先生这样热心的人实在难得！”王安福见他两人对自己忽然更亲热了，振了振精神站起来道：“我老汉主张干实事，虽说不是个十分有钱的户，可是不象那些财主们一听说出钱就吓跑了。会里人真要有用钱的地方，尽我老汉的力量能捐多少捐多少！就破上我这个小铺叫捐款！日本鬼子眼看就快来抄家来了，那还说这点东西？眼睛珠都快丢了，那还说这几根眼睫毛啦？”小常和王工作员，听了他这几句话，更非常佩服他的真诚，连连称赞。后来小常又说捐款还不十分必要，当前第一要紧的事是减租减息动员群众抗日，能动员得大多数人有了抗日的心情，再组织起来，和敌人进行持久战。问他有没有出租放债的事，是不是可以先给大家作个模范，他说：“这更容易！不过咱是生意人家，没有出租的地；放债也不多，总共以现洋算不过放有四五千元，恐怕也起不了多大模范作用！”小常说：“做模范也不在数目多少，况且四五千元现洋已经不是个小数目，至少也可以影响一个区！”王安福答应道：“这我可以马上就做，回头我叫柜上整理一下，到腊月齐账时候就实行！不说照法令减去五分之一，有些收过几年利的连本都可以让了！”

两下里话已投机，一直谈到半夜。临去时小常握着王安福的手道：“老同志！以后我们成自己人了，早晚到城就住到咱们会里！”王安福也说：“你们走到附近，也一定到这里来！”这样便分手了。

六十岁的王安福参加牺盟会自动减息这件事，小常回到县里把它登在县里动员委员会的小报上，村里有铁锁他们在牺盟会宣传，王安福老汉自己见了人也说，不几天村里村外，租人地的，欠人钱的，都知道减租减息成了政府的法令，并且已经有人执行了，也就有好多向自己的地主债主提出要求，各村的牺盟会又从中帮助，很快就成了一种风气。

李如珍是靠收租收利过活的，小喜、春喜自从民国十九年发财回来，这几年也成了小放债户；小毛也鬼鬼捣捣放得些零债。他们见到处都是办减租减息，本村的王安福不止自动减了息，还常常劝别人也那样做。他们自己的佃户债户们大多数又都参加了牺盟会，成天在更坊开会，要团结起来向自己提出要求。他们觉着这事不妙，赶紧得想法抵挡。李如珍叫春喜到县里去找县公道团长。春喜去到县里住了一天，第二天回来就去向李如珍报告。

这天晚上，李如珍叫来了小喜、小毛，集合在他自己的烟灯下听春喜的报告。夜静了，大门关上了，春喜取出一个记要的纸片子来报告道：“这一次我到县团部，把叔叔提出的问题给县团长看了，县团长特别高兴，觉着我们这里特别关心大局，因此不嫌麻烦把这些问题一项一项都详细回答了一下。他说最要紧的是防共问题。他说咱这公道团原来就是为防共才成立的，现在根本还不交，只是做法要更巧妙一点。他说防共与容

共并不冲突。他说阎司令长官说过：‘我只要孝子不要忠臣！’就是说谁能给阎司令长官办事，阎司令长官才用谁。对共产党自然也是这样，要能利用了共产党又不被共产党利用。既然容纳了共产党，又留着我们公道团，就是一方面利用他们办事，一方面叫我们来监视他们，看他们是不是真心为着阎司令长官办事，见哪个共产党员作起事来仍然为的是共产党，并不是为阎司令长官，我们就可以去密电报告，阎司令长官就可以撤他的职。第二个问题：‘牺盟会是不是共产党？’他说牺盟会有许多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能团结住许多青年，阎司令长官就利用他们给自己团结青年。他们自然也有些人想利用牺盟会来发展共产党，可是阎司令长官不怕，阎司令长官自任牺盟总会长，谁要那样做，就可以用总会长的身份惩办他。”

李如珍插嘴问道：“他就没有说叫我们怎样对付牺盟会？”

春喜道：“说来！他说最好是能把村里的牺盟会领导权抓到我们自己人手里，要是抓不到，就从各方面想法破坏它的威信，务必要弄得它起不了什么作用。”

李如珍翻了小毛一眼道：“我说什么来？已经好好抓在手了，人家说了个‘出钱’就把你吓退了！其实抓在你手出钱不出钱是由你啦，你一放手，人家抓住了，不是越要叫你出钱吗？现在人家不是就要逼咱执行减租减息法令吗？”说到这里他回头问春喜道：“阎司令长官为什么把减租减息定成法令啦？”

春喜道：“接下来就该谈到这个。县团长说：这‘减租减息’原来是共产党人提出来的。他们要求阎司令长官定为法令，阎司令长官因为想叫他们相信自己是革命的，就接受了。不过这是句空话，全看怎样做啦：权在我们手里，我们拣那些已经讨不起来的欠租欠利舍去一部分，开出一张单子来公布一

下，名也有了，实际上也不受损失，权弄到人家手里，人家组织起佃户债户来跟我们清算，实际上受了损失，还落个被迫不得不减的顽固名字。”

李如珍又看了小毛一眼，小毛后悔道：“究竟人家的眼圈子大，可惜我那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小喜笑道：“一说出钱就毛了，还顾得想这个！”说得大家齐声大笑。

春喜接着道：“这几个问题问完了，我就把小常到村成立牺盟会的经过情形向他报告了一下。他说别的地方也差不多都有这样报告，好象小常是借着牺盟会的名字发展共产党。他说他正通知各地搜集这种材料，搜集得有点线索，就到司令长官那里告他，只要有材料，不愁撤换不了他。这次去见县团长，就谈了谈这些。”

小喜道：“报告听完了，我们就根据这些想我们的办法吧！马上有两件事要办：一件是怎样抵抗减租减息，一件是怎样教铁锁他们这牺盟会不起作用。”

小毛抢着道：“抵抗减租减息，我想县团长说的那个就好，我们就把那些讨不起来的東西舍了它。”

李如珍道：“我觉得不妥当，县团长既然这样说，可见这法子有人用过了。空城计只可一两次，你也空城计我也空城计，一定要叫人家识破。我想咱村虽然有铁锁他们那个牺盟会，可是大权还在我们手，村长是我们的人，公道团是春喜，开起总动员委员会来，虽然是三股头——公道团、牺盟会、村政权——有两股头是我们的，怎么也好办事。”

春喜抢着道：“你这么一说我想起办法来了，我们可以想法子跟他们拖。总动委会开会时候，我们就先把这问题提出来——先跟村长商量一下，就说我们要组织个租息调查委员会，来

调查一下全村的租息关系，准备全村一律减租减息。铁锁他们都拿不起笔来，我们就故意弄上很详细整齐的表册慢慢来填，填完了就说还要往上报——这样磨来磨去，半年就过去了。”

小毛插嘴道：“过了半年不是还得减吗？”

小喜抢着道：“我看用不了两个月日本就打来了，你怕什么？况且这只是个说法，不过是叫挡一挡牺盟会的嘴，只要能想法把牺盟会弄得不起作用，这事搁起来也没人追了。”

李如珍道：“对！只要把牺盟会挑散了就没人管这些闲事了。我看还是先想想怎样挑散牺盟会吧！”

小喜道：“这我可有好办法。咱李继唐是个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人，还坏不了这点小事？”

春喜道：“你且不要吹！你说说你的做法我看行不行！现在多少跟从前有点不同，不完全是咱的世界了——自那姓常的来了，似乎把铁锁他们那伙土包子们怂恿起来了，你从前那满脑一把抓的办法恐怕不能用了。”

小喜道：“这也要看风驶船啦吧，我该认不得这个啦？一把抓也不要紧，只要抓得妙就抓住了！”

春喜道：“这不还是吹啦吗？说实在的，怎么办？”

小喜道：“办法现成！说出来管保你也觉着妙！铁锁他们那伙子，不都是青壮年吗？我不是自卫队长吗？我就说现在情况紧急，上边有公事叫加紧训练队员。早上叫他们出操，晚上叫他们集中起来睡觉，随时准备行动，弄得他们日夜不安根本没有开会的时间，他们就都不生事了，上边知道了又觉着我是很负责的，谁也驳不住我！”

还没等春喜开口，李如珍哈哈大笑道：“小喜这孩子果然有两下子！”春喜、小毛也跟着称赞。

事情计划得十全十美，四个人都很满意。李如珍因为特别高兴，破例叫他们用自己的宜兴磁烟斗和太谷烟灯过了一顿好瘾。

铁锁他们果然没有识破人家的诡计，叫人家捉弄了——村总动委会开会，通过了调查租息与训练自卫队。自从自卫队开训以后，果然把村里的青壮年弄得日夜不安，再没有工夫弄别的。王工作员虽然也来过几次，可惜人年轻，识不透人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见人家表格细致，训练忙碌，反以为人家工作认真，大大称赞。

只有王安福老汉不赞成这两件事。他倒不是识破人家的计划，他是主张干实事的，见他们那样作抵不了什么事，因此就反对。一日他又进城去，小常问起他村里的工作，他连连摇头告诉小常道：“不论什么好事，只要有小喜、春喜那一伙子搅在里边，一千年也不会弄出好结果来。象减租减息，照我那样自己来宣布一下就减了，人家偏不干实事，偏要提到总动委会上慢慢造调查表，我看不等他们把表造成，日本人就打得来了。自你走后，牺盟会一次会也没有开成，人家小喜要训练自卫队，领得一伙人，白天在地里跑圈子，拔慢步，晚上集合在庙里睡觉，把全村的年轻人弄得连觉也不得睡，再没有工夫干别的事。我看那连屁也不抵！不论圈子跑得多么圆，慢步拔得多么稳，有什么用处？”

小常是多经过事的人，自听王安福这么一说就觉着里边有鬼。问了一下县自卫队长，队长说：“谁叫他这样训？”后来队长又派了个人去替小喜当队长，调小喜到县受训去。

这样一来，小喜他们的计划被打破了。恰巧那时阎锡山觉着决死队学了八路军的作风，恐怕他掌握不住，又到处派些旧

军官另成立队伍。这些队伍也名“游击队”，在本县派的是个姓田的旧连长来当队长，叫田支队。小喜被调之后，也无心入城受训，就参加到这田支队去。

十

新从县里派来的自卫队长也是牺盟会会员，来到村里，除不妨碍牺盟会开会，自己又参加在里边，每天晚上要跟大家在一处谈谈——有别的事，就谈别的事，没别的事，就谈打游击，既不误会里的事，对训练自卫队也有帮助。牺盟会的工作更顺利了。王安福实行减息以后，大家要求李如珍跟王安福看齐，不要只造表不干实事，弄得李如珍无话可说，只盼望敌人早些来把这事耽搁一下。

果然不几天消息更吃紧了，平汉、正太两路已被敌人打通，牺盟会只顾动员大家空室清野，把减租减息的事暂且搁起来。租虽说暂且可以不减，李如珍也没有沾了光，从平汉、正太两路退下来的五十三军、九十一师、骑四师、孙殿英的冀察游击队、张仁杰的什么天下第一军……数不清有多少番号的部队都退到山西上党一带的乡间来。这些部队，不知道是谁跟谁学的，差不多都是一进村就打枪，把老百姓惊跑了他们抢东西，碰上人就要东西，没有就打。受过“孝子”训的村长偷跑了，区长也偷跑了，李如珍平素的厉害对这些老总们一点也用不上，结果被孙殿英的侯大队绑了票。

把李如珍绑走了，家里情愿花钱去赎，可是找不上个说票的人——村里的好人只恨他死不了，谁还管他这些闲事；坏人又找不上个胆大的，春喜不敢去，小毛更是怕死鬼，别的烟鬼赌

棍，平常虽好跟来跟去吸口烟灰，遇上这事，谁也躲得不见面了。家里人跟春喜、小毛商量了半天，都说非小喜不行，才打发人到田支队把小喜找回来。小喜巴不得碰上这些事，便满口应承去找侯大队。他去了三天没有回来，家里人正在发急，也找不上个探信的。第四天，小毛、春喜仍到李如珍家计划觅人探信，到了晌午李如珍跟小喜都回来了。大家问起怎样回来的，小喜洋洋得意道：“我一去了，他们打发了个参谋跟我打官腔，说‘部队里生活困难，请你叔父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请他捐几个“救国捐款”’。我说：‘这个容易，我管保能想出办法来给部队里补充些东西。我叔父虽有几顷地，可是没有现钱，这些年头卖地又没人要，不要在他身上打主意。’这个参谋见我是个内行人，就排开烟灯让我过瘾，两个人在灯下说了一会实底话。他说先叫我帮他们弄些东西来再放人，我也答应了。破了两三天工夫，黑夜也下了点劲，花布油酒，帮着他们弄了几十驮子，他们高兴了，请我跟叔叔吃了几顿酒饭，就打发我们回来了。”李如珍家里人听说没有花一个钱，自然十分高兴，春喜、小毛听了，也都佩服了小喜的本领。小毛还要问在哪里弄的那几十驮东西，小喜说：“这你不用问！‘黄河岸上打平和，几时不是吃鳖啦？’”

阴历年节到了，因为时候不对，谁也无心过年，差不多都连个馍也没有蒸。亲戚们也不送节了，见了面不说拜年，先问“你村住的是什么队伍”，“抢得要紧不要紧”。将就过了正月十五，日本飞机到县里下过了弹，不几天敌人就通通噹噹从长治打过来了。这村子离汽车路虽然只有十来里，敌人的大部队却没有来，只有护路的骑兵，三三五五隔几天来绕一趟。凡是有个头目的队伍，抢人时候虽然很凶，这时一听炮响，却都

钻了大山，只剩下三五成群的无头散兵比从前抢得更凶些。

村里的自卫队一来没有打过仗，二来没有家伙，只有一条步枪两个手榴弹，不能打，只能在村外放个哨，见有敌人来了，土匪来了，跟村里送个信，叫大家躲一躲。

李如珍是输过胆的，听说有个什么动静就往地洞里钻。春喜因为家里没有地洞，成天在李如珍家借他的地洞藏身。一天，太阳快落的时候，小毛跑来跟李如珍、春喜说：“那个王工
作员又来了，听说他当了咱这一区的区长。”李如珍道：“区长不区长那抵什么事？多少军队还跑得没影子啦！”才说了几句话，外边有人说来了十来个溃兵，吓得李如珍、春喜、小毛把大门关起来躲进地洞里。停了一会没动静，李如珍打发小毛到楼上的窗窟窿去了望。小毛才上去，就见有一个兵朝着大门走来。吓了他一跳，正预备去报告李如珍去，忽然又看见是小喜，便轻轻喊道：“继唐！”小喜听出是小毛的声音，便答道：“是你呀？快开门！”小毛道：“听说有十来个散兵？”小喜道：“没有事！你放心开开吧！”小毛开了门放他进来，又到洞里去把李如珍、春喜都叫出来。

李如珍问小喜道：“喜！你跟哪里来的？田支队驻在哪里？”小喜道：“我在侯大队住了几天，日军就来了，田支队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侯大队开到陵川大山里去了，我就留在附近，后来碰到个熟人，是豫北人，姓王，从前在太原会过面。”又望着春喜道：“这人你也许知道：民国十九年，老阎要成立四十八师，他们手下有一把子人想投老阎，那时候他在太原住过几天，我在四十八师留守处当副官，和他谈过几次，后来老阎失败了，没有弄成。这次他们跟着孙殿英的冀察游击队到咱们这边来。近几天孙军往东山去了，他拉出几十个人来住在白

龙庙，又收了些散兵，自称王司令，我在他那里算参谋长，就在附近活动。”李如珍道：“我这几天闷在家里哪里也不敢去，究竟咱们这地方是个什么局势？你可以给我谈谈！”小喜道：“大势是这样：汽车路和县城是日军占了。城里有了维持会，会长姓卫。”又望着春喜道：“这人你也许知道，是个大胖子，在太原时候常好到五爷公馆去，后来在禁烟考核处当过购料员。”春喜道：“认得。”小喜接着道：“城里秩序就靠他来维持。一出城，汽车路上每隔十里八里就有个日军的哨棚，多则一两班人，少则三五个人，巡逻的骑兵常常来往不断，有时候也到附近各村去走一走。汽车路旁的村子也都有了维持会，日军过来也招呼一下。”李如珍道：“你们跟日军跟维持会取什么关系？”小喜道：“还没有关系，白龙庙在山上，离汽车路二三十里，我们不到汽车路上去，他们也不到山上去，见不了面！”李如珍道：“家里实在不好住呀！光散兵一天不知道就要来几次……”小喜道：“散兵没关系！别的部队都走了，附近三二十里，凡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零兵，都是我们的人，见了他们，只要一说你认得我，管保没事。”李如珍道：“虽是那样说，心里总不安，城里要是有个秩序，还不如搬到城里去住。你能不能给那姓卫的写个信介绍一下？”春喜抢着道：“要是他，我认得，我可以替叔叔去打听一下，要合适的话，我跟叔叔同去，说不定还能找点事干！”

正说着，听见外边好多人乱吵吵的，小毛跑到门边去听了一下，回来说：“街上人说捉住十个逃兵，缴了六条枪。”小喜跳起来问道：“谁捉的？”小毛道：“听说是自卫队捉住的。”小喜道：“糟了！我走了！”说着就往外走，又摸了一下腰里的手枪。小毛追着问道：“什么事？”小喜头也不回，

只把手伸回背后来摆了一摆，开开门跑出去了。李如珍看春喜，春喜看李如珍，小毛跑回来问他们两个人，谁也弄不清是什么事。大家闷了一小会，听见好多脚步声咕咚咕咚越来越近，小毛赶紧去关门，已经来不及了。李如珍跟春喜只当是土匪，赶紧钻地洞。进来的不是土匪，原是王工作员跟自卫队长带着一二十个自卫队员——队员们背着新缴到的步枪，觉着很神气。冷元背着一条枪领着头，一进门就一把抓住小毛问道：“小喜来这里没有？”小毛吓得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说：“没没没有来！”后边有好多村里人也挤进来，有人说：“来了！我还碰见来！”冷元端起枪来逼住小毛道：“说实话！来了没有？”小毛缩成一团道：“来是来过，又走了。”王工作员道：“搜一搜！不要叫漏了！”大家就在李如珍家搜起来。搜到地洞里，搜出李如珍和春喜，只是没有小喜，问了他们两个人一下，都跟小毛说得一样，知道已经跑了，也就算了。

自卫队长、王工作员、自卫队员和村里的人们一大伙人从李如珍家里出来回到更坊门口。这更坊门口，早已有两个队员拿着枪站岗，把捉住的十个散兵关在更坊里。冷元指着更坊门问王工作员道：“这十个人怎么处理？”王工作员道：“我看趁这会人多，还不如先开会，这十个人留在会后处理。你们可以再分头到各家去召集一下人，最好是全村人都来。”这时敌人离得不很远，开会也不便再打锣，冷元铁锁们一大伙热心的人就跑到各家叫人去，好在这时候捉住了散兵，谁也想来着看，因此人来得反比平常时候更多。人齐了，村长早半月就跑了，李如珍和春喜，一个是村副一个是公道团长，又因为有小喜的事没有敢来。铁锁见村公所没有一个人来，想起自己是牺盟会村秘书，应该来主持会场，就走到更坊的阶台上向大家道：“王同

志现在成了咱区的区长了，今天来咱村里工作，先跟大家开个会。现在就先请王同志讲话。”

王工作人员走上去讲道：“老乡们！同志们！现在敌人已经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的县城和交通大道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正象常特派员上次和你们谈的，我们这里已经成了敌后抗战的形势了。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可是广大的乡村还在我们手里。我们以后就要凭着这广大的乡村来和敌人长期斗争，熬着打，打着熬，最后把敌人熬得没了劲，才能收复失地。大家不要因为看见许许多多中国军队都走开了，就灰心丧气。现在我给大家报告些好消息：大家都知道大战平型关的八路军吧？现在别的军队往南撤退，这八路军反向北开，收复了宁武、广灵、灵丘、唐县、繁峙、左云、右玉、宁晋、朔县。这些地方，现在都成了敌人的后方，八路军就要在这些地方建立抗日根据地来长期抵抗敌人。现在这军队已经从洪洞赵县到咱们这里来，要和咱们老乡们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敌人。可惜旧日的行政人员不争气，平常时候跟老百姓逞威风倒可以，遇上这非常时期就没了本事了。前半个月，消息一吃紧，各路军队一往这里退，县长吓病了，各区区长、各村村长吓跑了，扔下各地的老百姓，任敌人欺负，任溃兵糟蹋，没人管。打电给阎司令长官，阎司令长官才从临汾退出来，连自己也顾不住，他手下的‘孝子’们都紧紧跟着他只怕掉了队，派谁谁不敢来，后来才由咱们牺盟会举荐了个县长。这新县长上任才三天，敌人就打来了。县政府转移出来以后，地方上毫无秩序，区村长没有一个，没办法才由咱们的常特派员举荐了几个牺盟会的工作人员当区长，咱这一区就派的是我。咱这一区也和别的区一样，受过训的‘孝子’村长们，跑得一个也没有

了。我这次到各村来，先要作这两件事：第一是补选抗日干部，第二是布置眼前工作。这村里，各种救国会还没有成立起来，只好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村干部，先得有村长，大家可以马上补选一个，现在就选！”大家有的提王安福，有的提杨三奎，冷元跳起来道：“我有个意见：我觉着这会是兵荒马乱的世界，当村长不只要热心为大家办事，还要年轻少壮能踢能跳才行！我提张铁锁！”大家不等主席说表决，都一致喊道：“赞成！”后来王区长又叫举了一下手，仍然是全体通过铁锁当村长。村副虽然不缺，可是大家都说李如珍包庇小喜，不叫他再当村副，非改选不行，结果改选了王安福。提到自卫队长，大家一致都说队长好，可不敢调换了。干部选定以后，就布置工作，不过这里离敌人太近，除叫大家宣誓不当汉奸以外，其余的抗日戒严等工作，只能留在干部会上讲。王区长把他的事情宣布完了以后，大家要求报告一下怎么捉住那十个逃兵，并且要求区长处理，区长就让自卫队长先报告经过。

自卫队长报告道：“今天才吃过午饭的时候，王区长来了。王区长召集牺盟会的同志们在福顺昌开会，村外有自卫队站岗。到了半后晌，一个队员来报告，说村西头山上的小路上来了十来个散兵，到村西头的土窑里刨福顺昌埋的东西，我就集合了几个队员去看。我和队员们在远处看见只有一个站岗的，冷元说这土窑只有一个门，只要把站岗的捉住，就能把其余的人困在窑里。他说他可以去试试看捉得住哨兵捉不住。他慢慢走到哨兵背后的地堰上，猛一下跳下去拦腰把那哨兵抱住就推着跑，别的队员上去把哨兵的枪夺了。那哨兵虽然喊了一声，窑里的人可没有听见。那时我带着队里的两颗手榴弹上在窑顶上，先扔下一颗，响了，里边出来一个头，身子还没出来

就叫我喝回去了。我捏着手榴弹上的火线说：‘回去！谁动炸死谁！’他们不动了，我又喊：‘把枪架到门口！不缴枪我把土窑炸塌了，把你们一齐埋在里边！’他们不说话了，一会，一个人出来把五支枪架在门外。我当他们还有，我说：‘为什么不缴完？’他们一个人说：‘我们只有六条枪，放哨的拿走一条。’在村外站岗的一个队员说他们就只是六条枪，也就算了。冷元下去把枪收了，才叫他们出来。我问他们是哪一部分，他们说原来不是一部分，后来叫侯大队一个王连长收编了，驻在白龙庙，这村的李继唐——就是小喜——就是他们的参谋长。这次来刨窑洞，就是小喜领他们来的。小喜怕本地人认得他，把窑洞指给他们就躲开了。完了……这十个人就是这样捉住的。”自卫队牺盟会的人早就都知道了，后来的人不知道，听了队长的报告，都问小喜躲到哪里去了，知道的人告他们说躲在李如珍家，后来又跑了。

大家又讨论了一会怎样处理这十个人，最后都同意把这十个人交给区长发落，可是以后捉住了小喜，非当着村里人的面枪毙不可。后来这十个人由区长把他们带回县政府，经过了教育又补充了队伍。

小喜领得十个人出来抢东西，把人也丢了枪也丢了，不好回白龙庙去见姓王的，就跑到城里找着了卫胖子，在维持会当黑狗去了。他自从当了黑狗，领着巡路的日本骑兵回村子里去扰了好几次，把村里人撵得满山跑，把福顺昌的房子也烧了，把春喜叫到城里去给敌人办事，又在村里组织起维持会，叫李如珍当会长，小毛当跑腿的。从这时起，村里的自卫队不能在家里住，年轻妇女不能在家里住，每月要给城里的敌人送猪送羊

送白面，敌人汉奸来到村里，饭要点着名吃，女人要点着名要。

十 一

王安福年纪大了，不能跟着大家在野地里跑，就躲到二十多里外一个山庄上的亲戚家里。这山庄叫“岭后”，敌人还没有去过，汽车路附近抗日的人们被敌人搜得太紧了，也好到这里躲一半天。一天，铁锁冷元们来了，王安福问起村里的情形，冷元说：“不要提了！村里又成了人家李如珍和小毛的世界了！有些自卫队员们，家里已经出了维持款，他们的老人们把他们叫回家里去住，只有咱牺盟会有十几个硬骨头死不维持，背着自卫队的七条枪满天飞。如今是谷雨时候，这里的秋苗都种上了，咱们那里除了几块麦地，剩下还是满地玉茭茬——敌人三天两头来，牲口叫敌人杀吃完了，不只我们不能种地，出过维持款的，也是三天两头给敌人当民夫送东西，哪里还轮得着干自己的活？……”

王安福听他这样一说，觉着很灰心。他想这种局面到几时才能算了呢？他虽听小常和王区长都说过要慢慢熬，可是只看见敌人猖狂，看不见自己有什么动作，能熬出个什么头尾来呢？他问铁锁近来小常和王区长来过没有，铁锁说：“王区长来过一次，他说咱们过去的动员工作没有做好，现在势力单薄，能保住这几条枪这几个人，慢慢跟敌人汉奸斗争着，就从这斗争中间慢慢发展自己的力量。”

他们走了以后，王安福独自寻思了一夜。他不论怎么想，总以为没有什么发展的希望，总以为这种局面将来得不到什么好结局。他是急性子人，想起什么来就放不下，第二天早晨起

来，他便决定去找小常。

小常和他们牺盟县分会的几个同志们，跟县政府住在一个村子里，离岭后还有四五十里。王安福一来路很生，二来究竟是六十岁的老汉了，四五十里路直走了一天。太阳快落了，他走到一个小山庄上，看见前边几个村子都冒着很大的烟，看来好象是烧着了房子，问了问庄上的人，说是来了队伍，是队伍烧火做饭，他们庄上人才去送柴回来。问他们是什么队伍，他们也不知道，只说是很多，好几村都驻满了，县政府叫附近的山庄上都去送柴。王安福问了一会也问不清楚，他想既是县政府叫送柴，一定是中国兵，又问了一下县政府住的村子，经庄上人指给他，他就往前去了。

走到村里，天就黑了，只见各家各院都有住的兵，好容易才找着牺盟会住的院子，找见了小常。这时小常正和几个队伍上的人谈民夫担架问题，黑影里也没有看见他是谁。他也不便打断小常跟人家的谈话，就坐在院里等着。一会小常把那些人都送出去了，回头来看见院里还有个人，向他走来，走近了看见胡须眼镜和手杖，才发现是他，不由得很惊奇地握住他的手道：“呀！老同志！你怎么也能走到这里来？”才说了一句话，又有队伍上的人来找，他便叫别的同志招呼王安福到房子里洗脸吃饭，自己又和这新来的人谈起别的事来。这些人没有打发走，县政府又请他去开会，别的同志又都各忙各的工作。王安福吃过饭以后，只好躺在床上等小常。差不多快半夜了小常才回来，王安福听见他一开门，就从床上坐起来道：“回来了？真忙呀！”小常道：“你还没有睡，老同志？不累吗？”王安福一边答应着，便从床上下来坐在桌边。小常把灯拨亮了，也坐下来问道：“找我有事吗？村里近来怎么样？”王安福

道：“就是为这事情：村里成了维持会的世界了，李如珍的会长，小毛是狗腿……”小常道：“这个我知道，下边有报告。新近还有什么变化吗？”王安福道：“变化倒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就这个，村里就难过呀！眼看就是四月天了，地里连一颗籽也没有下……”小常道：“不要愁，老同志！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敌人的第一百零八师团九路围攻晋东南想彻底消灭我们抗日力量，被八路军打得落花流水。今天来的这些八路军，就是来收复咱们这地方来了，现在已经有一路要到你们那地方去打仗，你们那一带马上就要收复……”王安福听到这里忽然大声问道：“真的？”小常道：“可不是真的嘛！明天一早我也要去，去帮他们动员民夫抬担架。”王安福道：“那？那我也跟你相跟回村里招呼去！”小常道：“老同志，你不要急！你老了，跑一天路，明天不用回去，等一两天那里打罢了仗，把敌人打走了你再回去。村里的事，有铁锁他们在家可以招呼了。”劝了他一会，他仍坚决要回去，小常也只好由他。

这天晚上，小常睡得倒很好，王安福高兴得睡不着。他想把日本一打跑了，第二步一定是捉汉奸——城里一定要捉小喜、春喜，村里也一定要捉李如珍和小毛。他想到得意处，连连暗道：“李如珍！我看你叔侄们还威风不威风？看你们结个什么茧？”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得细——想到战场上怎样打、日本人怎样跑、李如珍被捉住以后是个什么可怜相、小毛怎样磕头祷告、村里人怎样骂他们……想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鸡叫才睡着了。当他睡着了的时候，正是军队吃饭的时候。小常就在这时候，起来吃过饭，天不明就随军队出发了。王安福起来，太阳就快出来了，别的同志跟他说小常同志随军出发了，叫他住一两天再回去。他心里急得很，暗暗埋怨小常不叫

他，马上就要随后赶去。别的同志告他说赶不上了，就是要走也得吃过饭，路上没有吃饭的地方。说话间已经是吃早饭的时候了，他胡乱吃了点饭，仍是非赶回去不行，就辞了会里的同志们，也不再往岭后去，一直往回家的路上赶来。六七十里山路，年轻人也得走一天，这老汉总算有点强劲儿，走到晌午就赶上了部队，不过部队的行列太长了，再往前赶还是，再往前赶还是，也没有找见小常在哪里。快到家了，方圆三五里几个村庄都住下兵；摸了十几里黑赶到了家，庙里也是兵，更坊也是兵，自己的房子被敌人烧得只剩一座，老婆、孩子、儿媳、子孙全家都挤在里间，外间里也住的是兵。他先不找自己的去处，先到铁锁那里去。这一下找对了，铁锁的三间喂过牲口的房子，也没有被敌人烧了，也没有住着兵，地下还铺着草，小常住在里边，王区长也来了，也住在里边。小常见他回来了，很佩服他的热情，就先让他在铺上休息。他问敌情，铁锁告他说：“听说城里敌人退出来了，今天晚上前边汽车路上的两三个村子也住满了，恐怕天不明就会有战事，村里的担架也准备好了。”王安福道：“敌人不知道咱的军队来了吗？”铁锁道：“不知道！大队还没有到的时候，半后晌就有几十个人先来把前边的路封了，不论什么人都不准走过去。”谈了一会，王安福的儿子就来叫王安福吃饭，王安福道：“你把饭端来吧！我还想问询问别的事！”饭端来了，铁锁说：“要不你就叫老掌柜在这里睡吧，你家也住得满满的了！”王安福的儿子说：“也可以！”回去又送来一条被子。

大家忙乱了一会，正说要睡，听见外边跑来几个人，有个人问道：“村长在这里吗？”铁锁道：“在！”那人道：“你来看这是不是个好人，半夜三更绕着路往前边跑！”铁锁出去

一看是小毛，便向那个兵道：“汉奸！汉奸！维持会的狗腿！”那个兵道：“那就送旅部吧！”小毛急着哀求道：“铁锁铁锁！我我我是躲出去的！我……”那个兵说：“走吧走吧！”就拉着他走了。王安福听见是小毛说话，正要出来看，听见已经送走了，就自言自语道：“小毛！你跑得欢呀？我看你还跑不跑了！”小常、王区长也都已经知道这小毛是什么人，都知道不是冤枉他，也就不问这事，都去睡了。王安福见把小毛捉住了，顺便想起李如珍来，问了问铁锁，说是已经看守起来了，也就放心睡去。

王安福一连跑了两天路，一连两夜又都没有睡好，这天晚上，他连衣服也没有脱，一躺下去便呼呼地睡着了，直到第二天五更打第一颗炮弹才把他惊醒。他醒来，天还不明，屋里早已点着灯。小常、王区长、铁锁都不知几时就走了；才过谷雨，五更头还觉凉一点，他们把草铺上不知谁的被子又给他盖了一条。二妞不知什么时候就起来了，坐在床上。小胖孩睡在她前边也被炮弹惊醒了。二妞向王安福道：“睡不着了，王掌柜？你听！炮已经响开了，他们打仗去了。”小胖孩问道：“娘！你说谁？打什么？”二妞道：“就是说晚上住的那些兵，到汽车路上打日本鬼子去了！”接着又听见两声炮，王安福站起来道：“到外边听听去！”说着就走出去了。小胖孩向二妞道：“娘，咱们也到外边听听！”说着便穿起衣裳，跟二妞走出来。青壮年抬担架的抬担架，引路的引路，早就和军队相跟着走了。街上虽有些妇女儿童老汉们出来听炮声，可也还安静。炮声越来越密，王安福和几个好事的人跑到村外的山头上去看，因为隔着山，看不见发火的地方，只能看见天空一亮一亮的，机枪步枪的声音也能听见。起先只听见在南边一个地方响，后

来好象越响地面越宽，从正南展到西南。天明的时候，越响越热闹了，枪声炮声连成一片。不大一会，正西也响开了，和西南正南的响声都连起来，差不多有二三十里长。这时候天已大明，村里的人，凡是没有跟队伍到前边去的，都到村边的各个山头上听，直到快吃早饭的时候响声才慢慢停下来。这时候，有的回去做饭，有的仍留在山头上胡猜测。忽然西南的山沟里进来一股兵，也弄不清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大家一时慌了，各找各的藏身地方。回去做饭的人听了这消息又都跑出来了，旅部留守的同志们告诉他们说是自己的队伍回来了，才把大家都叫回去。

队伍、民夫、自卫队都陆续回来了。敌人全退了，打死好几百，还打坏四个汽车。胜利品很多：洋马、钢盔、枪械、军服、汽车上的轮子、铁柱子……，彩号没有下担架，吃过饭就转送到别处去，其余的队伍就住在这一带各村休息。

旅部把李如珍和小毛交给王区长处理，村里人一致要求枪毙，吓得他俩的家属磕头如捣蒜。后来大家又主张不杀也可以，要叫他们把全村维持敌人的损失一同包赔起来。他们两个的意见是只要不枪毙，扫地出门都可以。政府方面的意见是除赔偿损失以外，还得彻底反省，保证以后永远不再当汉奸，大家一致拥护。这样决定了以后，仍由王区长派人送到县政府处理。

县城收复了，县政府又回了城。把李如珍和小毛解到县政府以后，小毛因为怕死，反省得很彻底，把他十几年来在村里和李如珍、小喜、春喜一类人鬼鬼捣捣做的那些亏心事，拣大的都说出来了。

可惜敌人从城里退出来的时候，小喜、春喜两个人跟着卫胖子一伙人，从城里跑出来就躲到田支队去。县政府派人去要，田支队不放手，回了个公函庇护他们说，这些人是他们派到城

里维持会里作内线工作的。县政府这边，早有小毛把小喜领着土匪回村刨窑洞，又领着敌人到村烧房子、捉人、组织维持会，把春喜叫到城里当汉奸……根根底底说得明明白白的了，可是田支队死不放，交涉了几次都空回来了。田支队凭着枪杆不让步，县政府凭着真凭实据不让步。后来各做各的——田支队包庇了这些人，县政府没收了他们的家产。

李如珍和小毛在县里反省了两个月，承认了赔偿群众损失，县政府派了个科长同王区长把他两人押解回村同群众清算。按李如珍在县里算的，共给敌人送过四口猪、十头牛，不足一千斤白面，只要跟小毛两家折变一些活物就够了，还不至于大变产业，可是一回来情形就变了。县府派来的科长同王区长，叫他两个人照着在县里反省的记录再在群众大会上向群众反省一遍，小毛就仍从十几年前说起，把他们从前打仗讹人的事一同都说出来了，内中象春喜讹铁锁一样，因为一点小事弄得人家倾家败产的事就有十几件，借着村长的招牌多收多派的空头钱更不知用过多少。一提起这些旧事，更引起群众的火来，大家握着拳头瞪着眼睛非跟李如珍算老账不行。李如珍怕打，也只好应承。结果算得李如珍扫地出门还不够，还是科长替他向群众求情，才给他留了一座房子。小毛平常只是跟着他们吃吃喝喝，没有使过多少钱，并且反省得也很彻底，大家议决罚他几石小米叫自卫队受训吃。小喜、春喜的家产一律查封，等要回原人来再处理。

十 二

敌人走了，李如珍倒了，春喜、小喜走了，小毛吃过亏再也

不敢多事了，村里的工作就轰轰烈烈搞起来——成立了工农妇青各救国会、民众夜校、剧团，自卫队又重新受过训，新买了一些子弹、手榴弹……

大家也敢说话了。小喜春喜的产业有许多是霸占人家的，自被查封以后一个多月了也没有处理，有些人就要求把霸占的那一部分先发还原主，其余的候政府处理。铁锁是村长，他把大家的意见转报给王区长，区长报到县政府。

一天，王区长又到县里追这事，县长说：“这事情弄糟了，人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阎司令长官那里告上状，说县政府借故没收了他们的产业，阎司令长官来电申斥了我一顿，还叫把人家两个人的产业如数发还。”说着就取出电报来叫他看。王区长看了电报道：“这两个人在村里的行为谁都知道，并且有小毛反省的供词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怎么能抵赖得过？我看可以把那些材料一齐送上司令部去，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县长道：“我也想到这个，不过他们都是阎锡山的孝子，阎锡山是偏向他们那一面的，送上去恐怕也抵不了事。虽是这么说，还是送上去对，县政府不能跟着他们包庇汉奸，把已经有真凭实据的汉奸案翻过来。”

王区长回来把这事告给铁锁，铁锁回到村里一说，全村大乱，都嚷着说不行，也没有人召集，更坊门口的人越聚越多就开起会来。在这个会上通过由工农青妇各干部领导，到县政府请愿。第二天，果然组织起二百多人的请愿队带着干粮盘缠到县政府去。县长本来是知道实情的，见他们大家把县政府围得水泄不通，一边向他们解释，一边给阎锡山发电报。隔了两天，阎锡山回电说叫等候派员调查。

大家回来以后把材料准备现成，只等调查的人来，可是等

来等去没有消息。一个多月又过去了，倒也派来一个人，这人就是本县的卖土委员^①。这位委员来到村公所，大家也知道他是个干什么的，知道跟他说了也跟不说一样，就没心跟他去打麻烦，可是他偏要做做这个假过场，要叫村长给他召集群众谈谈话，铁锁便给他召集了个大会。会开了，他先讲话。他给小喜春喜两个人扯谎，说大家不懂军事上的内线工作，说这两个人是田支队派他们到敌人窝里调查敌人情形的。他才说到这里，白狗说：“经济委员！我可知道这回事！”经济委员只当他知道什么是内线工作，也想借他的话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就向他道：“你也知道？”又向大家道：“你们叫他说说！”白狗道：“人家小喜做内线工作是老行家！”委员插嘴道：“对嘛！”有些人只怕他不明白委员是替小喜他们扯谎再顺着委员说下去，暗暗埋怨他多嘴，只见他接着道：“真是老行家！起先在白龙山土匪里作内线工作，领着十个人回咱村来刨窑洞，一下就把福顺昌的窑洞找着了；后来到城里敌人那里作内线工作，领着敌人到咱村烧房子，一下就把福顺昌烧了个黑胡同。不是老行家，谁能做这么干净利落？”他的话没有说完，大家都笑成一片，都说：“说得真对！”委员本来早想拦住他的话，可是自己叫人家说话，马上也找不到个适当的理由再不叫说，想着想着就叫他说了那么多。白狗的话才落音，冷元就插嘴道：“那你才说了现在，还没有说从前啦，从前人家小喜……”委员道：“慢着慢着！听话！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啦！”别的人乱抢着说：

^①那时候每县住着一个卖官土的，官衔是“经济委员”，老百姓都叫他“卖土委员”。

“你没有说完白狗怎么就说起来了？”“你是来调查来了呀，是来训话来了？”“说卖土你比我知道得多，说小喜、春喜你没有我清楚！”“你比我们还清楚，还调查什么？”……后来不知道是谁喊道：“咱们都走吧，叫他一个人训吧！”这样一喊，大家轰隆隆就散了。铁锁见委员下不了台，就走到台前喊道：“委员的话还没说完啦，大家都不要走！”台下的人喊道：“没说完叫他慢慢说吧！我们没有工夫听！”喊着喊着就走远了。只有十来个人远远站住，还想看看委员怎样收场，铁锁叫他们站近一点再来听话，委员看见已经不象个样子了，便道：“算了算了！这地方的工作真是一塌糊涂，老百姓连个开会的规矩都不懂！”铁锁本来是怕他下不了台，不想他反说是村里的工作不好，铁锁就捎带着回敬他道：“山野地方的老百姓，说话都是这直来直去的，只会说个老直理，委员还得包涵着些！”

委员一肚子闷气没处使，吃过晚饭便到李如珍家里去。李如珍虽然没有地了，大烟却还没有断，知道委员也有瘾，就点起灯来让委员吸烟。委员问起小喜、春喜的事是谁向县里报告的，并且说：“县政府凭的是小毛的口供，这小毛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李如珍说：“小毛原来也是咱手下的人。”接着就把小毛的来历谈了一谈。委员叫他打发人去叫小毛，他便打发自己的儿子去叫。

小毛觉着因为自己在县里说的话太多了才弄得李如珍倾家荡产，本来早就想到李如珍那里赔个情，可是又怕村里人说他去跟李如珍捣什么鬼，因此没有敢去。白天开会的时候，他听出委员是照顾小喜、春喜的，也有心去跟委员谈谈，可是一来觉着自己的身份低，不敢高攀委员，再则村里人当面还敢给委员玩

丢人，自己当然更惹不起，因此也没有敢展翅。这时委员忽然打发人来叫他，他觉着这正是个一举两得的机会，一来能给李如珍赔个人情，二来能高攀一下委员，自然十分高兴，跟屁股底下上着弹簧一样，蹦起来就跟着来人去了。

他一进到李如珍家，见委员跟李如珍躺在一个铺上过瘾，知道是自己人了，胆子就更大了一点。李如珍向委员道：“这就是小毛！”委员看了他一眼道：“你就是小毛？坐下！”说着把腿往回一缩，给他让了一块炕沿，小毛凑到跟前就坐下了。委员道：“小毛！李先生说你很会办事，可是为什么一出了门就顾不住自己了呢？”小毛懂不得委员的意思，看了看委员道：“我好长时候了就没有出门呀？”委员笑道：“不是说这几天，是说你在县里。你在县里，给人家瞎说了些什么？”小毛见是说这个，便诉起苦来。他说：“好我的委员！那是什么时候？过命啦呀！不说由咱啦？”委员道：“你也太没有骨头了，那边过命这边不过命？牺盟会人都是共产党，县长区长都是牺盟会，自然也都是共产党。他们吃着司令长官的饭不给司令长官办事，司令长官将来要收拾他们。李继唐、李耀唐连这里的李先生都是司令长官的人。你听上共产党的话来害司令长官的人，将来司令长官收拾共产党的时候，不连你捎带了？”小毛来时本来很高兴，这会听委员这么一说，又有点怕起来，便哀求道：“委员在明处啦，我们老百姓在黑处啦！反正已经错了，那就得求委员照顾照顾啦！不是我愿跟他们跑呀，真是被他们逼得没办法！”说着就流出泪来。委员道：“你不要怕！错了就依错处来！我看你可以写个申明状，我给你带回去转送到司令长官那里，将来就没有你的事了。不只连累不了你，只要你跟李先生、继唐、耀唐都真正一心，将来他们得了势，还愁给

你找点事干？”小毛道：“委员这样照顾我，我自然感谢不尽，不过这申明状怎么写，我是个粗人，不懂这个，还得请委员指点一下。”委员道：“这个很容易，你就说他们是共产党，要实行共产，借故没收老财们的家产，才硬逼着你在人家捏造现成的口供上画了字。只要写上这么一张申明状，对你也好，对继唐他们也好。”又向李如珍道：“虚堂（李如珍的字）！我看这张申明状你给他写一写吧！”李如珍道：“可以！”小毛道：“这我真该摆酒席谢谢！委员明天不要走，让我尽尽我的孝心！”委员道：“这可不必要！你们村里共产党的耳目甚多，不要让他们说闲话。以后咱们遇事的时候多啦，这不算什么！”

这次调查就这样收场了，李如珍替小毛写的申明状，委员第二天带回去就转到阎锡山那里。村里人也知道这卖土委员回去不会给自己添什么好话，可是既然有这么一回事，也就得再等等上边的公事。

委员回去又做了一封调查报告，连李如珍替小毛写的申明状一同呈到阎锡山那里去。调查报告的大意说：这个案件完全是共产党造成的，因为小喜、春喜都是从前反共时候的干部——小喜是防共保卫团团团长，春喜是公道团团团长，因此村里县里的共党分子借着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力量给他们造成汉奸的罪名，把他们的产共了。

这时候正是八路军在山西到处打败日军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时候，阎锡山的晋绥军退到晋西南黄河边一个角落上，不打败到敌后方来，阎锡山着了急，生怕他自己派出来的干部真正跟八路军合作。决死队学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和政治领导，他以为是共产化了。在阎锡山看来，山西是他自己的天下，谁来了都应该当他的“孝子”，眼看好多地方，孝子们没有

守住，被日本人夺去；孝子们又不会收复，又被八路军收复了，他如何不着急？偏在这个时候，各地都有些受了处分的汉奸们，象春喜们那一类人，不说自己当了汉奸，硬说是人家要共他的产；被敌人吓跑了的行政人员公道团长们，不说自己怕死，硬说牺盟会勾结八路军夺取了他们的权力，都到阎那里告状。阎锡山接到这一批状子之后，觉着这些人跟共产党是生死对头，就拣那些能干一点的，打电报叫去了一批，准备训练一下作为他的新孝子，小喜、春喜两个人也在内。又打发田树梅到晋东南来把田支队这一类队伍编成独八旅，作为以后反对八路军的本钱。

小喜、春喜两家的家产被查封以后，因为没有处理，地也荒了。村里人问了县政府几回，县政府说已经又给上边去公事要小喜、春喜归案。等来等去，夏天过了，上边除没有叫他两人归案，又打电报把他两个要走了。又等来等去，敌人二次又来了，大家忙着参加战争，又把这事搁起了。不过这次李如珍、小毛那些人没有敢出头组织维持会。敌人的巡逻部队来过几次，被自卫队的冷枪打死两个人，没有走到村里就返回去了，村里没有受什么损失。后来八路军三四四旅又把敌人打跑了，村里又提起处理小喜、春喜财产的事，又到县政府去问，县政府说上边来了公事，说这两个人都是忠实干部，说小毛的口供是屈打成招，并且把小毛的申明状也附抄在公文里转回来了。

这一下更引起村里人的脾气来，马上召开了个大会，把小毛捆在会场上。有几个青年把镢头举在小毛的头上道：“仍是我们落了屈打成招的名，这会咱就屈打成招吧！你说吧！你从前的口供上哪一行是假的？”小毛只看见镢头也不敢看人，吓得半句话也说不出来。全会场的人都喊道：“叫他说！”小毛怕

不说更要挨打，就磕着头道：“都都是真的！”有个人问道：“谁叫你写申明状？”小毛道：“委委员！”又一个人道：“谁替你写的？”小毛不敢说。有个青年在他的屁股上触了一锨把，他叫了一声。大家逼住道：“快说！谁给你写的？”小毛见不说马上就活不成了，就战战兢兢道：“李李李……”头上的锨头又动了一下，他才说出李如珍来。冷元道：“委员怎么叫写申明状？他是怎么跟你说的？为什么你就愿意写？”小毛道：“不写不行！委员说那边也要过命啦！”接着就把那天晚上见委员的事又说了一遍。冷元跳上台去喊道：“都听见了吧：口供上都是真的，委员叫他写申明状，老汉奸李如珍管给他写！这里边都是些什么鬼把戏？依我说，咱们自己把小畜春喜的两份产业处理了，原来是讹人家谁的各归原主，其余的作为村里的公产！不论他什么政府，什么委员，什么长官，谁来咱们跟他谁讲理，天王爷来了也不怕他！除非他一分理也不说，派兵把咱这村子洗了！”大家一致举起拳头喊叫赞成。铁锁道：“这样处理，在咱村上看来是十二分公平的了，可是怎么往上级报啦？县里自然也知道这件事的真情，可惜一个卖土委员的调查，一个小毛的申明，把事情弄得黑白不分了，又教县里怎样往上报啦？”杨三奎老汉道：“卖土委员来了开了个会也没有叫村里人说话，在李如珍那里住了一夜，跟小毛他们鬼捣了个申明状就走了，他调查了个什么？依我说，他当委员的既然能胡捣鬼，咱们老百姓也敢告他，就说他调查得不实，叫上边再派人来重查，非把实情弄明白了不可。”大家也都赞成。白狗道：“我有个意见，小毛能给委员写假申明，就能给我们写真申明，就叫他把他那天晚上见委员那事实实在在给咱们写出来。咱们也能给阎司令长官呈上去，呈上去看他们还有什么话

说？”大家拍手道：“对！马上叫他写！”大家问小毛，小毛说他自己不会写，叫找一个人替他写。大家就举王安福。王安福这时也觉着气不平，便向大家道：“要是平常时候，写个字谁不能啦？可是这会我偏不写！一来我是村副不便写，二来他们太欺人了！办那些鬼鬼祟祟的事，有人出主意，也有人写，能写那个就不能写这个？”这句话把白狗又提醒了。白狗道：“对！咱们把李如珍抓出来叫他再替他写！叫小毛说一句他写一句，他不写咱就把他送县政府，问问他跟委员跟小毛捣些什么鬼？问问他这汉奸反省了些什么？为什么还替汉奸捏状诬赖好人？”大家又是一番赞成。年轻人已跑去把李如珍抓来了。李如珍见是叫写委员住在他家那天晚上的事，明明是自己写状告自己，哪里肯写？结果被大家拖倒打了一顿，连小毛一同送县政府去了。至于怎样处理那两家的产业，铁锁说：“完全不等上边的公事也不好，不如先把他说人家的地先退给原主种，其余的东西仍然封存起来，等把官司打到底再处理吧！”年轻人们仍主张马上处理，修福老汉道：“先把地退回原主，其余就再等一次公事吧，看这官司三次两次是到不了底的。”后来大家也都同意，就这样处理了。

以后一直等到过了年公事还没有来，仔细一打听，才有人说阎锡山逃过了黄河到陕西去了，后来就再没有消息。

十 三

春天种地的时候，村里等不来上边的公事，李如珍、小喜、春喜他们讹人家的既然经村公所发还各原主，各原主也就种上了。这一年，秋景还不很坏，被李如珍叔侄们讹得破了产的

户口，又都收了一季好秋，吃的穿的也都象个人样了。铁锁也打了二十多石粮食，小胖孩也不给人放牛了，回村里来上了学。

大家不放心的就是上边仍然没有公事，李如珍押在县里也不长不短，催了几次案，县里说：“就照你们村里那样处理吧。大概也没有什么不妥当。”最后那一次是铁锁去的，小常告铁锁说：“阎锡山最近正在秋林召集反动势力开会，准备反对咱们牺盟会和决死队这些进步势力，恐怕对你们村里小喜叔侄们要庇护到底。县里对这事不便作主，由你们村里处理了，县里不追究也就算了。”

到了阴历十一月，忽然有些中央军来村号房子，向村公所要柴要草，弄得铁锁应酬不了。第二天，队伍开来了，又是叫垫街道，又是叫修马路，全村人忙得一塌糊涂。晚上又进来一批人：头一伙里有春喜，和当日在五爷公馆那些尖嘴猴鸭脖子一类人是一伙，说是什么“精建委员”^①；第二伙里就又看见有小喜，领着一把子带手枪的人，又叫什么“突击队”^②。冷元铁锁他们一看见这伙子人，知道要出事了，背地跟牺盟会几个常出头的人商量对付他们的办法。王安福老汉说：“我看你们大家一面派人到县里问一问，一面还是先躲开不见他们，把公所的差事暂且交给我来应酬。我这么大个老汉，跟他们装聋作哑，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大家说：“明知他们来意不善，要躲大家都躲开，你何必去吃他们的亏啦？”王安福不赞成，他说：“他们真要跟我不过，死就死了吧，我还能活多大

① “精建委员”即阎锡山的一个特务团体——“精神建设委员会”的委员。

② “突击队”是阎锡山的另一个武装特务团体。

啦？”他执意不走，大家也只好由他。铁锁冷元他们十来个前头些的人，带着自卫队的枪械都躲开了，只有白狗因为秋天敌人来了，配合军队打仗带了彩，无法走开，只好在家听势。

走出去的人，逃到了王安福当日住过的岭后，打发冷元到县里问主意。冷元去了半天就回来报告道：“大事坏了！小常同志叫人家活埋了！”说着就哭起来。大家一听这句话，比响了一颗炸弹还惊人，忙问是怎么一回事。冷元哭了一会止住泪道：“前天晚上，中央军跟突击队把县政府牺盟会都包围了。里边的人，冲出去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叫人家捉住杀了一部分，现在还正捉啦。县长生死不明，小常同志叫人家活埋了！”说得大家也都跟着哭起来。问他是谁说的，他说是牺盟会逃出来的一个交通员说的。得到了这个消息，都知道家是回不得了，附近各村，也都有了中央军、精建会、突击队，大家带的干粮盘缠又不多，只好在山里转来转去。山里人问他们是哪部分，他们只说是游击队。

他们转了四五天，转到一个山庄上，碰着二妞领着十一岁的小胖孩在那里讨饭，他们便把她叫到向阳坡上问起村里的情形。二妞摆摆手道：“不讲了！没世界了！捉了一百多人，说都是共产党，刹手的刹手，刹眼的刹眼，要钱的要钱……龙王庙院里满地血，走路也在血里走。”随着就把被杀了的人数了一遍。大家听了只是摇头。冷元道：“咱们只说除咱们这十几个人别的人就不相干了，谁想象崔黑小那些连句话也不会说的人，也都叫人家害了。真是活阎王呀！”

铁锁见二妞念的那些名字里边没有王安福，就问起王安福的下落。二妞道：“他们把人家老汉捉到庙里，硬叫人家老汉说自己办过些什么坏事。老汉说：‘你们既然会杀，干脆把我

杀了就算了！我办过什么坏事？我不该救济穷人！我不该不当汉奸！别的我想不起来！你们说有什么罪就算有什么罪吧！’李如珍又回来当了村长，小毛成了村副，依他们的意思是非杀不行。后来还是他们李家户下几个老长辈跪在他们面前说：‘求你们少作些孽吧！人家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后来叫人家花五百块现洋，才算留了个活命。”

大家又问起白狗，二妞哭了。她说：“把白狗刻薄得不象人了，还不知活得了活不了啦！就是捉人那一天，小喜亲自去捉白狗。他叫白狗走，白狗的腿叫日兵打的伤还没有好，动也不能动，他就又在人家那条好腿上穿了两刺刀，裤上、袜上、床上、地上，哪里都成血涂出来的了。后来他打发两个人，把白狗血淋淋抬到庙里，把我爷爷、我爹，都捆起来。第二天，人家小喜一面杀别人，一面打发人跟巧巧说，只要她能陪人家睡一月，就可以饶他们一家人的性命。巧巧藏不住，到底被人家抢走了。他烧灰骨^①强跟人家孩睡了一夜，后来幸亏他老婆出来跟他闹了一场——他老婆不是李如珍老婆娘家的侄女吗？他惹不起，才算不再到巧巧那里去。”

铁锁又问：“你娘儿们为什么也逃出来？是不是人家也要杀你们？把咱家闹成什么样了？”二妞道：“再不用说什么家了！咱哪里还有家啦？人家说你是咱村的共产头，队伍围着村子搜了你一天，没有搜着你，人家把我娘儿们撵出来，就把咱们的门封了。衣裳、粮食，不论什么东西一点也没有拿出来。我说：‘你们叫我娘儿们往哪里去啊？’人家小喜说：‘谁管你？想死就不用走，想活啦滚得远远的！’我爷爷、我爹、我

^①奸女口头骂人的话。

娘跟村里人背地都劝我说：‘领上孩子出去逃个活命吧！不要在村里住了！他们是敢杀人的！’后来我娘儿们就跑出来了。”铁锁听了，咬了咬牙说：“也算！这倒也干净！”

别的人各人问各人家里的情形，二妞都给他们说了说，有查封了家产的，有捉去了人的，有些已经花钱了事，有些直到她出来时候还没有了结。

正说着，山头上有人喊道：“喂！你们是哪一部分？”大家抬头一看，上面站着许多兵，心里都暗惊道：“这回可糟了！”人家既问，也不得不答话，冷元便答道：“游击队！”上面又喊道：“上来一个人！”离得很近，躲又躲不开，冷元什么事也好在前头，便道：“我去！”说了把枪递给另一个人，自己就上去了。大家在下边等着，听见说话，却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停了一会，只听冷元喊道：“都上来吧！是八路军！”大家听说是八路军，都高兴得跳起来，一拥就上去了，二妞跟小胖孩也随后跟上去。这部分队伍，是八路军一个游击支队，不过二三百人，从前也在李家庄一带住过，也还有认得的人。铁锁向他们的队长说明来历后，要求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自然很欢迎，从此这伙人就参了军。

铁锁又要求队长把二妞跟小胖孩带到个安全地方，队长说：“白晋路以西、临屯路以南这一带，现在没有咱们的队伍，只有我们这几百人，还是奉命开往路东平顺县一带去的。晋城一带驻的是中央军，专门想找着消灭我们这些小部分，因此我们还不能从晋城走，还得从高平北部日军的封锁线上打过去，女人小孩恐怕不好过。”二妞向铁锁道：“你顾你吧，不用管我！我就跟我胖孩在这一带瞎混吧！胖孩到过年还可以给人家放牛，我也慢慢找着给人家做点活，饿不死！中央军跟李如珍叔侄

们又不是铁钉钉住，不动了！一旦世界再有点变动我还要回去！”

队伍休息了一会就开动了，铁锁和二妞母子们就这样分了手——二妞跟小胖孩一直看着队伍下了山。

十 四

过了年，二妞到一个一家庄上去讨饭，就找到了个落脚处。这家的主人，老两口子都有五十多岁，只有十二岁个小孩，种着顷把地，雇了两个长工，养三条牛两头驴子。二妞见人家的牲口多，问人家雇放牛孩子不雇，老汉就问起她的来历。二妞不敢以实说，只说是家里被敌人抄了，丈夫也死了，没法子才逃出来。这老汉家里也没有人做杂活，就把小胖孩留下放牲口，把二妞留下做做饭，照顾一下碾磨。

山野地方，只要敌人不来，也不打听什么时局变化，二妞母子们就这样住下来。住了一年半，到了来年夏天，因为时局变化太大了，这庄上也出了事。一天，来了一股土匪，抢了个一塌糊涂——东西就不用说，把老汉也打死了，把牲口也赶走了。出了这么大事，二妞母子们自然跟这里住不下去，就不得不另找去处。她领着小胖孩仍旧去讨饭，走到别的村子上一打听，打听中条山的中央军七个军，完全被敌人打散了，自己的家乡又成了维持敌人的村子，敌人在离村五里的地方修下炮楼，附近一百里以内的山地，哪里也是散兵，到处抢东西绑票，哪里也没有一块平静的地方。

这时候二妞就另打下主意：她想既然哪里也是一样危险，就不如回家去看看。回去一来可以看看娘家的人，二来没有中央军了，家里或者还有些破烂家具也可以卖一卖。这样一想，

她就领着小胖孩往家里走。走到离家十几里的地方，看见山路上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小胖孩眼明，早早看清是白狗和巧巧，便向二妞道：“娘！那不是我舅舅来？”二妞仔细一看，也有些象；冒叫了一声，真是白狗跟巧巧，两个人便走过来了。白狗先问二妞近一年多在哪里，怎样过。二妞同他说了一说，并把铁锁跟冷元他们十来个人参加了八路军的消息也告他说了。白狗说：“人家这些人这回倒跑对了，我们在家的人这一年多可真苦死了！”二妞看见他穿了一对白鞋，便先问道：“你给谁穿孝？”白狗道：“说那些做甚啦？这一年多，村里人还有命啦？要差、要款、要粮、要草、要柴、要壮丁……没有一天不要！一时迟慢些就说你是暗八路，故意抵抗！去年冬天派下款来，爹弄不上钱，挨了一顿打，限两天缴齐，逼得爹跳了崖……”二妞听到这里，忍不住就哭起来。白狗说着也哭起来。姐弟们哭了一会，白狗接着说：“爹死了，爷爷气得病倒了，我怕人家抓壮丁，成天装腿疼，拐着走。去年打几石粮食不够人家要，一家四口人过着年就没有吃的，吃树叶把爷爷的脸都吃肿了！”二妞又问道：“你两人这会往哪里去啦？”白狗道：“唉！事情多着啦！小喜这东西，成个长生不老精了，你走时候人家不是阎锡山的突击队长吗？后来县里区里都成了中央军派来的人了，他们看见阎锡山的招牌不行了，春喜他们那一伙又跑回阎锡山那里去；小喜就入了中央军的不知道什么工作团，每天领着些无赖混鬼们捉暗八路，到处讹钱——谁有钱谁就是暗八路，花上钱就又不是了。这次中央军叫日军打散了，人家小喜又变了——又成了日军什么报导社的人了，仍然领着人家那一伙人，到处捉暗八路、讹钱，回到村里仍要到家去麻烦。爷爷说：‘你给她找个地方躲一躲吧！实在跟这些东西败兴也

败不到底！’福顺昌老掌柜还在岭后住，我请他给找个地方，他说：‘你送来吧！’我就是去送她去！”二妞又问道：“李如珍老烧灰骨还没有死吗？”白狗道：“那也成了长生不老精了！你走时候他就又当了村长，如今又是维持会长！”二妞又问起村里没了中央军以后，自己家里是不是还留着些零星东西。白狗道：“什么都没有了！连你住的那座房子都叫人家春喜喂上骡子了！”二妞听罢道：“这我还回去做什么啦？不过既然走到这里了，我回去看看娘和爷爷！”又向小胖孩道：“胖孩，你跟你舅舅到岭后等我吧！我回去看一下就出来领你。反正家也没有了，省得叫日本人碰见了跑起来不方便！”小胖孩答应着跟白狗和巧巧去了，二妞一个人回村里去。

她一路走着，看见跟山里的情形不同了：一块一块平展展的好地，没有种着庄稼，青蒿长得一人多高；大路上也碰不上一个人走，满长的是草；远处只有几个女人小孩提着篮子拔野菜。到了村里，街上也长满了草，各家的房子塌的塌，倒的倒，门窗差不多都没有了。回到自己住过的家，说春喜喂过骡子也是以前的事，这时槽后的粪也成干的了；地上已经有人刨过几遍。残灰烂草砖头石块满地都是。走到娘家，院里也长满了青蒿乱草，只有人在草上走得灰灰的一股小道。娘在院里烧着火煮了一锅槐叶，一见二妞，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哭起来。哭了一会，母女们回到家里见了修福老汉，彼此都哭诉了一会一年多的苦处，天就黑了。家里再没有别的，关起门来吃了一顿槐叶。

槐叶吃罢了碗还没有洗，就听见外边有人凶狠狠地叫道：“开门！”二妞她娘吓了一跳道：“小喜小喜！”又推了二妞一把道：“快钻床底！”二妞也只好钻起来。小喜在外边催道：“怎么还不开？”二妞她娘道：“就去了！我睡了才又起来。”

说着给他开了门。小喜进来捏着个手电棒一晃一晃，直闯闯就往巧巧住的房子里走。二妞她娘道：“他们今天晚上不在家，往他姑姑那里去了！”小喜用电棒向门上一照，见门锁着，便怒气冲冲发话道：“不在？哄谁呀？”他拾起一块砖头砸开锁子进去搜了一下，然后就转过修福老汉这边来。他仍然用电棒满屋里照，一下照到床底，看见二妞，以为是巧巧，便嘻皮笑脸道：“出来吧出来吧！给你拿得好衣裳来了！”说着伸手把二妞拉出来。他一见是二妞，便道：“好！这可抓住暗八路了！管你是七路八路，既然是个女的，巧巧不在你就抵她这一角吧！你也是俺春喜哥看起来的美人，可惜老了一点！洗洗脸换上个衣裳我看怎么样？”说着把他带来的一个小包袱向二妞一扔。

就在这时候，外面远远地响了一声枪，接着机枪就响起来。小喜一听到机枪，就跑到门外来听。起先是一挺，后来越响越多，又添上手榴弹响，小喜撑不住气便跑出去。二妞趁他出去的机会，赶紧跑出院里来藏到蒿里。停了一会，小喜也没有回来，机枪手榴弹仍然响着。二妞慢慢从蒿里站起来，望着远处山上，见敌人的炮楼上一闪一闪的火光，到后来机枪手榴弹停了，炮楼上着起一片大火。这时二妞悄悄跑回去叫她娘出来看，她们猜看总是八路又来了。看罢了火，娘儿们又悄悄关起大门回去跟修福老汉悄悄议论着，谁也没有敢瞌睡，只怕再出什么事。

天快明了，二妞她娘向二妞道：“快趁这时候悄悄走吧！不要叫天明了小喜那东西再来找你麻烦！”二妞也怕这个，在锅里握了一把冷槐叶算干粮，悄悄开了门溜出来跑了。她出了村，天还不明，听着后边有几个人赶来，吓得她又躲进路旁的

蒿地里去。她听见三个人说着话走过来，清清楚楚可以听出是李如珍、小喜和小毛。小毛问：“有多少？”小喜说：“老八路！人很多，好几村都住满了！”李如珍道：“咱怎么不打？”小喜道：“城里的日军不上二百人，警备队不抵事……”说着就走远了，听不清楚了。二妞得了底，知道晚上猜得还不差，她恨不得把他们三个捉住缴给八路军，可惜自己是一个人，也只好让他们走开。他们走过之后，二妞且不往岭后，先回到村里去传这个消息。炮楼着火是大家都看见的事，见二妞传来这个消息，有些人到小毛和李如珍家里去看，果然见这两个人不在家了，就证明是真的。这时候，青年人们又都活动起来了，有的到炮楼上去打探，有的去邻近村子里找八路，不到早饭时候就都打听清楚了——炮楼平了，里边的日军死的死了跑的跑了，八路军把汽车路边的几个村子都住满了。村里人又都松了一口气，常关着的大门又都开了，久不见太阳的青年女人和孩子们又都到街上来了，街上长的乱草又都快被人们踏平了。

二妞吃过了槐叶，仍旧要到岭后去叫小胖孩，就起程往岭后去。路上的人也多起来了，见面都传着敌人被打跑了的消息。八路军出差的事务人员，也三三两两在路上来往。二妞走到半路，就碰上白狗、巧巧、小胖孩和王安福老汉都回来了——他们已经得到了消息。二妞也跟着返回来，白狗跑得最快，把他们三个都掉在后面。路上碰上熟人，都问白狗的腿怎么忽然不拐了，白狗说八路来了自然就不拐了。

赶二妞他们三人进到村里，白狗返回来迎住他们笑道：“来了两个熟八路！你们来看是谁？”说着已快走到更坊背后，早听着更坊门口的人乱嘈嘈的。小胖孩先跑到拐角一看，回头喊道：“娘！我爹跟冷元叔叔都回来了！”二妞跟王安福老汉听说，

也都加快了脚步绕过墙角。大家见他们来了，全场大笑道：“二妞也回来了！王掌柜也回来了！”青年人们叫的叫跳的跳，跟装足了气的皮球一样，一动就蹦起来；老年人彼此都说：“象这样，就是光吃树叶也心轻一点。”

大家让开路，二妞、小胖孩、王安福和白狗四个人从人群中穿过，挤到冷元跟铁锁旁边。他两人都握了握王安福的手，拍了拍白狗的肩膀，摸了摸小胖孩的头。铁锁和二妞见了面，因为这地方还没有夫妻们对着外人握手的习惯，只好彼此笑了笑，互相道：“你也回来了？”冷元又补了一句道：“你跟铁锁哥商量过到今天一齐回来啦？”这句话逗了个全场大笑。

王安福和白狗先问跟他两人同时出去的十几个人，别的人怎么没有回来。那十来个的家属也有些人凑来问。铁锁道：“我们参加的那一部分没有来。他们在那边都很好，有好几个都成了干部，回头我到他们各人家里去细细谈一谈。我们两个人是上级从部队里调出来回来作地方工作的——上级说我们了解这地方的情况，作起来容易一点。我们两个就分配在咱们本区工作。”王安福道：“这就好了，就又可以活两天了。”有几个青年，要求他们两个讲讲话，铁锁道：“可以！你们去召集人吧！”杨三奎老汉道：“还召集什么人啦？村里就剩这几个人了！”他两个看了一下男女老少不过百把人，连从前的一半也不够，冷元问道：“就这几个人了吗？”杨三奎道：“可不是嘛！跟你们走了一伙，中央军跟阎锡山那队伍杀了一伙，中央军又捉走一伙，日军杀了一伙，抓走一伙。逃出去多少？被人家逼死了多少？你想还能有多少？”铁锁叹了一口气道：“留下多少算多少吧！咱们就谈谈吧：前年十二月政变，国民政府给八路军下命令，叫八路军退出中条山，退出晋东南，他们派中央军把这

地方接收了。他们在这地方杀了许多抗日的人，庇护了许多汉奸，逼死了许多老百姓，后来自己又保护不了自己，被日本人打垮了，把这地方又丢给日本人来糟蹋了个不成样子。现在八路军又来了。八路军这次来跟上一次不同——不走了！要在这地方着根！就是要把这地方变成抗日根据地。我两人出去原来参加的是部队，如今被上级调到这里来做地方工作，过来以后，就分配到咱们这一区——叫我当区长，叫冷元组织农会。眼前要紧的工作是恢复政权、组织民众、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这些事自然不是说句话能做好了，咱们现在先提出些实际问题吧！”

有个青年站起来道：“我先问一句话：你说那什么国民政府再有一道命令来了，八路军还走不走了？”

铁锁道：“再有一千道命令也不走了！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人再缴给他们去杀！”

那青年道：“那我们就敢提问题了：李如珍他们那些汉奸可该着处理了吧？可不用再等阎锡山的公事了吧？”好多人都叫道：“对！数这个问题要紧！”自这个问题提出来，大家都注意起这事来了。有的说：“他们已经跑了还怎么处理？”有的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寺院。”也有些老汉们说：“稳一稳看吧，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啦？”有些明白人就反驳他们道：

“不怕他！怕抵什么事？从前谁不怕人家，人家不是一样杀吗？”铁锁道：“这算一个问题了，还有些什么问题？”虽然也还有人提出些灾荒问题、牲口问题、土匪问题，可是似乎都没有人十分注意，好象一个处理汉奸问题把别的问题都压了。铁锁、冷元看这情况，觉着就从这件事上作起，也可以动员起人来，便向大家宣布道：“大家既然说处理汉奸要紧，咱们明天

就先处理汉奸。今天天也不早了，大家就散了吧！”

宣布了散会，铁锁向冷元道：“你也该回家去看看了！”又向二妞道：“咱们也回去看看吧！”二妞半哭半笑道：“咱们还回哪里去？”王安福道：“可不是！铁锁连个家也没有了！不过如今村里的闲房子很多，有些院子连一个人也没有，随便借住他谁一座都可以！”有个青年道：“依我说，把春喜媳妇撵回她的老院里，铁锁叔就可以回他自己的院里去住！”铁锁道：“这还得等把他们的案件处理了以后再说！”又向二妞道：“我看今天晚上咱们就住在龙王庙吧！那里很宽大，一定没有人住。”别的人也说那是个好地方，里边只有老宋一个人。说到吃饭问题，王安福道：“到我那里吃吧！我孩子们吃的是树叶，可还给我老汉留着些米。”冷元、铁锁都指着自己身上的干粮袋道：“我们带着米。”大家道：“那你们就算财主了！我们都是吃树叶！”二妞道：“我连树叶也没有！”大家让了一会就走开了。

夜里，好多人都到庙里找铁锁说：“李如珍叔侄们家里，小毛家里，今天都埋藏东西。要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就要赶紧动手，迟了他们就藏完了。”铁锁说：“只要他们不倒出去，埋了还不是一样没收？”他们说：“可也是！那咱们就得下点工夫看着他们，不要让他们往外面倒。”冷元说：“那你们就组织组织吧！”他们马上组织起二三十个人来轮班站岗，一家门上给他们站了两个守卫的。

这一晚上，二妞只顾向铁锁谈她这一年多的经过，直到半夜才睡。才睡了一小会，就听得外面有人打门，起来一看，站岗的把小毛捉住了。前半夜才组织起来的二三十个人，差不多全来了，都主张先吊起来打一顿。铁锁向小毛道：“你实说吧！”

你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半夜三更回来做什么？说了省得他们打你！”小毛看见人多势众，料想不说不行，就说道：“我们出去一直跑到天黑，没有跟日军联上，走到李如珍一个熟朋友家，李如珍住下了，叫小喜去找日军，叫我回来打听这边的情形。我摸了半夜才跑到村，到门口连门也没有赶上叫，就叫他两个人把我捉住了！”铁锁道：“李如珍确实在那里住着吗？”小毛道：“在！”别的人说：“叫他领咱们去找，找不着跟他要！”有的说：“叫他领去不妥当！有人看见捉住了他，要给李如珍透了信，不就惊跑了么？不如叫他把地方说清楚，派个路熟的人领着咱们自己去找。先把他扣起来，找不着李如珍就在他一个人身上算账！”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铁锁道：“依我说这些事可以请军队帮个忙。那地方还没有工作，光去几个老百姓怕捉不回人来！”大家说：“那样更稳当些！”这事就这样决定了。铁锁跟军队一交涉，军队上拨了一班人。村里人一听说去捉李如珍，自然是人人起劲，第二天早上王安福老汉捐出一斗米来给去的人吃了一顿饱饭。等军队上的人来了，就一同起程，不到半夜，果然把李如珍捉回来了。

十 五

捉回李如珍来，事情就大了，村里人要求的是枪毙，铁锁是个区长，不便作主。县长也是随军来的，还住在部队里。县政府区公所都还没有成立起来，送也没处送，押也没处押。铁锁和村里人商量，叫把李如珍和小毛暂且由村里人看守，他去找县长。到部队上见了县长，说明捉住这两个汉奸以后群众对政府的要求。县长觉着才来到这里，先处理一个案件也好，能叫

群众知道又有抗日政权了。这样一想，他便答应就到村里去对着全村老百姓公审这两个人。

龙王庙的拜亭上设起公堂，县长坐了正位，村里公举了十个代表陪审。公举了白狗和王安福老汉代表全村作控告人，村里的全体民众站在庙院里旁听。李如珍一看这个形势，也知道没有什么便宜，便撑住气来装好汉。县长叫控告人发言，诉说李如珍的罪行。群众中有个人向白狗叫道：“白狗！不用说他以前那些讹人的事，就从中央军来了那时候算起，算到如今，看他杀了多少人，打过多少人，逼死过多少人，讹穷了多少人，逼走了多少人……”白狗道：“可以，先数杀的人吧！”接着就指名数了一遍，别人又把说漏了的补充了一些，一共是四十二个。县长问李如珍，李如珍说：“这些人杀是杀了，有的是中央军杀的，有的是突击队杀的，有的是日本人杀的，我没有亲手杀过一个。”王安福道：“你开名单，你出主意，说叫谁死谁就不得活，如今还能推到谁账上去？”有个青年喊道：“照你那么说，县政府要枪毙你，还非县长亲自动手不行？”又有人说：“怕他嘴巧啦？咱村里会说话的人都是他的证人。”李如珍料也推不过，就装好汉道：“就说成杀了你们两个人，我一条命来抵也不赔本！杀了你们四十二个，利不小了！说别的吧！这些人都是我杀的！不差！”他既然痛快承认，以后的事情就不麻烦了。控告人说一宗，他承认一宗，一会也就说完了。审罢李如珍又审小毛。小毛打的人最多，控告人一时给他数不清，就向群众道：“打跑了的且不说，现在在场的，谁挨过小毛的打都站过东边，没有挨过的留在西边！”这样一过，西边只留下几个小孩子和年轻媳妇们，差不多完全都到了东边了，数了一下，共六十八人，陪审的十个代表、当控告代表的

白狗还不在此数。白狗道：“连陪审的人带我自己一共七十九个！叫他本人看看有冒数没有？”小毛也不细看，他说：“我知道打得不少。反正是错了，也不用细数他吧！不过我可连一个人也没有害死过，叫我去捉人都是他们的主意！他们讹人家的东西我也没有分过赃，只是跟着他们吃过些东西吸过些大烟！”群众里有人喊：“跟着龙王吃贺雨就是帮凶！”“光喝一口泔水还那么威风啦，能分上东西来，你还认得你是谁啦？”

审完以后，全村人要求马上枪毙；可是这位县长不想那么办。县长是在老根据地作政权工作的。老根据地对付坏人是只要能改过就不杀。他按这个道理向大家道：“按他们的罪行，早够枪毙的资格了……”群众中有人喊道：“够了就毙，再没有别的话说！”县长道：“不过只要他能悔过……”群众乱喊起来：“可不要再说那个！他悔过也不止一次了！”“再不毙他我就不活了！”“马上毙！”“立刻毙！”县长道：“那也不能那样急呀？马上就连个枪也没有！”又有人喊：“就用县长腰里那枝手枪！”县长说没有子弹，又有人喊：“只要说他该死不该，该死没有枪还弄不死他？”县长道：“该死吧是早就该着了……”还没有等县长往下说，又有人喊：“该死拖下来打不死他？”大家喊：“拖下来！”说着一轰上去把李如珍拖下当院里来。县长和堂上的人见这情形都离了座到拜亭前边来看。只见已把李如珍拖倒，人挤成一团，也看不清怎么处理。听有的说“拉住那条腿”，有的说“脚蹬住胸口”。县长、铁锁、冷元，都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说着挤到当院里拦住众人，看了看地上已经把李如珍一条胳膊连衣服袖子撕下来，把脸扭得朝了脊背后，腿虽没有撕掉，裤裆子已撕破了。县长说：“这弄得

叫个啥？这样子真不好！”有人说：“好不好吧，反正他不得活了！”冷元道：“唉！咱们为什么不听县长的话？”有人说：“怎么不听？县长说他早就该死了！”县长道：“算了！这些人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不过这样不好，把个院子弄得血淋淋的！”白狗说：“这还算血淋淋的？人家杀我们那时候，庙里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县长又返到拜亭上，还没有坐下，又听见有人说：“小毛啦？”大家看了看，不见小毛，连县长也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了。有人进龙王殿去找，小毛见藏不住了，跟殿里跑出来抱住县长的腿死不放。他说：“县长县长！你叫我上吊好不好？”青年人们说不行，有个愣小伙子故意把李如珍那条胳膊拿过来伸到小毛脸上道：“你看这是什么？”小毛看了一眼，浑身哆嗦，连连磕头道：“县长！我我我上吊！我跳崖！”冷元看见他也实在有点可怜，便向他道：“你光难为县长有什么用呀，你就没有看看大家的脸色？”小毛听说，丢开县长的腿回头向大家磕头道：“大家爷们呀！你们不要动手！我死！我死！”大家看见他这种样子，也都没心再打他了，只说：“你知道你该死还算明白！”县长道：“大家都还下去！”又向陪审的人道：“咱们都还坐好！”庙里又象才开审时候那个样子了。县长道：“你们再不要亲自动手了！本来这两个人都够判死罪了，你们许他们悔过，才能叫他们悔；实在要要求枪毙，我也只好执行，大家千万不要亲自动手。现在的法律，再大的罪也只是个枪决，那样活活打死，就太，太不文明了。”王安福道：“县长！他们当日在庙里杀人时候，比这残忍得多，——有剜眼的，有刹手的，有剥皮的……我都差一点叫人家这样杀了！”县长道：“那是他们，我们不学他们那样子！好了，现在还有个‘小毛’，据他说的，他虽然也很凶，可是没有杀过人，大家允许他悔过不允许？”大家正喊

叫“不行”，白狗站起来喊道：“让我提个意见，我觉着留下他，他也起不了什么反！只要他能包赔咱们些损失，好好向大家赔罪，咱们就留他悔过也可以！”还没有等大家说赞成不赞成，小毛脸向外趴下一边磕头一边说：“只要大家能容我不死，叫我做什么也行！实在不能容我，也请容我寻个自尽。俗话说‘死不记仇’，只求大家叫我落个囹圄尸首，我就感恩不尽了！”说罢呜呜地哭起来。县长道：“这样吧，李如珍就算死了，小毛还让我把他带走，等成立起县政府来再处理他吧！大家看这样好不好？”青年人们似乎还不十分满意，可也没有再说什么。白狗说：“就叫县长把他带走吧！只要他还有一点改过的心，咱们何必要多杀他这一个人啦？他要没有真心改过，咱的江山咱的世界，几时还杀不了个他？”这样一说，大家也就没有什么不同意了。审判又继续下去，控告人又诉说了小喜春喜的罪行，要求通缉；又要求没收他们四家的财产，除了赔偿群众损失，救济灾难民外，其余归公。县长在堂上立刻宣布接受大家的意见。审讯以后，写了判决书，贴出布告，这案件就算完结。

村里由冷元、铁锁帮忙，组织起处理逆产委员会来处理这些汉奸财产——除把小毛的财产暂且查封等定了案再斟酌处理外，李如珍叔侄们的财产，马上就动手没收处理。他们讹人家的不动产，前二年已经处理过一次，这次仍照上次的决定各归原主。动产也都作了价，按各家损失的轻重作为赔偿费。最大的一宗，是李如珍家里存着三百来石谷子和一百二十石麦子，把这一批粮食拿出来救济了村里的赤贫户，全村人马上就都不吃槐叶了。

不几天，县政府、区公所都成立了，各地的土匪也被解决

了。各村里当过汉奸的，听说打死李如珍的事，怕群众找他们算账，都赶紧跑到县政府自首了。

在李家庄，被李如珍他们逼得逃出去的人，被中央军和日本人抓走的人，都慢慢回来了；街上的草被大家踏平了；地里的蒿也被大家拔了种成晚庄稼了。修福老汉的病也好了。二妞跟小胖孩又回到十余年前被春喜讹去的院子里去住。村政权、各教会、武委会也都成立起来，不过跟冷元、铁锁他们年纪差不多的中年人损失得太多了，村干部除了二妞是妇救会主席，白狗是武委会主任外，其余都是些青年。没收的汉奸财产余了一部分钱作为村公产，开了个合作社，大家请王安福老汉当经理。民兵帮着正规军打了几次土匪，分到了十来枝枪。龙王庙有五亩地拨给了老宋。这时候的李家庄，虽然比不上老根据地，可也象个根据地的样子了。

小毛这次悔了过，果然比前一次好得多；自动请村干部领着他到他欺负过的人们家里去赔情，自动把他作过的可是别人不知道的坏事也都讲出来。说到处理他的财产，他只要求少给他除出一点来，饿不死就好。

只有小喜、春喜两个人归不了案，春喜跟着孙楚回阎锡山那里去了就再没有回来；小喜跟着日军跑到长治去了。

十 六

李家庄自从这次成了根据地，再没有垮了，敌人“扫荡”了好几次，李家庄有了好民兵，空室清野也作得好，没有垮了。三年大旱，李家庄互助大队开渠浇地，没有垮了。蝗虫来了，李家庄组织起剿蝗队，和区里县里配合着剿灭了蝗虫，又没有垮

了。不只没有垮了，家家产粮都超过原来计划，出了许多劳动模范；合作社发展得京广杂货俱全，日用东西不用出村买；又成立了小学，成立了民众夜校，成立了剧团，龙王庙和更坊门口，每天晚上都很热闹。

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李家庄之后，李家庄全村人高兴得跟疯了一样——青年人比平常跳得高多少就不用说，象王安福、陈修福、老宋、杨三奎那么大的老汉们，也都拈着自己的白胡须说：“哈哈！咱们还没有死，就把鬼子熬败了！”

垒小了的大门又都拆开了，埋藏着的东西也都刨出来了。砖瓦窑又动了工，被敌人烧坏了的门楼屋顶都动手修理着。各家又都挂起中堂字画，摆上方桌、太师椅、箱笼、橱、柜、蜡台、镜屏……当媳妇的也都穿起才从地窖里刨出来的衣服到娘家去走走。

村里人准备趁旧历八月十五，开个庆祝胜利大会。这个会布置得很热闹，请了一台大戏，本村的剧团也要配合着演。满街悬灯结彩，展览抗战以来本村得到的胜利品。预定的程序：是十四日白天的节目是民兵技术表演——打靶、投弹、刺枪、劈刀、自由表演。十五日正式开庆祝会。十六日公祭抗战以来全村死难人员。三个晚上都演戏、看戏。

十四这天早上，胜利品就陈列起来了，十七条日本三八式步枪、三枝手枪、几十个手榴弹、一把战刀、八顶钢盔、十来件大衣；还有些皮靴、皮带、皮包、钢笔、望远镜、画片、地图……七铜八铁摆了几桌子。

早饭后，步枪打靶开始，每人打三发。打完后，算了一下成绩，全体平均是二十三环，有两个神枪手，三枪都打着红心，其中一个就是武委会主任白狗。第二项是投弹，也不错，平

均二十米达；小胖孩从小放牛时候扔石头练下工夫，扔了三十二米达，占了第一名，都夸他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其余劈刀、刺枪、自由表演，也都各有英雄。表演完了，大家都欢天喜地受奖散会。

下午戏也来了，晚上街上庙里都点起了灯，当啷当啷开了戏。年轻人们都说：“自从记事以来还数今年这八月十五过得热闹。”王安福老汉说：“你们都记不得，我在十二岁时候——就是光绪二十七年，咱村补修龙王庙，八月十五唱了一回开光^①戏，那时候也是满街挂灯，不过还没有这次过得痛快，因为那时候是李如珍他爹掌权，大家进到庙里都连句响话也不敢说。”

第二天是十五日，是正式开庆祝会的一天。早上，大家一边布置会场，一边派人到区上请铁锁、冷元回来参加。早饭以后，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铁锁跟冷元没有来。大家又等了一会，只有冷元来了。冷元说：“铁锁哥到县里去了，今天赶晌午才能回来，我给他留下了个信，叫他回来就来。”村长说：“那咱们就先开吧！”

会开了，第一个讲话的就是村长。他报告了开会意义之后，接着就讲道：“我现在先笼统谈一谈抗战以来咱们村里的工作成绩。要说把八年来村里的工作从头至尾叙说一下，恐怕多得很，三朝五日也说不完，现在咱们只要把村里的情形笼统跟以前比一比，就可以看出咱们的总成绩来了。先说政权吧：抗战以前，老百姓谁敢问一问村公所的事？大小事，哪一件不是人家李如珍说怎样就怎样？谁进得龙王庙不捏一把把汗？如今啦？哪件事不经过大家同意？哪个人到龙王庙来不是欢天喜地

^①开光就是给神像开眼睛。

的？再说村里人的生活吧：从前全村有八十多户没饭吃的赤贫户，如今一户也没有了；从前每年腊月，小户人家都是债主围门，东挪西借过不了年，如今每年腊月，都能安心到冬学里上课，到剧团里排戏，哪还有一家过不了年的？平常过日子，从前吃是甚穿是甚，如今比从前好了多少？咱们也不用自己夸，各人心里都有个数。再说坏人的转变吧：从前村里有多少烟鬼？多少赌棍？多少二流子、懒汉、小偷、破鞋？咱们也不是自己夸，这一类人，现在谁还能在咱们李家庄找出一个来？从前东家丢了东西了，西家捉住孤老了，如今啦？在地里做活，锨镢犁耙也不想往回拿，晚上睡觉，连大门也不想关，也没有奸情，也没有盗案。大家都是这样过惯了，也不觉得这算个什么事，不过你冒细细一想，在抗战以前这样子行不行？说到全村人的进步，大家都是过来人，更不用多讲：论文，不论男女都认得自己个名字；论武，不论长幼都会打几颗子弹。这样在现在看来也都是些平常事，可是在抗战以前也不行呀！我想现在单单把李如珍叔侄们那些人弄得几个来放到咱们村里，他们就活不了：讹人讹不了，哄人哄不了，打人打不了，放债没人使，卖土没人吸，放赌没人赌，串门没人要，说话没人理，他们怎么能活下去？打总说一句：这里的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了！这里的世界完全成了我们的了！可惜近几年来敌人每年还要来扰乱咱们几回，如今敌人一投降，我们更是彻底胜利了！我们八年来，把那样一个李家庄变成了这样一个李家庄，这就是我们的总成绩！”

村长讲罢了总成绩之后，武委会主任、合作社经理、各救会主席、义校教员，也都各把本部门的成绩讲了一番。冷元又讲了一讲，以下便是自由讲话。自由讲话这一项最热闹，因为

谁也是被一肚子胜利憋得吃不住，会说不会说，总要上去叫几声，一直到晌午以后还没有讲完。

就在这时候，铁锁来了，大家就让他先上台去讲。他开头第一句就说道：“我来的任务，是报告大家个坏消息！”台下大部分人都觉着奇怪了，暗想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坏消息。铁锁接着说：“日本已经投降了，为什么还有坏消息呢？”人们低声说：“你可说呀？”铁锁仍接着道：“因为日本虽然宣布了投降，蒋介石却下命令不叫日本人把枪缴给我们，又下命令叫中央军渡过黄河来打八路军。阎锡山跟驻在山西的日军成了一气，又回到太原，把小喜他们那些伪军又编成他自己的军队，叫他们换一换臂章，仍驻在原地来消灭八路军。八路军第二次来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过永远不走了吗？可是现在人家中央军要来，阎锡山军也要来，又不叫日军缴枪，你看这……”台下的人乱叫起来了：“说得他妈的倒排场，前几年他们钻在哪里来？”有人问：“上边准备怎么办？”铁锁道：“怎么办？日军的枪还要缴！谁敢来进攻咱们，咱们只有一句话：‘跟他拼！’”白狗跳上台去向铁锁道：“你不用往下讲了！要是他们想来占这地方，我管保咱村的人都是他们的死对头！”台下大喊道：“对！有他没咱，有咱没他！”白狗已经把铁锁挤到一边，自己站在正台上道：“他们来吧！咱们这几年又攒了几颗粮食了，他们再来抢来吧！这里的人还没有杀绝啦，他们再来杀吧！叫他们来做什么？叫他们给李如珍撑腰吗？叫春喜再回来讹人吗？叫小喜再到我家胡闹吗？他们来了，三爷还可以回来掘人押人打人，六太爷还可以放他的八当十，你怕他们不愿意来啦？他们来了，又得血涂龙王庙，咱们还能缩着脖子叫他们杀呀？他们也算瞎了眼了！他们只当咱们还是前几年那个样

子，只会缩着脖子挨刀。不同了！老实说，咱们也不那么好惹了！反了几年‘扫荡’，跟着八路军也攻过些城镇码头，哪个人也会放几枪了，三八式步枪也有几枝了，日本手榴弹也有几颗了，咱们就再跟上八路军跑几趟，再去缴几枝日本枪，再去会一会这些攻我们的中央军，再去请一请小喜，看这些孙子们有什么三头六臂！”台下又喊：“谁愿意去先报起名来！”又有个青年喊：“不用报名了！我看不如咱们站起队来教武委会主任挑，把不能用的挑出来，余下咱们一通去！”白狗道：“还是报一下！大家同意马上报，咱们就报起来！”

院里、台上、拜亭上，分三组写名单。写完了，三组集合起来，报名的共是五十三个。白狗看了一下，也有四十岁以上的，也有十五六岁的，也有女的——二妞、巧巧都在数。铁锁道：“这样不好领导，还得有个限制。”挑了一挑，把老的小的女的除去，还有三十七个，村干部差不多都在数。铁锁把这结果一宣布，二妞、巧巧，还有几个女的都说了话，她们说她们一定要到潞安府捉小喜。铁锁告她们说没法编制，她们说可以当看护。麻烦了一大会，大家劝她们在家领导生产照顾参战人们的家庭。

村干部都参了战，马上都补选起来了——二妞代理村长，妇救会主席换成巧巧。王安福老汉说：“这么多的参战的，应该有个人负总责来照顾他们的家庭。我除了办合作社，可以代办这件事。”

大家在这天晚上，戏也无心看了，参战的人准备行李，不参战的人帮着他们准备。

第二天，公祭死难人员的大会，还照原来的计划举行，可是又增加了个欢送参战人员大会。

就庙里的拜亭算灵棚，灵棚下设起三个灵牌：村里人时时忘不了小常同志，因此虽是公祭本村死难的人，却把小常同志供在中间。左边一个是反“扫荡”时候牺牲了的三个民兵；右边一个是被反动家伙们杀了的逼死的那几十个人。前面排了一排桌子，摆着各色祭礼，两旁挂起好多挽联。

开祭的时候，奏过了哀乐，巧巧领着两个妇女献上花圈，然后是死者家属致祭，区干部致祭，村干部领导全村民众致祭，最后是参战人员致祭。

欢送参战人员的大会会场就布置在戏台下，那边祭毕，马上一个向后转，就开起这个会来。在这个会上，自然大家都又讲了许多话，差不多都是说“现在的李家庄是拿血肉换来的，不能再被别人糟蹋了”，“我们纵不为死人报仇，也要替活人保命”。讲完了话，参战人员把胜利品里边的枪械子弹手榴弹都背挂起来，向拜亭上的灵牌敬礼作别，然后就走出龙王庙来。

村里一大群人，锣鼓喧天把他们这一小群人送到三里以外。临别的时候，各人对自己的亲属朋友都有送的话。王安福向他的子侄们说：“务必把那些坏蛋们打回去，不要叫人家来了别了我这个干老汉！”二妞向小胖孩说：“胖孩！老子英雄儿好汉，不要丢了你爹的人！见了这些坏东西们多扔几颗手榴弹！”巧巧向白狗说：“要是见了小喜，一定替我多多戳他几刺刀！”白狗说：“那忘不了，看见我腿上的伤疤，就想起他来了！”

（一九四五年）

孟祥英翻身

(现实故事)

一、老规矩加上新条件

涉县的东南角上，清漳河边，有个西皎口村，姓牛的多。离西皎口三里，有个丁岩村，姓孟的多。牛孟两家都是大族，婚姻关系世代不断。象从前女人不许提名字的时候，你想在这两村问询一个牛孟两姓的女人，很不容易问得准，因为这里的“牛门孟氏”或“孟门牛氏”太多了。孟祥英的娘家在丁岩，婆家在西皎口，也是个牛门孟氏。

不过你却不要以为他们既是世代婚姻，对对夫妻一定是很美满的，其实糟糕的也非常多。这地方是个山野地方，从前人们说：“山高皇帝远”，现在也可以说是“山高政府远”吧，离区公所还有四五十里。为这个原因，这里的风俗还和前清光绪年间差不多；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象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

孟祥英的婆婆，除了遵照那套老规矩外，还有个特别出色的地方，就是个好嘴。年轻时候外边朋友们多一点，老汉虽然不赞成，可是也惹不起她——说也说不过她，骂更骂不过

她。老汉还惹不起，媳妇如何惹得起她呢？

有村里的老规矩，再加上婆婆的好嘴，本来就够孟祥英倒霉了，可是孟祥英本身还有些倒霉的条件：第一是娘家没有人做主。孟祥英九岁的时候就死了爹娘，那时只有十三岁一个姐姐和怀抱里一个小弟弟。后来姐姐也嫁到西皎口。因为姐姐的婆家跟自己的婆家不对劲，自己出嫁时候，姐姐也没得来，结果还是自己打发自己上的轿。象这样的娘家，自己挨了打谁能给争口气呢？第二是娘家穷，买不起嫁妆。第三是离娘早，针线活学得不大好。第四是脚大。这地方见了脚大女人，跟大地方人看小脚女人一样奇怪。第五是从小当过家，遇了事好说理，不愿意马马虎虎吃婆婆的亏。这些在婆婆看来，都是些该打骂的条件。

二、哭不得

满肚冤枉的人，没有伸冤的机会，常免不了要哭，可是孟祥英连哭的机会也不多。要是娘家有个爹娘，到娘家可以哭一哭，可是孟祥英娘家只有十来岁一个小弟弟，不说不便向他哭，他哭了还得照顾他。要是两口子感情好，受了婆婆的气，晚上可以向丈夫哭一哭，可是孟祥英挨打的时候，常常是婆婆下命令丈夫执行，向他哭还不是找他再打一顿吗？

不过孟祥英也不是绝没有个哭处。姐姐跟自己是紧邻，见了姐姐可以哭；邻家有个小媳妇名叫常贞，跟自己一样挨她婆婆的打骂，见了常贞可以互相对哭；此外，家里造纸，晒纸时候独自一个人站在纸墙下，可以一边贴纸一边哭。在纸墙下哭得最多，常把个布衫衿擦得湿湿的。

有一次，另外遇了个哭的机会，就哭出事来了。一天，她一个人架着驴到碾上碾米，簸着米就哭起来，被她丈夫一个本家叔父碰见了。这个本家叔父问明了原因，随便批评了她婆婆几句，不料恰被她婆婆碰上。这位本家叔父见自己说的话已被她婆婆听见，索性借着叔嫂关系当面批评起来。婆婆怕暴露自己年轻时候的毛病，当面不敢反驳，只好用别的话岔开。

婆婆老早就怕孟祥英跟外人谈话，特别是跟年轻媳妇们谈。据她的经验，年轻媳妇们到一处，无非是互相谈论自己婆婆的短处，因此一见孟祥英跟邻家的媳妇们谈过话，总要寻个差错打骂一番。这次见她虽是跟一个男人谈，却亲自听见又偏是批评自己，因此她想：“这东西一定是每天在外边败坏我的声名，非教训她一顿不可！”按旧习惯，婆婆找媳妇的事，好象碾磨道上寻驴蹄印，步步不缺。恰巧这天孟祥英一不小心，被碾碾子碾坏了个笤帚把，婆婆借着这事骂起孟祥英的爹娘来。因为骂得太不象话了，孟祥英忍不住便答了话：

“娘！不用骂了，我给你用布补一补！”

婆婆说：“补你娘的×！”

“我跟我姐姐借个新的赔你！”

“赔你娘的×！”

补也不行，赔也不行，一直要骂“娘”，孟祥英气极了，便大胆向她说：“我娘死了多年了，现在你就是我的娘！你骂你自己吧！娘！”

“你娘的×！”

“娘！”

“你娘的×！”

“娘！娘！娘！”

婆婆不骂了。她以为媳妇顶了她，没得骂个痛快。她想：“这东西比我的嘴还硬！须得另想办法来治她！”后来果然又换了一套办法。

三、死 不 了

一天，孟祥英给丈夫补衣服，向婆婆要布，婆婆叫她向公公要。就按“老规矩”，补衣服的布也不应向公公要。孟祥英和她讲道理，说得她无言答对，她便骂起来。孟祥英理由充足，当然要和她争辩，她看这情势不能取胜，就跑到地里叫她的孩子去：

“梅妮①！你快回来呀！我管不了你那个小奶奶，你那小奶奶要把我活吃了呀！”

娘既然管不了小奶奶，梅妮就得回来摆一摆小爷爷的威风。他一回来，按“老规矩”自然用不着问什么理由，拉了一根棍子便向孟祥英打来。不过梅妮的威风却也有限——十六七岁个小孩子，比孟祥英还小一岁——孟祥英便把棍子夺过来。这一下可夺出祸来了：按“老规矩”，丈夫打老婆，老婆只能挨几下躲开，再经别人一拉，作为了事。孟祥英不但不挨，不躲，又缴了他的械，他认为这是天大一件丢人事。他气极了，拿了一把镰刀，劈头一下，把孟祥英的眉上打了个血窟窿，经人拉开以后还是血流不止。

拉架的人似乎也说梅妮不对，差不多都说：“要打打别处，为什么要打头哩？”这不过只是说打的地方不对罢了，至于究竟为什么打，却没人问，按“老规矩”，丈夫打老婆是用

①孟祥英丈夫的名字。

不着问理由的。

这一架打过之后，别人都成了没事人，各自漫散了，只有孟祥英一个人不能那么清闲。她想：满理的事，头上顶个血窟窿，也没人给说句公道话，以后人家不是想打就可以打吗？这样下去，日子长着哩，什么时候才能了结？想来想去，没有个头尾，最后想到寻死这条路上，就吞了鸦片烟。

弄来的鸦片烟太少了，喝了以后死不了，反而大吐起来。家里人发现了，灌了些洗木梳的脏水，才救过来。

婆婆说：“你爱喝鸦片多得很，我还有一罐哩，只要你能喝！”孟祥英觉着那倒也痛快，可是婆婆以后也没有拿出来。

又一次，孟祥英在地里做活，回来天黑了，婆婆不让她吃饭，丈夫不让回家。院门关了，婆婆的屋门关了，丈夫把自己的屋门也关了，孟祥英独自站在院里。邻家媳妇常贞来看她，姐姐也来看她，在院门外说了几句悄悄话，她也不敢开门。常贞和姐姐在门外低声哭，她在门里低声哭，后来她坐在屋檐下，哭着哭着就瞌睡了，一觉醒来，婆婆睡得呼啦啦的，丈夫睡得呼啦啦的，院里静静的，一天星斗明明的，衣服潮得湿湿的。

第二天早上没有吃饭，午上还没有吃饭，孟祥英又觉着活不下去了，趁着丈夫在婆婆屋里睡午觉，她便回房里上了吊。

邻家媳妇常贞又去看她，听见她公婆丈夫睡得稳稳的，以为这会总可以好好谈谈，谁知一进门见她直挺挺吊在梁上，吓得常贞大喊一声跳出来。一阵喊叫，许多人都来抢救。祥英的姐姐也来了，把尸首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救了好久，祥英又睁开了眼，见姐姐抱着自己，已经哭成个泪人了。

两次寻死，都没得死了，仍得受下去。

四、怎样当上了村干部

一九四二年，第五专署有个工作人员去西蛟口协助工作，要选个妇救会主任，村里人提出孟祥英能当，都说：“人家能说话！说话把得住理。”可是谁也不敢去向她婆婆商量。工作人员说：“我亲自去！”他一去就碰了个软钉子。孟祥英的婆婆说：“她不行！她是个半吊子，干不了！”左说左不应，右说右不应，一个“干不了”顶到底。这位老太婆为什么这样抵死不让媳妇干呢？这与村里的牛差差^①有些关系。

当磨擦专家朱怀冰部队驻在这一带时候，牛差差在村里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后来朱怀冰垮了台，保长投了敌，他又到敌人那边跟保长接过两次头；四十军驻林县时，他也去跟人家拉过关系，真是个骑门两不绝的人物。他和孟祥英婆家关系很深。当年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师，因为造纸赔了钱，把地押出去了，没有地种，种了他五亩半地。他的老婆，当年轻时候，结交下的贵客也不比孟祥英的婆婆交得少，因为互相介绍朋友，两个女人也老早就成了朋友。牛差差既是桌面上的人物，又是牛明师的地主，两个人的老婆又是多年的老朋友，因此两家往来极密切，虽然每年打下粮食是三分归牛明师七分归牛差差，可是在牛明师老两口看来，能跟人家桌面上的人物交好，总还算件很体面的事。

自从朱怀冰垮了台，这地方的政权，名义上虽然属于咱们

^①牛差差不是真名，是个已经回头的特务，因为他转变得还差，才叫他“差差”。

晋冀鲁豫边区，实际上因为“山高政府远”，老百姓的心，大部分还是跟着牛差差那伙人们的舌头转。牛差差隔几天说日本兵快来了，隔几天说四十军快来了，不论说谁来，总是要说八路军不行了。这话在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师听来，早就有点半信半疑，因为牛明师家里造纸，抗战以来纸卖不出去，八路军来了才又提倡恢复纸业，并且由公家来收买，大家才又造起来。牛明师自己造纸赚了许多钱，不上二年把押出去的地又都赎回来了。他见这二年来收买纸的都是八路军的人，以为八路军还不是真“不行”。可是一听到牛差差的谣言，他的念头就又转了，他想人家这“桌面上人”，说话一定是有根据的。孟祥英的公公对牛差差的话，虽然半信，却还有“半疑”，可是孟祥英的婆婆，便成了牛差差老婆的忠实信徒了。她不管纸卖给谁了，也不管地是怎样赎回来的。她的军师只有一个，就是牛差差老婆。牛差差老婆说“四十军快来了”，她以为不是明天是后天。牛差差老婆说“四十军来了要枪毙现在的村干部”，她想最好是先通知干部家里预备棺材。你想这样一个婆婆，怎么会赞成孟祥英当妇救会主任呢？

工作人员说了半天，见人家左说左不应，右说右不应，一个“干不了”顶到底，年轻人沉不住气，便大声说：“她干不了你就干！”这一手不想用对了，孟祥英的婆婆本来认为当村干部是件危险的事，早晚是要被四十军枪毙的。她不愿叫孟祥英干，要说是爱护媳妇，还不如说是怕连坐，所以才推三阻四，一听到工作人员叫她自己干，她急了。她想媳妇干就算要连坐，也比自己亲身干了轻得多，轻重一比较，她的话就活套得多了：“我不管，我不管！她干得了叫她干吧！”

工作人员胜利了，孟祥英从此才当了妇救会主任。

五、管不住了

当了村干部，免不了要开会。孟祥英告婆婆说：“娘！我去开会！”说了就走了。婆婆想：“这成什么话？小媳妇家开什么会？”可是不叫去又不行，怕工作人员叫自己干。她虽觉着八路军“不行了”，可是估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比八路更不行，要是公然反抗起来，明天早晨四十军不来救驾，到晌午就保不定要被工作人员带往区公所。光棍不吃眼前亏，由她去吧！

妇女也要开会，在孟祥英的婆婆脑子里是个“糊涂观念”，有心跟在后面去看看，又怕四十军来了说自己也参加过“八路派”人的会，只好不去。第二天，心不死，总得去侦察侦察一伙媳妇们开会说了些什么。她出去一调查，“娘呀！这还了得？”妇女要求解放，要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要提倡放脚，要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要上冬学……她想：这不反了？媳妇家，婆婆不许打，丈夫不许打，该叫谁来打？难道就能不打吗？二媳妇①两只脚，打着骂着还缠不小，怎么还敢再放？女人们要打起柴来担起水来还象个什么女人？不识字还管不住啦，识了字越要上天啦！……这还成个什么世界？

婆婆虽然担心，孟祥英却不十分在意，有工作人员作主，工作倒也很顺利。会也开了许多次，冬学也上了许多次。这家媳妇挨了婆婆的打，告诉孟祥英，那家媳妇受了丈夫的气，告诉孟祥英。她们告诉孟祥英，孟祥英告诉工作人员，开会、批评、斗争。

①就是指孟祥英，她的大孩子跟大媳妇在襄垣种地。

孟祥英工作越积极，婆婆调查来的材料也越多，打不得骂不得，跟梅妮说：“那东西管不住了！什么事她也要告诉工作人员！可该怎么办呀？”梅妮没法，吸一吸嘴唇，婆婆也吸一吸嘴唇。

孟祥英打回柴来了，婆婆嘴一歪，悄悄说：“圪仰圪仰^①，什么样子！”孟祥英担回水来了，婆婆嘴一歪，悄悄说：“圪仰圪仰，什么样子！”

要提倡放脚，工作人员叫孟祥英先放，孟祥英放了。婆婆噘着嘴，两只眼睛跟着孟祥英两只脚。

村里的年轻女人们，却不和孟祥英的婆婆一样，见孟祥英打柴，有些人也跟着打起来；见孟祥英担水，有些人也跟着担起来；见孟祥英放脚，有些人也跟着放了脚。男人们也不都象梅妮，也有许多进步的，牛××说：“女人们放了脚真能抵住个男人做！”牛××说：“女人们打柴担水，男人少误多少闲工！”牛××说：“牛差差常说人家八路不好，我看人家提倡的事情都很有好处！”

不论大家怎样想，孟祥英的婆婆总觉着孟祥英越来越不顺眼，打不得骂不得，一肚子气没处发作，就想找牛差差老婆开个座谈会。一天，她上地去，见牛差差老婆在前边走。她喊了一声“等等”，人家却不等她，还走得很快。她跑了几步赶上去，牛差差老婆说：“咱两家以后少来往，你不要以为你老二媳妇放了脚很时行！以后四十军来了，一定要说她是八路军的太太！你们家里跟八路有了关系了，咱可跟你们受不起那个连累！”这几句话，把孟祥英的婆婆说得从头麻到脚底。她这几

^①圪仰圪仰：形容走路没精打彩的样子。

天虽是憋了一肚子气，可还没有考虑到这个天大的危险，座谈会也不开了。赶紧找梅妮想办法。可是梅妮有什么办法呢？还不是母子两个坐到一块各人吸各人的嘴唇？

六、卖也卖不了

有一次，村里的群众要去太仓村斗争特务任二孩，牛差差们说：“去吧！任二孩是人家四十军的得劲人，谁去参加斗争，谁就得防备丢脑袋，四十军来了马上就跟他算账！”孟祥英的公公婆婆丈夫听到这话，全家着了急，虽不敢当面来劝孟祥英，可是一个个脸色都变白了，娘看看孩子，低声说：“这回可要闯大祸！”孩子看看娘，低声说：“这回可要闯大祸！”

这些怪眉怪眼，孟祥英看了也觉着有点可怕，问问别的媳妇们，也有些人说：“不去好。”孟祥英这时也拿不定主意，问工作员“不去行不行”，工作员说：“这又不强迫，不过群众还去啦，干部为什么不去？”孟祥英说不出道理来，她想：去就去吧，咱不会不说话？

她一到太仓村，见群众满满挤了一会场，比看戏时候的人还多，发言的人抢还抢不上空子。任二孩低着头，连谁的脸也不敢看。这会她的想法变了，她想：这么多的人难道都不怕枪毙，可见闯不下什么大祸。不多一会，她就领导着西咬口人喊起反对任二孩的口号来了。

开过了这次斗争会，孟祥英胆子大起来，再也不信特务们“变天”的谣言了，工作更积极起来。可是她的婆婆却和她正相反，自从孟祥英开会回来，牛差差们就跟她婆婆说：“早晚

免不了吃亏。”婆婆听见这话越觉着胆寒，费了千辛万苦，才算想了个对付孟祥英的妙法。

一天，婆婆跟梅妮的姑姑说：“这二年收成不好，家里也没有吃的，叫梅妮领上他媳妇去襄垣寻他哥哥去吧！”家里没吃的是事实，离开婆婆，孟祥英也很高兴，只是村里的工作搞起来了放不下手。晚上，孟祥英到妇女识字班去了，婆婆又跟梅妮的姑姑谈起话来。识字班用的油放在孟祥英家，孟祥英回去取油，听见她们两人的半截话。婆婆说：“领到襄垣卖了她吧，咱梅妮年轻轻的，还怕订不下个媳妇？”姑姑说：“不怕人家告诉那里的八路军？”婆婆说：“不怕！那里是老日本子占着哩！”孟祥英听了这话，才知道婆婆的高计，赶紧告诉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她没有跟你说明，你也不必追问她，你只要说这里工作放不下，不去就算了。”

孟祥英不去，婆婆也无法，白做了一番计划。

七、英雄出了头

夏天，庞炳勋、孙殿英领着四十军和新五军投了敌人，八路军又在林县把他们打垮了。牛差差们一天听说四十军新五军有几千人过了漳河往北开，正预备宣传宣传，又打听得是被八路军在日军的据点上俘虏过来的，因此才不敢声张。事实摆在眼前，他虽不声张，也封锁不住胜利的消息。村干部们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都高兴起来，大大宣传了一番，从此人心大变，就是素日信服牛差差“变天”说法的人，也都知道牛差差的“天”塌了。孟祥英在这环境好转之后，工作当然更顺利了许多。

不巧的是连年有灾荒，这个秋天更糟糕一点，一夏天不见

雨，庄稼干得差不多能点着火。到秋来谷穗象打锣锤，头上还有寸把长一条蜡捻子。玉茭不够一腿高，三亩地也收不够一箩头。秋天又一连下了几十天连阴雨，三颗粮食收割不回来，草比庄稼还长得高。

政府号召采野菜度荒，村干部们一讨论，孟祥英管组织妇女。因为秋景太坏，村里人都泄了气。有些人说：“连年没收成，反正活不了，哪有心事弄那一把树叶？”孟祥英挨门挨户劝她们，说：“死不了还得吃，”说：“过了秋天想采野菜也没有了，”说：“野菜和糠总比吃纯糠好”……她一边说，一边领着几个积极的妇女先动起手来。没粮之家，说“情愿等死”，只能算是发脾气，后来见孟祥英领的几个人满院里是野菜，也就跟着去采。孟祥英把她们组成四个组，每日分头上山，不几天，附近山上，凡是能吃的树叶都光了，都晒在这伙妇女们的院里了。本村完了到外村去，河西没了到河东去，直采到秋风扫落叶时候，算了一下总账，二十多个妇女，一共采了六万多斤。

野菜采完了，听说白草能卖一块钱一斤，孟祥英又领导妇女割白草。这一次更容易领导，家家野菜堆积如山，谁也不再准备饿死，一看见野菜就都想起孟祥英，因此孟祥英一说领导妇女割白草，这些妇女们的家里人都说：“快跟人家去割吧！这小女是有些办法的！”后来大家竟割了两万多斤，卖了两万多块钱。

从此西皎口附近各村，都佩服孟祥英能干。

八、分 家

有人说，因为孟祥英能生产度荒，婆婆丈夫都跟她好起来

了，仔细一打听，完全不确。

孟祥英采来的野菜，婆婆吃起来倒也不反对，可是不赞成她去采，说她是“勾引上一伙年轻人去放风”。“放风”这个说法，原有两个出处：从前有一种开煤窑的恶霸，花钱买死了工人①关在窑底，五天或十天放出来见一次太阳，名叫“放风”，放罢了收回去，名叫“收风”。监狱里对犯人也是这样——从屋子里放到院子里叫“放风”，从院子里锁到屋子里叫“收风”。孟祥英的婆婆也不是绝不赞成放媳妇的风——只要看孟祥英初嫁的时候也到地里收割、拔苗就是个证据。不过她想“就是放风，也得由我放由我收”。按“老规矩”，媳妇出门，要是婆婆的命令，总得按照期限回来；要是自己的请求，请得准请不准只能由婆婆决定，就是准出去，也得叫媳妇看几次脸色；要是回来得迟了，可以打、可以骂、可以不给饭吃。孟祥英要领导全村妇女，按这一套“老规矩”如何做得通？因此婆婆便觉着“此风万万放不得”了。

这种思想，不只孟祥英的婆婆有，恐怕还有几个当婆婆的也同意。牛差差老婆趁此机会造出谣言，说野菜吃了不抵事，有些婆婆就不叫媳妇去了。孟祥英为了这件事，特别召集妇女开会检查了一次，才算把这股谣言压下去。

采罢了野菜，割罢了白草，孟祥英自己总结成绩的时候，婆婆也在一边给她作另一种总结。她的总结，不是算一算孟祥英采了多少菜，割了多少草，她的总结是“媳妇越来越不象个媳妇样子了”。她的脑筋里，有个“媳妇样子”，是这样：头上梳个笤帚把，下边两只粽子脚，沏茶做饭、碾米磨面、端汤捧水、

①被买的人有了错，可以随便打死。

扫地抹桌……从早起倒尿壶到晚上铺被子，时刻不离，唤着就到；见个生人，马上躲开，要自己不宣传，外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媳妇。她自己年轻时候虽然也不全是这样，可是她觉着媳妇总该是这样。她觉着孟祥英越来越离这个“媳妇样子”越远：头上盘了个圆盘子，两只脚一天比一天大，到外边爬山过岭一天不落地，一个皎口村不够飞，还要飞到十里外，不跟自己商量着有事瞒哄工作员，反把什么事都告工作员说……她作着这个总结发了愁：“怎么办呀！打不得，骂不得，管又管不住，卖又卖不了。眼看不是家里的人了！工作员成人家的亲爹了！”好几夜没有睡觉，才算想了个好办法——分家。

婆婆请牛差差作证，跟孟祥英分了家。家分的倒还公道（不公道怕孟祥英不愿分），孟祥英夫妇分得四亩平地四亩坡地，只是没有分粮食。据婆婆说：“打得少，吃完了。”可是分开以后，丈夫又回婆婆家吃饭、睡觉，让孟祥英一个人走了个便宜。

九、孟祥英的影响出了村

分开家以后，除分了二斤萝卜条以外，只凭野菜度时光，过年时候没有一颗粮，借了合作社二斤米、五斤麦子、一斤盐。

区公所离这地方四五十里，工作上照顾不过来，得一个地方干部很不容易。象孟祥英这样一个自己能劳动又能推动别人的度荒能手，反落得被家里赶出来饿肚子，区妇救会觉着这一来太不近人情，二来也影响这地方的工作，因此向上级请准拨一点粮食帮助她，叫她在当地担任一部分区妇救会工作。

孟祥英在今年^①确实也有个区干部的作用大：

正月，大家选她为劳动英雄，来参加专署召开的劳动英雄大会。会后她回去路过太仓村，太仓妇救会主任要她讲领导妇女的经验，她说：“遇事要讲明道理，亲自动手领着干，自己先来作模范。”接着就把她领导妇女们放脚、打柴、担水、采野菜、割白草等经验谈了许多。太仓妇救主任学上她的办法，领导着村里妇女修了三里多水渠，开了十五亩荒地。二月十五，白茆村（离西皎口四十里）有个庙会，她在会上作宣传，许多村的妇女都称赞她的办法好。今年涉县七区妇女生产很积极，女劳动英雄特别多，有许多是受到孟祥英的影响才起来的。

说起她亲自做出来的成绩更出色：春天领导妇女锄麦子二百九十三亩，刨平地十二亩，坡地四十六亩。夏天打蝗虫，光割烧蝗虫的草，妇女们就割了一万八千斤。其余割麦子、串地、捞柴、剥楮条、打野菜……成绩多得很，不过这都在报上登过，我这里就不多谈了。

十、有人问

有人问：直到现在，孟祥英的丈夫和婆婆还跟孟祥英不对劲，究竟是因为什么？怕她脚大了走路太稳当吗？怕她做活太多了他们没有做的吗？怕她把地刨虚了吗？怕她把蝗虫打断了种吗？怕她把树叶采光了吗？……

答：这些还没有见他母子们宣布。

有人问：你对牛差差和孟祥英的婆婆、丈夫，都写得好象

^①就是一九四四年。

有点不恭敬，难道不许人家以后再转变吗？

答：孟祥英今年才二十三岁，以后每年开劳动英雄会都要续写一回，谁变好谁变坏，你怕明年续写不上去吗？

（一九四五年）

福 贵

福贵这个人，在村里比狗屎还臭。村里人说他第一个大毛病是手不稳：比方他走到谁院里，院里的人总要眼巴巴看着他走出大门才放心，他打谁地里走过，地里的人就得注意一下地头堰边放的烟袋衣服；谁家丢了东西，总要到他家里闲转一趟；谁家丢了牲口，总要先看看他在家不在……不过有些事大家又觉着非福贵不行：谁家死了人，要叫他去穿穿衣裳；死了小孩，也得叫他给送送；遇上埋殡死人，抬棺打墓也都离不了他。

说到庄稼活，福贵也是各路精通，一个人能抵一个半，只是没人能用得住他——身上有两毛钱就要去赌博，有时候谁家的地堰塌了大壑，任凭出双工钱，也要请他去领几天工——经他补过的壑，很不容易再塌了。可是就在用他的时候，也常常留心怕他顺便偷了什么家具。

后来因为他当了吹鼓手，他的老家长王老万要活埋他，他就偷跑了，直到去年敌人投降以后，八路军开到他村一个多月他才回来。

我们的区干部初到他村里，见他很穷，想叫他找一找穷根子，可是一打听村里人，都一致说他是那个招惹不得的坏家伙，直到好多的受苦受难的正派人翻身以后，区干部才慢慢打听出他的详细来历。

福贵长到十二岁，他爹就死了，他娘是个把家成人的人，纺花织布来养活福贵。福贵是好孩子，精干、漂亮，十二三岁就学得锄苗，十六七岁做手头活就能抵住一个大人，只是担挑上还差一点。就在这时候，他娘又给他订了个九岁的媳妇。这闺女叫银花，娘家也很穷，爹娘早就死了，哥嫂养活不了她，一订好便送过来作童养媳。不过银花进门以后却没有受折磨——福贵娘是个明白人，又没有生过闺女，因此把媳妇当闺女看待。

村里有自乐班，福贵也学会了唱戏——从小当小军^①，长大了唱正生，唱得很好。银花来了第二年正月十五去看戏，看到福贵出来，别的孩子们就围住她说：“银花！看！你女婿出来了！”说得她怪不好意思，后来惯了，也就不说那个了。

银花头几年看戏，只是小孩子看热闹；后来大了几岁，慢慢看出点意思来——倒不是懂得戏，是看见自己的男人打扮起来比谁都漂亮——每逢庙里唱自己村里的自乐班，不论怎样忙，总想去看看，嫌怕娘说，只看到福贵下了台就回来了。有一次福贵一直唱到末一场，她回来误了做饭，娘骂了一顿，她背地里只是笑。别人不留意，福贵在台上却看出她的心事来，因此误了饭也不怪她，只悄悄地笑着跟她说一句“不能早些回来？”

^①小军：跑龙套。

二

福贵长到二十三，他娘得了病，吃上东西光吐。她自己也知道好不了，东屋婶也说该早点准备，福贵也请万应堂药店的医生给看了几次，吃了几服药也不见效。

一天，福贵娘跟东屋婶说：“我看我这病也算现成了。人常说：‘吃秋不吃夏，吃夏不吃秋’，如今是七月天，秋快吃得了，恐怕今年冬天就过不去。”东屋婶截住她的话道：“嫂！不要胡思乱想吧！哪个人吃了五谷能不生灾？”福贵娘说：

“我自己的病自己明白。死我倒不怕！活了五六十岁了还死不得啦？我就只有一件心事不了：给福贵童养了个媳妇在半坡上滚①，不成一家人。这闺女也十五了，我想趁我还睁着眼给她上上头②，不论好坏也就算把我这点心尽到了。只是咱这小家人，少人没手的，麻烦你到那时候给我招呼招呼！”东屋婶满口称赞，又问了日期，答应给她尽量帮办。

七月二十六是福贵与银花结婚的日子，银花娘家哥哥也来送女。银花借东屋婶家里梳装上轿，抬在村里转了一圈，又抬回本院，下了轿往西屋去，堂屋里坐着送女客，请老家长王老万来陪。福贵娘嫌豆腐粉条不好，特别杀了一只鸡，做了个火锅四碗。

不论好坏吧，事情总算办过了。福贵和银花是从小就混熟了的，两个人很合得来，福贵娘觉着满高兴。

不过仍不出福贵娘所料，收过了秋，天气一凉病就重起来——九月里穿起棉袄，还是顶不住寒气，肚子里一吃东西就痛，

①指事情未到底。

②指姑娘结婚前，要绞脸，盘髻，当地习惯叫“上头”。

一痛就吐，眼窝也成黑的了，颧骨也露出来了。

东屋婶跟福贵说：“看你娘那病恐怕不中了，你也该准备一下了。”福贵也早看出来，就去寻王老万。

王老万说：“什么都现成。”王老万的“万应堂”是药铺带杂货，还存着几口听缺的杨木棺材。可是不论你用什么，等到积成一个数目，就得给他写文书。王老万常教训他自己的孩子说：“光生意一年能见几个钱？全要靠放债，钱赚钱比人赚钱快得多。”

将就收罢秋，穰草还没有铡，福贵娘就死了。银花是小孩子，没有经过事，光会哭。福贵也才二十三岁，比银花稍强一点，可是只顾央人抬棺木，请阴阳，顾不得照顾家里。幸亏有个东屋婶，帮着银花缝缝孝帽，挂挂白鞋，坐坐锅，赶赶面，才算把一场丧事忙乱过去。

连娶媳妇带出丧，布匹杂货钱短下王老万十几块，连棺木一共算了三十块钱，给王老万写了一张文书。

三

小家人一共四亩地，没有别的指望，怕还不了老万的钱，来年就给老万住了半个长工。银花从两条小胳膊探不着纺花车时候就学纺花，如今虽然不过十六岁，却已学成了纺织好手。小两口子每天早上起来，谁也不用催谁，就各干各的去了。

老万一共雇了四个种地伙计，老领工伙计说还数福贵，什么活一说就通。老领工前十来年是好把式，如今老了，做起吃力活来抵不住福贵，不过人家可真是通家，福贵跟人家学了好多本领。

不幸因为上一年福贵办了婚丧大事，把家里的粮食用完了，这一年一上工就借粮，一直借到割麦。十月下工的时候，老万按春天的粮价一算，工钱就完了，净欠那三十块钱的利钱十块零八毛。三十块钱的文书倒成四十块，老万念其一来是本家，二来是东家伙计，让了八毛利。

福贵从此好象两腿插进沙窝里，越圪弹越深，第四年便滚到九十多块钱了。十月里算账，连工钱带自己四亩地余下的粮食一同抵给老万还不够。

这年正月初十，银花生了头一个孩子。银花娘家只有个嫂，正月天要在家招呼客人，不能来，福贵只好在家给她熬米汤。

粮食已经给老万顶了利，过了年就没吃的。银花才生了孩子，一顿米汤只用一把米，福贵自己不能跟她吃一锅饭，又不敢把熬米汤的升把米做稠饭吃，只好把银花米汤锅里剩下的米渣子喝两口算一顿。银花见他两天没吃饭，只喝一点米渣子，心疼得很，拉住他的胳膊直哭。

四

十四那一天，自乐班要在庙里唱戏，打发人来叫福贵。福贵这时候正饿得心慌，只好推辞道：“小孩子才三四天，家里离不了人照应。”

白天对付过去了，晚上非他不行，打发人叫了几次没有叫来，叫别人顶他的角，台底下不要。有些人说：“本村唱个戏他就拿这么大的架子！抬也得把他抬来！”

东屋婶在厢房楼上听见这话，连忙喊道：“你们都不知

道！不是人家孩子的架子大！人家家里没吃的。三四天没有吃饭，只喝人家媳妇点米渣渣，哪能给咱们唱？”东屋婶这么一喊叫，台上台下都乱说：“他早不说？正月天谁还不能给他拿个馍？”东屋婶说：“这孩子脸皮薄，该不是不想说那丢人话啦？我给人家送个馍人家还嫌不好意思啦！”老万在社房里说：“再去叫吧！跟他说明，来了叫他到饭棚底吃几个油糕，社里出钱！”

问题是算解决了，社里也出几个钱，唱戏的朋友们也给他送几个馍，才供着他唱了这三天戏。

社里还有个规矩：每正月唱过戏，还给唱戏的人一些小费，不过也不多，一个人不过分上一两毛钱，福贵是个大把式，分给他三毛。

那时候还是旧社会，正月天村里断不了赌博。十七这一天前晌，他才从庙里分了三毛钱出来，一伙爱赌博的青年孩子们把他拦住，要跟他耍耍钱。他心里不净，急着要回去招呼银花，这些年轻人偏偏要留住他，有的说他撒不下老婆，有的说他舍不得三毛钱——话都说得不好听：“三毛钱是你命？”“不能给人家老婆攒体己？”说得他也不好意思走开，就跟大家跌起钱来。他是个巧人，付得住手劲，当小孩子时候，到正月天也常跟别的孩子们耍，这几年日子过得不趁心才不要了。他跟这些年轻人跌了一会，就把他们赢干了，数了数赢够一块多钱。

五

回到家，银花说：“老领工刚才来找你上工。他说正月十

五也过了，今年春浅，掌柜说叫早些上工啦！”福贵说：“住不住吧不是白受啦！咱给人家住半个，一月赚人家一块半；咱欠人家九十块，人家一月赚咱三块六，除给人家受了苦，见一月还得贴两块多。几时能贴到头？”银花说：“不住不是贴得越多吗？”福贵说：“省下些工担担挑挑还能寻个活钱。”银花说：“寻来活钱不还是给人家寻吗？这日子真不能过了呀？”福贵说：“早就不能过了，你才知道？”

他想住也是不能过，不住也是不能过，一样不能过，为什么一个活人叫他拴住？“且不给他住，先去余二斗米再说！”主意一定，向银花说明，背了个口袋便往集上去。

打村头起一个光棍家门口过，听见有人跌钱，拐进去一看，还是昨天那些青年。有一人跑来拦住他道：“你这人赌博真不老实！昨天为什么赢了就走，真不算人！”福贵说：“你输干了，叫我跟你赌嘴？”说着就回头要走，这青年死不放，一手拉着他，一手拍着自己口袋里的铜元道：“骗不了你！只要你有本事，还是你赢的！”

福贵走不了，就又跟他们跌了一会，也没有什么大输赢。这时候，外边来了个大光棍。挤到场上下了一块现洋的注，小青年谁也不敢叫他这一注，慢慢都抽了腿，只剩下四五个人。福贵正预备抽身走，刚才拉他那个青年又在他背后道：“福贵！你只能捉弄我，碰上一个大把式就把你的戏煞了！”福贵最怕人说他做什么不如人，呕着气跌了一把，恰恰跌红了，杀过一块现洋来。那人又从大兜肚里掏出两块来下在注上叫他复。他又不好意思说注太大，硬着头皮复了一把，又杀了。那人起了火，又下了五块，他战战兢兢又跌了一把，跌了两个红一个皮，码钱转到别人手里。这时候，老领工又寻他上工，他

说：“迟迟再说吧！我还不定住不住啦！”那个青年站在福贵背后向老领工道：“你不看这是什么时候？赢一把抵住受几个月，输一把抵住歇几个月，哪里还能看起那一月一块半工钱来？”老领工没有说什么走了。

隔了不大一会，一个小孩从门外跑进来叫道：“快！老村长来抓赌来了！”一句话说得全场的人，不论赌的看的，五零四散跑了个光，赶老万走到院里，一个人也不见了。

晚上，福贵买米回来，老万打发领工叫他到家，好好教训了他一番，仍叫他给自己住。他说：“住也可以，只要能借一年粮。”老万合算了一下：“四亩地打下的粮不够给自己上利，再借下粮指什么还？不合算，不如另雇个人。”这样一算，便说：“那就算了，不过去年的利还短七块，要不住就得拿出来！”福贵说：“四亩地干脆缴你吧！我种反正也打得不够给你！”

就这么简单。迟了一两天，老万便叫伙计往这地里担粪。

福贵这几年才把地堰叠得齐齐整整的，如今给人家种上了，不看见不生气，再也不愿到地里去。可是地很近，一出门总要看见，因此常钻在赌场不出来，赌不赌总要去散散心。这样一来二去，赌场也离不了福贵，手不够就要来叫他配一配。

六

福贵从此以后，在外多在家少，起先还只在村子里混，后来别的光棍也常叫上他到外村去，有时候走得远了，三月两月不回来。东屋婶跟银花说：“他再回来劝一劝他吧！人漂流的时候长了，就不能受苦了！”银花有一回真来劝他，他说：“受不受都一样，反正是个光！”

他有了钱也常买些好东西给银花跟孩子吃，输了钱任凭饿几天也不回来剥削银花。他常说他干的不是正事，不愿叫老婆孩子跟他受累。银花也知道他心上不痛快，见他回来常是顺着他，也知道靠他养活靠不住，只能靠自己的两只手养活自己 and 小孩。自己纺织没钱买棉花，只好给别人做，赚个手工钱。

有一年冬天，银花快要生第二个小孩，给人家纺织赚了一匹布。自己舍不得用，省下叫换米熬米汤，恰巧这时候福贵回来了。他在外边输了钱，把棉衣也输了，十冬腊月穿件破衣衫，银花实在过意不去，把布给他穿了。

腊月二十银花又生了个孩子，还跟第一次一样，家里没有一颗粮，自己没米熬米汤，大孩子四岁了，一直叫肚饿，福贵也饿得肚里呱呱叫。银花说：“你拿上个升，到前院堂屋支他一升米，就说我迟两天给他纺花！”福贵去了，因为这几年混得招牌不正，人家怕他是捣鬼，推说没有碾出来。听着西屋的媳妇哭，她婆婆揭起帘低低叫道：“福贵！来！”福贵走到跟前，那老婆婆说：“有点小事叫你办办吧，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福贵问她是什么事，她才说是她的小孙女死了，叫福贵去送送。福贵可还没有干过这一手，猛一听了觉着这老婆太欺负人，“这些事怎么也敢叫我干？”他想这么顶回去，可是又没说出口。那老婆见他迟疑就又追道：“去不去？去吧！这怕甚啦？不比你去借米强？”他又想想倒也对：自己混得连一升米也不值了，还说什么面子？他没有答话，走进西屋里，一会就挟了个破席片卷子出去了。他找着背道走，生怕碰上人。在村里没有碰着谁，走出村来，偷偷往回看了一下，村边有几个人一边望着他一边咕咕呱呱谈论着。他没有看清楚是谁，也没有听清楚是说什么，只听着福贵长福贵短。这时候，他躲也没

处躲，席卷也没处藏，半路又不能扔了，只有快快跑。

这次赚了二升米，可是自这次也做成了门市，谁家死了孩子也去叫他，青年们互相骂着玩，也好说：“你不行了，叫福贵挟出去吧！”

来年正月里唱戏，人家也不要他了，都嫌跟他在一块丢人，另换了个新把式。

七

人混得没了脸，遇事也就不很讲究了：秋头夏季饿得没了法，偷谁个南瓜找谁个萝卜，有人碰上了，骂几句板着脸受，打几下抱着头挨，不管脸不脸，能吃上就算。

有一年秋后，老万的亲家来了，说福贵偷了他村里人的胡萝卜，罚了二十块钱，扣在他村村公所。消息传到银花耳朵里，银花去求老万说情。其实老万的亲家就是来打听福贵家里还有产业没有，有就叫老万给他答应住这笔账，没有就准备把他送到县里去。老万觉着他的四亩地虽交给了自己，究竟还没有倒成死契，况且还有两座房，二十块钱还不成问题，这闲事还可以管管，便对银花说：“你回去吧！家倒累家，户倒累户，逢上这些子弟，有什么办法？”钱也答应住了，人也放回来了，四亩地和三间堂房，死契写给了老万。

写过了契，老万和本家一商量，要教训这个败家子。晚上王家户下来了二十多个人，把福贵绑在门外的槐树上，老万发命令：“打！”水蘸麻绳打了福贵满身红龙。福贵象杀猪一样干叫喊，银花跪在老万面前死祷告。

福贵挨了这顿打，养了一月伤，把银花半年来省下的二斗

多米也吃完了。

八

伤养好了，银花说：“以后不要到外面跑吧！你看怕不怕？”他说：“不跑吃什么！”银花也想不出办法，没说的，只能流两眼泪。

这年冬天他又出去了。这次不论比哪一次也强，不上一个月工夫，回来衣裳也换了，又给银花送回五块钱来。银花问他怎样弄来的，他说：“这你不用问！”银花也就不问了，把这几块钱，买了些米，又给孩子换换季。

村里的人见福贵的孩子换了新衣裳，见银花一向不到别人家里支米，断定福贵一定是做了大案。丢了银钱的，失了牲口的，都猜疑是他。

来年正月，城里一位大士绅出殡，给王老万发了一张讣闻。老万去城里吊丧，听吹鼓手们唱侍宴戏，声音好象福贵。酒席快完，两个吹鼓手来谢宾，老万看见有一个是福贵。福贵也看见席上有老万。赶紧把脸扭过一边。

丧事完了，老万和福贵各自回家。福贵除分了几块钱，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老万觉着这福贵却非除去不可。

这天晚上，老万召集起王家户下有点面子的人来道：“福贵这东西真是活够了！竟敢在城里当起吹鼓手来！叫人家知道了，咱王家户下的人哪还有脸见人呀？一坟一祖的，这堆狗屎涂到咱姓王的头上，谁也洗不清！你们大家想想这这这叫怎么办啦？”这地方人，最讲究门第清，叫吹鼓手是“忘八”“龟孙子”，因此一听这句话，都起了火，有的喊“打死”，有的

喊“活埋”。

人多了做事不密，东屋婶不知道怎么打听着了，悄悄告诉了银花，银花跟福贵一说，福贵连夜偷跑了。

自那次走后，七八年没音信，银花只守着两个孩子过。大孩子十五了，给邻家放牛，别的孩子们常骂他是小忘八羔子。

福贵走后不到一年日本人就把这地方占了。有人劝银花说：“不如再找个主吧！盼福贵还有什么盼头？”银花不肯。有人说：“世界上再没有人了，你一定要守个忘八贼汉赌博光棍啦？”银花说：“是你们不摸内情，俺那个汉不是坏人！”

区干部打听清楚福贵的来历，便同村农会主席和他去谈话。农会主席说：“老万的账已经算过了，凡是霸占人家的东西都给人家退了，可是你也是个受剥削的，没有翻了身。我们村干部昨天跟区上的同志商量了一下，打算把咱村里庙产给你拨几亩叫你种，你看好不好？”福贵跳起来道：“那些都是小事！我不要求别的。要求跟我老万家长对看大众告诉告诉，出出这一肚子忘八气！”区干部和农会主席都答应了。

晚上，借冬学的时间，农会主席报告了开会的意义，有些古脑筋的人们很不高兴，不愿意跟忘八在一个会上开会。福贵不管这些人愿意不愿意，就发起言来：

“众位老爷们：我回来半个月了，很想找个人谈谈话，可是大家都怕沾上我这忘八气——只要我跟哪里一站，别的人就都躲开了。对不住！今天晚上我要跟我老万家长领领教，请大家从旁听一听。不用怕！解放区早就没有忘八制度了，咱这里虽是新解放区，将来也一样。老万爷！我仍要叫你‘爷’！逢着这种忘八子弟你就得受点累！咱爷们这眼很清楚：我欠你的是三十块钱，两石多谷；我给你的，是三间房、四亩地、还给你

住过五年长工。不过你不要怕！我不是跟你算这个！我是想叫你说说我究竟是好人呀是坏人？”

老万闷了一会，看看大家，又看看福贵道：“这都是气话，你跟我有什么过不去可以直说！我从前剥削过人家的都包赔过了，只剩你这一户了，还不能清理清理？你不要看我没地了，大家还给我留着个铺子啦！”

福贵道：“老家长！我不是说气话！我不要你包赔我什么，只要你说，我是什么人！你不说我自己说：我从小不能算坏孩子！一直长到二十八岁，没有干过一点胡事！”许多老人都说：“对！实话！”福贵接着说：“后来坏了！赌博、偷人、当忘八……什么丢人事我都干！我知道我的错，这不是什么光荣事！我已经在别处反省过了。可是照你当日说的那种好人我实在不能当！照你给我作的计划，每年给你住上半个长工，再种上我的四亩地，到年头算账，把我的工钱和地里打的粮食都给你顶了利，叫我的老婆孩子饿肚。一年又一年，到死为止。你想想我为什么要当这样好人啦？我赌博因为饿肚，我做贼也是因为饿肚，我当忘八还是因为饿肚！我饿肚是为什么啦？因为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十来块钱杂货，怕还不了你，给你住了五年长工，没有抵得了这笔账，结果把四亩地缴给你，我才饿起肚来！我从二十九岁坏起，坏了六年，挨的打、受的气、流的泪、饿的肚，谁数得清呀？直到今年，大家还说我是坏人，躲着我走，叫我的孩子是‘忘八羔子’，这都是你老人家的恩典呀！幸而没有叫你把我活埋了，我跑到辽县去讨饭，在那里仍是赌博、偷人，只是因为日本人打进来了，大家顾不上取乐，才算没有再当忘八！后来那地方成了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政府在那里改造流氓、懒汉、小偷，把我组织到难

民组里到山里去开地。从这时起，我又有地种了、有房住了、有饭吃了，只是不敢回来看我那受苦受难的孩子老婆！这七八年来，虽然也没有攒下什么家当，也买了一头牛，攒下一窑谷，一大窑子山药蛋。我这次回来，原是用来搬我的孩子老婆，本没有心事来和你算账，可是回来以后，看见大家也不知道怕我偷他们，也不知道是怕沾上我这个忘八气，总是不敢跟我说句话。我想就这样不明不白走了，我这个坏蛋名字，还不知道要传流到几时，因此我想请你老人家向大家解释解释，看我究竟算一种什么人！看这个坏蛋责任应该谁负？”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催 粮 差

抗战以前，还没有咱们解放区这统一累进税制度，征收田赋，还是用前清的粮银制，俗话叫“完粮”，也叫“点粮”。每年两次，夏秋各一半。

每次开了征以后不几天，县政府就把未来完粮的户口，随便挑一些，写成一张单子，并且出一张拘人的票，把单子粘在后边，派个差人出来走一趟，俗话叫催粮。要从票上看起来，有些很厉害的话，什么“……拖延不缴，殊属玩忽，着即拘究……”好象是犯了什么了不起的大罪，不过除了一年只进两回城的乡下人，谁也知道这不过是个样子，有势头的先生们根本不理；大村大镇的人们要是没有多走过衙门的，面生一点也只不过管一顿饭或者送一顿饭钱，只有荒僻山庄，才能有一点油水。可是这种名单上写的都是前几辈子的死人名字，又查不出有没有山庄上的户口（在县政府的粮册上改个名字，要写推收帖子，还要花些小费，因此除了买卖田地外，上世人死了也不去改名字）。

县政府的司法警察，不欢迎这催粮的差使，因为比起人命、盗窃、烟赌……等刑事案件来，弄钱又不多，跑路又太多。别的票子发下来，你争我夺抢不到手；这催粮票子发了来，写到谁名下谁也推不出。

崔九孩当了一辈差（司法警察），在那年虽是五十多了可还能说能跑。有一次南乡的催粮差使派到他头上，他不想去

——虽然能说能跑，可总得有点油水跑得才有劲——差使多了跑不过来，本来可以临时雇人；他虽不是跑不过来，可是不想去，好在有这雇人的例子，就雇个人吧！

他雇了煎饼铺里一个伙计。这人是从镇上来的，才到城里没有几天，虽说没有催过粮，可是见过别的差人到他家去催粮。他觉着这事也没有什么不好办——按单找户口、吃饭、要盘费。这有什么难办？他答应了，九孩就把票子、铁绳、锁子和自己的藤条手杖都交给他。

走路比卖煎饼还轻快，不慌不忙走了十五里，取出票来看看，眼前村子里有一户叫张天锡。他走进了村，到村公所一打听，村警说：“催粮啦？张天锡是张局长的老爷爷，早就不在了。”他又问村警说：“他住在哪一院？”村警说：“在南头槐树底那黑漆大门里。去不去吧……”

听这口气，好象说“去也扯淡”。他又问：“他家没有人？”村警说：“二先生在家啦！”他听说有人，也就不再往下问。他想：不管几先生吧，票上有他的名字，他还能叫我空着走？主意一定，出了村公所，往二先生家里来。

到了村南头，找着了槐树，又找着黑漆大门，一进去就有个大白花狗叫起来。有个人正担着水在院里浇花，见他进去，便挡住狗问他是哪里来的。他说从城里来。那人又问：“送信吗？”他说：“不是！有个事啦！”

二先生在家里听见了，隔着窗问：“什么事？”说着就到门边，揭开竹帘用手一点说：“过来，我问问你！”他便走到门边。二先生问：“说吧！什么事？是不是财政局打发你来的？”他说：“不是！我是催粮的！”二先生问：“催粮的？给我捎着信啦？”他说：“没有！”二先生说：“那你来做什

么？”他说：“票上有你的名字。”二先生看了看他，又问：“你是新来的吧？”他说：“是！”二先生摇了一下头，似乎笑了一笑说：“去吧！我已经打发人点粮去了！”

他觉得奇怪了。他想：这先生怎么这样不讲面子？不给钱吧也不管顿饭？不管饭吧连屋子里也不叫进去坐坐？他还没有想完，二先生追他道：“走吧！”说了就放下帘子把头缩回去。他生了气，就向着门里喊道：“这是拘票啊！”二先生也生了气，隔着门叹气道：“哪这么不通窍的差人来！”又揭开帘道：“你叫什么名？”他更气极了：“我拿着票找你找错了？”浇花那个人也赶上阶台，推了他一把道：“你这人真不识高低！跟二先生说话还敢那么喊叫？”白花狗也夹搀在中间叫起来。

二先生这会可真生了气：“我没有见过票，拿出来我看！”他在这种局面下，一时拿不定主意，也不知是拿票好还是不拿好。浇花的劝他赶紧走开算了，可是二先生认真要他取出票来，他也只好取出来。

二先生不是没有见过票，他是要看看这差人叫什么名字。二先生一看见崔九孩这个名字便问道：“你就是崔九孩？”他拿着票，也只好顶住这个名，便答道：“是！”才说出个“是”字来，就挨了二先生一耳光。二先生说：“回去吧！叫崔九孩亲自来拿票来！”

看样子是不便再商量了，只好返回城里去。来回跑了三十里，吃了一个耳光，满肚冤枉向崔九孩去诉苦。崔九孩问明了原因，便叹气道：“谁叫你到他那里去？算了算了！这是我的路途债，非自己去跑一趟不行！你挨了打还不算到底，我还得给人家说好话赔情去，要不，连票也拿不出来了！”

他满以为回来见了崔九孩可以给自己拿个主意，谁知崔

九孩也这么稀松？他便问道：“这家有多大势头？”崔九孩道：

“势头也不大，只是咱惹不起：他哥哥就是现在咱县财政局的张局长，咱得伺候人家；他从前不记得在哪县当过秘书，这几年在地方上当土绅，给别人包揽官司，常到城里来，来了住在财政局，咱还不是伺候人家？算了！你回去歇歇吧！还是得我去！”他听了这番话，也只好忍气回去卖他的煎饼，把铁绳、锁子、手杖等原物交还。崔九孩吃了午饭，仍然取上他出门的那一套便来找二先生赔情要票。

二先生家是他常去的——送信、捎东西，虽不是法警分内的事，可是局长说出来就得去——路是熟的，不用打听，一直跑到二先生院子里。

爬到玻璃窗子上一看，二先生跟他老婆躺在烟灯旁边摇扇子。他嬉皮笑脸揭开帘子道：“二爷！我来给你老人家赔情来了！”说了就嘻嘻笑着，走进来蹲到窗下。二先生看见是他，冷冷道：“九孩！我当你的腿折了！”九孩道：“可不敢叫折了！折了还怎么给你老人家赔情来啦！嘻嘻……”二先生老婆也瞥着笑了，只有二先生没有笑。二先生似乎要说什么，可是没有开口，先提起磁壶倒了半杯冷茶喝了。

“二爷，我给你冲去！”崔九孩一躬身站起来，提起磁壶到厨房冲了壶茶。

当他冲茶回来，看见二先生跟他老婆都笑着，他觉着事情已经解决了。他知道二先生也不把这事情当成一回事跟自己生气，只要一高兴就不跟他们这些人计较了。他恭恭敬敬给二先生夫妇一人倒了一杯茶，然后仍蹲到自己的原地方看风色。

二先生老婆笑着说：“老九孩！你怎么弄了那么个替死鬼？差一点把你二爷拴上走！”

九孩说：“不用说他了，太太！都只怨我！我不该偷懒！二爷知道，催粮是苦差！我老了，不想多跑，才雇了那么一个人。”

二先生也开了口：“雇人也看是什么人啦！象那样一个土包子，一点礼体也没有，要对上个外面来的客人，那象个什么样子？”崔九孩自然是一溜“是”字答应下去。答应完了，又道：“二爷！不要计较他！都是我的过！你骂我两句好了！”他停了一下，见二先生没有说什么，就请求道：“我走吧二爷？”二先生道：“走吧！票在桌上那书夹子里！”

他从书夹子里翻出票来看一看问道：“二爷！这村里有一户叫孙二则的住在哪里？”二先生道：“那是个种山地的，住在红沙岭！你到外边打听路吧！那可能给你赶个盘费！你们这些人还不是一进了山，就为了王了？”九孩笑道：“对对对！二爷是明白人！——二爷！再把你老人家的烟灰给我寻些喝吧？”二爷说：“迟早讨要不够！”说着拆开个大纸包给他抓了一把。

崔九孩辞了二先生，在村里问过了过红沙岭的路，喝一点烟灰，便望着红沙岭走。快到上山的地方，他拿出一付红玻璃眼镜戴上。这眼镜戴上不如不戴，玻璃也不平、颜色又红得刺眼，直直一棵树能看成一条曲曲弯弯的红蛇；齐齐一座房能看成一堵高高的红墙。他到大村镇不敢戴，戴上怕人说笑话；一进了山一定要戴，戴上了能吓住人。一根藤手杖，再配上这付眼镜，他觉着够味了。五六里山路他一点也不觉着累——一来喝上了大烟灰，二来有钱可取——越走越有劲，太阳不落就赶到红沙岭。

红沙岭这个山庄，只有七家人——三家姓孙的，四家姓刘的，都是前两辈子从河南来的开荒地的。老邻长六十多了，姓

刘，念过《百家姓》和《四言杂字》，其余的人除了写借约时候画个十字，就再不动笔。

他一到庄上，有三只狗一齐向他扑来，他用一条手杖四面招架，差一点吃了亏。孩子们出来给他挡住狗，他便问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道：“邻长住在哪里？”女孩说：“在这里，我领你去！”他就跟着这女孩找着了邻长。

他问：“你就是邻长？”刘老汉点点头，问他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从城里来的。你这庄上有个孙二则？”

“早就去世了！”

“他没有后代？”

“有！有个孙孙名叫甲午。”

“在哪里住？”

“上地了！”又向那个小女道：“黑女！去叫你爹！”黑女答应了一声跑出去。

刘老汉把崔九孩让到家里喝水，问是什么事。九孩喝了一碗水，冷冷答道：“有点闲事！”刘老汉也无法再问，崔九孩也撑住气不说，只是吸烟喝水。

一会，黑女跑来，领着一个人，赤着脊背，肩上背着件破小布衫，手里提着一顶草帽，一进门就问刘老汉道：“大伯！有人找我？”

九孩问刘老汉道：“这就是孙甲午？”

刘老汉答道：“就是！”

九孩再不往下问，掏出小铁绳来套在甲午的脖子上，用小铁锁崩的一声锁住。甲午和刘老汉都吃了一惊。黑女看了几眼，虽说不认得是什么事，可也觉着不对，扭头跑了。

刘老汉问道：“老头！究竟是怎么回事？”

九孩道：“不忙！有票！”说着用脚踩住铁绳头，掏出票来，花啦花啦念道：“查本年度下忙粮银业已开征多日，乃有单列各户，迁延不缴，殊属顽忽之至，着即拘案讯究，以儆效尤。切切此票。”又从单上指出孙二则的名字道：“这是你爷爷的名字吧？”甲午不识字，刘老汉看了半天道：“是倒是！……”

才念了票，甲午老婆和黑女都哭着跑来。甲午老婆看了看甲午，向刘老汉哭道：“大伯！这这叫怎么过呀！黑女她爹闯下什么祸了？”刘老汉道：“没有什么祸，粮缴得迟了。”甲午老婆也不懂粮缴得迟了犯什么罪，只歪着头看甲午脖子上那把铁锁。

九孩把票折好包起来，就牵住铁绳向刘老汉道：“老邻长，你在吧！我把他带走了！”又把绳一拉向甲午道：“走吧！”说着就向门外走。

甲午老婆和黑女都急了，哇一声一齐哭出来。

刘老汉总还算有点经验，便抢了几步到门外拦住道：“老头不要急！天也黑了！就住这里吧！人我保住，要说到一点什么小意思啦，也不要紧，总要打发你喜喜欢欢地起身啦！”又向甲午老婆道：“不要哭了！回去给人家老头做些饭！”九孩道：“倒不是说那个！今年不比往年，粮太紧！”虽是这么说，却又返回去坐下了。甲午老婆见暂且不走了，就向刘老汉道：“大伯！这事可全凭你啦呀！我回去做饭去。”说了就拉着黑女回去了。

刘老汉又向九孩道：“老头！我保住，你暂且把他放开吧？他是一手人，借个钱跑个路都得他亲自去。”

九孩见这老汉还能说几句，要是叫他保住，他随便给弄个块二八毛钱，又把原人弄个不见面，难道真能把他这保人带走？他想这人放不得，便道：“人是不能放呀！住一夜倒可以。”刘老汉道：“不放也不要紧。你也累了，到炕上来随便歇歇，咱们慢慢商量！”九孩便把甲午拴到桌腿上，躺到炕上去休息。刘老汉见他躺下了便向他道：“你且躺一下，我给你看饭去！”

刘老汉到了甲午家，天也黑了，庄上人都都回来了，都挤在甲午家里话弄这件事。刘老汉一进去，大家都围着来问情形。

刘老汉说：“不怕！他不过想吃几个钱，祭送祭送^①就没事了。”甲午老婆问：“不知道得几个钱？”刘老汉道：“要在村里给一顿饭钱就能打发走；到咱这山庄上还不是尽力撑啦吗？你们不要多到他跟前哭闹，只要三两个人来回跑跑路，里外商量商量，要叫他看见咱不十分着急，才能省个钱。”大家又选了两个会说话的人跟刘老汉一同去，都向刘老汉说：“大伯的见识高，这会全凭你啦！”

饭成了，做了一大锅，准备请大家都吃一些，可是有好多人不吃，都说“小家人吃不住这样破费”。

九孩吃过饭，刘老汉他们背地咬着甲午的耳朵给他出了些主意。又问了他一个数目。有个青年去借了一块现洋递给刘老汉。刘老汉拿着钱向九孩道：“本来想给老头多借几个盘费，不过甲午这小家人，手头实在不宽裕，送老头这一块茶钱吧！”

一块钱那时候可以买二斗米，数目也不算小，可是住衙门的这些人，到了山庄上，就看不起这个来了。他说：“小家人

^①乡下人迷信鬼神，得了病送鬼叫“祭送”。

叫他省个钱吧！不用！我也不在乎这块二八毛。带他到县里也没有多大要紧，不过多住几天。”

庄稼人最怕叫他在忙时候误几天工，不说甲午，别人也替他着急了。那个青年又跟甲午咬着耳朵说了一会话，又去借了两块钱，九孩还不愿意。一直熬到半夜多，钱已经借来五块了，九孩仍不接。甲午看见五块钱摆在桌上，有点眼红了，便说：“大伯！你们大家也不要作难了，借人家那么些钱我指什么还人家啦？我的事还是只苦我吧！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把钱都还了人家吧！明天我去就算了！”

九孩接着道：“对！人家甲午有种！不怕事！你们大家管人家做甚？”说了又躺下自言自语道：“怕你小伙子硬笨啦？罪也是难受着啦！一进去还不是先揍一顿板子？”

甲午道：“那有什么法？没钱人还不是由人家摆弄啦？”

刘老汉也趁势推道：“实在不行也只好有你们的事在！”把桌上的几块钱一收拾，捏在自己手里向那个借钱的青年一伸。青年伸手去接，刘老汉可没有立刻递给他，顺便扭头轻轻问九孩道：“老头！真不行吗？”

九孩看见再要不答应，五块现银洋咣啷一声就掉在那个青年手里跑了，就赶紧改口道：“要不是看在你老邻长面子上的话，可真是不行！”刘老汉见他改了口，又把钱转递到他手里道：“要你被屈！”九孩接住钱又笑回道：“这我可爱财了！”

九孩把手往衣袋里一塞，装进了大洋，掏出钥匙来，开了锁，解了铁绳，把甲午放出。

第二天早上，崔九孩又到别处催粮，孙甲午到集上去糶米。

（一九四六年）

小 经 理

小经理叫三喜，是村里合作社的经理。说他“小”，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他的年纪小，才二十三岁；第二是小村子的小合作社，只有一个经理和一个掌柜；第三是掌柜王忠瞧不起他——有人找掌柜谈什么生意里边的问题，掌柜常好说：“不很清楚就回来问一问俺那小经理。”说了就吐一吐舌头做个鬼脸。

这三喜从小就是个伶俐孩子，爱做个巧活：过年过节，搭个彩棚，糊个花灯，比别人玩得高；说个话，编个歌，都是出口成章，非常得劲；什么活一看就懂，木匠、石匠、铁匠缺了人他都能配手；村里人都说他是“百家子弟”。因为家穷，从小没有念过书，不识字，长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问个字，也认了好多。不过字太多了，学起来跟学别的不一样，他东问西问，数起数来也认了好几百，可是一翻开书，自己认得的那些字都不集中，一张上碰不到几个；这是他最不满意的一件事。

三喜入共产党，只比他当经理早三天。这村是个自然村，只有四个党员，算是一小组，附在行政村的村支部。八月间，村里开斗争会，斗争合作社的旧经理张太，三喜出力不小，支部就把他收为党员。

原来这张太是个放高利贷起家的，抗战以前在村里开了个小杂货铺。说“杂货铺”只是个名，常是要啥没啥。卖的东西比集市上贵一半，没人买。张太根本不凭卖货赚钱，就凭的是放债。村里的穷人们，一到秋夏季和年关，都得到他铺里去送

利，穷人们谈起家常话来，都说：“穷就穷到那小铺里，把咱们的家当慢慢都给人家送进去了。”一到抗战时期，张太看见风头不对，把门一关，光收不放，几个月的功夫就把收得动的债都收回去。一九四二年实行减租减息，张太就只剩了一些收不起来的账尾巴，送了个空头人情，说“本利全让”，有些人还以为人家很开明，叫人家当本村合作社经理。人家当了经理以后，光人家一家的股本比一村人的股还多，生意好象又成了人家的，人家拣赚钱的买卖干，村里人仍是要啥没啥，村里人对这事不满意了好几年，直到去年八月才又翻起来。翻起这事来以后，三喜连觉也睡不着，又是找干部，又是找群众，发动东家，发动西家；搜材料，找证据，讲道理，喊口号，天天有他，场场有他。赶斗倒了张太，共产党的小组长把三喜的积极活动情形报告了支部，支部就派这小组长去和他谈入党的话。这小组长才跟他一谈，他说：“不是早就入了吗？”小组长还只当是别人已经介绍了他，就问他：“是谁跟你谈的？”他说：“我不是已经斗过张太了吗？”小组长说：“斗张太怎么就算入了党？”他说：“搞翻身不是共产党的主张吗？照着共产党的主张做事，怎么还不算共产党？”小组长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他了解错了，才给他解释怎样才能算入党。解释完了问他人不人，他说：“人人人，斗争了这么一回，连个共产党员也不算还行呀？”

“众人是圣人”。三喜自参加了这次斗争，共产党看他来了，群众也看他来了。张太一倒，合作社就得补选经理。头一天晚上提起选经理这事，每个人差不多都想到三喜身上，第二天一开会，还没有讨论，就跟决定了一样，三喜一看这风色，一颗头好象涨有柳斗大，摆着两只手说：“不行，”可是也抵抗不住大家的“拥护”。他说：“我不识字。”大家说：

“都不识字。”他说：“我两口人过个日子，实在没工夫。”大家说：“大家帮你生产。”他再没有说的。

说“不识字”，说“没工夫”，都只是表面上一个说法，实际上是他怕使用不了王忠这个掌柜。王忠这个人跟张太是一伙，伺候了张太半辈子（从张太开放债铺到后来当合作社经理，都是王忠当掌柜），村里人说张太是严嵩，王忠是赵文华。这次斗张太，也捎带了王忠一下，不过生意是张太的，没有他的股本，他也只是穿黑衣保黑主，跟着张太得罪了許多人，自己也没有落下个什么，因此大家只叫他反省了一下，没有动他的产业，还叫他当合作社掌柜。大家虽是这样决定了，三喜的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总不想跟这“赵文华”共事。再者三喜自己也不懂生意，又要向王忠领教，又怕受王忠的捉弄，因此不敢领这个盘。

大家选起他来以后，他去向支部提出困难，支部说：“群众既要你当，你就该克服困难，起模范作用。”他说：“我干不了。”支部说：“你看谁比你强些？”他想想，没有。他说：“恐怕跟王忠合不来。”支部说：“你看换上谁合适就可以聘请谁。当经理有这个权。”他想想，也没有——村里识字的太少，没有担任别的工作的，还只有一个王忠。说个半天，还得自己跟王忠干。

三喜一上了任，王忠果然跟他捣蛋，在王忠的思想上也转不过弯来：第一、他虽作过了反省，可是只作了个样子，没有想到张太得利他惹人是件不合算的事——没有想到他是给张太当了半辈子狗，只是觉着张太是他的老主人，张太倒了他再干下去对不住张太，可是又怕群众说他仍然跟张太是一伙，又不敢不干。干着却实在是一肚子不满。第二、他觉着他自己要比三喜强一万倍，如今叫三喜当经理他当掌柜，实在有点不服

劲，总想看三喜的笑话。三喜上任这一天，叫把他以前那一段结算结算，交代一下。这在他本来是极容易的事，可是他偏不按平常结算的办法来结算，事事叫三喜出主意。三喜说点什么货，他就点什么货，三喜说算哪宗账，他就算哪宗账。三喜总算是聪明人，应想到的项目差不多也都想到了，结算得也还差不多，只是手续上不熟练，磨了好几倍的洋工。

他觉着王忠这人果不好对付，跟支部说了几回，支部叫他慢慢说服教育。可是天呀！王忠哪能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呢？他为这个着实发了几天愁，后来想着只有把合作社这一套弄熟了，才能叫王忠老实一点，从此便事事留心，有个把月工夫，却也摸着了好多，只可惜自己识字太少，账本上还得完全靠王忠。

要学账，就得跟王忠学，他想要跟王忠说这话，王忠越发要拿一拿架子，因此他决定不在王忠面前丢这人，等王忠不在的时候，自己翻开账本偷偷地学。王忠晚上在家里睡，每天晚上过了账点了钱，就把门一锁回去了。他觉着这是个好机会，就跟王忠说合作社晚上不可没人，自己要到里边看门，王忠就把钥匙交了他。他当王忠每天晚上回去之后，就关起门来翻开账本研究，因为白天留过心，晚上还能慢慢看出点道理来。比方说白天入了一百二十五斤盐，晚上找着了一百二十五斤这个码，就能慢慢找出哪一个是“盐”字来。起先只是认字和了解账理，后来又慢慢学着写——把账本上的字写到水牌上，写满了就擦，擦了又写，常是半夜半夜不睡觉。

有一晚上，他正在水牌上练习一个“酱”字，写了半水牌“酱”，有人在外面打门，开开门跑进个女人来，是他老婆。他问：“你半夜三更来做什么？”老婆说：“来找你！你怎么

白天白天不回去，晚上晚上不回去？家里就没有事了吗？”他说：“有什么事？家里少你的什么？”老婆说：“什么也不少，就是少你！”他说：“不要闹，快回去吧！我还有事啦！”老婆是个年轻娃娃，不听他的，只是跟他嚷：“不，今天晚上你不回去我就不走！”说着就去夺他手里的笔。他把笔举得高高的笑着说：“我是顾不上回去，你不走不会也住下？”他本来是说玩话，老婆可不客气地跟他说：“你说我不敢？住下就住下，里边又没别人！”说着就躺到他床上，赌气说：“不走了！”他没法，只好关住门，可是“酱”字还没学好，又坐上写起来，直写到和王忠写的差不多才睡。

半年工夫，账本上用的那几个字他学了个差不多。心里有了底，说话就硬一点，对王忠迁就得就少一点。王忠有点不高兴，就装起病来，一连三天没到合作社。到了第四天，他去看王忠，明知道病是装的，却也安慰了一番，说：“你慢慢养着吧，不要着急，合作社的事情我暂且招呼几天！”王忠见他不发急，也莫名其妙，心想“我且装上半个月，看你怎么办？”可是真正装了半月，也不见三喜发急，自己反而沉不住气，摇摇摆摆到合作社去看。

王忠一进合作社，三喜装得很正经地说：“好些了吗？这几天忙得也没顾上去看你！”他也客气了几句就坐下了。他一坐下就想看看三喜这半月来在账上闹了些什么笑话，顺手翻开了流水账，三喜还说：“你歇歇吧，不要着急！才好了些，防备劳着了！”他一看这本账先吃了一惊。他看见这账上不止没有多少错字，连那些粮食换货物，现钱和赊欠……一切很复杂的账理，一项也没有弄错。又翻了翻另外几本，也都一样，要说跟自己有所差别的话，只是字写得没有工夫些。这一下他觉着

以后再不敢讲价钱了，再要捣蛋就得滚蛋，滚出去便再没有个干的了（这合作社的经理是义务职，掌柜却是薪水制），他踌躇了半天，才搭讪着说：“我这一病就累你半月，心里急得很，只是病到身上由不得人，这会才算好了，我明天搬来吧！”三喜仍然很正经地跟他说：“你看吧！不敢勉强，身体要紧！”

自此以后，王忠果然老实了：三喜吩咐他干啥，他跟从前张太吩咐下来一样，没有什么价钱可讲，每到一个月头上，不等三喜说话就先把应结算的算出来……三喜见他转变了，对他反而又客气好多，他也觉着比在张太手下还痛快。

三喜把改造王忠这事报告支部，是支部搞立功运动的时候，就给他记了一大功。

（一九四七年）

邪 不 压 正

一、“太欺人呀！”

一九四三年旧历中秋节，下河村王聚财的闺女软英，跟本村刘锡元的儿子刘忠订了婚，刘家就在这一天给聚财家送礼。聚财在头一天，就从上河村请他的连襟来给媒人做酒席，忙了一天，才准备了个差不多。

十五这天，聚财因为心里有些不痛快，起得晚一点。他还没有起来，就听得院里有人说：“恭喜恭喜！我来帮忙！”他一听就听出是本村的穷人老拐。

这老拐虽是个穷人，人可不差，不偷人不讹诈，谁家有了红白大事（娶亲、出丧），合得来就帮个忙，吃顿饭，要些剩余馊菜；合不来就是饿着肚子也不去。像聚财的亲家刘锡元，是方圆二十里内有名大财主，他偏不到他那里去；聚财不过是个普通庄户人家，他偏要到他这里来。他来了，说了几句吉利话，就扫院子、担水，踏踏实实做起活来了。

聚财又睡了一小会，又听他老婆在院里说：“安发！你早就过来了？他妗母也来了？——金生！快接住你妗母的篮子！——安发！姐姐又不是旁人！你也是悻悻皇皇地，贵巴巴买那些做甚？——狗狗！来，大姑看你吃胖了没有？这两天怎么不来大姑家里吃枣？——你姐夫身上有点不得劲，这时候了还没有起

来！金生媳妇！且领你姪母到东屋里坐吧！——金生爹！快起来吧！客人都来了！”聚财听见是自己的小舅子两口，平常熟惯了，也没有立刻起来，只叫了声：“安发！来里边坐来吧！”安发老婆跟金生媳妇进了东房，安发就到聚财的北房里来。

这地方的风俗，姐夫小舅子见了面，总好说句打趣的话。安发一进门就对着聚财说：“这时候还不起！才跟刘家结了亲，刘锡元那股舒服劲，你倒学会了？”聚财坐起来，一面披衣服，一面说：“伙计！再不要提这门亲事！我看我的命终究要送到这上头！”安发见他这么说，也就正经起来，坐到床边慢慢劝他说：“以前的事不提他吧！好歹已经成了亲戚了！”聚财说：“太欺人呀！你是没有见人家小旦那股劲——把那脸一注：‘怎么？你还要跟家里商量？不要三心二意了吧！东西可以多要一点，别的没有商量头！老实跟你说：人家愿意跟你这种人家结婚，总算看得起你来了！为人要不识抬举，以后出了甚么事，你可不要后悔！’你也活了三四十岁，你见过这样厉害的媒人？”安发说：“说他做甚？谁还不知道小旦那狗仗人势？”聚财说：“就说刘家吧，咱还想受他那抬举？我从民国二年跟着我爹到下河来开荒，那时候我才二十，进财才十八，人家刘家大小人见了我弟兄们，都说‘哪来这两个讨吃孩子？’我娶你姐那一年，使了人家十来块钱，年年上利上不足，本钱一年比一年滚得大，直到你姐生了金生，金生长到十三，又给人家放了几年牛，才算把这笔账还清。他家的脸色咱还没有看够？还指望他抬举抬举？”安发说：“你那还算不错！你不记得我使人家那二十块钱，后来利上滚利还不起，末了不是找死给人家五亩地？要不我这日子能过得这么紧？唉！还提那些做甚？如今人家还是那么厉害，找到谁头上还不是该谁晦气？事

情已经弄成这样，只好听天由命，生那些闲气有甚么用？”……

金生媳妇领着安发老婆和狗狗进了东房，见软英脸朝着墙躺着。金生媳妇说：“妹妹！不要哭了！你看谁来了？”软英早就听得是她妗子，只是擦不干眼泪，见他妗子走进去了，她只得一面擦着泪一面起来说：“妗妗！你快坐下！妗妗！你看我长了十七岁了，落了个甚么结果？”安发老婆说：“小小孩子说得叫甚？八字还没有见一撇，怎么就叫个‘结果’？该是姻缘由天定，哪里还有错了的？再说啦，人没有前后眼，眼前觉着不如意，将来还许是福，一辈子日子长着哩，谁能早早断定谁将来要得个甚么结果？”聚财老婆也跟到东房里来，她说：

“他妗妗！你好好给我劝一劝软英！这几天愁死我了：自从初三那天小旦来提亲，人家就哭哭哭，一直哭到如今！难道当爹娘的还有心害闺女？难道我跟你姐夫愿意攀人家刘家的高门？老天爷！人家刘锡元一张开嘴，再加上小旦那么个媒人，你想！咱说不愿意能行？”……狗狗见他们只谈正经话，就跑到外边去玩。

东房里、北房里，正说着热闹，忽听得金生在院里说：“二姨来了？走着来的？没有骑驴？”二姨低低地说：“这里有鬼子，谁敢骑驴？”听说二姨来了，除了软英还没有止住哭，其余东房里北房里的人都迎出来。他们有的叫二姨，有的叫二姐，有的叫二妹；大家乱叫了一阵，一同到北房里说话。狗狗见二姨来了，跑回来问：“二姑！给我拿着落花生没有？”二姨说：“看我狗狗多么记事？二年了你还记着啦？花生还没有刨，等刨了再给你拿！”狗狗听说没花生，又跑出去了。安发说：“二姐二年了还没有来过啦！”聚财老婆说：“可不是？自从前年金生娶媳妇来了一回，以后就还没有来！”二姨说：“上河下河只隔十五里，来一遭真不

容易！一来没有工夫，二来”她忽然把嗓音放低“二来这里还有鬼子，运气不对了谁知道要出甚么事情？”安发老婆说：“那也是‘山走一时空’吧（狼多的地方好说这句迷信话，意思就是说不怕狼多，只要你不碰上就行）！这里有日本鬼，你们上河不是有八路军？那还不一样？”二姨说：“那可不同！八路军又不胡来。在上河，喂个牲口，该着支差才支差，哪像你们这里在路上拉差？”安发老婆说：“这我可不清楚了！听说八路军不是到处杀人、到处乱斗争？怎么又说他不胡来？”金生说：

“那都是刘锡元那伙人放的屁！你没听二姨夫说过？斗争斗的是恶霸、汉奸、地主，那些人都跟咱村的刘锡元一样！”二姨说：“对了对了！上河斗了五家，第一家叫马元正，就是刘锡元的表弟，还有那四户也都跟马元正差不多，从前在村里都是吃人咬人的。七月里区上来发动斗争，叫村里人跟他们算老账，差不多把他们的家产算光了！斗争就是斗那些人。依我说也应该！谁叫他们从前那么霸气？”金生媳妇说：“八路军就不能来把咱下河的鬼子杀了，把刘锡元拉住斗争斗争？”二姨问：

“刘锡元如今还是那么霸气？”聚财说：“不是那么霸气，就能硬逼住咱闺女许给人家？”二姨说：“我早就想问又不好开口。我左思右想，大姐为甚么给软英找下刘忠那么个男人？人家前房的孩子已经十二三了，可该叫咱软英个甚么？难道光攀好家就不论人？听大姐夫这么一说，原来是强逼成的，那还说甚么？”聚财老婆说：“你看二妹！这还用问？要不是强逼，我还能故意把闺女往他刘家送？”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二姨说：

“大姐！心放宽点吧！话已经跟大家展直了，后悔还有甚么用处？只怨咱软英长得太俊，要像高楼院疤莲，后崖底瞎秀，管保也没有这些事情。”安发老婆说：“人没前后眼。早知道有这些

1. 麻烦，咱不会早给咱闺女找个家打发出去？”聚财老婆说：“生是你姐夫三心二意把事情耽搁了，去年人家槐树院小宝他娘，央着元孩来提，你姐夫嫌人家里没甚……”聚财一听他老婆说起这个就要生气。他说：“再不要说这个吧？这个事算坏到我一个人身上行不行？”大家见他生了气，都劝了他几句，他仍然赌气到套间里去睡。安发跟着他走进去，跟他拉着闲话，给他平气。外间里，金生媳妇早忙着去院里烧火，只留下三个老婆。聚财老婆悄悄说：“看你姐夫那脾气！明明是他耽误了事，还不愿意叫人说着！我看嫁给人家槐树院小宝也不错！”安发老婆说：“孩子倒是个好孩子，又精干又漂亮，不过也不怨大姐夫挑眼儿，家里也就是没甚。”聚财老婆说：“咱金生在刘家放牛那几年，人家小宝也在刘家打杂，两个孩子很合得来。人家小宝比我金生有出息，前年才十八，就能给刘家赶两个驮骡。人家跟咱金生是朋友。闲了常好到咱家里来，碰着活也做，碰着好饭也吃，踏踏实实，跟咱自己孩子一样。”她说到这里，更把嗓子捏住些说：“这话只能咱姐妹们说，咱软英从十来岁就跟小宝在一块打打闹闹很熟惯，小心事早就在小宝身上。去年元孩来提媒，小东西有说有笑给人家做了顿拉面，后来一听你姐夫说人家没甚，马上就噘了噘嘴嘟噜着说：“没甚就没甚吧！我爷爷不是逃荒来的？”……”

聚财的兄弟进财、金生、老拐，踢踢踏踏都到北屋里来，把三个老婆的闲话打断。进财看了看桌子说：“还短一张。金生！你跟老拐去后院西房抬我那张桌子来！”他们抬桌子的抬桌子，借家具的借家具，还没有十分准备妥当，小狗就跑回来报信，说刘家的送礼食盒，已经抬出来了。老拐、进财、金生都出去接食盒，安发穿起他的蓝布大夹袄去迎媒人。

媒人原来只是小旦一个人，刘家因为想合乎三媒六证那句古话，又拼凑了两个人。一个叫刘锡恩，一个叫刘小四，是刘锡元两个远门本家。刘锡元的大长工元孩，挑着一担礼物盒子；二长工小昌和赶驮骡的小宝抬着一架大食盒。元孩走在前边，小宝、小昌、锡恩、小四，最后是小旦，六个人排成一行，走出刘家的大门往聚财家里来。安发的孩子狗狗，和另外一群连裤子也不穿的孩子们，早就在刘家的大门口跑来跑去等着看，见他们六个人一出来，就乱喊着“出来了出来了”，一边喊一边跑，跑到聚财家里喊：“来了！来了！”金生他们这才迎出去。

不知道他们行的算甚么礼，到门口先站齐，戴着礼帽作揖。进财和金生接住食盒，老拐接住担子，安发领着三个媒人，仍然排成一长串子走进去。

客人分了班：安发陪着媒人到北房，金生陪着元孩、小昌、小宝到西房，女人们到东房，软英一听说送礼的来了，早躲到后院里进财的西房里去。

安发是个老实人，只会说几句庄稼话，跟小旦应酬不来，只好跟锡恩小四两个人谈谈哪块谷子打了多少，哪块地里准备种麦子。小旦觉着这些话听来没趣味，想找个地方先过一过烟瘾。他走进套间里去，见聚财搭着个被子躺在床上。聚财见他进去，坐起来掩了掩怀，很客气地向他说：“老弟！我今天实在对不起，有点小病，身上冷得不行，不能陪你们坐坐……”小旦看见不是个抽大烟地方，说了句“没关系，你躺着吧”，就出来了。他好像下命令一样跟安发说：“安发！先给我找个过瘾地方！”安发说：“饭快了！先吃饭吧？”小旦说：“我这吃饭很扯淡，饭成了给我端一碗就行，还是先过过瘾！”安发见他这么说，就答应他说：“可以！”随着走到门边喊：“进财！”

进财来了，他向进财说：“叫小旦哥到你后院里过瘾吧？”进财也只得答应着，领着小旦往后院走。这时候，忽然又听得聚财老婆在东房里喊：“进财你来！”进财又跑到东房门边。聚财老婆对住他的耳朵说：“就叫他到你北房里吧！可不要领到西房里去，咱软英躲在你西房里。”进财点了点头，领着小旦去了。

小旦走了，说话方便得多。你不要看锡恩和小四两个人是刘锡元的本家，说起刘锡元的横行霸道来他们也常好骂几句，不过这回是来给刘家当媒人，虽然也知道这门亲事是逼成的，表面上也不能戳破底，因此谁也不骂刘锡元，只把小旦当成刘锡元个替死鬼来骂。小旦一出门，小四对着他的脊背指了两下，安发和锡元摇了摇头，随后你一言我一语，小声小气骂起来——这个说：“坏透了”，那个说：“一大害”……各人又都说了些小旦讹人骗人的奇怪故事，一直谈到开饭。

东房里都是几个女人，谈得很热闹，可没有什么正经话——说起谁家闺女好、谁家媳妇坏，就嘻嘻哈哈地；说起上河八路军长、下河鬼子短，就悄悄密密地。

西房谈的另是一套。金生问：“元孩叔！你这几年在刘家住得怎么样？顾住顾不住（就是说能顾了家不能）？”元孩说：

“还不跟你在哪里那时候一样？那二十块现洋的本钱永远还不起，不论哪一年，算一算工钱，除还了借粮只够纳利。——噯！你看我糊涂不糊涂？你两家已经成了亲戚……”金生说：

“他妈那×！你还不知道这亲戚是怎么结成的？”小宝说：“没关系！金生哥还不是自己人？”小昌说：“谁给他住长工还讨得了他的便宜？反正賬是由人家算啦！金生你记得吧，那年我给他赶骡，骡子吃了三块钱药，不是还硬扣了我三块工钱？说什么理？势力就是理！”……

各个房里的人都喝着水谈了一会闲散话，就要开饭了。这地方的风俗，遇了红白大事，客人都吃两顿饭——第一顿是汤饭，第二顿是酒席。第一顿饭，待生客和待熟客不同，待粗客和待细客不同——生客细客吃挂面，熟客粗客吃河落。^①三个媒人虽然都是本村人，办的可是新亲戚的事，只能算生客，上的是挂面。元孩小昌小宝虽然跟媒人办的是一件事，可是这三个人早已跟金生声明不要按生客待，情愿吃河落。其余的客人，自然都是河落了。小旦在后院北屋里吸大烟，老拐给他送了一碗挂面。

吃过第一顿饭以后就该开食盒。这地方的风俗，送礼的食盒，不只光装能吃的东西，什么礼物都可以装——按习惯：第一层装是首饰冠戴，第二层是粗细衣服，第三层是龙凤喜饼，第四层是酒、肉、大米。要是门当户对的地主豪绅们送礼，东西多了，可以用两架三架最多到八架食盒。要是贫寒人家送礼，也有不用食盒只挑一对二尺见方尺把高的木头盒子的，也有只用两个篮子的。刘家虽是家地主，一来女家是个庄稼户，二来还是个续婚，就有点轻看，可是要太平常了又觉有点不像刘家的气派，因此抬了一架食盒，又挑了一担木头盒子，弄了个不上不下。开食盒先得把媒人请到跟前。聚财老婆打发老拐去请小旦，老拐回来说：“请不动！他说有两个人在场就行！”锡恩和小四说：“那就开吧！”按习惯，开食盒得先烧香。金生代表主人烧过了香，就开了。开了食盒，差不多总要吵架。这地方的风俗，礼物都是女家开着单子要的。男家接到女家的单子，差不多都嫌要得多，给送的时候，要打些折扣。比方要两对耳环只送一对，要五两重手锡，只给三两重的，送来了自然要

^①即饸饹，北方一种杂粮面食。

争吵一会。两家亲家要有点心事不对头，争吵得就更会凶一点。女家在送礼这一天请来了些姑姑姨姨姘姘一类女人们，就是叫她们来跟媒人吵一会。做媒人的，推得过就推，推不过就说“回去叫你亲家给补”，做好做歹，拖一拖就过去了。

聚财家因为对这门亲事不情愿，要的东西自然多一点。刘家就是一件东西也不送，自然也不怕聚财改口，可是他也不愿意故意闹这些气——东西自己都有，送得去将来把媳妇娶到手，一件一件又都原封带回来了，不是个赔钱事，因此也送得很像个样子。像要了两对金耳环两对金戒指，每样都给了一对金的一对银的，只有金手镯没有给，给了一对镀金的。绸缎衣服一件也不少，不过都是刘忠前一个老婆的，要给软英穿，都窄小一点。不论好歹吧，女家既然有气，就要发作发作：聚财老婆看罢了首饰和衣服，就向锡恩和小四说：“亲家送给的这些衣服，咱也没见过太市面，不敢说不好，可惜咱闺女长得粗胖一些，穿不上。首饰的件数也不够，样子也都是前二十年的老样，没有一件时行货。麻烦你们拿回去叫亲家给换换！”话虽然很和软，可是里边有骨头，不是三言五句能说了的事。锡恩岁数大一点，还能说几句，就从远处开了口。他说：“聚财嫂！亲戚已经成亲戚了，不要叫那一头亲戚太作难。你想：如今兵慌马乱的，上哪里买那么多新东西？自然是有甚算甚。这不过是摆一摆排场吧，咱闺女以后过了门，穿戴着什么你怕没有啦？哪件不合适，咱家的闺女就是他家的媳妇，他能叫咱闺女穿戴出去丢他的人？……”他还没有说完二姨就接上话。二姨说：“你推得可到不近！他刘家也是方圆几十里数得着的大财主，娶得起媳妇就做不起衣裳、买不起首饰？就凭以前那死鬼媳妇穿戴过的东西顶数啦？”安发老婆也接着说：“不行！我外甥女儿一辈子头一场事，不

能穿戴他那破旧东西！”进财老婆拿着镀金镯子说：“旧东西也只挑坏的送！谁不知道刘忠前一个老婆带着六两重的金镯子？为什么偏送这镀金的？”金生媳妇也说：“这真是捉土包子啦！他觉着我们这些土包子没有认得金银的！”其实这几个女人们还只有她们两个见过金首饰，不过也没有用过，也不见得真认得，只是见这对镯子不是刘忠前一个老婆胳膊上那一对，并且也旧了，有些地方似乎白白的露出银来，因此才断定是镀货。

锡恩和小四看见事情不好下台，就往小旦身上推。锡恩说：“原来开单子要东西，都是小旦一手办的，要了多少，应承了多少，我两人都摸不清楚。”安发说：“单是我开的，那倒没有错！”小四说：“还是请人家小旦来吧！”聚财老婆说：“请他就请他！就是他说多要点东西，不答应就不行！许亲不许亲已经不由我了，要东西还不叫由我，那样只有他刘锡元活的了！老拐你再到后院里请小旦来！”老拐说：“咱请不动！”小四说：“小宝！你去一下吧！”小宝就去了。

小宝不知道小旦在北房，进财一向就在西房住，因此他就一直跑到西房里来。他正去叫“小旦叔”，忽然看见是软英。软英脸朝墙躺着，听见有人走得响，一翻身正要往起爬，看见是小宝，就又躺下去，说了声：“你？我当是谁来！”小宝低声说：“婶婶叫我找小旦！”软英用嘴指着说：“在北房里！”小宝扭转头正往外走，软英又叫住他说：“一会你来，我跟你说话！”小宝点了点头就去北房叫小旦。这时候，小旦的大烟已经抽足了，见小宝说外头有事，非要他不行，他就嘟嘟念念说：“女人们真能麻烦！再吵一会还不是那么回事？”说着就走出来了。女人们见他出来了，又把刚才说衣服手饰不合适那番话对着他吵了一遍，他倒答应得很简单。他说：“算了！你们

都说的是没用话！哪家送礼能不吵？哪家送礼能吵得把东西抬回去？说什么都不抵事，闺女已经是嫁给人家了！”聚财老婆说：“你说哪个天生不行！照那样说……”小旦已经不耐烦了，再不往下听，把眼一翻说：“不行你随便！我就只管到这里！”聚财老婆说：“老天爷呀！世上哪有这么厉害的媒人？你拿把刀来把我杀了吧！”小旦说：“我杀你做什么？行不行你亲自去跟刘家交涉！管不了不许我不管？不管了！”说着推开大家就往外走，急得安发跑到前边伸开两条胳膊拦住，别的男人们也都凑过来说好话，连聚财也披起衣服一摇一晃出来探问是什么事。

大家好歹把小旦劝住，天已经晌午了。金生他姨夫催开席，老拐就往各桌上摆碟子。不多一会，都准备妥当，客人都坐齐，点了点人，只短小宝，金生跑来跑去喊叫，小宝才从后院里跑出来。

原来小宝把小旦叫出来以后，就又到后院西房去看软英。小宝问软英要说什么，软英说：“你等等！我先想想！”随后就用指头数起来。她数一数想一想，想一想又数一数，小宝急着问：“你尽管数什么？”她说：“不要乱！”她又数了一回说：“还有二十七天！”小宝说：“二十七天做什么？”她说：“你不知道？九月十三！”小宝猛然想起来刘家决定在九月十三娶她，就答应她说：“我知道！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还有二十九天！”软英说：“今天快完了，不能算一天。八月是小建，再除了一天……”小宝说：“不论几天吧，你说怎么样？”软英说：“我说怎么样！你说怎么样？”小宝没法答应。两个人脸对脸看了一大会，谁也不说什么。忽然软英跟唱歌一样低低唱道：“宝哥呀！还有二十七天呀！”唱着唱着，眼泪骨碌碌就

流下来了！小宝一直劝，软英只是哭。就在这时候，金生在外边喊叫“小宝！小宝！”小宝这时才觉着自己脸上也有热热的两道泪，赶紧擦，赶紧擦，可是越擦越流，擦了很大一会，也不知擦干了没有，因为外边叫得紧，也只得往外跑。

吃过酒席稍停了一会，客人就要回去。临去的时候，小且一边走一边训话：“刘家的场面还有什么说的？以后再不要不知足……”安发一边送着客，一边替聚财受训，送到大门外作了揖才算完结。

小宝抬着食盒低着头，一路上只是胡猜想二十七天以后的事。

二、“看看再说！”

二姨回到上河，一直丢不下软英的事，准备到九月十三软英出嫁的时候再到下河看看，不料就在九月初头，八路军就把下河解放了，后来听说实行减租清债，把刘家也清算了，刘锡元也死了，打发自己的丈夫去看了一次，知道安发也分了刘家一座房子，软英在九月十三没有出嫁，不过也没得退了婚。过了年，旧历正月初二，正是走娘家的时候，二姨想亲自到下河看看，就骑上驴，跟自己的丈夫往下河来。

他们走到刘锡元的后院门口，二姨下了驴，她丈夫牵着驴领着她往安发分下的新房子里走。狗狗在院里看见了，叫了声“妈！二姑来了！”安发两口、金生两口，都从南房里迎出来。

二姨笑着说：“安发！搬到这里来，下雨可不发愁了吧？——金生！你两口子都来给你舅舅拜年来了？……”安发老婆和金生两口答应着，说说笑笑进了南房。二姨的丈夫说：

“安发！把牲口拴哪里？”安发接住缰绳说：“没处拴！就拴这柱子上吧！”二姨的丈夫说：“你就没有分个圈驴的地方？”安发说：“咱连根驴毛也没有，要那有什么用？不用想那么周全吧！这比我那座透天窟窿房就强多了。”说着拴住了驴，拿下毛连和捎连①，也都回到房里。

一进门，狗狗就问：“二姑夫！给我拿着花生啦没有？”二姨说：“看我狗狗多么记事？拿着哩！”她丈夫解开毛连口，给狗狗取花生，二姨还说：“去年花生收成坏，明年多给孩子拿些！”安发老婆说：“这还少？狗狗！装上两把到外边玩吧！”

二姨说：“这房子可真不错：那顶棚是布的呀纸的？”安发老婆说：“纸的！”二姨说：“看人家那纸多么好？跟布一样！咱不说住，连见也没见过！”安发说：“咱庄稼人不是住这个的，顶棚上也不能钉钉子，也不能拴绳子，谷种也没处挂，只能放在窗台上！……”二姨的丈夫说：“那你还不搬回你那窟窿房子里去？”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二姨说：“我这三个多月没有来，下河变成个什么样子了？”大家都说“好多了”。安发说：“总不受鬼子的气了！”金生说：“刘锡元也再不得厉害了！”二姨的丈夫接着说：“你舅舅也不住窟窿房子了！”二姨问：“刘锡元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大家把他打死了？”金生说：“打倒没人打他，区上高工作人员不叫打，倒是气死了的！”安发说：“那老家伙真有两下子！要不是元孩跟小昌，我看谁也说不住他。”二姨问：“元孩还有那本事？”金生说：“你把元孩错看了，一两千人的大会，人家元孩是主席。刘锡元那老家伙，谁也说不过

①盛物和钱的布袋。

他，有五六个先发言的，都叫他说得没有话说。后来元孩急了，就说：“说我的吧？”刘锡元说：“说你的就说你的，我只凭良心说话！你是我二十年的老伙计，你使钱我让利，你借粮我让价，年年的工钱只有长支没有短欠！翻开账叫大家看，看看是谁沾谁的光？我跟你有什么问题？……”元孩说：“我也不懂良心，我也认不得账本，我是个雇汉，只会说个老直理：这二十年我没有下过工，我每天做是甚？你每天做是甚？我吃是甚？你吃是甚？我落了些甚？你落些甚？我给你打下粮食叫你吃，叫你吃上算我的账，年年把我算光！这就是我沾你的光！凭你的良心！我给你当这二十年老牛，就该落一笔祖祖辈辈还不起的账？呸！把你的良心收起！照你那样说我还得补你……”他这么一说，才给大家点开路，这个说“……反正我年年打下粮食给你送”，那个说“……反正我的产业后来归了你”……那老家伙发了急，说“不凭账本就是说理！”一个“不说理”把大家顶火了，不知道谁说了声打，大家一轰就把老家伙拖倒。小昌给他抹了一嘴屎，高工作员上去抱住他不让打，大家才算拉倒。会场又稳下来，小昌指着老家伙的鼻子说：“刘锡元！这理非叫你说清不可！你逼着人家大家卖了房、卖了地、讨了饭、饿死了人、卖了孩子……如今跟你算算账，你还说大家不说理。到底是谁不说理？”这一问，问得老家伙再没有说的。后来组织起清债委员会，正预备好好跟他算几天，没想到开了斗争会以后，第三天他就死了！有人说是气死的，有人说是喝土死的。”安发说：“不论是怎么死的吧，反正是死了，再不得厉害了！”二姨问：“他死了，那账还怎么算？”安发说：“后来自然只能跟刘忠算。不过他一死，大家的火性就没有那么大，算起来就有好多让步。本村外村，共

算了他五千多石米，两万多块钱现洋。他除拿出些粮食牲口以外，又拿出三顷多地和四处房子。如今人家还有四十来亩出租地、十几亩自种地和这前院的一院房子。”二姨说：“那么外边说斗光了？”安发说：“没甚了没甚了，象我这么十个户也还抵不住人家！”……

安发老婆正去切菜，听得小昌的孩子小贵在院里说：“狗狗！谁叫你把花生皮弄下一院？扫了！”狗狗说：“我不！”“你是扫不扫？”“不！”“拍！”小贵打了狗狗一下，狗狗哭了。安发老婆揭开帘子说：“小贵！你怎么打起狗狗来了！”小贵说：“他怎么把花生皮弄下一院？”安发老婆说：“不要紧，弄下一院我给你扫！”小昌老婆在北屋里嘟噜着说：“扫过几回？”安发老婆听见也只装没听见，仍然跟小贵说：“不要打狗狗！狗狗小啦你大了！”小昌老婆又嘟噜着说：“小啦就该上天啦！”安发老婆忍不住了，就接上了话：“我那孩子就叫上天啦！你十二岁孩子打我八岁的孩子，还有你这当妈的给他仗胆，我那孩子还有命啦？”“打着了？打伤了？”“嫌他打得不重你不会也出来打两下？”“谁可养过个孩子？”“我那孩子还有娘？”“没娘来还惯不成那样啦！看那院里能干净一晌不能？人糟踏，牲口厕！”“厕了叫你扫啦？可知道你分了个驴圈！”“你不分一个？还不是你的‘问题’小？”“你有多大‘问题’，还不是凭你男人是干部？”安发见她们越吵话越多，就向他老婆说：“算了算了！少说句不行？”安发老婆不说了，小昌老婆还在北房里不知嘟咕些什么。二姨问：“北房里住是谁？”安发说：“说起来瞎生气啦，这一院，除了咱分这一座房子，其余都归了小昌。”二姨说：“他就该得着那么多？”安发说：“光这个？还有二十多亩地啦！人家的‘问

题’又多，又是农会主任，该不是得的多啦？你听人家那气多粗？咱住到这个院里，一座孤房，前院都是刘忠的，后院都是小昌的——碾是人家的，磨是人家的，打谷场是人家的，饭厦和茅厕是跟人家伙着的，动脚动手离不了人家。在咱那窟窿房里，这些东西，虽然也是沾邻家的光，不过那是老邻居，就比这个人贴多了！”

不大一会，饭好了，大家吃着饭，仍然谈着斗刘家的事。二姨仍是问谁都提些什么问题，谁都分的东西多。

老拐来了，背着个麻包，进门就喊“拜年拜年！”他跟大家打过招呼，安发老婆给他拿了两个黄蒸，他丢到麻袋里。安发老婆指着前院说：“你到人家前院，管保能要两个白面蒸馍！”老拐说：“咱就好吃个黄蒸，偏不去吃他刘家那白面馍！”二姨笑着说：“老拐！你就没有翻翻身？”老拐也笑了笑说：“咱跟人家没‘问题’！”说着就走了。

安发说：“你叫我说这回这果实分得就不好，上边既然叫穷人翻身啦，为什么没‘问题’的就不能翻？就按‘问题’说也不公道——能说会道的就算得多。像小旦！给刘家当了半辈子狗腿，他有什么‘问题’？胡捏造了个‘问题’竟能分一个骡子几石粮食！”二姨说：“怎么呀？小旦也分果实？在上河，连狗腿都斗了，你们这里怎么还给那些人分东西？”金生说：“人家这会又成了积极分子！”安发说：“那人就算治不了！人家把头捏得尖尖地，哪里有空就跟哪里钻！八路军一来刘锡元父子们就跑到一个荒山上躲起来，有什么风声小旦管给人家送信。高工作人员来发动群众去找刘锡元，有人说：‘只要捉住小旦一审就知道了。’这话传到人家小旦耳朵里，人家亲自找着高工作人员说人家也要参加斗争，说‘只要叫我参加我管保

领上人去把刘家父子捉回来。’高工作人员跟大家说：‘只要他能这么做，就叫他参加了吧？’大家说：‘参加就参加吧，反正谁也知道他是什么人，上不了他的当。’第二天人家果然领着人去把刘家父子捉回来。在斗争那一天，人家看见刘家的势力倒下去，也在大会上发言，把别人不知道光人家知道的刘家欺人的事，讲了好几宗，就有人把人家也算成了积极份子。清债委员会组织起来以后，他说刘锡元他爹修房子的地基是说他家的。大家也知道他是想沾点光，就认起这笔账来了。后来看见元孩、小昌他们当了干部，他就往他们家里去献好；看见刘忠的产业留得还不少，就又悄悄去给刘忠他娘赔情。不用提他了，那是个八面玲珑的脑袋，几时也跌不倒！”

提起刘忠跟小旦，二姨自然又想起软英的事，问了问金生。金生说：“这事真难说，一家人为着这件事成天生闲气。我看恐怕就怨我爹。二姨这会要没有别的事，就到我家坐坐，叫我妈给你细细谈谈！”二姨答应了，就同她丈夫跟金生两口子辞别过安发两口走出来。金生说：“把驴也牵到我那里喂吧！”说着解下缰绳牵上，四个人一同往聚财家里来。

聚财老婆一见二姨，就先诉了一顿自己的苦：“……她爹死扭劲，闺女也不听话，咱两头受气，哪头也惹不起！”二姨听不出个头尾来，要叫她细细谈，她才从送礼那次说起。她说：“送过礼以后，我跟软英说：‘事情仍是那样了，日子也近了，他送的那些衣裳有的窄小得穿不得，有的穿得也不时行，你趁这两天，挑那能穿的改几件叫穿。’人家起头就不理，说了四五天，才算哭着做着做一点，我也帮着人家做。一件一件拆开改好了还没有缝，就打开仗了。赶到日本人走了，刘家也跑了，九月十三也过了，软英忽然有说有笑了，我跟她爹说：

‘咱跟刘家这门亲事可算能拉倒了吧？’她爹说：‘看看再说吧！这会还不能解决！’又迟了几天，区上高工作人员来发动群众斗争刘家，把刘家父子都捉住了，小宝来跟金生、软英说：‘明天到大会上一定把强迫婚姻问题提出来，看他刘家有什么说的？’她爹强按住不叫提。她爹说：‘事情还不知道怎么变化啦！你叫他犯到别人手！咱不要先出头得罪人。’后来偏是刘锡元死了刘忠没有死，人家别人的大小问题都提了，咱这问题没有提，不长不短放下了。赶到斗争也过了，清算刘家的事到底了，我问她爹说：‘咱跟刘忠这亲事到底算不算数了？’他爹又说：‘看看再说吧！这会还不能决定！’我说：‘还看什么？要不是刘忠给刘锡元守孝的话，人家快又择日子娶了！’他说：‘一守孝就是三年！你急什么啦？’后来听小宝说他问过高工作人员，高工作人员说只要男女本人有一个不情愿，就能提出理由来，到区上请求退亲。我问他送过礼还能不能退，他说他听高工作人员说只要把东西退还了也行。我把这话跟她爹学了一遍，她爹骂人家小宝不该挑拨。软英听说她爹不答应了，又呕了几天气，他爹心里也有点活动了。这时候偏还有个该死的小旦又坏了点事：他是媒人，退东西脱不过他的手。听安发说刘忠又给他拿了几两土，他就又向着刘忠那一头说话。他知道我把衣服改了，就故意说：‘行是行！只要能把人家送的东西原封原样送回来！少了一件，坏了一件，照原样给人家买！’安发把这话跟他爹一说，他爹又埋怨起我来：又是‘明知道弄不断，开这口有什么好处’，又是‘人没前后眼，你知以后是谁的天下’，说得我也答应不上来。去年腊月初五，她爹当面说人家小宝：‘你来我这里有什么正事？再不要来这里说谈话！’又说软英：‘小小孩子嘻嘻哈哈，象个什么规矩？’说

得人家小宝红着脸走了，软英就跟她爹闹起来。她爹说：‘再敢跟那些年轻人嘻嘻哈哈我槌死你！’软英说：‘槌死就槌死吧！反正总要死一回啦！槌死也比嫁给刘忠强！’从那以后，爹也气病了，闺女也气得哭了几天，我两头说好话，哪头也劝不下，直到如今，父女们说不上三句就要顶起来。二妹你今天不要走，住上一两天，两头都替我劝一劝！”二姨见她姐姐哭哭涕涕很作难，就答应下来。

二姨先去探聚财的口气：“大姐夫！听说你身上不爽快？”聚财说：“也不要紧！冬天里，受了点凉！”“听大姐说，软英不听你的话，惹得你动了点气？孩子们说话，你理他做甚啦？哪个还能当一回事？”“当老的瞎操心啦吧！瞎惹你们笑话啦！”“自己人笑话什么？我说孩子大了，咱一辈不管两辈事，她自己的事，你叫由她一点算了！”她又故意说：

“软英对刘家这门亲事实在不满意，听说只要你愿意就能弄断了……”“唉！年轻人光看得见眼睫毛上那点事！一来就不容易弄断，二来弄断了还不知道是福是害！日本才退走四个月，还没有退够二十里，谁能保不再来？你这会惹了刘忠，到那时候刘忠还饶你？还有小旦，一面是积极分子，一面又是刘忠的人，那种人咱惹得起？他们年轻人，遇事不前后想，找出麻烦来就没戏唱了！还有，去年你大姐也跟你说过了，软英的心事在小宝身上，这我不能赞成——一则不成个规矩，再则跟上小宝，我断定她受一辈子穷。小宝那孩子，家里有甚没甚且不讲，自己没有出息，不知道为自己打算。去年人家斗刘家，他也是积极分子，东串连人，西串连人，喊口号一个顶几个，可是到算账时候，自己可提不出大‘问题’，只说是短几个工钱，得了五斗谷子。人家小旦胡捏了个问题还弄了一个骡子几石粮

食，他好歹还给刘家住过几年，难道连小旦都不如？你看他傻瓜不傻瓜？只从这件事上看，就知道他非受穷不可！要跟上小宝，哪如得还嫁给人家刘忠！你不要看人家挨了斗争！在本村说起来还仍然是个小财主！如今刘锡元也死了，骂名也没了，三四口人，有几十亩出租地，还不是清静日月？”二姨说：

“不过岁数大一点！”聚财说：“男人大个十四五岁吧，也是世界有的事！”二姨问：“那样说起来，你的主意还是嫁给刘忠？”聚财说：“不！我的主意是看看再说！刘忠守服就得三年，在这三年中间看怎么变化——嫁刘忠合适就嫁刘忠，嫁刘忠不合适再说，反正不能嫁给小宝！”聚财说这番话，二姨觉着“还是大姨夫见识高！应该拿这些话去劝劝软英。”

二姨劝软英：“软英！姨姨问你一件事，听说你年头腊月顶了你爹几句，惹得你爹不高兴？”软英说：“二姨！我也不怕你笑话！我不是故意惹我爹生气，可是家里有个我，我爹就不能不生气。我有什么办法？”“这话怎么讲？难道你爹多嫌个你？”“也不是我爹多嫌我！还是因为那件齜齜亲事！如今我爹已经嚷出来了，我也不说那丑不丑了！因为我要嫁小宝，不愿意嫁给刘忠！”“这闺女倒说得痛快！年轻人，遇事要前后想想！”“哪天不想？哪时不想？不知道想过几千遍了！”

“你觉着惹得起刘忠吗？”“斗争会上那几千人都惹得起他，恰是咱家惹不起他？”“年轻人光看那眼睫毛上那点事！你爹说日本人退出不够二十里，你敢保不再来？你得罪了刘忠，刘忠那时候还饶你？”“我爹就是那样‘前怕狼后怕虎’！我爷爷不是逃荒来的？日本再来了不能再逃荒走？都要象他那么想，刘锡元再迟十年也死不了！”“你爹说小宝那孩子没出息，不会为自己打算，当了一回积极分子没得翻了身。从这件事上看，

将来恐怕过不了日子！”“小旦有出息，会给自己打算，没‘问题’也会捏造‘问题’分骡子。照他那么说我就该嫁给小旦？”“你爹说刘家虽说挨了斗，在下河还是个小财主！”“他财主不财主，我又不是缺个爹！”“你爹说男人大个十四五岁，也是世界有的事！”“做小老婆当使女都是世界有的事，听高工作人员说自己找男人越发是世界上有的事！难道世界上有的如意事没有我，倒霉事就都该我做一遍？”最后二姨问：“照你这样说来，你的主意是不论你爹愿意不愿意，你马上就要跟刘忠说断了嫁给小宝？”软英说：“要以我的本意，该不是数那痛快啦？可是我那么办，那真要把我爹气坏了。爹总是爹，我也不愿意叫他再生气。我的主意是看看再说。刘锡元才死了，刘忠他妈是老顽固，一定要叫他守三年孝。去年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二十七天还能变了卦，三年工夫长着啦，刘家还能不再出点什么事？他死了跑了就不说了，不死不跑我再想我的办法，反正我死也不嫁给他，不死总要嫁给小宝！”软英说完了，二姨觉着这话越发句句有理。

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两套道理放到一处是对头。也有两点相同——都想看看再说，都愿意等三年。二姨就把这谈话的结果向聚财老婆谈了一下，两个人都觉着没法调解。不过聚财老婆却放了心，她觉着闺女很懂事，知道顾惜她爹。她觉着两套道理虽是对头，在这三年中间，也许慢慢能取得同意，到底谁该同意谁，她以为还是闺女说得对。

三、想再“看看”也不能

聚财和软英父女俩个都猜得不错，这三年中间果然有些大

变化——几次查减且不讲，第一个大变化是第二年秋天日本投降了；第二个大变化是第三年冬天又来了一次土地改革运动，要实行填平补齐。第一个大变化，因为聚财听说蒋介石要打八路，还想“看看再说”，软英的事还没有动；第二个大变化，因为有些别的原因，弄得聚财想再“看看”也不能了。

第二个大变化在一九四六年。这年十月里，有一天，区上召集干部和积极分子联合会，元孩、小昌、小旦、小宝……一共有四十多个人参加，要开七天。他们到区上以后，村里人摸不着底，有些人听别的区里人说是因为穷人翻身不彻底，还要发动一次斗争。这话传到刘忠耳朵里，刘忠回去埋藏东西；传到软英耳朵里，软英回去准备意见。

七天过了，干部积极分子都从区上回来了。晚饭后，还是这四十来个人，开了布置斗争会。元孩是政治主任，大家推他当了主席。元孩说：“区上的会大家都参加过了。那个会决定叫咱们回来挤封建，帮助没有翻透身的人继续翻身。咱们怎么样完成这个任务，要大家讨论，讨论一下谁还是封建？谁还没有翻身？谁还没有翻透？”他说完了，小昌就发言。小昌说：“我看咱村还有几户封建，第一个就是刘忠！”有人截住他的话说：“刘忠父子们这几年都学会种地，参加了生产，我看不能算封建了！”小昌说：“他那种地？家里留二十来亩自耕地，一年就雇半年短工，全凭外边那四十来亩出租地过活。这还不是地主？还不是剥削人的封建势力？”这意见大多数都同意，就把刘忠算做一户封建尾巴。接着，别人又提了四五户，都有些剥削人的事实，大家也都同意，其余马上就再提不出什么户来，会场冷静了一大会。元孩说：“想起来再补充吧！现在咱们再算算咱村还有多少没翻身或者翻也没有翻透的户！大家都

说：“那多啦”“还有老拐！”“还有安发！”“还有小宝！”……七嘴八舌提了一大串。元孩说：“慢着！咱们一片一片沿着数一数！”大家就按街道数起来，数了四十七个户。元孩曲着指头计算了一下说：“上级说这次斗争，是叫填平补齐，也就是割了封建尾巴填窟窿。现在数了一下：封建尾巴共总五六个，又差不多都是清算过几次的，可是窟窿就有四五十个，那怎么能填起来？”小宝说：“平是平不了，不过也不算很少！这五六户一共也有三顷多地啦！五七三百五，一户还可以分七亩地！没听区分委说‘不能绝对平，叫大家都有地种就是了’！”又有人说：“光补地啦？不补房子？不补浮财？”又有人说：“光补窟窿啦？咱们就不用再分点？”元孩说：“区分委讲话不是说过了吗？不是说已经翻透身的就不要再照顾了吗？”小旦说：“什么叫个透？当干部当积极分子的管得罪人，斗出来的果实光叫填窟窿，自己一摸光不用得？那只好叫他们那四十七个窟窿户自己干吧！谁有本事他翻身，没有本事他不用翻！咱不给他当那个驴！”元孩说：“小旦！你说那不对！在区上不是说过……”元孩才要批评这自私自利的说法，偏有好多人打断了他的话，七嘴八舌说：“小旦说的对！”“一摸光我先不干！”“我也不干！”“谁得果实谁去斗！”元孩摆着两只手好久好久才止住了大家的嚷吵。元孩说：“咱们应该先公后私。要是果实多了的话，除填了窟窿，大家自然也可以分一点；现在人多饭少，填窟窿还填不住，为什么先要把咱们说到前头？咱们已经翻得不少了，现在就应该先帮助咱的穷弟兄。”小昌说：“还是公私兼顾吧！我看叫这伙人不分也行不通，因为这任务要在两个月内完成，非靠这一伙人不行。要是怕果实少分不过来，咱们大家想想还能不能再找出封建尾巴来？”这意见又有许

多人赞成。小旦说：“有的是封建尾巴！刘锡恩还不是封建尾巴？他爹在世时候不是当过几十年总社头？还不跟后来的刘锡元一样？”元孩说：“照你那么提起来可多啦！”跟小旦一样的那些人：“多啦就提吧！还不是越多越能解决问题？”元孩说：“不过那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从我记得事，他家就不行了……”有人说：“不行了现在还能抵你那两户？”元孩说：“那是人家后来劳动生产置来的？”又有人说：“置来的就不给他爹还一还老账？”元孩听见他们这些话，跟在区上开会那精神完全不对头，就又提出在区开会时候，区分委说那不动中农的话来纠正他们。小旦他们又七嘴八舌说：“那叫区上亲自做吧！”元孩说：“不要抬杠！有什么好意见正正经经提出来大家商量！”那些人又都一齐说：“没意见了！”以后就谁也不开口，元孩一个一个问着也不说，只说“没意见”。会场又冷静了好大一会。有些人就交头接耳三三两两开小会，差不多都是嘟噜着说：“像锡恩那些户要不算，哪里还有户啦？”“要不动个几十户，哪里还轮得上咱分果实？”……元孩听了听风，着实作了难：上级不叫动中农，如今不动中农，一方面没有东西填窟窿，一方面积极分子分不到果实不干，任务就完不成。他又在会场上走了一圈，又听得不止积极分子，有些干部也说分不到果实不干，这更叫他着急。他背着手转来转去想不出办法。小昌说：“我看还是叫大家提户吧！提出来大家再讨论，该动就动，不该动就不动。”元孩一时拿不定主意，小昌就替他向大家说：“大家不要开小会了，还是提户吧！”一说提户，会场又热闹起来，哗啦哗啦就提出二十多户，连聚财进财也都提在里边。一提户，元孩越觉着不对头，他觉着尽是一些中农。他说：“我一个人也扭不过大家，不过我觉着这些户都

不像是封建尾巴。咱们一户一户讨论吧！要说哪一户应该斗，总得说出个条件来！”小昌说：“可以！咱们就一户一户说！”元孩叫记录的人把大家提出来的户一户一户念出来，每念一户，就叫大家说这一户应斗的条件。像小旦那些积极分子，专会找条件，又是说这家放过一笔账，又是说那家出租过二亩地；连谁家爷爷打过人，谁家奶奶骂过媳妇都算成封建条件。元孩和小宝他们几个说公理的人，虽然十分不赞成，无奈大风倒在“户越多越好”那一边，几个人也扭不过来。

讨论到聚财那一户，小宝先提出反对的意见。小宝说：“我觉着那一户真不应该斗！人家是开荒起家，没有剥削过谁一个钱东西，两三辈子受刘家的剥削，这几年才站住步，为甚么就把人家算成封建？……”他还没有说完，就有人喊叫“反对包庇！”有个年轻人在小宝背后嘟噜着跟小宝说：“还有甚么想头啦？记不得人家把你撵出来？”元孩说：“不要说笑话了！这一户可真不能斗！别人的条件，算不算封建吧，总还有个影子，这一户连封建影子也没有，受封建的剥削比我元孩还多，要是连他也斗了，恐怕连咱们这些人都得斗！人家有甚么条件？”他这么一说，大家也觉着真不容易找出条件来，会场好像又要冷静一会。小旦怕冷了场，就赶紧说：“有有有！他跟地主家结亲还不是一个大条件？”小宝说：“谁不知道那是刘家强迫的？你是媒人，我是抬食盒的，小昌叔和元孩叔也都去来！谁不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小旦说：“三媒六证，亲口许婚，那怎么能算强迫？是强迫他在斗刘锡元时候为甚么不提意见？这二三年了为甚么又舍不得退婚？”元孩觉着他这样颠倒是非太不像话，就正正经经问他说：“小旦你这是说笑话还是说正经话？要是别人办的，还许你摸不清；你亲自办的事，你还该不

知道那是见得人见不得？”事实谁都知道，元孩这样一碰，小旦也就再不提这事了。可是聚财这户，地也多、也都做好了，在近几年又积余了好多粮食，有些人很眼热，觉着放过去可惜，就又找出个条件。元孩才把小旦的话碰回去，就又有有人说：“他有变天思想！那总是个条件吧？”另有几个人说：“对！”有一个说：“他从前说日本人还要来，日本投降以后又说蒋军要来！”还有个作证的说：“对！有一次他在场里跟安发说过，我跟好几个人都听见来！”还有个追根的说：“他听谁说的？这都是特务造的谣言，问他在哪里听到的！他跟哪一个有联系？”……元孩说：“够了够了！再猜下去就比刘锡元还厉害了！大家一定要斗人家，也只能叫他献些地献些东西，要跟别的封建尾巴一样弄得扫地出门，咱实在觉着过意不去！”又有人说：“刘家给他送那好东西多着啦！人家别人都跟地主分家啦，也叫他跟刘家解除婚约，把好东西退出来归了群众！”小昌说：“明天刘家就扫地出门了，那你怕他不愿意啦？”又有人说：“那可是一批大果实，还有金镞子啦！”小宝说：“镀金的！”那个人说：“真金的，我见人家前一个老婆带过！”小宝说：“那一对没有归了他！”……元孩见他们这些人只注意东西不讲道理，早就不耐烦了，就又批评他们说：“那他是甚么就是甚么吧，争吵那有甚么用？这一户算过去了吧？时候不早了，讨论别人！”接着又讨论到进财。这一户，就是小旦那个找家，也没有找出什么条件来，只好去掉。总共提出二十七八户，讨论中间，元孩、小宝他们几个正经人，虽然争着往下去，结果还剩下二十一户再也去不下来了。元孩见这二十一户中间，大多数是中农，仍觉着不妥当，就跟桌子旁边的几个主要干部说：“动这么多的中农可是不妥当呀！要不等几天高工作人员来了再搞吧？”小昌说：

“户已经决定了，明天要不搞，说不定谁走了风，人家就都把东西倒出去了。我看不用等！羊毛出在羊身上，下河的窟窿只能下河填，高工作员也给咱带不来一亩地！”小昌是农会主任，说话有力量。他这么一说，另外几个干部都同意他的话，就算决定了。这时候已经半夜了，事情也讨论完了，就散了会。临走时候，小昌说：“今天夜里大家都得保守秘密，谁走了风明天查出来可不行呀！”大家都说“那自然！”说着就都往外走。小昌又叫住小旦说：“旦哥！到我那里我跟你说话！”小旦就跟着他同大家一同走出来。

小宝想到聚财家通个信，又觉着不遵守会上的纪律不好，回到家睡下了又睡不着，觉着不通个信总对不住，才又穿上衣裳往聚财家来。他在门外叫了叫金生，金生给他开了门，领他到自己屋里谈话。他把会上讨论聚财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金生，叫他们作个准备。金生问他还决定了些谁，他说：“光给你送个信就算犯纪律了。别的就再不能说了！”金生注意了自己家里的事，也无心再问别人，就把小宝送出来。最不妙的是小宝一出门，正遇上小旦从小昌那里出来往回走，谁也能看见对面是谁，可是谁也没有跟谁说话就过去了。

第二天开了群众大会，是小昌的主席。开会以后，先讲了一遍挤封建和填平补齐的话，接着就叫大家提户。村里群众早有经验，知道已经是布置好了的，来大会上提出不过是个样子，因此都等着积极分子提，自己都不说话。有个积极分子先提出刘忠，说出他是封建尾巴的条件，别的积极分子们喊了些打倒的口号，然后就说“该怎么办？”又有个积极分子提出“扫地出门”，照样又有人喊了些“赞成”，就举手表决。因为刘家从前逼得叫人家扫地出门的人太多了，这次叫他扫地出门，大家也觉

着应该，举拳头的就特别多。通过了刘忠，接着就提出哪几户真有条件。这时候，干部积极分子自然还是那股劲，别的群众，也有赞成的，也有连拳头也懒得举的，反正举起手来又没人来数，多多少少都能通过。这几户过去以后，就提出刘锡恩。一提出这个户，会场上就有点不大平静，从人们的头上看去，跟高粱地里刮过风来一样，你跟我碰头我跟你对脸；大家也不知说些什么，只听得好像一伙小学生低声念书。头里提出叫刘忠扫地出门，锡恩还举过手；这会提到他头上，真是他想不到的事。小四和他很近，悄悄问他：“怎么还有你？”他说：“不清楚！”小四又问：“不知道有我没有？”他又说：“不清楚！”他又听得积极分子提出他的封建条件是他爹当过总社头，他大声说：“那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从我爹死了我娘当家时候，就穷得连饭也吃不上了……”积极分子们不听他说完，就乱喊“父债子要还”，“反对封建尾巴巧辩”，“不用听他那一套，表决吧”……表决的时候，在五六百人的大会上，只有四十来个干部和积极分子东一只西一只稀稀举了几个拳头，群众因为谁也弄不清会不会提到自己头上，不止没人去数，连看也没心看，也就算通过了。锡恩以下，又提了几户中农，也有决定没收的，也有叫献地献东西的；起先提出条件来，本人还辩白几句，后几户本人不等提完条件，就都说：“不用提那些了，光说是没收呀还是献吧！”

提到聚财名下，聚财因为早有准备，应付得很妥当，没有费劲就过去了，决定叫他闺女和刘忠解除婚约，把受下的礼物一律退出来算成没收刘忠的东西，再献出沟里的十几亩好地和二十石麦子。

这时候，小旦跑到小昌跟前低低说：“提吧？”小昌点了

点头。小且大声说：“聚财的问题算是过去了，聚财还有个走狗我提议也斗一斗？”别的积极分子都问是谁，小且说：“你看聚财今天应酬得多么顺当？人家早有准备了。昨天夜里，我们在区上开会回来的人，又开了个会谈今天的工作，散会以后，小宝就跑到聚财家里去透气，直到半夜多了，我亲自见他从小宝家里出来。这回斗聚财，我也该捎带他一下！”别的积极分子一听这话，差不多都说小宝办这事见不得人，有人喊叫“叫他坦白！”小宝说：“坦白什么？谁能不到别人家走走？他要不到别人家去，怎么在半夜以后碰上我？”小昌说：“小宝！你不要胡扯！小且哥是我把人家叫去谈话，又不是到哪个斗争对象家里去来！”又有人说：“胡扯不行！你说你的！”小宝说：“那还说什么？你们说该斗就斗吧！”这一下可把他们顶得没说的。因为小宝家里只有三四亩坡地也没工夫做，荒一半熟一半，一年不打几颗粮食，凭自己的工钱养活他娘。从前给刘家赶骡子，这几年刘家倒了，就又给合作社赶骡子，反正只凭个光杆子人过日子，要说斗他，实在也斗不出什么果实来。隔了一会，有人说：“再不能叫他算积极分子！”小宝说：“不算就不算！”“这次不分给他果实！”“不分给算拉倒！这几年没果实没有过日子？”“不叫他给合作社赶骡子！”“不赶就不赶！我再找东家！”小且那些人，不论怎么会讹人，碰上这没油水的人也再没有什么办法。有人说：“算算算！不要误这闲工！再提别的户！”别人也再不说什么，小宝这一户也就算过去了。会从早饭以后开到晌午多，把二十一户都过完了，就散了。吃过午饭，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分开组到决定没收的各户去登记东西，不过没有叫小宝去。

聚财回到家，午饭也没有吃，一直跟做梦一样想不着为什

么能叫人家当封建斗了。晚饭时候，一家人坐在一处发愁：地叫人家把筋抽了，剩下些坡地养不住一家；粮食除给人家二十石麦子，虽然还有些粗粮，也是死水窝窝，吃一斗少一斗；想不到父子们开了多年荒地，才算弄得站住步就又倒下来。老婆说怨他不早跟刘家退婚，他说退了也不算，人家还会找别的毛病；老婆又说进财就没有事，可见退了也许没有事……两个人正争吵不清，安发领着小旦又来了。聚财觉着小旦到哪里，总没有吉利事，忙问安发“什么事”。安发说：“什么事？愁人事！”小旦说：“安发！这又不能多耽搁时候，你跟你姐夫直说吧！”安发就把聚财叫到一边说：“他又来给咱软英说媒来了！小昌托他当媒人，叫把咱软英许给他小贵。他说要愿意的话，还能要求回几亩好地来；要不愿意的话，他捉着咱从前给刘家开那礼物单，就要说咱受过刘家的真金镯子，叫群众跟咱要……”聚财从大会上回来就闷着一肚子气没处发作，这会子就是碰上老虎也想拔几根毛儿，因此不等安发往下说，就跳起来说：“放他妈的狗屁！我有个闺女就成了我的罪了！我的闺女不嫁人了！刘家还有给我送的金山银山啦！谁有本事叫他来要来吧！”他老婆跟金生、软英，听见他大喊大叫，恐怕他闯下祸，赶紧跑过来劝他。他老婆说：“我的爹！什么事你这样发急？”又指着小旦悄悄说：“那东西是好惹的？”聚财说：“他就把我杀了吧，我还活得岁数少啦？就弄得我扫地出门吧，我还不会学我爹去逃荒？他哪一个抖起我的火来我跟他哪一个拼！人一辈总要死一回，怕什么？”他们三个人见他在气头上说不出个头尾来，就问安发，安发才把小旦又来说媒的事又说给他们。小旦平常似乎很厉害，不过真要有人愿意跟他拼命，他也不是个有种的。聚财发作罢了，握住拳头蹲在炕上等他接

话，他却一声不响坐在火边吸起纸烟来。

软英这时候，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闺女，遇事已经有点拿得稳了。她听她舅舅说明小旦的来意之后，就翻来覆去研究。她想：“说气话是说气话，干实事是干实事。如今小昌是农会主任，也是主要干部，决定村里的事他也当好多家，惹不起。自己家里的好地叫人家要走了，要能顺着些小昌，也许能要求回一些来。只是小昌要自己嫁给小贵那自然是马虎不得的事，反正除了小宝谁也不能嫁给他。”又想顺着些小昌，又不能嫁给小贵，这事就难了，她想来想去，一下想到小贵才十四岁，她马上得了个主意。她想：“听小宝说男人十七岁以上才能定婚（晋冀鲁豫当时的规定），小昌是干部，一定不敢叫他那十四岁孩子到区上登记去，今天打发小旦来说，也只是个私事，从下了也不过跟别家那些父母主婚一样，写个帖儿。我就许下了他，等斗争过后，到他要娶的时候，我说没有那事，他见不得官，就是见了官，我说那是他强迫我爹许的，我自己不愿意，他也没有办法。”她把主意拿好，就到火炉边给小旦倒了一盅水，跟小旦说：“叔叔你喝水吧！我爹在气头上啦！你千万不要在意！说到我本身的事啦，我也大了，如今自己作主，跟我说就可以，我爹要不愿意我慢慢劝他，他也主不了我的事。”小旦见有人理他了，本来还想说几句厉害话转一转脸色，又觉着这么一个漂亮的大姑娘给自己端茶捧水，要再发作几句，还不如跟他胡拉扯几句舒服，因此就跟软英谈起来。小旦说：“说媒三家好，过后两家亲，成不成与我没什么关系！要是从前，这些事不能直接跟你们孩子们说，如今既然行自己做主了，叔叔就跟你说道个没大小话：你觉着人家小昌那家怎么样？”软英说：“不赖！人家是翻身户，又是大干部，房有房、地有地，

还赖啦？不论哪家吧，还不比刘忠强？”小旦觉着她有点愿意的样子，就故意说：“就是孩子小一点！是不是？”软英故意笑了笑说：“小慢慢就长大了吧！大的不能跟小处缩，小的还不能往大处长？”小旦见这个口气越来越近，就叫过安发来，聚财老婆也跟着过来了。小旦把软英愿意的话跟他俩人一说，聚财老婆跟软英说：“如今行这个新规矩了，你自己看着吧！”软英说：“我已经这么大了！胡沾住个家算了！有什么要紧？”……就这样三言五句把个事情解决了。小旦临走说：“好！回头择个好日子过个帖子吧！”

小旦走后，安发问软英说：“你真愿意呀，还是怕他跟你爹闹气？”软英说：“就那吧！有个什么愿意不愿意！”安发也只当她愿意，就走了。

安发走后，聚财和他老婆又问软英说：“你真愿意呀还是受着屈？”软英说：“过了一步说一步吧！”他们也只当她是怕她爹过不去，受着屈从下了。

第二天小宝听说了，悄悄跟软英说：“你可算找了个好主儿！”软英说：“想干了他的脑袋！他那庙院还想放下我这神仙啦？”接着把自己那套主意细细告给小宝，并且告他说：“你到外面，要故意骂我丧良心才好！”

四、“这真是个说理地方！”

聚财本来从刘家强要娶软英那一年就气下了病，三天两天不断肚疼，被斗以后这年把工夫，因为又生了点气，伙食也不好，犯的次数更多一点，到了这年（一九四七）十一月，政府公布了土地法，村里来了工作团，他摸不着底，只说是又要斗

争他，就又加了病——除肚疼以外，常半夜半夜睡不着觉，十来天就没有起床，赶到划过阶级，把他划成中农，整党时候干部们又明明白白说是斗错了他，他的病又一天一天好起来。赶到腊月实行抽补时候又赔补了他十亩好地，他就又好得和平常差不多了。

他还有一宗不了的心事，就是软英的婚姻问题。从工作团才来时候，小宝就常来找软英，说非把这件事弄个明白不行。他哩，还是他那老思想，不想太得罪人。他想：斗错了咱，人家认了错，赔补了地，虽说没有补够自己原有的数目，却也够自己种了，何必再去多事？小旦、小昌那些人都不是好惹的，这会就算能说倒他们，以后他们要报复起来仍是麻烦。他常用这些话劝软英，软英不听他的。有一次，他翻来覆去跟软英讲了半夜这个道理，软英说：“谁不怕得罪我，我就不怕得罪谁！我看在斗刘家那时候得罪小旦一回，也许后来少些麻烦！”

腊月二十四这天，早饭以后，村支部打发人来找软英，说有个事非她去证不明白。一说有事，聚财和软英两个人都知道是什么事，不过软英是早就想去弄个明白，聚财是只怕她去得罪人，因此当软英去了以后，聚财不放心，随后也溜着去看风色。

自从整党以来，村支部就在上年没收刘家那座前院里东房开会。这座院子，南房里住的是工作团，东房里是支部开整党会的地方，西房是农会办公的地方。到了叫软英这一天，整党抽补都快到结束时候，西房里是农会委员会开会计划调剂房子，东房里是支部开会研究党员与群众几个不一致的意见。

聚财一不是农会委员，二不是党员，三则支部里、农会里也没有人叫过他，因此他不到前院来，只到后院找安发，准备

叫安发替他去打听打听。他一进门，安发见他连棍子也不挂了，就向他说：“伙计！这会可算把你那讨吃棍丢了？”聚财笑着说：“只要不把咱算成‘封建’，咱就没有病了！”安发说：“还要把你算成‘封建’的话，我阁外那五亩好地轮得上你种？”聚财说：“你也是个农会委员啦，斗了咱十五亩地只补了十亩，你也不给咱争一争？既然说是错斗了我，为什么不把我原来的地退回来？”安发说：“算了算了！提起补地这事情，你还不知道大家作的什么难！工作团和农代会、农会委员会整整研究了十几天，才研究出这个办法来！你想：斗地主的地，有好多是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多占了，错斗中农的地又都是贫雇农分了。如今把干部积极分子多占的退出来，补给中农和安置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全村连抽带补只动五十多户；要是叫贫雇农把分了中农的地退出来，再来分干部积极分子退出来的多占土地，就得动一百五十多户。一共二百来家人一个村子，要动一百五十多户，不是要弄个全村大乱吗？我觉着这回做得还算不错，只是大家的土地转了个圈子。象去年斗你那十五亩地，还分给了我三亩，今年小昌退出阁外边我那五亩又补了你。那地是刘锡元从我手讹诈去的，斗罢刘锡元归了小昌，小昌退出来又补了你，你的可是分给了我，这不是转了个大圈子吗？”聚财说：“小昌他要不多占，把你阁外那地早早分给你，这个圈子就可以不转，也省得叫我当这一年‘封建’？”安发说：“这个他们都已经检讨过了。就是因为他们多占了。窟窿多没有补丁，才去中农身上打注意，连累得你也当了一年‘封建’。这次比那次也公道：除了没动过的中农以外，每口人按亩数该着二亩七，按产量该着五石一，多十分之一不抽，少十分之一不补；太好太坏的也换了一换，差不多的也就算了。你不是嫌补

的你亩数少吗？照原产量，给你换二十亩也行，只要你不嫌坏！”聚财说：“我是跟你说笑！这回补我那个觉着很满意！咱又不是想当地主啦，不论吃亏便宜，能过日子就好！——伙计！你不是委员吗？你怎么不去开会？”安发说：“今天讨论调剂房子，去村里登记农会房子的人还没有回来。”聚财说：

“人家支部里打发人把咱软英叫去了。这孩子，我怕她说话不知轻重，再得罪了人家谁。咱才没有了事，不要再找出事来！你要去前院西房里开会，给我留心听一听她说些什么妨碍话没有！”安发说：“不用管她吧！我看人家孩子们都比咱们强。咱们一辈子光怕得罪人，也光好出些事，因为咱越怕得罪人，人家就越不怕得罪咱！”聚财觉着他这话也有道理。

正说着，老拐进来了。他和聚财打过招呼，就坐下跟安发说：“你是咱贫农组组长，这次调剂房子，可得替我提个意见调剂个住处。”安发说：“上次你不是在小组会上提过了吗？已经给你转到农会了。”聚财说：“老拐！今年可以吧？”老拐说：“可以！有几亩地，吃穿就都有了，就是缺个住处，打几颗粮食也漏上水了。”……

小旦也来找安发。他说：“安发！抽补也快完了，我这人贫农团算是通过了没有？”安发说：“上级又来了指示，说象咱这些贫农不多的地方，只在农会下边成立贫农小组，不成立贫农团了。”小旦说：“就说贫农小组吧，也不管是贫农什么吧，反正我是个贫农，为什么不要我？工作团才来的时候，串连贫农我先串连，给干部提意见我先提，为什么组织贫农时候就不要我了？”安发说：“抽补也快结束了，这会你还争那有什么用途？”小旦说：“嘻！叫我说这抽补还差得多啦，工作团都不摸底，干部、党员们多得的浮财跟没有退一样，只靠各人的反

省退了点鸡毛蒜皮就能算了事吗？听工作团说，就只抽这一回了，咱们这贫农要再不追一追，就凭现在农会存的那点浮财，除照顾了扫地出门的户口，哪里还分得到咱们名下？”安发说：

“咱也不想发那洋财。那天开群众大会你没有听工作团的组长讲，‘平又不是说一针一线都要平，只是叫大家都能生产都能过日子就行了。’我看把土地抽补了把房子调剂了，还不能过日子的就是那些扫地出门的户，农会存的东西补了人家也就正对，咱又不是真不能过日子的家，以后慢慢生产着过吧！”小旦听着话头不对，就抽身往外走，临走还说：“不管怎样吧，反正我也还愿意入组，遇着你们组里开会也可以再给我提提！”说着连回话也不听就走出去，看样子入组的劲头也不大了。他走远了，聚财低低地说：“他妈的！他又想来出好主意！”安发说：“工作团一来，人家又跑去当积极分子，还给干部提了好多意见，后来工作团打听清楚他是个什么人，才没有叫他参加贫农小组。照他给干部们提那些意见，把干部们说得比刘锡元还坏啦！”聚财低低地说：“像小昌那些干部吧，也就跟刘锡元差不多，只是小旦说不起人家，他比人家坏得多，不加上他，小昌或许没有那么坏！”安发说：“像小昌那样，干部里边还没有几个。不过就小昌也跟刘锡元不一样。刘锡元那天生是穷人的对头，小昌却也给穷人们办过些好事，像打倒刘锡元，像填平补齐，他都是实实在在出过力的，只是权大了就又蛮干起来。小旦提那意见还不止是说谁好谁坏，他说‘……一个好的也没有，都是一窝子坏蛋，谁也贪污得不少，不一齐扣起来让群众一个一个追，他们是不会吐出来的！’”老拐说：“他还要追人家别人啦！他就没有说他回回分头等果实，回回是窟窿，分得那些骡子、粮食、衣裳，吃的吃了，卖的卖了，比

别人多占好几倍，都还吐不吐？”聚财说：“说干部没有好的那也太冤枉，好的就是好的。我看像人家元孩那些人就不错！”安发说：“那自然！要不群众就选人家当新农会主席啦？”

他们正说着闲话，狗狗在院里喊叫：“妈！二姑来了！”安发老婆听说二姨来了，从套间里跑出来，安发他们也都迎出来。老拐没有别的事，在门边随便跟客人应酬了两句话就走了。狗狗一边领着二姨进门，一边问：“二姑！你怎么没有骑驴？”二姨说：“驴叫你姑夫卖了，还骑上狗屁？”狗狗又笑着说：“二姑！你记得我前几年见了你就跟你要甚来呀？”二姨也笑着说：“狗狗到底大了些，懂事多了！要什么？还不是要花生？今年要也不行，你姑夫因为怕斗争，春天把花生种子也吃了，把驴也卖了！——大姐夫，听说你病了几天，我也没有来看看你！这几天好些？”聚财说：“这几天好多了！——你们家里后来没有什么事吧？”二姨说：“倒也没事，就是心慌得不行。听说你们这里来了工作团，有的说是来搞斗争，有的说是来整干部，到底不知道还要弄个甚。我说到这年边了，不得个实信，过着年也心不安，不如来打听打听！”聚财说：

“这一回工作做得好！不用怕！……”接着他和安发两个人，就预备把划阶级、赔补中农、安插地主富农、整党……各项工作，都给二姨介绍了一下。正介绍到半当腰里，忽听得前院争吵起来。聚财听了听说：“这是小宝说话！安发你给咱去看看是不是吵软英的事？”安发说：“咱们都去看看吧！”聚财说：“我也能去？”安发说：“可以！这几天开整党会，去看的人多啦！”说着，他们三个人就到前院里来。

这天的整党会挪在院里开，北房门关着，正中间挂着共产

党党旗和毛主席像，下面放着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凳子。工作团的同志们坐在阶台上，区长和高工作人员也在内，元孩站在桌子后当主席，阶台下前面坐的是十七个党员，软英和小宝虽不是党员，因为是支部叫来的，也坐在前面，后面便是参观的群众。当聚财他们进去的时候，正遇上小昌站着讲话，前边不知道已经讲了些什么，正讲到“……我跟你什么仇恨也没有！我是个共产党员，不能看着一个同志去跟个有变天思想的人接近！不能看着一个同志去给斗争对象送情报！不能看着一个同志去勾引人家的青年妇女！我们党内不要这种人！况且开除你也不是我一个人作的主，我提议的，支部通过的，支部书记元孩报上去的，区分委批准的，如今怎么能都算到我眼上？”聚财听了这么个半截话，似乎也懂得是说小宝，也懂得“有变天思想”和“斗争对象”是指自己，也懂得“勾引青年妇女”是指小宝跟软英的关系，只是不懂“开除”是什么意思。小昌说了坐下，小宝站起来说“我说！”软英跟着也站起来说“我说！”元孩说：“小宝先说！”小宝说：“党开除我没话说，因为不论错斗不错斗，那时候软英她爹总算是斗争对象，大会决定不许说，我说了是我犯了纪律，应该开除。可是我要问：他既然是共产党员，又是支部委员，又是农会主任，为什么白天斗了人家，晚上就打发小旦去强逼人家的闺女跟他孩子定婚？那就也不是‘斗争对象’了？也没有‘变天思想’了？说我不该‘勾引青年妇女’，‘强逼’就比‘勾引’好一点？我这个党员该开除，他这个党员就还该当支委？”小宝还没有坐下，小昌就又站起来抢着说：“明明是‘自愿’，怎么能说我是‘强迫’？”元孩指着小昌说：“你怎么一直不守规矩？该你说啦？等软英说了你再说！坐下！”小昌又坐下了。聚财悄悄

跟安发说：“这个会倒有点规矩！”安发点了点头。软英站起来说：“高工作人员在这里常给我们讲‘妇女婚姻要自主’，我跟小宝接近，连我爹我娘都不瞒，主任怎么说人家是‘勾引’我？要是连接近接近也成了犯法的事，那还自主什么？主任又说我愿意嫁给他孩子，我哪有那么傻瓜？我也是二十多的人了，放着年纪相当的人我不嫁，偏看中了他十四五岁个毛孩子？要不是强逼，为什么跟我爹要金镯子？”软英说完了，小昌又站起来说：“我说吧？我看这事情非叫小旦来不行！你们捏通了，硬说我要金镯子！我叫小旦来说说，看谁跟他提过金镯子？”后边参观的群众有人说：“还用叫小旦？聚财、安发都在这里，不能叫他两个人说说？”聚财远远地说：“不跟我要金镯子的话我还许少害几天病！还是找小旦来吧！省得人家又说我们是捏通了！”元孩说：“我看还是去找小旦吧！要金镯子这事也不止谈了一次了，不证明一下恐怕再谈也没结果！”别的党员们也都主张叫小旦来证明一下，元孩就打发村里的通讯员去找。

这时候，登记农会房子的人也回来了，安发和别的农会委员们都回西房里议论调剂房子的事。元孩是新农会主席，可是因为在整党会上当着主席，只好把西房里的事托给副主席去管。

不多一会，把小旦找来了，整党会又接着开起来。小昌说：“小旦哥！你究竟说说你给我说媒那事是自愿呀是强迫？”小旦想把自己洗个干净，因此就说：“我是有甚说甚，不偏谁不害谁！主任有错，我也提过意见，不过这件事可不是人家主任强迫她。如今行自主，主任托我去的时候，我是亲自跟软英说的。那时候，他给我倒了一盅水，跟我说……”接着就把软英给他倒上

水以后的那些话，详详细细实实在在说了一遍，然后说：“我说这没有半句瞎话，大家不信可以问安发。”软英说：“不用问我舅舅了，这话半句也不差，可惜没有从头说起，让我补一补吧：就是斗争了我爹那天晚上，小旦叔，不，小旦！我再不叫他叔叔了！小旦叫上我舅舅到了我家，先叫我舅舅跟我爹说人家主任要叫你软英嫁给人家孩子。说是要从下还可以要求回几亩地，不说的话，就要说我爹受了人家刘家的金镯子。没收了刘家的金镯子主任拿回去了——后来卖到银行谁不知道？那时候跟我爹要起来，我爹给人家什么？我怕我爹吃亏，才给小旦倒了一盅水，跟他说了那么一大堆谎话，大家说这算不算自愿？他小旦天天哄人啦，也上我一回当吧！”小旦早就想打断她的话，可惜找不住个空子，一听到她说了自己个“天天哄人”，马上跳起来指着软英喊：“把你的嘴收拾干净点！谁天天哄人啦？”高工作人员喝住他说：“小旦你捣什么乱？屈说了你？我还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小旦这才算又坐下了。参观的群众有人小声说：“还辩什么？除了小旦谁会办这事？”没有等小昌答话，别的党员们你一句我一句都质问起来：“小昌！你这个党员体面呀？”“小昌！你向支部汇报过这事没有？”“小昌！你这几天反省个甚？”……元孩气得指着问他说：“有你这种党员，咱这党还怎么见人啦？”小昌眼里含着泪哀求小旦说：

“小旦哥！你凭良心说句话，我托你去说媒，还叫你问人家要过金镯子？”小旦说：“要说实的咱就彻底说实的，在斗争会的头一天晚上，你把我叫到你家，托我给你去办这事，你说：‘明天斗争完了，趁这个热盘儿容易办。’我说人家早就要‘自由’给小宝，你说：‘不能想个办法先把小宝撵过一边？’”恰巧我那天晚上回去就碰见小宝跟聚财家出来，第二天早上我又

跟你商量先斗小宝，你说可以，那天就把小宝也斗了。到了晚上我去叫安发，顺路到你那里问主意。我说：‘不答应怎么办？’你说：‘你看着吧！对付小宝你还能想出办法来，还怕对付不了个聚财？’你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人？你叫我看着办，我要不出点坏主意怎么能吓唬住人？要金镯子的主意是我出的，东家可是你当的！”听小旦这么一说，聚财在后边也说了话。他说：“我活了五十四岁了，才算见小旦说过这么一回老实话！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他说了这么两句话，一肚子闷气都散了，就舒舒服服坐下去休息，也再没有想到怕他们报复。小宝又站起来说：“主席！这总能证明斗争我是谁布置的吧？这总能证明要过金镯子没有吧？这总能证明是强迫呀还是自愿吧？”另一个党员说：“主席！只这一件事我也提议开除小昌！”另有好几个党员都说：“我也附议”，“我也附议”……

元孩向大家说：“我看这件事就算说明了，今天前晌的会就开到这里吧！处分问题，我看还是以后再说，因为小昌的事情还多，不能单以这件事来决定他的处分。以下请组长讲话！”

工作团的组长站起来说：“这件事从工作团来到这里，小宝就反映上来了，我们好久不追究，为的是叫小昌自己反省。从今天追究出来的实际情形看，小昌那反省尽是胡扯淡啦！小昌！你想想这是件什么事？为了给自己的孩子订婚，在党内党外布置斗争，打击自己的同志，又利用流氓威胁人家女方，抢了自己同志的恋爱对象，这完全学的是地主的套子，哪里象个党员办的事？最不能原谅的，是你在党内反省了一个多月，一字也没有提着这事的真象，别人一提你就辩护，这哪里像个愿意改

过的人？给你个机会叫你反省你还不知道自爱，别人谁还能挽救你？你这种行为应该受到党的处分！此外我还得说说小旦！小旦！我们今天开的是整党会，你不是党员，这个会上自然不好处分你。不过我可以给你先捎个信：你不要以为你能永远当积极分子！在下河村谁也认得你那骨头！土改以后，群众起来了！再不能叫你像以前那样张牙舞爪了，从前得罪过谁，老老实实去找人家赔情认错！人家容了你，是你的便宜；人家不容你，你就跟人家到人民法庭上去，该着什么处分，就什么处分！那是你自作自受，怨不着别人！”

组长讲完了，元孩就宣布散会。大家正站起来要走，软英说：“慢点！我这婚姻问题究竟算能自主不能？”区长说：“整党会上管不着这事！我代表政权答复你：你跟小宝的关系是合法的。你们什么时候想定婚，到区上登记一下就对了，别人都干涉不着。”

散会以后，二姨挤到工作团的组长跟前说：“组长！我是上河人！你们这工作团不能请到我们上河工作工作？”组长说：“明年正月就要去！”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

传家宝

一

有个区干部叫李成，全家一共三口人——一个娘、一个老婆，一个他自己。他到区上做工作去，家里只剩下婆媳两个，可是就只这两个人，也有些合不来。

在乡下，到了阴历正月初二，照例是女人走娘家的时候，在本年（一九四九年）这一天早饭时，李成娘又和媳妇吵起来：

李成娘叫着媳妇的名字说：“金桂！准备准备走吧！早点去早点回来！”他这么说了，觉着一定能叫媳妇以为自己很开明，会替媳妇打算。其实她这次的开明，还是为她自己打算：她有个女儿叫小娥，嫁到离村五里的王家寨，因为女婿也是区干部，成天不在家，一冬天也没顾上到娘家来。她想小娥在这一天一定要来，来了母女们还能不谈谈心病话？她的心病话，除了评论媳妇的短处好象再没有什么别的，因此便想把媳妇早早催走，免得一会小娥回来了说话不方便。

金桂是个女劳动英雄，一冬天赶集卖煤，成天打娘家门过来过去，几时想进去看看就进去看看，根本不把走娘家当件稀罕事。这天要是村里没有事，她自然也可以去娘家走走，偏是年头腊月二十九，区上有通知，要在正月初二这一天派人来村里开干部会，布置结束土改工作，她是个妇联会主席，就不能

走开。她听见婆婆说叫她走走娘家，本来可以回答一句“我还要参加开会”，可是她也不想这样回答，因为她知道婆婆对她当干部这个事早就有一大堆不满意，这样一答话，保不定就会吵起来，因此就另找了个理由回答说：“我暂且不去吧！来了客人不招待？”

婆婆说：“有什么客人？也不过是小娥吧？她来了还不会自己做顿饭吃？”

金桂说：“姐姐来了也是客人呀？况且还有姐夫啦？”

婆婆不说什么了，金桂就要切白菜，准备待客用。她切了一棵大白菜，又往水桶里舀了两大瓢水，提到案板跟前，把案板上的菜搓到桶里去洗。

李成娘一看见金桂这些举动就觉着不顺眼：第一、她觉着不象个女人家的举动。她自己两只手提起个空水桶来，走一步路还得叉开腿，金桂提满桶水的时候也才只用一只手；她一辈子常是用碗往锅里舀水，金桂用的大瓢一瓢就可以添满她的小锅，这怎么象个女人？第二、她洗一棵白菜，只用一碗水，金桂差不多就用半桶，她觉着这也太浪费。既然不顺眼了，不说两句她觉得不痛快，可是该说什么呢？说个“不象女人吧”，她知道金桂一定不吃她的，因此也只好以“反对浪费”为理由，来挑一下金桂的毛病：“洗一棵白菜就用半桶水？我做一顿饭也用不了那么多！”

“两瓢水吧，什么值钱东西？到河里多担一担就都有了！”金桂也提出自己的理由。

“你有理！你有理！我说的都是错的！”李成娘说了这两句话，气色有点不好。

金桂见婆婆鼓嘟了嘴，知道自己再说句话，两个人就会吵

起来，因此也就不再还口，沉住气洗自己的菜。

李成娘对金桂的意见差不多见面就有：嫌她洗菜用的水多、炸豆腐用的油多、通火有些手重、泼水泼得太响……不说好象不够个婆婆派头，说得她太多了还好顶一两句，反正总觉得不能算个好媳妇。金桂倒很大方，不论婆婆说什么，自己只是按原来的计划做自己的事，虽然有时候顶一两句嘴，也不很认真。她把待客用的菜蔬都准备好，洗了占不着的家具，泼了水，扫了地上的菜根葱皮，算是忙了一个段落。

把这段事情作完了，正想向婆婆说一声她要去开会，忽然觉得房子里总还有点不整齐，仔细一打量，还是婆婆床头多一口破黑箱子。这口破箱子，年头腊月大扫除她就提议放到床下，后来婆婆不同意，就仍放在床头上，可是现在看来，还是搬下去好——新毯子新被褥头上放个呲牙裂嘴的破箱子，象个什么摆设？她看了一会，跟婆婆商量说：“娘！咱们还是把这箱子搬下去吧？”

婆婆说：“那碍你的什么事？”

婆婆虽然说得带气，金桂却偏不认真，仍然笑着说：“那破破烂烂象个什么样子？你不怕我姐夫来了笑话？来，咱们搬了吧！”

婆婆仍然没好气，冷冰冰地说：“你有气力你搬吧！我跟你搬不动！”

她满以为不怕金桂有点气力，一个人总搬不下去，不想金桂仍是笑嘻嘻地答应了一声“可以”，就动手把箱子一拖拖出床沿，用胸口把一头压低了，然后双手抱住箱腰抱下地去，站起一脚又蹬得那箱子溜到床底。

金桂费了一阵气力，才喘了两口气，谁知道这一下就引起

婆婆的老火来。婆婆用操场上喊口令的口气说：“再给我搬上来！我那箱子在那里摆了一辈子了！你怕丢人你走开！我不怕丢我的人！”金桂见婆婆真生了气，弄得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不该多事。婆婆仍是坚持“非搬上来不可”。

其实也不奇怪。李成娘跟这口箱子的关系很深，只是金桂不知道罢了。李成娘原是个很能做活的女人，不论春夏秋冬，手里没做的就觉着不舒服。他有三件宝：一把纺车，一个针线筐和这口黑箱子。这箱子里放的东西也很丰富，不过样数很简单——除了那个针线筐以外，就只有些破布。针线筐是柳条编的，红漆漆过的，可惜旧了一点——原是她娘出嫁时候的陪嫁，到她出嫁时候，她娘又给她作了陪嫁，不记得哪一年磨掉了底，她用破布糊裱起来，以后破了就糊，破了就糊，各色破布不知道糊了多少层，现在不只弄不清是什么颜色，就连柳条也看不出来了。里边除了针、线、尺、剪、顶针、钳子之类，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破布也不少，恐怕就有二三十斤，都一捆一捆捆起来的。这东西，在不懂得的人看来一捆一捆都一样，不过都是些破布片，可是在李成娘看来却不那样简单——没有洗过的，按块子大小卷；洗过的，按用处卷——那一捆叫补衣服、那一捆叫打褙^①、那一捆叫垫鞋底；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记号——有用布条捆的，有用红头绳捆的，有用各种颜色线捆的，跟机关里的卷宗^②上编得有号码一样。装这些东西的黑箱子，原来就是李家的，可不知道是哪一辈子留下来的——榫卯^③完全坏了，角角落落都钻上窟窿用麻绳穿着，底上

①打褙，就是用面糊把破布裱起来叫做鞋用。

②卷宗，就是公事。 ③榫卯，官名叫“榫子”。

棧上被老鼠咬得跟鋸齒一樣，漆也快脫落完了，只剩下巴掌大小一片一片的黑片。這一箱里表都在數，再加上一架紡車，就是李成娘的全部家當。她守着這份家當活了一輩子，補補衲衲，哪一天離了也不行。當李成爹在的時候，她本想早給李成娶上個媳婦，把這份事業一字一板傳下去，可惜李成爹在時，家里只有二畝山坡地，父子兩個都在外邊當雇漢，人越窮定媳婦越貴，根本打不起這主意。李成爹死后，共產黨來了，自己也分得了地，不多幾年定媳婦也不要錢了，李成沒有花錢就和金桂結了婚，李成娘在這時候，高興得面朝西給毛主席磕過好幾個頭^①。一九里^②，為了考試媳婦的針工，叫媳婦給她縫過一條褲子，她認為很滿意，比她自己做得細緻，可是過了幾個月，發現媳婦愛跟孩子到地里做活，不愛坐在家里補補衲衲，就覺得有點擔心，她先跟李成說：“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李成說：“我看還是地里活要緊！我自己是村里的農會主席，要多誤些工，地里有個人幫忙更好。”半年之后，金桂被村里選成勞動英雄，又選成婦聯會主席，李成又被上級提拔到區上工作，地里的活完全交給金桂做，家事也交給金桂管，從這以后，金桂差不多半年就沒有拈過針，做什么事又都是不問婆婆自己就作了主，這才叫李成娘著實悲觀起來。孩子在家的時候，娘對媳婦有意見可以先跟孩子說，不用直接打沖鋒；孩子走了只留下婆媳兩個，問題就慢慢出來了——婆婆只想拿她的三件寶貝往下傳，媳婦覺着那里邊沒大出息，接受下來也過不成日子，因此兩個人從此意見不合，誰也說不服

① 那時候毛主席在延安。

② 一九里，就是結婚后的九天里。

谁。只要明白了这段历史，你就会知道金桂搬了搬箱子，李成娘为什么就会发那么大脾气。

金桂见婆婆的气越来越大，不愿意把事情扩大了，就想了一个开解的办法，仍然笑了笑说：“娘！你不要生气了！你不愿意叫搬下来，我还给你搬上去！”说着低下头去又把箱子从床底拖出来，她正准备往上搬，忽然听得院里有个小女孩叫着：“金桂嫂！公所叫你去开会啦！区干部已经来了！”

二

这小女孩叫玉凤，和金桂很好，她在院里叫着“金桂嫂”就跑进来。李成娘一听说叫金桂去开会，觉着又有点不对头，嘴里嘟囔着说：“天天开会！以后就叫你们把‘开会’吃上！”

玉凤虽说才十三岁，心眼儿很多，说话又伶俐。她沉住气向李成娘说：“大娘！你还不知道今天开会干什么吗？”

“我倒管他哩？”李成娘才教训过金桂，气色还没有转过来。

玉凤说：“听说就是讨论你家的地！”

“那有什么说头？”

“听说你们分的地是李成哥自己挑的，村里人都不赞成。”

“谁说的？四五十个评议员在大会上给我分的地，村里谁不知道？挑的！……”玉凤本来是逗李成娘，李成娘却当了真。

李成娘认了真，玉凤却笑了。她说：“大娘！你不是说开会不抵事吗？哈哈……”

李成娘这时才知道玉凤是逗她，自己也忍不住一边笑，一边指着玉凤说：“你这小捣乱鬼！”

金桂把箱子从床下拖出来正预备往床上搬，玉凤就叫着进来了。她只顾听玉凤跟自己的婆婆捣蛋，也就停住了手站起来，等到自己的婆婆跟玉凤都笑了，自己也忍不住陪着她们笑了一声，笑罢了仍旧弯下腰去搬箱子。

李成娘这一会气已经消下去，回头看见床头上没有那口破箱子，的确比放上那口破箱子宽大得多，也排场得多，因此当金桂正弯腰去搬箱子的时候，她又变了主意：“不用往上搬了，你去开你的会吧！”

金桂见婆婆的气已经消了，自然也不愿意再把那东西搬起来，就答应了一声“也好”，仍然把它推回床下去，然后又把床上放箱子的地方的灰尘扫了一下。她一边扫，一边问玉凤：“区上谁来了？”

玉凤说：“你还不知道？李成哥回来了。”

“你又说瞎话！”

“真的！他没有回家来吗？”

正说着，李成的姐姐小娥就走进来，大家说了几句见面话以后，金桂问：“我姐夫没有来？”

小娥说：“来了！到村公所开会去了！——你怎么没有去开会？”

金桂抓住玉凤一条胳膊又用一个拳头在她头上虚张声势地问她：“你不是说是你李成哥回来了？”

玉凤缩住脖子笑着说：“一提他你去得不快点？”

“你这个小捣乱鬼！”金桂轻轻在玉凤脊背上用拳头按了一下放了手，回头跟小娥说：“姐姐！我要去开会，顾不上

招呼你！你歇一歇跟娘两个人自己做饭吃吧！”小娥也说：

“好！你快去吧！”李成娘为了跟小娥说起心病话来方便，本来就想把金桂推走，因此也说：“你去吧！你姐姐又不是什么生客！”金桂便跟玉凤走了，这时家里只留下她们母女两个。

小娥说：“娘！我一冬天也顾不上来看你一眼！你还好吧？”

“好什么？活受啦吧！”

“我看比去年好得多，床上也有新褥新被了！衣裳也整齐干净了！也有了媳妇了……”

李成娘的心病话早就闷不住了，小娥这一下就给她引开了口。她把嘴唇伸得长长地哼了一声说：“不提媳妇不生气。古语说：‘娶个媳妇过继出个儿’^①。媳妇也有本事孩子也有本事，谁还把娘当个人啦？”说着还落了几点老泪。她擦过泪又接着说：“人家一手遮天了，里里外外都由人家管，遇了大事人家会跑到区上去找人家的汉。人家两个人商量成什么是什么，大小事不跟咱通个风。人家办成什么都对！咱还没有问一句，人家就说‘你摸不着’！外边人来，谁也是光找人家！谁还记得有个咱？唉，小娥！你看娘还活得象个什么人啦？——说起心病来没个完。你还是先做饭吧！做着饭娘再慢慢告诉你！”

小娥说：“一会再做吧，我还不饿哩！”

“先做着吧！一会他姐夫回来也要吃！”

小娥也不再推，一边动手做饭，一边仍跟娘谈话。她说：“他姐夫给我们镇上的妇女讲话，常常表扬人家金桂，说她是劳动模范，要大家向她学习，就没有提到她的缺点，照娘这么

^①这是当地流行的一句俗语。

说起来，虽说她劳动很好，可也不该不尊重老人啊？”

李成娘又把她那下嘴唇伸得长长地哼了一声说：“什么好劳动？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她那劳动呀，叫我看来是狗捉老鼠，多管闲事！娶过她一年了，她拈过几回针？纺过几条线？”

小娥笑着说：“我看人家也吃上了，也穿上了！”

李成娘把下嘴唇伸得更长了些说：“破上钱谁不会耍派头？从前我一年也吃不了一斤油，人家来了以后是一月一斤。我在货郎担上买个针也心疼得不得了，人家到集上去鞋铺里买鞋，裁缝铺里做制服，打扮得很时行。”这老人家，说着就带了气，嗓子越提越高，“不嫌败兴！一个女人家到集上买着穿！不怕别人划她的脊梁筋①……”小娥见她动了气，赶紧劝她，又给她倒了碗水叫她润一润喉咙，又用好多别的话才算把她的话插断。

小娥很透脱，见娘对金桂这样不满意，再也不提金桂的事，却说着自己一冬天的家务事来消磨时间。可是女人家的事情，总与别的女人家有关系，因此小娥不论说起什么来，她娘都能和金桂的事往一处凑。比方小娥说到互助组，她娘就说“没有互助组来金桂也能往外边少跑几趟”；小娥提到合作社，她娘就说“没有合作社来金桂总能少花几个钱”；小娥说自己住在镇上很方便，她娘说就是镇上的方便才把金桂引诱坏了的；小娥说自己的男人当干部，她娘说就是李成当干部才把媳妇娇惯了的。

①也是当地的俗语，意思是说不怕别人指着她的脊背笑话她。

小娥见娘的话左右不摆脱金桂，就费尽心思捡娘爱听的说。她知道娘一辈子爱做针线活，爱纺棉花，就把自己年头一冬天做针线活跟纺棉花的成绩在娘面前夸一夸。她说她给合作社纺了二十五斤线，给鞋铺衲了八对千针底，给裁缝铺钉了半个月制服扣子。她说到鞋铺和裁缝铺，还生怕娘再提起金桂做制服和买鞋的事来，可是已经说开头了不得不说下去。她娘呢，因为只顾满意女儿的功劳，倒也没有打断女儿的话再提金桂的事，不过听到末了，仍未免又跟金桂连起来，她说：“看我小娥！金桂那东西能抵住我小娥一分的话，我也没有说的！她给谁纺过一截线？给谁做过一针活？”她因为气又上来了，声音提得很高，连门外的脚步声也没有听见，赶到话才落音，金桂就揭着门帘进来了，小娥的丈夫也跟在后面。

三

李成娘一见他们两个人进来，觉着“真他娘的不凑巧”。

小娥觉着不对，赶紧把话头引到另一边，她向自己丈夫说：“今天的会怎么散得这样快？”

她丈夫说：“这会只是和几个干部接一下头，到晚上才正式开会。”

只说了这么几句简单话大家坐下了，谁也再没有什么话说，金桂的脸色就很不平和。

金桂平常很大方，婆婆说两句满不在乎。可是这一次有些不同：小娥的丈夫是她的姐夫，可也是她的上级。她想婆婆在小娥面前败坏自己，小娥如何能不跟她自己的丈夫说？况且真要是自己的错误也还可说，自己确实没错只是婆婆的见解不

对，她觉着犯不着受这冤枉。

小娥的丈夫见她们婆媳的关系这样坏，也断不定究竟哪一方面对。他平常很信任金桂，到处表扬她，叫各村的妇女向她学习，现在听见她婆婆对她十分不满意，反疑惑自己不了解情况，对金桂保不定信任太过，因此就想再来调查研究一番。他见大家都不说话，就想趁空子故意撩一撩金桂。他笑着问小娥：“你们背地里谈论人家金桂什么事，惹得人家鼓嘟着嘴！”

金桂还没有开口，李成娘就抢先说：“听见叫她听见吧，我又没有屈说了她！你问她一冬天拈过一下针没有？纺过一寸线没有？”

婆婆开了口，金桂脸上却又和气得多了。金桂只怕没有机会辩白引起上级的误会，如今既然又提起来了，正好当面辩白清楚，因此反觉着很心平。她说：“娘！你说得都对，可惜是你不会算账。”又回头向小娥的丈夫说：“姐夫你给我算着：纺一斤棉花误两天，赚五升米；卖一趟煤，或做一天别的重活，只误一天，也赚五升米！你说还是纺线呀还是卖煤？”

小娥的丈夫笑了。他用不着回答金桂就向小娥说：“你也算算吧！虽然都还是手工劳动，可是金桂劳动一天抵住你劳动两天！我常说的‘妇女要参加主要劳动’，就是说要算这个账！”

李成娘觉着自己输了，就赶紧另换一件占理的事。她又说：“哪有这女人家连自己的衣裳鞋子都不做，到集上买着穿？”她满以为这一下可要说倒她，声音放得更大了些。

金桂不慌不忙又向她说：“这个我也是算过账的：自己缝一身衣服得两天；裁缝铺用机器缝，只要五升米的工钱，比咱缝的还好。自己做一对鞋得七天，还得用自己的材料，到鞋铺买对现成的才用斗半米，比咱做的还好。我九天卖九趟煤，五九

赚四斗五，缝一身衣服买一对鞋，一共才花二斗米，我为什么自己要做？”

等不得金桂说完，李成娘就又发急了。她觉着两次都输了，总得再争口气——嗓子再放大一点，没理也要强占几分。她大喊起来：“你做的对！都对！没有一件没理的！”又向女婿喊：“你们这些区干部，成天劝大家节约节约！我活了一辈子了，没有听说过什么是‘节约’，可是我一年也吃不了一斤油，我这节约媳妇来了是一月吃一斤。你们都会算账，都是干部！就请你们给我算算这笔账！”

她越喊得响亮，女婿越忍不住笑，等她喊完了，女婿已笑得合不上口。女婿说：“老人家，你不要急！我可以替你算算这笔账：两个人一月一斤油，一个人一天还该不着三钱，不能算多。‘节约’是不浪费的意思。非用不行的东西，用了不能算是浪费……”

李成娘说：“你们这些当干部的是官官相护！什么非用不行？我一辈子吃糠咽菜也活了这么大！”

金桂说：“娘！我不过年轻点吧，还不是吃糠长大的？这几年也不是光咱吃的好一点，你到村里打听一下，不论哪家一年还不吃一二十斤油？”

小娥的丈夫又帮助金桂说：“老人家！如今世道变了，变得不用吃糠了！革命就是图叫咱们不吃糠，要是图吃糠谁还革命哩？这个世道还是才往好处变，将来用机器种起地来，打下的粮食能抵住如今两三倍，不说一月吃一斤油，一天还得吃顿肉哩！”他这番话似乎已经把李成娘的气给平下去了，要是不再说什么也许就没事了，可是不幸又接着说了几句，就又引起了大事。他接着说：“老人家！依我说你只用好吃上些好穿上

些，过几年清静日子算了！家里的事你不用管它！”

“你这区干部就说是这种理？我死了就不用管了，不死就不能由别人摆布我！”李成娘动了大气，也顾不上再和女婿讲客气。她说金桂不做活、浪费还都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最要紧的是恨金桂不该替她作了当家人，弄得她失掉了领导权。她又是越说越带气：“这是我的家！她是我娶来的媳妇！先有我来先有她来？”

小娥的丈夫说：“老人家！不是说不该你管，是说你上年纪了，如今新事情你有些摸不着！管不了！”

“管不了？娶过媳妇才一年啊！从前没有媳妇我也活了这么大！她有本事叫她另过日子去！我不图沾她的光！大小事不跟我通一通风，买个驴都不跟我商量！叫她先把我灭了吧！”

金桂向来还猜不到婆婆跟自己这样过不去，这会听婆婆这么一说，也真正动了点小脾气。她说：“娘！你也不用跟我分家了！你想管你就管，我落上一个清静算了！”说着就跑回自己房里去。小娥当她回房去寻死，赶紧跟在她后面。可是当小娥才跑到她门口，她却挟了个小布包返出来跑到婆婆的房子里，向婆婆说：“娘！让我交代你！”

小娥看见已经呕成气了，赶紧拉住金桂说：“金桂！不要闹！娘是老糊涂了，象……”

小娥的丈夫倒很沉得住气，他也不劝金桂也不劝丈母，倒向小娥说：“你不用和稀泥！我看就叫金桂把家务交代给老人家也好！老人家管住家务，金桂清静一点倒还能多做一点活！”又回头向金桂挤了挤眼说：“金桂你不要动气！说正经的，你说对不对？”

金桂见姐夫是帮自己，马上就又转得和和气气地顺着姐夫

的话说：“谁动气来？”又向婆婆说：“娘！我不是跟你生气！我不知道你想管这个！你早说来我早就交代你了！”说着就打开小包，取出一本账和几叠票子来。

李成娘见媳妇拿出账本，还以为是故意难为她这不识字的人，就又说：“我不识字！不用拿那个来捉弄我！”

金桂仍然正正经经地说：“我才认得几个字？还敢捉弄人？我不是叫娘认字！我是自己不看账记不得！”

小娥的丈夫也爬到床边说：“让我帮你办交代！先点票子吧！”他点一叠向丈母娘跟前放一叠，放一叠报个数目——

“这是两千元的冀南票，五张共是一万！”“这是两张两千的，一张一千的，十张五百的，也一万！”……他还没有点够三万，丈母娘早就弄不清楚了，可是也不好意思说接管不了，只插了一句话说：“弄成各色各样的有什么好处，哪如从前那铜元好数？”女婿没有管她说话是什么，仍然点下去，点完了一共合冀南票的五万五。

点过了票，金桂就接着交代账上的事。她翻着账本说：“合作社的来往账上，咱欠人家六万一。他收过咱二斗大麻子，一万六一斗，二斗是三万二。咱还该分两三万块钱红，等分了红以后你好跟他清算吧！互助组里去年冬天羊踩粪，欠人家六升羊工伙食米。咱还存三张旧工票，一张大的是一个工，两张小的是四分工，共是一个零四分，这个是该咱得米，去年秋后的工资低，一个工是二升半。大后天组里就要开会结束去年的工账，到那时候要跟人家找清……”

婆婆连一宗也没听进去，已经觉得很厌烦。她说：“怎么有这么多的穷事情？麻麻烦烦谁记得住？”

小娥听着也替娘发愁，见娘说了话，也跟着劝娘说：“娘！

你就还叫金桂管吧，自己揽那些麻烦做甚哩？这比你黑箱子里那东西麻烦得多哩？”

李成娘觉着不止比箱子里的东西样数多，并且是包也没法包，卷也没法卷，实在不容易一捆一捆弄清楚。她这会倒是愿意叫金桂管，可也似乎还不愿意马上说丢脸话。

金桂仍然交代下去。她说：“不怕娘！只剩五六宗了——有几宗是和村公所，有几宗是和集上的，差务账上，咱一共支过十个人工八个驴工，没有算账。咱还管过好几回过路军人饭，人家给咱的米票，还没有兑。这两张，每张是十一两。这五张，每张是……”

“实在麻烦，我不管了！你弄成什么算什么！我吃上个清静饭拉倒！”李成娘赌气认了输，把腿边的一堆票子往前一推。

小娥的丈夫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我原来不是说叫你‘过几年清静日子算了’吗？”又向金桂说：“好好好！你还管起来吧！”又向小娥说：“我常叫你们跟金桂学习，就是叫学习这一大摊子！成天说解放妇女解放妇女，你们妇女们想真得到解放，就得多做点事、多管点事、多懂点事！咱们回去以后，我倒应该照金桂这样交代交代你！”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

田寡妇看瓜

南坡庄上穷人多，地里的南瓜豆荚常常有人偷，雇着看庄稼的也不抵事，各人的东西还得各人操心。最爱偷人的叫秋生，因为自己没有地，孩子老婆五六口，全凭吃野菜过日子，偷南瓜摘豆荚不过是顺路捎带。最怕人偷的是田寡妇，因为她园地里的南瓜豆荚结得早——南坡庄不过三四十家人，有园地的只是王先生和田寡妇两家，王先生有十来亩，可是势头大，没人敢偷；田寡妇虽说只有半亩，可是既然没人敢偷王先生的，就该她一家倒霉，因此她每年夏秋两季总要到园里去看守。

一九四六年春天，南坡庄经过土地改革，王先生是地主，十来亩园地给穷人分了；田寡妇是中农，半亩园地自然仍是自己的。到了夏天园地里的南瓜豆荚又早早结了果，田寡妇仍然每天到地里看守。孩子们告她说：“今年不用看了，大家都有了。”她不信，因为她只到过自己园里，王先生的园在哪里她都不知道。

也难怪她不信孩子们的话，她有她的经验：前几年秋生他们一伙人，好象专门跟她开玩笑——她一离开园子就能丢了东西。有一次，她回家去端了一碗饭，转来了，秋生正走到她的园地边，秋生向她哀求：“嫂！你给我个小南瓜吧！孩子们饿得慌！”田寡妇没好气，故意说：“哪里还有？都给贼偷走了！”秋生明知道是说自己，也还不得口，仍然哀求下去，田寡妇怕他偷，也不敢深得罪他；看看自己的嫩南瓜，哪一个也舍不得

摘，挑了半天，给他摘了拳头大一个，嘴里还说：“可惜了，正长哩。”她才把秋生打发走，王先生恰巧摇着扇子走过来。王先生远远指着秋生的脊背跟她说：“大害大害！庄上出下了他们这一伙子，叫人一辈子也不得放心！”说着连步也没停就走过去了。这话正投了她的心事，她一辈子也忘不了，因此孩子们说“今年不用看了”，她总听不进去。不管她信不信，事实总是事实。有一天她中了暑，在家养了三天病，园子里没丢一点东西。后来病好了虽说还去看，可是家里忙了，隔三五天不去也没事，隔十来天不去也没事，最后她把留作种子的南瓜上都刻了些十字作为记号，就决定不再去看守。

快收完秋的时候，有一天她到秋生院里去，见秋生院里放着十来个老南瓜，有两个上边刻着十字，跟她刻的那十字一样，她又犯了疑。她有心问一问，又没有确实把握，怕闹出事来，才又决定先到园里看看。她连家也没回就往园里跑，跑到半路恰巧碰上秋生赶着个牛车拉了一车南瓜。她问：“秋生！这是谁的南瓜？怎么这么多？”秋生说：“我的！种的太多了！”

“你为什么种那么多？”“往年孩子们见了南瓜馋得很，今年分了半亩园地我说都把它种成南瓜吧！谁知道这种粗笨东西多了就多得没个样子，要这么多哪吃得了？种成粮食多合算？”“吃不了不能卖？”“卖？今年谁还缺这个？上哪里卖去？园里还有！你要吃就打发孩子们去担一些，光叫往年我吃你的啦！”他说着赶着车走了，田寡妇也无心再去看她的南瓜。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

登 记

一、罗 汉 钱

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

这个故事要是出在三十年前，“罗汉钱”这东西就不用解释；可惜我要说的故事是个新故事，听书的朋友们又有一大半是年轻人，因此在没有说故事以前，就得先把“罗汉钱”这东西交代一下：

据说罗汉钱是清朝康熙年间铸的一种特别钱，个子也和普通的康熙钱一样大小，只是“康熙”的“熙”字左边少一直画；铜的颜色特别黄，看起来有点象黄金。相传铸那一种钱的时候，把一个金罗汉象化在铜里边，因此一个钱有三成金。这种传说可靠不可靠不是我们要管的事，不过这种钱确实有点可爱——农村里的青年小伙子们，爱漂亮的，常好在口里衔一个罗汉钱，和城市人们爱包镶金牙的习惯一样，直到现在还有些偏僻的地方仍然保留着这种习惯；有的用五个钱叫银匠给打一只戒指，戴到手上活象金的。不过要在好多钱里挑一个罗汉钱可很不容易：兴制钱的时候，聪明的孩子们，常好在大人拿回来的钱里边挑，一年半载也不见得能碰见一个。制钱虽说不兴了，罗汉钱可是谁也不出手的，可惜是没有几个。说过了钱，

就该说故事：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算到一九五〇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庄上有个青年叫“小晚”，正和艾艾搞恋爱。故事就出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照我这么说，性急的朋友们或者说我不在行：“怎么一个‘罗汉钱’还要交代半天，说到故事中间的人物，反而一句也不交代？照这样说下去，不是五分钟就说完了吗？”其实不然：有些事情不到交代时候，早早交代出来是累赘；到了该交代的时候，想不交代也不行。闲话少说，我还是接着说吧：

张木匠一家就这么三口人——他两口子 and 这个女儿艾艾——独住一个小院：他两口住北房，艾艾住西房。今年①阴历正月十五夜里，庄上又要玩龙灯，张木匠是老把式，甩尾巴的，吃过晚饭丢下碗就出去玩去了。艾艾洗罢了锅碗，就跟她妈相跟着，锁上院门，也出去看灯去了。后来三个人走了个三岔：张木匠玩龙灯，小飞蛾满街看热闹，艾艾可只看放花炮起火，因为花炮起火是小晚放的。艾艾等小晚放完了花炮起火就回去了，小飞蛾在各街道上飞了一遍也回去了，只有张木匠不玩到底放不下手，因此他回去得最晚。

艾艾回得北房里等了一阵等不回她妈来，就倒在她妈的床上睡着了。小飞蛾回来见闺女睡在自己的床上，就轻轻推了一把说：“艾艾！醒醒！”艾艾没有醒来，只翻了一个身，有一个明

①指一九五〇年。

晃晃的小东西从她衣裳口袋里溜出来，丁零一声掉到地下，小飞蛾端过灯来一看：“这闺女！几时把我的罗汉钱偷到手？”她的罗汉钱原来藏在板箱子里边的首饰匣子里。这时候，她也不再叫艾艾，先去放她的罗汉钱。她拿出钥匙来，先开了箱子上的锁，又开了首饰匣子上的锁，到她原来放钱的地方放钱：

“咦！怎么我的钱还在？”摸出来拿到灯下一看：一样，都是罗汉钱，她自己那一个因为隔着两层木头没有见过潮湿气，还是那么黄，只是不如艾艾那个亮一点。她看了艾艾一眼，艾艾仍然睡得那么憨（甜）。她自言自语说：“憨闺女！你怎么也会干这个了？说不定也是戒指换的吧？”她看看艾艾的两只手，光光的；捏了捏口袋，似乎有个戒指，掏出来一看是顶针圈儿。她叹了一口气说：“唉！算个甚？娘儿们一对戒指，换了两个罗汉钱！明天叫五婶再去一趟赶快给她把婆家说定了就算了！不要等闹出什么故事来！”她把顶针圈儿还给艾艾装回口袋里去，拿着两个罗汉钱想起她自己那一个钱的来历。

这里就非交代一下不行了。为了要说明小飞蛾那个罗汉钱的来历，先得从小飞蛾为什么叫“小飞蛾”说起：

二十多年前，张木匠在一个阴历腊月三十日娶亲。娶的这一天，庄上人都去看热闹。当新媳妇取去了盖头红的时候，一个青年小伙子对着另一个小伙子的耳朵悄悄说：“看！小飞蛾！”那个小伙子笑了一笑说：“活象！”不多一会，屋里，院里，你的嘴对我的耳朵，我的嘴又对他的耳朵，各哩各得都嚷嚷这三个字——“小飞蛾”“小飞蛾”“小飞蛾”……

原来这地方一个梆子戏班里有个有名的武旦，身材不很高，那时候也不过二十来岁，一出场，抬手动脚都有戏，眉毛眼睛都会说话。唱《金山寺》她装白娘娘，跑起来白罗裙满台

飞，一个人撑满台，好象一只蚕蛾儿，人都叫她“小飞蛾”。张木匠娶的这个新媳妇就象她——叫张木匠自己说，也说是“越看越象”。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按这地方的习惯，用两个妇女搀着新媳妇，一个小孩在头里背条红毯儿，到邻近各家去拜个年——不过只是走到就算，并不真正磕头。早饭以后，背红毯的孩子刚一出门，有个青年就远远地喊叫：“都快看！小飞蛾出来了！”他这么一喊，马上聚了一堆人，好象正月十五看龙灯那么热闹，新媳妇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很关心：“看看！进了她隔壁五婶院子里了！”“又出来了又出来了！到老秋孩院子里去了！……”

张木匠娶了这么个媳妇，当然觉得是得了个宝贝，一九里，除了给舅舅去拜了一趟年，再也不愿意出门，连明带夜陪着小飞蛾玩；穿起小飞蛾的花衣裳扮女人，想逗小飞蛾笑；偷了小飞蛾的斗方戒指，故意要叫小飞蛾满屋子里撵他，……可是小飞蛾偏没心情，只冷冷地跟他说：“不要打哈哈！”

几个月过后，不知道谁从小飞蛾的娘家东王庄带了一件消息来，说小飞蛾在娘家有个相好的叫保安。这消息传到张家庄，有些青年小伙子就和张木匠开玩笑：“小木匠，回去先咳嗽一声，不要叫跟保安碰了头！”“小飞蛾是你的？至少有人家保安一半！”张木匠听了这些话，才明白了小飞蛾对自己冷淡的原因，好几次想跟小飞蛾生气，可是一进了家门，就又退一步想：“过去的事不提它吧，只要以后不胡来就算了！”后来这消息传到他妈耳朵里，他妈把他叫到背地里，骂了他一顿“没骨头”，骂罢了又劝他说：“人是苦虫！痛痛打一顿就改过来了！舍不得了不得……”他受过了这顿教训以后，就好好留心

找小飞蛾的盆子。

有一次他到丈人家里去，碰见保安手上戴了个斗方戒指，和小飞蛾的戒指一个样；回来一看小飞蛾手，小飞蛾的戒指果然只留下一只。“他妈的！真是有人家保安一半！”他把这消息报告了他妈，他妈说：“快打吧！如今打还打得过来！要打就打她个够受！轻来轻去不抵事！”他正一肚子肮脏气，他妈又给他打了打算盘，自然就非打不行了。他拉了一根铁火柱正要走，他妈一把拉住他说：“快丢手！不能使这个！细家伙打得疼，又不伤骨头，顶好是用小锯子上的梁！”

他从他的一摞木匠家具里边抽出一条小锯梁子来，尺半长，一指厚，木头很结实，打起来管保很得劲。他妈为什么知道这家具好打人呢？原来他妈当年轻时候也有过小飞蛾跟保安那些事，后来是被老木匠用这家具打过来的。闲话少说，张木匠拿上这件得劲的家伙，黑丧着脸从他妈的房子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小飞蛾见他一进门，照例应酬了他一下说：“你拿的那个是什么？”张木匠没有理她的话，用锯梁子指着她的手说：“戒指怎么只剩了一只？说！”这一问，问得小飞蛾头发根一支杈。小飞蛾抬头看看他的脸，看见他的眼睛要吃人，吓得她马上没有答上话来，张木匠的锯梁子早就打在她的腿上了。她是个娇闺女，从来没有挨过谁一下打，才挨了一下，痛得她叫了一声低下头去摸腿，又被张木匠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按在床边上，拉下裤子来“披、披、披”一连打了好几十下。她起先还怕招得人来看笑话，憋住气不想哭，后来实在支不住了，只顾喘气，想哭也哭不上来，等到张木匠打得没了劲扔下家伙走出去，她觉得浑身的筋往一处抽，喘了半天才哭了一声就又压住

了气，头上的汗，把头发湿得跟在热汤里捞出来的一样，就这样喘一阵哭一声喘一阵哭一声，差不多有一顿饭工夫哭声才连起来。一家住一院，外边人听不见，张木匠打罢了早已走了，婆婆连看也不来看，远远地在北房里喊：“还哭什么？看多么排场？多么有体面？”小飞蛾哭了一阵以后，屁股蛋疼得好象谁用锥子刺，摸了一摸满手血，咬着牙兜起裤子，站也站不住。

她的戒指是怎样送给保安的，以后张木匠也没有问，她自己自然也没有说。原来是她在端午那一天到娘家去过节，保安想要她个贴身的东西，她给保安卸了一个戒指：她也要叫保安给他个贴身的东西，保安把口里衔的罗汉钱送了她。

自从她挨了这一顿打之后，这个罗汉钱更成了她的宝贝。人怕伤了心：从挨打那天起，她看见张木匠好象看见了狼，没有说话先哆嗦。张木匠也莫想看上她一个笑脸——每次回来，从门外看见她还是活人，一进门就变成死人了。有一次，一个鸡要下蛋，没有回窝里去，小飞蛾正在院里撵，张木匠从外边回来，着见她那神气，真有点象在戏台上系着白罗裙唱白娘娘的那个小飞蛾，可是小飞蛾一看见他，就连鸡也不撵了，赶紧规规矩矩走回房子里去。张木匠生了气，撵到房子里跟她说：“人说你是‘小飞蛾’，怎么一见了我就把你那翅膀耷拉下来了？我是狼？”“呱”一个耳刮子。小飞蛾因为不愿多挨耳刮子，也想在张木匠面前装个笑脸，可惜是不论怎么装也装得不象，还不如不装。张木匠看不上活泼的小飞蛾，觉着家里没了趣，以后到外边做活，一年半载不回家，路过家门口也不愿进去，听说在外面找了好几个相好的。张木匠走了，家里只留下婆媳两个。婆婆跟丈夫是一势，一天跟小飞蛾说不够两句话，路上碰着了扭着脸走，小飞蛾离娘家虽然不远，可是有嫌疑，去不得；

娘家爹妈听说闺女丢了丑，也没有脸来看望。这样一来，全世界再没有一个人跟小飞蛾是一势了，小飞蛾只好一面伺候婆婆，一面偷偷地玩她那个罗汉钱。她每天晚上打发婆婆睡了觉，回到自己房子里关上门，把罗汉钱拿出来看了又看，有时候对着罗汉钱悄悄说：“罗汉钱！要命也是你，保命也是你！人家打死我我也不舍你！咱俩死活在一起！”她有时候变得跟小孩子一样，把罗汉钱暖到手心里，贴到脸上，按到胸上，衔到口里……除了张木匠回家来那有数的几天以外，每天晚上她都是离了罗汉钱睡不着觉，直到生了艾艾，才把它存到首饰匣子里。

她剩下的那只戒指是自从挨打之后就放进首饰匣子里去的。当艾艾长到十五那一年，她拿出匣子来给艾艾找帽花，艾艾看见了戒指就要。她生怕艾艾再看见罗汉钱，赶快把戒指给了艾艾就把匣子锁起来了。那时候张木匠和小飞蛾的关系比以前好了一点，因为闺女也大了，他妈也死了，小飞蛾和保安也早就没有联系了。又因为两口子只生了艾艾这么个孤闺女，两个人也常借着女儿开开玩笑。艾艾戴上了小飞蛾那只斗方戒指，张木匠指着说：“这原来是一对来！”艾艾问：“那一只哩？”张木匠说：“问你妈！”艾艾正要问小飞蛾，小飞蛾翻了张木匠一眼。艾艾只当是她妈丢了，也就不问了。这只戒指就是这么着到了艾艾手的。

以前的事已经交代清楚，再回头来接着说今年（一九五〇年）正月十五夜里的事吧：

小飞蛾手里拿着两个罗汉钱，想起自己那个钱的来历来，其中酸辣苦甜什么味儿也有过：说这算件好事吧，跟着它吃了多少苦；说这算件坏事吧，想一遍也满有味。自己这个，不论

好坏都算过去了；闺女这个又算件什么事呢？把它没收了吧，说不定闺女为它费了多少心；悄悄还给她吧，难道看着她走自己的伤心路吗？她正在想来想去得不着主意，听见门外有人走得响，张木匠玩罢了龙灯回来了，因此她也再顾不上考虑，两个钱随便往箱里一丢，就把箱子锁住。

这时候鸡都快叫了，张木匠见艾艾还没有回房去睡，就发了脾气：“艾艾，起来！”因为他喊的声音太大，吓得艾艾哆嗦了一下，一骨碌爬起来，瞪着眼问：“什么事，什么事？”小飞娥说：“不能慢慢叫？看你把闺女吓得那个样子！”艾向艾艾说：“艾！醒了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你爹叫你回去睡哩！”张木匠说：“看你把她惯成什么样子！”艾艾这才醒过来，什么也没有说，笑了一笑就走了。

张木匠听得艾艾回西房去关上门，自己也把门关上，回头一边脱衣服一边悄悄跟小飞娥说：“这二年给咱艾艾提亲的那么多，你总是挑来挑去都觉着不合适。东院五婶说的那一家有成呀没成？快把她出脱了吧！外面的闲话可大哩！人家都说：一个马家院的燕燕，一个咱家的艾艾，是村里两个招风的东西。如今燕燕有了主了，就光剩下咱艾艾了！”小飞娥说：“不是听说村公所不准燕燕跟小进结婚吗？我听说他们两个要到区上登记，村公所不给开证明，后来怎么又说成了？”张木匠说：“人家说她招风，就指的是她跟小进的事，当然人家不给他们证明！后来说的另是一家西王庄的，是五婶给保的媒，后天就要去办登记！”小飞娥说：“我看村公所那些人也是些假正经，瞎挑眼！既然嫌咱艾艾的声名不好，这二年说媒的为什么那么多哩？民事主任为什么还托着五婶给他的外甥提哩？”张木匠说：“我这几天只顾玩灯，也忘记了问你：这一家这几年

过得究竟怎么样？”小飞蛾说：“我也摸不着！虽说都在一个东王庄，可是人家住在南头，我妈住在北头，没有事也不常走动。五婶说她明天还要去，要不我明天也到我妈家走一趟，顺便到他家里看看去吧？”张木匠说：“也可以！”停了一下子他又向小飞蛾说：“我再问你个没大小的话：咱艾艾跟小晚究竟是有的事呀没的事？”小飞蛾当然不愿意把罗汉钱的事告诉他，只推他说：“不用管这些吧！闺女大了，找个婆家打发出去就不生事了！”

二、眼 力

艾艾也和她妈年轻时候一样，自从有了罗汉钱，每天晚上把钱捏在手里，衔在口里睡觉。这天晚上回去把衣服上的口袋摸遍了，也找不着罗汉钱，掌着灯满地找也找不着，只好空空地睡了。第二天早晨她比谁也起得早，为了找罗汉钱，起来先扫地，扫得特别细致——结果自然还是找不着。停了一会，她听见妈妈开了门，她就又跑去给她妈扫地。她妈见她钻到床底下去扫，明知道她是找钱，也明知道是白费工夫找不着，可是也不好向她说破，只笑着说了一句：“看我的艾艾多么孝顺？”

吃过早饭，五婶来叫小飞蛾往娘家去，张木匠照着二十多年来的老习惯自然要跟着去。

张木匠这个老习惯还得交代一下：自从二十多年前他发现小飞蛾把一只戒指送给了保安以后，知道小飞蛾并不爱他，不是就跟小飞蛾不好了吗？可是每当小飞蛾要去娘家的时候，他就又好象很爱护她，步步不离她。后来他妈也死了，艾艾也长大了，两个人的关系又定下来了，可是还不改这个老习惯。有

一回，小飞蛾说：“还不放心吗？”张木匠说：“反正跟惯了，还是跟着去吧！”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五婶、张木匠、小飞蛾三个人都要动身了，小飞蛾说：“艾艾！你不去看看你姥姥！”艾艾说：“我不去！初三不是才去过了吗？”张木匠说：“不去就不去吧！好好给我看家！不要到外边飞去！”说罢，三个人就相跟着走了。

艾艾仍忘不了找她的罗汉钱。她要是寻出钥匙，到箱子里去找，管保还能多找出一个来，不过她梦也梦不到箱子里，她只沿着她到过的地方找，直找到晌午仍是没有踪影。钱找不着，也没有心思做饭吃，天气晌午多了，她只烤了两个馒头吃了吃。

刚刚吃过馒头，小晚来了。艾艾拉住小晚的手，第一句话就是：“罗汉钱丢了！”“丢就丢了吧！”“气得我连饭也吃不下去！”“那也值得生个气？我看那都算不了什么！在着能抵什么用？听说你爹你妈跟东院里五奶奶去给你找主儿去了。是不是？”“咱哪里知道那老不死的为什么那么爱管闲事？”“咱们这算吹了吧？”“吹不了！”“要是人家说成了呢？”“成不了！”“为什么？”“我不干！”“由得了你？”“试试看！”正说着，外边有人进来，两个人赶快停住。

进来的是马家院的燕燕。艾艾说：“燕燕姐！快坐下！”燕燕看见只有他们两个人，就笑着说：“对不起！我还是躲开点好！”艾艾笑了笑没答话，按住肩膀把她按得坐到凳子上。燕燕问：“你们的事怎么样？想出办法来了没有？”艾艾说：“我们正谈这个！”燕燕的眼圈一红接着就说：“要办快想法，不要学我这没出息的耽搁了事！”说了这么句话，眼里就滚出两点泪来，引得艾艾和小晚也陪着她伤心，眼边也湿了。

过了一阵，三个人都揉了揉眼，小晚问燕燕：“不是还没

有登记？”燕燕说：“明天就要去！”艾艾问：“这个人怎么样？”燕燕说：“谁可见过人家个影儿？”艾艾又问：“不能改口了吗？”燕燕说：“我妈说：‘你不愿意我就死在你手！’我还说什么？”艾艾说：“去年腊月你跟小进到村公所去写证明信，村公所不给写，是怎么说的？什么理由？”燕燕说：“什么理由！还不是民事主任那个死脑筋作怪？人家说咱声名不正，除不给写信，还叫我检讨哩！”小晚说：“明天你再去了，人家民事主任就不要你检讨了吗？”燕燕说：“那还用我亲自去？只要是父母主婚，谁去也写得出来；真正自由的除不给写还要叫检讨！就那人家还说是反对父母主婚！”小晚向艾艾说：“我看咱这算吹了！五奶奶今天去给你说的这个，一来是人家民事主任的外甥，二来又有你妈作主。你妈今天要听了东院五奶奶的话，回来也跟你死呀活呀地一闹，明天你还不跟人家到区上去登记？”艾艾说：“我妈可不跟我闹，她还只怕我闹她哩！”

正说着，门外跑进一个人来，隔着窗就先喊叫：“老张叔叔，老张叔叔！”艾艾拉了燕燕一把说：“小进哥哥又来找你！”还没等燕燕答话，小进就跑进来了。燕燕本来想找他诉一诉苦，两三天也没有找着个空子，这会见他来了，赶快和艾艾坐到床边，把凳子空出来让他坐，两眼直对着他，可是一时想不起来该怎样开口。小进没有理她，也没有坐，只朝着艾艾说：“老张叔叔哩？场上好多人请他教我们玩龙灯去哩！”艾艾说：“我爹到我姥姥家去了。你快坐下！”小进说：“我还有事！”说着翻了燕燕一眼就走出去，走到院里，又故意叫着小晚说：“小晚！到外边玩玩去吧，瞎磨那些闲工夫有什么用处？回去叫你爹花上几石米吧！有的是！”说着就走远了。燕

燕一肚子冤枉没处说，一埋头趴在床边哭起来，艾艾和小晚两个人劝也劝不住。

劝了一会，燕燕忍住了哭跟他两个人说：“我劝你们早些想想办法吧！你看弄成这个样子伤心不伤心？”艾艾说：“你看有什么办法？村里的大人们都是些老脑筋，谁也不愿揽咱的事，想找个人到我妈跟前提一提也找不着。”小晚说：“说好话的没有，说坏话的可不少；成天有人劝我爹说：‘早些给孩子定上一个吧！不要叫尽管耽搁着！’”燕燕猛然间挺起腰来，跟发誓一样地说：“我来当你们的介绍人！我管跟你们两头的大人们提这事！”又跟艾艾说：“一村里就咱这么两个不要脸闺女，已经耽搁了一个我，难道叫连你也耽搁了？”小晚站起来说：“燕燕姐！我给你敬个礼！不论行不行冒跟我爹提一提！不行也不过是吹了吧？总比这么着不长不短好得多！就这样吧，我得走了！不要让民事主任碰上了再叫你们检讨！”说了就走了。

艾艾又和燕燕计划了一下，见了谁该怎样说见了谁该怎样说，东院里五奶奶要给民事主任的外甥说成了又该怎样顶。她两人正计划得起劲，小飞蛾回来了。她两个让小飞蛾坐了之后，燕燕正打算提个头儿，可是还没有等她开口，五婶就赶来了。五婶说：“不论说人，不论说家，都没有什么包弹的！婆婆就是咱村民事主任的姐姐，你还不知道人家那脾气多么好？闺女到那里管保受不了气！你还是不要错打了主意！”小飞蛾说：“话叫有着吧！回头我再和她爹商量商量！”五婶见小飞蛾不愿意，又应酬了几句就走了，艾艾可喜得满脸笑涡。

小飞蛾为什么不愿意呢？这就得谈谈她这一次去娘家的经过：早饭后他们三个人相跟着到了东王庄，先到了小飞蛾她妈

家里。五婶叫小飞娥跟她到民事主任的外甥家里看看去，小飞娥说：“相跟去了不好！不如你先到他家去，我随后再去，就说是去叫你相跟着回去，省得人家说咱是亲自送上门的！”

南头这家也只有三口人——老两口，一个孩子——就是张家庄民事主任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孩子玩去了，家里只剩下老两口。五婶一进去，老汉老婆齐让坐。几句见面话说过后，老汉就问：“你说的那三家，究竟是哪一家合适些？”五婶说：“依我看都差不多，不过那两家都有主了，如今只剩下小飞娥家这一个了！”老汉说：“怎么那么快？”五婶说：“十八九的大姑娘自然快得很了！”老婆向老汉说：“我叫快点决定，你偏是那么慢腾腾地拖！好的都叫人家挑完了！”五婶故意说：“小一点的不少！就再说个十四五的吧？反正还比你的孩子大！”老婆说：“老嫂子！不要说笑话了！我要是愿意要十四五的，还用得搬你这么大的面子吗？”五婶说：“要大的可算再找不上了！你怎么说‘好的都叫人家挑完了’？我看三个里头，就还数人家小飞娥这一个标致！我想你也该见过吧！长得不是跟二十年前的小飞娥一个样吗？”老婆说：“人样儿满说得过去，不过听说她声名不正！”五婶说：“要不是那点毛病，还能留到十八九不占个家吗？以前那两个不一样吗？”老婆说：“要是那个毛病，咱不是花着钱买个气布袋吗？”五婶说：“你不要听外人瞎谣传！要真有大毛病的话，你娘家兄弟还叫我来给你提吗？那点小毛病也算不了什么，只要到咱家改过来就行了！”老汉说：“还改什么？什么样的老母下什么样的儿！小飞娥从小就是那么个东西！”五婶说：“改得了！人是苦虫！痛痛打一顿以后就没有事了！”老汉说：“生就的骨头，哪里打得过来？”五婶说：“打得过来，打得过来！小飞

娥那时候，还不是张木匠一顿锯梁子打过来的？”

他们正说到这里，小飞娥正走到当院里，正赶上听见五婶末了说的那两句话。她一听，马上停了步，看了看院里没人，就又悄悄溜出院来往回走。她想：“难道这挨打也得一辈传一辈吗？去你妈的！我的闺女用不着请你管教！”回到她家里，她妈和张木匠都问：“怎么样？”她说：“不行！不跟他来！”大家又问她为什么，她说：“不提他吧！反正不合适！”她妈见她咕嘟着个嘴，问她怎么那样不高兴，她自然不便细说，只说是“昨天晚上熬了夜”，说了就到套间里睡觉去了。

其实她怎么睡得着呢？五婶那两句话好象戳破了她的旧伤口，新事旧事，想起来再也放不下。她想：“我娘儿们的命运为什么这么一样呢？当初不知道是什么鬼跟上了我，叫我用一只戒指换了个罗汉钱，害得后来被人家打了个半死，直到现在还跟犯人一样，一出门人家就得在后边押解着。如今这事又出在我的艾艾身上了。真是冤孽：我会干这没出息事，你偏也会！从这前半截事情看起来，娘儿们好象钻在一个圈子里。傻孩子呀！这个圈子，你妈半辈子没有得跳出去，难道你就也跳不出去了么？”她又前前后后想了一下：不论是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姊妹们，不论是才出了阁的姑娘们，凡有象罗汉钱这一类行为的，就没有一个不挨打——婆婆打，丈夫打，寻自尽的，守活寡的……“反正挨打的根儿已经扎下了！贱骨头！不争气！许就许了吧！不论嫁给谁还不是一样挨打？”头脑要是简单一点，打下这么个主意也就算了，可是她的头脑偏不那么简单，闭上了眼睛，就又想起张木匠打她那时候那股牛劲：瞪起那两只吃人的眼睛，用尽他那一身气力，满把子揪住头发往那床沿上“扑差”一按，跟打骡子一样一连打几十下也不让人喘口气……

“妈呀！怕煞人了！二十年来，几时想起来都是满身打哆嗦！不行！我的艾艾哪里受得住这个？……”就这样反一遍、正一遍尽管想，晌午就连一点什么也吃不下去，为着应付她妈，胡乱吃了四五个饺子。

午饭以后，五婶等不着她，就到她妈家里来找。五婶还要请她到南头看看，她说“怕天气晚了赶天黑趁不到家”。三个人往张家庄走，五婶还要跟她麻烦，说了民事主任的外甥一百二十分好。她因为不想听下去，又拿出二十多年前那“小飞蛾”的精神在前边飞，虽说只跟五婶差十来步远，可弄得五婶直赶了一路也没有赶上她。进了村，张木匠被一伙学着玩龙灯的青年叫到场里去了，小飞蛾一直飞回了家。五婶不甘心，就赶到小飞蛾家里，后来碰了个软钉子，应酬了几句就走了。艾艾见她妈没有答应了，自然眉开眼笑；燕燕看见这情形，也觉着要说的话更好说一点。

燕燕趁着小飞蛾没有注意，给艾艾递了个眼色叫她走开。艾艾走开了，燕燕就向小飞蛾说：“婶婶！我也给艾艾做个媒吧？”小飞蛾觉着她有点孩子气，笑着跟她说：“你怎么也能做媒？”燕燕也笑着说：“我怎么就不能做媒？”小飞蛾说：“你有人家东院五婶那张嘴？”燕燕说：“她那么会说，怎么还没有把你说得答应了她？”小飞蛾说：“不合适我就能答应她了？”燕燕说：“可见全看合适不合适，不在乎会说不会说！我提一个管保合适！”小飞蛾说：“你冒说说！”燕燕说：“我提小晚！”小飞蛾说：“我早就知道你说的是他！快不要提他！你们这些闺女家，以后要放稳重点！外边闲话一大堆！”燕燕说：“我也学东院五奶奶几句话：‘不论说人，不论说家，都没有什么包弹的！’不过我的话比她的话实在得多，不象她那老糊

涂，‘有的说没的道！’ 婶婶！你想想我的话对不对？”小飞蛾说：“你光说好的，不说坏的！外边的闲话你挡得住吗？”燕燕说：“闲话也不过出在小晚身上，说闲话的人又都是些老脑筋，索性把艾艾嫁给小晚，看他们还有什么说的？”小飞蛾一想：“这孩子不敢轻看！这么办了，管保以后不生闲气，挨打这件事也就再不用传给艾艾了！”她这么一想，觉着燕燕实在伶俐可爱，就伸手抚摩着燕燕的头发说：“好孩子！你还当得了个媒人！”燕燕见她转过弯来，就紧赶着问她：“婶婶！你算愿意了吧？”小飞蛾说：“好孩子！不要急！还有你叔叔！等他回来跟他商量商量！”

燕燕说服了小飞蛾，就辞别过小飞蛾去给艾艾报喜信，不想一出门，艾艾就站在窗外。艾艾拉住她的手，叫她不要声张。两个人相跟着到了院门外，燕燕说：“都听见了吧！”艾艾说：“听见了！谢谢你！”燕燕说：“且不要谢，还有一头哩！你先到街上看灯去，到合作社门口那个热闹地方等着我，我到小晚家试试看！”说了就走了。

燕燕到了小晚家，也走的是妇女路线，先和小晚他娘接头。这地方的普通习惯，只要女家吐了口，男家的话好说，没有费多大工夫，就说妥了。

她跑到合作社门口，拉上艾艾走到个僻静处，把胜利的结果一报告，并且说：“只要你妈今天晚上能跟你爹说通，明天就可以去登记。”艾艾听罢，自然是千恩万谢高高兴兴回去了，剩下她想想人家的事，又想想自己的事，两下一对照，伤心得很，趁着这个僻静地方，悄悄哭了一大阵，直到街上人都散了她才回去，回去躺下之后，一直考虑“明天到区上还是牺牲自己呀，还是得罪妈妈”，一夜也不曾合上眼。

小飞蛾呢？自从燕燕和艾艾走出去，她把小晚这一家子细细研究了好几遍：日子也过得，家里也和气，大人们脾气都很平和，孩子又漂亮又正干，年纪也相当，挑来挑去挑不着毛病。这时候，她完全同意了，暗暗夸奖艾艾说：“好孩子！你的眼力不错！说闲话的人真是老脑筋！”想到这里，她又想起头一天晚上那个罗汉钱。她又揭开箱子找出那个钱来，心想还了艾艾，又想不到该怎样还她。她正拿着这个在手里搓来搓去想法子，艾艾一股劲跑回来。艾艾看见她手里有个东西，就问：“妈！你拿了个什么的？”小飞蛾用两根指头捏起来向她说：“罗汉钱！”“哪儿来的？”“我拾(拣)的！”“妈！那是我的！”“你哪儿来的？”“我、我也是拾的！”艾艾说着就笑了。小飞蛾看了看她的脸说：“是你的还给了你！”艾艾接过来还装在她的衣裳口袋里。

一会，张木匠玩罢龙灯回来了，艾艾回房去做她的好梦，张木匠和小飞蛾商量艾艾的婚事。

三、不准登记

当天晚上，艾艾回房以后，明知道她的爹妈要谈自己的婚事，自然睡不着觉，爬在窗上听了一会，因为隔着半个院子两重窗，也听不出道理来，只听见了两句话。听见两句什么话呢？当她爹妈谈了一阵争执起来之后，她妈说：“你说这么办了有什么坏处？”她爹说：“坏处是没有，不过挡不住村里人说闲话！”以后的声音又都低下去，艾艾就听不见了。

这一晚艾艾自然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晨起来，本来想先去找燕燕，可是乡村姑娘们，要是家里没有个嫂嫂的话，扫地，

抹灰尘，生火做饭，洗锅碗这几件事就成了自己照例的公事，非办不行。她只担心燕燕往区上走了，好不容易等到吃过饭，把碗筷收拾起来泡到锅里，偷偷地用锅盖盖起来就跑到燕燕家里去。

她本来想请燕燕替她问一问她妈和她爹商量的结果如何，可是一到了燕燕家，就碰上了别的情况，这番话就不得不搁一搁。这时候，燕燕在床上躺着，她妈坐在那里央告她起来，五婶站在地上等候着。艾艾问：“燕燕姐怎么样了？”燕燕她妈说：“燕燕只怕呕不死我哩！”燕燕躺着说：“都由了你了，还要说我是跟你呕气！”她妈说：“不是呕气怎么不起来啊？好孩子！不要呕了快起！来让你五奶奶给你说说到区上的规矩！再到村公所要上一封介绍信，快走吧！天不早了！”燕燕说：“我死也不去村公所！我还怕民事主任再要我检讨哩！”她妈说：“小奶奶！你不去村公所我替你去！可是你也得起来叫你五奶奶给你说说规矩呀？”燕燕赌着气坐起来说：“分明是按老封建规矩办事，偏要叫人假眉三道去出洋相！什么好规矩？说吧！”五婶见她的气色不好，就先劝她说：“孩子！再不要别别扭扭的！要喜欢一点！这是恭喜事！”燕燕说：“快说你们那假眉三道的规矩吧！什么恭喜事？你们喜的吧，我也喜的？”五婶说：“算了算了！气话不要说了！到了区上，我把介绍信递给王助理员。王助理员看了信，问你多大了，你就说多大了；问你是‘自愿’吗？你就说‘自愿’……”燕燕说：“这哪里能算自愿？”五婶说：“傻孩子！你就那么说对了！问过自愿以后，他要不再问什么就算了；他要再问你为什么愿意，你就说‘因为他能劳动’。”燕燕说：“屁！我连人家个鬼影儿也没有见过，怎么知道人家劳动不劳动？”她妈说：“我这闺女的主意可真哩！呕不死我总不能算拉倒！”燕燕说：“妈！

这怎么能算是我呕你？我真正是不知道呀！你也不要生气了！要我說什麼我给你說什麼好了！反正就是个我来！五奶奶！还有什么鬼路道，一股气说完了算！我都照着你的来！”五婶说：“也再没有什么了！”

这时候，小晚来找艾艾，见燕燕母女俩闹得不开交，也就站住来看结果。结果是燕燕答应到了区上照五婶的话说，她妈跟五婶替她到村公所去要介绍信。

等燕燕她妈跟五婶出去之后，艾艾跟燕燕说：“燕燕姊！你今天不高兴，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劝劝你……”燕燕说：“我这辈子算现成了，还有什么高兴不高兴？我还没有问你：你爹同意不同意？”艾艾说：“我也不好问！你今天遇了事了，改日再说吧！”燕燕说：“不！我偏要马上管！要管管到底，不要叫都弄成我这样！能办成一件也叫我妈长长见识！你就在我这里等一等，让我去问一问你妈，要是答应了，咱们相跟到区上去！”

燕燕走了，剩下了小晚和艾艾。艾艾说：“听我爹那口气，好象也不反对，听说你家的大人们也愿意了，现在担心的只是民事主任的介绍信！”小晚说：“我也是这么想：咱庄上凡是插过腿的事，不依了他就都出不了他的手。别看他口口声声说你声名不好，只要嫁给他的外甥，管保就没事了！”艾艾说：“对！事情是明明白白的！他不给咱们写，咱们该怎么办？”两个人都愣了，谁也想不出办法来。停了一会，燕燕回来了，说是张木匠也愿意了，可以一同到区上去登记。艾艾跟她说到村公所写介绍信不容易，她也觉着是一件难事，后来想了想说：

“你们去吧！趁着他给我写罢了你们就提出，他要是不愿意写的话，你们就问他‘别人来了可以替人写，亲自来了为什么不

行？’看他说什么！”小晚说：“对！他要是再不给写，咱俩就不拿介绍信到区上去登记。区上问起介绍信，咱就说民事主任是封建脑筋，别人去了可以替人写，自己去了偏不给写！”艾艾说：“那样你不把燕燕姐的事给说漏了吗？”燕燕说：“说漏了自然更好了！你们给说漏了，我妈也怨不着我！”小晚说：“人家要问介绍人哩？”燕燕说：“就说是我！”小晚说：“写信时候，介绍人也得去呀？”燕燕想了一想说：“可以！我跟你们去！”艾艾说：“你不是不愿意到村公所去吗？”燕燕说：“我是不去要我的介绍信，给别人办事还可以。咱们到村公所门口等着，等我妈一出门咱们就进去！”艾艾说：“民事主任要说你声名不正不能当介绍人呢？”燕燕说：“这回我可有话说！”三个人商量好了，就往村公所去。他们正走到村公所门口，他妈跟五婶就出来了。五婶说：“不用来了！信写好了！”燕燕说：“我也得问问是怎么写的，不要叫去了说不对！”她妈听着只当是燕燕真愿意了，就笑着跟她说：“你要早是这样，不省得妈来跑一趟？快问问回来吃些饭走吧！”说着就分头走开。

他们三个走进村公所，民事主任才写过信，墨盒还没有盖上。民事主任看见他们这几个人在一块就没有好气，撇开艾艾和小晚，专对燕燕说：“回去吧！信已经交给你妈了！”燕燕说：“我知道！这回是给他们两个人写！”主任瞟了小晚和艾艾一眼说：“你两个？”“我两个！”“自己也都不检讨一下！”小晚说：“检讨过了！我两个都愿意！”主任说：“怕你们不愿意哩？”艾艾说：“你说怕谁不愿意？我爹我妈也都愿意！”小晚说：“我爹我妈也都愿意！”主任说：“谁的介绍人？”燕燕说：“我！”“你怎么能当介绍人？”“我怎么不能当介绍

人？”“趁你的好声名哩？”“声名不好为什么还给我写介绍信？”主任答不上来就发了脾气：“去你们的！都不是正经东西！”艾艾看见仍不行了，就又顶了他一句：“嫁给你的外甥就成了正经东西了。是不是？”

这一下更问得主任出不上气来。主任对艾艾，确实有两种正相反的估价：有一次，他看见艾艾跟小晚拉手，他自言自语说：“坏透了！跟年轻时候的小飞蛾一个样！”又一次，他在他姐姐家里给他的外甥提亲提到了艾艾名下，他姐姐说：“不知道闺女怎么样？”他说：“好闺女！跟年轻时候的小飞蛾一个样！”这两种评价，在他自己看起来并不矛盾：说“好”是指她长得好，说“坏”是指她的行为坏——他以为世界上的女人接近男人就是坏透了的行为。不过主任对于“身材”和“行为”还不是平均主义看法：他以为“身材”是天生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行为是可以随着丈夫的意思改变的，只要痛痛打一顿，说叫她变个什么样就能变成个什么样。在这一点上，他和东院五婶的意见根本相同，可是这道理他向艾艾说不得，要是说出来，艾艾准会对他说：“这个民事主任用不着你来当，最好是让给东院五奶奶当吧！”

闲话少说，还是接着说吧：当艾艾问嫁给他的外甥算不算正经的时候，他半天接不上气来，就很蛮地把墨盒盖子一盖说：

“任你们有天大的本事，这个介绍信我不写！”艾艾说：“不写我们也要去登记！区上问起来我就请他们给评一评这个理！”主任说：“不服劲你就去试试！区上又不是不知道你们的好声名！”吵了半天，还是不给写，他们只得走出来。

燕燕回家去吃过饭，艾艾回家去洗过锅碗，五婶、燕燕、小晚和艾艾，四个人都往区上去。

三个青年人都觉着五婶讨厌，故意跑在前边不让五婶追上，累得五婶直喘气。走到区公所门口，门口站着五六个人，男女老少都有，只是一个也认不得。原来五婶约着人家西王庄那个孩子在区公所门口等，现在这五六个人，好象也都是等人，有两个大人似乎也是当介绍人的，其中有两个青年男子，一个有二十多岁，一个有十五六岁。燕燕他们三个人，都估量着那个十五六岁的就是给燕燕说的那一个，因为五婶说过“实岁数是十五”，可是谁也认不得，不愿意随便打招呼。停了一会，五婶赶到了。五婶在区门边一看说：“怎么西王庄那个孩子还没有来？”她这么一说，他们三个才知道是估量错了，原来那一个也不是。就在这时候，收发室里跑出一个小孩子来向五婶嚷着说：“老大娘！我早就来了！”嗓子比燕燕的嗓子还尖。燕燕一看，比自己低一头，黑光光的小头发，红红的小脸蛋，两只小眼睛睁得象小猫，伸直了他的小胖手，手背上还有五个小涡涡。燕燕想：“这孩子倒也很俏皮，不过我看他还该吃奶，为什么他就要结婚？”五婶说：“咱们进去吧！”他们先到收发处挂了号，四个人相跟着进去了。

正月天，亲戚们彼此来往得多，说成了的亲事也特别多，王助理员的办公室挤满了领结婚证的人，累得王助理员满头汗。屋子小，他们进去站在门边，只能挨着次序往桌边挤。看见别人办的手续，跟五婶说的一样，很简单：助理员看了介绍信，“你叫什么名？”叫什么。“多大了？”多大了。“自愿吗？”“自愿！”“为什么愿嫁他？”或者“为什么愿娶她？”

“因为他能劳动！”这一套，听起来好象背书，可是谁也只好那么背着，背了就发给一张红纸片叫男女双方和介绍人都盖指印。也有两件不准的，那就是有破绽：一件是假岁数报得太不

相称，一件是从前有过纠纷。

快轮到他们了，燕燕把艾艾推到前边说：“先办你的！”艾艾便挤到桌边。这时候弄出个笑话来：助理员伸着手要介绍信，西王庄那个孩子也已经挤到桌边，信就在手里预备着，一下子就递上去！五婶看见着了急，拉了他一把说：“错了错了！”那孩子说：“不错，人家都是一人一封！”原来五婶在区门口没有把艾艾和燕燕向那孩子交代清楚，那孩子看见艾艾比燕燕小一点，以为一定是这个小的。王助理员接住他的信还没有赶上拆开，小晚就挤过去跟他说：“说你错了你还不服哩！”回头指了指燕燕又向他说：“你是跟那一个！”经他一说破，满屋子弄了个哄堂大笑！王助理员又把信递给那个孩子说：“你怎么连你的对象也认不得？”小晚说：“我两个没有介绍信，能不能登记？”王助理员说：“为什么没有介绍信？”艾艾说：“民事主任不给写！燕燕她妈替她去还给写，我们亲自去了不给写！他要叫我嫁给他的外甥！”“你们是哪个村？”“张家庄！”问艾艾：“你叫什么？”“张艾艾！”王助理员注意了地一下说：“你就是张艾艾呀？”“是！”王助理员又看着小晚说：“那末你一定就是李小晚了？”小晚说：“是！”王助理员说：“谁的介绍人呢？”燕燕说：“我！”“你叫什么？”“马燕燕！”王助理员说：“你两个都来了？你怎么能当介绍人？”“我怎么不能当介绍人？”“村里有报告，说你的声名不正！”三个人同问：“有什么证据？”王助理员说：“说你们早就有来往！”小晚说：“早有个来往有什么不好？没来往不是会把对象认错了吗？”这句话又说得大家笑起来。王助理员说：“村里既然有报告，等调查调查再说吧！”燕燕说：“助理员！你说叫他们两人结了婚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还要调查

呢？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结过婚，和谁也没有麻烦！两个人又是真正自愿，还要调查什么呢？”助理员说：“反正还得调查调查！这件事就这样了。”又指着西王庄那个孩子说：“拿你的信来吧！”小孩子递上了信，五婶一边把村公所给燕燕的介绍信也递上去。

王助理员问西王庄那个孩子：“你叫什么？”“王旦！”“十几了？”“十……二十了！”小王旦说了个“十”就觉着五婶教他的话不一样，赶快改了口。王助理员说：“怎么叫个‘二十’呢？”小王旦没话说，王助理员又问：“你们是自愿吗？”“自愿。”“为什么愿意跟她结婚？”“因为她能劳动！”王助理员又看了看燕燕的介绍信说：“马燕燕！你说他究竟多大了！”燕燕说：“我不知道！”五婶急得向燕燕说：

“你怎么说不知道？”燕燕回答说：“五奶奶！我真正不知道！你哪里跟我说过这个？”五婶不知道燕燕是有意叫弄不成事，还暗暗地埋怨燕燕说：“这闺女心眼儿为什么这么死？就算我没有跟你说过，可是人家说二十，你就不会跟着说二十吗？”在这时候，小王旦偏要卖弄他的聪明。他说：“人家是真正不知道！我住在西王庄，人家住在张家庄，我两个谁也没有见过谁，人家怎么知道我多大了呢？”王助理员说：“我早就知道你没有见过她！要是见过，怎么还能认错了呢？你没有见过人家，怎么知道人家能劳动？小孩子家尽说瞎话！不准你们两个登记！一来男方的岁数不实在，说不上什么自愿不自愿；二来见了面连认也不认得，根本不能算自由婚姻！都回去吧！”

五个人都出了区公所：小王旦回西王庄去了，五婶和他们三个年轻人仍回张家庄去。在路上，五婶怪燕燕说错了话，燕燕故意怪五婶教她说话的时候没有教全。艾艾跟小晚说王助理员

的脑筋不清楚，燕燕说王助理员的脑筋还不错。

他们四个人相跟了一段，还跟来的时候一样，三个青年走在前边商量自己的事，五婶在后边赶也赶不上。他们谈到以后该怎么办，燕燕仍然帮着艾艾和小晚想办法，他们两个也愿意帮着燕燕，叫她重跟小进好起来。用外交上的字眼说，也可以叫做“订下了互助条约”。

四、谁该检讨？

前边说过：张家庄的民事主任对妇女的看法是“身材第一，行为第二，行为是可以随着丈夫的意思改变的”。其实这种看法在张家庄是很普遍的一种看法，不只是民事主任一个人如此——要是他一个人，也不会给这两个大闺女造成坏的“声名”。张家庄只剩这么两个大闺女，这两个人又都各自结交了个男人。谁也说她们“坏透了”，可是谁也只想给自己人介绍，介绍不成功就越说她们“坏”，因此她们两个的声名就“越来越坏”。

自从她们到区上走了一趟，事情公开了，老年人都认为“更坏得不能提了”，也就不提了；打算给自己人介绍的看见没有希望了，也就提得少了；青年人大部分从前只跟着大人瞎吵吵，心里边其实早就赞成，见大人不多提了也就不吵吵了；另有几个原来想和小晚竞争一下，后来见艾艾的心已经落到小晚身上，他们也就没劲了；再加上公开了之后，谁要当面说闲话，她们就要当面质问：“我们结了婚有什么坏处？”这句话的力量很大，谁也回答不出道理来。有这么好多原因，说闲话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她两个的声名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在这两对婚姻问题上，成问题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燕燕她妈，说死说活嫌败兴，死不赞成；一个是民事主任，死不给写介绍信；再一个就是区上的王助理员，光说空话不办事，艾艾跟小晚去问过几次，仍是那一句话：“以后调查调查再说。”因为有这么三个人，就把四个人的事情给拖延下来。

他们四个都是不当家的孩子，家里的大人，燕燕她妈还反对，其余的纵不反对也不给他们撑腰，有心到县里去告状去，在家里先请不准假。在这个情况下面，气得他们每天骂民事主任，骂王助理员。

一直骂了两个月，还是不长不短，仍然没有结果。种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小晚到合作社去，合作社掌柜笑着跟他说：“小晚！你们结婚的事情怎么样了？”小晚说：“人家区上还没有调查好哩！”掌柜说：“几时就调查好了？”小晚说：“还不得个十年二十年？”掌柜说：“你真会长期打算！现在不用等那么长时候了！婚姻法公布出来了！看了那上边的规定，你们两个完全合法！”小晚只当他是开玩笑，就说：

“看你这个掌柜多么不老实？”掌柜正经跟他说：“真的！给你看看报！”说着递给他一张报。小晚先看见报上的大字觉着真有这回事，就拿到灯下各里各节往下念。掌柜说：“让我念给你听！”说着接过来一口气念下去。等掌柜念完，大家都说：“小晚这一下撞对了！明天再去登记去吧！完全合法！”

小晚有了这个底，从合作社出来就去找艾艾；因为他们和燕燕小进有互助条约，艾艾又去找燕燕，小晚又去找小进。不大一会，四个人到了艾艾家开了个会，因为燕燕不愿意马上得罪她妈，决定第二天先让艾艾和小晚去登记。燕燕说：“只要你们能领回结婚证来，我妈那里的话就好说一点。虽然你们说

我妈不同意也可以，依我看能说通还是说通了好！”大家也就同意了她的话。

这天晚上散会之后，小晚和艾艾各自准备了半夜，计划着第二天到区上，王助理员要仍然不准，他们用什么话跟他说。不料第二天到了区上，王助理员什么也没有再问就给填上了结婚证。

隔了一天，区公所通知村公所，说小晚和艾艾的婚姻是模范婚姻，要村里把结婚的日期报一下，到那时候区里的干部还要来参加他们的结婚典礼。

因为区里说是模范婚姻，村里人除了太顽固的，差不多也都另换了一种看法；青年人们本来就赞成，有好多自动来给他们帮忙筹备，不几天就准备停当了。

结婚这一天，区上来了两个干部——一个区分委书记，一个王助理员。村上的干部差不多全体参加了——民事主任本来不想到场，区上说别的干部可以不参加，他非参加不可，他没法，也只得来。

因为区上说是模范婚姻，村上的群众自然也来得特别多，把小晚家一个院子全都挤满。

会开了，新人就了位，不知道哪个孩子从外边学来的新调皮，要新媳妇报告恋爱经过，还要叫从罗汉钱说起。艾艾说：

“那算什么稀奇？我送了他个戒指，他送了我个罗汉钱。一句话不就说完了吗？”

有个青年小伙子说：“她这么说行不行？”大家说：“不行！”“不行怎么办？”“叫她再说！”艾艾说：“你们这么说我可不成！这又不是斗争会！”有的说：“我们好意来给你帮个忙，凑个热闹，你怎么撵起我们来了？”艾艾说：“大家帮我的忙我很欢迎，不过可不愿意挨斗争！罗汉钱的事实在

没有多少话说的，大家要我说，我可以讲一些别的事！”大家说：“可以！”“说什么都好！”艾艾说：“大家不是都知道我的声名不正吗？你们知道这怨谁？”有的说：“你说怨谁？”艾艾说：“怨谁？谁不叫我们两个人结婚就怨谁！你们大家想想：要是早一年结了婚，不是早就正了吗？大家讲起官话来，都会说‘男女婚姻要自主’，你们说：咱们村里谁自主过？说老实话，有没有一个不是父母主婚？”大家心里都觉着对，只是对着区干部不好意思那么说。艾艾又接着说：“要说有的话，女的就只有我和燕燕两个，可是民事主任常常要叫我们检讨！我们检讨过了，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该自主！说到这里了我也坦白坦白：为了这事，我整整骂了民事主任两个月了，现在让我来赔个情！”大家问：“都骂了些什么话？”艾艾说：“现在我们两人的事情已经成功了，前边的事就都不提它了……”大家一定要艾艾说，艾艾总不肯说，小晚站起来笑着说：“我说了吧！我也骂过！主任可不要恼，我不过是当成故事来说的。我说：……我也愿意，她也愿意，就是你这个当主任的不愿意！我两个结了婚，能把你的什么事坏了？老顽固！死脑筋！外甥路线！嫁给你的外甥，管保就不用检讨了！”大家都看着民事主任笑，民事主任没有说话。区分委书记说：“你也给王助理员提点意见！”小晚说：“王助理员倒是个好人，可惜认不得真假！光听人家说个‘自愿’，也不看说得有劲没劲，连我都能看出是假的来，他都给人家发了结婚证！问人家自愿的理由，更问得没道理；只要人家真是自愿，哪管得着人家什么理由？他既然要这样问，人家就跟背书一样给他背一句‘因为他能劳动’。哪个庄稼人不能劳动？这也算个理由吗？轮上我们这真正自愿的了，他说村里有报告，说我们两

个人早就有来往，还得调查调查。村里报告我们早就有来往，还不能证明我们是自愿吗？那还要调查什么？难道过去连一点来往也没有才叫自愿吗？”小晚说到这里，又吃吃笑着说：

“我再说句老实话，我们也骂过王助理员。我们说：‘助理员，傻不傻？不要真，光要假！多少假的都准了，一对真的要调查！’王助理员你可不要恼我们！从你给我们发了结婚证那一天，我们就再也没有骂过你一句！”

区分委书记说：“你骂得对！我保证谁也不恼你们！群众说你们声名不正，那是他们头脑里还有些封建思想，以后要大家慢慢去掉。村民事主任因为想给他外甥介绍，就不给你们写介绍信，那是他干涉婚姻。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婚姻法以后，谁再有这种行为，是要送到法院判罪的。王助理员迟迟不发结婚证，那叫官僚主义不肯用脑子！他自己这几天正在区上检讨。中央人民政府的婚姻法公布以后，我们共产党全党保证执行，我们分委会也正在讨论这事，今天就是为了搜集你们的意见来的！”区分委书记说着向全场看了一眼说：“党员同志们，你们说说人家骂得对不对呀？检查一下咱们区上村上这几年处理错了多少婚姻问题？想想有多少人天天骂咱们？再要不纠正，受了党内处分不算，群众也要把咱们骂死了！”

散会以后，大家都说这种婚姻结得很好，都说：“两个人以后一定很和气，总不会象小飞蛾那时候叫张木匠打得个半死！”连一向说人家声名不正的老头子老太太，也有说好的了。

这天晚上，燕燕她妈的思想就打通了，亲自跟燕燕说叫她第二天跟小进到区上去登记。

（一九五〇年六月五日）

求 雨

“龙王”在中国的旧传说中是会降雨的神圣之一（传说中这一系列的神圣还有好多位），所以在经常遭受旱灾威胁的地方，往往都建有龙王庙。

金斗坪村的龙王庙，建筑在村北头河西边的高岸上。这岸的底部是村西边山脚下的崖石。据老人们说，要不是有这一段崖石，金斗坪早被大河冲得没有影了。

在解放以前，每逢天旱了的时候，金斗坪的人便集中在这庙里求雨。求雨的组织，是把全村一百来户人家每八人编成一班，轮流跪祷……第一班焚上香之后，跪在地上等一炷香着完了，然后第二班接着焚香跪守……该不着上班的人，随便在一旁敲钟打鼓，希望引起龙王注意。这样周而复始地轮流着，直到下了雨为止。

组织领导这事的人常是地主，在解放前不久是本村地主周伯元。周伯元怎样领导这事，只要引土地改革时候老贫农于天佑在斗争周伯元大会上说的一段话就可以明白。于天佑那段话是这样说的：“在求雨时候，你把你的名字排在第一班第一名，可是跪香时候你可以打发长工替你跪。别人误了跪香，按你立的规矩是罚一斤灯油，你的长工误了替你跪香，连罚的灯油也得他替你出。大家饿着肚子跪香，你屯着粮食不出放，反而只用一斗米一亩地的价钱买我们好地，求了十来次雨，就把金斗坪一半土地都买成你的了。有一次你和你亲家说：‘我这

领导求雨不过是个样子，其实下不下都好——因为一半金斗坪都是我的，下了雨自然数我打的粮食多，不下雨我可以用一斗米一亩地的价钱慢慢把另一半也买过来。’你长的是什么心？要不是解放，那就只有你活的了……”

土地改革后，金斗坪的全部土地又都回到农民手里，可是这年夏天不幸就又遇上了旱灾。这时候，政府号召开渠、打井、担水保苗，想尽一切方法和旱灾作斗争。金斗坪就在河边，开渠有条件，党支部书记于长水和村政委员会商量的计划，又请人测量了地势，就召开动员大会，动员开渠。

因为这渠要经过龙王庙下边的石崖，估计至少得二十天。有人说：“要是二十天不下雨的话，渠还没有开成，苗早就晒干了！”于长水说：“只要把渠开成，苗干了还能再种晚粮；要是不开渠白等二十天，苗干了不是白干了吗？只要我们大家有信心，我们就能克服灾荒。要是开成了这条渠，以后就再不会受旱灾的威胁了！”经过这一番加油打气，金斗坪的渠便开工了。

不幸在动工这一天，又出了点小事：大家正在画好了石灰线的地方挖土，忽然听见龙王庙里敲钟打鼓。一听这个，大家就议论开了：“谁还这么封建？”“不要管他，咱们干咱们的！”

“去叫他们停止了！不要让他们咚咚当当扰乱人心！”“叫人家求吧！能求得雨来不更好吗？”“开渠的开渠，求雨的求雨，谁也妨碍不了谁！”……各有各的主张。村长和党支部书记都去计划石工去了，党员们虽有自己的主张可是也说不服大家，最后都同意派个人去看看是些什么人在庙里，一个青年接受了这个使命。

这青年跑到庙里一看，庙里有八个老头，最想不到的是土

地改革时候的积极分子于天佑也在内。青年问于天佑：“你怎么也来了？”“我怎么不能来？”“你不是亲自说过龙王爷是被周伯元利用着发财的吗？”“那是周伯元坏，不是龙王爷不好！”

“原来你也是个老封建！”说了个“老封建”就把老头们惹恼了。有个老头是这青年的本家爷爷。他骂青年说：“你给我滚！不是你们得罪了龙王爷爷的话，早下雨了！你们长的是什么心肝，天旱得跟火熬一样还不让别人求雨！”这青年没法，只好回到河边去报告。晌午，党员把这情况反映到支部，支部书记于长水想出的对付办法是一方面说服他们，一方面加紧开渠——只要渠开成了，自然就没人求雨了。

可是钟鼓不断地敲着，把一些心里还没有和龙王爷完全断绝关系的人又敲活动了：庙里又增加了好几个老头子，青壮年也有被家里老人们逼到庙里去的。庙里又定出轮班跪香制，参加开渠的人，凡是和龙王有点感情的，在上下工时候也绕到庙里磕个头。

于长水一边发动党团员加紧挖土搬石头，一边帮着石匠钻炮眼崩石崖。土渠开得快，给人们增加了信心；石头崩得响，压倒了庙里的钟鼓。跪香的青壮年在不值班的时候，也溜出庙来参加开渠；老头们说他们心不诚，妨碍了求雨的效果。

两天之后，开渠遇上了新困难：上半截土渠已经挖到庙下边的石崖边，可是石崖上的石头太硬，两天才崩了一排鸡窝窝。原来的估计不正确，光这一段五十尺长五尺深的石渠，一个月也开不过去。这时候退坡的，说闲话的慢慢多起来，也有装病的，也有说家里没吃的不能动的，也有不声不响走开不来的；剩下的人，有的说“一年也开不过去”，有的说：“现在旱得人心慌，还不如等到冬天再开”……原来在庙里跪香的仍回去跪

香，原来只在上下工时候去磕个头的也正式编入跪香的班次。

河边人少了，崩开了的石头没人搬，炮声暂且停下来。于长水一边仍叫党团员们搬着石头支持场面不让冷了场，一边脱了鞋，卷起裤管，过到河的对岸，坐在一块石头上，对着这讨厌的石崖想主意。这时候，田里的苗白白地干着，河里的水白白地流着，庙里的钟鼓无用地响着，他觉着实在不是个好滋味。他下了个决心说：“要不能把这么现成的水引到地里去，就算金斗坪没有党！”在火海一样的太阳下，他坐在几乎能烫焦了裤子的石头上，攒着眉头，两眼死钉在这段石崖上，好像想用他的眼光把这段石崖烧化了一样，大约有点把钟没有转眼睛，新办法就被他想出来了。他想要是从石崖离顶五尺高的腰里，凿上一排窟窿，钉上橛子，架上木槽，就可以把水接过去。他这样想着，好像已经看见有好几段连在一起的木槽横在这石崖的腰里，水从木槽里平平地流过去，就泻在村北头的平地上。他的眉头眉开了。他站起来向对岸搬石头的人们喊：“同志们，不要搬了！有了好办法了，说了就又过河来和大家商量。石匠对他的办法又加了点补充，说再把崖上钉上一排竖橛子，用铁绳把横橛子的外边那一头吊在竖橛子上管保成功。

午上又开过群众大会通过了这个办法，退了坡的人听见有门道又都回来参加工作，党团员自然更加了劲，找木匠的、搬木头的、搭架的、拉锯的……七手八脚忙起来。

庙里跪香的人又少了，气得于天佑拼命地敲钟。

一天过去了，河边的木槽已经成形，庙里跪香的人偷跑了三分之二。

两天过去了，木槽已经上了架，跪香的人，不但后来参加的全部退出，连原来的八个老头也少了三个。

石崖腰里架木槽是个新玩意，全村男女老少都来看新鲜，吵嚷得比赶集还热闹。

这声音，在庙里的五个老头听起来心里很不安，连钟鼓也无心敲了。于天佑说：“人们这样没有诚心，恐怕要惹得龙王爷一年也不给下雨！”其余四个老头撇了撇嘴，随后五个人商量了一下，一齐跪到地上祷告。于天佑说：“龙王爷呀！不论别人怎么样，我们几个的心是真诚的！求你老人家可怜可怜吧！”就在这时候，忽听得外边的人群像疯了一样齐声大喊起来，喊得比崩石崖的炮声还惊人。一个老头说：“这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故了！”说了便爬起来跑出去，其余四个也都侧着耳朵听。

出去的那个老头跑回来喊：“快去看！接过水来了！大着哩！”地上跪着的四个老头，除了于天佑也都爬起来要出去。于天佑说：“难道我们也不能诚心到底吗？”一个老头说：“抢水救苗要紧！龙王爷会原谅！”说着便都走出去。

最后剩下于天佑。于天佑给龙王磕了个头说：“龙王爷！我也请你原谅！我房背后的二亩谷子也赶紧得浇一浇水了！”说罢，也爬起来跟着别的老头往外走。

（一九五四年）

三 里 湾

从旗杆院说起

三里湾的村东南角上，有前后相连的两院房子，叫“旗杆院”。

“旗杆”这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有些地方的年轻人，恐怕就没有赶上看见过。这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用四个石墩子，每两个中间夹着一根高杆，竖在大门外的左右两边，名字虽说叫“旗杆”，实际上并不挂旗，不过在封建制度下壮一壮地主阶级的威风罢了。可是在那时候，这东西也不是哪家地主想竖就可以竖的，只有功名等级在“举人”以上的才可以竖。

三里湾的“举人”是刘家的祖先，至于离现在有多少年了，大家谁也记不得。有些人听汉奸刘老五说过，从刘家的家谱上查起来，从他本人往上数，“举人”比他长十一辈，可是这家谱，除了刘老五，刘家户下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后来刘老五当了日军的维持会长，叫政府捉住枪毙了，别人也再无心去细查这事。六十多岁的王兴老汉说他听他爷爷说，从前旗杆院附近的半条街的房子都和旗杆院是一家的，门楣都很威风，不过现在除了旗杆院前院门上“文魁”二字的匾额和门前竖过旗杆的石墩子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当日刘家出过“举人”了。

旗杆院的房子是三里湾的头等房子。在抗日战争以前，和旗杆院差不多的好房子，本来还有几处，可惜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来“扫荡”的时候都烧了，只有旗杆院这两个院子，因为日军每次来了自己要住，所以在刘老五死后也没有被他们烧过。在一九四二年枪毙了刘老五，县政府让村子里把这两院房子没收归村；没收之后，大部分做了村里公用的房子——村公所、武委会、小学、农民夜校、书报阅览室、俱乐部、供销社都设在这两个院子里，只有后院的西房和西北小房楼上下分配给一家干属住。这一家，男女都在外边当干部，通年不回家，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妈妈留在家里。这位老太太因为年纪大、住在后院，年轻人都叫她“后院奶奶”。

三里湾是个模范村——工作开辟得早、干部多，而且干部的能力大、经验多。县里接受了什么新的中心工作，常好先到三里湾来试验——除奸、减租减息、土改、互助，直到一九五一年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先到这个村子里来试验的。每逢一种新的工作开始，各级干部都好到试验村取得经验，因此这个村子里常常住着些外来的干部。因为后院奶奶有闲房子，脾气又好，村干部常好把外来的干部介绍到她家里去住，好像她家里就是个外来干部招待所。

近几年来，旗杆院房子的用处有点调动：自从全国大解放以后，民兵集中的次数少了，武委会占的前院东房常常空着，一九五一年村里成立了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会、算账都好借用这座房子，好像变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室。可是在秋夏天收割的时候，民兵还要轮班集中一小部分来看护地里、场上的粮食；这时候也正是合作社忙着算分配账的时候，在房子问题上仍然有冲突；好在乡村里的小学、民校都是在收秋收夏时候放假的，

民兵便临时到对过小学教室里去住。到一九五二年，到处搞扫盲运动，县里文教科急于完成扫盲工作，过左地规定收秋不放假，房子又成了问题，后来大家商量了个解决的办法是吃了晚饭上一会课，下了课教室还归民兵用。

一、放 假

就在这年九月一号的晚上，刚刚吃过晚饭，支部书记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便到旗杆院西房的小学教室里来上课。她是个模范青年团员，在扫盲学习中也是积极分子。她来得最早，房子里还没有一个人，黑咕隆咚连个灯也没有点。可是她每天都是第一个先到的，所以对这房子里边的情况很熟悉——她知道护秋的民兵把桌子集中在北墙根作床子用。她知道板凳都集中在西墙根把路留在靠门窗的一边。她知道煤油灯和洋火都放在民兵床头的窗台上。她凭着她的记性，也碰不了板凳也碰不了桌子，顺顺当当走到窗跟前，放下课本，擦着火点上灯，然后来疏散那些桌子板凳。她的力气大、动作快，搬起桌子来让桌子的腿朝上，搬到了放的地方轻轻一丢手就又跑了。她正跑来跑去搬得起劲，忽听得门外有人说：“这武把还练得不错！”她不用看也听得出说话的人是谁，便回答他说：“你不止不来帮一帮忙，还要摆着你那先生架子来说风凉话！”

来的这个人是个穿着中学生制服留着短发的男青年，名叫马有翼，是本村一个外号“糊涂涂”正名马多寿的第四个儿子，现在当的是本村扫盲学校乙班的教员。这村有两个扫盲教员：一个就是马有翼，上过二年半初中，没有毕业；另一个是个女的，叫范灵芝，是村长范登高的女儿，和马有翼是同学，本

年暑假才在初中毕了业。马有翼教乙班，范灵芝教甲班。马有翼爱和灵芝接近也爱和玉梅接近，所以趁着乙班还没有人来的时候，先溜到甲班的教室来玩。玉梅要他帮忙搬桌子板凳，他便进来帮着搬。他见玉梅拿着桌子板凳抡来抡去，便很小心地躲着空子走，很怕碰破了他的头。玉梅说：“你还是去教你的‘哥渴我喝’去吧！”

不大一会，两个人把桌子板凳排好了，玉梅去擦黑板，有翼没有事，便在窗下踱来踱去。他溜到灯跟前，看见玉梅的课本封面上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便说：“玉梅！你怎么把个‘梅’字写得睡了觉了？”玉梅回头看了一眼，见他说的是课本外面的名字，便回他说：“谁知道那个字怎么那样难写？写正了也难看，写歪了也难看！”说着便在刚才擦好了的黑板上练起“梅”字来。她一边写一边向有翼说：“你看！写正了是这个样子，”写了个正的；“写歪了是这个样子。”又写了个歪的。有翼说：“歪的时候也要有个分寸！让我教一教你！”说着跑过去握着玉梅的手腕又写了一个，果然写得好一点。有翼又说：“你为什么要用那么个难写的名字？”玉梅说：“你不用说我！你那个‘翼’字比我这‘梅’字更难写！越写越长！”有翼说：“你也写一个我看看！”玉梅写了好大一会才写出个“翼”字来，比刚才写的那个“梅”字长两倍，引得有翼哈哈大笑。有翼说：“看你把我写了多么高？”玉梅说：“你不就是个高个子吗？”有翼说：“高是高了，可惜画成个蜈蚣了！也让我教一教你！”他正又握住玉梅的手腕去教，忽听得后面有人说：“握着手教哩！我说玉梅写字为什么长进得那么快！”有翼听见灵芝来了便放了手，玉梅嫌那个像蜈蚣一样的字写得太难看，拿起刷子来擦了。灵芝一晃看见一个“梅”字和一个

“翼”字并排写着，便笑了一笑说：“两个人排一排队很好玩，为什么擦了昵？”玉梅说：“两个‘字’排在一块有什么好玩？像你们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当教员、一个互助组里做活，不更好玩吗？”灵芝又正要答话，门外来了一阵脚步声，有几个学员进来了，大家便谈起别的话来。

忙时候总是忙时候，等了很久，甲班只来了五个人，乙班只来了四个人。大家等得发了急，都又到大门外的石墩子上去了望。一会，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玉梅的近门本家哥哥，是个单身过日子的小伙子，名叫王满喜，外号“一阵风”——因为他的脾气是一阵一个样子，很不容易捉摸。他来了，另外一个青年说：“我们的人到齐了！”大家问：“怎么能说是‘齐’了？”这个青年说：“甲班来了五个乙班也来了五个，两班的人数不是齐了吗！”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王满喜说：“快不要把我算在数里！我是来请假的！”有翼问：“又是还没有吃饭吗？”满喜说：“不止没有吃，连做还没有做；不止没有做，现在还顾不上做！”“忙什么？”“村里今天该我值日。专署何科长来了，才派出饭去，还没有找下房子住！”玉梅问：“后院奶奶那里哩？”满喜说：“住满了——水利测量组、县委会老刘同志、张副区长、画家老梁、秋收评比检查组，还有什么检查卫生的、保险公司的……都在那里！哪里还有空房子？我在村里转了好几个圈子了，凡是有闲房子的家都找过，可是因为正收着秋，谁家的空房子里都堆满了东西。”玉梅说：“还是你没有找遍！我提一家就有空房子！”“谁家？”“谁家？有翼哥他们家！你去过了吗？”满喜说：“他们家呀？我不怕有翼见怪！他家的房子什么时候借给干部住过？我不去他妈跟前碰那个钉子！”玉梅向有翼说：“有翼哥！你不能帮忙回家里

商量一下？”有翼说：“咱不行！你不知道我妈那脾气？”灵芝说：“这话像个团员说的吗？”另一个青年说：“叫他去说呀，管保说不到三句话，他妈就用一大堆‘烧锅子’骂得他闭上嘴！”玉梅想了一想说：“我倒有个办法！满喜哥！你先到我二嫂的娘家去借他们的西房……”满喜说：“他们那里不用去！他们那西房，早给干豆荚、干茄片子、烟叶子、黍子、绿豆……堆得连下脚的空儿都没有了！”玉梅说：“你等我说完！说借他们的西房不过是个话头儿，实际上是叫天成老婆替你问房子去！你不要对着天成老汉说，只用把他老婆点出来，悄悄跟她说，就说专署法院来了个干部，不知道来调查什么案子，村里找不到房子，想借她的西房住一下。她说腾不开的话，你就请她替你到有翼哥他妈那里问一问他们的东房，管保她顺顺当当就去替你问好了。因为……”满喜不等她说完便截住她的话说：“我懂得了！这个法子行！只要有翼不要先跟他妈说！”有翼说：“我不说，不过以后她总会知道！”满喜说：“只要等人住进去，她知道了不过是骂两句，又有什么关系？哪个坟里的骨头是骂死的？”说着就走了。

忙时候总是忙时候，大家等了好久，九个人仍是九个人。王满喜还来请个假，别的人连假也不请，干脆不来。有个学员说：“我说县里的决定也有点主观主义——光决定先生不准放假，可没有想到学生会放先生的假。”正说着，又听到西边一阵脚步声。玉梅说：“来了来了！这一回来的人可不少！”说话间，果然有好几个人从西房背后走过来，一转弯就向大门这边来了。当头走的是党支部书记兼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王金生，接着便是副村长张永清、生产委员魏占奎、社长张乐意、女副社长秦小凤，连一个学员也没有，尽是一些村里、社里的重要

干部。灵芝说：“再等也是这几个人，今天的课又上不成了！大家散了吧！”大家解散了，学员中有两个该值班的民兵，又到教室里去合并那些刚才摆开的桌子。灵芝问副村长张永清“是不是可以少放几天假？”张永清说：“人们都自动不来了，还不和放假一样吗？”

二、万宝全

玉梅离开了旗杆院的大门口往家里走，通过了一条东西街，上了个小坡，便到了她自己的家门口。她的家靠着西山根，大门朝东开，院子是个长条形，南北长东西短；西边是就着土崖挖成的一排四孔土窑，门面和窑孔里又都是用砖镶过的；南边有个小三间南房，从前喂过驴，自从本年春天把驴入了合作社，这房子就闲起来，最近因为玉梅的二哥玉生和她大哥金生分了家，临时在里边做饭；北边也有个小三间，原来是厨房，现在还是厨房；东边，大门在中间，大门的南北各有一座小房，因为房间太浅，不好住人，只是用它囤一囤粮食，放一放农具、家具。西边这四孔窑，从南往北数，第一孔叫“南窑”，住的是玉生和他媳妇袁小俊；第二孔叫“中窑”，金生两口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里边；第三孔叫“北窑”，他们的父亲母亲住在里边；第四孔叫“套窑”，只有个大窗户，没有通外边的门，和北窑走的是一个门，进了北窑再进一个小门才能到里边，玉梅就住在这个套窑里。

玉梅刚走到大门外，听见里边“踢通踢通”响，她想一定是她爹和她二哥打铁；赶走进大门来，看见北边厨房里的窗一亮一亮的，果然是打铁，便走到厨房里去看热闹。这时候厨房里已

经有五个人，不过和她爹打铁的不是她二哥，是她一个本家伯伯名叫王申，其余是她大哥的三个孩子——大的七岁，是女的，叫青苗；二的五岁，男的，叫黎明；三的三岁，也是男的，叫大胜。

这两位老人家，是三里湾两个能人。玉梅爹叫王宝全，外号“万宝全”，年轻时候给刘老五家当过长工，在那时候学会了赶骡子，学会了种园；他什么匠人也不是，可是木匠、铁匠、石匠……差不多什么匠人的活儿也能下手。王申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和万宝全差不多，不过他家是老中农，十五亩地种了两辈子，也没有买过也没有卖过，直到现在还是那十五亩地。他一个人做惯了活，活儿做得又好，所以不愿和别人合伙，到活儿拥住了的时候，偶然雇个短工，人家做过的活儿，他总得再修理修理，一边修理着一边说“使不得，使不得”，因此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使不得”。按做活儿说，在三里湾，使不得只赞成万宝全一个人，万宝全也很看重使不得，所以碰上个巧活儿，他们俩人常好合作。

他们俩人都爱用好器具。万宝全常说：“家伙不得劲了，只想隔着院墙扔出去。”使不得要是借用别人的什么家伙，也是一边用着一边说“使不得，使不得”。动着匠人活儿，他们的器具都不全，不过他们会想些巧法子对付。像万宝全这会打铁用的器具，就有四件是对付用的：第一件是风箱，原是做饭用的半大风箱。第二件是火炉，是在一个破铁锅里糊了些泥做成的。第三件是砧，是一截树根上镶了个扁平的大秤坠子。第四件是小锤，是用个斧头来顶替的——所以打铁的响声不是“叮当叮当”而是“踢通踢通”。这些东西看起来不相称，用起来可也很得劲。

他们这次打的是石匠用的钻尖子。钻尖子这东西，就是真的石匠也是自己打的，不用铁匠打——因为每天用秃了，每天得打，找铁匠是要误事的。这东西用的铁，俗话叫锭铁，比普通用的钢铁软，可是比普通的熟铁硬（大概也是某种硬度的钢铁，看样子也是机器产品），买来就是大拇指粗细的条子，只要打个尖、蘸一蘸火就能用。每一次要打好几条，用秃了再打，直用到不够长了才换新的。

玉梅见他们打的是钻尖，问他们断什么，宝全老汉说：“洗场礅！”（“场礅”就是打粮食场上用的碌碡， “洗”是把大的石头去小的意思。）玉梅问：“为什么洗场礅？”王申老汉和她开玩笑说：“因为不够大！”“还能越洗越大？”“你问你爹是不是！”玉梅又问宝全老汉：“爹！是能越洗越大吗？”宝全老汉笑了。宝全老汉说：“是倒也是，可惜你伯伯没有给你说全！‘不够大’是说场礅在场上转的圈子不够大。咱们成立了合作社，把小场子并成大场子了，可是场礅原是小场上用的，只能转小圈子；强要它转大圈子，套绳就要擦磨牲口的右后腿，所以得洗一洗！”玉梅又问：“洗一洗怎么就能转大圈子？”宝全老汉说：“傻闺女！把大头洗小了，转的圈子不就大了吗？”玉梅笑了笑说：“知道了！只洗一头啊！”王申老汉又和她开玩笑说：“谁教你们成立合作社哩？要不是成立合作社，哪有这些事？”玉梅说：“为了多打粮食呀！我说申伯伯！你怎么不参加我们的合作社？难道你不愿意多打粮食吗？”宝全老汉说：“你伯伯的地每年都是数着垄种的。他还怕人家把他的垄沟种错了哩！”王申老汉向宝全老汉说：“老弟！你说的对！咱老弟兄俩，再加上你玉生，怎么合作都行；要说别人呀，我实在不愿意跟他们搅在一块儿做活！”玉梅说：“那

你为什么还让接喜哥参加互助组？”王申老汉说：“下滩那五亩由他去瞎撞，山上的十亩不许他乱搅！”玉梅说：“你把人家分出去了吗？”宝全老汉说：“他父子们是分地不分粮。你伯伯嫌人家做的活儿不好，可是打下粮食来他不嫌多！”王申老汉说：“难道是我一个人要了？他不是也吃在里边？”……玉梅见这两个老汉斗起嘴来没有完，便又问宝全老汉说：“我二哥上哪里去了？怎么不跟你来打铁来？”王申老汉说：“你爹在这里当铁匠，他在南窑里当木匠哩！”玉梅问：“又做什么木匠活？”王申老汉说：“做场礅！”“木匠怎么做场礅？”

“做木头场礅！你们合作社就有这些怪事！”玉梅又问宝全老汉说：“爹！是吗？”宝全老汉又笑了。宝全老汉说：“又和刚才一样！是倒是，可惜你伯伯又没有给你说全！他做的是……”王申老汉指着火炉里的钻尖说：“只顾说闲话，烧化了！”宝全老汉也不再说什么木头场礅的事，停了风箱拿起斧头，左手用钳子去夹那烧过了火的钻尖。玉梅见他顾不上再说了，就说：“我自己到南窑看看去！”她正转身要往外走，宝全老汉夹出那条冒着白火花的钻尖来，放在砧上，先把斧头横放平了轻轻拍了一下。他虽然没有很用力，可是因为铁烧得过了火，火星溅得特别多。有个火星溅在三岁的大胜腿上，大胜“呀”的一声哭了，两个老汉赶紧停了手里的活去照顾孩子，玉梅也转回身来帮着他们查看烫了什么地方。王申老汉抱起大胜来说：“小傻瓜！谁叫你光着腿来看打铁？”宝全老汉查明了大胜只是小腿上烫了个小红点，没有大关系，就向玉梅说：“快给你大嫂抱回去吧！”玉梅接过大胜来才一出厨房门，金生媳妇就已经跑来了。金生媳妇一边从玉梅手里接住大胜，一边问玉梅说：“烫了哪里？”玉梅说：“不要紧，小腿上一点点！贴上一二点膏药吧！”说着

和金生媳妇相跟到中窑去给大胜贴膏药。

三、奇怪的笔记

中窑是一门两窗，靠北边的窗下有个大炕。金生媳妇把大胜放到炕上去找膏药，玉梅用自己手里的课本逗着大胜让他止住哭。大胜这孩子是个小活动分子，一止了哭就赤光光的满炕跑。金生媳妇找着了膏药来给他贴，他靠住墙站着不到前边来。玉梅说：“大嫂！你看那赤光光的多么好玩？”金生媳妇说：“穿个衣裳来管保烫不着了！早就给他预备下衣裳他就是不穿！生多少气也给他穿不到身上！”玉梅说：“穿上什么好衣裳也没有这么光着屁股好看！快过来给你贴上点膏药！”大胜还是不过来，玉梅从窗台上取起个红皮笔记本来说：“你看我这红皮书！”大胜见是个新鲜东西，就跑过来拿，金生媳妇向玉梅说：“可不敢玩人家那个！那是你大哥的宝贝！”可是大胜的手快，一把就夺过去了。玉梅爬上炕去抱住他说：“不要玩这个！姑姑换给你个好东西玩！”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顶针圈儿来套在自己的铅笔上给他摇着看，他才放开了笔记本。他一放手，笔记本里掉出个纸单儿来。金生媳妇抱住大胜去贴膏药，玉梅腾出手来拾起纸单儿正要仍夹进笔记本里去，可是又看见纸单子上的字很奇怪，不由得又端详起来。

单上的字，大部分又都是写好了又圈了的，只有下边一行十个字没有圈，玉梅一个一个念着：

“高、大、好、剥、拆、公、畜、欠、配、合。”

金生媳妇说：“你大哥有时候好管些闲事！公畜欠配合有什么坏处？又不会下个驹！”玉梅说：“我看也许指的是公畜

不够配合，母畜就不能多下驹。让我数数咱们社里几个公畜几个母畜：老灰骡是公的，银蹄骡也是公的……”金生媳妇笑着说：“你糊涂了？为什么数骡？”玉梅想了一下也笑了笑说：

“真是糊涂了！骡配合不配合没有什么关系，咱就数驴吧！社长的大黑驴是母的，小三的乌嘴驴是……”玉梅正数着驴，没有注意门外有人走得响，突然看见她大哥金生掀起竹帘走进来。金生媳妇说：“会散了？”金生说：“还没有开哩！”又看见玉梅拿着他的笔记本，便指着说：“就是回来找这个！”玉梅把手里拿的那张纸单子向金生面前一伸说：“大哥！你这上边写的是是什么，怎么我连一句也不懂？”金生说：“那都是些村里、社里的问题，我记得很简单，别人自然懂不得！”玉梅说：“为什么写好了又都圈了呢？”金生说：“解决了哪一项，就把哪一项圈了。”玉梅说：“那么下边这一行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了！怎么叫个‘高大好剥拆’？”金生说：“那些事马上给你说不清楚！快拿来吧！紧着开会哩！”玉梅说：“不用细讲，只请你给我简单说说是什么意思？”金生说：“不行！你听这个也没有用！”

也不怨金生嘴懒不肯说，真是一下不容易说明这几个字的意思。原来他们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个大缺点是人多、地少、地不好。金生和几个干部研究这缺点的原因时候记了这么五个字——“高、大、好、剥、拆”。上边四个字代表四种户——“高”是土改时候得利过高的户，“大”是好几股头的大家庭，“好”是土地质量特别好的户，“剥”是还有点轻微剥削的户。这些户，第一种是翻身户，第二、三、四种也有翻身户、也有老中农，不过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热心——多数没有参加，少数参加了的也不积极。地

多、地好的户既然参加社的不多，那么按全村人口计算土地和产量的平均数，社里自然要显得人多、地少、地不好了。这些户虽说还不愿入社，可是大部分都参加在常年的互助组里，有些还是组长、副组长。他们为了怕担落后之名，有些人除自己不愿入社不算，还劝他们组里的组员们也不要入社。为着改变这种情况，村干部们有两个极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尽量动员各互助组的进步社员入社，让给那四种户捧场的人少一点，才容易叫他们的心里有点活动；四种户中的“大”户，要因为入社问题闹分家，最好是打打气让他们分，不要让落后的拖住进步的不得进步。另一种意见，主张好好领导互助组，每一个组进步到一定的时候，要入社集体人，个别不愿入的退出去再组新组或者单干；要是把积极分子一齐集中到社里，社外的生产便没人领导；至于“大”户因入社有了分家问题，最好是劝他们不分，不要让村里人说合作社把人家的家搅散了。这两种意见完全相反——前一种主张拆散组、拆散户，后一种主张什么也不要拆散。金生自己的想法，原来和第一种意见差不多，可是听了第二种意见，觉着也有道理，一时也判断不清究竟拆好还是不拆好，所以只记了个“拆”字，准备以后再研究。

“高大好剥拆”五个字是这样凑成的，三两句话自然说不清楚，况且跟玉梅说这个也不合适，所以金生不愿说。

玉梅见金生把事情说大了，也无心再追问，就把本子和纸单儿都还给金生。金生正要走，金生媳妇顺便和他开玩笑说：

“玉梅说上边还写着什么‘公畜欠配合’是什么意思？难道母畜就不欠配合吗？”金生说：“没有！谁写着什么‘公畜欠配合’？”玉梅说：“你再看看你的单子不是那么写着的吗？”金生又取出他才夹回本子里去的那张纸单一看，连他自己也笑

了。他说：“那不是叫连起来念的！‘公’是公积金问题，‘畜’是新社员的牲口入社问题，‘欠’是社里欠外债的问题，‘配’是分配问题，‘合’是社内外合伙搞建设的问题。哪里是什么‘公畜’‘母畜’的问题！”说罢三个人都大笑了一阵，连三岁的大胜也糊里糊涂笑起来。金生便取了他的笔记本走了。

金生走后，玉梅问：“大嫂！申伯伯说我二哥在南窑做木头场碌是吗？”金生媳妇说：“是木头车轮！不知道叫做什么用的！”大胜说：“我知道！”又叉开他的两只小手比着说：“圆圆的，大大的，咕噜咕噜转……”玉梅说：“就是那么样转法？姑姑去看看！”玉梅正要走，大胜说：“我也去！”说着爬到炕边扭转身屁股朝前就往下溜。金生媳妇抓住他说：“你该睡了！你不是看过了吗？”大胜仍然闹着要去，玉梅说：“你睡吧，姑姑不去了！”说着又回头来坐到炕沿上。金生媳妇又向大胜说：“快睡了，妈给你做鞋！看你这鞋钻出小麻雀来了（前边露了趾头）！”玉梅笑着问：“大胜！你几天穿一对鞋？”这句话引起金生媳妇的牢骚。金生媳妇说：“玉梅呀！提起做鞋来我就想把他们送给人家那些没孩子的！”玉梅说：“你要真送，我替你找家！人家黄大年老婆想孩子跟想命一样！”又逗着大胜说：“你跟了人家黄大年吧？跟了人家天天穿新鞋！”大胜说：“不！妈！”金生媳妇说：“不不！你姑姑是跟你说着玩的！”又向玉梅说：“光这些零碎活儿就把人赶死了！三个孩子的鞋都透了，爹和你大哥的鞋也收不下秋来了！前几天整了两对大鞋底连一针也没有顾上纳，明天后天得上碾磨，要不然一割了谷，社里的牲口就要犁地，碾磨就得使人推了。说话秋凉了，大大小小都要换衣裳。白天做做饭，跟妈俩人在院里搓一搓大

麻，捶一捶豆角种，拣一拣棉花，晒一晒菜……晚上这些小东西们又不早睡，跟他们争着抢着做一针活儿抵不了什么事，等他们睡了还得熬夜！”玉梅说：“以后，晚上我可以帮你！你先把大胜的鞋交给我做好了！”金生媳妇说：“你白天上地，晚上还要学习，哪里顾得上做？”玉梅说：“收开秋这四五天，我们的课就没有上好，人越来越少，今天晚上又没有上成。我看以后越不行了，索性等收完秋再学习吧！大嫂你不要客气！你伺候得我长这么大了，难道我不能帮帮你的忙？再说二嫂也分出去了，家里的杂活……”

金生媳妇说：“你快不要提她！一提她我就有气！过门来一年了，她给家里做过什么活？没有下过一次地！碰上使碾磨就躲回娘家去！在院里没有动过扫帚！轮着班做做饭她还骂着说：‘谁该着伺候你们这一大群’？我进门来你二哥才十岁，要说‘伺候’的话，吃的穿的我整整给他做了十年，连去年结婚的衣服鞋子都是我一针一线给他做的！天天盼着兄弟娶媳妇，娶来个媳妇只会呕气，才进门三天就觉着伺候了我！就和我闹着分家！要按我的意思呀，她早滚开一天少生一天气，偏遇上你大哥那种专讲‘影响’的人，糊糊补补舍不得叫分开，硬叫你二哥教育她，一直糊补到现在，教育到现在，还不是分开了？‘影响不好’‘影响不好’，现在的影响还不是‘不好’？快不要提她！走开了干净得多！”玉梅说：“谁也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咱们不提她吧！不要让她听见了又得吵！”金生媳妇说：“吃了饭连碗也没有洗就不知道上哪里遛晃去了！她能跟家里待一会吗？她在我也要吵！吵就吵！多吵几回也叫大家多听听！省得不知道的还说我这当大嫂的尖薄——容不得一个兄弟媳妇！”金生媳妇和谁也没有生过大气，就是一提

玉生媳妇气就上来了。玉梅见她上气来，很后悔自己不该先提起玉生媳妇，好容易等她说到一个段落上停下来，正想用别的话岔开，忽听得南窗里有人说：“这是谁找谁的事呀？”她们两个人都听出来是玉生媳妇的口音，都觉着这一下可惹起麻烦来了。金生媳妇的气还没有下去，推开大胜要往外走，玉梅拉住她说：

“大嫂你不要动，让她找得来再说！你要先出去了，她还要说是你找着她闹哩！”金生媳妇听玉梅这么一说也就停住了。玉梅的话还没有落音，就听见玉生说：“你随便买了东西回来跟我要钱，难道是我找你的麻烦？”玉梅跟金生媳妇说：“你听！刚才她那话不是跟咱说的，一定又是她在外边买了什么东西回来跟我二哥要钱来了。”

玉生两口子吵架，在没有分家以前，就已经成了平常事。金生媳妇和玉梅一听出是他们两个人吵，都以为是没有事了，就取过针线筐来坐到灯下准备做活；可是才把活儿拿到手，又听着他们越吵越紧，吵着吵着打起架来。金生媳妇总算是个好心肠的人：虽说跟玉生媳妇有那么大的气，可是人家这会真打起架来了，她还是跟玉梅跑去给人家劝架去。

四、“这日子不能过了”

想知道玉生为什么和他媳妇打起来，总得先知道这两个人是两个什么样的人：

玉生从小就是个能干孩子，性情有点像他爹，十岁时候就会用荆条编个小花篮，十二岁时候就会用铜子打个戒指，后来长大了些，能做些别人做不来的巧活，人们都叫他“小万宝全”。他的研究精神很好，研究起什么来能忘了吃饭。三里湾村西边

有一条黄沙沟，每年发水时候要坏河滩一些地。一九四九年他发明了个活柳篱笆挡沙法，保护得他们互助组里两块地没有进去沙；来年大家都学会了他的办法，把可以进去沙的地一同保护起来，县里的劳模会上给了他一张特等劳模奖状。

玉生媳妇叫袁小俊，是本村袁天成的女儿，从小是个胖娃娃，长大了也不难看，说话很利落。她和玉生的结婚，是在个半新半旧的关系上搞成的。她比玉生小一岁，从小跟玉生也常在一块玩。后来玉生成了村里个小“能人”，模样儿长得又很漂亮，年纪虽说不大，大人们却也不得不把他当成个人物来看待，特别是在他得了奖状那几天，人们就更看重他——每当他从人群中间走过去，总有人在后边说：“小伙子有本领！”“比他爹还行！”……在这时候，村里的年轻姑娘们，差不多都愿意得到像玉生这样的一个丈夫，袁小俊也是其中一个。袁天成老婆也看见玉生不错，就跟袁天成说：“把咱小俊嫁给玉生吧？”袁天成是三里湾有名的怕老婆的人，自然没有别的话说，他老婆便去找范登高做媒人。乡村里留下的旧风俗是只要女方愿意，男方的话比较好说，况且小俊长得还好看，在社会上也没有表现过什么缺点；玉生虽说有研究的精神，可是还没有学会研究青年姑娘，只是觉着小俊长得还不错，也没有露过什么毛病，所以就答应下来。那时候，金生媳妇有点替玉生担心。要说小俊有毛病的话，金生媳妇也没有什么根据，不过她觉着袁天成老婆不是个好东西，教出来的闺女恐怕也靠不住。她把她的意见向金生说过一次，金生说：“家里的教育自然有关系，不过人是活的，天成老婆真要是把她教育坏了，难道玉生就不能把她再教育好了吗？”金生媳妇觉着这话也有道理，所以就取消了自己的意见。

小俊和玉生初结了婚的时候，也不闹什么气，后来的事情果然坏在天成老婆身上。天成老婆外号“能不够”，跟本村“糊涂涂”老婆是姊妹，都是临河镇一个祖传牙行家的姑娘。当她初嫁到袁天成家的时候，因为袁天成家是个下降的中农户，她便对袁家全家的人都看不起，成天闹气，村里人对她的评论是“骂死公公缠死婆，拉着丈夫跳大河”。到小俊初结了婚的时候，她把她做媳妇的经验总结成一套理论讲给小俊。她说：

“对家里人要尖，对外边人要圆——在家里半点亏也不要吃，总得叫家里大小人觉着你不是好说话的；对外边人说话要圆滑一点，叫人人觉得你是个好心肠的人。”她说：“对男人要先折磨得他哭笑不得，以后他才能好好听你的话。”从前那些爱使刁的女人们常用的“一哭二饿三上吊”的办法她不完全赞成。她告小俊说：“千万不要提上吊——上吊有时候能耽搁了自己的性命；哭的时候也不要真哭——最好是在夜里吹了灯以后装着哭；要是过年过节存了一些干粮的话，也可以装成生气的样子隔几天不吃饭。”这两个办法她都用过，要不天成老汉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听她的话。

以上还只是她一些原则的指示，后来的指示就更具体了：她嫌玉生家里人口多，小俊不能当家，便和小俊说：“你犯不上伺候他们那一大群，应该跟玉生两个人分出来过个小日月；不过你不要提分家，只搅得他们一会也不得自在，他们就会把你们两口子分出来；等分出来了你们一方面过着自己的清静日子，一方面还可以向别人说是他们容不得人把你们分出来的。”小俊照着她的指示和金生媳妇闹了几回气，金生媳妇果然想和她分家，可是金生不愿意。金生悄悄和媳妇说：“你让着她一点！不要叫别人笑话咱们连个兄弟媳妇都容不下！”金生媳妇

听了金生的话，遇着她寻气的时候不搭她的碴，她找不到一点缝儿，只得和她妈另外研究办法。她妈后来又想了个办法，叫她回去挑拨玉生和他大哥提出分家，她便回去跟玉生说：“我伺候不了你们这一大家！你跟大哥说说咱们分出来过！”玉生说：

“我们这一大家，除了小孩们都是参加生产的！说不上是谁来伺候谁！”“生产的东西又不是给了我，轮着我做饭可是得做一大锅！”“生产的东西没有给你，难道你吃的穿的都是天上飞来的？”“我也不愿意沾他们的光！”“你愿意分，光把你分出去，我是不愿意分出去过的！”“要你这男人就是叫把自己的媳妇分出去哩？那还不如分个彻底——干脆离了婚算拉倒！”

“你讲不讲理？这是你自己要分呀，还是我要把你分出去哩？”

“要分就是叫把我一个人分出去吗？”“自然是谁愿意分把谁分出去！我不愿分！我觉着这么着过就很好！”“我跟大嫂合不来！”“我觉着大嫂是个好人，毛病都出在你身上！”“大嫂好你就跟大嫂过好了，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放屁！”“你为什么骂人？”“你前边那话是怎么说的？再说一遍我听听？”

“用不着说别的！干脆两条路：要不就分家，要不就离婚！”

“离就离！分家我不干！”玉生要离婚，金生问明了情由说：“不用离！分开就分开过吧！分开有什么坏处呢？要说怕影响不好，因为分不了家就离了婚，影响不更坏吗？”这才把他们分出去。这还是最近几天的事。

分开家这几天，能不能更抓紧时间教了小俊一些对付玉生的原则和办法。她说：“离开了当家人，两口子过日子，一开头就马虎不得：他做得了的事你不要替他做——替过三趟来就成你的事了！你将就能当家的事不要问他——问过三趟来你就当不了他的家了！”小俊就照着她的话办。前两天，睡过了午觉，

合作社打了钟，玉生拿起镰刀要上地，小俊说：“水缸里没水了！担了水再走！”玉生说：“打钟了！你去担一担吧！”“我担不动！”“玉梅还能担动你担不动？”“可惜你娶的不是玉梅！”“分得了家过不了家算什么本事？担不动你看着办！打了钟我不能不上地！”玉生说罢走了，没有去担水。小俊马上去找能不够。小俊把事由交代完了以后问能不够说：“我自己要不担，晚上的饭怎么做哩？”能不够说：“可不要给他行下这个规矩！没有水晚饭不用做！你自己到我这里来吃饭！”那天晚上小俊果然没有做饭。小俊吃的是她娘家的饭，玉生吃的是他大哥家的饭。金生也叫玉生在分开家以后好好教育小俊，可是能不够正帮着小俊给玉生立规矩哩，小俊哪里会听玉生的话？

先要了解了这些历史，才能知道他们两口子吵架的真原因。

这天晚上，宝全老汉约着王申老汉来打钻尖。王申老汉刚来的时候说范登高的骡子回来了，贩来了好多新东西。小俊听了这个消息，最后的半碗饭也没有吃完，就放下碗往范登高家里去了。她到了范家，见范登高家的桌子上、床上放着好多新东西——手电筒、雨鞋、扑克牌、水果糖、棉绒衣、棉绒毯子、小孩帽子、女人帽子、头卡……还有些没有拆开的纸包。消息灵通的人，早已挤满了一屋子，小俊的妈妈能不够也在那里看。小俊看中了一身棉绒衣，问能不够说：“这一套衣裳不知道得用多少钱？”能不够说：“我问过了，九万！”“我想买一套，可不知道玉生给出钱不！”“你穿到身上他就得出钱！不过你头一次当家买东西最好是少买一点，不要让他真没有钱给你顶回来！你可以先买个上身——四万五，上下一样！”小俊就拿

了个上身，范登高给她用纸包起来，伸手来接她的钱，她说：

“没有带钱来！一会给你送过来好了！”范登高说：“好吧！一会你可就送过来！这是和人家合伙做的个生意！”说罢了把东西递给她，顺手记在自己的账单上。就在这时候，灵芝和有翼相跟着进来了。灵芝向范登高说：“爹！你还不去开会？人家别的主要干部都到齐了！”范登高说：“马上就去！”又向买东西的人们说：“我要走了！要什么明天再来吧！”说罢，又吩咐赶骡子的王小聚明天早点喂牲口就走了。买东西的人们接着也就都慢慢散了。

小俊拿着东西先挤出门来跑回家去。她回到院子里的时候，金生媳妇和玉梅正在中窑里谈论她，不过她一心回去向玉生要钱，没有顾上注意这些，一股劲跑回南窑去了。

从吃过晚饭以后，玉生就到南窑修理他做的场碾样子，连小俊出去了没有他也不知道。他这个场碾样子，是用一根木棍子两头安着两块圆木板做成的，看起来像车轮，不过两头不一般大。这东西是他下午在场上比着场碾做的，因为还没有弄得太合适天就黑了，才搬回家里来修理。他们社里要洗的场碾一共有三个，长短粗细都不一样，要是做三个样子也太麻烦。他想了个办法是照着最大的做，大的用罢了再改成小的。他做的这东西，小头是按原场碾的小头做的，大头比原场碾的大头小一点，至于究竟应该小多少他弄不准，只是做成了在场上滚着试，不对了再用木锉锉去一圈，直到对了为止。他下午做成的样子有两点不满意：第一是木板太厚，锉一次很费功夫；第二是小头的窟窿偏了一点，要改了窟窿轴子就太细，要去了外边轮廓就不够大。这两个毛病他觉着改起来比换两块板还慢，因此他又重新做了一次。他正拿着他的曲尺比量中间的窟窿，小

俊跑回来向他要钱。

小俊一进南窑门，看见满地刨渣、锯末、碎木片就觉着讨厌。她说：“不能拿到院里去弄？谁能给你一遍一遍扫地？”玉生说：“等弄完了我扫！你不用管！院里有风，点不着灯！”

小俊说：“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什么好处？”玉生说：

“用处大得很！”玉生跟小俊说着话，只是注意着手里的活儿，并没有看见小俊手里拿着东西。小俊打开纸包把棉绒衣一抖说：“你看这件衣服好不好？”玉生正按着尺寸在木板上画点儿，只瞟着有个红东西闪了一下，便顺口答应说：“好，好。”小俊用指头捏着衣服说：“你看！厚得很！”玉生仍然没有注意，还以为是说他的木板，便又答应说：“不厚了！已经换成薄的了！”小俊自然也不懂玉生的话，还以为是说范登高拿回来的衣服被别人替换了，便又说：“没有人换，才拿回来的！”玉生说：“我换的我不知道？”“你拿什么换的？”

“薄板！”“你说是什么？”这句话小俊说得很高，把玉生吵得抬起头来。小俊又问了一遍：“你是说什么？”玉生也问：

“你是说什么？”“我说这件衣服！”“那是人家谁的！”

“我买的！好不好？”玉生觉着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便又随便答了一声“好”，然后仍低下头去干自己的事。小俊说：“还没有给人家钱哩！”玉生说：“怎么不给人家？”“我没有钱！”“嗯。”玉生当她只是说明一件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所以只轻轻“嗯”了一声，算是把谈话结束了。小俊没有解决了问题，自然还得开口。小俊说：“给我钱！”玉生愣了一下，随后才明白她的意思。玉生说：“多少钱？”“四万五！”“前天还只卖四万。”“这不是供销社的！”“东西都一样！”“一样你不早给我买一件？”“五斗米！够做件棉袄了！”“棉袄

是棉袄，这个是这个！”“可惜没有钱！现在天还不冷，过几天再买吧！”玉生说罢又去做他的活。小俊说：“你说得倒容易！把人家的拿回来了，怎么再给人家送回去？”玉生说：“既然不是供销社的，一定就是范登高的，那有什么难退？没有钱有他的原物在，又没有给他穿坏了！”小俊说：“不不不！我不退！你给我钱！”“我不是告你说没有钱吗？”“没有钱你想办法！”“我不管！”“连家里穿衣吃饭的事都不管，却能管人家别人的扯淡事！”“我管过什么扯淡事？”小俊指着 he 手里做的活儿说：“这还不是扯淡事吗？”玉生见她把自己用全副精力作的事看成了扯淡事，觉着很伤心，可是马上又跟她讲不明道理，只是暗暗叹了一口气，埋怨自己认错了对象，埋怨大哥不同意自己离婚。他再不愿意多说一句什么话，低下头仍然做自己的活，心想只当没有小俊这么一个人算了。可是事实总是事实，小俊仍然站在他的对面。小俊见他不答话也不发急，便一把夺了他手里的曲尺说：“不管？非管不行！”玉生最反对人动他的家伙，特别是他这个曲尺。这个曲尺是他自己做的，比一般木匠用的曲尺细，上边还有一排很规矩的窟窿，可以用来画圆圈，因为有这好多窟窿，就很容易折断，所以就得特别当心保护。小俊把他这个宝贝夺了，他便发了急，可是又怕把东西弄坏了，只好央告说：“你要什么都行，只要先把尺子给我！”小俊说：“四万五！先拿过钱来！”玉生说：“不论多少都行，可惜我这会没有钱！”小俊说：“没有钱你就不用要尺子！”说罢了凑到炕沿边把尺子坐到屁股下。玉生说：“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偏要来找我的事？”小俊说：“跟你说个正经话你故意装样子不理，这是谁找谁的事呀？”玉生说：“你随便买了东西回来跟我要钱，难道是我找你的麻烦？”说着便跑过

去夺尺子。小俊知道自己不是玉生的对手，趁玉生还没有赶到自己跟前，便先把尺子拿出来往墙角上一摔说：“什么宝贝东西？”玉生本来没有准备和小俊打架，可是一见尺子飞出去，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劲儿，就响响打了小俊一个耳光。接着，小俊就大嚎大叫，把地上的木板、家伙都踢翻了。玉生见她把东西毁坏了，也就认真和她打起来。就在这时候，金生媳妇和玉梅跑进来才把他们拉住。

玉生说：“这日子不能过了！”说了就挺挺挺走出去。小俊也说：“这日子不能过了！”说了也挺挺挺走出去。玉生往旗杆院去了，小俊往她娘家去了。

五、拆不拆

玉生跑到旗杆院前院，看见有三座房子的窗上都有灯光：西边教室里是值班的民兵班长带岗，该不着上岗的民兵睡觉；东房里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李世杰正在准备分红用的表格；北边大厅西头的套间是村公所的办公室，村、社的主要干部会议就在那里开。玉生听见他大哥金生在西北套间里说话，便一鼓劲走进去。

这时候，套间里已经挤满了人：除了支书王金生、村长范登高、副村长兼社内小组长张永清、村生产委员兼社内小组长魏占奎、社长张乐意、女副社长秦小凤这几个本村干部之外，还有县委会刘副书记、专署农业科何科长和本区副区长张信同志三个人参加。秦小凤又是村妇联主席，魏占奎又是青年团支书。玉生正在气头上，一进门见了这些人，也不管人家正讲什么，便直截了当讲出他自己的问题来。他说：“这可碰得巧，

该解决我的问题！我和小俊再也过不下去了！过去我提出离婚，党、团、政权、妇联，大家一致说服我，叫我教育她，可是现在看来，我的教育本领太差，教育得人家抄起我的家来了！这次我是最后一次提出，大家说可以的话，请副区长给我写个证明信，我连夜到区上办手续；大家要是还叫我教育她，我就只好当个没出息人，连夜逃出三里湾！”魏占奎说：“你这话像个青年团员说的话吗？”玉生说：“我也知道不像，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魏占奎说：“你逃走的时候要不要团里给你写组织介绍信？”玉生没话说了。金生看着玉生，忽然想起洗场碾的事来，便向玉生说：“回头再说离婚的事，你先告我说场碾样子做得怎么样了？”玉生说：“就是因为她把那个给我捣毁了，我才跑来！”张乐意听说洗场碾的事停了工，也着了急，便向玉生说：“洗不出场碾来，明天场上五百二十捆谷子的穗就得转着小圈碾！一个后半天，要是碾完了扬不出来，晚上分不出去，就把后天的工也调乱了！”金生接着张乐意的话问玉生说：“你说这个要紧呀还是离婚要紧？”玉生听到张乐意的话已经觉得顾不上先去离婚了，又听金生这样问他，他便随口答应说：“自然是这个要紧，可是她不让我做我又怎么办？”还没有等得别人开口，他就又接着说：“要不我拿到这里东房来做吧？”金生说：“在那里做也行！误不了明天用就好！”玉生再没有说什么就回去取他的东西去了。玉生一出门，魏占奎便给他鼓掌，不过他的两只手并不碰在一块，只作了个鼓掌的样子，叫人看得见听不见，因为怕玉生听见了不好意思。大家都忍着笑，估计着玉生将走出旗杆院的大门，就都大笑起来。何科长说：“这个青年有趣得很——社里有了任务，就把离婚的事搁起了。”金生说：“玉生是不多发脾气

的，恐怕是事情已经闹得放不下了！”又向秦小凤说：“你明天晌午抽个空儿给他们调解一下！不要让他们真闹出事来！”又向大家说：“我们还是开我们的会吧！”

大家已经讨论完了领导秋收，接着便谈起准备扩社、开渠的问题。村长范登高说：“以下的两个问题，和行政的关系不大；我的骡子明天还要走，我可以先退席了。”金生说：“这两件事也是全村的事，怎么能说和行政关系不大呢？”登高说：“我以为扩社是你们社里的事，社外人不便发言；开渠的事虽说和全村有关，不过渠要经过的私人地基还没有说通，其他方面自然还谈不到。”副村长张永清说：“扩社在咱们村的行政范围里扩，而且是党的号召；渠是要社内外合伙开的，都不能说和行政关系不大。至于开渠用私人的地基问题，也正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谈的问题。你不要为了照顾你的私人小买卖，把责任推得那么干净……”一提小买卖，范登高就着了急——因为他发展私人小买卖在党内有人批评过他，不过他没有接受。县委一时也说不服他，准备到了冬天整党时候慢慢打通他的思想。他当时解释的理由，其中有一条是说他的私人事务并不妨害工作。这次县委又在他场，他怕县委问他，所以着急。他不等张永清再说下去就抢着说：“咱们说什么只说什么！不要把哪件事也和我搞小买卖联起来！况且我是个半脱离生产干部，私事总还得照顾一些！两个骡子在家闲住一天，除了不得生产，还得白吃一斗料，要不抓紧时间打发骡子走了，光料我也贴不起！”县委副书记老刘同志说：“登高！你对你的错误不只没有打算克服，而且越来越严重了！你是个半脱离生产干部，对你那资本主义生产抓得那么紧，为什么让人家这些完全不脱离生产的干部比你管更多的

事呢？”范登高见风头不对，赶紧说：“好好好！我参加到底！”

会议又继续下去，很快就讨论到扩社是否应该拆散互助组那个老问题上去。有范登高在场，这个问题提起来没有完。他说金生有本位主义，为了扩社把积极分子都抽到社里去，留下了落后分子，给以后行政上领导生产造成很大的困难。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怕拆散互助组，自己不得不上社，不过他的话说得很圆滑，弄得老刘同志在形式上也找不出驳他的理由；跟他讲本质他又故意装听不懂，故意绕着弯子消磨时间。

金生见这样拖下去不会有结果，便向大家说：“这样一直辩论下去，咱们的工作也没法布置。我想这样好不好？在我们动员的时候，哪个互助组报名的人多了，尽量争取他们全部加入，实在不行的话，仍把个别户留下；要是哪个组只有个别户报名，我们也不拒绝；等到报名完了以后，再研究一下具体情况，真要是留在社外的户就连互助组长也选不出来的话，党内可以按具体情况派几个党员暂且留在社外领导他们。”大家都说这样很好，范登高见金生提出的这个办法把他作为根据的那个理由给他彻底消灭了，便再说不出什么来。

谈到开渠的地基问题，何科长听见他们说只有一户没有说通，便向他们建议说：“你们尽可以作宣传、订计划，万一最后真说不通，向政府请准，也可以征购他的。”这一下也把登高的嘴给堵住了。

原则上的争吵过去以后，接着大家就计划起怎样宣传，怎样动员、组织的步骤来。

六、马家院

小俊跑到老天成院子里，见能不够不在家，就问天成老汉

说：“爹！我妈哩？”老天成老汉叹了口气说：“谁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吃了饭连碗也没有洗就出去了，直到现在不回来！”原来这能不够和她女儿一样，也是没有洗锅碗就走了。小俊听天成老汉一说，心里明白，也不再往下问，就又跑到范登高家里来。

这时候，范登高家桌上、床上的货物已经收拾到柜里去了，灵芝和马有翼围着范登高老婆不知道正谈什么闲话，小俊一进去，见房子里只有这三个人，就问：“我妈不在这里了？”范登高老婆说：“你一出去她就出去了！没有回去？”小俊说：“没有！”马有翼说：“大概到我们家去了！”灵芝说：“你怎么知道？”有翼说：“你忘记了玉梅跟满喜在学校说的是什么了？”灵芝一想便带着笑说：“你去吧！准在！”小俊自然猜不着他们说的是哪一回事，不过从口气上听起来她的妈妈一定是到她姨姨家去了，便不再问情由，离了范家又往马家去。

她走到马家的大门口，见门关着，打了两声，引起来一阵狗叫。马家的规矩与别家不同：三里湾是个老解放区，自从经过土改，根本没有小偷，有好多院子根本没有大门，就是有大门的，也不过到了睡觉时候，把搭子扣上防个狼，只有马多寿家把关锁门户看得特别重要——只要天一黑，不论有几口人还没有回来，总得先把门搭子扣上，然后回来一个开一次，等到最后的一个回来以后，负责开门的人须得把上下两道栓关好，再上上碗口粗的腰栓，打上个像道士帽样子的木楔子，顶上个连榫楔刨起来的顶门杈。又因为他们家里和外边的往来不多——除了他们互助组的几户和袁天成家的人，别人一年半载也不到他家去一次，把个大黄狗养成了个古怪的脾气，特别好咬人

——除见了互助组和袁天成家的人不咬外，可以说是见谁咬谁。

小俊打了两下门，大黄狗叫了一阵，马有喜媳妇陈菊英便出来开了门，大黄狗见是熟人，也就不叫了。小俊问：“三嫂！我妈在这里吗？”陈菊英说：“在！你来吧！”小俊进去，陈菊英又把门搭子扣上。小俊听见她妈在北屋里说话，便到北屋里去。

小俊的妈妈能不够几时到马家来的呢？原来她从范登高家出来正往她自己家里走，迎头碰上了王满喜。满喜说：“婶婶！我正要找你商量个事哩！”能不够是村里有名的巧舌头，只要你和她打交道，光有她说的，就轮不到你开口。不过王满喜这个一阵风，专会对付这种人。满喜和她一开口，她便说：“你说吧孩子！只要婶婶能办的事，婶婶没有不答应的。”满喜说：“专署来了个重要干部，找不下个清静一点的房子，想借你那西房住一住！”“好孩子！不是婶婶舍不得把房子借给人住！要是春天的话，那房子马上收拾一下就能住人，可惜如今收开秋了，里边杂七杂八堆得满满的，实在找不下个腾的地方！不信我领你看看去！”“要是做普通工作的干部，我也不来麻烦婶婶，旗杆院那么多的房子，难道还挤不下一个人？可是这个人是有特殊任务的……”“做什么工作的？”满喜想：

“要是完全照着玉梅的主意把话说死了，倘或她先知道是农业科长，她一定不信；就是现在完全不知道，将来知道了也不好转弯，不如把话说活一点。”想到这里，便故意走近了一步，低低向她说：“说是专署农业科的，又有人说实际上是专署人民法院派来调查什么案件的。婶婶！这可是秘密消息，你可千万不要跟谁说！”“孩子！你放心！永不用怕走了风！婶婶的嘴

可严哩！”满喜故意装成不在乎的样子说：“婶婶的西房要是不好腾，我先到别处找找看——我去看看你亲家家里的两个小东房是不是能腾一个，要不行话，回头再来麻烦婶婶！”说罢就故意走开，不过还留了个活口，准备让她想想之后再来找她。可是满喜才走了四五步，能不够又叫住他说：“满喜你且等等！”满喜想：“有门！”能不够赶了几步走到满喜跟前说：“马家院你去过了没有？”满喜说：“没有！那老大娘很难说话，我不想去丢那人！”“只要说对了脾气，我姐姐也不是难说话的人！要不婶婶去替你问问！”“婶婶要能帮我点忙，我情愿先请婶婶吃顿饭！”“好孩子！不知道的人都说婶婶顽固，其实婶婶不是顽固的人！婶婶可肯帮人的忙哩！”满喜也故意说：“谁敢说婶婶顽固？婶婶要是个顽固人的话，我还来找婶婶吗？婶婶要肯替我去，我就跟着婶婶到马家院门口等等！”只有天成老婆这个“能不够”，才会为了自己又卖假人情，也只有满喜这个“一阵风”，才有兴趣把这场玩笑开得活像真的。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了马家院门口，满喜远远地等着，天成老婆便叫开门进去。

这时候，马多寿和他老婆、大儿子、大儿媳都坐在院里。这四个人都有外号：马多寿叫“糊涂涂”，前边已经讲过了，他老婆叫“常有理”，他的大儿子马有余叫“铁算盘”，大儿媳叫“惹不起”。有些人把这四个外号连起来念，好像三字经——“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除了这四个人以外，还有四个人：一个是马多寿的三儿媳，叫陈菊英，在她住的西北小房里给她的女儿玲玲做鞋。一个就是这玲玲，是个四岁的女娃娃。一个是铁算盘的八岁孩子，叫十成，正和玲玲两个人在院里赶着一个萤火虫玩。铁算盘还有个两岁的孩子，

正在惹不起怀里吃奶。

能不够一进去，有外号的四个人都向她打招呼。铁算盘问：“姨姨！在院里坐呀还是到屋里坐？”能不够说：“到屋里去吧！有点事和你们商量一下！”说着也不等他们答应，便领着头往北房里走。

马家还有个规矩是谁来找糊涂涂谈什么事，孩子们可以参加，媳妇们不准参加，所以只有铁算盘跟着他爹妈走进北房，惹不起便抱起她的两岁孩子回避到她自己住的西房里去。

常有理点着了灯，大家坐定，能不够把王满喜和她说的秘密报告了一遍。她报告完了接着说：“我想咱们村里，除了前两个月姐姐出名在县人民法院告过张永清一状以外，别人再没有告过状的。告上以后，县里只叫村上调解，没有过过一次堂，一定是县里报告了专署，专署派人来调查来了！”铁算盘说：

“也许！我前几天进城，听说各机关反对什么‘官僚主义’，上级派人来查法院积存的案件。”能不够说：“满喜听我说我的西房腾不开，他就要去找老万宝全腾他的小东房……”糊涂涂说：“他姨姨！你还是答应下来吧！要是住到他们干部家里，他们是不会给咱们添好话的！你要知道我‘刀把上’那块地紧挨着就是你的地！我那块地要挡不住，开了渠，你的地也就非开渠不可了！”能不够说：“我就是没有那一块地，知道了这消息也不能不来说一声！姐姐是谁，我是谁？不过我那个西房实在腾不开！我想你们的东房里东西不多，是不是可以叫他来这里住呢？”糊涂涂说：“可以！住到咱家自然相宜，不过谁知道人家愿不愿到咱家来住？”能不够说：“找不下房子他为什么不愿来？满喜的值日。我跟他说我替他来找你商量一下，他还在外边等着哩！”糊涂涂他们三个人都说：“行”，

糊涂涂说：“你出去让他进来打扫一下，就把行李搬来好了！”常有理说：“你把他叫进来你也还返回来，咱们大家商量一下见了人家怎么说！”能不够见事情成功了，便出去叫王满喜。

能不够一出去，糊涂涂便埋怨他的常有理老婆说：“见了专署法院的人，话该怎么说，咱打咱的主意，怎么能跟她商量呢？”常有理说：“我妹妹又不是外人！”糊涂涂说：“什么好人？一张嘴比电报还快！什么事让她知道了，还不跟在旗杆院楼上广播了一样！快不要跟她商量那个！跟她谈点别的什么事好了！”糊涂涂有个怕老婆的声名，不过他这怕老婆不是真怕，只是遇上了自己不愿意答应的事，往老婆身上推一推，说他当不了老婆的家，实际上每逢对外的事，老婆仍然听的是他的主意。他既然不让说那个，老婆就只好准备谈别的。

能不够走出大门外，见了王满喜，又卖了一会人情，然后领着满喜进来，又搭上了大门到北房里来。

满喜向常有理要了钥匙和灯去打扫东房，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都不放心——怕丢了什么东西。常有理喊叫大儿媳说：“大伙家！去帮满喜打扫打扫东房！”惹不起说：“孩子还没有睡哩！”常有理又喊叫三儿媳说：“三伙家！大伙家的孩子还没有睡，你就去吧！”陈菊英就放下玲玲的鞋底子走出来。这地方的风俗，孩子们多了的时候，常好按着大小叫他们“大伙子、二伙子、三伙子……”，因此便把媳妇们叫成“大伙家、二伙家、三伙家……”。满喜按邻居的关系，称呼惹不起和陈菊英都是“嫂嫂”，又同在一个互助组里很熟惯，所以爱和她们开玩笑。常有理叫她们“大伙家、三伙家”，满喜给她们改成了“大货架、三货架”。陈菊英出来了，满喜说：“三货架！”

给咱找个笤帚来吧！”菊英找了个笤帚，满喜点着个灯，一同往东房打扫去，十成和玲玲也跟着走进去玩。

打扫房子的人分配好了，能不够又坐稳了，糊涂涂既然不让谈打官司的计划，常有理便和她谈起小俊的事。常有理问分开家以后怎么样，能不够才接上腔，就听见外边又有人敲门。接着又听见陈菊英叫十成去开门，十成不去，她自己去了。能不够只是稍停了一下便接着说：“唉！分开也不行！玉生那东西不听话，还跟人家那一大家人是一气……”

就在这时候，小俊便跑进来。小俊一边喘气一边说：“妈！不能过了！”能不够问：“怎么？他不认账？”“除不认账不算，还打起我来了！”“啊？他敢打人呀？”“就是打了嘛！不跟他过了！”“好！分开家越发长了本事了！去找干部评评理去！”“他已经先去了！”“他先去了也好！有理不在乎先告状！咱们在家里等着！”能不够的有理话说了个差不多，忽然又想起个不很有理的事来问小俊说：“你把绒衣给人家范登高送回去了吗？”小俊说：“没有！还在他家里丢着！”“傻瓜！你亲手拿人家的东西，人家是要跟你要钱的呀！快先给人家把东西送回去，回头咱再跟玉生那小东西说理！”小俊听她妈妈这么一说，也觉着自己太粗心，便说：“那末我马上就拿出来给人家送去！”说了便走出去，走到院子里又回头喊：“妈！你可快回来呀！我送了那个，就回咱家里等你！”没有等能不够答话她就开了门跑出去了。常有理自然又喊三伙家去把门关上。

能不够这会已经顾不上帮常有理打什么主意，还想请常有理在小俊的事上帮她自己打打主意，所以她要在常有理面前按照她的立场分析一下玉生家里的情况。她说：“姐姐呀！在小

俊的婚事上，我当初真是错打了主意了！玉生他们那一大家人，心都不知道是怎么长着的。金生是个大包单，专门在村里包揽些多余的事——像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呀，开水渠呀，在别人本来都可以只当个开心话儿说说算拉倒的，一加上个他，就放不下了。玉生更是个‘家懒外头勤’，每天试验这个、发明那个，又当着个民兵班长，每逢收夏、收秋、过年、过节就住在外边住宿，根本不是个管家的人。老万宝全是个老娃娃头，除不管教着孩子们过自己的日子，反勾引着孩子们弄那些没要紧的闲事。把这些人凑在一起算个什么家？我实在看不过，才叫小俊和他们闹着分家。我想玉生是个吃现成饭不管家事的年轻人，不懂得老婆是要自己养活的，分开家以后让他当一当这个掌柜他就懂得了。小俊跟他要死要活地闹了一年，好容易闹得将就把家分开了，没有想到分得了人分不了心，人家还跟宝全、金生是一股劲，对村里、社里的事比对家里的事还要紧。小俊要是说说人家，说得轻了不抵事，说得重了就提离婚。姐姐呀！你看我倒运不倒运！我怎么给闺女找了这么个倒运家？真他妈的不如干脆离了算拉倒！”糊涂涂不等常有理答话便先和能不够说：“他姨姨！你要不先说这话，我也不便先跟你说！离了好！别人都说我是老封建，在这件事上我一点也不封建！正像你说的，那一家子都不是过日子的人！咱小俊跟着他们享不了什么福！”常有理说：“对！那一家子都不是过日子的人！我那有翼常跟他家的玉梅在一处鬼混，骂也骂不改！那玉梅还不跟她爹、她哥是一路货？他们要真是自主起来，咱这家里可下不了那一路货！都怨我那有翼不听话！要是早听上咱姊妹们的主意做个亲上加亲的话来，那还不是个两合适？”能不够说：“姐姐！小俊跟玉生要真是离了的话，我还愿意，小俊自然更

愿意，不过人家有翼还有人家更合适的、有文化的对象，咱姊妹们都是些老封建，哪里当得了人家的家？”常有理说：“你说灵芝呀！那东西翅膀檣椽更硬！更不是咱这笼里养得住的鸟儿！如今兴自主，我一个人也挡不住，不过也要看他跟什么人自主——他要是真敢把玉梅和灵芝那两个东西弄到我家里来一个，我马上就连他撵出去！小俊跟玉生真要是离了的话，我看咱们从前说过的那话也不见得就办不到！如今兴自主，你不会叫小俊跟他自主一下？”糊涂涂觉着常有理的话说得太直，恐怕得罪了他那个能不够小姨子，便假意埋怨常有理说：“五六十岁的人了，说起话来老是那样没大没小的？”能不够倒很不在乎。能不够说：“你不用管！我姊妹们又说不恼！他两个人又都不在跟前，说说怕什么？”糊涂涂本来是愿意让她们谈个透彻的，只是怕能不够不好意思，见她不在乎，也就不再说什么，让她们姊妹们接着谈下去了。后来能不够露出一定要挑唆小俊和玉生离婚的话，糊涂涂觉着他自己要听的话已经完了，可是他老婆越谈越有兴头，不知道怎么又扯到她娘家哥哥的事上。糊涂涂说：“你怎么又扯起那些五百年前的谈话来了？小俊还急着要人家妈回去哩！”他一提小俊，能不够才想起自己还有要紧事来，马上把闲话收起说：“呀！我怎么糊涂了？小俊还等着我哩！我去了！”说着便走出去。糊涂涂他们三个人只送到门帘边，常有理喊：“三伙家！送你姨姨去！”

能不够一出门，糊涂涂又埋怨常有理说：“她那人扯起闲话来还有个完？好容易把她送走了，快计划咱们的正事吧！”随后三个人又坐定了，详详细细计划起要向“法院干部”说的大道理来。

七、惹不起遇一阵风

陈菊英送走了能不够，又按马家的规矩扣上大门搭子回东房里来。就在她出去送能不够这一小会，两个孩子又出了点小事：满喜在这东房南间里搬笨重东西，怕碰伤了他们，叫他们到北间去玩。北间的地上，平躺着一口没有门子的旧大柜，柜上放了个圆木头盒子。十成把盒子搬到地上，揭开盖子拿出个东西来说：“看这个黑布煎饼！”他把这个东西拿出去以后，玲玲看见下边还有许多碎东西，便弯下腰去翻检。就在这时候，菊英便返回来了。菊英一见他两个人在这盒子里拿东西，便拦住他们说：“可不要翻那个盒子呀！爷爷知道了可要打你们哩呀！”说着便把十成手里拿的红缨帽夺住。满喜听见菊英这么说，扭过头来看了一眼，才知道刚才十成说那“黑布煎饼”原来指的是这顶前清时代的红缨帽。满喜说：“你们家里怎么还有这个古董？”菊英低低地指着盒子说：“这里边的古董还多得很！我看都是没有半点用处的，不知道老人们保存这些做什么用？”满喜这个一阵风，本来就好在糊涂涂身上找点笑话材料，听她这么一说，也凑到跟前来翻着看。里边的东西确实多得很——半截眼镜腿、一段破玉镯、三根折扇骨、两颗没把纽扣、七八张不起作用的废文书、两三片祖先们订婚时候写的红庚帖、两个不知道哪一辈子留下来的过端午节戴的香草袋……尽些没用东西。两个孩子一看见两个花花绿绿的香草袋，都抢着要玩，菊英笑着说：“可不要动爷爷的宝贝！”满喜拿来说：“这本来就是叫戴的！我当家！一人一个！拿上戴去吧！”说着把这两个小东西分给了两个孩子，又指着盒子里的东西和菊英

说：“你说这些东西能做什么？烧火烧不着，沤粪沤不烂；就是收买古董的来了，也难说收这些货！我看不如——”他的意思是说：“不如倒到地上和垃圾一齐扫出去”，可是他没有往下说，却把盒子端起来做了个要泼出去的样子。菊英说：“我也觉着那样痛快，不过在這些没要紧的事情上还是不要得罪这些老人家吧！”满喜本来是说着玩的，见菊英这么说就又放下了。菊英又把盒子盖起来，同满喜继续去打扫。

两个香草袋不一样——一个瓶子样的，一个花篮样的。十成要用瓶子换玲玲的花篮，换过了。隔了一会，十成又要把花篮换成瓶子，又换过了。又隔了一会，十成又去用瓶子换玲玲的花篮，可是当他把花篮拿到手以后，索性连瓶子也不给玲玲，把两个一同拿去。玲玲和他夺了一阵，可惜一个四岁的女孩子，无论如何夺不过个八岁的男孩子，夺到最后，终于认了输，哭了。满喜看见了说：“十成！给玲玲一个！”十成说：“不！就不！”菊英也看见十成不对，不过一想到她大嫂惹不起的性情，也不敢替她教育十成，只好向玲玲说：“玲玲儿！咱不要它！妈到明天给你做个好的！”玲玲不行，越哭得厉害了。满喜走过去劝十成说：“十成！一个人一个！要不我就要收回了！”一边说，一边从十成手里夺出那个花篮来给了玲玲。这一下惹恼了十成。十成发了脾气有点像他妈，又哭、又骂、又躺在地上打滚，弄得满喜收不了场。就在这时候，惹不起在西房里接上了腔。她高声喊着说：“十成！你这小孩死的！吃了亏还不快回来，逞你的什么本事哩？一点眼色也认不得！人家那闺女有妈！还有‘爹’！你有什么？”满喜低低地向菊英说：“你听她这是什么话？让我出去问问她！”菊英摆摆手也低低地回答他说：“算了算了！闲气难生！由她骂吧！”

可是怎么能拉倒呢？十成还在地上哭着骂着不起来，惹不起接着又走出门外来说：“你这小死才怎么还不出来？不怕人家打死你？人家男的女的在一块有人家的事，你搅在中间算哪一回哩？”满喜也不管她惹得起惹不起，也顾不上听菊英的劝说，便走出东屋门外来问她说：“你把话说清楚一点！什么男的女的？”惹不起说：“我说不清楚！除非他们自己清楚一点！”满喜走过去一把揪住她说：“咱们找个地方去说！我就非要你说清楚不可！”满喜一揪她，她便趁势躺倒喊叫：“打死人了！救命呀！”这一着要是对付别人，别人就很难分辨，可是对付满喜这一阵风便没有多少用处。满喜说：“你要真死了由我偿命，没有死就得跟我走！”说着使劲儿捏住她的胳膊说：“起来！”惹不起尖尖地叫了一声“妈呀”就乖乖地随着他的手站起来，还没有等站稳，就被他拖着向大门那边走了两三步。铁算盘才听得满喜说话就赶紧往外走，可是走着走着，惹不起就已经被满喜拉住了。铁算盘知道满喜不是好惹的，赶紧绕到大门边拦住满喜说好话。满喜说：“老大哥！话还是得说清楚！三嫂是军属，大嫂这话我担不起！我们到法院去，她举出事实来，我坐牢；她举不出来，叫法院看着办；反正得弄清楚！”这时候，糊涂涂和常有理也都出来了，十成也哭着跑出来，菊英拉了玲玲也跟出来。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三个人都知道满喜在自己的利益上不算细账——在别人认为值不得贴上整工夫去闹的事，在满喜为了气不平也可以不收秋也可以不过年。因为他们三个深深知道满喜这个特点，所以都赶上来向他赔情道歉；惹不起满以为自己的本事可以斗得过满喜，现在领了一下教也知道不行，所以也不敢再开口，可是满喜还没有放手。

最觉着作难的是菊英：菊英是个青年团员，作事顾大场，

团里给她的经常任务是和家庭搞好关系，争取家里的落后分子进步。可是糊涂涂、常有理、惹不起三个人都把她看成了敌人——因为她的丈夫马有喜从学校里出来去参军的时候，到她娘家和她作过一次别，糊涂涂和常有理两个人说是她把有喜放走了，因此便和惹不起打伙欺负她。这次满喜和惹不起闹起来，把自己也牵扯在里边，说话吧，一个青年团员和一个有名的泼妇因为几句闲话闹一场，也真有点不合算；不说话吧，让一个泼妇血口喷人侮辱自己一顿，也真有点气不过；想来想去，为了怕妨碍自己的长期工作任务，也只好忍气吞声、吃亏了事。可是她见满喜拉着惹不起死不放手，自己愿吃亏也不能了事，又只得帮着公婆大伯劝满喜说：“满喜！用不着说那么清楚！我不怕！她爱怎么说怎么说！只要人家别信她的话！”铁算盘拉住满喜的手说：“老弟！算了！你还不知道她是个什么东西？”满喜所以要和惹不起闹，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自己受了冤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想叫连累菊英，现在见菊英不在乎，也就息了几分气，放开了惹不起。惹不起吃了这么一场败仗，再没有敢开口，拉着十成回去了。铁算盘又向满喜说：“兄弟！你也回去歇歇！我替你打扫房子！”满喜说：“谢谢你！还是我打扫吧！”说罢仍往东房去。铁算盘向菊英说：“我帮着满喜打扫，你也回去吧，小孩子也该着睡觉了！”菊英见他这么说，也和玲玲回去了。铁算盘为什么这么仁义呢？这也是用算盘算出来的——得罪了菊英，怕菊英提出分家；得罪了满喜，怕满喜离开他们的互助组；不论得罪哪一个，对他都是很不利的事。

这一场小风波过后，满喜和铁算盘又继续去打扫房子。

农村的闲房子实际上都带一点仓库性质。像马家的东房在

三里湾比较起来，里边储藏的东西算是简单一点的了，可是色样、件数也还不太少——钉耙、镢头、木楸、扫帚、破箱烂柜、七铜八铁，其中最笨重的还有糊涂涂准备下的两副棺材板，两个窗户还是用活砖在糊窗纸里边垒着的。这些情况，给一个做不惯或是手脚慢的人做起来，归置归置总得误个一朝半日；要给满喜他俩，就没有那样困难。王满喜这个一阵风，做起活来那股泼辣劲好像比风还快；马有余这个铁算盘，算起自己的小账来虽说尖薄些，可是在劳动上也不比满喜差多少。这两个人默默不语在这座房子里大显身手，对里边的一切，该拆的拆，该垒的垒，该搬的搬出去，该摆的摆起来，连补窗子、扫地、抹灰尘，一共不过误了点把钟工夫，弄得桌是桌、椅是椅、床位是床位，干干净净，很像个住人的地方。

房子收拾妥当以后，满喜才返回旗杆院给何科长取行李去。

八、治病竞赛

小俊听了她妈的话，从马家院跑出来，回玉生家取了绒衣往范登高家里去送。这时候，灵芝和有翼围着范登高老婆谈笑。范登高老婆见她拿着绒衣，只当是这绒衣上有什么毛病，便止住笑向她说：“怎么？不合适吗？都还在柜子里，再换一件好了！”小俊不想说玉生不给钱，只说是想换一件淡青的，因为她知道刚才见的那些里边没有淡青的。范登高老婆说：“没有淡青的！”小俊说：“没有就暂且不买吧！等以后贩回来再买！”说着就把手里拿的那件红绒衣递给范登高老婆，又扯了几句淡话走了。她一出门，有翼便猜着说：“大概是玉生不给她拿钱！”接着便和灵芝又扯了一会玉生和小俊的关系，又由这

关系扯到小俊爹妈的外号，又由那两个人的外号扯到自己家里人的外号……真是“老头吃糖，越扯越长”。

有翼和灵芝的闲谈已经有三年的历史了，不过还数这年秋天谈的时候多。从前两个人都在中学的时候，男女分班，平常也没有多少闲谈的机会，到了寒暑假回家来，碰头的机会就多一点。他们两个人谈话的地方，经常是在范登高家，因为马家院门户紧，又有个大黄狗，外人进去很不方便；又因为范登高老婆没有男孩子，爱让别家的男孩子到她家去玩，所以范家便成了这两个孩子假期闲谈的地方；范登高老婆自己也常好参加在里边，好像个主席——有时候孩子们谈得吵起来她管调解。这一年，有翼早被他爹把他从学校叫回来了，灵芝在暑假毕业以后也没有再到别处升学去，两个人都在村里当了扫盲教员，所以谈话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这一年，他们不止谈得多，而且谈话的心情也和以前有点不同，因为两个人都已经长成了大人，在婚姻问题上，彼此间都打着一点主意。这一点，范登高老婆也看出来了。范登高老婆背地问过灵芝，灵芝说她自己的主意还没有拿稳，因为她对有翼有点不满——嫌他太听糊涂涂的摆弄，不过又觉着他是个青年团员，将来可以进步，所以和他保持个“不即不离”的关系；可惜这几个月来看不出有翼有什么进步，所以有时候想起来也很苦恼。他们两个人都参加地里的劳动，并且都在互助组里，经常也谈些工作上、学习上的正经话，可是隔几天就好到范登高家里来扯一次没边没岸的谈话，或者再叫一个别的人来、再配上范登高老婆打个“百分”，和在学校的时候过礼拜日差不多。

这天晚上，当小俊进来送绒衣以前，他们三个人正比赛着

念一个拗口令。这个拗口令里边有“一个喇嘛拿了根喇叭、一个哑巴抓了个蛤蟆……”几句话，范登高老婆念不来，正在那里“格巴、格巴”，小俊便进来了。小俊放下绒衣走了以后，大家就谈起小俊的问题，再没有去管喇嘛和哑巴的事。后来由小俊问题扯到了外号问题，灵芝和有翼就互相揭发他们家里人的外号——两个人一齐开口，灵芝说“你爹叫糊涂涂，你娘叫常有理，你大哥叫……”有翼说“你爹叫翻得高，你娘叫——”说到这里，看了范登高老婆一眼，笑了，灵芝可是还一直说下去。范登高老婆说：“算了算了！谁还不知道你们的爹妈都有个外号？”范登高老婆的外号并不难听，叫“冬夏常青”，因为她自生了灵芝以后再没有生过小孩，所以一年四季身上的衣服常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逗过了外号，灵芝问她妈妈说：“妈！有些外号我就不懂为什么要那么叫。像老多寿伯伯，心眼儿那么多，为什么叫‘糊涂涂’呢？”范登高老婆说：“他这个外号起过两回：第一回是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人给他起的。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地里做活，嘴里都好唱几句戏，他不会，后来不知道跟谁学了一句戏，隔一会唱一遍。这句戏是‘糊涂涂来在你家门’。”灵芝打断她的话说：“所以就叫成‘糊涂涂’了吧？”范登高老婆说：“不！还有！有一次，他在刀把上犁地，起先是犁一垄唱两遍；后来因为那块地北头窄南头宽，越犁越短，犁着犁着就只能唱一遍；最后地垄更短了，一遍唱不完就得吆喝牲口回头；只听见他唱‘糊涂涂——回来’‘糊涂涂——回来’，从那时候起，就有人叫他‘糊涂涂’。”灵芝问：“这算一回。你不是说起过两回吗？”范登高老婆说：“这是第一回。这时候，这个外号虽说起下了，可是还没有多少人叫。第二回是在斗争

刘老五那一年。”又面向着有翼说：“你们家里，自古就和刘家有点来往，后来刘老五当了汉奸，你爹怕连累了自己，就赶紧说进步话。那时候，上级才号召组织互助组，你爹就在动员大会上和干部说要参加。干部们问他要参加什么，他一时说不出‘互助组’这个名字来，说成了‘胡锄锄’；有人和他开玩笑说‘胡锄锄除不尽草’，他又改成‘胡做做’。”又面向着灵芝说：“你爹那时候是农会主席，见他说了两遍都说得很可笑，就跟他说：‘你还不如干脆唱你的“糊涂涂”！’说得满场人都笑起来。从那时候起，连青年人们见了他也叫起糊涂涂来了。那时候你们都十来岁了，也该记得一点吧？”有翼说：“好像也听我爹自己说过，可是那时候没有懂清楚是什么意思。”灵芝说：“不过这一次不能算起，只能算是这个外号的巩固和发展。你爹的外号不简单，有形成阶段，还有巩固和发展阶段。”有翼说：“你爹的外号却很简单，就是因为翻身翻得太高了人家才叫他翻得高！”范登高老婆说：“其实也没有高了些什么，只是分的地有几亩好些的，人们就都瞎叫起来了。”有翼说：“就那就沾了光了嘛！”范登高老婆说：“也没有沾了多少光，看见有那么两个老骡子，那还是灵芝她爹后来置的！你记不得吗？那时候，咱们的互助组比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大，买了两个骡子有人使没人喂，后来大组分成小组的时候，往外推骡子，谁也不要，才折并给我们。”有翼说：“这我可记得：那时候不是没人要，是谁也找补不起价钱！登高叔为什么找补得起呢？还不是因为种了几年好地积下了底子吗？”

范登高老婆提起从前的互助组比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大，大家的话头又转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来。灵芝说：“那时候要是早想出办社的法子来，大组就可以不拆散！”范

登高老婆说：“可不行！那时候人都才组织起来，什么制度也没有，人多了尽打哈哈耽误正事，哪能像如今人家社里那样，做起什么来不慌不忙、有条有理？”有翼说：“婶婶！你既然也觉着人家的社办得好，那么你们家里今年秋后入社不？”他这一问，问得灵芝和她妈妈齐声答应，不过答应的话不一样——灵芝答应“一定入”，她妈答应“那要看你叔叔”。有翼说：“我看一定入不成！全家一共三口人，婶婶听的是叔叔的话，按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叔叔不愿意入，自然就入不成了！”灵芝说：“你怎么知道我爹不愿意入？”有翼说：“他跟我爹说过！”“几时说的？”“割麦时候！”“怎么说来？”“我爹问他秋后入社不，他反问我爹说：‘你哩？’我爹说：‘我不！’他说：‘你不我也不！等你愿意了咱们一齐入！’”“照这话看来，我爹也不是不愿意入，他是想争取你家也入哩！”“可是又没有见他对我爹说过什么争取的话！”灵芝又想了一阵说：“就是有点不对头！怨不得党支部说他有资本主义思想哩！唉！咱们两个人怎么逢上了这么两个当爹的？”范登高老婆说：“那又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换一换！”灵芝说：“换是不能换，可是能争取他们进步！”又对着有翼把手举起来喊：“我们要向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范登高老婆说：“见了你爹管保你就不喊了！”灵芝说：“不喊了可不是就不斗争了！”有翼说：“哪里有这团员斗争党员的？”灵芝说：“党员要是有了不正确的地方，一般群众都可以说话，团员自然更应该说话了！”范登高老婆说：“你爹供你念书可供得上算——要不你还不会挑他的眼！”灵芝说：“妈！这不叫挑眼！这叫治病！我爹供得我给他治病了，还不上算吗？”又向有翼说：“多寿伯伯也供你上了二年半中学，你也该给他治一治病！”

有翼说：“唉！哪天不治？就是治不好！也不知道怨病重，也不知道怨我这医生不行！”灵芝说：“不要说泄气话！咱们两个人订个公约，各人给各人的爹治病，得保证一定治好！”有翼说：“可以！咱们提出个竞赛条件！治好了以后怎么样？”说着向灵芝的脸上扫了一眼。灵芝说：“治好了就算治好了吧，还怎么样？难道还希望他再坏了？”有翼笑了笑说：“我指的不是这个！”灵芝很正经地说：“我早就知道你指的不是那个！一个团员争取自己家里人进步是自己的责任，难道还可以是有条件的吗？要提个竞赛条件也可以，那只能说‘咱看谁先治好’，不能说‘治好以后怎么样’！照你那个说法，好像是说：‘你要不怎么样，我就不给他治了。’这像话吗？”有翼见她这么一说，也觉着自己的话说得不太光明，赶紧改口说：“我是跟你说着玩的！难道我真是没有条件就不作了吗？”灵芝说：“好！就算你是说着玩的！咱们现在讲正经的吧：我爹不是跟你爹说过他们两个人可以一齐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吗？咱们要让他们把假话变成真话——我负责动员我爹，你负责动员你爹，让他们在今年秋后都入社。”有翼说：“条件不一样：你爹是共产党员，党支部可以帮助他进步；我爹在村里什么团体也不参加，谁也管不着他的事，光凭我一个人怎么争取得了他？”灵芝说：“再加上你三嫂，你们一家就两个团员，难道不能起一点作用吗？”有翼说：“不行，不行！你还不知道我爹那人？我们两个年轻人要向他说明这么大的事，他管保连理也不理，闭上他那眼睛说：‘去吧，去吧！干你们的活儿去！’”范登高老婆说：“这还估计得差不多！遇上他不高兴的时候，还许骂一顿‘小杂种’！”灵芝想了想又向有翼说：“事实也许会是这样，不过老是照着他的主意活下去，不是都

要变成小‘糊涂涂’了吗？一家两个青年团员，就算起不了带头进步的作用，也不能让落后的拖着自己倒退！我给你们建个议：不论他理不理，你们长期和他说，或者能争取到叫他不得不理的地步；要是说到最后实在不能生效，为了不被他拖住自己，也只好和他分家！”范登高老婆说：“你这个建议要不把有翼他爹气死才怪哩！人家就是怕有翼的翅膀长硬了，才半路把他从学校叫回来。人家常说：‘四个孩子飞了一对了，再不能让这一个也飞了！’你如今建议要人家分家，不是又给人家弄飞了吗？”灵芝说：“飞了自然合算！要不早一点飞出来，再跟着他爬几年，就锻炼成个只会爬的了！”范登高老婆向灵芝说：“要是你爹不听你的话，你是不是也要飞了？”灵芝说：“我怎么能跟他比？不论我爹听不听我的话，我迟早还不是个飞？”说罢把脸合在她妈妈怀里哈哈地笑起来。有翼说：“咱们一齐飞好不好？”灵芝抬起头来说：“你这进步怎么老是有条件的？我要不飞你就爬着！是不是？”有翼说：“我没有那么说！我只是说……”灵芝说：“算了算了！这一下我才真正认识你了！你的进步只是表演给我看的！”有翼说：“你不能这样小看人！将来的事实会证明你是胡说！”灵芝说：“可是过去的事实一点也没有证明我是胡说！你回来半年多了，在你的家里起过点什么好作用？”“你回来也快三个月了，在你的家里起过些什么好作用？”“我起的作用都汇报过团支部！你呢？”有翼一时答不上来。范登高老婆说：“那么大两个人了，有时候跟两只小狗一样，一会儿玩得很好，一会儿就咬起来了！谈点别的笑话好不好？为什么只谋算着对付你们那两个好爹？”灵芝听她这么一说，忽然觉着不应该对着她泄露自己对付爹的意图，就赶紧掉转话头说：“好！尊重妈妈的意

见！”又向有翼说：“奇怪！为什么谈着闲话谈着闲话就扯到这上边来了？我们今天晚上本来是当礼拜日过的，还是谈些轻松的吧！”

有翼正被灵芝问得没话说，忽然见她释放了自己，才觉着大大松了一口气，接着三个人又和开头一样，天上地下乱扯起来，直扯到范登高老婆打了呵欠，才算结束了这个小小的漫谈会。

灵芝把有翼送出大门外来，正要回去，忽然看见旗杆院的西南墙角下转过来几道用电棒打来的光，接着又听见有几只狗叫起来。有翼说：“大概是旗杆院的会也散了！”往村里来的电棒光一道一道散开了，可是还有两道没有往村里来，却往旗杆院南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场上去。灵芝说：“怎么还有人往村外走？”有翼说：“大概是护秋的民兵！”正说着，又有一条电棒的光已经打到他们脸上，不大一会，范登高便走近了。他们两个人向范登高打过招呼，灵芝指着南边的电光问：“爹！怎么还有人往村外去？”范登高说：“不！那是玉生到场上去试验一个东西！”玉生是村里有名的试验家。他要试验的东西，差不多都很新鲜。两个青年听到这个消息，都要去看，范登高只好把电棒给了灵芝说：“早点回来！”灵芝答应着，便和有翼往大场上去。

这时候，场上一共有五个人——玉生、会生、张乐意，还有两个值班的民兵。从闪闪烁烁的电棒光中，可以看到场东南两边上的新谷垛子，好像一道半圆圈的围墙；别的角落上，堆着一些已经打过的黍秸和绿豆秆；场的正中间，竖着一个石滚，原是玉生早已盘量好了的“中心”的记号。玉生用了个小孩子滚铁环时候用的卡子，推着一个像车轮形的东西在半个场上

转，第一圈转到中间碰在竖着的石碾子上，张乐意和金生一齐说“对了”；可是第二圈，这个木头车轮却切着石碾子的一边过去。张乐意说：“怎么两次不一样？”玉生说：“这东西太轻，推的时候用的力气不规矩一点就有变动！”金生说：“行了！只要大数不差，在真正碾的时候，只要把缰绳松一松或者紧一紧，都能趁过来！”

灵芝向玉生问明了原委，知道是想把小场用的石碾子洗一下给这大场用，便向他们大家说：“这个用不着试验，可以计算出来！”金生说：“是！会计李世杰也说能算出来！他说他见别人算过，可惜没有记住那个算法。你会不会这个算法呢？”灵芝说：“我想是可以找出算法来的！”说着便蹲在场边和有翼两个人用两根草棒子在地上画着商量了一阵，然后向金生说：“可以算，不过得先知道场子的大小、石碾的长短和石碾两头的大小！”玉生说：“这些数目字都有！得多么长时间能算出来？”灵芝说：“用不了多么大一会，不过得有个灯儿，打着电棒算，着急得慌！”玉生说：“这个自然！你要真有把握的话，咱们回旗杆院算去！那里纸笔算盘都有！”灵芝说：“可以！有把握！”灵芝是个很实在的姑娘，大家都相信她不是胡吹，就领着她到旗杆院前东房里来。

张乐意告灵芝说三个才试对了一个，还要算两个；玉生说他试的那一个也不十分对，三个都还得再算。玉生怕这算法万一和事实不符合了误事，所以想让灵芝把自己试过的那一个也算一下着有没有出入。灵芝先让玉生交代出她需要的那几个数目字，立起式子来向有翼说：“你算一个，我算两个！”然后就分头算起来。灵芝先把玉生试过的那一个算完，说出了计算的结果，张乐意问玉生对不对，玉生说：“除了用我的尺子还量

不出来的一点小数以外，完全对了。这点小数现在还没有法子量，可以不管它！”金生说：“可见人还是多上一上学好！”玉生说：“对呀！咱们要是早会算的话，哪里用得着费那么多的工夫做小样？”不多一会，他们把那两个也算好了，这个问题就这样轻轻巧巧得到了解决。

九、换 将

第二天，金生家北窑的窗上才有点麻麻亮，宝全老汉就起来整理家伙，又叫起玉生来，父子俩上场里去洗碜。金生媳妇趁孩子还没有醒来便爬起来叫醒了女儿青苗，要她起来跟自己去扫院。玉梅也起来去担水。只有金生晚上睡得太迟，大家没有惊动他。

玉梅担着水回来向金生媳妇说：“我二嫂她妈，又在她门口骂人哩！”金生媳妇说：“咱们惹下人家了，堵得住人家骂？”玉梅说：“不是骂咱们，是骂满喜哥！等我倒了水出来告诉你！”她把水担进厨房倒在缸里，然后挑着空桶出来向金生媳妇说：“人家看见满喜哥走过来，就故意冲着他骂。人家骂的是‘谁哄了他祖奶奶，叫他一辈子也找不上个对象！’满喜哥没有理她。”金生媳妇说：“总是满喜怎么骗了人家了吧！”玉梅说：“我告诉你怎么骗了她……”接着就把昨晚找房子时候自己怎样给满喜出主意才把何科长送到糊涂涂家的事说了一遍。金生媳妇说：“你们打伙哄了人家，自然人家骂的也有你一份——也叫你一辈子找不上个对象！”玉梅说：“你这个老大嫂，怎么也帮着能不够骂起人来了！”说着就挑着水桶做了个要向金生媳妇头上砸的样子。金生媳妇说：“不要闹不要

闹！不要把你大哥闹醒了！”金生在中窑里隔着门帘说：“我早就醒来了！”玉梅吐了吐舌头，接着和金生媳妇一齐笑起来。

玉梅挑着水桶正准备走开，金生又在里边说了话，她也只好仍站住听。金生说：“你们都学正派一点好不好？争取一个人很不容易，打击一个人马上就见效，你们团里也布置过说服老多寿的工作，可是只用这么一下就把几个月的争取说服工作都抵消了。”玉梅说：“我看打击不打击都一样。有翼和菊英两个团员都住在他家，争取来争取去有什么作用？糊涂涂天生糊涂涂！一辈子也争取不过来！”金生说：“难道到了社会主义时候，还要把他们留在社会主义以外吗？争取工作是长期的！只要不是生死敌人，就得争取！”说着就穿好衣服走出来。玉梅笑着说：“你不是说过争取中间也要有斗争吗？”金生说：

“斗争也应该正正派派斗争，哄了人家，人家下次还信咱们的话吗？再不要跟人家开这种玩笑！”玉梅听到这里，知道他的话说完了，便挑着水桶往外走，可是才走了两步，就又听得金生叫她。

金生这会可不像刚才那么严肃，只是轻轻叫了一声说：

“玉梅！你且把水桶放下，我跟你商量个别的事！”玉梅见他不再追问哄了能不能和糊涂涂的事，也就觉着轻松了一点，便把水桶放下来问他商量什么事。金生说：“咱们社里又要分粮食了。去年的社才二十来户，在分粮食时候，一个会计都搞不过来，今年发展到五十户了，会计方面要是再不加人，恐怕分配就很成问题。我想把灵芝动员到社里来当会计你说好不好？”

玉梅说：“那当然好了！不过她不是社员呀？”金生说：“我想工换工总可以。咱们换给他们互助组里一个人，我想他们也不会不答应。灵芝本人是团员，到社里又不屈她的才能，我想

更没有什么不答应的理由。”玉梅说：“可是该把谁换出去呢？”金生说：“我就是和你商量这个。我想把你换给他们组里。你同意不同意？”这一下问得玉梅马上没有回答上来。她恨自己文化程度低，但是明明低，自己也不能不认输。她想自己低也倒罢了，为什么偏要用自己作抵头，去换人家那高的呢？她想到这里，便反问金生说：“社里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偏要拿我去换呢？”金生说：“这也有些原因：社里各组都是大包工，男劳力抽调不动。要用女劳力换，总还得换给人家个强的，不能让人家说光图咱的合适，不给大家打算。咱社里强的女劳力虽说还有几个，可是除了你和小凤是一个团员一个党员，其余都是群众，不一定很好说话，今天晌午打下谷子来就要分，顾不上等着慢慢和她们商量，所以我才想到你——小凤是副社长，自然不能换出去。我想这是为了咱社的顺利，对你也没有害处。你想想是不是可以去。”玉梅说：“为了咱们社自然是好事，大哥说什么话自然都是经过考虑的，可是等我想想我自己行不行。我担回这担水来答复你好不好？”金生说：

“好！你去吧！”玉梅挑起水桶走了，宝全老婆从北窑里出来问：“你们要把我玉梅换给人家谁呀？”金生媳妇有时候爱和婆婆逗笑。她说：“换给供销社，给你换一匹洋布穿！”宝全老婆笑了笑说：“能值一匹洋布也不错！”

玉梅走出大门，第一个念头仍是恨自己耽误了学文化。她和灵芝同岁。当她们在十四岁的时候，正是刘邓大军南下的那一年（一九四七）。那时候，太行山区已经没有敌人了，县里的高级小学正式恢复，因为没有学生，县教育科派人到各村动员。在三里湾本来打算让她和灵芝两个女生都去，后来她妈妈说一个十四岁的傻姑娘，出了门自己顾不住自己，她自己也不

愿意离开妈妈到城里去，所以结果只有灵芝去了。现在灵芝是初中毕业了，她自己却连初小学的那点东西也忘了一半，还得在夜校补习。这一点，她早晚想起来都有点不服气。她觉着她的天资一点也不比灵芝差，只怨错打了主意才耽搁得不如人家。她从小也曾听说过些什么姑娘跟着什么灵山老母学艺，学成了以后，老母赐了她一个宝葫芦，要甚有甚。她觉着灵芝现在好比是得了宝葫芦了，自己本来也可以得到，可是误了。这个念头在她脑子里只要起个头，接着就要想起一大串，想拦也拦不住。她想着想着，就已经走到井台上。比她先到的还有三个人没有绞水。她把水桶挨着那第三个人的水桶一放，猛然发现自己又想到宝葫芦那条老路上了，就突然暗暗纠正自己说：

“又想这个干什么？回去就向大哥说这个吗？”接着就转了一个方向想下去。第一她想到糊涂涂他们那一组里的活也没有什么难做——青年妇女只有个陈菊英，老年妇女有的根本不下地，有的下地也做不了多少，自己倒也不怯她们。第二想到组里的青年少，不太热闹，不过有了和有翼接近的机会，满可以补起这个缺点。她和有翼的感情是从学文化上好起来的。她以为有翼的葫芦里的宝可能没有灵芝的全，不过就是这不全的，自己一时也倒不完，满可以作自己的老师。第三想到互助组是工资制，不是分红制，在报酬上可能要吃点亏。第四是她听满喜说给谁做活如果吃谁的饭，抵三斤米。糊涂涂家爱让人家在他家吃饭，可是他家的饭吃不饱……她正想着这些，前边的三个人都绞起水来担走了，后边的人催她绞水，她猛然发现自己想的又不是路，又暗自埋怨说：“呸！为什么又光给自己打算起来？回去就向大哥说这个吗？”她用索头套上了水桶，吱咕吱咕一气绞了两桶水，担起来来回走。这时她索性把自己的思想简

单化了一下：“什么也不用考虑了！能给社里换来一个好会计，还不是一大功吗？”

她担着水一进了大门，金生便问她：“考虑得怎么样？行不行？”玉梅说：“行！马上就换过去吗？”金生说：“等我和各方面都商量了再换。我先到场里和乐意老汉商量一下！”说着便要走。

金生媳妇说：“慢着！你先把这一口袋麦子捎带扛到磨上！”又向玉梅喊：“玉梅！你倒了水给我送一下筐箩、簸箕好吗？我先到社里牵牲口去！”又向婆婆说：“娘！请你给我听着孩子！要是大胜醒来了，给我送到磨上来叫他吃些奶！”

金生扛起麦子，金生媳妇领着女儿青苗跟着走出去。玉梅倒了水，拿起筐箩、簸箕、罗床、钢丝罗、笤帚等一堆家具也走出去。

金生送了麦子去找张乐意，金生媳妇牵了牲口去套磨，玉梅送了磨面家具转到场里去削谷穗^①，走到半路上，碰上她娘领着她大嫂的五岁孩子黎明往磨上送。这老人家见了玉梅便向黎明说：“跟你姑姑到场里玩去吧！不要到磨上麻烦你娘了！”

十、不能只动一个人

才收开秋，场上的东西色样还不太多，不像快收割完了时候那样红黄黑绿色色都有，最多的是才运到场上还没有打的谷垛

^①这个“谷”是指北方碾小米的谷子，应该叫“粟”，可是俗话都叫“谷”。

子，都是成捆垒起来的；其次是有一些黍秸、绿豆秆，不过因为不是主要粮食，堆儿都不大，常被谷垛子堵得看不见。可是就从这简单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出哪个场是合作社的，哪个场是互助组的，哪个场是单干户的。最明显的是社里的大场，一块就有邻近那些小场子的七八块大；谷垛子垛在一边像一堵墙；三十来个妇女拖着一捆一捆的带秆谷子各自找自己坐的地方，满满散了一场，要等削完了的时候，差不多像已经摊好了一样；社长张乐意一边从垛子上往下推捆，一边指挥她们往什么地方拖，得空儿就拿起桑杈来匀她们削下来的谷穗；小孩们在场里场外跑来跑去闹翻天；宝全老汉和玉生把两个石碾早已转到场外空地去洗。社长“这里”“那里”“远点”“近点”的喊嚷，妇女们咕咕呱呱的聒噪，小孩们在谷穗堆里翻着舂斗打闹，场外有宝全和玉生两人“叮梆叮梆”的锤钻声好像给他们大伙儿打板眼，画家老梁站在邻近小场里一个竖起来的废石碾上对着他们画着一幅削谷穗的图。互助组的场上虽说也是集体干，可是不论场子的大小、谷垛子的长短、人数的多少，比起社里的派头来都比不上。单干户更都是一两个人冷冷清清地削，一场谷子要削大半个上午，并且连个打打闹闹的孩子也没有——因为孩子们不受经济单位的限制，早被社里的小孩队伍吸收去了。

就在这个大热闹的时候，金生来找张乐意。金生把他想拿玉梅换灵芝来当会计的计划向张乐意说明以后，张乐意拍了一下手说：“昨天晚上我见她算石碾算得那么利落，也想到怎么能把她借过来才好，可没有想到换！”因为他见金生和他想到一条路上，觉着特别高兴，说话的声音高了一点，可是忽然又想到灵芝就在紧靠社场西边马多寿的场上给马家摊场，觉着可

能被她听见了；向西着了一看，灵芝正停了手里摊着的连秆小谷（早熟谷），指着这边场里向马有翼说话，他想八成是听见了，便用嘴指了指西边向金生说：“咱们说的人家听见了！”金生向西一看，正碰上灵芝和有翼转回头来看他们，两方面都笑了。

金生走到场边低声说：“听见了我就先和你谈谈，不过且不要向外嚷嚷！你觉着怎么样？愿意吗？”灵芝说：“这么好一个学习机会，我自然愿意！你能跟我爹说一说吗？”金生说：“那自然要去说！还能越过了组长？我说且不要嚷嚷，就是说等完全说通了再宣布。不过有余是副组长！有余！你看怎么样？”有余听到别人低声讲话时候，只怕人家是议论他们家里的落后，所以没有不偷听的。这次他没有从头听起，正愁摸不着头脑，又不便打听，恰巧碰到金生问他，他便装作一点也没有听见的样子说：“什么事？和我有关系吗？”当金生又给他说了一遍之后，他立刻答应说：“可以！我们组里用不上人家的才能，换过去就不屈材料了！”其实他是铁算盘，马上就算到这么一换对他有利——玉梅的劳动力要比灵芝强得多。

灵芝向有翼悄悄说：“要他们再找一个人连你也换过去好不好？”有翼也悄悄怪她说：“你不知道我生在什么家庭？”

金生见这一头很顺利，便和张乐意说：“这一头算说妥了，我再去找范登高去！”乐意老汉说：“慢着！还有魏占奎那一头哩！”接着他想了想又说：“你先去吧！一会他担谷回来我向他说明！”金生便去了。

一会，十个青年小伙子每人担着一担带秆的谷子回来了。乐意老汉问：“担完了吗？”小组长魏占奎说：“还有八担！”他们担的是昨天担剩下的一部分，所以不再另打垛，直接分送

到削谷穗的妇女们面前，拔出尖头扁担来便又走了。

乐意老汉叫住魏占奎说：“占奎你不要去了，我和你商量个事！”魏占奎凑近了他，他便把用玉梅换灵芝的计划向他说明。魏占奎说：“可以！不过你得再给我们组里拨人！”乐意老汉说：“你提得也不嫌丢人？全社的青年小伙子三分之二都集中在你们组里，一个秋天还多赶不出一个妇女工来？”魏占奎说：“我们今年的工包得吃了亏了。就像刚才担的这四亩谷子，在包工时候估是六十担，现在担了七十担，地里还有八担……”乐意老汉说：“十八担谷不过多跑上两遭，那能差多少？”“光担吗？也要割、也要整、也要捆，哪里不多误工能行？”“那也不是光你们组，大家都一样——在产量方面我们都估得低了点！”“我也不是光嫌我们组里吃了亏！我考虑的是怕不能合时合节完成秋收任务！前天是八月三十一号，我们组里结算了一段工账，全年包下来的工做得只剩下四百零两个了，按我们现有的人力，赶到九月底还能做五百一十个，可是按每块地里庄稼的实际情况估计，非六百以上的工收割不完。再者，玉梅是个强劳力，除了社里规定不让妇女挑担子以外，不论做什么都能得上个男人……”乐意老汉打断他的话说：“小利益服从大利益嘛！分配工作做好了，每次一个人少在场上等一会，你算算能省多少工？想想去年到年底还结不了账，大家多么着急？”魏占奎说：“这道理我懂，换人我也赞成，只是我们的任务完不成也是现实问题。你说怎么办我的老社长！要不把包给我们的地临时拨出去几亩也行！”乐意老汉说：“那还不一样？能拨地还不能调人？你等我想想看！”老头儿盘算了一会说：“园里可能想出办法来——黄瓜、瓠子都卖完了，秋菜也只有点芹菜和茄子了，萝卜、白菜还得长一个多月才能卖，秋凉了也不费

水了，大概可以调出一个人来。这样吧！决定给你调个人，你先把玉梅让出来吧！”“什么时候？”“玉梅马上就要，给你调的人最迟是明天给你调过去！”魏占奎见这么说，也就没有意见了。

十一、范登高的秘密

金生走到范登高家门口，听见范登高和给他赶骡子的王小聚吵架，就打了个退步。他不是听人家吵什么——事实上想听也听不见，只能听见吵得声音太大的字眼，像“算账就算账”呀，“不能两头都占了”呀等等——他只是想等他们吵完了然后再进去，免得当面碰上了，弄得两个人不继续吵下去下不了台。可是等了半天，人家一点也没有断了气，看样子谁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就那样平平稳稳吵一天也说不定。金生是有事人，自然不能一直等着，便响响地打了几下门环，叫了一声。这一叫，叫得里边把争吵停下来，范登高在里边问了一声“谁呀？”金生才走进去。

登高一见是金生，心里有点慌，生怕刚才犯争吵的事由已经被他听见，就赶快让坐说：“有什么事这么早就跑来了？”

他准备用新的话头岔开让金生不注意刚才吵架的事，可是怎么岔得开呀？小聚还站在那里没有发落哩！小聚没有等金生开口就抢着向登高说：“还是先说我的！我得回去打我的谷子！只要一天半！”登高这会的要求是只要小聚不要说出更多的话来，要什么答应什么，所以就顺水推舟地说：“去吧去吧！牲口后天再走！”

小聚去后，金生在谈问题之前，顺便问候了一句：“大清

早，你们东家伙计吵什么？”范登高知道一个党员不应该雇工，所以最怕别人说他们是“东家伙计”。他见金生这么一提，就赶紧分辩说：“我不是早向支部说过我们是合伙搞副业吗？我出牲口他出资本，怎么能算东家伙计？”金生说：“我的老同志！这就连小孩也哄不过去！谁不知道小聚是直到一九五〇年才回他村里去分了三亩机动地？他会给你拿出什么资本来？”

这王小聚原来是三里湾正西十里“后山村”的一个孤孩子，十二岁就死去了父母，独自一个人在临河镇一家骡马大店当小伙计，因为见的牲口多，认得好坏，后来就当了牲口集市上的牙行，就在临河镇娶了个老婆安了家。在一九四七年平分土地的时候，后山村的干部曾打发人到镇上问他回去种地不，他因为怕劳动，说他不回去种地。从前的当牙行的差不多都是靠投机取巧过日子。他在一九五〇年因为在一宗牲口买卖上骗了人，被政府判了半年劳动改造，期满后强迫他回乡去劳动生产。这时候，土地已经分过了，村里只留了一部分机动地，准备给无家的退伍军人安家的，通过后山村的机动地管理委员会临时拨给他三亩。本来还可以多拨给他一点，可是他说他种不了，怕荒了出不起公粮，所以只要了三亩。

三亩地两口人，就是劳力很强的人也只够维持生活，他两口子在过去根本没有种过地，自然觉得更吃力一些，但是就照这样参加到互助组里劳动几年，锻炼得有了能力，到了村里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参加了社，生活还是会好起来的，只是他不安心，虽说入了互助组，组里也管不住他，隔个三朝五日就仍往临河镇上跑一次，仍和那些不正派的牙行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当个小骗子。

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有一天，范登高赶着骡子到临河镇上缴货，走到半路恰巧和他相跟上。他说：“三里湾村长！我给你赶骡子吧？”范登高本来早就想雇个人赶骡子，可是一来自己是党员，直接雇工，党不允许，变相雇工弄穿了也有被开除党籍的可能，二来自从平分土地以后，愿意出雇的人很少，所以没有雇成。现在小聚一问他，他随便开着玩笑说“可以”，可是心里想：“雇人也不要你这样的人！”两个人相跟着走了一阵子以后，范登高慢慢又想到“现在出雇的人这样缺，真要雇的话，挑剔不应太多，一点毛病没有是很不容易的。”心眼一活动，接着就转从小聚的优点上想——当过骡马店的伙计，喂牲口一定喂得好；当过牙行，牲口生了毛病一定看得出来；常在镇上住，托他贩货一定吃不了亏。他又觉得可以考虑了。就在这一路上，范登高便和王小聚谈判好了，达成了下面四条协议：每月工资二十万，生意赚了钱提奖百分之五，不参加庄稼地里工作，对外要说成合伙搞副业，不说是雇主和雇工。

这次吵架的原因，依登高说是小聚没有认真遵守协议的精神，依小聚说是不在协议范围之内。事实是这样：骡子经常是给别人送脚，有时候给登高自己捎办一些货物，采办货物时候，事先是由登高决定，可是小聚也有机动权，见了便宜可以改变登高的计划。这次贩绒衣是登高决定的，在进货时候恰巧碰上供销社区联社也在那一家国营公司进货，小聚便凑了区联社一个现成进货价钱。在小聚还觉着小批进货凑一个大批进货的价钱一定是便宜事，回来和登高一说，登高嘴上虽说没有提出批评，心里却暗自埋怨他不机动，竟和区联社买了同样的货，再加上他又向别处缴了一次给别人运的货，迟回来了两天，区联社的绒衣就已经发到三里湾来了。供销社的卖价只是

进货价加一点运费和手续费，“进价”可以凑，“卖价”凑不得——要跟供销社卖一样价就没有钱可赚了。范登高想：“照昨天晚上的事实证明，这批绒衣不赚钱也不好出手，只好放在柜子里压着本不得周转。”他正为这事苦恼了半夜，早上刚一起来又碰上小聚要请假回家收秋，这又与他的利益冲突了：脚行里有句俗话说，“要想赚钱，误了秋收过年”，越是忙时候，送脚的牲口就越少，脚价就越大。登高想：“要在这时候把骡子留在家里，除了不能赚高价运费，两个骡子一天还得吃一斗黑豆的料。里外不合算。”他觉着小聚不应该太不为他打算。他把上边的道理向小聚讲了一遍，不准小聚请假。小聚说：“我给你干了快一年了，你也得照顾我一下！我家只种了那三亩地，我老婆捎信来说明天要打谷子，你也能不让我回去照料一下吗？”登高说：“打谷子有你们互助组替你照料！打多少是多少吧，难道他们还要赚你的吗？要说照顾的话，我不能算不照顾你——一月二十万工资，还有提奖，难道还不算很大的照顾吗？偏在能赚钱的时候误我的工，你可也太不照顾我了！”小聚说：“工资、提奖是我劳力劳心换来的，说不上是你的照顾！”“就不要说是照顾，你既然拿我的钱，总得也为我打算一下吧！难道我是光为了出钱才找你来吗？”“难道我光使你的钱没有给你赶骡子吗？”“要顾家你就在家，在外边赚着钱，不能在别人正要用人时候你抽工！一个人不能两头都占了！”“可是我也不能死卖给你！今天说什么我也得回去！不愿意用我的话，咱们算了账走开！”“算账就算账！该谁找谁当面找清！”“长支你的工资只能等我到别处慢慢赚着钱还你！用你那二三十万块钱霸占不住我！”……两个人越吵理由越多，谁也不让谁一句。在登高知道小聚长支的钱马上拿不出

来，所以说话很硬；在小聚知道登高这位雇主的身分见不得人，不敢到任何公共场面上说理去，所以一点也不让步。要不是金生到那里去，他们两个真不知道要吵出个什么结果来。

登高见金生猜透了他和小聚的真实关系，赶紧分辩说：“唉！跟你说真话你不信，我有什么法子？”金生说：“不只我不信，任是谁都不信！好吧！这些事还是留在以后支部会上谈吧！现在我先跟你谈个别的小事！”接着就提出要用玉梅换灵芝当会计的计划。登高见他暂不追究雇工的事，好像遇上了大赦；后来听到自己女儿的能力，已经被支部书记和社长这些主要干部尊重起来，自己也觉得很光荣，便很顺利地答应说：“只要她干得了，那不很好吗？”

这时候，金生的女儿青苗跑进来喊：“爹！何科长和张副区长找你哩！”金生向范登高说：“我得回去了！那事就那样决定了吧？”登高说：“可以！”金生便跟青苗回去了。

十二、船头起

金生回到家，何科长先和他谈了一下糊涂涂老婆常有理告状的事，然后提出要全面看一下三里湾的生产建设情况，让他给想一个最省工又最全面的计划。金生说：“计划路线倒很容易，只是找个向导很困难——主要干部顾不上去，一般社员说不明问题。”副区长张信说：“向导不用找，我去就行了！”金生说：“你要去的话，就连计划也不用订了。一切情况你尽了解。”张信说：“可是何科长只打算参观一天，想连地里的生产建设、内部的经营管理全面了解一下，所以就得先好好计划

一下了。”三个人商量的结果是：上午跑野外，下午看分配，夜里谈组织和经营。谈了个差不多，管饭的户就打发小孩来叫何科长和张副区长吃饭来了。

吃过早饭，张信同志便带领着何科长出发。他们过了黄沙沟，沿着河边石堰上向南走。张信同志一边走着一边向何科长介绍情况说：“这黄沙沟往北叫上滩，往南叫下滩。社里的地大部分在下滩，小部分在山上，上滩也还有几块。社里的劳动力，除了喂骡驴的、放牛的、磨粉、喂猪的几个人以外，其余共分为四个劳动组。三里湾人好给人起外号，连这些组也有外号：咱们现在就要去的这个组是第三组，任务是种园卖菜，组长是金生的父亲王宝全，因为和各组比起来技术最高，所以外号叫‘技术组’。打这里往西，那个安水车的地方叫‘老五园’。在那里割谷的那一组是第二组，组长是副村长张永清，因为他爱讲政治——虽说有时候讲得冒失一点，不过很好讲，好像总不愿意让嘴闲着——外号叫‘政治组’。靠黄沙沟口那一片柳树林南边那一组掘谷的，连那在靠近他们的另一块地里割谷的妇女们是第一组，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民兵——民兵的组织性、纪律性强一点，他们愿意在一处保留这个特点，社里批准他们的要求——外号叫‘武装组’。社里起先本来想让他们分散到各组里，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起模范作用，后来因为要在那一片几年前被黄沙沟的山洪冲坏了的地里，起沙搬石头恢复地形，都需要强劳力，才批准了他们的要求。第四组今天在黄沙沟做活，我们现在还看不见，组长叫牛旺子，因为河滩以外山上的地都归他们负责，所以外号叫‘山地组’。”

他们说这话已走近了菜园。

这菜园的小地名叫“船头起”，东边是用大石头修成的防河堰，堰外的地势比里边低五六尺，长着一排柳树，从柳树底再往东走，地势越来越低，大约还有一百来步远，才是水边拴船的地方。大堰外边，有用石头垫成的一道斜坡，可以走到园里来，便是从河东岸来了买菜的走的路。靠着大堰，有用柳枝搭的一长溜子扁豆架，白肚子的扁豆荚长得像皂荚。园里分成了若干片，一片一个样子，长着瓠子、丝瓜、茄子、辣子、白菜、红白萝卜等等杂色蔬菜，马上也判断不清还长着些什么别的东西。园子的东南角上有一座小孤房子，是卖菜的柜房，也是晚上看园人的宿舍。

这时候，水车上已经驾起骡子车水，有几个社员在种白菜那一片里拨水、灌粪，另一个社员拿着个筐子摘茄子。

副组长王兴老汉，正提着个篮子摘垄道两旁的金针花苞，因为摘得迟了一点，有好多已开了花（金针是快要开花时候就应摘的，开了花就不太好了），一边摘着一边给那个摘茄子的人讲做活应懂得先后，说茄子迟一会摘不要紧，应该先摘金针。他正讲着话，看见张信领着一个人走进园子里来，便把手里的篮子递给那个摘茄子的说：“副区长领了个参观的人来了。你且不要摘茄子，先给咱们摘金针，让我迎接人家去。”

王兴老汉迎到跟前，张信给他介绍过何科长，他握着何科长的手说：“就在石堰上休息一下吧！”他领着他们两个人走到石堰上一棵柳树荫下坐下。这里放着个向过路客人卖甜瓜用的木盘。王兴老汉说：“副区长你且陪何科长坐着，让我给你们先摘几个甜瓜吃！”何科长辞了一会，王兴老汉一定要让他们吃。张信说：“在老西北角上哩！你喊他们一个年轻人去吧！”王兴老汉说：“他们都是今年才学着种，认不得好坏！”说着自己就去了。

张信指着老汉向何科长说：“这老人家就是女副社长秦小凤的公公，今年六十五岁了，出身和王宝全老汉差不多，也给刘家种过园。”何科长指着园里那些豆棚、瓠架、白菜畦里的行列说：“怪不得活儿做得跟绣花一样哩！原来是这么两个老把式领导的！不错！称得起‘技术组’！”

一会，王兴老汉摘了些甜瓜来放在盘里说：“哪一个不熟、不脆、不甜、不香都管换！”又向柳树上喊：“老梁同志！下来吃个甜瓜再画！”何科长和张信都抬头向上看着说：“树上还有人哩！”老梁在树上说：“谢谢你！我就下去！”又向何科长和张信说：“对不起！我没有和你们打招呼！”何科长笑着说：“没有什么！倒是我们打扰了你！你们艺术家们是怕人打扰的！”

大家坐下了，老梁也下来了，四个人围着盘子，一边吃甜瓜一边谈情况。何科长问起园里收入的情况，张信说：“按原来的预算是一千五百万，现在听说超过，可不知道超过了多少。”又问王兴老汉说：“大概可能卖到两千万吧？”王兴老汉说：“在造预算时候我就说过对园里的估计不正确。现在已经卖够一千五百万了，将来连萝卜白菜卖完了，至少也还卖一千五百万！”何科长说：“这是几亩？”王兴老汉说：“一共二十亩还有二亩种的是谷子。园地不费地盘，就是误的人工多。常说‘一亩园十亩田’哩！”何科长说：“照现在这样是不是能抵住十亩田？”王兴老汉说：“按现在增了产的田算抵不住，要按从前的老产量说可以抵住。像这地，从前的产量是两石谷子，二十亩是四十石，按现在的谷价合，八万一石，四八合三百二十万。现在光种菜这十八亩就能卖三千万，粗说一亩还不是抵十亩的收入吗？”何科长说：“那二亩为什么不也种菜？”张信说：“那二亩是社的试验地，由玉生掌握，一会咱

们可以去看看！”老梁问：“你们的社扩大以后，是不是可以种它五十亩呢？”王兴说：“不行！这里离镇上远一点，只能卖到东西山上没有水地的山庄上，再多种就卖不出去了。”

算了一会收入账，何科长又问了几种种菜的技术，就有个买菜的小贩挑着筐子走上石坡来。张信向何科长说：“咱们到各处走走吧！老汉要去给人家称菜了！”说着就站起来。接着大家就都站起来。王兴老汉说：“副区长！你就陪着何科长游一游，要是还有要问我的事，等我把这个客打发走了再谈！”说罢就分头走开——张信同何科长游园，王兴老汉去卖菜，老梁仍回到柳树杈上去画画。

何科长对每一种菜都要走到近处看看。他一边看，一边称赞他们的种植技术：菜苗的间隔、距离匀整，菜架子的整齐统一，好像都是量着尺寸安排的；松软平整的地面上，不止干净得没有一苗草，仿佛连一苗茄子几片叶子都是有数目规定的。他问张信说：“他们组里几个人？”张信说：“连在河边撑船摆渡的两个人一共十二个人——摆渡也是他们的副业收入，不止渡买菜的。”何科长说：“说起地面来，一个人平均种不到二亩，种的也确实不多，可是要把地种成这个样子，就是种一亩也不容易！一家人在院子里只种几盆花，也不见得像人家这块地里的东西抚弄得整齐、茂盛。怪不得人家十八亩地就要收入三千万！人家真把工夫用到了！”

他们欣赏着各种蔬菜的种植技术，已经走到玉生经营的二亩试验地边。这二亩地没有垄道，又分成两块：靠园的一块种着颜色、高低各不相同的六种谷子，往外面一点的一块，种的是一色狼尾谷。何科长问：“园里的水走不到这里吗？怎么连垄道也不打？”张信说：“他们的谷子都种在旱地里。他们怕水

地的经验到了旱地不能用，所以故意不浇水。”接着他又把这二亩谷子试验的目的向何科长介绍说：“靠园的这块是试验谷种的。这地方的谷子种类很多，这六种都是产量最大的，可是六种自己比起来究竟哪一种更合适些，大家的说法不统一。玉生说就把这六种谷子种成六小片，每片都只种一分地，上一样粪，留一样稠的苗，犁锄的遍数、时期都弄得一样了，看看哪一块收得多。靠边的这一块是一亩四分，是试验留苗稀密的。去年省里推广密垄密植的经验，叫每亩地留一万二千苗，我们社里照那数目留下了，果然增了产。玉生说在咱们这地方留一万二千苗是不是最合适的还不知道。他说也可以试验一下，也可以分成好多小块，种同一种谷子、上一样粪、犁锄的遍数、时期也都弄一样了，只是把每一小块种成八寸垄、九寸垄、十寸垄，每分九百苗、一千苗、一千一、一千二、一千三、一千四都有，看哪块收得多。大家同意他试验二亩，所以就种了这二亩试验地。”何科长问谁给他出的主意，张信说是他自己想的。何科长说：“这个青年的脑筋真管用，好多地方暗合科学道理！以后可以派县农场的同志们帮他每年都作一点这种试验，慢慢就可以把哪一个谷种，最适宜种在什么土壤上、用什么肥料、留多少苗、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施哪一种追肥……都摸一下底。农业专家作试验也常要用这种办法，不过他们的知识和仪器都更精密一点罢了。”

他们看罢了试验地，便要往“政治组”去，临去向老王兴招手说：“王老人！你忙着吧！我们去了！”王兴老汉身边正围着三四担菜筐子等他称菜，顾不上来送他两个，只高举着秤杆子招呼他们说：“再见，再见！我顾不上送你们了！明天有工夫再来玩吧！”

十三、老五园

张信领着何科长离了船头起菜园，通过了几块棉花地，就钻进了一丈多高高秆的玉蜀黍地中间的小路上。张信介绍说：

“这也是‘政治组’种的地。”伸起手还探不着的玉蜀黍穗儿长得像一排一排的棒槌，有些过重的离开秆儿，好像横插在秆上，偶然有一两个早熟的已经倒垂下来。这些棒槌虽说和秆儿连接得很保险，可是在你不继续考虑这个关系的时候，总怕它会掉下来砸破你的头。他两个在走这一段路的时候，谁也不想多说话，只想早一点通过这个闷人的地方。

穿过了这段玉蜀黍地，便看见老五园。三里湾自古就向东西两边的山庄上卖菜，不过菜园子是汉奸刘老五家开的，就在这块地方。那时候，刘家用自己的威风，压着大家给他让一条卖菜的路，从船头起通到这里，贩菜的人和牲口每天踩着路旁的庄稼，大家也只好忍气吞声，直到刘老五犯了罪，这园被没收了分配给群众以后，才把这条路改小了。得地的人，都是些缺粮的小户，所以大家都不种菜而改种粮食，虽说后来在水井的两旁成立了两个互助组，又把轱辘换成水车，可是仍然不再种菜。在头一年（一九五一年）建社时候，井北边的一个组入了社，井南边的仍旧还是互助组。

何科长和张信快要走近这老五园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小休息。社里的“政治组”和井南边的互助组共同休息在井台附近。社里的组长就是前边提过的副村长张永清，互助组的组长是和王宝全打铁那个王申的孩子王接喜。两个组长好像正谈论着什么事，张永清拿着两柄镰刀不知道表演什么，引得大家大笑

了一阵。有个老社员看见了何科长和张信，喊着说：“张信同志！你和何科长正赶上给我们修理机器。”张永清回头一看，见是何科长和张信来了，就弯腰拾起了两个谷穗子然后迎上去。

大家把何科长和张信让到井台的一角上坐下了。何科长问：“修理什么机器？”问得大家又笑起来，比刚才笑得更响亮，更长久。原来当他们两个人还没有走近这里的时候，张永清正介绍他在省里国营农场参观过的一架“康拜因”收割机割麦子。这事情他本来已经作过报告，可是大家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所以要让他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谈。这个机器一共有多少部分，哪一部分管做什么，连他自己也没有记住，所以只好表演。他说那家伙好像个小楼房，开过去一趟就能割四五耙宽，割下来就带到一层层的小屋子里去，把麦子打下来、扬簸得干干净净，装到接麦子的大汽车上……他正用两只手指指划划叙述着，接喜问他：“机器怎么会把四五耙宽的麦子捉住呢？”他说：“是用很长的一个轮子，跟咱们风车里的风轮一样，那轮上的板把上半截麦子打在一个槽里……”说着便旋着两根镰柄在谷地做样子，可是一用力就把两个谷穗子打掉了。有人说“这部机器还得修理修理”，说得大家“轰隆”一声都笑起来。那个老社员请何科长和张信修理机器，就指的是这个机器。何科长和张信问明了原因，也随着他们笑了一阵。

张永清看着何科长便想起了糊涂涂老婆常有理。他想何科长既然住在他们家，常有理一定要告自己的状——因为自从他顶撞了常有理的几个月以来，每逢新到村里来一个干部，常有理就要告一次状，连看牲口的兽医来了，她都向人家告。他试探着问何科长说：“你住的那一家的老太太向你告过状了没有？”还没等何科长回答，大家几乎是一齐说：“那还用问？”何科长

说：“要不是她告状的话，我还不能一直睡到快吃饭才起来呢！”王接喜替张永清问：“告得一定很恶吧？”何科长说：“那老太太固然糊涂一点，可是张永清同志说话的态度恐怕也不太对头。”又向张永清说：“人家说你说过：‘在刀把地上开渠是一定得开的，不论你的思想通不通——通也得开，不通也得开！告状也没有用！我们一边开渠一边和你打官司！告到毛主席那里也挡不住！’这话如果是真的，那就难怪人家告你的状了！”何科长说到这里，别的人都看着张永清笑了。张永清说：“这几句话我说过，可是她就没有说我们是不是也向她说过好的？”何科长说：“只要说过这几句话，任你再说多少好的也没有作用了。”王接喜组里一个组员说：“何科长还不了解前边的事，依我看不能怨永清的态度不好。在永清没有说那几句话以前，大家把什么好话都给她说完——她要地给她换地、要租给她出租、要产量包她产量——可是她什么都不要，就是不让开渠，你说气人不？都要像她那样，国家的铁路、公路就都开不成了。依我说她那种像茅厕里的石头一样的又臭又硬的脑子，只有拿永清那个大炮才崩得开！”何科长说：“问题是崩了一阵除没有崩开，反把人家崩得越硬了！要是已经崩开了的话，人家还告他的状吗？为了公共事业征购私人的土地是可以的，但是在一个村子里过日子，如果不把思想打通，以后的麻烦就更多了。她是干属，是军属——是县级干部和志愿军的妈妈，难道不能和我们一道走向社会主义吗？大家要和他对立起来，将来准备把她怎么样？渠可以开，但是说服工作一定还得做！再不要用大炮崩！”张永清说：“对对对！我以后再不崩了！”一开头请何科长修理机器的那个老社员说：“以前崩的那几炮算是走了火了！”大炮能走火的事以前还没有听说过，所以又都

笑了。

一个和王接喜年纪差不多的青年组员说：“接喜！你爹那脑子，依我看也得拿永清老叔的大炮崩一崩！”另一个组员纠正他说：“连‘常有理’都不准崩了，怎么还可以去崩‘使不得’？”

何科长见他们这一组热闹得很，数了数人也没有数清，好像大小有二十来个，便问他们说：“你们这一组不觉着太大吗？”张信向他解释说：“这是两个组。一个是社里的，另一个是互助组。”互助组一个组员说：“我们明年就一同入社！”何科长说：“全组都愿意吗？”“都愿意，就是剩组长他爹不愿意了。”何科长又问到组长他爹是个什么想法，张信便把王申那股“使不得”的劲儿向他介绍了一番。以前说要拿大炮崩的那青年说：“依我看那是糊涂涂第二！”张永清说：“可不一样：糊涂涂是财迷，申老汉不财迷。到了扩社时候，我保险说得服他！”

又谈了一阵，张永清看了看水车的阴影说：“该干活了！”那个青年也看了看阴影说：“人家‘武装组’和‘技术组’都有个表，咱们连个表也没有。”张永清说：“不要平均主义吧！咱们也不浸种、也不换岗，暂且可以不要，等咱们把生产发展得更高了，一人买一个都可以！”

两个组又都干起活来了，何科长和张信看他们割了一阵谷子，就又向黄沙沟口柳树林那里走去。

十四、黄沙沟口

何科长看见黄沙沟口柳树林那里那伙捆谷的青年不在地里

了，另外有个人驾着一头牛在里边耙地，就问张信说：“怎么谷捆子还在地里就耙起地来了？”张信说：“远地都是等担完了谷子才耙，近地只要先担了一溜就可以耙——耙的耙、担的担也赶得上。”何科长说：“收秋这一段不是包工吗？”张信说：“包工。谷子地连犁耙、种麦子都包在内；晚秋地不种麦子，不过秋杀地也包在内。犁耙地的，每组都有专人——收开秋，他们不管别的事，只管耙地、犁地。”他们正说着，武装组的十个小伙子又扛着尖头扁担从场里返回地里来了。这十个人顺着地畛散开，一个个好像练把式，先穿起一捆谷子来，一手握着扁担紧挨那一捆谷子的地方，另一只手握着那个空扁担尖，跟打旗一样把它举到另一捆谷子的地方，把那一个空扁担尖往里一插，然后扛在肩膀上往前用力一顶，就挑起来了。不到五分钟工夫，他们便又连成一行挑往场里去。

何科长和张信又走了不多远，便听见在这柳树林边另一块地里割谷子的青年妇女们，用不高不低的嗓门，非正式地唱着本地的“小落子”戏，另有个十五六岁的小男青年，用嘴念着锣鼓点儿给她们帮忙。何科长他们走近了，那个小男青年一发现，便向妇女们打了个招呼，妇女们也都站起来了。小男青年布置了一下，大家齐喊：“欢、迎、何、科、长！”接着便鼓了一阵掌。何科长向大家打过招呼，大家又恢复了工作。

那十个担谷的又扛着空担子来了。他们向何科长打过招呼，又要散开，组长魏占奎说：“你们且走着，我同何科长看一下，马上就去！”一个爱向他开玩笑的青年说：“来不来由你！反正三趟一分工！”何科长说：“你们忙你们的吧！我和张信同志随便遛遛！”魏占奎说：“我应该给你介绍一下情况！”张信也和他开玩笑说：“误三担就是一分工，算你的呀算社的？”

魏占奎说：“一担也误不了！到不了晌午我就能赶出来！”说着他便和何科长他们走向柳树林边的大沙岗旁边。

魏占奎指着几十步长、一人多高的一段沙岗说：“这沙是从这五六亩地里起出来的。在去年建社的时候，这五亩地还压在沙底，每亩地只算了三斗产量，只能种大麻也长不好，现在五亩地割了四十多担谷子。”何科长说：“这样土地产量该按多少分红？”张信说：“土地分红不增加，因为起沙是社的二。所有的地增了产，土地分红都不增加，因为增产不是土地增的。”何科长点了点头，又问：“土地多的户也同意吗？”魏占奎说：“他们为什么不同意？让他们自己种他们又增不了多少产，社里增了产每一个劳动日都分得多，自然也有他们的份儿。就像这块地，要不是用社里的工起沙，他一家哪有这力量？”

沙岗中间有用石头修成的一个水口，让山洪打这水口上流进来。何科长问：“这样不怕再进沙吗？”张信说：“沙给上边的柳篱笆挡住了。”他们一同登上水口去看柳篱笆。柳篱笆是用粗柳枝作骨干，用细柳枝编织在这骨干上的。柳枝是活的，是埋在地下浇上水然后才编的，所以都是栽活了可以生长的。从大柳树林边到地边，共有四层篱笆，前边的一层，骨干都有碗口粗，外边的沙已经和篱笆平了，沙上生满了荆条、蓬蒿；后边的三层，一层比一层小，可也都是青枝绿叶的。魏占奎指着说：“这就是玉生发明的活篱笆。”何科长说：“就是这样？我从前在报上看过，上一次来了没有顾上来看。这很有意思！看这一排大的已经长成树了！”魏占奎说：“这是一九四九年栽的，当年秋天沙就积满了，以后才又在它的后边栽，一年栽一层，一层比一层高。现在这些沙上边的荆条和草已经锈成一片，沙已经不来了。”张信说：“这一边是挡住了，要是不想

根本办法，迟几年沟口的沙堆满了，还要往别的地方去。今年在正沟里也试栽了两行，沙也早积满了。要是将来全村都入了社的话，一道黄沙沟每隔十步栽一排，那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了。”魏占奎说：“那一定能解决问题！听王兴老汉说，从前一道黄沙沟都是树林和荒地，沟里的水时常可以流出来。”接着他指了指两边山脚下说：“那一片地名叫‘苇地洼’。王兴老汉说他刚刚记事那时候，苇地洼还有不多一点水，也还长着些苇，后来沟口住着的那十几户人家来了，把沟后的地一开，水就慢慢没有了。”正说着，担谷的那几个人又来了，和魏占奎开玩笑的那个青年喊着说：“魏占奎！三厘三！”魏占奎看了他们一眼，回头辞了何科长，就和他们一同去了。

在魏占奎和何科长他们说话的时候，有几个妇女只顾看他们的活动，忘记了割谷子，那个十五六岁的小男青年喊：“军干属同志们！加油呀！”这些妇女，差不多都是民兵和青年干部的家属，所以他那样喊。可是里边有一个姑娘向他提出抗议。这姑娘说：“你分清楚一点！都是军干属吗？”小男青年是个调皮一点的孩子，趁她这一问，便向她开玩笑说：“现在不是，将来还不是吗？——军干属，候补军干属！大家……”“呸！你这个小调皮鬼！你这个小女婿！你这个圆蛋蛋！”因为这小青年姓袁，叫小旦，在村里演戏时候扮演过“小女婿”这个角色，所以她那样还口逗他。

何科长和张信离开这些一边做活一边玩笑的青年们，走进重重密密的柳树林中去。何科长问张信：“玉生究竟属哪个组？怎么园里也有他的工作，这里也有他的工作？”张信说：“他不参加包工，所以没有参加劳动小组。社里就有好多不参加劳动小组的人——像粉房老师、放牛的、放羊的、管驴骡的、会

计——都不在这四个组里。这些人要是有了多余的工夫，光社里的杂活——像出圈、垫圈、割蒿积肥……——就够做了。”何科长问：“社里的技术员不是有好几个吗？”张信说：“每组一个，玉生是总的。”“平常他都管些什么事？”“他是个百家子弟，什么事也能伸手。他分内的事是那些药剂拌种，调配杀虫药，安装、修理新式农具，决定下种时期、稀密，决定间苗尺寸……一些农业技术上的事，不过实际上作的要多得多——粉房的炉灶、家具也是他设计的，牲口圈也是他设计的，黄沙沟后沟几百根柿树也是他接的……在生产技术上每出一件新事，大家就好找他出主意。他聪明，肯用思想，琢磨出来的新东西很多。”……

他们谈论着玉生，就穿过柳树林，走到黄沙沟口。

十五、站得高、看得遍

黄沙沟口的北岸上有一片杂树，从下边望上去，树干后边露出了几个屋檐角，在岸边上槐树下睡着一头大花狗，听见下边有人走过去，抬头看了一眼又睡下去。张信向岸上指着给何科长介绍说：“山地组的十几户人家就住在这里。他们都是上一辈子才来的外来户。沟里、山上的地都是他们开的，原来给刘家出租，到刘老五当了汉奸以后这地才归他们所有。”

这条路是通后山村的大路，从这沟口庄门前往西北，路基就渐渐高起来。何科长和张信说着走着，不知不觉就已经离开河沟走到半山腰里。张信指着前边说：“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后走，恐怕到中午赶不回来，不如回过头来爬到这山上看看。这山叫‘青龙背’，到了山顶，往西可以看到沟里，往东可以看

到河滩，看罢了也不用再到这边来，从金生他们那窑脑上的一条路上就回村去了。”何科长同意了。

快到山顶，听到牛铃“叮咚玲咚”响着，红牛、黑牛散成一片，毛色光滑得发亮，正夹在荆棘丛里吃草。残废了一条胳膊的“牛倌”马如龙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吸旱烟，见他们上去了便向他们打招呼。张信向何科长说：“让他给你介绍一下沟里的情况。他比我清楚得多。”他们走到马如龙跟前，马如龙让他们坐下，然后指着西边谈起沟里和山上的情况。

马如龙说：“这一带山上和沟里，一共才有一百二十亩地，还有好多是沙坡，产量都不多。这里主要的出产是核桃和柿子，不过都是私人的——入社不带已经结果的果树。社的地里也养了果树，不过都还小。对面山头上不是有一群羊吗？”张信插话说：“那羊也是社的。”马如龙接着说：“那羊群南边的洼里山地组正在那里割谷子的那几块谷地里，不是有好多长黄了的柿子吗？那是私人的。再往下那一垛豆地里不是有好多像酸枣树一样小的小树吗？那就是社里去年移栽进去的黑枣树，今年都已经接成柿树了，再有四五年才能结柿子。沟岸上那些玉蜀黍地后堰根都有小核桃树，现在还没有玉蜀黍高，我们看不见。社里的计划是多多发展果树，等到大家都入了社，慢慢把这一百二十亩地一齐栽成树。”何科长说：“对！那样子，沟里的沙就不会再流出去了。”马如龙说：“还不止为那个：种这一亩山沟地，平均每年误二十二个工；种一亩河滩地，只误十二个工，将来开了水渠，全村再都入了社，用极少数的人管理果树，剩下来的人工一齐加到上下滩的两千多亩地上，增的产量要比种这一百二十亩地的产量多得多。”

何科长问马如龙放牛的工怎么算，马如龙说：“我的工已

经超出三百六十五天以外了。放一个牛一年顶二十个工，我放了二十一个，一共四百二十个工。”张信说：“社里有好多活是这样包的——放牛、放羊、做粉、喂猪、担土垫圈……好多好多都是。”又谈了一会，何科长和张信就又往山顶的最高处去。

刚上到山顶，看见河对岸的东山；又往前走走，就看见东山根通南彻北的一条河从北边的山缝里钻出来，又钻进南边的山缝里去；河的西边，便是三里湾的滩地，一道没有水的黄沙沟把这滩地分成两段，沟北边的三分之一便是上滩，南边的三分之二便是下滩；上滩的西南角上，靠黄沙沟口的北边山根便是三里湾村，在将近晌午的太阳下看来，村里的房子，好像事先做好了一座一座摆在稀密不匀的杂树林下，摆成大大小小的院子一样。山顶离村子虽然还有一里多路，可是就连碾、磨、骡、驴、鸡、狗、大人、小孩……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张信把何科长领到一株古柏树下坐了，慢慢给他说明上下滩的全面情况。他说：“咱们坐的这地方地名叫‘青龙背’。顺着这山一直往东北快到河边低下去那地方叫‘龙脖上’。龙脖上北边那个弯到西边去的大沙滩叫‘回龙湾’。龙脖上南边叫……”何科长说：“哪来这么多的地名？叫人记也记不住！”张信说：“我说的都是大地名，每个大地名指的地方还有好多小地名——像从这青龙背往龙脖上走，中间就还要经过什么‘柿树腰’、‘羊圈门口’、‘红土坡’、‘刘家坟’、‘山神庙’……他们这一带，不论在哪个村子里，地名似乎都要比人名还多，我乍来了也记不住，久了也就都熟悉了。”何科长说：“我们家乡的地名可没有……唔！也不少，也不少！”说着便笑起来——因为他也想起了家乡农村里的一大串地名。接

着他又问：“你刚才说‘龙’这个‘龙’那个，那么哪里算龙头呢？”张信说：“河这边的龙脖上不是越往河边越低，低到和河平了吗？那里的对岸，不是也有厚薄和这边差不多的一段薄石岸又高起去了吗？那也叫‘龙脖上’。和那连着再往东北跟河这边的回龙湾相对的地方，不是有个好像和东山连不到一块的小山头吗？那地方就叫‘青龙脑’。”何科长说：“原来这条青龙是把头伸到河那边去了啊！那是三里湾以外的事了，我们还是谈三里湾吧！”张信说：“不！这些都与三里湾有关系！三里湾计划要开的水渠，就得从青龙脑对过这边把水引到回龙湾西边的山根下来。从那里到龙脖上的河床是整块的崖石，不过那里的水位比龙脖上高。只有从那里引水到三里湾的下滩才浇得着地。从回龙湾西边的山根下到龙脖上离河边四五十丈的地方不是插着一根木杆吗？就要从那地方凿个窟窿，把水引到上滩来——因为那里的石头最薄。”何科长说：“看来也还有四五十丈厚。”张信说：“已经挖着坑探过了四五十丈，只有三丈厚的石头，南边都是土。那里的南边不是有一条北边窄南边宽的狭长的地吗？地名叫‘刀把上’。昨天晚上那位老太太向你告状说大家要占她的那块地，就是这刀把上最北头种玉蜀黍的那一小块。整个的上滩，像一把菜刀，那一带地就像刀把。刀把上往南，滩地不是就弯到西边来了吗？可是水渠不能靠着西山开——因为按滩地的地势说是西北高东南低，要从山根开，渠的最深处是一丈五；要从上滩中间斜着往村边开，最深处只是一丈，并且距离也短，能省好多土方。你从刀把上往村边看，不是不多远就竖着一根木杆吗？那就是水渠要经过的地方。渠开到村里，离地面只有尺把深了，再用水桥接过去，大渠的水便可以沿着下滩的西山根走，全部下滩地都可以浇到。”何科长

问：“上滩一点也浇不到吗？”张信说：“从村边开一条小支渠向东北倒流回去，可以浇到靠河边南部的一部分。照玉生的计划，可以把下滩的水车调到刀把上南边的水渠上，七个水车一齐开动，可以把上滩的地完全浇到。”

何科长听完，看着地形琢磨了一下三里湾的开渠计划，觉着还不错——可以把三里湾的滩地完全变成水地。他又问张信说：“照这样看来，大家的地都可以浇到，那么种上滩地的人为什么还有好多不同意的？”张信说：“真正不同意的也只是马多寿和一两户个别户——最主要的还是马多寿。”何科长说：

“马多寿的地不是也可以浇到吗？”张信说：“他的心眼儿比较多一点。你看！刀把上往南快到上滩中心那地方不是安着一台水车吗？那地方的地名叫‘三十亩’，马多寿的地大部分在那一带，水车是他们的互助组贷款买的。名义上是互助组的水车，实际上浇得着的地，另外那四个户合起来也没有他一家的多，不论开渠不开渠，他已经可以种水地了。要是开渠的话，渠要从那个水车旁边经过，要把七个水车一齐架到那里，那样一来别的户就要入社，他就借用不上别的户的剩余劳动力了。叫他人社他又不肯——因为他的土地多，在互助组里用工资吸收别人的劳动力，实际上和雇工差不多。金生今天早上跟你谈话时候说过他有点剥削就是指这个。”何科长说：“你估计开了渠，别的户入了社，剩下马多寿他会怎么样？”张信说：“两个办法：一个是雇长工，再一个也许可能入社。”

这时候，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上下滩每条小路上的人都向村边流动；社的场上，宝全和玉生已经把石碾洗好回家去了，负责翻场的人已经提前吃了饭到场里来，用小木杈翻弄着场上晒着的谷穗；社里管牲口的老方，按照他的标准时间到金生

媳妇磨面的磨上去卸驴。

何科长看见磨上似乎有一点争执，便问张信说：“看那个磨边好像有点什么事故。”张信看了看说：“就是有点事故，不过已经解决了。那两个女人，坐在地上罗面的是马多寿的三儿媳陈菊英，在左边那个磨盘上和一个小姑娘扫磨底的那是金生媳妇和他的女儿青苗，在没有卸的那盘磨旁边草地上蹲着玩的是陈菊英的小女孩子玲玲，卸了磨牵着驴子走了的是社里管牲口的老方。”何科长问：“出了点什么事故？”张信说：“其实也算不了事故：老方这个人名字叫马东方，因为他的性格是只能按规矩办事，一点也不能通融，所以人送他外号叫‘老方’。社里有个规定：凡是用合作社牲口驾碾磨的，到了规定的时间一定得卸。老方就按那个时间办事——到了时间就是磨顶上只剩一把也不许再赶完。刚才可能是金生媳妇还没有赶完他就把驴子卸了——卸了也就没有事了。”何科长问：“管牲口的也有个表吗？”张信说：“没有！玉生给他发明了个简单的表——用一根针钉在老方位的那间房子窗外边的窗台上的砖上，又把砖上刻了一条线，针的阴影完全到了线上就是卸磨的时候。”“天阴下雨怎么办呢？”“天阴下雨就没有人用碾磨。”何科长想了一下，自己先笑了。

何科长说：“天也晌午了，咱们也看的差不多了，回村去吧！”两个人便从金生的窑顶上那条小山路上走下来。

十六、菊英的苦处

金生家门外坡下不远的空地里有两盘磨。早晨金生媳妇架磨的时候，陈菊英已经架了另一盘。磨麦子就数磨第二遍慢。

两家都磨上第二遍的时候，便消消停停罗着面叙起家常来。一开始，金生媳妇谈的是玉生离婚问题，菊英谈的是在马多寿家享受的待遇问题。

不过菊英谈的不是夜里打扫房子时候和惹不起吵架，而谈的是自己的实际困难问题。她说：“大嫂呀！我看小俊也是放着福不会享！你们那家里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一心一腹的——也不论公公、婆婆、弟兄们、小姑子，忙起来大家忙，吃起来大家吃，穿起来大家穿，谁也不偏这个不为那个。在那样的家里活一辈子多么顺气呀！我这辈子不知道为什么偏逢上了那么一家人！”金生媳妇说：“也不要那么想！十根指头不能一般齐！你说了我家那么多的好，一个小俊就能搅得人每天不得安生。谁家的锅碗还能没有个厮碰的时候？你们家的好人也不少嘛！有县干部、有志愿军、有中學生，你和你们老四又都是团员，还不都是好人吗？”菊英说：“远水不解近渴。这些人没有一个在家里掌权的，掌权的人还是按照祖辈相传的老古规办事。就说穿衣裳吧：咱们村自从有了互助组以后，青年妇女们凡是干得了地里活的人，谁还愿意去织那连饭钱也赶不出来的小机布呢？可是我们家里还是照他们的老古规，一年只给我五斤棉花，不管穿衣裳。”金生媳妇说：“你大嫂也是吗？”菊英说：“表面上自然也是，只是人家的男人有权，也没有见人家织过一寸布，可不缺布穿，发给人家的棉花都填了被子。”“你没有问过她吗？”“不问人家人家还成天找碴儿哩！就是要我织布我又不是不会，可是人家又不给我留下织布的工夫——我大嫂一天抱着个遮羞板孩子不放手，把碾磨上、锅灶上和家里扫扫摸摸的杂活一齐推在我身上，不用说织布，磨透了鞋后跟，要是不到娘家去，也做不上一对新的；衣裳脏成抹灰布也

顾不上洗一洗、补一补。冬夏两季住两次娘家，每一次都得拿上材料给他们做两对大厚鞋——公公一对，老四一对。做做这两对鞋，再给我自己和我玲玲做做衣裳、鞋袜，再洗补一下旧的，就得又回这里来了。就那样人家还说：‘娶了个媳妇不沾家，光在娘家躲自在’哩！”“那么你穿的布还是娘家贴吗？”

“不贴怎么办？谁叫他们养下我这么一个赔钱货呢？赔了钱人家也不领情。我婆婆对着我，常常故意和别人说：‘受屈活该！谁叫她把她的汉糊弄走了呢？’”

金生媳妇说：“咦！我也好像听说过‘有喜’是你糊弄走了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菊英说：“不错，走的时候是打我那里走的，不过那是他自己的主张。我自己在那时候的进步还不够，没有能像人家那些进步的妇女来动员他参加志愿军，可是也没有学那些落后妇女来拖后腿。他们恨我，恨的是我不够落后。”“那么有喜究竟是谁动员去的呢？”“是谁？自然还是人家自己。本来人家在一九四九年就要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后来被我那个糊涂公公拖住了。那些事说起来就没有个完：我跟有喜是一九四八年结的婚，那时候我十八、他二十一。听他说他在十五岁就在小学毕业了。他说那时候他想到太行中学去升学，他爹说：‘你二哥上了一次中学，毕业以后参加了政府工作，就跑得不见面了，你还要跟着他往外跑吗？哪里也不要去！安安稳稳给我在家里种庄稼！’可是在我们结婚以后的第二年，我都生了玲玲了，他爹忽然又要叫他去上学……”金生媳妇说：“人家都说他是怕孩子参军。”菊英说：“就是那个思想。四九年春天，不是有好多人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吗？在人家大家开会、报名时候，他爹把他和有翼两个人圈在家里不放出来，赶到夏天就把他们一齐送到县里中学去了。那时候

他已经二十二了，站在同学们中间比人家大家高一头；人家都叫他老排头，背后却都笑他是怕参军才来。到了五〇年，美国鬼子打到朝鲜来了，学校停了几天课，老师领着学生们到城外各村宣传抗美援朝，动员人们参加志愿军，有些村里人就在他背后指着他说：‘那么大的大人躲在娃娃群里不参加，怎么有脸来动员别人？’他说从那时候起，同学们都说他丢了学校的人，弄得他见了人抬不起头来。他说他早就想报名，只是有那么个爹，自己就作不得主。到去年（一九五一年）秋天，美国鬼子一面假意讲和，一面准备进攻，学生们又到城外各村宣传，这次人家大家不让他参加——大家出去宣传时候把他一个人留下。这时候，他越想越觉得他父亲做得不对，越想越觉得自己太落后了，因此就下了决心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可是人家学校说学生参军一定得得到家里的同意。你想我们那家里会同意他去吗？到了冬天，他实在不愿意待下去，就请了两天假，说是回家可没有回，跑到我娘家去找我——那时候我在娘家住。他和我诉了半天苦，问我是不是同意他参加志愿军。大嫂！你想：我要再不同意，难道是想叫家里把他窝囊死吗？我实告你说你可不要向外说：我同意了。我留了他两天，给他缝了一套衣裳，把他送走了。后来家里知道了，我婆婆去找人家学校闹气，学校说他请假回家了，又拿请假簿给她看；她问有翼，有翼也说是，她没话说了才走开。这是有翼说的。她从学校出来又找到我娘家，你想我敢跟她说实话吗？我说‘来是来了，住了一天又回学校去了’，她当时也说不出别的话来，后来就硬说是我把她的孩子鼓动跑了。他走了，他那糊涂爹今年春天也不让有翼去上学了——只差半年也不让人家毕业。这老两口的心眼儿不知道怎么好好就凑到一块儿！还有我那大嫂……”说到这

里，糊涂涂老婆牵着个小驴儿走来了，菊英吐了吐舌头把话咽住。

糊涂涂老婆常有理向磨顶上一看便问：“二遍怎么还没有完呀？”菊英说：“只剩磨顶上那么多了！”“大驴从早上磨到这时候了，该替了，可是小驴拉不动二遍。你不说早些赶一赶！”金生媳妇想替菊英解围，便向常有理说：“老婶婶！我看可以替！多了拉不动吧，那么一点总还可以！一会三遍上了就轻得多了！”常有理慢腾腾地应酬着把大驴卸下来，菊英接着把小驴换上。常有理看着小驴拉了两圈，见走得满好，就牵着大驴回去了，临走还吩咐菊英说：“撵快一点！晌午还要用驴碾场！”金生媳妇说：“你们那个到晌午可完不了。我这三遍都上去了还怕完不了哩！天快晌午了老大婶！”常有理也知道完不了，只是想让菊英作难，见金生媳妇看出道理来，也就改口说：“赶多少算多少吧！真要完不了多磨一阵子也可以！”说着便走远了。

菊英说：“你听她说的那像话吗？驴使乏了还知道替上一个，难道人是铁打的？‘多磨一阵子’！从早晨架上磨到现在，只吃了有翼给送来的那么一碗饭，半饥半饱挨到晌午也不让卸磨，这像是待人吗？”金生媳妇说：“牲口不好，为什么一次不能少磨一些麦子？”菊英说：“这都是我大嫂的鬼主意！她们俩人似乎是一天不吵架也睡不着觉，可是欺负起我来，她们就又成一势了。她们趁我在家，总是爱说米完了、面完了，差不多不隔三天就要叫我上一次碾磨，攒下的米面叫她们吃一冬天，快吃完了的时候我就又该回来了——算了算了！说起这些来一辈子也说不完。”……

一会，宝全老婆来找金生媳妇，说小俊在玉兰的南窑里取

了个大包袱走了，不知道都拿走了些什么。金生媳妇说：“娘，你不到场里告玉生说？”宝全老婆说：“我去过了，玉生不管。玉生说：‘只要她这一辈子能不找我的麻烦，哪怕她连那孔窑搬走了我也不在乎！’说是那么说，要是连玉生的衣裳都拿走了，叫我玉生穿什么？”金生媳妇说：“娘！我想她真要想和玉生离婚的话，她不拿玉生的衣裳——因为那样一来她就走不利落了。我看玉生说得对，她真要能走个干净，咱们就吃上这一次亏也值得。丢了什么没有，等玉生晌午回去一查就知道了。依我说都是些小意思！算了吧娘！”宝全老婆也没有和人闹过气，经媳妇这么一说开，谈论了一阵子也就回去了。

这时候，两家的磨上都上了第三遍，驴子转两圈就要下一磨眼，连拨磨顶带罗面，忙得喘不过气来，闲话都顾不上说了，只听得驴蹄踏着磨道响、罗圈磕得罗床响，幸而有金生的七岁女儿青苗帮着她们拨两趟磨顶，让她们少跑好多圈儿。

金生家的麸还差一两遍没有溜净，老方就来卸磨。这时候，菊英才把第三遍磨完。

十七、三个场上

吃过午饭，社的场上试用洗好了的三个新石碾，直接参加过洗碾工作的宝全老汉、王申老汉、玉生、灵芝都早早跑来看结果，别的关心过这事的人也有来看的。

三个管场的社员，牵来了三个高大肥壮的骡子，驾着这三个石碾，转得很轻快，果然像玉生预料的一样，一点也用不着强牵强扭，自自然然每圈都能探着中心又探着边沿。驶牲口的人，觉着很得意，挽着缰绳、扬着鞭子，眼睛跟着骡头转；看

热闹的人，也觉着很赏心，看那稀稀落落的骡蹄轻轻从谷穗子上走过，要比一个骡上驾两个小毛驴八条腿乱扑腾舒服得多。有人说：“驾这么大的牲口，碾这么大的场，不论打多打少，活儿做得叫人痛快！”大家看了一阵子又散开了——负责管场的社员就地参加了打场工作，不负场上责任的社员们和王申老汉那些非社员们各自又去忙他们自己的事，金生叫着灵芝和会计李世杰仍回旗杆院去做分配的准备工作的，玉生被村里的调解委员会叫到旗杆院去解决婚姻问题。

西边场上，马有余正在翻他们的连秆小谷。按习惯，摊了场应该在午饭以前来翻一下，趁着正午的太阳晒一阵子，等吃了饭再碾，上下就都成干的了，可是马有余他们的互助组上午给他家割谷子，回来得晚了点，所以在别人都已经驾着牲口碾场时候他才来翻。一会，有翼和满喜来了。有翼告他说家里的两个驴都不能碾场——大驴才在磨上卸下来还没有吃饱，小驴还在磨上驾着没有卸下来。他埋怨了一会家里人作事没有打算，可是也想不出别的主意来。满喜告他说登高的骡这天早上没有走了，建议去借一个来。登高是他们的组长，骡子既然在家，问题就解决了，有余便叫有翼去牵骡子。

有翼从登高家牵出骡子来，在路上遇见玉梅，两个人便相跟着来了。满喜接住骡子驾上骡，碾着已经翻过的大半个场；有翼和玉梅也每人拿了一柄桑杈，帮着有余翻那没有翻完的一部分。有翼因为多上了几年学，场上的活儿做得不熟练，拿起家伙来没架式，玉梅笑他，满喜说他在这上边还得当学生，有余说：“你去歇歇吧！你翻得高一块低一块，碾过来不好碾！”有翼见自己做的那活儿也有点丢人，又见他们也快翻完了，就顺着他大哥的话，放下了桑杈到西南角上一垛用泥封着的麦秸垛

旁边去歇凉。有余和玉梅翻到快要完了的时候，玉梅见使用不开两柄桑杈了，便放下桑杈拿起扫帚来围了一个圈儿，然后也到麦秸垛旁休息。整个场上只有这么一块阴凉地方被两个青年占去，有余便到场东边闲看社场里碾场。

玉梅向有翼问了个奇怪问题。她问有翼说：“字儿有没有数？”有翼说：“有！听先生说，中国字一共有八千多，平常用得着的只是四千多。”玉梅说：“那么上个中学怎么就得好几年？难道误着整工夫一年还认不完吗？”有翼说：“你不是也上过初级小学吗？难道上学就只是认字吗？”玉梅说：“不！还有什么算术呀，常识呀，什么什么呀，不过那时候三天两头打仗，什么也没有真正学会，好像记得顶数认字重要。”有翼说：“在小学时候，每天要记的生字是多一点，以后的生字就越来越少，别的功课就越加越多。”玉梅问他还加些什么东西，他便把课程表上那些历史、地理、代数、几何，又是什么动植矿物、物理、化学、政治讲话，什么什么，数了一气；又举了些例子说明这些功课的内容。玉梅对这些东西一时也听不太懂，只听得什么中国、外国、古来、现代，又是什么根、茎、叶、头、胸、腹、地层、结晶、刮风、下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什么什么……麻麻烦烦，什么也听不进去，便赶紧摆手说：“算了算了！我这一辈子只能当糊涂虫了！”她又恨自己当年不该错打了主意，不跟有翼和灵芝一道儿去上学。有翼见她很灰心，便鼓励她说：“你不要这样想！政府的计划是把扫盲运动做过之后，再把民校经常化了，也像一般学校一样，按部就班一级一级教文化——说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扫盲成绩、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玉梅好像和他开玩笑说：“那么像我也能学到中学毕业吗？”有翼说：“自然可以！不过到那时候，我和灵

芝这两个当老师的早就把我们自己一点底货卖完了。”玉梅说：

“‘你们俩’，到那时候，自然会再贩得更好的货来了！”有翼和玉梅谈话，常常注意避免提到灵芝，不过一不小心就要提到，一提到就要被玉梅打趣，这次又犯了老毛病。他知道再加什么解释反会弄得更不好意思，所以就找了点别的事拨转话头谈下去了。

一会，社场上卸了骡子，二十来个社员七手八脚忙起来。有个社员不知道玉梅和灵芝换工的事，看见玉梅在西场的麦秸垛下歇着，便喊她说：“玉梅！不要歇着了！该动作了！”从武装组调来的小青年袁小旦嚷着说：“不要喊玉梅了！玉梅已经成了人家的人了！”玉梅从麦秸垛下站起来向他还口说：“等一会我揍你这个小圆蛋蛋！”——按习惯，“已经成了人家的人”这话，是说明姑娘已经出嫁了的时候才用的。袁小旦知道玉梅爱和有翼接近，故意用了这么一句两面都可以解释的话，才招得玉梅向他还口。

社场上攒起堆来扬过第一遍，马家的谷子也碾好了，组员黄大年和袁丁未也来了。有翼去给范登高送骡子，黄大年、袁丁未、王满喜、马有余、玉梅五个人使用桑杈抖擞着碾过了的谷秆。黄大年是个大力士，外号“黄大牛”，一个人可以抵两个人。他用的家伙都是特别定做的，比别人的都大一半，现在用的桑杈自然也是——挑一下抵住别人挑两三下。袁丁未外号“小反倒”，决定个什么事情，一阵一个主意；在做活方面，包件的活做得数量多质量坏，打伙儿的活是能偷懒就偷懒，现在和大家在一块抖擞谷秆，别人挑两下他也不见得能挑一下。玉梅是做惯了的，跟在有余后边和有余做个差不多。满喜有个顽强性，跟在黄大年后边见黄大年一杈挑过去的地方比他挑得宽一

倍，他有点不服劲，挥着桑杈增加了挑动的次数——黄大牛挑一下他便能挑两下——第一次挑起去的还没有落地，第二次便又挑起，横着看起来，飞到空中的谷秆好像一排雁儿一个接一个连续着往下落。袁丁未见满喜这股劲儿把自己比衬得太不像样，便向他开玩笑说：“满喜今天午上是吃上什么东西了？”这一下把满喜说得泄了气，手里的杈法就松下来。

说到吃饭问题，满喜就有点不满意：按他们互助组的规定，不论给谁家做活，要不管饭就多给三斤米的工资。糊涂涂家是愿意管饭的，不过他管的饭大家都不愿意吃，只有满喜是个单身小伙子，顾了做活顾不上做饭，所以才吃他家的饭。这天午饭吃的是什麼，糊涂涂老婆的说法和满喜的说法就不太一致——照糊涂涂老婆常有理说是“每个人两个黄蒸，汤面管饱”，照满喜的说法是“每个人两个黄蒸，面汤管饱”，字数一样，只是把“汤面”改说成“面汤”。究竟谁说的正确呢？常有理说得太排场了一点，满喜说得太挖苦了一点，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每个人两个黄蒸、一碗汤面、面汤管饱”——黄蒸每个有四两面，汤面每碗有二两面，要是给黄大年吃，就是在吃饱饭以后也可以加那么一点；要是给王满喜吃，总还可以吃七分饱。

在抖擞过了一遍，快要搭起垛子的时候，有翼送骡子也回来了，糊涂涂马多寿老汉也来了。马多寿老汉见玉梅不论拿起什么家伙来都有个架式，便暗暗夸赞；又见有翼拿起什么家伙来也没个来头，便当面申斥。

等到马家场上攒起堆来，社里的谷子已经过了筛扬第二遍。袁丁未见社里做活的条件好，做得赶得住劲；又听说光菜园子的收入，每户平均就能分到差不多一百万元，便羡慕地说：“看人家社里做得多利落！我明年也入社哩！”满喜和他开玩笑说：

“人家没有人顾上看你！”因为丁未做活总得有人看着，要让他一个人给别人做活，很难免在地里睡觉。黄大年也跟着满喜的话向丁未说：“到给你分粮食的时候，哪一次秤头低一点，你就要入社了！”两个人的话说得都不轻，可是丁未都没有还口。丁未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受了批评不吭声，过后还是老样子。

攒起堆来头遍快扬完了，多寿老汉看见风不太好，便向有翼说：“有翼！你跟谁给咱们回去抬风车去吧！”有翼叫玉梅，玉梅说她怕狗，满喜说：“我跟你去！”有翼看了看玉梅，便又被东场的袁小旦看透他的心事。袁小旦说：“你放心去吧！跑不了她！”

一会，满喜和有翼把风车抬来了。满喜向老多寿说：“多寿叔！快回去一下吧！婶婶和大嫂又跟三嫂闹起来了！”他这么一说，说得老多寿和马有余都一愣。老多寿追问说：“怎么一回事呀？”满喜说：“快回去吧！回去再问，不要等闹出事来！”老多寿听他说得那样紧，也顾不上再问，只得糊里糊涂跑回去。

场上的人们虽然谁也忙得顾不上说话，马有翼仍旧找不着事——木锨、扫帚都拿过了，只是找不到下手的空儿。

老远的一个小场上有人喊：“有余！能不能给我匀一个人来帮一帮忙？”有余停住木锨看了看是袁天成，便向有翼说：“有翼！给姨夫帮忙去吧！”

有翼得着这么个差使，便通过社的大场边，往袁天成的小场上去。当他走过社的大场时候，社里有人喊着袁天成开玩笑说：“喂！要不要社里给你拨个帮忙的人？”天成老汉没有答话。

天成老汉是社员，不过他的自留地比入社地还多，到了忙时候，他要做他的活，社里掌握不住他的工，所以大家对他都有意见。刚才那个社员问他要不要社里拨人帮他，就是见他忙不过来，表示幸灾乐祸的意思。

在入社时候留这么多的自留地，也是他那个能不够老婆给他出的鬼主意。按他们的社章规定，自留地不得超过个人所有土地总数百分之二十，可是他有个早已参了军的弟弟，他老婆能不够便从他这个弟弟身上想出主意来了。能不够到临河镇找着了她自己娘家的当牙行的哥哥，给她捏造了个分家合同，说是袁天成弟弟临走的时候已经同着他舅舅把家分开了——袁天成舅舅死了，无法对照。能不够叫袁天成向社里说他当不了弟弟的家，不能替弟弟把土地入了社、至于自己名下的土地，仍可以按百分之二十留自留地。当时有些社员见他这么说，明知道他是打埋伏，不想要他，经过几天研究之后，还是要了。为什么经过研究又愿意要他呢？原来这袁天成也是一九三八年开辟工作时候的老干部，到减租时候分得的好地多了一点，而且他弟弟走了他便连他弟弟的一份也经管着，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两大份”；也属于王金生写的那“高、大、好、剥、拆”的“高”字类。在一九五一年社成立的时候动员他入社，他说他老婆的思想打不通；本年（一九五二年）扩社时候金生用党的原则说服他，他说不出别的话来，便听上能不够的话弄了点鬼。当大家猜透了他的谜，不愿接纳他的时候，金生说：“好地多一亩就有一亩的作用，至于他留的地多了，只顾做他的就顾不上做社的；他在社里做的工少了自然是大家做的工多了，也就是大家分得多了，他自己占不了社的便宜。跟他说过多少遍他不信，可以让他试一年。”大家计算了一下，也觉得不吃亏，所

以在他入社时候才让他留下了那么多的自留地。

能不能在当初给袁天成成立规矩的时候，坐根就没有立下给他在场里、地里帮忙的规矩。天成老汉在没有互助组以前，忙了雇短工；有了互助组，就靠互助组；现在自己入了社，村里组织得很好，没有出短工的，而能不能还愿改变老规矩，自己又留了那么多的自留地，所以就照顾不过来了。

社里打场这一天，袁天成也要打他自己的。晌午他和他十三岁的一个小男孩碾完了场，孩子把驴送回去，他便一个人挑、一个人攒堆。孩子来了，拿了个小扫帚扫着，比他妈在屋子里扫地也快不了多少。在扬场时候，一定得有个人在扬过的粮食上用扫帚将那些没有被风吹出去的碎叶子、梗子，十三岁的小孩们干不了。天成老汉拿起木楸来扬两下子，就得放下木楸拿起扫帚来将两下子，累得他在别人快往家里送粮食的时候，他还没有扬完。他向四周看了看，见马家快扬完了，便借着亲戚关系向马有余要求派个帮忙的。马有余这个铁算盘，不用算也知道有翼在自己场上的用处不大，便把有翼派去。

马有翼虽然比十三岁的孩子强一点，可惜也是深一下浅一下捋不到正经地方，仍得天成老汉停一会放下木楸来清理一次，停一会放下木楸来清理一次。将就扬了一半的时候，调解委员会便来叫有翼和满喜去作证。天成老汉见有翼这位帮忙的用处也不太大，便顺水推舟说：“你去吧！”

十八、有没有面

糊涂涂回到马家院，没有看见菊英，见他老婆坐在灶火边的小板凳上，大媳妇坐在阶台上面对面谈话。以前谈了些什么

他不知道，只从半当腰里见大媳妇惹不起说：“……翅膀棉袄越来越硬了！”他老婆常有理说：“不怕！她吃不了谁！也不只告过咱们一次了，也没有见她拔过谁一根毛！”糊涂涂听这口气，知道菊英不在家，也想到她可能又是去找干部去了，不过既然回来了，总得问讯一下，就向他老婆问：“菊英哩？”常有理说：“谁管得了人家？还不是去告咱们的状去了？”糊涂涂又问：“又为什么吵起来了？”常有理说：“家常饭吃腻了，想要你给她摆一桌大菜吃吃！”糊涂涂着了急，便催着说：“说正经的！”常有理说：“有什么正经的？如今妇女自由了，还不是想找事就找事吗？”糊涂涂更急了。他见老婆的回话牛头不对马嘴，怕拖长了时间真让菊英到优抚委员会诉什么苦去，便向老婆和大媳妇发脾气说：“忍着点吧！趁咱们的运气好哩？趁咱们在村上的人缘好哩？”他也再顾不上问什么底细，便走出门来去找菊英去。

凭过去的经验他想到菊英一定会先到优抚主任秦小凤家里去，可是走到小凤家，没有。他又想到她会到村长范登高家里去，走到范登高家，又没有。他见秦小凤和范登高也都不在家，连着想到头一天晚上小俊和玉生的事。他想大家一定是都在旗杆院处理那事，这才又往旗杆院来。

他走进旗杆院，见前院北房门上挤着好多人——有些是拿着簸箕、口袋或者别的家具往场上去的青年，绕到这里来看结果——因为婚姻问题是很容易引起青年的注意的。糊涂涂好容易挤出一条路来挤到里边去，见里边的人比外边的人还密。他先不向桌边挤，跷起脚来把一个一个脸面都看遍，哪个也不是菊英。他正扭转身往外走，桌边坐着的秦小凤却看见了他。

小凤喊他说：“多寿叔！你且等一下！不要着急！我们给玉生写完了证明信，马上就调解你们的事！”糊涂涂见她这么说，知道菊英已经来过了，便向一个看热闹的人问菊英到哪里去了。那个人告他说去吃饭去了。他说：“没有回去呀？”那个人说：“难道不许到别人家里吃饭吗？”这些看热闹的人，见调解委员会把玉生的离婚问题调解得有了结果（没有平息下来，已经决定要向区公所写信证明调解无效，让他们去办离婚手续，也就算看出结果来了），其中有好多人本来正准备走散，恰好碰上菊英去找小凤诉苦，就又有些人留下来。小凤只听菊英提了个头儿，听她说还没有吃饭，就叫她先领着玲玲到后院奶奶家里借米做饭吃，才把菊英打发走了。这些情况，在场的人谁也听得明白——都知道菊英到后院奶奶家里去了，可是大家都恨常有理和惹不起欺负人；所以都不愿把情况告糊涂涂说。糊涂涂见人家不告他说，知道再问也无效，到别处瞎找也不见得能找到，也只好暂且挤在人中间等着。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年轻人，而且又差不多是在打场工作中抽空子来的，流动性很大，一直挤进来挤出去，糊涂涂这个老头站在中间很不相称，又吃不住挤，弄得东倒西歪不由自主。还是秦小凤看见有点不好意思，便向大家说：“大家让一让！多寿叔请到这里来坐下歇歇！”大家给让开一条路，糊涂涂走过去，玉生站起来腾出一把椅子让他坐下。

一会，证明信写完，打发玉生和小俊走了，看热闹的人差不多也走了三分之一，会议室里便松动了好多，主任委员范登高便向糊涂涂说：“是怎么一回事？你谈谈吧！”糊涂涂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呀！”有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人向他开玩笑说：“一点也不知道，你来做什么呀？你真是糊涂涂！”看

热闹的人哄笑了一阵子，糊涂涂把他才从场里回来的情况交代了一下之后，秦小凤说：“还是把老婶婶和大嫂子请来吧！”便打发值日的去请常有理与惹不起。

又停了一阵子，菊英也来了，常有理和惹不起也来了。范登高说：“好！大家都来齐了！各人都先把事实谈一谈，然后我们大家再来研究。菊英！你先谈吧！”菊英说：“我不是已经谈过了吗？”登高说：“你再谈一下，让她们两位也听一听，看事实有没有出人！”菊英说：“很简单：我从早起架上磨，早饭只喝了一碗稠粥，吃中午饭也不让卸磨，直到他们碾完了场才卸下磨来。这时候家里早吃过饭了，只给我和玲玲留下些面汤……”惹不起说：“说瞎话叫你烂舌根！我给你留的没有面！”常有理接上去说：“大家吃什么你也只能吃什么！磨个面又不是做了皇帝了！我不能七碟子八碗给你摆着吃！”范登高拦住她们说：“慢着慢着！还是一个人说了一个人说！菊英你还说吧！”菊英说：“我说完了！她说有面我没有见！”小凤说：“究竟有没有面，我提议连锅端得来大家看看！”菊英说：“端什么？她早给驴倒到槽里去了！有没有面有翼和满喜都看见来！不能只凭她的嘴说！”惹不起说：“放着面你不吃，我不能伺候到你天黑！”登高说：“你就接着说吧！她已经说完了！”惹不起说：“我也说完了！”登高又让常有理说，常有理倒说得端端有理。她说：“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媳妇自然也都是我的儿媳，哪一根指头也是自己的骨肉，我也犯不上偏谁为谁！可是咱们这庄户人家，不到过年过节，每天也不过吃一些家常便饭，我吃了这么大也没有敢嫌坏。大家既然都吃一样饭，自然也没有给媳妇另做一锅的道理——我和孩子他爹这么大了，也没有另做过小锅饭。今天的晌午饭是黄蒸和汤面，

男人们在地里做重活，每人有两个黄蒸，汤面管饱；女人们在家里做轻活，软软和和吃顿汤面也很舒服，我和大伙家吃了没有意见，不知道我们的三伙家想吃什么！人和人的心事不投了，想找碴儿什么时候都找得出来！像这样扭扭别别过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呀？我也不会说什么，请你们大家评一评吧！”登高问菊英还有什么意见，菊英说：“照我娘说的，好像是我愿意吃汤面，可是我实在没有见哪里有汤面呀！吃糠也行——我也不是没有吃过，不过要我吃糠也得给我预备下糠呀！”在座的张永清，因为得罪过常有理，半天不愿意开口，到这时候看见双方谈的情况对不了头，便出主意说：“我看就这样谈，谈不明白事实。菊英刚才不是说满喜和有翼看见过她们争论吗？我建议请他们两位来证明一下。”委员们，连看的人都说对，并且有人自动愿意去叫。惹不起听说要找证人，有点慌。她说：“他们回来抬了个风车就走了，哪里知道什么底细？自己要是不凭良心说话，找谁也是白费！可知道别人的话是不是凭良心说出来的？”小凤说：“大嫂子！这样说就不对了！难道人家别人都跟你有仇吗？”登高说：“就找他们两个来吧！能证明多少证明多少！证不明也坏不了什么事！”这样决定下来，便有人去找有翼和满喜去了。

这两个人一来，登高便把案情简单向他们说了一下，然后先让满喜来作证。满喜对头天晚上和惹不起吵架的事仍然有点不平，便趁这机会把那件事埋伏在他的话里边。他说：“看见我倒是看见的，可是这证人我不能当！有嫌疑！”登高说：“有甚说甚，那有什么嫌疑？”满喜说：“我说的不是今天的吃饭问题，是人家军属的名誉问题！咱可担不起那个事！”他卖了这么个关节，大家自然要追问，他便趁势把头天晚上惹不起

说玲玲“有娘”“有爹”那些话一字不漏说了一遍。还没有等满喜说完，看热闹的人中间有好多军属妇女就都叫起来。有人向委员们说：“……且不要说今天的事了，先把昨天晚上的事弄清楚！先看她拿的是什么证据！要是拿不出证据来，血口喷人不能算拉倒！”登高说：“已经过去就不要提了，还是说今天的吧！”军属们仍然坚持不能放过去，说菊英担不起这个名声。菊英不愿转移吃饭问题的目标，便向大家说：“由她说去吧！只要别人信她的！”小凤说：“我是军属，也是优抚主任。我代表军属和优抚委员说句话。我也觉着说这话是要负责任的，不过菊英不追究了也就算了，再要那么说我们就要到法院去控告她。”登高说：“过去的事，已经说开了就算了。满喜！你还是谈谈今天的情况吧！”满喜说：“我还是不谈！谈了她会说我是报复她！有翼是他们家里人，可以先让他谈谈！”登高说：“也好！有翼你就先谈谈！”有翼还没有开口，常有理向有翼说：“看见就说你看见来，没看见就说你没看见！不要有的也说，没的也道！”有翼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范登高说：“我没有看见！”满喜说：“咱们走过去，不是正碰上她端起锅来往外走吗？你真没有看见吗？”有翼支支吾吾地说：“我没有注意！”满喜说：“好！就算你没有看见！你晌午吃了几碗汤面？”有翼说：“两碗！”满喜说：“第二碗碗里有面没有？”有翼又向他妈看了一眼，支支吾吾地说：“面不多了！”满喜说：“不要说囫囵话！有没有一两面？”有翼又看了他妈一眼，满喜追着说：“我的先生！拿出你那青年团员的精神来说句公道话吧！有没有一两面？”有翼再不好意思支吾，只好照实说了个“没有！”大家又哄笑了一阵，满喜说：“这不是了吗？也不能说一点面也没有，横顺一样长那面条节节，每一碗总还有

那么十来片，不用说一两，要够二钱也算我是瞎说！”大家又笑起来，常有理气得把头歪在一边，指着有翼骂：“你这小烧锅子给我过过秤？”登高说：“事实就是这样子了。现在可以休息一会，让我们委员们商量一下看怎样调解好。你们双方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也都在这时候考虑考虑，一会再提出来。”说了便和各委员们离开了座，往西边套间里去。满喜截住登高问：“没有我们证人的事了吧？”登高说：“没有了！你们忙你们的去吧！”说着便都走进套间——村长办公室里去。

常有理觉着没有自己的便宜，拉了一下惹不起的衣裳角，和惹不起一同走出旗杆院回家去了。

糊涂涂坐着没有动，拿出烟袋来抽旱烟。

一伙军属拉住菊英给她出主意，差不多一致主张菊英和他们分家。

天气已经到了睡起午觉来往地里去的时候，看热闹的人大部分都走散了，只是军属们都没有散，误着生产也 想看 一看 结果。

套间里的小会开得也很热闹：范登高主张糊涂事糊涂了，劝一劝大家好好过日子，只求没事就好。秦小凤不同意他的意见。小凤说：“在他们家里，进步的势力小，落后的势力大，要是仍然给他们当奴隶、靠他们吃饭，事情还是不会比现在少的。让一个能独立生活的青年妇女去受落后势力的折磨，是不应该的。”范登高说：“正因为他们家里有落后的，才要让进步的在里边做些工作。”范登高这话要打点折扣。实际上他也知道菊英在他们家里起不了争取他们进步的作用，可是他知道菊英要分出来一定入社，说不定也会影响得糊涂涂入社，所以

才找些理由来让他们维持现状。小凤说：“想叫菊英在他们家里做些工作也是分开了才好做。分开了在自己的生活上先不受他们的干涉，跟他们的关系是‘你听我的也好，不听我的我也用不着听你的’；要是仍在一处过日子，除非每件事都听他们的，哪一次不听哪一次就要生气。”别的委员们也都说小凤说得对。登高见这个理由站不住，就又说出一个理由来。他说：“咱们调解委员会，不能给人家调解得没有事，反叫人家分了家，群众会不会说闲话呢？”小凤说：“你就没有看见刚才休息时候已经有人悄悄跟菊英说‘分开’‘分开’吗？大多数的人都看到菊英在他们家里过不下去，要不分开，群众才会不同意哩！”登高最后把他和金生笔记簿上记的那拆不拆的老理由拿出来，说：“要是咱们调解委员会给人家把家挑散了的话，咱们这些干部们，谁也再不要打算争取他们进步了！”张永清反驳他说：“想要争取他们进步，应该先叫他们知道不说理的人占不了便宜。让落后思想占便宜，是越让步越糟糕的。”范登高说：“难道除分家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小凤说：“有！叫她们婆媳俩向菊英赔情、认错、亲口提出以后的保证，把菊英请回去，那是最理想的。你想这都办得到吗？”有个委员说“一千年也办不到”，别的委员都说对，小凤接着说：“不行！哪个人的转变也不是一个晌午就能转变了的！可是要不分开家，菊英马上就还得回去和她们过日子！咱们先替菊英想想眼前的事：要不分家，今天晚上回去，晚饭怎么样吃？婆婆摔锅打碗、嫂嫂比鸡骂狗，自己还是该低声下气哩，还是该再和她们闹起来呢？”登高说：“那也只能睁一只眼合一只眼！才闹了气自然有几天别扭，忍着点过几天也就没有事了！”小凤说：“难道还要让受了虐待的人再向虐待她的人低头吗？”登高说：“就是要分家，今天也分不完，

晚饭还不是要在一块吃吗？”小凤说：“不！要分家，就不要让菊英回去了——让菊英暂且住在外边，让他们家里先拿出一些米面来叫菊英吃，直到把家分清了然后再回到自己分的房子里住去！我赞成永清叔的话——不能让不说理的人再占了便宜。”大家同意小凤的意见，登高也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小会就开到这里为止，大家便从套间里走出来。

会议又恢复了，只是缺两个当事人——常有理和惹不起都回家去了，打发人去请了一次也请不来，糊涂涂便作了她们两个的代表。

范登高问菊英的要求，菊英提出和他们分开过。别的军属又替她提出追究造谣和虐待的罪行。范登高作好作歹提出“只要分开家过，不必追究罪行”的主张。糊涂涂没有想到要分家，猛一听这么说，一时得不着主意，便问范登高说：“难道再没有别的办法吗？”没有等登高答话，有一个军属从旁插话说：“有！叫她们婆媳俩先到这里来坦白坦白，提出保证，亲自把菊英请回去！”糊涂涂一想：“算了算了！这要比分家还难办得多！”永清劝他说：“弟兄几个，落地就是几家，迟早还不是个分？扭在一块儿生气，哪如分开清静一点？少一股头，你老哥不省一分心吗？”别的委员们也接二连三劝了他一阵子，年纪大一点的，又直爽地指出他老婆不是东西，很难保证以后不闹更大的事。说到再闹事他也有点怕，他的怕老婆虽是假怕，可是碰到管媳妇的事，老婆可真不听他的。他想到万一闹出人命来自己也有点吃不消。这么一想，他心里有点活动，只是一分家要分走自己一部分土地，他便有点不舒服。他反复考虑了几遍，便向调解委员们说：“要分也只能把媳妇分出去，

孩子不在家，不能也把孩子分出去。”小凤说：“老叔！这话怎么说得通呢？你把孩子和媳妇分成两家子，怎么样写信告你的孩子说呢？要是那样的话，还叫有喜怀疑是菊英往外扭哩！事实上是她们俩欺负了菊英呀！”别的委员们又说服了一阵，说得糊涂涂无话可说。

这点小事，一直蘑菇到天黑，总算蘑菇出个结果来：自第二天——九月三号——起，三天把家分清；已经收割了的地分粮食，还没有收割的地各收各的；先拿出一部分米面来，让菊英住到后院奶奶家里起火，等分清家以后再搬回自己房子里去住。

十九、出 题 目

常有理和惹不起碰了钉子回去之后，两个人的嘴都噘得能拴住驴。惹不起向常有理说：“生是有翼把咱们证死了！”恰巧在这时候，有翼回家去取口袋，常有理一肚子怨气没处出，便叫过有翼来大骂一顿。她骂过半点钟之后，劲儿似乎才上来，看样子在两三个钟头以内是不准备休息的。有翼打断了她的骂跟她说：“场上等着用口袋哩！”她说：“不用你去送！场上的谷子我不要了！你总得给我说清楚你是吃饭长大的呀，还是吃屎长大的？青年团是不是你的爹妈？……”有余在场上等着有翼，自己回来取口袋，一进门碰上这个场面，便先问调解委员会说了个什么结果，可是常有理正骂得有板有限顾不上理他，他也因为场上的人等着装谷子用口袋就不再细问，找着了口袋取上走了，让他妈沉住气骂下去。有翼直等到这位老人家骂得没有劲了躺到床上去捶胸膛，自己才走出来到场上收拾谷糠去。

惹不起也回房里去睡觉，后来被有余从场上扛着谷回来骂

了一顿，才起来去做晚饭去。

天黑的时候，糊涂涂在调解委员会无可奈何地答应了让菊英分家，也憋着一肚子气回来，便把有余叫到自己房子里，把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结果向他说明。有余摇摇头说：“把十几亩地跑了！”糊涂涂把两手向两边一摊说：“就是嘛！”扭转头向常有理说：“你们有本领！省了一顿饭把十几亩地抖擻出去了！”常有理这回却找不着什么理，只好到吃饭时候又骂着有翼捎带着满喜出气。

常有理又骂上劲来，青年团有人在门外喊叫有翼开会。常有理向有翼说：“我不许你去！不跟上你那些小爹小妈，你还不会证死我！”有余见他妈骂得上气不接下气，便趁这机会劝她说：“妈！你让他走吧！你也该歇歇了！”糊涂涂说：“叫他走吧！咱们不要把村里的大小人都得罪遍了！”常有理刚刚因为逞本领弄错了一件事，也不敢太坚持自己的意见，有翼趁她不再追逼的空子，急急慌慌溜走了。

有翼走进旗杆院，见前院北房里已经有很多人。他问明了是开党团员联合大会，正准备进去，忽听得灵芝在东房里说话，便先往东房里去。

这东房现在是社的办公室，金生和李世杰、范灵芝正讨论分配技术问题。有翼见灵芝仰着头呆坐着，便问她想什么。灵芝没有向他说明问题，直撞撞地问他：“不用斗，用什么东西一下子就能装满一口袋？”有翼的脑子已经被他妈骂糊涂了，灵芝这一问问得他更糊涂，就反问灵芝说：“你问这干吗？”正在这时候，北房催他们开会。李世杰说：“你们开你们的会去吧！这问题恐怕只有找玉生才能解决！”灵芝虽然还有点不服，也只好罢了。

他们三个人走进北房，看见好多人围着北边墙上贴着的一张大幅水彩画，画家老梁同志站在一旁请大家提意见，大家都满口称赞。有翼和灵芝凑到跟前。有翼一看说：“这是三里湾呀！”又走近看了看：“上滩、下滩、老五园、黄沙沟口、三十亩、刀把上、龙脖上……真像！”有人说：“远一点看，好像就能走进去！”老梁说：“不要光说好，请提一提意见！”大家都没有意见。玉生说：“老梁同志！现在还没有的东西能不能画？”老梁说：“你说的是三里湾没有呀，还是世界上没有？”玉生说：“比方说：三里湾开了渠，”用手指着图画说，“水渠从上滩这地方开过，过了黄沙沟，靠崖根往南开，再分成好多小支渠，浇着下滩的地；把下滩的水车一同集中到上滩这一段渠上来，从这里打起水来，分三道支渠，再分成好多小渠，浇着上滩的地；上下滩都变成水地，庄稼比现在的更旺。能不能画这么一个三里湾呢？”老梁说：“这自然可以！你想得很好！那可以叫‘提高了的三里湾’，或者叫‘明天的三里湾’。”金生说：“老梁同志！我们现在正要准备宣传护社和开渠。你要是能在十号以前再画那么一张，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老梁说：“可以！”金生想了想又说：“还可以再多画一张！将来我们使用了拖拉机，一定又是这个样子！”他这么一说，就有好几个人又补充他的话。有的说：“那自然！有了拖拉机，还能没有几个大卡车？”有的说：“那自然也有了公路！”有的说：“西山上的树林也长大了！”有的说：“房子一定也不是这样了！”张永清说：“我从前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县委说现在不应该宣传那些，你们说来说去又说的这一路上来了！”金生说：“县委也不是说将来就不会有那些。县委说的是不要把那些说得太容易了，让有些性急的人今

天入了社明天就跟你耍电灯电话。我们一方面说那些，一方面要告群众说那些东西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换得来，大概就不会有毛病了。老梁同志要是能再画那么一张画，我们把三张画贴到一块，来说明我们三里湾以后应走的路子，我想是很有用处的！老梁同志！这第三张画尔也能画吗？”老梁说：“能！我还带着几张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画哩！把那些情景布置到三里湾不就可以了吗？”有人问：“三里湾修的新房子，能和别处的一样吗？”没有等老梁回答，就有个人反驳他说：“那不过是表明那么个意思就是了吧！难道画上三个汽车，到那时候就不许有五个吗？画了一块谷子，到那时候就不许种芝麻吗？”老梁说：“对！我只能根据我现在对农业机械化理解的水平，想一想三里湾到了那时候可能是个什么气派，至于我想不到的地方和想错了的地方，还要靠将来的事实来补充、纠正。对不起！因为我征求意见耽误你们开会，以后再说吧！你们要的那两幅画，我在十号以前一定画成！”金生说：“三张画给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我们开会也为了这个！今天的会也请你列席好吗？”老梁答应了。

金生催大家坐好，正在套间里谈经营管理问题的张乐意和何科长也走出来。

金生宣布了开会，便先把头一天晚上社干会议决定的扩社、开渠两件事向大家报告了一下，然后向大家说：“……最要紧的事是要争取时间：按咱们原来的计划，水渠要社内外合股去开，成本和人工要按能用水的地面来分担，社只算一个户头，社外便要以户为单位去计算，因此在开工之前就得先把扩社工作作完——入了社的就算在社的总账里，花钱误工都由社来统一调度，没有入社的也要另有个编制——要不先分清谁是社员谁不

是社员，开渠工作就很不容易管理。可是秋收以后离上冻不到一个月工夫，要是等收完了秋再护社，护社工作完了渠也就不好开了。我们支委们研究了一下，又在社干会上研究了一下，都觉着在收秋这一个月里，也可以把扩社的工作做好。日程是这样排列的：本月十号以前，我们的党、团员、宣传员，先在群众中各找对象个别地宣传一下，听取一些群众的意见。十号上午由各团体联合召开一次动员大会，然后按互助组和居民小组分别讨论、酝酿，接着，愿意入社的就报名。到了二十号以后，报名的大体上报个差不多，就可以做开渠的组织工作。这样一天也不耽搁，才能保证一过了国庆节马上就动工开渠，在上冻之前把渠开成。这中间还夹着个小问题，就是马家刀把上那块地还没有动员好，也要在本月里解决。”张永清插了句话说：“刀把上地现在有了解决的办法！”金生说：“有了办法更好！村里、社里这一个月的工作就是这些。我们党、团员、宣传员们要在群众中广泛地宣传，要帮助家庭的亲人们打通思想，要在群众中用行动来带头——用一切办法来保证工作顺利完成。我要传达的就是这些。以下让宣传委员谈一谈具体的宣传计划。”

张永清接着便谈宣传计划。他先把村里的住户按地段分成好多片，按住地的关系和私人的关系规定了把党、团员、宣传员们组成若干个临时宣传小组。他说：“从现在到十号，要按各人宣传的具体对象，分别说明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路；说明我们社内这二年的增产成绩、变旱地为水地的好处、水地的耕作技术和基本建设集体经营起来比个体经营容易得多；说明到了机械化的时候增产更多。让大家的脑筋活动一下。群众要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思想障碍，要随

时汇报党、团支部，让支部针对具体情况想办法。十号的动员大会开过之后，是大家拿主意的时候。在这时候，我们要帮着群众算细账，解释群众提出来的问题。这样做下去，做到开始报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知道个数目了。就是在报名以后我们也不关门——水渠开了工，完了工，一直到明年春耕之前，个别户要想加入我们也欢迎，不过要向他们说明参加得越迟，做的工就越少，分的红自然也少。动员他们尽早参加进来。”有人问他刀把上的地是怎么解决了的，他说：“这个问题我们支委会还没有商量过，以后再谈吧！”

永清谈到这里，金生让大家分了分临时宣传小组，各组选了组长，会就散了。

散会之后，张乐意仍和何科长去套间里谈经营管理问题，张永清拉着金生到东房里商量刀把上地的问题，魏占奎叫团支委留下来开团支委会。

马有翼因为挨了骂，只想等开完了会找灵芝诉一诉苦，党支书和宣传委员讲了些什么，他连一半也没有听进去，可是等到散会以后，灵芝又被魏占奎叫住开团支委会，自己落了空，便垂头丧气跟着大家向外走。他刚走出北房门，忽然想到会散得太早，他妈还没有睡，回去准得继续挨骂，便又踌躇起来。正在这时候，魏占奎又在北房里伸出头来问：“马有翼走了没有？”有翼答应着返回去。魏占奎说：“你且在西房里待一下，一会还要跟你谈个事。”有翼便到睡着满桌子民兵的西房里去。

民兵们睡觉的睡下了，上岗的上岗了，只有个带岗的班长点着一盏灯坐在角落上一张小桌子边。马有翼找了一条闲板凳也凑到桌边来坐。因为怕扰乱别人睡觉，这位班长除和他打了个招呼外，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谈——他自己自然也照顾到这一

点，没有开口。煤油灯悄悄地燃着，马蹄表老一套地滴得着，有翼在桌子一旁只想他两宗简单的心事——第一宗是魏占奎留下他说什么，第二宗是要有机会的话再留下灵芝谈谈心。

闲坐着等人总觉得时间太长，表上的针像锈住了一样老不肯迈大步，半点钟工夫他总看够一百多次表，才算把北房的团支委会等得散了会。他听见轻重不齐的脚步声从北房门口响出来，其中有一个人往西房里来，其余的出了大门。凭他的习惯，他知道来的人是灵芝，本来已经有点瞌睡的眼睛又睁大了。他觉得这半个钟头熬得有价值。门开了一条缝，露了个面，正是灵芝，两道眉毛直竖着，好像刚和谁生过气，也没有进来，只用手点了点有翼，有翼便走出来跟着她到北房里去。

有翼见灵芝面上的气色很不好，走路脚步也比往常重了好多，便问她说：“你生谁的气？”灵芝张口正要说“生你的气”，猛然想到她跟有翼的关系还没到用这样口气的时候，便不马上回答他的话。

前边也提过了：有翼这个人，在灵芝看来是要也要不得，扔也扔不得的，因此常和他取个不即不离的关系，可是一想到最后该怎么样就很苦恼。她这种苦恼是从她一种错误思想生出来的。她总以为一个上过学的人比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在各方面都要强一点。例如她在刚才开过的支委会上，听说有翼下午给菊英作证时候是被满喜逼了一下才说了实话，便痛恨有翼不争气。有翼在那时候的表现确实可恨，不过灵芝恨的是“一个中学生怎么连满喜也不如？”其实满喜除了文化不如有翼，在别的方面不止比有翼强得多，有些地方连灵芝自己也不见得赶得上。不是说应该强迫灵芝不要爱有翼而去爱满喜，可是根据有翼上过中学就认为事事都该比满喜在上，要叫满喜知道的

话，一定认为是一种污辱——因为村里人对满喜的评价要比对有翼高得多。灵芝根据她自己那种错误的想法来找爱人，便把文化放在第一位。三里湾上过中学的男青年，只有一个有翼还没有结婚；因为村里的交通不便，又和从前的男同学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只好把希望放在有翼身上。她所以迟迟不作肯定是想等到有翼进步一点再说，可惜几个月来就连有翼一点进步的影子也看不到，便觉得很苦恼。她常暗自把有翼比做冰雹打了的庄稼，留着它长不成东西，拔掉了就连那个也没有了。

有翼见灵芝不回答他的话，也摸不着头脑，只好跟着灵芝走到会议室的主席台桌边，和灵芝对面坐下。这时候一个五间大厅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还只坐在靠东的一头，开过两次会的煤油灯上大大小小结了几个灯花，昏暗暗地只能照亮了一个桌面，灵芝的脸上仍然冷冰冰竖着两道眉，平时的温柔气象一点也没有了。有翼看了看灵芝的脸，又看了看四周，觉得可怕得很，灵芝板着面孔冷冰冰地和他说：“团支委会派我通知你：党支委秦小凤把你今天下午在调解委员会上那种混账的、没有一点人气的表现，反映到团支部来，团支委会决定要先写一个检讨，再决定怎样处理！去吧！”说了站起来便要走。有翼急了，便赶紧说：“可是你要了解……”灵芝说：“我什么也不要了解！”有翼见她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便哀求着说：“我只说一句话！今天下午，最后我还是说了实话的呀！”灵芝说：“要是最后连实话也不说的话，团里也就不再管你检讨不检讨了！”说着便丢下他走了。

有翼挨了这么一下当头棒，觉着别的团支委和人谈思想不是这样的态度，灵芝代表团支委和别人谈话也不是这样的态

度，一定是灵芝生了他的气，用这种态度表明以后再不和他好，想到这里就趴到桌上哭起来。他哭了一阵，没有人理，自己擦了擦泪准备回去，又想到回去他妈还要继续骂他，才擦干了的眼泪又流出来。

正在这时候，套间门开了，何科长和张乐意两个人走出来。他一想起何科长住在他们家里，好像得了靠山，赶紧吹了桌上的残灯，偷偷擦了擦泪，走到何科长跟前来。何科长问他：“还没有回去吗？”他说：“我留在这里等你！”说罢便和何科长相跟着回去了。

二十、小组里的大组员

有翼受了灵芝一顿碰，生怕灵芝从此丢开他，躺在床上睡不着，便坐起来点上灯写检讨。他的检讨是专为写给灵芝看的，所以特别下工夫，不过不是把工夫下在检讨错误上，而是在考虑如何才能既不丢人又能叫灵芝相信。第一遍稿子还写了几句正经话——如“……为了袒护母亲就完全冤枉了自己的同志……”——写过了又一想：“不行！这像人做的事吗？”本来就不像人做的事还偏想说得像人做的事，那就难了。他把这第一遍写的放过去之后，接着便尽量想往“像人”处写，把那些“说得不够明白”、“有点顾虑”、“开始有点勇气不足”、“脑筋迟钝一点”、“一时有点糊涂”、“思想准备不充分”……一切含糊字样换来换去，觉着怎么说也有点不大圆通。这样一直写到天明，也没有写出一份满意的来。

天明了，他听得一声清脆的女人声音在门外叫他，好像是灵芝，可惜后半截被大黄狗叫了一阵给搅乱了。他赶紧从好多

纸片中挑出一份自己认为比较像样的检讨书来放在桌子上，把其余自己认为要不得的压到席子底去，然后才开了他自己住的东南小房门走出来。他走到大门里，喝退了大黄狗问是谁，才听见答话的声音是玉梅。他先把腰栓缝里那个象道士帽的楔子打下来，正要拔腰栓，又听见他妈在北房里叫他，他便停住手答应说：“等我开了门就来！”他妈说：“快来快来！”玉梅在门外说：“你且不要开门！你们的狗死咬人！等我走远了你再开！党支部要咱们这个临时小组马上开个紧急会议讨论一件重要的事！地点就在后院奶奶家！我先走了！你马上就来了！”有翼说：“等一等咱们相跟着！”玉梅说：“我还要去通知村长去！”说着便走了。常有理仍然一声接一声地叫有翼，有翼只得跑到北房门口来。有翼推了一下门见门还没有开，便走到窗下问常有理有什么事。常有理隔着窗先埋怨着他，给他下命令说：“见了你那小妈你就走不开了！给我到临河镇请你舅舅去！”有翼说：“可是我马上要去开会呀！”常有理说：“家里没有你们这两个常开会的人，我这家还散不了！再要去开会我就不算你的妈！”糊涂涂接着常有理的下音向有翼说：“有翼！我倒不是说你不应该开会，可是家里有了要紧事总可以请个假吧？调解委员会叫咱们在三天以内和你三嫂分开家。你快去请个假回来赶上个驴到临河镇接你舅舅去。你舅舅好出门去掉卖牲口。最好你在早饭以前赶到他家，不要去得迟了扑个空！快去吧！”有翼等他说完了，便往旗杆院后院去。

玉梅离开马家院门口跑到范登高家，见灵芝在敞棚下喂骡子，便问范登高起来了没有。灵芝一面答应着一面给骡子添好了草料，就把玉梅引到房子里来。这时候，灵芝的妈妈正在桌边梳头，见玉梅进来便先让她坐下。玉梅问起登高，灵芝妈妈说：

“他昨天晚上回来不知道心里有什么事，问着他他也不说正经话，吹了灯也不睡觉，坐在床边整整吸了一盒纸烟，鸡叫了才躺下。”又指着放下帘子的套间门说：“这会可睡着了！我和灵芝都没有惊动他。”范登高睡得不太熟，隔着帘听见有人说话便醒了。他开头还以为是他老婆和灵芝谈他夜里回来的情况，后来听得好像是对外人谈，心里有点不自在，便叫了灵芝一声。他老婆听见他醒来了，也就不再谈下去。灵芝低声向玉梅说：“我爹醒了！你找他说什么，告我说我顺便告诉他一下！”玉梅说：“党支部要我们那个临时宣传小组开个紧急会议讨论一件重要事情。他跟我们编在一个小组里，我来请他参加。”

灵芝进了套间，把玉梅的来意向登高说明；登高微微睁了一下眼，慢吞吞地说：“党一支一部？”接着他又考虑了一阵，向灵芝说：“你叫玉梅进来一下！”

每逢金生代表支部说话的时候，登高总有点不满意。在开辟工作时候，他当支部书记，金生还只是个民兵，这几年因为他只注意他的两头骡子，对同志们冷淡了，同志们便对他也冷淡了，所以在每次支部改选时候他总落选。金生这个人在他看来是“有些能力”，不过比起他来那还提不到话下。提倡办社、开渠在他看来都是金生故意出风头——他以为没有这些事可以过得更安静一点。特别叫他不自在的是现在支部来领导扩社工作。他以为这是将他的军，违背了“自愿”的原则。虽说支部没有人直接动员他人社，可是把他编在临时宣传小组让他去向别人宣传，他以为这是金生他们想出来的威逼他的巧妙办法——以为社里暗算他的两头骡子；把他和玉梅、菊英、有翼编成一个临时宣传小组，他以为是故意给他凑了几个毛孩子开他的玩笑。三个青年选他当组长他说他顾不上——其实他是觉着“我怎么好

意思当这么个娃娃头儿？”——可是选了玉梅他更不高兴——他又觉着“天哪！我怎么被玉梅领导起来了？”——总以为夜里那次党团员大会是金生他们完全为了摆布他才设下的圈套。他既然认为是圈套了，自然就要安排跳出圈套的办法，所以散了会回来顾不上睡觉先来作种种安排。他的第一着是抓住“自愿”的理由再向支部提出“反对动员”的意见，可是又想到这个不行，因为县委副书记老刘同志当面驳斥过他这意见，告他说“自愿”不是“自流”，宣传动员还是要做的。他想要是不行，第二步可以赶上骡子出外边走走，等过了这十来天再回来，可是又怕后山的王小聚趁这个空子找到了别的营生不再给他赶骡子……他这样想来想去，整整吸了一盒纸烟也没有找到最后的主意，直到鸡叫才睡下，也睡得十分不安稳，有点什么动静就醒来一次。

当灵芝告他说玉梅来找他，说是党支部要他们这个小组开紧急会议的时候，他想：“什么党支部？还不是金生的主意？玉梅也真正当起我的小组长来了！他们一步紧一步地和我斗上了！”他本来想叫灵芝告玉梅说他没有工夫，后来又想到这样顶回去，将来传到老刘那里要说他“目无组织”，所以才又让灵芝叫玉梅进去。

玉梅进去以后，他故意对玉梅装出少气无力的样子说：“玉梅！叔叔昨天夜里回来伤风了，头痛得抬不起来。你们讨论吧！叔叔实在起不来！”玉梅见他这么说，也只好劝了他几句要请人治疗的话就回旗杆院去了。

党支部派来参加他们这次紧急会议的是张永清。张永清见玉梅说登高不准备来，便向大家说：“他不来咱们就先讨论。不过他想躲也躲不开——这事和他有关系。等讨论完了我再去找他。”玉梅说：“咱们就开会吧！”有翼说：“可是我爹要

我请个假去请我舅舅去！你说怎么办？”玉梅还没有答话，张永清便向有翼说：“不要理那老糊涂虫！这老家伙鬼主意真多！咱们不能让他再请得个牙行来摆布菊英！”有翼说：“可是他非叫我去不行！”玉梅说：“我的老先生！你也太没出息了！你不去难道他能吃了你？”有翼说：“可是将来我还得回去呀！”玉梅说：“他既然知道要请假，你就可以向他说没有请准。难道请假不许请不准吗？”有翼觉着也有理，只是也觉着不好交代，所以马上没有答话。永清说：“好了！我们谈正经的吧！”有翼想：“不去行吗？最好再等我拿一拿主意！”可是永清不等他，他也就停下来了。永清接着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水渠已经测量好了，水渠要占用的地该怎么办也都大部分商量通了，只是马家刀把上那一块地还没有得到有翼他爹的答应，看样子是准备和我们麻烦到底的。现在菊英要和他们分家了。昨天夜里我们支部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最好让菊英把这块地争取到手，免得到开工的时候再和有翼他爹打麻烦。菊英先想一想你自己愿不愿这么做！你只要把这块地争取到手，明年要是入社，社里按产量给你计算土地分红，要不入社，社里给你换好地！”菊英打断他的话说：“能分了家我怎么还肯不入社？”永清接着说：“我们也估计你一定愿入。”玉梅问：“怎么样向她家提出呢？”永清说：“争取的办法是这样：由菊英直接向他们提，别人帮个腔。既然分家，总得有家里人都在场吧！总得由调解委员会给他们评判一下吧！有翼是他们家里的一股头，登高是调解委员会主任，菊英是当事人：你们这个小组一共四个人就有三个与这事有关系，配合得好一点，这工作是可以做好的。”菊英说：“要是他不先问我的意见就给我配搭成一份，还怎么单单提出要换这块地呢？”永清说：“可

以提！什么转弯话也不用说，就说你明年要入社，想帮着社里、村里解决个问题；就说他们原来不愿让出这块地来无非是怕吃了亏，现在要他们把这个亏让给你来吃！大家再一帮腔，他再没有不让的理由——再不让就显得他是故意捣乱。就是这么一件事，你们抓紧时间商量着办吧！让我先去找一下范登高，单独和他谈谈！”说了就往外走。菊英迫着他说：“要是他打发人去请我们那个牙行舅舅，不通过调解委员会呢？”永清说：“给你分的没有那块地的话，你可以说他们分得不合适，再到调解委员会提出你的意见！”菊英笑了笑说：“对对对！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已经成了一方面了！”永清回头向她说：“对！你懂得这个就好了！”说着便走了。

菊英想了个提出问题的办法，说出来让玉梅和有翼听听使得使不得；玉梅给她补充了些话；有翼没有发言，只想到他没有去请舅舅，回去怎样应付他爹。

会议一共几分钟就散了，菊英留在后院奶奶家，玉梅和有翼相跟着走出旗杆院。有翼觉着会散得这样早，和请个假误的时间差不多，回去见了他爹仍然可以说是请了假；不过按这次会议的精神，是不应该再去请那个牙行舅舅去的。他觉着昨天犯了个错误正写着检讨，今天明明白白在会上表示自己不再去请舅舅，回头要再去了，不是又要算错误吗？不过这次错误他还不是不愿意犯，而是怕犯了以后团里不允许，特别是怕得罪了灵芝和玉梅。他想先在玉梅名下取得合法——让玉梅批准一下，便向玉梅说：“我回去了，我爹仍然要我去请我舅舅，我该说些什么呢？”他想让玉梅说一句“实在要你去，你也只好去了”，可是玉梅回他的话是他没有想到的。玉梅说：“我的老先生！你三嫂自己成了一方面了，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方面

呢？该怎么对付由你去想！我替你出不了主意！”说完便离开了。旗杆院门口剩下有翼一个人。

玉梅没有批准，有翼更作了难：回去吧，一定得去请舅舅——别的话他想不出；找灵芝去吧，连玉梅都嫌自己没出息了，还怎么敢和灵芝提——况且检讨也没有交卷……他在旗杆院门口转来转去，好大一会得不着主意，忽然看见远远的有个红影儿一闪，定神一看，原来是何科长骑着他自己的红马走了。有何科长住在他家，他妈还不便和他大动气；何科长走了，就连这一点庇护也没有了，更叫他觉着不妙。一会又有个花影儿从他眼前闪过去，原是他大哥赶了他们的大驴，驴鞍上搭着一条花被子走过去，他便赶紧躲进门里闭起门来。他从门缝里看见他大哥赶着驴往下滩去，知道他爹等不着他，已经打发他大哥接他舅舅去了，便觉着又算遇了大赦，直等到他大哥走得看不见了，才准备回家挨骂去。

永清找到范登高家，和范登高说明要让菊英争取刀把上那块地的时候，登高没有听完就有点烦躁——他想：“什么事也能和‘扩社’‘开渠’连起来！难道你们除了这两件事就再没有别的事了吗？”他将就听完了永清的话，便反驳着说：“作为一个党员，我要向支委会提意见：第一、党不应该替人家分家。第二、提出这个问题，马多寿一定会说是共产党为了谋他的一块地才挑唆菊英和他分家。这对党的影响多么坏！”他这样用保卫党的口气提出两条理由，满以为永清再无话说，可是永清马上就把他的话顶回去。永清说：“菊英要分他的地，难道是党要分他的地吗？昨天下午在调解的时候全场人都给菊英出主意要她分家，难道是党挑唆的吗？群众难道以为开了渠是给党浇地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也要向你提意见：你对支委会和

支部会的决议没有一次没意见！没有一次积极执行过！这是组织纪律不允许的！”登高急了，大声嚷着说：“哪一次的决议我抵抗过？至于一面执行决议一面提意见，那是党允许的！我的意见多那是因为我看得出问题来！你们不尊重我的意见那该着你们检讨，不应该来教训我这提意见的人！”这一来又引得张永清这门大炮崩了他一顿。张永清说：“够了够了！我们哪些地方没有尊重你的意见让我们慢慢检讨去！那么这次的决定你执行不？”范登高说：“在没有执行以前，我提出的意见你们考虑不？”永清说：“我已经回答过你了！你提出的理由站不住，用不着考虑！你是个‘大’党员，开会不到，我这个当支委的可以找上门来传达！以后执行得怎么样，请你向你的临时小组长玉梅去汇报！”说了便走。范登高老婆和灵芝把他送出来。

二十一、非他不行

自从早晨散会以后，菊英就在后院奶奶家里等候通知，一直等到晌午没有动静，到别处打听了一下，听说有余把那个牙行舅舅请来了，可是也没有来叫她。她想要是找回家里去，没有同着个调解委员会的人，万一再和常有理她们顶撞上了，又会弄得分辩不清，不如沉住气等糊涂涂他们的好，因此仍回旗杆院后院去。糊涂涂他们似乎比菊英更沉得住气，直到天黑也没有来叫菊英。菊英吃过晚饭，便把玲玲托付了后院奶奶，去找调委会主任范登高去。

菊英出去不多久，玉梅来找她，玉梅白天在互助组里给黄大年割了一天谷，听有翼说他舅舅在晌午就来了，和他爹、他大哥商量分家的问题，不让他参加，把他撵到互助组里来。玉

梅除又数说了有翼一顿“没出息”以外，也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因为她的临时宣传小组负有争取刀把上一块地的责任，所以一丢下碗就来找菊英问讯。

玉梅听后院奶奶说菊英找范登高去了，便往外返；刚到院里，听登高在后院东房供销社信贷股和人说话，便往东房里去。她见登高和一个办事员争执一个问题，争得她自己插不进话，只好等着。只见范登高说：“不让我贷，把原来我存的还我行不行？”办事员说：“到了期自然由你提取！”“难道我不存下去也不行了吗？”“定期款自然到期才给你准备！”“我不信你们就没有流动款！”“流动款有流动款的用处，让你拿走了还怎么流动！”“这是乡下！是供销社附设的信贷股！不是银行！不一定要把事情弄那么死板！”“我们只能按规矩办事！”“那叫官僚主义！信贷工作是叫人方便的！不是叫人有钱也不得用的！”“你既然为了多得利息存成了定期，就不能再享有活期的方便。我是执行县联社的决定的。上级叫我怎么做我怎么做。有没有官僚主义都不在基层社！有意见你到县里提去！”“我跟你说不清楚！去找你们主任来！”“主任到县里开会去了！爱找你自己找去！”这个办事员是县城里人，话头比范登高快得多，一点空也不露，弄得登高占不住一点理——实际上他也没有理。登高见战不胜他，退也退不出来，正在为难，玉梅恰巧给他作了后殿。玉梅拦住他的话说：“叔叔！菊英在你家里等你哩！”登高趁势向那个办事员说：“算了算了！你不贷算拉倒！我顾不上跟你白误工！”说了便和玉梅走出来。办事员从里边又送了他一句说：“我似乎比你还要忙一点！”

范登高为什么要贷款呢？因为二号早晨他的赶骡的王小聚

回去收秋的时候，约的是三号下午就来，四号早晨就要赶上骡子走。这天下午小聚果然来了，可是上次贩来的绒衣因为和供销社买顶了卖不动；别的货物虽说卖了一些，又因为才收开秋，人们手里现钱缺，赊出去的多，赶不上马上再进货。登高本来还有些存款，当日因为用不着，就定期存入供销社的信贷股，也不能抵现钱用。他想先到供销社信贷股贷一笔款打发小聚走，等收起账来就还，偏是这年秋天县里让信贷股正规化，准备以后从供销社分出来独立成为信贷社，所以定下的规矩不能通融。县里规定临时贷款限于以下三种用途才准贷出：一、农业投资；二、婚丧事故；三、不可抗拒之灾害。登高是倒买卖，自然不在这三种范围内。信贷股这个办事员为了给登高留面子，没有拿出这三种限制来抵抗他，只说没有现款。这些限制，在登高本来很明白——因为别人拿这些理由去贷款还得由村公所证明。他是常给别人写这种证明的——只是想借村长的面子通融一下，见办事员推辞他便有点不高兴，才扯到定期存款上。办事员见他不识进退，就和他顶撞起来。

玉梅虽说给他解了围，可是玉梅和菊英找他也够叫他伤脑筋。糊涂涂刀把上地一争取到菊英名下，开渠的事就再也挡不住了；渠一开了，第一是要经过他的上滩几亩地，第二是糊涂涂地里的水车再也团结不住满喜和黄大年——这两个人一入了社，他自己不入就更觉难看。他觉着对他自己这样不利的事，除了不便公开抵抗，反而还得帮着去做，不是故意往窄路上走吗？他这样想着想着，就和玉梅走到他自己家。

小聚和菊英，都正在家里候他回来。他一回去，小聚先问他说：“明天走吗？”他说：“明天走还只能给人家送个干

脚，自己想捎点什么，款又不现成。已经歇了两天了，索性明天再歇一天吧！也许能讨起些账来！”菊英见他把他自己的事交代完了，就问他说：“叔叔！我们那分家的事今天不见动静，该怎么办呢！”登高说：“他们没有来找，我也不便自己往事里钻。我想他们自己合计合计以后是会来找我的。”

正在这时候，马有余跑进来。马有余看见了菊英说：“老三家也在这里吗？正好！省得再去找你！”又向登高说：“登高叔！我爹请你明天到我们家去哩！不要吃早饭！我们那里准备着哩！”又向菊英说：“老三家明天也不要另做饭！就回家里吃去！‘好合不如好散’哩！明天请登高叔和咱舅舅给咱们当公正人，和和气气商量着分开，以后在院子里处个邻家也方便。你嫂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都担在我身上！”又向他们两个人说：“就这样吧！家里还有客人，我回去了！明天早上我再请你们！”登高应酬了几句，有余便走了。

单从有余这次谈话的态度上看，这个家满可以不分。他这些话可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

当这天晌午有余从临河镇把他舅舅接来之后，便连他爹三个人关起门来整整商量了一个下午。他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按什么标准分地。他家一共十四口人——多寿老两口、有余四口、有福四口、有喜三口、有翼一口——六十八亩地，每人平均四亩八分多地。要按人口分，菊英该分到十四亩四分多；要是多寿老两口除出一些养老地，其余按四股分，菊英就可能少分一点。有余说按股分合适，因为养老地可以多留一点，而且可以留好的。开始打算留二十亩养老地，后来怕菊英不愿意，再按人口和他们算账，只决定留十六亩。按这样分，菊英该得着十三

亩，比原来少一亩多。谈到这里，老牙行想起一件旧事来。老牙行说：“在减租时候那次假分家，不就除的是十五亩养老地吗？要是那一次的分单文书还在的话，就省事多了。”他转向糊涂涂说：“那文书是你表兄写的。如今你表兄也死了，更可以证明那是真的，省得我们跟她临时讨价还价。”糊涂涂说：“不过那次斗争没有斗到咱头上，所以就没有把那文书拿出去过。”老牙行说：“没有往外拿过不更好吗？你可以说：‘孩子们多了我早知道早晚要有这一天，所以我早给他们安排了！’这样一则可以表明你有远见，再则可以表明你大公无私，不是专为了菊英才布置的，三则可以省去临时麻烦。”糊涂涂觉着他说的也使得，便叫有余到东房里从那一盒差一点没有被满喜倒在垃圾里的古董里把四张分单找出来。他们商量的第二个问题是刀把上的那块地。他们估计到社里人会叫菊英要那块地。糊涂涂先让老牙行查一查分单上刀把上那块地是不是养老地，结果查出写在老二马有福名下，不是养老地。糊涂涂说：“虽然不是养老地，只要不在老三、老四名下就好。”第三个问题是调解委员会会不会推翻这些分单，主张重新分配。糊涂涂说：“不会！主任委员是范登高。这个人村长也是党员，说话很抵事，不过他自己是不愿开渠也不愿人社的。只要我们说得有点情理，他是会顺水推舟的。”老牙行说：“咱们先跟他联系一下好不好！”糊涂涂说：“那可不行！你让他自己说，他会帮着我们说话；要是当面和他说破，他反而不敢帮我们——因为他怕别的党员抓住他的把柄。”第四个问题是万一丢了刀把上那块地，大年、满喜两个人入了社，互助组也散了，菊英也分出去了，自己也人社是不是比单干合算。有余这个铁算盘算了一下：除了菊英分出去的地，自己还剩五十五亩，每年还得

吸收一百个短工，估计可以收到一百零八石粮；要是入了社，连土地带劳力可以分到八十八石粮，单干要比人社多二十石，再抛除七石粮的零工工资，也还多十三石——因为一百个零工等于雇三个多月长工，还是忙季，自然有些剥削。糊涂涂说：

“万一那样的话，先单干一年试一试。成问题的是人社的多了，零工不容易雇到。”最后一个问题是研究了一下在谈判时候对付菊英的态度。他们三个都一致主张要和气，尽量让菊英不好意思争执，要让常有理和惹不起忍着点气来顾全大局。

因为经过了这样一番布置，所以有余见了菊英才那样客气起来。

有余走后，登高以为自己毕竟还有权力，便慢吞吞地向菊英和玉梅说：“我估计对了吧！我知道他们越不过我这一关！”

二十二、汇报前后

次日（九月四日）范登高参加了马家的分家谈判，整整误了一天，没有顾上去收账，晚上回去十分不高兴。灵芝也很关心菊英的事，见他回去就问谈判的结果，才问了一句，就引起他一大堆牢骚话来。他说：“我算不会和青年人共事！话要往理上说！说话抓不住理了，别人实在不容易给她圆场！”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卷棉纸卷来往桌上一摔说：“人家在十年以前就写好了的分单怎么能说是假的呢？”灵芝问：“怎么昨天才提出分家，十年以前就会有分单呢？”登高指着那卷纸说：“你不会看看！”灵芝展开一看，见第一张前边写着一段疙疙瘩瘩的序文，接着便是“马有余应得产业如下”，下边用小字分行

写着应得的房屋、土地名目、座落、数目。又翻了第二张、第三张，序文都一样，一张是有福的，一张是有翼的，只是没有有喜的。灵芝问：“怎么没有老三的呢？”登高说：“菊英拿去研究去了！看她能研究出什么来！”灵芝又翻了翻，见刀把上那块地写在老二有福名下，就又问登高说：“怎么？没有把刀把上他们那块地争取到老三名下吗？”登高表示很烦躁地说：“任他们怎么处分我！这个糊涂决定我没有法子执行！”灵芝正要问底细，赶骡子的王小聚走进来。小聚问：“收起钱来了吗？”登高说：“倒收起‘后’来了！”“那么明天走不走？”“等一等看！我拿一拿主意！”他想了一阵子说：“这么着吧！我明天自己赶上骡子走，把那些存货带上，能退的退，能换的换别的货，退换都不能的话，我再想别的办法。”小聚说：“那么我呢？”“你帮忙给我在家收几天秋！”“咱们当初不是说过我不做地里的活吗？”“不愿意做你就回家，反正干几天按几天算账！”这一下可把小聚难住了：不干吧，回家没有个干的；干吧，实在有点吃不消。灵芝一听登高说他自己要赶着骡子走，接着便问：“给菊英分家的事不是还不到底吗？”登高说：“调解委员又不是我一个人！”“可是支部给你的任务你还没有完成呀！”“老实说！要不是为那个我还不走！让他们换个别人完成去吧！只要他们有一个人能完成了，我情愿受严重处分；要是他们也完不成的话，那就证明他们是借着党的牌子故意捏弄我——该受处分的是他们！”就在这时候，外面有人喊灵芝去开会，灵芝便答应着跑出来。登高还隔着门给灵芝下命令说：“出去不要乱说！”

这天夜晚的会议是党、团支委在金生家听取各个临时宣传

组长汇报。

灵芝走到金生家的院子里，见玉生和宝全老汉在院里试验着一个东西。这东西，猛一看像一付盖子朝下的木头蒸笼安在个食盒架子上，又用滑车吊在个比篮球的篮架矮一点的高架子上。这是玉生父子俩在两天内做成的新斗，可以一次装满一口袋。他们先把口袋口套在像笼盖的那个尖底漏斗上，往地上一放，像食盒架子下面的腿和这漏斗一齐挨了地，然后把一口袋谷子装到这付蒸笼样子的家伙里，把绳子一拉吊上去，一个人随手扶住口袋，谷子便漏到口袋里来。在周围看的人，除了金生、金生媳妇、宝全老婆、玉梅、青苗、黎明、大胜——他们一家子外，还有几个党、团支委和临时宣传小组组长。当玉生拉起绳子，谷子溜满了口袋，宝全老汉把套在底上的口袋口卸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喊“成功了，成功了”。灵芝想：“这些人就是有两下子！”她见这个家伙下半截连在一起，上半截却是几个圈子叠起来，便问：“为什么不一齐连起来呢？”玉生说：“这六道圈子每一道是一斗，下边是五斗，一共一石一斗，谁该少得一斗去一道圈。”“为什么不凑成一石的整数呢？”“因为社里的口袋，最大的只能盛一石一斗。”“五斗以下的怎么办呢？”“五斗以下用小斗找补！”大家都说想得周到。

一会，人到齐了，后来的人又要求他们试了一遍。金生说：“咱们开会吧！”大家散了。玉生和宝全老汉收拾工具。金生媳妇和婆婆打扫院里撒下的谷子。灵芝看到人家这一家子的生活趣味，想到自己的父亲在家里摆个零货摊子，和赶骡的小聚吵个架，钻头觅缝弄个钱，摆个有权力的架子……觉着实在比不得。她恨她自己不生在这个家里。她一面看着人家，一面想着自己，没有看见别人都走了，直到听见魏占奎在南窑里喊她，

她才发现只剩她一个人没有进去，便赶紧答应着进去了。

玉生离了婚，南窑空下来正好开会用。当灵芝走进来的时候，可以坐的地方差不多都被别人占了。她见一条长板凳还剩个头，往下一坐，觉着有个东西狠狠垫了自己一下；又猛一下站起来，肩膀上又被一个东西碰了一下。她仔细一审查，下面垫她的是玉生当刨床用的板凳上有个木橛——在她进来以前，已经有好几人吃了亏，所以才空下来没人坐；上边碰她的原是挂在墙上的一个小锯，已被她碰得落在地上——因为窑顶是圆的，挂得高一点的东西靠不了墙。有个青年说：“你小心一点！玉生这房子里到处都是机关！”灵芝一看，墙上、桌上、角落里、窗台上到处是各种工具、模型、材料……不简单。她把碰掉了的小锯仍旧拾起挂好，别人在炕沿上挤了挤给她让出个空子来让她坐下。

金生宣布开会了，大家先静默了几分钟。在讨论什么问题的会议上，一开头常好静默一阵子，可是小组长汇报的会上平常不是这个样子，不知道这一次为什么静默起来。停了一会之后，有个小组长说：“我先谈一点：袁天成留那么多的自留地，在群众中间影响很坏。有人说：‘用兄弟旗号留下地，打下粮食来可归了自己。这叫什么思想？’别的人接着说：‘社会主义思想！党员还能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人说：‘有党员带头，咱明年也那么办——给我老婆留下一份，给我孩子留下一份，给我孙子留下一份……’还有人说：‘总是人社吃亏吧！要不党员为什么还不想把地人进去？’我们碰上人家说这些话，就无法解释。这是一宗。还有……别人先谈吧！我还没有准备好！”可是别人好像也都没有准备好，又静默下来。

灵芝本来是个来听汇报的团支委，可是她见没有人说话，自己就来补空子。她说：“我不是个小组长，可是也可以反映一点情况：菊英争取刀把上马家那块地的事，好像是已经吹了。我看这事坏在我爹身上。马家拿出几张十年前就写好的分单，把刀把上那块地写在老二名下，菊英不赞成，我爹还不高兴。在我看来，我爹自己是也不愿意入社、也不愿意让村里开渠的——只要一提到这两件事他总是不高兴。他说他自己……”玉梅抢着说：“菊英也说他不帮一句忙。菊英怀疑这些分单是假的。她把她拿到的一张给了我，要我替她找永清叔研究一下。”说着就从衣袋里往外取那张分单。别的小组长，也都抢着要说群众对于范登高的反映。金生说：“等一等！还是先让灵芝讲完大家再讲。”

原来每一个组里一开始去宣传，都碰到群众对范登高提出意见来——差不多都说：“你们且不要动员我们，最好是先动员一下党员！”说这话的人们，有的是自己早想入社，同时对范登高有意见，想借这机会将他一下军；也有些是自己不想入社，想借范登高作个顶门权——不过都包含着个“党员不该不带头”的意思在内。因为有这个情况把宣传的人弄得没话说，很被动，所以在向小组长汇报的时候，都把这个情况摆在第一位提出来。小组长们来开会的时候，谁也准备先谈这个，可是一坐下来之后看见灵芝在场就有些顾虑，都以为应该想法让灵芝回避。灵芝倒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她所以发言，只是因为她觉着她爹的思想、行动处处和党作对，发展下去是直接妨碍村里工作的。她早就说过她要给她爹治病，现在看着她爹的病越来越重，自己这个医生威信不高，才把这病公开摆出来，让党给他治。灵芝说开了头，大家放了心，所以才打破沉默抢着要说。

金生让灵芝接着说完，灵芝便接着说：“我爹说他自己明天要赶上骡子走开，让别人去管菊英分家的事。我觉着他的思想上有病，支部应该给他治一治！”张永清说：“治过了，治过了！支委会和他谈了几次话了，只是治不好！”金生说：“治不好又不是不治了。还要治！大家还是先谈情况吧！”有个小组长说：“我在我们那个互助组里给大家讲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道理，就有人提出‘共产党领导的是什么道路’。我说‘当然是社会主义道路’，人家就问‘买上两头骡子雇上一个赶骡子的，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这话叫我怎么回答呢？”金生问：“你是怎么回答的？”那个组长说：“我说那是个别的。”“他又说什么？”“他又说：‘共产党的规定，是不是小党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党员走资本主义道路？’”张永清大声说：“混蛋！这是侮辱共产党！这话是谁说的？”金生叹了口气说：“不要发脾气！这是咱的党员给人家摆出来的样子！”别的组长又都谈了些一般宣传情况，差不多都有和范登高、袁天成两个人有关系的话。金生说：“我看这两个人的问题再也放不下了！”玉梅又补充报告了一下菊英和她讲过的分家情况，就把菊英的分单递给张永清看。张永清是个文化程度比较高一点的人，可是看了看分单上的序文，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便向灵芝手里一塞说：“我这文化程度浅，请你替我解释一下。”灵芝说：“我看过了。这位老古董写的疙瘩文我也不全懂，好在字还认得，让我念给大家听听！”接着她就念出以下的文章来：“尝闻兄弟阋墙，每为孔方作祟；戈操同室，常因财产纠纷。欲抽薪去火，防患未然，莫若早事规划财产权益，用特邀同表兄于鸿文、眷弟李林虎，秉公评议，将吾财产析为四份，分归四子所有。嗣后如兄

弟怡然，自不妨一堂欢聚；偶生齟齬，便可以各守封疆。于每份中抽出养老地四亩，俾吾二老得养残年，待吾等百年之后，依旧各归本人。恐后无凭，书此分付四子存据。三子有喜应得产业如下：”接着便念出哪里哪里地几亩几亩，哪里哪里房子几间几间……最后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五日，立析产文约人马多寿。中证人于鸿文、李林虎。于鸿文代书。”张永清听完了说：“怨不得疙里疙瘩的！我就没有看见是这个老家伙写的！”青年们都问他于鸿文是个什么样的人。张永清说：“是临河镇上一个老秀才，常好替别人写一些讹人的状子，挑唆个官司，已经死了七八年了。”大家都说不用解释，大体上都听明白了。金生说：“看样子这分单也不是假的。据我估计，可能是那时候老多寿怕斗争，准备和孩子们假分一次家，后来因为不斗争他了他没有把这东西拿出来。”金生问他们刀把上那块地分给谁了，灵芝说：“分在老二名下。”金生想了想说：“不论是真是假，分给菊英这份地也不坏。我看就那样子好了！”秦小凤说：“我也觉着这份地很好。只要他们公道一点就好。咱们军属们又不是要占人家的便宜的。”张永清说：“可是没有刀把上那块地呀！”金生说：“那个咱们另想办法吧！”玉梅问：“那么我们这一小组这个任务算解除了吧？”金生说：“好吧！明天早起我再和你详细谈！”

汇报完了，金生宣布党支部留下，其余散会。先走出门来的人说：“噢！下雨了！”灵芝听了说：“下雨好！下了我爹明天就不走了！”金生向魏占奎说：“捎带去叫醒乐意老汉，问一问场上还有没有摊的东西！”魏占奎说：“我们几个人去看一下好了！要有的话，我们自己收拾一下！你们谈你们的吧！”

金生领着党支部委员们到旗杆院后院找县委老刘去。其余

的人，是社员的都到场上去，不是社员的回了家。灵芝虽说不是社员，可是已经和社发生了关系，也跟大家到场里去了一趟。大家见早有人把场上应遮盖的东西都已经遮盖好，知道是张乐意社长早有布置，就都回来了。

灵芝回到家的时候，范登高老婆早睡了觉，只有范登高独自一个人对着煤油灯坐着。登高问灵芝开的是什么会，灵芝想要是向他实说了，他一定还要问长问短，不如含糊一点，便告他说是团的会。可是登高很关心是不是谈到今天给菊英分家的事，便又问团里讨论什么问题。他这一问，灵芝猜透了他的心事，觉着更不应该和他说实话，可是又不愿意让他再追问下去，便选了个他最不愿意追问的问题回答他说：“讨论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灵芝猜得很准，登高果然不再追问了。

灵芝睡了，登高仍然没有睡，仍旧对着一盏灯听外边的雨声。他觉得天气也和他作对，偏让他第二天走不了。哪一阵雨下得小一点，他都以为是雨停了，可是仔细一听都觉失望。后来他走到门外向天上望了一下，睁着眼和闭上眼一样黑，看样子好像这场雨要下个一年半载的。就在这时候，院门外有人打门，问了一下，是他最不愿意看见的张永清。他给张永清开了门，永清进来问他要那三张分单，说是支委会要研究一下。他说：“那是调委会的事，支部为什么管得着？”永清说：“人家和咱们的团员闹气，难道党内不应该摸一摸底？”登高说：“好吧！你们能管到底更好！我实在跟人家没有话说了！”说罢便把三张分单拿出来让永清拿走了。

他送走了张永清，又把大门关上，回来灭了灯，躺在椅背

上猜测支部会研究出什么结果来，又想到明天走不了该怎么办，支部说分单是假的该怎么办，是真的又该怎么办，留不住马家刀把上那块地怎么办……想下去没有完。他正想得起劲，又听得有人打门。他摸着走到门边问了一声，是党的小组长。小组长告他说：“你不用开门了！金生叫通知你：明天要是还下雨，早上开支部会；要是不下雨，晚上开支部会。”说了就走开了。登高在里边喊叫说：“等一等！要是明天不下雨，我就得请个假哩！”小组长远远地说：“谁也不准请假！县委有重要报告！”说着就走远了。登高想：“这一下又让他们拴住了！”屋子里已经吹了灯，眼睛已经一点用处也没有了。他慢慢摸到他坐的那把椅子上往下一坐，少气无力自言自语说：“实在麻烦！”

二十三、还得参加支部会

四号夜里，登高只顾估计第二天的情况，一夜又没有得睡好觉。天亮了雨还没有停，登高一起来，马有余便来请他。参加马家分家的会议、躲开支部会议，也是登高想出来的办法之一。他以为支部既然要研究分单，这真假问题至少总还可以纠缠几天，而支部会议不过一个上午就过去了。头天夜里他埋怨天气和他作对，这天早晨却又觉着下雨对他有帮助——因为下雨，把支部会议放在白天开，在时间上才能和马家的分家会议冲突。马有余一来，他很高兴，慌慌张张擦了一把脸便跟着马有余往外走。小聚只怕把自己留在家里，便随后赶上问他说：“要是早饭以后天晴了，要不要赶上骡子走？”登高说：“回头再决定！”再让骡子歇一天，开完支部会再赶上骡子走，也

是登高想出来的办法之一，所以仍不肯放小聚走。

登高到马家一小会，有翼也把菊英叫来了。糊涂涂马多寿、铁算盘马有余、牙行李林虎和范登高，四个人摆好了架子坐稳。范登高用那种逗小孩的口气问菊英说：“研究了分单没有？”菊英说：“研究过了！”“真的呀假的？”“真的！”“嗯？”这一下范登高没有料到，也猜不透菊英的意思。菊英见他怀疑，就又答应了一遍说：“真的！”“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了！我觉着还公道！”牙行李林虎说：“好孩子！你是个讲理的！舅舅和你爹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哄你？哪根指头也是自己的肉，当老人的自然用不着偏谁为谁！地和房子你既然没有意见，咱们今天就分一分家具什物那些零碎吧！你还有什么意见？”菊英问：“牲口怎么分呢？”糊涂涂说：“一共两个驴，一份半个。你要是要大的，别的东西少得一点；要是小的，别的东西多得一点，完全由你选！”菊英说：“我要入社，半个驴也能入吗？”糊涂涂说：“要入社可以给你折成钱，把钱入到社里让他们再买！好吗？”菊英答应了。

家具什物他们也作了准备——糊涂涂和铁算盘头天晚上忙了半夜，开出分配清单——马有余拿出单子来，先念了一遍总的，然后念各人名下的，因为念得很快，叫听的人赶不上记忆。自然他们也打了好多埋伏——例如有些箱、柜、桌、椅本来是祖上的遗物，他们却说成了常有理和惹不起的嫁妆；小一点的、不太引人注意的东西，根本没有写上去。念完了，他们问菊英有什么意见。菊英只想早一点离开他们过个干净日子，无心和他们较量那些零碎，便放了个大量说：“只要有几件家具过得开日子就算了，多一点少一点有什么关系？庄稼人是靠

劳动吃饭的！谁也不能靠祖上那点东西过一辈子！给我那么多我就要那么多！没有意见！”李林虎说：“好嘛！你看这有多么痛快呀！”马有余便把菊英应得的那张单子给了菊英。

登高一想：“奇怪！原来准备要摆几天长蛇阵，怎么会在不够一点钟的工夫里解决了呢？”头一天太不顺利，这一早晨太顺利，他以为都是和他作对。

为什么这天早晨菊英那样痛快呢？原来这天绝早，金生便叫玉梅向她那个临时小组传达头天夜里支委们研究的结果。支委们的意见是不论分单真假，只看是否合理——是合理的，真的也赞成，假的也赞成；要不合理，真的也反对，假的也反对。支委们都以为这些分单是在菊英的事故以前写的，所以还比较公道；要是重新来一次，不见得比这个强，至于没有刀把上那块地，已经想出别的办法来，不必再让菊英争取了。玉梅跑到旗杆院后院奶奶家里去找菊英，恰巧碰上有翼也来找菊英，就把支委的意见向他们传达了一下，然后又去找登高，可是那时候登高已经被马有余请去，所以菊英知道，登高不知道。

分家的事情结束了，马家留范登高吃过早饭，李林虎便帮着马有余给菊英清点家具。范登高见没有自己的事了，便辞了糊涂涂走出来，不过一出大门便碰上一些党员们相跟着往旗杆院去，顺路也叫他相跟着走，他再没有什么逃跑的理由，也只好不声不响跟了去。

支部大会仍在旗杆院前院北房里开。一开始，金生先谈了谈开会的意义。金生说：“这次会议是个小整党会议，可能在一两天以内开不完！大家要耐心一点！”这几句话在登高听起

来就是个警报。他历来就怕提“整党”，更怕一连整好几天。金生接着说：“县里原来决定在今年冬天农闲的时候才整，可是有些不正确的思想已阻碍着现在的工作做不下去，所以昨天晚上才和县委刘副书记决定先整一整最为妨碍工作的思想，等到冬天再进行全面整顿。现在先请刘副书记给大家讲一讲！”接着便是老刘同志讲话。老刘同志仍然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讲起。提起这两条道路，登高就以为是“紧箍咒”——因为一听着管保头疼。他既然抱了这个成见，所以老刘同志讲了些什么他根本没有听进去——他以为不论讲什么，也不过都是些叫人头疼的药罢了。可是老刘同志的“紧箍咒”似乎比别人的厉害，有些字眼硬塞进他的耳朵里去——老刘同志的讲话里有这样的话：“……例如范登高、袁天成就是这种思想、行动的代表！”范登高虽说没有听见老刘同志前边讲的是哪种思想、行动，可是总能猜着指的不是什么好思想、好行动。既然点着他范登高的名字，以下的话他就不得不注意，只听得老刘同志接着说：“领导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共产党！不愿意走这条道路还算个什么党员？愿不愿带头走这条道路？以前走了没有？是怎样走的？以后准备怎样走？每一个党员都得表明一下态度！特别是在思想上、行动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应该首先表明！这是能不能作个共产党员的界线！一点也含糊不得！希望同志们都认真检查一下自己！”老刘同志讲完了话，金生宣布说：“大家休息一下，以后就个别发言。今天就是晴了也湿得不能下地，准备开一整天会，明天要是下雨就再开一天，要不下雨白天下地晚上开。”范登高搔了搔头暗自说：“天呀！金箍儿越收越紧了！”

休息过之后，范登高已准备了一下。县委既然点了他的

名，他只得先发言了。不过他这人遇上和自己利益有矛盾的事，总想先抓别人一点错。他说：“话也不用转着弯说了！看来今天这会似乎是为了我才布置的！”这显然是对支委、支书和县委的不满。老刘同志才听了他这两句，就插话说：“我插句话：今天的会，主要的就是要范登高、袁天成两位同志带头来检查自己的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其次才是让其他同志表明态度！我在讲话时候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并没有转弯！不要误会！登高同志谈吧！”范登高只想倒打一耙，所以准备的是另一套话，并没有准备真正检讨错误，现在听老刘同志明白指定要他检查思想，他便惊惶失措，一时找不到话讲。隔了一阵，他找到些理由，便说：“当初在开辟工作时候……”有个老党员站起来说：“你拉短一点行不行！在开辟工作时候，我知道你有功劳，不过现在不是夸功的时候，是要你检查你的资本主义思想！”范登高已经没有那么神气了，便带着一点乞求的口气说：“可是你也得叫我说话呀！”主席金生说：“好！大家不要打岔！让他说下去！”范登高得了保证便接着说：“在当初，党要我当干部我就当干部，要我和地主算账我就和地主算账。那时候算出地主的土地来没有人敢要，党要我带头接受我就带头接受。后来大家说我分的地多了，党要我退我就退。土改过了，党要我努力生产我就努力生产。如今生产得多了一点，大家又说我是资本主义思想。我受的教育不多，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好还是请党说话！党又要我怎么办呢？”当他这样气势汹汹往下说的时候，好多人早就都听不下去，所以一到他的话停住了，有十来个人不问他说完了没有就一齐站起来。金生看见站起来的人里边有社长张乐意，觉着就以老资格说也可以压得住范登高，便指着张乐意说：“好！你就先讲！”

乐意老汉说：“我说登高！你对党有多么大的气？不要尽埋怨党！党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要翻老历史我也替你翻翻老历史！开辟工作时候的老干部现在在场的也不少，不不是你一个人！斗刘老五的时候是全村的党员和群众一齐参加的！斗出土地来，不敢要的是少数！枪毙了刘老五分地的时候，你得到的地大多数在上滩，并且硬说你受的剥削多应该多得，人家黄沙沟口那十来家人给刘家种了两辈子山坡地还只让人家要了点山坡地。那时候我跟你吵过多少次架，结果还是由了你。在结束土改整党的时候，要你退地你便装死卖活躺倒不干工作，结果还只退出黄沙沟口那几亩沙阪。土改结束以后你努力生产人家别人也不是光睡觉，不过你已经占了好地，生产的条件好，几年来弄了一头骡子，便把土地靠给黄大年和王满喜给你种，你赶上骡子去外边倒小买卖，一个骡子倒成两个，又雇个小聚给你赶骡子，你回家来当东家！你自己想想这叫什么主义？在旧社会里，你给刘老五赶骡子、我给刘老五种地，咱们都是人家的长工，谁也知道谁家有几斗粮！翻身时候，你和咱们全体党员比一比，是不是数你得利多？可是你再和全体党员比一比，是不是数你对党不满？为什么对党不满呢？要让我看就是因为得利太多了！不占人的便宜就不能得利太多，占人的便宜就是资本主义思想！你给刘老五赶骡子，王小聚给你赶骡子，你还不是和刘老五学样子吗？党不让你学刘老五，自然你就要对党不满！我的同志！我的老弟！咱们已经有二十年的交情了！不论按同志关系，不论讲私人交情，我都不愿意看着你变成个第二个刘老五！要让你来当刘老五，哪如就让原来的刘老五独霸三里湾？请你前前后后想一想该走哪一条道路吧！”张乐意说完之后，接着又有几个人给范登高补充提了些意见。范登高还

要发言，金生劝他好好反省一下到下午再谈，然后便让袁天成发言。

袁天成见大家都很认真，不便抵赖，便把错误推到他老婆不够身上。他说在本年春天入社的时候，就情愿跟大家一样只留百分之二十的自留地，后来能不能够给他出主意，要他以他那个参了军的弟弟为名，把土地留下一半。他说他平日不敢得罪人，所以听了她的话。大家要他表明以后究竟要受党领导呀还是受老婆领导，袁天成说：“自然是受党领导，不过有时候也还得和她商量商量！”大家说他那话和不说一样。

谈到这里，天就晌午了。金生宣布休会，叫大家吃了饭再来。

二十四、奇 遇

登高回家去吃午饭时候，一句话也不想说，也没有叫灵芝给他端饭，自己默默地舀一碗饭躲到大门过道里去吃。他老婆悄悄问灵芝说：“你爹又和谁生气？”灵芝这天上午也在旗杆院和李世杰研究总分配问题，也听到党支部会上大家给登高提意见，可是也不便向她妈说，只好答应了个“不清楚”。

登高只吃了一碗饭就放下碗站在台阶上吸纸烟。灵芝想试探一下登高的思想是否通了，就故意问他说：“支部开会讨论什么？”登高只慢吞吞地说了两个字：“念经！”“什么经？”

“真经！”灵芝想：“不行！这个病还没有治好！”

王小聚只关心登高是不是放他赶着骡子走，端着碗凑到登高跟前说：“天晴了！明天你去呀我去？”登高说：“谁也不用去了！我要卖骡子了！”“为什么？”“不养了！已经养出资

本主义来了！”说完了也不等小聚再问什么，就吸着烟走出去。

登高老婆摸不着头脑乱猜测，灵芝假装不知和她瞎对答。她们胡扯了一会，李世杰便又把灵芝叫走了。

灵芝同李世杰又到旗杆院前院的东房来，北房的支部大会也开了。灵芝正在制着一份分配总表，本来无心听北房里人们的讲话，可是偏有一些话送到她耳朵里来。有一次，她听见她爹大声说：“不要用大帽子扣人！我没有反对过社会主义！当私有制度还存在的时候，你们就不能反对我个人生产；一旦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我可以把我的财产缴出来！”灵芝一听就觉着这话的精神不对头，只是也挑不出毛病在哪里。她本来也想过找一个适当机会和她爹辩论一下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看来她爹懂得的道理也不像她想的那样简单。她正想找个理论根据试着反驳一下，就听见张永清反驳着说：“一个共产党员暂且发展着资本主义生产，等群众给你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好了以后，你再把财产缴出来！你想想这像话吗？这是党领导群众呀还是群众领导党？”金生补充了两句说：“就是群众，也是接受了党的领导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等到别人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好了以后再缴出财产来。大家都发展资本主义，还等谁先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呢？”另外一个人说：“范登高！你不要胡扯淡！干脆一句话：你愿不愿马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没有说过我不愿意！”“那么你马上愿不愿入社？”“中央说过要以自愿为原则，你们不能强迫我！”“自愿的原则是说明‘要等待群众的觉悟’。你究竟是个党员呀还是个不觉悟的群众？要是你情愿去当个不觉悟的群众，党可以等待你，不过这个党员的招牌可不能再让你挂！”灵芝听到

这里，再没有听到她爹接话，知道是被这些人整住，暗自佩服这些人的本领，心思慢慢又转回自己制造的表格上来。

造表这种工作和锄地，收割那些劳动性质不同——总得脑力集中——手里写着“总工数、总产量……名称、合价……”耳朵里听着“检讨、纠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总觉得有点牵掣。灵芝一个下午出了好几次错，不过总还在支部没有散会之前，她和李世杰的工作就已经告一段落。

灵芝走出旗杆院的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她忽然想到马有翼给团支委写的检讨书还没有交代，便到马家院来找有翼。灵芝才离开他们的互助组，也不过三四天没有到马家院来，马家的大黄狗见了她便有点眼生，“呜”地一声就向她扑来，不过一到跟前马上又认出她是熟人，就不再叫了。灵芝见菊英正在院里往东房里搬她分到的家具，便低声问她说：“有翼在吗？”菊英往东南小房一指说：“在！”灵芝走到窗下敲了两下窗格，有翼便喊她进去。

灵芝一走进去，觉着黑咕隆咚连人都看不见，稍停了一下才看见有翼躺在靠南墙的一张床上。这间小屋子只有朝北开着的一个门和一个小窗户，还都是面对着东房的山墙——原来在有翼的床后还有两个向野外开的窗户，糊涂涂因为怕有人从外边打开窗格钻进来偷他，所以早就用木板钉了又用砖垒了。满屋子东西，黑得看不出都是什么——有翼的床头仿佛靠着个谷仓，仓前边有几口缸，缸上面有几口箱，箱上面有几只筐，其余的小东西便看不见了。灵芝问有翼说：“大白天怎么躺在家里？”有翼说：“倒霉了！”“因为要你写检讨吗？”“不！要比那倒霉得多！我舅舅……”常有理就在这时候揭开门帘进来

了。常有理指了指有翼说：“快去吧！你爹叫你哩！”有翼答应着站起来向灵芝说：“你且等一下，我去去马上就来！”常有理说：“有事哩！马上可来不了！快去吧！”灵芝看见常有理这样无理，有翼又那样百依百随，也只好向有翼说：“我也走了！你以后写好了直接给支委会送去吧！”说着就随在有翼后边走出东南小房，独自走出马家院。常有理朝着灵芝的脊背撇了撇嘴，差一点没有骂出来。

灵芝从一个碾道边走过去，见小反倒袁丁未架着驴儿碾米，有翼他舅舅李林虎正和小反倒谈他的驴能值多少钱，赶骡子的王小聚也在一旁凑趣。灵芝回到家打了个转，王小聚便领着李林虎在院里看登高的骡子。这时候，登高也散会回来了。登高问李林虎说：“你看我那两个骡子能值多少钱？”李林虎说：

“不论值多少你又不卖！”登高说：“卖！说真的，卖！”李林虎说：“我又没钱买！你真要卖的话，回头给你找个主儿！”

“好！你给咱留心着！”李林虎又客气了一会便出去了。

前边提过：小聚也是牙行出身。小聚晌午听范登高说要卖骡子，虽说不相信他是真心，可是也想到万一他真要卖也不要让他逃过自己的手。他和范登高有个东家伙计的关系，不好出面来从中取利，所以才去拉李林虎来做个出面的人。他们商量好要趁登高散会回来的时候，用半开玩笑的口气探一探登高的心事然后再作计议，所以李林虎才在这时候来看登高的骡子。

李林虎走后，灵芝把登高叫回家里去问他说：“爹！你为什么要卖骡子？”“人家都说咱养骡子是发展资本主义，还不赶快卖了它去走社会主义道路吗？”“难道不卖骡子就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卖骡子怎么走？”“入社！”“入了社谁给咱赶骡子？”“连骡子入！”“你说得倒大方！他们有的人

个小毛驴，有的连小毛驴也没有，偏是我入社就得带两头骡子？要入骡子大家都入骡子！光要我入骡子我不干！”“可是人家大家都没有骡子呀！”“谁不叫他们有骡子？”“人家都没有你……”“没有我翻得高！没有我会发展资本主义！是不是？别人都这样整我，你也要这样整我！是不是？”灵芝停了一下说：“你叫我怎么说呢？你发展的是哪个主义呀！”这时候，登高很想向灵芝发一顿脾气，可惜想了一阵找不出一条站得住脚的道理来。灵芝接着劝他说：“爹！你自己都愿意入社了，为什么偏舍不得入骡子？况且社里又不是白要你的！社里给你公平作价，每年按百分之十给你出息，还不跟你卖了骡子把钱存在银行差不多吗？”登高又带气又带笑地说：“你才到社里去帮了三天忙，就变成社里的代表了！这话真像社里人说的！”登高老婆见登高的眉头放开了一点，自己的牵挂也减轻了一点，便想法子给登高开心说：“谁让你答应把她换给人家社里呢？换给人家自然就成了人家的人了！”灵芝说：“我爹也答应入社了，社就跟咱们成了一势了。我一方面是替社说话，另一方面还是为我爹打算。牲口入社不吃亏这个道理，这几天来我们宣传小组赶紧给群众讲解还怕群众有误会，我爹是党员，在入社以前先卖骡子，那还怎么能叫群众不发生误会呢？要是准备入社的人跟着我爹卖起牲口来，恐怕全体党、团员，全体社员都会反对他！”登高说：“我卖骡子又不是怕社里不给我报酬！”灵芝说：“可是怎么向群众解释呢？况且既然不是怕吃亏，又真是为了什么呢？连我也不懂！”登高说：“这会闹得连我也不懂了！我本来是想卖了骡子给自己留下一部分活动款，可是真要入了社还留那款叫活动什么呢？”登高老婆说：“你们都不懂，我自然更不懂了！”灵芝问登高说：“那么你不卖骡子了吧？”

登高说：“我这脑袋里这会乱得很！等我好好考虑一下再说！你且不要麻烦我好不好？”灵芝从他这些话里知道他还没有真打算入社，只是也有一点活动口气，便最后向他说：“我只再问一句话！你们这次支部会开完了没有？”登高说：“你又问那干吗？你怕烦不死我哩？”灵芝听他这么说，知道还没有开完，便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她想：“只要那个会没有开完，自然就有人替我麻烦你！”

夜深了，灵芝回到自己房子里睡不着。有三件事扰乱着她：下午造的那份表还有毛病。爹的病还没有彻底治好。有翼才说了个“我舅舅”就被他妈妈管制起来了。她脑子里装满了这些东西：农业总收入、农业成本、土地应得、副业总收入、副业成本、公积金……摆零货摊、雇人赶骡子、等别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卖骡子、“是党员呀还是不觉悟的群众”……仓、缸、箱、筐、“我舅舅”、常有理的嘴脸……这些东西，有时候还是有系统地连成一串，有时候就想到“仓、缸、箱、筐”应该记在“农业成本”项下，或者想到“卖骡子”不能算“副业收入”……总而言之：越想越杂乱。最后她给自己下命令说：“尽温习这些能解决什么问题？快睡！明天早一点起来正经搞！”

睡是睡着了，可是睡得不太好，一觉醒来天还不明。这时候她的头脑很清醒，想到头天下午制的那个表，就跟放在桌面上看着一样。她觉着只要把两三个项目前后调动一下次序就完全可用了。她穿上衣服走出院来，想去她爹房子外的外间桌上看一看表，可是伸手去揭帘子就又打了退步。这只表是她爹搞小生意买来的。她想要是她爹醒来了，一定要以为“我要不发展资本主义，你哪里会有个表看？”想到这里她又寻思说：

“算了！不看你的！等到社会主义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现在我到旗杆院民兵那里看去！”

灵芝快走到旗杆院门口，一条手电筒的光亮照到她脸上来，吓了她一跳。原来打谷场和旗杆院中间有个岗位。在这岗位上的民兵，一方面监视着村里通到场上的路，另一方面也算旗杆院的门岗。站岗的民兵叫住灵芝问明了原委，便放她过去。灵芝走进旗杆院，见东西两个房子的窗上都有灯光：“难道是李世杰早就来了吗？”她刚这么一想，就听见东房有人问“谁？”紧接着就听见枪栓响了一声，她就赶紧答应说：“我，我！”她走进去，见玉生站在账桌后边，手里握着枪。玉生见是她，就把枪放下了。她看见民兵的表放在账桌上，走过去看了看才四点二十分；表旁边放着个笔记本，上面压着个尺子。玉生问她：“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玉生在四点钟才把最后一班岗换出去，估计在这时候不会有人活动，所以一听到灵芝在院里走动就紧张了一下。灵芝说：“有一份表画错了，我来改一改。我没有表，不知道才四点多钟。”她又问玉生说：“你怎么到这边房子里来带岗？”玉生说：“我想捎带着琢磨个东西，翻得纸沙沙响，怕扰乱别人睡觉。”灵芝听他这么说，才注意到他的笔记本翻开的一页上画着几个齿轮和圆圈，尺子中间有一排窟窿，有个窟窿里还钉着一个针。她听说玉生和小俊离婚是因为一支有窟窿的尺子吵起来的，猜想着一定就是这个尺子了。她把尺子拿开去看下面的图，玉生说：“你可不要笑我！我们弄的这些东西，可不能比你们有文化的人那么细致！”灵芝看了看，觉着是粗一点，不过也都很有道理，便问他说：“发明什么机器吗？”玉生说：“见了人家的机器连懂也懂不得，还要发明什么机器？我不过是想把咱们那些水车改装一

下！咱们不是就要开水渠吗？开了渠下滩就不用水车了，可以把水车都搬到上滩的渠上来。下滩的井是两丈深，上滩水渠上要安水车的地方才六尺深。水越浅水车越轻，轻了就用不着一个牲口。我想或者是用报上登的那个变轴的办法把水车加快，或者再想个办法能让一个水车挂双筒，那就能叫一个抵两三个用。”灵芝问他现在琢磨得怎么样，他便把他画的那些图一张一张翻着解释给灵芝看。灵芝见他画的那些齿轮的齿子有些过长，向他说：“这么长的齿子不行！”他说：“实际上不是那么长的。那是因为尺子上的窟窿只能钻那样密，所以画得长了。”灵芝听他讲完了，觉着他真是了个了不起的聪明人，要不是有个“没文化”的缺点，简直可以做自己的爱人了。她又拿起那个尺子来看了看，觉着完全用手工做那么个东西实在够细致，可是要拿它当个画图的仪器用，却还粗得可怜。她想为了社里的建设，也该把自己在学校用的那些圆规、半圆量角器、三角板、米达尺借给玉生用一用，便向玉生说：“这个尺子画这些图不够用，我可以借给你几件东西用！”说了便回家去取她那些东西。

她把那些东西取来，一件一件教给玉生怎么用。玉生说：“谢谢你！这一来我可算得了宝贝了！”

这时候天色已经大明，民兵也撤了岗，玉生也回去睡觉去了，灵芝便坐到账桌后去修改她的表格。

二十五、三 张 画

九月十号是休息日。这天早晨，社里的青年们在旗杆院搭台子。这个台子搭起来很简单，只要把民校的桌子集中到前院北

房的走廊前边，和走廊接连起来，上面铺几条席子，后面挂个布幕把北房门遮住，便是个台子。这个台子，差不多每十天就要搭一次——有时候只开个会，有时候也演戏——因为搭的次数多了，大家都很熟练，十分钟便搭成了。这次的台上，除了和往常摆设得一样以外，还添了老梁赶制的三幅大画。青苗、十成、黎明、玲玲他们那一伙人在休息日都是积极分子，才搭台就跑来了。他们看见正面挂着三张新画，大一点的孩子一看就认得是三里湾，指指点点先给小的讲解，讲解了一阵就跑到村里去宣传，逢人便说：“台上有三张画，都画的是三里湾，有一张有水，有一张有汽车！”集体宣传了还不算，又都分散回家去拉自己的爹爹、妈妈、爷爷、奶奶。

吃过早饭，大家陆续往旗杆院走——有的是本来就要来开会，有的是被小孩们拉来的。干部们都到幕后的北房里开预备会，其余的人在前边院里看画。

村里人，在以前谁也没有见三里湾上过画，现在见老梁把它画得比原来的三里湾美得多，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要称赞一遍。这三张画，左边靠西头的是第一张，就是在二号晚上的党团员大会上见的那一张。第二张挂在中间，画的是个初秋景色：浓绿色的庄稼长得正旺，有一条大水渠从上滩的中间斜通到村边，又通过黄沙沟口的一座桥梁沿着下滩的山根向南去。上滩北部——刀把上往南、三十亩往北——的渠上架着七个水车岸水；下滩的渠床比一般地面高一点，一边靠山、一边用堤岸堵着，渠里的水很饱满，从堤岸上留下的缺口处分了好几条支渠，把水分到下滩各处，更小的支渠只露一个头，以下都钻入盛旺的庄稼中看不见了。不论上滩下滩，庄稼缝里都稀稀落落露出几个拨水的人。第三张挂在右边，画的是个夏天景色：山

上、黄沙沟里，都被茂密的森林盖着，离滩地不高的山腰里有通南彻北的一条公路从村后边穿过，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线杆。村里村外也都是树林，树林的低处露出好多新房顶。地里的庄稼都整齐化了——下滩有一半地面是黄了的麦子，另一半又分成两个区，一个是秋粮区、一个是蔬菜区；上滩完全是秋粮苗儿。下滩的麦子地里有收割机正在收麦，上滩有锄草器正在锄草……一切情况很像现在的国营农场。这三张画上都标着字：第一张是“现在的三里湾”，第二张是“明年的三里湾”，第三张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

大家对第二张画似乎特别有兴趣：有的说“能有这么一股水，一辈子都不用怕旱了”，有的说“今年一开渠，明年就是这样子”，有的说“增产一倍一点问题也没有”……妇女们指着经过村边的那一段渠说“这里能洗菜”，“下边这一段能洗衣裳”，“我家以后就不用担水了，一出门就是”……小孩们也互相订计划说“咱们到这里洗澡”，“捉蛤蟆”，“捉鱼”……

看菜园的老王兴进来了。这老人家，因为菜园里离不了人，他和另外一个人轮班休息，两次休息日才能休息一次，大家都说：“老汉不容易碰上这个！让老汉好好看看！”说着便把他招呼到前排。老汉指着左边那第一张说：“这一张我见过了。你们都没有我见得早！就在我那园里画的！”有人逗老汉说：“菜园是你的吗？”老汉哈哈笑着说：“很奇怪！我总觉着是我的！就跟我个孩子一样！”老汉看到第二张，就指着画问老梁说：“老梁同志！你怎么把我园里的水车画丢了？”老梁说：“这渠里有了水，还要水车干吗？”老汉又哈哈笑着说：“这画的是开了水渠以后的事呀！我就没有注意到大水渠！”又有人逗他说：“你只看见你的菜园子了！”老汉看到第三张

上菜园子那地方种了麦子，把种菜的地方调到黄沙沟口偏东一点的地方，便又指着向老梁说：“这个可不行！把菜园子搬到村边来，买菜的来了路不顺！”老梁说：“你就没有看见通到河边的这条汽车路吗？”又向下边的画边沿上指着说：“要是把这画再画得大一点，这一边就是大河，到那时候大河上已经修起可以走汽车的桥来了！”“可是汽车怎么能通到东山上呢？”“三里湾可以有汽车，难道东山上就不会有汽车吗？到那时候，种下的菜主要是为了自己吃，离村近一点，骑上个自行车一会就拿回来了。”又有人说：“每家都到园里拿菜多么麻烦？还不如用个人推上个排子车往各家送！”另一个人说：“算了算了！那些小事情，到了那时候自然不愁想不出更高的办法来！”王兴老汉说：“到那时候都用了机器，我们的技术还有没有用呢？”又有人逗他说：“老汉！你还能活多大！”老汉说：“我死了还有你们哩！你们不是也有些人正学习这种技术吗？”老梁说：“大的耕种方面用机器，小的细致工作还得用手工。自然到那种条件下工作要有新的技术，可是新的技术往往都是从旧技术基础上进步成的！人只要进步，自然就能赶上时代！”

北房里的预备会开完了，村里、社里的干部们、县委刘副书记和其他外来的干部们，都从布幕后转出来跳下走廊坐到台下，金生留在台上作主席。金生宣布了开会，先让张永清作了一次扩社、开渠的动员讲话。张永清讲起话来像演戏，大家听起来管保不瞌睡。他从两条道路讲起，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光明大道，接着又用老梁同志的三张画说明了怎样走到社会主义，最后讲到当前的任务是继续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也就是扩社、开渠。老梁的三张画一挂出来就已经把大家的兴

趣提起来了，再加上他这一讲，大家响应的劲头就更大了一些。他在讲话中，常用问答的口气来鼓励大家的情绪——例如“有没有信心？”“有！”“干不干？”“干！”正在这一问一答的时候，有人想看看平常表示不愿意入社、不愿意开渠的人们现在有什么表现，发现马有余一声不响地也坐在后边一个角落上，眼睛不对着张永清，却对着黄大年、王满喜两个人在答话时候举起的拳头。

张永清讲完以后，金生又站起来说话了。他说：“主张个人发财不顾别人死活的资本主义思想，妨害着咱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道理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只是根据这种道理来检查自己有没有资本主义思想，不止大家都还做得不太够，连我们党内也做得不够，有些个别同志的资本主义思想还很严重。像范登高和袁天成两位老同志，就还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我们支部大伙儿在这几天帮着他们检查了一下，决定让他们两位在今天的大会上向大家作个检讨。现在就让他们两位发言。”又个别向他们两个人说：“你们谁先讲？”范登高说：“我先讲。”接着便走上台去。

范登高在减租减息时候，讲起话来要比张永清还受人欢迎，可是近几年来，一上台大家就不感兴趣，因为他已经变得只会说一些口不照心教训别人的话。这一次金生说让他检讨，大家都不太相信他还会承认他不是万分正确的大干部。他的女儿灵芝也担心他不拿出真心话来，让大家失望。只见范登高说：“我这几年有个大错误，向你们大家谈谈！”他才开口，就有人互相低声说：“听！又摆开教训人的架子了！”范登高接着说：“我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只注意了自己的生产，没有带着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我觉悟了！一个党员不应该带

头发展资本主义！我马上来改正！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带着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村里的社不是要扩大了吗？我马上带头报名入社！我已经把赶骡的小聚打发了！我情愿带头把我的两个骡子一齐入到社里！我这人说到哪里要做到哪里！现在先向你们大家表明一下！完了！”他声明“完了”以后，没有看清楚谁在下边鼓了两下掌，可是只响了两下子，他等了一下，见前边鼓掌的那个人也没有再继续，别的人也没有响应，只好悄悄地退到台下来。

金生听了登高的检讨，觉着很为难。范登高这几天在党的会议中间，因为有些老同志揭发着他的错误，他的检讨比今天在这里谈的要老实得多，可是今天当着群众的面，他又摆出领导人、老干部的神气来，惹得大家非常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金生觉着在没有征求群众再给他提意见帮助他反省之前，党首先应该对他这次检讨表示一下态度，只是自己要代表党来讲这话，会弄得范登高更不能考虑别人的意见。因为范登高在经济上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上又是满脑子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常以为金生时时都在跟他抢领导权，现在要听到金生的批评，一定要以为金生是组织群众打击他，再不会想到别人的意见能帮助他进步。金生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当范登高下台之后，自己又站到主席地位上，很大一会没有讲出话来。

县委刘副书记了解金生和登高的这种关系，见金生为难，自己便站起来说：“主席！我讲几句话！”金生把他请上台，他说：“范登高同志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了改正的决心，这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可是在态度上不对头——还是站在群众的头上当老爷——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自己早已落在大家的后面，还口口声声要‘带头’，还说‘要带着大家走社会主义道

路’。农民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走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三里湾，这条道路有好多人已经走了二年了你还没有走！你带什么头？不是什么‘带头’，应该说是‘学步’！学步能不能学好，还要看自己的表现，还要靠群众监督！第一步先要求能赶上大家！赶上了以后，大家要是公认你还能带头的话，到那时候你自然还能带头！现在不行！现在得先放下那个虚伪的架子！党内给你的处分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大家呢？你不愿意放下架子我替你放下！范登高同志的思想、行动已经变得不像个党员了，这次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之后，党给他的处分是留党察看。请党内党外的同志们大家监督着他，看他以后还能不能做个党员！不止对范登高，对其他党员也一样——不论党内党外，只要有人发现哪一个党员不像个党员了，都请帮忙告诉支部一声！”

县委讲完之后，金生征求大家给登高提意见。大家接二连三提出好多意见，不过大多数的意见都是支部会上谈过的，因为他在检讨的时候自己没有提，才累得大家重提了一遍。只有山地组组长牛旺子提出个新的意见。他说：“范登高把他那‘两头骡子一齐入社’说得那么神气我有点不服——好像跟他救济我们的社一样！我们老社员们这二年栽了那么多的树、修了那么多的地，为了欢迎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新社员一点也不打算计较，偏是他人两个骡子就成了恩典了吗？谁都知道他的外号叫‘翻得高’。我们种山地的人，在翻身时候也要都翻他那么高，谁还弄不到个骡子？社里接受牲口还是按一分利折价付息，算得了什么恩典？他愿入是他的本分，他不愿入仍可以让他留着去发展他那资本主义！我们花一分利到银行贷出款来还愁买不到两个骡子吗？听了他的检讨，我觉得他还没有真

正认识了他自己！能不能老老实实当个好社员我还不太相信！”老刘同志在台下插话说：“这个意见提得好！登高同志，你看群众的思想水平比你怎么样？再要不老老实实求进步，你这个党员还当得下去吗？”

大家提过了意见，范登高在马虎不过的情况下，表示了以后愿意继续检查自己的思想。

天快晌午了，才轮到袁天成上台作检讨。袁天成的问题比较单纯——只是听上他那不够老婆的话用他弟弟的名义多留了些自留地，照实说出来，表示以后愿意纠正，也就完了。大家都说他当不了老婆的家也是实话，不过甘心接受老婆的落后领导还应该由他自己负责。

上午的会就开到这里。金生表示希望大家分组讨论张永清的讲话，就宣布散会。

大家走出了旗杆院，只留下些负责文化娱乐的人准备下午的演出。

二十六、忌 生 人

十号下午，马有余把大会上的情况报告了糊涂涂，并且向他商量晚上的小组讨论会是不是可以不参加。他们商量的结果是让马有余参加进去看看情况，不要发言。

晚上，马有余到十点来钟散了会回来叫门，叫了很大一会没有人来开。在从前，开门这个差使是菊英的，现在菊英分出去了，不管了。常有理已经睡下了，不想再起来穿衣服；糊涂涂虽然心里有事睡不着，只是上了几岁年纪，半夜三更不想磕磕撞撞出来活动，况且使唤惯了孩子们，也有点懒，只是坐在

炕沿上叫有翼。惹不起是时时刻刻使刁的女人，听见糊涂涂叫有翼，自然就觉得不干己事。有翼本来没有睡，不过这几天正和常有理呕气，故意不出来。

有翼为什么和常有理呕气呢？事情是这样：五号下午，灵芝去找他，他不是才说了个“我舅舅”就被常有理叫走了吗？原来是他姨姨不够在那天上午去找他舅舅给他和小俊说媒，他舅舅和他妈都大包大揽答应了。他才露出了一点不愿意的意思，就被他妈和他舅舅两个人分工——一个骂、一个劝——整了他一大晌，整得他连午饭也没有吃，下午躺在床上头疼得要命。当灵芝去找他的时候，他妈妈一看见是灵芝来了就觉得怕坏事，赶紧跑到他房里把他支使开。从那以后，他只要一动，他妈就跟着他，叫他不得接近灵芝和玉梅。

他要是出面反对，向村里宣布他不赞成这种包办婚姻，问题本来是很容易解决的，可是他不用那种办法——他觉着那样做了，一来他妈妈受不了，二来以后和舅舅、姨姨不好见面，不如只在家庭内部呕几天小气，呕得他妈妈自动取消了这个决定。不过他妈丝毫没有取消这个决定的意思。自他舅舅走后，他妈妈自己一个人担任“骂”与“劝”的两种角色，骂一阵、劝一阵、永远叫他不得安心。

糊涂涂对这事本来不太赞成——他知道小俊跟他那小姨子学得比惹不起还惹不起——只是因为不想得罪老婆和小姨子，所以不发言。

这场气已经呕了五天了，看样子还得呕下去。

糊涂涂叫了几声有翼，见有翼不答应也不出来，只好自己开了北房门走出来，不过有翼听见他一开门，也怕黑天半夜跌

他一交，还是替他出来把大门开了。

糊涂涂把有余叫到北房里问情况，有余说：“不妙得很！满喜和大年都要报名入社，袁丁耒也没有说不愿人，只是说等一等看，从咱们这个互助组看，真正不愿意的只剩咱一户了！”糊涂涂听说满喜和大年这两个劳动力没有希望了，也觉着不妙，不过也没有想出什么挽回的办法。停了一下，他又问起开渠的事，有余说：“更糟！谈到了刀把上那块地，大家都把我包围起来和我说好的，硬要我回来动员我妈！满喜还说：‘只要你能跟老婶婶说通了，我情愿把井边那三亩地换给你们！你们刀把上三亩是六石九斗产量，我井边的三亩是九石产量，还能和你们的地连起来！你想还不合适吗？我就只有那一块好地，不过我不嫌吃亏——只要入了社，社里的好地都是我的！’”糊涂涂问：“村的领导干部谁参加你们的会？”有余说：“只有个团支书魏占奎！”“他听了满喜的话说什么？”

“他说‘那个问题以后再谈吧！’”糊涂涂说：“满喜那‘一阵风’，说话没有什么准头！他要真能把那三亩换给咱，那倒合适！在买水车的时候，他和大年两个人才出了一石米，将来入了社，水车他带不走，咱可以找补他们一石米把那两股买回来。那么一来，地也成咱的了，水车也成咱的了。可是谁能保证满喜那话能算数呢？”有余说：“他这一次的话倒说得很坚决。有人和他开玩笑说：‘要是再退社的时候，难道还能把你的地换回来吗？’他说：‘要打算退的话我就不入！难道才打算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先计划再返回来吗？’我觉着满喜这人得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说话佻皮，另一方面有个愣劲，吃得亏！”糊涂涂听他这么一说，觉着很有道理。

糊涂涂说：“地这么一换也不错，就是劳力成问题！”他

想了一阵又说：“这么着吧：以后不要让有翼当那个民校教员，让他在地里锻炼一年，就是个好劳力！”他又看了常有理一眼，见常有理已经睡着了，便低声向有余说：“我看不要强让有翼娶小俊了！有翼既然跟玉梅有些意思，就让他把玉梅娶过来，不又是个劳动力吗？”有余想了想说：“不行！那是当惯了社员的，她怎么会安心给你在家里种地？弄不巧的话，不止不给你种地，还要连有翼勾引跑了哩！”糊涂涂说：“对！我从前也想到过这一点，现在因为抓不住劳动力，又把我弄糊涂了！这样看来，还是让有翼娶小俊对！这几天我觉着小俊这孩子有点刁，现在看来，刁一点也有好处——可以把有翼拴住一点！”有余说：“不过小俊是和金生闹过分家的，咱家的菊英又给人家摆了个样子，很难保证到咱家来不闹着分家！”糊涂涂说：“这个没关系！你妈是她的姨姨！掌握得了她！我这几天因为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没有带着你妈劝有翼，以后再不要耽搁了！你明天就先到供销社按照你姨姨和你妈讲好价的那些衣料布匹买起来。这么一来，一方面露个风声，把灵芝和玉梅那两个孩子的念头打断，另一方面让有翼知道我已经下了决心，他也就死心塌地了。”有余说：“可是万一有翼真不愿意的话，买了的东西还怎么退呢？”糊涂涂想了想说：“不会！有翼这孩子，碰上一点不顺心的事，有时候也好闹一点小脾气，不过大人真要不听他的，过一两天他也就不说什么了！”

第二天糊涂涂果然打发有余到供销社买了几块粗细衣料和一些头卡、鞋面、手巾、袜子等零碎东西回来。有翼一见这些东西，就知道糊涂涂也已经批准了常有理的主张——因为花钱是要通过老头的。他想再要不积极活动，眼看生米做成熟饭就

无可奈何了。他向糊涂涂说：“爹！你快叫我大哥把那些东西给人家退了吧！那事情我死也不能赞成！我妈不懂现在的新规矩，由她一个人骂也就算了！你为什么要同意她的主张呢？”糊涂涂说：“将就点吧有翼！你妈那性子你还不知道？什么事由不了她，常要气得她打滚。她和你姨姨已经把话展直了，收不回来，再要不由她，要是气得她病倒了，一家不得安生！况且小俊那孩子也不憨、不傻、眉不秃、眼不瞎，又是个亲上加亲，我看也过得去了！好孩子！爹起先也觉得不应该难为你，后来一想到你妈那脾气，还是觉着不要跟她扭吧，真要不听她的话，倘或有个三长两短，爹落个对不起她，你也落个对不起她！好孩子！还是将就点吧！凡事都要从各方面想想！”

有翼听了糊涂涂这番话，当时没有开口，仍旧回到自己那个小黑屋子里去。他觉得他要誓死反对，一定会闹得全家大乱，要是就这样由他们处理，就得丢开自己心上的人。他想：“我早就不信命运了，可是这不正是命运吗？”他想到这里就呜呜哭起来。常有理听见他哭，就跑来劝他说：“孩子！不该！这是喜事，为什么哭？”有翼说：“我哭我的命运！”“这命运也不错呀！”“命运！命运！哈哈哈哈哈……命运呀！哈哈哈哈哈……”常有理见有翼又哭又笑，以为是中了邪。

马家的人，不论谁有点头疼耳热，都以为是中了邪，何况大哭大笑呢？马家的规矩，凡是以为有人中了邪，先要给灶王爷和祖宗牌位烧个香，然后用三张黄表纸在病人身上晃三晃，送到大门外烧了，再把大门头上吊上一块红布条子，不等病人好了，不让生人到院里来。这一次，常有理也给有翼照样做了一遍。

从那天起，别人就不得到马家院去了。

二十七、决心

自从扩社的社员大会开过以后，愿意入社的人就开始报名，灵芝在场上没事的时候，也常到旗杆院帮忙登记新社员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等入社的东西。七八天之后，除了像小反倒袁丁未那些拿不定主意的个别几户以外，要人的都报了名，不愿人的也就决定不报了。

到了十八号这天晚上，灵芝帮着社里的负责人在旗杆院前院东房统计新社员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等，到了快要完了的时候，玉生走进来。社长张乐意问他说：“玉生你找谁？”玉生说：“我谁也不找！我看看你们完了没有！”灵芝知道他在带岗的时候爱在这个房子里研究什么东西，便向他说：“今天又该你带岗呀！你来吧！我们马上就完！”说话间，东房里收拾了工作的摊子，玉生也从西房里拿过他的东西来。

灵芝跟着社里的负责人走出东房，玉生又叫她说：“灵芝灵芝！我还得麻烦你帮我算个账！”他自从借了灵芝的圆规、量角器等等东西之后，常请灵芝帮他计算数目。灵芝在帮他计算时候，发现他的脑筋十分灵活，往往是一点就明，因此也乐意帮他，几天来把数学上边的一些简单道理教会了他好多。这次他把灵芝叫回去，又拿出个图来。这个图像个天平，不过是杠杆的两头不一般长，上边又有轮盘，又有些绳子、滑车等等麻烦。他指着杠杆两边标的尺寸说：“照这样尺寸，一个人能吊起多么重的东西？”灵芝看明白了他是想作个简单的像起重机样子的家伙，便问他说：“你做这个吊什么？”玉生说：“到开渠的时候吊土！”灵芝先把杠杆上那重点、力点、支点和三点

距离的关系给他讲了一下，然后给他去算数目，他说：“我懂得了！让我自己算吧！对不起！这几天麻烦得你太多了！”灵芝说了个“没有什么”便走出来。

灵芝回到家，正碰上她爹妈坐在他们自己住的房子的外间里挽玉蜀黍——每个玉蜀黍穗上留一缕皮，再把每六个或八个挽到一块，准备挂起来让它干——她便也参加了工作。她对她爹这几天的表现很满意。她爹自从打发了赶骡子的小聚之后，因为不想贴草料，已经把骡子提前交到社里由社里喂、社里用，自己也在十号晚上就报名入了社，又把自己搞小买卖剩下的货底照本转给了供销社；自那以后，也不和小聚吵架了，也不摆零货摊子了，也不用东奔西跑借款了，也不用半夜三更算账了……总之：在灵芝认为不顺眼的事都消灭了。灵芝很想对他说：“这不是就像个爹了吗？”可是也不好意思说出口，只是见了他常显出一种满意的微笑，表示对他很拥护。

社里的分配办法搞出头绪来了，新社员报名和给登高治病的事也都告一段落了，灵芝在松了一口气之后，这天晚上便又想起自己本身的事来：

自从马有余到供销社买东西把有翼已经和小俊订婚的风声传出来以后，灵芝听了就非常气愤。她也想到有翼可能不会马上答应，不过也没有听见他公开反对过。她自从那次跟有翼要检讨书被常有理打断以后，再没有见有翼出过门，听团里的同志们说，有翼的检讨一直没有交代，每逢开会去通知他的时候，都被常有理说他有病给顶回来——只说有病又不让人看，近七八天来又装神弄鬼把大门上吊着一块红布，干脆不让任何人到他们院子里去了。根据有翼的历史，她想就算不会马上答应，

最后还是会被他那常有理妈妈压得他投降的。有一次她也想再闯到马家去给有翼打打气免得他投降，可是一来自己工作忙，二来不想去看常有理那副嘴脸，三来觉着要扶持有翼这么一个自己站不起来的人，也很难有成功的把握。不论有翼自己是不是答应了，有翼和小俊订婚的事已经为人所公认。灵芝想：“难道你是没骨头人吗？为什么不出面说句话呢？”可是从历史上好多事实证明有翼就是这么个人，她也只好叹一口气承认事实。她又想：“在团支部的领导下，有这么个团员，因为怕得罪他的妈妈，不愿意给另一个团员作一次公道的证明人，支部已经命令他作一次检讨；可是这次检讨还没有作，就又为了怕得罪他的妈妈，干脆连团的生活也不参加了。那末，我这个团支委，对这位团员该发表一点什么意见呢？见鬼！我为什么要爱这么个人？”她又想到幸而自己先见之明，没有和这个站不起来的人订下什么条约，因此也没有承担什么义务，不过“更满意的在哪里”，还是她很难解决的一个老问题。这时候，她发现她手里挽着的几棒玉蜀黍中间，有一棒上边长着两样颜色的种子——有黄的、有黑的。她想到这就像有翼——个子长得也差不多，可惜不够纯正。她停了工作，拿着这一棒玉蜀黍玩来玩去。登高老婆只当她累了，便说：“灵芝！睡去吧！夜深了，咱们都该睡了！”说罢，自己先停了工，登高也响应老婆的号召站起来伸懒腰，灵芝便拿了那一棒花玉蜀黍回到自己房里去。

灵芝回到自己房子里点上灯，坐在桌子旁边仍然玩着那一棒花玉蜀黍想自己的事，随手把玉蜀黍的种子剥掉了好多。她撇开了有翼，在三里湾再也找不到个可以考虑的人。她的脑子里轻轻地想到了玉生，不过一下子就又否定了——“这小伙子，真

诚、踏实、不自私、聪明、能干、漂亮！只可惜没有文化！”她考虑过玉生，又远处近处考虑别的人，只是想着想着就又落回到玉生名下来，接着有好几次都是这样。她自从一号夜里帮玉生算场碓之后虽然只帮了玉生几次忙，每次又都超不过半个钟头，可是每一次都和拍了电影一样，连一个场面也忘不了。她想：“这是不是已经爱上玉生了呢？”在感情上她不能否认。她觉着“这也太快了！为什么和有翼交往那么长时间，还不如这几个钟头呢？”想到这里，她又把有翼和玉生比较了一下。这一比，玉生把有翼彻底比垮了——她从两个人的思想行动上，觉着玉生时时刻刻注意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有翼时时刻刻注意的是服从封建主义的妈妈。她想：“就打一打玉生的主意吧！”才要打主意，又想到没有文化这一点，接着又由“文化”想到了有翼，最后又想到自己，发现自己对“文化”这一点的看法一向就不正确。她想：“一个有文化的人应该比没文化的人作出更多的事来，可是玉生创造了好多别人作不出来的成绩，有翼这个有文化的又作了点什么呢？不用提有翼，自己又作了些什么呢？况且自己又只上了几年初中，学来的那一点知识还只会练习着玩玩，才教了人家玉生个头儿，人家马上就应用到正事上去了：这究竟证明是谁行谁不行呢？人家要请自己当个文化老师，还不是用不了三年工夫就会把自己这一点点小玩艺儿都学光了吗？再不要小看人家！自己又有多少文化呢？就让自己是个大学毕业生，没有把文化用到正事上，也应该说还比人家玉生差得多！”这么一想，才丢掉了自己过去那点虚骄之气，着实考虑起丢开有翼转向玉生的问题来。她对有翼固然没有承担什么义务，不过历史上的关系总还有一些，在感情上也难免有一点负担。她把刚才剥落在桌上的玉蜀黍子儿抓了一把，用

另一只手拈着，暗自定下个条件：黄的代表玉生，黑的代表有翼，闭上眼睛只拈一颗，拈住谁是谁。第一次拈了个黑的，她想再拈一次；第二次又拈了个黑的，她还想再拈一次；第三次才伸手去拈，她忽然停住说：“这不是无聊吗？这么大的事能开着玩笑决定吗？要真愿意选有翼的话，为什么前两次拈的都不愿算数呢？决定选玉生！不要学‘小反倒’！”

主意已决，她便睡下。为了证明她自己的决定正确，她睡到被子里又把玉生和有翼的家庭也比了一下：玉生家里是能干的爹、慈祥的妈、共产党员的哥哥、任劳任怨的嫂嫂；有翼家里是糊涂涂爹、常有理妈、铁算盘哥哥、惹不起嫂嫂。玉生住的南窑四面八方都是材料、模型、工具，特别是垫过她一下子的板凳、碰过她头的小锯；有翼东南小房是黑古隆冬的窗户、仓、缸、箱、筐。玉生家的院子里，常来往的人是党、团、行政、群众团体的干部、同事，常作的事是谈村社大计、开会、试验；有翼家的院子里，常来往的人是他的能不够姨姨、老牙行舅舅，作的事是关大门、圈黄狗、吊红布、抵抗进步、斗小心眼、虐待媳妇、禁闭孩子……她想：“够了够了！就凭这些附带条件，也应该选定玉生、丢开有翼！”

人碰上了满意的事，也往往睡不好。灵芝在这天夜里又没有睡到天明就醒了。她醒来没有起床，又把夜里想过的心事温习了一遍，觉得完全正确，然后就穿上衣服起来点上灯。她知道玉生这时候，仍是坐在旗杆院东房里的账桌后边画什么东西。她打算去找玉生谈判，又觉着事情发展得总有点太快。她起先想到“和一个人的交往还不到二十天，难道就能决定终身大事吗？”随后又自己回答说：“为什么不能呢？谁也没有规定过

恋爱的最短时间：况且玉生是村里人，又和自己是一个支部的团员，老早就知根知底，也不是光凭这二十天来了解全部情况的。”想到这里，她便鼓足了勇气去找玉生。

她照例通过岗哨走进旗杆院，玉生自然是照例问话，照例拿起枪；她也照例回答，照例走进去。

她的估计大体上正确——玉生仍然坐在那个位置上，不过不是画图而是制造起土工具的模型，桌上摆的是些小刀、木锉、小锤、小凿、钢丝、麻绳、小钉、铁片……和快要制造成功的东西。因为摆的东西多了，玉生把表放在窗台上，灵芝看了看，又是个四点二十分。

玉生不明白灵芝的来意，还当她只是来看表，便指着桌上做的东西说：“你且不要走！请帮我研究一下这个：一切都没有问题，只是吊起土来以后，转动方向不灵便。”灵芝等他拆卸下来，研究了一会减少转盘的摩擦力，又修改了一次装上去，虽然比以前好一点，还是不太合乎要求。玉生忽然想起个办法来说：“干脆不要转盘，把竖杆上边安上个方框子，把杠杆用一段粗绳吊在框子上，在半个圆圈以内转动没有问题！一点摩擦力也没有！试也不要试了！成功了！”灵芝看了看窗台上的表，已经过了五点。她想：“再要不抓紧时间谈那个事，民兵就撤了岗回来了！”

灵芝帮着玉生收拾了桌上的摊子，坐在桌子横头的一把椅子上，看着胜利之后洋洋得意的玉生说：“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觉着我这个人怎么样？”玉生想：“你怎么问了我这么个问题呢？团支委、初中毕业、合作社会计、聪明、能干、漂亮，还有挑剔的吗？不过你为什么要我评议一番呢？你又不会爱

上了我！”玉生只顾考虑这些，忘记了还没有回灵芝的话。灵芝说：“你怎么不说话呀？”玉生一时想不出适当的评语来，只笼统地说：“我觉着你各方面都很好！”灵芝见他的话说得虽然很笼统，可是从眼光里露出佩服自己的态度来，便又紧接着他的话说：“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爱不？”“你是不是和我开玩笑？”“不！一点也不开玩笑！”“我没有敢考虑到这个事！”“为什么不敢？”“因为你是中学毕业生！”灵芝想：“我要不是因为有这个包袱，也早就考虑到你名下了！”她这么一想，先有点暗笑，一不小心就笑出声来。她笑着说：“以前没有考虑过，现在请你考虑一下好不好！”玉生说：“我的老师！只要你不嫌我没有文化，我还有什么考虑的呢？”玉生伸出了双手，灵芝把自己双手递过去让他握住，两个人四个眼睛对着看，都觉着事情发展得有点突然。

二十八、有翼革命

天明撤了岗之后，玉生和灵芝先到后院找张信给他们作个证明人，约定到第二天(二十号、休息日)下午到区公所登记。在吃早饭时候，双方都向自己的家庭说明。村里人知道得早的，也都分头传播着他们订婚的消息。

这一天，社里正收着玉蜀黍，灵芝在场上一方面帮忙翻晒谷种，一方面登记收回来的玉蜀黍担数。这两件事都不是连续的工作，合在一块才是个只能抵五分工的轻劳动。灵芝就在这空隙中，想起了对付有翼的问题。她想到她爹和他们互助组的人这时候都正给黄大年收玉蜀黍，她爹和玉梅又都知道她和玉生订婚的事，很难免在地里谈起来，一到晌午，消息就会传到

有翼耳朵里。她想要是自己不先计划个对付办法，万一有翼一时怀恨，说自己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到那时候，自己或者是任他侮辱，或者是找他讲理，都不是占上风的事。想到这里，接着便想对付的办法。她在县城里上学的时候，常见老师们或别的职员们订了婚就要请朋友们吃糖。她和有翼也吃过人家的。她想趁午饭以前，先到供销社买些糖，按朋友关系把自己和玉生订婚的事通知有翼。她知道不论用什么办法通知，有翼都不会满意，不过自己先主动通知了他，总比他先从别处得到消息气小一点。

快到吃午饭时候，她向在场外翻晒谷草的老社长张乐意说她有点小事要早离开一小会，让张乐意替她记一记在上午收工时候最后上场的一批玉蜀黍担数，就到供销社买了点糖往马家院去。

马家院的大门头上仍然吊着块红布，大黄狗躺在门道下喘气。在接近中午的太阳光下看人很清楚，大黄狗抬起头来只叫了一声，看见是灵芝，就仍旧躺下去。灵芝跨过黄狗，走过门道，转弯便往东南小房去。

有翼一见是灵芝，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低声说：“他们怎么会把你放进来呢？”灵芝说：“我自己进来的！”“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我舅舅……”“不要说那个了！我知道了！你舅舅给你和小俊保了个媒，已经过了礼物了！是不是说那个？”“你听谁说的？”“村里人没有不知道的！”“可是我没有答应！”“不过也没有听说你反对！”“我没有一天不反对！”“这个我还没有听人说过！”“你自然不会听人说！因为我还没有出去过！”“你为什么不出去？”“他们不让我出去！”“他们自然也不会让你不答应！”

“谁到我家里来了！我家忌着生人哩！真不讲究！”常有理

在院里这么喊叫着，打断了有翼和灵芝的话。

灵芝说：“了不得！老大娘来了！咱们赶快说正经的吧！我和玉生订婚了！我来请你吃糖！”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包糖来放在床上。有翼听了这话，好像挨了一颗炸弹，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常有理便揭起门帘走进来。

常有理说：“灵芝！你怎么不吭一声就进来了！我家里忌着生人哩！你就没有看见门上的红布？”灵芝想：这一回你倒来得正好！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她说：“对不起，老大娘！我不懂红布是什么意思！”“挂红布是不让生人进来！有翼病着哩！”“要是那样我就该走了！再见吧有翼！等你病好了我再来看你！”说了便翻身走出去。有翼本想不顾常有理的干涉，冲出门去追赶灵芝；正待动身，又想到“自己已经变成个吃糖的角色了，还追人家有什么用处？”想到这里，便无可奈何地爬到床上放声大哭。常有理不知底细，还以为是灵芝把鬼带进来了。

有翼一边哭，常有理一边摸不着头脑地瞎劝。过了一阵，有翼清醒了一点，停住哭，坐起来想自己的事。他想起灵芝刚才说过的一句话：“他们自然也不会让你不答应！”看这几天的样子，确实不会。他想：“怎么办呢？灵芝已经脱掉了，万一玉梅也趁这几天走了别的路子，难道真要我娶来个小俊每天装死卖活地折磨我吗？”他痛恨他爹妈没有得他的同意就在村里瞎声张，不由得狠狠看了他妈妈一眼。常有理见有翼的眼神不对劲，以为他发了疯，吓得吸了口冷气站起来说：“有翼你要干什么？”有翼也跟着站起来说：“我要出去！”“不行！不行！”常有理伸手去拉有翼，有翼一个箭步躲开她。常有理见没有拉住，便抢到门边，双手把

门挡住。有翼从箱上抱下个装着半筐碎烟叶的筐子来向常有理的身上推。这只筐子的直径和门的宽窄差不多，把常有理堵得不能接近有翼。有翼要是猛一推的话，管保能把常有理推得面朝天跌到门外，不过他还不是真疯了，他只是一步一步推得常有理不得不往外退。常有理退到院里，知道自己挡不住了，便喊糊涂涂说：“他爹你快来！有翼疯了！”糊涂涂听她这么一喊，赶紧跑到院里来。有翼怕被他们拖住走不脱，便抱着筐子转着身一圈一圈地抡，一边抡着一边往大门外走，把大黄狗吓得夹住尾巴远远地跑开。有翼抡着筐子跑到大门外，他爹妈也追到大门外。这时候正赶上村里人陆续从地里往家走，经过马家院门口的都远远站住研究情况，在家里的妇女、小孩们听见有热闹也抢着出来看，渐渐把马家院通向野地的巷道也塞住了。也有些人想拉开他们劝一劝，只是被有翼从筐子里抡得飞出来的碎烟叶子迷得睁不开眼。糊涂涂老汉瞅了个空子，双手夺住筐子的另一边，有翼趁势一丢手把筐子递给他，自己钻进人丛中去。

常有理向大家喊：“请你们拉住他！他疯了！”有几个人把有翼拉住。有翼说：“请你们不要操心！我一点也不疯！是我不赞成他们给我包办的婚姻，他们把我看守起来了！我向大家声明：他们强替我订的婚我不答应！劳驾你们哪一位碰上了小俊，告她说让她另去找她的对象！”拉他的那些人，见他说的都是明白话，都渐渐丢开了手，有翼便挤着往外走。常有理又挤到人丛中去赶有翼，口口声声说“不要放他走”，别的人们劝她说：“老人家，你回去吧！那么大的孩子是关不住的了！”糊涂涂不像常有理觉着那么有理，仍然抱着个筐子呆站着想不出主意来。

调皮的袁小旦喊着说：“有翼革了命了！”

有翼要找玉梅，却不知道玉梅在什么地方，听家里人说这天他们的互助组给黄大年收玉蜀黍，便想往“三十亩”黄大年的玉蜀黍地里去撞一撞。他跑到村外向着上滩三十亩一带看去，见这十几天地里的变化很大——谷子早已收光，玉蜀黍也差不多收了一半，种麦子的地都犁耙得很干净，有的已经下了种，树叶也飞散得七零八落，挡得住眼的东西已经不太多了。他没有顾上多注意别的，眼光顺着往黄大年地里去的一条路上分辨着一连串正往村里走的男女人们，想从中间找出玉梅来，一直望到黄大年的地里，发现他们组里的人都还正在地里赶着装筐子，中间似乎有女人。他也不管玉梅是不是在内，便从那些挑着担子的队伍旁边擦过去往地里走。这些人们随便都问着他“好了吗”，他也随便回答着“好了”，不停步地往前赶。他快走到黄大年的地头上，碰上他大哥和范登高、王满喜挑着担子走到路上来。他大哥一见他就觉着有点不妙，停住步喝他说：“快回去！你怎么出来了？”有翼说：“我没有病！尽是你们弄鬼！”“疯话！快回去！”“你自己走你的！不要想再捉弄我了！”大年夫妇和玉梅见他们闹起来，也停了装筐子工作站住看他们。大路上，后边来的挑着担子的人们，被他们挡得挤在一块，一直催他们“走，走，走”。有余怕有翼再说出真情实话来当着大家丢他的人，所以也不敢认真拦挡，只向大年他们喊了声“请你们把有翼招呼回来”，自己便先挑着担子逃走了。有余、登高、满喜先走了，小反倒这天赶着驴儿上了临河镇，根本没有来，地里只剩下黄大年夫妇和玉梅三个人。黄大年当真放下手里的工作来招呼有翼，有翼说：“你不要信我大哥的鬼话！我什么病也没有！”接着便走进地里去，帮着大年装着筐子，把他爹、他妈、他大哥、老牙行、能不够怎样

把他圈在家里软化他的事有头有尾谈出来。大年他们听见他这番话里一句疯话也没有，便跟着他批评了糊涂涂他们的糊涂。东西收拾完了，大家要回去，有翼向大年夫妇说：“你们先走一步，我还要和玉梅谈几句话！”大年夫妇也猜透了他的心事，便先走了。

有翼瞪着眼盯了玉梅一阵子。玉梅见有翼的眼光有点发滞，觉着有点怕，便问他说：“你怎么样了？刚才不是还说你没有病吗？”有翼说：“我还是没有病！我只问你一句话！说得干脆一点！你愿不愿和我订婚？”玉梅说：“你不是疯话吗？那么大的事，是你一言我一语就可以决定的吗？”“可以决定！你要不愿意也趁早说话！不要蘑菇来蘑菇去也落个空！”玉梅听了他这句话，知道是灵芝和玉生订婚的消息已经传到他耳朵里，惹起了他的忿气。不过玉梅过去因为承认有翼对灵芝比对自己亲近，所以不曾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灵芝既然有了下落，自己可以考虑了，只是就这么站着马上能考虑出个结果来也实在不容易。她见有翼还正生着灵芝的气，气头上很难讲道理，就又向他说：“这么着吧：问题算你提出来了，等我考虑一下定个时期答复你好不好？”有翼说：“不不不！那是推辞话！你跟我认识不止一两天了，要说完全没有想过这问题我不相信！不愿意就干脆说个不愿意，我好另打我的主意！说老实话，不要也来骗我！”玉梅想：“咦！这才是‘黄狗吃了米，逮住黑狗剃尾’哩，别人愿不愿嫁你我碍得着什么事呀？况且你以前也不是真看得起我！要不是灵芝找了别的路子，你会马上考虑这个问题吗？”想罢了便回答他说：“我的先生！我也学你的话：‘我跟你认识不止一两天了’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呢？也说老实的，不要骗我！”这一下打在有翼的弱点

上。有翼自知理亏，不敢强辩。玉梅想趁他在这老实一点的时候，提出些条件来反迫他一下，便又向他说：“你猜对了：我不是‘完全’没有考虑过，不过没有敢决定！”“为什么？”

“因为对你有赞成的地方，也有不赞成的地方！”“什么地方赞成，什么地方不赞成？”“一方面你是我的文化先生，另一方面你还是你妈手里的把戏；我赞成和你在一块学文化，可是不赞成在你妈手下当媳妇——要让那位老人家把我管起来，我当然就变成‘常没理’了。还有你那位惹不起的嫂嫂，菊英因为惹不起她才和她分开了，难道我就愿意找上门去每天和她吵架吗？更重要的是：我是社员，你家不入社，难道我愿意从社会主义道路上返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吗？因为有这么多我不能赞成的地方，所以我不能冒冒失失决定！”有翼听了玉梅这番话，一股冷气从头上冷到脚心。他哭丧着脸说：“那么你就不如说成个‘不愿意’算了！”玉梅说：“不！愿意不愿意，还要看以后各方面事实的变化！”她想：“你这位到外边学过艺的先生，宝葫芦里自然有宝，不过我还要看看你能不能用你的宝来变化一下我所不赞成的事实！”

她给有翼上了这么一课，又给他出了个题目让他去作文章，感到非常胜利，向周围看了一下，一个上滩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了；看到了村边路上，有一位老太太向地里走来，正是常有理。她向有翼说：“你快走吧！你妈又来找你来了！”有翼看了一下回头说：“咱们相跟着走！”“可是你妈……”“我已经不怕她了！”“你还是先走吧！我不愿意和她麻烦！”有翼听她这么说，也只得先走了。

有翼一边走一边想：不愿意受我妈管制，不愿意和惹不起

吵架，不愿意从社里退出，除了分家还有什么办法呢？好！回去分家去！”接着便想如何提出分家的具体办法，想着想着就走到常有理跟前。常有理叽哩咕噜骂着玉梅来拖有翼，有翼闪开她跑在她前边往家里走，常有理自然也追到家里来。

有翼没有回他自己住的房子里，直接往北房来找他爹。这时候，他爹和他大哥正在一块计划对付他的办法。他们估计到灵芝来的时候已经把和玉生订婚的消息告诉了他，所以惹得他生了大气。他大哥把他去找玉梅的事端出来以后，他爹说：“他真不愿意娶小俊，就让他找玉梅算了，不要再逼出什么意外事故来。”他们正商量着，有翼便来了，常有理接着也追回来了。常有理指着有翼的鼻子说：“千说不改，万说不改！只记得你那些小妈……”糊涂涂拦住她说：“你不嫌俗气！尽说这些干吗？”又转向有翼说：“有翼！一切都由你，你不要闹好不好？”有翼说：“爹！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管保再不闹！”“你说吧！”“把分单给了我，我自己过日子去！”糊涂涂想：“这小子真是‘茶馆里不要了的伙计——哪一壶不开你偏要提哪一壶’！我费尽一切心机来对付你，都为的是怕你要分家，你怎么就偏提出这个来？可是说什么好呢？刚刚说过一切都由你，你才提了一件就马上驳回，能保住你不再闹吗？”他觉着要是马上驳回，惹得他马上再跑出去闹，还不如暂且用别的话支吾开，等他平平气再和他谈判，便向他说：“分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何必这么着急？”“好！那么就把分单给我吧！我拿住了分单就不着急了！”“你还是不要着急！分单要在手边的话，爹马上就会给你，可惜是登高那天拿走了就没有拿回来！你先去吃饭！吃了饭回房里去歇歇！咱们都睡他一觉起来

再谈好不好？”“好吧！”有翼说了这么一句便走出去。糊涂涂见有翼走出去，低声向常有理说：“你再不要那么骂他好不好？越逼越远！”有余说：“这会算过去了，一会他要认真和咱们谈分家，该怎么办呢？”糊涂涂说：“不好办！这该怨你舅舅：他要不提那几张废了的假分单，咱们只给菊英写一张来就好说一些。如今已经把那分单说成真的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一会你不要等他睡醒就跑到他房里去劝他。你就说我很生气。你就说我嫌他没有良心，为了媳妇忘了爹娘。你就说他真要分出去，这一辈子我再不理他。”有余答应了，然后就说：“咱们也吃饭吧！”

他们去吃饭，见锅还盖着，锅里还没有下勺子。常有理问惹不起说：“有翼还没有来舀饭吗？”惹不起告她说没有，她便又跑往东南小房里去。她一看有翼也不在房子里，便唧唧喳喳嚷着说：“有翼怎么不在家里？有翼！有翼！饭也不吃又往哪里去了呢？”糊涂涂一听便向有余说：“糟了！他会去找范登高要分单去！你快到登高家看看！”有余连饭也没有舀上，只好往登高家里跑。

有翼跑到登高家去要分单，登高说他给了张永清；有翼又找到永清家，永清领着他到旗杆院拿去。永清和有翼走到旗杆院前院北房里，取出钥匙开了套间门，进去又开了办公桌子抽斗上的锁，取出两张分单来，看了看，把有翼的一张给了有翼，把另一张又放回去。有翼问：“那一张呢？”永清说：“你拿你的好了！那一张是你大哥的！”“怎么没有我二哥的？”“别人拿着研究去，还没有拿回来！”说着便把抽斗又锁上。他们正要出门，有余便走进来。有余走的路线也和有翼一样——先到登高家、再到永清家、最后到这里。有余问有翼：“你到这里

做什么？”“取分单！”“取上了没有？”“取上了！”有余听说取上了，马上想不出别的办法来，只好跟着他们往外走。他们走到院里，碰上个送信的，把村里、社里的一些报纸、公文、信件都给了永清，另外拿着一封信问永清说：“这位马多寿住在哪一块？”永清拿住看着向有余说：“湖南来的！一定是你二弟的信！”又向送信的说：“多寿就是他爹！就交给他好了！”永清又返回套间里去看他接到的东西，有余拿了信便和有翼相跟着回了家。

有翼得住了宝，舀上饭回他自己房子里吃去，有余打了败仗，回北房和他爹妈报告结果。糊涂涂听完了有余的报告，先让常有理去劝有翼、讨分单，然后让有余给他拆读老二的来信。

常有理向有翼软说硬说要分单，有翼已经有了主意根本不理她。她要搜有翼的身，有翼跑到院里。她正得不了手，一圈一圈在院里赶着有翼跑，有余揭开北房的门帘喊她说：“妈！你快不要追他了！老二来了信！又出下大事了！”

二十九、天成革命

灵芝订婚和有翼革命两件事在午饭前后已经传遍了全村。听到了这两条消息不得不关心的是袁天成家。

天成老汉这天午上，正和他的十三岁孩子在场上打他的最泄气的三亩晚熟谷子。说起这三亩谷子来真惹他生气：担了个“两大份”的声名，自留地留得多了，抢种时候一个人忙不过来，种这三亩谷子的时候，地就有点干了，勉强种上，出来的苗儿还不到三分之一，下了第二场雨又种了一次，也没有把前一次的苗儿完全闯死，大的大、小的小乱留了一地，到了秋

天，大的早熟了，已经被麻雀吃完了，小的还青，直到别人收玉蜀黍的时候才割回来，估计产量要减少一半。他正在场上挽着驴缰绳一边碾着一边叹气，听见别的场上正打着豆子的人们传说着玉生和灵芝订婚的事，传说着有翼不愿和小俊订婚的事，更叫他气上加气。他恨能不够——恨她不该出主意留那么多自留地，恨她不参加劳动让自己一个人当老牛，恨她挑拨小俊和玉生离婚，恨她和常有理包办儿女婚姻最后弄得大家丢人。他一边恨着能不够，一边已经把谷子碾下来，没有人帮忙的问题又摆在他跟前。孩子卸着牲口，他眼望着天想人，想了一阵便向孩子说：“你送了牲口到满喜家去一趟。你就说‘满喜哥！我爹说你要有工夫的话，请你帮他打一打场好不好？’不论他答应不答应，你都快一点回来——要不不行我好另想别人。”

孩子去后，天成老汉一个人用杈子挑着泄气的带秆谷草，等候着孩子请人的消息。一会，幸而满喜扛着一柄桑杈跟着孩子来帮忙。

他们挑上草，攒起堆来正要扬的时候，能不够唧唧喳喳跑到场上来。能不够夺住袁天成手里的木杈说：“放下！你先给我说说你为什么败坏我的名声？”袁天成说：“我又犯了罪了吗？”

灵芝、玉生和有翼的两条新闻在场上传着的时候，同样也在街道上传着。能不够听说有翼把她和常有理给包下的婚姻推翻了，急得她像热锅上的蚂蚁，想去找常有理又怕挨有翼的碰，里一趟外一趟干跑没办法。她走到街道上，大小人见了她都要特别看她一眼，正谈得热闹的人一看见她就都把话收住，弄得她既不得打听，又不便去打听，只好关住大门听门外传来一言半语的没头没尾评论——“……能不够这一下可摔得不轻……”

“……灵芝都看得起玉生，小俊看不起……” “……小俊的眼圈子大……” “……一头抹了，一头脱了——玉生也另有对象了，有翼也不要她了……” “……就不该先受人家的礼物！看她怎么退……” “……天成老汉在大会上说得对，事情都坏在不够身上……” —— 能不能够听到每一条评论，都想马上出来和评论的人对骂一场，不过她知道自己没理，跟谁骂也骂不赢，所以只好都想一想算拉倒，只有听到最后的一条觉着抓住了胜利的机会——天成是自己骂熟了的，骂他一顿就可以把所有的气都出了。本来这一条也不是最后的，只是再以后的她没有听，只听到这里便壮着胆子冲出了大门。至于这位评论家说袁天成在大会上怎样怎样，还指的是十号那一天袁天成在大会上作的检讨——这事在三里湾虽然早为人所共知，可是谁见了能不能够也没有谈过，所以在能不能够听起来还是新闻。

能不能够跑到场上夺住袁天成手里的木楸，问他为什么败坏自己的名声，问得袁天成莫名其妙。要在平日，袁天成只好低下头不吭声，让她一个人骂得没有劲了自动走开，然后再继续做自己的活，不过这一次恰碰上天成老汉也闷着一肚子气，所以冷冷地反问她一句：“我又犯了什么罪了吗？” 能不能够说：

“你还要问我？你做的事你知道！快给我说！” 天成老汉夺过木楸来推她说：“走开走开！我真要犯了罪，你先到法院去告我！不要来这里麻烦！我心里够烦的了！” 能不能够想：“咦！这老头儿今天怎么大模大样和我顶起嘴来了？这还了得？” 她第二次又夺住木楸把子说：“嫌麻烦你就不要败坏别人的名声！我也找不着法院！我就非叫你说清楚不行！” 袁天成把木楸让给她：“给你！我早就不想做了！我这个老长工也当到头了！” 满喜劝他们说：“算了算了！婶婶回去吧！闲话是闲了时候

说的，现在先做活！”袁天成说：“不行！满喜你也请回去歇歇吧！活儿我不做了！三颗粮食，收不收有什么关系？”能不能说：“活该！谁不叫你多打些？把地种荒了也是我的事？收不收我不管！只要你饿不着我娘儿们，哪怕你把它一齐扔了哩！”袁天成说：“你做错梦了！我的长工当到头了！这几天也有分家的，也有离婚的，咱们也去凑个热闹！我看你以后饿了肚找谁去？”说着连头也不回出了场望着旗杆院走去。能不能说：“不论你想干什么，都得先把我娘儿们安插个地方！”说着也随后赶去。袁天成回头看了看说：“就是给你找地方去的！你来了也好，省得一会派人叫你！”

袁天成敢和能不能这样说话，在三里湾还是新闻，在场上做活的人们，都停了工就地站着看他们，可是没有一个人跑去劝架，想都让能不能去受一次训。

满喜就在他们场上帮忙，觉着不去劝一下太不好看，只得假意随后赶去。

调皮的袁小旦又说：“天成老汉也革了命了。”

袁天成走得快，能不能追得快，满喜在后边喊得快。满喜喊：“快回来吧！不要闹了！老两口子吵个嘴算不了什么！……”不过腿上不加劲，故意装作赶不上。他看到袁天成进了旗杆院，准备等能不能也进去的时候背地里给她鼓两下掌，可惜能不能没有走到旗杆院门口，就坐到路旁边的一块石头上了。满喜想：“你怎么不加油呢？”

能不能闹气有锻炼：你不要看她有时候好像已经不顾生死了，实际上她的头脑还很清楚，能考虑到当前的形势是否对自己有利。这次她一方面追着袁天成，一方面想到以下的几个条

件：第一、自己的名声自己知道。第二、有翼的革命又给自己的脸上涂了一层石灰。第三、和老天成说话的理论根据，拿到旗杆院去站不住。她想到了这些条件，早已想退兵了，可是老天成不退，由不了她。她一路上回头偷看了满喜好几次，见满喜只嚷嚷不快跑，暗骂满喜不热心。她见老天成进了旗杆院，觉着大势已去，只剩下一线希望就是自己不要进去让满喜追进去把老天成劝回来，所以才坐到路旁的石头上。满喜这个调皮鬼似乎猜透了能不够的心事。他不再去追袁天成，却反拉住能不够的胳膊说：“婶婶！拉倒吧！回去吧！叔叔是个老实人，不要再跟他闹了！”拉住了被告让原告去告状，和抱住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放手打是一个样，能不够越觉着不妙了。她恨透了满喜，可是在眼前看来还只能依靠这位自己觉得不太可靠的人帮帮忙。她向满喜说了老实的了。她低声说：“你不用拉我，先到旗杆院拉你叔叔去！”满喜笑着丢了手，往旗杆院去。

袁天成走进旗杆院前院，见北房闭着门，里边却有人说话。他推门进去，看见党、团支委，正、副社长全都在场。金生见他来势很猛，问他什么事，他说：“我要和能不够离婚！请调解委员会给我写个证明信！”金生笑了笑说：“好吧！待一会让永清叔给你们调解调解！你且回去吧！现在这里正开着个很重要的会议！等这里完了再说吧！”“不能分出个人来吗？”

“不能！这次会议太重要了！”袁天成听金生这么说，也只好走出来。他返到院里，正碰上满喜走进去。

满喜说：“叔叔！不要闹了！婶婶说她愿意拉倒！”袁天成说：“不行！她愿意也不行了！这次总得弄个彻底！等这里的会开完了，马上就要谈我们的事！”说着就往外走。

满喜总算个好心肠的人。他平常不赞成能不够，只想让她

吃点亏，这次能不够自动让步了，他就又诚心诚意帮着她了事。他跟在袁天成后边劝袁天成私下了一了拉倒，不要再到调解委员会去。他们一出旗杆院大门，能不够看见他们就放了心，没有等他们走到跟前自己便息了旗鼓低着头走回家去。满喜劝天成丢过手仍然去打场，天成说：“不不不！你请回去吧！场不打了！这次要拉倒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说着也往自己家里走。满喜见劝不下他，也跟着他到他家里去。

小俊自从她妈走出去之后，对外边传来的消息也放心不下，也学了她妈的办法关起大门来躲在门里听流言，直到她妈回来叫门她才把门开开。门开了，满喜和天成也正赶到。

满喜看见小俊的眼圈子有点红，顺便问了一声“二嫂你怎么……”，不过话一出口就想到叫得不对，同时发现小俊的脸一下子就红到脖子根，才赶紧改口说：“对不起，我怎么又乱叫起来了！”小俊没有回话，低下头去。满喜不好意思再看她的神色，似乎看见滴下几点泪去。

能不够什么也没有说，走进去了。袁天成什么也没有说，也走进去了。满喜再没有说什么，也走进去了。小俊觉着奇怪：“爹不是打场去了吗？怎么空手回来了？妈向来是不参加打场的，怎么跟爹相跟着回来？要说他们吵过架吧，妈的脸上怎么没有一点杀气？满喜一脸正经的样子跟着他们，又是来干什么？”她正东猜西猜摸不着头脑，恰好碰上她十三岁的弟弟也揉着眼睛赶回来。她拉住弟弟问了半天，才大体问明了她爹妈在场上发生的事故——至于到旗杆院去的一段，连她弟弟也不清楚了。

问明了这段情况，她拉着弟弟哭起来。她妈出去以后，她

躲在门里听到的评论，大体上和她妈听到的差不多，特别刺到她的痛处的，是“一头抹了、一头脱了”这句话。这是地方上一句俗语，说的人特别多，一小会就听到好几遍。她和玉生离婚以后，想起玉生的时候常有点留恋，只是说不出口来。她每逢出现了这种心情，就觉着她妈的指导不完全正确，自然有时候难免对她妈有点顶撞。她妈觉察到这一点，所以趁她舅舅来给菊英分家的时候就抓紧机会给她包揽有翼这股头。这件事合了她的心事。她想要是能捞到一个中学生，也算对玉生一种报复，不想事情没有弄成，自己要捞的这个中学生没有捞到手，反让玉生捞到个中学生，正好是“一头抹了、一头脱了”。要不声张出去还好，偏是过了礼物又让人家顶回来，弄得她更没法再出面见人。她听弟弟说爹生了大气要和妈离婚。她想真要那样的话，自己和妈妈就会变成一对再也没有人理的人物。她正一边哭着一边想这些事，忽然听得她爹又在里边嚷起来，便拉着弟弟赶紧跑回去。

原来正当小俊在门道下前前后后思想自己的道路时候，袁天成和能不够也正在满喜的监督下开始了谈判。满喜让双方提出今后的条件来作为讨价还价的根据，能不够便先提出今后不得再在外边败坏她的名声。她才提了这么一条，袁天成就恼火了。袁天成说：“你还要提你那好名声？是我败坏了你的名声？我的名声早被你败坏得提不得了，我找谁去？你要是什么洋理也不要抓，老老实实检讨你的错误，咱们就谈，再要胡扯，咱们就散！”能不够怕的就是这个“散”字。天成提到这个字，她就又老实了一点。她说：“这么着吧：你说我说得不对，你先说好不好？”天成说：“我就先说：听上你的鬼主意，留下那么多的地，通年只在社里做了五十个工，家里的地

也种荒了，叫我受了累、减了产，还背上个‘资本主义思想’的牌子。你说我冤不冤？你不参加劳动，也不让小俊参加劳动，把我一个人当成老牛，忙不过来的时候去央告人家别人帮忙。你也睁开你那瞎眼到地里、场里去看看！看人家别的妇女们谁像你们母女俩？妇女开会、学习你都不参加，也不让小俊参加，成天把小俊窝在你的炕沿上，教她一些人人唾骂的搅家婆小本事。人家玉生是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你偏挑得小俊跟人家离了婚！人家又和灵芝订婚了，你教的这个好徒弟结了个什么茧？”这一下又刺到小俊的痛处，说得她顾不得怕满喜笑话，就哭出声来。天成接着说：“你鼻子、嘴都不跟我通一通风，和你那常有理姐姐，用三十年前的老臭办法给孩子们包揽亲事，如今话也展直了，礼物也过了，风声也传出去了，可是人家有翼顶回来了，我看你把你的老脸钻到哪个老鼠窟窿去？”能不够说：“我的爹！你少说几句好不好？对着人家满喜尽说这些事干吗呀？”天成说：“你还嫌臊吗？‘要得人不知，除非己不为’！满喜要比你我都知道得早！”满喜说：“算了算了！话说知了算拉倒！从前错了，以后往对处来！咱们大家休息休息，还是去收拾场里的谷子吧！”天成说：“不行！还不到位！”能不够说：“你不论说什么都由你一个人说，我一句也没有打你的岔，难道还不到位吗？我的爹！怎么样才能算到底呢？”天成说：“怎么样？听我的：明年按社章留自留地，把多余的地人到社里去；你和小俊两个人当下就跟我参加劳动，先叫你们来个‘劳动改造’，以后学人家别的妇女们参加到社里做工去！要你们参加开会、参加学文化，慢慢都学得当个‘人’，再不许锻炼那一套吵架、骂人、搅家、呕气的鬼本领！你听明白了没有？一条一条都照我说的这样来，咱们才能算到

底；哪一条不答应，都得趁早散伙！”能不够想：“咦！这老头儿真的是当过老干部的，说出来的话一点空儿也不露！我摸典了他多半辈子，想不到今天他会反扑我这么一下！要是完全听他的，以前的威风扫地，以后就再不得为王；要是再跟他闹翻了吧，看样子他已经动了老火，下了决心，说不定真敢和我离婚、分家……”她正考虑着利、害、得、失，调解委员会就打发人来叫他们来了。

来叫他们的人说刚才的重要会议已经结束，调解委员们留在旗杆院准备给他们调解这场争执。满喜对来的人说：“你回去请委员们散了吧！就说他们自己已经调解了！”天成说：“请你等一等！”又向能不够说：“你说句清楚的！我说的那些你要是都答应，咱们就打发人家回去；要是还想打折扣的话，咱们趁早都往旗杆院去！”能不够想：“我真不该到场里去找你这一趟呀！”她说：“好吧！我都听你的就是了！”“找你的保人！”“自己家里个事怎么还要保人呀？”“不搁上个外人，过不了一夜你就又忘了！”能不够看了看满喜说：“满喜你保住我吧！”给他们和解，满喜倒还热心；要让他当保人的话，他便有点踌躇——他知道能不够的话，不是说一句抵一句的。小俊说：“满喜！你行点好！说句话吧！”天成看了能不够一眼说：“看你那牌子怎么样？”又向满喜说：“满喜你只管答应她！不要怕！我不是真要谁保她不后犯，只要中间有个人能证明今天我跟她说过些什么就行了。有这样一个人作个证明，一日她不照我的话来，我跟她散伙就成了现成的事！你明白吗？”满喜说：“好！婶婶我保你！”

天成向叫他们的那个人说：“你回去请委员们散了吧！就说满喜给我们调解了！”

满喜说：“起晌了（即睡午觉时间过去了），我还要给大年收玉蜀黍去。”

三十、变糊涂为光荣

灵芝和玉生订过婚，有翼和天成革了命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号）又是个休息日，上午又是在旗杆院前院搭起台开大会。

早饭以后，大家正陆续往旗杆院走的时候，干部们照例在北房里作开会的准备。

这天负责布置会场的是灵芝。灵芝参加这次布置工作的心情和以前不同——因为休息日是社里的制度，社外人只是自由参加，上次她还是社里用玉梅换来帮忙的工，这次她爹已经入了社，她又和玉生订了婚，娘家婆家都成了社里的人，她便感觉到她是主人，别人也觉得她不止是会计，而且是社里的秘书。

台后的布幕中间，并排挂着一张画和一张表——画还是老梁的三张画中的第二张，准备讲到开渠问题说明地点时候用；表是说明近十天来扩社成绩的，是灵芝制的，为了让远处也看得见，只写了几行大字，说明户口、土地、牲畜等和原来的比较数字。

先到的人们，一方面等着别人，一方面个别地念着“……原五十户、增七十一户、共一百二十一户……原七百二十亩、增一千二百一十五亩、共一千九百三十五亩……原五十八头、增……”

一会，人到得差不多了。有人问灵芝说：“怎么还不开会？”灵芝告他们说因为魏占奎到县里去取个重要的东西还没有回来。灵芝问八音会的人都来了没有，有人告她说只缺个打鼓

的。打鼓的就是外号叫“使不得”的王申老汉。灵芝又问王申的孩子接喜，接喜说：“他身上有点不得劲，不会来了。”另外有知道情况的人说：“有什么不得劲？还是思想上的毛病！”灵芝说：“思想上没有什么吧？他已经报名入社了！”又有人说：“就是因为那个才有了毛病！”灵芝把他们的话反映给在北房里开会的干部们，金生和张永清都忙着跑到台上来问，才问明了毛病出在张永清身上。

原来十号以后，参加在沟口那个小组里讨论扩社问题的干部是张永清。有个晚上，王申老汉说他不愿意和大家搅在一块做活，张永清说：“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毛主席的号召。要是不响应这个号召，就是想走蒋介石路线。”到了报名时候，王申老汉还是报了，不过报过以后又向别人说：“我报名是我的自愿，你们可不要以为我的思想是张永清给打通了的！全社的人要都是他的话，我死也不入！我就要看他怎么把我和蒋介石那个忘八蛋拉在一起！”

问明情况之后，金生埋怨张永清说：“你怎么又拿大炮崩起人来了？是光崩着了这位老人家呀，还是也崩着别人了？”没有等他回答，沟口那些人：“没有崩着别人，因为别人表明态度在前！”张永清说：“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得罪了人家还是我自己请他去！”说着就要下台。金生说：“你不要去了！咱们还有要紧事要谈！我替你找个人去，等请来了你给老汉赔个情！”他向台下问：“我爹来了没有？”宝全老汉从团在一块吸烟的几个老汉中间站起来说：“来了！”金生便要求他替张永清去请王申老汉去，别人也都说他去了管保请得来。宝全老汉去了。

金生和永清正要返回去，有翼站起来说：“现在还能不能

报名入社呢？”金生说：“当然可以！你们家也愿意入了吗？”

“不！光我入！我就要和家里分开了！”金生看见有余也在场，就问有余说：“有余！怎么样？你们已经决定要分了吗？”有余无可奈何地看了有翼一眼说：“唉！分就分吧！到了这种出事的时候了！”金生说：“你们分家的事我不太了解，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社里的规矩：在每年春耕以前，不论谁想加入，社是不关门的！”

小反倒袁丁未站起来说：“我也要报名！我的思想也打通了！”金生也说可以，满喜喊了一声“不要！”金生向满喜说：“应该说欢迎，怎么说不要呢！”满喜说：“他昨天把他的驴卖了！”永清说：“那自然不行了！”金生说：“本来到银行贷款买牲口也跟把你的牲口给你作价出息一样，只是你既然这样做，就证明你不信任社。要收一个不信任社的社员，对社说来是起不好作用的！迟一迟等你的思想真正打通了再说吧！”有人说：“迟迟也不行！想入社他再买回个驴来！”又有人说：“把驴价缴出来也行！”小反倒说：“把驴价缴出来也可以！一百万块钱原封未动一个也没有花！”范登高说：“一百万？闭住眼睛也卖它一百五十万！”小反倒说：“不不不！真是一百万！税款收据还在我身上！”满喜说：“你就白送人吧还怕没有人要？”登高问：“卖给谁了？”小反倒说：“买主我也认不得！有余他舅舅给找的主！”有人说：“老牙行又该过一过年了！”金生说：“这样吧：你的思想要是真通了，卖了一百万就缴一百万也行！反正缴多少就给你按多少出利！”小反倒两眼瞪着天不说话了。满喜又问他说：“想什么？五十万块钱只当放了花炮了！要入社，少得上五十万本钱的利息；要不入，再贴上五十万还买不回那么一个驴来？”别的人都乱说：

“放花炮还能听听、看看”，“要卖给我我出一百六十万”，“小反倒不会再去反倒一下”……

大家正嚷嚷着，魏占奎回来了。张永清先问魏占奎：“领来了没有？”魏占奎说：“领来了！”金生又向小反倒说：“入社的事你考虑考虑再说吧！不忙！离春耕还远哩！”说了就和张永清、魏占奎相跟着往幕后边走。金生说：“就叫有余来吧！”张永清说：“可以！”金生回头把马有余也叫进去。

马上开不了会，大家等着无聊，青年人们便拿起八音会的锣鼓打起来。打鼓的老王申还没有来，吹喇叭的张永清只顾得和别的干部们商量事情，短这么两个主要把式，乐器便奏不好，好多人换来换去，差不多一样乱。

正吹打着，马有余从幕后出来了。他低着头，脚步很慢，跳下台来不找自己的坐位，一直往大门外去。有人问：“你怎么走了？”他说：“我有事！回去一趟。”

女副社长秦小凤，手里拿着个红绸卷儿，指着北房间灵芝说：“他们都在里边吗？”灵芝点点头，她上了台进幕后去了。她拿的是刚刚做好的一面旗子，拿到北房里展开了让大家都看活儿做得整齐不整齐。不协调的锣鼓在外边咚咚当当乱响，大家说讨厌，张永清说：“这算好的！这鼓是接喜打着的，他比他爹自然差得远，不过还不太使不得。”他正评论着接喜的手法，忽然听得鼓点儿变了样。他高兴得说：“王申来了！我先给人家赔情去！”说着便跑出去。金生说：“咱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出去开会去吧！”

开会了。第一项是金生的讲话。他先简单报告了一下扩社的情况，然后提出个国庆节前后的工作计划草案。他代表支部建议

把九月三十号的休息日移到十月一号国庆节，建议在国庆节以前这十天内，一方面社内社外都抓紧时间把秋收、秋耕搞完，另一方面把开渠的准备工作做完；在国庆节以后、地冻之前，一方面社内社外抓紧时间开渠，另一方面在社内评定新社员入社的土地产量、作出新社员入社牲畜农具的价钱，定好明年的具体生产计划。接着他又把支部对这些工作想到的详细办法谈了一下。他说：“这是我们党支部提出的一些建议，希望大家补充、修正一下，作为我们这十天的工作计划。”

他讲完了，大家热烈地鼓掌拥护。不常来的老头们也都互相交头接耳举着大拇指头说：“有学问！”“不简单！”……

第二项是选举开渠的负责人。金生提出个候选名单草案来让大家研究。他说：“我们开渠的筹委会建议把这条总渠分成五段动工。”接着便指着画面上的地段说：“龙脖上前后，包括刀把上在内算一段。三十亩到村边算一段。黄沙沟口左右算一段。下滩靠山根分成南北两段。为了说着方便，咱们就叫刀把上段、三十亩段、沟口段、山根一段、山根二段。刀把上段短一点，因为要挖得深。山根二段也短一点，因为要把渠床垫高。除此以外还有两处特别工程：一处是龙脖上的石头窟窿，一处是黄沙沟的桥梁。这两处要用匠工，所以不算在各段内。”接着就念出正副总指挥、总务、会计、五段和两处正副主任的名单，其中总指挥是张乐意、副总指挥是王玉生、总务是王满喜、会计是马有翼、石窟主任是王宝全、桥梁主任是王申。大家听了，觉着这些角色都配备得得当。有人提出金生自己也应参加指挥部，金生说到那时候还有社里评产量、订计划那一摊子，所以自己不能参加。念完名单接着就发票选举。

在投票之后开票之前，马有余领着马多寿来了。这老头从

来不参加会议，他一来，会场人的眼光都向着他，查票的人也停了工作看着他走到台下来。有爱和他开玩笑的老头说：“糊涂涂你不是走迷了吧？”金生向大家说：“欢迎欢迎！把老人家招呼到前边来坐！”大家给他让开了路，又在前排给他让出个座来。

马多寿还没有坐下去先向金生说：“我这个顽固老头儿的思想也打通了！我也要报名入社！”还没有等金生答话，全场的掌声就响成一片。和他开玩笑的那个老头站起来朝天看了看说：“今天的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出来的？”另一个老头站起来说：“不要开玩笑了！我们大家应该诚心诚意地欢迎人家！”大家又鼓了一番掌。这个老头接着又说：“人家既然入了社，和咱们走一条路，我建议以后再不要叫人家‘糊涂涂’！”大家喊：“赞成！”金生说：“这个建议很好！咱们应该认真接受！”马多寿想：“也值得！总算把这顶糊涂帽子去了！”

监票人查完了票，宣布了选举结果——原来提出的人完全当选。大家自然又来了一番鼓掌。

金生说：“最后一项是宣布一件喜事！有翼他二哥马有福，把他分到的十三亩地捐给咱们社里了！刀把上的三亩也在内！”全场的掌声又响起来。好多人觉着奇怪，互相问是怎么回事。金生在台上接着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在菊英分家的时候，有人见马家刀把上那块地写在有福的分单上。社干部们商量了一下，给有福写了这么一封信。”说着取出一叠纸来，在中间挑出那信稿念：“‘有福同志：我们社里，要和全村散户合伙开水渠，渠要经过你们刀把上的三亩地，你们家里把这块地在十年前就分在你名下了。有人说这分单是假的，我们看来不假，现在附在信里寄给你看看！我们向你提出个要求，

请你把这块地让出来。你愿意要地，村里给你换好地；你愿意得价，村里给你作价汇款；你愿意得租，村里就租用你的。这三种办法，请你选择一下，回我们一封信。为了咱村的生产建设，我们想你一定是会答应我们的！敬礼！三里湾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到了昨天下午，接到有福的回信。我也念一念，‘正副社长并转全体社员、全村乡亲们：你们集体生产建设，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很高兴。我现在是县委会互助合作办公室主任，每天研究的尽是这些事，请你们多多告诉我一些模范先进经验。分单字还是我表伯父写的，不会是假。我现在是革命干部，是机关工作者。这工作是我的终身事业，再也没有回三里湾种地去的机会。现在我把我分到的土地全部捐到咱村的社里，原分单也附还，请凭分单到县里领取土地证。至于分单上的房屋，一同送给我的兄弟们重新分配——因为他们的房子不多。我已经另给我父亲写信说明此事，请你们和他取得联系。你们接受之后，请来信告我。敬礼！马有福。九月十三日。’念完这封信，大家又鼓了一次掌。金生又取起一张纸来说：“这是派魏占奎到县里领来的土地证！”掌声又响起来。

原来头天上午有余接到的那封信，也是说这事；党团支委和正副社长开的紧急会议也是讨论这事。

在紧急会议时候，金生主张当下就去和马家联系，可是大家主张先领回土地证来再联系。大家是怕马家节外生枝，金生虽然觉着那样作有点不大正派，但不是什么大的原则问题，也没有再争论。

马多寿接到信后，也和有余商量了一个下午，结果他们打算等社里打发人来说的时候，再让有余他妈出面拒绝。到了这

天开会之前，魏占奎拿回土地证来，干部才把有余叫进去，向他说明经过，并且说准备给他们送旗，叫他回去动员马多寿来参加会议。

马有余回去一说，马多寿觉着再没了办法。常有理说：“不要他们的旗！送来了给他们撕了！”马多寿说：“算了算了！那样一来，土地也没有了，光荣也没有了！”

马多寿又让有余算了算账：要是入社的话，自己的养老地连有余的一份地，一共二十九亩，平均按两石产量计算，土地分红可得二十二石四斗；他和有余算一个半劳力，做三百个工，可得四十五石，共可得六十七石四斗。要是不入社的话，一共也不过收上五十八石粮，比入社要少得九石四斗；要是因为入社的关系能叫有翼不坚持分家，收入的粮食就更要多了。马多寿说：“要光荣就更光荣些！入社！”

马多寿决定了入社，就到会场上来。

让大家看过土地证，金生接着说：“干部捐了土地，他的家属是很光荣的——现在老汉又要报名入社，更是光荣上加光荣了。我们一夜工夫赶着做了一杆光荣旗，现在咱们打着锣鼓到马家送一送好不好？”大家鼓掌赞成。王申老汉又拿起他的鼓槌，张永清从台上跳下来拿起喇叭，别人也都各自拿起自己吹打的乐器，吹打起来，秦小凤打着红绸旗走在前面，大家离了旗杆院往马家院来。马家的大黄狗被乐队的大声镇压得躲到北房的床下去。

马家也临时在供销社买了一些酒，炒了几盘菜，举行了接待的仪式。

在互相应酬的中间，张永清向多寿老婆说：“老嫂子！从

前我得罪了你，今天吹着喇叭来给你赔个情。你在县人民法院告我的状子，法院里又要我们的村调解委员会再调解一下，假如调解不了，他们再受理。我想过一两天再请你老嫂子谈谈！”多寿老婆说：“拉倒！还有什么要谈的呢？”

三十一、还是分开好

二十一号晚上，秦小凤召开了一次村妇联的全体大会，动员妇女尽可能参加开渠工作，会后向金生去汇报。

这时候，孩子们都睡了，玉梅帮着她大嫂给大胜做棉衣，金生也才开过统计男劳力的会议回去。

金生问小凤动员的结果，小凤说：“要是把看小孩和做饭的两个问题能解决了，可以动员到八十个人参加；解决不了，只能参加四十二个人。看小孩问题谈得有点眉目：有人提议在后院奶奶家和黄大年家成立两个临时托儿所，奶奶和大年老婆也都愿意，另外还动员了几个帮手，看来不成问题。做饭问题，有人提议成立临时食堂，让那些没有人替她们做饭的青年妇女连她们的丈夫，在开渠时候都到食堂买饭吃，不过开食堂就要准备房子、家具、米面、做饭的人，光妇女办不了。”金生说：“这个我明天可以和村里商量一下，也许可以办成。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小凤说：“在这方面没有了。另外还有个奇怪问题，我马上答复不了。”

金生问她什么问题，她说：“根本没有参加过会的多寿老婆、有余媳妇、天成老婆和小俊今天晚上都到了。小俊也报名参加开渠。多寿老婆要求咱们干部们给他们和一和家。你说该怎么答复呢？”金生问：“她是不是还想让菊英回去？”小凤

说：“那个她倒没有提，可是有翼还要往外分哩！”金生说：“他们家入了社了，有翼还要分吗？”小凤说：“就是还要分！”金生媳妇看了看玉梅说：“玉梅！这可是你弄下的麻烦吧？”玉梅说：“我不给他们弄这点麻烦，他们以后可就把我麻烦住了！”金生对有翼从家里冲出来到地里找玉梅的事也知道一点风声，便问：“你们说是什么时候的事？”金生媳妇说：“今天！”金生向玉梅说：“玉梅！你这就不对了！人家已经入社了，你为什么还要提那个条件？”玉梅说：“入社是一回事，家里又是一回事！我斗不了常有理和惹不起！”金生说：“以后再不要叫人家这些外号了！人是会变的，只要走对了路，就会越变越好！”玉梅说：“可是在她们还没有变好以前，我怎么对付她们呢？他们家的规矩是一个人每年发五斤棉花不管穿衣服，我又不会织布，穿衣服先成问题。我吃的饭又多，吃稀的又不能劳动，饭又只能由他们决定，很难保不饿肚。我是个全劳力，犯得着把我生产的东西全缴给他们，再去受他们的老封建管制吗？”金生说：“你知道人家还要照那样老规矩办事吗？”玉梅说：“可是谁能保他们马上会变呢？我还没有到他们家，难道能先去和他们搞这些条件吗？到了他们家他们要不变，不是还得和他们吵架吗？”金生说：“他们要不变，正需要你们这些青年团员们争取、说服他们！难道你们只会吵架吗？”玉梅笑着说：“大哥最会考虑问题，这一次怎么糊涂了呢？”“我什么地方糊涂了？”“你想：菊英分出去了，有翼再分出来，剩下的就只有他爹妈和他大哥大嫂。他大哥和他爹妈是一股劲，他大嫂谁也惹不起，他们还拿那老封建规矩去管制谁去？只要分开家，那套老封建规矩自然就没处用，也不用争取、说服，也不用吵架，自然就没有了。那不比先让他们管制起来然后再争取、说

服省事吗？”小凤说：“我觉得玉梅说得对。前十几天调解委员会主张让菊英分出去，不跟这道理一样吗？菊英自分出去以后，不是果然不受他们的气了吗？他们那些封建老规矩，在菊英身上不是没有用处了吗？”

金生说：“咱们还是从各方面想一想：他们家里现在的情况和菊英分家那几天有个大不相同的地方——那时候，他们不止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反而还想尽办法来阻碍别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他们报名入了社，总算是进了一大步。有翼在这时候还要坚持分家，不是对这种进步表示不信任吗？对马多寿不是个打击吗？”玉梅说：“又不是怕他退社才跟他分家，怎么能算不信任？分开了对他们没有一点坏处，怎么能算打击？咱们社里人们不是谁劳动得多谁享受得多吗？要不分开，我到他们家里，把劳动的果实全给了他们，用一针一线也得请他们批准，那样劳动得还有什么趣味？分开了，各家都在社里劳动，自然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要不分开，给他们留下个封建老窝，让年轻人到了社里走社会主义道路，回到家里受封建管制，难道是合理的吗？”金生说：“照你那样说，这一年来，小俊在咱们家里闹着要分家，反而也成了合理的了——人家也说是犯不上伺候咱们一大家，也是嫌吃饭穿衣都不能随便。”玉梅说：“那怎么能比？咱家都是一样吃、一样穿，没有那些老封建规矩；小俊在咱家又不愿意劳动，又想吃好的穿好的，自然是她的不对了。就是那样，后来还不是你同意她和我二哥分出去了吗？我觉着弟兄们、妯娌们在一块过日子也跟互助组一样，应该是自愿的——有人不自愿了就该分开。”

金生对玉梅的回答很满意。像马家这种家庭，在他们没有人社以前，金生本来是主张“拆”的，可是人家现在报名入社

了，他还没有顾上详细考虑这问题，所以当秦小凤一提出来，他觉着是不分对，可是和玉梅辩论了一番之后，又觉着是分开对了。不过他还顾虑到一个问题，就是怕伤了老一代人的心。他向小凤说：“玉梅说得很有道理。这种大家庭是不能鼓励人的劳动积极性的。不过这样分家的事太多了，会不会让一般老人们伤心呢？孩子们一长到自己能生产了就都闹着分家，剩下不能劳动的老人谁负责呢？”没有等小凤答话，玉梅便说：“这个很不成问题！谁也舍不得把他的爹妈扔了！就像马家，只要分开了，有翼和我两个劳动力，完全养活他们老两口子都可以。只要他们老两口子愿意跟我们过，管保能比他们现在吃的好、穿的好！”金生媳妇没有参加他们的辩论，可是听了玉梅这几句话，便笑着插话说：“那不又和不分一样了吗？”玉梅说：“那可不一样：我们又不是怕他们穿衣吃饭，只是不愿意让他们管制。那样一来，他们便管制不着我们，我们让他们痛快一点还能争取他们进步。”金生媳妇说：“你的弯弯儿可真多！”金生和小凤也暗自佩服玉梅的脑筋。

金生向小凤说：“讨论了半天还是分开对！你明天就误上半天工夫给他们调解一下吧！马多寿老两口子愿意跟哪个孩子过日子，完全可以由他们自己选择。”

三十二、接 线

第二天（二十二号）上午，范登高这个互助组在刀把上给满喜收玉蜀黍，马家因为有小凤给他们去调解家务，没有人来；只有黄大年夫妇、袁丁未、玉梅、范登高和满喜自己——一共六个人。

前边提过：刀把上靠龙脖上的第一块地是马家的，往南紧接着就是袁天成的地。这地方的地势比北边宽了一点，满喜的地在东边的岸边上，和天成的地并排着。这天上午，天成也领着小俊在地里割豆子。

大约十点来钟的时候，宝全老汉、玉生、县委老刘、副区长张信和测量组走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位同志，五个人靠着山根，走过袁天成的地、马家的地，上了龙脖上，去测算石窟要打多么深。

小俊一看见玉生，又引起了自己的后悔，眼光跟着玉生的脚步走，一会就被眼泪挡住了。她偷擦了一把泪，仍然去割豆子，可是豆子好像也跟她作对，特别刺手。黄豆荚上的尖儿是越干、越饱满就越刺手。在头一天他们割的是南半截地的，南半截地势低，豆秆儿长得茂盛，可是成色不饱满，不觉太刺手；今天上午来的时候，因为露水还没有下去，也不大要紧；这时候剩下的这一部分，豆的成色很饱满，露水也晒下去了，手皮软的人，掌握不住手劲的人，就是有点不好办。小俊越不敢使劲握，镰刀在豆秆根节一震动，就越刺得痛，看了看手，已经有好几个小孔流出鲜血来。她看到玉生本来就有点忍不住要哭了，再加上手出了血，所以干脆放下镰刀抱着头哭起来。天成老汉问她为什么哭，她当然不说第一个原因，只说是豆荚刺了手。被豆荚把手刺破，在庄稼人看来是件平常事，手皮有锻炼的人们也很难免有那么一两下子，谁也不会为这事停工。天成老汉见她为这个就哭得那么痛，便数落她说：“那也算什么稀罕事？你当什么东西都是容易吃到的？你只当靠你妈教你那些小本领能过日子？不想干了回去叫你妈来试试！她许比你的本领还大点！……”小俊不还口，只是哭得更响一点。

玉梅向满喜说：“满喜哥你听！我二嫂又和她爹生气了！”满喜说：“还是二嫂？”“可不是！又乱叫起来了！”“我也乱叫过。”“快去给人家调解调解！你还是人家的保人哩！”满喜总算个好心肠的人，真给他们劝解去了。

满喜问明了一半原因说：“劳动也不是一天就能练出工夫来的！不能从割豆子开头！咱们临时换一换手——我替你割一阵子，你去替我劈玉蜀黍！”天成觉着不便让满喜来替自己女儿做这棘手的工作，便说：“不要了！这就快完了！让她慢慢自己来，割一根算一根！我又不逼她！”满喜说：“还是换换吧！她马上干不了这个！”他们商量好了，天成便叫小俊到满喜的地里来。

小俊一到满喜地里，先分析着地里的人以便选择自己工作的地点：拿着镰刀割的是范登高和黄大年，割倒了放在地上还没有劈下来的一共只有三个铺（即三堆），每铺横面坐着一个人——袁丁未、大年老婆、玉梅；袁了未是个中年人，在她说来算长辈，虽说这个长辈也常被青年人奚落，可是自己和人家不太熟惯；玉梅虽然跟自己熟惯，可是自己和玉生离了婚，和玉梅到一处没有说的，又想到万一玉梅要顺口叫声“二嫂”，自己更觉不好看；挑来选去，只好和黄大年老婆对面坐下，共同劈着一铺。大年老婆见她把一双玲珑可爱的眼睛哭得水淋淋的，觉着有点可怜，劝慰她不要着急，慢慢锻炼，又告她说怎样把玉蜀黍的轴根连秆握紧用另一只手把轴一推就下来了。

这时候，玉生站在龙脖上和下边的人拉着一根绳子正比量什么。玉生喊着“左一点”“右一点”，小俊偷偷看了一眼，紧接着滚下了几点泪珠，还没有来得及擦，已被大年老婆看见。大年老婆猜透了她的心事，更觉她可怜。大年老婆想给她介绍

个对象，一边劈着玉蜀黍，一边数算着村子里未订婚的青年男子，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人来。大年老婆等小俊刚才的心情平息下去，故意把口气放得平淡淡地向她说：“小俊！再给你介绍个对象吧？”小俊这会的心情已经平静了好多，只叹了一口气说：“婶婶呀！人家谁还会把咱当个人呢？”说了这么一句话，才平静下去的心情又觉有点跳动，跟着就又来了两眶子眼泪，不过这一次控制得好，没有流出来。大年老婆用嘴指了指西边地里说：“你觉着满喜怎么样？”

小俊一想到玉生，觉着满喜差得多；可是撇开了玉生，又觉着满喜不错——做活那股泼辣劲，谁看见都不得不服；虽然好说怪话、办怪事，可是又有个好心肠。她和玉生离婚以后，不记得什么时候，满喜的影子也从她脑子里很快地溜过了一次，那时候也想到满喜这些长处，不过因为那时候的思想不实际，希望着她妈能把她和有翼的事包办成功，再加上那时候她家还留着那么多自留地，满喜也没有人社，把她家的地和满喜的地一比，觉着满喜是穷光蛋，提不到话下，所以只那么一溜就过去了。现在她爹要把多留的地入了社，满喜也人社了。她在玉生家住过一年，别的进步道理虽说没有接受多少，入了社的人穷富不在土地多少却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又不觉得满喜是穷光蛋了。至于满喜这个人，从各方面比起来要比有翼强得多，这个道理她仍不能了解，总还以为有翼好，不过有翼已经公开声明不愿意和她订婚，她也就断了那股念头。她从这各方面一想，心眼儿有点活动。

大年老婆见她一大会没有答话，从神色上看到她没有反对的意思，便继续和她说：“你要是觉着可以的话，我就和满喜提一提！”小俊马上还答不出话来，停了一阵，她无精打彩地

说：“婶婶！还是不要提吧！提一下谁知道他要说出什么怪话来呢？”大年老婆说：“不怕！他在我跟前不会说出什么怪话来！”小俊说：“可是他要到别处去说呢？”要想叫满喜绝对不说怪话，大年老婆也不敢保险，所以马上也回答不出，只笑了一笑。就在这时候，她们两个人已经把一铺玉蜀黍劈完，大年和登高已经另外割倒了好几铺，两个人便各自转移到一个铺边去了。

过了一会，龙脖上那几个人做完了事往回走，袁丁未叫住了走在后边的张副区长，问他卖出的驴被老牙行李林虎屈了价，能不能去找后账。张信早恨李林虎他们几个流氓不该借着几头破牲口，成天在临河镇集上掉来换去骗农民的钱，但是他对袁丁未这个小反倒在入社之前抢着卖驴，也没有好感，便先批评他说：“没有像你这样的人供给那些流氓吃饭，也早把他们饿得改行了！”袁丁未说：“那一回已经做错了，现在还能不能从他手里把驴倒回来呢？”张信说：“只要你能证明他是转卖了的话，可以和他讲讲道理！牲口是叫卖给农民用的，不是叫他们当成人民币在市上流通着扰乱市价的！”

天成的黄豆割完了。天成向满喜道过谢，满喜便回到自己地里。满喜让小俊回去，天成还说再让小俊多给他做一会。满喜说：“回去吧！我们的也快完了！”

小俊走后，大年老婆把满喜叫到跟前说：“满喜！给你介绍个对象吧！”“哪里的？”“还是三里湾的！”“谁？”“小俊怎么样？”“我又不是收破烂的！”“你这孩子！人家就怕你说怪话？人家这两天不是也转变了吗？玉梅不是说过你是保人吗？”“我保的是她妈！”“连她妈那么个人你还敢保哩！青年人不是更会转变得快吗？”满喜也觉着刚才那怪话不该说

——他想：“不论算不算对象，人家既然觉悟了，知道以前不对了，为什么还要笑话人家呢？”他说：“婶婶！我是跟你说着玩的！可不要让人家知道了！”大年老婆见他转了点弯，便劝他说：“满喜！我看你可以考虑考虑！那闺女长得满好看，也很伶俐，只要思想转变好了，还是个好闺女！”满喜想了想笑着说：“可是她妈骂过我，说叫我一辈子也找不下个对象，我怎么反能去找她呢？”玉梅隔着个铺，早就听见他们谈的是什麼，听到这里也插话说：“她说叫你一辈子找不下对象，你把对象找到她家里去，不是更叫她没有话说吗？”大年老婆也开着玩笑说：“真要成了亲的话，你这个当女婿的不简单——还给丈母当过保人！”

最后玉梅说：“满喜哥！婶婶给你们把线接通了！你们以后自己联系吧！”

三十三、回 驴

这一年是个闰五月，所以阴阳历差的日子很远——阳历的九月三十号才是阴历的八月十二。临河镇每逢阴历二、五、八有集，这天因为离得中秋节近了，所以赶集的特别多。

三里湾这几天因为突击秋收、秋耕、准备开渠，赶集的人虽说不是太多，不过有事的总得去：王满喜当了开渠指挥部的总务，要去买些开渠用的东西；张信接到区公所的通知，要回区里汇报工作；袁丁未仍然挂念着他卖出去的驴，要到集上打听驴的下落（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其余还有六七个人，也都各有各的事。一行十来个人，这天早上离了三里湾到临河镇来。集上人很多。他们一到，就都挤进人丛里，散开了。

满喜买的尽是一些笨重东西——抬土的大筐、小车上筐子、尖镐、大绳、大小铁钉……沉沉地挑了一担在人群里挤着往外走，迎头碰上了丁未。丁未说：“满喜！我找着我的驴了！”满喜问在哪里，丁未说：“还在牲口市场拴着哩！有个东山客正跟李林虎搞价！”“你打算找他吗？”“我还没有主意，不知道追得回来追不回来！”“咱们去看看情况再说！”他替满喜拿了两只筐子，让满喜的负担减轻了一点，两个人就相跟着往牲口市场来。

牲口市场在集市的尽头接近河滩的地方，是个空场上钉了些木桩，拉着几根大绳，大绳上拴着些牛、驴、骡、马。进了场的人，眼睛溜着一行一行的牲口；卖主们都瞪着眼睛注意着走过自己牲口跟前的人们；牙行们大声夸赞着牲口的好处，一个个忙乱着扳着牲口嘴唇看口齿，摸着买卖各方的袖口搞价钱。场外的人围了好几层，很不容易找到个缺口。丁未把满喜引到离自己的驴不远的场外一个地方，挤了个缺口指给满喜自己的驴在什么地方。

这时候，给丁未的驴当卖主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李林虎正和他对着袖口捏码，小孩摇着头说：“不卖！不卖！”丁未悄悄和满喜说：“不行了！这牲口已经倒了户了！买我的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大个儿！”满喜也悄悄跟他说：“照我看来都是李林虎一个人搞鬼！要是别人买了再卖的话，那么多的牙行，怎么恰好就又找到他名下了？”这时候，李林虎又和东山客捏了一回码，回头又向小孩捏了一回说：“行了！你让人家牵走吧！”说着便把缰绳解下来给东山客。小孩抢过缰绳来说：“不卖不卖！卖了我回去没法交代！”李林虎又把手伸进小孩的袖口说：“再加上这个！总没有说的了丁吧？”小孩还说不卖，

李林虎强把缰绳夺过来说：“人家出到了正经行情，当牙行的就得当你一点家！你爹不愿意叫他来找我！”小孩还说：“你给我卖了，你替我交代去！”李林虎没有再理他，便问了东山客的姓名喊叫写税票。他喊：“驴一头、身高三尺四、毛色青灰、口齿六年、售价一百八十万、卖主常三孩、买主赵正有、经手人李林虎。”丁未和满喜听到一百八十万这个价钱都有点吃惊；另一个牙行听到一百八十万这个数字，和李林虎开着玩笑说：“老李真有他妈的两下子！”眼看写完了税票，驴就要被人家牵走，丁未悄悄问满喜说：“我现在去拉住行不行？”满喜说：“恐怕拉不出来！牙行们在这种事情上是一气。他们人多，你占不了上风！”“难道就算拉倒了吗？”“我给他打个岔儿试试！”满喜说着故意躲在后一层人里大声说：“我看是捉了东山人的一大头了，那驴不过值上一百四十万！”不料站在他前边的人也接着他的话说：“顶多也不过值一百五十万！”李林虎向他们看了看，满喜和丁未赶快往人背后一蹲，没有被他看见。那个叫赵正有的买主，对一百四十万、一百五十万这两个数目字听得特别清楚，又想到刚才另一个牙行说老李真有两下子，知道自己吃了亏，便把缰绳塞到李林虎的手里说：“我不要了！你们尽糊弄人！”李林虎把缰绳丢到地下说：“你亲自看的驴、亲自许的价，谁糊弄了你？”说着把税票取过来，把一联递给那个小孩，另一联递给他：“拿钱吧！在这么大的会场上耍赖皮是不行的！”“可是我带的钱不够，难道也非买不可吗？”“钱不够为什么要答应买？”“我只顾搞价忘了还有多少钱了！”“让我搜搜你！”场外有几个人看不过，便大声嚷着说：“你抢了人家吧！”“不要买，看他能把你怎么样？”李林虎虽然没有敢真去搜赵正有，可是对后来那句话提出了

反驳。他说：“他自己许的价，等到把税票都写好了还能不要！我就到区上和他讲讲理！”满喜见自己的话起了作用，藏在人背后笑个不停。李林虎又向赵正有说：“好！算你没有带现款！我跟你取一趟去！”“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那么多！”“家里没有你去借去！我等着你！”赵正有看见脱不了身，便说：“好吧！”他想挤在人群里跑了算了事！李林虎说：“现在有多少先过多少！”赵正有不想露出自己带的二百万块钱来，只从中间抽了几张，估计有七八万，拿出来一看，是十一万，就给了他。

赵正有牵着驴，李林虎紧贴着他的身跟着他往场外走。满喜向丁未说：“好好好！你赶紧跟上他们，等离得牲口市远了你就问那个东山客多少钱买的。只要他说出是一百八十万，你就拉上驴去找张副区长，管保能倒回来！”丁未在这件事上倒很聪明。他照着满喜的话，赶出了牲口市场，便问那个赵正有说：“东山客！你这驴是买的吗？”“买的！”“多少钱？”

“一百八十万！”丁未便转向李林虎说：“你是多少钱骗了我的驴，如今卖一百八十万？”“是你亲自牵来卖给别人的，我怎么算骗你？”“我不跟你在这里说，咱们到区上说说！”又向赵正有说：“东山客！这驴还有麻烦！你要想买也得跟我到区上，区上要把驴说成了他的，你才能买！”说着便把缰绳夺到自己手里。李林虎正要去夺，赵正有回头来拦住他说：“你这驴来路不明，我不敢要了！你还把十一万块钱还我！”丁未趁这空子，便牵着驴走远了。李林虎说：“你快丢开手，我先去把驴夺回来再说！要不让我去，我是把驴交给你了，你给我钱！”

“你卖了来路不明的驴让人家牵走了，还要怨我？我也跟你到区上说说理！”

三个人一前二后都来到区上。袁丁未来得早，已经找着了副区长张信说明来由。张信问李林虎，李林虎说：“不论谁买谁卖，我只是个中间人。袁丁未的驴卖给姓王的了，这个姓赵的买驴，卖主姓常，都有税票为证。他们已经倒了几次手，我这个当牙行的怎么管得着他们的事？”张信说：“姓袁的、姓王的、姓常的、姓赵的。一个驴在十天之内倒了四个主，比人民币流通得还快！这究竟是谁捣的鬼？姓常的在哪里？我打发人叫来和他谈谈！”李林虎说：“我也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了！”张信说：“一点也不老实！当面撒谎！你要不知道他在哪里，他的驴价还要不要了？”李林虎后悔自己说错了一句话，便连忙改口说：“我说是现在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了，以后他是会来拿钱来的！让我给你找他去！”张信说：“用不着你去！”说罢便叫来一个通讯员，要他去牲口市上叫那个姓常的常三孩来，并且告他说：“你就说刚才卖的那个一百八十万的驴，人家不付价，闹到区上了，要他来作个证！”

常三孩来了，张信单独问他那个驴是什么时候买的、买谁的、多少钱、上过税没有。常三孩本来是个假卖主，自然经不起盘查，什么也说不出来。张信要他说实话，他说：“我是县城里人，爸爸在家卖烧饼，李林虎雇我来当伙计。”张信问他：“这伙计怎么当？做什么事？”常三孩说：“他告我说只要作一件事——当卖主。他跟我对袖口又不捏码，只装个栏儿。”“那样你知道是多少钱吗？”“他知道就行！用不着我知道，他告我说只要拉住缰绳说不卖，等到他用力拉的时候叫我丢了手，嘴里还说当不了我爹的家！”张信问明了这段情节，便向他说：“小孩子家为什么出来作这种骗人的事？这回还得你到法院去一趟，给李林虎作个证明！”说罢又把李林虎

他们三个人叫来，让小孩当着他们的面说了一遍，然后让李林虎退了赵正有的十一万元，让袁丁未把驴牵回去再把驴价一百万元送到区上来转退给李林虎，并且把李林虎和常三孩这个骗局写成诉状，告到法院里去。

三十四、国庆前夕

这天夜里，干部们在旗杆院分成三个摊子，开会的开会，办公的办公，因为九月三十号是社里年度结账的日子，有好多事情都要在十月一号的大会上交代，又加上开渠工作，已经决定十月二号动工，也要在这大会上作出准备工作报告，所以他们这天夜里特别忙。

党支部委员和正副社长在北房外间（会议室）里审核由金生拟定的新社章草案和新社干部候选名单草案。范灵芝和李世杰在东房里结束本年度工账和各户分配尾数，订立下年度的新账。北房的套间里是留给玉生和马有翼来检查开渠准备工作的，现在只来了马有翼一个人——这事本来该总指挥张乐意主持，因为他又是社长，要参加外间那个会，才委托了副总指挥王玉生。马有翼是开渠指挥部的会计，又被聘请为秘书，所以也来参加工作。玉生正和他们的总务王满喜在储藏室里清点开渠要用的工具、材料，所以还要等一阵才能来。

有翼在北房套间里，一边抄写着要在大会上张贴的各段分组名单，一边等候着玉生，忽然听到有些人在东房里交涉立户口的事（因为社员中有了分家的、出外的、结婚的……一些人事变动，自十月一号以后，记工、投资、土地分红、社员与社的其他经济往来，都要按新户口计算），他便想起自己的事。他是个新社

员，对社里这年度的规定虽然也听说过，却不像一般老社员那样关心。当他报名入社那时候，家还没有分清；这几天虽说分清了，自己又当了开渠指挥部的秘书兼会计，忙得没有想起立户口这事来，现在经别人提起，他才想起来了。他趁玉生还没有来，便先跑到东房里来办这件事。这时候，灵芝正忙着结束分配账，见他进去了，便仍按朋友关系和他打过招呼，不过手里没有停止工作；有翼虽说才当了两天秘书兼会计，对灵芝这种忙碌已经能够谅解了。直接管立户口的是李世杰。有翼等前边的一个新立户口的办完了手续，便和李世杰交涉自己立户口的事。李世杰问他怎么个立法，他说：“我大哥、大嫂算一户，我和我爹、我妈、玉梅算一户。”这出乎李世杰和范灵芝的意料；他爹他妈向来和他大哥是一气，为什么又和他分在一块呢？他和玉梅还没有结婚，为什么先把户口调过来呢？灵芝只看了他一眼，仍然继续做自己的工作，李世杰顺口问：“你和玉梅不是还没有结婚吗？”“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三号（中秋节）！”说了又看了灵芝一眼，好像向她说：“你不要小看我！我比你结婚在前！”灵芝只微笑了一下，没有感到有什么惊奇。

原来老多寿这几天的思想也有点改变：在菊英没有分出去、有福没有把地捐给社、有翼没有提出分家之前，他只想多积一些粮食，学范登高买两头骡子，先让有余赶着跑个小买卖，以后等外边的两个儿子也回来了，家产也发展得大了，又有财产又有入，全三里湾谁也不能比马家强；菊英分出去以后十几天的变动，给了他个很大的教训，让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四个儿子就有三个再也不会听他的指挥，他便有些灰心。二十号给他送旗的人散了之后，他向他老婆说：“我看这样就好！咱

们费尽心机为的是孩子们，如今孩子们不止不领情，反而还要费尽他们的心机来反对咱们，咱们图的是什么呢？我看咱们也不如省个心事，过个清静日子算了！”他老婆说：“可是咱们两个人该跟着哪个孩子过日子呢？”在报名入社那一会儿，他还把自己和老大算在一起，这时候他一考虑到自己以后的事，就又变了主意，不过他先问他老婆说：“你愿意跟谁过？”“老大倒是个好孩子，不过他那媳妇有时候我也惹不起！”“媳妇倒还是小事！老大那人尖薄得很！跟上他，眼前咱们还能劳动他倒很愿意，赶到咱们再上些年纪，自己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恐怕要受老罪！你看跟有翼怎么样呢？”有翼倒是他老婆偏爱的一个小孩子，不过她一想到有翼要娶玉梅，就有点气恼。她说：“他要是勾得个玉梅来，咱可惹得起人家？”“你要惹人家干什么？我看玉梅是个好姑娘——人也忠厚，做活的本领也比咱有翼在上，满过得了日子。依我说咱们老两口子最好是跟有翼过到一块儿，只是你挂着个‘常有理’的招牌，恐怕人家不愿意要你！”“你这老家伙又来挑我的眼儿！难道你那‘糊涂涂’招牌比我的招牌强多少吗？”“好好好！不要动气！我是跟你说着玩的！咱们还是谈正经的吧！你要知道：咱们两个人，都是不受青年们欢迎的人物，真要想跟人家在一块过日子，还得费好大劲儿才能说通。现在先要你拿一拿主意。你要愿意了，我再想办法。”他老婆一想：四个孩子有两个不在家，眼前这两个她都有顾虑。她说：“咱们有十六亩养老地，谁也不要跟，自己过日子怎么样？”“不好！这个我可见得多了：凡是给孩子们分开家老人们自己过日子的，到了自己不中用的时候，差不多没有好结果——财产大的，孩子们为了谋财产，谁也恨不得让他们早死了自己早谋到手，没有财产的，在能劳动的时候

不靠拢孩子，到了不中用的时候，累着了谁谁没有好气，还是不如早一点靠拢一家。”他老婆向来就佩服他在为自己打算这方面是个精细鬼，所以经他这么一说就同意了他的主张。他说：

“你同意了，咱们就想个办法：咱们跟有翼直接说话不行——一来有翼怕玉梅不赞成他，他就不敢答应咱们；二来我去跟有翼说这话，就要得罪老大，不如转个弯儿请干部们来给咱们主持一下。你明天出面去找一下调解委员会的秦小凤，就说咱们入了社，不愿意和有翼分家了，让她来给咱们说和说和。她要来跟有翼一说，有翼必不愿意，咱们就借这机会让她参加一下咱们分家的事。谈到咱们两个人跟谁过日子的时候，我说我愿意跟老大，你说你愿意跟老四——你偏爱有翼是老大也知道的，不会引起什么麻烦——最后我装作惹不起你，只好同意你的意见。这样一来，有翼和玉梅要是不愿意，自然有秦小凤会去说服他们，又可以不得罪老大。”他老婆同意了他这个办法，在二十一号夜里动员妇女的会上碰上了小凤，提出这个要求，小凤后来同着玉梅和金生研究了一下对付的办法，理由虽然和马多寿想得不同，可是研究的结果正合了马多寿的希望，所以没有费多大工夫就把问题解决了。马多寿老两口子就这样才和有翼分在一块。

李世杰给有翼立上名字、登记过土地、牲畜之后，又问他说：“那么你大哥怎么没有来报户口呢？是不是你爹跟你分在一块，他自己就不入社了呢？”有翼说：“他说他还人，不过因为我妈不愿意跟他分在一块，他心里有点不痛快，况且也不知道社里的规矩是今天立户口。你们可以打发人去通知他一下！”李世杰说：“暂且给他浮记上一个名字，记着工再说吧！”

这时候，玉生和满喜清点完了开渠用的东西到旗杆院来了。玉生听见有翼在东房说话，便喊他说：“有翼！快来干咱们的吧！”有翼走出东房来，满喜走进东房去。

满喜向李世杰说：“也给我立个户口！”李世杰说：“早就给你立下了！”“我知道！我是请你把小俊写在我的户口上！”“哪个小俊？”“咱村还不就是那么一个小俊？”“怎么一回事？”“我和小俊快结婚了！”“几时结？”“八月十五！”“怎么就没有听说？”“也说过，不过是没有和你说！”

满喜和小俊的事进行得似乎很秘密，灵芝这几天忙得喘不过气来，没有听到，听满喜这么一说，也觉着是一条新闻。

北房外间的会议，正由金生解释他拟定的新社章草案。他谈到下年度的社，大小干部就得六十多个，大家觉着这数目有点惊人，有的说“比一个排还大”，有的说“每两户就得出一个干部”，有的说“恐怕有点铺张”。金生说：“我也觉着人数太多，不过有那么多事，就得有那么多的人来管。根据从专署拿来的别的大社的组织章程，再根据咱村的实际情况：社大了，要组织个社务委员会来决定大计，要九个社务委员。为了防止私弊，还得组织个监察委员会，要五个监察委员。要一个正社长，三个副社长；全体社员要组成一个生产大队，就要有正副大队长。把全体社员按各户住的地方分成三个中队，每中队要有正副中队长。每中队下分三个小组，要有正副小组长。生产大队以外，咱们社里还有副业、有水利、有山林、有菜园、有牲口、有羊群，每部门都得有正副负责人。这些部门各有各的收入或开支，就都得有个会计。在社务方面，除了正副

社长，还得有个秘书；社里开支的头绪多了，就还得有个管财务的负责人。财务部门得有个总会计、有个出纳、有个保管。要提高生产技术，也得有个技术负责人和几个技术员。要进行文化教育，也得有个文教的负责人和几个文化组长。六十多个人还没有算兼职，要没有兼职的话，六十多个也不够。我觉着这样也好：一个社员大小负一点特殊责任，一来容易对社务关心，二来也容易锻炼自己的作事能力。”社长张乐意问他说：

“究竟得六十几个呢？”他说：“这个马上还不能确定，因为这些人有的应该由社员大会选出，有的应该由他的小单位选出，有的要由社务委员会聘请，不到选举完了、聘请完了，还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兼职的。”他解释过人数多的理由，便又接着解释章程上别的情节；解释完了，便让大家讨论、修正。

讨论完了章程，便讨论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很长，不必一一介绍，其中原位不动的，有社长张乐意、副社长秦小凤、王金生、耕畜主任老方（马东方）、山林主任牛旺子、会计李世杰——张乐意又兼大队长、李世杰称为总会计，原来是干部而调动了位置的是魏占奎当财务主任、王宝全当技术主任、王玉生当水利主任、王兴升为菜园主任、张永清当文教主任；新社员当主要干部的是范灵芝当社长的秘书兼管一部分总会计的事，王申当副业主任、王满喜当一个监察委员、马有翼当文教副主任；其他干部也有老社员也有新社员，各小组干部和应该聘请的干部没有列在名单之内。大家讨论了一阵，稍稍加了些修改，也就确定下来。

两个草案讨论完了，又谈了些第二天大会上应该准备的别的事情，就散了会。

会议室的会散了，金生和张乐意走进套间里。张乐意问：“怎么样？后天开工没有问题吧？”玉生说：“没有问题：除了木匠还得过几天才能来，石匠已经来了，各段的家伙也准备足了，各段分组名单已经和各段长商量好了，总账和各段的账已经立起来了，工地规则和算工办法草案是你们已经讨论过的了，只要明天在大会上通过了规则和办法，散会后各段各组碰一碰头选举一下小组长，把家伙分配一下，后天开工就成了现成事。”

这时候，有翼正在抄写没有抄写完的算工办法，玉生正拿着个编组以后又报名参加的几个劳力的名单分别往各个组里填补。金生和张乐意随便翻了翻已经准备好了的账簿、文告，就走出来又往东房里去。

东房里的账已结完，李世杰已经走了，留下灵芝一个人翻着账本把重要的数字往她写好的报告里填。金生和张乐意也问了一下情况，见没有问题，也就放了心，回去了。

灵芝填完了报告里的数字，这十来天最紧张的工作才算告了个段落，觉着身子有些累，便靠到椅背上来喘气。她闭上了眼，想让眼睛稍稍休息一下然后再回家去，可是闭了一会，不知道怎么样一下就想到有翼和满喜来立户口的事，又由这两对青年结婚想到自己结婚的事。八月十五这个节日，她一向很感兴趣。她在小的时候，每逢这个节日，总是爱在月光下吃自己最爱吃的东西，玩自己最满意的玩意儿；到了中学以后这几年，在这个节日里，又爱找自己最满意的朋友在月下谈天，谈到半夜也不肯散。现在她想：“今年这个节日该怎样过呢？小孩子的玩法已经过去了，学校的好朋友已经四散了，人家别人有了对象能趁着这一天结婚，咱也找了个对象，不止没有顾上准备

结婚的事，自从登记以后，两个人在一个旗杆院办公，都忙得连句话也顾不上说……”她正这么闲想着，忽然听见北房的门响，玉生和有翼从北房里走出来，她赶紧睁开眼，站起来走到门边叫住了玉生，让有翼一个人走了。

玉生搞完了他的工作，也觉着很轻松，走进东房里来见只有灵芝一个人，便觉着可以坐下来谈谈。他们把两把椅子并在一块儿坐下，灵芝便先问他说：“工作搞完了？”“完了。你哩？”“我也完了。”“可算松一口气吧！”“八月十五你打算怎么样过？”“后天一开工就又忙起来了，哪里顾得上过节？”“我也一样：一过了明天，就要评入社地产量、订生产计划，不过晚上忙完了工作，还是可以过一过节的！”“请你到我家玩去好吗？”“那样也还好！让我报告你个消息：有翼和满喜都要在八月十五结婚哩！”“我知道！玉梅在家里说过！”“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趁一趁这个日子呢？”“咱们一直忙得没有顾上准备，明天还要开会，后天就要开工，哪里还来得及？”“有什么要准备的？依我说什么也不用准备，还跟平常过日子一样好了！”“就连收拾房子的工夫也没有！”一说到收拾房子，灵芝便又想起他南窑里那长板凳、小锯和别的东西，便说：“不要收拾了！那些东西安排得都很有意思！”

“连件衣服也没有做！”“有什么穿什么吧！一对老熟人，谁还没有见过谁？”说到这里两个人一齐笑了。他们又具体商量了一阵，玉生也同意了。

灵芝问：“咱们是不是也要另立户口呢？”“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过，还是因为别人来立户口才引起来的！”“我不愿意另立户口——多么麻烦？谁给咱们做饭吃呢？”“我也没有想过这问题！”她又想了想说：“这样子好

不好？咱们都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最好是不用另立户口，你作的工还记在你家，我作的工还记在我家，只是晚上住在一块；这办法要行不通的话，后天食堂就开门了，咱们就立上个户口，到食堂吃饭去！”“穿衣服呢？”“靠临河镇的裁缝铺！”“那不成了个特殊户了吗？”“特殊就特殊一点！这又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的话就谈到这里。这时候，将要圆的月亮已经过了西屋脊，大门外来了脚步声，是值日带岗的民兵班长查岗回来了。他两个就在这时候离了旗杆院，趁着偏西的月光各自走回家去。

（一九五四年）

刘二和与王继圣·

一、学校与山坡

一九三四年秋天，有一天后晌，黄沙沟的放牛孩子们——二和、满囤、小囤、小胖、小管、铁则、鱼则——七个人赶了大小二十四个牛到后沟的三角坪去放。

这三角坪离村差不多有二里路，是一块两顷来大的荒草坪。因为离村远，土头也不厚，多年也没有人种它，事隔远年了，村长王光祖就说是他家的祖业，别人也没有谁敢说不是。就算是他的吧他也不开，荒草坪仍是荒草坪。放牛孩子们都喜欢

·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大众》杂志（一九四七年太行华北新华书店编辑），是编辑部特约写的。根据当时编者说明，作者计划写三部分，每一部分写三章。但《新大众》发表完第一部分的一、二、三章以后，并没有继续发表第二部分。全国解放后，《人民文学》重新发表这篇作品；后来出的《选集》也收录了这一篇，只是把原来的小标题去掉了。这次，在赵树理同志家属保存的遗稿中，发现第二部分的两章手稿，即第四章和第五章，正好同前面三章衔接起来。第六章以后，是原稿遗失了，还是没有继续写下去，无法判断。

到这里来放牛——虽说远一点，可是只要把牛赶上坪去，永不怕吃了谁的庄稼。这几年也有点不同；逃荒的老刘^①问过了王光祖，在这坪上开了几亩地，因此谁再到坪上来放牛，就应该小心点。话虽是这么说，小心还得老刘自己加，因为他是外来户，谁老牛吃了他的庄稼也不赔他。

平常来这里放牛的孩子本来要比这天多，因为这一天村子里给关老爷唱戏，给自己放牛的孩子都跟他们的爹娘商量好了，要在家里等着看戏，只有他们七个人是给别人放，东家不放话，白天的戏他们是看不上的。他们每次把牛赶到坪上，先要商量玩什么。往常玩的样数很多——掏野雀、放垒石、摘酸枣、捏泥人、抓子、跳鞋、成方……这一天，商量了一下，小囤提出个新玩意。他说：“咱们唱戏吧？兔子们都在家里等看戏啦。咱们看不上，咱们也会自己唱！”

“对！可以！”七嘴八舌都答应着。

小管问：“咱们唱什么戏？”

小胖说：“咱们唱打仗戏！”

大家都赞成了，就唱打仗戏。他们各人都去找自己的打扮和家伙^②，大家都找了些有蔓的草，这些草上面有的长着黄花花，有的长着红蛋蛋，盘起来戴在头上、连起来披在身上当盔甲；又在坡上削了些野桃条，在老刘地里也削了些被牛吃了穗的高粱秆当枪刀。二和管分拨人：自己算罗成，叫小囤算张飞，小胖、小管算罗成的兵，铁则、鱼则算张飞的兵。

满囤说：“我算谁？”

^①就是刘二和的爹。

^②家伙，就是乐器。

二和看了一下，两方面都给他补不上名，便向他说：“你打家伙吧！”

戏开了，满囤用两根放牛棍在地下乱打，嘴念着“冬仓冬仓……”六个人在一腿深的青草上打开了。他们起先还划了个方圈子算戏台，后来乱打起来，就占了二三亩大一块，把脚底下的草踏得横三竖四满地乱倒。

满囤在开戏时候还给他们打家伙，赶到他们乱打起来就只顾看，顾不上打，后来小胖打了鱼则一桃条，回头就跑，鱼则挺着一根高粱秆随后追赶，张飞和罗成两个主将也叫不住，他们一直跑往坪后的林里去了。满囤见他们越唱越不象戏，连看也不看他们了，背过脸来朝着坪下面，看沟里的水。

一会，沟里的转弯处又进来四个孩子。满囤先看见了，便叫道：“那是谁呀？”又回头向二和他们道：“不用唱了！你们看沟里又来了些谁？”二和、小囤、小管、铁则也都停了打，跑到坪边站成一排看沟里来的人。小胖和鱼则，远远听说有人来了，也都跑回来挤到排里。

下边来的人喊：“二和！小囤！你们头上戴的是什么？你们玩什么？”

二和也喊：“我们唱戏。那是谁？是喜宝？是满土？后面那两个是谁？”

喜宝和满土都说：“那是宿根和小记！”

小胖又问：“你们不上学了吗？为什么来放牛坡玩？”满土说：“庙里一唱戏就没地方念书了，先生说就放了秋学吧！”

提起唱戏，他们七个人又齐声问：“戏来了没有？”

满土说：“没有啦！听说天黑了才能来！”

小囤悄悄说：“该！叫狗×们看吧！”

喜宝、满土、宿根、小记四个人正跑到坡根还没有上坡，又听着沟前边花啦花啦银铃响，一个穿着红花夹袄带着联锁绳①的孩子随后赶来。这孩子，论岁数和前边来的那四个差不多，都是十一二岁。他一转过弯来便喊道：“叫你们等等你们听见没有？×你妈的！不等老子，再上了学叫先生打不死你狗×们？”前边走的那四个也奇怪，果然不敢不等他，都在坡下停着步。

上边，小管指给大家说：“看那是个谁？”

小囤说：“还不是继圣？”

小管说：“到底是村长的孩子！看人家多么阔气！”

二和悄悄说：“害人精！可真是他爹的种！”

小管摆摆手说：“人家听见了你又该吃打啦！给人家做活还敢惹人家？”

二和说：“他不是驴耳朵②！”

说着他们这五个人也上了坪。前边的四个上来了，继圣仍然落在后面。前面的四个，一见这毛茸茸的大草坪，都喜得又叫又跳，打滚的打滚，翻筋斗的翻筋斗，只有这继圣一个，气喘吁吁赶上了大家，就坐在草地上喘气。

喜宝翻了个筋斗起来向继圣说：“继圣哥你会？”

继圣说：“×你娘，那还算个本事啦。”说着也翻了一个。

小记指着继圣说：“看你把联锁绳上的铃铃压扁了！”

继圣提起项上联锁绳一看：“呀！坏了！”说着捏了一

①联锁绳，就是一条银链系着四个银铃、一个银锁子。

②俗语都说驴耳朵长，听得远。

捏，仍是扁的，就向那四个人骂道：“×你娘！我回去告先生说，就说喜宝、满土、宿根、小记，把我引到放牛坡，把我的铃铃打扁了！”

四个人也不打滚了，也不翻筋斗了，谁也不敢分辩，谁也不敢回话，只有七个放牛的不受先生管，看见继圣当面扯谎，就挤眉弄眼笑个不止。继圣见他们笑自己，正没法抵挡，忽然看见里面也有二和，就骂道：“×你娘二和！你笑什么？我回去告老领^①说，就说二和不好好放牛，戴着满头花花光说玩啦！”别的放牛孩子们看见他这样，都哈哈大笑起来。

五个学生和七个放牛孩合了伙，重新讨论玩法。小胖提出“到沟里耍水去”，大家差不多都赞成，只有二和不愿参加。二和说：“把牛放在坪上大家都去沟里玩，俺怕牛跑到俺地里去。”可是一个人扭不过大家，大家都说：“那你就在坪上吧！俺们都到沟里玩玩！”说着就都走了，把二和一个人留在坪上。

二和不是不愿玩，只是不能随便离开坪上。他一家四口人（他爹、他娘、他哥哥和他）只种了这一块块荒地，离村又远，土头又薄，除了给村长缴租、贴粮、贴社，余下的粮食本来就不够吃，哪还经得起糟蹋？就是天天加着小心，放牲口的多了，也年年是地边一耙宽没有穗。有一年，老刘两天没到地里去，不知道谁的牛就给吃了半块谷，到了秋天，粮钱社钱租子都还是照样出，只是苦了自己。那时候，二和就给村长王光祖放牛，老刘就跟他说：“迟早到放牛坡，都要留心看一看，不要叫谁的牲口到咱地里糟蹋。”二和这孩子很精干，自从听了他爹的话，每天赶上牛总在这三角坪左右放。在忙时候，有他爹

^①老领，就是领工伙计。

他哥哥在地里做活，他还可以玩玩，这几天已是秋收时候，三角坪地势高，庄稼成得晚，收割不得，他爹跟他哥哥趁空子在村里打忙工，好几天没有到这块地里来，因此他更不敢离开这里让几十头牛随便乱跑。别的放牛孩子们，觉着有二和给他们看牛，玩着更放心些，因此也不再拉他，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坪上，自己都往沟里玩水去了。

他们下了坪，走到水边，多数人主张玩“水汪冲旱汪”。学生们中间，只有喜宝会玩这个，其余四个不知道，便问“啥叫个水汪冲旱汪”，小囤给他们解释道：“把人分成二伙，一伙在上水①堵个汪，满满堵一汪水，叫水汪。另一伙在下水堵个没水的汪，叫旱汪。上水的水汪堵成了猛一放，要是把下水的旱汪一下冲破，就算旱汪堵得不好，堵旱汪的就算输了；要是一下冲不破，那就是水汪堵得太小，堵水汪的就算输了。这就叫水汪冲旱汪。”他这么一解释，继圣、满土，宿根、小记觉得这种玩法很新鲜，也都同意了。

继圣说：“我们学生们算一伙，你们放牛的算一伙！”

喜宝说：“不行不行！他们六个咱们五个，那怎么能不输？”

小囤说：“再给你们一个人！你们六个我们五个行不行？不是跟你吹啦！再给你们两个人你们也赢不了！”

继圣说：“不不不！我不跟你们这些放牛孩子算一伙！”

小囤狠狠翻了继圣一眼道：“放牛孩子×过你娘？不跟老子们合伙，谁去你家叫你来？”

继圣跳到小囤身边，挺起胸对小囤骂道：“×你娘小囤！”

①上水，就是上流。

你怎么敢骂老子？”撑开手学着他爹打人的架子，劈头向小囤打去：“×你娘！”

继圣这一回可是找错了对象：他自从跟他爹学会打耳光，说打谁就要打谁——从三岁上他爹抱着他，就常笑着叫他娘道：“过来！过来叫孩打你一耳光！”——可是不论打谁，谁也没有敢回过手，直长到十一岁还是这样。象满土、喜宝、宿根、小记他们在学校里，虽说那个半吊子先生好打人，挨先生打还没有挨继圣的多。继圣在学校衣裳穿得好，手脸也洗得白，小嘴又会说，先生跟他爹又是好几辈以前的老姨亲（听说先生的曾祖奶奶是村长他奶奶的姑姑），因此继圣说一句，先生就听一句——比方他告先生说满土踢了他一脚，满土就得挨十板；说喜宝骂了先生一句，喜宝就得挨十五板。再往下象宿根、小记那些比他小一两岁的，更不在话下，说叫谁早上挨，谁就等不到晌午。先生是本村人，在家伺候老婆的时候多，到学校的时候少。先生不在学校的时候，就该继圣为三，谁敢不顺他，小巴掌就打到谁脸上去。他这小巴掌打到脸上虽说也很痛，可总比先生那块干巴巴的木头板打在手心上轻的多，同学们想少挨木头板，就得忍点气挨他的小巴掌。他从前在家打顺了手，后来在学校又打顺了手，就以为到处都可以一样打，不想这一下打到放牛孩子小囤头上，没有那么顺当——小囤不象喜宝他们那样怕他，没等他打到脸上，就扭住胳膊把他按倒，随口又骂他道：“×你娘！不服气再起来试试！”

继圣从出世以来就没有碰过这一手，哪里肯服？他爬起来就向小囤身上扑，又被小囤推得跌出三步以外。这一下他已经知道自己不是小囤的对手，就不敢再起来向小囤进攻。只躺在地上大哭大骂：“×你娘，老子不跟你们玩了！×你娘小囤！老

子回去告你掌柜说。打不死你舅子！啧啧……”

小囤不只挨他的打，连骂也不让他一句：“老子尿你？不玩不玩吧，离了你这王八鼓也要响啦，离了你这马尿河也要涨啦！”又向别的孩子们说：“他不玩咱们玩！”

继圣这躺到地上大哭大骂，也是一种厉害——在家里他娘怕这个，在学校先生怕这个，每逢他这样一闹，总得劝半天。这一次这种厉害也使不上了——起先不止没人劝，还有小囤还口相骂；停了一会，不止没人来劝，连骂也没人骂了，只好越哭越松，最后连他自己也觉得哭着没味了，才停住了哭，一个人孤零零地爬起来。

他爬起来向沟心一看，人家大家都已经玩起来了：喜宝、满土、宿根、小记、铁则、鱼则六个人在上水堵水汪，小囤、满囤、小胖、小管四个人在下水堵旱汪。他虽不愿跟人家放牛的算一伙，可也想去看看人家怎样玩。小囤在下水，他不往下水去，就慢慢凑到上水来。这沟心①不过有两丈宽，水在中间只占尺把宽一条条地方，其余的是平平的黄沙夹着稀稀几块乱石块，两边是二三尺高的沙石岸，岸上有薄薄一层土，长着毛茸茸的细草。他走到喜宝他们堵汪的地方，并不下岸，就在岸上看他们堵。

喜宝们一心要和小囤们赌胜，生怕六个人输给人家四个人，因此忙得连气也喘不过来，并没有看见岸上的继圣。这六个人，每两个管一样事：宿根、小记搬石头，铁则、鱼则垒堰，喜宝、满土捞沙涂堰。他们正忙乱着，忽听得继圣在岸上喊：“中间为什么还要留口？”大家向他看了一眼，却没人答话——铁

①沟心，就是河床。

则、鱼则只顾一股劲垒，四个学生就有三个不懂，只有个喜宝懂得，又被铁则、鱼则催着只顾捞沙顾不上答他。他又问了一遍，喜宝才简单答了他一句：“等做成了才堵口。”他又问：“为什么？”喜宝又说：“里边水深了不好垒。”当喜宝说这两句话的时候，自己虽没有停工，满土、宿根、小记三个人却站住看他，铁则就催他们道：“快，快！不敢说闲话！”继圣便骂道：“用你管啦？×你娘草灰羔子①！”铁则和鱼则看了他一眼，也没有说什么。他两个是从河南逃荒来的，跟二和一样，他们的爹娘惹不起本地的大人，他们也惹不起本地的小孩，只得吃一点亏。

继圣骂过铁则，铁则没有敢还口，算是完全胜利了。这次胜利，好象补了补刚才跟小囤那次失败，又长了点精神。不过他觉着这还不够！他刚才哭的时间太长了点，眼也哭痴了，嘴也哭麻了，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来慰问，也没有一个人重来请他入伙，仍是自己孤零零爬起来，无精打采凑过来，慢慢搭讪着跟人家说话：这是多么丢脸的事！刚才骂铁则，本来就是想换一换神气，可是一骂出来，嗓子不止不亮，末尾还带一点哭声，他觉着这神气仍没有换过来，还得再找个空子换一换。他想刚才既然说到汪中间留的那个口，最好还是依着那个口说，主意一定，就先咳嗽了一下打扫打扫喉咙，然后用手指着道：“我看有口不好！先把口堵住！”这么一说，他觉着很成功——声音又圆又亮，口气又象个命令，他总算把刚才那哭丧神气换过来了。

铁则、鱼则不知道他这种心事，只顾垒；四个学生按习惯

①当地人骂逃荒来的外省人生的孩子叫“草灰羔子”。

不敢不理他，都停了工向他看。喜宝仍给他解释：“你不知道！堵住可难垒啦！”

“只有你知道的多！叫你堵住你堵住好了！多嘴！”继圣的声音更大了。喜宝明知堵住不好做，又不便不听他，正在踌躇，恰巧宿根又搬过石头来，继圣就命令宿根：“堵到口上！”

宿根托着石头看看喜宝他们，他们都不说话，又看看继圣，继圣又说了一遍“堵到口上”，也只得堵到口上。

继圣又向喜宝、满土两个说：“怎么不堵上沙？堵！”

喜宝和满土没有说话，捞起沙来往口上填了几把。

事情就这样弄糟了：口一堵上，汪里的水慢慢聚起来。宿根、小记两个虽然照样搬石头，铁则、鱼则两个却无心再垒，喜宝也无心再捞沙，都只站着看汪里的水往上涨。满土看见水快满了，赶紧捞起沙来往堰上堆，可是他一动手脚，搅起水波来把堰上的沙又洗回去，才捞了一两把，就把一条堰洗成了光石头堰，水从石头缝里漏出来，不大一会，缝又变成窟窿，窟窿越冲越多，越冲越大，最后把石头堰也冲塌了。

在这时候，继圣指手划脚大声嚷着这个骂着那个——“快堵快堵”，“那边那边”，“×你娘小记怎么不下水”，“×你娘都是些吃材①”……嚷着嚷着，直嚷到堰塌了，他才赶着大水头往下水跑，嘴里又喊道：“河涨下来了！河涨下来了！”

下水的四个人比他们上水的六个人本领大，垒起来的堰又粗又高。当他们垒到半路，忽然发现水不下去了，不知道是继圣捣乱，还只当是上边的水汪垒成了，就堵起口来，赶快把堰加

①“吃材”，就是“蠢材”。

高，等到水下去了，还不够半汪，小囤喊道：“你们来看看！你们六个人才堵了这一点点水！”

这时继圣也已经走到旱汪边的岸上。他看见小囤他们四个人还没有离开汪边，就想顺便报一报仇，双手抱起一颗石头向汪里一扔，扑通一声打得一片水花，满满溅了那四个人一身，还溅到他自己脸上两滴。他扭回头就往上水跑。

“×你娘作死脸！”四个人一齐跳起来赶他。小胖力量最大，赶上他拦腰把他抱住。四个人拖的拖推的推把他仍然抓到汪边来。他虽使劲挣扎，也没有用处，小胖仍是死抱着他的腰，小管抡起放牛棍呼——呼——把汪里的水往他身上打，把他的小白脸和红花夹袄都涂成一色，活象破庙里被雨淋过的泥胎象。起先他还骂，后来一张开嘴，泥水就溅进嘴里去，这才不骂了。

上水的六个人，正因为汪塌了在那里生气，忽听着下水吵起架来，就一齐跑来看热闹。他们一见是把继圣制住了，心里都很高兴。铁则对住小囤的耳朵说了句话，小囤便喊道：“不要放了他，给他做一个老牛看瓜！”

继圣虽没有见过什么叫“老牛看瓜”，总知道不是好事，不过既然被大家制住了，就只得由大家摆布。他一点也不由自主的被大家又抬到岸上，解裤带的解裤带，捆手的捆手——用他自己的裤带把他自己的两手捆到一处，叫他两条胳膊抱住两个膝盖，又从膝腕下边胳膊上边穿了一根核桃粗三四尺长的木棍，然后把他一推叫他睡倒。这样捆起来的人，除了脊梁骨，头脚都不能着地，因为胳膊和腿连在一起，棍子又长，坐也坐不起来，横也横不过来，只有仰面睡着，好象朝天一张弓；这就叫“老牛看瓜”。继圣被捆成老牛看瓜，起初仍是不服，总还以为这放牛孩子们生的办法，只能制放牛孩子，一定制不住自

己这样聪明的人。他用尽气力，象陀螺一样在地上乱滚，直到滚得没有劲了，还仍和原来的睡法一样。自己破不了，就不得不找别人，他又下了命令：“宿根！解开！”宿根还没有赶上答应，他就又骂道：“×你娘你给老子解不解？”宿根惹不起他只得去给他解。可是宿根才去动手，小囤指着他道：“谁敢去给他解就再给谁捆一个！”宿根本来就想叫他多睡一会，见小囤不叫解也就算了。

也有人跟小囤说：“给他解开吧，省得他回去到咱们家里找麻烦！”小囤说：“你就这会给他放开，谁能保他回去不找麻烦？刨一镢头也是动了一回土，仍是惹他一回，就叫他睡到天黑吧！”

学生们里边，都怕这事连累着自己。满土说：“俺不玩了，俺要回去啦！”喜宝也说：“俺也要回去啦！”宿根、小记也都说要回去啦，四个人相跟着溜走了。

小囤向其余五个放牛孩子说：“叫他睡着吧！咱们也都去看看咱们的牲口！”五个人都同意，也相跟着上了坪。

这两伙人一走，沟里只丢下一个继圣。这会他也不哭了，也不骂了，也不再妄想自己能弄开了，也不得命令别人给他解开了。他只能照老样躺着，脊梁骨困了就转动转动，然而仍只能转成原来的老样；每转动一次，听着自己连锁绳上的银铃花啦花啦响几声，却也没法看看压扁了几颗。他想来想去又想起个二和来，他又觉着有救了，可是叫了几声没有听着答应，山沟里的回声应回来，还跟他叫的一样。

这坪太大了，边上可以听得沟里说话，后面便不行。二和家开的那块地在很后面，二和在那附近着着牛吃草。小囤他们后来上去的这六个人，见二和看着牛，也就不再往二和那里

走，溜到林边吃酸枣去了，因此二和就不知道继圣在下边“看瓜”，又听不到他喊叫。直到山沟里看不见太阳，他们把牛赶到坪边来，继圣听得牛铃响，又喊叫二和，二和才听见。二和问过了小囤他们，知道他的少东家在下边“看瓜”，才跑下来照顾他。

二和是他骂熟了的，见了面自然非骂不行。“×你娘二和！你的耳朵聋实了？”

事情偏有点不凑巧：二和走得离他只有两三步了，忽然听得小管在上边喊道：“二和！看你的老红犍去哪里了？”二和扭回头一看，看见老红犍从坪的半坡上又返回一层窄崖上，用舌头探吃一根长在半崖上的黄萝卜条。很危险。他也顾不上去解继圣的绑，喊了一声“唔嗷……”扭头就向坪坡上跑，继圣骂着“×你娘先给老子解开”，他连答应也没有顾上答应。这层崖太窄，牛大了不容易翻回头来，一不小心就能把牛跌死。他们七个人都来招呼这只牛——他们都很着急，可是又怕把牛惊了，不敢一齐上手，只好在远处帮忙，有的在坡上叫，有的爬到半崖上截，结果总还算没有出了事，平平安安赶了下来。这时候，二和才又听见继圣在下边骂（原来就一直骂着，只是二和没有顾上听），这才跑下去给他解开。

可是这时候天已快黑了，继圣一个人不敢回家去，还只好跟放牛孩子们算一伙，跟着大家往回走。

二、说什么理

从半后晌①小囤他们才给继圣做老牛看瓜时候，喜宝、满

①半后晌，指下午三四点钟。

土、宿根、小记四个学生，因为怕连累他们自己，不是就离开后沟了吗？当他们走前沟，看见南面岭上下来许多骑驴媳妇。这些女人们有的是本村娘家，有的在本村有亲戚，有的是自己找来的，有的是村里人接来的，都来村里看戏。这些人，喜宝他们差不多都认得。他们四个一边走一边看，远远指着说那个是谁的姑姑，那个是谁的姐姐。不过这些人们，男的都戴着大草帽，女的也只穿些红裤子蓝布衫，都是些平常打扮。一会岭上又转过一个人来，穿着件白大衫，戴着一顶小白草帽，打着一柄洋布伞；跟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穿着一身毛蓝布学生制服；后边又有个媳妇，骑着马，穿的衣服，上身是鱼白的，下身是黑的，一只手拿个团扇，一只手也拿着一柄洋布伞，不过这时候的太阳已经斜了，伞只遮着她一颗头，身上的衣服，仍被太阳照得一晃一晃打闪，一看就知道是不平常的绸缎；马后跟着个人，却是个戴草帽的普通人。喜宝指着这几个人向宿根、小记、满土三人说：“你们猜那是谁吧！”大家想也想不起来。一会，他们又走近了些，小记认出来了，便抢着说：

“我认得了：那穿大衫的是继圣他姨夫！”

宿根也抢着说：“对了！就是西坡马先生——继圣他姨夫！那个骑马的是他姨姨！那个小孩叫天命，是他姨姨的孩子！”

满土说：“谁认不得天命？今年正月咱村闹红火^①，他不是继圣家住了好几天吗？”

喜宝说：“听说人家上高小念书了！”

满土说：“人家爹是校长啦！人家该不上啦？”

^①闹红火，过正月十五扮演各种玩意。

喜宝说：“他那狗×校长还不跟咱的先生一样？听说人家一年只去学校走一两趟。”

小记问：“他那学生们就不用教？”

宿根说：“人家的学生们都大了还用教？咱的先生前几年不就是人家的学生吗？”

喜宝说：“宿根也是假在行！学生大了就不用教了吗？你没听咱先生说，人家的学校有五个先生，校长是个先生头，不在学校都不要紧。”

小记问：“先生头是管先生的不是？”

喜宝说：“问个啥问到底！咱没有上过人家学校，怎么会知道那些事？”

满土说：“咱们不说那些吧！”又指着那匹马后边那个人道：“你们猜那个赶马的是谁？”

喜宝说：“谁？还不是老驴？”

大家都说：“对！就是老驴！”说着他们就走近了，小记故意把头一歪喊道：“老驴！”那个赶马的举起鞭杆向他们喝道：“捶你们呀！这些孩子们实在掉蛋！”

这人也不姓驴（自然也没有姓驴的），也不名驴，老驴不过是个外号。他姓李，名叫安生，有五十上下年纪。他原来也是个逃荒的，没有家口，只他一个人，当初来到黄沙沟也不过才二十来岁。那时候，继圣他爹还只有这时候的继圣大，继圣的爷爷就把他留在家里当长工。老东家高兴时候常说：“安生！只要你好好干，回头给你娶个媳妇！”安生也没追究过他说这“回头”是什么时候才回。后来到底没见回头，老东家也就死了，所以安生到底还是没有老婆。安生在他家做了三十年长工。前十几年，一年还结算一回账，剩下的工钱都给他存在账

上；后来熬成领工的了，家里人连继圣他爹王光祖在内，都再不叫他的名字，叫他时候，称呼他“老领”。这个称号，他觉着很光荣。觉着这是自己的功劳换来的，因此对东家越亲近了——别人使用东家的牲口，他要看一看使得轻重；别人借用东家的家具，他也要看看坏了没有；工钱账也不结算了，一年一顶草帽一条手巾也改成二三年才换一次了。他手下的长工们，邻居们，受了他的气都恨他，看见他的破手巾烂草帽又都可怜他，有个长工说他生活象个老驴，大家都觉着象，就背地慢慢叫开这个外号，不过当面却都还称呼他“老领”。

他自从知道了自己的外号叫“老驴”，十分丧气，可是爱和他闹着玩的人偏好叫他，淘气的孩子们见了他也偏好远远喊他“老驴”，等他发了脾气赶来就又跑了。这一次也跟往常一样，小记他们四个人见他赶来，三脚两步就跑过他前面去了，跑到十几步以外，又回过头来大喊了三声“老驴”，算是完全胜利，都笑着跑回去了。

他们还没有跑到村边，就听庙里的锣鼓响，都说“戏来了戏来了”，大家越跑越快，谁也不回家，一直跑到庙里去。

他们到庙里一看，还不十分热闹——台上除了打锣鼓的只有两三个人出场，穿的衣裳也不好，呜哩呜啦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台下看戏的没有一个大成人，也没有一个女人，只是一伙孩子们打打闹闹，比台上说得还响；拜亭上虽然烧着香，可是还没有摆设停当，二和他爹、铁则他爹、鱼则他爹，还有几个穷人们，抬桌子的抬桌子、挂灯的挂灯，都在那里打杂。他们四个上下看了一会，见没有什么着头，就和别的孩子们说起继圣“看瓜”的事来。这些孩子们不是跟他们在一起念书的，就是跟二和、小囤他们在一起放牛的，一听说继圣“看了瓜”，

没有一个不痛快，连戏也看不下去，想先去打听一下这事的
结果，就跟喜宝他们一同跑出来了。

一大伙孩子们跑到村南头的打谷场子上向沟里看，除了骑
驴媳妇看不见别的人，放牛的一个也没有往回走，继圣也没有
影踪。

这一块场子就是继圣家的场子，场东边就紧靠着他家后院的
院墙。场上已经有打过了的黍秆，还放着一垛子新割起来的
谷子。孩子们打听不着继圣“看瓜”的结果，就在场上玩起
来。大家问继圣“看瓜”的情形，喜宝就睡在黍秆堆上，两手
抱住膝盖学继圣打滚的样子，惹得大家哈哈大笑，都觉着比看
戏还有趣。正笑得起劲，忽听东墙根有人喊道：“捶你们呀！
把黍秆踩得实塌塌地！”着也不用看，一听就知道是老驴的腔
调。孩子们跟一群麻雀被人惊了一样，轰隆一下跑了个干净。

不过他们还不想算拉倒，跑了一段，又都站住，回过头来
看老驴的动静，只见老驴拿起杈子来收拾他们刚才打过滚的
黍秆。

这时候，天命拉着继圣他娘的手，也到场边来。继圣他娘
向老驴问道：“老领！你见继圣来没有？天命急着要找他玩
啦！”老驴说：“没有见。”孩子们沉不住气，有一个远远向
场里喊道：“继圣在后沟看瓜啦！”继圣他娘远远向他们一
看，又问他们道：“在哪里呀？”有几个抢着答应：“在后
沟”，“三角坪底”，“老牛看瓜”，“干看急起不来”，
“……”。

继圣他娘听不懂什么是老牛看瓜，老驴却听懂了。老驴吃
了一惊，停住了手里的杈也喊着问：“怎么呀？谁给他做老牛
看瓜？”又向他们点手道：“来！来给我细细说一说！”可是他

这命令在小孩们面前行不通——小孩们经他一叫就都吓跑了。继圣他娘见他这样惊慌，便也急着问：“怎么呀！什么看瓜呀？”老驴道：“小杂种们刻薄他啦！把他捆起来了！”

继圣他娘一听这话，大声叫起来了：“这是哪些小‘烧灰’^①们干的？老领！快去看看吧！小爹呀！谁叫你跑到后沟去啦呀？……”老驴答应着，丢下杈子去了。

王光祖跟马先生也摆着方步出来遛跬，见继圣他娘大呼大叫，也来问讯，经她唧唧喳喳说明了以后，王光祖骂道：“下流东西！谁叫他到放牛坡去玩？回来给我好好捶他一顿！”他看看天命，又看看马先生，觉着自己的孩子到放牛坡去玩是一件很大的丢脸事，暗暗怪他老婆不该对看客人把这事说出来，便翻了她一眼道：“回去吧！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他老婆没有说什么，却也没有回去，仍然看老驴往沟里走。

马先生怕他们两个再往下吵，便插嘴道：“小孩们离开了学校就不好管！天命放了假到家还不是一样的！我早就说继圣可以上高小去了，你也没有当成个事。”

王光祖用嘴指着他老婆向马先生道：“他娘不让么！”

继圣他娘道：“他姨夫！不是我不叫去！他没有出过门，自己照料不了自己……”

马先生道：“可以！这孩子很有出息！叫他跟上我，你还不放心吗？”

继圣他娘道：“怎么不放心！跟上你还不跟在我家一样？我也是怕累着你！你也不常到学校去……”

① “烧灰”是骂人话。原字为“骚货”，老百姓的口音转成“烧灰”。

王光祖怕马先生多心，赶快截断她的话道：“那怕啥！他是校长。只要他说句话，谁敢不招呼？”又向马先生道：“我看村里的学校也学不了个什么。今年招生时候可惜误了，就叫他明年夏天去吧！”

马先生道：“不过这会去也行！今年的新生还没有备案，名额也不足，还报得上去！”

王光祖又问：“也不用考吗？”

马先生说：“那不过是个样子！”

他们两个说说话话在场上遛着，继圣他娘和天命向沟里望着，等候着老驴去找继圣的消息。

老驴一进沟，太阳就落了，远远听得牛铃子叮咚叮咚响，喊叫了几声，果然听得继圣答应。

继圣一听老驴叫他，可算遇着了救命恩人，一面答应着，一股劲赶过牛群前面。他早就不想跟放牛的在一起了，只是一个人不敢走路，不得不借放牛孩子的光，这会有老驴来保他的驾，自然又给他长了精神。可是他这一高兴，却没有想想见了老驴说不说“看瓜”的事，因此老驴远远问了他一句，问得他低下头来。老驴问：“看你那一身脏成个啥样子了？”他低头向胸前一看，小嘴一嘟噜，脚步也慢了许多。这时候他才计划怎样来对答老驴。他想“看瓜”这事千万说不得，叫别人知道了以后没法见面。可是他又想到这事瞒也瞒不住：七个放牛的知道，四个学生知道，他们怎能不跟人说？有这些破绽，就得想法糊补。他想喜宝他们四个有法对付，一吓唬他们就不敢向人说了；小囤他们六个人没法对付，因为他们不怕先生打，不过他们是放牛的，说他们也只能跟放牛的说，随他们说去也没有大关系；只有二和不好对付，得马上想法子。他想二和虽然

也是个放牛的，可是在自己家住着，晚上跟自己家里的长工们在一块睡觉，怎么能叫他不今天“看瓜”这事？……他正这么胡思乱想，老驴催他道：“快走！你天命哥哥来了，在家等你啦！”一说天命来了，他又高兴了一点，放快了脚步走到老驴跟前，老驴便返回头来领着他往家里走。不过他对二和仍放心不下。他想“看瓜”这事本来就不可叫家里知道了，现在家里又住了个天命，更走不得风，一定不能叫二和胡说。他摸得着二和的脾气是好说话——吃着饭也说，做着活也说，只有受了老驴的气才能不说。有一回，老驴打了二和一顿，二和三天就没有说话。他以为想叫二和不说话，总得叫老驴打他一顿。他又觉着二和也就该挨一顿打才对：“×你娘！别人笑我也笑我！别人给我做老牛看瓜你故意躲到坪上不下来！喊叫你半天你故意不答应！先去赶牛不先给我解开绑！×你娘！非叫你挨一顿不行！”他打定了这个主意，就牵着老驴的衣裳，一边走一边说二和的坏话——说二和“光顾戴着满头花玩”，说二和“光顾给他爹看庄稼”，说二和“把牛赶到窄崖上差一点跌坏了”。老驴起先只是哼哼答应，却也没有当成一回事。以后听他说把牛赶到窄崖上了，才打动了他的心。他平常爱惜牲口，牲口毛上有点粪他也要擦得净净的。他听说牛上了窄崖上，就马上反问他怎样上去的怎样下来的，受了伤没有。继圣见他注意了，就半真半假说得十分危险，末了又加了一句话说：“他说‘你回去千万不要告老驴说’！”老驴听完了他这一段报告，着实起了脾气。他觉着二和犯了两宗大罪：第一是不该不操心把牛赶到窄崖上，第二是不该没大没小说自己是“老驴”。特别是第二宗，他以为越发饶不得。他觉着自己是“老领”，凭这功劳东家也得尊敬，一个放牛孩子，是自己直接领导的部

下，为什么敢这样随便骂起来？他想这孩子非教训一下不可了。他想到这里恰巧也走近场边，便指了一下王光祖他们向继圣道：“快回去吧！你爹你娘他们都还在那里等着你啦！”说了便扭头返回去找二和算账。

王光祖只顾跟马先生说话，他老婆和天命却早就着见老驴领着继圣从沟里出来了。赶走到近处，老驴又返回向沟里走去，天命却就迎上来。天命第一句先问继圣谁给他做老牛看瓜，问得他红了脸答不出话来，暗暗骂道：“×你娘！这是谁给露了气？”

王光祖听得他们说话，抬头一看，看见继圣一身涂得象一只落水狗，跟天命那一身干干净净的蓝制服一比，实在无脸。他恨不得跑过去踢他两脚，可是当着马先生，又不好对自己的孩子发那么大的脾气，就狠狠咬牙骂道：“下流东西！给老子滚得远远的！天生那种奴才架子，明天就叫你去放牛啦！”他老婆看见自己的孩子被糟蹋成那样，自然也又是骂又是疼。马先生劝了他们一会，才算都不吵了。

他们静下来，才听得远处有人哭起来。老驴返回去见了二和，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先打了两个耳光，把二和打哭了。二和还只当是继圣把“看瓜”的事推到自己的头上了，他就一边哭一边分辩道：“是我来？你问清楚是我来？”不分辩还好，一分辩又加了一耳光。二和早就知道继圣不是好东西，可是这一回却没有想到他要害自己。他觉着这一次实在没有对不起继圣的地方，可偏又被他害得挨了一顿没名姓的打，真是冤枉极了。老驴打罢了二和，一边走一边说：“你干的是什么事？再敢不小心我揭你的皮！”说着就走远了。二和挨了打，一边哭一边赶着牛慢慢走到场边，还见继圣站在他娘跟前。仇人见面，分

外眼明，二和就看着继圣赌着誓分辨道：“要是我叫死我全家，妄嘴说人也叫死他全家了！”

王光祖正在气头上，听了他这么说，更是火上加油。他觉着这真不成个规矩，哪有这放牛孩子敢在东家面前骂人的道理？他又觉着这应该和对付自己的孩子不同——他以为对着客人打自己的孩子是丢人事，可是对着客人不教训一个没规矩的下人更是丢脸事，况且自己还在气头上，也正好借这来出出气，因此他就叫道：“二和你来！”二和只当他要问刚才老驴打自己的事，心想“我非把这事说个清楚不行”，就走到他跟前，哪知道正要张开嘴去说话，被他劈嘴打了重重一巴掌，打得仰面朝天倒在场里。二和哇的哭了一声，爬起来唾了唾嘴里的血，仍哭着辩道：“放个牛就这么下贱？想打就打？打也得说个理吧？”王光祖一瞪眼道：“你还要跟‘我’说理呀？”说着又一耳光打去，二和却跑开了。

二和这一回下了决心，就一边跑一边顶他道：“伙计、伙计不说理，东家、东家不说理，我任凭再跟我爹去讨饭也不敢给你放牛了！我还怕你们打死我啦！”说着头也不回，牛也不圈，饭也不吃，一股劲跑回自己家里去了。

王光祖原来是想争个脸，没打划结果这么糟，气得他两眼死盯着二和的脊背发作道：“作死脸！我着你造得了什么反？——老领！”老驴听得东家喊叫，赶紧跑出来，他便向老驴道：“叫得老刘来算一算账把二和打发了！”老驴答应着，叫别的长工圈了牛，就去找老刘去了。就在这时候，庙里打发人来请王光祖，说是庙里的席已经摆好了。王光祖辞过马先生上庙里去，马先生、天命、继圣和继圣他娘也都回王家吃饭去。

二和哭着跑回家，家里他哥哥大和打忙工还没有回来，他

爹被人家派在庙里打杂也没有回来，只有他娘一个人在家。他娘听见他哭，赶紧跑出院里来看他，见他的嘴也破了，耳朵也红了，半个脸也肿了，倒吓了一跳，三脚两步跑到他跟前搬住他的头一边看一边问道：“小爹呀！谁又跟你闹气？”二和一肚冤枉要说，可是一见了娘又恸得很，哭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铁则他娘、鱼则他娘几家邻居们也出来看，也帮着问，可也问不清楚。

当二和挨打时候，小囤他们六个人都亲眼看见，喜宝他们一伙人，虽然没有敢到场上去看，却也躲在一边看得清楚。他们这些人，见二和哭着回了家，有的回去圈了牛，端了一碗饭，有的连饭也没有端，就跑来看望二和。这时候，二和的哥哥大和也回来了，大家都在院里站了一大圈，把二和跟二和他娘围在中间，孩子们见二和哭得说不清楚话，知道的就替他抢着说，总算把继圣看瓜跟二和挨打的经过，给他娘跟他哥哥说明了。说完以后，大家都替二和抱不平，有的主张去找王光祖说个清楚，有的主张到庙里去叫大家评一评这个理。二和他娘唉声叹气道：“咱能跟人家说个什么理？趁咱的什么啦？”说着眼里也流下泪来，拉着二和回屋里去了。

天黑透了，院里的孩子们也散了，大和也回屋了。二和的娘给二和舀上饭二和也吃不下去，仍哭着道：“我是不敢给他放牛了！我还怕他打死我啦！”大和也说：“咱惹不起他吧也怕不起他？不给他放就不给他放吧，不论到哪里还愁寻不上个主儿！”

二和这时候哭也止住些了，他娘把他的头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一只手给他揉耳朵，觉着他半个小脸热烫烫的。就在这时候，老刘回来了，一进门就问“二和啦？”二和他娘说：

“在这里！”老刘喘了几口气就骂：“×你娘！老子不捶死你算你武艺高！”说着就往炕上摸二和，吓的二和他娘把二和往炕后一推用脊背堵住，大和也挡着老刘说：“爹！一点也不怨二和的过！你听谁说什么来？”说着把他招呼到小板凳上坐下，他还是喘着气说：“他算是给我闯下乱子了！”

大和给他点上灯，慢慢跟他说二和这打怎样挨得冤枉。二和的娘也指着二和，哭着向他说：“不用打了，人家早就快把他打死了！”老刘半天也没有说一句话，等到大家都不说了，他才说：“人家不叫咱活了！人家村长打发老驴到庙里找我，说咱这闯事的二和跟人家村长顶嘴！人家不要他给人家放牛了，要叫我跟人家去算账啦！”

大和说：“不放就不放吧！只有他一家雇人的？”他娘也说：“什么好主家？吃的饭还没有吃的打多！”

老刘说：“都是傻瓜！咱凭什么跟人家算账啦？大前年的庄稼叫牲口吃了一半，前年又遭了旱灾，光欠租就是三石多。今年春天又借人家的一石谷，到这时候连本带利又是一石五。光这四五石粮食，咱指什么给人家呀？还有咱种的那几亩山地是人家的，住这座破房也是人家的，人家扭一扭脸，咱还怎么在这地方站呀？”

二和他娘说：“咱这一家活得算个啥？还不如死了清静些！”

老刘叫着二和道：“爹跟你好好说：你以后少给咱闯点事好不好？”

二和发急道：“爹呀！我真正是没有闯过什么事呀！”

老刘道：“你还哭啦！你为什么跟人家顶嘴？”

二和道：“我白白挨了两顿打，连话也不叫我说一句吗？”

他说我不该顶他，他为什么好好就该打我？”

老刘道：“唉！孩子呀！打就是打了吧，还能问人家该不该？人家是什么人？咱是什么人？”

二和他娘道：“你那么说咱那孩子还有命啦？”

老刘说：“说什么理？咱没有找人家说理人家就找咱算账啦！有理没理且不论，这账怎么敢跟人家算呀？”

正说话间，外面有人喊道：“老刘伯伯！庙里叫你去点灯啦！”老刘留了一碗饭，端着走了。

三、关帝庙挤不挤

叫老刘是鱼则去叫的。鱼则是老黄的孩子。老黄跟老刘一样，都是外来户。原来庙里有了神社事，要叫谁都是社首打发看庙的去——叫桌面上的人物说是“请”，叫村里老百姓就说是“叫”。要说叫外来的逃荒的人，那就连“叫”也说不上，只是派个条子叫他来支差就算了。象唱戏的时候派老刘他们打杂，自然是只用通知一回，就把这三天戏唱完才能算消差，半路上再没人去叫他们，谁误了是谁的事。老刘因为二和得罪了村长的事，回去一大会没有来，这时候拜殿上要挂灯，老黄怕他误了再受社首们的气，因此才打发自己的孩子去叫他一声。

他跟着鱼则离开了家，外面果然黑得看不见路了，快到庙门口，才看见有两家卖油糕的点着两盏麻油灯。他只当误了什么事，赶忙三脚两步走进庙里，看了看情形，时候还早，这才放了心。原来庙院里还是黑的，只有四五个去处有点火光：社房楼上正豁拳喝酒，窗上照得亮亮的；戏台上两个小门黄黄的有点灯光，后台里似乎有一盏灯；拜亭上有老黄、老张他们在

那里挂灯，可是才点着了一支蜡烛；两廊靠近台阶的地方有几个纸灯笼，是几个卖果子的。人也不多：除了做菜的，托盘的，和几个打杂的以外，就只有一伙孩子们跑上跑下乱喊叫。

老刘见拜亭上有了人，也就一径走到拜亭上来。负责挂灯的是三个人——老黄、老张和老刘。挂的灯是各色各样的宫灯，都是用木头做成了格子，上边张着纱，用的时候才十片八片往一处拼对。老黄是小木匠出身，懂得这个。老黄还有个怪劲，手巧嘴拙，能做不能说，急了干张嘴，张十来次嘴才能说出一句话来。老张自小就是个打莲花落讨饭的，和自己地位高低不差什么的人在一块做活，只要他张开嘴就没有旁人说话的地方。他跟老黄到一处，总好故意挑着老黄说话——看见老黄张几次嘴说不出来，他就再跟着说几句；等到老黄快又要说了他就再说几句，然后哈哈一笑，就笑得老黄把话闷回去。

负责的虽然只有他们三个，帮忙的却是七手八脚人数不少，就是白天在山上放牛那伙孩子们。他们这帮忙是为了自己：原来每一支蜡烛的把子都长的很，往灯里插的时候总要折下多半截来，象一根筷子。唱戏的时候，这庙里要挂六七十个灯，这半截烛把子要折两大把，他们都爱抢这个，不过也不一定真是做筷子，只是玩一玩。

老黄管拼灯，老张管插蜡烛，老刘管往上挂，孩子们除了抢烛把子还管提上灯给老刘递一递。插蜡烛自然比拼灯容易，因此老张一直催老黄，顺口就低低地唱起莲花落：“叫老黄，快快干，误了开戏不好看。”“黄师父，你快作，误了开戏吃家伙。”老黄急了一大会才急出一句话来说：“我我我只有两只手呀？”老张连停也不停又唱：“不管你有几只手，吃了家伙难开口。”小孩们都嘻嘻哈哈笑他唱的有趣。

铁则是老张的孩子，见他爹管往灯里插蜡烛，他一点也不放松，把烛把子一根一根都弄到他手。鱼则向他耍，他举得高高的不给。小胖仗凭力大，从背后把他抱住叫“鱼则！快抢！”还没有等鱼则下手，小囤手快，一把就夺过去了。大家见烛把子都到了小囤手里，一轰就把小囤围起来。小囤见走不了，就说“咱们分吧！一个人先分两对！”大家说“行！”小囤一手把东西举得高高的，叫一个名，发出四根，叫一个名，发出四根。这里也有别的孩子们等着领，可是小囤仰着脸不看他们，只是念放牛坡上的那一伙人的名字。他顺口念到二和名下没有人答应。别的孩子们都说：“他没有来，先给我们发。”放牛孩子们说：“你不知道二和怎么啦？”小囤没有等他们说也想起来了，把举着的东西放下来：“二和还在家哭啦！咱们先去叫他吧！”小胖说：“分了再去！”小囤说：“可以。”小囤这会也不再举起手，也不细数，放牛的孩子们也愿意叫他快快发，伸了一圈手来接。小囤花啦花啦发了个差不多，便说：“这算我跟二和的吧？”他们也都不再计较，都说“走吧！走吧！”说着就去找二和去了。

放牛的都走了，别的孩子们仍然围着老张抢烛把子。这时候社首王海从社房楼上的窗口伸出头来叫道：“上菜吧！”往上端菜的是小管的爹。他听王海一喊叫，接着就在庙院里喊叫小管，老刘答应他“小管到我家去了”，他就不喊了。老张仍然是一支一支插着蜡烛，口里仍唱着莲花落：“叫老黄，快快快，社房楼上上了菜。”……小管他爹见小管不在，自己便拉过木盘，端着第一碗海参上了楼。

楼上，一桌坐着六个人：王光祖坐在中间一把圈椅上，左边一条凳子，坐着两个社首——一个叫王海，是王光祖的本家弟

弟，另一个叫赵起，右边一条凳子也坐的是两个社首——一个叫赵永福，一个叫李恒盛；下位偏左放了个方凳，坐的是学校先生，右边留了个口叫上菜。

小管他爹把吃光了的酒菜盘向四边一推，摆上海参碗又退下去。李恒盛便先举起筷来在碗上点了几下，笑嘻嘻向王光祖打着招呼说：“来吧来吧！趁热！”大家也都举起筷来等着王光祖。王光祖也不谦让，懒懒地拾起筷来，先夹了一片，大家也就跟着夹下去。王海才把第一片送到嘴里，觉着很烫，吸了几口气，然后嚼着说：“好！又热又烂！”他觉着坐在离王光祖最近的座位上，随便评论一两句菜的好坏，才能算比别人高贵些。赵起觉着能跟王光祖坐在一个桌上吃一碗菜，已经够不错了，再要扳着说个什么那是不知趣，因此不预备开口。赵永福接着王海的下音说：“好是好，可是不敢算账！这一碗菜至少值一斗小米！”王光祖轻轻看了赵永福一眼，微微有点发笑。王海顺着王光祖的意思向赵永福开玩笑说：“你也算枉当了多半辈子财主，连半斤肉也没有买过。”李恒盛是小户人家，跟人家三个人凑到一处，本来不相称，可是时时总想跟人家往一处凑；见人家说得很热闹，早就想凑几句，只是一时想不起说句什么话合适——顺着王海说吧，怕赵永福不满意；奉承赵永福几句吧，又不合王光祖和王海的意思；不说这个另说个别的什么吧，又跟人家两个人的话连不起来。他猛一下想起一句合适的话来正要去说，可是已经冷了场，人家都又吃起菜来，话误了菜可不敢误了，他赶紧也跟着去夹了一块海参送进嘴里。吃了一口菜之后，他又觉着费很大劲想好的那句合适话，不说一说实在可惜，就拿了一拿劲说：“永福老哥虽说没多吃过好东西，可也没有……”他正说着“可也没有枉花过钱”，可巧遇着王光祖

开了口，把这句得意的“合适话”碰散了。原来王光祖没有心事听李恒盛说什么，只看见学校先生因为是个晚辈有点拘束——话也不说，菜也吃得很客气，便叫着他的名字向他说：“宝三！你吃你的！不要拘束！”就是这句话把李恒盛的话碰散了的，李恒盛直到吃了几碗菜以后还觉着可惜。

吃了几碗菜，王光祖想起继圣要上高小的事来，顺便向大家道：“继圣他姨夫说叫继圣秋后上高小念书啦。你们哪家的孩子愿意去的话，这倒有个作伴的。”在黄沙沟村，王光祖和别人坐在一处，总是别人先跟他说话，很不多见他先跟别人开口！要是他先开口，那一定说的是和他自己有利的事。这一次也不特别，表面上好象说情愿用我的孩子给你们的孩子作伴，实际上想在人家的孩子们当中给自己的孩子找个作伴的。他这样一开口，在座的人都觉得人家愿意把人家自己的孩子跟咱的孩子算成一类，实在是件光荣的事。特别是李恒盛：他听了这两句话，高兴得两只手就在头上乱搔，嘴里的菜也顾不得往下咽就来接王光祖的下音。他说：“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念书好。我这一辈不识个字，心里实在闷得慌，实在想叫我宿根多念几天书，可惜是供不起。我宿根跟你继圣……”他一股兴头正往下说，见王光祖把头转向赵起那边去说话，也就只好半路停住。其实王光祖向大家说孩子上学的事，并没有把他算在数里；见他先插嘴已经觉着够讨厌了，哪还能一直听他说哪样长，因此便把头一转去问赵起。他也不是特别看得起赵起，只是觉着赵起的孩子满土老实，又比继圣大一点，早晚从学校回来跑跑，到路上能招呼招呼继圣，这才向赵起说：“你啦！叫你满土去吧？”赵起是个小疙瘩户，无心爬高，只觉着孩子能守着原盘日月就好，因此就说：“我趁啥啦？还供得起那个？”不等王光祖再

来劝，王海就替他来劝赵起说：“去吧！你这小疙瘩户怕啥啦？咱们也叫孩子们赚几个轻巧钱吧，难道就只能辈辈当山里的老土？你要能叫满土去，我也能叫我喜宝去。”就这么几句话，已经把赵起的心说动了一点，不过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就含含糊糊说：“我怎么敢跟你比？不过这会念书听说也不花什么钱，回头想想看吧！”王光祖见赵起有这心事，又接着淡淡地劝了他几句：“没什么花消，只是管自己孩子一点吃。在家不吃了吗？”说到这里，馍上来了，大家都取了馍。李恒盛见王光祖不理他的话，一大会了总觉着脸上灰灰的，早想找几句话解一解，只是插不上嘴，这会见大家不说了，就又想补个空子。不过他这会不敢再去王光祖名下找丢人，就避开王光祖向赵永福说：“老哥！叫你小记也去吧？”赵永福笑了一笑说：“咱还挖咱的土吧！”王海说：“你跟他说那干啥？人家有一斗谷，春天放出去秋天就能成一斗半；一块钱放出去，一年能多三毛，怎么舍得弄这个？”赵永福正想分辩，排戏的来请点戏，把他的话打断了。

四个社首都不懂戏，村长王光祖又不好看戏，就把这事推给学校先生。王光祖向先生道：“宝三！你到楼下跟他挑戏去吧！要是不知道什么好，可以问一问聚宝！”先生便和排戏的一同下去。王海见排戏的已经来了，庙院里的人也轰隆轰隆的了，只是庙院还黑黑的，就向窗口喊叫：“聚宝！怎么还不点着老灯？”这时候，小管他爹也端上漱口水来了，大家也都吃足了，便都离开了座。四个社首都戴起帽子来去烧香。

这聚宝原来是个碾磨子的石匠，可是很懂戏——也会看也会唱。他碾起磨来也是手里碾着嘴里唱着，锤就是他的梆子，碾得慢了唱流水，碾得快了唱垛板。附近几个戏班子里都有他

的熟人，哪一班唱什么戏得手他也都知道，因此本村每逢唱戏，大家都愿意请他来挑。他拨戏台上的大油灯拨得很有把握，因此社里每年总是派他管老灯。不过他有一股别扭劲，只会说一股老直理，人送外号“碾磨锤”，理说顺了怎么说怎么应，要是惹起他的脾气来，什么难听他就说什么。这一回他才去点灯就弄了个别扭：王海喊叫他点灯，他正提了个油罐上到台上，先生又叫他点戏。先生见他上了台，就挤到台跟前仰起脸向他说：“聚宝！你给咱点戏吧！”他说：“可以！等我点上灯着！”先生站在台下等，等了一会，见他才点着了一盏，就催他说：“就且点着一盏吧，村长说叫你去点戏啦！”先生就多说了个“村长说”就惹起他的脾气来了。他说：“我不管！点灯能派差，点戏可不能派差！”台下另有人劝他说：“去吧聚宝！这不是派你的差，是我们大家请你去！请你给大家点几出好戏看看！”他说：“你叫先生说清楚，看究竟是大家请我去呀还是村长派我去？”说罢仍然点他的灯。先生知道他素日的脾气，因为怕耽误时间，也只好说：“去吧去吧，是大家请你，不是村长派你！”他也没有再说什么，仍然是先把灯点好，才跟先生去点戏。不大一会，戏点出来了，戏牌挂在台口柱子上，正本戏是《天河配》，搭戏是《铡美》、《下南唐》、《杀狗》，大家都很满意。

拜亭上烧着香，戏台上排着场，庙门口进着人，眼看快到开戏的时候。这时候，忽然从庙门口闪进一道亮光来，正往庙里走的人们往两边一裂，那亮光好象更大了些，从中间的人缝中穿到庙院里。大家向门口一看，老驴点着村长的马灯在前边领着路，继圣他娘、他姨姨、天命、继圣、马先生，都挨走进来，后边跟了两个长工给扛着两把圈椅。

王光祖在楼上看见马灯一晃，就知道是马先生他们来了——因为村里再没有第二盏马灯——急忙下楼来迎接。老驴见他接着马先生往拜亭上走，天命和继圣也跟着到拜亭上去，就不去管他们，点着马灯把继圣他娘和他姨姨送上社房楼上对面的东敞棚楼上。这座楼是专叫妇女们看戏用的，前边也只有栏杆没有墙。她们两个来得迟了一点，靠栏杆的一列已经排满了板凳坐满了人，按常理她们只好坐在后边，可是她们这两个人就不能以常理论了：上年纪的老婆们见人家这些贵人们来了，不用等人家开口就先给人家躲开；年轻的媳妇们舍不得让开前边的座位，婆婆们就怪她们不懂礼体，催着她们快搬了板凳；十来八岁的小孩们，就更简单——他们连凳子就没有，只是靠栏杆站着，老驴只向他们喊了一声“往后”，他们便跑过后边去了。逼过了大人，撵过了孩子，长工把椅子排好，打发她们两个坐下，老驴这才提着马灯领着长工们下去。椅子本来就要比板凳占的地方大许多，再加上是圈椅，逼得后面的板凳离她们至少也有五尺远。

王光祖领着马先生往拜亭上走，拜亭上才烧过香的社首们也笑脸相迎。可是拜亭上也不是个清静客厅：喜宝、满土他们一伙学生们才在这里抢完了烛把子；小囤他们去叫二和回来，见蜡烛已经插完了，扑了个空，可是也没有马上跑下拜亭，只是跟喜宝他们合了伙，来比谁得的烛把子多；大人们，不论是本村的、外村的、男的、女的，也有好多都在上边游来游去看灯。先生见王光祖和马先生上来了，一边跟马先生打着招呼，一边横起两条胳膊撵着拜亭上的大人们往下走：“闲人都下去！下去叫客坐！”本村人不是客，自然都下去了；外村人虽然是客，可也知道先生说的那客不是说他们全体，除了几个穿

长衫的跟王光祖和马先生打过招呼留在上边以外，其余的也都把自己算成“闲人”走下来了。“闲人”下来以后，社首们叫打杂的增加了些椅子板凳，让王光祖他们这几位更“闲”的人坐。这时候，拜亭上的人物只是有数的几个了：王光祖、马先生、本村学校的先生任宝三、四个社首、外村几个穿长衫的和天命、继圣两个小孩。他们有的遛跬着，有的坐着，有的摇着扇，有的背着手，在他们看来，拜亭上只留这几个人才能算有次序。继圣又换了一套花衣服，把联锁绳换成了银项圈，和天命两个人半通不通地念着宫灯上写的诗句，引得别的穿长衫的夸奖他们的聪明。别的孩子们见他两个也是小孩，能在拜亭上玩，又凑上去试试，可是没有上到台阶上，又被社首李恒盛赶下来。马先生在黄沙沟附近这一带好象是圣人，扳得着他的人见了总是问长问短。这次王海问起他宣统皇帝复位的事来，他便谈了一顿国家大事，给大家讲了讲出了个“满洲国”，出了个“北平政务委员会”，还有什么“塘沽协定”，不过他只是说明有了这些东西，一字也没有说这有什么利害关系；听的人就连这个也还没有完全听懂。

戏开了，他们嫌拜亭上离得太远听不清，叫打杂的又在庙院上半院排了些桌椅，摆了些梨儿桃儿，然后从拜亭上移下来坐在新座位上。他们仍然谈他们的，两个孩子先把桌上的梨桃装满了自己的口袋，然后跑到东北楼上找他们的娘去了。

戏开了他们就谈戏。从这戏的东家到有名的角色，马先生都知道。提起这戏的东家来，马先生说是城北关三益堂的戏，说这三益堂从明朝时候就是财主，从家里起程往周家口走，一路上都有自己的生意，可以不住别人的店，说得赵永福吐了吐舌头说：“妈呀！我常想戏上穿那些绸缎衣裳，贵巴巴的谁

买得起，不想人家那财主就那么大！哪来那么多的钱来？”说得大家都笑了。马先生说：“出一班戏能花人家几个钱？人家家里七八十口，子弟们也有作官的也有念书的，有在省里的，有在各县的，还有在北平和南京的。县里出北门五十里哪村没有人家的地？一亩地七八分粮银，人家名下就有一百多两。要说外边那些大地方，哪家银行有多少存款，哪家大公司有多少股本，除了人家自己那就谁也不知道了。”他这么一说，不说赵永福，就连王光祖也叫他吓住了。

《天河配》是老熟戏，又是文戏，唱起来大半天不动锣鼓。他们虽然坐了个好地方，可是也不细看也不细听，只是大声谈他们的话，谈话的声音把台上的戏都压住了。谈到了这本戏，马先生说是老俗戏，也是单边戏，使不着大角色。王光祖说：“要不你点一回吧？”还没有等马先生答话，他就随着向台上喊：“喂！叫你们的排戏的来一趟，马先生要点戏啦！”有人要点戏，戏班里自然愿意，打发了个唱旦的拿了个写着戏本名目的笏板来了。马先生接过来看了一下，点了一出昆曲《游湖》，那人便接住打了个千儿去了。

不大一会，《天河配》半路停住，就开了《游湖》。不过一台下的看戏的，差不多都没有马先生那样风雅，都急着要看牛郎织女成亲，不愿听那呜呜哇的昆曲，就哼哼唧唧地议论起来。王海看见前边站着的人头乱动，恐怕扰乱了王光祖和马先生的兴头，就高声大喊：“不要乱！好好听！”大家又稍稍安静了一点。可是聚宝偏不服劲：他见把他挑的《天河配》停了又开了《游湖》，早就有点不耐烦；赶到听见王海说“不要乱”，他就接着说：“不要乱？姓马的有钱，雇上一班戏回他家里唱去，管保一点也不乱！”他说得不高不低，近处的人听

得很清楚，都觉得这话很得劲；王海和马先生他们也听见了，可惜没有听出是谁说的，也无法追究。凑巧的是人越来越多，戏虽是开了一会了，路远一点的人才赶到。王光祖他们的桌子前面，起先还有空子，后来越挤越近，挤得他们一点也看不见，王海虽然屡次喊叫“往前一点”，可是人多了，挤得都由不了自己，一点效果也没有，他们只好站起来。聚宝听王海喊了几遍，又自言自语说：“往前？这会可使不上你们那威风了！”这一回王海可听出这话是聚宝说的，有心骂他几句，又怕丢了自己的身份，想了一想，就变了一个样子来发作。他象发紧急命令一样，喊叫一声：“聚宝！把灯拨亮！”聚宝看见灯着得好好的，知道他是故意发脾气，就顶了他两句说：“挑刺也要看看眼对不对，这灯还不亮？”王海丢不下人来，提高了嗓子大声嚷着说：“叫你拨你就得拨！有什么说的？”他这么一说，惹起聚宝的火来。聚宝起了脾气，谁的账也不认，听了他的话，扭回头来对着他喊：“我不拨你把我怎么样？我早就破出来了！看你能把我的手剁了不能？”王海虽然也跟他对吵，可是没有他的声音高，被他的声音压住。他越嚷越起劲：

“只叫你们活吧！东西楼上、拜亭上、台上、台下，满庙里都成了你们的世界，哪还有别人活的地方？”王光祖早就忍不下去，但发作起来又怕顾不住自己的身份，因此只让王海去压服，自己没有亲自动神色。赶听到这里，觉着非亲自开口就再压不下去，便跳起来喊：“把他捆起来！没有见过这么野的东西！”可是没有等他的话落了音，前边的人一动，后边的人抗不住，花啦一声往后一倒，跟河涨了一样，把他们连桌椅带人，一齐都挤倒了。聚宝还在人群里喊：“捆吗？我犯了什么罪？”说着就从人群里闯了一条胡同走出庙去。王光祖手下虽然有几个

小喽啰，可是自己都知道不是聚宝的对手，谁也不敢去拦挡。这么一闹，人都乱起来，戏也停了，有些怕事的都挤出去走了，庙里才算又松动一点。

老驴把王光祖跟马先生扶起来，王海他们也都爬起来。王光祖听说聚宝走了，就下命令说：“去捉去捉！这还了得？”王海和李恒盛带了几个人去捉聚宝，王光祖和马先生回社房楼上休息。戏又照样唱起来。一会，王海他们回来了，说聚宝早就背着他的锤钻走了，家里只留下了煤墩火柱，一口砂锅，一只碗，还有一口破水缸，一条破席子。

王光祖觉着对着马先生，本村就敢有人这样不给自己顾面子，说是非办不可。还是马先生说：“算了，张扬出去跟着他丢人。”这才算把一场风波平息过去。老刘瞅了个空子找老驴，请老驴到庙门外吃了几个油糕，托他到王光祖面前替二和讲情，叫把二和再收回去。老驴说：“这不算啥！小孩们能不吵架！不过二和的嘴太强，你以后要劝说着他些！”老刘一边连声答应，一边把大和打了一天忙工赚的工钱开了油糕钱。

继圣他娘和他姨姨，自从庙里吵过架以后，就没有再看戏，挤过这边社房楼上来看王光祖和马先生受了伤没有。继圣和天命也跟过来。他们早就想回去了，只是嫌人多不好往外挤，赶到唱完了《游湖》，老驴把二和叫来，当着王光祖的面骂了二和几句，算是做了开解，然后叫二和提上马灯，仍叫长工搬上圈椅，自己拉着继圣的手。二和在前领着路，马先生、王光祖、继圣他娘、他姨姨、天命、老驴、继圣八个人摆成一串走在中间，两个长工搬着椅跟在后面，一同走出庙去。庙里的人们见他们去了，觉着庙院猛一下就宽大了许多。

四、也算翻身

聚宝自那次跑出来，十来年没有回黄沙沟去：抗战以前，怕王光祖，不敢回去；抗战时期，被日本人修的正太铁路把他隔住，不能回去；日本投降后，他已经在路东找下个落脚处，又在斗争恶霸时候分得些果实，村里群众又对他很好，因此又觉着不必回去。

又隔了十来个月，他忽然又想回去看看。因为有一次路西来了一个人，说那边也到处有群众运动，把那些吃人咬人的先生们都斗倒了。他问了一下被斗的人们都是谁，那人数了一大串名字，他只知道两个——一个是那年在黄沙沟唱的那戏的东家三益堂，一个就是王继圣的姨父马先生。他问起王光祖，那人不知道，没有听说。这一问引得他想回去看看这王光祖究竟落了个什么结果，因此就回去了。

走了十来天，这天半后晌，就到了他的老家黄沙沟。

当他走到离村半里的地方，早看见好多人在河滩一块地里割麦，数了一数，共是七个人，除了一个穿土色衣服的，其余的六个，都穿的是雪亮的白小衫，戴的是崭新的大草帽。这些人都割得飞快，好像在地里跳舞，嘴里还不知道唱些什么，割着唱着，一会就打起来了，一会就又笑起来了。这是黄沙沟的好地，麦子长得有胸脯高，大约有五六亩。他把这一片地，一块一块数算了一下，数算着这一块是王光祖的。他想这一定是归了翻身户，却不知道是归谁了。

赶到他走近了，割麦的人也都看见了他，停住了手望着他

仔细端详着。有个白胡须老汉（就是那个穿土色衣服的）先认出他来，叫了一声“聚宝”，年轻人们也有叫大爷的，也有叫大叔的，都跟着老汉笑眯眯的来招呼他。

这老汉就是老刘，他认得；其余的年轻人看起来有些还没有大变了样子，可是一时叫不来他们的名字，只觉着和他们上一辈的人们年轻时候有点一样。他一边说话一边想着，慢慢又认出一个大和来。那些青年人们都故意和他闹，这个说“大叔你认得我是谁”，那个说“大爷你猜猜我叫啥”。他觉着这伙人蹦蹦跳跳实在可爱，引得他哈哈大笑。一个粗大个子青年说：

“大爷！放下歇歇！”说着就从他的肩膀上替他卸下行李。他坐下了，大家也跟着他坐下。老刘说：“你还背着你的碾磨锤？”他说：“凭什么敢把这个丢了？”

经过老刘介绍，才知道这几个青年的名字：给他接行李的那个是小胖，跟大和面目差不多的那个是二和，其余的三个是铁则、鱼则和宿根。他看着他们的新衣帽，笑着问：“大家都翻了身了吧？”

“翻了！”好几个人齐声答应。

“咱村都斗了谁？”

“斗了谁？老光祖！”“王海！”“赵永福！”七嘴八舌答应着。

小胖用嘴指着宿根说：“还有他家！他给人家通风报信就捎带了他一家伙！”宿根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

聚宝的心落实了，心里暗暗得意，好象对王光祖他们说：“试试！你狗×们再厉害？”他又故意问二和说：“二和！再也不用给王光祖放牛了吧？”

没等二和答应，小胖插嘴说：“人家二和早就升了，从继

圣升中学那一年，人家就从放牛孩升成长工了！”

聚宝笑了一笑说：“如今总不干了把？”

小胖说：“不？还吃人家的饭，还给人家干！”

聚宝说：“奇怪呀！不是翻了身了吗？”

小胖说：“也算翻吧，只展了展腿！”

聚宝说：“为什么不翻个透彻？”

小胖说：“为什么？”又指着老刘、大和、二和、铁则、鱼则说：“这几个人？算了吧！教着曲也唱不响！背地里不论给他们打多少气，一上了正场就都成了闷葫芦了。自己不想翻，别人有什么法？”

大和向聚宝说：“老叔你不摸内情：人不能跟人比，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本事。小胖人家是武委会主任，嘴一份手一份，能说能打；象我们这些人，平常只在黑处钻着，上了大场面能说个啥？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说出去谁知道是啦不是啦？”

老刘说：“我看也翻得可以。就说我家吧：咱是一筐一担逃荒来的，黄沙沟没有咱一砖一瓦一垄田地，如今咱住的那座房也算咱的了，咱在三角坪开的那块荒地，这几年展到七八亩，也算咱的了；这还不够好？就是不该把老婆饿死了来！……”

聚宝问：“怎么？老嫂不在了？”

老刘说：“唉！不提她了！灾荒年饿死了！怨她没有命，要活到这时候来死了也放心些！”

宿根半天插不上话，见说起这来了，他也趁空开开口：“老叔你还不知道啦：咱村过灾荒年饿死了好几十口——小囤他爹、小管他娘……”

小胖说：“数那些做甚啦？数到天黑也数不完，我看还是说说别的吧：你这十来年都在哪里来？”

聚宝说：“在路东，太行山里，也没有一定的地方，哪里有磨就到哪里碾，近二年来才算有个落脚处。这些说起来话长，咱们回去再谈吧，你们先告我说斗王光祖斗得怎么样？”

老刘说：“斗得也不轻，如今只留下三十来亩地了。”

小胖说：“不轻？可算是没有斗好，只把些远地给了群众，还给人家丢下三十多亩好地近地。这不是？这些地还是人家的，你看这麦长得多高？”

聚宝愣了一会说：“怎么还能把这么好的地给他丢下？那你们翻了个什么身？”

二和半天没开口，这会也说话了。他说：“说起来咱也算翻了身了，可是咱还是人家的伙计，人家还是咱的东家！”

小胖说：“那怨谁？没有叫你们多提意见？”

老刘看了二和一眼说：“算了吧！不要太不知足了！给人家当伙计还不是咱愿意？咱三角坪那点地，用得着咱父子三个人种吗？咱给他当长工他给咱工钱，我还找不上个主儿啦，人家每月愿意花八十斤米，还不给人家住？”

小胖笑着向老刘说：“你这老人家不会打算！你的地不够种不能多要他几块？一定要给人家留那么多，回头再去给人家当长工？”

老刘说：“你们如今说那里我就听不过去！人家就只有那么多的问题，也不能给人家没有窟窿去钻眼呀！咱一辈子虽说穷可穷得干净，不会说那些讹人话。”

小胖说：“那能算讹他？你父子们给人家受，人家睡着吃；人家吃胖了，把你们吃干了；过灾荒年，人家关住门吃饺子，

却饿死了你的老婆，你好好想想这账该跟谁去算？”

二和说：“俺可知道俺爹又要说啥啦！‘那还不是咱的命穷？’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大家都跟着笑起来。

笑得老刘不好意思了，老刘翻了二和一眼说：“你笑啥！那是正经话！”他这么一说，大家更笑得厉害了。

“就斗了个这？”聚宝觉着很泄气。他又问大家说：“王光祖总不能还是村长了吧？”

小胖说：“那倒不是了。如今的干部没有一个旧的，也没有一个老的：满土是村长，小囤是政治主任，满囤是农会主任，小管是副主任。”

聚宝问：“都在家吗？”

小胖说：“村长在家，政治主任跟农会正副主任都到区上受训，明天就回来了。”

聚宝又问：“王光祖那颗种(就是继圣)成了个什么器？”

小胖说：“上了半年中学日本就打进来了，后来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如今在村里合作社管账。”

二和指着路上的一个人说：“老驴来了！”大家随着他看了一眼都拿起镰来。小胖说：“怕他做甚啦？不许歇歇？”

聚宝问：“你们是给他打短工吗？”

大家说：“我们是个互助组。”

聚宝站起来，一面背他的行李一面说：“咱们晚上再谈吧！我先回去了！”

大家也都说：“好！你先回去歇歇吧！”大家送他走了，又都割起麦来。

小胖忽然又想起个问题来，远远叫着聚宝说：“聚宝大

爷！你的房子坏了！你可以先到我家吃顿饭，叫村长给你找个房子住！”别的人，也都喊着“到我家吃饭吧”。聚宝远远的点头招手，向大家道谢说：“好好好！”

聚宝回到村里，在街上没有碰到一个人。他没有先去找村长，却仍回到他那破房子里。他进去一看，哪里还像个房子？席子大个房顶就塌了箩头大三四个透天窟窿，门窗上早已没有一片木头，地上早成了泥堆。他看了独自一个人发笑，心想“像这房子，就是不坏了吧，能算个什么东西？费了十来天工夫回家，就回了这样一个家？”看了一会，觉着没甚意思，仍然背着行李去找村长。

他走到满土家，见有个年轻媳妇在院子里做饭。他虽然认不得她，猜也可以猜着是满土老婆，就问：“村长在家吗？”那媳妇先告他说不在家，接着又盘查了他半天，才又告他说村长在合作社。他又问了合作社的地点，就往合作社来！

快到合作社门口，见个小孩子拿了个小口袋，里边不知装了些什么东西也往合作社走，和他同时进了合作社门。

合作社里柜后坐着四个人，是王继圣、满土、喜宝和宝三（就是从前的学校先生）。他们见了聚宝，都觉得有点奇怪，差一点要问“你怎么还在！”可是谁也没有这样说出来，都只说了声“回来了大爷？”聚宝和他们点过头，他们又都问些“从哪里回来”“这几年都在什么地方”，聚宝一张嘴只好慢慢答应。

就在这时，那个小孩把他手里的小口袋向柜台上一搁说：“换盐！”他们只顾和聚宝谈话，没有理。那小孩又催了几遍，把个继圣催烦了，便教训他说：“等一等！你就没有看见有客？一点眼色也没有！”小孩说：“家里急着吃！”继圣说：“就等一会吧！”聚宝看见不像话，就向继圣说：“你先

做生意！这又不是生客！”他虽是这样说，继圣仍是先让他坐了然后才给小孩换盐。

继圣这会聚宝似乎很好，他一边量着小孩的麦子，一边向聚宝说：“大爷！放下行李先进来歇歇！”喜宝和宝三也好像很亲热的让着，只有满土却真是实心实意的让着，一边说话，一边便从柜后来接他的行李。聚宝看了继圣和喜宝两个青年的面貌，就想起王光祖和王海来，心上实在有些不痛快，因此也就不想跟他们两个人的后代坐在一处。可是满土对自己无仇无冤，自己又要找人家谈房子的事，人家又是一番好意让自己到里边坐坐，怎么好意思推委呢？两种心事一比较，还是进去对，他便把自己的行李向柜台上“咚”的一丢，一跃身进到柜台里边，回手又把行李抓起来丢在里边的地上。满土说：“大爷还是这么大精神！背的还是碾磨锤吗？”聚宝笑了笑说：“那是吃饭家伙，还敢不背？”说着就和喜宝、满土一同坐下。

他两个仍向聚宝说了一些见面话，——无非仍是“这几年在哪里来”，“回来走了几天”，“那里的麦子好不好”……一类的话。继圣打发走换盐的孩子，宝三记了眼，也就凑来打招呼。

继圣、喜宝、宝三和满土四个人同时欢迎聚宝这位稀客，可是心事不同；满土只是觉着奇怪，觉着这十几年没有音信，不论谁都忘记了的一个，现在忽然又回来了，真是想不到的事。宝三虽然和王光祖他们接近一些，可是向来也没有对不起聚宝的地方，心里也平平的。继圣和喜宝两个人的心情就不那么简单。——聚宝是怎样走的，他们那时候虽然是小孩子，却还记得个影儿。年头腊月黄沙沟搞群众翻身运动，他们俩家虽然也挨过斗争，可是并没有人替聚宝提出问题。如今聚宝这人已经

是回来了，他们觉着在这种年头，再加上聚宝的“碾磨锤”脾气，很难保不生事，因此一见面心里先有几分不自在，不过他们两个也和他们的老子们一样，一上场都有一套，并不像一般老实人们，有什么心事都带在脸上。他们连商量也不用商量，一见聚宝这个老冤家，就知道用什么法子对付，因为在年头腊月他们就是用这种法子对付过好多对他们有意见的人，结果取得很大的胜利。他们的法子，就是灌米汤，说软话，叫几声“大爷”“大叔”“大哥”，送一些小礼物小人情，把人弄得不好跟他们当面破脸皮，把一场斗争弄成了个“水过地皮湿”，有那么一回来就算了。这次一见聚宝，自然无须商量，就拿出那一套老法子。

继圣打发走了换盐的孩子，掉过头来笑嘻嘻向聚宝说：“大爷！真想不到还能见上你！”说着站起来把脸凑近聚宝的脸，好像说什么秘密话一样，低低的说：“大爷！先喝一壶吧！”又转向喜宝说：“喜宝哥！先去炒一盘鸡蛋！”喜宝答应着去了，继圣不等聚宝答话，就拿起酒壶来到酒坛边灌酒。

聚宝赶紧起来按住他的手说：“不不不！这几年闹咳嗽，一盅也不能喝！”继圣仍是要灌，聚宝坚决不让，也只好罢了。喜宝拿了个炒锅进来舀油，继圣说：“算了！人家大爷不喝！”喜宝又让了一会，结果仍是不喝。

其实聚宝很好喝盅酒，虽然老了还没有断过，只是人不对劲不喝，勉强喝起来一喝就醉，醉了马上就要闹起来。他才回到村里，不想先闹这一手，因此坚决不喝。他俩人见他实意不喝，也就不再让下去，四个人又重新坐好。

继圣说：“大爷呀！你这十几年算是运气好，没有在家，咱村里可真是遭了大难了！敌人又扰乱，又闹灾荒，实在死了

些人了呀！像你们这老一辈的人，真没有几个了！”接着把五十岁以上的人，死的活的都数了一遍，末了又夸赞了一遍聚宝的运气好。他说这一大段话的用意是叫聚宝再不要把那次离开家乡的事放在心上，好像说：“幸亏那年我爹把你赶走，你才免了这场大难，要不一定是已经死了。”他一边说一边看喜宝，喜宝早就觉着他这段话说得很得劲，笑着向他点头，又把这十来年的灾难更详细的补充了好多。他们两个虽然有一番用意，聚宝却只当做平常话来听，因为聚宝在这十几年来经过的灾难并不比他们小。他们满以为聚宝听了他们的话，一定很吃惊，一定要再向他们细问端底，不想聚宝听了，只说了一声“到处都一样”，把他们原来的用意弄得落了空。

继圣要跟谁故意亲热起来，有一套大本领，就是话头拉不断，一点也不至于叫人看出空子来。他见聚宝说了个“到处都一样”，也就把话头一转说：“是吗？那边也是这样吗？那么咱们都是死里逃生的人了。唉！在这些年头，咱们这些逃过劫来的人，能碰到一处，真是难得呀！”

他正预备再往下说，轰隆轰隆走进许多人来，老的也有，小的也有，七嘴八舌，一齐向聚宝打招呼，聚宝答应不过来，只好站在柜台后点着头向大家打“啊啊”。原来这时候天快黑了，有个互助组从地里回来经过合作社门口，听说聚宝回来了，就都来看望。接着别的人们也陆续跟进来，把个合作社柜台前边挤得满满的，门里门外都是人。原来这聚宝是个好拉好唱的老孩子头儿，听说他回来了自然都要来看看他。

后来进来个老太婆——是老张老婆，铁则他娘——端了一升麦子，大家给她让开路。她慢慢走到柜台边，把升往柜台上一放说：“要一条鞋沿口，买五寸白布，买点麻，买点盐，买

点……”继圣截住她的话说：“算了算了！一升麦早就不够了！你光说买点这个买点那个，你就不知道一升麦价多少钱，你要买的那些东西值多少钱？”老张老婆说：“我不知道，凭你算吧！”继圣向大家说：“你们都看看这生意怎么做？拿了一升麦，就念了那么一大堆东西！凭我算怎么能算得够呀？”又捏起一颗麦来咬了一咬说：“麦子又这么湿！”又向老张老婆说：“这只够买白布跟鞋沿口，余也余不下几个！”老张老婆说：“够什么就买什么吧！”宝三用柜上的升去量麦，聚宝问：“这是老张嫂吗？”老张老婆自进了合作社门半天还没有抬头，听得有人跟他说话，这才抬起头来。她一看见聚宝，认了一大会也认不准，慢腾腾地冒叫声“聚宝？”她虽是这样叫了，却还不知道确实是不是，等到聚宝答了话，她才知道没有认错，就接着说：“唉！你还在？”聚宝说“在！你也还在？老张哥也还在？”老张老婆说：“在！唉！可不是还在吧，死了谁受啦？”聚宝说：“不是翻了身了吗？”老张老婆说：“唉！翻不翻吧！我看都不差什么，反正咱这命还不是活到老受到老？”继圣本来才把五寸布给她撕下来，还没有给她拿出鞋沿口，听她说到翻身的事，不愿意再听她说下去，就打断了她的话，问她“余下的钱还是要盐，还是要别的？”她听了这一问，就把与聚宝说的话截住，向继圣说：“还能买多少麻？”继圣说：“能买一两？”她说：“一两麻也不济事，那就买成盐吧！”继圣也没有再说什么，叫宝三给她秤了盐，她又与聚宝应酬了几句就去了。

打发走老张老婆，宝三拔开笔去记账，继圣向大家说：“你们看这生意怎么做？一升麦就得出好几笔账：又要入卖货钱，又要出买麦钱，麦价又不能一样，干啦、湿啦、好啦、坏啦，看

麻烦不麻烦？”他这样议论着，大家着起耳朵听，不知道是谁也跟着说：“可也真是麻烦事。”他见他的话大家注了意，又有人同意，就索性丢开聚宝扭过头来又向大家说下去。他说：

“不干什么不知道什么难干：拿一升麦，换好几样东西，你说不给换吧，三厘两毫都是个东家，给换吧，赚的钱不够记账的纸钱。到每期结账时候，大家都嫌赚的钱少，不想一天尽做这种生意，怎么会赚了钱？”听话的人，跟在台下听讲一样，都只是瞪着眼睛听，都觉着人家比自己想得透彻。

聚宝对继圣的话不同意：他在别的合作社入过股，见人家柜上的生意并不比这个不麻烦，可是每期结账以后分的红并不少。在继圣说话时候，他预备插几句话，因为不了解村里过去的情形，也就算了。

他本来是来找满土给他找房子，可是一进来就被继圣他们几个人麻烦住，听了半天虚情假意的亲热话。他早就觉着没味，可也走不脱，最后见继圣对老张老婆的态度那样坏，还要强造出一大段高明的道理来，跟给村里人上课一样吹了半天，实在是越看越不顺眼，好在村里人也都来看自己，才把这些闷气解了些。他觉着这会走的时候了，再迟了怕继圣再说起什么亲热话来，因此便向满土说：“看我这记性多么坏！我来找你谈甚啦，就扯起闲话来忘了！我那房子塌了，请你给找个住处暂且住几天。我到你家里去了，家里说你在这里。……”

还没有等满土张口，继圣的亲热就又出口了。他说：“那容易！房子有的是，村里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哪个院子里也有闲房子！依我说呀！你也不用找房子了；咱合作社后院那西楼上闲闲的只放了几包棉花，你就在那上边住也不用起火，合作社里给你带做点饭，不省得每天麻烦吗？”聚宝对这一套已

经听够了，赶紧向他摇着手说：“不不不！我一个人清静惯了，还是找个地方好！”接着赶紧向满土说：“怎么样？村长？”满土说：“行！你想清静一点，就住我那后院吧，那里边只有小管他们父子俩个。”聚宝说：“好！我就去吧，住哪个房子？”满土说：“我也要回去了，让我跟你去！”聚宝说：“那也好！”说着就从地上提起他的行李，有个青年人说：“我给你送去！”说着就从聚宝手里抢过行李背在自己膀上。聚宝和满土跨出柜台，跟着送行李的青年去了，别的人们也有跟着去问长问短的，也有回家吃晚饭的，陆陆续续都走了，合作社只留下继圣、喜宝和宝三。继圣说：“看那劲儿恐怕还想找麻烦吗？”喜宝说：“你说得对！这人可真难接近，不论说什么他也不理咱的茬，越赶越远！我看你回去还得问一问大爷怎么办好！”继圣说：“走着看吧，对这种人，我爹他能有什么主意？唉！到这种年头见什么忘八吹鼓手都得磕头！”宝三只是顺着他们哼哼了几句。

聚宝到了满土的后院，铁则父子们已经吃起饭来了，又跟他们应酬了一会，满土说：“你也不用做饭了，先在我那里吃上一顿，明天我好给你借些锅碗家具你再起火！”聚宝见他是实意，也就不客气跟他到前院来。在吃饭以前，聚宝问起村里的斗争情形，满土说：“咱村做的很平和，比邻近各村都好！”接着就数了一下哪村打了谁，哪村封了谁的门，然后又说：“咱村一点差子也没有出，虽然也斗了几户，都是自动拿出些地来，拿出些粮食来就算了。”

聚宝觉着满土这个青年人也很好，只是不赞成他说这“平和”。他想王光祖他们作了一辈子恶，大家对他们这样平和，还算什么“翻身”？只是他跑了多半天路，又应酬了半后晌，

有点累了，也顾不得多想这事，胡乱吃了两碗饭，就去睡觉去。

五、打麦场上

满土给聚宝找的这座房子，也不热也不咬，聚宝一觉睡到明，还是小管他爹起来担水才把他惊醒。他起来正准备去找满土借锅碗，小胖就来找他。小胖说：“聚宝大爷！有点要紧活不知道你能给我们做做不能？”聚宝问：“做甚啦？”小胖说：“我们这互助组用的是继圣和宿根两家的场子打麦。继圣家场里的辘轴坏了，宿根家的辘轴有点不正，想请你给洗一洗（就是再碾得圆一点）。聚宝说：“那怎么不能？咱是个干啥的？”小胖说：“我是说你才回来该歇几天再做，可是今天就要用，我才来跟你商量。”聚宝说：“可以可以！”他这样一答应，小胖便替他背起锤钻，引他到家里吃饭去。

吃过饭，小胖扛着杈子扫帚，聚宝背着锤钻，拿了一截高粱秆，相跟着往场里来。这块场子，和继圣家的场子紧靠着，都在继圣院的西房背后（就是当年王光祖一耳光打倒二和的那块场子）。场子上早有宿根、铁则、鱼则在那里摊麦子，继圣家场里有大和、二和弟兄两个也在那里摊麦子。这一天摊的麦子共是四家的：宿根场里是宿根和小胖两家的，继圣场里是继圣和老刘两家的。大和是给自己摊，二和是继圣的长工，给继圣家摊。小胖见大和把他自己的麦子摊在靠场边的一角上，顺路跟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客气？虽说是他家的场子吧，可是既在一个互助组，就有一份权利，不敢往中间摊一摊？”大和说：“我不过四五担，趁个边就行了！”

说着就走到宿根家场里，聚宝把辘轴拉得转了几个滚，看

了一看说：“小头不差，大头差一点！”说罢，放下锤钻，把辘轴上的木框子打了，一脚蹬得滚到场边，双手揪住大头不慌不忙把它竖起来。年轻人们都夸他的力气大，他笑了一笑，打开皮包取出个锥子来贯在高粱秆上，用一个钻尖随着高粱秆的一头向周围一画，偏了一点，他指着这一边说：“就差这么多！”然后把小头翻上来又画了一画，小头果然不差。画罢了，就把它放倒，拿起锤钻，砰砰碾起来。大家见他比量好了，已经动开手，就都去摊麦子去了。

石匠碾起石头来，只是“砰！砰！……”一样声音响到底，可是就这样简单的声音，总能叫附近的人们听得有石匠。他才碾了一道线，就引逗出一个人来。这人也是他不愿意见的，却偏又是来找他扯淡。这人就是继圣的娘，虽然有五十以上年纪，看起来还只象三十来岁的人。近一年来王光祖吃过斗争以后，就不叫她穿新衣服了，可是她把旧衣服洗得很翠，槌得很平，衣服上折叠的痕儿，不论几时都不变样，都象是新从包袱里抖开的，好象她穿着衣服不只没有做过什么，就连坐也没有坐过，迟早是站着的，要是坐一下，一定会把裤子上的折缝弄得不那么周正。她是奉着王光祖的命令出来和聚宝联络联络的。头天晚上，继圣把聚宝回来的事报告给王光祖，王光祖觉着也不敢不理，可是也知道聚宝那干脾气很难说话，只好慢慢想法子。这一会，普通人家吃过了早饭，王光祖也正准备起床，忽然听得外边“砰”“砰”的锤钻响，知道一定是聚宝给谁碾什么，就跟继圣他娘说：“这不是聚宝给谁做活？你出去看一看吧！能说得他到咱家里来坐坐吃顿饭谈谈最好，不能的话，联络联络也有好处。”她就奉了这道命令出来了。场上自然没有她能坐的地方，靠着西南房的墙角站了一站，朝着聚宝，扯开

她那细细的嗓子喊：“聚宝哥！你几时回来？”聚宝听见有个怪声怪气的女人叫自己“哥”，一时想不起是谁，停住家伙向这墙角上看，后来认出来是她，已有几分不高兴，故意装做没有听清她的话，侧转头装做聋子样反向她叫了声“啊？”她见聚宝这样，以为她的话没有传到聚宝耳朵里，就又向前走。聚宝见她走来，就又低下头碾起来，赶她走到离聚宝还有十来步远的地方，石头片就溅到她头上。她怕石头片溅到她眼里，赶紧倒退了两步，又把她前边说的那句话重说了一遍，聚宝连手也没有停，又向她看了一眼，故意装做才认出来的样子，仍然没有停手向她说：“是你？我是夜里才回来的。找我有件事吗？”她笑嘻嘻的说：“也没什么事！继圣他爹痛得快不行了，听说你回来了，他想请你去坐坐！唉！自从你那次走了，继圣他爹可后悔死了！提起你来就说：‘可不该把人家吓唬走了来！到外边倘或遇着什么灾难，不是咱把人家害了吗？’十几年了，常常打听，也打听不着你个消息……”她一直是这样亲亲热热往下说，聚宝只是连手也不停“嗯嗯啊啊”装聋，摊麦子的那伙年轻人在一旁挤眉弄眼的笑。

就在这时候，老驴挟了个扫帚踉踉跄跄出来了。这老驴比从前老得多了；头发胡须都白了一半多，脚手也笨了，走几步平路也要咳嗽喘气。虽说老了可还是那种穿黑衣保黑主的驴劲，一到了场里就先指东话西批评人家做得不对。他见大和跟二和两个人摊的麦子中间空了一道空场，就说：“怎么不挨住摊？”大和说：“边上这是我的！”他仔细一看，才看出大和手里摊的麦比王光祖的麦低得多。他说：“大和！你不要摊了，你们明天打吧，俺这是头场（按这地方的迷信习惯，说第一场跟别人在一块打，就打少了）！”大和说：“俺这也是头场！”老驴说：

“知道！可是俺这场是有东家的呀！你去跟东家商量好，我可以不说啥！不然的话，我就要担错啦！”

继圣他娘正在那里跟聚宝亲热着，忽然听得老驴说不问东家就要担错，虽没有听见说的是什么事，可总知道是件要紧事，就撇开聚宝一扭一扭走过来打听。老驴见她来了，早想在她面前夸一夸自己的主张，只等她问了一句，就“不得不得”告诉了一大篇。她听了果然觉得老驴虑得是，就向大和说：“大和！不是我要故意得罪你！我如今地少了，实在是不敢大意！这场子里的五谷爷可灵啦！你们还是明天打吧，那么一点麦怕打不了它啦？”二和不等大和答话就抢着说：“哪有那些说处？该打多少只能打多少！”继圣她娘把嘴撇得长长的对着二和说：“这孩子越长越不如从前了！我还没有你知道得多？”二和自从参加了农会之后，却也比以前胆大得多了，遇上了吃不下去的话也敢顶敢碰了。他见继圣他娘这样大模大样来教训自己，也就冷冷地碰了她一句说：“你知道吃上了不饥！”这一下可真把她碰恼了。她翻起两只白眼睛说：“你说啥呀？再说说我听听？越长越不象样！我比你大一天来，也大着十二个时辰啦吧？”二和见她明明白白摆起老资格来，准备干脆把话说得更难听些，看她怎么样，就说：“那是你自己长老了吧！”这句话，在这地方是一句不很轻的骂人话，原来应是这样说：“那是你自己长老了吧，难道是谁把你×老了？”可是用的时候，都只说前半句，听的人自然就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继圣他娘听了这话如何受得了？她的脸一红，连耳朵脖子都成了红的，可是她反觉着没法应付了，因为她知道二和既能说出这话来，再摆什么老资格都不抵事，半天再没有说出句话来，看样子好象要哭。大和虽然也恨她，可是觉着二和这样骂也骂得重了些，就

随口低低说了二和一句“唉！还可那样说？”继圣他娘碰了这个钉子，只后悔自己不该来和一个不三不四的长工比大论小，本来已经准备吃了这次冷亏算拉倒了，赶听了大和这句话，觉着连大和也不赞成他弟弟这样说，可见自己理直气壮，就大声发作起来。她说：“我说这孩子也不要得了一步进一步！我从我十来岁把你养活到这么大，不想把你养成龙了！……”

二和不等她往下说就插上话：“伺候你十七八年，还没有跟你好好算账啦！”

“工钱不短你一个……”她仍然接着说下去。

“由你算还不是我倒欠你的啦！”二和也跟着顶。

“住我的房，种我的地……”

“哪一年打的粮食够给你？”

“欠下我的租不还，又亲自把你爹叫到我家把房和地白白地开明给你们……”

“那不是你们怕在斗争会上吃家伙？”

“我哪一条对不住你们？……”

“你哪一条对得住我？”

“……”

“……”

她说一句二和顶一句，一点也不让，老驴跟大和两个人拦也拦不住，声音越来越高。

正吵嚷着，继圣他娘忽听背后有人气喘吁吁地说：“×你娘趁你的什么啦？”她一听见，知道是王光祖出来了，赶紧撇开二和回头来看他，只见他装做快要死的样子——弓着腰，伸着脖，两只鞋底拖着地，双手拄着一根棍，说一句话喘半天，走一步晃几晃，要不是他的皮色和平常一样，谁也看不出他的病

是装的。只见他断断续续地说：“趁你地什么啦？你是嫌我死得慢啦！”继圣他娘才听他开口，正预备把事情交给他来处理，不想他除不先来问一问端底，就先说出埋怨的话来，不由得跟他争辩着说：“我嫌你死得慢啦？是人家嫌我死得慢啦！人家快把我顶死啦，还说我趁什么！”王光祖说：“顶死你活该！这年头哪里是你的衙门？”继圣他娘说：“人家连问也不问一声，就把麦摊到场上……”王光祖说：“对着啦！这年头谁的是谁的？”继圣他娘说：“你还没有听听人家二和用什么话骂我。人家说：‘是你自己长老了吧！’”王光祖说：“人家骂得对！这年头么？”

王光祖一个“这年头”，两个“这年头”说下去，就逼起小胖的火来。小胖停住了摊麦，两只眼盯住了王光祖说：“老汉，这年头怎么样？”又向大和说：“大和哥把麦挑过咱这边场里来！我这头一场欢迎人多！这年头咱不跟他互助！”

小胖是武委会主任，他一说了话，王光祖生怕弄出事来，一句话也没敢回，继圣他娘赶紧解释着说：“主任！我不是说互助不好，我是说……”

小胖说：“这年头我们就不跟你互助了！谁管你说好不好？”

聚宝看见王光祖出来，已经够不顺眼了，又听他一个“这年头”两个“这年头”说了许多不满意世道的话，恨不得跑过来按住揍他一顿，只是插不进去，赶听到小胖说了话，才觉着“这还象个样子”，正预备帮几句，一时还想不到该从哪里插嘴。他打了个主意：“不说是不能说，说就得给他个厉害叫他怕。”可是一时也找不到个适当的厉害，就又碾起他的石头来。

就在这时候，老刘也挟了个扫帚到场里来。继圣他娘正被

小胖的话堵住嘴没有说的，见老刘来了，就转向老刘说：“老刘你把你二和叫回来吧，我也再不敢用他了！他恨不得一句骂死我啦！”老刘一听，摸不着是什么事，心里一怔就站住步说：

“啊！”大和说：“不住就不住吧！东家伙计，放着场子还不让凑用一下啦！”继圣他娘接住大和的话向老刘说：“我不是不叫用，我说我今天打的是头场……”小胖接住继圣他娘的话也向老刘说：“大爷不用跟他说了，把麦摊过这边来打，我这头场不怕人多！”老驴接着小胖的话也向老刘说：“头场不头场吧，那都能商量，只是你二和骂的那个实在听不得！”二和接着老驴的话也向老刘说：“爹！你不要光听他们的，我为什么不骂别人？”大家都向老刘说，老刘一时也听不懂是什么事，只按着他那“有理没理，先管自己”的老规矩骂二和：“小杂种！你又跟人家掉什么蛋？”继圣他娘见老刘教训起二和来了，就向老刘把“是你长老了吧”那句话念了一遍，老刘更认真地大声向二和骂：“小杂种！你在哪里学这些骂人本事？”二和听着老刘这样骂，知道他是不愿意跟人家讲是非，想就这样骂自己几句作为了事，心里有些不服，就想把事情索性弄大一点叫他想了事也不能，因此就顺口又说了一句：“哪里学的？放牛出身，骂牲口骂惯了！”继圣他娘说：“二和！你也不用骂了，你来把我杀了吧？”老刘狠狠看了二和一眼说：“你这小杂种反了！”说着就从大和的手中夺出杈来，来打二和，二和跑开了，小胖跑过来把老刘拦住。

小胖说：“大爷你真是老顽固！你也不问问谁是谁非，为什么就先说自己没理？”老刘说：“这明明是他的不对么！他对着我还是这样骂人家，可见人家不是冤枉他了！”聚宝这时候再也撑不住气，也放下家伙跑过来向老刘说：“不差！骂是

确实骂来，该骂就得骂啦么！又不是骂错了！”小胖也说：

“对！哪种病就得吃哪种药！”……

老驴趁老刘和小胖说话时候，就跑到王光祖跟前悄悄问王光祖：“怎么样？就叫他那么摊吧？”王光祖也悄悄说：“这年头，谁叫你管他们？一两场麦，完全不打一颗有什么关系？你们这些人呀！”说罢，摇了摇头，慢慢拄着他的棍子就回去了。

继圣他娘满以为有老刘在场，可以占个十分理，后来见小胖、聚宝都过来了，也就不敢再说什么。

老驴虽说在王光祖面前落了个多事，却也得了主意，就跑到老刘跟前来送人情：“孩子家，说他几句就是了，哪里值得真正跟他动气？算了吧！咱们该做啥做啥吧！”

小胖不接老驴的话，却仍说出自己原来的意见：“在一个互助组里连场也不叫用，还互助什么？我的意见是不要他们。大家这会就开个会研究研究！大家都来吧！二和！回来吧！开会啦开会啦！”铁则、鱼则、大和、二和、宿根都来了。小胖说：“关于今天这个用场问题，咱们先开个会。我先提出我的意见：‘互助’是互相帮助啦，不是光叫咱帮助人啦。咱们跟继圣家互助，大家想想咱是怎样帮助了人家，人家帮助了咱些什么？以地说他家的地最多，以人说他家只有二和一个劳力和老李（就是老驴）半个劳动力。在地里做的话，就算还有个等价交换；晌午打场，谁也没有给谁算过工。大家想想：咱们是几家才合起来打一场，人家一家就要打好几场；咱们一、二、三、四、五、六，出六个人，人家出一个半人；可是咱们给人家白白服了务，连人家一个场边也不能用一用，这还互助个什么？以我说咱们从今天起不要他们，把以前的工资结算一下找

清楚，大家赞成不赞成？”

聚宝说：“对么！这不是个正经理了？”

聚宝虽然赞成了，可惜他不是组里的人，连谁也不能代表。组里的人啦？除二和痛痛快快喊了一声赞成以外，其余的人马上都没有开口。二和见大家都不说，自己就又补充了几句说：“我要是不给他住了，组里还要我不要？”小胖说：“你回了你家那当然要！”老刘看了二和一眼，预备说话，又看了小胖一眼，可又不说了，仍然又都是静悄悄的。

除了二和，其余的人，各有各的想法：老刘觉着“咱一辈子没有得罪过人，如今老了自然更不该多事。再者，咱二和给人家住着，‘吃人一碗，由人使唤’，如今除不由人家使唤，又骂得人家那么重，不向人家赔情已经是对不起了，哪里能再说什么？再者，人家打的是头场，咱连问也不问，就把麦子摊到人家场边，也实在不是个理！再者……”他越想越觉着自己理短，实在不能赞成小胖的意见，可是小胖是武委会主任，又不好直接说不赞成，因此一时没有话说。大和对小胖说的道理完全同意，知道自己跟继圣家来互助吃亏很大，可是真正要开除人家出组，他就又有些心软了。他觉着“说话知了就是了吧，何必真正要给人家弄个过不去啦？”可是这话说出来恐怕小胖不赞成，因此没有开口。铁则主张“不关己事不开口”，鱼则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也都没有开口。宿根本来是向着继圣家这一方面的，可是他爹李恒盛就是因为包庇王光祖吃过一次斗争，他如何还敢当着武委会主任的面再来包庇一下呢？因此也不敢开口。大家都不说话，自然就把个会场弄得静悄悄的。

老驴见是这样，便趁空子来做开解。他向小胖说：“主

任！你不要计较俺掌柜老婆的话！她那老脑筋，跟我一样，已经换不过来了。依我看，咱们不要管她说什么，咱们的话还是该怎做就怎做。咱们也不用管他头场不头场，老刘的麦已经摊开了，就那么打吧！”

老刘说：“那我就沾光了！就那样吧？主任你看怎么样？”

小胖本来很起劲，见老刘自己这样松，也觉泄了点气，就问大家说：“你们都为什么不说话呀？”又指着问大和、宿根、铁则、鱼则四个人，四个人的答话都一样，都说：“大家看吧！”

聚宝看了半天，后来见大家这样，生了一口气说：“唉！照你们这样，一千年也翻不了身！”说了就又到场边砸他的石头去了。

小胖也很生气地说：“我也是想叫大家出口气，怎么听大家的口气，好象只有我一个人不愿意？你们既然愿意吃人家的家伙，我有什么话说？只是我要声明：不论你们怎么样，我是不能跟他家互助了！我不能再去伺候他这一家！大家要是不愿意不要他们，你们再选小组长，我马上出组！”

正说着，忽然来了三个人。他们听见脚步响，抬头一看，是小囤、满囤和小管三个人在区上开会回来了。大家点过了头，小囤说：“小胖！走！马上开干部会！”小胖回过头来又向组里人说：“你们要是不愿开除他家，把我的麦给我挑起，我今天不打了！”老刘他们齐说：“不不！你要是顾不得，我们情愿替你打！”

小胖没有听他们下边说是啥，就跟小囤他们走了。

（未完）

表 明 态 度

这是我一九五一年夏天在山西长治专区草拟的一个电影故事，后来因故搁置，今天看来也还可以当个故事看看，所以又把它拿出来了。

一

太行山区有个贫农名叫王永富。他在一九四三年春天，才从减租运动中得到一部分土地和半个耕牛。他正准备春耕，偏碰上日军到他村里扫荡。他是村里的武装主任，领着民兵掩护群众退到深山里，全村人口没有一口损失，可惜把牲畜藏在另一个山洼里，被敌人发现，完全给拉走了——他自己的半个牛自然也在内。

直到立夏，敌人才退走。这时候，正应该抢种，可是全村没有一头牲口。贫农中间有个李五，想了个抢种的办法，是用四人拉犁、一人扶犁、儿童跟在后边随犁下种。大家觉着这个办法能用，就分头碰组，进行抢种。

武装主任王永富和民兵铁柱、金柱都并入李五的一组，共同推选李五当组长。李五老婆也是个会种地的，在耕地时候由她扶犁，由李五、永富、铁柱、金柱四人拉犁。李五老婆一边扶着犁，一边用“吁吁、窝窝”喊牛的口号向他们四人开着玩笑。李五的女儿腊梅和永富的孩子小春，那时候都是十三岁的孩子，两个人跟在犁后边随犁下种，有时候互相争夺起来，李

五老婆还得给他们说和。

从这时候起，村里就成立了好多互助组，以李五这一组算模范；几年以后，这个组增加到十几户，仍选李五当组长。

后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自卫战争的战线也渐渐离得远了，生产提高了，财富增加了，村里买牛的、置车的、修房的、打井的也慢慢多起来。李五组里的组员有好几户买了牛，数永富的牛大。

永富的孩子小春与李五的女儿腊梅同在一个组好几年，感情很好，到一九五一年春天，两个人结了婚。

这时候的王永富，经济上也宽裕了，孩子长大了，并且娶了媳妇，便觉得革命成了功，因此又觉着这时候参加互助和担任干部工作都成了累害，只是自己人过共产党，背着个进步名号，有些退坡的话不好说出口来。

永富老婆是个心地窄小的人，吃不得一点小亏，谁要是招挂着她一点利益，她就能唠叨好几天——凡是永富不好意思说出口来的话她都说了出来。永富对上外人虽然也怪他老婆不该叨叨，不过心里可十分赞成他老婆替他说说；他老婆也很明白他的心思，所以越遭到他的阻拦，就越要多说几遍。这样装模做样瞒不了大家的眼睛，所以凡是谁受过永富老婆的气，背地里都只骂永富。

二

这年①春节过后，便要布置春耕。一天夜里，李五组开第

①就是一九五一年。

一次会，讨论两件事：第一件是本年有没有出组和入组的户，第二件是当前应先做什么活。在讨论第一件事的时候，李五说：“腊梅既然出嫁了，就成了永富家的一口人了，可是永富到县里开会还没有回来，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让腊梅入互助组。”小春说：“那还成什么问题？”李五老婆说：“亲家现在的脾气变得有点古怪，还是问问他吧！”腊梅说：“我是青年团支书，事事应该争取模范，不能因为结了婚就退步，不过为了尊重老人家，应该问问他，想他也是村干部，没有不答应的！”在讨论第二件事的时候，决定先给铁柱家的沟地补壑子——因为这时候的地里还没有完全解冻，别的活都还不好做。

三

其实这天晚上当他们才集合起来开会的时候，永富已经从县里回来了，只是他已经觉着互助组讨厌了，所以假装不知道，吃了一碗剩饭，就匆匆忙忙睡了觉。

第二天早晨，腊梅见了永富，还没有赶上问他人组之事，永富先从衣袋中取出一封信来递给腊梅说：“团委通知你叫你今天到区里去开会！”腊梅一边接信，一边问“什么事”，永富说：“无非是什么‘抗美援朝’‘加紧春耕’一些烂扯淡话！有什么要紧事？”看他说话的神情，好象十分疲倦。腊梅见他这样，实在想批评他，只是才过门的新媳妇要批评起这位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的公公来，估计他接受不了，所以只皱了皱眉头，便去拆看方才收到的信。腊梅看了来信，自言自语说：

“这次会要开三天！”永富说：“开吧！有什么法子？一年尽开会，什么也不用办了！”腊梅又问他人互助组的事，永富还

没有答话，他老婆就抢着说：“你们三个都参加了互助组，家里的事叫谁做？喂猪、喂牛、做饭、碾米、磨面，没有娶媳妇由我一个人顶，娶了媳妇还要让我顶吗？我做够了！家当将来都是你们的！我再不给你们当这老牛！以后我什么事情都不管了！”永富和腊梅说：“先开会去吧！回来再说！”腊梅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摇了一下头，就打起自己的背包到区里开会去了！

四

按几年来的习惯，互助组上地时候是打钟集合，一组一个地点。李五组的集合地点是村里一排白杨树下。腊梅起程之后，村里已经打了钟，李五组的人陆续来到白杨树下，只是小春没有来，等了很久仍没个踪影。一个青年说：“让我去看看！”说了便往永富家去。他走近永富家门口，就听得小春和永富老婆母子们争吵，只听见吵得很凶，却听不清吵些什么，赶到跟前，见小春和他妈两个人共同拉着一条牛缰绳，一个往里拉，一个往外拉，把一头老大牛拉得不知道该怎么走才好。

五

原来腊梅走后，永富老婆怪永富说：“咱家有地、有人、有牲口，好好蒙住头种咱自己的十几亩地，多么自在？你们老的小的，每天起来开会呀、互助呀，尽和别人打哈哈！花了几十石粮食买来个好牛叫给大家支差！互助对咱有什么好处？”永富说：“多年来弄成这种关系了，我有什么法子？难道我能说出退组的话来？”“只是你舍不得丢开你那宝贝组！你要是舍

得，还用得着你说话吗？只要我不管，我就有办法！”“好！以后我能不管就不管！就看看你的本事！”

六

小春端着碗去送腊梅，送走腊梅后还没有回到家，就听得打钟，所以匆匆忙忙把碗送回去，取了个镢头就往白杨树下跑。他一出门，忽然想起头天晚上决定用他们的牛套车拉石头，这才又返回去到牛圈里牵牛套车。

永富老婆听见牛铃丁咚丁咚响，揭开门帘一看，见小春已经把牛牵出来，她觉着这正是试一试“本事”的时候了。她三脚两步跑出来拦住小春说：“牵牛干什么？”“互助组拉石头！”“不行！你们互助组使牲口没个轻重！去年冬天拉煤，有一次把牛使得满身是汗，你倒忘了？使坏了那又不是三两个钱的东西！”“拉轻些就是了！”“不行！”“我已经答应下人家了！”“我没有答应！你也没有问过我！”小春见她不放，就向着屋里喊：“爹！我妈不叫牵牛！”永富半天没答话，小春又喊了一声，才听他慢腾腾地答应了一声“我不管”。小春急了，便要把牛强往外拉；他妈夺住半截缰绳往里拉。就在这时候，组里那个青年就跑来了。

七

这个青年见永富老婆不放手，劝了一阵也没有用，才又想到先把这情况回报到组里，可是等他回到白杨树下，全组人走得一个也没有了。

八

这位青年随后赶到给铁柱家地里补壑那个工作地点，见大家正在沟口一堆乱石头中间，有的用铁条撬着转石头，有的用铁锤打圆石头，打成有棱有角的……只听得滴里打拉丁令当郎……凑成各种音韵，赶到看见这位青年没有叫来小春，大家都停住手来问，各种声音都停止了。

李五问：“怎么没有套得车来？”青年把小春母子拉牛的事情向大家说了，大家就乱纷纷地议论起来。铁柱说：“我早看透了：他自从买上好牛就想往外扭，如今娶过儿媳妇了，越发用不着人了！我看他迟早要有扭出去的一天，不如请他早点走开干净一点！”其他好几个人都说：“对”，还有一个人补充说：“省得他老婆每天叫喊着说她吃了亏！”铁柱说：“咱们全组人差不多都在这里，大家可以民主决定一下以后要不要他！”又有好几个人赞成这个意见。这时候小春一个人也正无精打采赶来，听了铁柱的后半截话，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觉着窘得很。李五接着铁柱的话说：“不要那么着吧！他近来的脾气虽说有点古怪，不过究竟还是咱村里一个老干部，又是咱组里一个老组员，这样决定也太随便一点！依我说，咱们今天晚上细细了解一下情况，看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铁柱说：“问题很明白：就是发了财看不起人了！”停了一下，他又说：“也好！今天晚上叫他表明一下态度，或长或短叫他亲口说上一句！”李五老婆说：“小春！惹不了你娘算了！等我回去再跟她说，你先去把我那个小老鼠牛套得来！牛小了不过多拉几趟，活儿照样能做！”小春这时候正想躲开大家的议论，

听了这话，便赶快回去套车去了。

九

晚饭时候，小春和永富说：“今天因为我娘不叫赶牛，大家对咱很不满意，要不是组长说了些好话，大家就要决定叫咱们出组！”永富说：“出组就出组吧，难道我还想在组里占他们的什么便宜？抬脚动手就拉我的牲口，用我的家具，我还没有说过话，他们倒还有话说？随他们的便，出组就出组！这又不是我提出的！”小春还没有来得及答话，组里一个青年就跑进来喊：“永富叔！互助组开会哩！”永富说：“我听说组里要开除我，怎么又来叫我？当初成立互助组的时候，是我把他们组织起来的，如今他们本事大了，会开除我了！回去告组长说！我不去！让他们开除吧！”

十

青年回到李五家，见组里人差不多集合齐了！就把永富说的话学给大家，引得大家又纷纷议论起来。铁柱说：“你们听！明明是他要往外扭，还要倒抓三分理！他也不肯卖老！他把我们组织起来是叫我们同他拉犁，如今他买上了四条腿牛，自然用不着咱们这些两条腿牛了！我担得起名！就算我要求开除他！这次不说个清楚，以后不好干活！他不表明态度我表明态度！有他我不干！”有几个比较急躁的人跟着铁柱说“我也不干”，“我也不干”，虽然有几个党团员主张再去说服，可是大多数都不同意。李五说：“大家不要生气！有他没他咱们

总不能不互助！明天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要一直不来，咱们以后就不要他！”

十一

散会后，李五老婆跟李五说：“亲家的思想越来越坏，哪里还象个共产党员？依我说，你这会再去找他谈一谈，无论如何，明天叫他到地里去解一解这个疙瘩！”李五说：“他不能从思想上检讨自己，问题就不好解决。他的思想早就变坏了，支委会和他谈过几次都没有用，我去说能有什么效果？我看还是先回报支部，让支部结合着今天这件事再和他谈一次，看怎么样！”“倘或今天晚上谈不通，明天他仍不上地，不就弄僵了吗？”“自然最好是今天晚上谈通，不过实在要谈不通，僵也只好僵了。我去试试看。”

十二

这天晚上，小春回去后想挽回僵局，试探着劝永富第二天到组里解释解释，可惜永富不但听不进去，反而跟小春说：“什么群众影响呀，进步呀，积极呀，都不过是在开会时候说说好听，肚子饿了抵不得半升小米！你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遇事也该先算算自己的账！”说到这里，突然有个人闯进来把他的话打断。来的人说：“支书叫你去谈话！”永富很厌烦地说：“这一定又是亲家多事！屁大点事儿也要报告支部！谈什么话？迟早还不是叫我检讨思想？”他虽是这么说着，还是跟着来的人到支书那里去了——因为他虽然早就不想做工作，可是

还想保留党员的称号。

十三

永富到了支书家，见李五早坐在那里，就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亲家又告我的状吗？”支书说：“这不是谁告谁的状！党员身上出了问题，难道不应该先报告给支部知道吗？”永富见支书认真起来就不说话了。李五说：“亲家来了，咱们就正经谈谈吧！倘或今天晚上谈不通，俺亲家明天不去地，事情僵下来，就不好解决了。”支书先让李五把事由交代明白，又问永富事实有没有出入。永富说：“事实差不多，只是他们大家要开除我，责任怎么能推到我身上？我老婆又不在组里，她的话怎么能代表我？他们既然要往外挤我，我勉强留在里边，对组里也没有好处，我看不如我干脆退出来，省得以后再发生麻烦。”支书说：“一个党员为了几句闲话退了组，你估计在群众中间会发生什么影响？”永富说：“在一处合不来，影响不更坏吗？”支书说：“为什么偏要‘合不来’呢？”永富说：“大家想往外挤我，怎么能合得来呢？”李五见永富硬要把错误往大家身上推，便也很认真地说：“亲家！咱们都是党员，说话要说真的！让我用咱们上党课听来的一句话：‘看问题不能光看现象，要看本质。’说真心话，咱们组里有哪个人真想把您挤出来吗？谁也看得明明白白是您往外扭，您强抓上个理由哄得过谁？”支书接住李五的话说：“永富同志！这和前几天支部要您检查思想是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思想处处表现在行动上，那是瞒不过人的……”永富没等支书再往下说，就发了脾气：“人家要开除我也成了我的思想问题了吗？这个我一

一点也不准备接受！党章上又没有规定非参加互助组不行！”支书说：“永富同志！这象一个党员对党说话的态度吗？”“谁要说我思想上有问题，我就是这个态度！你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党！”“那还谈什么？支部没有改选以前，我可以代表党和你谈话！你既然声明你要用这种态度对党，我也代表党正式通知你：今天不和你谈了！等明天召开了支部会再向你谈吧！”永富气昂昂地走出去，走到门外还说：“支部大会也只能按党章办事，不能拿大帽子扣人！”说着就走远了。

十四

这一夜永富心里很烦，直到鸡叫也没有睡着，等到快睡着了就听见村里打钟——因为天已经明了，互助组又该集合理。

小春一听见打钟，急忙穿上裤子、披了衣服、拿上家伙跑到白杨树下，可是他起得迟了一点，别人都已经来齐了。有个组员问小春：“你爹哩？”这一问，才问得小春想起头天晚上的事来，就随口答应说：“各人管各人！”打钟集合已经成了好几年的老规矩，小春在头天晚上睡觉以前虽然也想起他爹的事，可是到了在梦中听到钟声就又忘了，连什么也没有赶上想就跑到白杨树下来了。铁柱说：“小春倒是个好孩子！”又向小春说：“不过你爹要不参加，你又不能把地带来，还怎么互助哩？”好几个青年七嘴八舌向小春说：“小春！你参加你的！不要让你爹把你拖住了！”“不带地也没有关系，以后再说！”“青年团员要做互助模范！”……小春对这些意见都很赞成，随着大家就出发了。他们才动身，就听见永富赶来喊叫：“小春！你不要走！咱家没有煤烧了！先去给我拉一趟煤！”

小春没有应话，一个青年低声说：“十五以前拉了两车煤，才十来天就烧完了？瞎扯！”永富虽然又喊了几声，可是谁也没有答应，只觉着他的喊声越离越远。

十五

早饭时候，小春回来吃饭，他妈说：“既然有本事，就不用回来吃我的饭来！”永富说：“这倒也很好，吃上自己的，去给人家干活！”永富的话，对小春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妈那么说，他听惯了，也不觉奇怪；可是他爹这个共产党员也能直接说出这样话来，是他想不到的。小春本来想问他“这象共产党员说的话吗”，可是因为有父子关系不便这么说，就绕了个弯子说：“我是个青年团员，不能让村里人骂我落后！”这句话果然说得永富马上接不上话来。永富老婆倒没有这些顾忌，她立刻顶住小春的话说：“你那青年团怎么不管你吃饭？”小春说：“我也是个成丁的小伙子，哪一天也没有窝过工，难道连饭也不应该吃了吗？”他妈说：“你也不用种我那地，就凭你那小伙子到别处吃去吧！”小春说：“平分土地时候是每人一份！我就要吃我那份！”永富听了这话，好象抓住了洋理，就变了脸说：“有你一份你拿走！我不沾你的光！把你养活大了！你会跟老子要一份了！”他老婆说：“拿走？说得倒容易！咱俩死了都是他的！如今且不能由他！”“地是天生的！人人都有份！我想要就得由我！老规矩行不通了！”……一片嚷嚷，越吵越凶，惊动得外边人跑来解劝，劝了半天才停下来，不过这顿早饭三个人谁也没有吃饱，大白天三个人都躺在家里，谁也没有做活。

永富苦闷了一天，到夜里又被支部大会追究了一次思想，觉得气不平，死不肯认错。最后支部决定给他留党察看处分，回报了上级党，请上级党批准。

又一夜过后，全家还是那样呕着气：永富老婆做饭只做两个人的，小春拿了个小锅自己另做一锅，耳鬓相磨，互不说话，外院邻家劝不下他们，也各自回家不再过问。

十六

下午，腊梅就从区上开会回来了。

三天前腊梅到区团委会开会，第一天上午听了团委书记“结合抗美援朝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的报告，下午各村团支书、支委分组讨论，在讨论中，彼此挑战应战。腊梅是全区的模范书记，在第二天早晨汇报的时候，订出计划向全区挑战；其他村有好多人也各定计划向她应战，赶到夜里她就收到十几份应战书，除了满意，还想到责任重大，松不得劲；第三天（就是今天）上午听完总结，下午就回来了。当腊梅在大会上向全区挑战的时候，正是永富夫妇头天吃着早饭和小春吵架的时候；赶她收到挑战书，又正是永富在支部大会上受到大家批评的时候。

十七

腊梅回到家，太阳还没有落。她一进门，见永富坐在桌边不动，永富老婆背朝外躺在床上，小春用一个小沙锅做了一碗多饭还不太熟，灶前放着好多没有洗过的锅碗，就问小春：

“怎么这时候才吃午饭？”小春本来有一大堆话要说，可是对

着这样的父母说不出来，才故意装作不着急的样子说：“忙得很！”腊梅说：“好！只要咱村各个组都有这样大的劲头，我这个挑战计划就落不了空！”小春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想“各个组要都有了这个劲头，那就遂了爹妈的心愿了。”腊梅不了解情况，仍然继续说下去：“不过区团委书记说：‘不要把生产观念弄得太单纯了，一定得和政治、时事、文化、技术各方面的学习结合起来！’”又转向永富说：“爹！我今年还是得参加互助组！团委会的报告说，‘青年团员不但要参加，还要做模范，’他说，‘家里忙了，妇女们可以多帮家里做点事，不过有工夫还是参加到组里活动，一来可以在群众中做些宣传动员工作，二来可以养成集体观念。’我和咱村去的团支委在区上已经订出计划向全区挑战。我们的计划是发动全村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人人参加互助组，识字的每天在休息时间给组里人读报，发动每个团员都帮助组里完成增产计划，上夜校每个团员都争取先到……我也不细念了，一句总话：事事争取做模范！”又从衣袋里取出一叠信件来说：“这是各村的应战书。人家都要跟咱村比赛！这次可要好好搞，搞坏了可不是玩的！”永富听了没有说一句话。腊梅扭过头来看了看小春，小春也没有说话。永富老婆本来是脸朝着墙躺着的，一听到腊梅的话，就把床头上的被子拉开了盖上耳朵。腊梅一个人转着圈子在屋里打量了一会，结果也看不出个头绪来，就自言自语说：“怎么大家都不说话？”仍没有人答应。腊梅又察看了一圈子说：“奇怪！出了什么事？问问我妈去！”说着便走出去。

小春忍了三天气，早就盼着腊梅回来和腊梅谈谈，可是腊梅回来了又不便谈；赶听了腊梅说出在区上挑战的情况，十分佩服腊梅的见识，有心称赞几句，觉着不是个说话的地方；等到腊

梅走了，他又想：“已经得罪了爹娘，为什么又要冷落了腊梅呢？不如赶到她妈那里和她谈谈！”想到这里，就叫着腊梅跑出去。

十八

小春追着腊梅跑到李五家，李五老婆早在家里做饭^①，三个人把近三天的事谈了个明白。李五老婆问小春的主意，腊梅说：“不怕！老人们管不了我们的事！我们该怎么干怎么干！”李五老婆说：“你这小鬼说得倒容易！家产在老人手，你们没有地怎么参加互助？”小春说：“土改时候一人一份！我把我那一份分出来！”“他们愿意？”“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我要求村公所替我要！”腊梅略略想了一下说：“要得！咱们马上找村长去！”小春拉住腊梅的手说：“走！”李五老婆拦住他们说：“等一等！不用那么急！这办法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他们对不起孩子，不是孩子对不起他们！不过等你爹回来商量一下，晚上再去不好么？”腊梅说：“晚上还要开团员大会！”“晚上顾不得明天也不算晚！这又不是什么紧急大事！”腊梅又略略考虑了一下说：“也好！”又向小春说：“我看你也用不着再到家里和他们生气。把咱们的铺盖搬过来，就在我妈家里住，让他们老两口清静一点！”小春答应着就去搬铺盖去了。

十九

当小春叫着腊梅跑出去的时候，永富独自说：“好！都走

^①参加互助组的妇女往往都只做半晌地里活就要回家来做饭。

吧！媳妇也走了，孩子也走了！”永富老婆听永富这么一说，揭了被子爬起来跑到窗前看动静，不过她起来得晚了一点，孩子、媳妇都走远了。他们老夫妇两个叹了一口气，骂了一会小杂种，又听得有人跑进院来。永富老婆到窗前一看，见小春回他自己的屋里去取上衣、被子就往外跑。她大声喊：“小春！把我的东西往哪里取？”小春急忙跑出去，没有答话。她对着窗户骂了一阵，也没有一个人应声。

二十

永富老婆骂着骂着天就黑下来。她正准备离开窗口去歇歇，忽见一个人影背着被子走进来。她恨恨地说：“你既然有本事到外边过日子，还回来干什么？”可是进来的人没有应声，一直往她这屋子里来。永富一看，来的人是县武装主任，就赶快把行李接住，让主任坐下。主任说他是来检查武装会议时候所布置下来的工作作得怎样。

三天以前，李五组里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永富不是才从县里开会回来吗？那一次就是县武装主任召开的武装会议。在这次会上，决定各村武装主任，回村之后，立即整顿民兵组织，检查原有枪枝有没有损坏，并且说三天以后，县、区武装干部分头到各村去视察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永富在开会当中，见把时间安排得这样紧，就觉着有点不耐烦；回来以后又跟孩子闹了一场大气，直到这天天黑了还没有结束，所以把会上布置的工作彻底丢开，现在见主任亲自来视察，一时无话可说，就推诿着说：“这几天村里各系统会议过多，因为时间冲突，武装会议还没有召开。”主任听他说连

会也没有召开，觉着实在有点不象样，一边摇头，一边说：“今天夜里还不打算开吗？”永富就住他的话说：“本来就打算在今天夜里开的！我先通知村公所给你派饭，吃了饭咱们就开！”

永富到村公所，一边先叫人给主任派饭，一边向村长商议夜里借公所的会议室召开武装会议的事。村长说：“生产主任已经通知各互助组长在村公所汇报生产计划，武装会议就召集在你的院子里开吧！”

二十一

小春把行李搬到李五家的时候，上地的人们都从地里回来了。好多青年听说腊梅回来了，都端着饭赶来问长问短。谈到小春和腊梅以后的生活问题，好多人都赞成小春提出的分家计划。李五老婆和李五说：“在一处仍不能过日子，我看分出来也使得！”一个青年和她开玩笑说：“你不怕你亲家找得你来，和你要孩子？”另一个又说：“人家到法院告你，说你把人家的孩子挑唆坏了！”李五老婆说：“我什么都担得起！”又一个青年说：“小春！我不知道你爹怎么能算个党员！要叫我说，入团也不够条件！”李五说：“人家在解放临汾时候是配合正规军挖着地道炸过敌人的碉堡的！你当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来？可惜现在的思想变坏了，要不然干什么也是咱们村里数一数二的！”一提起过去，年纪大一点的人们都说永富是个有本领的，可是一说到现在，就都又骂他不长进了。

腊梅向青年们说：“咱们管不了上一辈子的事，还是先说咱们的吧：今天夜里就在这里开团员大会。也不用通知了，大

家送了碗，顺路给咱们叫一叫人，马上就来！”一个青年看了看院里的人说：“还去叫谁？差不多都在这里了！”腊梅让各小组长点了点人，只少两个，就有四五个人争着去叫。

李五跟小春说：“你们的家务事，暂且就那样拖着——你且住在我家，分家的事等等看。你们开你们青年的会，我还要到村公所参加互助组长会议去！”说完便走出去。

腊梅向李五老婆说：“妈！再给我们找一盏灯！我们的会就在院里开！”“就端上这个灯吧！我也去听听你们说什么！”一个青年说：“五婶子岁数大了，参加团不合乎章程规定！”“没有我这个老党员指导，光你们一伙小鬼们还开得好一次会？”腊梅说：“我还没有想到，我们该请党支部来给我们讲讲话！”另一个青年答应着就去了。

二十二

腊梅掌着灯，另有几个人搬桌子板凳布置会场。阶台上放一张桌子，桌子旁边放两条板凳，就是这个会场的全部设备。其实摆板凳也只是个样子，根本没有人坐，大家都坐在地上，只有李五老婆一个人是坐软席——草垫子。

腊梅看了看灯说：“油太浅了！”前排中间一位青年站起来说：“让我拿油罐去！”坐在他两边的两个人也站起来说：“我去”“我去”，说罢三个人一齐到屋里去。李五老婆说：“拿上灯去！不要把什么家具摸翻了！”坐在后边一点的一个人说：“还摸得错？进了套间门，扭回头来，开开柜子，揭开柜子里上一格中间那个木头盒子，靠盒子前边的就是两个罐子，小罐子里是香油、大罐子里是麻油；大罐子里要是没有

了，再到北墙根那个瓮子里舀上一些！”大家轰地一声笑了。李五老婆说：“这些小杂种们比我摸得还熟！”她正说着，忽然听见里边有开抽屉的声音，就顺便向屋里喊：“小杂种们开我的抽屉干什么？”院里有个人说：“还不是偷吃馍馍？”这时候，屋里的三个人都笑着走出来，每个人口里都衔一小块干蒸馍，向李五老婆表示胜利，引着大家又全笑起来。腊梅站起来从一个人手中接住油罐去添灯油，那三个人又都坐到原位上，又恢复了原来的会场秩序。

去请党支部书记的回来报告说：“今晚民兵还要开会，党支部书记是民兵指导员，参加那里的会去了！”腊梅说：“时间又冲突了！咱们这里还有十几个民兵！”一个当民兵的说：“咱们这里快点开，开完了再去参加那个！”

腊梅取出笔记簿来传达区团委书记的报告。指头粗的灯捻^①，发出来的火苗儿跳得有尺把高，照得每个人脸上的亮光都跟着这灯光儿跳动，连李五老婆头上才生的三根白发也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青年们的神情好象比这灯光还饱满——讲话的腊梅指手划脚，好象满身都装着弹簧；听讲的青年们仰面挺胸，好象腰里都插了棒子。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腊梅的嘴上。

腊梅正讲得起劲，突然有村公所一个通讯员闯进来把她的话打断。通讯员问：“这里的会还得多大一阵儿？武装主任召集民兵开会！还要检查枪枝哩！”腊梅说：“怎么这样大嚷大叫？为什么不写个条子？”另一个青年说：“他从县里回来三天了，为什么不早开？要在今天晚上开，为什么又不早通知？回去告诉他，等我们开完了他再开吧！”腊梅恐怕这话影响政权与青

^①就是用棉捻的灯心。

年团的团结，就把口气放温和一点向通讯员说：“我们快一点进行！这里一结束让他们马上就去！你先回去吧！”通讯员走了，腊梅又接着讲下去。

二十三

通讯员又往村公所问组长会议散会的时间，生产主任的回答也和腊梅差不多。

二十四

通讯员向永富去汇报情况，见县武装主任正向永富讲话，县主任见他进去，就把话停住。通讯员向永富说：“两个会都才开了，不过他们都答应赶一赶，一完了参加这两个会的民兵们马上就可以来！”永富叹了一口气，通讯员便退出去。这时候，永富家坐着四个人——县武装主任、村支书、永富还有他老婆。永富老婆靠墙坐着，连看也不想看他们一眼。县主任接着在通讯员进来之前和永富讲的话说：“……你不要光埋怨支书告你的状！你是主任，他是指导员：你敢于放下工作不做，难道他也跟你学样吗？”永富说：“不论大小事，一到我头上，就都成了思想问题了！有点工夫他尽让我检讨思想，我哪里还有工夫召开武装会议？”支书说：“要是为了检讨思想误了工作，我替你负责；可惜是你把工作也误了，也没有检讨了思想——真要是检讨了思想、纠正了思想，工作也误不下！”话只谈到这里，四个人就一言不发闷坐起来。这时候有三个民兵都背着锈红了的步枪走进来。这三个人和屋里的三个男人打过招

呼，回头看永富老婆靠墙坐着，脸板得和墙一样死，嘴噘得象个晒干了的桃儿，要不是多两只眼睛，谁也不会觉着那地方有人，不过这两只眼睛也不算白长，狠狠对着他们三个人翻了一下。他们三个无心再看永富老婆这尊圣象，就退到院里的阶台上看天上的星星去了。

县武装主任坐得着急，就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听见院里的民兵逐渐来得多了，每逢一个人进院来，先来的那些人都告他说不要进屋里去。又等了一阵，县主任说：“不知道来了多少人了，咱们摆开摊子到院里等吧！”永富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端起灯来就往外走。永富老婆说：“不要把我的灯拿走！几上不是个小灯？”永富看了看几上，有个小灯盏，比喝白酒用的小酒杯稍大一点，中间有一个小管，灯捻子是一根红头绳作的，点着以后，半黄半蓝，象一颗大豆。永富点着灯，县武装主任和支书跟着，三个人一同往院里走。

二十五

永富一出门，脚下有个东西差一点把他绊倒，幸亏灯里的油不多，没有洒了油。他用一只手逼住灯光往地上侦察了一阵，见一个民兵枕着枪托拦门睡着，还没有被他惊醒；他又用脚尖蹬了一蹬，那人似乎醒了一点，唧唧啾啾翻了个身向一边靠了一靠，又睡着了。

他们三个人站在阶台上看了看周围：有十来个民兵分看三四处谈天，各按地势，能坐就坐、能靠就靠、能躺就躺，要不是天气还有点凉，倒也都还舒服。这些人见永富拿出灯来，觉着灯光虽小，也比没有好得多，就都向着灯光围上来。

永富数了数人数，已经有十五个人，就向县武装主任说：“人数已经快有一半了！我看就这样开会吧！先开着再等他们！”县武装主任看了这个七零八落的会场已经有点叹气，听永富这么说，觉着实在忍不下去，就向永富说：“你也是老武装干部了，怎么变得这样糊涂？在从前缺一个人，班长不是也得交代清楚吗？同志！这也是思想的反映！当主任的这样含糊，就难怪民兵把枪都锈成红的了！”永富没有话说。

支书说：“让我亲自去看看那两个会还得多长时间——要是太晚了，咱们就移到明天开！”县武装主任说：“咱们一同去看看好了！”两个人说着就走出来。

二十六

县武装主任和支书两个人走到村公所，见村公所的会议室里把三张方桌连在一处，桌和桌对缝的地方摆着两盏高座子煤油灯，生产主任和各互助组长围着桌子坐着，每人手里正拿着一张生产计划表填着计划数字。这些人见他们两位进来，都站起来让他们坐，县武装主任摆手说：“不！我们只是来看看这里还得多少时间。”“我们马上就完！”“好！那我们就再到青年团那里看看！”

二十七

他们两个离开村公所又走到李五院中。这时候，青年团的会已经快要结束，大家正通过具体工作计划，没有注意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随便溜到众人后边看热闹，只见腊梅喊着一

连串的问候，大家一条条举着拳头答应——“我们能不能保证完成生产计划？”“能！”“能不能在休息时间教大家唱歌？”“能！”“能不能保证在休息时间给大家读报？”“能！”“上夜校能不能保证全到、争取比群众先到？”“能！”……最后腊梅说：“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明天晚上还在这里集合，讨论刚才传达的报告！散会！”大家一同站起来，其中有人喊：“凡是民兵都回去拿枪，到武装主任院里集合！”有关的人都答应“知道了！”大家走动开了，才发现县武装主任和支书来了，就此一同相跟着走出去。

二十八

他们两个人又回到永富院里，觉着这个会场比起人家那两个会场来，真有点看不得：回头一看，那几个青年团员民兵已经背着枪跑来了，几条枪都明闪闪地，给这个会场添了好多新气色，可是把那些锈红了的枪比衬得更看不得了。

又停了一会，人数已够了，永富上了台阶，宣布了开会，就从怀中取出笔记来传达县武装部的决议，但是他近一二年来对武装工作有些冷淡，所以对县里的决议连大概有几条、哪一条是什么内容也记不得，笔记本上本来记得不全，再加上字又草、灯又暗，急得他满头汗，结结巴巴念不成句，只听他念道：“发扬、发扬、发扬光、光荣传统，保、保卫胜利果、果实……整顿、整顿……”

“算了算了！”县武装主任自从进得永富家来，就觉着工作差劲，不过他还以为这个村子的的工作都比从前差劲，等到他见了互助组长们和青年团的两个会场，才知道问题仍在永富身上，

问题虽然发现了，却还不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还以为这个能说会道、能踢会跳的老干部，不过是工作抓得不紧就是了，直到永富照着笔记说不成话，才觉着已经彻底丢开了政治生活，连一个进步的群众都不如了。他很失望地说：“算了算了！这样没有准备的会，开起来是白磨时间哩！永富同志恐怕是家务忙一点，再担任这种工作不太相宜，明天通过村政委员会另推一个人来担任吧！我还得在这里住几天，把民兵组织整顿好了再走。今天夜里时间太晚了，大家也累了，我建议散会。”县武装主任这几句话，说得永富出了满头汗宣布了个散会。

二十九

永富这几天，没有碰上一件不倒霉的事，等到县武装主任当众宣布撤了他的职，更觉着再没有脸面见人，躺在床上整整一夜又没有睡着，熬到天明听得村里打钟，他就一个人骂：“打你妈的吧！老子不理你们！”他骂过之后，强闭住眼睛，可是闭了一会，太阳就照到窗上了。他起来勉强洗了一下脸，他老婆给他端饭来他也无心吃。他越不想听见村里的钟声，就越觉得钟打得响、打得次数多。他才端起碗来吃了两口饭，早晨收工的钟声响了，他刚把饭吃完，集合的钟声又响了。他听了这一遍钟声，预料他的儿子和媳妇已经在白杨树下和全组人集合在一起了，不过要做的活已经与他自己无关，而他自己的地还得他一个人去做。他当着他老婆的面强说了一句硬话，他说：“都走开吧！老子一个人也照样做活！”他推开了饭碗，强装成年轻人的步伐走出去，牵出牛去，套上车，往地里拉粪。

三十

永富装好了车就出发，刚走出村，忽然听见后边有人互相说话，越听越近，回头一看，原是一个互助组集体担粪。牛走得慢，人走得快，这些人一会就赶上了他，都和他打着招呼就超过他的车先走了。他觉着这些人的眼光都有点不平常，好象嘲笑他，走过去之后又偏有两个人低声评论他——一个说“鸡也飞了，蛋也打了。”另一个说“土地老爷住深山，自在没香火。”他听了这两句话，突然间脸红到脖子根，汗珠儿从头发里钻出来——因为这两句话的意思，第一句指的是他的孩子媳妇也走开了、武装主任也被撤职了；第二句指的是以后再没有人理他了。他喘了几口气，擦了一下汗，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一下才又往前走。

他赶着车又走到山根要转弯的地方，听见有人教唱歌——一个人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仔细一听，教的人是腊梅，这又把他难住了——因为转过弯去就是给铁柱补壑那块地，小春、腊梅和他们互助组全体的人都在那里做活，大家碰了头该说什么，走过去又会引起什么评论，这些对他都是不利的。他是为了争一口气才出来做活，现在着来不止不能争一口气，反要叫孩子、媳妇笑话一顿，实在不合算。他停了车考虑了一阵，最后觉着还是不过去好，因此就拨转牛头磨过车来往回返。不巧的是以前碰上那伙担粪的已经把粪送到地里又返回来了，而且又赶上他了，其中有个人问他：“为什么又把粪拉回来呢？”向来没有从地里往家里运粪的，他没有答话，只是又红了一阵脸，冒了一头汗。他把车赶到家门口，把粪又倒回粪

堆里去；老婆问他为什么拉回来他也不答话，只是卸了车、把牛交给老婆去拴，自己回去躺在床上，从此就病了。

三十一

永富病了三天，村里没有一个人去问过一声。这倒不是大家故意不理他，只是没有什么要找他的事——支书不找他去检讨思想了，村公所不找他开会了，互助组不找他上地了，孩子和媳妇都搬到李五家去住了，他一家独住一院又没个邻居，因此没有人到他家去。

起先他和他老婆都以为是因为一连几天没有睡好劳累着了，只要睡一睡就会好。这种估计也还有点正确，能好好睡一天也许可以好，可惜是比从前更睡不着，一躺下去就胡思乱想，想起来的尽是倒霉事，越想越生气，越生气越想，头疼得要命也停不下来。到了第三天，他老婆见他跟傻子一样，有点害怕，到村里去找医生，才把他病了的消息传出来。

三十二

第四天上午，李五组在地里休息的时候，有人把永富病得起不来的消息传给大家，大家都有点吃惊，小春和腊梅更有点慌。有人说：“还叫人家回咱们组里来吧！一个人孤零零地太可怜了！”铁柱说：“难道是咱们不让他回来？那是咱们的老朋友，又是给咱们村里出过力的老干部，难道谁还跟他有仇？可惜是他自己怕吃亏，硬要扭出去，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只要他愿意回来，我是很欢迎的！”“我也欢迎！”“我也欢

迎！”……大家都这么表示，没有不同意的。

有个青年向腊梅和小春说：“你两个也该回去看看老人家！”李五说：“光看看行了吗？他真要是成了病，就得回去伺候他一个时候！”又有个人说：“他爹的病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走开了才得的，依我说让他们两个人干脆也出了组回到他们自己地里做活，他爹的病就会好了！”李五说：“那可不对！人情是人情，道理是道理。只能叫前进的带着落后的前进，不能叫落后的拖着前进的落后。叫孩子们回去伺候他是人情，可是等他好了以后，还是得争取他进步！”铁柱说：“这样吧：这块地里的活只丢了一点小尾巴了，你们三个人就先回去看看他，我们做完了回去吃饭，吃了饭大家一齐去看看他！在一个组里共事七八年的老朋友了，就是他将来不回组里来，我们也应该尽一尽这点人情！”这么作大家也都赞成。

三十三

李五和小春、腊梅三个人回到李五家，李五老婆早把早饭做成等他们回来吃。他们在吃饭中间，商量好四个人一同去。吃过饭后，李五老婆取出自己腌的一些什锦咸菜作为礼物，四个人一同往永富家去。

他们走到永富门口，见院门还关着，李五就去敲门。

三十四

人有时候喜欢清静，可是过一会就又想热闹热闹，特别是当心里有事的时候总想找个人来谈谈。永富这几天来闷躺在

家，除了听到村里的钟声隔一会响一阵外，确实尝了一尝“土地老爷住深山”的滋味，很想找一个人来家里坐坐，只是谁也不来，自己一来不好意思，二来爬不起来，不能出去见人。这天早晨，邻近院里一只猫儿从大门道下钻进来，这要是在以前，他一定把它赶出去，可是这一天他觉着这也特别新鲜，就把这位不说话的来客叫到自己的床上，用他剩在碗里的一点冷饭来招待。他老婆正给他煎着一锅中药，满屋里都是药味。

他听见有人叩门，觉着是三天来第一件喜事。他笑了一声说：“奇怪！怎么还会有人再来打咱们的门呢？”

他老婆跑出来开了门，和李五夫妇打过招呼以后，向小春说：“你回来干什么？”这虽然是一句埋怨小春的话，可是才一开口，就忍不住笑出来。她一边领着客人往屋里走，一边隔着窗向永富说：“亲家来了！”永富一听是李五来了，突然添了精神，把被子一推，急忙披上衣服坐起来，等到来的人进了屋子，才知道孩子和媳妇也都来了。

永富说：“亲家！我哪里还有脸见你们？”说着就掉下泪来。李五握住他的手说：“你身体不好，不要多动！咱们有话慢慢谈！”小春、腊梅也都近前来慰问，不过都只叫了一声爹，没有找出适当的话来。永富说：“你们能回来看看我就好！”

腊梅见灶边七零八落堆着些饭碗、药锅、煤块、饭粒……就自言自语说：“怎么成了这个样子？”随手拿起笤帚来打扫、整顿——这是农村妇女一种不自觉的良好习惯，并不是为了讨人的欢心。

永富尝过了三天“清静”的滋味，已经认识到错误全在自己，不认错挽回局势来，想在李五面前表明一下自己的心事，可惜他还想维持一下老干部的面子，不想有甚说甚。当他

和李五谈到自己思想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小眼薄皮的老婆，吃不得一点亏，每天穷咄念，日子长了就把我的思想搅乱了！”永富老婆，真是个小眼薄皮的”。她见永富把摔了跟头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也不管永富病不病，就唧唧喳喳分辩起来。她说：“你不要冤枉好人！你说你‘说不出退组的话来’，叫我使使我的本事！你对孩子说‘什么积极呀、进步呀，都不过是在开会时候说说好听，肚子饿了抵不得半升小米！’你叫孩子‘遇事先算算自己的账！’这些话都是你亲口说的！是谁把你的思想搅乱了？谁的思想有毛病谁检讨！不要尽往别人身上推！”李五夫妇没有听完就哈哈大笑起来。李五老婆开着玩笑说：“亲家最怕的是检讨思想，怎么你也叫他检讨起思想来了？”永富无可奈何，但也不太反对。他说：“让她说吧！这还怨我不坦白！这话她要说在三天以前，我早和她吵起来了。现在我想通了，要不是我的思想先坏了，她的话能起什么作用？前几年也是这个老婆，我虽说没有改造了她，可是她也没有影响了我！”李五笑着和他老婆说：“亲家已经真能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了！”

钟声又响了，永富向小春和腊梅说：“打钟了！你们走吧！”腊梅这时正洗刷着这几天来没有洗过的碗碟，一边洗一边说：“我们已经在组里请了假，这几天不去了——等你病好了再去！”永富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感到孩子和媳妇本来都很好，可惜自己不长进才逼得他们走开。

停了一会，听见院里好多脚步声，全组的人都拥进来。铁柱走在前边，提着两盒点心，原是全组人来探病拿的礼品。永富见了大家，恻得说不出话来，很久才说：“我真想不到你们这一辈子还会到我这里来！”铁柱说：“快不要这么说，我的老

哥！我们谁跟你也没有仇！”“不是你们跟我有仇，是我自己太不争气！”“你是村里的有功人，大家心里都有个数！我们是不知道你病了，要早知道的话，早就来了！”“我心里也有个数，说起从前来，不论反扫荡，不论作土改，咱永富都是能踢能跳的人，可恨是自从有了一碗饱饭吃，就变成个自私自利鬼，互助也不愿参加了，干部也不愿当了，党的工作不想作还想留个虚名，最见不得人的是用最坏的思想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我向孩子说‘进步、积极’都抵不了半升小米，其实要不是大家一齐进步、一齐积极，我哪里会有半升小米吃呢？我对不起老朋友，对不起孩子们！”说着又哭起来。大家劝他好好休息，且不要想那些不痛快的事。

李五说：“亲家！你的思想真通了！我们给你贺喜！”永富说：“我自己也给我贺喜！我真象从前的人说的‘鬼迷心窍’了，现在可算把鬼打跑了！”

铁柱说：“那末你还回咱们互助组里不？”永富说：“只要大家还愿意要我这个龌龊人，那就很宽大了，我还有什么话说？”铁柱说：“好好好！这老哥这一下可算表明态度了！”大家都抢着说：“欢迎欢迎！”“我知道你会回来！”……在大家抢着说话的时候，腊梅拉了小春一下，悄悄说：“咱们也搬回来吧？”小春点点头。

大家要走，永富送到门口，腊梅和他说：“我去搬回我们的行李来！”腊梅又从衣袋里取出一张新来的报纸给一个青年说：“这是昨天才来的报！这几天我请了假，请你替我在组里读几天报！”说着就和大家一同出了门。

过了几天，永富能走路了，就去找支部书记谈思想去。

（一九五一年初稿，一九五六年七月改编）

金字

这个小东西，是我一九三三年在太原写的，因为原稿遗失，现在只能凭着回忆来重写。整理旧作应该是暮年的事，我现在能跑能走，自以为还未到那等年龄，不过在一个新的作品还未形成的时候，偶一为之也未尝不可，所以在本年国庆前后留京时期，把它写出来以献《收获》。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在乡村集镇上教小学，教学以外的杂事很多：赛神唱戏写通知、写神庙对联，村里人有了红白大事写请柬、谢帖、庚帖（婚约）、灵牌，年关之前替穷人写借据、卖契，替一般住户写春联……象一个全村或全镇的义务秘书。我在王店镇教小学，杂事要比一般村镇还多一半，因为镇公所的书记每天只顾上给镇长到遥远的山庄上催租逼债，镇长便经常拉我的差。在这种年头，为了不丢掉饭碗，不能随便得罪镇长，因此我便得多吃一点苦。

一天，镇长交给我一卷缎子和一包泥金，要我替他写字。这个任务他在上一天请区长吃过大餐之后就向我说过，说区长被调升，镇上有个欢送的表示。按地方的习惯，每逢被提升的县、区长离任的时候，地方士绅便向老百姓收一笔钱，请他吃顿饭，送些礼物。礼物是用绸缎之类的料子，写上几个恭维性质的金字，名叫“帐子”，“帐”字可能是屏幛的“幛”字叫

错了音，不过可以不必管它。

王店镇的学校设在一座汤帝庙里，冬天在厢房里上课，夏天常把课堂搬在正殿对面三丈见方的戏台上。这座戏台，每年只是秋收以后唱一次戏，除此之外，冬天有些大户借它存干草，到夏天一方面作课堂用，另一方面有些住家离庙近的农民在后台和角落上铺着席子，在午饭后和晚饭后到上边乘凉休息，好在和上课时间不冲突，倒也能各尽其用。这天午上，我拿着镇长交给我的缎卷子、泥金包、白芨、粗瓷碗和两支笔到台上去，一个青年小伙子从一条席子上爬起来问我：“先生！写帐子吗？我来帮你！”他这么一说，另外有几个人听了也起来看热闹。写“帐子”在这地方不算稀奇，大户人家做红白大事也有送“帐子”的。这位热心帮忙的青年有经验，并没有问我怎样做，就把泥金放在碗底，倒了一点水，用白芨研起来。

青年把金研好，我把缎卷子绽开一抖，台上闪起一道红光，引得大家吃了一惊，凡是躺着还没有闭上眼睛的人，都爬起来看。

“这是什么缎？”几个人一齐问。

“呀！跟闪电一样！”有一个人吃惊地夸赞。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缎。既然有人提到闪电，我便顺口说：“就叫它闪电缎吧！”

“给谁送？”有人问。

“给区长！”我说。

“为什么？”

“区长要走了！”

“早就该走！”“就不该来！”“去了是福！”……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我提起大笔在金里蘸着，就有人把缎子给我铺在桌面上问我说：“先生！给他写几个什么字？”

这一问可把我问住了。原来这位区长才来了三个月，因为办了一宗县里认为“很漂亮”的事，县里报了省府，省府就马上把他提升了。他办了什么叫“漂亮事”呢？本年春天，省府连派了三次粮秣借款，因为地方太穷苦，前任区长收不起款来被撤了职，而这位新区长一来了马上就想出了办法，办法全在于和王店镇镇长配合得紧密。这位镇长是全区的首户，全区大小村庄都有他放的债，都有押给他的地。新区长来了请他帮忙，他便出了个主意，要区长把全区欠款户挨次传来，有钱的交钱，没钱的把地押给他，他替欠户还款。区长听了他的话，用油印印了些押地字据，把欠款户一一传来，有钱的交钱，没钱的不填字据不放走，果然从四月份上任，不到五月底就把欠款全部追清。这位区长就是因为办了这样一宗“漂亮的事”才被提升了的。对这样一位“漂亮区长”，该恭维他几个什么大字呢？我一时想不出个主意来，便反问大家说：“你们说写什么好？”

那位研金的青年说：“写‘真会要钱’吧！”

“不好！不如写‘真会逼命’！”又一个人说。

“逼谁的命？不如写成‘逼死祖爷’更明白些。”又一个人说。

我笑了笑说：“你们都说得对，可是不论照谁说的写上去也保准出事！”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有人说：“还是由你写吧！”

由我又有什么好写的呢？还不是得昧着良心说话吗？我想了一阵，想出个模棱两可的成语来，写了“有口皆碑”四个大字。

“先生！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区长的好处大家常常念道着哩！”

“对！哪个人、哪一天还不骂他几遍忘八蛋！”

我换了小笔去写上下款。这上下款都是镇长拟好了写在个纸条子上的。我把纸条铺好正要写，那位研金的青年指着纸条子上写的下款“王店镇镇长王静仁率全体镇民敬叩”的“全体镇民”几个字说：“怎么还要叫我们给他送帐子？”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瞪了眼，识字的念给不识字的听，不识字的也火了！

“不行！除了催款，他哪里挨得着我们！”一个人说。

“我们不捧他这催命鬼！”又一个人说。

“可是镇长要我这样写，我替人写个字，怎么好改呢？”我既然抗不过镇长，也只好当众说明不是我的意思。

还是那个青年说：“写了也不算！我不出钱！”他又向大家说：“谁也不要给他出钱！区长给镇长放了押地债，让镇长一家给他送帐子吧！”

“连名字也不愿挂，谁还给他拿钱？”

“谁拿钱谁是忘八蛋！”

“谁拿钱谁是龟孙子！”

“谁拿钱谁是……”

“可惜是你们已经拿过了！”我说。

“谁拿过了？”每个人都看着别人的脸色互相追究。

我问：“镇公所前天不是收过一次钱吗？”

“那天收的是‘公事钱’！”有人回答。

我向他们解释说：“那一笔‘公事钱’，除了给区长摆了一顿筵席之外，剩下的只买了这么一块缎，花完了没有我可不知道。”

“真他妈的！又叫人家把咱们装鼓里头了！”

“质问镇长去！”

“质问王静仁去！”

“质问忘八蛋去！”

大家说着都跳下台，冲出庙门。

过了一阵，街上的人声就“哇啦哇啦”越吼越大了。

灵 泉 洞

没有人过大山的人，听起山里的故事来，往往弄不清楚故事产生的地理情况。例如我说起太行山里的故事来，有的人就问我：“一座太行山究竟座落在什么地方？你说的太行山为什么有时候朝东、有时候朝南？”提出这问题的人，就没有人过大山。凡是有名的大山，都指的是一大群连在片的山，不是一座山。就以太行山说吧：从河南省的济源县起，经过山西的晋城、陵川、壶关、平顺、襄垣、武乡、辽县、和顺、昔阳和河南的辉县、林县、河北武安、涉县、磁县、沙河、邢台一直到井陘大大小小重重叠叠的无数山头都叫太行山，可是每一个山头又都不叫太行山。你要是想横穿过太行山去，不论在哪一段上，从山的一边到另一边，都有那么二三百里厚，其中也有上、也有下、也有河流、也有平地，有时候你不觉着在山上走，可是那些地方已经比你进山和出山的地方高出几百公尺以上了。

闲话少说。我现在要说的故事，又是这太行山里的故事，这事出在太行山南端。这地方有一条山沟叫灵泉沟。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因为沟的最后边有核桃粗细一股泉水从一堆乱石下面钻出来，往前流了十几步远，又从丈把高的岩石节上落下去，落到一个岩石窝窝里，聚成了二亩来大的一池清水，从前讲迷信的时候，每逢天旱，附近几十里的人们常到这里求雨，所以把这泉叫做灵泉。灵泉沟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这地方有

七八十户人家，分散着住在沟的两岸，总名叫做灵泉沟村。三五户人家的各个小庄，又都各有小名——有叫石窑上的，有叫白土嘴的，有叫田家湾的，有叫刘家坪的……不必一一细数。

田家湾有个佃户叫田永盛。老夫妻两个佃种着刘家坪刘承业家十几亩山地，因为人口不多，日子倒也过得去，只是一连生了五六个孩子，一个也没有活，直到四十岁以后才落住了两个男孩，大的叫金虎，二的叫银虎。金虎在小的时候，是个粗胳膊大腿的胖娃娃，性情有点调皮，爱和别的孩子打闹，常把人家打哭了，惹得人家的妈妈找上门来。他们家门口不远就是沟岸，岸上离沟底有三丈上下高。金虎在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一不小心从岸上溜下去，好在岸是夹沙土的，经过多年雨水冲刷，好象有点坡度，所以平平安安溜到底，没有把他跌伤。从这以后他不只不怕，还好象是发明了一种玩法，在没有人见的时候，就坐到岸边往下溜，他妈妈每给他补一次裤，隔不了一两天就又被他溜土岸磨破了。有一次他正溜在半坡上，被他们院子里东屋邻家的小女孩小兰看见了。小兰告诉了他妈妈，他妈妈三天不准他出去；他一边向他妈妈说再也不溜了，一边恨小兰——好几天不跟小兰说话。银虎只比金虎小两岁，体格比金虎差一点，性情也比金虎软一点。田永盛两口常说金虎是武的、银虎是文的。

田永盛一辈子不识字，因此想叫孩子们识几个字，就把两个孩子前后都送在本村初级小学念书。果然和田永盛估计的一样，在念书方面金虎不如银虎，可是在别的事情上银虎就不象金虎那样刚强。刘家坪地主刘承业的孩子乳名叫接旺，大名叫刘步云。那孩子就不让同学叫他的乳名，谁要失口叫他接旺，他就揍谁。他和银虎同年级。有一天放学回来，银虎在路

上一不小心叫了他一声接旺，他揍了银虎两拳头。金虎马上还了接旺两拳头。接旺哭了，马上返回学校告诉了老师。老师向金虎说：“大同学不该欺负小同学。”金虎说：“接旺为什么可以欺负银虎？”这位老师是刘承业举荐的，因此惹不起接旺，只以大小来评理，他说：“他小你大！大了就应该讲理！”金虎横转脖颈翻了他一眼说：“你那么大了为什么比我还不讲理？”

“野蛮东西！教不了你开除得了你！”“你不讲理，叫我念我也不念了！”从这天起，金虎回去扭住劲死也不再上学，就帮着老永盛在地里做活。银虎上完四年初级小学，按老永盛的意见，也就是庄稼人识得个姓名就算了，偏遇了个爱管闲事的张兆瑞劝他供给银虎上一上高级小学。张兆瑞劝他也有个原因。张兆瑞住在刘家坪。刘家坪刘承业要送自己的孩子接旺上高小，而自己村里没有高小，须得往三十里以外的镇上送。刘承业也常在小说上看到古来什么什么员外家的孩子上学要用个书童，自己也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个，只是一来自己这个地主还没有那些员外们那样势派，二来当时的学校也已经没有用书童那个例子，要是真买起来也怕惹人笑话，不过要把十来岁一个孩子送到三十里以外，不找一个照顾他的人，在刘承业看来也实在不放心。他想来想去，想出一个怪主意来。他想田永盛是自己的佃户，田永盛的孩子银虎要能跟接旺一块去上学，自然就是个书童了——“他爹种的是我的地，他给接旺挑一挑行李、打扫打扫屋子，还不是分内应该的事吗？”有一天，张兆瑞到他家闲坐，他便把他的心事向张兆瑞说了，不过说的时候没有说出要让银虎给接旺当书童，只说接旺想到镇上去上学，没有个作伴的，要是田永盛的孩子也能去的话，那就是个好伴了。张兆瑞最爱管刘承业家一点闲事，不论当中人、作保人、

娶媳妇、办出殡好象都离不开他。他听刘承业那么一说，第二天便把田永盛说通了，因此银虎和接旺便成了同学。后来虽然银虎没有成了接旺的书童，不过大体上还不出刘承业所料——因为银虎家种的是他家的地，银虎对接旺果然要照顾许多。只有一件叫接旺父子们不满意，那就是银虎的学习成绩每学期都要比接旺好得多。二年的高小上完了，银虎和接旺都毕了业。接旺要到县里上中学，刘承业虽然没有再差张兆瑞来劝银虎去作伴，可是刘家湾的佃户们却替张兆瑞作了这件事。佃户们中间有人和田永盛说：“银虎有这点才能，你再鼓一鼓劲，供他上几年中学，也给咱们这些种山地的培养个人。”前边说过，田永盛家里因为人口少，日子还过得去，现在金虎又长到十六岁，又算给家里加了半个劳力，生活更丰裕一点，所以便同意了。

田永盛这一着失算得很：他不知道供一个中学生到城里念书，比供一个小学生到镇上念书费钱要多好几倍。只是半年工夫便把他几年来的积蓄差不多用光了，有心停下来吧，前边用过的钱算白扔了，要是供下去呢，以后的生活就成了问题。田家湾的朋友们都劝他不要松劲，并且答应大家尽力帮忙。来年春天，大家拼凑了几个钱，总算又对付了半年，可是大家都是佃户，经济力量也很有限；到了下半年，仍然还是田永盛的事。在从前，佃户借债是不灵的，因为他们的田地不属于自己的，债主们怕他们还不起抓不住把柄，所以都不肯借给，不过支用卖粮钱倒可以——当庄稼长起来的时候，先向囤粮户支了粮价，打下粮食来就给人家送。老永盛到了银虎上中学的第二年下半年，就用这种办法应付，一年工夫就把自己的日子弄得过不下去了。

银虎刚刚上到中学三年级，恰巧碰上了七七事变，来年（一九三八年）春天，日军打进了太行山，中学就停办了。银虎只差一个学期没有毕业。

又隔了不几天，日军占领了县城，县里、区里的旧官员不知都逃到什么地方去了，满山遍野都是溃兵土匪。老百姓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也只得东藏西躲，各自顾命。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开到灵泉沟一带来，维持住地方治安，动员群众就在山里组织起抗日政权，才算把这一带山区治理得有个秩序。田银虎就在这时候参加了抗日区公所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日军在太行山来过一次大扫荡，游击队配合八路军作战去了，地方上的抗日工作留给了地方党政领导群众来作。这时候，金虎在村里当民兵，银虎在区指挥部当联络员。村里人经过一年多的组织、锻炼，和一年以前大不相同——从前是出了租、纳了税不问世事，这时候，有的已经当了干部，有的已经当了民兵，其余工农妇青各有组织，都能够有领导地集体进退，刘家坪那些地主们虽然因为不得专横，对新政权有一千条不满，只是看见大风倒了，也只好跟着大势走。

反扫荡过后，那支游击队参加了八路军，没有再回到灵泉沟一带来。到了冬天，听说邻近各县有山西阎锡山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到处打抗日政府、捉共产党，银虎他们区上接到上级的通知，叫他们随时提高警惕，防备蒋阎军突然袭击，可是警惕了好长时候也不见动静。到了来年夏天，突然有个消息说，国民党军队，大批开到这里来了。

我要说的故事从这里才算开始。以上只算是故事前边的交代。

一九四〇年初夏的一个中午，银虎他们区上接到县里的紧急通知，说国民党军队在今天拂晓包围解决了抗日县政府和县委，好在同志们早有准备，半夜就转移了，损失不大，要他们赶紧分头到各村去通知公开了的党员们撤出来由县委带到北边去。大家问明了集合的地点和时间，就分头往各村去了。

银虎负责到灵泉沟一带几个村通知。他接受了任务，安排了一下次序，先通知了离三水镇比较近的两个支部，然后到灵泉沟，打算趁天黑和灵泉沟支书王正明、村长张得福一同相跟着溜出来往集合地点去。

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同学刘接旺坏了他的事。刘承业自从听到蒋阎军在邻近各县打共产党的消息，就派他的儿子刘接旺到外边去找国民党。这一天，接旺已经随军到了三水镇。军队解决了县政府之后，马上分兵到各个区上去。一个排长带着两班人，由接旺带路，到了银虎他们那个区公所扑了个空，接旺预料区上的人可能转移到灵泉沟，所以向排长建议到灵泉沟来。

银虎跑到灵泉沟田家湾自己的院子里，顾不上回家，先到东屋里向王正明传达了上级的通知。王正明听完了说：

“铁拴和得福到洞里处理文件去了，快打发金虎去叫他们回来商议一下！”他说着揭开帘子叫来了金虎交代明白，临出门又吩咐他说：“傻孩子！千万不要向别人提起！”

金虎刚一出院门，正碰上刘接旺引着三四个兵远远走来。头一个兵用手枪指着金虎说：“不要走动！回去！”金虎不知

是什么事，跑回来向王正明说：“接旺引着几个兵来了！不叫我出去！”王正明和银虎一齐说：“坏了！”王正明说：“谁能给铁拴他们送个信，叫他们赶紧走开才好！”银虎说：“可是这信怎么还能送出去呢？”银虎的话才落音，接旺和那几个兵已经进了院子。接旺指了指东屋，那些兵就进了东屋。接旺一见银虎说：“你也在？”指着银虎回头向那些兵说：“这是他们区上的干部！”又指着王正明说：“这是村里的共产党负责人！”那些兵们就拿出绳子来捆他们两个。金虎一把拉住要捆银虎的那个兵说：“我们犯了什么罪？”另外两个兵拖住金虎问：“你是什么人？”接旺说：“那是个傻瓜！叫他滚！”那两个兵把金虎拖到门跟前，其中一个一脚把金虎蹬出来说：“滚！”王正明老婆和他们的女儿小兰见这情况都哭起来。南屋里田永盛老夫妇两个，北屋里李铁拴媳妇听见东屋里乱哄哄，也都跑出来看，只是一个兵挡着门不让他们进去。

金虎被那个兵一脚蹬出门来以后，只向他爹妈说了一句话：“咱银虎叫人家捆起来了！”田永盛说：“为什么？”金虎说：“不知道！正明叔也叫人家捆起来了！还不知道要……”他正要说“还不知道要捉谁”，猛然想起王正明说要给铁拴他们送信的事来。人们都说金虎傻，其实只是直爽一点，另外一方面也还有他的聪明。他说了半句话，咽了个下半截，就跑出大门去。他顺着村西头往石洞上那条路上跑，刚跑到村口，被一个端着大枪的兵拦住说：“不许出村！”他又找了一条路跑，又被一个兵堵回来。他想：“不用问！别的路也叫人家堵起来了。”他返回来又打自己的门口经过，看见自己小时候常往下溜的土岸，马上想出主意来，往岸头上一坐，“取律律律”溜下去，顺着河床往石洞上报信去了。

张得福和李铁拴是怎样两个人？到什么石洞里去取什么文件？金虎把信给他们送到了没有？他们都走开了没有？这里要交代明白。

前边提过，灵泉沟出泉水的地方，不是有一大堆石头吗？这个堆可大得很——东西有里把长，南北有五六十步宽，都是不知多少年来的山洪从上游推下来的，塞在一段山谷里。石头也大小不一，大的有象骆驼的有象大象的，虽然堆积着好象一撞就会翻，其实互相挤压得很紧，一个人能推得动一动的都很少。大大小小的石头窟窿里，长着些青青绿绿的藤蔓，把这堆大石头遮蔽得象一些卧在草丛里的牲口。这一段山谷很窄，两岸都是十几丈高的石岩，靠北边的岩下凹进去一个大石坎，又被乱石堆把前面挡住，只留着屋门大小的一个口可以出人，里边却能窝藏几百个人。上年夏天敌人搜山那几个月，灵泉沟村的人，除了民兵差不多都在这洞里住了几个月，村公所和党的村支部也都在洞里工作，直到日军退出山区以后，大家才搬回村住，好多家的箱笼家具还没有搬回去，村公所和党的文件箱也存在洞里一个秘密地方，箱里边还有一些公开的文件。张得福和李铁拴都是党的村支部负责人，不过当时的党除了支书以外都还没有公开。张得福在行政方面的职务是村长，李铁拴没有担任什么公开的职务。早几天地主们谣传说国民党军队要来，村支部决定把所有的文件都埋了以防万一，所以他两个人去处理文件，可是当他们才离家一小会，家里就出了事。

金虎从土岸上溜下来，绕着河沟跑到洞里，见张得福和李铁拴还在一块大石头上点着油灯整理文件，就没头没脑报告他们说：“村里来了些不知道什么兵，把银虎和正明叔捆起来了！正明叔说叫你们两个人快逃走哩！”张得福一听，预料情

况有些不妙，便把挑出来的文件卷了一下，又塞进箱里，推进原来存箱子的乱石头窟窿里，把原来塞口的一块石头依旧转过来堵住窟窿，把灯吹熄了，塞进原来放灯的石缝里。他一边作着，一边和铁拴估计情况；金虎在一旁催着他们快点走。金虎领着头，铁拴和得福随在后边，三个人都从洞里钻出来。不妙的是金虎来的时候，在村里找出路误了点事，顺着河沟走多绕了二里多路又耽搁了些时间，等到他们从洞里出来，接旺引着两个兵也赶到了。好在这一段山谷又窄又深，傍晚天黑得早，里边看外边清楚，外边看里边有点模糊。金虎一看见他们来了，扭回头拦住铁拴和得福两个人说：“返回去往沟后面跑！他们来了！”三个人都知道沟的上游石岩很高没有出路，只是见接旺他们越来越近，也只得返回去，都想等他们进了洞然后趁那机会跑了，没想到接旺和一个兵进了洞，留了一个兵端着枪站在洞口上。铁拴他们三个人蹲在远处的几块靠岩根的石头上，借着一丛野葡萄藤挡着身子向着洞口了望。铁拴说：“怎么办呢？”金虎说：“我看这个地方，抓住岩上吊下来那几条野葡萄藤可以上去！”金虎是个想到什么就做到什么的人，一边说看，一边动了一步跳起去抓那葡萄藤，不料一把没抓得住，两脚一落地，把几块大石头中间的一块比洗脸盆大一点的石头踏得陷下去，把他也掉进这个窟窿里边。铁拴和得福被他吓了一跳。铁拴把手伸到窟窿里低低地叫了他一声，他伸起手来拉了铁拴一下手说：“下来吧！里边地方很大！”铁拴和得福也都跳进去。得福临下去时候，顺手把刚才遮身的那丛野葡萄藤拉过一部分来堵住口。金虎又向岩根这边摸了摸，没有摸到边；又走了两步踏着水，水可以淹住脚面。他向左右两边摸，都摸着了岩石，只是靠岩根的正面还是什么也摸不着。他

就是这样挪着步往前摸着，仍是什么也没有。铁拴站在金虎踏下去那块石头上向外探了探头，踮起脚尖一伸脖子，也只能把头伸得跟外边的石头平，什么也看不见。停了一会，他听见前边有人讲话，虽然听不见说的是什么，可听得出他们越走越远了。他蹲下去说：“我听得他们是走了！咱们该怎么办呢？”得福说：“咱们就在这里不要动，先让金虎回去探一探！金虎！金虎！咦！金虎哩？”铁拴也叫了几声不见答应。两个人都在自己的周围乱摸。铁拴摸住了一只手，叫了一声“金虎”，得福说：“还是我！”“金虎哩？”“不知道！”擦一根洋火看看吧！”“不敢！不要让外边看着光！”他们两个也和金虎一样，也是往岩根摸了两步下了水，又往前挪了几步摸不着边。铁拴说：“这会可以擦洋火了！”得福擦了一根洋火，金虎在里看见火光，远远地大声喊：“快来吧！这里边大着哩！”得福说：“这傻瓜！喊什么？快出来吧！”金虎说：“再擦一根洋火吧！我已经摸不着口了！”得福一边给金虎擦着洋火，一边也觉着惊奇，便向铁拴说：“想不到这里又有这样的大石洞！”他一连擦了五根洋火，金虎才来到他们跟前。铁拴说：“金虎！洞上那几个家伙已经走了。我们两个还在这里等一会，你先回村里给咱们探一探情况看他们走了没有，看捉去咱们几个人。”金虎答应着，摸到窟窿口边就往上爬。铁拴又向他说：“你先到白土嘴这一边了望一下，要是村边还有他们的岗哨就不要进去！”金虎说：“知道！”说着就爬上来走了。

铁拴和得福两个人估计情况交换意见。他们虽然不知道上级的新决定，可是都说家里恐怕待不下去，不如到北边山里去参加八路军。意见一致之后，金虎还没有来，两人闷坐着很着急。铁拴说：“看样子咱们出去，一年半载也不见得就能再回

这里来，不如把文件箱搬过来藏到这个新洞里吧！”得福同意这么作，两个人趁着等金虎这个空子，就去把文件箱和油灯都拿过这个新洞里来。他们先把箱子放在跳下去的地方，擦了根火点着灯，望着靠岩根那边一看，先看见的是明晃晃一道水和一片坡形的石头地面，看远处和顶部都黑幽幽地看不见什么，看了看进口的侧面，是囫圇圇的岩石，好象窑洞的墙壁一样，弯弯地包上顶去，上边有几根尖东西，好象柱子一样垂下来；地下也有那么几根尖东西，摸了摸是石头的，上下对起来，好象狗牙——不过没有这么大的狗——是钟乳石，他们点着灯，沿着这墙根从右往左走着，脚踩着的，手扶着的，全是连在一块的石头。在头顶上边，又看见过好几根象锥一样垂下来的柱子。墙根是曲曲弯弯的，地势是忽高忽低的。他们走着走着，发现墙根又有个小窟窿能钻进去。铁拴让得福等着，自己端着灯钻进去一看，里边象一间套间，比自己院里那三间北房还大，不知道什么地方透风，吹得他直打寒战，还没有赶上细看，手里的灯就被风吹灭了。他赶快摸出来向得福要了洋火又点着灯，才向得福说明情况。他们依旧依着墙向左走，走到进口对过偏左一点的地方，看见半墙上好象蹲着个人，吓得张得福叫了一声“谁！”那人没有动。他们仔细看过去，才知道仍是墙隆起来的石头，象一只大猴子，恰好在那好象叉开的两腿之间，有一股水顺着有点坡度的墙流下来，好象猴儿在那里尿尿。墙根下积了一大潭清水，又向边上一条石壕流出去。这股水也象洞外边乱石堆下流出的那泉水一样粗，一直流出洞口外漏下那乱石堆里。可见灵泉沟的泉就是从这里流出去的。这个洞和那个旧洞不同——那个旧洞有差不多一半墙壁是借着那堆乱石头堵起来的，所以里边的石头缝儿很多，可以随便找一个

缝儿藏东西；这个洞上下前后左右是一块岩石，好象是岩石里边一个大泡儿，就算有一些小窟窿，也都是明明白白一眼就能看见的。他们转了大半个圈也没有找到个可以藏箱子的地方，赶走到那流水的地方，对着那象猴子的石壁出神，金虎就来了。

金虎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背着些行李，凭着朦胧月光走到新发现的窟窿口，手扳着石头把腿往下一伸，一只脚踏在箱盖子上，吓得他愣了一愣正要再纵出来，可是手没有扳稳，已经溜下去了。他叫了声“铁拴哥”，没有人应声；伸手摸了摸箱子，和他前一会儿在旧洞上见的那个文件箱大小差不多，他估计到是他们两个人在自己走后去搬过来的，因此也想到他们两个人可能到摸不着边的大洞里去了。他翻身就上来，把他拿来的行李扔下去，然后自己又下去，向着岩根那边摸着走，走了十来步，才看见对过的灯光——因为洞里的地方太大，望过去只能看见红红的一个光圈。他叫了一声“铁拴哥”，铁拴在对过应了一声；一个往里走，两个往外走，走到中间才碰了头。得福说：“你快说情况怎么样！”金虎哭了。金虎说：“俺家银虎跟正明叔叫人家捆走了。俺爹跟东屋婶婶赶到村外边，也叫人家撵回来了。把民兵的枪都要去了。”“再没有抓别人吗？”“没有！”铁拴问：“都到谁家去过？”“除了俺家和正明叔家，还去过得福叔家，把箱柜里的东西倒下一地，什么都翻遍了！”铁拴又问：“到我家去过没有？”“没有！”得福问：“你到我家去来没有？”“去来！婶婶叫把夹被、夹袄都给你拿来了！还给你拿了些干粮！”“你没有说我在哪里吧？”“我悄悄对着婶婶的耳朵说你在洞上。小秀问：‘我爹在哪里？’婶婶说：‘小孩子家不要管！’”一提小秀，得福掉下了眼泪。小秀是他个独生

女儿，才九岁。他最疼爱这孩子，每次上地回来都要抱一抱她。

铁拴向得福说：“看来他们没有发现我是党内的人，我可以停一停再看。你得走！”金虎向铁拴说：“连你的行李也拿来了！”铁拴说：“拿来也好，可以叫得福叔拣用着的多带一些，用不着的藏在这里，以后咱还能拿回去。”金虎说：“我给你们拿过来！”说着返到进口处把两个背搭一齐拿进来。他们把行李打包好，铁拴向得福说：“要走你最好现在就走。走它一夜就不会再碰上熟人了！”他们又计划了一会路线，然后就要出洞，可是一走到口边看见了文件箱，才想起这东西还没有处理。得福说：“洞里连个缝也没有，还不如搬回原来的地方。”铁拴也同意了。金虎说：“你们还说我傻瓜！就把它摆到洞的中间也可以！这么大个‘洞’还没人知道哩，要找那石头缝干什么？咱们出去搬一块石头把进来的窟窿一盖，不就是最保险的地方吗？”他们两个人猛一听都笑了。大家就按金虎说的，把箱搬回洞里，找了块水浸不到的石缝里放下，然后出了洞，盖了洞口，金虎和铁拴两个人打发得福上了路，又到旧洞里摸了两把夏天里空室清野寄存在外边的镢头，冒充从地里做活回去的样子就回去了。

这一天晚上，灵泉沟除了刘家坪常有人打着手电筒往来以外，其余各家门口都特别安静——小孩子也不在打麦场上打闹了，大人们也没有端着碗到门外乘凉的了。不过你可不要以为大家都早早关了门睡了觉。那种人也有，只是不多，更多的男人们都是三三五五在村边眼亮的地方看动静。金虎和铁拴一走到村边，就看见一排枣树下边有几个黑影往远处躲了一躲，他们便也往路旁另一边的枣树下躲了一躲，可是这一躲，正撞上这一边枣树下的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正注意着刘家坪的电筒晃

来晃去，冷不防背后来人，吓了他们一跳，正要跑开，忽然发现是金虎和铁拴，才又都站住了。金虎和铁拴，自然也吃了一次虚惊，然后彼此就搭上了话。铁拴问：“那些家伙们没有走呀？”有一个人说：“走了！”“那么刘家坪那边有什么事？”“那又是一帮子。”铁拴他们碰见的两个人究竟是谁？刘家坪还有哪一帮子？下边再来交代。

二

铁拴和金虎在刚进田家湾的西头枣树下不是碰上了两个人吗？这两个人是父子俩，孩子叫李小胖，是个青年党员，和金虎在一块当过民兵。他们的家就住在村梢这一排枣树后边。金虎在政治上本来也很忠实可靠，只是脾气太直，有时候有点傻气，党内怕他不小心把不该讲的话“统”出去，所以没有吸收他，只是有些无关大要的事也不避忌他，所以他也知道党内一些无关大要的事。他在新洞里报告张得福说村里再没有别的人被捕、把民兵的枪收了等等的消息，就是从小胖那里打听来的。他见小胖说刘家坪还有“另一帮子”，接着就问：“又有一帮子什么人？”小胖说：“听说是他们的一个什么旅部参谋和一些随从的人，住在刘石甫家。听说刘石甫和刘承业两家摆席请客，刘接旺也可能没有走。”“坏东西们！又不知道搞他妈的什么鬼！”“自然不会有好事！你们快回去吧！田大爷和王大婶都着了气，快回去劝一劝他们！我妈到你们那里去了！我们在这里盯着刘家坪那边！”又指着远处说：“那边的枣树底下也有我们的人！有什么事我给你们送信！”铁拴和金虎别了小胖父子俩，就回家里来。

他们两个人走到大门外就听得东屋里王正明老婆和她的女儿小兰的哭声，一进大门更听得哭声劝声连成一片。来劝的尽是些妇女——男人们都怕再发生意外事，不便来，只打发妇女来了。金虎把镢头放在院里先来看他的爹妈，只见他爹少气无力地躺在床上，两眼半开半闭，也不哭，也不叫，也不说话。金虎叫了声“爹”，他爹只把一只眼睛睁大了一些看了看，也没有说什么。金虎娘坐在床边，一声也没有哭，两个眼睛定定地看着老永盛。她见金虎叫爹，便向金虎说：“把你爹气糊涂了，不用叫他！让他多歇一会！”在床的对面椅上坐着的小胖的娘，慢言慢语劝老永盛说：“事情已经出下了，不要再把你气着了！只要你能好好的，咱们就可以慢慢想法打点孩子的事，你要不清醒，老嫂只顾忽乱你的病，还顾得上照顾别的吗？”金虎娘说：“这老头就见不得事，小肠窄肚的！”又向老永盛说：“醒醒金虎爹！碰上晦气事谁能不生气？可是生气又抵什么用？咱的孩子又没有杀过人，放过火！没有罪！咱的孩子跟狼叼走了一样！你醒一醒，歇一歇，咱们想个法子到狼嘴里夺咱的孩子去！”老永盛听他老婆又提起孩子，又无精打彩地长号了一声，眼泪横流下来，又流在已经湿了的枕头上。小胖的娘劝他说：“不要再哭了吧！你看老嫂还不哭哩！”金虎娘也说：“不要哭了！哭抵什么事？我一辈子就不会哭！数哭没有用哩！”金虎也说：“爹！不要哭了！我明天到镇上打听打听他们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了！”老永盛这才被逼出几句话来说：“算了！已经丢了一个了，你不要再去惹事了！我去！”他挣扎着要起来，可是身子不听话，抬动了一下就又摔回去了。大家劝他多歇歇，不要起来。

铁拴回来以后，先到东屋里劝了一会王正明老婆和她的女

儿小兰，然后转到南屋里来。他见老永盛的嘴有点歪，一只眼睛睁不大，便问：“能起来吗老叔？”老永盛挣扎得又起了一下，仍然失败了。他转向金虎娘说：“南屋婶呀！老叔可是病了呀！我爹初病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金虎娘可没有想到这个。铁拴他爹当年是半身不遂死的。金虎娘听说老永盛现在的情况和铁拴他爹初得病时候的情况一样，便又加了一番着急。她叫老永盛动一动手，果然右手动不了。她恨得在自己的腿上捣了一拳头说：“哼！真他妈的祸不单行！金虎！明天一早先到镇上给你爹请个医生去！”金虎说：“可是咱也没个钱呀！”“把你爹的袍子先卖了！人好了再说穿衣服的话！”小胖他娘说：“老嫂是个有主意的！先顾人要紧！”铁拴向老永盛说：“老叔！我看婶婶说得对；明天叫金虎到镇上去给你请医生，顺路听一听风声，打听一下银虎和正明叔的下落。”又低声说：“在这风头上，我不便到外边去跑；金虎去了没有人怀疑他。家里的事我可以替你做。”小胖他娘也说：“家里有什么事，也可以叫小胖来帮个忙。”

正说着小胖，小胖就进来了。铁拴问：“有什么动静？”小胖说：“别的没有，刚才刘家打发人把石窑上的杂毛狼叫去了，不知道鼓捣什么！”

杂毛狼也姓刘，祖上是老地主，到他父亲手就倒塌下来了。当刘家坪刘家大修宅院的时候，正是他父亲拆了房子卖木料的时候，所以刘家坪刘家房子上用的木料，大部分都是石窑上刘家的。杂毛狼叫刘光汉，三十来岁年纪，也上过二年初中，因为在学校里赌博被开除了。他父亲后半辈贩卖烟土，他是子承父业卖金丹棒子。在为人方面他也和他父亲在世一样，是个什么事都敢做、什么钱都敢花的人物。因为他头上有些白

头发，又是那样的人品，所以人都叫他“杂毛狼”。抗日战争开始，这杂毛狼趁着兵荒马乱群众东奔西逃的时候，在村里大摇大摆收拾了人家好多没人看管的财物；抗日政府成立之后，县里关了他几个月禁闭，把追得出来的赃物都追还了原主，才又把他放回村里，交给村政权管制改造；放出他来才一年工夫，就又遇上了这次变化。

一听说杂毛狼又出了世，小胖他娘打了个冷战。她说：“娘呀！又该人家吃人了！”金虎说：“都怨县政府没主意！什么宽大？早杀了他不就没事了吗？”铁拴说：“你把他说得太重要了！如今最大的毛病是咱们的势力还小，等咱们的势力长大了，把他们的老根刨了，他们就不厉害了！”金虎娘说：“天塌了大家顶！事到了头上怕也不算！顶着吧！割了头不过碗大个疤！”小胖说：“大娘说的对！斗吧！管他黑毛狼白毛狼！狼能吃人，人也能打狼！”

大家议论了一会，决定第二天打发金虎到镇上去，就都散了。铁拴、小胖和村里另外几个积极一点的同志们，这一夜轮流着在村边遛哒，察探着刘家坪的动静。刘家坪这一边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可也有好几次有人打着电筒往别的小庄上来往，不过没有到田家湾来。

第二天早晨，金虎他娘刚把金虎打发走，就听见刘家坪打着锣喊话，因为隔得远一点，听不清喊的是什么。打锣的人似乎走得很快，一会走到石窑上，一会又走到白土嘴，很快就来到田家湾。这一会田家湾的人可听出是谁来了——是杂毛狼。杂毛狼每打几声就喊一阵子，喊的是：“都听着！今天谁也不准出村！吃了早饭，都到刘家坪去听讲！有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听见杂毛狼的嗓门可就烦了，虽然没有人出来公然挡他的马

头，可是谁也在暗暗地骂他——“快滚开！不想听你这狼号叫！”“有你妈的什么重要事情？”“重要的事情是防你们这一窝狼！”“……”

吃了早饭，也有些人慢慢往刘家坪走着，其中老头子老太太太多，男女青壮年都很少。就是去的这些人，也没有是热心去听讲的，只是有的想去看一看风色摸一摸底，有的怕人家怀疑自己与头一天捉去的两个人有关系；青壮年们，男的都怕他们拉了民夫，女的往往吃过这些旧军队的亏，所以除了家里没有别人或者很容易被人家怀疑是反抗的以外，很少有人去。金虎他们院里，就只去了铁拴一个人。

也许因为去的人太少了，停了很大一会，杂毛狼又到田家湾来催人。杂毛狼走进田永盛家里，见老永盛躺着，金虎娘正用小壶喂他喝水。杂毛狼说：“走走走！为什么这时候了还不动身？”金虎娘这人刚强是刚强，可认得事。她知道现在和杂毛狼硬碰沾不了光，不如用好话把他推走了合算。她说：“光汉！我不是不愿去！你看老头子已经起不来了。这种病说不定哪一会就会咽了那口气……”“走吧走吧！这不是我不行，是上头不让！”老永盛闭着半个眼睛，歪着嘴，咯里咯得地说：“你去你的吧！我死我活怨不着你！”杂毛狼这家伙有点迷信——怕鬼。他看见老永盛确实象个快要死的人，又听得话里有些怨气，就想到老永盛的鬼魂会来找他的麻烦，因此就连忙改口和金虎娘说：“要不你就照顾病人吧！我回去和上头说说看！”说罢扭头就出了门。老永盛低声说：“什么你妈的‘上头，下头’的？”

杂毛狼从南屋出来又进了东屋，见正明老婆躺在床上，她的女儿小兰坐在床边守候着，和刚才那个场面差不多。杂毛狼这

家伙什么毛病都有。他嘻皮笑脸怪声贱气地向小兰说：“好姑娘！你怎么不去听讲去呀？”小兰翻了他一眼说：“我妈病了，没有人伺候！”他又放低了声音说：“不去也行！你得答应给我点什么好处！”小兰变了脸，站起来说：“给你一刀！戳你个货郎鼓！”小兰她娘因为丈夫被捕的事哭了一夜，杂毛狼来的时候，她才瞌上眼没有多大工夫，小兰才把被子给她蒙上，杂毛狼开头的话说得声音不高，没有把她惊醒，这阵小兰顶撞了杂毛狼，才惊醒了她。她把头上的被子掀起，还没有看清楚是杂毛狼，杂毛狼一扭头便出去了。杂毛狼临跨出门槛的时候说：“真能逃出我手才算你有本事哩！”小兰娘问明了情由，很后悔地向小兰说：“你不理他算了，顶撞他干什么哩？”

杂毛狼跑遍了大小各庄，才算又撵出五六个人来，连以前来了的一共不过二十来个人，稀稀拉拉，站在刘家坪刘家大院大门外的高阶台下。台阶上的大门楼下已经摆好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杂毛狼上了阶台，站在桌子前面向下边看了一眼走进门里去了。不大一会，接旺又出来看了一下又进去了。又停了一会，杂毛狼和几个村里的流氓走出来下了阶台站在下边，接着走出一个兵来站在一旁，刘承业陪着一个着武装带的军官走出来，接旺和爱管刘家闲事的张兆瑞也跟了出来。刘承业躬着腰让坐，那军官一点也不客气，挺着肚子坐下来；刘承业和接旺、张兆瑞等人也各找位子跟着坐下。最后走出来的是刘石甫。他没有坐，直接走到桌子后面先开口讲话了。

这刘石甫是刘承业的堂兄。这个人来历可不浅：当他在三十来岁的时候，有他在高级小学时期一个同学做了省建设厅一个秘书，便把他举荐到省里做官——头一任是补修办公室的监

工，第二任是搬运石子的押送员，第三任升了官，升的是什么铁路筹备处材料处采运科验收股股长，不过直到他上任后的第三年，这条路也还没有正式测量过，后来又不知道因为什么把这筹备处取消了，才又把他调到一个“永恒煤矿筹备处”去——可是等到查明那个预定的地区根本没有煤以后，那个筹备处也解散了。他被调到“永恒”没有几天，建设厅厅长换了人，他那位秘书同学也跟着旧厅长走了，所以到了那个“永恒”的筹备处解散以后，他就回到灵泉沟来。他的派头要比他的堂弟刘承业大得多。他原名叫刘承基，在省城作“官”的时候，见人家那些作官的彼此都称呼“字”，他便也请人起了个“字”叫“石甫”——这个字在省城虽然连他那位秘书同学也没有称呼过他，可是回到灵泉沟以后用得呼声响。比方说刘家大院这个大门楼里大门顶上的匾额，原是当年修房子时候就修在门框子里的，上边刻有“仁者寿”三个大字，刘石甫从省城回去那一年，觉着门楼上的油漆旧了，又觅人重新涂抹了一遍，把三个大字又贴了贴金，并且在后面又加了一行款志，刻的是“主人省营永恒煤矿公司监督石甫刘题”。灵泉沟的识字人们虽然没有到过省城，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个公司，可是记得“仁者寿”三个字确实不是这位什么“监督”写的，还记得这位“监督”原来不叫什么“石甫”，而且这一进三院的刘家大院也不过有他六间房子，他也不算不得个主要的“主人”——真正主人还只是刘承业。从这时候起，灵泉沟的人们就已经知道他改名叫“石甫”了。刘石甫回家以后，一言一动都要想法表示出他是从省城做官回来的，常要把他的灵泉沟话加上几个省城的字音儿。例如灵泉沟人们的土话把门窗的“门”念成煤炭的“煤”，刘石甫不只要把“门”字改正过来，而且要把烧火的“煤”也说成

“门”。他说省城里是这么说，别人没有到过省城，无法和他分辩，也只好让他烧“门”算了。他回家以后，包收过这个山区的牲畜税，屠宰税。杂毛狼给他当伙计。后山有些小孤庄，死个驴驹或者羊羔，他们主仆们知道了都要当漏税法办，往往因为一个羊羔就罚人家四五十块银元。在抗日政府成立之后，后山里有些人告他的状，经政府查明，命令他退过一些款，所以国民党军队这次来了，把他作为个提拔的好对象。

现在在这个大门楼下阶台上边开口讲话的正是这个刘石甫。他穿着一件当年在省城穿回来的时兴大衫，拿着一把在省城带回来的折扇——这时候是初夏天气，又在这凉爽的山区，根本还用不着扇子，可是刘石甫觉着不拿这个不够气派。他这种打扮，初见面的人看起来会把他认成一位相面的先生。他说话好用最时髦的字眼，不论用的是不是地方，用上说得通说不通，总是想起来就用。他端正地站在桌子后面，先学着当年他那位秘书同学的声气咳嗽了一声，便把嗓门放宽说：“往前站，往前站！”先前跟着杂毛狼走下来那几个人往前凑了一凑，挺着腰站得笔直，其他群众好象也有几个人活动了一下，大部分没有动。刘石甫继续说：“不要动了！听话！我们的‘抗战’打了两年多日本了。我们的中央军‘进行’到我们的‘原籍’来了。他们的共产党都被捉住了。我们的国民党又都‘秩序’了。我们的吴参谋来给你们训话。大家要‘严重’地听！越‘严重’吴参谋越喜欢。就是这个‘问题’！”他说罢这几句话，就向那个军官打了个招呼，自己退到了一边。那个军官就是吴参谋。

吴参谋毫不推让，站起身来，踏了两个正步，走到桌子中间开口训话了。他一开口先说了个“汉菜”，他的勤务兵先来了

个立正，别的人不懂什么叫“汉菜”，也不懂勤务兵为什么要立正，都只是愣愣地看着。吴参谋瞪着眼睛向台上台下扫了一圈，似乎很生气，然后向勤务兵喊：“稍息！”接着他高一声低一声发了一大会脾气，可是在场的人，连刘承业父子在内，都没有听懂他说了些什么。他为什么发脾气，这里要做一点解释：这位参谋不是本地人；所说的话，除了他的勤务兵，在灵泉沟没有人能懂得。头天晚上，他住在刘家商量今天的事，要没有勤务兵给他们作翻译，根本就商量不成；可是他现在站在阶台上训话，勤务兵就没法代劳了。他说的“汉菜”就是“现在”。按他们那部队的规矩，官长一开口训话，不论先说出几个什么字，听话的人都得先来个立正，现在吴参谋已经说了“汉菜”，除了勤务员谁也不懂得立正，怎么能不惹他生气呢？他尖声怪气说的原是这样一些话：“都是活死人！什么都不懂！国民都是这样的教育程度，日本怎么能够不打我们呢？”可是从他的口里说出来，就变成这么个调：“斗西豪西林！麻子斗不登！贵迷斗西极让加入升斗，日本杂木冷狗不大吴蒙老？”吴参谋发过脾气之后，正式开始训他的话：“汉菜，妖鬼宁蒙……”他的话就这么有板有眼训下来，直到大家站的腿酸了才算训完——训的是些什么，自然还只有他的勤务兵知道。

吴参谋训完了话，刘石甫就宣布第二个项目。他说：“现在有几个‘组织’叫步云给你们‘宣传宣传’！”

接旺站起来，从蓝制服口袋里取出他们头天晚上拟的计划念：“灵泉沟村正规化方案：一、取消不合法的村公所，成立正规化村公所。二、取消不合法的农会，成立正规化农会。三、取消不合法的民兵，成立正规化的国民兵团。四、分类制

定门牌，以便清查户口……”他麻麻烦烦念了好大一会，总算把那一大张字念完了。

刘石甫又站起来说：“现在该选村长了！我‘提拔’个人要大家‘表示’！我提拔刘承业！”杂毛狼跟同他在一块的几个流氓举手说“赞成”，别的人没有说什么。刘石甫说：“好！村长提拔过了，该提拔村副了。我提拔张兆瑞！”还是杂毛狼那几个人举了举手就算通过了。这样正规化选举自然很容易通过，不必一一细说，结果：刘承业是村长，张兆瑞是村副，刘石甫是农会干事长，刘接旺是国民兵团指导员。不过按当日国民党“正规化”的习惯，农会干事长和国民兵团指导员这两个名义，就是村一级国民党和三青团的两个负责人。刘石甫和刘接旺正充当的是这两个角色。他们把这几个头头安插好之后，村长刘承业又指派了五个村警察，让杂毛狼领导。国民兵团要按年龄开名单由村长审查批准，收到以后才办。接着刘承业宣布门牌分类的办法说：“门牌分三等：白牌红字的是头等。凡是国民军属、合‘法’的党政在职人员和村一级合‘法’的负责人，都定头等牌。白牌黑字的是二等。一般人家都定二等牌。蓝牌白字的是三等。凡是共党分子，不论已捕不论在逃和接近过共产党的嫌疑分子，一律定三等牌。门上定有头等牌的，军警要进去的时候先要喊‘报告’，等里边应了声才准进去；定有二等牌的，军警在查户时候不打招呼可以进去；定有三等牌——就是定有蓝牌的，军警可以不奉命令、不分昼夜，随时进去检查。”大家听了，都出了一身冷汗，生怕把蓝牌定到自己的门上。刘承业又接着说：“就是这些事！完了！”

刘承业正要退到一边让刘石甫宣布散会，吴参谋急得站起来指着他说：“噢！把贼妖精的歹狗忠良拉哈老！”刘承业见

他这样着急，赶快躬着腰来注意他的话，只是一字不懂，急了一头汗，最后只得问勤务兵。勤务兵说：“参谋说你‘把最要紧的代购军粮忘了’！”刘承业连忙点头说：“是是是！我该死，我该死！怎么把这么要紧的事忘了？”他马上一转脸向大家说：“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中央有命令，叫敌后驻军就地购粮。咱们的国军是公公公公买公卖的……”他这样结结巴巴地说，倒不尽是被这位吴参谋吓糊涂了的，除了着急之外，还有一点别的原因。头天晚上，这位吴参谋和他提起这事来，说是“公买公卖”，可是一取出各种粮食的定价单来，他们几个人就觉得有点为难了。他们都知道要购灵泉沟的粮，固然能仗着他们的势力向群众多派一点，可是他们也知道群众在粮食方面是老鼠尾巴，没有多么大油水，真要供应军队，大头还是他们自己出。他们见粮价单上的各种粮价，差不多都只能抵住实价的一半，所以都有点暗暗摇头，向吴参谋提了提，吴参谋说不能动。今天这“公买公卖”要刘承业自己往外说，自然说到口边舌头就有点软了。刘承业结结巴巴把代购军粮的话交代清楚，接着掏出粮价单来念了一遍，就看见阶台下面的人交头接耳议论起来。要在抗战以前，刘承业在灵泉沟讲话还有人敢议论，早就被他骂得狗血喷头了；今天也不是他有了什么宽宏度量，而是他故意想让人们议论给吴参谋听。吴参谋见这情况，忍不住站起来大骂一顿——不过大家仍不知道他骂了些什么话。他骂过之后，刘石甫就宣布散会。

散会以后，杂毛狼他们那几个流氓就忙起来。分类门牌是头天夜里赶做成的。他们领了刘承业的命，火速跑遍各个庄落，把门牌都定上去。

金虎家一院三户都定了蓝牌。杂毛狼到这里定牌的时候

没有说一句话，拿着个斧头狠狠地在各家门框上定，震得房顶上往下落灰土。定完了就取起他剩下的一叠门牌往别家去了。

这个院子里去刘家坪参加会的只有铁拴一个人。东屋里小兰娘问铁拴定牌是什么意思，铁拴给她解释着。金虎娘听见铁拴回来走进了东屋，也赶忙跑来看。金虎娘顾不上先问蓝牌的事，劈头一句就说：“铁拴！你看金虎这时候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呀？”“啊？”这地方离镇上不过十几里路，早晨走了到不了中午就该回来，可是这时候太阳已经大偏西了还没有回来。在平常时候，一个人出门去了早回来一阵迟回来一阵本来没有多大关系，只是这几天不比寻常，头一天村里才出了捉走王正明和银虎的事，所以大家都不放心。他们胡乱估计着情况，焦急地等着金虎，可就是等不来，一直等到晚饭以后，大家越着了急，铁拴，小胖趁着月光接到五里以外还是没有接着。

三

金虎上哪里去了呢？银虎被捕的第二天早晨，金虎不是到镇上去请医生去了吗？金虎一早起程，不到吃早饭时候已经到了镇上。这镇叫三水镇，是三条小河沟会合的地方，房子都修在河西边的岸上，看起来是长长的一条，一共不过百来家人。这地方，虽说人家不多，在这山区可也算个热闹地方。可是这一天特别：金虎在路上没有碰到一个人，远远看见镇西北的关公阁，阁下边的拱门里也没有人出人。金虎这人有时候还是有点傻——要是别人，碰上这种情况，总得考虑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来往，自己是不是可以进去，可是金虎只急着要给他爹请

大夫，一看到了关公阁，就一溜小跑步望着它跑，跑到跟前就往里闯。他一闯进了拱门，见拱门里站着个兵。他不知道为什么觉着不妙，愣了一愣，见那个兵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也就过去了。他走在街上，很不容易碰到人——平常在街上摆的小摊一个也没有了，偶然见一个挑水的老头或者送灰渣的老太太，也都是匆匆忙忙直来直去，谁也不说一句话。他走到常往灵泉沟去的马大夫药铺，一推开门，见里边住着几个兵，柜台做了他们的床，药柜也做了他们的衣架。一个兵凶凶地问他：

“干吗？”“找马大夫！”“不在！”“哪里去了？”“不知道！”金虎见他们的话很“铤”，知道问不出个道理来，只得退出。金虎这时候得不着个主意，正想找人问问，恰好对面来了个熟人，是从前粮食集上的牙行老了。“老丁！你见马大夫没有？”老丁虽说认人宽，可是只记得大概是什么地方的人，并不能叫出名字来。老丁看了金虎一眼说：“灵泉沟客！你请大夫吗？”“是！”“不巧得很！今天还得借你点光！”“什么事？”“支一趟差去！”“什么差？”“给部队下河南换大米去！”“这可不行！我爹的病很重！”“反正也没有大夫！还是受一点屈吧！”“老丁！我们哪一次来集粮食也照顾你！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呢？军队抓差不抓差碍你的什么事？”“对不起！我参加了新县政府的差徭局！抓差是我的责任！不要说废话！快到县政府门外集合去！”“你们的县政府在哪里？”

“还在共产党那个县政府住过的地方！不要乱说话！什么我们的县政府？我们的县政府不是你的县政府吗？咱们是老相识，我关照你！要是别人听见了，不当共产党办你才怪！真是山里人！快去吧！”金虎挨了老丁一顿训，觉得很晦气，等老丁走开之后，暗暗说：“老子可没有那么老实！请不到大夫，老子

回去！”他不往那个什么县政府走，一股劲又向关公阁走回来。他走到阁边，原来站的那个兵挡住他说：“不准出去！”“我有事！”“不管有没有事！”金虎看了看旁边，已经有两个被挡住的人，其中有一个很面熟，好象到自己家去过，只是想不起是谁。金虎想：“不用说，又跟昨天一样——北头不准出去，跑到南头一定也出不去。”他看了看临河的石岸，这岸可和田家湾那土岸不一样，一点坡也没有，不能往下溜。他想往别的地方找一找出路，正要往回返，可是才一动步，那个兵又说：“不要走，就在这里等着！”这时候，街上又走来两个兵，向那个站岗的兵喊：“那里有几个了？”“有三个了！”“有几个算几个吧！”说着已经走到金虎他们三个人面前，向他们说：“走走走！”就这样把他们带到他们那个县政府门口。

这个地方，已经集中了一百来个人，由十来个兵看守着，金虎他们是最先被抓去的。跟金虎他们来的这两个兵向另一个大概是班长的兵说：“报告！再找不到人了！”“就这样快走吧！再迟了就赶不住站口了！”这十几个兵，把这些人押送到一个存放粮秣的大院里。那里管粮的早已把口袋、扁担、绳子准备好——这些东西原是头天晚上在镇上挨户搜出来的——叫他们把小米装起来，挑到河南的博爱县换大米去。不多一会，大家把口袋装起来，每十五个人算一组，由两个兵押着，慢慢都从三水镇起程了。

金虎他们这一组在中间偏后一点，前面长得很，后面看来也还有三四组，想跑是很不容易的。走在金虎前面的，就是金虎看见很面熟的那个人。那个人身材也不小，担得也不重，可是走得很不稳，不象个常担挑的人。金虎一边走着一边端详着这个人，慢慢就想起是谁来——原来是共产党县委宣传部的

高部长，当日县委会没有公开，他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到灵泉沟去过，到过金虎家。金虎只知道他是高工作人员，虽然他换了衣裳，金虎对他也还认得很准确。金虎要是真傻的话，随便叫他一声高工作人员，也许坏了事，可是金虎在这些地方特别懂事——已经认出来是他，反而连端详也不再端详他，只装做不相识的样子，一前一后走着。高部长似乎也已经认出金虎是熟人，所以只是用破草帽掩着脸，连一次头也不回，生怕金虎叫他一声。他们这一组，除了最前边有几个三水镇的人互相说几句话以外，其余谁也不认识谁，都是一言不发，挑着担子各吱各吱往前走。

大约走了二十来里，要翻一座大山了，前边传过话来说：“就地休息！”说话间，前边的人已经把担子放下，大家就在这山坡下休息下来。这时候，大部分都摘下草帽来当扇子搧着风，坐在金虎前边的高部长却没有摘帽子。

金虎又往前看，和他相隔五六个人，坐在本组前边那个押送兵眼前的，正是他要请的那位马大夫。他向马大夫招手说：“先生！你也来了？我正要找您！”说看走了几步凑过去。那个押送兵说：“不要动！就地休息！”金虎说：“求求您！我们只说几句话！”“要说快说！”金虎就蹲到马大夫身边，把他爹的病状向马大夫大略说了说，并且问马大夫“迟了是不是还能治”。马大夫说：“这种病，要危险就在得病的前几天；要是能过个七天八天没有事，也就稳定下来了。这种病治起来见效也很慢——急也没有用！咱们回去再想法子吧！”马大夫接着又问了问说话的声音怎么样，哪条胳膊能动，清醒不清醒……前边就传过话来说：“走了走了！”那个押送兵向金虎说：“走了走了！”金虎便和马大夫作别，回到自己放担子的地方，挑起

担子来跟着大家走了。

这一天，除晌午打了打尖以外没有误什么事，虽然早饭以后才起程，不到天黑还走了七十多里。这些差都是临时抓来的。抓的差不比派的差——派的差半路偷跑了可以找派出的地方，抓的差半路偷跑了找不着根。押送兵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所以一路上追得很紧，不到天黑就赶到了预定的程头。这天晚上住在一个也象个小镇的山村。村里有一座骡马大店，在这慌乱的时候，路上没有赶脚的牲口，他们就住在这店里——班长住在柜房，士兵住在客房，运粮的民夫就在拴骡子的敞棚下，把骡马粪上边铺了些草，睡在草上。大门上了锁，士兵们挨班换岗把守着。

吃过饭以后，押送兵还叫大家按白天走路的次序分组躺下。大家睡定以后，金虎推了推旁边的高部长，对着高部长的耳朵说：“你不是高工作人员吗？”高部长一把抓住金虎的手，扭回头来向他说：“不要乱说！你是田银虎的哥哥吧？田银虎跑了没有？”金虎又扭过头去，简单告他说银虎和王正明被捕了，并且又问他说：“你怎么不跑？”高部长说：“在镇上跑不出去，人家把镇上封银了。”金虎说：“就在路上想法子跑吧！回去叫他们认出来不得了！”高部长说：“知道！不要再说话了，防别人怀疑！”他们就这样睡了。

第二天早上，大家胡乱吃了点东西，就又挑起担子向南走了。这地方，越往南走山越低，天气也越热。这些人都是从高处来的，有的穿着两件布衫，有的还披着夹衣，走到这天半前晌，热得大家都把多余的衣服脱下来搭在粮袋上，还都是满头大汗。

在金虎这一组前边的那个押送兵，忽然闪在一边，和后边

的那个押送兵说他肚子疼。后边的那个押送兵给他想了个办法——把他的枪栓去了，把枪让一个担粮的民夫捎上，又把他的行李包让另一个担粮的民夫捎上，让他空着手走。这样又走了一会，前边的那个押送兵又不行了，后边的那个押送兵，又把自己的行李包挂在金虎的扁担头上，他自己搀扶着前边的那个押送兵走。又走了一会，前边的那个押送兵的病似乎越来越重，哼哼得越来越响。就在这时候，已经走进一段有松林的地方，前边传来了话：“就地休息！”被搀着的那个兵，没有等前边放下扁担，自己就先躺在一棵松树下边。他向搀他的那个兵说前边有个大夫。搀他的那个兵就向民夫说：“前边有个大夫吗？来给我们这个伙计治一治病！要是能治好了，今天夜里再抓个差，明天就放他回去！”马大夫听了有点不耐烦，心里想：“抓住大夫给你们担上小米换大米，已经够不讲理了，怎么给你们治好了病还要等到明天才能放我回去？反正药铺也叫你们占了，回去不回去都一样！我还是给你们挑担子吧！”想到这里，故意装作没有听明白，没有答话。躺着的那个挣扎着坐起来向前边看了一看，指着马大夫向搀着他的那一个说：“就是他。”那一个直接指着马大夫说：“来呀！”马大夫见推不过，只得走过来说：“半路上，也没有带针，也没有带药，使什么治病？”“你先给看一看好不好？”马大夫，抓住躺着那个兵的手诊脉，大家也都围拢来看。马大夫诊过脉，又看了看指甲，摸了摸肚子说：“中暑了！”当大夫的差不多总都有个救人的心肠，一经过手就想给他治一治。他从衣袋里掏出个药包来说：“这是我自己带着用的防暑药，也不过够用两三次，现在给你用一些吧！要一杯新鲜凉水！”站着的那个兵问哪里有水，有人指着松林的右边说：“这岭背后的沟里不远就有

水！”那个兵把自己腰里的茶杯拿下来递给金虎说：“取一杯水去！”金虎接过茶杯，觉着偷跑的机会来了，扭过头来正要走，迎面看见高部长，忽然又变了主意。他把茶杯往高部长的手里一塞，学那个兵命令自己的口气说：“取一杯水去！”他想自己跑不了不过吃点苦，高工作人员跑不了有性命关系，不如把这机会让给高工作人员，可是他对着好多人也不敢挤眉弄眼，只好直来直去说话。高部长自然懂得他的意思，心里非常感激，接住茶杯就去了。这时候，马大夫要站着的那个兵再找一个家具盛药，那个兵把躺着的那个兵的茶杯取下来递给马大夫，马大夫把一包“益元散”用一根树枝拨成了三份，把一份拨到那个茶杯里说：“等取来了水，冲一冲喝下去就会好些。”那个兵把药接到手里，坐下来等水。他刚一坐下来，忽然想到打发去取水的人，就是自己一路上押着怕跑了的民夫，有点不放心——刚才因为一时着急忘了这一点。他把茶杯里的药递给躺着的那个兵，自己背着枪闪过岭头上一看，沟里的水看得很明显，只是派去取水的人不见了。他自言自语说：“他妈的！人也跑了，把茶杯也取走了！”他返回来看见金虎，骂金虎说：“傻家伙！叫你去取水，你为什么叫别人去？”“谁去不一样？”“一样什么？他跑了朝你说话？”“跑不了！”“你妈的！跑不了是不见了！把茶杯也带走了！”说着又从躺着的那个兵手里接过那个有药的茶杯向金虎一塞说：“给我就用这个杯取水去！小心把药冲跑了！”金虎正来接杯，他又缩回手去说：“算了！还是我去吧！”说罢就拿着杯转过岭去。

那个兵刚过了岭，前边传过话来：“走了走了！”金虎他们也正各自去拾扁担，躺着的那个兵挣扎了一下坐起来说：“不要动！让他们先走吧！”后边一组的一个押送兵过来问情

况，坐起来的这个兵说：“我肚子疼，他去取水去了！把这一组留到后边吧！”那个兵见他这么说，就带着后边的一组从他们这一组旁边走过，接着，其它组也都走过去，只把他们这一组留下了。

这个兵，因为刚才挣扎了一下，觉着肚里有一股气冲上胃口来，疼得他哎呀一声又躺下去，急急地叫：“大夫大夫！快快快！”马大夫和别的人又都跑过来看。他按着肚子向马大夫说：“快给我按住！加点劲！再加点劲！对对对！就这样！”马大夫按了一阵按得手酸了，刚一丢手，他说：“不行不行！不要放手！”马大夫跟金虎说：“你来给他按一会，我手酸了！”金虎接住手给他按着。

山上的路看着很近，走起来却得一阵子，直等到所有的挑担子的都走得看不见了，取水的那个兵还没有回来。这时候，有病的那个兵好象有点昏过去了，半闭着眼。金虎一边给他按着肚子，一边又想出怪主意来。他向在他身边的马大夫呶一呶嘴说：“快跑！回去给我爹看看病！”马大夫笑了笑，往大路的右边一条河沟溜了。别的人见马大夫拐了个弯不见了，都看了看金虎和躺着的兵。金虎扭着头向他们把嘴噘得尖尖地，并不出声地说：“跑跑跑！”胆大的先走，胆小的后走，一小会跑了个光。金虎见他们都跑了，丢开了给那个兵按着肚子的手，见那个兵也没睁眼也没有出声——大概是昏过去了。金虎暗暗地说：“你多躺一会吧！我这个大夫也要去了！”他站起身来一溜烟地跑进松林里去。

金虎在松林里大约走了两三个钟头，估计那个押送兵不会再来追他，这才离开松林从路上向家乡的方向走，却不料走了几里，又碰上了一个兵。那个兵说：“站一站！”金虎站住

了，那个兵就递给他一个小包说：“给我送一送行李！”金虎说：“我不是本地人！”“不管是哪里人！哪里人能不支差？”金虎想：“这样要起差来哪有个完？”把包裹往手里一接，听见“花啦”一声，原来不过是一百来颗核桃。

金虎在前，那个兵在后，又走了四五里路，要过一个村子。他们刚进了村，对面来了两个兵，其中一个的领章上多一朵花儿，跟着金虎的那个兵连忙闪在一旁敬了个礼。可是多一朵花的那个兵并不走过去，却喊住跟着金虎的那个兵说：“怎么拿个包裹也拉差？”“给我们营长拿些核桃！”“营长说过叫你拉个差吗？那么一点东西也拿不动吗？怪不得干正事也找不到个人，都叫你们这样把人力浪费了！自己拿上！”那个兵没有再回话，从金虎手里接过包裹来自己拿着走了。金虎说：“谢谢你！要不是你来我就走不了了！说罢正回过头来要走，只见多一个花的那个兵说：“喊喊喊！你可不要走了！这里有正经事！”金虎说：“什么事也不能做了！我饿了一天还没有吃饭哩！”“没有吃饭不要紧！这里有饭，也有住处！”“不行！我出来好几天了！我爹还在家病着哩！”“不要说废话！过几天磨完了面就放你回去！”原来这里派收的（他们说是代购的）军粮是麦子，要在这里磨面。金虎又在这里磨起面来。

金虎就这样被他们东一拉西一拉，拉了一个多月也脱不得身，最后还是在黑夜里偷跑出来，钻了两天林才回到灵泉沟。

他这时候有了经验，每次要到一个村庄，总得先到比较高的地方看一看村里有没有兵，回到灵泉沟来也一样，先转到洞顶上的老羊坎下边向村里了望了一阵。这时候刚过中午，从老羊坎前边望灵泉沟每一个小庄子都是一目了然，跑过一只鸡来也看得见。他看见村子里不只没有兵，连本村人也很少活动，大概

是睡午觉。顺着老羊坎西南方向，下一段坡，就是他家租种刘家的十来亩地——从田家湾人们种的地说来，这几块地要算最远的，要下到沟底，过了沟，再上一道大坡才能走到。他这一个月来，支差到过的地方，谷苗差不多都没有间开，有的已经长到一尺来高，看样子已经撕扯不开了，他就想到自己的谷苗一定也是那样，可是这阵子从远处看去好象已经都间过了。他想了一想，觉得不会——“爹的病死活还不知道，娘一个人怎么会顾不上到地里来呢？”他想顺路到地里看看，就顺着岭往下走，大约有里把远就走到自己地里。到地里一看，苗是间开了，不过只是拔了拔，没有锄。他想：“拔开了也不误，一定是爹的病好了。”

他下了坡，过了沟，走过一段土岸下，见岸后寄埋人的一个空穿堂（可以容下一口棺材的小土洞）封上了口，预料是村里死了人，他的心颤了一下，想到自己的爹。他又绕了一个弯，听见土岸后的地里有人说话，吓得他打了个退步，仔细一听，听得有女人的声音，这才放了心。这块地是王正明的。他想看看是谁在地里，就爬了一层堰上到这块地里，只见有四个人在地里间苗，是他娘、铁拴、小胖和小兰。他叫了一声娘，四个人一齐停住了手。

他们见金虎来了，自然都是又惊又喜，彼此间问长问短，哄乱了一阵之后，都到一棵核桃树下坐下来。金虎先问他娘说：“我爹怎么样？”“还是那样！”“我看见穿堂里又埋了人，吓了我一跳！咱村谁又死了？”“你东屋叔叔！”小兰见又提起她爹，就又流下泪来。金虎听了一怔说：“怎么？他们把东屋叔叔害了？”铁拴说：“唉！慢慢说吧！气人的事情多得很！你先跟大娘回去弄点什么吃一吃再说！”金虎娘说：“饿了没有？出

去也没有带吃的，这二十多天你怎么活过来的？我只说我两个孩子连一个也落不下了！”金虎娘向来不好哭，这会可掉了几点泪。金虎说：“咱银虎怎么样？是不是也——”“不知道，不知道！那天在三水镇那河沟里毙了几十个人，都叫人家打得、烫得不象人样了！我跟你东屋婶都去找过尸首，把他东屋叔叔的尸首找着了，怎么也找不见他，大半是死了！那一群狼怎么会让他逃出来哩？”铁拴劝他说：“那也说不定！也许逃出去了！我觉得找不见比找见好——有个想头！”金虎娘说：“我不想他！活着哩，他终久会回来；死了哩，想也不算！现在总算已经有一个回来了！”小胖说：“大娘总算是个明白人！金虎哥！你快先跟大娘回去吧！还不知道在哪里吃了点饭，先回去吃上点再谈，话长得很！”金虎说：“这么多天了谁还知道个饥饱？半前晌在岭西一个小庄上要吃了人家一团槐叶菜吃，直到这会也不知道饿！”金虎娘说：“咱家里也是那种伙食！粮食差不多叫人家那些狼要光了！我且不回去！你先回去看看你爹！蒸笼里有给你爹蒸的两个黄蒸，还有几团槐叶菜，你自己吃上点，喝上点水，歇歇吧！我们今天后晌想给你东屋婶把这块谷赶完！”金虎说：“可以！我吃点东西和你们一块来拔！”大家都说：“不用了！你先回去歇歇吧！”铁拴说：“你要来也不要声张！不要让杂毛狼他们知道咱们帮东屋婶的忙——连东屋叔叔的尸首还是我们偷着去搬回来的！”金虎答应了声“知道”，就回去了。剩下他们四个，仍旧做起活来。

四

原来当金虎出去以后的第十天，三水镇的军队和他们的县

政府，对捕去的共产党已经经过拷打以后，一齐赶在河沟里用机枪扫射了。在灵泉沟捕去的两个人，王正明的尸首找见了，银虎是死不见尸活不见人；金虎说的是到镇上请医生去也一直没有见回来，大家估计他弟兄两个恐怕都是凶多吉少。铁拴、小胖他们几个党员们悄悄商议了一下，要对王正明、田永盛和张得福三户有困难的党员家属照顾一下，因此就分了分工，分成了两个组来帮他们先把谷苗间开。铁拴去和金虎娘一商量，金虎娘非常感激他们的好意，不过金虎娘是个要强的人，不愿多受别人的照顾，因此就和铁拴说：“要照顾我和小兰家这一组，我和小兰都能做活，我们也参加到里头做，连你们地里做不出活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帮忙，大家在一块伙种这几十亩地算了！”她这种提议，经铁拴和党内的同志们商量了一下，大家都觉得是个好办法，只是说金虎爹病着还得个人伺候，让金虎娘有空儿就做一会，没空儿就不要勉强。以后大家就这样办起来了。这组织本来就是个互助组，还带有代耕队的意思，只是当时还没有那些名目，所以大家都不那么称呼它。金虎回来之后也参加了这个组织。

幸好有这个互助组，虽然大家差务都很重，四五个月来都是多在外少在家，可是地总算没有荒了，到了秋天还有七成收。小兰她们家有一块谷子长得特别好，二亩就割了四十多捆——要只说这一块地，在那时候就算十分收成。

一天中午，小兰和金虎、铁拴三个人在场地上打谷——在灵泉沟是最早的一场谷——扬出来以后，大家估计有六担左右。铁拴因为避嫌疑，扬出来以后，就回去了。小兰娘拿着簸箕、口袋到场里来。他们三家只有两条口袋，先装起一口袋来让金虎扛着往回送，小兰娘和小兰又去装第二条口袋。就在这时候

候，接旺领着杂毛狼他们三四个人拿着口袋和斗来了。小兰娘看这来头好象是来讨租，可是往年都是收到家才按数给他送，今年他为什么亲自领着人来拿来哩？

原来这一年是和往年有点不同：军队每月要“代购”粮，村公所连他们的国民兵团有三十个人每天要吃粮，有好多户不能按月缴出，刘承业说他都给垫上了，说是垫一斗要还一斗半。在快收秋这前几天，他们父子们商量了一下须得就场收，因为他们算着全村的产粮数字，要是先还了他们的代垫军粮，租子就很难收起来了。刘承业和接旺说：“不要让粮食回了他们家，要当场收。要是佃户，先收他们的地租，剩下代垫粮，能还得起的就叫他们还，实在还不起的能还多少算多少，其余算是借给他们的，明年秋天一斗要他们还二斗——好在咱们又没有真正垫出够那么多，真要是没有，让他们落个永远欠户算了。”

接旺和杂毛狼他们就是奉了这道命令来的。小兰娘一看情况不妙，就赶紧说好话。她说：“步云，是要租吗？”“对！还要垫粮！”“我求求你！这两三个月了，家里一颗粮也没有，这一场谷也打得湿，等一通收完了干一干我给你送！你不凭信吗？多年来我哪一年欠过租？”“今年说今年！我家的粮食都给你们垫出去了，不收我们吃什么？”回头向杂毛狼说：“盘吧，盘吧！”又翻着账本向小兰娘说：“你们的租是两石，给你们垫过两石二斗军粮该还三石三斗，一共是五石三！”杂毛狼插嘴说：“还有新派的一石军粮！”接旺说：“那让他们自己送，咱们不管代收！”这时候，他们已经装满了一口袋靠辘轴框竖着，又去装第二口袋，金虎就已经送回去一口袋又拿着空口袋来了。金虎见他们拿着斗量着装谷子，小兰母女们眼泪汪汪站在一边看，知道他们是来收租，就直冲着接旺说：“这谷

是人家自己那二亩地里的，租种你们的地里种的是玉菱……”

“你管不着！收着你的你且说话！”金虎见说也没有用，就去扛竖着那一口袋，接旺说：“慢着！你就没有看见是谁的口袋？等我盘够了剩下你们再扛！”说着已经又装了一口袋，接旺就指着同来的两个狗腿子说：“先扛着吧！”两个狗腿子扛着走了，接旺也溜过场边去，剩下另一个狗腿子和杂毛狼还继续盘着往口袋里装。金虎没法，只好丢下空口袋拿起扫帚来去扫游糠。杂毛狼一边撑着口袋，一边嘻皮笑脸扭过头来对小兰低声说：“你只要答应我个事，我替你们求个情留下两口袋！”小兰瞪了他一眼，大声说：“该饿死就饿死算了！饿死了只当是叫狼吃了！”“好！有本事！我看你有多大本事！”小兰娘拉了小兰一把说：“闺女家不要多嘴！回去吧！”金虎见杂毛狼的话来得不善，丢下扫帚双手叉住腰看他还要怎么样。杂毛狼怕金虎发了傻气和他干起来，也再没有敢说什么。小兰趁空溜走了。

他们把场上的谷扫尽了，一共装了五口袋。接旺问：“还差多少？”那个狗腿说：“差二斗多一点！”杂毛狼说：“他们已经扛回去一口袋了！叫他们回去拿去！”接旺说：“下一场再补吧！”又一本正经地向小兰娘说：“下一场你再给二斗算了！”好象还留了点人情。

小兰先回去把场上发生的事件向铁拴说了，铁拴很吃惊。稍停了一阵，金虎和小兰娘都回去了。小兰娘一进院子就咄念着说：“听着死吧！这还怎么活哩！”金虎娘听得，就赶紧走到门边揭开竹帘子问：“又怎么了？”还没等小兰娘说话，金虎就替她答应说：“接旺把她们的谷就场上盘去了！”铁拴从北房里伸出头来低声说：“东屋婶！这里来！”小兰娘答应着到

北房里去，金虎娘和金虎也跟了去，大家见小兰早已在北房里。铁拴说：“东房婶！你要留神！杂毛狼早就操了贼心！你以后一步也不要离开小兰！”金虎说：“他真要敢动手动脚，冒上个跑出去不回来，先把他揍死再说！”铁拴说：“真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说不定那还是个办法。现在暂且这么跟他滚着过吧！”

村里人听说把小兰家的谷扛走了，差不多后晌都没有去地收秋去，割下来还没有扫到场里的庄稼也都不再抢着往场里担，人们三三五五到处打搅搅，商量着对付这件事。铁拴也趁着人乱的时候，和小胖他们几个党员研究办法。金虎娘也去跟小胖他妈几个老太太们谈论这件事。

太阳快落的时候，杂毛狼拿着一叠给国民兵团才做好了二十来件军衣，来找小兰缀扣子。这半年来，他们村公所里不论有什么活，都强派给定蓝牌的户口来做，所以小兰母女明知是对小兰的报复，也只得做。小兰娘说：“你放下吧！我们缀好了给你送！”杂毛狼说：“不！急得用！我等你们缀好了拿走！”小兰母女们没法，只得给人家做，两个人每人才缀了一件，天就有点黑了，小兰娘点上了灯。

杂毛狼一会儿又出了个鬼主意向小兰娘说：“到村公所给我取电筒去！”小兰娘见他不怀好意要把自己支使开，又无法抵抗，着了急，走出东屋门冒向南屋叫了声“南屋嫂”，恰好金虎在家。金虎揭起帘子说：“她出去了！我给你找她去吧？”“不用！你替婶婶到村公所跑一趟！”杂毛狼隔着门喊：“不要乱支派人！我派的是你，不是他！”这意思越发明白了，小兰娘更着急。金虎走出院里来说：“你去吧婶婶！我给你看门！”说罢就从屋里走出来蹲在南屋阶台上。小兰娘见有他在

院里，就放心出去了，不过她没有从刘家坪去，先到小胖家去找金虎娘。

杂毛狼听得金虎在家，已经有几分不自在；又听金虎说管“看门”的意思，好象也已经猜着了他的心事。他暗暗埋怨说：“这傻瓜！你这会怎么也聪明起来？”他本来也想找个理由马上把金虎支使出去，可是他这会有点怕金虎。他想：“我的心事他已经猜着了，再要一支使他，不更明显了吗？万一他的傻劲一发作马上跟我顶起来，院里又没有自己一个人，一定得吃眼前亏！”可是他又一想：“要不把他弄走，眼看得要成的事不就耽搁了吗？”他又怕吃亏、又不甘心拉倒，马上得不着个主意，就搬了把椅子堵着门面朝里坐下，慢慢来想他的“两全之计”。

这院里的大门就开在东房的南边山墙下，和南屋的阶台在一个平线上。金虎蹲在阶台上待了一会，见小胖走到大门口用手点他，就走到门口和小胖说话。杂毛狼听见金虎走动，扭过头来一看，见金虎已经走出去，觉得十分幸运。他约莫着金虎已经出了门走出十来步之外，以为这机会再也不能错过了，马上站起身来准备去扑小兰。小兰见他一动也有点心慌，马上停住手里的活准备来对付他。就在这时候，金虎又故意咳嗽着返回来仍蹲在原处，杂毛狼也就坐回椅子上去。

静了一会，就听得外边有人哭，哭着哭着往南边岸上去了。又稍停了一会，听见村里乱喊叫，小胖大踏步跑进来朝着东屋里喊：“小兰！快去看看你娘！你娘在岸上哭着哭气死了！”小兰听了这消息，好象挨了一炸弹，顾不得丢下手里做的活就站起身往外闯。杂毛狼站起来伸开两条胳膊拦住门说：“你要往哪里跑？”小兰急了，左手拿着正缀着扣子那件军衣，右手

捏紧了针，狠命地双手向杂毛狼胸口一推，连椅和人都推得摔出门外去，把个针戳进他的肋缝里，自己从他的腿上跳过去跑了。这时候，除了老永盛病得不能动以外，院里人全都走完了，剩下杂毛狼爬起来忍着痛把针拔出，狠狠地叫了一声：“小兰！害不死你我不姓刘！”说了就随后追出去。这时候，天已黑了，虽然有点月光，在动乱中间也看不清谁是谁，只见人们都往南边岸上去，杂毛狼也就跟了去。这时候，小兰娘已经不出声，小胖媳妇、铁拴媳妇、金虎娘都抱着她、捂着她的嘴乱喊，别的人也围着乱喊。杂毛狼趁着月光在人丛中找来找去，只是找不着小兰，他以为小兰一定是因为螫了他一针，不敢再见他，躲开了。

原来小兰娘没有真的气死，不过是铁拴他们想出来的营救小兰之计。小兰娘跑到小胖家去找金虎娘，正碰上铁拴和几个党员们刚开罢会还没有回去。他们布置的是：先让小兰娘到岸边去哭，小胖媳妇和金虎娘去劝，叫小兰娘哭大阵就装气死，她们两个就假意抱住救，不要让别的人沾身以防露出假来；又打发小胖悄悄去跟金虎说，一会小兰要是闯不出来的时候，要他装作劝架把杂毛狼挡住让小兰跑，跑出来趁人乱的时候拉住小兰转个弯逃走，又叫小胖先在村里乱喊“救人”，接着跑进田家院叫小兰一声，然后自己跑出去。他们没有想到小兰会螫杂毛狼一针，很耽心配合不好救不出小兰，后来小兰螫了杂毛狼又把他推倒地上，时间就比他们想到的从容得多了，所以当小兰一出屋门，金虎还没等杂毛狼爬起来就拉着小兰出了大门从另一条路跑了。

后来杂毛狼打定主意要对小兰报一针之仇，可是一天一天等下去，再也没有见小兰回来。

自从当场盘去小兰家的谷子，铁拴和几个党员们商量出个办法来是：好粮食尽可能不要上场，就在地里想法弄个地方分散保存起来，把草秸熏了肥料，只把秸多穗少的担回场里来应付应付，他们要盘就让他们盘去，拿地里存下来的对付着过日子。不过这时候党已经停止了活动，不敢号召大家做，只好借亲戚的串连，无形中传播这个办法；好在大家前二年都有过两次空室清野的经验，各家各户准备的小窑洞也不少，有些人没有等得有人去串连他们，也已经想到这样做了，所以这年的粮食上场的只是半数上下。后来连刘承业他们也觉着有人把粮倒走了，只是大家眼多，他们的眼少，等他们知道了已经做完了。这一年，大家就凭野地里存的这点粮食过了一冬一春。

五

1941年春天，灵泉沟人好象发起了个刨狍犴运动。“狍犴”应该说也是一种老鼠，和松鼠的个子差不多，没有松鼠的尾巴大，颜色也和松鼠不同——松鼠是深灰色，狍犴是黄色，还有几条黑花，看起来很好玩，可惜糟害庄稼。它会存粮过冬，刨着一个狍犴窝，有时候可以得到一二斗粮食。因为上年秋天只有七成秋景，收几颗粮食又差不多叫刘家借着代购军粮和收租子，当场就收拾光了，所以大家都缺粮——有的还在外边的一些窑窑洞里藏一点，有的就连那一点也没有。真没有粮的想到了刨狍犴，就是在外边存一点的，为了关照一下免得让人家当狍犴窝刨了，为了往家里取粮食时候有个公开的名义，也断不了去刨狍犴：无形中造成了个刨狍犴运动。

有一天，一个旅部军需到灵泉沟村公所来坐催代购粮。这

个军需的来头有点厉害——他用两个卫兵先把村长刘承业监视起来，并且和刘承业说：“说什么也是白费！不见粮食不能算到底！”刘承业的仓库里自然有粮，只是一来不想拿自己的，二来要拿也不想叫部队摸着他的底——要漏了底，他们吃完了就还会来要。整整一天一夜，刘承业想不出应付的办法来。到了第二天，他的孩子接旺在他和军需两个人的面前说：“我看老百姓还不是真没有粮，只怨咱们情面还是有点软。”刘承业说：“有也是很有限的！全村产多少粮，去年秋天咱们……咱们……也知道他们收的不多！”本来他要说“咱们收了多少”，说到口边，见军需在场，就转了个弯，扯了那么个不太对头的尾巴。接旺说：“要没有，他们一冬一春吃的是什么？”“不是早就在野地刨犴狴窝吗？”“哄鬼可以！哪有那么多的犴狴窝？有好多户都把粮食存在野地就没有上场，吃的时候才一斗二斗往家取，碰上人哩就说他们是从犴狴窝里刨的。叫我说咱们明天也打发村警和国民兵团都去刨大犴狴窝，碰巧的话，一两天也许就把这次的代购粮刨够了！”没有等刘承业说话，军需官就竖起大拇指来夸奖他说：“好！你是个会办事的！青年有为！”

军需官一夸奖，接旺高兴得不知道他自己姓什么了。他马上召集村警和国民兵团两股人马，说明任务。杂毛狼说：“这事你交给我好了！我杂毛狼是吃野食长大的，找个门道还不外行！我看什么地方有，八九成落不了空！”他们这样一商量，马上决定出发，就分头向老百姓去借镢头。有人问他们借镢头做什么，他们都说：“我们也去刨犴狴窝！”有杂毛狼那个老行家指挥，很容易发现人们存粮的地方，一天工夫就刨了二十多口袋，拨着民夫送往三水镇，总算把个军需官打发得喜喜欢

欢地去了。灵泉沟的人们等那一伙狼从野外回来之后，除了支差的以外，家家户户都到野外去检点自己的损失。

这次小小事变过后，灵泉沟的变化可不小：断粮户有好多到山上去剥树皮、剜草根充饥，有十来户担起筐子出外逃荒；军需官回到镇上向三青团的县团部保举接旺升为县团干事。杂毛狼在指挥刨粮食时候留着几处，到了晚上给自己刨。

金虎家的院里三家都没有受损失：小兰娘根本没有什么粮食了，铁拴家的粮食藏在自己房子里一个地窖里，金虎家的粮食藏在老羊坎附近，因为路远，杂毛狼他们没有到过。张得福家的粮被刨光了，铁拴和小胖家匀给他们母女们一点暂且支持着过活。不过他们几户也和其他贫农户一样，都是老鼠尾巴，没有多大油水，自然还都不免要采些树皮草根搅和着吃。

有一个晚上，金虎拿了点玉菱从地里回来，走到洞口那一段乱石头河沟里，忽然从他眼前的石头上站起个人来。这地方离新洞口只有十来步远，他以为是铁拴，正张口去叫，忽见那人把手电筒捏得亮了一下，吓得他赶紧一蹲。他知道铁拴没有电筒，一定是村公所或者部队上的人，仔细对着月光看去，看见杂毛狼一个侧面。这一下他可吃惊不小。他以为杂毛狼一定已经发现了新洞里的秘密——因为新洞里不止存着党的文件，小兰也躲在里边过了半年了——这秘密除了他们两家以外，还只有铁拴知道。杂毛狼又向新洞的方向前进了两步，打着电筒看了一阵，就放下电筒弯下腰去把一颗百来斤重的石头推得转了个身，露出个大一点的石头窟窿来。几颗大石头碰在一处，往往不能靠得太紧，中间的空隙往往是可以钻进去的。杂毛狼把那颗推得动的石头推过去之后，又拿起手电筒，爬下去把头伸到那个空隙里去看，金虎更料定他是找新洞口，就再也不敢错过机

会，丢下手里的粮食口袋，几个箭步赶过去，两只手抓住他的两条小腿，把他倒提起来象捣蒜一样往那个石头窟窿里插下去提起来，插下去提起来，没有等他来得及喊叫就咚咚地捣了三下把他撞死。人死了手电筒掉在里边没有顾上关，从空隙里照出了一条白光。金虎先把死了的杂毛狼提出来放在一边，伸手把手电筒拿起来关了，然后又把杂毛狼的尸体填进去，仍把那颗石头转动了一下盖上口，然后拾起了手电又返回走几步拿了自己的小粮食口袋，到新洞里去找小兰。

小兰自从上年秋天跑出来之后就藏在这新洞里。按铁拴、小胖他们原来的计划，不过是想设法把杂毛狼推走然后就让小兰回去的，可是没有想到小兰会螫杂毛狼那一针。当金虎把小兰引到庄外的枣树林里，小兰才跟他说明再不可回去的理由。金虎听她那么一说，也觉得她不可回去，才临时决定把她藏到新洞里。金虎把小兰送进洞去之后，跑回去和铁拴说明了情况，又和小兰娘商量了一下，就让金虎给小兰在洞里修下炉灶、送进去日用东西，把小兰安插在洞里住。他们三家原来已经有了互助关系，小兰入洞之后，三家有什么针线活，就让金虎在给小兰送东西时候带到洞里叫小兰做。在这洞里安个家真不容易——除了不用到外边取水以外，连修灶火用的土也是金虎从外边运来的。最费的是灯油和柴：不论白天黑夜，见做活就得点灯，一月就得五六斤大麻油，把三家种的大麻差不多让一个人用完了。因为洞口小，带梢的柴拿不进去，只好到老羊坎附近的林里拾干柴棒子往里送；柴又比不得灯油送起来那么方便，就是一天只烧三五斤，平均三五天就得送一次，想要有点积存，就更得勤往里送。这地方又不是大明白日可以来的，只能在一早一晚趁着月光悄悄地往来。金虎这半年来为了照顾小兰，常常

是前半月的前半夜不得休息、后半月的后半夜不得休息。

小兰的家安在那个风很大的套间里。那里的风原是从另一个窟窿里吹进来的，后来金虎割来一担白草（类似茅草）把那个窟窿一塞，风就没有了。往日金虎在初进了洞口附近的墙上存着一些点火用的松柴，他自己身上也常带着洋火，一进了口就点着松柴往套间里走，这一天他得了杂毛狼的电筒，就没有用松柴火，捏着了电筒就望着套间门走去。他一到套间门口，就熄了电筒摸进去，转过了个弯，见没有灯光，知道小兰已经睡了。按往日的规矩，金虎每逢小兰睡了的时候，常是在快到看得见灯光的地方叫几声，等小兰应了声起来之后才进去，不料这次正碰上小兰因为赶做了点活，疲劳太过，一睡下去就睡得太熟，连叫了好几声也不见答应，金虎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就捏着了电筒走进套间去看动静。他用电光向套间里扫了一圈，刚扫到小兰脸上就把小兰惊醒。小兰一睁眼看见电光，顾不上细看就爬起来抓住个明闪闪的家伙向金虎戳过来。金虎赶紧熄了电筒躲在一边说：“慢慢慢！是我是我！”“金虎哥？”

“对！”金虎又捏着了电筒，小兰才回到铺上，丢下手里的家伙去穿衣服。这件家伙是个矛子枪头只安了三尺来长一段木把子，也是金虎当民兵时候用的。她进洞以后，要金虎给她找一个什么随身武器以防万一发生什么事故，金虎就把这东西给她找来——因为长把子拿不进洞里来，才把把子截短了。

金虎就在小兰拿着短矛子枪向他戳过来的时候，注意到小兰生得美。小兰有几个特“长”：个子长、辫子长、眉梢长、胳膊长、腿长，在灵泉沟数算起来，还没有比她再美的姑娘，要不杂毛狼也不会那样积极地在她身上打坏主意，不过金虎和她是一个院里的邻居，从小在一块长大，习惯了也不觉着有什

么特别之处，这一次在那特别明亮的电光一闪中，见她只穿得个衬衣衬裤，露着两半截赤膊，直竖着两条长眉，拿着枪头向他刺过来，觉得活象当地一出戏中的一位打虎女英雄，真是世界少有的美人，可惜这个影子只闪了一闪就过去了，又无法让她再演一遍，金虎好象也觉得有点可惜。

小兰一边穿着衣服一边说：“金虎哥！替我把灯点着！”金虎到灶前从柴灰里刨出个埋在里边的红木炭来，用两根小柴棒夹着，对在灯头上吹火。这样吹着火点灯，有点技术，会吹的一下就能吹着，不会吹的有时候永远吹不着。金虎吹了几下，因为技术低，没有吹着，就干脆扔了木炭掏出自己的洋火盒子来擦了根洋火点上。小兰说：“你快给我留下些洋火吧！我的洋火只剩两根了。”金虎把自己的洋火盒子给她丢下说：“我这盒里也不多了，家里也只剩两盒了。去年冬天可该多买些，今年连镇上也没有卖的了！以后还是省着点用！”小兰说：“省着省着你不是又浪费了一根吗？”

灯着了，就可以看见套间里的全面情况。这里边没有个指南针，不能说东西南北，只能说前后左右。现在以小兰铺着白草睡觉的那个墙根为主位，左前方离这铺位丈把远的地方是小兰做饭的灶火，灶火旁边有连在墙上离地二尺来高的一块平面石头，是小兰做针线活的桌案；过了灶火再往前一点就是套间的进口；过了进口，再往前的地势就高起来，就地放着些水桶、水盆、锅、匙、碗、碟……最前方靠墙的地方是一大堆积存起来的干柴棒。再从铺位的右方看起洞壁是圆圆地抱向前去，前方和进口打对过，就是那个有大风的窟窿，这时虽说用白草塞住了，可是还有点微风——这点风还是洞里需要的，以前塞得太紧了就有点闷人，后来才松开了一点；过了窟窿再往前，洞壁

凹进去一个大凹，两边石缝里钉了椽子，拉着一根绳子，上边搭的是小兰一些衣服；凹里边放了些带皮的大麻和干菜；再往前地势也高起来，洞壁也圆圆地抱回来和左边放柴那地方接上了。往上边看，中间的洞顶最高，盖一座两层楼房也碰不了顶，周围都是逐渐低下来，圆圆地抱到下边的地上。在烧火时候出烟很利落，预料上边有裂缝可以通到外边，不过始终也没有在外边看见有烟出去。

金虎早把那一小口袋玉茭放在进口的墙根，点着了灶前的灯，手拿着电筒，坐在小兰烧火时坐的草垫上。小兰穿好衣服走过来，从他手里把那个手电筒接过去看着说：“你不是说过银虎的手电筒就没有拿回来吗？这会怎么又找着了？”金虎说：

“这可不是银虎那一个！”“是谁的？”“杂毛狼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你怎么借他的东西？”“哪里是借的？杂毛狼已经回了老家了！”“几时死的？”“刚才！”“在哪里？”“离这洞口不几步远！他来找这个洞口，我……我把他干了！”金虎本是个善良的小伙子，虽说弄死的是杂毛狼，究竟是打死了人，说起来有点紧张。接着金虎就把来送粮食遇上杂毛狼的事向小兰说了一遍。小兰听他说把杂毛狼的尸首填在洞口附近一个石头窟窿里，就跟他说：“我的傻大哥！杂毛狼丢了，村公所不会不找。这以后天热了，过几天发了臭，人家到这洞口边来找出尸首，这洞也就保不住了。”金虎想了一想觉着小兰的话有道理，就想了个办法说：“让我再把他背出去扔到沟前边那个大水池子里好了！”

小兰同意了金虎的主张，金虎便把电筒交给小兰收存、使用，自己点了根松柴走到洞口，摸出洞来，摸到杂毛狼死的地方，搬开石头，把杂毛狼的尸首拉出来。他见杂毛狼腰里围着

一条口袋，才知道杂毛狼还是为了刨粮食才到这里来的。原来是金虎上一次给小兰送粮，走到这里，口袋漏了，漏在那石头丛里一些玉菱，被杂毛狼在这一天白天发现了，以为下边有藏的粮食，所以夜里才到这里来。金虎就用他的口袋兜住他的腰，背到前边大水池的岸上，连口袋往下一扔，心里暗暗说：“你到龙王宫里刨粮食去吧！”平常往水里扔个东西，不过是“扑通”一声响，可是这一次的响声特别，“轰”地一声震得地有点动，吓得金虎愣了一下，拔脚就跑，跑了不几步，又听得西南边“通”“轰”先轻后重响了两响，才想到是大炮的声音，预料是日军又来扫荡来了。

六

金虎听见炮声，知道是日军出发了。自从国民党军队来到三水镇一带以后，日军还没有来过。他们的县政府和村公所，除了要东西要人以外，也从来没有说过日军来了老百姓该怎么办。金虎摸不着底，急于想回去看看铁拴他们准备怎样对付，就加快了脚步赶紧往回走。他走到庄外的枣树林边，早听得树林里有人低声谈论，知道庄上人也已经被炮声惊起来了，就不露声色地慢慢凑到离人近的地方。这时候的炮声仍然不紧不慢地继续响着，枣树林里的人也越来越多，金虎起先也和别人说了几句估计情况的话，见人们都没有注意到他是刚从洞上回来的，就搭讪着溜到一边慢慢回了家。等金虎到家的时候，他们院里三家人都起来了，小兰娘和金虎娘都在铁拴家里商量对付敌人扫荡的办法，金虎也凑到北房去。小兰娘一见金虎，先问小兰的情况，金虎告她说没有问题，不过没有把弄死杂毛狼

的事说出来。

大家向铁拴问主意，铁拴说：“现在的情况还弄不清楚，不比咱们的军队在这里的时候——那时候早一点可以得到消息，现在炮响了还不知道敌人要从哪路来。我想等一会总会知道一点眉目。不论三水镇往南一带的军队怎样顽固，敌人打到他们头上，他们总不会连动也不动一下。如果敌人只是南边的一路，那不过是小出发，打一阵炮，到山边抢点东西就走了；要是分几路来围攻，那就有进山来的可能；万一要来的话，咱们还是过去的老办法，把妇女小孩隐蔽到洞里，男人们分散到山上隐蔽，只可惜他们把民兵的武器都搜走了，连个防身的家具也没有，群众也没有组织。我想就是敌人要到这里来，军队不转移，村公所那些坏蛋不走开，咱们还不能去组织群众，最好是等炮声再近一点，他们那些坏蛋只顾逃命的时候，咱们再想咱们的办法。”

正说着，小胖从外边跑进来低低地喊：“铁拴哥！快领上大家走！来了！”说着也跑进北房。铁拴说：“这消息靠不住！炮声还这么远，怎么就会来了？”“来了！大家都看见的！刘家坪、白土嘴都有了！很多！快走！”这么一说大家都着了急。金虎和小胖抬着金虎爹，其余的人都只拿了点紧要行李就跑出来。他们刚一出门，见几个穿军服的人拦住去路说：“不要跑！回去给我们收拾房子去！”其中一个人，打着电筒在大门上写部队番号，原来就是在三水镇驻扎的军队。小胖刚才说已经有敌人到了刘家坪和白土嘴，也是这些部队，因为事前没有打过招呼，黑影里只看见好多人，分不清是什么人。

不论多么顽固，既然还是中国的军队，老百姓看他们自然还和看日军不一样，见不是日军，金虎他们就松了一口气，

都返回院里来。小胖和金虎仍然把金虎爹抬着往南房去，那个号房子的兵拦住说：“且不要把病人往这屋子里抬！这个屋子我们要住一个班！”金虎说：“那叫我们住哪里呢？”“你们合并合并！”铁拴说：“那就且抬到北房吧！”那个兵说：“那也不行！北房也要用！”铁拴说：“好老总！我们一院三家人，至少我们也得有两个房子，才好把男人合到一个房子里，女人合到一个房子里……”“这是‘非常时期’，说什么男女？不要啰嗦！连一点‘战时教育’都没受过！”说着已经在南房的墙上用粉笔写完了番号，又转到北房门上去写。小兰娘说：“那就只好抬到我那里了！”金虎和小胖就把金虎爹抬到东房里去。

接着，踢踢踏踏进来了三四十个兵，枪支、行李扔下一院。铁拴、金虎见人来得多了，各自跑回家去照顾自己的东西。那些兵看了墙上写的字，各自找自己要住的地方。他们进了屋，把铁拴他们的东西，不分锅匙碗筷、盆瓮缸坛、衣服被褥、犁耙锄镰……一同扔到一块说：“快拿出去！”铁拴和金虎见这气派，知道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只好都先拣打得破的东西往外搬。

另外有几个兵问那个号房子的兵说：“我们在哪里住？”那个兵说：“等一等！”他马上又跑到东房墙上号了字，就进到东房里说：“你们搬出去吧！这个房也得用！”金虎娘说：“你叫我们住哪里？”“你们住西房！”“哪里有西房？那只是个棚子，外边挡着些高粱秆，还喂着两个小驴，怎么住人哩？”“南间里喂着驴，北间里不能住人？”“北间里草塞得满满地，哪里还有空子？”“快搬！不要说废话！草一会就用完了！”金虎娘听说他们要用草，着急地说：“你可不能用我

们的草！用了草我们的驴还怎么喂？”“废话！哪个当兵的还带着铺草？”他正和金虎娘争吵着，院里的兵已经动手往南北两个房子里搬草，该住东房的兵怕别人把草搬光了自己没有铺的，也各自去抢了一捆，放在院里坐在自己屁股底，还有两个见东房墙上号了字，就跑进东房撵人、扔东西来占自己的铺位。

铁拴见无法商量，就向东房里喊叫说：“都出来吧！咱们还是搬到洞上住去！”

这一阵，小胖已经走了，金虎和金虎娘抬着金虎爹，铁拴把他和金虎家的两个驴牵出来，搭上鞍，把紧用的东西挑出一些来，能使驴驮的使驴驮，不能使驴驮的放在筐子里用人拿，先把两个驴驮打并好，让他媳妇抱一个孩子、拉一个孩子捎带赶一个驴，让小兰娘提着一筐锅匙碗筷捎带赶一个驴；先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然后把还得拿的东西装满了两筐准备挑着走，又把拿不走的盆瓮缸坛往原来放草的棚下边安置。

金虎他们往洞里的路上走的时候，路上断断续续也走着些人，进了旧洞，见旧洞里早已左一堆右一堆烧着火，有好多入正沿着墙根布置自己休息的地方，见金虎爹也被人抬来，近邻们都争着给这位老人让铺位。金虎娘和大家谦让了一会，就靠着小胖他爹的铺位把老头儿放下。金虎到沟外把驴身上驮的东西卸下来，先把驴拴到沟南岸一个草坡上，然后扛了一驮东西和铁拴媳妇、小兰娘相跟着走过那一段乱石沟，进了旧洞，让她们都安插着各自的位置，这才又去搬另一驮行李。

这时候，洞里的议论十分热闹：“你家也住满了？”“要不满我还会来？”“这些兵会不会放枪？”“不知道！一枪也没有听见放！”“会！记不得去年在镇上杀共产党？老正明是

怎么死的？”“没事吃粮，有事占房！反正只有他们能活！”

“占房也该和气一点占呀？那股凶劲我看也和日军差不多！好象咱们成了敌人了！”“八路在的时候是听见炮响往山外开，这些兵是听见炮响往山里开！”“说话小心点！不要‘七路’‘八路’地！”“不怕！现在来的人里边还没有一个狼！”“……”

正议论着，杂毛狼老婆也掖着一卷铺盖、提着个篮子走进来。大家见她来了，就转了话题谈别的事。有个人故意问杂毛狼老婆说：“怎么？军队也住到‘你们’家去了？”杂毛狼老婆说：“什么他妈的军队？跟土匪一样，呼一喝二把人往外撵……”

金虎这时候正把第二驮行李扛回来，听见杂毛狼老婆说这几句话，心里想：“活该！那是你们伺候的好掌柜！”其他人也这么想，不过谁也没有说出来。杂毛狼老婆继续着唠唠叨叨埋怨杂毛狼说：“还有我们那个该死的！村公所也找不着他，也不回来照顾一下自己的家，不知道上哪里死去了！”她这几句话，可投合了大家的心事，都觉着真是“该死的”。金虎想：“他‘上哪里死去了’，只有我和小兰知道。”

金虎他们把住的地方都安顿好了，只是还不见铁拴来。铁拴媳妇很着急，生怕再出什么事故。金虎说：“让我回去看一下。”说了就往回走。金虎以为在路上会碰上铁拴，可是没有碰上，一直到家，见院里住着的那些兵，留住铁拴叫给他们打扫屋子、烧开水。那些兵见金虎回去，就也把金虎留下和铁拴一块儿做活。金虎觉着该倒霉，不过也还有点好处，能把在洞里安顿三家人的情况趁空子告诉给铁拴知道。

金虎才进去一小会，一个村警领着一个兵来了。那个村警说：“可算找着两个人！”那个兵向金虎和铁拴说：“走走走！旅部要你们去担土修灶火！”院里的一个兵说：“我们这里还

有活做！”旅部那个兵说：“你们自己干什么？一共两个民伕，先尽你们要呀，还是先尽旅部要？”又向铁拴和金虎说：

“走走走！”铁拴和金虎也只得跟他走，院里那个兵也没有再说什么。铁拴和金虎跟着村警和旅部那个兵往刘家坪住的旅部去，差不多忙到天明才把旅部交代的活儿做完。村公所怕再有人要民伕，还不让他们两个人走，金虎说：“实在饿得不行了！等我们到洞里去弄点什么东西吃了再来好不好？”一个村警考虑了一下说：“可以！要你你再来好了。”

铁拴和金虎为了避免麻烦，也不敢再回田家湾取筐子里的东西，一直跑到洞里来，天就快明了。铁拴把驴驮里装的山药蛋拿出几个来在柴火里烤着还没有烤熟，金虎忽然想起个事来，马上望着他娘的耳朵说：“咱的洋火带来了没有？小兰没有火了！”“带来了！”“快给我！一会天明了，这里这么多的人，就不便再去开那个洞口了！”金虎娘找着了两盒洋火，握在手里悄悄塞到金虎手里，金虎便溜出旧洞往新洞里去。

金虎进到新洞的套间里，正碰上小兰烧火做饭。小兰吃饭，不按外边的规矩做。住在这洞里，分不出什么白天黑夜，常是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小兰常以金虎来一次算一天，所以有时候一天只吃几顿饭，有时候一天要吃几十顿饭。金虎见了小兰，先把一夜间发生的变化告诉小兰说了一遍。小兰说：“这么说来，你一定是饿了吧？”“直折腾了一夜怎么能不饿？刚把几个山药蛋烧在火里，就想到要给你来送火！”“其实也不是那么用得急！你不是还留下几根吗？要是每次都把木炭埋好，也费不了几根火！你先把我的饭吃了吧！我一会再做！”

“我怕一会天明了不便出去！”“不怕！只要有一点空子能爬上去就行！家里人都住在旧洞里，就不会有人乱猜你来得奇

怪！你冒充个拾柴的，拾一些柴拿着回去不就对了么？”金虎见她说得有理，就老老实实坐下来吃饭。

小兰自从送走了金虎，还不到一夜工夫，为什么就起来做饭来呢？原来小兰早已爱上了金虎，每次把金虎送走之后，总要有很久很久安不下心来，有时候吃过五六顿饭也睡不着，这一次更因为杂毛狼已死，就又考虑到自己是否可以出洞的问题，所以自金虎走后根本就没有睡，后来干脆也不睡了，又点着灯做了一阵活，就又来做饭。

金虎胡乱吃了点饭，就匆匆忙忙往外走，走到洞口听得人声嘈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往外一伸头，见天已大明，对过岸上的人三三五五走动，要一出去彼此都能明明白白互相看见，只得又缩回头去等，可是等了好久人声也没有停下来，太阳已经照到野葡萄藤上了。

原来因为金虎在离开刘家坪的时候向一个村警说要回洞里吃饭，就惹下了一场麻烦：那个村警向刘承业和刘石甫献计叫把村公所搬到洞里。他们都很赞成，就打发村警先到洞里把老百姓撵出去然后搬家。村警到了洞上去撵人，可是撵不动，大家都说到这些时候谁先占住谁就住，村公所来了也还放得下，有他们住的就有群众住的。村警回去报告了这种情况，刘石甫和刘承业因为找不着杂毛狼，就骂了这个村警一顿不会办事，然后带着几个村警自己出马往洞里来。刘石甫又用他自己的省城“官”话向群众说“战争时期要守秩序”，说大家搬出去了洞里就“秩序”了……可是他说了一阵，除了有些人笑他的“官”话以外，还是没有人肯搬。

就在这时候，另一批有势力的人来了——他们的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县团部、公安局连他们的妻小家属浩浩

荡荡将近一千人——因为有接应在内，连领路的也不用找，到村里也没有停，一直往旧洞里来。这些人来了自然不用和群众商量，只用武装警察进去一赶，就连刘石甫和刘承业都赶出来了。刘承业暗暗嘱咐接旺到上边求个情把村公所也留在里边，可是这洞里住一千人本来就有点窄小，再加上那些头头们又都要占个加倍宽绰的地方，所以不止村公所住不进去，连公安局还有一部分人也得住在洞前边一段悬崖下边。

群众被赶出来之后，有的散到地里那些存过粮食的小窑洞里，有的上了大山，有的坐在乱石堆里想主意，有的被人家新占了洞的人又抓了差。被抓去担水的人，发现大池里漂着杂毛狼的尸首，打捞上来认出是杂毛狼，杂毛狼老婆就去哭丧。他们的县政府在这逃命的时候，也顾不上检验尸首，胡乱看了一下说是“失足坠崖撞死落水”就催着民夫们埋了。粮食受了损失的人们都想着：“他要早死几天的话，粮食还损失不了！”这时候南边的炮声又响起来，他们的公安局赶紧撵散了沟里的群众，把沟前、沟后、岸上都布了岗哨。

有十来户人家上了大山，铁拴他们三户也在内。金虎娘悄悄告铁拴和小兰娘说金虎到新洞里给小兰送火没有出来，他们都很着急。

七

金虎在洞口听得人声嘈杂，正是那些警察把群众赶出洞来的时候，还没有等到警察赶散了群众布上岗，太阳就出来了，金虎见出不了洞，就又回到套间去和小兰说明情况。小兰说：“既然出不去了，就等天黑了再说吧！”金虎说：“可是一夜

没有睡觉，瞌睡得要死！”“瞌睡了那不是铺？”“我怎么好
在你的铺上睡觉呢？”“我的傻大哥！再不要分那么清楚了！
你就再分得清楚一点，将来也和别人解释不清楚！咱们两个人的
关系已经算现成了！我看这样就很好！你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这些话在小兰已经想过几百遍了，也有好几次想说没有说出来，
这一次很没有费气力就说出来了。在金虎这方面说来，这还是个
新问题。金虎也很爱小兰，只是自己背着个“傻”牌子，没有想
到小兰会看得起他，现在听了小兰的话，自然是十二分赞成，不
过马上想不起来该说什么好，愣了一阵之后，就笑了笑说：“那
我可就睡去了！”说了就站起来往铺上去。小兰叫住他说：“你
不要马马虎糊地，究竟你赞成不赞成？”金虎回头来低低地望着
小兰的耳朵说：“只要你不嫌我傻，我还会有什么说的？”小兰
听了这句话，觉着算是了结了一宗很不易了结的心事。

因为金虎和小兰两个人都熬了眼，就把吃这一顿饭的工夫算
作了一天，两个人一齐睡去，等到洞外太阳入山的时候，金虎先
醒来推醒了小兰说：“你去做饭，我到口上看看动静，吃了饭一
等天黑了我就出去！”小兰起来去做饭，金虎起来到洞口去探
动静。

金虎来到洞口，见野葡萄藤上已经没了太阳，知道天气离黑
不久了；又听了听洞外十分安静，手扳住石头把头伸出去隐在
葡萄藤里张望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一个人，正想出去看一眼，忽
听得对过岸上有人咳嗽，抬头一看，见一个穿着黑制服带着枪
的人站着岗，吓得他赶紧缩回来。他想：“这一定是他们的公安
局来调查杂毛狼死了的事，要不警察怎么会到这里来站岗？”
他把这事又告诉了小兰和小兰商量对付的办法。小兰

说：“依我看还是不出去好！他们要调查，也只不过调查一下就走了，总不会在这里常住。咱们这里有吃的有烧的，就跟他们熬上半月也熬得起。难道他们能在这里住半月吗？再说还是日军扫荡时候，他们不会为一个杂毛狼一直熬在这里。”金虎说：“走着看吧！反正现在不能出去，也只好看机会再说！”

他们两个又吃过一顿饭，天就黑了。金虎又赶着月光去看了一下那个岗，见还没有撤了，也只好打住下的主意。小兰告他说到洞里就要按洞里的规矩过日子，说：“不管洞外现在是黑夜还是白天，按洞里的规矩，睡起觉来吃的第一顿饭，只能算早饭，吃了就该干活。”金虎要小兰给他找点活干，小兰叫他去磨面。洞里有个小手摇磨，原是铁拴家的一个磨煎饼汁用的磨，早已让金虎给小兰搬到洞里来用。这个小磨，摇起来倒很轻，可惜磨得太慢，一整天也难磨够十斤粮食。金虎摇得很着急，可是没有用，再有气力也用不上，摇得太快了就会把磨顶上的粮食轮得飞到地上去。小兰给铁拴纳了一段鞋底，又做成了一顿饭，金虎也不过磨了三斤玉茭。小兰说：“傻大哥！又到吃饭的时候了！”

吃了饭就算下午，金虎又问小兰该做什么，小兰说：“你休息一下吧！这里没有你的什么要紧活了！”金虎开头依着小兰的话休息了一阵，不过劳动的人，坐过一会来就觉着没意思了。他忽然想起个事来问小兰要手电筒。小兰问他做什么，他说：“墙上那个窟窿究竟有多么深咱们不知道，也不知道里边有什么东西好象磨面一样呼碌呼碌响，从前因为风大点不着灯没有法子看，现在有了手电筒可以看一看了！”小兰说：“那个我也来看看！咱们一同看去！”小兰跑到铺上又取出那个半截矛头枪来。金虎问她取那个干甚，她说恐怕碰上什么厉害东

西。金虎说：“要有什么厉害东西，不早把白草顶开进这里来了？”虽是这么说，小兰还是取了矛子枪来，又把电筒给了金虎。

揭开了白草，自然还是那么大的风，先把灶前的灯吹灭了。金虎开了电筒在前，小兰拿着矛子枪在后，两个人好象个小小的探险队。在塞白草的地方以外可以站着走，取了白草再往里就只能爬着走，爬了大约有十来步，里边就又可以站起来了。这时候听见的声音已经不象是磨面，简直是吼雷。金虎用电筒向左方的侧面一晃，怪叫了一声说：“大蛇！”小兰挤在后边没有看见，只把矛子枪塞在金虎的左手边说：“快快！给你枪！”等金虎接了矛枪，她便把头从金虎的腋下伸出去说：“哪里有什么大蛇？”金虎又一晃电筒，小兰见白亮白亮一段东西蠕蠕地从上往下走动，比自己做饭这小炉子还粗。灵泉沟这地方没有蛇，小兰没有见过，金虎在别处见过，可是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猛一看愣住了。小兰远远看见那东西也没有个头尾，只有那么丈把长一段，一直走动也没有个完，就问金虎说：“怎么也没个头？”金虎把电光向右方移动了一下，见那东西钻下地去，对过又成了石头墙壁；又更往右移了一下电光，见黑古隆洞连墙壁也没有了；又往上晃了一下，对过的墙壁是直立着的，好象很高；返回去又晃到左方那一段东西上去，见还是那么粗，还是那样走动。小兰说：“一个蛇有多么长？怎么再也走不完了？”金虎说：“再等一等看！”又等了很大一阵，那东西仍然是那么走着，一点也没有变化。小兰说：“就是有几里长也该跑完了。一个蛇有几里长吗？”金虎说：“不是蛇！不会有那么长的蛇！”“那么是什么？”“不知道！让我走近点看一看！”“你可小心着！”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没

有见过蛇，一个有点傻胆气，要是别人的话早缩回去了；要真是蛇的话，也早把他们伤了。金虎走到近前蹲下去一看，回头叫小兰说：“不是蛇！是水！”虽然只隔两三步远，因为水的吼声太大，小兰听不见金虎说什么，就走了几步凑到金虎跟前，等金虎又说了一遍，她才听见，和金虎一同蹲下去看。只见那水从一道斜坡形的夹道里流下来，表面上纵起些条纹，好象是鳞片；中间不是平面，好象有一道脊梁，也不往开散；顺着往下看去，坡更陡，更下边好象成了直的钻下底去；吼声就是从那下边发出来的。金虎见那水流得很紧，把电筒交给左手、矛子枪换到右手里来，用矛子枪往水里一探，还没有等他插下去，就好象有人把矛头拉住一样，猛一拉差一点把他拉进水里去；他一松手矛子枪就飞也似地下坡去了。小兰拉了他一把，两人都往后退了一步。金虎说：“这水好大劲儿！”金虎又用电筒扫到顶上，见离顶还有两三丈高。宽可只有丈把宽，是个扁长形的缝儿，左方高上去，右方低下来，再往右好象是人了地。地上的水还不够三尺宽，深浅还不知道。金虎又用一只脚跨过水去，两只脚蹬着两边的石头向小兰说：“咱们这样往上坡走一走看上边是什么样子吧？”小兰没有听清楚他的意思，只是以为在这里冒险没有什么意思，就喊他说：“咱们回去吧！这里太凉了！”金虎听她喊凉，也觉得有点凉，就和她一同又回到套间里来，仍用白草堵了窟窿。

在他们两个过的是下午，洞外边可还是后半夜。金虎又到洞口去看了一次，正是天黑得举手看不见拳头的时候，到那乱石堆里无法走动。金虎再想不出办法，这才又回套间去给小兰磨面。就这样过了三天，见洞口对过那个岗还没有撤，金虎真有点等急了。有一天，洞外的天刚有点亮，金虎把头伸在野葡萄

藤里眼不转睛地看着那个站岗的警察。这时候，旧洞那边喊那个站岗的警察说：“喂！局长叫你到旅部去一趟哩！”“谁来换岗？”“不用换了！有两个岗就是了吧，要那么多的岗干什么？”听口气也可能是个什么小头头儿。那个警察听了他的话，撤走了。金虎等他走远了，以为机会来了，就拉开野葡萄藤爬上来。他刚一露面，沟后边有人喊：“站住！”他扭头一看，见离他四五十步远的乱石堆里还站着一个警察，已经把步枪端起来瞄他，吓得他一把拨开葡萄藤又跳进洞去。那个警察开了枪，不过没有打着金虎，子弹打在石崖上。

可是这一枪非同小可，连旧洞里的县长、县党部书记、公安局长……各个头头儿和他们的全部人马一齐惊出来了。那个开枪的警察指着新洞口那方向说明了那里有人，然后同其他几个警察跑到跟前，发现了新洞口。一个警察对着洞口喊：“快上来！要不我就开枪了！”没有人应声。他朝着洞口往下打了一发子弹，也没有什么动静。另一个人回旧洞里拿了个电筒向洞口里边看了一下，发现底下有水，旁边的崖石有凹进去的地方，就向局长报告了情况，他们这位局长没有敢近前去看，只把自己的盒子枪交给一个警察带着下去。那个警察下去先朝着崖石凹进去的地方用电筒一晃，一道银光直挺挺晃进洞里去，吓得他向着电光所到之处先打了一发子弹，洪大的回声似乎比日军的炮声还响亮得多，站在洞口的几个人都吓得退了两步。那个警察见是这样大一个洞，估不透里边埋伏着多少人马，赶紧跳上来向局长报告。局长命令全部警察一同下去搜索前进。这些人下去，一个个平端着上好刺刀的枪把身子缩得象老鼠一样，用十几个电筒四方八面晃着，沿着墙根慢慢一步一步探着往前走，好象都怕地下有陷阱把自己陷下去。往左方去的，走到水

池边，发现墙上象猴子一样的石头，就有个人大喊：“找着了！找着了！”向右去的那些人听说找着了，就往这边凑，有个人一不小心，踏进一个石窝窝里——这是小兰用的厕所——踩了一小腿粪。左边那个人向那颗石头喊：“快下来！要不就开枪了！”石头自然没有动，一个手快的又开了一枪，只震起些灰尘来，好象起了雾，电光有点不亮了。当大家判明是石头以后，才又向别处搜索，搜到了套间口，又碰上了难题——谁也不敢进去。这以后，自然又是打枪、请命令那一套，不必细说。他们从早晨磨到了晌午，才有第一个人被命令所迫，顶着凉风钻进套间那个窟窿里。这个人一进去也把水看成大蛇。他连身也没有转过来，就尖声怪叫着倒爬出来。局长听了他的报告，就命令连续打枪，大家也就轮流着象打靶似的一股劲打，一直打了有半个钟头，把他们的子弹差不多打完了，局长才叫停止。局长说：“就有一千条蛇也该都被打跑了！大家进去吧！”有几个一个接连一个往里爬，爬在前边的一个用电筒一瞧，正要喊叫，可是又看见有点不象蛇，又停了一下就判明是水。他装出英勇的口气说：“都是他妈的怕死鬼！哪里有什么蛇？不过是一股水就吓得大家打了半天！”他说着先爬进去，后边的人好象也都变成英勇的人物跟了进去。前边的人向左方移动了几步，后边两个也都走到站得起人来的地方，因为地方不宽，再后边的就只好仍然爬在窟窿的低处。前边那个人好象还要卖弄他的镇静，就蹲身下去说：“看这水多么清？”他左手打着电筒，右手拿枪托去水里一搅，被水猛一冲，没有等他撒手，就连他也拖进水去，只见电光一闪，明晃晃拉成一条，象空中的闪电一样，一晃就入了地了。这一下，吓得另外两个人要往后退，窟窿里的人还想往前钻，两边的当头一个的头

碰了头，电筒碰了对方的枪。里边的人喊“快走”，外边的人就倒退，挤了个乱七八糟。退出去之后，里边的两个对局长报告了里边的情况，并说明前边那个人被水冲走得如何快，如何来不及拯救，局长也只好作罢。局长说：“看来里边原来住的那个人，一定也是咱们追得紧了，躲到里边被水冲走了！”

这时候是敌人出发的第四天，炮声早两天就不响了，可是谁也弄不明前方的情况，县政府备文去问了旅部，旅部的复文说：“正在侦察中”。旧洞里这些人们，几天都嫌住得太挤，发现了新洞之后，一听说里边宽敞，又有水，大家抢着往新洞里搬，并且叫村公所给他们到野地里找民夫砍树、劈柴、割白草……在新洞里安家。

八

现在应该谈谈金虎和小兰的下落：

金虎见沟后边那个站岗的警察发现了自己并且打了一枪之后，跑回洞里和小兰说：“坏了！叫他们看着了！马上就会有人来搜咱们！”“啊？那怎么办？”小兰正洗着锅碗（他们刚吃过在洞里说来是晚饭的一顿饭），一听这消息，马上停住了手。金虎说：“咱还是先躲一躲看看情况！”“躲到哪里去？”这时候，洞口打了一声枪。金虎说：“快拿出铁拴哥他们那一卷文件来！”小兰从木箱里抓出一卷东西来递给金虎说：“快烧了吧！”金虎说：“恐怕烧不完他们就会进来！咱们把它丢在窟窿里的水里边就冲走了！我们也且躲进窟窿里去，他们要不大搜，咱们就再出来；要大搜，咱们就骑着那股水往窟窿后边钻！”“钻进去他们要是不走我们怎么办？”“反正现在

只有那一个躲处！咱们进去再商量吧！里边冷！你把你的衣服都拿上！可惜把咱的矛头枪丢了！拿上咱们的劈柴斧！追得咱们紧了干他一个算一个！”这时候，外边又响了第二次枪。这一声比前一声响亮得多，因为是朝着洞里打的。小兰说：“他们进来了！咱们快走！”说着先到铺后取过电筒，又到搭衣服的地方把绳子揪下来，把绳上的衣服一捆，背在背上，金虎也从柴堆里取出劈柴斧，把窟窿口上的白草一去了，放出那股阴风，他们便顶着风钻进窟窿里。金虎先把文件往水里一扔（自然是一闪就下去了），然后先骑着水蹬住两边的石头，回头向小兰说：“照我这样跟着来！脚千万不要踏到水里！”小兰一只脚刚过水去，外边就开第三枪打那个石猴子。小兰说：“快走吧！他们进来了！”金虎说：“不怕！那么大个洞，他们搜查一下也得一阵子！不要慌！一步一步踏稳了走！”他们一步一步慢慢走着，顺着斜坡往上上，转过一个弯去，坡更陡了点，好在这里边冷一点，没有霉苔，虽说坡陡了走着吃力，可不光滑，所以他们走得很有把握。这时候虽然又听到他们进套间时候打的那第四次枪声，不过有那水的吼声，又加上风往外顶，要不注意几乎就听不见了。这一段仍是又窄又高的石头缝，再往上，顶就低得只有一人多高，脚下的地势可又平了好多。他们又转了两个弯，水靠了右边的墙，左边已经露出丈把宽的平底来，金虎先靠了一边，用电筒晃着向小兰说：“靠这边来！”小兰靠过一边来向金虎说：“歇一歇吧！下边的坡太陡，腿没有劲了！”金虎听了她的话，就坐下来。小兰也坐下去。

这地方，风也小了，在窟窿口边听见那水的吼声也听不见了，眼前的水声不过象用水壶在水缸里打水的样子，“卢卢卢

声”地一点也不难听。小兰见水流得不那么紧，用手去试了一下，也不过象在河沟里洗衣服时候那水那么紧，就坐得更放心一点。金虎熄了电筒，小兰说：“我的傻大哥！你不是说到里边来再商量怎么办吗？现在咱们就商量商量吧！”金虎说：“咱们看看情况再……哈哈……你看我只顾走路就忘了正事！咱们尽管往里走，还能知道什么情况呢？不行！我还得返回去看情况！你就在这里等一下！要是没事了我就回来叫你，要是不能回去，我自然就又来了。”小兰说：“你不要愣往回走！要是和他们碰了头怎么办？”金虎说：“我自然不会马上再回到洞里去！不要怕！我和他们碰不了头！他们打了好几次枪还没有进到咱的套间，要是想往这个小胡同里来，恐怕走三步就得打枪！”小兰说：“要往回走咱们还相跟着走不好吗？”“不行！你已经走累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金虎打起电筒正要走，忽然想到自己拿走了电筒小兰没个照明的，便问小兰说：“你把洋火带来没有？”小兰说：“盒里只有三两根火了也忘了带！你不是说过你是到洞里给我送火来了吗？如今人也出不去了，怎么也没有见你送来的火？”金虎摸了摸衣服口袋说：“我真成了傻瓜了，整天整夜只顾想出洞的办法，就忘了把火交给你！”说着取出火来交给了小兰，自己打起电筒返回去了。

金虎转了两个弯，掉转头手托着地退下了陡坡，还不到再转弯处，就听得水的吼声中夹着匀匀整整的枪声一直继续响着。他也不知道人家几时就已经响起，一连又听了三十多声，还不见个完。他想：“这些家伙们好象非搜我们不行了！不过他们进得可真慢！我原来想他们是三步一枪，现在看来可能是一步三枪了！”其实金虎这次估计得还是太快，没有想到人家是

站在窟窿前边打靶。金虎无意听他们尽管打枪，听了一阵就仍然返上陡坡，走到小兰等他的地方，熄了电筒和小兰说明情况，又说明他对情况发展的估计。小兰说：“这样看来，我们再不能出去了！真倒霉！这山顶上边也不会塌个窟窿！”金虎听了小兰末一句话，愣了一愣说：“那可也不一定！咱们现在走的是个上坡。我想一直往上走，总有个到顶的时候！”“走到上边要没有窟窿哩？”“没有窟窿也不过和这里一样吧？反正这里没有窟窿！”

小兰在等金虎的时候，已经把应该加的衣服都加穿到身上，把剩下的仍用绳子捆起来吊在背上，金虎仍拿起他的劈柴斧，就都又往前进发。这一段路和金虎想的相反——越走越平，有时候已经平到看不见水流。他们走着走着，胡同越来越宽，就又走进一个大洞里。这个洞比原来那个新洞还不过大，样子和那个洞大不相同：周围没有圆圆地抱上顶去的墙壁，都是些小山一样的削壁，好多凹进去的地方又黑又宽，各自成洞；靠右方的地势高，地面不平，有好几个洞里往外流水，粗一股细一股地顺着地面上一些不规则的濠沟，汇成了较粗的几股子向右方流着；左边的地方大部分淹在水里，有好几个洞口根本被水淹着底部人不能过去，看来这几个洞才是水的主要出路，金虎他们进来的那条路上，不过才分了这水的一小部分。这个大洞里虽说有这么多的水，因为没有很大的坡，却没有冲激的声音，有点响声，也不过“滴滴铃铃”，听起来一点也不刺耳。

他们两人看了一阵，小兰说：“窟窿倒不少了，可不知道哪一个可以走出去！”金虎说：“咱们拣陡坡上——坡陡了自然上得高！”他们试着进了好几个口，发现有个没有水的洞，

一进口就上坡。金虎说：“就上这个吧！你把你的行李给我！省得再把你背累了！”说着接过小兰背着的几件衣服，又把手里的劈柴斧，象小孩拴着树杈当枪背着一样，也拴在身上背起来，打着电筒上坡。果然象金虎希望的那样，越走坡越陡，不过越走路也越窄，走了不够一百步，路就变成了象井一样那么个直上直下的窟窿。小兰说：“你说坡越陡越好，这坡可够陡了吧？”“够陡了咱们就上！”“我的傻大哥！这还怎么上哩？”“再比这陡也能上！”“自然不会有再比这陡的了！可是怎么上哩？”金虎把电筒交给小兰，然后用手在两边撑着、脚在两边蹬着往上爬了几下向小兰说：“就是这样上法！”小兰正要跟着上，金虎说：“你且不要上！让我先上去探探！”小兰给他打着电筒，他便继续往上爬了，爬了大约有两丈高，就闪过一边说：“上来吧！这里好象又有坡了！”小兰伸手去撑墙，才发现电筒占着手，就向上喊：“电筒怎么拿上去呢？”金虎想了想，就把拴大斧的绳解下来，说：“给你这绳，把电筒拴好，吊在胸前，就拿上来了！”小兰照着他说的办法，就吊着电筒爬上去了。

金虎从小兰手里接过电筒看了看上边的地形，不止成了坡了，而且路也宽大了。金虎说：“这是咱们的楼上！”小兰说：“连出路还没有哩，还要说玩话？”金虎说：“真要没有出路，发愁也没有用！总然出不去，上上楼不是也很好吗？”小兰说：“这电筒好象没有以前亮了！”金虎一听马上把电筒熄了说：“真是的！这可不能开玩笑！要把电用完了，有出路也找不见了！”

这两个人就是这样一会急着找出路，一会又开着玩笑，一会饿了，小兰说：“该早预备些干粮”，一会渴了，金虎说：“该

把下边的大水饱喝一肚”；岔路发现了几十条，走得没了路就返回来，楼儿上了十几层，哪一层走不通就再下来，最后找到一条坡度不大、高低宽窄都很均匀的路，可是走有大约十多里也没有变化，终于把个电筒用得连个红印儿都没有了。小兰请金虎想照明的办法，金虎这人可真想得出来——他扔了空电筒把小兰的剩余衣服，挑出一件最旧的来撕成条条，向小兰要了洋火来燃着布条走。

他们燃了两件衣服，总算把这条路走到头，不过不是走出外边，而是走得没了路——就连个细窟窿也没有了。当他们走到尽头的地方，下了两三步坡，地势也宽了一点，可惜只有那么个半圆形窝窝，虽然觉着有点风，可就是找不出个窟窿来。金虎摸着了个圆石头，擦了一根火一看说：“这象是河滩的石头！”小兰说：“难道上了那么多的楼，又回到河滩去了？”金虎拿着最后剩下的一件半新的衣服说：“把这件也烧了吧！反正出不去也穿不成了！”说着就又撕成条条燃着火研究情况。他见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圆石块夹着些沙土，上小下大，圆圆地堆了半间房大那么一堆，好象半个大坟堆，就说：“这上边一定是河滩！这沙土和石头盖有多么厚不得知道，也许能刨透了！”小兰说：“也许还有窟窿！要不哪来这风吹得连火也不好点！”金虎主张刨刨看，小兰在这时候自然也不会不同意。他们都上到这半个坟堆顶上动手去搬石头。小兰摇起来一颗石头说：“怎么沙还会把石头粘住了？”金虎说：“这还粘得不算紧！我见过些粘得紧的，用锤也打不开！好在还不是那个，要是碰上那个的话，就是再浅也不用打算刨透了！”他们把上边能搬得动的放下来几颗，发现盖在头上的石块中间有个尖东西，金虎摇了一摇，摇折了，对住火头一看，是一段死了

的树根。金虎一见就长了精神说：“刨吧，快透了！”他下去拿上劈柴斧来，用斧刃把那靠着树根的石块又撬落了两块，又露出一段树根来可以用手握住。金虎握住树根又摇了几摇和小兰说：“树根已经活动了！”不过他没有想到一摇动了树根，上边的沙土小石头就会往下落，只听得花拉拉一声，上边塌出个露天窟窿来，一股带着灰尘的风，把小兰手里燃的布条火给震灭了。小兰喊：“傻大哥！透天了！”可是没有听见金虎答话。她伸手摸了摸，见金虎的腿已经埋进沙土和石块里去，上半截虽说没有埋住，可是嘴里也吃满了土，急着唾也唾不出来。“啊呀我的傻大哥！”小兰叫了一声，因为看不见情况，急得抱住金虎上下乱摸。金虎唾了几口，腾出嘴来说：“快刨！”“火哩？”“在口袋里！”金虎的右手压在自己的身子下边，因为转不得身，伸不出来，剩了个左手去摸衣袋，衣袋也被埋住了。小兰摸不着火，只好摸着用手刨沙，金虎也用左手刨着，好在地势的坡度很大，刨了几下就把洋火刨出来。小兰又点着布条让金虎用左手拿住，她就先搬开碍事的石块赶紧刨，总算刨出来了。金虎试着往外拔了几次腿都没有用，直到刨完了，右腿还是动不得。他说：“动不了了，我这条腿坏了！”小兰想了想说：“这样吧，你抓住我的肩膀，我抱住你的腰，先试试站得起来站不起来！”金虎依着她的话试了试，可以站起来。金虎说：“站起来有什么用？上边才有那么个小窟窿，还出不去人，也还不知道会不会再塌，坡又这么陡，怎么能出去呢？你还是先把我放下，咱们商量个办法再说！”小兰把他放下，又上下看了一会情况说：“靠里这一边是连着山的石头顶，坡上这一边还是这碎石头和沙。我看再刨一刨就可以出去。现在我先把这下边的坡弄得好走一点，把你仍架到下边，

等把这窟窿刨得大一点，再把你架出去。”金虎同意了她的做法，嘱咐她小心着刨，然后就让小兰把路弄好，把他架下去。小兰把金虎安放到一个石头滚下去砸不着的地方，然后刨出劈柴斧来，撬那小窟窿边的活石块，撬了几块，伸出头来一看，好象还在一个井底，不过这个井怪得很：最下层也有半亩地大，越往上越大，大约有两丈来深，底上积了好多干树叶，好象还盖着一星半点没有消尽的雪，可是有些草芽偏会从这残雪里露出头来；周围的墙上也分不清是草是树，树枝子都向里伸着，有几枝长的从两边伸到中间碰了头，把仅仅能看到的一块天分成了几格子。小兰一见这样，觉着很有希望，扔了布条火，借着外边的光，用斧头把沙土石块往洞里扒，扒了不多几下，就平平地从洞口钻出来——井从底看来，洞口在一个侧面，和井底取个平。

小兰站起来，抓着墙上的树枝爬到井口边，看到外边很宽的天地，可惜她多日没有见过太阳，一见了太阳晃得她睁不开眼，只得又退下去。她回到洞里把这个胜利告诉了金虎，并且说她到外边睁不开眼不能活动。金虎说：“咱们是早起动身走的。现在的太阳怎么就还没有落？也许咱们已经走了一天一夜，太阳又出来了？你没有看见是后晌啊还是早晨？”“朝地下看了看就睁不开眼了，谁还敢朝天看？”金虎想了想说：“这也很容易弄清楚：要是一阵比一阵明，就是早晨；要是一阵比一阵黑，就是后晌，一会你再去看看！”小兰问了问他的腿怎么样，他说：“不动不太疼，一动就疼！现在且不说腿，肚里饿得要命，嘴里渴得要命。你不是说这井里也就有草芽吗？不论什么草，给咱们弄一点来吃吃！”小兰说：“对！我也正想弄点什么吃，就是想不起来什么能吃。”小兰出到井底，拔了一

根很尖的草芽，带起一块东西来象姜，尝了一尝，有点甜味，也有点药味，看看那块子，有大拇指头大，正中间长着一根芽，有一边似乎是折了的，又向原来的地方一挖，挖出一串来，都是那么大的块子连在一起，前两块上都带着一根杆儿，上边有些干叶子，象竹叶；后边的几块，杆儿已经没有了，不过都还有长杆子的地方，是个圆点儿。她又找了几个同样的杆子，往下一挖都一样，不过最前边那块长芽的还没有出土。她又想抓一点雪来吃，只是那雪太少，用手一抓就没有了。她把这象姜的东西拿回洞去，和金虎嚼了几块，似乎也能解一点饥渴。稍停了一下，看见窟窿上的光有点暗，金虎说：“这还是后晌！你瞧！天黑下来了！”小兰说：“我再到外边看看去！”她拿了劈柴斧又爬出洞来，果然看见天黑下来。她爬上了井口，见太阳已经落下，靠天的一边一片红，还有点晃眼。她知道发红的这边一定是西，背过来朝东一看，见自己站的是个高处，眼前的斜坡下有几十亩地大一个水池，池边和前面的高处满长着树，除了松树是浓绿色以外，别的树似乎都才出芽，有的连芽也没有出。她先跑到池边喝了一肚子水，又想给金虎拿点水可是没有家具，就从一棵树上用斧砍断一块皮，剥下来卷成个尖底锥形的家具，用一只手捏着舀了些水拿回洞里去。金虎喝过了水，觉着好一点，就跟小兰说：“这些草根，我想弄熟了总比生的好吃。你给咱们弄些柴来先烧着吃些好不好？”小兰说：“这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天也黑了，咱们该住哪里呢？”“我看今天夜里只好就住这里！”“他们要是也追到这里来呢？”“照他们那样走一步打三枪，再有一车子弹也打不到这里来！不怕！他们不会找得来！就是他们找得来，咱们听见打枪再动身还不晚！”小兰去弄了点柴，天就黑得看不见了。这

两个人就住下来。

九

再说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县团部、县政府……这些人初进了新洞，抓着老百姓给他们割草垫铺、砍树劈柴、挑土运石，埋锅安灶；那几个头头们又让把洞口拆大一些，让村公所摘下老百姓的门板给他们搭高铺，搬来老百姓的桌椅供他们打牌……看来都是要在这里住几辈子的，不过没有住够半个月，他们就自动搬出来了。他们所以搬出来，主要的原因有三：第一是日军的炮声不响了，第二是粮食吃完了，第三是几个头头们把带来的几包洋蜡点完了。他们向旅部借粮，旅部又向他们要粮，谁也没粮，就各自找老百姓要。灵泉沟老百姓，大部分早已吃的是树皮草根，哪有粮食供应他们？这些人比不得老百姓，有树皮草根他们也不会吃，饿了不几天就饿得各奔前程——有跑回家的，有投亲靠友的；和敌占区能联系的，就跑到敌占区当汉奸；有枪在手的，就散到山庄上抢人……剩下来的，连他们的头头也不过百把人，就搬到旧洞里来住——因为旧洞地势高一点、地方小一点，白天靠洞门外透进来的阳光，人们总还看得见活动。他们的给养，只能零零碎碎和旅部讨一点，讨一斗算一斗，讨一升算一升。

老百姓在野外住的地方，有好多连风雨也避不住，听说新洞腾出来了，有些老弱孤寡就搬到新洞里来住——年轻小伙子为了避免抓差，年轻妇女为了保护自已，在外边纵然顶着风雨，也不肯到这走不脱的地方来。有一天，铁拴为了打听金虎和小兰的下落，天快黑的时候，溜到新洞里来。他说老羊坎

那地方不好住，来看看新洞里还有没有地方。住在新洞里的人们都好心好意地告他说地方倒有，只是年轻人来了有两种不方便，还没有谈到正经事上，村公所就来派差，说军队要到山外打游击，要民夫去抬担架，灵泉沟人都是被派差派怕了的，铁拴他们这些挂过蓝牌的户支的差更多，不过听说这些军队要去打日军还是个新鲜事。那个村警对他说：“明天天明到田家湾集合，各自准备绳担！”铁拴说：“可是没有吃的怎么办？”“那我管不着！你自己想办法！还有个事要问你，跟你们搬到老羊坎的田永盛，他家的金虎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听他娘说，在搬到老羊坎的第二天，就被军队抓了差，直到现在没有回来！”“尽是些套通了的鬼话！军队又不吃人，抓了差怎么会不回来？回去跟老永盛说：明天早上不打发金虎跟你们一齐去支差，就要当共产党办他！”铁拴说：“话我能给你捎到，他能不能找着人，我可不能担保！”“你们这些蓝牌户都是一路的神通！还有个找不着的？去吧！”铁拴没有打听着金虎和小兰，又受了一顿碰，摸着黑路回到老羊坎。他一到家，正碰上小胖去找他。小胖先问了问打听金虎和小兰的结果，然后告他说村公所来派差。铁拴说：“我见着他们的人了。不过这回听见了个奇怪的事，说是军队要到山外去打游击。他们这些听见炮响就往山里跑的军队，怎么会去找着日本兵打仗呢？”小胖说：“我想这一次还许是真要去打仗——山外的地方被他们丢光了，山里的粮食被他们抢光了，再要不向山外发展，他们吃什么呀？现在也许是饿醒了！”“不论是什么原因吧，打日军总是好事！咱们和党失去联系虽然快一年了，可是还不会忘了党的话。党告咱们说应该支持他们抗日、反对他们反共。现在他们既然能主动去抗日了，我们就可以支持他们

——也许他们打起日本来就能少花些时间来做坏事。”小胖说：“要能那样自然是好事！我觉得希望不大，跟他们走着瞧吧！”这天夜里，他们就准备了第二天早上出发要吃的饭和拿的干粮。

前边说过，金虎家的粮就存在老羊坎附近，也没有被杂毛狼他们找到，只是搬到这里来的自己人很多，金虎娘又是个直心肠的人，差不多把自己的粮食公开了，还是铁拴、小胖、小兰娘、小秀娘（张得福老婆）这些人劝金虎娘留一点粮叫照顾金虎爹，才算留了一点。铁拴、小胖他们来的时候也带了一些山药蛋准备做种子用，所以每天虽说吃着树叶，还是把山药蛋留下了一点。这天夜里，因为要去支差，铁拴就把留作种子用的山药蛋煮了一锅，准备在出发之前每人吃一顿，把剩下的带上作干粮。金虎娘也把留着给金虎爹作病号饭的玉菱面送给他们半碗，叫他们作一顿糊糊汤喝。

第二天天不明，他们两个吃了饭就回到田家湾集合。要出发的部队，就是铁拴他们院里驻扎的一个排，这时候都正端着碗吃饭。他们吃的饭很奇怪，一半榆叶一半米，米没有碾细，总还有三分之一是谷子，大家都说伙夫不会做饭，顿顿吃生米，其实他们不懂得谷子要不碾成米，就是煮一天，吃起来也还是这样子。小胖看了看他们碗里吃的东西，向铁拴笑了笑，意思就是说：“我猜对了吧！他们再不开到山外去，就连这饭也吃不了几顿了！”

铁拴想先把担架和自己的绳担捆在一起，可是在院子里找来找去，没有见担架在哪里，问了问别的去支差的人，别的人也没有找见。铁拴问一个兵，那个兵反问铁拴说：“要担架干什么用？”奇怪！不要担架，要民夫干什么呀？铁拴见他们不把民夫当人看，也无心再问，只得和同来的十几个人蹲在一处听

候分派。一会,那些兵吃完了饭,有一个兵指着东房阶台上一迭东西向民夫说:“马上要出发了!大家都来领口袋!”原来那一迭东西是军用粮袋。铁拴低低地向小胖说:“这哪里是打仗呀?”

不是打仗,而是“打给养”。“打给养”是他们驻在这一带的部队征发粮食时候通用的话,不过在各个时期、各种条件下的“打”法不同。例如他们初来的时候,每到一个村庄,先捉住一个人要东要西,故意把人家逼跑了然后追着打枪——也不真打住人,只是虚张一下声势,把全村庄的老百姓都惊跑了,然后挨户搜索,搜着什么拿什么。要是他们驻在哪个村,那又是一种打法,先让村公所查各户欠的代购粮,估计哪一户还有点油水,就到哪家去要;主人要说没有,他们就搜,不过搜着别的东西可以不拿,要搜着粮食,就是一升半升也不肯留下,并且搜着少的就说可以证明还有多的,每天继续搜查,直到这一户吃的饭里再不见粮食为止。到敌占区去打给养,还是近几天来他们“创造”的新办法,前两天没有带民夫,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带民夫”也可以说是这种“创造”的“发展”,至于怎样打,看他们“打”一次也就知道了。

他们天明出发,该吃早饭的时候通过三水镇。有个兵和三水镇驻着的一个兵认识。三水镇那个兵和他打着招呼说:“你们干什么去?”“有任务!”“都是一样‘任务’,你们走在我们后边了!”“你们到哪个村去了?”“我也不知道!”排长听见了这话,就叫过三水镇那个兵去问。那个兵向他敬过礼,恭恭敬敬地回答他,可是答的话还是“不知道”。他们各个部分打给养是互相保密的。排长问了几句,见问不出道理来,就丢开了他往前进发。到了中午,迎头来了一些军队,他们以为是

遇上了日军，排长下命令抄小路快跑，跑了不几步，才想到可能是三水镇的部队打给养回来了，回头一看，果然见有些兵担着口袋，这才又命令大家站住。一会，那些兵走近了，打过招呼，才知道对方打给养的地方，正是他们预定的目标。这个地方，离山里最近，离日军新开的公路最远，土地很好，是个产粮的地方，现在被三水镇的军队走在前边，他们很以为可惜。最好的地方既然去不成了，大家就要排长找个次好的地方。排长说：“大家先休息一下，让我想想看！”

休息下了，有个民夫觉着有点饿，从小干粮袋里掰了一小块糠窝窝塞进嘴里。一个兵看见了说：“来！借给我一点吃。”说着就伸手去掏口袋。那个民夫按住口袋说：“糠！”才说了个“糠”字，把吃进嘴里的又喷出来，接着说：“糠窝窝！一点粮食也没有！”“糠的也行！”“不不不！就这一点点！”

“不怕！前边有饭吃！”不等那个民夫答应，那个兵就把口袋夺过来，又有两三个兵抢着要，把个小口袋也撕破了。其他的兵看出巧来，一轰把所有的民夫围上，来抢每一个人的干粮。铁拴把他和小胖两个人共同拿的山药蛋口袋死按住不放，一边向排长喊：“官长！官长！他们要把我们的干粮吃了，我们一会可不能担担子呀！”排长看了看说：“你就借给他们吃了吧！一会到前边也有你们的饭！”一个兵捏住铁拴的胳膊夺着说：“对么！前边有你们的饭！你这人可真不开眼！”铁拴见挡不住，先挣脱出手来，把口袋打开抢了两个，把一个递给小胖，把口袋一丢让他们去抢，自己拿着一个吃起来。小胖悄悄跟铁拴说：“没有想到先把咱们的‘给养’‘打’了！”排长见铁拴他们的‘给养’最好，预料那些兵都是各人离各人的嘴近，不会有人让给他一个，他也不肯放过机会，主动跑过来抢

了一个。

“打”过了民夫的“给养”之后，排长又想出个“次好”的地方来。这地方叫“交口”，土地也不坏，户数少一点，离日军的新公路近一点，离这休息的地方还有二十多里，估计回来的时候要摸黑路，只是近处再找不出好地方，也只好到交口去。一到交口，见一座大庙门外安着两口大锅，锅里泡着一些才吃过饭的碗筷，有两个人正在那里刷洗，灶下的柴灰还没有冷，烘得锅里的洗锅水还冒着热气。排长嘟囔着说：“他妈的！这又是哪一部分先来过了！”那两个刷锅碗的只顾忙着作活，把碗弄得哗啦啦响，没有注意到来了人，等到听见很乱的脚步声压住了碗响的声音，抬头一看，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了跟前，躲也没有法了，只得顶住脸打招呼。这两个刷锅碗的，一个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小伙子，另一个是五十来岁的小老头。铁拴见了这个小老头，觉得有点面熟，只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小老头见了铁拴，好象要打招呼，可是忽然又变了主意，把脸扭向另一边去。排长向小老头说：“喂！你是村里的什么人？”“我是民夫！管做饭、洗锅碗的！”“找你们村长！”“村长不在家！”“谁在村公所主事？”“村公所早散了！”“谁派你来做饭的？”“村里人临时推出我们来支应军队的！”“那末你们自然就是负责人了！”“不是！村里人每天凑出一点粮食来，叫我们两个给过路的军队做饭！”“你听我讲！我们是国军！是来看望你们的！看一看敌人来过之后你们有什么损失，村里有没有汉奸，秩序怎么样。”“谢谢官长！我们就是支应国军的。”“你们不要怕！还是找一找你们的负责人！”小老头想：“前几天日军来了，你们这些国军不知道上哪里去了，这几天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国军？既然是国军，驻下来也算，

我们也可以只供应一头，象现在这样子，一天到晚不知道要吃多少粮、拿多少粮！这怎么得了呀？”这话自然当面说不得，只好变个法子说：“官长！这里实在没有负责人！今天收起来的粮食还有一点。官长们要吃饭，我马上烧着火来给官长们做！”“哪里有粮食？”小老头指着庙门里竖着的半口袋米说：“那口袋里就是米！水火都现成！马上烧开锅就是饭！”说着就赶快把洗剩的几个碗刷了一下往外捞。排长说：“你且不要忙这个！让那个年轻人洗家具，你还是先去找负责人！”排长看见那半口袋粮食不能解决问题，才又催小老头去找负责人。这里的“负责人”实在无法再找；国民党军队反共以后安插的那一整套村组织，原封不动成了日军维持会的“负责人”，国民党军队来了，他们既不敢反对又不敢支应，头头们躲在县城里，让一些狗腿们在家给他们调查老百姓的行动。谁要向国民党军队说出他们是汉奸，城里的伪县政府接到报告，就会把谁捉去办罪。日军对这地方不象对县城附近那些老占领区那样注意，半月之前到这里来，原不过为的是抢一大批粮食和牲口，后来见国民党军队一退得那么远，这才又变了主意。这里有一座土煤窑，产的无烟煤比较好。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县城里烧的都是这里的煤；日军占了县城之后，这里有八路军游击队占着，后来又是国民党军队占着，城里才改用别处的煤。这一次，国民党军队又往山里退了五六十里，汉奸们都向日军献计叫修一条公路运煤。日军一来为了用好煤，二来为了向山区进军便当，就从了汉奸之计，修了一条运煤的公路。路虽然修好了，日军可没有剩余的兵力到这一带来驻扎，只是用两个押车的伪军押着一部大卡车每天到这里运两趟煤。因为是这样个情况，国民党军队才能到这里活动。这个洗锅碗的小老头，实际上就

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一个应付混乱局面的负责人。他和铁拴在灵泉沟一样，是个没有公开职务的共产党员，国民党也曾在他的门上钉过蓝牌，因为他为人实在，不会混水摸鱼，大家才选他干这份不太得劲的差使。那个青年也是个共产党员，是这小老头自选的帮手。排长一直催小老头去找负责人，小老头一边答应着，一边只是忙忙乱乱做活——把碗捞出来，把洗碗水舀了换上清水，取过柴来点着火，就又去擦碗。排长又催他说：

“叫你去找负责人，你为什么尽管磨时间？”“好好好！我先给官长做成饭让官长吃着，我再想法子！”排长火了：“想你妈的什么法子？你这家伙为什么故意和国军作对？你是不是汉奸？”排长这样一发威，那个洗锅碗的青年小伙子再也忍不住了。他抢了一步走过来说：“官长！我们不是汉奸！当汉奸的正是你要找的那些负责人！”“是谁？”“谁？你们的村长！你们的国民党书记！他们当了维持会的正副会长……”“你这小子！目无官长，侮辱党国，不是汉奸才怪！给我捆起来！”两个兵过来，从铁拴他们的扁担上取下两条大麻绳，给这个青年上了五花大绑。

每当过路军队来的时候，这两个人支应着，别的群众也有好多站在远处观风。这个青年的父亲，远远地看到军队把他的孩子捆起来，就拼命跑过来掩护，别的人，热心一点、胆大一点的也都凑过来做开解，小老头也帮着求情，都说“年轻人不会说话，得罪了官长，官长不要和他计较”。排长向青年的父亲说：“你是负责人吧？”“不是！你捆的这个后生是我的孩子，求官长放开他！官长要什么我去给官长找！”“要负责人！”“实在没有个负责人！”“没有负责人，这个摊子是谁支起来的？”“这是我们老百姓商量着支了两口锅，攒了一点米，

叫支应军队的。官长说我是负责人我就算负责人。官长要什么，说出来我跟大家商量去。”排长觉得找着路道了。他说：

“你们村里欠几万斤代购军粮没有送，我们来要！找得着负责人就找一个负责人来；找不着负责人缴出粮来也行！你们连个负责人也不给找，不是汉奸是什么？”那个被绑的青年说：“人也没有，粮也没有！当汉奸的尽是你们保举的人！我们不会当汉奸！”青年的父亲和大家七嘴八舌都说：“小孩子家不要多嘴！”“官长不要理他！要什么都有我们！”……青年的父亲向小老头说：“你快烧锅给官长做饭，我去和大家商量攒粮！”小老头又要求排长放那个青年，排长说：“待一会！现在还不能放！”自然不把粮拿到手，他们是不会放的。排长见事情有了希望，就和那些兵到庙门里的戏台下边乘凉。

小老头又去烧火，铁拴也装作帮忙的样子凑到灶前边和他交谈。铁拴低声说：“老叔！我好象在哪里见过你！”小老头没好气地扬着头说：“见过！你是灵泉沟的！”铁拴又低声说：“是！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呀？”“这我可记不得！你们现在算是抱住粗腿了！”又把声音放低了说：“好事不干了，至少也该少干点坏事！没想到你们会跟着他们出来干这个来！”铁拴说：“老叔你不要冤枉好人！我们十来个人都是被逼来当民夫的！我们带一点干粮也都被他们路上抢光了！”小老头又看了看十个民夫的神色，见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象是跟着土匪一样的队伍出来混水摸鱼的人，气就稍微消了些，不过他还不肯和铁拴说实话——原来他是一九三八年共产党召集的一次地方活动分子大会上听过铁拴的发言的，现在已经隔了三年，党的活动又早已停止，所以不敢冒然相认。老百姓攒粮食去了，军队休息去了，庙门口暂时安定下来。一会，远远地听见隆隆的马

达声响。铁拴向小老头低声说：“听！哪里来的汽车响？是不是日军来了？”小老头这时候已经觉着铁拴不是坏人，就低声告诉他说：“不是！这是日军的运煤车！”铁拴把声音更放低些说：“你就说是日军来了，不把他们吓跑了么？”小老头比他的声音更低了一点说：“借日本人的势力吓人也不光明了！”

“这老叔！这些土匪队伍难道比日本好多少？把他们吓跑了谁还会去对日本人说借过他的势力？”“不！不能叫群众觉着日军更厉害些！”这时候，汽车来得更近了一点，有个兵说：“报告排长！有汽车响！”“知道了！”排长好象也听见了，说着就到庙门外来了望。小老头尽管不赞成借日军的势力吓人，群众中可也有人想到了这个办法，只听得有好几个人乱喊：“快跑！”“日军来了！”“这边这边！”“不要顾东西！人跑了就算！”……有几个人故意抱着小孩、挟着包袱从庙门口跑过。

排长撑不住气了，下命令说：“快走！往北撤退！”有个兵端枪来对住那个被绑着的青年问排长说：“把这小子敲了吧？”

“不准打枪！快走！”他们好象长了翅膀一样向北跑，民夫们死赶活赶也赶不上。小老头自然也得假意儿跑。铁拴拉了小胖一把，和小老头跑在一起。

小老头向东跑了几十步，刚刚跑出村外，见铁拴和小胖跟在后边。小老头有点怀疑，停住步，握紧了拳头说：“你们追我干什么？”铁拴见他是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就离他几步远站住和他解释说：“老叔你不要误会！我们不是追你！”“不是追我为什么向北去？”“我们不愿和他们跑在一起！”小胖站在铁拴背后说：“我们只有两个人，难道敢留在你们交口村干坏事吗？都是好好的老百姓，谁和谁有仇了？”小老头说：“既然不是坏人，他们已经走了，你们随后回去吧！我还要先返

回村里放人！”铁拴说：“我们也可以返回你们村里歇歇。一来可以帮你放人，二来也可以给交口村人解释一下灵泉沟人不是跟着土匪部队来抢粮的！”说罢，就和小胖两个人掉转头走在小老头之前往村里走。小老头见他们回村里去，也就放了心跟在他两个人后边又回到庙门口。这时候，被绑着的青年早被他父亲解开了，已经有几个人在一处打攒攒，一见铁拴和小胖两个人，有个青年说：“把这两个人捉住！他们是跟着部队来抢粮的！”他们这一说，好几个人都过来拖铁拴和小胖，还是小老头给他两个做开解说：“大家不要急！他们也是被抓了差来的！”铁拴趁势就把军队退入灵泉沟以后群众住在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村公所怎样派差、打游击怎样不准备担架准备口袋，军队在半路上怎样抢吃民夫的干粮说了一遍，说得大家都替灵泉沟人落泪。他把情况叙述完了之后，接着说：“我们两个人留在后边，就是想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不是跟着军队来抢粮的。现在解释完了，我们就要走了！”小老头说：“等一等！你们一定都很饿了吧？等一下让我回去给你们找点什么吃的！”又问大家说：“做饭也太误事！谁家晌午要有剩的饭，请给他们两位端一点来吃！”铁拴说：“不打扰你们吧！这些年头，一天半天不吃东西是平常事！”小老头又向刚解开绑的那个青年说：“你陪他们两位坐一会，我去拿点东西去！”说罢就走了。这小老头本想把铁拴他们请到家吃顿饭，可是不了解铁拴这人近几年有没有变化，怕万一靠不住了让他摸着自己的住处发生什么事故；就那样让他饿着肚子走，作为一个同志来说，没有那个道理，想来想去，终于想出给他们拿出些饭来吃，既不让同志饿肚子，又不让他知道自己的底细。他回去把他准备叫躲避日军用的干粮——半斤重的黄蒸——拿了四

个，又用小锅把晌午剩的汤拿了一锅，拿到庙门口来。先前喊叫让大家捉铁拴和小胖的那个青年也端来了一碗小米干饭，又有人送来了一碗两和面汤面。小老头把大灶火里的柴火抽出来，用三个砖支起锅来给他们热汤，看他们拿得饭来，就把汤倒出去一些，把两碗饭加进去煮在一起，并且把黄蒸交给铁拴说：“你们把饭吃了，把黄蒸拿上到路上吃！”铁拴说：“谢谢你！我们吃一顿就行了。”

这时候，别的人都已经散去，只有小老头和那个被绑过的青年陪着他们。小老头一边烧着火一边问铁拴说：“你们回去还得住到那石坎里吗？”铁拴看了看小胖说：“你怎么样？我是不回灵泉沟去了！”小胖说：“咱们的家怎么办？”“怎么办？回去不过是多两个支差的？帮不了家，也把咱们贴的里边了！”小胖想了想说：“我也不回去了！”小老头问他们说：“你们不回家该到哪里去呢？”铁拴还没有想到适当的答话，小胖就马上回答说：“我们有我们的去处！”铁拴翻了他一眼，埋怨他的嘴不该那样快。小老头把他们前后的话接起来一想，已经明白了他们的意思。这时候，小老头已经对他们一点也不怀疑了，就跟铁拴低声说：“我认识你！你是李铁拴同志！到了那边，请上级赶紧对咱们这地方想办法！你就说，再迟了这地方的人就都不能活了！”铁拴说：“一定！我要去也是这意思！请问老同志你是谁？”小老头说：“我告诉你也没有什么用处！等把这地方收复了咱们自然还见得着！”

他们的话就谈到这里。小老头又回去给他们装了一背搭干粮，等他们吃过饭，就打发他们上了路。

十

铁拴和小胖两个人钻了两天山，偷过了日军的封锁线，就到了有八路军的老解放区。

他们走近了封锁线以北的第一个村庄，也和金虎在那大黑洞里找着了窟窿一样，两颗好象悬在空中的心都落实了。这地方，虽然也是山区，又比灵泉沟偏北，气候可比灵泉沟暖一点，村庄附近向阳的地方，还可以种几块麦子，不过麦熟期很晚——要到夏至以后才能收割。他们到这里的时候，正是小满初过，村外的麦子刚扬过花，麦穗儿随风翻着波浪；秋田里的谷子和春玉米，刚刚出土，早一点的可以看见顺垅青。铁拴和小胖说：“你看人家这里的光景，秋是秋、夏是夏，哪象咱们那里直到现在人上不了地？”他们走到村边，早看见墙上写着的“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快收、快打、快藏，不让敌人破坏生产”……一些鲜明的标语，村口上站着两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向他们要条。铁拴说：“我们是从南边来找八路军的，没有路条！”正在附近地里补苗的一个青年小伙子，听见他说是从南边来的，就拿着铁锨过来问话；正在打麦场上收拾场子的几个人也凑过来——这几个人都是民兵，负有帮助儿童团盘查行人的责任。铁拴和小胖见了他们，想到了前二年自己也都是这样子的人物，便老老实实和他们说南边待不下去，要到这里来参加八路军。盘查的人们见他们两个的神色气派都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觉着不会有问题，不过他们既然没有什么证明，也不便告他说哪些地方都有八路军。那个补苗的人向他们说：“你们跟我来吧！”他们两个跟着这人到了村公所，先让他们喝水，

然后去把民兵指导员找来。指导员先盘查了他们的来历，接着便和他们说：“凡是从南边来的人，都得先到武工队上把来历说明，让他们统一安排。现在我给你写个介绍信，派两个同志送你们到那里去！”说罢就给他们写了个介绍信。铁拴他们见信后边具的名字上边有民兵指导员的职务，知道他就是共产党的村支书，更觉放了心，就同着两个民兵到另外一个村子里找武工队去。

“武工队”的全名是“武装工作队”，属专区领导，常在老解放区的边缘上活动，任务是打击敌占区的汉奸势力，保护边缘区的抗日政权。他们通常的工作是向敌人碉堡上的伪军喊话，惩办危害过抗日人员的汉奸，警告一般汉奸叫他们少做坏事。

铁拴他们来的这一天，正是武工队准备教训一批汉奸的时候。武工队近几天来，从敌占区捉来了三十多个维持会长和向敌人献过殷勤的小汉奸，准备在这天晌午开始给他们上第一课。那两个民兵，把铁拴和小胖送到，把介绍信给了一个武工队员，队员就去把队长找来。队长问明他们是从灵泉沟来的，就很客气地让他们坐下，然后向队员说：“到招待室去请火光报社记者鲁丁同志！”那个队员去了。队长问：“你们认识鲁丁同志吧？他也是你们灵泉沟人。”铁拴和小胖听了都一愣。小胖说：“不认识！灵泉沟没有这么个人！”队长对他们有点怀疑了。“你们是灵泉沟的吗？”“是！”“为什么本村不认识本村人？这是战争时期！说话可要老实！”铁拴说：“我们前二年也是跟着八路军做过抗日工作的，自然不会哄自己人。不过你说那位‘鲁’什么同志我们确实认不得！我们灵泉沟就没有姓‘鲁’的！”队长见他们说话都非常自然，丝毫不象哄人的样子，想到可能另外有个灵泉沟，就打开随身带着的背包来查地图。

就在这时候，从门外走进一个青年人来，穿着一身很整齐

的干部制服，蹬着一双缴获敌人的爬山用的皮鞋，挂着个缴获敌人的皮包，精神饱满地跨进门来。铁拴和小胖怎么也想不到会碰上这样一个熟人，一齐站起来喊：“银虎？”银虎也奇怪地问：“咦？你们怎么也来了？”队长向铁拴他们说：“这不是熟人吗？怎么还想不起来？”小胖说：“要说‘银虎’不早就想起来了么？”又向银虎说：“到了咱们自己的地方，怎么还要改名换姓的？”银虎找不着什么改名的理由。队长笑着向银虎说：“鲁丁同志！好改名换姓也是你们文化人一个毛病！我刚才没有想到，还以为另外有个灵泉沟哩！既然是熟人，你们先谈谈吧！我得先去布置开课的事！”说罢，便别了他们走出去。

银虎要铁拴他们谈谈家乡的情况，小胖说：“家乡的事，说来话长。你先给我们说一说你是怎样逃出来的好不好？”银虎说：“可以！不过这事情说起来也不短：他们把我捉到三水镇，和好多同志都被送到从前开过盐店的那个大院里，门外用两个兵站着岗。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从门外走过他们一伙便衣队，每个人的胳膊上都缠了一条白布条子，有的拿着些绳子，有的拿着短枪，看样子又是到哪里去捉人。两个站岗的兵，见他们走过来了，都只顾面对着他们看，我就看出了一个紧急的空子来——我把我穿的学生制服里的白领子摘下来拴在我的胳膊上，从一个站岗兵的背后钻过去挤进这个便衣队里，随着他们匆匆忙忙往前跑。我觉着走得了就算走了，走不了被他们抓回去也不过还是走不了，总要比死等在那里听他们摆弄多一个逃走的机会。我这一撞撞对了。他们没有发现我是半路加进去的。跟着他们跑出了三水镇，向西北的山区进发，我才发现他们走的路，正是要到我们和县委书记约定的集合地点去的。这时候，我再不敢迟延，赶紧趁着一段有树林的地方避开他们往

集合地点去报信。我一个人自然要比他们一伙人跑得快，跑到集合地点，回头还看不到他们的影子。我把这紧急情况告诉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马上打发大家先走，自己留在那里等几个还没有赶到的同志。又停了一会，那几个还没有来——可能也是出了事——那个便衣队就快赶到了。县委书记怕自己撤走之后，那几个没有来的同志随后赶来不了解情况被人家捉住，不等便衣队走近就先打出一发子弹去，然后马上离开原地。对方对准了发火的地方还了好几枪。静静的夜里在静静的山里打枪，十几里以内都听得见。预料没有赶来的同志们听着枪声、看见火光就不会再往这里赶，县委书记才放心退出来赶上我们。那些便衣队来势很凶、其实很松，见我们这边也有枪，就不敢那样大胆前进；我们可就大胆赶路了。我就是这样冒碰了一下碰出来的。”银虎把他的逃跑经过简单说了一遍之后，就向铁拴打听家里的情况。铁拴也给他谈起家乡的变化，才谈到小兰和金虎不知下落，一个武工队员就跑来喊：“鲁丁同志！开会了！”银虎向铁拴和小胖说：“今天要给新抓来的一批汉奸上第一课！这个会很有意思！你们也可以看看去！”“可以看吗？”“可以！公开的！”

这个会场很别致：村外的一段没有水的小土沟岸上长着一棵大柿树，柿树下放着一张方桌和几条板凳，长板凳上坐满了干部，有个干部早已站在桌后边讲话。在桌前边地上坐着的就是从敌占区捉来那三十来个人，其中有七八个被绑着手，每个人旁边都有带枪的队员陪同他们坐着。他们的周围又坐着一层队员，外边才是看稀罕的观众。银虎把铁拴和小胖领到会场，让他们挤在观众中看，自己挤到方桌边。坐在桌旁板凳上的干部们见他走来，又往紧处挤了挤给他腾出一段板凳和可以铺开

笔记簿作记录的一块桌面。银虎坐下来，从大皮包里取出记录簿。

正在讲话的是专署的敌工科长。这次会是他的主席。两旁板凳上坐着的是县、专两级的行政和司法干部——没有一个是武工队的干部，因为武工队干部常要领着队到敌占区活动，不便让他们认识。敌工科长只简单宣布了开会的意义。铁拴他们没有赶上从头听，只听得科长末了的话：“……今天就让大家了解一下‘汉奸作了些什么事’，‘我们要怎样对待汉奸’！现在先点一下他们的名字！”专署司法科一位同志取了一个汉奸名单逐一点了一遍，各个汉奸也都应了声。主席说：“请专员讲话！”专员站起来走到主席刚才站着的地方，主席坐到专员刚才坐的那一位上。

专员接过那个汉奸名单来叫第一名：“傅治家！”“有！”“站起来！”坐在前排被绑着手的一个深眼窝留着几根黄胡须的家伙站起来。专员向旁边坐着的司法科长说：“把他的罪行向大家谈谈！”司法科长从一迭卷宗里找出他的案卷来向大家说：“他的历史太长了，现在只能简单说一下：他是十五里铺的一户地主，抗战以前当过几任村长，又是县里的防共委员。一九三八年敌人占领县城以后他就出头维持敌人。前后有三次领着警备队包围过我军的工作人员，有一次捕去我们两位工作同志后来被敌人杀害了，并且连累了当地两户居民。敌人看中他的害人本领，叫伪县政府把他接到城里去住。他给敌人献计叫把十五里铺一带的树林全都砍伐光，给我们到那里活动的人造成困难。最近敌人又不知封了他个什么官，每天骑着马带着十来个警备队员到处转，常常威吓老百姓说：‘有我傅治家在，就不许本县有一个共产党人！你们谁要窝藏了共产党、八路军，

我报告了皇军就要杀你们个鸡犬不留！’前天我们武工队把他从县城里捉回来……”专员说：“下面的用不着讲了！”又向那个傅治家说：“你可以算得个死心塌地的老牌汉奸！你是东条的亲生子吧？要不然怎么对抗日的人这样仇恨呢？你知道不知道杀人要偿命？你以为把树林砍光了，我们就不会到那里去了吗？你以为住到县城里凭日伪军保护着就十分保险了吗？想错了！你既然做了坏事，就是钻到老鼠窟窿里，我们也会把你挖出来！作恶已经作到头了！再不能让你那样无法无天了！”说到这里，就转向在他身边的队员说：“拉出去！”在他旁边坐着的一个武工队员站起来和在场外进去的一个队员两个人把他拖往预先准备好的地方去。专员又叫名单上的第二名，那个被叫的人颤颤抖抖地站起来，专员又叫司法科长宣布他的罪行。司法科长才翻开他的案卷，就听得“呱”的一声枪响，枪毙了傅治家，吓得才站起来那个人腿一软又倒下去，在他旁边那个队员站起来又把他拖起。别的汉奸听了这一声枪响，也都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战。群众听到枪声，也有一部分跑去看的。这种处理形式，既不象审讯，又不象宣判，只是指出名来，宣布一下罪状，斥责一番，然后就拖去枪毙，实在是他们想不到的。就是这样一连枪毙了三个，吓得那些名字靠近前边的汉奸们现出种种怪象，我们不必多花时间去细说他们。

当专员第四次拿起那张名单，那个第四名觉着自己的时辰已到，不住的向周围张望着，好象想找个人交代什么后事一样。可是专员这一次改变了办法。专员没有再往下念名字，只说：“以下这些人，严格点说，都够枪毙的资格，不过比起以上那三个来，还不象那样把敌人当成他的亲爹，钻头觅缝每天起来主动地去害人，我们觉得可以宽大处理，因此他们的罪状就不

都在这里公布了！”又用手指向着其余的汉奸们头顶上的空中一划说：“你们的罪状，回头叫别人念给你们自己听！这个宽大不是无边的！宽大也不是不问罪，是给你们留个立功赎罪的机会！现在的案卷上写的是你们的罪行，将来你们谁立了功，就把你们的功也写上去，等到立下的功可以赎罪就宣布你们无罪，功大了还可以得到另外的奖励，再有了罪行就罪上加罪，到了一定的期限就再来这么一次处理。至于限期多长，怎样立功，准备花三天时间请教员给你们上上课。今天只能算是个开课典礼！”专员讲完了话，敌工科长宣布了一些开课的安排，就散了会。

散会之后，铁拴他们又请银虎找着了队长说明来意。队长说可以把他们的意见转给上级，只是说马上要八路军去打蒋军还不能向上级提——因为要顾全大局，还不能和他们分裂。

铁拴问到他们两个人自己本身该往哪里去，队长说：“我这里正需要从南边来的可靠的人。你们要愿意参加工作的话，就可以参加武工队。”他们两个同意了，就留在武工队里。

十一

这里我们再回头来谈谈会虎和小兰。金虎被轧了一下以后，右胯骨有点脱臼，躲在洞口的石头地上，一夜被冷风吹得直疼，稍一翻身就疼醒了。小兰又摸到洞外，趁着月光摸了些柴来给他烧火让他烤着。将就到天明，小兰又平了平路，招呼着金虎爬到洞外的井底上。这一爬，在两堆圆石头中间卡住了金虎那条带伤的腿，小兰不知道，在前边猛一拉，疼得金虎叫了一声。小兰松开手，擦了根洋火看了看情况，然后才调顺了方

向又拉着金虎走，可没有想到这一下除没有坏了事，反把脱臼的地方给纠正过来——金虎的这条伤腿能动了。

俗话说：“筋骨疼痛一百天”，伤了骨头不是短时期能完全好了的。金虎又在井底住了几天，等到把那条伤腿养得能作一点主，才爬上井口和小兰两个人又找了个可以存身的石坎住下来，仍然吃着那象姜的东西充饥。那东西原来是一味中国的补药，名叫“黄精”，相传吃得久了可以成仙。他们两个人虽说没有成仙，可是也都养得精神饱满，不到一个月，金虎的腿已经能对付走路了。不过他们不知道这个药名，就把它叫成“山姜”。

这地方是个大山顶，百里之内找不到一个人。小兰也曾在这丛林中钻来钻去想找一找自己的家在哪个方向，只是一点标志也找不着；后来金虎能活动了，拄着一根树枝遛了几天，也看不明白是什么地方。灵泉沟的新洞，在一条深沟的北岸，不可能钻到南边；北、西、东三边比较起来，西边最低，越往西越平，金虎到过那里，又可以断定不是西边；至于北边和东边，山太高、路太远，一般青年人没有特殊事情是走不到的，他们两个都没有来过，不知道究竟是北还是东。

有一天，小兰搀扶着金虎到一处林下去刨黄精，无意中发现了—丛才出土的山药蛋苗，刨了一刨，下边有拳头大一个山药蛋，大的周围，象指头肚大小的小山药蛋就有三四十个，也都长出来一些小芽，芽尖才发红，还没有完全露头。金虎说：“这地方怎么会有山药蛋？”小兰说：“也许就有野山药蛋！”“再找找看！”“那不是一棵？”“那又有一棵！两棵两棵！不不不！那个、那个……多得很！”他们越找越多，不过大的很少。他们发现了这种吃不尽的宝物，自然觉得生活改善了好

多，只是这东西已经长了芽，再过几天，苗一出土，下边的山药蛋就要烂。他们决定多刨一些存到石坎里。

不妙的是他们的两盒洋火已经用完，只有在柴灰里保存得一点火种，万一熄了就再烧不着火。他们都很为这事担忧，总想发现个邻居，可惜发现不了。有一天小兰搀着金虎爬上了南边的山峰，看见石崖下有一个地方冒烟。小兰指着烟说：“好了！咱们找到邻家了！”金虎一看也很高兴，可惜崖太高下不去。这地方，从北往南是一道斜坡往上爬，可是一到峰头上，南边是五六丈高的齐崖，象一刀劈下去的样子，而且有好几里长的地方都一样。崖下边自然还是山顶，不过比北边低一点，再往南也是平的，总还有里把宽才慢慢低下去。在那平的地方，中间有一道沟，烟就是从那沟里冒出来的。金虎看了一阵说：“看来这一带没有路，总得转到东西两头才下得去。峰顶上有好多缺口，走不通。小兰又把金虎搀下来先往西转，可是西边的地势低下去，山峰突出来，不止那边下不去，这边也下不去；又转到东头，爬上顶去一看，两个人都吓了一跳——南边的平顶越往东越窄，到这里已经过了平处的尽头，成了几十丈的高崖，下边是长满树林的深谷，一不小心掉下去，不等落到底，上边就看不清了。转了大半天，路也没有找着，金虎的腿就又大疼起来。

第二天，金虎没有出来。小兰一个人爬到山峰上去看，仍见那个地方冒烟；又来往跑了几趟仍找不着路。她要站在山峰上喊，冒烟那地方是可以听见的，可是她不了解是什么人，也不敢随便喊。后来他们一连找了好几天路，只是找不着。这一带，象他们出洞时候遇上的那种井一样的土窝窝，大的、小的、深的、浅的总有一百多个。有一天晌午，他们从一个没有

长着草木的土窝窝旁边走过，听见里边有人咳嗽。小兰拉了拉金虎退了一步说：“有人！”“咱们不是找人吗？”“谁知道是什么人？”“可惜没有拿着咱们的劈柴斧！”这一片地方，地势比他们住的那边高一点，没有树林，草也很稀，除了那个土窝窝，没有个藏身的地方，碰上好人自然是好事，可是碰上坏人就有些不便。他们站了一下，金虎想出个主意说：“咱们每人拿上一颗石头去跟前看看，要是好人，咱就和他谈话；要是村公所那些人，咱就两石头闷死他！”小兰同意了，两个人各自选了一块很得劲的石头攥在手里，走到土窝窝边来会客人。只见一个人，穿着土色的衣裤，上衣破了，露着黑油油的肩膀，一看就知道是常常顶着太阳作活的庄稼人。这人用一个镢头在墙上掘土，旁边放着一担筐子，看样子是准备叫挑土用的。因为墙上的土很干燥，往下一挖，尘土直往上飞，吸到鼻孔里就会引起咳嗽。下边的人掘一阵就要咳嗽几声，尘土飞到金虎鼻孔里，金虎也咳嗽起来。下边的人听见上边咳嗽，就停住手往上看，正和小兰的眼光碰在一处。小兰喊：“枣树院伯伯！”下边的人是个老头，眼有点花，一时看不清是谁，正要问，忽然看见金虎，就喊：“金虎！你怎么在这里呀？那一个是谁呀？”他们两个见是自己人，就都把手里的石头丢了。这人名叫李洪，就是小胖他爹。小兰说：“我是小兰！”“小兰？这半年你在哪里来？吃了苦了吧？看那脸上连一点血色也没有！”金虎说：“这几天还算好得多了！前几天的脸上就跟白纸糊的一样！”……

老李洪见了这两个早已丢了的青年，连土也不挖了，爬上来和他们谈话。他说：“家里都说你们两个人恐怕都不在世了，没想到今天会碰见你们！”金虎说：“我们很想回去看

看，一来我的腿压伤了，二来找不着灵泉沟在哪一边……”老李洪说：“暂且不要回去了！你们家里的人都还好。且到我家里住吧！我家搬到这里来了。”金虎和小兰一齐问他住在哪里，老李洪说：“就住在这南边石崖下不远的一条小沟里！”小兰说：“我们看见那里冒烟，只是找了几天也找不着路！”老李洪说：“这路你们找一年也不会找着！全世界只有我和张得福知道！”“你们怎么知道的？”“说起来话长，”老李洪从腰里取出旱烟袋和火镰来打着火吸着烟接着说：“二十多年前，我给三水镇一家地主放羊，张得福那时候才十几岁，跟着我学放羊。有一次，有些羊跳到这么个土窝窝里吃草，就丢了两只。又过了两天，我们在山头上看见那两只羊在南边崖下跑，可是找来找去没有路，下不去。后来我们觉着那两只羊也许不是我们的，我们又到丢了羊那个窝窝里去找，见那窝窝里有个石洞，点着火一看，见洞里有羊粪，就钻进去，想不到就那样平平地从南边的崖下走出去。那时候，邻近各县的羊，一到夏天，差不多都到这山上放，放羊的人都带了粮食来碰伙作饭；这几年因为战争，才没有人来了……这些古话说起来没有完！咱们走吧！我带你们到那边去！等我下去担上土！”金虎说：“我给你担！”小兰说：“我担去！你连你自己还顾不住哩！”小兰说着就下去了。金虎问老李洪说：“难道那边连土也没有吗？”老李洪说：“不是！这土是碱土，能熬出盐来！”“你怎么知道？”“羊好啃吃它！”“这里离灵泉沟有多远？”“远得很！一天还走不到！”“没有那么远吧？”“你们走了多长时间？”“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不信！这地方叫阎王脑，从灵泉沟来没有第二条路！谁来也得转到西北，钻完了大沟再往南返！”“不！我们走那一条路，也是全世界上只有我和小兰知道！”“再没有能

上来的地方！再一条路就是从灵泉沟往东下了山，再从东边上
来，不过那样走至少得三天多！”“不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从
哪一边来的。灵泉沟在哪个方向，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我
们也是从石头里钻上来的！”“石头里怎么能钻上来？”“说起来
一天也说不完！你没有听说灵泉洞后边还有个新洞吧？”“听
说过！他们那个土匪县政府还在里边住过哩！”“对！我们就是
从那里来的！”接着他就从小兰走出来说起，才说到小兰入
洞，小胖爹打断他的话说：“你怎么知道那里有个洞？”这一下
把金虎难住了。他和铁拴放走张得福的事，铁拴吩咐他不准向
任何人说起。他正想编一个说法，小兰就把窝窝里的土挑上
来。小兰快上到口上的时候，有一两步太陡的地方蹬不住，就
喊着：“傻大哥！快来拉我一把！”金虎一听，就趁着去拉小
兰，老李洪说：“我来！你的腿还不能吃大劲！”说着就抢到
金虎前边去把小兰拉上来。金虎见小兰上来了，急着要到南边
看看，就催着老李洪说：“老叔！咱们先到那边去吧！”

小兰挑着土，三个人相跟着，金虎和小兰请李洪老汉谈着
家乡变化情况，穿过一段树林，经过了十多土窝窝，走到一个
也有小树林护着的土窝窝边，老李洪说：“路就在这里边！”
小兰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土窝窝？”老李洪说：“相传说
这是‘毒龙窝’，有三百六十个，都是大毒蛇住的地方。不过
据我知道，这山顶上根本没有蛇，直到东边下山的地方才有
蛇！”金虎说：“依我看这都是水泡下去的！我们也是从这么
个窝窝里钻出来的，说不定每一个窝窝下边都有石洞！”李洪
老汉领头，抓着树枝走下去，南边墙上密密的树枝下边露出洞
口，比金虎他们走出来的那个口大得多，人不用弯腰就可以走
进去。老李洪也和金虎一样，早就在洞口里预备下点火的东

西，不过不是松柴而是黄萝卜。他们走进去，只转了两个弯，一把黄萝卜还没有点完，南边就露了明。这时候，忽然听得好多种鸟叫，其中有一种特别好听。小兰问这是什么鸟，老李洪说：“我也不知道名字，是一种黑色的小鸟，不太怕人捉，有时候还会落到羊背上叫，不过你真要捉可也不容易捉住。”他们说话间就走出洞口。这边的树已经长满了绿叶，地上的草叶也已经长得护住了地皮。金虎说：“这边要比那边暖得多！”李洪老汉说：“对！我们从前找着这条路以后，在那边的草还没有长起来的时候，常把羊从这洞里赶过这边来放，别的放羊的在山头上看见了，干着急找不着路，喊着问我们，我们只说是从山前边上来的——其实山前边根本上不来。”

紧靠着洞口崖根就是树林。这边的林也与北边不同；北边是松柏树多，这里是青梗树多。老李洪给他们介绍说：“这树叫青梗树，也叫榲桲树，又叫榛树，有一种大叶子的可以放柞蚕，小叶子的结的果子干了落下来，外边的壳子叫橡碗，可以染黑布；老树下边能长木耳；木头硬得很，咱们常用的那青梗木楔把子，就是用这些小树做的。”这老汉虽然介绍得很详细，两个青年并不怎么注意听，等他说完，小兰却另提出个问题说：“那个子儿能吃吗？”老汉说：“这可没有吃过！”

“给我们找一个看看好不好？”老汉在周围看了一眼说：“这都不是结子的树！等碰上了我告诉你！”正走着，前边有一片土薄的地方，树也稀了、也小了，露出一块草坪，有一群石鸡在草里跑着咯啦咯啦乱叫。李洪老汉说：“停一下！我打个石鸡！”说着顺手拣起一块小石头，金虎也拣起一块。老汉说：“你可不要打！一打准跑！”可是没有等他说完，金虎的石头已经抛出去，果然没有打住，不过因为他的腰腿还不得劲，扔出去的石

头无力，只惊得飞起两三只来，飞了几步又落下去。李洪老汉说：“我说什么来？这回还算好，它们没有看见人，要不早飞光了！”老汉斜了斜腰，对准一个石鸡把石头抛出去，只打得那只石鸡怪叫了一声，拍着翅子跳了几步就不动了，其余的咯啦咯啦叫着一齐飞起，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李洪老汉跑到那只被打住的鸡跟前，用烟口袋上吊着的鱼刀先把鸡血放了。小兰说：“老伯伯！你这手可真准！”老汉笑着说：“抡了半辈子石头了还不该准？这地方的石鸡真多，一天能打好几只！我们这几天就凭吃这个！”他们继续往前走，穿过了这块草坪，又走进树林里。金虎拾起有墨水瓶盖那么大个东西来，见外边长着毛，里边光光地，问老李洪说：“这是什么？”李洪说：“那就是我说的那能染黑布的橡碗！”“怎么没有子？”“这东西一成熟了就裂开了！子掉在别处！”老汉在地上找到一颗子，拾起来递给金虎说：“这就是子！”金虎接过来塞进嘴里去一咬说：“怎么这么硬？”“傻孩子！这东西跟木头一样，怎么咬得动？”“也许能磨面吃！”“也许！不过到这里用不着吃这个！这里能吃的东西可多哩：有黄精、菜姜、甘藜、野百合、山慈、山韭、木耳、石鸡、锦鸡、鱼……”没有等老汉数完了，小兰先笑起来。小兰说：“老伯伯摆起酒席来了！”老汉也笑着说：“笑什么？要摆酒席真摆得起来！立秋以后还有松茸、蘑菇、猴头哩！”小兰说：“算了！这就够好吃的了！”他们说笑笑，已经走到下坡的地方，下了不多远就到了沟心。沟心流着一股小水，也把平平的石板上冲成了象茶杯粗细那样个濠濠，从上水往下水坡度也很大。他们又顺着水往下走了一段，走到个平处，靠西边有个水潭，似乎还没有灵泉沟新洞里那一池水大，不过靠墙的地方，水可深得看不见底，里边的鱼很稠密，

大约都不过一尺来长，都是红脊梁，一见人来都游到深水处去。李洪老汉说：“你看这鱼多不多？从这往下，有这么几十个水潭，都有鱼！”小兰说：“这要用石头打，我也打得住！”李洪老汉说：“你？我也打不住！想吃鱼得钓！石头可不能打鱼！”过了水潭又要下坡，李洪老汉说：“不要下了！我们就住在这崖上！”他先赶到头里引路，顺着左边的山崖，平平地走过去。他们才走了一二十步，金虎到崖边一看，离沟底已经有两丈多高了，再往前的沟还要低得多。金虎说：“前边那沟好象比灵泉沟还要低了！我们来的时候，好象也没有上过这么高的坡！”李洪老汉说：“这和灵泉沟根本挨不着！灵泉沟的水是往南走了，这里的水出去就转向东边了。”“从这道沟往下走，还出不了山吗？”“不行！沟里还有几丈高的高崖，水流得下去，人跳不下去！”“我们在那边山顶上怎么没有看见这条深沟？”“你们看见冒烟的地方就是这里，因为沟太窄，从那边山顶上看，只不过是一块平地中间有个黑道道。”正说着，就见前边的石坎里冒出烟来。李洪老汉说：“前边冒烟的地方就是我们家了！”金虎问：“那里也有洞吗？”“没有！这边是沙石山，连一个洞也没有！我们就住在石坎里，跟在老羊坎差不多！”

他们还没有走进石坎，就见张得福的女儿小秀抱着铁拴的小孩子走出来。金虎问小秀说：“怎么你们两个也在这里？”李洪老汉说：“他们也搬来了！”小秀见了小兰自然也很惊奇，免不了问长问短；金虎和小兰没头没尾答应着走进了石坎。小胖娘见了这两位青年，又悲又喜——喜的是老邻居的儿女失而复得，悲的是自己的小胖去向不明。大家坐定之后，老李洪问小秀：“你娘哩？”小秀指着铁拴的孩子说：“我娘和他娘

拔菜去了！”小胖娘说：“小胖媳妇也去了！”小兰和金虎一齐问：“我们的家怎么没有搬来？”李洪老汉说：“你们两个人的娘，不知道为什么舍不得灵泉沟那个饿死人的地方，说死说活不肯往外走！”又向金虎说：“偏说你爹不能动，只要你娘愿意出来，我和你娘抬也能把你爹抬上山来！”金虎说：“是呀！况且也不用你们两个人抬，还有铁拴哥和小胖哩！”“唉！不用提他们两个了！”“怎么样？”“他们去支了一趟差，就支得没有下落了！”小胖娘一听提起小胖，就又落下泪来。金虎说：“不要怕！支差这事真说不定遇上什么情况。去年我去支差不是也走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吗？我想过几天他们会跑回来！”“自然希望是那样！”“我爹我娘和小兰娘都住在哪里？”“都住在你说的那个新洞里！”金虎和小兰，自从警察搜索新洞以后，还不知道后来的变化，金虎想趁此机会打听一下，就问：“新洞不是被他们的公安局占了吗？”李洪老汉说：“你还不知道哩！他们那个公安局起先只是说到里边搜查一个人，后来他们县政府那伙忘八蛋就一齐搬进去住……”“他们搜查的那个人搜着了没有？”“没有！听说可能是被水冲走了！听说还冲走了一个搜查的警察！”小兰听到这里，哈哈地笑起来。老李洪看了她一眼说：“傻闺女！笑什么？”“笑什么？其实里边藏着两个人哩，他们只知道一个！”说着又笑了。老汉想了一想就猜透了说：“原来就是你们两个人吧？”金虎接着问他们家里的情况，老汉说：“不忙！我倒得先听一听你们是怎样上山来的！”金虎扭不过他，只得把新洞里的故事，除了放走张得福、打死杂毛狼、冲走文件三件事以外，都向他粗枝大叶说了一遍。李洪老汉听完了说：“想不到石头里边还有那么大的世界！怪不得你们两个人的娘不愿意离开新洞，也许她们还以为

你们两个人能从洞里出去。”金虎说：“可惜没有电筒了，要不真还能从那一头出去！你把外边的路告我说，我明天回去看看她们去！”“不要忙！象你这腿，现在还不能走那个路！我会整骨头。等一会吃点东西，我给你把那块胯骨捏一捏，歇几天你好回去！”

这时候，已经后半晌了。老李洪把新打来的石鸡交给小胖娘说：“剥一剥和前晌打的一只一同炖上，我去烧火熬盐去！”金虎问他盐是怎样熬法，他说：“先挑一挑水来，把土化开、澄清、去了土，把上边的水在锅里熬干，就熬出盐来了！”小兰说：“我帮你挑水去！”金虎说：“我看不如把土再挑到水潭边，把锅和水桶也拿去，就在那里烧起火来熬。”老汉说：“谁要再说金虎傻，算他认不得人！那里离得水也近、柴也近、地方又宽绰，多么方便啊？我看不如连鸡也拿到那里炖去，一会她们拨回野菜来也在那里煮。”小兰说：“依我看锅碗家具也不要往回拿，只要是晴天，白天就在那里吃饭，晚上再回这里睡觉来；下了雨好回这里做饭来！”老汉说：“好！我就是个好干新鲜事的人，你们想得比我还新鲜！就那么办！在这地方，有什么家具爱放哪里放哪里！放下黄金也丢不了！”

大家就依着小兰和金虎的话，把做饭家具都搬到水潭边来过日子。太阳快落的时候，拔野菜的也回来了，鸡也炖成了，鸡汤里放着些山葱和木耳，闻着喷香，看着也顺眼，只是盐还没有熬干，李洪老汉就把快熬成的盐水舀了一点放在鸡汤里尝了一尝说：“好！有了盐就比前几天那个好吃多了。”山葱这东西，在山里人吃起来，不只抵调料，而且抵菜，没有粮的时候还能抵粮。这东西，说是葱，其实只有点葱味，长得不象葱——是一个长把子上长着一片单叶子，象中药里边的藜芦，而且常和

藜芦生在一个地方，一不小心把藜芦当成山葱，就会吃出事故来。闲话少说。他们这一锅菜，说成山葱熬石鸡，不如说成石鸡熬山葱，因为主要的东西还是山葱，要它也抵菜也抵饭。老李洪宣布了开饭，每个人都拿到了一碗石鸡熬山葱。

小兰一边吃着一边跟金虎说：“把咱们的山药蛋拿来一些熬到里边就更好了！”李洪老汉不知道他们在山上发现了山药蛋，还以为是指家里留的山药蛋种子说的。他说：“要不是因为二三十斤山药蛋，我们还许来不到这里哩！”金虎和小兰都觉得奇怪。金虎问：“怎么为了山药蛋，就到这里来了哩？”李洪老汉说：“小胖他们走后不几天，下了一场雨也没有下透，有山药种的，都抢着先种山药，我的和铁拴家的那点山药种没有剜出来……”说到这里，有点小事情要向没有种过山药蛋的人交代明白：一个山药蛋上边不是有好几个凹进去的窝窝吗？每一个窝窝，就是个要长芽的地方，种的时候，用刀尖把每一个长芽的地方剜出一小块来作为种子，把其余的部分又都做菜吃了。这是从前的老种法，大跃进以后怎样种，可还没有研究过。老李洪说山药种没有剜出来，就是说还没有把它一块一块剜下来。闲话少说，咱们还是接着听老李洪的话吧。老李洪接着说：“……可是地里那一点渗，种得慢了就干了。那时候，咱们四家只有我一个人会摇耩，我说：‘你们妇女们在家剜山药种，我先把咱们留的那点谷种种到地里，明天再种山药蛋！’我前晌在地里种着谷，见人家别人刨窝窝种山药蛋，觉得有点着急，因为山药蛋早一点种好，可是到了后晌，就觉着幸亏前晌没有种——他们那县政府有些忘八蛋，把人家前晌种下去的山药种刨出来当野菜吃。我想：‘这还成他妈的什么世界？干脆，把咱们那点山药种拿上山去！这地方不能住了！不论种上什

么，谁知道自己吃得上吃不上？”就这样我才回去和大家商量上山。你娘和小兰娘都不愿意来。她们说叫我们上山来种山药，吃野味，她们在家里锄拔那种下去的几亩谷，到了秋后谷子要收了叫我们还回去，谷子要丢了，她们好上山来！”金虎听了这话说：“这么说来，灵泉沟真不能住了！过几天我回去把他们都接来好了！”小兰问：“这里种了多少山药？”老李洪说：“一共也不够三十斤种子，种了一小片。这地方就是山药蛋收成好，可惜没有种子！”金虎说：“这个不愁！我们那边有种子！”老李洪问他们哪来的种子，他们把他们发现野山药的事说了一遍。李洪老汉说：“奇怪！山药蛋哪里会有野的？”等到他打听清楚那个有野山药蛋的地方以后才点头说：“我知道了：那地方在三十年前还有两户种山地的，也许是他们种的山药蛋没有刨尽，后来就传下了种。”金虎说：“那不就成了野山药蛋了吗？”

李洪老汉说：“既然有这种东西，我们明天就去把它挑过来种！”小兰说：“咱们就种在那边还不一样吗？”李洪老汉说：“这一回可不能听你们的！你们不了解情况。这么大一个阎王脑，只有三条路可以走人：北边的一条路不成个路形，很难走，只有很少的常在这山上放羊的人知道，问题不大；西边的路走到和去灵泉沟那条路岔路的地方，一直正西下去，可以走到日军占的地方，东边一下山，就有日军修的碉堡。我们要住到那边，万一日军要从这山上穿过去，就有些不便。我们住在这边保险得很——除了我和张得福，是谁也走不过来的！”小兰说：“我们两个人不是已经走过来了吗？”老汉笑了笑，也不和她斗嘴，只说：“我们明天就去挑山药蛋去吧！你们有什么行李也都顺路搬过来！”提到行李，金虎和小兰一齐笑了。

金虎说：“我们的行李就是一把劈柴斧！”

十二

有山药蛋熬石鸡吃着，有李洪老汉这个正骨大夫守着，金虎的胯骨又待了个把月就完全好了。这天金虎要回灵泉沟探他的爹娘和小兰的娘，小兰和山上的人们给他准备了一些礼物，让他带着回灵泉沟。

金虎在路上住了一宿，第二天晌午就到了灵泉沟。他没有回田家湾，直接就到新洞里。一进洞口，见进口偏左一点烧着个柴火灶，他娘和小兰娘守着灶火上的口煮菜锅坐着，他爹躺在个白草铺上。他娘听见洞口的脚步声，也毫不惊怕，只懒懒地问了一声：“谁？”金虎听见是他娘的声音，赶紧喊：“娘！我回来了！”两位老太太一听，猛一下都站起来：“金虎？”“是我！”金虎娘向小兰娘说：“咱们又等着了！你的糊涂主意使上了！”原来自从那个土匪县政府搬出去之后，有好多在山上住的老百姓搬回这洞里来往，后来那些土匪们和村里驻的土匪兵都走完了，大家又都各自回了家。大家往外搬的时候，金虎娘主张也搬回去，她说：“不用等了！人要还在里头的话，有一百也饿死了！”可是小兰娘不。小兰娘说：“搬到哪里也是吃树叶！我只当给小兰守坟哩！你们走吧！我一个人住在这里！”金虎娘自然不能让她一个人在洞里住，所以就一同留下来。有些好心好意的邻居们，到地里去，路过这里的时候也常好来看看她们，每天差不多都有人来，所以她们听见有人来并不觉惊奇。小兰娘只见金虎不见小兰，并且见金虎是从外边来的，便问：“你是怎么逃出去的？小兰逃出去了没

有？”“都出去了！”“小兰哩？”“在山上！”“哪边的山上？”“在阎王脑！”“不管在哪里吧，总算把这一条孤根儿留下了！”小兰娘心落实了，反而流下泪来。金虎爹只有一只眼睛和一个耳朵管用，还放在下边靠着枕头，洞里的火光又不太亮，直到人家都答了话，他还没有弄清楚是谁，可是听见人家讲话，他又想马上打听是什么事，所以卷着个舌头问长问短。金虎娘望住他的枕头说：“金虎回来了！”金虎也抢过去说：“爹！我回来了！”小兰娘又从灶里抽出一根带火的柴来照亮了金虎的脸，金虎爹这才认出：“金虎！你还在呀？”这老人家本来淌着泪的眼，泪流得就更多了。小兰娘问金虎和小兰怎么逃出去的，金虎娘说：“我看咱们还是先搬回田家湾去再说吧！那里总比这里明亮一点！”金虎说：“马上也就说不清楚！既然土匪们都走了，咱们就回去吧！”金虎娘说：“咱们把这一锅榆菜吃了再走！”金虎说：“枣树院叔叔还给你们捎来些好吃的哩！”“你们碰上了？”“碰上了！堂屋嫂和东院婶婶都在那里！”说着就把山上带来的礼物从一条破口袋里掏出来——一捆煮熟了又晒干了的山葱（这东西就是这种吃法，干的比鲜的好吃），三只熏鸡和一小布包盐。这些东西，在灵泉沟人看来都是宝贝。

他们吃过饭，就要搬家。金虎问：“咱们的驴儿在哪个坡上？”金虎娘说：“哪里还有驴？早被土匪们杀吃了！驴也没有了，行李也不多了——只有些破锅烂碗！咱们走两趟：先把东西送回去，给你爹安插好睡的地方，再来抬你爹！”

趁着平常应该睡午觉的时候，他们就把家搬回去了。田家湾的人大部分都逃荒走了，剩下的几家邻家见金虎回来都来问候。金虎一方面感谢大家，一方面仍得和大家说谎——说是被

军队抓了差，直到现在才逃回来。

大家都正在金虎家的南房门外阶台上坐着问话，刘家坪的张兆瑞来了。张兆瑞也不象从前那张兆瑞：头发又白了好多，眼窝也陷下去了，手脸也都黑了，衣服也顾不上洗了……一身倒霉劲。大家正围着金虎问长问短，见他进来了，话头就少起来，不过大家对他们村公所那些人的威风，已经不大认账，除了金虎娘这个做主人的懒洋洋地让他坐下之外，别的人都没有和他打招呼。他坐下之后，见大家不多说话了，就先声明来意说：“大家该谈什么还谈什么吧，我是来闲坐的，没有什么事！”其实他这声明是假的。他还是来给刘承业办事。大家也常说他这个神婆子走到哪里也会带一些鬼来，所以都想先找一点顶门杠子的话顶他一下。金虎娘是个会随机应变的人，马上想出关门的话来说：“有什么谈的？还不是谈夜里该吃什么？能吃的都叫外边来的人吃光了，我们这些腿短走不出门去的人不是活该饿死吗？”张兆瑞本来要先说别的事，见金虎娘提起没有吃的，也就引起了他的心病话。他说：“现在谁也不用告诉谁！有的也光了，没的也光了！灾荒年过了多少，也没有今年苦！你们知道，往年我的粮食要往三水镇卖多少趟，谁想到现在连树叶也没有本事弄下来！”金虎娘本来和他们这些户儿开不着玩笑，这时候也想趁势讽刺他几句，就说：“你不要堵门子！我们也不敢向你借！借了也还不起！”张兆瑞却又一本正经地说：“唉！有头发的谁肯装秃子？从前遇着灾荒，我虽然不象刘家那样趁着东西便宜置房买地，却还没有断过粗茶淡饭，从来也没有弄得象今年这样倒霉！粗糙粮食咱原来也还是有几颗的，可是叫人家替咱吃了！”有个人故意说：“我不信！你们成天给军队办事，军队还会把你们的粮要光了！”

张兆瑞很伤心地说：“喂不熟，喂不熟！都是只认粮食不认人的！”金虎娘又说：“就算没有粮食，你还和我们不一样！你给刘家办了半辈子事了，他们吃着能叫你饿着？”提起这个来，张兆瑞略略摇了摇头，好象有点伤心，不过他觉着当着这些人的面，不是他诉苦的地方，只“唉”了一声，没有再往下说。旁边一个老太太，见张兆瑞提起刘家趁着灾荒年买东西，又见金虎娘说他给刘家办了半辈子事，以为他是来给刘家买东西来的，就想起卖东西来。她说：“张先生！我求你给我办一点小事：我房后那棵大杨树，求你给我说一说卖给刘家。全灵泉沟还数我那棵杨树大！只要一斗米——好年景三石米我也不卖……”“不行了！他今年连一分钱东西也不买了！他也说他的粮食叫军队要光了！”“你不要推辞了！要是嫌贵，还可以少一点——不过一斗米已经是太便宜了。张先生！我知道你没事不到我们这里来！要房要地我没有！木料也是钱！就请你给我办办这点小事吧！”张兆瑞说：“真不行！我倒是来给他们办事的，不过不是办这个事！”金虎娘已经给他顶上了顶门杠子，大家又都真穷到开不了锅了，所以不止不怕他再讨走了什么东西，反而想听听他又来给刘家办什么事。有个人冷冰冰地说：“我想在如今这个时候，除了给他买点什么，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办呀？”张兆瑞是个说客，很会随机应变找出打动人心的话来。他说：“怎么没有别的事？大家饿着肚子没有吃的，难道不是大事吗？”金虎是个好说直话的人，他说：“没有吃的刘家给发粮吗？跟我们要粮倒要得凶，发粮还没有见他发过！”“倒不是发粮，是发地！二先生（指刘承业）说：‘村里人逃走了好多，丢下了好多租种地，可以拣好的换给现在留在村里的佃户。要荒也先尽坏地荒，不要把好地荒了。’我想

你们田家湾租种的都正是二先生的坏地，所以来和你们商量一下给你们换换！”刚才想卖树那个老太太问：“要是人家还回来呢？”张兆瑞说：“二先生说‘换过就算换过了！他们回来叫他们种坏的！谁叫他们不安心在家哩？’”这些话猛一听起来，好象刘承业对这些没有逃走的佃户特别关心，可是这些佃户已经和他打了多年交道，对他这人早已摸得透熟，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好心肠，不过是为了秋后的地租打算。金虎娘说：“好地也罢，坏地也罢，今年反正没有指望了！咱这地方的俗话说：‘伏不掩籽’。现在已经入了‘头伏’五天了，还种什么庄稼？我看什么地也不要种了！”张兆瑞说：“夏秋两季还有点树叶，到了冬天吃什么哩？咱这地方还有两句俗话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荞麦不用盖。’早的误了还能赶一季晚的。二先生想请你们各位租户一会到他家里坐坐，谈一谈今年的地还是怎么种好，怎样给大家把那些最坏的地换换！我还要到白土嘴去打个招呼，你们一会就请到刘家坪去吧！”他把他的话说完，就离开金虎家院里。院里的人一等他出了门，就纷纷议论起来：“刘家把威风使够了，现在又想起种地的人来了！”“我看是饿醒了！”“他可没有饿着了，后院那个靠山的暗窑连口还没有开哩！粮食有的是！”“旅部住在他院里，还会给他留下粮食？早就刨光了！”知道底细的人说：“没有刨着！旅长的勤务兵住在有暗窑那个房子里，就没有找着窑口；兵走了以后还不到一个月，他自己能吃多少？”……一谈到去不去刘家坪的问题，有的主张去，有的主张不去。金虎娘说：“不用上他那当！咱们吃的没吃的，种子没种子，时间又这么晚，牲口也叫他们那些土匪们杀完了，地还不知道种得成种不成，种上了到秋后又不知道谁来抢吃，他可要跟咱们要租。依我说去

也可以，地咱不换，没有种上的趁这回给他交回去，荒也让他去荒，免得秋后跟咱麻烦！谁有法子想还要出去逃荒？人家除在外边受了苦，回来再给人家换些坏地，咱的心上也过不去！他有本事他自己去种，要不就让它荒着等人家回来再种！咱犯不着夺咱们自己人种的地！”大家听了金虎娘的话都觉着有理，就都往刘家坪交地去。

他们到了刘家坪，别的庄上也有些人去了，只是村里人本来只剩了二十来户，除了不去的，也不过只到了十来个人——金虎娘没有去，只打发金虎去了。

这时候的刘家院已经不象从前那样神气了：村警都跑光了，刘家的佣人都打发了，刘接旺已经通过他姨夫的关系到伪警备队当参谋去了。整个一座刘家大院前后中院只剩下刘石甫和刘承业两家五口人，接旺媳妇也亲自上碾上磨做饭洗碗了，院里的花也没人浇了，家里的猫也都懒得喂了，青草长上了阶台也懒得拔了，炉灰渣堆到墙角下也不往外送，洗碗水洗脸水也都满院泼，苍蝇嗡嗡地满院飞……院子倒是好院子，只是好院子住成这样，就更能看出他们的倒霉劲来。刘承业把客人让在中院的阶台上坐，自己却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对面。刘石甫没有参加他这个“盛”会。张兆瑞自己又到屋里搬出个方凳子来坐在刘承业的旁边。刘承业又把他那换地的假慈悲话重复了一遍，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把金虎娘提到的那些季节晚了、没有种籽、没有吃的几个问题提出来。刘承业说：“我看先把地换好，那些事情咱们一件一件商量。”金虎赞成他娘在家说的那不换地的话，就先向刘承业说：“地不能换！出去逃荒的人已经够苦了，回来我们再把人家的好地夺了，都是个租种地的，那象什么话？现在没有种上地，不是因为地不好，是因为

人家捣乱得我们种不上……”一提这个，大家的看法都一样，没有等金虎再往下说就都各自发表起自己的观感来：“对！不是咱不种，是咱种上人家给咱刨了！”“不用说换好地，就再比咱种那地坏一点，能早早种上的话，已经该出穗了！”“也不旱、也不涝，都是人误了！”“……”

刘承业的目的就是想鼓动大家把地种上，免得到秋后自己落空，说换地不过是个引诱的话，见大家不在乎这个，也不坚持，就拨转话头说：“不换也可以，咱们就谈谈怎么种吧：现在种谷子种玉菱都晚了，种荞麦就再迟半月还赶得上。我看最好是种荞麦——面好吃，产量也不太小，时间又赶得上……”有人说：“没有种子！”刘承业说：“这可以想办法！军队不会吃荞麦，没有把我的荞麦要去，不过可惜没有多少，要好好计算一下借给大家。你们先报一报谁能种几亩，让张先生替我开下个单子来，我研究一下再给大家分配！”他怕谁分得多了种不了吃掉。接着他问：“这样可以吧？”好象还很民主。

金虎问：“还出租不？”刘承业想：你这傻鬼！不缴租我请你们来干什么！不过他没有这么直接了当说，他只是冷冷淡淡地说：“那当然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了！”金虎说：“那可不行！种谷打多少？种荞麦打多少？租约上写的是死数目，种荞麦连那个数目也打不够，我们还吃什么？”刘承业想：这傻家伙怎么还知道这么多？可是他还想开开金虎的玩笑，就故意让金虎出主意。他问：“依你说怎么办？”“依我说打多少算多少，按成分账！”刘承业觉着奇怪，他又看了金虎一眼，想：你懂得什么叫按成分账？他又问：“怎么个分法？”金虎说：“打下荞麦来以后，除了你的种子，其余按二八分，我们得八成你得二成！”刘承业说：“你比共产党的减租办法都减得多

了！真是共产党员的哥哥！等共产党来了你再是那么办，我没有说的！现在还不是那样时候！”一个老年人替金虎解释说：“金虎说的我看也不是要减二先生的租。荞麦这东西收成薄，种谷子对半分也够吃了，种荞麦我们就分八成也不见得比谷子那一半多。要是种一季庄稼，末了还是个没吃的，不是都提不起劲来吗？”刘承业说：“你们分八成才够吃，我分二成该吃什么？”金虎说：“我们分八成只是各家分各家种的那一点，你分二成是每家都分给你二成。你几口人，我们几口人？”“你倒也不傻！会算账！可惜地是我的，不能由你算！要是你们的地，我连一成也不分你们的！”“我们要不种你能分几成？”刘承业站起来指着金虎说：“你这个傻瓜！让你说几句话你就认不得你是谁了！不种我的地你吃屁吧！我分不上你吃得上吗？”金虎这时候也知道他已经没有村公所和土匪军队那两座靠山了，就放开胆子顶住他说：“不种地我们又不是坐着饿肚子的！树叶也能多采它几筐子！地给你交回来，租约退给我，我去采树叶去！”“树叶也是我的！你姓田的在灵泉沟只有那一座房子！”“树叶是谁采到手算谁的！你要说太阳也是你的，我们就该钻洞吗？”“你抢了我吧！依你说什么东西都没有主了！没有想到漏了你这么个共党分子！”“是共产党你又怎么样？你还嫌没有把灵泉沟人害完吗？”刘承业又指住金虎放开嗓门子去骂，可是一张开嘴，气又喘不上来，憋得他又坐回椅子上去。这时候，张兆瑞抢到他跟前给他揉胸，劝他不要和金虎这个“傻瓜”较量，那个老年人怕金虎惹出事来也劝金虎少说几句，忙成了一阵才又稳定下来。张兆瑞劝刘承业继续和大家谈下去，刘承业说：“我先把金虎家的租约退他叫他走！和别人谈不谈不与他相干！”说罢就回房里去找租约。金虎见

他要单独收回自己租的地，就想趁势再把他娘在家说的那话说一遍来提醒一下别人。他说：“退了痛快！我早就不想种了！这样晚的时候，种上地还不知道成得了成不了，成了还不知道自己吃得上吃不上，耽搁得连树叶也采不到手，回头他还要租，我图的是啥？”刘承业在屋里听见这话要坏事，隔着门嚷：“你小子少说两句废话好不好？”金虎在院里顶他说：“一个人长着嘴就要说话！”刘承业知道已经压不住金虎，再说得多了让他越顶越丢人，就不再接他的下音，匆匆忙忙把他的租约找着，拿出院里来递给他：“给你给你！”金虎接住租约正往外走，刘承业顺口补了一句说：“拿上走你妈的！”金虎连这也不让他，回头顶了一句：“你妈的！”刘承业后悔他自己不该多补那一句，还想再说句什么争一争面子，可是还没有等他想好，金虎就胜利而去。

金虎去后，会仍然又开下去。金虎的话已经打动了好多人。好多人想到地不能种了。刘承业说：“不按租约出租也可以，不过不能象‘傻瓜’说的那二八分。大家也得替我想想！我……”白土嘴一个人站起来打断他的话说：“二先生！按几成分账我都没有意见，只是我的腿在前几天受了风，不能着重，说不定几时才会好。我看把我租种的地也让给别人种算了，等我的腿好了，二先生再租给我一点别的地种！”“你的腿好了，别人把我的地租种完了你怎么办？”“不会！二先生的地多得很！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也只好另想法！”他这么一说，跟着又站起来好几个人来，有的说“家里有病人”，有的说“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虽然理由不同，目的都一样，都想把地交出来。刘承业有点为难。他想：“这一定还是嫌租重，可是要照金虎说那二八分的话，一行开那个规矩，以后就

再不容易涨起来了。”闷了一会，他想不出别的主意，最后想到二成也比放了空强一点，就赌了赌气说：“好吧！就按二八分！这可没有说的了吧？”有些人同意了，有些人还坚持要交地。这时候，天快黑了，刘承业向那些要交地的说：“你们究竟为的什么？就为的和我呕气吗？”那个老年人说：“不瞒二先生！说实话是大家光吃树叶做不了活。二先生是不是能特别开恩每家借给几斗粮食呢？”这老人说得虽然十分客气，刘承业一听可就火了。他想：二成荞麦还不知道能收几颗，每户倒先要借我几斗！到秋后你们还不起，我能把你们怎么样？不行，这个要求不能答复。他说：“往年大家也不是没有借过我的，只是今年不行！军队在这里住着把什么都吃光了，我自己还是在囤底扫了一点土粮食吃的。不是不借，是没有！”白土嘴那个人说：“我也知道二先生没有，所以就不敢张口。还是请二先生把租约还我吧！”刘承业见希望不大了，就又赌气说：“好！交地就交地吧！”另有些人说“我也交”、“我也交”“……”

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走来了原来的一个村警。他走到刘承业跟前打了个招呼说：“村长你好！”刘承业一见是他，就责备他说：“这一向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村里一点次序也没有，还有漏下的共产党，你们怎么那么心静地走开了？”“这个以后再说吧，有……”“什么‘以后再说’？”刘承业见他在自己面前这样大模大样地说话，实在不成体统，可是那个村警一点也不在乎，只是接着说：“有一位副连长要见你！”刘承业一听提起军队的人就有点头疼。他低声说：“就说我不在！”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位副连长和两个兵已经走进中院来。副连长问：“哪位是村长？”村警说：“这位就

是！”副连长向刘承业说：“对不起！我们来打扰你！我们连里的给养一时有点困难，请把你后院暗窑里的粮食借给我们用了吧！以后我们领来了再归还你！”刘承业想：你怎么会知道我后院暗窑里有粮食？想到这里看了村警一眼就明白了，暗暗埋怨说：“怪不得你大模大样地！原来就是你搞的鬼！”

这个村警，在刘承业他们看来，是杂毛狼死后最能干的一个，有人叫他是“狼羔子”，是从村公所散伙以后跑到部队里去的。前一些时候，驻在山里的兵不是常到接近平川的地方打给养吗？这些兵，开始还是以排、连为单位被上级派出去打给养，后来被派出去的部分慢慢都不和他们的上级联系，干脆各自成家，游到哪里吃到哪里，有的连他们自己原有的番号都不带了。在刘家坪驻扎的旅部，也是把人派出去都收不回来才走了的。这个狼羔子村警最喜欢那种局面；那些部队也都欢迎狼羔子这种人物，两下一凑合，狼羔子就成了红人。在开始，前山头的部队少、粮食多，到处可以敲诈出东西来，后来各部分都看到这种便宜，都到那地方去称霸，就变成部队多、粮食少了。狼羔子参加的这个部分，原来是驻在三水镇对过黑虎崖的炮兵连，这时候已经把炮埋了跑到前山头去当土匪。狼羔子帮着他们刨了好多窑洞，抢了不知道多少宝贵的东西，后来前山头再也找不到大批粮食，才想起灵泉沟刘承业这位老上司来。

狼羔子已经作了介绍，刘承业想跑也跑不了，张兆瑞趁着狼羔子还没有介绍出他自己名字来，一转身就往外跑，佃户们也都跟着往外走。那位副连长吩咐跟着来的两个兵说：“不要让他们走了！还有事！”这时候，张兆瑞和几个动身早的佃户已经走到前院，跟副连长的一个兵向外边喊：“不要放走了人！连长留他们有事！”前院门口有些兵挡住了门，连张兆瑞在内

都没有得走出去。

刘承业勉强装了一点笑容说：“官长！屋里坐吧！”副连长说：“不客气！天也晚了，我们还要赶路！请你先开了门让他们装着粮食咱们再谈！”“你请到屋里坐一会，我拨人给你装！”“不用！我们有人！”回头向一个兵说：“叫他们把口袋拿进来吧！”那个兵跑出去一传话，滴里瓜拉进来了好几十个兵，也有拿口袋的，也有只背着一条枪的。这些人不象一般部队那样见了官长先敬个礼然后等待命令，而是见人就问“粮食在哪里”，问得一些佃户回答不出来，只好说不是这家的人，而他们还都不相信。狼羔子这时候还起了点好作用。他说：“不用问他们！那都是些穷佃户！村长在这里！”拿着口袋的兵听他这么说，就挤到刘承业跟前来，跟着副连长把刘承业围住；其余的兵，有的站在旁边助威，有的随便到各个房间里翻箱弄柜。狼羔子露着得意的神气催刘承业说：“村长！你就把那个钥匙拿出来吧！”刘承业气得翻着白眼说：“好！你算升了官了！”“就这么一回事吧！你是明白人！”每个人背着一条枪，乱七八糟站下一院，刘承业自然再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好回房去取钥匙开门。拿口袋的兵跟着刘承业往后院走，中院里只剩下佃户们和张兆瑞。副连长说：“留你们没有别的事，请帮忙往外扛一扛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只好跟着扛。张兆瑞没有用惯这种气力，扛撒了一口袋，有个兵揍了他一枪把子。

大家帮着把粮食搬到大门外，早有十来个驮骡站在门外，骡子身上都搭着专为驮炮用的铁架子鞍。赶骡的兵叫佃户们帮他把粮食绑到驮子上，副连长也出来了，刘承业跟在后边送客。副连长点着名字叫两个兵：“王天庆！”“有！”“朱来

宝！”“有！”“咱们借的粮今天运不完，派你们两个在这里守着！”“是！”“别的一部分来借的话，就说是我们的存粮！”

“是！”刘承业一听这话愣住了。他想：怎么呀？拿了二三十口袋还不行？我的粮食算全部给了你们了吗？怎么说你们“借的粮食”还没有拿完？你们问过我吗？副连长也不管他是怎样想，只和他点了点头说：“麻烦你！明天见！”刘承业虽然也应酬着，心里却想：最好是明天不见！

抢粮的走了，王天庆和朱来宝留下了，佃户们也都离开了刘家坪。

刘承业送走了副连长，一回到自己房子里，就见接旺媳妇拉着他老婆哭。他问哭什么，接旺媳妇不说话，他老婆要说话又没说的。他一见这情况，知道是接旺媳妇吃了亏，也没有再往下问，只是摇头。一会，接旺媳妇止住了哭，刘承业就向他老婆说：“这地方住不得了！他们明天还要来，还留着两个人看管咱的粮仓——怕别的一部分来拿——看来他们非把咱的粮食拿完了不行。这些人咱惹不起！我看咱们不如逃出去——逃出去人总能不受伤！”他老婆说：“逃也没个逃处！”接旺媳妇抢着说：“娘！爹的话对！咱们马上就走，死到外边也比在家好！”刘承业说：“我看就逃到城虽找他二姨去！接旺也在那里，照顾一下也挺方便。”

话说到这里，三个人的意见就一致了。刘承业吩咐拣值钱多的东西随身携带一点，趁看两个兵向他们要了些面去做饭的时候，三个人就悄悄溜出门去跑了。

十三

刘家坪又来了军队，灵泉沟人谁也不敢不理。田家湾和刘

家坪隔着一条河沟正打对过，田家湾的人都跑到枣树林里看动静，别的小庄上也有到这里来看的。

田家湾有些人知道金虎到刘家坪去过，见了金虎，就问刘家坪来的部队是哪一部分，别的去开会的人为什么还没有回来。金虎见问，就在枣树底下叙述在刘家坪开会的情况，谈到他怎样顶住了刘承业，大家都很满意。只是金虎回来得早，部队来的事和开会的最后结果他都不知道。

说话间天已经黑了，早已挂在当头上的月亮慢慢亮起来。月亮下边看什么总不十分清楚。大家见刘家的大门外许多人马的黑影忙乱了一阵，又排成一个长条下了坡，知道是军队已经离开，至于往哪边走走了，因为转了弯，被岸挡得看不见了。又隔了一会，田家湾去开会的人回来了，大家就走出枣树林围上来问。有人把金虎去后刘承业怎样答应了二八分账，答应了借给荞麦种子，大家怎样提出借粮，刘承业又怎样推说没有粮，军队怎样逼着他开了暗窰把粮食拿走……洋详细说了一遍，大家更觉得痛快。有个人说：“粮食还厚得很！除军队拿走的三十多口袋不算，剩下的至少还有一百口袋以上！”成天吃树叶的人们，一听说有这么多的粮食，兴趣大得很，马上就纷纷议论起来：“真可惜，放着粮食吃不上！”“咱们吃不上他也吃不上！便宜了土匪兵了！”“现在咱们去借，刘承业准借给！借给咱们还能指望咱们还他，土匪兵吃了是一去不回头！”“他愿意了，有人不愿意，说还不是白说？”“我看咱们也可以和那两个留下来的兵商量一下。粮又不是他们的，又没有个准数，咱们少拿一点，他们的人再来了也看不出来。咱们可以先求他做个人情，他同意了再进去和刘承业商量！”“算了算了！那些兵还有通人性的？”“也说不定！他们也都是老百姓出身，不过是跟着他们的头儿学

坏了！难道不会遇上个通人性的吗？”“谁管去说？”“我明天去。”“明天人家的部队就来了！要去现在就得去！”“现在黑天半夜谁敢去？要是说顶了，那些家伙们是不留情的！”站在金虎背后的一个人悄悄地指了指金虎的脊背向大家呶了呶嘴，大家也都会意，都向金虎看了一眼。有个人说：“金虎！你支差支得多了，该摸得着这些军队一点脾气。你是不是可以去替大家打这一次交道呢？”金虎说：“跟他们说话倒容易——不答应不过成不了事，咱们也不贴什么本钱，只是要我去跟刘承业那老家伙打交道我不去！他的粮食都是咱们的！八路军打回来咱们再跟他算账，现在去他名下求情，我看还不如吃树叶！”有个老汉说：“我跟你两个人去！你管说军队，我管说刘承业！”金虎说：“那倒可以，不过两个人去也不行，得大家都去；这时候不能跟平常一样慢慢由他过斗、记账，只能是说的说，装粮的装粮，他要赶得上记就记某人取了一口袋，赶不上记就多拿几口袋也不算对不起他，因为他向我们要的那代购粮究竟给了军队多少、他吃了多少二毛，谁能查清他的账？我看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先到里边和那两个兵说着，你们大家三个两个地拿上口袋往里边走着，不说刘承业，就是那两个兵，见我们人多了，话也许就好说一点！”要是在常年，灵泉沟的人们见个拿枪的就躲得不敢露面，这几年，一来八路游击队在村的时候有好多年年轻人当过民兵，二来又被日军的扫荡和这些土匪兵的折磨也磨练出几个有胆量的人来，三来吃了几个月树叶实在不愿意把这一百多口袋粮食轻轻放走，所以有几个年轻人马上赞成了金虎的办法，有几个别的庄上的人也都自愿回庄上再叫些人来同去。大家商量好了，拿口袋的拿口袋，叫人的叫人，忙乱了一会，又都集合到枣树林里。金虎查点了一下人数，有

十四个人，其中有五个和他都在一块当过民兵。金虎分拨了一下谁先走谁后走，谁和谁走在一起，自己就先和那个老人动身往刘家坪去。

他们两个人走到刘承业的大门口，见大门没有关，就慢慢走进去。前院里每个窗户上都没有灯光，只有刘石甫的窗上红红地亮了一次，马上就又停了，大概是刘石甫在家吸旱烟。他们通过前院走进中院，见西南角上的厨房里有灯光，又听得咯咚咯咚响，就走进厨房去。那个名叫朱来宝的兵正站在案旁切面条，听见了脚步声，抬头一看，和他们打了个照面。金虎他们一齐向朱来宝打招呼：“还没有吃饭吗老总！”“没有！”金虎说：“我帮你做吧？”说着就走到灶前替他烧火。朱来宝说：

“谢谢你！”朱来宝只顾赶面、切面，炉里的火着残了锅还没有开，也正该料理料理了。老头儿见朱来宝这人很和气，就婉婉转转向他提出要求说：“老总！我们求你个事：我们这里去年遇了灾（其实没有遇过天灾，都是被刘家要光了），树皮树叶从春天吃到现在，饿得大家死去活来的。今天后晌，我们正来和村长商议借点粮食，你们一进来我们就再没有谈下去。现在我们还想跟村长谈谈借点粮食，你看可以不？”“村长的粮食都借给我们了！”“我知道！不过粮食很多，我们少借一点，你们的部队来了不会看出来！老总！你就救救我们这几十条命吧！大家壮子里都饿得着了火了！”“……”

他们谈着，其他的人也都断断续续走进来，也有在厨房里的，也有在院里的。有些人也哀求着：“老总救命吧！”“救我个命我一辈子也不忘你的好处！”……这朱来宝原来也是农民，当他长到十岁时候家里遭了灾荒把他的寡妇母亲饿死了，他才被一个贩卖人口的带到豫东卖给一家姓朱的农民当儿子。

“来宝”这个名字是朱家给起的。说起吃树叶他不外行，曾把他吃得脸肿到脖子根。他见来借粮的人有三、四个肿了脸的，就联想到当年吃树叶的苦处，心里有点活动。他正问来了多少人，忽见窗外有人打电筒，就听得那个叫王天庆的兵在院里喊：“谁！干吗这么乱七八糟的？走走走！”有个人说：“老总！我们是老百姓！”“干什么？”“向你们求个情借点粮！”“呸！都是你妈的什么眉眼！快滚！朱来宝！你他妈的怎么搞的？谁让你给他们开门？”朱来宝知道这家伙是个流氓，怕他对这些吃树叶的人再动手动脚的，就抢到厨房门口和他说：“快进来吧！不要那么诈诈唬唬的！你守着门，你问谁？”“我守门不守门你管得着吗？”这家伙什么毛病都全占，在部队里也常常欺负老实一点的人。朱来宝叫他帮着烧火，他说他要到前边守门；说是到前院守门，出了厨房可就溜到后院里去；见后院西房点着灯，进去一看没有人，就想翻翻箱柜；翻着梳妆台的抽屉里有些脂粉、首饰，知道是年轻女人住的房子，就想等着人家回来戏弄一番。前院的大门本来是他关上的，可是就在他玩弄着首饰等好事、朱来宝在厨房里和面做饭的时候，刘承业两口子和接旺媳妇就从中院北房溜出来逃走了。大门是他们三个出去开了的。王天庆在接旺媳妇房子里一边拿着一个戒指往自己的小指上套，一边静听着院里有没有脚步声，忽然听到中院里扑哩扑通响，脚步声倒是脚步声，不过不是他等的那脚步声。作贼心虚，王天庆觉着要等这些脚步声走进这后院西房里来，总然自己带着一条枪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不如先出去看看情况。他到了中院，打着电筒一晃，见是些拿着口袋借粮的老百姓，就放了心，骂起来。不过他不知道刘承业一家三口逃走的事，还以为是朱来宝开的门，所以骂过了老百姓，也顺路骂到朱来宝

头上。朱来宝也不知道刘家逃走的事，反以为是王天庆给开的门，所以就怪他说，“你守着门，你问谁？”王天庆听朱来宝这么一反问，还以为朱来宝已经知道他到后院去的事，所以又着急地说：“我守门不守门你管不着！”到这时候，朱来宝让了一点步说：“好好好！咱们谁也管不着谁！现在面条该下锅了。你进来！咱们煮上面条吃着再商量！”王天庆也饿得差不多够受了，听说吃饭也还感兴趣，就走进厨房里来。和金虎来的那位老人说：“金虎！你帮着老总们烧火下面条，我去找一找村长去！”

老头走进北房，北房里点着灯没有人；找到后院，西房点着灯没有人；叫了几声“二先生”，也没有个人应声；摸了摸别的屋的门子，一个一个都锁着；找到前院问刘石甫，刘石甫说“没有发明（就是没有见的的意思，是刘石甫的省城话）。”老头觉得奇怪，又返回厨房问朱来宝说：“村长一家人都往哪里去了？怎么一个也找不见？”朱来宝问王天庆：“村长他们出去了吗？”王天庆说：“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去看大门去了吗？”“没有！我肚子有点不舒服，在屋里睡了一阵子！”朱来宝问金虎：“你们进来的时候，谁给你们开的大门？”

“我们进来时候大门就是开着的！”老头儿说：“那还找什么？一定是跑了！”金虎说：“他们跑了就更好办！老总！你看村长也走了，让我们拿上点粮食，明天你们的部队来了不是谁也不会知道吗？你就叫我们拿上点吧！”朱来宝说：“你们有几个人啊？”王天庆说：“问那干吗？谁顾上跟他们搞那个麻烦？这对我们会有什么好处？”又转向金虎他们一伙人说：

“不成！上级没有命令，我们不能借给你们！快走吧！”老头说：“好老总！我们借在前，你们借在后，你们多吃些，我们

少吃些还不行？”“老家伙！你还要跟我们说理是不是？”“好老总！我知道你不说理，不过……”老头本来是想说“我不敢和你说理”，可是不知道怎么样一下说错，就说了个“我知道你不说理”。王天庆一听火了，没有等老汉往下说，就狠狠地举起巴掌朝着老汉头上打来。幸亏金虎手快，一把架住王天庆的胳膊说：“老总不要动气！要打你打我们年轻人！那么大老人可受不住你这一下子！”王天庆说：“你妈的，我要问他谁不说理？”朱来宝说：“天庆你少诈唬诈唬行不行？那么大老人家是你骂得的？人家要说理你不让说，是谁不说理？”“好！你是老善人！老善人该去修道去，谁叫你来当他妈个穷兵？没有上级命令，你拿粮食做人情，老子就不愿意！”“粮食是你家的？什么上级下级的？你不是不知道咱们是什么队伍！”“不愿意当土匪为什么你不滚开？土匪又不是没个头儿！不服从命令照样枪毙得了你！”“枪毙也轮不着你来毙？我就要把粮食借出去！”“你要起反我就管教得了你！”“什么叫起反？”“不服从命令就叫起反！”“抢人家的粮食不算起反，借给人粮食倒算起反！谁给你定的这法令？”朱来宝说到这里就向门外喊：“大家都去装粮食去！有什么事朝我说！”王天庆从背上卸下大枪来，抡转枪托往朱来宝的顶门上打，朱来宝忙向旁边一闪，王天庆的枪托子打在地下。朱来宝的个子瘦小一点，王天庆不把他放在眼里，就丢下大枪，双手把他抱住正要往地上按，没有想到这一下又激起了金虎的愣劲。金虎见朱来宝要吃亏，就抢到王天庆背后，双手把王天庆连胳膊带胸部抱在一起，好象给他上了一道铁箍，任他怎么挣脱也挣脱不了，只得丢开抱着朱来宝的手。朱来宝气极了，顺手抓起案上的厨刀用刀背向王天庆的顶门上打。虽说是个刀背，王天庆的脑盖也抵

抗不住，只挨了一下，脑袋就耷拉到一边，全身的骨头马上都软下来，金虎一放手，他就软软地倒在地下。大家见这情况都愣了。朱来宝虽说跟着他们胡混了几年，可还是个老实人。他摇了摇头，唉声叹气地说：“真没有想到今天夜里会闹出人命事来！这样吧：我闯下的事我来顶，大家不要怕！大家既然是为借粮食来的，还是去拿上些粮食回去吧！”那位老人向大家说：“我看这粮食咱们不可以拿了！这位好老总为了咱们弄出事来了，咱们再要拿走一部分粮食，不是给他加麻烦吗？”朱来宝说：“已经惹下了大麻烦，就不在乎那点小麻烦了！”金虎说：“我看也可以没事！你不要回那部队上去，不就完了吗？”朱来宝说：“那个我也想到了，不过我一走开，事情就成了你们的！我老实告诉你们说：我们那部分军队现在已经变成了土匪！你们要打死他们个人，他们会来把你们的家抄了。大家来借粮，粮也没有借上，我给你们惹下一场祸，我觉得实在有点过意不去！你们走吧！还是我一个人来顶！你们就是不拿粮食，他们也不会放过我。我看还是不如拿上点！”大家听了他这番话，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眼眶里都骨碌骨碌落下泪来。老汉说：“我的好老总！一万个人里边也遇不到你这样一个好人！”金虎说：“老总你不要回去了！我觉着有办法！我们把他抬出去埋了，你不说、我们不说、村长他们一家子又不在，没有人会知道。你再一走，你们的部队来了，不过以为你们两个开了小差，也碍不着我们的事！”朱来宝自从金虎帮他抱住了王天庆，就已经感激得很，现在又听他想出一条很周全的计策来，越发觉着金虎是个十分难得的朋友。他说：“老弟！我也学那位老人家说句话：一万人里边也遇不到你这样一个好人！这会我完全听你的！请你再帮我一次忙，咱们把这个该死的东西

抬出去埋了！”有个跟金虎在一块当过民兵的青年说：“用不着你们去，我们几个人也办得了这点事！”金虎说：“不要忙着处理他！他自己已经不会跑了，别人这会也不会去报告！依我看，事情既然闹出来了，就索性再闹大一点：现在这地方的村公所、县政府、军队，还有到山里来扫荡的日本人，根本都是土匪！我们的家，早被他们抄得再没有什么抄头了，还有什么怕的？这里的米面锅灶都现成，我们不如先做上一大锅饭大家都饱饱吃上一肚，吃饱了就搬粮食。要把这里的粮食一齐搬到新洞里，够咱们全村剩下来这二十来户吃一年！”有人问：

“要是军队找来了哩？”“找来了我们不过钻山！只当土匪军队多来驻了一回！只当日军多来扫荡了一回！有什么了不起的？”

“要是找着了粮食哩？”“找着了他们不过搬走，我们不过还吃树叶，也不算赔本！我们现在不就是吃树叶吗？可恨我们民兵的武器都叫他们搜去了，要不他们来了我们把洞口一堵，吊上些手榴弹，埋上些地雷，连粮食也损失不了！”又一个当过民兵的青年说：“你才回来还不知道哩！现在的武器可多得很，光他们那个公安局丢了的、埋了的大枪和手榴弹，就比咱们民兵原来的多得多！有些人见了悄悄拾回去不敢叫人知道，有些人拾起来又埋到别处不敢拿回家去，有些人见了连拾也不拾。光我一个人就拾了两条大枪、五个手榴弹，都还埋在外边哩？”他这么一说，别的人也报起数来——你三条、我两条，你两颗、他三颗；你一排、我两排，步枪、手榴弹、子弹，马上报了一大堆，不过没有别的枪支。金虎听说有这么多的东西，越听越起劲，听着听着他就又想出好主意来。他说：“有人有家伙，我们的粮食保证丢不了！刘承业说我是共产党，可惜我不是，不过我想咱们可以共几天产；我们今天夜里先把这里

的粮食倒出去，倒得新洞里，明天和全村各户商量组织一个大灶，谁愿意参加咱们的大灶，就都搬到新洞里去住。咱们把愿意参加的人组织一下，分一部分人管咱们已经种上的庄稼，一部分人打柴，一部分人做饭，一部分人站岗，还有些什么事想起来再说。咱们把老羊坎露天的那一面修上一堵墙，有什么动静就把老老少少行动不方便的人先撤到那里去住，让民兵守洞，万无一失；真要有大部队再住到咱灵泉沟，咱们就一同撤上阎王脑去住，那里更有保险的地方！”有人问：“明天的部队来了要攻新洞怎么办？”“只要有枪、有手榴弹，只用两个人守住里边的套间，有一千人他们也攻不进去！”“要是人家把洞口堵了哩？咱们也出不来呀！”“不怕！里边有出路！路不太好走，不过只要有电筒，年轻人是可以走得了的！”“没有路吧？”“有！”“你怎么知道？”“我走过一次！”“出去是什么地方？”“阎王脑！”四五个青年民兵高兴得闹起来：“真要是那样，来一万人也不怕他！”“干！我们把灵泉沟守住，连刘承业也不让他再回来！”“除了八路军，谁来了接谁！”“……”朱来宝说：“我叫朱来宝！原来也是吃过树叶的老百姓！你们真要能这样干，我也不走了！请你们帮我换一套便衣，我参加你们的队伍！”大家都说：“欢迎。”金虎说：“那好得很！请你教我们练武！”老汉低声说：“咱们把声音放低一点！刘石甫还在前院哩！”金虎也放低声音说：“对！我们就把他忘了！”有个青年说：“我们先把 he 收拾了吧？留下那么个不干不净的东西没有好处！”他这一提，有好多人先赞成。金虎想了想说：“刨一镗头也是动了一回土，打个窑也不过是动了一回土！干就干了他吧！咱们不收拾他 he 就想收拾咱们！干！我去！”金虎拾起王天庆的大枪，一个青年又取了

王天庆的手电筒，四五个人都跟着金虎往外走，朱来宝提起自己的枪拿起自己的电筒来赶着说：“我也去帮个忙！”四五个人一同来到前院，见刘石甫屋里没有点灯，揭开竹帘子用电筒一照，门已经锁上了。原来当那位老人家到他家去找刘承业那时候，他听说刘承业全家都逃走了，埋怨了一阵刘承业走的时候不该不叫上他，接着就卷包了一点贵重东西拉上他老婆也跑了。金虎说：“走了算他的造化高！咱们回去做饭去吧！”大家又回到厨房，就见王天庆的尸体还堆在地上。一个青年问金虎说：“这东西怎么处理？”金虎说：“来！咱们把他暂且拖到门外，等吃过饭搬粮的时候，把他捎到新洞里，让他和被水冲走的那个警察一路去吧！”

这天夜里，就照着金虎的安排做了。那个当了土匪的炮兵连，抢了这一遭粮回去之后，别的一部分把他们驻的村子占了，两家都不让，动了一回武，打了个乱七八糟，第二天也没有到灵泉沟来，隔了几天来了，人也没了，粮也没了，还只当是别的一部分抢了去，也没有追究就走了。

新洞里开了大灶，把村里人都组织起来了，大家推选金虎和朱来宝做正副洞长兼民兵的正副队长。村里人有的搬到洞里来住，有的只在洞里吃饭仍住在家里。不论住在洞里住在家里，都参加一定的工作，谁管照料庄稼、谁管打柴、谁管拔野菜（因为没有菜吃）、谁管种秋菜、谁管做饭、谁管碾米磨面……都各有分工，每一件事都有专人负责。张兆瑞也要求参加，大家讨论了一下，不让他住在洞里，只准在洞里吃饭。他不会做什么，大家让他学习劈柴、烧火。他老婆和儿媳、女儿，也都参加了缝补小组。

过了几天，生活过顺了，已经种上庄稼的地本来就

做了几天也就没有多少要做的活了，金虎便拨了些人，临时组成了个修建小组，把老羊坎的露天的一面修了一堵石墙，把里边堵成个走廊式的大屋子，墙上每隔一段都留着窗户，住起来要比洞里明亮得多。这地方准备叫有时候匪军占了村子，老百姓搬上去住。

又过了些时候，金虎准备了些松柴，配着两支电筒，同几个青年和朱来宝，走洞里那条路往阎王脑去过一次。他们和老李洪商量出山上山下互相支援的办法来。办法是这样：把阎王脑石崖南边沟两岸几处石坎也修上墙，准备万一老羊坎也待不住的时候全村人都搬到这里来住。等山上的山药蛋成了的时候，村里拨人来把山药蛋收了，切成片，晒干存起来，准备叫山下的人来了吃。山上没有粮，到了冬天天气也冷。山上的人收过山药蛋之后都回村里去住，到了种山药蛋的时候再拨人来，种完了就回去，锄的时候、收的时候再来。山上的行李不用往下带，没有的东西再从山下带些来，利用这地方没有人找得到，放下什么也不怕丢了。这样把山上山下和老羊坎安下三个据点，大小战争都应付得了。

灵泉沟实行了金虎的共产办法之后，果然对日军的扫荡、匪军的扰乱都应付得过去，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大小战争都经过几次，群众可没有什么损失。村里大大小小都佩服金虎胆大心细，再没有人敢以为他是傻瓜。

到了一九四三年三月之后，情况就有了大的变化：土匪兵集体投敌，八路军分头入山，灵泉沟人到那时候才能算重见天日。

本来我应该接着写下去，只是再写下去就要误了我今年应该参加的劳动锻炼，所以只好等我锻炼一个时期之后再继续写吧！

（一九五八年）

“锻炼 锻炼”

“争先”农业社，地多劳力少，
动员女劳力，作得不夠好：
有些妇女们，光想讨点巧，
只要没便宜，请也请不到——
有说小腿疼，床也下不了，
要留儿媳妇，给她送屎尿；
有说四百二，她还吃不饱，
男人上了地，她却吃面条。
她们一上地，定是工分巧，
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
割麦请不动，拾麦起得早，
敢偷又敢抢，脸面全不要；
开会常不到，也不上民校，
提起正经事，啥也不知道，
谁给提意见，马上跟谁闹，
没理占三分，吵得天塌了。
这些老毛病，赶紧得改造，
快请识字人，念念大字报！

——杨小四写

这是一九五七年秋末“争先农业社”整风时候出的一张大字报。在一个吃午饭的时间，大家正端着碗到社办公室门外的墙上看大字报，杨小四就趁这个热闹时候把自己写的这张快板

大字报贴出来，引得大家丢下别的不看，先抢着来看他这一张，看着看着就轰隆轰隆笑起来。倒不因为杨小四是副主任，也不是因为他编得顺溜写得整齐才引得大家这样注意，最引人注意的是他批评的两个主要对象是“争先社”的两个有名人物——一个外号叫“小腿疼”，那一个外号叫“吃不饱”。

小腿疼是五十来岁一个老太婆，家里有一个儿子一个儿媳还有个小孙子。本来她瞧着孙子做住饭，媳妇是可以上地的，可是她不，她一定要让媳妇照住她当日伺候婆婆那个样子伺候她——给她打洗脸水、送尿盆、扫地、抹灰尘、做饭、端饭……不过要是地里有点便宜活的话也不放过机会。例如夏天拾麦子，在麦子没有割完的时候她可去，一到割完了她就不去了。按她的说法是“拾东西全凭偷，光凭拾能有多大出息”。后来社里发现了这个秘密，又规定拾的麦子归社，按斤给她记工她就不干了。又如摘棉花，在棉桃盛开每天摘的能超过定额一倍的时候她也能出动好几天，不用说刚能做到定额她不去，就是只超过定额三分她也不去。她的小腿上，在年轻时候生过脓疮，不过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治好了。在生疮的时候，她的丈夫伺候她，在治好之后，为了容易使唤丈夫，她说她留下了个腿疼根。

“疼”是只有自己才能感觉到的。她说“疼”别人也无法证明真假，不过她这“疼”疼得有点特别：高兴时候不疼，不高兴了就疼；逛会、看戏、游门、串户时候不疼，一做活儿就疼；她的丈夫死后儿子还小的时候有好几年没有疼，一给孩子娶过媳妇就又疼起来；入社以后是活儿能大量超过定额时候不疼，超不过定额或者超过的少了就又要疼。乡里的医务站办得虽说还不错，可是对这种腿疼还是没有办法的。

“吃不饱”原名“李宝珠”，比“小腿疼”年轻得多——

才三十来岁，论人材在“争先社”是数一数二的，可惜她这个优越条件，变成了她自己一个很大的包袱。她的丈夫叫张信，和她也算是自由结婚。张信这个人，生得也聪明伶俐，只是没有志气，在恋爱期间李宝珠跟他提出的条件，明明白白就说是结婚以后不上地劳动，这条件在解放后的农村是没有人能答应的，可是他答应了。在李宝珠看来，她这位丈夫也不能算最满意的人，只能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不是个干部——所以只把他作为个“过渡时期”的丈夫，等什么时候找下了最理想的人再和他离婚。在结婚以后，李宝珠有一个时期还在给她写大字报这位副主任杨小四身上打过主意，后来打听着她自己那个“吃不饱”的外号原来就是杨小四给她起的，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既然只把张信当成她“过渡时期”的丈夫，自然就不能完全按“自己人”来对待他，因此她安排了一套对待张信的“政策”。她这套政策：第一是要掌握经济全权，在社里张信名下的账要朝她算，家里一切开支要由她安排，张信有什么额外收入全部缴她，到花钱时候再由她批准、支付。第二是除做饭和针线活以外的一切劳动——包括担水、和煤、上碾、上磨、扫地、送灰渣一切杂事在内——都要由张信负担。第三是吃饭穿衣的标准要由她规定——在吃饭方面她自己是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对张信是她做什么张信吃什么；同样，在穿衣方面，她自己是想穿什么买什么，对张信自然又是她买什么张信穿什么。她这一套政策是她暗自规定暗自执行的，全面执行之后，张信完全变成了她的长工。自从实行粮食统购以来，她是时常喊叫吃不饱的。她的吃法是张信上了地她先把面条煮得吃了，再把汤里下几颗米熬两碗糊糊粥让张信回来吃，另外还做些火烧干饼锁在箱里，张信不在的时候几时想吃几时吃。队里

动员她参加劳动时候，她却说“粮食不够吃，每顿只能等张信吃完了刮个空锅，实在劳动不了。”时常做假的人，没有不露马脚的。张信常发现床铺上有干饼星星（碎屑），也不断见着糊糊粥里有一两根没有捞尽的面条，只是因为一提就得生气，一生气她就先提“离婚”，所以不敢提，就那样睁只眼合只眼吃点亏忍忍饥算了。有一次张信端着碗在门外和大家一齐吃饭，第三队（他所属的队）的队长张太和发现他碗里有一根面条。这位队长是个比较爱说调皮话的青年。他问张信说：“吃不饱大嫂在哪里学会这单做一根面条的本事哩？”从这以后，每逢张信端着糊糊粥到门外来吃的时候，爱和他开玩笑的人常好夺过他的筷子来在他碗里找面条，碰巧的是时常不落空，总能找到那么一星半点。张太和有一次跟他说：“我看‘吃不饱’这个外号给你加上还比较正确，因为你只能吃一根面条。”在参加生产方面，“吃不饱”和“小腿疼”的态度完全一样。她既掌握着经济全权，就想利用这种时机为她的“过渡”以后多弄一点积蓄，因此在生产上一有了取巧的机会她就参加，绝不受她自己所定的政策第二条的约束，当便宜活做完了她就仍然喊她的“吃不饱不能参加劳动”。

杨小四的快板大字报贴出来一小会，吃不饱听见社房门口起了哄，就跑出来打听——她这几天心里一直跳，生怕有人给她贴大字报。张太和见她来了，就想给她当个义务读报员。张太和说：“大家不要起哄，我来给大家从头念一遍！”大家看见吃不饱走过来，已经猜着了张太和的意思，就都静下来听张太和的。张太和说快板是很有工夫的。他用手打起拍子有时候还带着表演，跟流水一样马上把这段快板说了一遍，只说得人人鼓掌、个个叫好。吃不饱就在大家鼓掌鼓得起劲的时候，悄

悄溜走了。

不过吃不饱可没有回了家，她马上到小腿疼家里去了。她和小腿疼也不算太相好，只是有时候想借重一下小腿疼的硬牌子。小腿疼比她年纪大、创荡得早，又是正主任王聚海、支书王镇海、第一队队长王盈海的本家嫂子，有理没理常常敢到社房去闹，所以比吃不饱的牌子硬。吃不饱听张太和念过大字报，气得直哆嗦，本想马上在当场骂起来，可是看见人那么多，又没有一个是会给自己说话的，所以没有敢张口就悄悄溜到小腿疼家里。她一进门就说：“大婶呀！有人贴着黑帖子骂咱们哩！”小腿疼听说有人敢骂她好象还是第一次。她好象不相信地问：“你听谁说的？”“谁说的？多少人都在社房门口吵了半天了，还用听谁说？”“谁写的？”“杨小四那个小死材！”“他这小死材都写了些什么？”“写的多着哩：说你装腿疼，留下儿媳妇给你送屎尿；说你偷麦子；说你没理占三分，光跟人吵架……”她又加油加醋添了些大字报上没有写上去的话，一顿把个小腿疼说得腿也不疼了，挺挺挺挺就跑到社房里去找杨小四。

这时候，主任王聚海、副主任杨小四、支书王镇海三个人都正端着碗开碰头会，研究整风与当前生产怎样配合的问题，小腿疼一跑进去就把个小会给他们搅乱了。在门外看大字报的人们，见小腿疼的来头有点不平常，也有些人跟进去看。小腿疼一进门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伸开两条胳膊去扑杨小四，杨小四从座上跳起来闪过一边，主任王聚海趁势把小腿疼拦住。杨小四料定是大字报引起来的事，就向小腿疼说：“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规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罚款、不怕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把你请得到法院！”又向王聚海说：“不要拦她！放开叫她打吧！”小腿疼一听说要出

罚款要坐牢，手就软下来，不过嘴还不软。她说：“我不是要打你！我是要问问你政府规定过叫你骂人没有？”“我什么时候骂过你？”“白纸黑字贴在墙上你还昧得了？”王聚海说：“这老嫂！人家提你的名来没有？”小腿疼马上顶回来说：“只要不提名就该骂是不是？要可以骂我可就天天骂哩！”杨小四说：

“问题不在提名不提名，要说清楚的是骂你来没有！我写的有哪一句不实，就算我是骂你！你举出来！我写的是有个缺点，那就是不该没有提你们的名字。我本来提着的，主任建议叫我去。你要嫌我写得不够，我给你把名字加上好了！”“你还嫌骂得不痛快呀？加吧！你又是副主任，你又会写，还有我这识字的老百姓活的哩？”支书王镇海站起来说：“老嫂你是说理不说理？要说理，等到辩论会上找个人把大字报一句一句念给你听，你认为哪里写得不对许你驳他！不能这样满脑一把抓来派人家的不是！谁不叫你活了？”“你们都是官官相卫，我跟你们说什么理？我要骂！谁给我出大字报叫他死绝了根！叫狼吃得他不剩个血盘儿，叫……”支书认真地说：“大字报是毛主席叫贴的！你实在要不说理要这样发疯，这么大个社也不是没有办法治你！”回头向大家说：“来两个人把她送乡政府！”看的人们早有几个人忍不住了，听支书一说，马上跳出五六个人来把她围上，其中有两个人拉住她两条胳膊就要走。这时候，主任王聚海却拦住说：“等一等！这么一点事哪里值得去麻烦乡政府一趟？”大家早就想让小腿疼去受点教训，见王聚海一拦，都觉得泄气，不过他是主任，也只好听他的。小腿疼见真要送她走，已经有点胆怯，后来经主任这么一拦就放了心。她定了定神，看到局势稳定了，就强鼓着气说了几句似乎是光荣退兵的话：“不要拦他们！让他们送吧！看乡政府

能不能拔了我的舌头！”王聚海认为已经到了收场的时候，就拉长了调子向小腿疼说：“老嫂！你且回去呢！没有到不了底的事！我们现在要布置明天的生产工作，等过两天再给你们解释解释！”“什么解释解释？一定得说个过来过去！”“好好好！就说个过来过去！”杨小四说：“主任你的话是怎么说着的？人家闹到咱的会场来了，还要给人家赔情是不是？”小腿疼怕杨小四和支书王镇海再把王聚海说倒了弄得自己不得退场，就赶紧抢了个空子和王聚海说：“我可走了！事情是你承担着的！可不许平白白地拉倒啊！”说完了抽身就走，跑出门去才想起来没有装腿疼。

主任王聚海是个老中农出身，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好给人和解个争端，人们常说他是个会和稀泥的人；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来了以后他当过村长，作各种动员工作都还有点办法；在土改时候，地主几次要收买他，都被他拒绝了，村支部见他对斗争地主还坚决，就吸收他入了党；“争先农业社”成立时候，又把他选为社主任，好几年来，因为照顾他这老资格，一直连连选连任。他好研究每个人的“性格”，主张按性格用人，可惜不懂得有些坏性格一定得改造过来。他给人们平息争端，主张“和事不表理”，只求得“了事”就算。他以为凡是懂得他这一套的人就当得了干部，不能照他这一套来办事的人就都还得“锻炼锻炼”。例如在一九五五年党内外都有人提出可以把杨小四选成副主任，他却说“不行不行，还得好好锻炼几年”，直到本年（一九五七年）改选时候他还坚持他的意见，可是大多数人都说杨小四要比他还强，结果选举的票数和他得了个平。小四当了副主任之后，他可是什么事也不靠小四做，并且常说：“年轻人，随在管委会里‘锻炼锻炼’再说吧！”又如社

章上规定要有个妇女副主任，在他看来那也是多余的。他说：“叫妇女们闹事可以，想叫她们办事呀，连门都找不着！”因为人家别的社里每社都有那么一个人，他也没法坚持他的主张，结果在选举时候还是选了第三队里的高秀兰来当女副主任。他对高秀兰和对杨小四还有区别，以为小四还可以“锻炼锻炼”，秀兰连“锻炼”也没法“锻炼”，因此除了在全体管委会会议的时候按名单通知秀兰来参加以外，在其他主干碰头的会上就根本想不起来还有秀兰那么个人。不过高秀兰可没有忘了他。就在这次整风开始，高秀兰给他贴过这样一张大字报：

爭先社，难爭先，因为主任太主观；
只信自己有本事，常说别人欠锻炼；
大小事情都包揽，不肯交给别人干，
一天起来忙到晚，办的事情很有限。
遇上社員有爭端，他在中間陪笑脸，
只求說个八面圆，誰是誰非不評断，
有的没理沾了光，感谢主任多照看，
有的有理受了屈，只把苦水往下咽。
正气碰了墙，邪气遮了天，
有力没处使，誰还肯爭先？
希望王主任，来个大转变：
办事靠集体，說理分长短，
多听群众話，免得耍光杆！

——高秀兰写

他看了这张大字报，冷不防也吃了一惊，不过他的气派大，不象小腿疼那样马上唧唧喳喳乱吵，只是定了定神仍然摆出长

辈的口气来说：“没想到秀兰这孩子还是个有出息的，以后好好‘锻炼锻炼’或许能给社里办点事。”王聚海就是这样一个人。

杨小四给小腿疼和吃不饱出的那张大字报，在才写成稿子没有誊清以前，征求过王聚海的意见。王聚海坚决主张不要出。他说：“什么病要吃什么药，这两个人吃软不吃硬。你要给她们出上这么一张大字报，保证她们要跟你闹麻烦：实在想出的话，也应该把她们的名字去了。”杨小四又征求支书王镇海的意见，并且把主任的话告诉了支书，支书说：“怕麻烦就不要整风！至于名字写不写都行，一贴出去谁也知道指的是谁！”杨小四为了照顾王聚海的老面子，又改了两句，只把那两个人的名字去了，内容一点也没有变，都贴出去了。

当小腿疼一进社房来扑杨小四，王聚海一边拦着她，一边暗自埋怨杨小四：“看你惹下麻烦了没有？都只怨不听我的话！”等到大家要往乡政府送小腿疼，被他拦住用好话把小腿疼劝回去之后，他又暗自夸奖他自己的本领：“试试谁会办事？要不是我在，事情准闹大了！”可是他没有想到当小腿疼走出去、看热闹的也散了之后，支书批评他说：“聚海哥！人家给你提过那么多意见，你怎么还是这样无原则？要不把这样无法无天的人的气焰打下去，这整风工作还怎么往下做呀？”他听了这几句批评觉着很伤心。他想：“你们闯下了事自己没法了局，我给你们做了开解，倒反落下不是了？”不过他摸得着支书的“性格”是“认理不认人、不怕不了事”的，所以他没有把真心话说出来，只勉强承认说：“算了算了！都算我的错！咱们还是快点布置一下明后天的生产工作吧！”

一谈起布置生产来，支书又说：“生产和整风是分不开的。现在快上冻了，妇女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来，花秆拔不了，

牲口闲站着，地不能犁，要不整风，怎么能把这种情况变过来呢？”主任王聚海说：“整风是个慢工夫，一两天也不能转变个什么样子；最救急的办法，还是根据去年的经验，把定额减一减——把摘八斤籽棉顶一个工，改成六斤一个工，明天马上就能把大部分人动员起来！”支书说：“事情就坏到去年那个经验上！现在一天摘十斤也摘得够，可是你去年改过那么一下，把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改得心高了，老在家里等那个便宜。这种落后思想照顾不得！去年改成六斤，今年她们会要求改成五斤，明年会要求改成四斤！”杨小四说：“那样也就对不住人家进步的妇女！明天要减了定额，这几天的工分你怎么给人家算？一个多月以前定额是二十斤，实际能摘到四十斤，落后的抢着摘棉花，叫人家进步的去割谷，就已经亏了人家；如今摘三遍棉花，人家又按八斤定额摘了十来天了，你再把定额改小了让落后的来抢，那象话吗？”王聚海说：“不改定额也行，那就得个别动员。会动员的话，不论哪一个都能动员出来，可惜大家在作动员工作方面都没有‘锻炼’，我一个人又只有一张嘴，所以工作不好作……”接着他就举出好多例子，说哪个媳妇爱听人夸她的手快，哪个老婆爱听人说她干净……只要摸得着人的“性格”，几句话就能说得她愿意听你的话。他正唠唠叨叨举着例子，支书打断他的话说：“够了够了！只要克服了资本主义思想，什么‘性格’的人都能动员出来！”

话才说到这里，乡政府来送通知，要主任和支书带两天给养马上到乡政府集合，然后到城关一个社里参观整风大辩论。两个人看了通知，主任说：“怎么办？”支书说：“去！”“生产？”“交给副主任！”主任看了看杨小四，带着讽刺的口气说：“小四！生产交给你！支书说过，‘生产和整风分不

开’，怎样布置都由你！”“还有人家高秀兰哩！”“你和她商量去吧！”

主任和支书走后，杨小四去找高秀兰和副支书，三个人商量了一下，晚上召开了个社员大会。

人们快要集合齐了的时候，向来不参加会的小腿疼和吃不饱也来了。当她们走近人群的时候，吃不饱推着小腿疼的脊背说：“快去快去！凑他们都还没有开口！”她把小腿疼推进了场，她自己却只坐在圈外。一队的队长王盈海看见她们两个来得不大正派，又见小腿疼被推进场去以后要直奔主席台，就趁了两步过来拦住她说：“你又要干什么？”“干什么？今天晌午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先得把小四骂我的事说清楚，要不今天晚上的会开不好！”前边提过，王盈海也是小腿疼的一个本家小叔子，说话要比王聚海、王镇海都尖刻。王盈海当了队长，小腿疼虽然能借着个叔嫂关系跟他耍无赖，不过有时候还怕他三分。王盈海见小腿疼的话头来得十分无理，怕她再把个会场搅乱了，就用话顶住她说：“你的兴就还没有败透？人家什么地方屈说了你？你的腿到底疼不疼？”“疼不疼你管不着！”“编在我队里我就要管你！说你腿疼哩，闹起事来你比谁跑得也快；说你不疼哩，你却连饭也不能做，把个媳妇拖得上不了地！人家给你写了张大字报，你就跟被蝎子螫了一下一样，唧唧喳喳乱叫喊！叫吧！越叫越多！再要不改造，大字报会把你的大门上也贴满了！”这样一顶，果然有效，把个小腿疼顶得关上嗓门慢慢退出场外和吃不饱坐到一起。杨小四看见小腿疼息了虎威，悄悄和高秀兰说：“咱们主任对小腿疼的‘性格’摸得还是不太透。他说小腿疼是‘吃软不吃硬’，我看一队长这‘硬’的比他那‘软’的更有效些。”

宣布开会了，副支书先讲了几句话说：“支书和主任今天走得很急促，没有顾上详细安排整风工作怎样继续进行。今天下午我和两位副主任商议了一下，决定今天晚上暂且不开整风会，先来布置明天的生产。明天晚上继续整风，开分组检讨会，谁来检讨、检讨什么，得等到明天另外决定。我不说什么了，请副主任谈生产吧！”副支书说了这么几句简单的话就坐下了。有个人提议说：“最好是先把检讨人和检讨什么宣布一下，好让大家准备准备！”副支书又站起来说：“我们还没有商量好，还是等明天再说吧！”

接着就是杨小四讲话。他说：“咱们现在的生产问题，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棉花摘不下来，花秆拔不了，牲口闲站着，地不能犁，再过几天地一冻，秋杀地就算误了。摘完了的棉花秆，断不了还要丢下一星半点，拔在秆上熏了肥料，觉着很可惜；要让大家自由拾一拾吧，还有好多三遍花没有摘，说不定有些手不干净的人要偷偷摸摸的。我们下午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后两天，由各队妇女副队长带领各队妇女，有组织地自由拾花；各队队长带领男劳力，在拾过自由花的地里拔花秆，把这一部分地腾清以后，先让牲口犁着，然后再摘那没有摘过三遍的花。为了防止偷花的毛病，现在要宣布几条纪律：第一、明天早晨各队正副队长带领全队队员到村外南池边犁过的那块地里集合，听候分配地点。第二、各队妇女只准到指定地点拾花，不许乱跑。第三、谁要不到南池边集合，或者不往指定地点，拾的花就算偷的，还按社里原来的规定，见一斤扣除五个劳动日的工分，不愿叫扣除的送到法院去改造。完了！散会！”

大会没有开够十分钟就散了，会后大家纷纷议论：有的说：“青年人究竟没有经验！就定一百条纪律，该偷的还是要

偷！”有的说：“队长有什么用？去年拾自由花，有些妇女队长也偷过！”有的说：“年轻人可有点火气，真要处罚几个人，也就没人敢偷了！”有的说：“他们不过替人家当两天家，不论说得多么认真，王聚海回来还不是平塌塌地又放下了！”准备偷花的妇女们，也互相交换着意见：“他想的倒周全，一分开队咱们就散开，看谁还管得住谁？”“分给咱们个好地方咱们就去，要分到没出息的地方，干脆都不要跟上队长走！”“他一只手拖一个，两只手拖两个，还能把咱们都拖住？”“我们的队长也不那么老实！”“……”

“新官上任，不摸秉性”，议论尽管议论，第二天早晨都还得到村外南池边那块犁过的地里集合。

要来的人都来到犁耙得很平整的这块地里来坐下，村里再没有往这里走的人了，小四、秀兰和副支书一看，平常装病、装忙、装饿的那些妇女们这时候差不多也都到齐，可是小腿疼和吃不饱两个有名人物没有来。他们三个人互相看了看，秀兰说：“大概是一张大字报真把人家两个人惹恼了！”大家又稍微等了一下，小四说：“不等她们了，咱们就按咱们的计划来吧！”他走到面向群众那一边说：“各队先查点一下人数，看一共来了多少人！男女分别计算！”各个队长查点了一遍，把数字报告上来。小四又说：“请各队长到前边来，咱们先商量一下！”各队长都集中到他们三个人跟前来。小四和各队长低声说了几句话，各个队长一听都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依小四的吩咐坐在一边。

小四开始讲话了。小四说：“今天大家来得这样齐楚，我很高兴。这几天，队长每天去动员人摘花，可是说来说去，来的还是那几个人，不来的又都各有理由：有的说病了，有的说

孩子病了，有的说家里忙得离不开……指东划西不出来，今天一听说自由拾花大家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这不明明是自私自利思想作怪吗？摘头遍花能超过定额一倍的时候，大家也是这样来得整齐。你们想想：平常活叫别人做，有了便宜你们讨，人家长年在地里劳动的人吃你们多少亏？你们真是想‘拾’花吗？一个人一天拾不到一斤籽棉，值上两三毛钱，五天也赚不够一个劳动日，谁有那么傻瓜？老实说：愿意拾花的根本就是想偷花！今年不能象去年，多数人种地让少数人偷！花秆上丢的那一点棉花不拾了，把花秆拔下来堆在地边让每天下午小学生下了课来拾一拾，拾过了再熏肥。今天来了的人一个也不许回去！妇女们各队到各队地里摘三遍花，定额不动，仍是八斤一个劳动口；男人们除了往麦地担粪的还去担粪，其余到各队摘尽了花的地里拔花秆！我的话讲完了！副支书还要讲话！”有一个媳妇站起来说：“副主任！我不说瞎话！我今天不能去！我孩子的病还没有好！不信你去看看！”小四打断她的话说：“我不看！孩子病不好你为什么能来？”“本来就不能来，因为……”“因为听说要自由拾花！本来不能来你怎么来的？天天叫也叫不到地，今天没有人去叫你，你怎么就来了？副支书马上就要跟你们讲这些事！”这个媳妇再没有说的，还有几个也想找理由请假，见她受了碰，也都没有敢开口。她们也想到悄悄溜走，可是坐在村外一块犁过的地里，各个队长又都坐在通到村里去的路上，谁动一动都看得见，想跑也跑不了。

副支书站起来讲话了。他说：“我要说的话很简单：有人昨天晚上要我把今天的分组检讨会布置一下，把检讨人和检讨什么告大家说，让大家好准备。现在我可以告大家说了：检讨人就是每天不来今天来的人，检讨的事就是‘为什么只顾自己不顾

社’。现在先请各队的记工员把每天不来今天来的人开个名单。”

一会，名单也开完了，小四说：“谁也不准回村去！谁要是半路偷跑了，或者下午不来了，把大字报给她出到乡政府！”秀兰插话说：“我们三队的地在村北哩，不回村怎么过去？”小四向三队队长张太和说：“太和！你和你的副队长把人带过村去，到村北路上再查点一下，一个也不准回去！各队干各队的事！散会！”

在散会中间又有些小议论：“小四比聚海有办法！”“想得出来干得出来！”“这伙懒婆娘可叫小四给整住了！”“也不止小四一个，他们三个人早就套好了！”“聚海只学过内科，这些年轻人能动手术！”“聚海的内科也不行，根本治不了病！”“可惜小腿疼和吃不饱没有来！”……说着就都走开了。

第三队通过了村，到了村北的路上，队长查点过人数，就往村北的杏树底地里来。这地方有两丈来高一个土岗，有一棵老杏树就长在这土岗上，围着这土岗南、东、北三面有二十来亩地在成立农业社以后连成了一块，这一年种的是棉花，东南两面向阳地方的棉花已经摘尽了，只有北面因为背阴一点，第三遍花还没有摘。他们走到这块地里，把男劳力和高秀兰那样强一点的女劳力留在南头拔花秆，让妇女队长带着软一点的女劳力上北头去摘花。

妇女们绕过了南边和东边快要往北边转弯了，看见有四个妇女早在这块地里摘花，其中有小腿疼和吃不饱两个人。大家停住了步，妇女队长正要喊叫，有个妇女向她摆摆手低声说：

“队长不要叫她们！你一叫她们不拾了！咱们也装成自由拾花的样子慢慢往那边去！到那里咱们摘咱们的，她们拾她们的！”

让她们多拾一点处理起来也有个分量！”妇女队长说：“我说她们怎么没有出来？原来早来了！”另一个不常下地的妇女说：“吃不饱昨天夜里散会以后，就去跟我商量过不要到南池边去集合，早一点往地里去，我没有敢听她的话。”大家都想和小腿疼她们开开玩笑，就都装作拾花的样子，一边在摘过的空花秆上拾着零花，一边往北边走。

原来头天晚上开会时候，小腿疼没有闹起事来，不是就退出场外和吃不饱坐在一起了吗？她们一听到第二天叫自由拾花，吃不饱就对住小腿疼的耳朵说：“大婶！咱明天可不要管他那什么纪律！咱们叫上几个人天不明就走，赶她们到地，咱们就能弄他好几斤！她们到南池边集合，咱们到村北杏树底去，谁也碰不上谁；赶她们也到杏树底来咱们跟她们一块儿拾。拾东西谁也不能不偷，她们一偷，就不敢去告咱们的状了！”小腿疼说：“我也是这么想！什么纪律？犯纪律的多哩！处理过谁？光咱们两人去多好！不要叫别人！”“要叫几个人，犯了也有个垫背的；不过也不要叫得太多，太多了轮到一个人手里东西就不多了！”她们一共叫过五个人，不过有三个没有敢来，临出发只来了两个，就相跟着到杏树底来了。她们正在五六亩大的没有摘过三遍花的地里偷得起劲，听见有人说话，抬头一看，见三队的妇女都来了，就溜到摘过的这一边来，后来见三队的人也到没有摘过的那边去了，她们就又溜回去。三队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小腿疼说：“笑什么？许你们偷不许我们偷？”有个人说：“你们怎么拾了那么多？”“谁不叫你们早点来？”三队的人都是挨着摘，小腿疼她们四个人可是满地跑着拣好的。三队有个人说：“要偷也该挨住片偷呀！”小腿疼说：“自由拾花你管我们怎么拾哩？要说是偷，你们不也是偷吗？”

大家也不认真和她辩论，有些人隔一阵还忍不住要笑一次。

妇女队长悄悄和一个队员说：“这样一直开玩笑也不大好。我离开怕她们闹起来，请你跑到南头去和队长、副主任说一声，叫他们看该怎么办！”那个队员就去了。

队长张太和更是个开玩笑大王。他一听说小腿疼和吃不饱那两个有名人物来了，好象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说：“来了才合理！我早就想到这些人物碰上这些机会不会不出马！你先回去摘花，我马上就到！”他又向高秀兰说：“副主任！你先不要出面，等我把她们整住了请你你再去！你把你的上级架子扎得硬硬地！”可是高秀兰不愿意那样做。高秀兰说：“咱们都是才学着办事，还是正正经经来吧！咱们一同去！”他们走到北头，队员们看见副主任和队长都来了，又都大笑起来。张太和依照高秀兰的意见，很正经地说：“大家不要笑了！你们那几位也不要满地跑了！”小腿疼又要她的厉害：“自由拾花！你管不着！”“就算自由拾花吧！你们来抢我三队的花，我就要管！都先把篮子缴给我！”吃不饱说：“我可是三队的！三队的花许别人偷就得许我偷！要缴大家都缴出来！”张太和说：

“谁也得缴！”说着就先把她们四个人的篮子夺下来，然后就问她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到南池边集合？”吃不饱说：“你且不要问这个！你不是说‘谁也得缴’吗？为什么不缴她们的？”“她们是给社里摘！”“我们也是给社里摘！”“谁叫你们摘的？”“谁叫她们摘的？”“对！现在就先要给你们讲明是谁叫她们摘的！”接着就把在南池边集合的时候那一段事给她们四个讲述了一遍，讲得她们都软下来。小腿疼说：“不叫拾不拾算了！谁叫你们不先告我们说？”“不告说为什么还叫到南池边集合？告你说你不去听，别人有什么办法？”小腿

疼说：“算我们白拾了一趟！你们把花倒下，给我们篮子我们走！”

这时候，高秀兰说话了。她说：“事情不那么简单：事前宣布纪律，为的是让大家不犯，犯了可就不能随便了事！这棉花分明是偷的。太和同志！把这些棉花送回社里，过一过秤，让保管给她们每一个篮子上贴上个条子，写明她们的姓名和棉花的分量，连篮子一同保存起来，等以后开个社员大会，让大家商量一个处理办法来处理！”张太和把四个篮子拿起来走了，小腿疼说：“秀兰呀！你可不能说我们是偷的！我们真正不知道你们今天早上变了卦！”秀兰说：“我们一点也没有变卦！昨天晚上杨小四同志给大家说得明白：‘谁要不到南池边集合，拾的花就都算偷的’，何况你们明明白白在没有摘过的地里来抢哩？这是妨害全社利益的事，我们不能自作主张，准备交给群众讨论个处理办法！你们有什么话到社员大会上说去吧！”

小腿疼和吃不饱偷了棉花的事，等到吃早饭的时候，就传遍了全村。上午，各队在做活的时候提起这事，差不多都要求把整风的分组检讨会推迟一天，先在本天晚上开个社员大会处理偷花问题——因为大多数人都想叫在王聚海回来之前处理了，免得他回来再来个“八面圆”把问题平放下来。两个副主任接受了大家的要求，和副支书商量把整风会推迟一天，晚上就召开了处理偷花问题的社员大会。

大会开了。会议的项目是先由高秀兰报告捉住四个偷花贼的经过，再要她们四个人坦白交代，然后讨论处理办法。

在她们四个人坦白交代的时候，因为篮子和偷的棉花都还

在社里，爱“了事”的主任又不在家，所以除了小腿疼还想找一点巧辩的理由外，一般都还交代得老实。前头是那两个垫背的交代的。一个说是她头天晚上没有参加会，小腿疼约她去她就去了，去到杏树底见地里没有人，根本没有到已经摘尽了的地里去拾，四个人一去，就跑到北头没摘过的地里去了。另一个说得和第一个大体相同，不过她自己是吃不饱约她的。这两个人交代过之后，群众中另有三个人插话说，小腿疼和吃不饱也约过她们，她们没有敢去。第三个就叫吃不饱交代。吃不饱见大风已经倒了，老老实实把她怎样和小腿疼商量，怎样去拉垫背的、计划几时出发、往哪块地去……详细谈了一遍。有人追问她拉垫背的有什么用处，她说根据主任处理问题的习惯，犯案的人越多了处理得越轻，有时候就不处理，不过人越多了，每个人能偷到的东西就太少了，所以最好是少拉几个，既不孤单又能落下东西。她可以算是摸着主任的“性格”了。

最后轮着小腿疼作交代了。主席杨小四所以把她排在最后，就是因为她好倚老卖老来巧辩，所以让别人先把事实摆一摆来减少她一些巧辩的机会。可是这个小老太婆真有两下子，有理没理总想争个盛气。她装作很受屈的样子说：“说什么？算我偷了花还不行？”有人问她：“怎么‘算’你偷了？你究竟偷了没有？”“偷了！偷也是副主任叫我偷的！”主席杨小四说：“哪个副主任叫你偷的？”“就是你！昨天晚上在大会上说叫大家拾花，过了一夜怎么就不算了？你是说话呀是放屁哩？”她一骂出来，没有等小四答话，群众就有一半以上的人“哗”地一下站起来：“你要造反！”“叫你坦白呀叫你骂人？”“……”三队长张太和说：“我提议：想坦白也不让她坦白了！干脆送法院！”大家一齐喊“赞成”。小腿疼着了慌，头

象货郎鼓一样转来转去四下看。她的孩子、媳妇见说要送她也都慌了。孩子劝她说：“娘你快交代呀！”小四向大家说：“请大家稍静一下！”然后又向小腿疼说：“最后问你一次：“交代不交代？马上答应，不交代就送走！没有什么客气的！”“交交代什么呀？”“随你的便！想骂你就再骂！”“不不不那是我一句话说错了！我交代！”小四向大家说：“怎么样？就让她交代交代看吧？”“好吧！”大家答应着又都坐下了。小腿疼喘了几口气说：“我也不会说什么！反正自己做错了！事情和宝珠说的差不多：昨天晚上快散会的时候，宝珠跟我说：‘咱明天可不要管他那什么纪律！咱们叫上几个人……’”

这时候忽然出了点小岔子：城关那个整风辩论会提前开了半天，支书和主任摸了几里黑路赶回来了。他们见场里有灯光，预料是开会，没有回家就先到会场上来。主任远远看见小腿疼先朝着小四说话然后又转向群众，以为还是争论那张大字报的问题，就赶了几步赶进场里，根本也没有听小腿疼正说什么，就拦住她说：“回去吧老嫂！一点点小事还值得追这么紧？过几天给你们解释解释就完了……”大家初看见他进到会场时候本来已经觉得有点泄气，赶听到他这几句话，才知道他还根本不了解情况，“轰隆”一声都笑了。有个年纪老一点的人说：“主任！你且坐下来歇歇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支书也拉住他说：“咱们打听打听再说话吧！离开一天多了，你知道人家的工作是怎样安排的？”主任觉得很没意思，就和支书一同坐下。

小腿疼见主任王聚海一回来，马上长了精神。她不接着往下交代了。她离开自己站的地方走到王聚海面前说：“老弟呀！你走了一天，人家就快把你这没出息嫂嫂摆弄死了！”她

来了这一下，群众马上又都站起来：“你不用装蒜！”“你犯了法谁也替不了你！”“……”主任站起来走到小四旁边面向大家说：“大家请坐下！我先给大家谈谈！没有了不了的事……”有人说：“你请坐下！我们今天没有选你当主席！”“这个事我们会‘了’！”“……”支书急了，又把主任拉住说：“你为什么这么肯了事？先打听一下情况好不好？让人家开会，我们到社房休息休息！”又向副支书说：“你要抽得出身来的话，抽空到社房给我们谈谈这两天的事！”副支书说：“可以！现在就行！”

他们三个离了会场到社房，副支书把他和杨小四、高秀兰怎样设计把那些光想讨巧不想劳动的妇女调到南池边，怎样批评了她们，怎样分配人力摘花、拔花秆，怎样碰上小腿疼她们偷花……详细谈了一遍，并且说：“棉花明天就可以摘完，今天下午犁地的牲口就全都出动了，花秆拔得赶得上犁，剩下的男劳力仍然往准备冬浇的小麦地里运粪。”他报告完了情况，就先赶回会场去。

副支书走了，支书想了一想说：“这些年轻人还是有办法！做法虽说有点开玩笑，可是也解决了问题！”主任说：“我看那种动员办法不可靠！不捉摸每个人的‘性格’，勉强动员到地里去，能做多少活哩？”“再不要相信你摸得着人的‘性格’了！我看人家几个年轻同志非常摸得着人的‘性格’。那些不好动员的妇女们有她们的共同‘性格’，那就是‘偷懒’‘取巧’。正因为摸透了她们这种性格，才把她们都调动出来。人家不止‘摸得着’这种性格，还能‘改变’这种性格。你想：开了那么一个‘思想展览会’，把她们的坏思想抖出来了，她们还能原封收回去吗？你说人家动员的人不能做

活，可是棉花是靠那些人摘下来的。用人家的办法两天就能完，要仍用你那‘摸性格’的老办法，恐怕十天也摘不完——越摘人越少。在整风方面，人家一来就找着两个自私自利的头子，你除不帮忙，还要替人家‘解释解释’。你就没有想到全社的妇女你连一半人数也没有领导起来，另一半就咱那个小腿疼嫂嫂和李宝珠领导着的！我的老哥！我看你还是跟那几位年轻同志在一块‘锻炼锻炼’吧！”主任无话可说了，支书拉住他说：“咱们去看看人家怎么处理这偷花问题。”

他们又走到会场时候，小腿疼正向小四求情。小腿疼说：“副主任！你就让我再交代交代吧！”原来自她说了大家“捉弄”了她以后，大家就不让她再交代，只讨论了对另外三个人的处分问题，留下她准备往法院送。有个人看见主任来了，就故意讽刺小腿疼说：“不要要求交代了！那不是？主任又来了！”主任说：“不要说我！我来不来你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刚才怨我太主观，不了解情况先说话！”小腿疼也抢着说：“只要大家准我交代，不论谁来了我也交代！”小腿疼看了看群众，群众不说话，看了看副支书和两个副主任，这三个人也不说话。群众看了看主任，主任不说话；看了看支书，支书也不说话。全场冷了一下以后，小腿疼的孩子站起来说：“主席！我替我娘求个情！还是准她交代好不好？”小四看了看这青年，又看了看大家说：“怎么样？大家说！”有个老汉说：“我提议，看到孩子的面上还让她交代吧！”又有人接看说：“要不就让她说吧！”小四又问：“大家看怎么样？”有些人也答应：“就让她说吧！”“叫她说说试试！”“……”小腿疼见大家放了话，因为怕进法院，恨不得把她那些对不起大家的事都说出来，所以坦白得很彻底。她说完了，大家决定也按一斤

籽棉五个劳动日处理，不过也跟给吃不饱规定的条件一样，说这工一定得她做，不许用孩子的工分来顶。

散会以后，支书走在路上和主任说：“你说那两个人‘吃软不吃硬’，你可算没有摸透她们的‘性格’吧？要不是你的认识给她们掌了腰，她们早就不敢那么猖狂了！所以我说你还是得‘锻炼锻炼’！”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

老 定 额

和我接近的同志们常劝我在写人物的时候少给人物起外号。我自己也觉着外号太多了不好，准备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只是这一次还想写一个有外号的人物，好在只用一个，对其他人物一律遵照同志们的忠告。

这个人姓林名忠，在抗日战争中当过民兵中队长，合作化时期是星火农业社的主任，一九五八年星火社并入李家河人民公社成为“星火大队”他仍被选为大队长。他原来没有什么外号，在当民兵中队长时期，虽然也有人把他叫做“豹子头林冲”，不过那只是临时凑趣，因为当时人们常把指导员李占奎叫做“黑旋风李逵”，既有了“李逵”就顺便又凑出个水浒传上的人物名字来，都取其与真名字的声音相近，并非什么性格相同。要说这些人当时的性格，连他们的队员在内都有点“神行太保”加“鼓上蚤”的风度——黑夜出发到四十里外破坏了敌人的铁路，不到天明还可以赶回家来睡觉。

林忠的外号叫“老定额”。这个外号的历史很短，在一九五五年才开始形成。这个外号，也可以说是批评，也可以说是称赞——原来是批评他的人送他的。合作化后期有些活儿按定额计算工分，的确有鼓励生产积极性的作用。例如林忠的妈妈在二十多年前就不到锅灶边去了，初行定额制这一年又重新做起饭来，让儿子、媳妇、孙孙、孙媳妇一同下地。这一年光林忠一家子就做了一千多个劳动日。可是什么事情也不应该讲究

得过了分。林忠对于定额就有些讲究得太细了。例如锄头遍谷子（间苗），苗的稠、稀、高、低，在消耗劳力上确实差别很大，不过你要每块、每天都定一次额那就不会有一亩相同的。林忠就好在这类事情上穷讲究。有人说他是因为自己家里的劳动力多，怕吃了亏，他不承认。他说：“定额是管理生产的大关，一定得把守好！”这话有好多人赞成，可是反对的也不比赞成的少。反对的人说：“把住了大关是叫人过关过得舒服，不拥挤，不是叫你越把越噜嗦，越叫人走得不痛快。”林忠不接受这种意见，仍然把大部分精力消耗在随时修改定额上，因此提意见的人就把他叫做“老定额。”

今年（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吃过早饭，林忠正在大队部（原来高级社的办公室）赶制一张割麦的定额表，党支书李占奎来找他。“忠哥！今天前晌还是先割白杨套的丰产麦吧！”“昨天夜里不是说过先割蜂腰岭的吗？”“今天早上天气预报说有雷阵雨。大家的意思还是先割好的！”“知道！雷阵雨在夜里，白天是晴转多云……”“夜里难道可以保证不下雹子吗？”“不！只差个前晌后晌！蜂腰岭的定额已经通过了，白杨套的定额我在前晌就可以算出表来，中午吃饭时候一通过，后晌就可以割！”“白杨套还要算什么表？我看哪一块也差不多，况且是早就包给了各小队的，让人家小队里自己定还不行？”“不行！去年各小队包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麦子能长得那么厚，连割带运，三倍的工也不够！”“超产越多，奖励也越多，还赶不出多误的工来？”“超产奖励是有个百分数卡着的，劳动日分的是各项收入的平均产值，那怎么能一样？”“照你那种计算法，分吃个烧饼还得数一数哪一块上有几颗芝麻！”“……”正争吵

着，有个小队长进来问：“到底是割哪里的？”原来是大家听了天气预报都怕雹子打了丰产麦，才让党支书去找大队长改变计划的。党支书李占奎不想为了只争个前晌后晌叫这个小队长误会他和大队长不团结，就勉强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向这个小队长说：“前晌就还割蜂腰岭的吧，后晌割白杨套的！”说着就和这位小队长相跟出来往地里去了。

林忠还有他个人的算盘：李占奎走后，林忠一个人嘟念着说：“没有定额怎么能行？同是一个白杨套，情况就不一样：一队和二队包的是前套，三队和我们四队包的是后套。一样的丰产麦，前套能用车子拉，后套得用扁担挑；包工包产时候，后套虽然多估了一些工，可是如今产要超两三倍，工不是也要超两三倍吗？超产奖励的百分数一样，超了的工教谁赔呢？……”他一边嘟念，一边继续造他的定额表。这张表可也真有要磨工夫的地方：白杨套的麦地，有大块塞沟地，有小块肋条地；有用铁锹翻过的，有用山地犁犁过的；有红白二色土的，有纯白土的；有风头高的，有风头低的……六十亩地就有二十多块，论产量从二百斤到千斤亩都有，不过都可以叫丰产地，其中有的可以通车，有的只能用扁担挑。他这张表上的项目是：地块名称、亩数、估产数、割工、运工五项。估产、估工确实得用点工夫——因为这些地在公社化以前从来没有长过这样好的麦子。他先在表格的第一第二两列上填上了地块名称和亩数，放在一边，然后取过算盘和一纸便条来，按亩数估算每块地的产量。这件事情里搅着他个人的利害关系，弄得他很费脑筋——既怕自己的队吃了亏，又怕别的队里说不公。

林忠费了一个来钟头，把白杨套二十来块地里的产量都估算出来浮记在便条上，正拿过表来要往上填，没有想到就在这

时候从门外不慌不忙走进个人来把他的工作打断。这个人有五十来岁年纪，两撇小八字胡须修剪得很整齐。他一揭门帘便客客气气地向林忠打了个躬说：“忙着哩主任！”“主任”是林忠在星火农业社里的老职务，自从公社化以后被改选为大队长就很少有人这样称呼他了，不过总还有那么几个爱讲旧排场的人，以为“主任”比“大队长”的气派大一点，所以还是那样称呼他，这个小老头就可以说是个代表——好在“大队”也叫“管理区”，按“管理区”来说，林忠仍然是“主任”。这个小老头叫李大亨，年轻时候常好给地主捧个场，可是地主们也看不起他；解放以后虽然对参加劳动十分不满，可是见了干部还偏要多说几句拥护新社会的话。他一进来，林忠就感到头疼，因为早知道他说一句真实话是要绕够一二百个弯子的。林忠说：“有事吗？”“有点事主任！”“吃晚饭时候再谈吧，现在我要赶个东西！”“就是现在的事，马上不解决就不好办！”“什么事也得等到晚上！”“不行！停不住手！”“哪有那么要紧的事？什么事？”“主任不是常说‘什么事也得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办法’吗？现在有这样情况……”“直截了当说！说什么就说什么！咱们三言两语解决问题！我还有要紧事哩！”

“好！我是给公共食堂磨面的，就说磨面的事！”“磨面的什么事？你不要尽说帽子，说主要的！”“主任！不要着急！说话总得有个头绪……”林忠这时候，只得把笔插进套子里。

李大亨正要接着“头绪”讲，三队里有个叫蛹蛹的青年小伙子匆匆忙忙跑进来，因为跑得太快，进门来只顾喘气，马上还说不出话来。“蛹蛹”好象是个外号，其实是个真名。这个人在小孩子时期，长得皮紧肉满，初生两个月就会翻身，赤光光地在床上滚来滚去象个大蛹，他的妈妈成天叫他“蛹蛹”，

直到长大也没有改名。现在虽然长到二十多岁，看他那浑身劲，还象个大蛹，是星火大队的第三小队的副队长。

李大亨见蛹蛹的来势甚猛，生怕他提出什么更重要的问题来抢了自己说话的机会，因此就趁他喘气的时候，先继续说自己的话：“主任是注重定额的。我要请示的也是个定额问题。”“你直截说问题好不好！”李大亨这会可真要直截说问题了——因为一来怕林忠生了气真不听他的，二来又怕蛹蛹插上话再轮不上他说。他说：“普通杂面，一百斤里边应该是多少玉米多少豆？”“还不是十五斤到二十斤豆吗？”“豆多了是不是还能磨够定额？”这倒把林忠问住了。林忠没有这个经验。蛹蛹插话说：“豆越多磨的面自然也越多！”李大亨翻了蛹蛹一眼说：“你懂我说的是什么？”蛹蛹说：“我十来岁上就常替我妈照磨，还没有磨过个杂面？”“小孩子家等听明白了再说话！你说的是面，我说的是工！你知道一盘磨一天能磨多少杂面？”“那要看用哪一盘磨，架哪个牲口！小孩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那也要看什么样的小孩子！”

林忠见蛹蛹挫了李大亨的锐气，觉着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就向李大亨说：“不是给你定过额吗？就是食堂门口那盘大磨，架上土黄骡再贴上个驴，不是六十斤面抵一个劳动日吗？”蛹蛹问：“六十斤？”林忠只顾看李大亨的神气，没有回答蛹蛹的话；李大亨在定额里讨着便宜，自然不肯理蛹蛹的话，不但不肯理，反怕蛹蛹再追问一句，因此不等蛹蛹再开口，就向林忠说：“可是司务长这次给发的粮是三七对，七十斤玉米三十斤豆，你说还能磨够吗？”林忠说：“那能差个什么？有捞鱼时候有晒网时候，成天磨就一样了。”李大亨见有蛹蛹这个小内行在场，不敢再争下去，准备作为接受了林忠的意见

退出去，可是蛹蛹偏又冷冷地讽刺了他一句说：“便宜了还想便宜！”李大亨这样个爱脸面的人物，让蛹蛹这个毛孩子当面奚落一句，说什么也得再回一句，可是他又怕说得重了惹起事来，想了一阵，想出个好法子来是“且战且退”。他没有再向林忠说什么，一边转身向外走着，一边自言自语说：“不负责任的话谁也会说！”不料这句话恰恰惹出点事来。蛹蛹没有让他走脱，抢过去用两条粗胳膊把门一挡说：“我负责任：就是那盘磨，就是那土黄骡贴一个驴，就是那三七对的杂面，一个劳动日磨七十斤。你要包还先尽你包，你要不包我包！”李大亨一看蛹蛹那个劲头，想冲是冲不出去的，也只好再来一套软的：“蛹蛹！老汉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你提出来老汉赔情！咱们都是同锅吃饭，有什么过不去哩？”“老人家！我一点也没有跟你过不去的地方，不过咱们谁也不许哄公家。一个劳动日磨七十斤面，合理合法，公私两利！你磨你就磨，你不磨我磨！”林忠着急的是割麦的定额算不出来，想了个糊涂了事的办法说：“算了算了！不要斗嘴了！”蛹蛹说：“不是光斗嘴，差着十斤面哩！大队长你说上一句！是包六十斤合算，还是包七十斤合算？”林忠见蛹蛹绝有胜利的把握，就趁势逼了李大亨一下说：“大亨你说吧：蛹蛹愿意包七十斤。你要也愿意就还包给你，要不就让蛹蛹包了算了！”七十斤保证磨得够，况且不磨面就得上地，李大亨心里已经愿意了，只是话太不好说。林忠又催着说：“快点！一言为定！我还有别的事哩！”李大亨经这样一逼，忽然逼出一句很排场的话来。他说：“蛹蛹敢包难道我就不敢试一试？七十斤就七十斤！我也学一学大跃进！”林忠见蛹蛹帮着自己完全击败了李大亨将他这一次军，满心舒畅地说：“好好好！谁也应该大跃进！”李大亨

正作表面光荣的退场，蛹蛹又加了句话说：“哪里用得着大跃进？闭住眼睛也磨得够！稍稍起一点早，八十斤也磨得够！”李大亨怕蛹蛹再加码，没有敢再回话就走了。

李大亨走后，蛹蛹问林忠：“他来干什么来了？”林忠说：“来补领那十斤定额来了！”说了就嗤嗤地笑起来。蛹蛹接着也笑了。林忠说：“你这小鬼可真沉得住气！”蛹蛹说：

“对这种人实在不能太客气！爱讨便宜的人也是常有的，不过不象他这种人除了找便宜再没有别的事！”林忠因为心里有事，无心对李大亨再作什么评论，就把话头转到询问蛹蛹的来意上：“你怎么没有去割麦？”“去来！我是从蜂腰岭回来的！”

“找我有事吗？”“原来有事，现在又没有了！”蛹蛹说着，面上露出一一点憨笑来。林忠说：“小鬼又搞什么鬼？队里有问题了吗？”“没有！”

林忠正有点纳闷，忽听得房背后似乎有车过去。林忠问蛹蛹说：“你们队里又想用车子拉麦是不是？蜂腰岭的路不能走车！去年秋天二队拉粪不是差一点把一辆车子摔下崖去吗？”

“我们没有说要用车子！”“你不要哄我！就你一个人来了呀，还有别人？”“就我一个人！你不要乱猜，不是为那个！”

“那么谁在外边驾车呢？”“没有谁驾车！大概是东院婶子和二奶奶给幼儿园的孩子们推着玩哩！”林忠又听了听，果然不见再响，也就不再追问。

林忠急着要造表，可是还没有问清楚蛹蛹的来意，就又接着问：“蛹蛹！你到底来做什么？不要尽贪玩！”蛹蛹嘻嘻一笑说：“也是定额问题！算了！说起来不光荣得很！蜂腰岭上我们队里的麦，叫羊蹬了两块，倒在地下不好割，有些人要求叫修改定额！”“有多少？”“一共不过二三亩地，多误上十

来八分工，也跟李大亨说那一百斤杂面多加了十来斤豆子一样，提不到话下。我来的时候思想不正确，现在让李大亨这件事教训过来了。定额太细了很容易叫人尖薄。党团员、干部不愿吃一点小亏，就很难叫李大亨那些人不捣蛋！”

说话间又听得房背后车子响。林忠向蛹蛹说：“你说得对！烧的纸多惹的鬼多！我也觉得定额太细了有毛病了！你还到地里去吧！就说没有找见我！劝大家在小事情上厚道一点，不要惹人笑话！”蛹蛹答应着往外走，林忠又说：“出去到幼儿园告你二奶奶说不要推着那个废车玩，防忌轧了孩子们的脚！”打发蛹蛹走后，他看见桌上的表已经到十点四十分了，急得他一边搔头，一边拔开笔赶紧在表上填那些算好了的数字。

蛹蛹离开大队部，到大队部房背后的幼儿园来。他一进门，孩子们就把他围上，有个孩子说：“大哥哥跟我们修房子玩！我们要修学校！”蛹蛹用手分开他们说：“大哥哥吃晚饭时候再跟你们玩！”二奶奶也趁过来劝孩子们说：“大哥哥有事哩！闲了再跟你们玩！”蛹蛹向二奶奶说：“二奶奶！大队长叫告你说不要让孩子们推着那辆废车玩，防轧了他们的脚！”

“孩子们没有推着车玩呀！车轱辘前后都是砖垫着的！”孩子们自己也说没有推着玩，有个孩子指着车上垒好的积木说：“这是我们的学校！”蛹蛹看了看，车轮是用砖垫着的，细看车轱辘、车盘一切都好好地，就问二奶奶说：“这车没有坏了呀，怎么说是废车？”二奶奶说：“什么也没有坏！是有了大轱辘车用不着它了！”正说着，又听见外边有车子过来的声音。蛹蛹说：“这又是哪里车响？”二奶奶侧着耳朵去听，又不响了。东院婶正在儿童食堂给孩子们蒸馍，隔着窗向蛹蛹说：“不

是车，是响雷哩！”蝻蝻扬起头向院里的天空一看，只有稀稀地几小团黑云，太阳还是那么亮，就说：“不象是雷！”东院婶说：“是！响了好几次了！”“为什么是老闷音？”“前响响的雷就是这老闷音！你听！这不是又响哩？”就在这时候又响了一声。蝻蝻说：“噫！就是雷！”

蝻蝻跑到外边向四周一看，西边的云重一点，但还不象马上就能下雨的样子，闷声闷气的雷声又从远处传来。他马上想到白杨套的丰产麦，又跑回大队部来。他在门口喊：“大队长！响雷哩！西北边阴住了！”

“啊？”林忠一听说是响雷，连笔也没有顾上套住，摔在桌上就跑出来。他和蝻蝻跑到院外一个比较眼亮的地方向西北天上一看，远处的云边上一晃一晃闪着亮光，虽然在太阳光下还不太显亮，可是能断定西北的远处闪电打得很紧，好在离得太远，要不雷声就会连起来了。两个人正看中间，偏西的方向来了一次比较亮的闪电，停了一会又响起一声象在远处拉车的闷雷来。林忠说：“决定错了！该先割白杨套的麦！”“现在怎么办哩？”“叫四个队上都转到白杨套去！定额等割了再评！”“好！我替你去传令！”蝻蝻说着就跑了。林忠叫住他说：“不行！还是我去！有些人还得说服！你给咱们在村里再动员些人，就说我说的，一切活儿都停下，全体出动到白杨套抢收丰产麦！告炊事员们说且不要做午饭，先烧些开水往白杨套送，等抢完了麦，后晌回来再做饭吃！”“行！我传达完了就到白杨套去！请你告我们队长说，让他把我的扁担和镰刀带到白杨套！我不到蜂腰岭去了！”说罢，两个人就分头走开。林忠回家去取上镰刀和扁担往蜂腰岭去。

蛹蛹先在一个房顶上用广播筒喊了一阵，又到各条街道上跑了一遍，果然又动员出几十个人来，连李大亨也把磨卸了参加了抢收队——因为他很清楚地里减了产有了工分也成空的了。

蛹蛹折腾了一阵，带着这个混成队往白杨套走，可是还没有走到往白杨套走的这条路上，就看见有二三十个人挑着麦子从白杨套出来；等他们走近了，才看见各队的人都有。担麦的碰上了他们，其中有人说：“已经有人回来过了吗？”蛹蛹说：“就我一个人回来过！大家不是都在蜂腰岭吗？你们几时往白杨套去的？”二队队长说：“天气不好！大家看见西北方向打闪电，支书就叫转到白杨套去了！支书说叫我回来跟大队长说说再动员些人。大队长哩？”“大队长到蜂腰岭叫你们去了！能动员的人都动员来了！就是大队长叫动员的！”挑着担子说话不能站得太久，二队队长听明白了蛹蛹的话，就和蛹蛹分了手。蛹蛹回头喊：“我的镰和扁担哩？”“都替你带到白杨套了！”二队队长远远地回答。

这个混成队进了白杨套，早见各队包种的麦地里都有人。蛹蛹说：“分开吧！各队的人各自归队！”说着就都分开了。

支书李占奎在三队。他正和大家割得起劲，见又增加了人，觉着林忠办事真快，马上就把人动员来了。他以为既然把别人都动员来了，林忠一定来了，于是就到四队的地里来找林忠。他跑到四队的地里，没有发现林忠。他问：“大队长哩？”有人回答说“没有见”，可是这句话还没有落音，就听得土崖上边有人答应说：“来了来了！”李占奎抬头一看，见真是林忠，就问他说：“你怎么从高处来了？”林忠笑了笑说：“非从高处来不行！你们不也是从这高处来的吗？”原来从蜂

腰岭往白杨套走，数这条路近，要是打村里去绕一下，要比这条路远一倍还多。李占奎决定转移割麦队伍所以没有回村去和林忠商量，也正是因为怕走路耽误了时间。

林忠见了李占奎，说明了从高处来的原因以后，就商量抢收的措施。林忠问：“你看中午不收工，割到下午四五点钟能不能割完？”李占奎说：“麦很厚！平均割一亩得四个工。现在连后来的几十个人，一共不过二百四五十个人，光割也得一天，不说运输！依我说打乱了队先尽最好的割，能割多少算多少，把咱们在家的牲口一齐用上，能驮的驮，能拉的拉，再加上人挑，先把好的抢回去，万一下了冰雹，也只让它打次的！”

这时候，雷声更近了一点，林忠就按李占奎说的办法下了命令，各队的人就都集中在几块最好的麦地里，仍由各队队长指挥着割，并且把体力最壮的小伙子们选出来挑担子，把老年人选出来赶车运送。

大队长林忠在对敌斗争时期是破路英雄，一个人能扛起一条铁轨来。他虽然已经快五十岁了，仍然自告奋勇挑担子，并且用绳子把两捆麦子捆在一起，一个人挑四捆。青年小伙子们不服劲，也都挑四捆，蛹蛹说四捆还不够他挑，可是扁担只有那么长，再多了挑不住。

蛹蛹见老汉们赶着车拉，就想起幼儿园那一辆废车来。他和另一个青年去把那一辆废车拖出来，驾上绳套用人拉，两个人一车能拉二十捆。有个青年和蛹蛹开玩笑说：“牲口不够用了，又驾了个大‘蛹蛹’！”

天已经过了吃午饭时候，大家因为怕雹子打了麦，也不觉着饿，只是渴得要命。四个炊事员挑得开水来，大家暂时歇了

手来喝水——和开饭一样，由炊事员分派。大家喝着水、听着雷声、议论着雨下得来下不来。有人说：“雨转到北边去了，可能下不来！”大家正望着北边的云头看动向，西边的山头上突然闪了一道亮光，接着山摇地动地响了一声雷。大家听了，好多人都放下碗站起来说：“快抢吧！雨要来！”

这时候的人们，已经跟打仗的冲锋时候一样了：有的摔掉了草帽，有的脱去了布衫，所有的镰刀都闪着亮光，好象人也在飞、镰刀也在飞、麦子也在飞，白杨套的麦地里好象起了旋风，把麦子一块一块吹倒又吹成捆；从白杨套往村子里去的路上，牛车、骡车、驮子、担子、在宽处象流水，到窄处象拧绳，村边打麦场上的麦垛子一堆一堆垒起来。

林忠毕竟年纪大了一点，挑了两遭觉着腰板有点不得劲，就在场上帮着大家把麦垛成堆。为了不妨碍打麦，按习惯是把初运回来的麦子垛在场边上，而且是穗朝里垛成一排，好象一人来高的矮墙。林忠开头也是这样垛，后来雷响得更紧了点，他想到万一下了雹子，把麦子打落在场上，雨大了还是能冲跑了，因此他就又发明了个新垛法：垛成两层，外层的根茬朝外、里层的根茬朝里，把穗夹在中间，任凭多么大的雹子也不会打着穗。他用这种新办法垛了一列，西边飞来的云头已经挡住了偏了西的太阳，看样子雨来得要比他们收割得快。他一着急，又想出了更妙的办法来。他想：“照这种新的垛法，把麦子捆垛在地里也能挡住冰雹！”得着了新主意，马上就下紧急命令：“一律停运！先割先捆，就地垛起！”他留了一个人在场上告诉运麦的运来这一遭都把牲口车辆送回去运转到地里去割，自己先跑到地里和支书李占奎商量，使用这个救急办法。

这个办法用上了，白杨套的割麦队伍大起来，一块块地里的麦垛子也站起来。

旋风般的割麦大队，先割完了几大块塞沟地里的千斤亩，然后逐块往外旋，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不过五个钟头，就把六十亩丰产麦割倒了四十五亩；要按林忠那张定额表上估的产量，六十亩一共三万斤，这四十五亩就占到二万七千斤，剩下的不过是一些二百斤亩。

这时候，天阴得更重了，乌云低得好象就要碰着白杨套后边的山顶，一阵凉风吹过来，吹散了没有赶上捆好的麦铺，一声霹雳过后，巴拉巴拉落下来些稀密不匀的大雨点。林忠在这时候又下了紧急命令：“安全要紧！大家立刻停止！马上回去！”

打发大家上了路，林忠、李占奎和一些党团员、积极分子们冒着雨把割倒了没有捆起来的麦子捆好、垛起，也就都跑回去了。

这一天，幸而没有下雹子，只下了一阵大雨，大雨过后，云散天晴。这时间才是下午五点钟，夏至前后的白天长，太阳仍然很高。

开饭了。本来准备吃面条，因为改了吃饭时间，和起来的面发了酵，就改成了烧饼、茄子菜。饭前，支书李占奎和林忠接过头，就在食堂的饭厅里鼓励大家说：“咱们今天的成绩很大，五个钟头比一整天干的活都多！刚才和大队长商量，决定吃过饭不再做活，让大家痛痛快快地休息一下，明天再去搬运咱们的丰产麦子！”

在大食堂的饭厅上吃饭是自由碰座，老年人爱找老年人，孩子们爱找孩子们。林忠、李占奎和从前跟他们在一块当过民兵

的几个小老头常常碰伙占一个桌子。这一次吃饭时候，一个爱和林忠开玩笑的人说：“‘老定额’哥！咱们今天的定额该怎么算呢？”林忠说：“别人的以后再研究，你的算成义务工好了！”“你倒很大方！你的呢？”“我的也算义务工！”另一位很正经地说：“说真的，今天的工就是很不好记账！”林忠说：“有什么难记的？这是一次突击抢收，按每个人的底分记还不行？能把咱们的丰产麦抢到手就是很大的便宜！记个工分，吃亏便宜能差多少？”原来和他开玩笑的那个说：“这话真不象你这‘老定额’说的呀？你一家出动着四个劳力，难道不嫌吃亏吗？”另一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说：“他这几年才成了落窝鸡儿吧，从前还不是能飞能跳的来？咱们跟他去破坏敌人铁路的时候，你问他拧一个道钉多少定额？抬一条铁轨多少定额？挖一方路基、搬一根枕木又都是多少定额？没有定额的事情他干过的并不太少啊！”原来那一位说：“那是什么时候，如今是什么时候？”支书李占奎原来在一旁听着他们斗嘴只是笑，及至听到这里，他就插上话，他说：“那是革命时候，如今还是革命时候！”“民主革命时候还能跟社会主义建设时候一样吗？”“谁说完全一样？从前没有定额如今不是有了定额了吗？可是有了定额也不是就不要革命精神了！”“……”他们就是这样半开玩笑半辩论着吃过了这顿烧饼。

饭后，林忠回到队部，套住他放在桌上已经干了尖的水笔插进自己的衣口袋里，拿起那张未完成的定额表来看着说：“尽在这上边打小算盘，真是他妈的落窝鸡！”说着便揉了一揉丢进字纸篓里。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套不住的手

白云岗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是高级社时期就成立了的，任务是教初参加农业生产的人们学技术。当一九五六年高级化的那一会，有些素不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和青年学生被动员参加了农业生产，做的活很不合规格，主任陈满红提议组织一个教练组，选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选一部分产量不高、做不好也不太可惜的地作为教练场，来训练这些人。这个建议经管理委员会通过后，就把大磨岭顶上的几十亩薄地和南边沟里几块小园地选作教练场，又选了两个教师——一个是主任陈满红的父亲陈秉正，另一个是种园地的老人叫王新春。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组员是流动的，经常分配在各小队，遇上了教练自己不会做或者做不好的活计的时候才来学。训练的对象虽说是初参加生产的人，可是也有例外：第一是经常参加生产而对于某一种活计作得不好的，在教练那种活计的时候，自动报名来学习；第二是对某种活计做不好或者能做好也不做好的人，经小队评议为需要学习，就送来学习——在学习期间，每个劳动日是打六扣记工分的。故意不做好活被送来学习也可以算是一种小小的惩罚。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按一般惯例，这样大岁数的人本来早就该不参加主要劳动，可是这老头身体特别强健，在年轻时候一个人可以抵一个半人做活；如今虽说老了，一般青年小伙子还有点比不上他。一九五八年冬天，公社

化后，大磨岭算一个大队，大队长仍选的是陈满红。大队成立起敬老院，经过评议，请陈秉正老人退休入院。这老人只进去了三天，就觉着只做那些揭麻皮、拣棉花之类的轻微劳动，有气力没处使，所以又自动要求出院，依旧当他的教练组长。

陈秉正老人的老技术，不但在大磨岭是第一，就整个白云岗山区来说也是曾被评为特等模范的。经他手垒过的石头地堰，从来也不会塌壑儿；经他手压的熏肥窖，从来也不会半路熄了火；至于犁、种、锄、收那些普通活计，更是没有一样会落在马下的。

他在教练组里教人做活，不但要要求规格，而且首先要教架式。他说架式不对就不会做出合乎规格的活儿来。例如锄二遍地，他要求的架式是：腰要弯到一定的度数；一定要斜身侧步，不许乱动脚；两手要攥紧锄把，叫每一锄下去都有准，不许让锄头自己颤动，规格是：一定要锄到庄稼根边，不许埋住生地皮；在庄稼根上拥土，尽可能做到整整肃肃三锄拥一个堆，要平顶不要尖顶。在开始教的时候，他先做榜样，让徒弟们在一边跟着看。他一边做一边讲，往往要重复讲十几遍，然后才让大家动手他跟着看。因为格律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那样，有时腰太直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计划，该是一下就能办的事却几下不得解决问题……陈秉正老人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往往随时打断他们的工作重新示范。

有个人叫郝和合，半辈子常是直着腰锄地，锄一锄，锄头蹦三蹦，锄头蹦到草上就锄了草、蹦到苗上就伤了苗。教练组成立以后，小队里评议让他到组里受训。他来的时候，老组长陈秉正照例教给他锄地的架式，只是这个人外号“哈哈”，

带几分懒汉性，弯下腰去锄不了几锄就又直起腰来。陈秉正这老人也有点创造性，第二天回去把自己家里闲着一个锄头，安了三尺来长一个短把子给郝和合说：“你这弯不下腰去的习惯，只有用这短把子锄头，才能彻底改正。”郝和合一换锄头果然改正了——因为三尺来长的锄把，要不弯腰，根本探不着地皮。后来各小队知道了这个办法，都准备了几张短把锄头，专门叫给那些没有弯腰习惯的人用。

徒弟们练架式练得累了，老组长陈秉正便和他们休息一阵子。相隔八九段梯田下边的沟岸上，有副组长王新春领着另一批徒弟在那里教练种园地。在休息时候，上下常好打个招呼，两个老人好到一块吸着旱烟闲谈一会；徒弟们也好凑在一处读一读小报，或者说说笑笑。陈秉正一见王新春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王新春比陈秉正小十来岁，和陈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为一被他握住象被钳子挟住那样疼。

有一次休息时候，陈秉正叫王新春上去吸烟。陈秉正是用火镰子打火的，王新春说：“烧一堆柴火吸着多痛快！”一个新参加学习的中学生听说，忙帮他们在就近拣柴，却找不到什么东西，只拣了二寸来长两段干柿树枝。王新春笑了笑说：“不用找！你陈家爷爷有柴！”那个学生看了看，没有看到什么柴。陈秉正老人也说了个“有柴”，不慌不忙放下火镰子，连看也不看，用两只手在身边左右的土里抓了一阵，不知道是些什么树皮皮、禾根根抓了两大把，王新春老人擦着洋火点着，陈老人就又抓了两把盖在上面。那个学生看了说：“这个办法倒不错！”说着自己就也去抓。陈老人说：“慢慢慢！你可不要

抓！”可是这一拦拦得慢了点儿，那个学生的中指已经被什么东西刺破了，马上缩回手去。王新春说：“你这孩子！你是什么手，他是什么手？他的手跟铁耙一样，什么棘针蒺藜都刺不破它！”

那个学生，一边揉着自己的中指，一边看着陈老人的手，只见那两只手确实和一般人的手不同：手掌好象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都象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象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不过他对这一双手，并不是欣赏而是有点鄙视，好象说“那怎么能算‘手’哩”。

学生的神情，两个老人都看出来。陈秉正老人没有理他，只是自豪地笑了一下就拿起自己的旱烟袋来去吸烟，王新春老人点着烟之后却教训起这个青年人来。他说：“小伙子！你不要看不起那两只手！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教练场恐怕还是荒坡哩！这山是地主王子裕的，山顶上这十几段地，听老人们说从光绪三年就荒了，一直荒到宣统三年。当年间我们两家都没有寸陇田地，他给王子裕家当长工、我给王子裕家放牛。后来他来这儿开荒，我长大了从放牛孩子升成长工，跟着老领工在大河滩学着种园地。这些地都是他老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他们父子俩一绺头一绺头剜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没有那两只手，这里还不是一片荒坡吗？”

那个学生虽然对他自己那种鄙视的表示有点后悔，可是他除了不愿当面认错，反而还自我解嘲地说：“怨不得我们学得慢，原来就没有那样的手！”

陈秉正老人一本正经地教训他说：“是叫你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手！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用不着再长

成这样了！”

陈老人虽然不希望别人的手长成那样，可是他对他自己已经长成那样的一双手，仍然觉着是足以自豪的。他这双手不但坚硬，而且灵巧。他爱编织，常用荆条编成各色各样的生产用具，也会用高粱秆子编成各色各样的儿童玩具。当他编生产用具的时候，破荆条不用那个牛角塞子，只用把荆条分作三股，把食指塞在中间当塞子，吱吱吱……就破开了，而他的手皮一点也磨不伤；可是他做起细活计来，细得真想不到是用这两只手作成的。他用高粱秆子扎成的“叫哥哥”笼子，是有门有窗又分楼上楼下的小楼房，二寸见方的小窗户上，窗格子还能做成好多不同角度的图案，图案中间的小窟窿，连个蜜蜂也钻不过去。

土改以后，经过互助、合作一直到公社化了，陈秉正老汉家里的收入也丰裕起来了。一九五九年冬天，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他接过来一看说：“这双手可还没有享过这个福！”向手上试着套了一套，巴掌不够宽，指头也太细、太长，勉强套上去，把巴掌那一部分撑成方的了，指头的部分下半截都撑粗了一点，上半截却都还有个空尖儿。儿子陈满红说：“慢慢用着就合适了！”老人带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还好！”说罢，卸下来交给满红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满红媳妇说：“爹！你就带上走吧！到地里手不冷？”老人说：“在沟里闸谷坊，戴上它搬石头不利落！”说着就放下走了。以后谷坊闸完了，别的活儿又陆续接上来——铡干草、出羊圈、窖萝卜、捶玉米……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一天，白云岗有个物资交流会。满红媳妇劝老人说：“现

在这些杂活计又不用你教多少技术，你还是休息一天去逛逛会吧！”老人答应了。老人换了一件新棉袄，用新腰带束住腰。满红媳妇说：“这回可带上你的手套吧！”说着把手套给他拿出来，他带上走了。

大磨岭村子小，没有供销分社。老人穿着新衣服、戴着手套打街上走过，村里人见他要到白云岗去，就有些人托他捎买东西，东家三两油、西家二斤盐，凑起来两只手就拿不了，借了邻家一个小篮子提着。他走到白云岗，逛了半条街，走到供销社门口，把给别人捎买的日用品买全了又向前走，刚走过公社门口，看见山货部新运来一车桑杈，售货员忙着正往车下搬。这东西在这地方已经二年不见了，不论哪个队原有的都不够用。他以为机会不可错过。他自己身上没有带钱，想起满红在公社开会也许有带的钱。他跑到公社向满红一说，满红说：

“噢！哟！那可是宝贝，赶快买！”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来递给他。老人拿上钱就到山货部来挑桑杈。老人对农具很讲究，从来见不得有毛病的。他把手套卸下来往怀里一装，拿起一柄来把杈头放在地上试看三股子平不平、有力没力、头正不正、把弯不弯。他连一柄还没有看完，就来了十来个人，每人拿着一柄看；转眼工夫，买杈的越来越多，连在公社开会的大队长们也暂时休了会出来买杈。这些人也不挑三拣四，问明了价钱就拿。陈秉正老人见情况紧张起来，也不敢再按自己的规格挑选，胡乱抢到手五柄，其余的就叫别人拿完了。他付了钱，把杈捆起来扛上，提起小篮子来挤出山货部，因为东西够拿了，他也无心再逛那半条街，就返回原路走出白云岗村。一出村，他觉人也不挤了、路也宽敞了，这才伸手到怀里摸他的手套。他摸了半天只有一只，放下篮子和桑杈，解开腰带抖搜

了一下，也仍然不见那一只。他知道一定是丢在山货部里了。他想：“丢就丢了吧！拿上它也没有多少戴它的时候！”于是他又束好了腰、扛起桑杈、提起小篮子继续往家走；可是走了不几步，就又想到“孩子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免对不起他们”，这才又扭回头来重新返回白云岗物资交流大会上的山货部来。幸而售货员早已给他拾起来放在账桌上，见他来找就还了他。

隔了好久，陈秉正老人又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到县里去出席劳模大会。这自然又该是他带一次手套的时候。他除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又把他的手套带上。

大磨岭离县城四十里，冬天的白天又短，陈秉正老汉从吃过早饭起程，直走到太阳快落山才到。这一天只是报到的日期。老人到县后，先找着报到处报了名、领了出席证，然后就去找晚上住宿的招待所。他半年没有进县城，县城里已经大变了样——街道改宽了，马路也压光了，他们往年来开会住的破破烂烂的招待所，已经彻底改修成一排一排崭新的砖瓦房了。他进入招待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后边几排房子靠甬道两旁的窗户里都闪出灯光，一看就知道里边已经住下了人。前三排的窗户，也有明的、也有黑的。他到传达室登记了名字，招待员领他往西二排五号去。他走到西二排，见只有最西边的六号房间窗上有灯光，其余都还是黑的；脚底下踩着些软一块硬一块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些什么。招待员向他说：“小心点老人家！这房子刚修好，交了工还不到一礼拜，院子还没有清理完哩！——这边些，那里是个石灰池！——靠墙走，那里还有两截木料……”走到五号门口，招待员开了门先进去开了灯，才把

老人让进去。老人一看，房子里挺干净，火炉子也燃得很旺，靠窗前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条板凳，后边靠东西墙一边排着两张床，门窗还不曾油漆过，墙好象才粉刷了，经火炉子一熏还有点湿味儿。老人看了看床位说：“一个房间住四个人吗？”招待员说：“四个人！”“这次会议住得满住不满？”

“都来了差不多住满了！路远的还没有赶到哩！你休息一下吧！我给你打水来洗洗脸！”一会，招待员打来了水，老人洗看脸，路远的人也陆续来着，西二排的房子就也都住满了。五号房间除了老人以外，又住了三位青年，老人和他们彼此作了自我介绍。

会议一共开三天半，老人又是听报告、又是准备发言，和大家一样忙个不了，直到第四天上午听罢了县委的总结报告，才算了结了一宗事。下午，离县城近一点的就都回村去了，路远的就得再住一宿。陈秉正老人离家四十里，说远也不算远，说近可也不近，要是青年人，赶一赶也可以在天黑赶到，老人究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不想摸黑，也就准备多住这半天了。

吃过了午饭，住下来的人们差不多都想上街逛逛。老人回到西二排五号房间里，见和自己同住的三个青年，陪着四号一个人打扑克玩。老人问：“你们不上街去？”一个青年回答说：“你先去吧老爷爷！我们过一会去！”老人束上腰带，戴上手套，便走出房间。因为院里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走过四号门口，便得擦着三号的墙根走，他总觉着太不顺畅。他想：

“把它转过一边不就好走了吗？可是转到什么地方好呢？”他蹲在四号门边来看空子，觉着只有转到石灰池的南边好一点，着准了，把手套卸下来放在阶台上，就来动手转木料。这一截木料是截去两头、中间留下来的一段盘节，又粗又短又弯又

扁，很不好转动。老人很费了点气力才掀起来，转了一个过就又跌死了。老人想找个帮手，敲了敲四号的门，四号的人都出去了，这才又回到五号来向那几个青年说：“同志们！你们帮一下，咱们把院里那两截木头转到一边让走路痛快一点好不好？”

“好！我昨天还试了一下，没有转动了！”一个青年答应着，放下手里的牌，其他三个也都同声答应着站起来往外走。老人趁空子解了腰带脱下他的新棉袄来放在床上，就跟着走出来了。

老人和青年们一同去转动木料，一个青年拦住他说：“你歇歇吧！不够我们转！”短短一截木头，四个人就护满了，老人插不上手，只好让他们转，而自己去搬动另一截。青年们把那一截粗而短的转过去，回头看见老人搬动另一截，一个青年又拦住他说：“老爷爷你歇歇吧！这一截可以抬起来走！”另一个青年就走过来和这个青年抬。这一截比那一截长一点，可是一头粗一头细，抬细头的抬起来了，抬粗头的吃劲一托没有动，连声说“不行不行”就放了手。抬细头的见他抬不起来，正要往下放，老人说：“我来！”说着弯下腰去两手托住，两腿摆成骑马架式，两肩一耸，利利落落抬起来。起先来抬的那个青年，看着另外一个青年竖了竖大拇指头，然后两个人一齐抢过来接住说：“老爷爷真行！你上年纪了，还是我们来吧！”

一个招待员提着茶壶来送水，见他们抬木料，忙说：“谢谢你们！我们来吧！”“算不了什么！”“在开会以前，我们只剩前三排院子没有赶上清理完，开会期间又顾不上做它，等明天早晨你们一走，我们几个人用不了两天就清理完了！”陈秉正老人说：“为什么要等到我们走了才做呢？我们的会开完了，现在不是正好帮你们清理院子吗？”招待员说“不便劳驾”，陈老人和青年们说“完全可以”，其他房间里还没有上

街的同志们听见谈到帮助招待员清理院子，大家都从房间里走出来表示同意。招待员见这情况，赶忙去问经理，大家不等他问来，就去找清理院子的工具。前三排还没有清理，工具就放在东西排的院子里，被他们找来铁锹、扫帚、筐子、抬杆一大堆，马上就动起手来。陈老人要抬筐子，大家看见他的长白胡须，说死说活不让他抬，他也只得拿起扫帚跟着大家扫院子。劳模总是劳模，前三排没有走掉的人见西二排这样做，大家也都仿照着做起来。不大一会，招待员把招待所经理找来了。经理劝大家休息劝不下去，也就只好号召事务员、会计和每个招待员全体总动员和劳模们一齐参加劳动。

大家用铁锹拢着院里的残砖、破瓦、树皮、锯屑等类的零乱东西，陈老人跟在后边扫地。老人从西二排院子的西南墙角落上扫起，面朝北一带沿一带排过来，扫到六号窗下，看见窗台上还有泥块、刨花，把扫帚伸上去，因为地方小扫不着，就放下扫帚用他那两只磨不破的手往下扒拉。他又顺东看去，只见每个窗台上都有。他沿着六号、五号、四号……把每一个窗台都先扒拉干净，然后返回西头来继续扫院子。

人多好做活，不过个把钟头就把六个院子都清理完了，垃圾都堆在大甬道的两旁，成材的东西都抬到存剩余材料的后门外，只等夜间有卡车来装载。老人对这成绩欣赏了一阵，觉着这样一清理，走步路也痛快得多。

经理、事务员、会计、招待员们一齐给劳模打水洗手脸。大家洗过之后有些人就上了街，陈老人重新穿起新棉袄，束住了腰，伸手去戴手套，才发现又把手套丢了。他顺口问那几个青年说：“你们打扫时候可见过一副手套吗？”有一个答应说：“没有见！你放在哪里来？”“放在四号门口的阶台上！”

另一个青年说：“有来！我们拢着拢着，看见一团刨花里好象有一只手套沾满了泥土。我还当是谁扔了的一只破手套哩！”

“对！可能是我把四号窗台上的刨花扒拉下来埋住了它，你们没有看见，给拢到泥土里去了！”老人跑到甬道旁边的垃圾堆里来找，可是光西二排的垃圾就抬了几十筐，马上怎么会找到呢？

一个招待员看见了就问：“老爷爷你找什么？”“我的一副手套拢到这里边去了！”“准在吗？”“准在！”“准在你上街逛去吧，我们给你找！”“不要找它了吧！手套给我没有多大用处！”老人干脆放弃了。

老人逛了几道街，除看了看半年以前还没有的一些新建筑外，别的东西也无心多看。他想：“我也不买什么、也不卖什么，净在这些店铺门口转什么？”想到这里，也就回招待所来了。他回到招待所，天还不黑，同房间的青年们都还没有回来。一个招待员给他开了门，告他说手套找到了。他到房间里一看，静静的火炉子依旧很旺，招待员已经给他把手套洗得干干净净的，搭在靠近火炉的一个椅背上，都快烘干了。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满红媳妇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

（一九六〇年）

实干家潘永福

潘永福同志和我是同乡不同村，彼此从小就认识。他是个贫农出身，年轻时候常打短工，体力过人，不避艰险，村里人遇上了别人拿不下来的活儿，往往离不了他。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参加了革命工作，在行政上担任过村长、区助理员、区长、县农林科长、县农场场长、县采购站长；在党内是县委会委员，曾担任过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在群众团体中，担任县工会主席，现在还是。从他一九四一年入党算起，算到现在已经是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他的工作、生活风度，始终是在他打短工时代那实干的精神基础上发展着的。

我对他生平的事迹听得很多，早就想给他写一篇传记，可是资料不全。今年一月份，我到沁水县去，又碰上了他，因为要写这篇传记，就特地访问了他几次。我访问他的目的，不过是想把我知道的事了解得更具体一点，可是一谈之下，他附带谈出来的事都是我不曾听到的，而且比我知道的那些事更重要。这时候，我觉得写他的全传不太容易，就准备只记一些大事，题目就写作《潘永福大事记》。这几次访问，在他的谈话中又发现有一些新的关节还要请他补充，可惜他要下乡我也要下乡，两个人下的不是一个乡，就把这访问停下来。现在三月初，我到晋东南专区（长治市）来参加一个会议，他也来参加另一个会议，又住在一个宾馆，我便继续在会议的空隙中访问他。从这几天访问中，我发现我改拟的题目还不合适，因为他

补充的新事，更比我原来听到的“大事”“大”了。这也难怪：在我看来是了不起的大事，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已经习以为常，要不从闲谈中以话引话慢慢引出来，有些事他还猛一下想不起来。这正是他的品格高超处，我愿向他学习。他已是五十六岁的人了，从他十六岁算起，所干过的不平常的事，即以每年十件计算，四十年也该有四百件，想要他都谈出来，他也谈不完，我也记不完，而已经谈出来的也不见得比没有想起来的还“大”，所以只好不那样命题而改为现在这个题目，有些事他作过而一般作地方工作的老同志也都作过（如抗旱、灭蝗、土改、民兵等项），别人也写过。关于这一类事，我就暂且不写在这篇文章里。

以下便该书归正传。

慈 航 普 渡

一九五八年秋天，潘永福同志任中共山西阳城县委会（当时阳城、沁水两县合并，后来又分开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要赴沁水北边的一个名叫“校场”的村子去工作。这地方是安泽县和沁水县的交界处，两县的村庄犬牙交错着，想到校场村去，须得从安泽的马壁村坐船摆渡。这里的船工，都是潘永福同志的徒弟，可是潘永福同志这次上了船，见撑船的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没有识过面。他看见这新生一代有两下子，就随便问他说：“你是谁的徒弟？”青年似乎不了解潘永福同志问他的意思，或者还以为是看不起他的本领，便回答说：“你管得着吗？”潘永福同志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的老师不是马银，就是瑞管，再不就是长拴！”因为潘永福同志在这里只传

授过这三个人。那青年说：“咦！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姓潘？”

“你猜对了！”“我的老大爷，你好！”潘永福同志又问了问他住在哪个院子里，那青年回答了他。潘永福同志想了想当年的情况，记得有两个不到上学年龄的孩子，是弟兄两个，长得很好玩，算了算时间，该是这个青年这样大小了，便又问他说：

“你叫黑济呀还是叫白济？”青年说：“我叫黑济！”潘永福同志又问黑济爹娘的好，黑济说他们都去世了，彼比感叹了一番。潘永福同志顺便又问讯了马壁以北的招贤、东李、魏寨、建始等各渡口老船工的消息，船已靠了岸，就和这青年作别，往校场村去了。

马壁、招贤、东李、魏寨和建始这五个渡口的老一代的船工，全是潘永福同志教会了的。原来安泽县只有孔滩一个渡口有船，船工也是沁水人，父子两个同撑，不传外人。潘永福同志当年在马壁打短工，马壁人听说他会撑船，就集资造了船请他撑。他又回原籍找了个帮手，就在马壁撑起船来，并且带了三个徒弟。上游招贤、东李、魏寨、建始等村也有摆渡的需要，就先后造了船请他去撑，并请他带徒弟，因此五个渡口的老船工都是他的徒弟。

潘永福同志住在校场，有一天晚上到招贤去看他的老朋友们（也就是徒弟，因为年岁相仿，所以彼此都以老朋友看待）。他刚到了一家，村里人就都知道了，凡是熟人都抢着来看他，后来连四五里以外别的村子里的人也知道了，也有些赶来看他的，有点象看戏那样热闹。老朋友们都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也兴奋得睡不着觉，有几位老朋友特地给他做了好饭请他吃，一夜就吃了好几顿。

他为什么这样受人欢迎呢？原来他在这里撑船的时候，每

天只顾上渡人，连饭也顾不上做，到了吃饭时候，村里人这家请他吃一碗，那家送他吃半碗，吃了就又要去撑船去了。他是个勤劳的人，在谁家吃饭，见活计也就帮着做，因此各渡口附近村庄的庄稼人们对他都不外气。他还有个特点是见别人有危难，可以不顾性命地去帮忙。为了说明他这一特点，不妨举个例子。

他在招贤渡口的时候，也是一个晚饭后，有一伙人要到对岸一个村子里看戏，要求他摆渡。他说：“我还没有吃晚饭，饿得很，撑不动了！”其中有几个和他学过几天的人说：“我们自己来吧！”说着就都上了船，把船解开。潘永福同志对他们的技术不太相信，虽然也未加阻拦，可是总有点不放心，所以当把他们把船撑开的时候，自己也未敢马上走开，只站在岸上看着船向对岸前进。沁河的流量虽然不太大，可是水流太急，而且上下游隔不了三里总有乱石花坡，船只能摆渡而不能上下通行。在摆渡的时候，除了发洪期间在篙竿探不着底的地方用划板划几下外，一般只靠划板是划不过去的，全凭用篙撑；撑的时候，又要按每段水势的缓急来掌握船身的倾斜度。坐船的人，看了船身的斜度和船工用力的方向，总以为船是向对岸很远的上游进行的，可是在客观上靠岸的地方只是个正对岸，在水大的时候往往还要溜到下游一半里远。假如在水急的地方把船身驶得斜度小了，船头便会被水推得颠倒过来。船头要是打了颠倒，便要迅速地往下游溜，几棹板摇得扭回头来，也会溜出里把远；要是水太急了，马上扭不过来，溜到乱石花坡是非被冲翻了不行的。潘永福同志开头看见他们撑得还正常，可是一到了中流，船打了颠倒，飞快地顺水溜走；坐船的人都直声喊叫起来。潘永福同志知道凭那几个人的本领，在一二里内是拨

不回船头来的，因此也忘记了肚子饿，也顾不上脱衣服，扑通跳下水，向着船游去。撑船的那两个人倒也把船头拨转回来了，只是拨得迟了点，船已溜到个两岔河口的地方。河到这里分为东西两股，中间水底有块大石头挡着一堆小石头。船头被隔在这石头上，船尾左右摇摆着，好象是选择它倒向哪一边溜得更顺利些。西岸上有些人早已发现船出了事，喊着从岸上往下游赶，赶到这里见船被隔住了，可是也无法营救。这时候，潘永福同志赶到，站在几块乱石上，一膀把船尾抵住，两手扳住底部使它不得左右摇摆。照这地方水的流速，不用说逆水行船往上游撑，就是往东西两边撑也是撑不过去的。船上的人向潘永福同志要主意，潘永福同志说：“西岸有人，要是带着缆绳头扑过西岸去，叫大家拉住绳顺着水势能拉得靠了岸；可惜我现在饿得没有劲了，要是扑得慢一点，船要被冲得溜起来，我一个人可拖不住它！”坐船的人，有拿着油条和糖糕的，拿出来给潘永福同志吃。潘永福同志两只手扳着船尾的底部腾不出来，就叫船上的人往他嘴里塞。可是水淹在他脖子根，直着脖子不容易咽下东西去。船上的人先给他塞了个油条，他咽不下，吐出去说：“油条吃不下去，快拿糖糕来！”船上的人，喂得他吃了十多个糖糕后，他吩咐船上人把缆绳盘顺搁到船边，把绳头递给他。船上的人，一边照办，一边向西岸的人打过了招呼，潘永福同志便丢开船尾，接住绳头，鼓足了劲，拼命地向西岸扑去，不几下子就扑过翻波滚浪的急流，到达西岸，和岸上的人共同把船拉过去。满船乘客全部脱险。

象潘永福同志这样远在参加革命之前就能够舍己为人的人，自然会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所以他走到离别十八年之久的地方，熟人们见了他还和以前一样亲热。

为何要到安泽去？

潘永福同志是沁水县嘉峰村人，离安泽县界有百余里，为什么会到那里去当船工呢？这至少也得从他的青年时代谈起。

潘永福同志是个贫困农家出身。当他小的时候，家里因为地少人多，欠下好多外债；一到他能劳动，就给别人做短工——欠谁家的钱，就得先给谁家做，经常是做了工不见现钱，他的体力强，做活一个足抵两个人，到了忙时候，债主们都抢着要他，天不阴就会有好几个人找上门，往往还因为争他而吵起来。他不做日工活，只做包工，因为他家欠的外债过多，做日工实在还不了几个钱。他包下的活都能保质保量，又能完成双工的任务。例如担粪，别人每次担两桶，他一次要担四桶。

农家活总有个忙闲，打短工不一定通年有人雇用。在没有人雇用他的时候，他不得不找一些生产门路。他小的时候，夏秋两季常在村外的沁河里玩水，练得个游泳的技术，所以后来在农忙的间隙没有人雇用他的时候，他和一位名叫何田的伙伴，常到沁河里摸鱼、捞鳖。他们真有点发明创造精神：把河边浅水处用石头垒成一道临时小堤，让这浅水与深水隔绝，只留一个口，浅水里撒上有几粒麦子的麦糠。这泡过麦糠的水从他们留的那个口里流出去，水里带有麦味，老鳖就顺着这味儿来找食物。到了夜里，他们把口一堵，就在这小堤里的水里摸，往往一次就能捞到几十个。沁河里较大一点的有鳞鱼不易捉到，因为鱼太稀，用网不能捕；有鳞鱼的动作迅速，用手捉不住。能用手捉的只是老绵鱼，不过捉它的人要会泅水，要钻到光线不足的水底石坎中去摸。潘永福同志就有这个本领。

嘉峰村渡口上的船工叫马成龙。潘永福同志到河里捉鱼的时候也常帮他的忙，日子多了，从他那里学得了撑船的全部技术。不过这种工作没有报酬。住在河边村子里的人们，就有一些爱尽这种义务的，和爱唱戏的票友一样。潘永福同志开始学渡船的时候，也只是马成龙的票友。

潘永福同志在打短工的开头几年里最怕过冬季——冬季里除了打窑洞、垒地堰外，很少有人雇短工。在夏秋两季，闲下来还可以摸鱼，一到冬季，就连鱼也不能摸了。后来潘永福同志找到了冬季的生产门路。村里有个土法凿井的老行家马老金，每到冬季就在邻近各村包打水井。马老金要找一个帮手，不过这个帮手需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体力强，手眼快，遇了险不手忙脚乱，受了伤不大喊小叫。马老金选来选去，觉着潘永福同志最适合自己的要求，就拉作帮手。用土法包打水井，和一般工头剥削工人的包工有区别：打井是包井下不包井上，而井下的活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包”的意思，就是和要打井的东家定下条约说：“你也不用管我误多少工，打成这眼井你给多少钱。所有井里误的工都是我的，井上绞辘轳或者拉滑车的笨工是你的，几时打成几时算数。”做这种井底活危险性很大：各种土质有各种打法，弄错了塌下去会把自己埋在井底。井上要是遇了毛手毛脚的人，土筐、水桶、石块、铁锹等物，常会因为拴得不牢、扳得不稳而飞落下去，躲闪不好就要吃亏。他们自己常说：“赚这种钱是卖命钱。”潘永福同志跟着马老金做了几冬天，又学得了打井的全部技术，也会找了帮手去赚这种卖命钱了。

在旧中国，欠债多的穷苦人，任你怎样勤劳也不得翻身。潘永福同志学会了赚这卖命钱之后，真要是卖掉了命的话是自己

的，赚了钱却还是债主的。他到哪村去包打水井，也不是一天半日可以成功的。债主们的耳朵长、打听着他包工的地方，就找到那个打井的东家，同着潘永福同志，当面把包工的工资拨给他抵利息，往往一冬天得不着个现钱。一九三一年冬天，潘永福同志不但打了一冬天井没有得着现钱，过年时候连家里剩下的百把斤口粮也被债主倒光了。在这年过年关的时候，潘永福同志就跑到安泽县去。

安泽的旧县名叫“岳阳县”，和沁水县的北部连界，是沁河的中游。这地方全部是山区，土山多，地广人稀，可以开垦的荒山面积很大。本地人往往是地主，外省外县到这里开荒的和打短工的很多。安泽附近各县有句俗话说：“措不响，上岳阳”，意思就是说措打不开了，可以到安泽去打短工或者开荒。潘永福同志也是抱着这种打算往安泽去的，只是去的时候是个冬天，没有多少短工可做，找到点杂活也只能顾个吃。但是在潘永福同志看来，这样也比在家强，只要冬季一过，赚钱不论多少总能躲过债主的监视——把钱拿回家去虽说大部分还是还了债，但债主摸不着自己的底，总还可以留一点来解决一下全家的生活困难。他本来也想打短工或开荒地。后来因为那地方缺船工，才开渡口撑船，但在他所在渡口的荒沙滩上也还种一点农作物来作为附带收入。

潘永福同志在安泽撑了十年船，起先每年还回一两次家，抗日战争开始后，有二三年没有回家去。

抗日战争初期，他在东李渡口上。有一个短时期，渡口两边的村子里，一边住的是蒋军，一边住的是八路军。他是一个船工，每天忙于摆渡，也顾不上多和军队接触，不过他在这两边都走动。对于这两种军队的区别，他理解得很简单——一只知

道蒋军打人，八路军不打人。后来打人的军队不知去向，不打人的八路军向南开动了。他打听得不打人的八路军开到自己的家乡，也就跟着回了家。

这便是潘永福同志参加革命以前的生活概况。在这种苦难日子里，把他锻炼成一条铁汉。有一些互相对立的日常事物，在潘永福同志看来差别不大——屋里和野地差别不大，水里和干地差别不大，白天和夜里差别不大，劳动和休息差别不大。若用“吃苦耐劳”等普通字样，是不足以说明潘永福同志这种生活风度的。

干 部 新 风

一九四一年，八路军的地方工作队到了潘永福同志的老家嘉峰村，他也赶回了家。这一带原来驻的军队是蒋介石的第三十三军团，后来这部队被敌人打散了，遍地都成了溃兵：嘉峰南边相隔十里的王村又已变成维持敌人的区域，所以这一带的群众，只要是看见军队，用不着看臂章就知道不是来干好事的，马上跑个光。八路军的地方工作队初到嘉峰村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潘永福同志回到村后，无形中做了工作队的义务宣传员。他宣传的内容只有一句话：“这队伍不打人。”这句简单的话效力很大，他的穷朋友们听了，马上跟他先回了村，其他人也慢慢试探着都回去了。

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把周围的土匪溃兵肃清以后，环境变得单纯了，嘉峰村变成了和日军相持的边缘，群众组织起来在村南边布下岗哨，监视着通往维持区的要道。潘永福同志是夜里在野外活动惯了的人，不论该不该自己的班，夜里都好到那里

去看路上的动静，一发生变故马上就报告工作队。工作队见他和他的几个穷朋友们大有舍己为人的精神，就吸收他们入了党。

嘉峰村建立了地方政权，第一任村长是王思让同志，潘永福同志是村供销社干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村干部，从外表上看，和群众无大区别，潘永福同志在这方面更突出——完全和他打短工时期的打扮一样。有个外村的老相识在路上遇上了他问他说：“听说你当了干部了，你怎么还是这样子？”潘永福同志反问他：“干部该是个什么样子？”问他的人马上也拟定不出个干部样子来，只得一笑而罢。

潘永福同志当了干部以后，不但外观上没有变化，工作和生活也都按着自己特有的风度发展着。为了说明这一点，也举两三个例子：

一、搭 桥

嘉峰村东北方向五十里外的玉沟村，开了个为沁水民兵制造手榴弹的工厂。这工厂烧的是阳城煤，运煤时候需要在嘉峰村过沁河。沁河上过渡的习惯，夏秋两季用船，冬天冰冻以后至春天发洪之前用桥。每年搭桥的时间是寒露以后——早了水大，迟了水凉，所以选择在这个季节。这年冬天，因为南边离八里的王村成了维持区，群众宁愿自己不过河去，也不愿给敌人制造方便，在非过不可的时候可以多绕四五十里到上游去过别村的桥。嘉峰村的人事先没有想到五十里外玉沟工厂的需要，等到工厂缺了煤找到嘉峰来的时候，搭桥的地方已经被冰封了。上级要求嘉峰村想法子，村长王思让便和会搭桥的党员干部潘永福、何启文等同志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地方，桥的构造是用两根树杈顶一根平梁算一个桥脚，一个个桥脚中间都用五六根长的木料连接起来，上边铺上厚厚的灌木枝条，然后再垫上尺把厚的土把它压平。这些木料都很笨重，在水里边推来拉去倒不太费气力，只是想把顶着横梁的桥脚竖起来就不太容易。竖的办法是用好多人在两岸拖着一股大绳，再用几个人把桥脚从水里拉到应竖的地方，拴在大绳上，自己扶着让岸上的人拉。用对了劲，一拉就竖起来了。活儿倒也有传统办法，只是时间不对，河被冰封着，冰又只有寸把厚。人到冰上，怕把冰压破了，破冰下水，人又受不了。党员们研究了半天，更巧的法子想不出来，也只好破冰下水。王思让同志勇敢得很，把冰打开口，他就先跳下去。可是他的身体没有经过更多的风霜锻炼，一下去就抖得倒在水里。在打开的冰窟窿里倒下去，马上便会被水推到下游的大冰层下，潘永福同志见势不好，跳下去一把把他抓出来。这时候，王思让同志的皮肤已经变成黑青的了。

潘永福同志是在河里井里泡惯了的，何启文同志也是年年搭桥离不了的人物。岸上的同志们搬运着木料，这两位英雄下了水，打开冰道，送过大绳，来来往往拉木料、扶桥脚……终于在这冰层包围中完成了上级党给予的任务。两个人的腰上、肚上、胳膊上，被顺流而下的冰块割成了无数道的大小创口，只有腿部藏在水底，没有受到冰块的袭击。

二、借渡口

在潘永福同志当区长时候，有一次，敌人集中了大于我们当地驻军十多倍的兵力来“扫荡”这个地区，沁河以西有我们一

部分部队一定得渡过沁河转到外线。领导方面知道潘永福同志是撑船能手，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潘永福同志接受任务后，马上跑到离区公所十五里路的张山去找部队。他向部队的首长说附近几个渡口船太小，恐怕一夜渡不完；王村的船大，可是维持区，要是把维持会的人挟持住，夜里可以在那里摆渡。部队同意了他的建议，就派了几个便衣，由他领着路，到王村去找维持会。他们走到王村村边，碰上了一个人。潘永福同志要这个人带他们到维持会去。这个人便带他们去了。走到维持会门口，潘永福同志同那个人走进去，便衣在外边守着门。一进了屋子，静悄悄连一个人也没有。领路的那个人向潘永福同志说：“你坐一下，我给你找他们去！”说着就走出院里来。潘永福同志见那个人神色不正，怕他搞鬼，略一思忖便跟了出来，却不见他往哪里去了，问了问门外的便衣，说是没有出去；又返回院里来，见有个通房后厕所的小门，情知是从这小门里跑了。潘永福同志马上向门外的便衣说明了情况，并且又向他们说：“你们监视住河边和村西头的路，不要让有人过去，就出不了事，让我亲自去找撑船的人去！”潘永福同志和这里的撑船的人都很熟识，一会就把他们都找到了。这时候，太阳已经落了，清除了一下船里渗漏进来的积水，吃了些晚饭，部队就开到了。

潘永福同志和王村的船工们共同撑着船，先送过一部分机枪手们到对岸山头上布了防掩护住渡口，然后才渡大队人马。船开得也不慢，只是人太多了，急切渡不完。潘永福同志见深处没有几步，绝大部分淹不住人，就跳下水去拉住缆绳在前边拉，王村有几个船工也跳下去帮着他拉。这样拉的拉、撑的撑，船比以前快得多，一趟又一趟，还不到鸡叫就把全部人马渡完了。部队的负责同志临别的时候向潘永福同志说：“潘区

长！谢谢你的帮忙！敌人很快就会侦察到我们在这里过渡！你也要马上离开这里！”

潘永福同志向来觉着工作和休息差别不大，可是这一次碰上了例外：他跑了几十里路，找了半晌人，又拉了多半夜船，算起来已经连续劳动了二十个钟头了。打发部队走后，他本想马上离开王村，只是走到村边，身子便摇晃起来，再勉强走是会摔倒的。王村靠河的那一边，支着一排喂牲口的石槽。这时候，潘永福同志已经走得寸步难挪，就穿着一身湿透了的衣服睡进一个石槽里，一闭上眼就睡着了，等到他一觉醒来，天已大明。他一见天明了就觉着有点不妙，慢慢抬了抬头，一只眼睛沿着石槽边向河边一看，不知几时开来的日军已经把这一段河边的空地坐满了。他不敢坐起，急忙扳住石槽的另一边一骨碌滚出背着敌人这一边的地上来，然后爬起来就往山上跑。不巧的是敌人已经在这山头上放下岗哨，一见有人跑上来就开了枪。潘永福同志往旁边一绕，仍然跑他的，身旁边的飞弹吱吱地越来越密，好在抢了几步跳到一条土胡同里，顺住土胡同可以跑到另一段沁河边，他也不管后边的子弹来得怎样密，反正有土胡同隐蔽着打不到身上，就这样跑到河边游过了水，不到晌午又回到他的区公所。

正因为潘永福同志是这样一个苦干实干的干部，在他影响下的群众都十分喜爱他，到处传颂着他一些出格的故事，甚而还有人加枝添叶地把一些故事神话化。在潘永福同志自己，却不曾有过丝毫居功的表现，平常时候在办公之余，仍然和区公所的同志们扛着锄头或挑着粪桶，去种他们机关开垦的小块荒地，和打短工时代的潘永福的神情没有什么区别。

正因为他喜欢实干，所以坚决反对虚伪的俗套子礼节。一九四九年他被调回县里去作农林科长，区公所的同志们要举行个送别的仪式。这种仪式已经形成了俗套，办法是被送的人走在前边，同事们和一组八音会的音乐跟在后边，慢慢摆开八字步走出区公所所在的村镇，和旧时代的送龙王回宫差不多。潘永福同志根本不赞成这一套，不过在送旁人的时候，怕被送的同志多心，也不便反对；现在轮到了送他自己，他想免一免这套过场。可是有些同志诚心诚意要那样送他，说死说活不让免，他也马马虎虎同意了，等到送他的那天早晨，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却不见他出来和大家打招呼，有人进到他屋里去看，床上只剩了一条席子，潘永福同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挑着行李走了。这也不奇怪，他原来就是个认为白天和夜里差别不大的人。

经 营 之 才

潘永福同志是实干家，善于作具体的事，而不善于作机关工作。一九四九年他被调到沁水县当农林科长。这时期的农林科是新添的部门，从前没有传统，科技人员又缺乏，虽然挂着个指导农林生产之名，可是和实际的农林生产接不上碴。潘永福同志失去了用武之地，摸索了二年也没有摸索出个道理来——后来换了别人也同样对实际的农林起不到指导作用，原因在于那时候的生产资料还属于个人所有，单纯科技的部门指导不了那样散漫的单位。

一九五一年，潘永福同志又被调到县营农场。这也是个新添的单位，归县里的农林科领导，但是潘永福同志觉着这要比当农林科长的工作具体得多。有他个老相识以为他是降了级，

问他犯了什么错误。他说：“我没有犯错误，到这里来是党的需要。”

在一九五一年以前，认识潘永福同志的人，往往单纯以为他是个不避艰难的实干家；自他被调到农场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里，才又发现他很有经营计划之才，不过他这种才能仍然是从他的实干精神发展来的。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举他三个例子，而且第二个例子比较长一点：

一、开辟农场

沁水县要开辟一个县营农场，而这个农场要具备企业和试验两种性质。地址准备在沁水县东乡的端氏镇，共有土地七十亩，三十亩山地，四十亩平地，职工的住址是镇中间的城隍庙。

潘永福同志到任后，首先感到不合适的是这个住址——上街倒很方便，往地里去便差一点。后来他和镇里交涉，把城隍庙换成了南寺，就比较好些了。

再一个成问题的事就是那三十亩山地。这三十亩地离人住的地方有五里远，还隔着一条小河，土质不好，亩产只是百把斤，不论从企业观点和试验观点看来，价值都不大。可是那时候的土地还是个人所有制，这三十亩地是未被分配过的地主土地，其他已分配了的土地各自有主无法调拨。潘永福同志曾向一个农民提出过调换土地的要求。那个农民提出的条件很苛刻——三十亩远地换他近处一亩菜地，还得倒贴他十石小米。潘永福同志一计算，三十亩地一年的产量也产不够十石小米，三十亩换一亩再贴一年产量，这买卖干不着。

换不成，只有农场自己来种了。潘永福同志是种过远地

的。他知道这三十亩地种好了能把产量提高一倍，可是从企业观点上看，提高一倍也还是不合算——共产六千斤粮，按六分一斤折合，共值三百六十元；但想种好须得两个长期农业工人，每人每年工资以二百四十元计，须得四百八十元，一年净赔一百二十元。这买卖还是干不着。

隔了几天，潘永福同志对这三十亩地终于想出了应用的办法。他见端氏镇的农民种的棉花多，牲畜饲草不足，自己农场养的牲口也要吃草，草价很高，就想到种苜蓿。种苜蓿花的工本都很少，二年之后，三十亩苜蓿除了自己牲口吃了，还能卖很大一部分；再把地边种上核桃树，又能卖树苗，算了算细账，收入金额要超过粮产，而节余下的劳力用到近处的四十亩地里，又能赶出一部分粮来。账算清了，他便把这三十亩远地种成了苜蓿和核桃树。到了一九五三年，端氏镇成立了青峰农业社，更扩大了棉田，牲畜的饲草更感到不足。这时候，农场的三十亩苜蓿已经发育到第三年，根深叶茂，长得有一腿多高，小核桃树也培养得象个样子了。青峰农业社提出来愿意用镇边的十多亩菜地来换农场的三十亩山地和这地里的苜蓿、树苗，潘永福同志一计算，光三十亩苜蓿的收入也要抵住三十亩中等棉花，只讲经济价值农场还吃一点亏，但是为了便于集中经营，把地换得近一点也还是有益的事，所以就换过了。要按当年那个单干农民向农场提出来的苛刻条件，换这十多亩菜地，须得三百多亩山地，还得贴一百多石米。

农场的第三个问题是作农事试验的问题。这事潘永福同志自己不在行，又没有这种专门人材，光靠几个上过短期训练班的技术员，也搞不成什么名堂，和实际农业生产还是碰不了头，对企业收入又要有所妨碍。潘永福同志见当地有些群众有

到外地买生产树（即干果、水果、花椒等树）苗的，就想起试种树苗来。他想这样既能满足群众需要，又能兼顾企业收入，是件可干的事，问了问县里，县里也说可以干，于是就决定种树苗，种了几年，群众有树苗可买，十分满意；农场也因此增加了企业收入。后来县里见他这样做的成绩不错，干脆把这农场改为育苗场了。

潘永福同志从开办这个农场起，鉴于场子小、工人少、干部多，有碍企业，就和工人们在田间作同质同量的活，直到一九五四年他被调往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为止，始终不变。

二、小梁山工地

一九五九年冬，潘永福同志担任沁水县工会的主席，同时他又是中共沁水县委委员，被领导方面派往县东乡的蒲峪沟经修水库。

这年冬天，沁水县要开两个中型水库——较大的一个是由省投资，名山泽水库；其次一个就是这蒲峪水库，原决定由专区投资，后来因为由专区经修的水库多了些，又改作由县投资；两个库都由县里派人经修。

潘永福同志接受任务后，于十月二十七日随同十三个下放干部来到蒲峪。这时候，各公社派来的民工，离得近的也来了一些；县里早已通知水库附近村庄给他们找下了住处。

潘永福同志先到技术员已经画下的库址上看了一下，又上下跑了一跑，觉着库址有点不合适，不如往下游移一移，找了一会技术员，有人说技术员已经往其他小型水库上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

库址没有落实，坝基不能挖，只得先找一些别的活做。潘永福同志见工地附近有几孔多年没有住过人的旧土窑洞，就和同来的同志商量先拨些人收拾一下给将来的指挥部用；决定以后，就打发了几个同来的同志到附近村里去找先到的民工，自己也拿了带来的铁锹参加了这项劳动。

他走到一孔破窑洞旁边，见这孔窑洞的门面已经塌了，塌下来的土埋住了口，只剩一个窟窿还能钻进人去。他对这一类地下的土石工活也是老行家，认得该从哪里下手。他看准了土的虚实，就慢慢从上层挖虚土。一会，被拨来的民工也都陆续来了。有几个民工见这里已经有人动开手，也凑到这里来参加。一个民工问潘永福同志说：“你是哪个村人？”潘永福同志说：“嘉峰村的！”“参加过水库工作没有？”“还没有！”那人见他说没有参加过水库，觉着不足以和他谈水库上的事，就转问另一个民工说：“可不知道这库是国库呀还是私库？”那个人回答说：“这样大的库，大概是国库吧？”潘永福同志听了莫名其妙，就问他说：“怎么还有私库？”那人说：“你们没有做过水库工的人不知道：国库是上级决定的，由上级发工资；私库是县里决定的，不发工资，只把做过的劳动日记录下来，介绍回自己家里的生产队里作为分红工。我看这个库是私库！”“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山泽水库是省里决定的。往山泽去的民工，都有公社干部参加带队；来这里的民工，没有人带队，只让各自来：不是私库是什么？”“管他是不是国库？把工介绍到队里分红还不一样吗？”“怎么会一样？国库的工资高！”潘永福同志觉着他这种看法传播到民工头脑中，对工作很不利，正想批评他一下，另一个民工替他说了话。这个人 and 原来说话的那个人认识，很不客气地批评他

说：“你这家伙思想有问题！把工给你介绍回队里去分红，还不和你在家劳动一样吗？你是来修水库来了呀，还是来发财来了？”这个人不说话了。停了一阵，另几个民工又谈起到别的水库上做工的事来——哪个水库吃得好，哪个水库有纪律，哪个水库运输困难，哪个水库吃菜太少……好象他们都是不只在—一个水库上做过工的。

潘永福同志把他们谈出来的事暗自记在心上，作为自己的参考，并且趁大部分民工还没有发现他是县里派来的领导干部之前，又到其他做零活的民工中参加了两天劳动，访得了更多的参考资料。

这时候，民工大部分来了——原调二千人实到一千四五百人；原调三十头牛，实到十三头。人来了就得组织起来干活。全体民工中只有一个公社来了个干部，其余都是各自来的，只好按地区民选干部，经过动员、讨论后，选出班、排、连、营、团各级负责人和司务长、炊事员等。

组织就绪，就应该开工了，只是技术员没有回来，坝基迁移问题不能决定。潘永福同志这时候又想出新主意来。他想：民工住的村庄，离工地都有几里远，每天往返两次，多误一个半钟头，用在工作上的劳力就等于打了八扣，不如就附近打一些窑洞，让全部民工都搬到里边来住；窑洞里挖出来的土垫到坝上，也和取土垫坝一样，并不赔工。主意一定，就从民工中选拔打窑洞行家，共选出四十个人，每人带粗工二十余人，选定了地址，五十多孔窑洞同时开工。此外，牛要吃草，到附近公社去买，运输不便，又决定选出人来在就近坡上割干白草——每割三百斤草算一个工，共割了三万斤，一直喂到来年青草出来还没有用完，改作柴烧了。

山泽和蒲峪两库都开了工，物资、工具、运输力都感到不足。潘永福同志想尽可能靠自己解决一部分困难，就发动民工自报特技，计报出铁匠十人（用五人）、木匠二十六人、石匠十三人、编筐匠二十人（用十人）、修车三人、缝纫一人（愿自带机）、剃头三人、补鞋二人……所用工具、各自有的回家去取，没有的买得来就买，买不到就借，也买不到也借不到的，等铁木工人开了工就地打造。后来各个行业都配备成套，就地试验取得定额，从此蒲峪水库工地上，放牛、割草、割荆、编筐、自己打铁、自己造车、理发店、补鞋摊、缝纫房、中药铺……各行各业，花花朵朵，在这荒无人烟的山谷中，自成一个新天地。有些民工说这里象个小梁山寨，比得有点道理，此是后话。

这样虽然能把一大部分民工临时用在为工程服务的工作上，但总还用不完，正经工总得施。潘永福同志自己对这样工程技术没有学过，只得尊重技术员的安排，把其余工人调到已经制定的坝基上去做清基工作。做了两天，县里派一位李思忠同志到这里来看开工情况。李思忠同志是一位水利工程的老技术员。潘永福同志把他领到工地上，向他说明自己的改变坝基的打算。潘永福同志说：“从这里修坝，库容小，又是运土上坡，往下移一移，库容要比这里大几倍，又是运土下坡，卧管用的石头又能就地起取，不用运输。依我看是移一下合算，可是技术员不在，我自己又是外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李思忠同志上下察看了一会，说：“你的看法完全对！应该移！”潘永福同志说：“要可以的话，早移一天少浪费好多工。责任完全由我自己负，在技术上我听你一句话！你说可移我马上就停了上边的工，明天就移过来！”李思忠同志又答应了句肯定的话，第二天就移到下边新决定的坝基上重新开了工。

又隔了两天，技术员回来了。潘永福同志先向他说明了迁移坝基经过，并问他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技术员表示完全同意。潘永福同志又请他测算一下两个库址投工、投资、容水等项的差别，计算的结果是：原来的需工四十三万个，现在的是四十五万个；原来的需资二十五万元，现在的是三十万元；原来的可容水八十万方，现在的是三百万方。潘永福对于土石方工程做得多了，一看到投工的数字，觉着和自己的见解有些出入。他向技术员说：“我看用不了那么多的工，因此也用不了那么多的款。要知道原定的坝基是运土上坡，新改的坝基是运土下坡，一上一下，工效要相差两三倍。”

等到清完了坝基筑坝的时候，运起土来就是省劲，一个小车能推三百斤。取土的地形是开始走一段较平的坡，然后才是陡坡，可是到了陡坡边不用再往下推，因为坡太陡，只要一倒，土自己就溜下来了。有人建议用高线运输，潘永福同志说：“用不着！这种没线往下溜，要比高线快得多。”“那是技术革新！”“这比那还要新！”

在五十里外订购了些石灰。石灰窑上和工地定的条约是一出窑就得全部运走，因为他们怕停放下来遇上了雨淋化了。可是水库工地上只有那十几头牛，每次全部拨去也不够用，何况有时候还有别的运输任务。调牲口调不来，自己烧石灰又没有青石，也是个不好办的事。有人说打窑洞打出来的土里，有一部分蜡鬻石（是一种土色的石头，形状象鬻，俗名蜡鬻石），可以用来烧石灰。潘永福同志用做饭的小火炉试烧了几块，真可以烧成石灰，可是修成烧石灰的窑炉，就烧不成，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后来遍问民工谁见过蜡鬻烧石灰，有一位姓孔的（忘其名）民工，原籍河南人，说他听说过要在个两头透气的

窑洞里烧。潘永福同志根据老孔的启发，捉摸着打了个窑洞又去试烧，结果烧成了。一连烧了几次，取得的经验是一窑可烧一万三千斤，需柴（草柴）六至七千斤，时间是两昼夜零半天一次。一共烧成三十万斤，足够修这个水库用。这一试验成功后，附近各生产队曾派好多人来学习，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六零年春天，牛已经有青草可吃，把割下来没有喂完的干白草也作了烧石灰的柴。

种地的季节到了，潘永福同志见工地附近也有荒地，也有库容里被征购来而尚未被水占了的地，又有人粪、牛粪，又有用渠道正往外排的水，就想到自己种菜以免收购运输之劳，就又从民工中选出两个种菜能手，自己也参加进去，组成个三人种菜小组——在忙不过来的时候，由下放干部临时帮忙。后来生产的菜，除供全体员工食用外，剩下来的，每个下放干部还缴给县里一千五百斤生产任务。家里没有劳力的民工，有请假回去种自留地的，有特技的民工，因为工作离不开，不能回去种地，安不下心来，潘永福同志允许他们也在工地附近开垦小块土地，利用工地水肥来种植，产品归他自己。

有了这些安排，工程进行得相当顺利。不料到了夏季，发生了点小小变故——请假回家的人逐渐增加，而且往往是一去不回头。潘永福同志一调查，原因是从外边来的。原来山泽、蒲峪两个水库都不是单纯的拦洪库而是有活水的，可是因为地势不同，蒲峪的活水在施工期间可以由渠道排出，而山泽的活水则需要用临时的小库蓄起来。雨季来了，山泽的小库蓄着几万方水，而且逐日增加，一旦来个山洪冲破小库，说不定会把已经做起来的半截坝完全推平。领导方面急了，把山泽未完成的土方分别包给各个公社，限期完成。各个公社怕到期完不成任

务，只得增加民工，因为农忙时候劳力难调，有些就把蒲峪请假回去的改派到山泽去。同时，蒲峪库这时已经改为由县投资，“国库、私库”那种谣传，也影响得一部分落后的民工，以回家为名，暗自跑往山泽。潘永福同志见这原因不在工地内部，也想不出扭转形势的办法，只好每天向各公社打电话讨索请假回去的人。

有些公社，在潘永福同志去打电话向他们讨人的时候，他们说人走不开，问派些牛来能不能代替。潘永福同志觉着这正是扭转形势唯一的希望，赶紧和他们搞好具体的头数。一两天后，果然来了百余头牛，可是这些牛又都是骨瘦如柴，其中尚有一些带瘟病的。有些民工，认得一些牛是他们村里派往山泽工地的，就向潘永福同志说：“潘部长（他们爱称他这个老衙头）！这都是山泽工地上拉车拉垮了的牛！快给他们退回去吧！”潘永福同志说：“可是退不得！在没有劳力时候，这也是宝贝！”

“一个也不能用，算什么宝贝？”“在他们那里不能用，到咱们这里就有用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那里是运土上坡，路上又净是虚土。牛上坡一发喘，再吸上些灰土，就吃不进草去，怎么能不瘦？到咱们这里是运土下坡，开头拉得轻一点，每天少拉几个钟头，还是能养过来的！”潘永福同志收到这批牛之后，先请兽医检查过，把有瘟病的挑出来隔离开治疗，把其余的分为重病、轻病、无病三类：重病号除医药治疗外只放不用，轻病号每天使用四个钟头，瘦而无病的每天使用六个钟头，卸了车以后，都着专人成群赶到附近草坡上放牧。结果是瘟病的死了四头，其余的抢救过来；重病号养了一段时间又能拉车了；轻病号和瘦而无病的在使用中又都逐渐肥胖起来，恢复了正常的体力。原来是山泽把那些瘦牛病牛退还各公社以

后，各公社听民工们说蒲峪工地的牛养得很胖，就把这些牛派到蒲峪来养。这也可以说是“两利”，这批牛对后来蒲峪工地的继续施工，起到一部分主力作用。

因为民工减少，蒲峪水库直至一九六零年底，尚欠三万工未得完成，可是投资、投工都比原来的预算节约得多。

三、移矿近炉

一九六零年秋收时节，各个水利、基建工地要把劳力压缩一部分回农村去收秋，蒲峪工地只剩了三百来人。潘永福同志因为在这里领导修水库，长期把自己负责的工会工作托付给会里其他同志做着，这时候水库工地上人少事少了，便想趁空回县里看看去，于是把工地上的事托付给指挥部的同事们，自己便回到县里。

这时候，县西南乡的中村铁厂，正修建着五里长一段运矿的土铁路，也因为民工回家收秋而几乎停工。潘永福同志要到中村铁厂去，因为他又是县党委委员，县委会便托他顺路看一下有关土铁路的情况。他到达铁厂后，铁厂有人向他反映，有好多矿石已经从山顶用高线运输法运到了一个山沟里，只等这里的土铁路建成才能接运回来，要是土铁路停了工，矿石运不到，铁厂就不能开工。

潘永福同志觉着此事对铁厂关系重大，就到运输现场去观察了一番，见到的情况是这样：采矿的地方离铁厂十八里，地名轧儿腰，在一个山头上，原来有一条路可通胶皮大车。现在全线的运输设计是从矿洞所在的山头上把两条铁线架到个较低的山头上算作第一段高线，再从这较低的山头上把同样的铁线架到

山沟底，算作第二段高线。这两段高线已经架通使用起来，只是较低的山头上卸矿和装矿还放不到一个地点，因此第一段溜下来的筐子无法就原筐子转挂到第二段线上，还得这一边倒在地上那一边再拿筐子装起搬运到第二段线头上去挂。现在正在修建的五里土铁路，是准备用来接这已经溜到山沟里的矿石的，不过只能接到沟口的较宽处，再往里边还有二三里路便成了陡岩狭谷无法修通，只好用人担出来再往车上装。潘永福同志看了之后一合计，觉着这样是个傻事：高线上每筐只能装一百斤，狭谷里每人也只能担一百斤。每筐装一次只算五分钟、卸下来倾倒一次只算一分钟，每筐或每担装卸一次共是六分钟，每吨每段就得两个钟头，三段共是六个钟头。需用六个钟头才能把一吨矿石送到土铁路上的车子上，若用胶皮大车运输，走下坡路只架一个轱辘每次也能拉一吨，十八里路往返一次也不过用四个钟头。这套运法且不用说运，光装筐也比胶皮大车慢了。他把这意见向铁厂的负责同志一说，铁厂同意了他的说法，就把土铁路的工停下来。

潘永福同志在中村遇上了个老汉，也是旧相识。潘永福同志问他说：“你们这里除了轧儿腰，别处就没有矿吗？”“十八条也有！”“好不好？”“和轧儿腰的一样！”“十八条离这里多么远？”“就在村西头，离铁厂半里远！”“啊？”潘永福同志有点惊奇，接着便又问：“铁厂的人不知道吗？”老汉说：“说不清！人家没有和咱谈过！”潘永福同志又向铁厂说明了这个新的发现，并建议去刨一刨看。结果按照那老汉指点的地方刨出来了，和轧儿腰的矿一个样，只要查明蕴藏量够用的话，就用不着再研究轧儿腰的运输问题了。

以上三个例子，看来好象也平常，不过是个实利主义，其

实经营生产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实”利，最要不得的作风就只摆花样让人看而不顾“实”利。潘永福同志所着手经营过的与生产有关的事，没有一个关节不是从“实”利出发的，而且凡与“实”利略有抵触，绝不会被纵容过去。这是从他的实干精神发展来的，而且在他领导别人干的时候，自己始终也不放弃实干。

记 余

我对潘永福同志的事，姑且只写出这么多吧！假如同志们关怀到他现在的生活，我可以在这里加一点补叙：他现在在沁水县工会工作，没有随带家属（家属还在嘉峰生产队参加生产），只住了一个房间，房子里除了日用的衣服被褥外，没有什么坛罐罐。因为县工会只有五个人的编制，经常下厂矿平均就有三个，立不起灶，都在县委的灶上吃饭。他的衣服比他打短工时代好一点，但也还不超过翻身农民，和民工在一起，光凭衣服你还不会发现他是干部。按他应得到的干部待遇，下厂矿或工地可以骑骡子（因为山里行车不便，所以有此规定），但是他在百里之内，要不带笨重的东西，他仍是要步行的；要和挑东西的人在一块走，他觉着空走着还有点不好意思，因此在上水库工地的时候，还要捎带一二十斤炸药或三两根钻条。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写于山西长治）

杨老太爷

杨老太爷原名叫杨大用。在抗日战争之前，他家是个中农户，后来因为过灾荒年把土地押得只剩三亩，幸而以后赶上减租清债，才又被退回来。他虽然不识字，可有点小聪明。因为他老丈人在世时候在河南做过生意，他的小舅子当年利用商业界一些熟人跑个小买卖，带着他跑过几次河南，便引逗得他不想好好种地，光想发个小洋财。他有两个孩子，大的叫铁蛋，二的叫金蛋。铁蛋在抗日战争时期上过抗日中学，后来在边区政府做财粮工作；金蛋留在家里种地。

铁蛋是一九四一年上的抗日中学。那年铁蛋十五岁，长得聪明能干。村里回来一个在边区政府工作的同志，见铁蛋有点出息，就劝杨大用让他到抗日中学念书。杨大用相信他小舅子比他的见识高，就去找他小舅子问主意。他小舅子说可以去，并且还讲了一套他家祖传的处世为人之道。他说“见巧不讨，一行大罪”。说“人长到十五六就该出门去撞个事，识个路数”。说“多念几天书，混个事腿长，况且又是公费，千万不可放过这个便宜”。杨大用听了他这番教训，就让那位同志把铁蛋带走。

不过他的小舅子因为这事受了他几年窝囊气。铁蛋上学才半年光景，敌人来了个大“扫荡”，中学转移的新地址，和杨村这一带隔了敌人一条封锁线，从此杨大用再也见不着铁蛋。杨大用见了小舅子就说：“生是听了你的话把个孩子弄丢了”，

他小舅子每听到他说这话，就只好低下头说：“唉！人没有前后眼，不过说不定以后还会因此好起来哩！”接着往往是彼此不说话闷一会，到了要走开的时候，杨大用一边走着……一边说：

“好什么？再好还如得孩子在眼跟前……”

到了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之后，封锁线没有了，铁蛋也来了信，说是已经参加了边区政府，做财粮工作，并且已经结了婚。这消息传到了杨大用老婆的娘家，杨大用的小舅子马上就跑到杨村来探听。这次他很神气地向杨大用说：“我说的不错吧！念书人腿长——老师们、同学们人多得很，碰巧了有个连手，说上去就上去了！”杨大用听了这话，开头自然很高兴，可是紧接着对这种幸运就有点怀疑。他说：“有事倒有事做了，可是为什么不给家里兑个钱哩？”“骑着驴找马嘛！管财粮还怕没有钱取？不要着急！以后缺不了你的钱花！”

杨大用又等了一年，仍不见铁蛋寄钱回来；去信告了几次艰难，回信说现在干部是供给制，没有钱，并且说已经给村上去信，托村上对家里加以照顾了。

村长（是杨大用的一位本家哥哥）接住铁蛋的来信气得有点冒火。他拿着信找到杨大用家里向杨大用说：“土地给你退回来了，斗争果实你也分到了，父子们两条大汉种自己的地、过自己的日子，有什么困难？为什么写信去打扰孩子，让孩子怀疑这地方还没有做土改工作？”“我没有说这些呀！信是我念给他舅舅写的！”“你说退地来没有？说分果实来没有？”

“也没有！”“没有说那个，又说你有困难，难怪孩子不那样估计！现在我问你：你究竟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困难！我不过想说得困难一点，叫他给我寄个钱来！”“财迷转向！”

“这不是什么财迷：我打发他出去还不是为了赚个钱吗？他也

做了几年事了，为什么一个钱也不往家寄？”村长听了他这番话，觉着有点哭笑不得，便叹了口气说：“唉！除了分果实，开一万次会也请不动你！这除了怨我不会作工作还能怨谁哩？你以为如今的干部们还跟以前的官一样，人人都是为赚钱才去当的吗？土改工作队来了，赚了咱村多少钱？咱村在外边当干部的，大小也有三四十个人，他们都寄回来多少钱？”“可是我也这么大年纪了……”“连四十岁都不到，你多么大年纪了？”“……这二年腿也有点疼……”“要是还分一次果实的话，管保你还是比谁也跑得快！”“……难道跟孩子要个钱花也要错过了吗？”“唉！跟你这财迷着心窍的人说话，很难说明什么道理！做你的老太爷去吧！”村长说着便气昂昂地走出来，杨大用在气头上也没有出来送他。村长在里边说话的时候，有几个人站在窗下听，一边听着一边笑；等村长出来之后，有个好事的青年，跑进去看了看杨大用的脸，出来和外边的人们说：“老太爷的脸色跟烤过的红薯差不多！”

又隔了一年（一九四七年），刚收完秋，铁蛋回来了——个子长得比他爹还高，穿着一身整整齐齐的灰制服，背着一个四方背包，挂着一个小皮袋，和所有的解放军一样，背包外边插着一双鞋，皮袋带子上吊着个小搪瓷碗和一条洗脸毛巾，只有服装的颜色和军人的不同。他的面容已经没有当年离家时候的孩子气，只有眼神还象小时候那个劲儿——假如家里没有个金蛋来作比，谁也认不出他就是铁蛋来。

杨大用一家子见铁蛋回来，自然都是欢天喜地的。杨大用老婆拉住孩子前后左右看了又看，一边看一边说：“孩子长成人了！……好！拳大胳膊粗的！……你媳妇就不回来认一认家？”“她有工作，离不开！”

村里每逢着新从外边回来一个人，照例是街坊邻里挤下一屋子来问长问短。铁蛋是太阳没有落山就回来的，可是直到掌灯时候，来看的人还是往来不断。

吃过了饭，铁蛋的妈妈给铁蛋安排日程：“今天夜里淘一点麦子，明天前晌晒晒、后晌磨磨，后天蒸几笼馒头，大后天去看看你舅舅，大大后天去看看你二姨，大大大……”“妈！你快不要这样安排！我后天早晨就得走！”“这可由不了你！”

“自然不能由我：后天中午机关汽车在县里等我，晚上还要赶到专署集合！”杨大用一听这话着了急。他说：“不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光说说一天也说不完！”“多少事也得在明天一天办完！”……

“大用叔！开会！”一个青年闯进来把他们的话打断。这青年把眼睛凑近铁蛋端详着说：“这是个谁？”铁蛋也认不出对方是谁，但是他知道一定是村里的熟人，便一边拉住他的手一边问他爹说：“这是哪一位？”“是你后院三伯的老二嘛！”铁蛋想起来了：“福来！我是铁蛋！”“铁蛋哥！要是在路上遇着的话，我真不敢认你！”接着便和别的邻居们一样，问了一阵子外边情况，不过他是村公所文书来通知杨大用开会，顾不上象有些老人们那样多拉闲话，筒筒短短问候了一下，话又转入本题：“……铁蛋哥你歇歇，以后有功夫再谈！大用叔咱们走吧，别的人都已经到齐了！”“我不能去了！铁蛋回来我还没有顾上问问情况哩！”“不！村长说一定叫我把你请到”“金蛋不是已经去了吗？去一个还不行？”“不行！各是各的事！”“你回去吧，我一会就去！”“你可就来！”“对对！”福来只好暂且回村公所去，不过他知道再来两次也不见得准能请到。

大用和铁蛋在外间坐，铁蛋娘在套间里坐；外间点着灯，套间里没有点灯。福来出去后，铁蛋娘从套间里伸出头来说：“他爹，你进来一下！”大用进去了。铁蛋娘悄悄说：“孩子走野了，得屈一屈他的性子哩！千万不要放他后天走！”“这个自然！最重要的是得套出他的实话来——究竟一年能落多少钱！”

他们才说了这几句悄悄话，福来就又返回来了。福来一进门先向铁蛋说：“铁蛋哥！村长正召集人开会，顾不上来看你！村长见我说你回来了，想请你在会上给大家讲讲话哩！”

“开什么会？我也没有个准备！”“南下民工家属大会！”“是那个会，好！咱们马上就去！我就是为这事情来的！”说着站起来就拉住福来的手往外走。大用从套间里伸出头来探望，福来一见就向他说：“大用叔！咱们一块走吧！只等你一个人了！”“好！你们走吧，我马上就去！”

“南下民工家属大会”是个什么性质的会议呢？原来刘邓大军要在这时候往大别山进军，因此要动员当地民工支援前线。这次动员的民工，和以前每个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不同——那是临时性的，这却要有一年半载的长期性，而且要经过好几个省，所以在选择的时候要选年轻力壮的，家里有两个以上男全劳力的，而且要本人自愿报了名、又得到家庭的同意。杨村的作法是先由在民兵年龄的人自愿报名，再由村武委会审查条件把不够格的抽去，再开一次家属会把家属的思想打通——打不通家属思想的可以不去。杨村的定额是十五名，报名的有三十二名，经过审查合格的有二十五名。当铁蛋回来的这一天，报名、审查两步工作都已经做过，只剩下打通家属思想这一步了。这种会议也已经开过一次。在开的时候，村长作过一次动员报告，并且

告大家说他自己带队去，请大家放心。报名的青年中间有杨金蛋，那次家属会议人来得不太齐，杨大用自然是个缺席的。在讨论的时候，有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说：“我们都是些老民工，运粮、破路、抬伤兵、送弹药什么没有干过？不用说叫孩子们去，就是让我们自己去，也不至于顶不下来。依我看这二十五个人中间，就怕金蛋有问题——‘老太爷’那一关先打不通！”另一个人开玩笑说：“‘老太爷’的话好说！你把他请得来让我跟他说！”“还跟你不说一样！只要你能请得来，说服的事包给我！”“……”讨论过后，村长说：“今天人也来得不齐，会就开到这里，不作决定。大家回去考虑考虑，和家里别的人商量商量，改日咱们再来商议！”铁蛋回来这天，是作最后决定的时候了。县里要各村在第二天把最后决定的名单送县，并且让决定去的民工积极作出发的准备，一礼拜以后就要出发。

福来先把铁蛋领到办公室，然后到会场上把村长请到办公室来。铁蛋和村长打过招呼。村长问他说：“你是请假回来看看呀，还是出差路过回来看看？”铁蛋说：“是出差路过！边府派到咱专署六七个人来了解南下民工动员情况。我前天就到了咱县，昨天在县里住了一天，问了问准备进度，县里说各村名单明天才能全部送到，大部分村庄的动员工作深入可靠，有一部分敌人没有到过的偏僻山庄工作差一点，不过先进村庄的超额数字满可以把额数补足，大体上没有问题。我趁这一天多的空子跑回来看看，后天上午要赶回县去；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后天下午还可以乘专署的汽车赶回专署去！”铁蛋又问村长本村的动员情况，村长说：“没有问题！保证超额完成！我自己带队去！”铁蛋说：“我也去！边府要去好几十个带

队的！”

村长让铁蛋给民工家属讲话。铁蛋进入会场，老长辈们很亲热地围住他问长问短，要他给谈谈解放战争形势。他先把各个战区的胜利谈了一下，又念了一些俘虏蒋军高级军官名单，接着便谈了一番革命要彻底的道理。他说：“……从咱这个解放区来说已经是全部解放了，可是要不解放全国，这个局部解放还不是完全可靠的！我们这老解放区，应该支援未解放区……”他讲完话之后，有个中年人向他说：“铁蛋！叔叔我是个直性子人，有话存不住！审查合格这二十五个人中间，就怕你兄弟金蛋有点靠不住，因为跟你爹说话很难说。你要能把你爹的思想打通，咱们这一项工作就算彻底完成了！”村长紧接着他的话说：“孩子才回来，你不要难为他吧！他这干部到县到专署说话还有人听，到他爹名下可说不应！不用跟他说了！少去一个也没关系！”

会散了，铁蛋在回家的路上打了打怎样说服他爹的主意。他从他爹寄给他的信上知道他爹思想落后，不过对那种落后的程度还估计不足，因此还想说一下试试。

他一进屋门，他娘埋怨他说：“怎么这时候才回来？早把你爹等急了！”铁蛋问他爹说：“爹！你怎么不去参加会？”

“你回来了，我有好多要紧话要跟你说，别的事哪里还放得到心上？”“什么事？你说吧！有什么想不开的，咱爷们商量商量！”铁蛋还以为他是不愿意让金蛋去当民工，所以才这样说。他爹先叹了一口气说：“唉！这叫我从哪里说起哩？减租清债那一年把咱的地都退回来了……”“好嘛！革命就是为了叫大家翻身嘛！”“……有地了，又参加了互助组……”“那更好！互助起来力量大！”“别人的力量大，咱可不大……”

“怎么不大，你和弟弟两个强劳力……”“什么强劳力？我这么大岁数了，腿又不得劲，不做吧，评工记分、等价交换，记不上工就得找人家工资；做吧，自己又做不动。跟别人两家分得了个小驴，也十来年口了，犁一天地只抵八分工……”“这都是些家常话，以后再谈吧！你不是说有要紧话吗？”“这就是要紧话，等我慢慢给你说！你舅舅的一个邻家，有个好驴，三尺四大，银灰毛色，四年口，生得又整齐，活儿又……”

“你说那干吗？我又不是贩牲口的！”“……生得又整齐，活儿又好，紧着要卖，才说一百五十万块钱（一万约合现在一元）。我想咱要把它买来，犁一天地准能评到十五分工，省得你爹这两条病腿到地里去受！”“你有钱吗？”“对！就是这个要紧！这就要你帮爹一点忙！只要你一百万，不够了爹自己筹划！”“我的爹呀！”铁蛋哭了，他没有想到他爹落后到这种程度。他想到刚才会场上那二十几个和自己爹年岁差不多的人那样关心国家大事，那样通情达理，又想到自己爹刚才说的那一番用驴工换人工的剥削计划，对比之下真见不得人，所以十分伤心。其实他了解得还不全面：用驴工换人工的理想他爹是有的，至于那一头三尺四大的好驴却并非实有其驴，不过是当他在会场上讲话的时候，他爹和他娘在他家的套间里共同编造出来的要钱的说法。铁蛋听了他这段瞎话之后，连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哭了一阵，打开背包，钻进被子里。

铁蛋睡了之后，他爹悄悄和他娘说：“要说的话都说了，还是不吐口！”“不吐口怎么办？”“明天去找他舅舅商量个办法！”

第二天早起，杨大用就去找小舅子。这个小舅子可真有些坏主意。他和杨大用说：“善钱难舍！你得摆出当家人架子

来压服他，就说‘你不给我赚钱我就不让你出去了’！”又给他计划了一些具体说法。

杨大用领了小舅子的高教，回来把铁蛋叫到跟前，照着小舅子教他的话说：“铁蛋！咱爷们话也不要往远处说，你一月到底赚多少钱？”铁蛋见他把肮脏思想不包不盖地露出来，也就不再替他伤心，直截回答他：“供给制干部要什么钱？当干部又不是做生意！”“不赚钱你就不要给我出去了！留在家里给我好好做庄稼！”“这可不能由你！我是国家的干部！”“我不管你是谁的干部，你先是我的儿子！”他把话说绝了，铁蛋便扭头往外走——想去找村长。“往哪跑？给我回来！”他爹随后追出门来。铁蛋跑到村公所，他爹追到村公所。村长问明了情由，想了一想便向他们说：“父子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你们先坐下歇歇，我还有点紧事要办，办完了给你们做个开解就完了！”他又转向文书杨福来说：“咱们先弄那个去！”说了就往门外走。福来想不起是什么事来，忙问“什么事”，可是当他问的时候，村长已经走出办公室，也只得跟出去。办公室留下了铁蛋他们父子两个，他爹坐在一把椅子上一言不发，他溜到福来的办公桌上看那还没有誊完的民工名册。

一会，村长和福来都回来了。村长看了铁蛋他们两个一眼，就向福来说：“这样吧：让他们面对面，说看就会顶起来。咱们两个人分分工——我把铁蛋领到他家去劝一劝，你在这里劝一劝大用，顺便和他提一提昨天夜里那事！铁蛋！你跟我回家去吧！”说了便领着铁蛋走出去。

福来向大用说：“老叔！金蛋要出省当民工的事跟你谈过没有？”“怎么出省当民工？我不知道呀！”“不知道回头再跟你谈吧！现在先来调解你和铁蛋哥争吵的事……”“不不

不！你还是先说金蛋的事！”“说金蛋就先说金蛋！”接着把金蛋报名的过程交代了一下。大用一听自然是跳起来了：“不行不行！你们村公所尽捉弄人！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背着 我 决定！”“没有背着！开了两次民工家长会，都没有把你请到嘛！现在还没有决定，一定得取得家长的同意才能决定！”“我不同意！”“不同意也可以，不过我可以给你谈谈应该去的道理！”“我不听！”“我们得把工作作到，你听完了要不同意还可以不同意！”接着又把全国形势和革命要彻底的大道理讲了一遍，比铁蛋头天夜里在会场上讲的要长得多。他还没有讲完，村长就回来了。大用一见村长，也不听福来讲了，转向村长说：“老哥！金蛋去当民工的事我不同意，说上两天也白说！”“你不同意不让他去好了！铁蛋那脾气真铤！我跟他说着话，一时没有留神他就背起行李来跑了！”“啊？”“就那么跑了！我和他娘撵了半天也没有撵住！”

这是村长叫福来用话把大用拉住，自己去把铁蛋放跑了的。他出了办公室门，走着路跟铁蛋说：“你爹的思想很落后，听上那个鬼舅舅的话，光想在你身上打点主意。你现在就到县里去吧，‘夜长梦多’，这家里待不得。你的行李打包现成了没有？”“没有！”“到了你家，我劝你，你不要理。你只管打你的背包，打好了你背起来一跑，我在后边一撵，你就算走开了！我也好交代你爹！”

铁蛋这次就是这样走开的。村里人背地里都埋怨大用说：“把孩子逼跑了，你可好好摆你的老太爷架子吧！”

（一九六二年一月写于太原）

张 来 兴

县里兴建的一座水库，早在三年前就落成了。水库里养的鱼很多，已经给这素不吃鱼的山区，形成吃鱼的新习惯。在一次县人代会开会期间，大会总务处为了让全县代表都赏识一下本县产的鱼，就决定在最后会餐的席上特加一道好菜——煎鱼。

要会餐了，招待所长廊式的餐厅上，餐桌排成了一个单行。这个招待所是由没收汉奸何老大的“何家花园”改建的。这餐厅原名“来爽轩”，建在荷花池边，隔着窗户可以赏花。人还没有到齐的时候，先来的委员们、代表们都临窗站着看荷花稀处的鸭子游动，等到招待员端上饭菜来，才都就座。

第三道菜便端上煎鱼来。鱼是整条煎的，都是三四斤重的中等个头。山区里近几年来虽然普遍吃鱼了，可是还没有煎整条鱼的习惯，因而也没有盛鱼的椭圆盘子。这次端上来的鱼，都是用茶盘大小的圆盘盛着的，鱼头鱼尾都闪出盘边之外。

没有吃过整条煎鱼的代表们，对着盘子发愣，不知该从哪里下筷，只好等有经验的代表们动手之后，自己再跟着来。有几张桌子上的代表们全是没有吃过整鱼的一一虽然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位或几位新选出的正副主席或委员作陪，可是陪客的不会吃也无法让客；桌子又摆的是单行，也不便于从旁参考——后来经过一番调整，才给每桌上至少调进去一个有经验的加以指导。

大家吃过几口鱼之后，有一位在南方住过的代表发议论

说：“这鱼煎得完全是南方的口味！这位领作的大师傅一定是南方人！”

第三桌上一位名叫王世恭的代表接话说：“你猜得有点道理，不过他不是南方人，是我村子里人！”

“那一定在南方呆过！”

“对！抗日战争以前，在亳州呆过二十多年；回家来以后，在抗战开始的前二年还在咱们县伪县政府财政局做过一年饭，后来因为脾气刚直，顶撞了局长，才被辞退了。那个局长也姓张，就是后来和地主何老大一起投了敌被咱们捉回来枪毙了的那个张维。”

“这位老师傅的岁数一定很大了吧？”

“七十五岁了，是我们村里年纪最大的老汉！这位老人家很不平常，骨头硬，当年在那个财政局里，把张维抢白得出不上气来！”

王世恭代表这么一说，大大引起了前后几张桌子上代表们的注意。坐在第一桌的县长听了，问一个端菜的招待员说：

“这位老师傅在咱们招待所参加工作吗？”招待员说：“没有！是咱们临时请来指导做鱼的！”县长敲了敲桌子说：“请各位注意：咱们用着七十五岁的老人给咱们做菜，我觉着有点当不起！咱们请这位老师傅到这里来喝杯酒好不好？”大家自然都赞成，可是让招待员去请了一次，回来说：“老张师傅说谢谢各位，他现在还腾不开手，等一会再来！”

就在老张师傅还未到餐厅之前这一阵子，靠近第三桌的一些人要求王世恭代表讲一些老张师傅在伪财政局的故事。王代表便作了如下的叙述——虽说他的话常被人打断，可是断断续续总算把老张师傅的为人讲明了。

我们村子里，从前有好多人在安徽的亳州做生意——各行各业里都有，老张师傅是当厨师的。

老张师傅名叫张来兴，当年在亳州是一把好手，后来因为脾气刚直，得罪了东家，东家便把他辞退了。他从亳州回来，便呆在家里学种地。他家只有三四亩地，顾不住生活，农闲时候，常到县城里来卖熏鸡。

他到那个财政局小灶做饭还是我介绍的。那是一九三五年的事。那时候我才二十岁，因为升不起学，在那个局里当录事。我听庶务员说要找一个厨师，便向他介绍这位张师傅。我说：“这人是一把好手，就是脾气有点太直爽。”庶务员说：“只要饭菜做得好，脾气没有关系——有什么脾气到衙门里都使不上。”话就是这样说定了，张来兴老师傅便到局里上了工。

以前听说这位老师傅有脾气只是“听说”，等他到局里来了之后，我才真正认识了他的脾气。他不象庶务员估计的那样怕衙门。他认理真得很，自己有理的事，连一句话也不让。

我和他因为是一个村子里人，所以当他在开过晚饭、洗过家具之后，我往往好到厨房里找他聊一聊。有一天，我又到他厨房去，他刚刚洗罢了碗，连炉边还没有擦。这时候，我已经听见对过局长室里有搓牌的声音。我指了指局长室笑着向他说：“今天都来得早！”他说：“早也得打到半夜，迟也得打到半夜！什么财政局？依我说不如干脆叫成牌政局！”

张维喊：“杜禄！开壶！”

杜禄就是咱们招待所灶上现在这一位杜师傅。他的手艺是跟老张师傅学的；这次老张师傅来指导做鱼，也是他亲自去请来的。当年间他才十七八岁，也在那个旧财政局里当差。

当时张维叫杜禄叫不应，就改叫“老张”，张师傅答应说：“壶还不开哩！”“杜禄哩？”“不知道！”我看了看，两把铁壶都正在火炉上开得翻滚。我说：“来兴叔！你替他送一下不好吗？”他说：“谁的事谁干！局长先叫的是他！况且提壶也该是他的事！”我说：“他是局长用熟了的人，你是才来的，还是让着他点好！”他说：“讨厌处就在这里！我这人就是见不得这种神气——说句话先把局长的旗号打在前边，好象他是局长的传令官！是我份内的事，传令我也没有什么说的，不是我份内的事，谁想要我做，谁就得和我商量，传令不行！”

谁介绍的人谁关心。当时我听了他那番议论，担心他和杜禄的关系搞不好，可是又过了不几天，他们的关系就变好了。发生变化的关键是这样：

张维这家伙好应酬，每天晚上不是约几个人来打打牌，就是到他干爹何老大家里去问问安，夜里一两点钟以前没有见他睡过觉，白天十点钟以前也很少见他起过床。晚上他不睡，杜禄也不得早睡；早上他可以睡到十点以后，杜禄可要在八点钟大家上班以前把他管的几间房子打扫出来。杜禄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晚上熬了眼，早上自然也不会起得十分早，因此起来之后先得打扫每天有人按时上班的房间，而把会议室和局长室的房子放在吃过早饭以后才打扫。他知道反正会在局长起床之前打扫完毕。可惜任何事情也不便保证绝无例外。有一天，局里有人要到省城里去，张维太太要给她在省里作事的女婿带点东西，并且要张维替她给女婿写一封信。公共汽车九点半开车，所以张维只好在八点半就起来。他起来之后，连洗脸水也没有顾上要，先到办公间里来准备写信。这时候的办公间里，桌子还在正中间放着，麻雀牌还散在桌上，纸烟头、花生皮扔下一地。他气

极了，把杜禄叫去足足骂了半个钟头，好在他怕误了写信，才让杜禄退出来，当差的和当差的总还容易接近一些。杜禄受了张维的气有冤无处说，就跑到小灶上向张师傅诉苦。张师傅在这几天里也觉着杜禄并非诚心诚意倾向张维，这阵子见他挨了骂，马上就和他表同情。张师傅悄悄跟他说：“你不要吭声，让我借着替你骂他几句！”说着便转过身来，朝着门外大声说：“哭什么？你挨骂怨谁？你这家伙：夜里不睡，早上不起，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干的是什么事？你自己没有事，难道人家别人也没有事吗？”他这样一骂，杜禄觉着还解气。从这以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就好起来——杜禄渐渐把张师傅当作自己的保护人，张师傅也把杜禄当作还需要有大人照顾的孩子。

又一个晚上，杜禄来请我到小灶上去。我只当是他们两个人又闹什么纠纷，便跟了去准备为他们和事。我一进去，见地上摆着一张矮桌子和三个矮凳子，桌子上摆着酒壶、酒杯、一碟子炒鸡蛋和几碟子素菜。我问张师傅为什么摆这场面，张师傅笑了笑说：“这是杜禄这孩子开玩笑！”杜禄先让我坐下然后跟我说：“是这样，王先生：我要拜张师傅为师父，跟他学手艺！请你给我们作个介绍人！”说着又让张师傅坐下，然后给我们每人斟了一杯酒。张师傅说：“杜禄这孩子总还有点孩子气！我见他在灶上帮个忙手脚很灵活，用什么家具都象个架式，就跟他说只要他想学，我就把自己的一些小手艺都教给他，没有想到他就去铺排了这么一套，做饭菜本来是些琐碎活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艺道，只要跟着多做一个时候就都会了。管他谁是师父谁是徒弟哩？”我说：“不过经过这么一个小场面也好！这样，师父教得会更认真，徒弟学得也会

更专心！我祝你们前途顺利！”这样他们便正式建立了师徒关系。

张师傅在那里只呆了不满一年，来年——就是一九三六年秋天，和张维闹了一次气，就离开了。闹气的原因很奇怪：张维有一次到他干爹何老大家里去，恰碰上何老大的姨外甥女婿送来一些干海菜。张维一见那些不常见的东西，就和何老大讨了几样拿回局里去。这些东西他也不全认得，拿回去把张师傅叫到房子里好象考试一样地一一细问，并且问他会不会做。张师傅一看，也不过是些海参、鲍鱼、江瑶柱、黄鱼之类的寻常海味，自然没有不会做的，第二天做给他吃了几样，他很满意。有一天，何老大要给一个孙子娶媳妇，张维头天晚上去送礼，顺路献殷勤说局里有个厨子，特别会做海味，可以打发去帮个忙；何老大也愿意接受。他先叫杜禄传令，张师傅不去；他打发庶务员去跟张师傅说，张师傅也不去；他又亲自跟张师傅说，张师傅还是不去。他下不了台了，听说张师傅跟我是同一个村里的，才又托我去跟张师傅商量。我见了张师傅说明来意之后，张师傅说：“请你原谅我！这个事我还是不能去做！干哪一行有哪一行的规矩。要请人做菜，先得派个主事的人去和人家商量——准备办多么大场面，已经置备了些什么东西，先让人家知道个底，再问人家还要配些什么菜、什么作料，配货单子一定得请人家领作的人亲自开。象他这样，明天要摆席，今天晚上叫我一声让我马上去，我是他家的狗？我就连边沿也拍不着一点，去干什么？我又不是他家的狗！”我说：“你想他们那些大户人家办事，事先能没有个准备吗？他家里自然有大师傅，我想要你去不过让你帮个忙罢了！”他说：“要我去剥葱叶、洗萝卜吗？那点活谁不会做？为什么非要我去不行？”

谁答应的谁去吧！我是不去！”我说：“老叔！你们当厨师的，就都只能自己领作，不能帮别人作吗？”“那除非领作的亲自说话！比方修房子吧：请小工是东家的事，请匠人就得领作的亲自去搭班子，东家不能替请。干我们这一行也和那个一样！要是他何家的大师傅来请我，不论我答应不答应，总还有个商量头：局长派我去可不行！人家认得我是老几呀？”我觉得张师傅这番话很有道理，只得就用这话去交代张维。

张维还没有听完我的话，看了看表已经是夜里十点了。他再也顾不得听下去，就打断我的话说：“道理不要讲了，讲结果！去不去？”他这样问，我也只好说“不去”。他火了，马上把张师傅叫去说：“张来兴！我命令你马上到何家去！”张师傅摇了摇头，低声说：“我不能去！”“没有商量头！不论你愿意不愿意总得去！”“不要耽搁人家的事，让人家请别人吧！反正我不能去！”张维把眼一瞪，提高嗓门说：“反了你！一个穷厨子，摆什么臭架子？好大个厨子！就算我这个局长劳不起你的大驾，难道连何先生也劳不起你的大驾吗？你那眼里还有谁呀？”老张师傅把脖子一扬，很认真地回答他说：

“局长！我姓张！”这一下差一点没有把张维气死，气得他直瞪着眼、大张着嘴，足有一分钟没有说上话来——因为他也姓张，可又是何家的干儿子。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举起巴掌恶狠狠去打张师傅，被张师傅一闪打了个空，自己反而摔倒地上。张师傅趁这空子走出来。他再也想不到个出气的办法，就叫庶务股马上撵张师傅走。

张师傅就这样离开了那个财政局。他临启程的时候跟杜禄说：“别的什么我都丢得开，只可惜还没有把你教成个全把式！”杜禄说：“谢谢师父！你不要惦记我！眼面前这点活儿

我都拿得起来了，虽说没有学会做鱼，可是咱这地方就没有鱼，学不学都一样！”

就在那天晚上，杜禄替他背着行李，把他送到家。

王世恭把张师傅的故事说到这里，张师傅就来了。

张师傅多年没有遇上摆大筵席，手头有点痒痒，如今虽说上了年纪，遇上这大一点的场面，还想温习一下他的老手艺，所以他一道菜也不肯放过，一直顶到最后端上汤去，才算腾开了手。杜师傅招呼着他洗过手脸、换上衣服，就扶着他到餐厅来。

他走进餐厅，无论走过哪一张桌子，那里坐的委员们、代表们都站起来欢迎他，杜师傅也随着给他介绍谁是县长、谁是副县长、谁是什么委员、谁是哪乡代表。

老张师傅走到第一桌，县长起来和他打过招呼，然后敲了几下碟子向大家说：“各位委员、各位代表：今天咱们大家吃这几桌好菜，是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老张师傅亲自指导做的。我建议为了感谢这位老师傅、为了这位老师傅的健康干杯！”一阵掌声过后，大家都干了杯。老张师傅虽说上了年纪，可是精神很好。耳不聋、眼不花，喝起酒来还很利落。他见大家为他干杯，很感激也很客气地说：“谢谢诸位的抬举！多年不做了，做起来有点手生。活儿都是年轻人干的，我不过是挂了个名儿！哪里做得不到，请大家多提意见。”

干过了杯，杜师傅便又扶着张师傅往外走，又走过第三桌，王世恭代表拦住他们说：“我知道来兴叔还能喝几杯，杜师傅也好喝。来！让来兴叔坐下，咱们再喝几杯！”说着自己便离开座，让老张师傅坐。结果三个人谁也没有坐。一个招待员又拿过两个空杯来给他们斟上酒。三个人又碰饮了一杯。王世恭是

个老来调皮，他向老张师傅开玩笑说：“来兴叔！你不是不到何家去吗？这里可是何家花园呀！”老张师傅看了看窗外的荷花池，笑着回答他说：“不错！是那个地方，不过现在它不姓何了！”王世恭又向杜师傅说：“杜师傅！这一次你可学会做鱼了吧！”杜师傅也笑着说：“我师父说过：‘鱼也数不清有多少种，做法也数不清有多少种。’一时如何学得完？只好以后继续学习吧！”他们又碰饮过一杯，彼此拱了拱手，老张师傅和杜师傅便在众人欢送的掌声中走出餐厅。

（一九六二年五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试笔。）

互 作 鉴 定

光明公社第三大队第一生产队队员刘正，给县委李书记写过这样一封信：

李书记：

我是咱们县立第二中学去年暑期毕业的一个初中毕业生，毕业后回村参加了农业生产工作。我知道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参加劳动生产是光荣的，是有前途的，只是我还是个今年才满十八周岁的孩子，很需要有人加以培养、教育，给以帮助。眼前我所遇到的不是这样一个温暖的环境，而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角落——同学们排挤、讽刺，队长打击，周围的人对面冷眼相看，背后挤眉弄眼……这样冷酷的地方，我实在待不下去。

李书记！你是不是会以为我的神经过敏呢？不！这不是我随便猜想的，有以下事实为证：

我才上了几年初中，知识有限得很，因此便想找机会学一点在生产上真正有用的知识。这难道也是错的吗？和我同时毕业回到村里来的连我共有四个人，他们三个也同样有这个想法。去年有两次学习的机会（一次学养蚕，一次学开锅驼机），我们四个都报过名，其中有两个因为父亲是干部，被派去了，我和一个名叫陈封的同学没有被选上。我说队长有偏心，队长就召集全队的人开会批评我，说我不安心劳动，光想往外走。最可恨的是陈封——他同样和我提出学技术的要求，同样和我没有被选中，等到队长说我不安心的时候，他为了在队长面前讨好，也说我不安心。在会上数他发言次数多，攻得我也最猛烈。

我爱学着作诗，难道也是错误吗？陈封在这一点上也讽刺我，

叫我诗人，引得大家都叫，叫得我受不了。他并且作着诗骂我说：“象一条水龙呀，冲向你自己的屁股。”

我要求在大队的蜂场学养蜂，大队批准了。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蜂螫了我的头，副业主任和他的女儿幸灾乐祸，看见许多蜂落在我的头上也不管。第二天，他们说我不会管理蜂，调我帮着修理蜂箱的木匠拉大锯，一拉就是半个月。我觉着光拉大锯也学不会养蜂，才又要求调回生产队去。这明明是副业主任父女们想包办蜂场，排挤别人，可是等我把这情况反映给大队长，大队长又听了副业主任一面之词，批评了我一次。

今年春天浇麦子时候，在安装锅驼机那一天，分配我的工作是在清理渠道上的树枝。我把我应该做的工作做完了，可是夜里记工分只给我记一厘——就是一个劳动日的的百分之一。因为大家都在挤我一个人，我一时说不过他们，就说“我情愿白尽义务，不要工分”，大家说“不要也不行，一定要记上一厘以作纪念”，并且把这“纪念工分”发表在第二天的黑板报上。恶毒的陈封，又得到了新的讽刺资料，把“诗人”那个称号的头上又加了“一厘”二字，叫我做“一厘诗人”。

不举例了！我在这里遇到的受气的事，写起来一个月也写不完。李书记！你看这样环境能活人吗？周围的人都象黄蜂一样，千方百计地创造着刺人的方法来刺伤我的心灵，怎么能叫我忍受得下去呢？

李书记！我用几乎绝望的声息向你呼吁，要求你救我脱离这黄蜂窝。我情愿到县里去扫马路、送灰渣……作一切最吃苦的事。我什么报酬也不要，只要你能把我调离这个地方，就是救了我。

李书记，我以后的生命就寄托在这一封信上了。你能答应我的请求吗？急待你的回音！谨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光明公社第三大队第一生产队

最可怜的队员 刘正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

他把这封信用双挂号办法发出去，第三天便接到了盖有县委会收发室公章的回执。他想：“石子扔到河里，大小总可以听到个响声；信既然交到县委会，早晚总会有个结果。”他开始虽然想得这样从容，可是又隔了两天就着了急，跑到公社的邮寄代办所打听有否回音——自此每天一趟，一连跑了三四次。同学们见他每天往公社跑，谁也不知道他跑的为什么，私下免不了作为个研究的题目。陈封问过他一次，引起他一阵反感说：“你管得着吗？”

就在这天下午，生产队长和他说：“明天要开始锄谷苗了，闲工误不得了！在锄苗期间，有事出外村去，一定得请准假再走！”他一边答应着，一边还以为是陈封在队长跟前告了他的状，便和陈封恼起来，连话也不说了。其实陈封没有告过他的状，公社离这个大队十多里，去一次要误一大晌，一个人无故几晌不出工，不用说瞒不过队长，就连每个队员也都会觉察出来。

刘正就这样勉强强锄了三天苗，第四天早饭后，大家正在出发的时候，他便向队长来请假，说他的关节炎犯了，两个膝盖疼得蹲不下去，要到公社卫生站去看病。队长还没有答话，几个青年妇女格格格地笑起来，其中一个嘴快的说：“锄苗的开头几天，膝盖还有不疼的？”陈封说：“恐怕是你们的关节炎都犯了吧？怎么没有听见小南院爷爷说疼？”说着指了指旁边一位花白胡须的老人。刘正翻了陈封一眼，又向队长说：“队长！我是向你请假的，别人管不着这事！你准不准我的假？”队长见他毫无自觉性，便向他说：“你叫我怎么说好呢？民主一下好不好？”刘正见这情势，知道自己占不了便宜，就和队长耍起无赖来。他说：“队长是大家当呀还是你

当？”队长见他这样不识好歹，便板起面孔向他说：“队长自然是我当！这次假我不准！”“难道不准人腿疼吗？”“就因为一天跑一次公社把你的腿跑疼了！不让你去是爱护你！”

“谢谢吧！俗话说‘皇帝还不使病人哩’！我不能上地！”大家见刘正这样无理取闹，都有点不耐烦了，用不着队长说话，就你一言我一语地顶住了他——“去不去随他的便吧！哪里在乎他做那一点？”“快找大队长把他调走！咱们队里放不下这种货色！”“……”

正争吵间，忽然听到汽车马达声。“嘘——汽车！”“还是咱的锅驼机响！”“不！你听！”大家正猜测着，马达声越来越远，不一会一部吉普车就停站在大队办公室门口了。大队长、支书都来欢迎客人。

突然感到丧气的是刘正：他认识这部汽车是县委会的，因为本县只有这一部吉普车的帆布篷子是绿色的。由于车子，他联想到车里坐的人可能是李书记，而李书记来了一定要谈自己的问题，而自己又刚和队长吵过架，而……越想越不妙。大家见汽车停下了，不约而同地凑近来看的是谁，刘正也无精打采地跟了过来。

客人下车了，大队长和支书迎上来和客人握手。刘正见来的不是李书记而是王书记和生产办公室的一个人，才放了心，——因为按县委书记们的分工，王书记是管农业生产的。他一位名叫陈茵的女同学叫了他一声，然后放低声音努着嘴说：“看！‘土头土脑……’”没有等她往下说，刘正就跺着脚也向她低声说：“我揍你！”

刘正为什么着急呢？有这么一段小故事：前年他还在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皇请王书记去给他们全体同学讲“学生参加劳

动锻炼的重要性”，讲过之后在讨论的时候，他说过怪话。他说王书记是“土头土脑，小天小地，没有大志，只懂种地”。当时陈封说：“这是你给王书记作的鉴定吗？”他吐了吐舌头。有人把这话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组织全班同学和他辩论了一次，都说他看不起劳动，侮辱党的领导人。他的同学陈茵，便是引用这桩旧事来和他开玩笑的。

生产队长简单地和王书记打过了招呼，回头便领着本队的人往地里去，没有再理刘正的碴。刘正这时候有点为难：他虽说看不起王书记，可也不愿意把自己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嚷嚷到王书记的耳朵里；有心跟大家一块去吧，自己是来请假的，手里没有拿工具，还没有想到该怎么办，队长就带着全队的人走远了。他歪着头又想了一阵子，最后觉着还是去者为妙，于是就回家拿上了小手锄随后赶到地里去了。

王书记是从公社吃了早饭来的，略休息了一下就和大队干部相跟着去看生产。

他们先到养蜂场，见几个妇女正掀着箱盖往外提框子。党支部书记向一个妇女问：“你爸爸哩？”“摇蜜哩！”支书听了，就领着大家走进摇蜜的房间里——因为进来了好几个人，就有十来个蜂跟着飞进来；人刚刚进完了，一个青年妇女抢了一步过来把门关上。大队长指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向王书记介绍说：

“这位就是副业主任！”王书记向副业主任去握手，副业主任拱了拱手说：“手上有蜜！”支书又指着关门的那个青年妇女说：“这是我们大队的团支书。”这位被介绍的人自己接着说：

“王书记你好！我认识你！我叫李耀华，在县里一中上过学，听过你的报告！”“几时毕业的？”“前年！”“在村里待得惯吗？”“怎么待不惯呀？我就是在这村里长大的么！”副业

主任说：“不止待得惯，还是我们这蜂场的台柱子！”王书记转向主任说：“蜂场上几个人？”“六个！”“几个女的？”

“除了我全是女的！”大队长说：“他是老师！”主任谦虚地说：“什么老师？解放以前我不过在省城里卖水，后来在裕华蜂厂当过几年工人。如今青年们已经比我懂得的多了！”王书记又问：“你们的副业一共占几个人？”“养蚕归各生产队经营以后，大队的副业就剩这个蜂场了。还有两个木工，除照顾蜂场用的家具以外，还管修理各生产队的农具，收入合并在这里算账。”“每年共有多大收入？”“没有灾情的话，能见万把块钱的纯利；这二年因为天旱花少，才能落两三千块钱！”王书记略为思忖了一下说：“这倒是个便宜事！一共才占八个人！”队长微笑着说：“这是我们村里的小摇钱树！群众对这事兴趣可大哩！”提蜜框子的人走进来，王书记说：“你们工作吧！不打扰你们了！”说着便和大队干部们走出来。

他们走过一条水渠，见满渠的水正向菜园子里流着。王书记说：“看看你们的锅驼机去！”他们走到小河边，见半条小河已经被堵截住，堵成了约有二三亩大一个水潭，靠岸的一边，岸上有座新房子，马达声从房子里传出来，这便是锅驼抽水机所在的房子了。王书记指着渠道说：“这好象是一条旧渠道，渠道边的树都长这么粗了。”支书回答说：“十年了！这是一九五一年安装解放式水车时候开的！”说着话便走进房子里。还没有等介绍，管机器的姑娘便向王书记打招呼说：“王书记！你好！”王书记答应着，并且问她的姓名。她说：“我叫李晚秀，二中学生！”“几时毕业？”“去年！”“机器好用吗？”“好用！”“每天开吗？”“不！不缺雨的时候不开！”“那样子怎么计算工分呢？”“开一天记一天！”“不开的时候

候呢？”“回生产队生产去！”“别的活你也会做么？”“不会做的就学习么！”“和你同时毕业回村里来参加农业生产的有几个人？”“四个人！”“在不在一个生产队里？”“我在第二队，他们三个在第一队！”“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也是种地的。我们的家庭全是庄稼人。”“你父亲是干部吗？”“是我们二队的副队长，不脱产干部。”“他们的家长哩？”“有两个是干部——陈茵的父亲是党支部副书记，也不脱产；陈封的父亲是大队会计，一年补贴二百个工。”“你们回村来生产，你们的家长都乐意吗？”李晚秀想了想说：“这主要得看我们自己——只要我们各人自己安心，家长们不会有多少意见，就是有点意见也好说服。”“你们自己都安心吗？”李晚秀笑了。停了一下她回答说：“大体上都能行，不过我可不能完全代表别人！”支书觉着她这话说得很准确，满意地微笑了一下，顺便看了一下汽压表说：“小鬼！添得火了！”王书记说：“好！希望你们安心生产！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全部家当，将来都是你们的！”说着就返身走出来，同来的人也都跟着离开了这座新房子，去看渠道的分布。

接着他们便到第一队的谷子地里看锄苗。一队的青年们见王书记来了，老远就鼓着掌喊口号：“欢迎王书记！”刘正见王书记到地里来，暗自赞赏自己刚才决定的英明。他想要是使性子不来的话，陈封这阵子一定會在王书记面前谮讼自己。他在这种满意的心情支持下，做活也就加了点劲儿，看去还象个有突击性的青年。大家向王书记打招呼，王书记说：“你们锄吧！我随便看看！”大家就都又恢复了工作，陈封说：“我们几个学生是才学锄苗，锄不好，请你指导！”“你也是个初中毕业生吗？”“是！”王书记说：“不要着急！庄稼活儿只要

能安心做，慢慢做着就都做好了。”跟在刘正后边锄的就是那位花白胡须的老人。他看着刘正锄的那两垅苗说：“小正今天的活儿做得能行！”陈茵开玩笑说：“这是我们的诗人大跃进了！”陈封突然地问王书记说：“王书记！听说你会治关节炎？”他这一问，引得一伙青年们格格大笑，几个妇女笑得接不上气来，倒在地上。王书记看得出他们是开玩笑，还没有来得及反问，就见队长一本正经地站起来斥责陈封说：“小封！你怎么什么时候也开玩笑？不要闹了！对着上级领导同志一点规矩也没有！”

“是！不闹了！”陈封痛快地接受了批评，大家又都好好干起活来。王书记着了一阵，就和大队干部相跟往别处去了。

下午，上地去的时候，一队长向刘正说：“今天下午你不要去地了，县委王书记要和你谈话！”

这一通知，使刘正想到是有人把他上午和队长顶撞的事反映给王书记了。他想：“这究竟是谁反映的呢？最大的可能是陈封——他在地里问王书记会不会治关节炎，难道不是想把这事透露给王书记吗？在地里，他的话被队长打断了，难道他在睡午觉的时候不会再去找王书记谈吗？也可能是队长——不要看他在地里不让陈封说下去，他可能觉着那样开着玩笑说，不如他用队长的身份告状来得有力量。陈茵哩？也有可能！别人哩？可能反映的人太多了！全队里几乎谁也是仇人！谁也不会替我说好话！不论是谁吧，事情既然反映上去了，就得想对策！”至于“对策”，他也想了好多。他以为这可不能“主观主义”，要看对方的状告得轻重和王书记对这事的态度——要从“客观情况”出发，不过“原则”一定要“坚持”——坚持自己“真有”“关节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以为这也是

“马列主义方法”的运用。

刘正运用了一阵他的“马列主义”之后，还不见王书记打发人来叫他谈话。他着了急，亲自到大队办公室找王书记去。他以为这也是“争取主动”之一法。找到王书记了，王书记正和大队长谈话，要他暂且回家去等一等。他走出大队办公室，觉着情况对他更不利了——他觉着大队长一定在王书记跟前败坏自己——因为他也和大队长顶撞过。他以为大队长的话既然说在前边了，自己已经准备好的对策就该有所修正。修正过对策之后，还不见有人来找，就又一次“主动”地找到大队办公室，可是王书记和大队长的话还没有谈完；一连“主动”了好几次，都是如此，气得他放弃了这种“主动”回房躺下，继续考虑他的“对策”。

一会，听见院里有人问刘正，他妈妈答应说在西房里。他从窗上看见是王书记来了，就很有礼貌地出来迎接。他把王书记迎进房里去，让在自己的书桌旁坐下，然后给王书记倒了一杯水，自己才坐下。他说：“对不起，劳你亲自找得来！你只要打发人叫我一声好了！”王书记说：“没有什么！到你们家来玩玩不很好吗？”坐定之后，刘正静待王书记先开口。这时候他反而不愿意争取主动。他以为王书记先说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知道是谁的原告，状告得重不重；第二可以看出王书记对这事看法如何。

王书记果然先开口了。他说：“听说你们去年毕业的同学们，在村里团结得有点不够好，我想把你们召集到一处，让你们彼此谈谈心。现在先跟你个别谈一下，看你有什么意见！”

王书记这一提，使刘正感到自己遇上了最大的幸运。他想：“这状一定是陈封告的，可是王书记没有全信了他的话，

反而觉着是他和我有意见想借机会攻击我。只是要集合同学们到一处谈起来，没有我的便宜……谁也不会替我添好话，怎么办呢？我还是先攻击他们，说他们都对我有成见！”主意拿好，他便向王书记说：“王书记呀！团结不是一方面的：人家每天都在围攻我，我怎么去和人家讲团结呢？”说着便哭了。王书记说：“不要激动！正象你说的，‘团结不是一方面的’，只是自己考虑这问题的时候，不要只考虑自己有理的那一方面。‘围攻’这个字眼儿还是不要乱用的好！他们又不是敌人，为什么偏爱‘围攻’你哩？‘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个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到你们名下难道就不适用了吗？所谓‘批评’，就是找不团结的原因。这原因也许在两方面，也许在一方面，不过在自己考虑的时候，最好是先考虑自己应该作自我批评的一方面——那样才便于主动解决问题！”

王书记讲这一段话，出乎刘正意料之外。他以为雇工出身的王书记只会讲“劳动生产的重要性”，怎么还会挑字眼哩？他以为象“激动”呀，“公式”呀，“适用”呀，“所谓”呀：这些词头只有上过学的人才会用，“土头土脑”的王书记为什么还会用得那么恰当呢？他想：“这个人象我以前估计的那样简单，说话得小心一点！可是话总得说，要把给李书记写的信上的内容都说上，最后说明这地方再也不能待下去，要求他在县里给找个工作，不要在这里召集什么讲团结的会！”想罢，便开始按照计划讲起来。他讲到春天安装锅驼机时候的例子，特别补充说自己有关节炎不能下水，并且联系到当前说：“这病现在发展得更严重了，想去治一治，在队里也请不准假！”讲到要求王书记给他在县里找工作的时候，他说：“什么都

行！我绝不讲价钱！再苦的事我也作得了！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难道不能让我到别处贡献自己一点微弱的力量吗？就算不团结的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一走开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吗？我不跟他们谈什么‘心’！我这一张嘴说不过他们！最好是走开了事！”

王书记一句话也没有插，让刘正把他的长篇讲话按计划讲完，然后考虑了一下才跟他说：“到外边工作的问题可以考虑，不过讲团结的会还要开！团结了以后往外走不更好吗？”刘正听到可以让他到外边做工作，兴奋了一下子，只是又听到“讲团结的会还要开”的话，觉着前边的话只是陪衬，便又追问王书记说：“王书记！你能答应给我找工作吗？”“谁也不能给谁强‘找’工作，这完全要看有用人的地方没有！”“县里有吗？”“县里没有，听说你们公社里最近倒要用几个人！”“干什么？我可以去吗？”他觉着就是到公社去，“发展”的机会也要比在村里多。王书记说：“可以！你知道你们公社的地界里有个小山庄叫‘八里沟’吗？”“知道，离我们村子才十二三里，一共才八户人家，也算一个生产队。我姥姥家就在那里！”“那更好了！你知道那地方开过沙锅窑吗？”“开过！我小时候到我姥姥家去，就常到沙锅窑上玩泥。不过在好几年前就停了，会做沙锅的人都是些老头，也都去世了。”“对！不过现在还有个老人会做坯。公社想恢复这座沙锅窑，想找几个青年跟这位老人学习……”“你是不是说让我到八里沟去学做沙锅？”刘正觉着王书记所说的工作和自己的理想相差太远，无心再听下去。王书记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公社也没有托我替他们找人，我不过是昨天晚上住在那里随便听到的。他们说此地十分需要有这么个沙锅窑，因

为现在用的沙锅都是从二百里以外贩来的……” “王书记你不必费心了，我非常不宜于干这个！”刘正早就不耐烦听了。王书记说：“你不是说干什么都行吗？”刘正说：“你不要考验我了！这难道是国家培养青年的目的吗？” “难道经过国家培养的青年就不能烧沙锅了吗？你不愿干，公社自然会找到别人；愿意干，还得你自己去找公社。人家谁有闲工夫拿上个工作岗位故意来考验你呀？”王书记这几句话，把个刘正说得低下头来。刘正一向和人顶撞惯了，每逢占不住理的时候就好耍个无赖。这次他刚刚顶了两句，猛然想起来是跟县委书记讲话，虽说有点自悔，可是话也收不回来了。王书记不慌不忙教训了他几句，见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才又缓缓地跟他说：“年轻人还是不要事事都‘自以为是’吧！你说人家别人都是有意和你作对，难道我也是参加了‘围攻’你的集团吗？你说我是‘考验’你，就算‘考验’你吧。你的病根子仍然在于不安心劳动，说‘什么都愿干’是个幌子，真正的意图还是想到外边找一个个人出头的机会！还是要你考虑我开始和你讲的那些话——不要光想自己有理的那一方面，应该准备作一些自我批评！就这样吧！你准备准备！晚上把你们召集到一块儿谈谈！”刘正还想找一些理由把刚才对王书记的态度装饰一下，可是还没有等他准备好，王书记便站起来要走，他也只好送出门来。

这天夜里，王书记住在大队会计的办公室里。王书记已经通知和刘正同时毕业的三个二中学生晚饭后来开会，因为谈的是青年思想问题，并且请共青团支书列席。

刘正因为下午讲话失言，想先向王书记解释解释，所以来得最早，可是还没有等他说到本題上，陈茵和陈封两个人嚷嚷

着走进来。陈封没头没脑地说：“什么证明人也不用找，请王书记亲自跟咱们说！王书记！今天上午刘正向队长请假那事，究竟是谁反映给你的？”刘正原来估计是陈封干的，现在见陈封、陈茵一齐来问，已经知道不是他两个。他又估计那一定是队长了。他很慎重地等待着，想从旁听一听王书记回答陈封的话。王书记见这两个人来得鲁莽，问得糊涂，反问他们说：“什么请假的事？没有人向我说过什么请假问题呀？”陈茵紧接着问：“那末你今天下午留下刘正谈什么？”王书记说：“你们彼此间不是有意见吗？”“谁反映的？”陈茵、陈封一齐问。王书记说：“有意见只说谈意见，为什么一定要问反映意见的人呢？”这样一来，连刘正自己也被弄糊涂了。他想：“不是今天的问题，那末究竟是什么问题、谁反映的呢？王书记今天下午说的那‘团结得不够好’究竟指的是什么具体内容呢？无风不起浪。要是没有人反映，王书记怎么会知道我们不团结呢？……”

刘正正猜想着，李晚秀和团支书李耀华也进来了。陈茵问李晚秀说：“你向王书记反映过我们跟刘正有意见吗？”“没有！”“这就奇怪了！”李晚秀问：“什么事？你问得我摸不着头脑！”陈茵说：“今天下午，王书记找刘正谈话，我只当是有人把今天上午刘正请假的事反映给王书记了。我想谁这么嘴快，把出在我们同学身上的屁大一点小事也反映给县委书记哩？我问队长，队长说他没有说；问陈封，陈封说他没有说。我和陈封一同来问王书记，王书记说不是今天请假那事，是我们跟刘正彼此有意见。我问是谁反映的，王书记也不愿意说。我想我们应该自觉一点，是谁说的谁就承认起来，免得大家胡猜。”李晚秀向王书记说：“王书记！请你给我们说出来吧！不要让我们有事的没事的都不自在！”王书记说：“不要

胡猜了！是刘正自己反映的！”刘正听了一怔说：“啊？我自己？”王书记说：“对！”“什么时候？”“今天下午！”“可是你和我谈话之前怎么会知道哩？”“你不是给李书记写过信吗？”

“那……”刘正自从下午听到通知那时候起，一直没有想到会是由于那封信引起的波澜，听王书记这么一说，象是有人敲了他一棒子，头上的汗冒得象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其他在场的四个人一听到这话，把眼光一齐集中到他脸上来，压得他把头低下去，再也不敢向谁看一眼。这一下可真造成了围攻之势，三个二中的同学一齐问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王书记说：“大家不要问了！刘正！你对大家有什么意见，还是开诚布公跟大家谈谈吧！从今天晚上大家对你的态度看来，你对同学们的看法有好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下午找你谈了一次话，同学们怀疑是有人告你的状，不等你知道，人家就都互相检查起来了。这难道不是同学间的友谊吗？难道不是爱护你而是‘围攻’你吗？现在要你把你写给李书记的意见和今天下午向我口头反映的意见都在这里谈一谈，同学们要是和你有不同的看法也让他们谈一谈，最后看法一致了、责任分清了，不是就能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吗？”王书记打开皮夹子取出刘正的原信来说：“就依这封信上反映的问题的次序谈吧！先谈派人学养蚕和学开锅驼机的事：原信上说……”刘正见王书记念信，发急地说：“王书记！我求你不要念原信好不好？那封信我是写给李书记私人的！”王书记说：“小孩子家说话老实点好不好？你要求我不要念原信也可以，怎么偏要把它说成私人信件？真是私人信件的话，我和李书记都算违犯了宪法了！你和李书记有什么私人关系？信里谈的有什么私人问题？你向县里党机关的负责人写信说你在一个‘冷酷无情的角落

里’，受到‘排挤、讽刺、打击’，活不下去，要他‘救’你脱离这个‘黄蜂窝’，难道能算是私人信件吗？李书记把‘救’你的任务委托给我了！今晚开这次会，为的是真正‘救’你！好吧！不念原信就不念原信，你只要把信里的……”“王书记！我要求念原信！”“我也要求！”“我也附议！”刘正的三位同学全说了话。团支书李耀华说：“王书记！我也觉着还是把原信全念一遍好——这样把问题全摆到桌面上来，一来谈着不闷人，二来可以把重复的情节合并一下。你看是不是可以？”王书记说：“那样也行，不过大家事前得有个思想准备。准备‘冷静’！不要一听就冒火！要知道思想上的问题不能用‘激动’来解决！不论有什么意见都要平心静气地讲道理！大家能不能保证这样？”“能！”王书记看了看大家的神气，然后把信交给李耀华说：“那就请你读一读吧！”

李耀华缓缓地、一字一句都摆得朗朗利利地读着信，陈茵、陈封、李晚秀三个人屏息恭听，只有刘正一个人两肘支在桌子上、两手托着下颌，无可奈何地等候这篇见不得天的妙文一字一句地传进同学们的耳朵里。王书记对这篇妙文已经很熟悉，不再注意听它，但却始终注视着每个人的神色，每当念到那些象“冷眼相看”、“挤眉弄眼”、“冷酷无情”、“幸灾乐祸”等等刺人的字眼儿，只要有人一竖脖子或者一瞪眼睛，他就用手掌在空中一按然后轻声说：“冷静、冷静！”当念到周围的人都象黄蜂一样，千方百计地创造着刺人的方法来刺伤我的心灵”的时候，陈茵突然站起来指着刘正说：“刘正！你真丧良心！”“冷静，冷静！”“我再冷静不下去了！”王书记也站起来用双手在空中按了几下说：“不！还是冷静！要遵守诺言！”陈茵听王书记提到“诺言”，才又恢复了理智坐下去。

一会，信读完了。王书记说：“信读过了。刘正的意见也就是这些，今天下午谈的和信上写的内容完全一致，没有什么新的补充——要说有的话，只是补充说他有严重的关节炎。大家就这个范围谈吧！谈的时候，首先都要有自我检讨的精神，并且特别要注意平心静气！刘正准备了吧？按道理说，你的信，就算你在这会上的发言了，不过为了使你多有一点自我检讨的机会，我想建议其他同学还让你首先发言！”王书记转向其他三个人说：“还可以让他先说吗？”大家同意了。

刘正的思想似乎已经动了步。他站起来沉默了一下说：“王书记今天下午对我的指导使我很感激。正如王书记说的，我的‘病根子仍然在于不安心劳动’。我在那封信上写的那些事，虽说都有点影子，可是都不正确。我所以要那样写，为的是把这地方说坏一些，好让李书记可怜我，给我在县城找个工作地点。今天听到了王书记的教导，我已经感觉到对不起同学们，对不起大队长和副业主任，对不起学校给予我的栽培！我完全是错的，请同学们给以批评！”

他这段检讨虽然很简短，却起到了一定的镇静作用——同学们听完他这段话，每个人的怒气都消去了许多。不过他的检讨只能说是思想上动了步。他只是说出了已经被王书记指出来的真正动机，又把摆在同学们面前的无可辩驳的造谣事实总的承揽起来，至于在同学们面前逐条地、具体地去分析那些错误事实的严重性，他还没有作那种思想准备。

第二个发言的是陈茵。她说：“刘正这一次发言的态度我很赞成。我们回村来参加生产差不多一年了，生活检讨会也开过好多次了，只有这一次我们才见他说话老实一点。不过我觉着他这次检讨还是不够认真，只是把错误笼统地包下来而不想接

触到具体的事实，只提了提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而不说怎样对不起。刚才听了他写给李书记的信，我觉着他这种行为是非常不道德的。例如他说不派他去学技术是大队长的偏心，照顾了干部的子女，并且说因为他向大队长提了这意见，大队长就召集人开会批评他：这不仅是一般性的不正确，简直是造谣！公社开养蚕训练班，决定每个生产队可以派一个妇女去学习。决定说可以派可以不派，可是没有说可以派男人。派我去是咱们生产队开会决定的，与人家大队长什么相干？至于大队长召集人开会批评他，那是派晚秀去学锅驼机那时候的事。那还在我去学养蚕以前，怎么能把两件事扯在一块？说起那件事，他简直该死！我们村里的青年是女的多男的少，所以凡是轻一点的劳动尽量让女的担任。这也是全村人一致同意的。要说照顾干部子女的话，陈封父亲是大队会计，晚秀父亲是生产队副队长，为什么不派陈封偏派晚秀呢？这一次我们四个人一齐报了名，大队长把上边的道理向他们两个男的讲明，陈封自动放弃了而他不放弃。他顶撞大队长说：“这不但是干部路线，而且是妇女路线！谁知道你们搞的是什么关系？”因为他说的太不象话了，大队长才召集我们开会批评他，召集的还只是我们这些中学生，大队长本人又没有参加。说他‘不安心参加劳动、光想往外走的’是我们，不是大队长！他说‘副业主任父女两个想包办蜂场、排挤别人’也是胡说！蜂场一共六个人，他们两个包办得了吗？把他写给李书记的信和这些事实对照一下，简直是造谣中伤！是缺德的行为！犯罪的行为！这样严重的错误！难道不值得具体检讨一下吗？所以我说刘正的检讨还不够认真。希望刘正再考虑一下！”

陈茵说罢，陈封和李晚秀又都作了补充。团支书李耀华向

王书记说：“我这列席的也可以给刘正提一点参考意见吗？”

“当然可以！”李耀华向刘正说：“刘正同学！那天在蜂场里蜂螫你那事，怎么能说主任父女们是幸灾乐祸哩？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工作，都不戴面罩；你那天去了，因为是第一次和蜂打交道，主任怕螫你，特地给你戴上面罩。是你没有把脖子围好，一个蜂钻进去螫了你；主任要你跑回屋子里去再卸下面罩来拔刺，你不听，你偏要马上卸下面罩来去打那个蜂，结果那一个蜂也没有打住，却又招得好几个来；主任又警告你说‘不要动！越动越多’，而你却越打越上劲，结果又引得成群的蜂飞到你身上来。你不听主任的话，把蜂打恼了，连主任自己都陪着你挨了两刺，你怎么还忍心说人家是幸灾乐祸哩？调你做木工，开始也是你自己要求的，可是拉了几天大锯你就烦了，你说：‘难道叫我拉一辈子大锯吗？’你已经检讨出‘不安心劳动’是你的‘病根’了。这很好，不过要认识得更深刻一点！干什么就怕干‘一辈子’，正是你不安心劳动的具体表现！你不愿意拉大锯，大锯还是得有人拉，为什么别人就不怕拉‘一辈子’哩？因为在蜂场的事别的同学知道得不多，所以补充提一下当时的真象，帮助你反省得更深刻点。”

由于李耀华这一补充，引得陈封也补充说明了一次安装锅驼机那时候的真象。陈封说：“……‘一厘诗人’和‘水龙冲屁股诗’本来是一回事，而且那诗也不是我作的——是他自己作的，而我只续了六个字。这怎么能说是我作着诗讽刺他哩？王书记！这事在我们同学们中间是早就吵明了的，本来用不着补充，但是他既然向县委会告了我的状，我可不可以辩明一下冤枉哩？”王书记说：“当然可以！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假如其中有应该作自我检讨的地方，最好是结合着谈！”“好！谢谢你的指

导！”接着他就谈事实的经过。他说：“……在那前一天，已经把锅驼机安装起来了，只是春天水枯，皮管稍稍有点不够长，要把拦河的半截水坝加高，大队决定每个生产队再派三个人去做这工作。我们队里派的三个中间，就有我和刘正两个。老实说：小队给大队派劳力，差不多都有点本位主义——不是派软的，就是派女的。象我们这些男的中学生，还算是软不硬的哩！做这活儿要下水。刘正说他有关节炎，下不得水；要他去担石子，他说他肩膀上也有关节炎。满身都是‘关节炎’，这活儿就难派了。大队长为难了一会说：“这样吧：咱们这渠道是用水车时候开的，清理好了也不见得够大，前几天修理树砍下来的枝扔又扔得满渠都是。你给咱们去清理这个吧！收拾起来搬过来，咱们加坝还能用！”他说他可以捆，可是搬不动。大队长摇着头说：“捆你就捆去！陈封去搬！”第一捆是我跟他两个人捆的，捆起来我搬走了。我把第一捆拆开匀到坝上，又去搬第二捆，见他盘着膝坐在水渠正中间一块干沙地上，手里拿着笔记本写诗哩。我说：“刘正！你捆的放在哪里？”他猛抬头，象刚做过梦一样地说：“你倒又来了？捆捆捆！”他这才去捆哩！我能坐着等吗？我又跟他两个人捆了一次。赶我把第二捆搬回去，大队长已经叫人把上年秋后搭的那座小土桥拆了（这桥本来是每年搭一次，枯水时候用不着），用棚土那些树枝往坝上压。这倒省我再去和刘正捆去。快到晌午，坝加好了，水也抽上来了，来做工的人，也有回去的，也有留在那里看水的。渠太干，水流得很慢。我从好多树干缝里看见刘正又坐在原来坐的地方作诗。我喊：“刘正！不用捆了！水上来了！”他没有听见。我和他开玩笑，要悄悄走到他的背后去看他作什么诗——我走直路、水走弯路，又是干渠，预料水不会

马上走到。我快要走近他的时候，就听他反复地念着这样半句：‘象一条水龙啊，冲向——象一条水龙啊，冲向……’左手端着笔记本，用右手拿着的水笔在空中画着，象乐队指挥打拍子一样；头也随着手一弯一弯地晃着。我走到他背后站住，他果然没有发现。这时候，我清清楚楚看到他写的诗。这诗我以为还写得不错。——虽然他自己只和我捆了两捆树枝，而这诗可是歌颂这次劳动的。诗是这样的：‘我们英雄的人民才是万物之主，古往今来创造出奇迹无数。小小河流啊，我们一定要把你征服！我们要让你离开河床，流进土窟、跃上高岸、穿过丛树，象一条水龙啊，冲向’，‘冲向’以下还没有字。我正看中间，忽然听着背后悉悉索索响，好象又有人潜到我背后似的。我回头一看，没有人；看了看地下，水已经到了，水头上推着一些没有被北风扫尽的老树叶。这时候，刘正还在‘冲向’‘冲向’地念道着，我赶紧往旁边一躲，和他开玩笑说：

‘冲向你自己的屁股！还不快起来？’”这些过程，除了王书记，大家虽说早就听过了，可是当陈封这次又说到这里，大家早又沉不住气，来了个哄堂大笑，把王书记也逗笑了。

陈封接着说：“这时候，他要是躲的话，完全还来得及，可惜他还象才睡醒了一样，不知道是水来了，愣头愣脑向我看，看着看着水就真地冲向了他的屁股，把一条裤子的后边一半全弄湿了，他这才跳起来躲开。我一边替他拧着裤子上的水一边说：‘这可对你的关节炎很不利呀！’……”陈茵插话说：“还说哩，你不嫌损？”陈封说：“那个我一会再检讨，我这叫‘如实反映情况’！当时刘正也跟你一样，他说：‘陈封你损不损？你怎么忍心看看叫泡我？’我说：‘你不要冤枉我呀！我学你奶奶说句话：天老爷在上，我要是诚心叫泡你，叫我立刻就

死！我正看着你的诗，水就来了，要不是回头看了一眼，准连我也得泡了！’这能说成是我作着诗骂他吗？说他是‘一厘诗人’也正是这一天的事。‘一厘诗人’这个称呼是我给他加的，我应该负责检讨；至于给他记一厘工分，却是大家的意见。那一天上午，因为强劳力不多，连好多妇女都下了水，而他却只和我共同捆了两捆树枝，把其余的工夫放在作诗上。又因为泡了一下，泡得有点不高兴，下午修渠道他也没有去。夜里记工的时候，凡是给大队作的工，都是同着领工的人，大家在一处民主评议的。在评议的时候，大家对刘正不满意，要给他按件计值——把他和我共同捆那两捆作为有他的一半。大家说捆这个，每个劳动日能捆一百捆，一捆只能记一厘工。他说他情愿不要，大队因为不记这一厘工就证明我们生产队出够了三个人，所以非给他记不行。黑板报是宣传员们办，报上也有表扬也有批评。一天做了一厘工这事，就在全公社范围内说来，恐怕也要算新纪录，黑板报怎么会不登哩？总之：这些都是真的，可是这该怨谁哩？难道是大家故意找他的碴吗？在这一次‘事件’中，有两处是我应该作检讨的：第一是续成那‘冲向屁股’诗。发现一个同学在工作中放弃了工作作诗，我是破着跟他争吵也应该制止他。自然在多次积累的经验中证明那样作是无效的，不过即使他不听也比看着他造成‘事件’好。第二是制造‘一厘诗人’那个称号。开玩笑应该开得彼此嘻嘻哈哈为止，叫人难堪，就是‘恶作剧’了……”

陈封讲完了，刘正也作了答复，王书记把大家的意见体系化地总结了一下，反复给刘正指出错误的严重性，特别嘱咐刘正要收拾起往外跑的野心，安心生产，嘱咐其他同学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帮助刘正。最后，王书记又问刘正本人还有没有

意见。

刘正说：“我再一次感谢你对我的教导，不过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一个青年难道不应该抱着伟大的理想去轰轰烈烈作一番英雄的事业吗？”王书记说：“这要看你对这问题怎么理解！理解错了，今天这点进步就全成假的了！你的诗里不是说‘我们英雄的人民就是万物之主’吗？不是说他们‘古往今来，创造的奇迹无数’吗？你们不是已经把你们的‘小小河流’征服了吗？难道这都不能算英雄的事业吗？你们还不能算英雄的人民吗？大家在一块作起事来还不轰轰烈烈吗？就现有的基础上逐步改变着农村的面貌最后走向共产主义，这种理想还不伟大吗？要是连水也不想下，连大锯也不想拉，连沙锅也不想烧，认为那都只有‘没出息’的人才肯干，而自己则是这帮‘没出息人’的天然指挥者，那便是抱着个站在别人头上的理想，去占你所谓‘没出息’的人们——其实也就是你的诗里所说的‘英雄人民’的劳动成果了。要知道那不叫什么‘伟大的理想’而应该说是‘不可告人的野心’！希望你千万不要解释错了！”

后来陈封把王书记对刘正的批评归纳为这样的话：“自命不凡，坐卧不安，脚不落地，心想上天。”

(写于一九六二年国庆节)

卖烟叶

现在我国南方的农村，在文化娱乐活动方面，增加了“说故事”一个项目。那种场面我还没有亲自参加过，据说那种“说法”类似说评书，却比评书说得简单一点，内容则多取材于现在流行的新小说。我觉得“故事”、“评书”、“小说”三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例如用评书形式写成的《水浒传》，一向被称为“小说”；读了《水浒传》的人向没有读过的叙述起这书的内容来，就又变成了“说故事”。

我写的东西，一向虽被列在小说里，但在我写的时候却有个想叫农村读者当作故事说的意图，现在既然出现了“说故事”这种文娱活动形式，就应该更向这方面努力了。闲话少说，让我先写一个买烟叶的故事试试灵不灵。

秋末冬初，正是华北某些零星产烟区收购烟叶的时候。

有个名叫王兰的姑娘，在一个星期天，给他们的生产队到县城里收购站去交售烟叶。因为到得晚，交了货天就黑了，只好赶着空车下店住了宿。这姑娘是个高中学生，学习成绩和他们班里的几十个同学比起来，是数一数二的。她本来在这一年（一九六三年）暑假就该毕业，不幸她的父亲在这年夏天病故，她连照顾病人带打发死人，前后误了两个多月课，事情忙完了，连毕业考试也误了，所以只好休学一年。

她要是没有别的事，星期日卖了烟叶，星期一早晨就该回去了。不过她还有点小事需要耽搁一会。她原来就在这县立第一

中学上学。在她上学的后三年（高中时期），有个教语文的李光华老师很器重她，和她师生感情很好，她想顺便去看望一下这位李老师。

第二天，大约九点钟的时候，她走到学校大门口，正碰上李老师提着个小书包从门里走出来。这位李光华老师大约有六十四五岁的年纪，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蓝布制服，两袖和胸前带着粉笔灰。凡是熟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这衣服是四季不变色的，两袖和胸前的粉笔灰也是有永久性的。学生们有时候提醒他说：“李老师！看你胸前那粉笔灰！”他常回答说：“没关系！粉笔灰是干净的！”有时候也许顺手拂打两下子，不过结果往往是除了没有拂打掉，反而增加两个白道道儿。这不过是李光华老师一点表面特点。李老师的特点多得很，不过我不打算在他刚出学校大门时候多做交代，待一会让故事里的一个人替我介绍吧。

王兰看见李老师一出门，便跑到他身边和他打招呼。李老师是大个子，王兰的个子只能打到他的腋下。他看见王兰穿着一件农村妇女们常穿的有大襟的夹袄走近了他，一时没有认出来是谁，不过听到王兰叫他李老师，便认得是王兰的声音了。

“小兰！好孩子！你外表上已经打扮得像个农民了！”“李老师！不止是外表，我已经学会赶车了！”“那自然更好了！到家里玩玩去！”“好！”

李老师的家，王兰是常去的，所以走在前边。李老师是党的县委会委员，住在县委会家属宿舍里。他和两个县委书记三家共住着一排房子，每家三间——两间宿舍、一间厨房，他占的是中间那三间。他的孩子们都在别处做事，家里只有个六十来岁的老伴。王兰和这位老太太也熟识得很，一进门打过了招

呼，便和李老师对坐在书桌旁边谈起话来。

李老师虽然也看过王兰的休学申请书，见了面还是想问一问她家庭的情况。这倒不是客套。前边提过，李老师对这个学生是很器重的。李老师问过她的家庭情况之后，慨叹了一会便嘱咐她说：“在农业上锻炼锻炼也好，不过要瞅空儿温习功课，特别是数、理、化和外文，一丢开就非常难补……”“李老师！我不想再上学了！”“为什么？”“我今年就已经二十岁了……”“从你们那一班往前倒数，学生们的年龄都大一点！这是战争环境造成的，大一点又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因为贾鸿年考大学没有被取上，你们要结婚了？”王兰突然把她的两道长眉一攒说：“李老师！快不要提他！我生他的气！”李老师说：“二十岁大姑娘了还是那样孩子气！又是因为从前那些小误会吗？”“一点也不是误会！从前的也不是！”

话说到这里，外边有人叩了三下门。这种叩门的叩法有点别致：速度是不紧不慢的，声音是不大不小的。王兰一怔，低声说：“说曹操曹操就到！这是贾鸿年！”李老师也说：“像！”王兰把声音放得更低一点说：“他只有叩你的门才是这样叩法！”李老师正要答话，外边又照样叩了三声。李老师说：“进来！”

李老师的三间屋子，除了厨房是另开门以外，这两间共一个门，坐北向南，西一间是套间，东一间就是李老师和三兰正在谈话的这一间，一窗一门并列着，门在东，窗在西，靠窗就是李老师的书桌，左右两头放着两把椅子，李老师在左、王兰在右，面对面坐着；另有一个茶几放在和书桌对过的后墙根，茶几旁边只有左方放着一把柳木躺椅——这种椅子比普通椅子要低差不多半尺，背上带着个大木圈子，靠背就镶在圈子里，

在工作时候不能坐，只能斜躺下休息。

门开了，走进来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男学生，穿的衣服除了没有粉笔灰，几乎完全和李老师的制服一样。这个人，从体格上看，和一般男青年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从他一进门迈的那两步脚步和他脸上那必恭必敬的神情上看，那种老成持重的样子，和他的岁数实在不相称。这个人正是王兰料定的那个贾鸿年。

这时候，李老太太已经回套间里去了，屋里只剩下李老师和王兰。贾鸿年一进门，朝西一扭头，自然是先和李老师碰面，不过同时也能看到王兰的脊背。王兰本来不愿见贾鸿年，可是碰上了也和军事上的“遭遇战”一样，想躲也没法躲，所以暂且用两手托住头，把身上略伏下去，准备等对方和自己接话的时候随便支吾几句，找个空子走开了事。贾鸿年进门来定住身扭头朝着李老师一看，好像亮了个相，然后把身一转、把腰一躬，紧紧走了几步来到书桌边，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说：

“李老师，你好！”要是当一个话剧演员的话，他这一串又恭敬又热情的动作，和最后说那句台词的速度、声调，都可以打个八九十分。李老师点头答应着，并且指了指茶几旁边那张柳木躺椅说：“坐下！”贾鸿年转回身去，规规矩矩迈了两步走到椅子跟前，又规规矩矩转过身来坐下去——因为椅子低，他把小腿略屈回去一点，两肘放在膝盖上，屁股刚沾了个椅子边——眼神仍然又对住李老师，不过因为距离远了点，看得全面一点，才看见李老师对面坐的是王兰。

从贾鸿年坐下去之后马上伸着脖子面对李老师那股神气来看，他好像急须要向李老师提出什么特别庄严的问题，可是就在这时候猛然发现了王兰，他的神气就又发生了变化。“王

兰？”他先这样带着疑惑的口气叫了一声——好像是说“原来是你呀”，可是他下边的话和叫的这一声接起来，好像有点前言不照后语。他说：“我早断定你是到这里来了！”王兰觉着有点奇怪，便问他说：“你听谁说的？”要是在别处，贾鸿年一定会说：“你猜！”可是他觉得对着李老师这样说不大合适，所以使用正经口气回答说：“同学！”王兰可不考虑口气问题，听到他这样回答便气忿忿地说：“你见鬼！我连一个同学也没有碰上过！”贾鸿年正要答话，外边窗台上的电话铃响了。

李老师的窗子上只有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剩下都是纸糊的，不隔音，只要电话铃一响，里边就不用再想谈话。铃响了一阵没有人接，李老师正要去接，走到门边就听得到个小姑娘接住了说：“要谁呀？”停了一下便喊：“马大娘！电话！”李老师见不是叫自己的，便仍旧返回去坐到他的位子上。贾鸿年又正要说话，那位马大娘在窗外说话了：“三嫂？你几时来的？三哥来了没有……好！你那些孩子们也好吧……来吧……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呀……你打那里往北，碰上一个山货店就向西拐，过两个门，路北有棵槐树，那里有个小胡同……”这位老太太左一弯、右一拐地说了半天，又重复了两遍，好不容易才把她要说的路线说清，然后把电话挂上。贾鸿年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好不容易等窗外静下来，便向老师说：“这电话是才安装的吧？怎么安装到你的窗台上？这样子吵着还能工作？”李老师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反正总得有个地方安装！”贾鸿年转向王兰笑了笑说：“原来你那些话都是学着李老师说的呀？”王兰说：“就算我是学李老师，学的也是好事！李老师要像你的话，就要叫把电话安装到别人的窗台上，吵别人去！”贾鸿年说：“我没有那个意思！你不要咬住我那一两句话乱引

伸！咱们对着老师不可以这样开玩笑！你拿什么事实能证明我是那样一种人？”他这段话说得像炒豆儿那样急，完全失掉了他刚来时候叩门的那种风度。

李老师说：“算了算了！不要常为这些小事情争吵！”王兰没有再接话，贾鸿年恭恭敬敬点头答应了个“是”。王兰看到这是个抽身的机会，便向李老师说：“李老师，你们谈，我要回去了！牲口还在店里站着哩！”李老师还未答话，贾鸿年抢着说：

“那也好！”又转向王兰把语调放得很温和地说：“王兰！我求求你！你住在哪个店里？请你在店里等我一小会好吗？”

王兰说：“不行！现在已经九点多了，牲口又不太快，还有六七十里路哩！”

李老师觉得王兰说得有理，便向王兰说，“也对！净是山路，天黑了不好走！”王兰站起来正要动身，李老师又补充着说：“记住我前面和你说的话！要趁空儿经常温课！”

王兰说：“课我倒是常温习着的。本来学的东西就不多，丢了很可惜；不过，李老师，我真不能复学了！”

“为什么？”

“我爹去世后，家里就只有我妈和我两个人了！”

“你母亲不能劳动了吗？”

“能劳动也只能顾住她自己，怎么还能供我上学呢？”

“你队里没有助学金吗？”

“助学金只有两个名额，我娶了别人就得不着了！我不去争那个！反正总要有得不着的哩！”

说着便向李老师点头告别。李老师说：“等一下！除了经济问题再没有别的问题了吧？”王兰又略略考虑了一下，贾鸿年趁空儿向李老师说：“李老师，我也要走了！我有个要紧的事想求你，又觉得不应该再给你添麻烦，不过再三踌躇，还只得来求你——因为除过老师你，别人一来没有那力量，二来也不会真心帮助我！”

“什么事？你直截说好不好？”

“对不起！前天给我们队里买骡子借你那一百块钱……”

“那没有什么！为

集体的事嘛！我又不等着花！不现成以后有了捎来好了！”

“不不不！事情比那严重得多！昨天我给队里来交售了五百斤烟叶，一共得了三百块钱。钱拿到手，我就要先来还你那一百块，可是走过集上，因为星期天人太多，好挤了一阵才挤过来，赶走到人稀的地方向口袋里一摸，三百块钱一齐不见了！”

“丢了？”贾鸿年很丧气地说：“嗯！没有想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人敢在别人的口袋里往外掏钱！”“唉！这都怨你没有真正尊重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党中央和毛主席不是多次提醒大家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吗？现在你打算怎么办？”“丢就是丢了！‘钱’又没个记号，找是找不着的。我妈妈还有一对陪嫁的大柜，我想回去抬到县里来卖了赔出来，只是队里初次托我办事，我不想担那没出息的名儿，因此想请老师再借给我二百块钱，等我卖了柜一并还你！”李老师没有马上答应，只是扬起头来考虑。

就在这时候，院里的电话铃又响了，还是那个小女孩接住问了一下，然后朝里边说：“李老师！你的电话！”李老师只得放下他们两个人去接电话去。

李老师出去之后，贾鸿年觉着正是争取王兰一点同情的時候。他看了看王兰，见王兰没有什么表示，便主动地从自己坐的那把躺椅上起来，移到李老师坐的那把椅子上去。窗外李老师的话，只是些不接连的“嗯……是……有来……”等等声音，贾鸿年把头伸到王兰的耳朵边轻轻地说：“你看这多么倒霉呀！”王兰把身子往后一仰躲开他，低低地可是恨恨地说：

“谁知道你搞什么鬼！”贾鸿年说：“我又怎么得罪下你了？九月份写给你那么长的信，就连你个纸条也得不着；这会碰上我遭这么大的事，你不只幸灾乐祸，还要疑神疑鬼！这都从哪

里说起呢？”王兰真想马上走开，可是李老师说问自己的话自己还没有回答，走开了太不礼貌，所以仍耐着性子待下来，不过她也不再准备正面回答贾鸿年问她的话，只简单回答说：“我爱怎么做、怎么想，都有我的自由权，没有向你说的义务！”贾鸿年又把语气转得更温和地说：“我的兰兰！难道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这样简单了吗？就是真要散场，总也还得吹个‘尾声’吧？兰兰！你对我这样胡猜乱想是很危险的！我求求你：咱们不要在老师这里闹，待一会我到你住的店里……”“干白菜？没有！”李老师在打电话中间提到了个“干白菜”，贾鸿年吃了一惊，这时候的贾鸿年再顾不上向王兰提要求，也再顾不上考虑对王兰应该表现什么风度，干脆把耳朵贴到纸窗上听李老师打电话，嘴张得像在皮球上挖了个窟窿。

院里的李老师，依然继续打电话：“嗯……听谁说的……没有想到……六十多斤……他还在我这里！你派个人来吧！”院里的李老师把电话机一挂上，里边的贾鸿年的腿一软便跌坐到椅子上。李老师怒气冲冲地走回来向着贾鸿年盯了一眼，贾鸿年把头低到肚子上“呜呜”地号哭起来。王兰料定贾鸿年有鬼，可也不知道鬼在什么地方。

贾鸿年究竟在什么地方弄鬼，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为了把原因交代明白，只好让他多哭一阵子。

以下我便要交代他哭的原因了。

智取王兰

王兰和贾鸿年在高中同班，本来都该在本年暑假毕业，后来王兰因事休学，贾鸿年一个人毕业了。他们两个都是高材生，

特别是文章作得好，李老师很器重他们，以为是不可多得之才。他们两个又都爱文学，李老师又是个业余作家，因此他们常好到李老师家里来请教，并且就因为在这请教中常碰头，才产生了彼此爱慕之意，后来关系深了，就在李老师面前也不避忌——不但不避忌，有时候有点小摩擦，李老师还替他们排解。

贾鸿年读的文学书籍比王兰多一些，文章也写得比王兰更好一些，在一些纪念节日或者班里的会议场面上讲起话来，也要比王兰讲得更热情、更全面、更有政治风度。王兰对他很钦佩、很信任。

他们两个人同时申请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王兰被批准了，贾鸿年却没有被批准。据团支部了解：王兰的特点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心直口快、有甚说甚”。例如每个学期开学，集体买回来的课本、文具，总难免有有缺点的。这有缺点的东西，发到别人手里，往往还要争着换一换；发到王兰手里，王兰便一声不响地收起来——要是有人提醒她去换，她便会说“反正总得有个人要”。年关节日大扫除，布置会场，做脏活、重活常是她带头——有人为她鸣不平，她便要说“反正总得有个人做”。团支部了解贾鸿年的特点则正和王兰相反。贾鸿年的特点是“看客下菜、看风驶船，明似谦恭、实则傲慢”。例如见了李老师就温文儒雅地谈文学，见了班主任就严正其辞地谈班风；叩李老师的门是不紧不慢、不轻不重地叩三下，回到自己宿舍则是不管门里有人无人，把门一脚蹬开，先来个武生亮相。

王兰入团之后，贾鸿年又提出第二次申请。团支书派王兰帮助贾鸿年克服缺点，及至把贾鸿年的缺点说给她，她反替贾鸿年辩护说那都不是事实；团支书批评她看事物不够客观，她还有点不服气。其实当时也很难怪她。贾鸿年的缺点，绝大部分

是不会暴露给她看的。不过每个人的缺点，都不能在熟人面前长期保密，贾鸿年对王兰自然也不例外。

这个中学的学生自习，都是在课堂上作的。上年快放寒假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课堂上做自习，团支部叫王兰谈话去了，过了一阵，王兰附近桌子上一位男同学想借王兰的尺子用一下，就拉开抽斗去取。贾鸿年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架住他的手说：“你有什么资格翻人家的抽斗？”那个男生的功课作得不太好，见是贾鸿年这位常被老师称赞、又是王兰朋友的高材生，觉着不便较量，就缩回手去归了座。贾鸿年正去替王兰关抽斗，忽然看见王兰的笔记簿在抽斗里，就随手把笔记簿抓出来。偷看人家的笔记簿本来就够不应该了，可是他还偏要摆个特别的架式来看——他把抽斗关回去，一纵身坐到桌子上，右脚蹬住王兰的座位，把左脚架到右膝上，双手揭开笔记簿向前一伸，堂堂正正地看起来。叫他不够十分得意的是：他刚刚把笔记簿揭开，王兰气冲冲地一开门走进来了。贾鸿年听到门响，把眼光从笔记簿上移开一着，见是王兰，就跟屁股上安装着滑轮一样，一骨碌从桌子上溜下来——不过他也没有马上走开。只是拿着笔记本规规矩矩地站在桌子横头候命。王兰连看也没有着他，只是拉开抽斗看了看说：“谁翻我的抽斗？”前边桌子上一位女同学和她开玩笑说：“有资格人士！”王兰气愤地说：“谁敢有这资格？”那位女同学仿着她平常的口气说：“反正总得有个有资格的！”贾鸿年觉着这会正是自己表示资格的时候，就恭恭敬敬把笔记本递过去，虽说没有开口，意思好像是说：“要不是有我保护，你的抽斗早被别人翻了！”可是他得到的效果并不够理想——王兰气冲冲地把笔记簿夺过来摔进抽斗，“砰”地一声把抽斗关上了。原来当贾鸿

年架住那个男同学的手那时候王兰就回到教室外边了，因为夜间屋子里有灯的时候，里边看不见外边，外边却能看见里边。王兰在这情况下初次发现贾鸿年对同学如此无礼，想观察一下，所以没有马上进来，及至看到他翻阅自己的笔记簿那种傲慢的态度，实在觉得忍无可忍了才走进来。

从这以后，王兰对贾鸿年才事事留神，过了一些时候果然发现和团支书所说的一样。她每发现一件事都要和贾鸿年闹一场气，不过是背地里闹的多，当众闹的少。她开始和贾鸿年闹气的时候，只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以为只要跟他闹一下，他以后就不敢犯了。贾鸿年随机应变的鬼本领是很出色的：每当王兰和他闹起来，他觉得能抵赖过去的就千方百计地抵赖，抵赖不过去的就低声下气求饶，“誓死不再犯”的话说过千百遍，可是“再犯”的次数要比“誓死”的次数多得多。贾鸿年揣摩透了王兰一种规律，那就是每向她表示一次悔过，就能把她的感情拉得更接近一点，因此不但不怕她闹，并且在较长时间里不闹的时候还故意出一点小错挑得她来闹一闹。王兰就在他这个圈子里和他越闹关系越深，发现的毛病越多反而越不容易一刀两断。王兰自从抛不开贾鸿年之后，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心直口快”了——例如在李老师面前对贾鸿年的小错误虽然也常常指责，可是遇上比较大的错误反而会给他隐瞒，比起以前来，就不够直爽了。李老师不知道详情，所以往往以为他们是犯了小孩子脾气，有时候还替他们排解。

创 作 忙

在本年上半年，贾鸿年写了一本二十来万字的长篇小说

稿，写的是他们大队前任大队长。他把稿子拿给李老师看了，李老师说“不行”，说主要问题是不像——写大队长当长工时期的生活不像个长工，写他当民兵又不像民兵，写他当支部书记又没有写具体场面，写土改又是把别人的小说改头换面抄过来的。他请李老师提修改的意见，李老师说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没有社会生活知识问题。并且告他说：“写自己不懂的事谁也写不好。”但是他不甘心放弃，老是在自习时间里改来改去。他这位高材生上不了大学，与这事大有关系。

他和其他考大学没有被取上的同学们一样表示过要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作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劳动人民，可是一回到村子里，有了和那位前任大队长长期接触的机会，又唤起了他重新修改那本长篇小说的念头。他起初是一有空儿就找这位大队长问长问短，后来干脆误上整工找人家谈细节。

这位前任大队长，已经有六十多岁年纪，身体也不大好，家里又不缺劳力，按一般习惯，就是不再上地，也不会有人责怪他。不过这老人有很浓厚的类似封建时代的功臣思想——觉着自己是个长工出身，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领导过本村的土改，当过支部书记兼民兵指导员，合作化初期试办过初级农业社，高级化以后还是社长，公社化后又当了一年大队长，如今虽然因为年老体弱光荣地退休了，可是家里儿孙满堂、人财两旺，很足以尽天伦之乐，因此逢戏就看，逢集就赶，每逢春暖花开的时候，买个车票到省里或京里游游名胜古迹，找几位攀得上关系的高级干部合拍几张照片……以为一个人得着了这样幸福的结局，也算罢了；现在贾鸿年要把他这光荣的历史写成书，在他看来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好事——觉着自己现在已是盛极一时，那样就还可以留芳千古，所以十分乐意和贾鸿

年合作。

这样一老一少便忙忙碌碌共同搞起创作来。贾鸿年对这位老队长几十年的生活史，考问得十分详尽，几乎连一天也不肯放过。例如谈到老队长九岁上给人家某富农放牛，就要问放了几个什么样的牛，穿什么样衣服，戴什么样的草帽，拿什么样的割草镰刀，在什么样的山坡上放……；问到给地主当长工算工资的一段，又要问在什么样的房间里，房里摆着些什么家具，地主坐在什么位置上，自己蹲在哪一块儿……；其中谈到了一些具体动作——像赶牛、割草、地主讲话的姿态等等，贾鸿年便要请老队长摆起个架式来，自己按照那种架式找出描写它的适当字眼儿，写成一段材料。他们两个人搞的这种工作，在别人看来像照相、像排戏、又像巫师下神。村里有个爱说快板的人给他们编了两句顺口溜说：“老功臣，少子弟，不去生产光排戏！”

村里对他们两个人的闲话太多了，党支部开会批评了这位老党员老队长，生产队长也找贾鸿年个别谈过一次话，才把他们的排练次数约束了一下——不占主要生产时间。

老队长究竟是老党员，经过批评之后，认识到自己晚年的居功享乐思想给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就不再那样热衷于表现自己了。贾鸿年的急于成名思想却不那么容易纠正过来。他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党无法对他提出严格的要求。生产队长叫他谈话的时候，他虽然也表示过“以后一定要以参加农业生产为主，有了空闲时间再搞创作”，可是在实际上他并没有真照他答应的那样做——开始的两天是白天上地劳动，夜里创作；两天之后把他搞病了就请了病假；后来对外说是“一病不起”，实际上只病了一天，其余的时间是借病创作。

这样又引起一点家庭内部矛盾。他父亲是商人出身，当年和他舅舅在河南一带跑通行商，回家之后趁空子还搞点小买卖。就在他装病写作的中间，队里死了个小驴，他父亲和他舅舅买了来，明说是买来吃，实际上是合伙到一个集市上去卖腊肉，要他停下写作去帮几天忙收收钱。他说：“不行！我的事情正放不下手！”“你搞那能抵钱花吗？”“爹！你怎么净说钱？”

“白供你念了一阵子书！自己不能赚钱，又要花我的钱，可又看不起钱！我养活你叫做什么呀？”“你要知道人到世上不光要活个钱呀！”“你写来写去究竟写些什么高超的东西我也不懂，可是照你这样写下去，钱还得花我的呀！”“就专以钱说，也要比你卖那点死驴肉弄得多！”“你胡吹！谁管给你钱？”贾鸿年想：“这老人家既然只懂得钱，就只给他谈谈钱的方面吧！”他便把如何投稿、如何算稿费的规定说了一番。他父亲听了半信半疑，和他舅舅在集上谈论过一回这事，可巧有他村里人听见了，回来就传说他写的这本书至少能卖一千块钱。

这种传说给贾鸿年造成一种顾虑。他觉着这话如果传得叫王兰或者李老师知道了，自己的地位便要一落千丈，因此常常埋怨他父亲多话，父子俩便常因为这件事争吵。他觉着这种环境真不能创作，将来非改变一下不可。不过改变环境只能算以后的事，贾鸿年还是在这争吵的环境中创作下去了。

大约一个月工夫，贾鸿年写了十多万字，作为这本小说的第一部——他的计划是把全书分为四部，第一部只写那位老队长的放牛和当长工时代。他写完了这一部分，自己读了几遍，觉着非常满意。他本来想先寄给李老师看看，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他对李老师教他的创作方法大部分都接受，就是对李老师说的那“作家必须先参加社会实际生活”有怀疑。他总觉得详

细的“访问”和“参加”一样。他想把稿子寄给李老师看就是想在李老师面前证明他自己的想法正确——也可以说是向李老师示威，或者说纠正李老师的“错误”观念，后来又怕李老师不相信他在没有参加社会实际生活以前能把这部作品改好，因而把他的稿子根本放起来不看，误了他早日发表，所以才改变主意先投到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意一定，他便妥善加封，亲自送到邮局挂号寄出。寄出之后，日日夜夜地设想不久便要一鸣惊人的前景——像接到书、领到稿费、书送大队一本、公社一本……李老师一本、王兰一本，以及稿费如何开支等等。

万 言 书

贾鸿年把稿子寄出之后，除了想到将来如何惊人之外，同时自然要想到王兰。从夏天王兰回家伺候病人开始，他隔不了三天便要给王兰写一次信，王兰父亲病故的时候，他还亲自去慰问过一次，后来仍是不断有书信往来。近个把月来因为过度地把精力集中在创作上，竟有二十多天没有给王兰写信，从王兰对他的信任“程度”上看来，他觉得是很危险的。他想必须写一封异乎寻常的长信，才能挽回这种影响。可是要写长信，不是把时间更拖长了吗？再说亲自去看望一番吧，又是秋忙时期，王兰又不会装病，见了面谈不了几句话人家就下地了，自己又不好跟上去，仍是表不明心迹……想来想去，总算想出个好主意来：先用短信打个招呼，然后再写长信。主意一定，他便写出这样的一张信笺：

我的久别的兰兰：近来忙于秋收，多日不通信，按我们的关系说，我想你一定不会怪我。在这紧张的秋收中，我另外得到了一种不小于秋收的收获，其内

容一言难尽。我将用万言长信把这种收获报你知道。
这种收获，关系到我们两人的前途问题，所以先给你
送个节目预报。

年 九月二十七日

他给王兰写信的格式，也是经过精心研究的：为了表示亲昵，用“我的”这么两个字开头，为了表示免俗，又只称原名而不用“快乐”呀、“鸽子”呀等等古怪称呼；结尾用“敬礼”则觉太卑，“一吻”又太俗，“握手”则太平，不如什么也不用反而雅致大方；后面签名的地方，单签一个“年”字，写得工整一点，足以表示自己高而不傲的老大哥风度。他暑假后给王兰的每封信都差不多是用这个格式。直爽的王兰，虽然也知道注意观察他的言行，而在这些微小的地方，可没有发现他也是做戏，所以看了他好多来信，反而以为他自从参加了农业劳动，比以前变得朴实了。

王兰接住他这次写的这封简短的信，猜测了半天，以为可能是他在农业生产上有了什么较大的发明创造打算、或者建设计划，需要自己和他去共同完成，及至又等了几天接到他的万言书，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下可把王兰气坏了。

信是怎样写的呢？原信太长了，念一念也得两个钟头，这里只能扼要地谈谈它的内容。他这封信有三个要点：第一点叙述了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和对这个成品的估价，第二点是改善创作环境的计划和所以那样作的正当理由，第三点是要求王兰秋后就和他结婚，以便共同安排。

他的创作过程，前边已经有那两句顺口溜可以说明，不必重复。他对他的作品估价，在这封长信里有这样一段结束语：

“……同上学期你和李老师都看过的初稿几无一段相同，可惜

投寄时候没有留下底稿，无法举例，不过我的总感觉是比现在流行的新作品都要细致一点。”为了取得王兰的信任，并且还说：“你不要怕我会再因此骄傲。自从听了你今年五月二日下午四点钟在学校体育场上那次忠告以后，在戒骄戒躁方面，我已经是无一事不加检点的了。”

这信的第一部分，虽然有末尾那些表明心迹的话，仍然引起王兰一些怀疑。在写文章方面，王兰佩服他的才华；评论起别人的作品来，王兰也相信他有一定的眼光。只是把他写的东西和现在已经流行的作品比起来，王兰觉着他那两下子还差。再一点怀疑，是他前边那封短信上说他因为秋收竟忙得连信也顾不上写，怎么会在这忙碌的一个月中，写出十万字而且还比别的产品都强的作品来呢？王兰想“一定有鬼”。

王兰接着又把这信的第二部分看了一半，才知道他在这忙碌的秋收中，除完成了十万字的小说，还有更惊人的创作。信里这样说：“……由于我们两人的结合，决定了我们今后的生活要以创作为主。一个月的创作生活告诉我，环境对于创作往往有决定的意义。我有个改善创作环境的方案，需要等你来了之后共同实现。事关你我终身大计，我需要不厌其详地写在下边，来征求你的意见。”接着便是有图有文的方案。方案开始是这样写着：“咱家（实际上还只是贾鸿年自己的家）你是来过一次的。咱家的南房后墙，是紧靠着一丈多高的土岸筑起的。南楼后墙上有已经堵死了的一个门，是和岸上的地面平着的。这地方原来也是一座院落，和咱们现在的院子是上下两院，咱们现在的南楼就是上院的北房——如图一。上院的西房是上下六间，西楼比咱们现在的南楼高一层；南边是个碾棚，和咱们的南楼一样高；东边的地势也到了岸边，没有房子，只有三尺

来高一堵篱笆式的围墙。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把碾棚下边堆的柴草点着了火，除把碾棚烧了，还烧了西楼的南间，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如图二。”上边这一段只是说明房子的现状的，以下才谈他的改良计划。他说只要把上院的西楼修补一下，南边不用修复碾棚，只须修一堵围墙，留一个通外边的大门，再把现在南楼后墙上的门窗拨开，把东边岸上的短墙补一补就是个现成院落，并且又附了一个平面图、一个立体图、一个远视图。立体图画得很工整，画的是新式门窗。远视图画的是一张国画——他是和李老师学过几天国画的。下一段便写的是如何使用这座新居，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着：“只要一上南楼隔着门窗往院里一看，你就会产生‘别有天地’之感。南边通外边的大门，除了运煤运水之外，经常可以不开，也就是陶渊明所谓‘门虽设而常关’的意思。我们住到西房里，西楼就是我们的书斋。这楼是三面开窗，视界很广，远处的流水高山，近处的绿槐庭院，随时都可以供我们以诗情画意。你试想：到了夏秋之际的月朗风清之夜，我们靠着岸边的短墙设个座儿，浸润在溶溶的月光和隐隐的飞露中，望着淡淡的远山，听着潺潺的流水，该是多么有益于我们的创作心境哩！至于北房——也就是现在的南楼——的用法，我有这样个打算，不知你是否同意。我想你来了之后，老岳母一个人呆在你们村子里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干脆接到咱们家里来住，咱们照顾起来也方便一点。”

王兰在看他这封信的第一部分时候，虽然对他的创作成绩有所怀疑，可是看这第二部分看到这里的时候，和自己以前亲自看见的他那个环境一对照，可又不得不佩服他的设计才能。她觉着就那个现有的状况说来，这真是花费不多、收效不小的改造方案。她一边想着一边又去看那说明现状的第一图和第

二图，联系着回忆到她到贾鸿年家去的那一次所了解的情况，又发现了个可疑之处。她记得贾鸿年说过他家只有现在住的那些房子，为什么又多出一个“上院”来呢？

不过贾鸿年早就知道她会想到这一点，所以在信中接着便叙述上院的来历。信中是这样写的：“这个方案实现起来，预料是会很顺利的，不过也还存在着个不难解决的小问题：这上下院原来都是咱们家里的祖业，可是在我爷爷手里把上院的西房卖出去了。现在这座房子的主人，就是咱们学校初中二年级名叫贾松年的小同学的父亲。这位老远房叔叔，去年因为出丧，长支下了队里二百多块钱，想把这座破房子卖了归还队里，可是一年多了也卖不出去。我想过几天我的稿费寄来了……”

“呸！稿费还没有拿到手就先想到要吞并别人的房子呀！”王兰看到这里看不下去了，便把手里剩下的几张信纸摔在桌子上。她扬着头发了一阵呆，又自言自语说：“我真傻！这封信一开始就把他这该死的思想暴露出来了，我为什么一直看到这里才发现呢？”其实王兰偏是看到这里发现问题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给她父亲买棺材也借用了队里一百多块钱还没有着落。隔了一阵，王兰又把扔下的信拿起来说：“我看你下边还要放些什么屁？”

贾鸿年这小子真算摸着了王兰的脾气。这信下边除接着写出他对稿费数字和买房、修补工料等数字的估计外，又单独写了一段他所以要那样作的正当理由。理由是这样：“你会不会以为我是自私自利、谋产霸业呢？兰兰！考虑问题要全面：我这位远房叔叔这座破房子愁的是卖不出去，咱们不还价买了他的，他不但不会怀恨而且还要感激哩！至于咱们扩充房子为的是改良创作环境。创作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人民而创作——也

就是为了‘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

“呸！呸！你再有天大的理由我也不愿再往下看了！”王兰说着干脆把剩下的信纸揉成一团扔到桌底去。“一刀斩断！”王兰拿过自己的纸来给贾鸿年写回信：

“贾鸿年！你这可耻的鬼魂！不许侮辱‘共产主义’！凭你那肮脏‘精神’，怎么竟敢说你还要‘教育人民’？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凭你那臭鬼魂就写出高于‘现在流行’的东西来了吗？真要有个瞎眼编辑让你那臭东西‘流行’起来，还不知要毒害多少纯洁的灵魂哩！你为了结婚想把人家贾松年家的房子谋到手来建造你的‘空中楼阁’，还要让人家感激你呀？人家贾松年长到结婚时候没有房子只会骂死你！你要真成了作家，得到了更多的稿费，还不想把你所欣赏的那些‘绿槐庭院’都买了来改建洋楼才算怪……”

王兰一鼓气写到这里忽然把笔停住了。因为她想起今年上半年快要离开学校时候——也就是贾鸿年说的那五月二日下午四点钟——责骂贾鸿年那次，用过这种口气，结果是贾鸿年哭啼啼表示了一次“大彻大悟”作为了事。她想这次给他寄去这封信，要是招惹得他亲自来到家里再表示一回“大彻大悟”又该怎么办呢？“算了！这种戏我看够了！真要断只有一个简单办法：不理！再来一千封信也不理！亲自来了躲开，仍不要理！对！就这么办！”她独自一个说罢，就把她刚才未写完的那张纸揉了一下也扔到桌底去。

特种家风

贾鸿年一样和王兰上学，又都是高材生，为什么在品质方

面和王兰那样不同呢？这和他的家庭习惯有很大关系。前边提过：贾鸿年的父亲和他舅舅是两个投机商人，直到如今还好偷偷摸摸搞点小投机买卖，因此他们的处世做人、言谈举动都有一套特殊的习惯。比方说：一般劳动人民，偶尔沾了别人一点什么便宜，总觉得是对不起人的事，而他们则恰好与这相反。他们沾了别人的便宜，不论是偷来的、摸来的，只要没有被人夺回就算“胜利”；谈到自己的历史，不论是拐了人、骗了人，只要得过实际利益全当“光荣”；三天不哄人，就觉着什么任务没有完成；一次不得手，也好像有了亏耗还须补偿：村里人常说他们是“未出窝的麻雀嘴朝外，挨着了就吃”。贾鸿年就是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所以秉承了这种家风。

难道贾鸿年受了多年学校教育，思想上就没有点变化吗？有是有来，只是还远远没有这到脱胎换骨的程度。一个人的思想改造，有个决定性的界限，那就是有没有决心做个合乎社会主义公民标准的新人。谁要是没有过了这一关，他的基本行为就仍是旧思想指导着，学得的一些新词汇、新道理，恰好能给自己的旧思想、坏打算做个伪装、打个掩护，让别人一时摸不透他的底。贾鸿年正是这一种人。

贾鸿年和他爹贾连升也有矛盾，不过那种矛盾是假的。他爹贾连升和他舅舅石三友一样，都是不涂不抹赤裸裸的投机分子，而贾鸿年要达到什么个人打算，可要把拿得到人前的表面过场做个够。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父子们好像不能共事，其实是一窝狐狸不嫌骚，只要利害一致了，互相体谅着一点，还是可以合作的。当贾鸿年把给王兰写的“万言书”寄出去个把月之后，他们父子们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纠纷，正好说明这种假矛盾的性质。

大队里清理仓库，有一批历年积累下来的奖品——原来是政府奖给大队集体的，却又是些私人用品，像暖水瓶、自行车等——要按人按户分配，东西少，分不过来；要继续积存下去，有些东西就要生锈或者霉烂，最后想了个办法是把东西卖给社员，把卖来的钱并入公积金。在卖的时候还有个困难：冷货会没人要，热货会有人争。大队为这规定了个办法是：凡有两个以上的买主争一件东西，要比一比需要，卖给最需要的。贾连升和石三友这两个无孔不入的宝贝，碰上这种机会自然不肯放过，就各自拿了手里的现款到场去抢便宜。有一条毛毡，好几个人都想要，大队要他们比一比谁最急需，贾连升便说贾鸿年要结婚，于是就把这条毛毡买到手。说贾鸿年结婚也不是他编造的瞎话，是贾鸿年向他说的，不过贾鸿年向他说的时侯，要求他不要向外人说，而他却偏找了这么个热闹地方说出来了。

贾鸿年这一天往哪里去了呢？贾鸿年自从把小说稿子和万言书寄出去之后，日日夜夜盼望着两头的来信，每星期总要借故请假往公社跑一两次。这一天，他又往公社的邮寄代办所去打听来信，结果是王兰仍没有一字回音，稿子被出版社退回来了。他取了退稿，回到半路上打开封皮看了一下里边附的退稿信，信上仍说他对战争时期的生活不熟悉，写得不像，并且劝他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历史题材，而要努力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以便从中吸取养料、丰富自己。他看了这信非常厌烦，以为这位阅稿的编辑简直是和李老师一鼻孔出气。为了不让本村参加生产的中学生碰上了找麻烦，他掏出手绢来又在那纸封皮外加了一层布封皮，压在车架上。不巧的是他回去得晚了点，到了村边要上一道小坡的地方，刚跳下车来推着走了几步，旁边一股小道上走来一些晚上收工回家的人，其中偏又

有个爱和他开玩笑的中学生。这个学生指着他车架上那个小包说：“鸿年！我可能猜着你这是一包什么东西！一定是结婚用品！”“不要瞎说！谁说我要结婚？”“老封建！这还瞒什么？你爹在大队说的还会有错？”贾鸿年有点着急，但是也不想再做什么解释，只好回家和他爹生气去。

前边提过：贾鸿年家和他舅舅家，都是以沾了便宜为光荣的。这天晚上，贾鸿年一回到家，就碰上他爹和他舅舅在灯下欣赏那条刚买来的便宜毛毡。贾鸿年和他们连招呼也不打，黑丧着脸进了套间里。一会，他娘出来埋怨他爹说：“你在大队说鸿年什么话来，惹得他回来连饭也不想吃了！”“我没有说什么呀！”“你提他要结婚的事来？”“那个呀？那也是个见不得人的事？不提结婚，人家怎么会把这么好的毛毡三十块钱卖给咱们呢？”贾鸿年在套间里接话说：“我不要那个行不行？”他爹说：“这倒不是亏人物！你真不要的话，我拿到别的地方，不会卖也卖它五十块！”他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愿把结婚的消息传扬出去，他也不便向他爹说明王兰那一头还没有来信，所以想吵也吵不起来，只好各自纳闷。他舅舅趁势劝了几句，见都不说话了，还以为是自己的话发生了效果，便把话头仍转到倒腾小买卖上，提出个贩卖烟叶的诡计来。

有个情况需要在这里交代一下：种植烟叶的地区，生产队除了按合同完成了交售给国家的任务之外，往往还留一点自用的，平均卖给吸烟的队员。这些吸烟的队员们，有的吸得多，有的吸得少。吸得少的，或者根本不吸的有了剩余，往往把剩余下来的送人或者出让给别人。贾连升和石三友，正是利用这种空子来搞鬼。

石三友的具体计划究竟怎么样，等说到他露了馅的时候，

大家自然会知道，此处不细交代。他放低了声音对着贾连升的耳朵说出他的办法之后，又放大了一点嗓门说：“你看怎么样？翻得好了三五次就能翻他几百块！你要有意的话，拿出个百把块钱来咱们再去倒腾他一下子！”贾连升指着毛毡和其他新买来的东西说：“都买了这些了，哪里还有现钱？”石三友见说没有现钱，也就无心再谈下去，又随便应酬了几句就走了。

贾鸿年躺在套间里把他舅舅说那“能翻几百块”的话听在上，刚回来时候那一点怨气也被这话打消了。他有他的计划。他从从容容走到外间来向他爹说：“爹！只要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我明天可以给你借到一百块钱！”贾连升一怔。他想：“咦！这孩子怎么忽然开了窍了？”为了鼓励孩子参与自己的鬼事，他便慷慨地说：“你说吧！只要是能答应的爹都答应你！”贾鸿年说：“你要是赚了钱，请你把上院那座西房买过来，修理修理让我以后住！”“你也会想到这个？咱父子们想到一股路上去了！我前几天还想：要是把那座西房买下了修理修理，再把咱南楼后墙上的门窗拨开，再把南边修上一堵围墙，就是现现成成一个小院！”贾鸿年听到这里，自然是眉开眼笑，为了证明自己的谋略不比他爹差，便跑回自己住的房间里，把当日附在万言书中那张立体图底稿取得来给他爹看。他爹看了笑着递给他娘说：“你看这！谁敢说咱这孩子傻？”回头又向贾鸿年说：“可是你到哪里借这一百块钱去理？”贾鸿年说：“去找我们李老师借！”“人家肯借给吗？”“话说对了是能借得来的！”

这样一来，父子们的矛盾就完全烟消云散了。他们没有真矛盾：不要看贾鸿年瞧不起一条便宜的毛毡，像一座房子那样

大的便宜他便不肯放过去。他说找李老师借钱要把“话说对了”，并非要说真话。按他们的家庭习惯，说真话不能算是说“对”了，而是要骗得对方相信才能算“对”了的。在这些地方，他们父子们可以“心照不宣”，彼此无须再作解释。

贾鸿年他娘说：“我鸿儿办得了事！我说等他借回钱来，就让他和他舅舅去干好了！”贾鸿年着急地说：“不不不！除了借钱，别的我不参加！”他爹说：“你说得对！除了借钱，别的什么事也不让你管！”回头埋怨老婆说：“你尽说废话！孩子以后是要在‘有头有面’的人们中间‘混’事的，怎么能和我们这些快要死的老骨头去倒腾那个呢？”

父子们由谅解而合作了。贾连升最后的话，完全说到贾鸿年心上。贾连升所说的“有头有面”的人们，是指我们县里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过他不会懂得今天的干部是在实际工作中久经锻炼、久经考验的，而以为还和旧时的作官人一样，是在官场中“混”来的。贾鸿年也不比他爹高明多少：老革命干部的传记、回忆录他是看过好多的，不过从来也不打算和自己的思想、行动联系一下；至于他自己，则按家教办事，——多方找门路“混”。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根本不是他的打算，不过是在热潮中不得不应付一下，只要有一点机会，就要出去“混”去。他所以不愿参加卖烟叶的勾当，并非以为那是坏事，而是怕妨碍以后“混”的前途。难道哄骗着老师借投机资本还不算是参加了吗？

贾连升见资本有了着落，马上便去找石三友计划进行程序。一会，贾连升回来和贾鸿年说：“你早点睡觉，明天一早起来吃顿饭就进城去！”贾鸿年说：“还没有向队里请假哩！”

“已经安排了！明天绝早让你妗母到队里替你请假去，就说你舅

舅病了，要你到公社替他请大夫！”“请大夫不是要跟大夫同来吗？”“傻瓜！跟大夫相跟出来，不会说你还要找个人，让他先走一步吗？”在他们家里，这样公然教孩子说瞎话是很平常的。

特殊功课（一）

第二天早晨，贾石两家按原计划进行：石三友老婆给贾鸿年请假没有发生问题——石家没有孩子，有事就是靠外甥们帮忙的。贾鸿年去请大夫也没有发生问题——和大夫骑着车子走了一段路，就推说要回去找个人，丢开大夫回头往城里来了。他找李老师借钱也很顺利——他知道李老师对集体事业乐于协助，就编造着说生产队在牲口集市买了一头骡子，还差一百块钱，要李老师暂借一下，三两天就送来。在他说来，这算把话说“对”了，所以骗得了李老师的信任，把钱借给了他。

不过他在这一次进城中间，也还发生了点小小意外。他临起身时候，他爹托过他代买两条麻袋，要是借到钱随手就买的话，也就买上了，不巧的是他照顾了一下别的事情，把这事耽搁下来。

事情是这样：他对王兰是不能放手的。他借到钱之后，正是上午十一点半钟。这时候，他有心去找王兰，一来时间来不及了，二来又怕有什么意见当面弄僵了，所以便改变了个主意，利用这个时间去找王兰的女朋友探探口气。

王兰这个女朋友叫周天霞，家和王兰是邻村，又同在一座中学上学，王兰比她早一年级。现在她是高中二年级生。贾鸿年和王兰的关系早已不避忌她，有时候闹了纠纷她也往往替他们调解。贾鸿年以为这是个很好利用的对象，便趁她在中午

吃饭之后去找她。

出乎贾鸿年意料之外：周天霞和他略寒暄了几句便主动地问他说：“你和兰姐闹了什么意见吗？”贾鸿年见对方主动提出来了，便假装不知地说：“没有！你听谁说的？”“听她村里人说，她给大队赶了大车，并且在群众大会上宣布说她‘今生今世也不离开本村’，要和本村人共同进行生产建设，直到进入共产主义！”贾鸿年听了这话好像挨了一棒子，再往下问，周天霞说她不了解别的情况；求周天霞替他去问询，周天霞说一来刚回过家不便请假，二来去了也碰不上她在家。问来问去得不着要领，上课铃响了，只得辞出。

王兰的情况周天霞几乎全部知道，可是周天霞这次偏也说了瞎话。这不能埋怨周天霞，瞎话仍不能不说，也可以说是贾鸿年要她说的。

两星期以前，周天霞请假回过一次家，返校的时候去找过一次王兰。那天她到王兰家是上午十点多钟。王兰不在家，她问了王兰妈妈，知道王兰赶着车往地里送粪，便歇下来等。她到王兰家是很熟惯的。她问王兰妈妈说：“兰姐怎么学了赶车？”王兰妈妈说：“她自己在大会上报了名，支书、队长批准了，就干起来了。”这老人家对王兰赶车看来十分满意。她向周天霞好像有点夸女儿的样子继续说：“小兰可真有两下子，把几头骡子使得像玩猫一样随便！快回来了，你可以出去看她赶得怎么样！”周天霞也很有兴致，听老人家说了一声便跑出大门去，不过没有赶上看，王兰已把骡子卸了送回圈去，拿着一条空鞭子回来了——原因是牲畜收工要比人早个把钟头，以便让它吃饱。

周天霞紧跑了几步，在大门外的一棵大槐树下迎着了王兰，用双手握住王兰的左手——因为右手拿着鞭子。王兰急忙缩手也没有赶上，便说：“手上有粪，等洗了再握！”周天霞笑着说：“那就失去了握手的作用了！咱们回去一齐洗！”周天霞见王兰把辫子盘在头顶上，束着腰，挽着袖，拿着鞭子，便上下端详了一会说：“这装束有点像古装戏上的女兵！”两个人又相对一笑，王兰便放下鞭子，解下腰带来拂打了身上的尘土，又把辫子解开往背后一扔说：“这个女兵又结束了一次战斗！咱们到屋里坐去吧！”周天霞想到回去对着王兰妈妈，可能有些话谈起来不方便，就要求王兰说：“咱们就在这外边玩一会再进去好不好？”“可以！”“你家这院子的地势真好，在这山腰里，站得高看得远！”“天霞！你说得完全正确！要不我就宣布一辈子不离开这里哩？”

周天霞见话正好转入正题，便问她说：“我们村里人也听说你在大会上宣布过一辈子不离本村的话。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决定！”“你不是也说这里好吗？”“兰姐！说正经的！贾鸿年又和你闹过吗？”“天霞！咱们不要说别人的事吧！我也是和你说正经话的！你看：对过阴坡上那小松树林，完全是才长到十年的小树；半山腰里那两攒红叶子是两棵老柿树；从那以下越来越多的红叶，都是小柿树；和松树的年纪一般大，才结了柿；下边沟里那条小流水……”“兰姐，兰姐！我不是来看风景的！你怎么把你自己的事说成别人的事呢？”“我也不是给你讲风景，这才是我自己的事哩！”“兰姐！咱们不要越说越远！你只当给我解个谜：你和鸿年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你要是半个月以前来的话，你就是不想和我谈那个，我也要强和你谈；如今我已经把它放下了，再翻出来谈还有什么意

思呢？”

王兰妈妈这时候从院里出来了。她一看到两个人都在槐树底，便叫王兰说：“小兰！怎么不和天霞回屋里来坐！回来吧！快吃饭了！”王兰说：“好！就来！”回头向周天霞说：

“咱们到里边去吧！”说着拾起鞭子来和周天霞回到房子里。

离吃中午饭还有一阵子，周天霞又要求王兰谈她与贾鸿年的关系，王兰说：“一定要谈就不能轻描淡写！”说着到自己的柜子里拿出两个纸夹子来放在桌上。王兰先把一个夹子揭开向周天霞说：“这是他给我的所有的信件。这些信，除了一部分我当时不愿让你知道的和我休学以后的，其余大部分给你看过。这是所有他给我的纪念品——还有些这里夹不下的，只编了个号，写明另存。这人可以说是纪念专家，一张邮票、一片树叶都签了名作为纪念送我。这一叠稿是从我自己的日记中抄出来的，都是他当时说过的话：所有这些，大小一共二百五十五件，是按日期先后编出号来的，每件上差不多都有我标过的线和简短的批语，每个段落又都附有我的概括说明。你要想了解他是个什么人、我该不该抛开他，看了这些自然会明白！”周天霞说：“我的兰姐！你是不是想留我住几天呢？”王兰说：“我是和你说着玩的！怎么会那样折磨你呢？我可以给你做个总的说明，并不清的再让你看原件。”说着便从夹子里拿出个目录单来继续说：“这一切，几乎无例外地都是耍小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跟着他走，为他服务。例如前年他在要求入团之前，不论是说话、不论是写信，到处引用毛主席的话、引用李老师的话……”说着随手翻出有关原件，一一指着上边标出的红线给周天霞看了说：“……等团里回答他没有批准之后，以后的写信、谈话，这些词句就很少出现了。又如去年

暑假之前，不论来信、谈话、送东西，都提到他的家乡风景如何开朗、物产如何丰盛……”随手又翻出有关原件指给周天霞看了说：“……然后向我提出请到他家玩一次。以后差不多一年没有提到他的家乡可爱，可是今年暑假的信件中，写他家乡的可爱又超过去年，写过几次家乡可爱之后，便要我考虑结婚问题，以后一步逼紧一步，终于骗得我回过他一封信说‘秋后再说’。半个月之前，接到这封万言长信，也就是最后的一封信。别的信内容可以不谈，这封信却非谈不可！”接着就把那封“万言书”中所透露的思想和适得其反的效果说了一遍，又把那些附图翻出来指着说：“尽管他在出头露面的热闹场面上、在作文和写信的字面上把‘以忘我的精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话说得烂熟，最终的目的不过是想做这么个笼子把我装起来叫他玩。过去我所以把这些废纸片当作宝贝似的保存着，有时候还当作宝贝给你欣赏，就是因为对这个人没有做过系统分析，所以才上了当；好在上当没有上到底，在法律上没有履行过订婚手续，还算没有和他拴在一起！”这一部分材料已经说服了周天霞。周天霞说：“兰姐！我真佩服你！没有想到你能像做功课一样下工夫来整理这个！”王兰叹了口气说：“你以为我有兴趣做这门功课吗？这都正是我为了私人感情放弃政治原则造成的苦果。天霞！看人要全面看，千万不要轻信他说的漂亮话，也不要把他表演给人看的局部行为作为全面行为！希望所有诚实的同学们谁也不再来做这一门倒霉的功课！”王兰说到这里有点伤心，不过还勉强忍住了眼泪。

这时候，就听得王兰的妈妈在厨房里喊叫说：“小兰！端饭来！”她们两个便共同洗了洗手吃饭去了。

特殊功课（二）

周天霞从来没有想到贾鸿年这样个青年小伙子，思想会这样复杂。她吃着饭，认真考虑着这件事。她认为从那一包材料上看，这人实在可恨，可是联想到具体的人，又不知道为什么觉着不至于那样坏。吃完饭，她又向王兰提出个疑问：“难道他已经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吗？人不是可以改造的吗？”王兰指着另一个夹子说：“这一包材料正是说明这个问题的！”周天霞拦住她说：“兰姐！你可不要再让我看那么多了，要不我就走不了啦！”“我也只给你说个大概！”她摊开夹子，里边只有大小五本日记和她决定与贾鸿年断绝关系时候给团里写的报告。她果然没有先翻材料，只把左手按在一叠子日记簿上先向周天霞说：“我自从结识了这个人之后，有时候和人家高谈阔论，有时候和人家书信往来；有时候和和气气，有时候别别扭扭，终朝每日总以为是正在影响着人家，改造着人家，可是实际结果怎么样呢？”王兰叹了口气，翻开一本日记指着上边标的红线说：“这红线是标明与我原来的理想、原来的前途打算有关系的部分……”又翻了几页，指着上边标的一条黑线说：“这黑线是标明我和他认识之后，我的思想、打算改变了的部分……”又把这本日记拿起来对着周天霞忒愣了一遍说：“你看前边净红线，自从有了黑线之后，红的逐渐少、黑的逐渐多起来！”她放下这一本又拿起第二本来忒愣，一本本都忒愣完了，便接着向周天霞说：“最后连一条红线也没有了！你看这是谁改造了谁？正因为从检查我自己的日记引起了警惕，我才向团支部写检查思想的报告，提出我不离山村的要求。”她又

翻开报告稿纸说：“在报告中我对我自己思想变化作了这样的总结：‘按着我原来的前途打算，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会和大家一起把我们的山区改变得更加美好；自和贾鸿年认识之后，我逐渐变成了个个人主义的依附者，要不立刻割断关系，不久就更会变成他一个私人秘书……’”她把夹子合上，然后接着说：“不止前途打算变了，趣味也变了：在一个课堂上上课却还要天天写信，这算是什么样的人的趣味呢？东一个纪念品，西一个纪念品，一个刚刚活了二十岁的人，又不是明天就死了，要那么多的纪念品干什么？我和我们小学的同学由老师领着在荒山上播种的松树已经成了林，我记得的黄河滩闸成的滩池，种出来的烟叶已经够拉几大车，放着这些都不曾当作纪念，偏会把他从校园里捡来的几片干树叶当成宝贝保存起来，这又是哪里来的趣味呢？这都又算是谁改造了谁呢？这等人，让他慢慢在我们的新社会大熔炉里改造吧！我已经领教不少了，万万不能先和他拴在一起了！”

周天霞听了王兰这篇“论改造”的讲话，又扬起头考虑了很久说：“兰姐！我已经佩服了你对自己生活态度的认真，只是还有一事不明：你当初和这个人是怎么接近起来的呢？据你从前说，你和他是从爱好文学上接近起来的。是不是一个人爱好了文学就会变成个人主义者？我和你也都爱好文学，以后还不敢不敢爱好下去呢？”王兰说：“不！今年五月初，他在一次谈写作时候，暴露过一次个人名利思想，我批评了他。后来他和我在李老师那里遇上了，他故意问李老师说：‘是不是爱好写作的人都是为名为利呢？’李老师说：‘各行各业都一样，抱着个人目的做什么事也是为名为利，抱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目的做什么事也是为共产主义。’我觉得李老师的话是

对的，可惜我当时护着他，没有把他的可耻的思想揭露给李老师听，骗得李老师仍然以为他是优秀生。我们为什么不敢爱好文学呢？当了社会主义建设者，以后不是正有了写的了吗？”

“至于他的坏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这里还没有材料。这个人就是有点做假的本领：通过了无数次的写信、谈话，他把我的家庭生活情况什么都摸透了，可是一字也没有透露过他的家庭生活情况。我当时也真傻，从来没有想考查一下他的家庭——每逢谈到那方面，他总有办法把话引到别的大事上去。在他申请人团那一次，表上添的是个‘中农’成份，可是我到 he 家里去的那一次，看不到 he 家里有什么农民气象。我还以为是富庶地区的农民生活和山区不同哩，现在才怀疑到他家可能根本不是农民传统，不过既然和他断了关系，也就无心再追究它了。”

周天霞说：“我的天呀！认识一个人这样不容易吗？”王兰说：“一开头知道不容易就上不了当，开头看得容易了就要做我现在做的这门倒霉功课！我劝你千万不要在学生时期解决婚姻问题。一个人的进步是真是假，参加了社会生活才容易看得更准确。”

话谈到这里，周天霞要走了。王兰说：“我也该上工了！”说罢依旧盘起辫子、束起腰、拿上鞭子，和周天霞同时走出门来。在握手作别时候，周天霞又问王兰说：“万一以后碰上贾鸿年，问起你的消息来，我该怎么回答呢？”王兰想了想说：“他非常可能专为这事去找你！他要问起我来的话，你就说你最近没有见到我，只听说我宣布过一辈子不离本村的决心，让他死了这条心算拉倒。”“那不是让我当面说谎吗？”

“好妹妹！对他这种人以后再也不可以推心置腹了！你和他讲

了真话，他是会利用你的话打什么坏主意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不对的，不过我们过去犯的错误恰好和这相反——我们对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他让我们非向他说瞎话不可，我们也只好说！”“难道这个人以后肯定不会再变好了吗？”“那是以后的事！让新社会的大熔炉去完成这个任务吧！我们村里的学生组织已经把他的材料转到他村子里去了！变好了社会上多一个好公民，自然也是好事，只是现在千万不要和他再谈我的情况，否则我那两个夹子里就又会增加材料了！”

果不出王兰所料，过了两星期，贾鸿年去找李老师借钱的时候，就去找周天霞打听王兰的消息，所以周天霞便照王兰的主意把他推走。

贾鸿年从学校推了车子走出来，几乎连买房子的心事也没有了。他勉强跨上车，失魂落魄地蹬着，有好几次差一点撞了人。他一阵恨着王兰想：“小王兰！你不要调皮！我总有本领把你弄到手！”一阵又放开王兰想：“去你的吧！算老子白下了一番工夫！”最后仍然想到买房子上。他想：“只要把环境建设好了，你王兰来了算你有福；你王兰不来，好姑娘有的是！”想到得意处，车子便又快起来。他快到公社所在的村子里，碰上了一辆拉花椒的大车，从装花椒的麻袋上才想到忘了买麻袋，便到公社供销社去买。

他走进公社供销社，正好没有一个熟人碰上，便抓紧时间向售货员要麻袋。售货员把两条麻袋递给他，他连好歹也没有看，便掏出钱来付款，忽听背后有个人说：“鸿年真发财呀！”他回头一看，见是村里一个青年，便后悔不该把借来的一百块钱都拿出来。那个人接着随便问他说：“买麻袋装什么？”他

很快就编好了瞎话，也装作很随便地答应说：“一位老师托我给人家买些干白菜！”

两头泄气

石三友自从这天早晨装起病来，就一阵一阵瞎哼哼。一会，大夫来了。大夫问他哪里不好受，他说肚子疼。大夫给他测了测体温，体温不高；按了按肚子，按一下他叫一声。大夫判不明病情，只得给他注射了些镇痛剂，留了点镇静药片走了。大夫走后他的哼哼仍没有停——上午哼得轻，下午哼得重，晚上一直叫要命。

晚上十点钟左右，生产队刚刚记完了工还没有散，石三友老婆便去找队长。她说石三友病得厉害，明天要送到县里医院去治，要队里借给一头牲口，并且再替贾鸿年请一天假让贾鸿年去送。

队长还没有答话，记工的人群里就纷纷议论起来，都说在杀地和铡草两项工作挤在一块正忙的时候，不可以再把青年劳力放走。有人向队长建议说：“他爹贾连升也不会杀地、也不会铡草，还不能让他去送一送他的大舅子？”队长考虑了一阵子说：“还是让贾鸿年去好！”有个老汉说：“对！不要让他爹去！把那两个‘宝贝’弄到一块，又不知道会出什么鬼事！”另一个人说：“也不怕！队里再没有死驴叫他们卖了！”队长转向石三友老婆说：“你回去让贾鸿年来一下！”

一会，贾鸿年来了，队长说：“队里正杀地，牲口忙得撒不出来。三队的大车明天到窑上拉煤，去的时候给咱们队里捎二、三百斤烟叶，就让你舅舅也坐那个车去好了。你要去，我

就不派会计去了。咱们交了这批烟叶，全年任务就完成了，你可以替咱们队里和收购站结一下账，把站上该找咱们的二百来块钱连清单一起拿回来！”

第二天队长领着人在谷场上铡草，其他各队也都有在场上铡草的。

北方农村秋后的铡草工作，是一项紧张活泼的有趣工作。这种工作，不能单干，就是在农业合作化以前，也是由几户自由组成变工队干的。这是一种重劳动。参加这种劳动的每天要吃够五顿饭，上午下午各有一顿饭是在场上吃，名叫“贴晌”，吃的是些黄蒸、煎饼之类的干食品。吃贴晌的时候是大休息。在这时候，不论青年老年都爱谈谈笑笑，喧闹之声此起彼落。

这一天，各队场上的谈笑话题无形中都集中在石三友身上——可能是他头一天哼哼了一天的结果。青年们好多人不知道石三友的经历，见老年人笑起来觉着莫名其妙，有些老年人便讲解给他们听。石三友的外号叫“十三么”。有人给青年解释这个外号说：“‘十三么’是打麻雀牌时候一种最大的成牌法，要是没有满贯的限制，‘十三么’要算十三翻，见一块钱要翻到八千一百九十二块，在从前行赌博的时候，小户人家连那么一牌也输不起。人们所以给石三友送这个外号，就是说他的翻腾劲过大。”有人接着补充说：“人家在当年做生意的时候，使用的东西和买卖的货物常不分家，只要价钱合适，把腿上穿的裤子脱下来卖了也行！”又有人揭他倒霉的底子说：“要是不会翻的话还来不到咱们村子里哩！他有一次翻塌了锅，赔了个扫地出门，才托他妹夫贾连升给他在咱们村子里弄了几间房子搬过来。”还有个人接着打趣说：“要不咱们村子里就会缺这么一块料！”

石三友他们自己的队里，开始议论的仍是贾鸿年请假问题，后来就转到石三友病情的真假，最后扯出个严重问题来。有个青年说：“贾鸿年尽躲重活，这次锄草又被他躲过了！依我说，另换一个人去照顾石三友，也应该把他留下来锄草！”队长说：“这个我也想来，不合适：留下个贾鸿年，叫他输（念‘如’的音）吧他不会，叫他锄吧锄不动，虽说是个青年，抵不住个正经劳力用，要换可就得换出个干得了活的，比起来还不如让他去了省事！”那个青年说：“不会干就学嘛！我们村里二十多个中学毕业生都学得会，他为什么就学不会？照他那样，不是越不想劳动越能躲清静吗？”有个年纪大一点的人说：“我看石三友那病，照顾不照顾都死不了！”又有人说：“依我说他那病根本就是装的！可能是他前天在大队里买了些什么冷货，想拿到城里去倒腾倒腾！”还有个人接着说：“他们两家向来是‘贾不离石、石不离贾’，说不定贾鸿年也是跟他去倒腾买卖去了！”队长说：“我看还不至于是那样！贾鸿年在劳动上虽说轻浮一点，可是也不同意他爹搞投机买卖！”一个从来不多说话的人忽然开口说：“不至于？也说不定！贾鸿年他娘昨天晚上买了我三斤自用烟叶，说是给他一个亲戚买的，也许是想捎到城里卖一卖赶个零花钱！”有人问：“三斤烟叶能卖几个钱？”另一个人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买别人的呢？”那个青年向各队的场上一看，见有好几个队的人也都正吃贴晌，便向队长说：“让我去打听一下！”说着就跑到别的场里去了。吃过了贴晌，大休息过后又要做活了，那个青年跑回来报告队长说：“就是有鬼！又调查着五户，一共卖给他家二十二斤烟叶，是他们老两口子分头去买的，都说是给他一个亲戚买‘几斤’——这家‘几斤’，那家‘几斤’，就查出

那么多来！很可能还有买别人的！”队长拍着膝盖说：“鬼、鬼、鬼！没有想到！你给我开个单子，马上报告大队一下！”大家又纷纷议论起来：“这才像他们两家做的事！”“我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嘛！”“……”那个青年从日记簿上撕下一块纸来给队长开了个单子，队长拿去报告大队，其余的人都侧起草来。

大队听到了这个生产队的报告，中午召集各个生产队长碰了一下头，让大家马上继续调查一下还有没有更多的情况。一会，各队断断续续又报了几户，接着就有第三队队长领着一个饲养员来报告另一个情况。饲养员说：“大车起身的时候，贾鸿年拿出两麻袋东西来，说是给他一个老师捎的干白菜，我看不像：一来白菜是一百斤湿的才落五斤干的，两麻袋不过装二十来斤，不应该是那样沉甸甸地；二来鲜白菜在城里满街都摆的是，谁偏要吃干菜；三来他家没有种自留白菜，又没有见他买别人的！”大队长听了这个情况，和前边买烟叶的情况对在一块，很明显地能看出他们是倒卖烟叶了。大队长和支书一商量，先打电话给公社把这情况报告一下，然后继续调查，决定到晚上再找贾连升到大队来交代。

晚上，大队召集了个群众大会，把十几户卖给贾家烟叶的人叫到前排来，然后让贾连升坦白交代。贾连升见事情已经揭开底了，想不承认也不行，只得说“我错了，我错了”。卖过烟叶的这些户质问他：“贾连升！你究竟有几个亲戚要烟叶，把我们蒙到鼓里边！”大队长问他说：“把烟叶倒到哪里去了！”贾连升说：“烟叶确实是给一个亲戚代买的，人家拿走了！”“胡扯！”“哪个亲戚？”“是不是石三友？”“……”群众正在追问，会场外边有自行车铃响，住在公社的一位县公安局干事来了。公安干事把大队长叫出去说了几句话，然后回到会场

上宣布说：“不用再追烟叶的去处了，是石三友拿到城里去了！石三友已经被政府捕起来了！”贾连升一听，吓得他几乎站立不住。他这时最不放心的是他儿子贾鸿年不知道怎么样了。

难言之苦

贾鸿年这时候往哪里去了呢？他倒找到了个清静地方，可惜是凉一点——在离城五里一个西瓜园里的草棚里。他是怎样到这个地方去的呢？这事还得回过头来交代：

贾连升本来是愿意单独干这次买卖的，后来想到怕石三友吃醋才去找石三友合伙。他预料到他们两个有名的“宝贝”一齐出马一定要引起村里人的怀疑，这才和石三友作了一套奇怪的分工——自己出资、收买，让石三友到城里去卖，再派贾鸿年暗中监督。这样一安排，便把贾鸿年安排成旧社会里那种“少东家”的身份。

贾鸿年这次可没有完全忠于他父亲的委托：头一天他来向李老师借钱，不是得到王兰一个出乎他意外的消息吗？他和王兰两个人的关系，都不是愤慨一下就能了事的。王兰决定和他断绝关系的时候，还整理了那样繁乱的两宗文卷给他作了一次清算，他得到王兰那个消息后，如何能只拍一拍胸脯就死了心呢？不过他可不是像王兰那样因为受了一度刺激来彻底检查了一下自己，而只是半夜没有睡觉又打了个坏主意。他所以爱王兰，只爱的是王兰的聪明、美丽，因此他便觉得只要得到个聪明、美丽的姑娘就够了，叫不叫“王兰”都没有关系。他在和王兰交往的时候，就已经觉着王兰的女朋友周天霞也是既聪明又

美丽的，这时候他就又想打一打周天霞的主意了。他计划这天和他舅舅石三友进城，趁着是个星期日再去找一找周天霞，求她去说服王兰放弃不窝山村的主张；以后每隔几天就去找一次，能说服了王兰自然更合乎他的理想，说说服王兰就在这多次软磨中间和周天霞磨出感情来，让她代替王兰。因为有这么个鬼主意分了他的心，所以没有把那个“少东家”当好。

拉煤的大车把他们送到县里的收购站门口，就把东西卸下来走了。石三友和贾鸿年往院里一看，见交售烟叶的人们长长地排着个队，预料在两三个钟头之内能交了就够好。石三友把贾鸿年拉到个僻静处说：“我先到店里占个房间，然后到市场上打听一下行情。这东西我先扛一袋走，你把队里的货交了、手续办了之后，扛上那一袋到隆昌客栈找我；有人问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仍然说成干白菜！”交代过后就扛起一个麻袋来，临走的时候又说：“到那里不要问我的真名字，就说找‘吴有铭’！我准备在他们的号簿上登记这个假名字。”说罢便先走了。

石三友走后，贾鸿年排进交售烟叶人们的队里。他看着前边的人数和每个人办手续的速度，急得他满头是汗，仿佛觉着交到天黑也轮不到自己似的，其实也没有那么慢，不过一个来钟头就该着他了。收购员们给他过了秤、结了账、开了清单，找给他二百二十四块六毛钱。他因为急于要去找周天霞，勉强等把手续办完，就匆匆忙忙扛起麻袋往隆昌客栈去。其实他只要多待十来分钟，王兰就也到这里交售烟叶。可是他哪里会知道呢？

人越着急，就觉着事情越不顺利。贾鸿年到了隆昌客栈，石三友上市场去还没有回来。他按照石三友的话说找“吴有

铭”，服务员告他说：“吴先生出去了，他说有人来送干白菜，叫送到他住的房间里去！”说着拿了钥匙给他开了第二十三号房间的门，让他把东西扛进去。

他把他扛来的一麻袋东西，放在石三友扛来的那一麻袋上边，翻身走出来，服务员正去锁门，石三友回来了。石三友说：“你且等一下！”贾鸿年只好跟他又回到房间里。服务员去后，石三友悄悄和贾鸿年说：“行情不好！和咱们的进价差不多！”“那怎么办？”“你给队里交了货，找了价没有？”“找了！”“找了多少钱？”“二百多块！”“有钱就有办法！再倒一下就成。把钱给我！”“买进来要卖不出去呢？”石三友笑了笑说：“傻瓜！这要随时跟着情况的变化做！这道理你不懂！坐下来，舅舅慢慢给你讲！”贾鸿年要是坐下去慢慢听的话，那就完全合乎“少东家”的本分了，可惜他放不下周天霞，便把二百块两叠整票子掏出来给石三友说：“回头再讲吧！我还得去找个同学！”说着就拔起脚来跑了。

一个毕业生回到母校去找未毕业的同学，一般是不按会客的规则接见，而是直接跑进宿舍去找的。贾鸿年头一天来找周天霞就没有经过这番手续，可是这一天来了反而被传达室挡了驾。传达室的同志很有礼貌地和他打招呼说：“来了，鸿年？”贾鸿年也点头答礼。传达室又问：“你找哪位呀？”说着把会客登记簿递给他。对方要公事公办，他也无权犯规，只好一边拔出钢笔来准备填写，一边回答说：“找高二一班周天霞！”“周天霞刚出去！”人既然不在，自然连簿子也不要填了。他又把钢笔套起来说：“我等她一下可以吗？”“好！请到会客室坐吧！里边有开水，随便喝杯水等等！不过她刚出去，恐怕马上不会回来！”

传达室对一个前期毕业生为什么这样客气呢？这也经过一度简单的安排：周天霞虽说没有料到贾鸿年要在自己身上打什么鬼主意，可是已经在王兰那里接受了一点教育，知道贾鸿年这小子不便招惹，所以在他头天找了一次麻烦之后，便和传达室说明贾鸿年以后可能还要来缠个不休，要求传达室在他再来的时候挡一挡驾，可巧他这一天接着就又来了，所以传达室对他特别注意。

星期天学生们上街，回来得迟早是没有准的。贾鸿年喝了两杯水不见周天霞回来，看了两本画报还不见她回来，又看了一本小人书还不见她回来，看了看墙上的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这时候，离学校开饭只剩下半个钟头（星期天是两餐），上街的学生断断续续往回走，他再也坐不住了，便走出会客室到校门外来等，每碰上个熟人就打听是否看见周天霞，但结果都说是没有看见——他们自然不会看到，周天霞根本就没有出去——等呀，等呀，一直等得人都快回完了也没有见周天霞回来。这时候的贾鸿年再也不能等了——因为他中午没有吃饭，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他离开学校，跑到街上一个小馆子里叫了一份饭。这种“份饭”是一饭、一菜、一汤。他没有等到菜来，就先把饭快吃完，等菜来了才吃了几口菜，就听街上闹闹嚷嚷走过一群人来。有人说是公安局捉了个人，引得一些吃饭的客人都挤到门边来看。贾鸿年也挤过来一看，见有一辆小平车推着三麻袋东西，几个警察把他舅舅石三友夹在中间正往前走。他见到这情况，便再也无心继续吃饭了。

石三友的事是怎么犯了的呢？下午三点，公社给公安局打电话，报告了村里报来的石三友倒贩烟叶的情况，公安局便

派人到市场上和各旅店稽查。查旅店的一组人查到了隆昌客栈，查过旅客登记簿，没有个“石三友”；问经理是否有人拿来两麻袋东西，经理问了服务员，服务员说二十三号房间的客人吴有铭，拿来两麻袋干白菜。负责那道街的派出所长说：“对！电话上也说他是冒充卖干白菜的！”“他们一同到二十三号房间，石三友还没有回去，服务员开了门让他们进去，指着地上的两麻袋东西说：“就是这个！”麻袋封着口，大家闻了闻（嗅了嗅的意思）都觉着有烟叶味，服务员拿了把剪子来拆开个口一看，正是烟叶。倒霉的石三友，又另外买了一条麻袋在市场上收购了一袋烟叶扛回客栈来。他走到二十三号门口，见门开着，还以为是服务员来送暖水瓶；及至走进去，看见有几个警察，才觉得不妙了。

石三友就是这样被捕了的。

贾鸿年见石三友出了事，连要来的菜和汤也吃不下去了。他勉强就着菜把剩不多的米饭吃完，又喝了一两口汤，推说太咸，便算了账匆匆离开饭店。他在未离饭店之前那一霎间，好像是急于要去挽回局面似的，及至走出饭店来之后，才想到自己不但无能为力，而且连个去处也没有了。他无目的地顺着街道走着想了一阵子主意，觉着只求能脱离干系就好。他以为要脱离干系，只有回家去假装不知，预料舅舅这个老江湖，会单独把罪名承担起来，不会把自己暴露在案里。这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钟，他来时候没有骑车子，预计摸黑路回到家，至少也得在十点以后，可是就那也得走，否则住到哪里也有受到盘查的风险。

他出得城来大约走了有五里路，忽然想起收购站找给队里的二百块钱已经给了舅舅，回去了无法交代——要说丢了，别

人不但不会相信，反而会很自然地 and 舅舅的事联系起来。他坐在路旁想了一阵，又想出一条找李老师骗钱之计。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觉着回城去下店怕受盘查，找附近村庄投宿也难免会有人问长问短；向周围一看，附近有个草棚，是种园地的生产队夏天卖西瓜时候搭的。“讲究不起，就住这瓜棚里吧！”他这样一盘算，便走进瓜棚里。这地方很清静，没有人盘查，要是夏天来住是十分凉爽的，可惜他来得晚了一点，又没有带行李，一夜冻醒了五六次，快到天明，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将就睡着。他正睡得香甜，被一个赶大车的甩了两声响鞭把他惊醒。他醒来看了看太阳，大约已经是早晨八点左右的时候。

他清醒了一下，把这一次不太顺利的出行回想了一遍，觉着还只能按着到瓜棚来投宿那阵子的计划进行，于是便拂打了一下身上的尘土，掏出手绢来干擦了一下脸，走出这座新式旅馆，顺大路返回城里去，溜着背巷去找李老师。要是不经说破，谁也不会想到坐在李老师和王兰面前这位恭而有礼的“优秀生”，正是头天晚上在瓜棚里投宿的那个倒霉的旅客。

贾鸿年可也真有点无耻之“勇”，就在那种遭遇下，一来还把戏文作得那么足，二来仍不放弃追求王兰。他本想先把王兰哄骗回店里去，然后向李老师骗到钱，再到店里去找王兰，做到个两全其美，及至听到李老师有资助王兰复学的意思，他便着了急。他着急的是怕李老师先答应了资助王兰，再没有钱借给他，所以没有等王兰回答李老师的问话便抢着提出借二百块钱的事来——要不是电话来得早，王兰固然不会再听他的话，说不定李老师还会上他一次当哩！

李老师之悟

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就剩下一个情节没有交代，那就是李老师接到的电话是谁打来的和为什么把这事告给李老师。这个根由还得回头来说：

前边不是提过在头天夜里县公安局住在公社里的一位干事到贾鸿年他们村子里去了吗？这个人是石三友被捕之后，县公安局打电话命他到村子里调查详细情况的。队里的群众大会散了之后，党、队、群众团体各系统的领导干部又留下来碰了碰头，布置了一下如何调查，就各按系统进行工作。一会，各系统把调查结果报告上来。这些报告中，除了前边提到的石三友装病、贾连升夫妇收买、贾鸿年装运等情况之外，还怀疑到城里有人入股。具体的反映是这样：有人说前天大队里卖积存东西的时候，贾石两家把所有的钱都买了便宜货，后来因为钱不够了，又都恋恋不舍地把挑选的一部分东西放弃了，可是第二天怎么就会有钱买烟叶？又有人说贾鸿年在公社供销社买麻袋时候，掏出一叠票子来，大约有一百来块。又有人听说他能在城里一位李老师那里借钱，说他到公社请大夫就走了一整天，可能是到城里向那位老师借钱去来。又有人因此怀疑到这位老师既然能借钱给他让他倒买卖，说不定是人着股和他们合伙干的。

这天早晨八点钟，这位公安干事骑着车子赶到县里来向局长汇报。局长听完了全部情况之后说：“一切情况大体上都和这里已经有的材料符合，就是怀疑这里的李老师入股的事没有可能性，还需要你将来那里向群众作个解释。”

他先向这位干事解释说：“第一中学的老师们只有一位姓李的，名字叫李光华。这是一位老革命同志，在旧社会里因为发表革命的文章坐过牢。抗日战争开始，他在省里一个中学里教书，带着一批进步学生参加了八路军。我就是在那时候认识他的，和他带来的一个学生编在一个班里。那时候部队分配他做宣传工作，老根据地成立中学的时候又调他出来教书，直到省城解放了，他才随着学校搬回到省城里去。

“他是个业余作家，常爱写文章。省文联想请他去编刊物他没有答应。他说他教惯了学生，最好还是专于教学这一种熟悉的业务。

“他的生活永远是那样简朴，仿佛一辈子永远穿的是那一套衣服。他经常有些稿费收入，不过什么时候也不见他有多余的存款，常常资助一些社会事业和穷苦的学生，不过他有点轻于相信人们说进步话，往往也有被人骗了的时候。

“一九五八年各地方的高中班次增多了，要从省里往下调老师，有些老师对省城的生活有些留恋，将近六十岁的李老师便首先要求下放，这才被调到咱们县里来。被调来的其他老师，往往还有点从大地方来的架子，李老师仍然和他从前参军时候的习惯一样，不论学习、不论劳动，事事都走在他们前边，后来被选为党代表出席县里的党代大会，在会上又当选为县委的委员。”

局长把李老师的为人，行事介绍到这里，就提出他自己的见解说：“像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和别人合伙去投机倒把弄钱去呢？”

那位干事听了，也觉着不应该让群众怀疑这样一位老同志，不过他觉得还有个问题须得弄清楚了才好向群众解释。他

问局长说：“群众要问起李老师是不是借钱给贾鸿年，要借过的话又借给他做什么用，该怎么回答呢？”局长说：“这个自然要弄清楚！我可以打电话问问李老师，你待一会再来一下！”

李老师接到的电话，就是这位公安局长给打来的。局长除了把贾鸿年和他舅舅倒卖烟叶的事告诉了李老师外，又问明了：贾鸿年假托给队里买骡子借过李老师一百块钱。李老师没有要他买过什么干白菜。

李老师以为是公安局要捉贾鸿年，所以最后在电话中说：“他还在我这里，你派个人来吧！”公安局长回他说：“你且让他回村去检讨吧，法院没有决定捕他！”

李老师接罢了电话回来，贾鸿年一见，不是就放声大哭起来了么？这时候，李老师没有说话；王兰不摸详情，想劝李老师消气也无从劝起；李老太太听到了哭声，急急忙忙从套间里走出来问长问短，也问不出个所以；只有走投无路的贾鸿年还苦苦哀求李老师救他。

这样的局面持续了好大一阵子，后来还是李老师先说了话。李老师向贾鸿年说：“我怎么救你呀？我主观上一向以为你在我这里接受的是无产阶级教育，可是实际上你成了个烟叶贩子。作为你个老师，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没有把你的真实思想研究清楚来作针对性的教育，而却长期被你的假进步、假积极所蒙蔽，结果害了你！”王兰插话说：“李老师！我真对不起你！我本来早就发现他那一套假正经是表演给你看的，只是我当时掩护着他，没有向你报告；最近我决心和他断绝关系的时候……”贾鸿年听到这里，吃惊地看了王兰一眼，接着想到即使她以前无此决心，眼前也会临时产生，于是无可奈何

地又把头低下去。王兰没有理睬他，接着说：“……又想把这历史情况报告你，后来想到他既然已经离开学校，也不必惹你再生气，所以没有那样做。现在看来，假如我在一个月之前把这情况报告给你，你还许能少上一次当哩！”“好孩子！你从前对他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是不对的，以后又能警惕起来证明你还是懂得站稳阶级立场；至于没有向我报告我不能怪你！我对他的行为也不是一无所知：他临毕业的时候，我还建议团组织对他这个‘优秀’生作一番突击性的教育，争取能在毕业之前吸收为团员，后来团支部和我谈了一次他的情况，我也觉得不行。从那时候起，我大体上对他有个了解，不过总觉得一个聪明的小伙子，经一经劳动锻炼是可以改造好的，没有想到他很快就发展到投机倒把这条路上来！”

贾鸿年听到这里，又抽抽噎噎地哭了。李老师对他说：“哭有什么用？早早地摔一跤对你有好处！你要想重新做人，就得先在群众面前把你自己的底子交代透！千万不要以为在群众中只有你自己聪明！做一件事有一件事的结果。群众是要把你所作的事的一切结果综合到一处来给你作评价的！你哄得了谁？回去向群众交底去！你才二十来岁，跌倒了爬起来重新做人有的是前途；不过要继续做‘鬼’的话，那就没有人再挽救得了你了！”

（一九六四年发表于《人民文学》）

打倒汉奸

(有韵小剧)

这种文体不是我的创造，而是山西东南部说鼓词的艺人们放在正书之前的开场闲话之一种，也叫“书冒”，因此我也可以把它叫作“书冒体”。

这篇小东西是一九三六年在山西写成的，当时曾在×××同志办的小报上印过一次，也在农村演过一个时期，后来抗战开始，那地方成了抗日根据地，除奸成了合法的了，这戏就失去现实意义，我连稿也没有存。不过因为写的时候磨过一点洋工，自己还能背诵；又因为自己涵养不足，青年盛气一发作，就好在人前卖弄一番，去年有一次和同志们卖弄起来又背诵了一通，同志们一定要我把它抄出来作为一种“文体”来参考，当时就把它抄出来，并且在《大众文艺通讯》第二期印过一次。为了避免抄卖旧货之嫌，特作出这点小声明。

作者

人物

黑 蛋——大学毕业生，三十余岁

黑蛋父

黑蛋母

黑蛋妻

来 拴

保 官——大学毕业生，另名良鉴

群众四五人

小孩小乱

二嫂——四十余岁

布景

一个农民的家庭，左后有门，傍门侧有床，正中摆两椅一桌，右方有一长凳。

时间

一九三五年冬天。

幕启：黑蛋母与二嫂坐床上，手内均拿着消闲活（非正经活），黑蛋妻坐右侧椅上。

二嫂 黑蛋娘，你为啥不去看看人家保官？

黑蛋母 他二嫂，咱哪里有脸去看！你不看咱的黑蛋。

二嫂 那不能光看眼前，各人的命运都有个早晚，要说咱黑蛋的聪明能干，十个保官咱也不跟他换。

黑蛋母 什么聪明能干，哪如人家保官，听说人家在天津当什么委员，一年就能挣几万。

二嫂 不是咱黑蛋今年在大学也已经住满？

黑蛋母 满不满什么也不算，人家见缝就钻，他不会看风驶船，他爹把我的地也快卖完，供得他念书，念了十年，如今毕了业，家也不回，事也不干，闲闲的住在省城会馆。

〔黑蛋妻听见婆婆说黑蛋的短处，把手中缝的衣服一团，站起就走。〕

黑蛋母 黑蛋媳妇！谁要你这样摔摔板板。

二嫂 你倒管她扯蛋，如今的年轻人，哪个不是这样大胆？

黑蛋母 唉！你还不知我那糊涂老汉，他听见人家保官在外面做官，常常骂我们那没出息的黑蛋，黑蛋媳妇一听见就要

变脸。如今的年轻人，谁还敢管？咱们从前对着公婆谁敢？那么大个老汉，见着儿媳妇还得把性子改变改变？

二 嫂 不过黑蛋他爹，说起话来也太麻烦。

黑蛋母 凭良心说也不能尽怨老汉，上了那么大年纪，老胳膊老腿不想动弹，什么事也得他管。幸亏我还有个白蛋，地里的粗活都还会干，要不一家人早就没处吃饭！

二 嫂 你不能让你白蛋跟上人家保官到天津纱厂去纺线？

黑蛋母 咱白蛋那痴眉瞪眼，哪里会给人家纺线。

二 嫂 好干！好干！你不看东院里的王官，南院里的小软，前庄的小二、小三、疙瘩、小板、兴旺、来拴，哪个不是痴眉瞪眼，都不是今年夏天跟着保官到天津纱厂去纺线。

黑蛋母 不过听说那里的活儿又很难干，一伙子走了半年，到如今书也不见，信也不见，吓得老人们心惊胆战，前天来拴他娘不是在庙里烧香许愿？！

〔黑蛋父上与保官打帘，保官也上。〕

保 官 烧什么香，许什么愿，他们都很平安，我给他们家家带着信件。

黑蛋母 回来了！保官。

二 嫂

黑蛋父 （向保）坐下，良鉴！（回头向二嫂及黑蛋母）女人们只知道乱喊，你不知道李家少爷大号良鉴！（取茶壶。）

二 嫂 呀！呀！谁有你老汉见过世面。

〔黑蛋父出外取水。〕

二 嫂 （低声与黑蛋母）看！看！看人家保官！这大冷的冬天，人家的领口还往外卷！看人家的口袋里的黑漆烟管，看！看！看人家的胸前的金绳绳一晃一晃的打闪，

（转向保官）良鉴！听说你回来带了几万。

保 官 没有什么，不过随便回来看看。

〔黑蛋父提水上与保官倒茶，群众四五人跟黑蛋父上。〕

群众甲 好冷的天。

群众乙 老汉你这里可有笔砚？

黑蛋母 干什么用笔砚？

黑蛋父 报名，开单，他们都要去天津纱厂纺线。

保 官 用不着笔砚。（拿出钢笔和笔记簿准备开单）

二 嫂 良鉴！你怎么能给这样多人找下事干？

黑蛋父 你们女人家见识太浅，人家是委员，又认识天津纱厂老板。

保 官 这不算什么稀罕，我既然能在外边吃碗饭，对乡亲们都要顾盼顾盼。

黑蛋母 你就不能顾盼一下我那黑蛋？

保 官 我这次在省城还跟他见了面，不过他老兄有点偏见，纵然给他找下事，他也不干。

黑蛋父 不干！不干！他只能讨饭，我前辈子不知和他结下什么仇冤，早知道他是那么下贱，我连一天书也不给他念。

黑蛋母 你这穷老汉，动不动就说他下贱，说他讨饭。都是你那张穷嘴，封得他没有事干。

黑蛋父 好！我说他要作官！

群众乙 算！算！老两口不要争辩。开单，开单！

黑蛋父 先写我的白蛋。

黑蛋母 就剩下个白蛋，再不能让他跑那么远。

黑蛋父 难道说我情愿？还不是为了挣几个钱？

黑蛋母 挣钱？王官、小软、来拴他们不是走了半年，也没见

他们捎来个钱。

保 官 那不能看眼前，他们出去都是一条光杆，没有一点底垫，一天起来要吃要穿，小房子也得一间，就算有几个钱，还能不顾一下身面？今年捎不来钱，到明年你再看。

〔小乱上向母。〕

小 乱 大奶奶！大奶奶！你快去小屋子窗窟窿看看，黑蛋婶婶也不知道拿的是绳呀是线，尽管在她那脖子上乱缠！

黑蛋母 啊！说得她还要上天！（跳下跑出去。）

二 嫂 快点，黑蛋的媳妇寻了短见！（跳下跟母跳出。）

黑蛋父 讨厌！偏趁着人多，给我丢脸。（也跑下。）

群众丙 黑蛋媳妇寻了短见，咱们也去看看。

〔都跑下去，只留下保官。〕

保 官 讨厌，乡下的女人只知道死呀活呀，闹着玩。（向外）你们都不要散，等我吃了饭，来了再办。（套上笔也走了。）

〔台后人声杂乱：“白蛋！快些，先把绳子剪断！”
“不相干！不相干！你不看她嘴也动弹，眼也动弹，快弄些开水来灌灌。”〕

〔一阵哭叫。〕

二 嫂 （扶黑蛋媳妇上，坐床上，众人也跟上）傻孩子，婆婆说你该摔摔板板，你也不该去寻短见。

黑蛋母 （上）是我管教得太严，媳妇一点也不得方便！

黑蛋妻 与她老人家什么相干？是我自己觉得羞惭，没有嫁到个好汉！

二 嫂 你千万不该那样打算，只要蒙着头往好里盼，总有一天时来运转。

黑蛋妻 什么时来运转，苦命人一辈子也望不见天！
二 嫂 有什么闷气说说散散，不要往肚子里多糗，为人总得知道自解自劝！
〔内：“回来了？黑蛋！快回去吧！你媳妇寻了短见。”〕
群众甲 不要跟老汉闹着玩，（黑蛋上）呀！真是回来了个黑蛋！
群众丙 回来了黑蛋，黑蛋在路上走了几天？
群众甲 黑蛋！道上乱不乱？
群众丁 黑蛋！就没有人与你作伴？（高声。）
黑 蛋 （群众吵时，黑蛋一直应酬，答应）相跟了个来拴。
群众丁 在哪儿？
黑 蛋 还在后边。
二 嫂 来拴不是在天津纱厂纺线？
黑 蛋 纺线？他才是遭了一场大难。
黑蛋父 人家是遭了一场大难，你是作了大官？
黑 蛋 你就只认得作官！
黑蛋父 好！好！你去讨饭！
黑蛋母 你还说讨饭，不是因为说讨饭，逼得人家媳妇寻了短见！
黑 蛋 （向妻）寻什么短见？
黑蛋妻 亏你问得有脸？你在外面住得那么安然，别人的死活你哪里还管？
黑 蛋 人家谁就不上外边，难道叫我每天看你几眼？
黑蛋妻 谁要你看？人家的男人都会弄钱，偏偏你不给人争脸，叫人家一个下贱，一个讨饭，成天对着我揭短。
黑 蛋 那算什么短？真讨了饭那有什么下贱，我看日本鬼子

把咱这地方一占，大家谁不讨饭？

黑蛋父 自己不会挣钱偏要扯那么远！你看人家保官，一年能挣几万，常是穿绸穿缎，哪象你大冷的冬天，破袍烂衫，看看多么体面。

黑 蛋 哼！他那样的事，我死了也不干。

黑蛋父 我说你只能讨饭，你媳妇还说我是揭短，人家是天津的委员，你只能住在省城会馆。

黑 蛋 什么委员，不过是个汉奸，仗着鬼子的势力，招摇撞骗，我纵然忍着饥寒，哪能象他那样下贱。

黑蛋父 什么汉奸不汉奸，人家挣的是白花花的银元。

黑 蛋 我也不能卖着乡亲去干。

黑蛋父 我不跟你辩，人家对乡亲顾盼顾盼，你怎说人家卖着乡亲去干？

黑 蛋 待一会你问一回来拴！

黑蛋父 我倒问他扯蛋。

黑蛋母 你这糊涂老汉，孩子回来又没喝水又没吃饭，你象搬倒了尿罐，一开口就唧唧个不完，不能停一会再管！

黑蛋父 从小你就把你的小爹惯得上天，怨不得儿大不由爷管。
〔话至此，僵局。〕

群众丙 （即小乱之父）小乱，（小乱跑上）回去给我端饭。

小 乱 不！我还要看。

群众丙 小小孩子比我还懒，端来了不能再看。（作打耳光势）
长了十二三，还不如人家秃蛋。

〔小乱下。〕

〔内：回来了，来拴！〕

〔来拴上，群众七嘴八舌问。〕

群众丁 回来了来拴？

群众甲 走了几天？

群众丙 （较高音）听说那里活儿很难干？

来 拴 （一手分开众人）唉呀！危险！危险！咱们差一点不得见面，我操他保官的八代祖先！

二 嫂 纺线有什么危险？

来 拴 哪里是他妈的纺线，给日本那些忘八蛋修飞机场抬土抬砖。

群众丙 抬土抬砖也没有什么难干。

来 拴 你当是由着咱干，什么也得由人家鬼子指点，三百斤的土箩筐，看着叫你盛满，压得你浑身是汗，大张着嘴发喘，你敢立立，站站，后边就是皮鞭。

群众丁 不会不给他干？

来 拴 谁敢？人家有鬼子兵着管，你要一跑人家说杀就杀，说砍就砍，死了就把尸首扔在海河里边，叫你尸也不见，人也不见。

群众甲 那么你怎么能逃出这场大难？

来 拴 危险！危险！（稍停，想一想）还是今年秋天，有一天傍晚，该我们那班抬砖，我冒了个大胆，扔下抬杆，往那高粱地里一钻。

群众乙 人家没撵？

来 拴 怎么没撵，一直撵了里把远，还放了几粒子弹，后来我赶紧转弯，赶紧转弯，才算把他们背转，逃出来身上没有一个盘缠，讨了几个月饭，逃到省城，才算碰上黑蛋。

群众丁 （问哥叔弟等）那么我×？

来 拴 （一手分众）没有见，都没有见，一进去人家就把咱

们的人都编乱，是熟人都不得见面。

群众丙 我操他保官的祖先，咱和他保官无仇无冤，他为什么使黑心眼。

来 拴 他给人家拉一个人二十块钱，一手过人一手过钱，他哪还管别人的长短。

群众丁 好他妈的毒辣手段。

群众甲 他妈的话说的好甜，（学保官）什么“对乡亲顾盼顾盼”，差一点二十块钱都把咱们卖到阎王殿。

黑蛋父 天津不是咱们中国的地面？

来 拴 中国地面！人家鬼子有什么师团、旅团，人家凭的是枪杆，咱的地面，那里能由咱管？

黑蛋母 你这糊涂老汉，还要先开上白蛋，你看危险不危险，人家把你卖到饭馆，你还只说候你吃饭。

黑蛋父 我知道他是那么个坏蛋？

黑蛋妻 人家可不是坏蛋，人家是委员，一年能挣几万，人家谁象咱只能下贱，只配讨饭。

保 官 （上，面对黑蛋妻用手指着她）你就不嫌麻烦，什么下贱、讨饭，屁大的事也值得尽管争辩。

〔小乱端一碗上。〕

小 乱 闪一闪！烫你们一下我可不管。

保 官 （回头看小乱，先看见来拴）那不是来拴？（说着从口袋内取出手枪。）

来 拴 我操你祖先！（上去抵住保官的枪，群众也上去，在混乱中，保官开枪打来拴，打着小乱，来拴夺枪，大家将保官抱住，小乱爬地上。）

保 官 咱们走着看，说得你们还要造反。

群众甲 是谁造反？你为什么拿我们卖钱？

群众丙 你为什么打死我小乱？

黑 蛋 不要和他争辩，拉到外边给他一粒子弹。

〔从来拴手上抢过来手枪，众拉保官下。

黑蛋母 （夺住黑蛋手）黑蛋可不干，人命关天，谁不知他爹难缠。

黑蛋父 （夺开手，黑蛋下）什么人命关天，我不怕他爹难缠，他为什么要将咱白蛋卖钱，他为啥打死人家小乱，难道说王法只许他犯？

〔外枪响，幕下。

万 象 楼

时间 一九四一年

地点 太行山某县

人物

何有德 旧统税局长。晚年回到本县组织古佛道愚弄乡民。勾结汉奸吴二，鼓动教徒暴动。（德）

何有功 何有德的弟弟，地方流氓。（功）

吴 二 在日军占领的县城内为日军当特务，自称为特务队副队长，以抬高身价。（吴）

李积善 老农民。迷信观念很强，被封为“守坛护法”，好多教徒都是他发展的。（李）

李月桂 李积善之女。年轻漂亮，不太迷信，但拗不过她父，只得服从。（月）

道徒甲 中年男农民。

道徒乙 中年妇女。

道徒丙 老太婆。

道徒丁 青年，男，农民。

以上四人都是小头领，简称男、女、老、青，总称甲、乙、丙、丁。

满街香 淫荡妇女，吴二的旧相识。（满）

八路军便衣一人。（便）

八路军士兵二或四人。（甲、乙）其他道徒四、五人。

第一幕

布景 万象楼上，右后方有一小门，两旁两条条标语上写“老师禅堂，闲人免进”。中间摆旧式场桌和椅子。

何有德事先居中坐。打二板长皮开幕。

德 （唱）

想当年在税局瞒上欺下，都说我何有德会把钱抓。到老来回本县威名甚大，不论是什么钱我都敢花。共产党讲民主我心害怕，小百姓齐出头教我无法。从今后再不能凭空讹诈，气得我何有德咬碎钢牙。

功 （唱）

何有功只生来泼皮胆大，嘴又尖眼又快好象乌鸦。变产业卖老婆咱管搞价，吃二毛敲竹杠也是行家。不论在赌博场大烟灯下，都认得咱老二这颗脑瓜。今日里有贵客来到家下，上楼去见大哥传达传达。（落，上楼）

（白）大哥，吴二来找你，见他不见？

德 吴二！哪个吴二？

功 你当统税局局长的时候，他给你当过听差。

德 他呀！不是找个钱花，就是要口烟吸，见他有什么好处？就说我不在！

功 大哥，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我看他身上穿得光溜溜的，好象干了什么大事。

德 （思量）也许，日军住在城里，他家就在城关，也许和日军勾搭上了？

功 那吗，见他不见？

德 （思量）你教他上来吧！

功 （向外）吴二哥，请上来吧！

吴 （上，见何有德，鞠躬）局长你好？

德 （不离座，不还礼）唉！再不要叫什么局长了。

吴 对！对！那是多年前的老官衔，如今不时兴了，那就称呼你老人家“先生”吧！何先生你好？

德 唉！有什么好？世界变了，哪里还是咱的世界？

吴 何先生不用发愁，我给你老人家带来好运气！

德 这从哪里说起？这种年头，好运气怎么会轮到咱的头上？

吴 何先生，你可知道咱吴二现在干什么？

德 你他妈的那么透脱，住在城关，还怕跟日军勾结不上吗？

吴 何先生，你猜对了！（唱）咱吴二这几年吃了洋饭，在皇军特务队做了洋官。每日里吃的是洋米洋面，吸了它洋料子又拿洋钱。（过）

德 这是你的好运，可惜轮不到我们乡下人的头上。

吴 何先生，这种好运气飞到你的头上来了！（唱）何先生有大名皇军听见，派吴二到这里与你勾连。只要你给皇军做个内线，皇军到管封你做个县官！（过）

功 （背向德）大哥，一个县长也不算小，答应了吧？

德 做个县长倒也使得，可不知道吴二这家伙在那边地位如何？说话有没有准？等我问他一下。（向吴）我说吴二，你在那边有个什么官衔，说出来以后也好称呼。

吴 （点头）噢！（唱）
这一个老家伙把我小看，
少不得用大话唬他一番。（夹白）何先生！（唱）
大皇军他把我吴二上看，
当了个副队长公事很繁。大小事

都是我吴二经管，大队长他不过挂个头衔。

德 （白）唔呀！（离座唱）

那吴二他混得果然体面，当了个副队长有职有权。

（向吴）

吴大人请上坐恕我怠慢，（过，夹白）吴大人，吴队长！

吴、吴……

吴 （向德）何先生你是叫我？

德 正是叫大人你！

吴 （背笑）我也成他妈的大人了！（向德）请坐！（坐）

德 吴大人！（唱）

见皇军还要你好话多添。（落）

吴 何先生，怎么称起我大人来了？

德 官大不敢提名！

吴 说什么官大不敢提名，你是我的老上司，如不嫌弃，你就叫我老吴，我就叫你老何吧！

德 吴大人！

吴 何先生！

吴 老何！（同笑）哈哈……

功 （背）这家伙说话还许顶事，得先撒伙撒伙（向德）大哥，吴二哥这么远来到咱家，咱们得先招待招待！

德 哈哈，只顾说话，我就忘了，快去备饭！

吴 住！咱老吴这会不饥不渴，不要先忙吃喝。你们既然有这番好意，就请你们叫个娘们来，咱们大家玩上一玩。

功 吴二哥的兴头倒还不小，可惜咱们乡下没有那样女人。

吴 怎么没有？满街香不是个老伴当吗？

功 哈哈哈哈哈！亏你还想得起她来！我马上给你去叫！

吴 慢点！千万不要告她是我，免得倡扬出去麻烦！
功 知道！（下）
德 老吴，刚才你说教我给皇军做个内线，这内线是怎样做法？
吴 自然我要告诉你！你不是古佛道的掌教吗？
德 是呀！
吴 可有多少道徒？
德 有两千来人。这有什么用处？
吴 大大有用！每年中秋节不是你们拜佛的节日吗？
德 是呀！
吴 要你在今年八月中秋，鼓动你的两千弟子去打抗日县政府，把他弄个乱七八糟。我们那里派人来组织起维持会来，由你当个县里的总会长，不就和当了县长一样了吗？
德 可是……离这地方不远就有八路军呀！
吴 什么八路军？不过是些游击队，能有几条破枪？只要把地方搅乱，教他们收不起粮来，不几天就饿散了！
德 可是……现在离中秋节只有个把月工夫，准备不及。
吴 有什么准备的？只要弄些长枪短棒，一轰而上，就把他们打散了。
德 可是……也没有个帮手，皇军是不是能来配合？
吴 这么大点小事，值不得请皇军来一趟。到那时候，咱老吴倒可以来帮忙。
德 可是……
吴 看你三心二意，成不了大事，咱老吴另找旁人去吧！（要走）
德 慢慢慢！咱们商量商量再说！
吴 再没有什么商量的！你是做不做吧？

德 我我我，唉！做就做了吧！（唱）

何有德放开了杀人斗胆，从今后做一个地道汉奸。只等到中秋节八月过半，打倒了县政府就能做官。

满 （上唱）

满街香在家里梳妆打扮，何老二他叫我去赚大钱。只要他有票子人人是汉，陪伴他一小会与我无干。一溜烟到何府去把客见，（上楼，唱）

原来是吴二哥离别多年。（落。白）我当是谁，原来是二哥你呀！二哥，这几年到哪里去了？我想你呀，把肠都快想断了！

吴 嘻嘻嘻嘻，真他妈的两片哄孤老嘴！

功 吴二哥可不是从前的吴二哥了！如今做了官了！

满 吴二哥做了官了？给吴大老爷贺喜！（跪）

吴 起来！起来！起来！

满 （起）吴大老爷做了个什么官？

功 可不是个平常官，是个日本洋官！

满 那不成了汉奸？

吴 不会发财的东西！（转椅背坐）

满 好我的吴大老爷！我不过说了句耍话，就把你气成那样？

快消消气！（揉吴背，吴不理）吴大老爷，你当真恼了吗？

大人不记小人仇啦！（仍揉，吴仍不理）你是理呀不理？

不理我就走了！（扭头要走）

吴 （起身，一把拉住满）回来！回来！这回算你胜了！咱们打牌吧？（德亦离座，同站齐）

德 万象楼安然自在，

四个同 耍你我玩个痛快！

（幕下）

第二幕

第一场

布景 李积善家门外，可不用布景以幕布代之。也可在二道幕前作戏。

开幕后，八路军便衣和兵甲上。

便 众人纷纷乱，

甲 不知为哪般。

便 老王！

甲 老李！

便 你看这大路上这么多的人，拥拥挤挤都往北走，是不是那个村里有庙会？

甲 没有听说今天有什么庙会呀！

便 今天是八月十五，也说不定那里会有庙会。

甲 没有！我家离这里不远！就没有听说过。

（内人声嘈杂，甲和便向左看）

便 你看！远远地又过来了一坨都人，咱们躲到这茅厕里听听他们说什么。（二人同下，阴阳板，李积善从右上。）

李 （唱）

六十年花甲子眼看一转，身旁边并无有后辈儿男。因此我每日里修身行善，修一个来世报胜似眼前。今日是中秋节八月过半，按规矩又该是佛祖临坛。叫女儿快回来将衣更换，随老父何家岭去把佛参。（落，白）月桂！月桂！

月 （内应）来了！来了！（上）

李 月桂，你又到哪里去了？不是教你早点换换衣服，跟我到

何家岭拜佛吗？

月 爹，你自己去吧，我不去了！

李 为什么不去？

月 人家都说十七八大姑娘胡烧香乱磕头，象个什么样子！

李 再不要听那些道外人的话。你小的时候，七病八痛，要不是佛祖保佑，早就没有命了呀！（唱）

莫听那道外人胡言乱道，行善人哪一个不把香烧？你长到七八岁险乎死了，若不是佛祖保佑哪有今朝？（过）

月 我听人家妇救会说，何有德那老东西尽骗人！

李 不许你胡说！什么妇救会！一伙疯婆子！也不烧香，也不敬神，没大没小，胡言乱语，再不许你听她们的鬼话了！

（唱）

那一伙疯婆子少调失教，一个个都不晓地厚天高。跟她们只有坏不会有好，再不要到她们那里胡跑！

月 （摇头）唉！（唱）

老爹爹主意定说他不倒，少不得再跟他去走一遭。到那里我只当看看热闹，免得他老人家尽管唠叨。（落。白）爹，不要说了，去就去吧！

李 对！这才是好女儿！要你回去换换衣服！（月下。李正欲下，四小头领和众道徒各提献供，从左上。）

众 李师兄，准备现成了吧？

李 现成！到家坐！

众 我们人多，就在这里等等吧！

李 大家既然不到我家，也就没有什么等的了。

我们一同走吧！（向内）月桂，把献供捎出来！

（月已换了新衣，提篮上。）

李 咱们就走吧！（同下）

（便衣和兵甲上）

便 你听见了没有？他们要到何家岭何有德家拜佛。何有德那老家伙有通敌嫌疑，咱们掌握了他一些材料。他们恐怕会闹什么事！你回去报告一下营长，我混在人群里去探听探听。

甲 可以！不过人家都拿着礼物，你手里空空地，混到里边不象。

便 （想）我也有礼物。（取出小手枪来用手绢包了提着。）这不象个礼物吗？还数我这礼物重呢！

（二人同笑。分头下。）

第二场

布景 万象楼

开幕时，何有德仍居中坐定。

德 （唱）

今日是中秋节八月过半，到夜晚闹他个地复天翻。在楼上把二弟一声呼唤，叫二弟上楼来有事商谈。

功 来了！（内唱）

在楼下听大哥一声呼唤，（上唱）

耽擱我何有功半口大烟。迈开了报丧腿上楼去见，

（上楼，唱）

问大哥有甚事与我商谈？

德 老二！（唱）

今日里中秋节八月过半，大事情成不成就在今天。我教你准备下戈矛刀剑，到如今你可曾准备齐全？

功 大哥！（唱）

大小事有为弟说了就办，打仗的好家伙弄了两千，长的是矛子枪短的是剑，还有那铁火柱枣木圪栏。

德 二弟！（唱）

我二弟办事情果然能干，只等着吴二到商量一番。

（落。吴二上。上楼）

德 （离坐）老吴来了？

吴 来了！

功 （学旧戏的口气）吴二哥到来未去远接，多有得罪！

吴 得了罪你受！不要扯淡了，现在天气还早，快去叫满街香来，咱们赶趁四圈再说！

功 好！我就去叫！（下楼，下）

吴 （向下看）老何，你看这下边多么热闹，跟起庙会一样！

德 （亦向下看）有点意思！咱们把椅子搬到窗口，看他一会。

（二人把椅子同向前移，并坐，向下看。）

同 有趣！有趣！（唱）

咱二人坐窗口只往下看，大路上有许多善女信男。

德 （唱）你看那老太婆走得多慢，

吴 （唱）还有那青年人跳跳玩玩。

德 （唱）远远地又来了白发老汉，

吴 呀！（唱）

随后边跟着个美貌天仙。天生来好人材不在打扮，引得我心痒痒神魂不安。何师父还要你救苦救难，成全了这件事保你升官。（落，白）老何，你要能把这小姑娘给老吴勾引到手，咱老吴保你官往上升。

德 要是别人倒还可说，这个姑娘是我的守坛护法李积善的女

儿。李积善这个老头在道徒中地位最高，要是得罪了他，今夜的大事就办不成了！

吴 这有什么难处？今天夜里，你就命这姑娘替他父亲守坛，先把他父支使出去。咱老吴藏在你的禅堂里边，等大家走后，跟她来个生米做成熟饭，不就成了吗？

德 妙妙妙！亏你想得出来！果算贪花能手！（何有功领满街香上，上楼）

满 吴老大爷来了？我昨天夜里梦见你来！

吴 梦见我怎样来？

满 我梦见豆地里蹦出个小兔子来，今天你就来了。

吴 去你妈的！（笑）

功 不要扯淡了，抬桌子。

（二人把一张桌子抬到中间，四面摆上椅子。把一副麻将牌“哗啦”往桌上一倒。）

满 桌子摆好了，咱们打吧！

吴 且慢着，今晚的大事布置得怎么样？我还不摸底，咱们还得先商量商量。我在城里带来一点头等料面，咱们一边过着瘾，一边商量，等把瘾过足了，事情商量好了，再打不迟。

德 好好好，还是老吴想得周全。老二，点起灯来！

（功点了一支神前蜡烛）

吴 （唱）在腰中取出来头等料面，（过，白）桌上坐，桌上坐。

（德居中坐定，吴坐左，满坐右，功站在满的背后，一只脚蹬着椅，前面的椅空着。）

德 （唱）桌面上有神灯正好抽烟。

吴 （唱）好料面再配上日本烟卷，（取出纸烟，分开，缠上纸条，用小指甲挑上料面，放在烟头上，用四根火柴一齐

点着；吸一口，吐烟。)

四人同 真美也！（唱）

好一似驾祥云飞上九天。

（便衣暗上，站左方听）

德 （唱）

那件事今夜马上就办，见众人该造些什么谣言？

（过。各想主意）

吴 老何（唱）

你就说到政府前去请愿。（过）

德 （想了想，微微摇头）不象！请愿怎么还要带刀枪呢？

满 何先生（唱）

不如说县政府有了汉奸！（过）

德 还不行！说县政府有汉奸他们不会相信。

功 我有个主意不知使得使不得？

德 你冒说说。

功 你就说县长是丧门神下界，公务人员是鬼怪妖魔，不把他们杀了，难逃刀兵水火大劫也！（唱）

你就说县长是丧门一转，公务员俱都是鬼怪临凡。不杀了定要遭刀兵水旱，管保他一个个信你的谣言。

德 （白）你想得真妙也。（唱）

我二弟你果算聪明能干，这件事多亏你想得周全。

吴 何先生（唱）

何老二有大材不敢小看，单等着皇军到保你作官！

（落。便衣暗下）

满 这会可该打牌了吧！

吴 （向外，向上看）计划完了！太阳也落了还打他妈的什么

牌？老何！你们弟兄赶快整理香案，升你们的坛。满街香，你且随我到何师父的禅堂里修炼修炼去！

（吴与满入禅堂。老鼓过场，功摆香案，德下换五佛冠道袍又上。望场，坐高台后。功在高台右角的一把椅上站着）

功 今夜西天古佛临坛，各路护法坛前朝佛，众弟子楼下随拜。

（老鼓过场，李积善领四小头领上楼，跪在案下。）

德 众弟子稳跪坛前听吾法语！（唱）

有吾神临坛来救苦救难，赛过了苦海里一只慈船。众弟子有甚事我都照看，要你们在坛前细对我言！（过）

功 佛祖说，你们有什么困难，提出来佛祖给你们想办法。

老 嗯！嗯！我这耳朵听不见。

德 听了！（唱）多烧香两耳就能听见。（过）

功 （低头向老）老太太，佛祖说，只要你多烧香，耳朵就听见了。

男 老佛祖，我妻病了半年了，吃什么药也吃不好，怎么就能好了呢？

德 听了！（唱）有吾神我赐她一颗金丹！（过）

功 （从手中作接药状，然后又作交给男状）佛祖赐你一颗仙丹，给你老婆吃了保好！

妇 老佛祖，我生了五次孩子，一个也长不大，该怎么办呢？

德 听了！（唱）

生下子还要你舍在寺院！（过）

功 佛祖说，你要再生了孩子，舍到寺院，教他当小和尚去！

青 老佛祖，我娶不上个好媳妇该怎么办呀！

德 不用愁！（唱）信吾神管保你娶个天仙！（过）

功 佛祖说，只要你信佛祖，管保娶个美女！
青 我不是信了好几年了？
德 李护法！（唱）李护法你可有什么心愿？（过）
李 弟子没有什么祈求，只想修一修来世。
德 也罢！（唱）到来世管保你成佛成仙！
 （落。白）一同平身？（众起）
德 李护法，你女李月桂现在何处？
李 在楼下朝佛。
德 宣上坛前，吾有吩咐！
李 是！（向外）李月桂坛前朝佛！
月 来了！（内唱）在楼下听爹爹一声呼唤，
 （上唱）他叫我李月桂亲到坛前。到楼上我去把佛祖朝见，
 （上楼）。（唱）跪在了佛祖前不敢多言。（落。跪）
德 下跪可是李月桂？
月 是弟子！
德 你父李积善另有任用，吾神命你今晚替父守坛。
月 是！（站起，从李积善手中接拂尘，站在一边。）
德 众弟子！
众 佛祖！
德 今晚命你们降妖伏怪，你们可都敢去？
李 有佛祖保佑自然敢去，可不知妖魔在哪里？道行怎样？
德 众弟子不知，听吾道来！（唱）
 今日里县政府妖精作乱，公务员俱都是鬼怪临凡。那县长
 他本是丧门一转，众妖魔只害得一方不安。不杀他定要遭
 刀兵水旱，命你们到那里平他一番！（落）
男 老佛祖，县政府公安局人人有枪，弟子们赤手空拳，哪里

是他们的对手？

德 不妨，吾已命何有功给你们准备下戈矛刀剑。

青 戈矛刀剑也挡不住人家的枪炮子弹呀！

德 不怕！你们一同跪了，吾有神咒（众跪）呀费！（扑灯蛾）

天上四金刚，地下五阎王，一齐来助战，枪炮不能伤！

（白）一同起去！（众起）何有功！

功 在！

德 要你到在楼下，说与众弟子各选武器！

功 遵法语！（下楼。下。）

德 李积善！

李 在！

德 吾神赐你杏黄旗、斩妖剑，你领了众弟子前去降妖！

李 遵法语！（接旗剑）（四头领与李转身向外站齐）

李 今晚动干戈，

四人同 要斩众妖魔！

（五人同下楼。下）

（月桂执拂尘转到石后方何有功所站过的椅旁，面向德站定）（吴二从月桂背后的禅堂门里开门窥伺。阴阳板）

吴 （唱）咱吴二在禅堂悄悄偷看。

（上）俏冤家果生得美貌不凡。尘世上好女子见过千万，抵不住这娃娃一个指尖。这一阵引得我心慌意乱，笑嘻嘻走上前跟她谈谈。（落）

吴 （突如其来）月桂小姐转来，咱老吴给你敬礼了！

月 （扭头一看，急忙从台前绕过，跑到台左后方）老佛祖！这是个什么人？

德 他是你的丈夫，快快上前认过！

月 （一怔）老佛祖，弟子认不得他！

德 认不得，马上就叫你认得了！

（唱）这本是前生里一宗公案，你二人原来是隔世姻缘。
今夜晚在坛前夫妻相见，月下老托吾神来把线牵。

月 唉！我好不该来也！（唱）

这一个贼东西贼眉贼眼，哪有这老佛祖来把线牵？看起来
这件事真假难辨，好不该到这里拜佛求仙。

吴 小姑娘！（唱）

今夜晚用生米要做熟饭，不论你从不从都不相干！我劝你
早早的情出自愿，要不然咱老吴就要强奸！

月 吓煞人也！（唱）

那贼子要动手来得不善，想必是他二人设就鬼圈。（过。
吴看何，何呶嘴示吴动手。被月看见。）

月 何有德，老贼呀！（以手中拂尘掷德。唱）只说你终年里
修身行善，谁知你长的是狗肺狼肝！

德 住口！（唱）

喝住了小月桂真正大胆，佛面前你竟敢口出恶言。

月 呸！（唱）

贼骨头贼眉眼贼心一片，昧良心骗幼女你装什么神仙！

（背唱）到如今我才知受了他骗，受了他骗，不如我下楼
走逃出难关！

吴 （跑过来堵住去路。唱）

拦住了俏冤家要你且慢，（关中幕，老鼓长皮，过，便衣
引四兵上）

一兵 老李，我们用这条机枪守住要路，请你到村里打探打
探！

便好，（分头下，长皮，开中幕）（吴接唱）

吴（唱）狸猫儿见老鼠哪能放还？笑嘻嘻我把你拖倒地面？
（过，吴拖住月，月反抗数次，最后被吴摔倒地上，吴挽袖子）（忽然机枪响，吴德同惊，德离座。）

吴呀！（接唱）猛听得村外边枪炮喧天。

德（唱）你听这机关枪来得不远，

吴（唱）想必是大事情泄露机关。

德（唱）依我看咱不如暂且逃难，（德同吴下楼）

德
吴大事情成不成先把命全。
（二人下，掩钹，月桂挣扎。）

月唉！（渐板，唱）
这一会只觉得天昏地暗，（月仍倒地，李上）

李（唱）村外边开来了人马万千！（落，白）且住！
是我领着大家才到村口，不知道哪里来的军队把村围了，
到楼上去见佛祖拿一主意。（唱）方才间领大家去得不
远，村外边围上了兵马万千。到楼上我去问佛祖高见，
（上楼，唱）
见我的小女儿倒在平川。（落，白）啊！这不是月桂？

月（抬头见李）爹！唉爹呀！（三抢，李扶月起）

李你怎么倒在地上？佛祖哪里去了？

月唉，爹呀！（唱）何有德老狂头借佛作乱（切）

李住口！你怎么骂起佛祖来了？

月唉，爹呀！（接唱官板）在楼上藏贼人……（拖噪）

李怎样？

月（接唱）猛听得枪声响将他不见，要不然孩儿我身体难全。

李 这不反了！（唱）听一言气破了我的肝胆！何有德狗狂徒欺我老年。（过。李以手捻胡，又从胡上把眼光转向月）儿呀！（唱）是老父不听儿好言相劝，一心要领我儿到此求仙。只害得我的儿遭此大难！待老父舍性命与儿报冤。执宝剑入禅堂搜他一遍，（老鼓长皮，李入禅堂赶出满街香，满绕场跑，被李扭住，以剑压脖。（接唱）你是个什么人躲在里边？我问你这里边哪来贼汉？若不说我定要把你心剜！

满 老老老大爷！（唱）

他的名叫吴二日本差遣，他与那何有德早有勾连。今夜晚哄众人前去作乱，还教我陪他们打牌抽烟。

李 我明白了！（唱）听这个狗贱人讲了一遍，这里边原来是一伙汉奸。狠一狠把贱人一刀两断！（过，李放手举剑，满趁空躲到月桂背后，扳住月桂膀尖。）

满 老老老大爷饶命！小小小姑娘给我讲个人情。

月 爹！她已经讲了实话，你就饶了她吧？

李 也罢！（唱）看我的女儿面把你容宽！留着你见众人作个证见，（向月白）女儿快走！（月在前，李又拉住满，一同下楼）

（关二道幕，内拆景）

李 （向满唱）还要你把此事当众细谈！李积善在大街高声呐喊！（月前行，李拉满相随，四头领、四道徒、便衣均应声随李等穿场。下。）

第三场

（二道幕开，中设一椅，代替街上高地。月、李等人仍按前场次序相继上。李站椅上，众在下。）

李 （唱垛板）站立大街高声喊，四方道友听我言。
何有德是个大坏蛋，结交吴二狗汉奸。（指满）这个女人多下贱，陪他们打牌抽大烟。鼓动咱们去作乱，叫给日本打江山。生巧计又把我女骗，骗到楼上敢胡缠。若不是枪声救了难，（转二板）我的女儿命难全。（指）这女人从头至尾亲眼见，要不信大家问一番！（落）（李下椅，众拥满至中心）

便 （指满）你是哪里人？叫什么？

满 我我我……

一道徒 她叫满街香，是何家岭有名的坏女人。

便 你和吴二几时认识？

满 前几年他给何有德当差时候就认识。

便 他跟何有德搞了些什么买卖？

满 他说，只要何有德能鼓动道徒打了抗日县政府，日军来了，就委他做个知县。

便 他们现在什么地方？

满 听见枪声响，他们都跑了。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说完就要溜走）

便 回来！

众 （拦满）不要走！

便 你已经当了汉奸，就不能放你！要你跟着我们把吴二捉住，可以减轻你的罪。

满 我的天老爷！吴二有枪，我可不敢跟你们去捉！（强挤着跑）

便 （把包手枪的手绢摸去，握住手枪对满）不要跑！你看这是什么？

满 (向外吐舌) 好厉害的一份献供呀!

便 (向众) 老乡们, 我是八路军! 队伍就在村外。我知道你们都是老好人, 今晚是上了汉奸的当。只要你们帮着我们捉住汉奸, 我保你们无事回家。

众 好! 我们大家受骗不轻, 非捉住他们不行! (下)

便 (指满) 你跟我去找吴二! 捉不住吴二枪毙你! 走! (下)

第四场

(德与功探头探脑上, 众追来, 急下, 众追下。)

第五场

(吴持枪蹑足蹑手上, 穿场下。满与便上)

满 (指前) 那就是吴二! (便持枪追下, 满回头就跑, 又被二众赶来扭住。下。)

第六场

(吴二持枪探索前进, 便悄悄赶来夺枪在手, 用二手枪逼住吴)

便 站住! (吴站住。众二人应声赶到扭住吴二。众扭德、功、满相继上。)

便 一同送到部队里去!

(尾声, 幕下, 全剧完)

两个世界

全剧人物

- 金 虎 三十多岁一个农民，还是个傻瓜。
- 银 虎 金虎的弟弟，二十四五岁，被顽军逼得离了家，在我根据地当区级干部。
- 其 父 将近六十岁的老贫农。
- 其 母 也近六十岁，勤苦耐劳，说话很爽快。
- 李铁拴 金虎的邻家，四十余岁，也是贫农，很愿意为着大众的事情出头。
- 村 长 三十余岁，高中毕业，受过顽固分子的训。
- 村 副 五十余岁，虽然也是个国民党员，却比较开明一点。
- 石 甫 国民党村书记，也三十余岁，初中毕业，最顽固。
- 接 旺 三青团村团长，农村知识分子，事事听石甫的话。
- 村警甲 流氓。
- 村警乙 农民。
- 伙夫一人。
- 村公所书记一人。
- （村公所人一律穿制服。）
- 顽军营长 三十余岁，官气十足。
- 马 弁 十七八岁小流氓。

其他小军官数人 不开口

赶驴兵二人。

散兵数人。

王干事 国民党县党部干事。

支差的 爱漂亮的农村青年。

群众十余人 露面不登场，最好是男女老少都有。

时间

第一幕 一九四三年春。

第二幕 夏。

第三幕 秋。

地点

陵川县某村。

第一幕

景 把舞台作为一个欢迎会的讲话台。舞台右方为讲话台的后面，上贴“欢迎王营长及全营官兵大会”几个大字。靠幕排两张空桌子；左方为讲话台的前面（用布野景方法挂幕条），从右往左，约占舞台三分之二那地方，横排四根柱子，顶上用柏树枝扎三个“半圆形”，下边绑一根横木杆作为栏杆（好象新搭起的台子），再往左就算讲话台下（布景时能分出上下来更好）。舞台后方为讲话台的左方，上贴“欢迎王营长及全营将士”“欢迎王营长指导本

村工作”“欢迎中央军保卫地方”等标语。

开幕时，远远听有老太婆的哭声，村警甲乙二人抬一口已经杀好的猪（或羊）走到舞台中心，幕开。

甲、乙（把猪放在靠后墙的桌子上，又从左方下。）（哭声仍继续着）

甲、乙（又取了些零星慰劳品——如手巾、胰子、鞋、袜之类——慢慢往桌上摆。）

乙（一边摆，一边歪着头听）这是谁哭？

甲 谁！还不是金虎娘？

乙 因为什么？

甲 摆你的吧！这还用问？还不是哭银虎？

乙 银虎走了二三年了，这时候不年不节哭什么？

甲（不耐烦了）你的心上就没窟窿？银虎不是叫中央军杀了吗？这两天中央军驻到村里来了，他自然就想起儿子来了吧！夜来就哭了一场了。

（哭声止）

乙（凑近甲一些，低声。）喂！有人说银虎还没有死！

甲 你听谁说？

乙 人家夺火村还有人在辽县碰见他一回。

甲（认真起来，指着乙）这你可要当证人吧？

乙（怕起来）不不！我不过跟你说句谈话！我又认不得人家是谁！

甲（挺起肚子大笑——肚子挺得很高，好像耍把戏的小孩练软腰的架式。）哈哈……！你真是个庄稼人！随便跟你开个玩笑，就把你吓成那样！胆子这样小怎么能当村警？老弟！以后要学得胆大一点！

乙 (放了心)老哥!你真吓了我一跳!我当又说出什么祸来了。

甲 这不过是你跟我说啦吧,要是对上头说,你看有祸没祸?银虎是跟八路军走的,你怎么知道他的消息?马上不把你当暗八路抓起来才算怪!(内——讲话台下——脚步声,他向远处一看,吐了吐舌)村副来了!(赶紧摆慰劳品。)

(村副从左方上——即上了讲话台——很笨的一步一步走着。)

村副 还没有人来?村长啦?

甲 给国民兵团讲话去了!

(石甫上)

村副 吃饭了石甫?

石 吃了!你吃了?

村副 吃了!

石 (向全台扫了一眼,然后向甲乙二人)叫你们早点动手,你们干什么去来?说是八点钟开会,这会已经七点半了,连桌凳都还没有搬上来!

甲 村长叫先摆这些啦!

石 那就该早点摆呀?

甲 (向乙)我摆这些,你先去搬桌子去!

(乙下。甲仍然摆着。)

(村副和石甫摇来走去。)

石 (走到左方,扬头看。)下不成了!

村副 下不成了,也就差不多下透了!这场好雨!正是犁种时候!

石 谷雨前后下雨,自然正是时候,不过在咱们这一带还早一点,咱们这一带立夏种谷正好!

村副 谷雨种也行,不过还不知道种得成种不成啦,听说敌人

在长治安阳都增了兵，恐怕要来扫荡！

石 军事上自有军队负责，咱们操心也不抵事。

（村警乙扛上一张桌子来，放在台正中）

石 （向乙）快点搬！马上就到时候了！（向甲）你还没有摆完？

甲 完了完了！（赶紧把余下的两件小东西——不论是手巾、胰子都行——摆齐，就走过来。）

石 再去打一圈锣，叫村里人吃了饭马上就来，谁不来罚他一斗小米！回来顺路问问营长的马弁，看人家便宜了没有。

（甲应声下）

（内锣声，并喊道：“一家出一个人，吃了饭马上到庙里开会！谁要不到，罚小米一斗！”连敲连喊，越走越远，慢慢听不见了。）

（乙又送上两把椅子来，他两人拉过来坐到桌边。）

（接旺上）

接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都早早来了？

村副 （用长辈对晚辈的架子，头虽然动了一动，可是身子躺在椅背上没有起来。）也才来！（向右）石甫！接旺也来了，咱们就趁这一会再谈谈派款派粮的事：我看那真收不起来！请免又请不准！

石 绑住吃得打！强要就能要起来！除了几家赤贫户，哪家能不存个一石两石粮食？

村副 我看也不见得，从去年收了秋到现在，光军粮要过五次了呀！况且村公款公粮每月要收，三十一个脱离生产的人，每月光说小米就是九石三斗，新发下来的制服费也没有缴……

接 三十个人吧，哪够三十一个？

（村警乙又扛上桌子来）

石 你这三青团长！（见乙走过去，吐了吐舌头，赶紧改口）
你你这指导员也太不负责任了！连村里脱离生产的人数也
记不得！

接 我记错了？我给你数：你一个、我一个、村长村副两个、
教官一个，共是五个。还有五个村警、二十个国民兵团团
员；这是二十五个。二十五个加五个是多少？

（乙下）

石 小学教员不吃东西？人家除三斗米外还有十斤面啦！

接 嗷！我把他忘了！

村副 咱还是谈正经的吧：这次的军粮，又是五千斤小米、两
千斤白面、两千斤小粉面、五百斤豆面、一百五十斤榆皮
面、两千五百斤马料。不足二百户人家一个小村，能有多
少粮食呀？

石 你的意见怎么办？

村副 我倒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昨天晚上，村里有些人见说这次
呈请减免没有请准，还要求村公所再递个呈文请一请！

石 还请啦！请了一次就把驻军请下来了，还要请啦！

村副 呈请是呈请，驻军是驻军，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

石 没有关系？你没有见指令吧？

（乙又扛两条板凳上）

村副 没有见！昨天晚上才听村警说没有请准！

石 （向乙）去把村公所桌上那宗县府指令卷取上来！

（乙下）（接旺拉过一条板凳来坐下）

石 没有关系，关系可大啦！老叔！你也有个年纪了，当个不

管事的现成村副不好吗？有人在你跟前哭穷，你最好是推你管不着！心一软听上那些人的话，弄出事来，他不替你负责呀！

（乙又捎了两条板凳取卷宗上，放下板凳将卷宗递给石，站一边。石递给村副，村副揭开取出指令来。）

村副 （念）呈悉。查该村情形，本府业已了然。当此抗战期间，极应免为其难。内称多数村民屡乞转请减免等情，恐系异党分子鼓动愚民，变相抗粮。兹除请本县驻军分兵驻地镇压外，仰该村长仍将前派军粮按期如数收齐，以便拨发。切勿延误。为要。此令。（读完放下）唉！这也太，也太不合事实了！要求请免的人，明明是真没有粮食，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就是咱们也出不起呀！

石 那你也太武断：共产党头上又没有字，你知道谁是谁不是？

村副 （略不高兴）那时候上呈文，虽然用的是村公所的名义，（向石）也是通过你国民党书记。（向接）通过你三青团团长才递的（石看了村警乙一眼）！要是共产党鼓动的，你们为什么不制止？

石 不要起脾气，我不过想提醒你一下，请你以后注意。（摸起袖子看表）八点多了。（向乙）你去打听一下营长吃过饭了没有。

（乙下）

石 （向村副）老叔！你怎么一发了脾气什么都不顾了？虽然没有外人，也不要乱喊什么党书记、什么三青团长！放着上级规定的公开名目，用起来还不方便吗？以后还叫我农会干事长，叫他（用嘴指接）指导员好了！（用上级的口气）这是纪律问题！

（村副无话。停了一会，接旺开了口。）

接 请也请不准，咱就谈谈怎样摊派吧！

石 就按粮银派吧！

接 去年腊月才按粮银派过了，我看这次不如按户口派。

石 你不要因为自己粮银重一点，就光给自己打算！按户派，收得起来吗？

接 你是老户主，种八十多亩地才有一两七钱粮银，你怕不敢叫按粮银派啦！要按粮银派，我先知道我就拿不出来！

石 我可不是给自己打算，我是怕有些真正没有粮食的家跟咱们死拖！你说我的粮银轻，咱就按地亩派！

村副 按户口就按户口吧，实在收不起来再说！按地亩也不一定能收起来！就说我吧：听起声名来，外边也租出去几个小山庄，可是说起地来都是在石头缝里找土！收不上几颗租，亩数可不少！一顷多！要是按地亩派，我自己就是连一颗也不留，也缴不够那么大的数目！

石、接 （同声）按户口就按户口！

（村警乙上）

乙 村长来了？村长才从营长那里出来！

（村长上。三人向他打过招呼，他就坐下）

石 他们队伍上便宜了没有？

村长 快了！各连都正集合啦！营长昨天晚上打了一会牌，起得晚了，这会洗脸啦！

石 呀！老百姓还没有来一个！（向乙）快再去催一下！

乙 也快了！他们在街上集合啦！

（远远听见喊“一二三四”）

石 （向接）你去吧！去教他们一些行礼规矩，等一会队伍来

了，领着他们喊喊口号！

接 可以！（下）

村长 战争恐怕快要来了！听营长说：安阳、长治、博爱的敌人，都增加够好几千，大批的要牲口、抓民快。看起来好象不几天就要出发！

村副 呀！这又是件愁人事！（泄了气，躺到椅背上。）

（三人都不说话，好像发了愁。）

（内集体的脚步声——虽然喊着“一二三四”，却仍然不能走得整齐一致。）

接 （在内喊）咱们到后边，把军队让到前边！

（喊“一二三四”的那个人，忽然喊道：“立正！稍息！”

接着另一部分人的脚步声也由远处走来了，声音比较齐一点。村长等三人向左方看。）

村长 国民兵团也来了！

内又喊“立正！稍息！”

（村警甲挟着个锣跑上来）

甲 （向乙）怎么还没有把桌凳摆好？队伍开上来了！

（村长等站起来走到舞台左方向远处看。好几部分集体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声音都很整齐、洪大。近处喊口号——接旺喊一声，大家喊一声。）

（同时，甲乙二人手忙脚乱摆桌椅板凳——靠讲话台栏杆摆一桌一椅，其余记录席和几条凳子。营长、马弁、还有五六个着武装带的人上，村长接着上让坐。营长暂坐记录席上，余人各找座位坐下。马弁站着。）

（甲乙二人正要下）

村长 叫书记拿上纸笔来记录！

(甲乙应声下。)

营长 (向村长) 请你介绍一下!

村长 (站起立正) 是! (向村副和石) 这位就是王营长! (指村副) 这是村副! (指石) 这是农会干事长!

(介绍毕仍各就座。村警甲用茶盘捧着十余个茶杯一个磁壶一盒纸烟上, 乙提了一把大铁茶壶上, 倒茶。)

(大家接茶后, 略喝了一两口抽起烟来。村书记取着纸笔上。)

营长 天气不早了, 就开会吧!

村长 (站起立正) 是! (向书记) 你赞礼吧!

书记 (虽不立正却也非常拘谨。)(走到讲话台前靠右第二根木柱旁。喊。) 第一、宣布开会! 现在就开会了! 第二、主席报告开会宗旨!

村长 (向营长及各军官敬过礼, 走到桌前。侧面向右。) 各位官长! (向左) 各位士兵同志! 各位同胞! 今天开的是欢迎王营长及全营官兵大会。因为我们村里的工作作得不好, 恐怕还有共党分子捣乱, 县政府才请军队到我们村子里来驻。这是来给我们维持秩序的, 我们应该欢迎。因为我们的工作不好, 更应该欢迎王营长和各位官长多多指导。各位官长和各位士兵同志到我们村里来还是第一次, 我们本来应该好好慰劳一下, 可惜我们这山野小村, 什么也准备不下, 凑了几件简单的东西, 实在表不出个敬意, 还希望各位官长和士兵同志们多多原谅! 我的话完了! (前后又敬了一番礼, 仍回原座。)

书记 第三、请王营长训话!

(村长等又站起来打招呼。营长走到讲话处。村警送一

杯茶，放在讲话处的桌上。书记回记录席上去记录。)

营长 (满面威风) 现在 (内多数的脚步齐响了一下) 稍息！本营奉上级的命令，应陵川县政府的邀请，来这里驻扎。今天受到村里的欢迎，是应该感谢的。我代表全营官兵向大家致谢！(敬礼) (内又作脚步声) 稍息！我今天要讲的话，分为两点：第一、上级的命令，说这村有共党分子暗中捣乱，鼓动抗粮，派本营来镇压。我们初到这里，人地生疏，还希望村公所和全体村民多多加以帮助——遇有鼓动大家不出粮的人，马上来报告。第二、是振刷国民精神：日本所以敢打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太不振作——脸也不洗，纽扣也不扣！家里、街上，都弄得乱七八糟，一点也不知道讲究整齐、清洁！我们以后要把这种精神彻底改过，大家都振作起来，都要改成整齐、清洁，精精干干的人！现在我提出几件事，限大家在五天以内作完，作为我们振刷国民精神的初步。第一件：村里的房子，有砖的、有土的；蓝一座，黄一座，看起来实在不整齐。要你们统统用黄土把外墙刷一下！第二件：满街都是茅厮，臭气熏天，要你们统统把他填了，另外全村再打上三个大的新茅厮——一个官长茅厮，一个士兵茅厮，一个老百姓茅厮。第三件：你们村里村外的路，宽一段，窄一段，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没有一点痛快劲。要你们把他修理一下——修八尺宽，要各处一样。要是占着哪家一点地，希望不要太小气——要知道这是为了全村人走路宽绰，牺牲一点也就算了。第四件：有些老百姓太不顾身面——衣服穿破了也不洗一次，上边的补钉，青一块，蓝一块，头不

剃，脸不洗！（用手向远处指）你看那个是谁？那个袖子上补着红补钉的！

石 他叫金虎。是个傻瓜！

营长 叫他上来！

石 （向远处招手）金虎！上来！上来！（金虎上）

营长 谁给你补这衣裳？

金虎 我娘！（说得很傻）

营长 为什么补红的？

金虎 没有黑布！

营长 （把金虎一推推得转过去）你叫人家大家看看这像个什么人！头不剃，脸不洗，纽扣不扣，衣服上红一块白一块！你觉着好看吗？

（金虎不答）

营长 我讲的话你都听懂了没有？

金虎 听懂了！（扭头就要走）

营长 （大声）哪里去？

（金虎又站住）

营长 你听懂了什么了？我问你：日本人为什么敢来打中国？听懂了你就说说！

金虎 （更觉傻气）因为村里的墙没有刷、茅厮没有填、路没有修；因为我的脸没有洗、头没有剃、还补了一块红补钉，日本就打进来了！

（内哄然大笑，营长觉着不好意思，半天也不再问，石看见不好解决，就替营长把事推开。）

石 （向金虎）傻鬼！还不滚下去？（金虎下）

营长 （继续讲）这几件事，一定要在五天内作完，不然的

话……（突然用手一指，大怒。）那几个人是谁？你们不听话，在一处商量什么？

内一人（远声远气）我们想跟营长请个示！

营长 这样无法无天！派一个代表上来！

（内嚷嚷起来，但声音太小太杂，听不清楚。）

石 派个代表上来！快！

（农民李铁拴上）

营长 你叫什么名字？

李 叫李铁拴！

营长 你们嚷嚷什么？

李 他们大家说，想请营长把刷墙、填茅厕、修路这几件事展一展期，让老百姓趁这场雨种一种地再做！

营长（狠狠的）你们倒是理由十足！种地要紧，这几件事不要紧！是不是？

李 营长吩咐的几件事自然也要紧，不过雨下得不多，过几天干了就不能种了，还是请营长恩典！

营长 我吩咐的事，“也”要紧，可见没有你们自己的事要紧！满街臭气，过几天熏得大家得了病，你们负责不负责？提这意见的都是谁？

李 都是村里人，人多了我也记不清。

营长 记不清你就能来当代表？可见就是你鼓动的！（向远处）上来两个人！把他捆起来！

（二兵上，用绳子捆李。内群声大哗。）

（幕落）

第二幕

景 全舞台作一石崖下的石坎，可以避雨，石坎后右方有一洞口，很暗，要不是有人出入，几乎看不见。石坎的左右两边，都通野外，所以不能避风。靠后墙中间，放着一担荆条筐，筐里有些破烂衣服，锅碗；还有个大盘子，里边放着树叶。紧靠着这几件家具，铺着两条破被。

（金虎父躺在铺上，金虎娘坐在旁边。远处尚有一两声炮声。幕开。）

（驴叫）

金虎母 这金虎真是个傻瓜！弄一点吃的，也不知道弄上了没有，晌午多了还不回来！驴在雨里淋了三四天了，也不给驴寻个避雨地方？

金虎父 （长声，但很没气力。）叫——他——淋——着——吧！人——还——没——处——去——啦！

母 要全是自己的倒不要紧！跟咱女婿伙个小驴，虽说是亲戚吧，坏了也不好交代呀！

父 唉！看这几天的来头呀，能顾住人就算不错！（突然大叫）啊呀啊呀！肚疼！

母 （赶紧招呼）怎么，怎么又疼起来了？

父 （挣扎）躺不住了！快！快扶起我我坐坐！

（金虎母扶他起来，他靠着两个荆筐中间坐好。）

母 怎么样？

父 坐起来好一点。

母 (小声) 给你口开水压一压吧？

父 (想了一想) 唉！算了吧！不论军队、不论村公所，都不是好惹的。他们不叫烧火咱不烧好了，忍一会就算了！

母 不怕！我去找一把干柴来！只要不起烟，外边看不见。

父 一连下了几天了，哪里有干柴。

母 真是！我有一会就糊涂了。(向墙后看) 要不就把这个破篮拆烧了吧！(把篮里的树叶倒在地上，还倒出一个糠圪塔来。她掰了一半给金虎父，把那一半放到筐里。) 你先吃一口压压，我给你烧开水！(坐下拆篮子。)

(金虎上——带了一顶破草帽，满身水淋淋的。背了一条口袋，里边约有一斗多东西。)

金虎 这会可碰上好东西了！(将口袋放下)

母 什么？

金虎 青核桃！

母 有仁了？

金虎 有点水仁。吃家可多啦！碰上一棵树大家就抢了。(看见父拿着糠圪塔) 娘！也给我一块糠圪塔吃！

母 就剩那一个了，哪里还有？你爹病了，教他吃吧！

金虎 我不信那么一大篮，就都吃完了！

母 跑出来四五十天了，那一篮圪塔能有多少？

(母擦了根洋火点着火，用小砂锅放在两颗石头上烧水。金虎取了一张镰，把口袋里的核桃取出几个来，放在地上，只拿了一个，一切两半个，剝出半个仁来。)

金虎 (向父) 爹爹你尝尝！(父接住。他又把那半个也剝出

来。向母。) 娘! 你也尝尝! 好吃了!

(李铁拴从右方上)

李 (小声) 大娘! 快去把你的驴藏起! 军队又来赶驴来了!

母 真的? 金虎! 快去把咱的驴赶到沟里!

(金虎把他从口袋里取出来的核桃赶紧又装回口袋里。他还没有装完, 村警甲从洞中出。)

甲 你们怎么还没有搬走? 昨天就叫你们马上搬, 你们为什么不服从命令? (突然发现有火, 更大发威风) 你们的胆子真不小! (一脚把小砂锅踢翻) 你们就不要命? 军队驻在东山上, 下的命令是四十里以内不准举火, 村公所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说过没有?

母 说过说过! 四五十天了, 谁烧过火? 今天是金虎他爹肚疼起来……

甲 不管肚疼不肚疼, 火是不能烧的! 况且村公所住在洞里, 你们在这洞口边烧火, 引得日军来算是谁的事?

母 不敢烧咱不烧好了!

甲 不烧火你们也得马上搬走! 村公所住在洞里, 你们常在这洞口边鬼混也不合适!

金虎 我们原来住在洞里, 你们来了把我们撵出来, 如今就连洞外也不叫我们住了! 满地都是湿的, 你叫我们搬到哪里去?

甲 (一瞪眼) 照这么说你们是不搬吧? 好! 我看你们究竟搬不搬! (扭头就要走)

母 (拦住甲) 你不用理他! 他是个傻瓜, 说话不知道个颠三倒四。我们不是不搬, 是因为地方还没有找好。一会我

叫他找一个避雨地方，找好了马上就搬走！

（右方有喊牲口的声音——“达达！吁！”两个兵上）

兵甲 这不是村警！我们还到那边去了，有人说公所搬过这边来了。

甲 我们搬过来两三天了。有什么事？

兵甲 每村要十个驴，五十只羊。村长在吗？

甲 村长是外路人，早跑了！村副、干事长、指导员都在里边！

兵甲 哪里还有个里边？

甲 你跟我来！（向洞口走去）

兵甲 （向兵乙）你在外边看牲口吧！（跟甲走到洞口）这真是个好地方！走到跟前还看不出来！（跟甲进去）

（兵乙向右方走下）

李 把牛杀吃完了，又该杀驴杀羊啦！

金虎 把牛杀完了可没有吃完。前两天抓了我的差，叫我给人家往山里送牛，我见人家把牛肉都烤干了，装在子弹箱里钉住了。

母 （向金虎）你不要说闲话了！快去把驴藏起来！

（金虎才要动身，兵乙又从右方上。）

兵乙 实在饿得抵不住了！找你们点什么吃的！（说着就乱翻起来）

母 出来四五十天了，又不准烧火，那有什么吃的？

兵乙 （从筐里取出半个糠圪塔）就这吧！（咬了一口）

金虎 （从兵乙手中夺出）你们把我们的粮食都要光了，半块糠圪塔还要抢！

兵乙 （打了金虎一耳光）你这小子找着挨揍！

金虎 （还他一耳光）×你娘打咱就打！

（兵乙从背上取枪，却被金虎从他背后连人带枪抱住，把他脸朝下摔在地上。然后骑在他的腰上。他喊了一声“嗷——”，金虎把他的脖子捏住。李铁拴去拉也拉不开，赶拉开金虎的手，兵乙已经死了。）

母 （大惊失色）看你这傻瓜闯下乱了没有？

李 死仍是死了，丢到他南坡窑洞里，弄个死无对证就算了！

（向金虎）快！我跟你去！一会里边有人出来就不好办了！（金虎背起来，李铁拴抬着腿，慌慌张张从左方下）

母 （拾起枪来，向金虎父）把这埋了吧？

（金虎父点头，金虎母取枪也向左方跑下。）

兵甲 （从洞内出，向右方看了一眼，回头向金虎父）俺那个伙计啦？

父 （向右边指）过那边去了！

兵甲 （仍向右方看）没有呀？开了小差了？（向右方下）

父 （自语）开你妈的老差了！

甲 （从洞内出，见兵不在，向金虎父。）那两个兵啦！

父 （用手向右方指了一下，没有说话。）

（甲正要往左方下，兵甲上。）

兵甲 （向警甲）俺那个伙计开了小差了！这家伙！一路上我就知道他靠不住！

甲 有几个驴子了？

兵甲 才三个！我看见那边还有三个驴一群羊，叫你们公所再给找四个驴就够了，你们也不肯给派！

甲 村里人都跑散了，上哪里找去？就是那三个驴一群羊，也还不能都赶走——有二个大驴是指导员的，羊是村副的。

兵甲 这会也讲不起是谁的，凑不够数，只好见一个赶一个！
（说着仍向右方下）（甲仍回洞里。金虎母从左方上。）

父 那个兵赶驴去了，你到那边看赶了咱的驴没有？

母 呀！那准是叫人家找见了！就明拴在坡上，人家还看不见？（跑到右方向远处看，又回头向金虎父。）赶啦赶啦！已经解开了！（向右方喊）不要赶那一个驴！那是我跟女婿伙了个驴！（喊着跑下去）

接 （甲、村副、接旺都从洞内出）
（向甲）他说他真要赶？

甲 他说他要赶！咱们看看他赶不赶。
（三人走到右方）

甲 看！把金虎的驴赶下来了！金虎他娘撵去了！

接 撵不撵那抵什么事（稍停）呀！又去赶我那个了！真倒霉！（稍停）不算了！解开！

甲 看！金虎他娘牵他的驴啦！（稍停）打起来了！金虎他娘跌倒了！起来了起来了！返回来了！我早就知道你不行！

村副 都躲不过！那不是，又去赶我的羊了！

甲 这他可不容易赶！羊不比驴——要不是行家，就算他赶不走！

接 那家伙有办法！先把放羊的抓住了。

村副 不算了！放羊的还得给人家去送啦！那不是，给人家撵起来了！
（金虎母上）

母 真不说理！

接 真不说理！（看看金虎母，忽然想起来。）哎，你们就

还没有搬走？

母 金虎去找地方去了，找好了马上就搬！

接 不论找好找不好都得马上搬！太不成话！说了两三天了
尽管推！（向甲）催着他！叫他马上搬走！（向村副）咱们
回去吧！反正人家是赶走了！唉！真不说理！

（仍回洞中去）

甲 （向金虎母）你看我说不行不行，你们尽管推！还等什么？搬吧！

母 搬也得等金虎回来！

甲 你不能先收拾行李？

母 有什么收拾的？一担就担完了！只是他爹不好招呼……

（金虎和李铁拴上）

李 算是给他找了个好地方！（看见村警在，吓了一跳。）

母 （向李使眼色）找了个好地方就搬吧！

金虎 （向母）人家是说甚啦？你是说甚啦？

甲 （不了解他们的事）不论说甚也得搬！

母 搬搬搬！谁说不搬？（说着就去收拾东西）

（县党部王干事穿着雨衣从右方上）

甲 （回头一看）王干事来了！（赶紧跑过来，帮着王脱下
雨衣挂在石坎下，然后规规矩矩站在一旁。）

王 谁都在？

甲 村副、农会干事长、指导员三个人在！请到里边去吧！

王 我一会再进去，你先把农会干事长请出来，我跟他
说句话！

甲 是！（进洞里去）

母 （向李）铁拴！你们那边还能挤两三个人不能？人家非

叫搬不行，这可搬到哪里去？

李 也可以搬到那边去，不过挤一点吧！

母 那不要紧！挤总比在雨里淋着强，你帮我点忙吧？一会叫金虎担上行李，你跟我把他爹架上！

李 可以可以！

（石甫从洞内出）

石 来了王干事！东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王 （看金虎等）

石 （向金虎等）你们走开点，我们谈谈话！

（金虎等走开，只留金虎父未动。）

石 你这老头子怎么不走开？

父 （略摇头，装作不省人事。）给口水喝吧！

王 不用管他！一个老头病成那样，他听得懂什么？

石 那么请你谈吧！

王 情况变化很大！这次战争大概算是结束了。咱们的队伍损失很大：大部分是投降了；有一部分跑下河南去了；还有许多打散了的，就在这附近各地当土匪。

石 县党部和县政府啦？

王 昨天上午，县党部开了个会。决议是这样：为了抵制共产党、八路军，现在公开跟日军接头。昨天晚上，县政府已经派人去跟日军接洽好了。

石 各村怎么办啦？

王 昨天晚上决定的办法是各村干部原封不动，只要改一改名目——村公所改成维持会，村长副担任正副会长；国民兵团改成警备队，教官还是队长；党还是党，担任防共工作；就这样简单。我怕有些人的脑筋一时改不过来，所以

先跟你单独商量一下。

石 这村里的干部，没有什么不愿意的——军队已经垮了，要不走这条路他靠谁去？不过也说不齐，我看村副就有点谬劲！

王 村长不是跑了吗？那么村副要再不干，叫谁当会长？

石 走着看吧！真要是他不干，那只好叫接旺代理！

王 商量一下再说！自然还是他干好！

石 那么进来吧！（引王入洞）

父 （独自骂）亏你狗×们活得有脸！平常要上老百姓的小米，再拨上差担到修武换大米吃！日本人来了你狗×们跑到山里，再要上老百姓的牛驴吃肉！吃你狗×们叫做甚？打起仗来投日本的投日本，当土匪的当土匪！

（金虎等上，又收拾行李。把行李收拾好了。）

母 大家都肚饥了，就把那青核桃吃几颗再走吧。

（金虎取出核桃来，大家剥着吃。）

父 我着咱就停停再搬也可以！县政府、县党部跟村公所那伙狗×的都投了日本了，他们还不走啦？他们走了，咱们还许能再搬进洞里去住啦！

李 谁说？

父 那个什么干事跟咱村那狗×干事长亲自说的！

（接旺和村副从洞内出）

接 （向金虎等）你们且过一边，我们说几句话！

（除金虎父，余人仍下。）

村副 不用谈了！你们叫我当个清静老百姓好不好？

接 你再不要推那么清静！咱村除了你再找不出合适人来！况且就给你自己打算，也应该把这个会长当起来，要不然，

八路军倘或来了，你靠谁去？

村副 这我倒不操心：粮食叫中央军要光了，牲口叫他们赶光了，不论他谁来吧，想要我这条老命，不管他谁要去好了！

石 （从洞内出）不用尽管推了，接旺！你就暂且应起个名来，晚上回到村里再慢慢跟老汉商量吧？

接 那也好！

（三人一同进洞，金虎等又回来。）

母 不用等了！搬吧！这还能住？人家说句话也得给人家走开！

李 搬就搬过那边去吧，省得受这些零碎气！

金虎 搬就搬！

（金虎挑着筐，李铁拴扶着金虎父，金虎母把锅碗收拾在已经拆破了的篮子里，正抬步向左方走，甲从洞内出。）

甲 等等！不要搬了！现在不打仗了，大家就都要回村子里去啦！

金虎 那么就搬回家去吧！（仍要走）

甲 不要走！还有事啦！你们且放下！

（金虎等各自放下东西，金虎父也暂且坐到原处。）

甲 （指金虎和铁拴）村公所还有些东西，派你们两个送一下。你们来取来吧！（金虎、铁拴、村警甲同人洞）

母 （向金虎父）你着这说个什么理？

（金虎、铁拴、村警甲、石甫、接旺、村副、王干事等一同出洞，除王干事外，每人都拿着些被褥或口袋。拿到洞外，放成一大堆。）

甲 （向金虎）挑过你的筐子来，把这些铺盖放进去！（向

铁拴)你背上这几条口袋!

(金虎把自己的行李取出,把他们的行李装进去。甲把口袋一条一条向铁拴肩膀上搭。铁拴喊着“背不动了背不动了”,甲又给他加了两条。)

(石等四人,各自拄着小棍也动开步,王干事正去取他的雨衣,右方突然有人喊“站住!”接着就开了一枪。)

王 (向大家挥手)散兵散兵!快跑!

(王先向左跑,石等跟着跑。金虎和铁拴丢下行李,架上金虎父也从左方跑下,金虎母也跟下。)

(停了一小会从右跑来一个兵——就是前幕里营长的马弁。)

弁 (向右方喊)快上来!好东西多着啦!(解开一条口袋,取了块饼吃着。)快上来!有蒸馍,有烙饼!

(兵十余人上,先抢吃的,后抢行李,抢上就仍向右方下,只留下马弁和两个老兵。)

弁 (看见雨衣)对!这是件好衣服!

老兵甲 给营长拿回去吧!

弁 啊!这时候,谁拿到手是谁的!管他营长不营长?

老兵乙 (向甲)他们都把好的拿了,咱们就把这两条破被拿上吧!铺起来总比睡在湿地上好一点!(两人把金虎的破被背起来。)

弁 (指金虎的锅碗)把那个拿上叫晚上开水喝!

(老兵甲取锅,乙取碗杓等物。)

弁 (向全场扫了一眼)走吧!没有什么了。(同下)

(金虎上)

金虎 好好好!抢完了!省得老子去送!(又看自己的)呀!

把我们的被子锅碗也都抢走了！（向远处）娘！回来吧！
土匪走了！把咱的东西也抢光了！

（石等听得有人叫，也都慢慢回来。金虎母和铁拴扶着金虎父最后回来。）

石 他妈的，什么都抢完了！看这情形咱们回去也不保险，
还不如迟几天再说！

村副 干粮行李都没有了，在外边还怎么住下去？

接 就先回去吧！有什么风声再跑出来！

石 那就走吧！（向王）王干事，咱们请到村里去吧！

王 好！（向墙上看）呀！我的雨衣也没有了！

（五个人没精打彩往左方走）

金虎 他们走了，咱们到洞里去住！

石 （回头向金虎等）不要到洞里去！我们回去说不定还要
来！（下）

李 （等石走远一点）×你娘！洞又不是你打的！（向金虎
娘）管他来不来！你们先住进去再说！

（金虎先进去，金虎母和铁拴扶着金虎父一步一步慢慢往
里边走。）

（幕徐徐落）

第三幕

景 村公所的室内。舞台左后方，有一门通院内，上挂软帘；
右方一小门通厨房。右后方靠墙处，摆一张桌子，两旁摆
两条板凳。

开幕后 石甫和接旺匆匆上，村警甲从厨房出。

石 端饭！

甲 菜成了，~~饭~~还没有做成啦！

石 看你们这些东西该死不该死！不是告你们说天一明就要吃饭吗？

甲 拿出来的大米吃完了，刚才我们才又剜开窑洞取了一点。

接 给日军收起来的面也吃完了吗？

甲 面还有。

石 你们都是死人？大米没有拿出来，不会吃面？

甲 饭单上规定的是早上吃大米。

石 不用管什么饭单不饭单！太阳上来那么高了，我们吃了饭还有事啦！就吃烙饼吧！快点做！

甲 是！（仍向右方下）

石 （向接）看情况是不行了，除了城里日军的各大据点，都叫八路军打垮了。我们现在最好是能早走一步早走一步。昨天他们的区公所有通知，说是今天要派人来这里开会。我们不要跟他们碰头。

接 你还不十分要紧，我是维持会长，他们一定不肯甘休！

石 再不要说谁要紧谁不要紧，你要知道咱们得罪的人太多了啊！

接 那末咱两个人悄悄走了也不好！还有村副，还有教官，我们能不通知他们一声吗？

石 你太老实了！教官听说八路要来，昨天晚上连夜就跑了。村副一来有个谬劲，二来那末大年纪了，跟上咱们，行动上也太不方便。况且咱们这次到城里找日军，去的人不少，谁知道人家收容不收容？老弟！照现在的情形，只能

各人顾各人！（起来走到左后方，揭起帘子看）他妈的，太阳已经照着西楼窗了！（向右喊）饭成了没有？

（内应“快了！”）

甲 （取两个蒸馍一盘菜上）和起面来了，马上就现成！要是太饿了，先吃个蒸馍吧！

（石正取蒸馍咬了一口，内起哭声。）

石 这是谁哭？

甲 金虎他娘！昨天晚上，金虎他爹死了！

石 真他妈的不吉利！偏要在这时候来哭！这才是扯淡啦！全村里大小死下一二百口，哪在乎多死她一个老汉？（向甲）出去告她说！不准她哭！

（甲正要下）

石 顺路叫金虎来支差来！

（甲从左下，石、接都取起馍来去就菜。）

石 他妈的，只会炒个小菜？（向内喊）再炒个过油肉来！

（村警乙从右方走出）

乙 正烙饼！烙几张饼再炒吧？

接 不论弄什么，只要快！你着太阳上来多么高了？

（乙下，取烙饼上。又下。）

（内哭声停止。两人低头大吃——要多吃一会。乙又送一盘烙饼来。）

石 过油肉啦？

乙 便宜了！（放下烙饼，匆匆跑下，端菜上。）

石 （吃了一口，向接。）这个还不错！

接 （没有等他的介绍，紧接他的筷也挟了一筷吃了。）不错！

石 （向乙）再弄两碗苜蓿汤来！

乙 没有海米了！

石 真是活死人！没有为什么不早说？就弄成鸡子汤吧！（乙下。他二人仍吃个不抬头——仍要使劲多吃一回。）

（甲和金虎上。）

石 （看金虎）你怎么连扁担也不拿？真是傻瓜！就不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回去拿扁担！

（金虎下）

石 （向甲）去把我两个人的行李打包一下！

（甲下）

接 八路军究竟来了有多少人？

石 人数还弄不清楚，不过很厉害：往南一直打到晋城、博爱、修武，在双庙一直打了三天三夜，把双庙附近的皇协军收拾了个净光。

接 那么咱们出去，不是不能回来了吗？我家里的 情形 你知道，我一离开那里还有个能管事的？

石 这会只能先顾命！要说到顾家，谁家里也离不了人！

甲 （慌慌张张上）北边岭上下来几十个兵！南边河里上来一群牲口，不知道都是干什么的！

（石、接二人大惊）

石 真糟透了！叫你们早做饭，你们干的是什么事？

乙 （用木盘端一磁盘烙饼两碗汤上）成了成了！

石 快跑吧！八路军两面包围上来了！

甲 行李还没有捆好！

石 不要拿了！

（石、接二人先跑下。甲跟着下。乙把烙饼和汤连木盘放桌上正要跑，伙夫从厨房门内伸出头来问。）

夫 有什么事？

乙 跑跑跑！（自己跑下）

（伙夫莫明其妙，见他们都跑完了，也就跟着跑了。）

（全场静寂一小会，金虎取扁担上。）

金 （故意声张）八路军来了！（看桌上）咦！怎么没有一个人了？（头伸到厨房门内看了一下）都跑了！狗×的比我知道得还早！（看桌上剩下的饼、菜、汤。）这可该老子家过过年啦！（丢下扁担，先端起一碗汤来喝了一口。）不错！很好喝！（又拿起烙饼来，就上菜吃。）都好！（三口五口先把菜吃完了，又把一部分饼装在怀里。）这给我娘拿回去！（又端起碗来喝汤。）

（壶关一个支差的青年，头上顶着白净的毛巾，穿一件白小布衫，外边披了件青夹袄，手里拿着一条很好的长穗皮鞭和一条干粮袋。揭开帘子问）

差 老乡！这里有火没有？我们开些水喝！

金 进来吧！你是哪里人？

差 壶关的！（上）往夺火送子弹回来的！

金 不用开水了，你喝那碗汤吧！

差 那可不敢！

金 怕什么？这是维持会那些狗×们做下的！狗日们见岭上有些兵，连饭也没有吃完就都跑了，剩下的咱们还不敢吃吗？喝吧！你要早一步进来，还有烙饼肉菜啦！

差 那就讨他个小便宜！（把干粮袋放在椅上，皮鞭往背上一挂，端起汤来喝了一口。）

金 （见他挂皮鞭）你还赶着牲口吗？你们那里还有牲口？

差 有！我们十几个人一共赶了二十四个驴，喂！（放下碗）

先开水！不要把人家大家忘了！

金 你喝吧！我给你开水去！

差 我去我去！

金 我去！你摸不着！（放下碗从右方下）

（差又端起碗喝了一两口，金又上。）

金 温水锅里一大锅热水，马上就开了！（坐下又端起碗喝汤）喂！我问你个事：你们那里的军队不杀驴？

差 （冷不防被他逗笑了，把喝到口里的一口汤喷出去。）军队为什么要杀驴？

金 我们这里的军队把牛驴都杀吃完了！我跟我姐夫伙了一个驴也叫人家杀吃了。你们那里住的是什么军？

差 八路军！

金 （点头自语）八路军不杀驴！（向差）你们那里死的人多不多？

差 你问得真奇怪！好好的人自然死不了，要是生灾害病，或者跟敌人打仗，还能不死几个？

金 我们这里死得多！光这个村就死了二百多口，我爹夜来也死了！

差 为什么死下许多人？

金 粮食都叫军队要光了，夏天日本来了，大家跑在山上，军队不叫烧火，大家都吃青核桃、生树叶，把人吃病了，就死开了。（喝完了汤放下碗）

（差取出干粮来，就着汤吃。）

金 你这干粮真好呀！什么面？

差 玉茭跟谷子！（分一块给金）你尝尝！

金 真好！你们那里都吃是这个吗？

差 这也不算什么好的！

金 我们这里见都见不上！

差 你们这里还有这么好的汤！（喝完最后一口，放下碗。）

金 就是因为他们要得太多，才把我们要穷了。
（李铁拴上）

李 （很拘束，低声。）壶关客！你们的伙计们问水开了没有？
（发现金虎）你怎么敢坐在这里？维持会那些人不在？

金 跑了！剩下的烙饼肉菜鸡蛋汤我都给他吃了！

李 噢！他们也怕起人来了吧！（很得意）

差 我看看水开了没有！

金 我给你看看，（说着走到厨房门边向内一看）开了！

差 我去送！

金 我替你送吧？

李 （向金）你就去送一下吧！我想跟人家壶关客谈谈！（向差）叫他去送吧，我想跟你谈谈那边的情形。

金 谈吧！好事多着啦！人家那里住是八路军，不杀驴、不死人，（举起人家给他的干粮）还有这么好的干粮！

李 （笑）傻鬼！送你的水去吧！
（金向右方下）

李 刚才有几十个八路军，都背着粮食，跟你们那些驴旁边走过去，怎么也不要差？

差 那个事边区政府有规定，除了战争时期往前方运粮准要差，各部分平时吃的粮，都是自运！
（金提着水桶拿着几个碗——至少要七八个——从右方上，向左后方下。）

李 半路不能抓差吗？

差 不能！没有专署的拨差证、换差证，也不能拨差，也不能换差！

李 那可真便宜！我们这里自二十七军来了，这几年支差可真没数，一个人每年除了支差，实在没有几天空闲！人家提个油瓶子也要个差。今年六月以后，他们投了日本，那就要得更凶了——刨开了老百姓的粮食窖洞，抢出粮食来还得派老百姓去送！

金 （在内）到里边坐吧老村副！铁拴哥正跟他谈那边的事啦！

村副 （也在内）还有谁在里边？

金 （仍在内）没有谁了！维持会那些人都跑了！

（金和村副同上，大家让坐。）

村副 （坐下。看桌上的碗碟。）这些人真叫人看不过眼！到这时候了，还是这么大吃大喝！

金 没有吃完就偷跑了！

村副 壶关客！听说你们那里的地方情形很好，我想向你请教一番！喂！你们吃过饭了没有？请到家里吃顿便饭吧！

差 谢谢你！我们早上刚吃过饭。我也不会谈个话！你想知道些什么事吧？

村副 就先请谈谈负担吧：你们那里一年收几次公粮？

差 每年只派一次，可是能分夏秋两期交。

村副 每亩地派多少？

差 不按地亩，都是按收入派啦！不论什么收入都折合成米，每口人再除了七斗免征点，每石粮再除一斗生产费。其余作成份数……

村副 （听着很吃力，好象听不懂。）这个我一时算不来，请你只说个简单数目吧！比方收一百石粮的家，要出多少

负担？

差 收那么多粮食的家，份数就重一点，总得出十几石！

村副 那还重吗？你们那里可真是另一个世界！（低声）我今年春天三个月，只说军粮就出了四十多石。赶到夏天，军队垮了，敌人来了，村里人一维持，把我两个窑洞底都给扫光了。

（内喊“走走！”）

差 （向内）走着吧！（向众）对不起！我们要走了！再有人来再谈吧！

李

村副 好好！再过来歇！

金虎

（差下。又提空水桶取碗上。）

李 放着我们拿吧！

差 那可不能！这就够麻烦你们了！

（双方点头，差下。）

（稍停，远处有呼喝牲口的声音，有一群驴过去的脚步声，有驴笼头上戴的许多小铁铃声——不是大铜铃。还有个驴夫喊了一句旧戏白：“幸喜诈出关来，马上加鞭！”这一喊引起许多人的笑声。慢慢就走远了。）

李 你看人家这些人是什么精神？要是八路军早来几个月，咱这里的人还不也是这样高兴？

金 春天那个中央军营长，不是来“振”了一回“国民精神”吗？一顿都把人振死了！

村副 唉！有些人常说八路军杀人放火，我就觉着靠不住——他为什么要杀人放火哩？简直想不通。刚才你看人家那些

支差的，哪里像杀人放火的地方出来的？

（银虎背着背包、挂包、米袋、穿着一身整齐干净的便衣——夹衣——上。）

金 （大吃一惊）银虎？（疑惑）是不是？（看银虎脸）

银 （向金虎看）哥！你怎么瘦成那样子？

李
村副 银虎！

李 人家都说你死了！真是三里没实信！

（银放下包件。李让开座。银坐下。）

村副 孩子呀！你看咱这地方成什么样子了？

金 你到家来没有？

银 还没有！

金 你快跟我回去看看吧！要是早回来一天，还能见见咱爹！

银 （急问）咱爹怎么？

金 咱爹夜来才死了，咱娘还病着啦！

李 （向金）你这傻瓜！为什么先告他说那个？

银 （很后悔，很难受，但并不哭。）唉！我昨天就说着来啦，因为区上有点事隔住了。

（内许多脚步声，老少男女乱说“银虎回来了！”有个人揭开帘子，门前露出许多人，都有病容——包着头或拄着棍。有些用手指着银虎回头向后边的人说“那不是！”）

李 （向银）村里人都来看你来了。

金 （拉银）咱先回去看看咱娘！

村副 （向银）回去看看吧！也该先回去看一下！

（金虎母在内问“在哪里”众向门上指。）

母 （仍在内）银虎！（叫着就从众人中冲进门来——满面病色，

头上顶了个火罐。)

母 银虎！你真回来了？唉！咱这里真不能活了呀！（好像哭，但没有哭。）

银 娘！你不要哭！我正要跟我哥回去看看啦！咱们回去吧！

母 我不哭！你爹死了我才哭了两三声，还叫人家维持会骂了一顿！这时候，谁哭谁？哪个病人不是躺在炕上等死啦？你也不用急着回去！看什么？有什么看的？除了你一个死爹躺在炕上，别的地方，叫人家散兵跟鬼子连老鼠窟窿都刨过了！你跟哪里来的？

银 跟区上来！区上派我来咱村里开会来了！

母 还没有吃饭吧！你开你的会，我给你去找点什么吃！唉！可找点什么！

银 我带着米啦！

村副 都不用！（向李）铁拴！你去他们这里边（指厨房）看看有什么，先给银虎弄点饭！

金 不用！他们都跑了，我还拾了些烙饼！（向银虎）我吃了些，给咱娘丢了些，给你跟娘分吃了吧！（把切成小块的七八块饼分拿在两个手里，一手给银，一手给母。给银的放在桌上，给母的母不好意思接）。

母 我不吃！

村副：这老嫂！你吃了吧怕什么？（向金）金虎还是个孝子啦！

母 （接了一小块）那些给银虎吃吧！我不吃那么多！

金 （把其余的饼也放桌上，到里边舀了两碗开水，分给母和银。）就上开水！

母 我就喝碗水！家里几根湿蒿，连火也烧不着！（就着开水咬了一口饼。）

银 （喝了一口水，向村副。）老村副！据我们区上调查，你老人家在这村里真是个开明士绅：真正懂得平等，不欺负人；真正懂得民族大义，誓死不投降敌人！我们想在这会上向民众提一提，请他们出名，给你向边区政府请个匾挂一挂。

村副 （满面笑容，虽然谦虚，却也想要。）不用提吧？这都是咱的本分，算不了什么！

银 不不！一定得提！在士绅里边，像你老人家这人很不易得！喂！你看我这记性多坏！先找个人打打锣准备开会吧！

村副 天还早哩！吃点东西再说吧！

内 （不上场）还打锣做什么？

李 召集人开会！

内 （仍不登场）不用打了！一听说银虎回来了，村里除了死人病人，凡是能跑能走的都来了！

银 那咱们就先开会，不要叫大家等着！

李 （向金）咱们也出去听听！（同下）

母 我也出去听听，看八路军来了要做甚！

村副 你病着哩！就在里边吧！

银 （走到门边，搭起帘子，用家常话说。）我是个老熟人，不用介绍！（提高嗓子）我要讲的话很简单：我们这地方，被敌人跟顽固分子，弄得老百姓不能过日子——这是大家亲自经过的事，我也不用细说。今年秋天——就是前一个多月——八路军来了，把敌人打跑了。把维持会吓得跑的跑了、散的散了、捉的捉了，我们就建立了抗日新政权。这样我们老百姓本来应该能活啦，可是专署、县、区都有了

政权了，村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弄得村里有许多要紧事不能办，所以还活不下去。现在，我们先建立个简单的村政权——只要选一个村长一个村副。要选能热心给大家办事的人。大家先准备一下。

众 （声音短而有力）对！

银 好！这是一件事！以下还有两件事：咱们也有军队了，也有政府了，大家再不要打死的盘，要打活的盘。我们既然要活，第一先要把各家的死人埋了。人死的太多，连抬的人也没有了！我们军队驻的地方，都是军队帮着老百姓抬；没有驻军的地方，大家就要组织些互助队，这家给那家抬，那家给这家抬。第二还要吃东西：敌人跟顽固军队搅得老百姓没有种上地，后来又遭了旱灾蝗灾，大家都没有吃的，怎么能活到明年夏天啦？边区政府跟八路军总部号召大家——不论军队，不论政府，不论老百姓——都趁这秋天，赶紧一律打野菜，采树叶，准备渡明年春天的灾荒！这两件事情要紧不要紧？

众 大大要紧！

内一人 上边真想得到！

村副 （点头）

银 除此以外，还有两件事，很不费什么力气：第一、咱村的老村副，很懂得平等，很懂得民族气节，既不欺负老百姓，又不投降敌人，咱们村里人大家出个名，请边区政府给他老先生挂个匾，可以不可以？

众 可以！

村副 （轻声笑）海海海海！

另有几人乱说 “应该！” “人家真是个好绅士！”

银 还有！第二、敌人在这里的时候，咱村一定也有维持会。大家见了那些在维持会办事的人，劝他们到政府去悔过——只要他们能承认错误、真正改过，政府很宽大，不追究他过去的罪恶！

（众乱哄哄嚷起来）

内一人 （大喊）不行！不能一律那么办！

又一人 咱村就有两个人非杀不行！

银 你们说是两个谁？

（众停了一会）

前人 我不怕！我敢说！就是石甫跟接旺！

母 （跑到银虎跟前）银虎！要捉住那两个人不杀，我也不行！什么坏事都是他们挑的头！

众 （乱声）不行！叫我们活就不叫他两个活！

银 那就不跟他客气了！政府的宽大也不是无限的，群众不容他政府就没法宽大他了。

内又一人 对！

银 好！我的话完了。最后一句：我们还要活！不要等着死！

村副 要活！要活！照现在的情形谁还肯不活？

内又一人 不死了！能照这样咱们还要活啦？

众 对！

前人 这又成咱们的世界了！

众 对！可算又能活了！

（众大鼓掌！银虎回过身来。）

（幕闭）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于平顺）

好消息*

时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

地 磁县附近的山地。

人 难民——四十余岁，农民。

他的女儿——十七八岁，有重病。

解放区青年民兵甲乙二人。

中央军逃兵一人。

景 舞台正中挂一幕，将全场隔作前后两处。中幕前不设置什么东西，代表道路；中幕后为一岔路口，两前侧和右后方均通路（布一点简单的山头或不布也可）。中幕可以随时开闭。

开幕之前，先打几声能代表战争的急锣鼓（像上党戏与大乐子常用的“拉锚”，别的戏也各有相类似的），然后女在内叫板，内唱一句。

女 （内唱——各地方戏用本地的起句，如上党戏的二簧摇板或落子的起腔等）战兢兢逃出来天罗地网！

（前幕等唱完了字拖后嗓时拉开。这时难民扶女。女唱完第一句，一声锣切住，跌倒，再坐起接唱。）

女 止不住浑身痛坐在路旁。（拉长一点的过门转正板——如中路梆子的慢板或落子的清流水等。）

女 恨只恨中央军不把理讲，害得我女儿家实在凄惶：想当年

* 这个小剧，最初发表在一九四五年《新大众》第十二期。

我长到十岁以上，那时候日本鬼占了家乡，每日里出城来胡杀乱抢，苦害得老百姓东躲西藏。八年来只熬得鬼子投降，八路军把鬼子赶下新乡，也只说这地方就算解放，谁知道又打来什么中央，他与那日本鬼毫无二样，抢东西拉民夫还要姑娘，他把我抓去了一夜不放，一个个来得来都像虎狼，一夜间害得我不像人样，吃了苦到人前有口难张。随爹爹逃出来天罗地网，怎奈得身无衣肚里无粮，跑得我浑身痛实难支撑，坐在了大路上哭断肝肠。（切）

难 女儿！女儿！这里离前线还是太近，再走三五里到了山边，咱们再歇！

女 爹！我实在不行了，一步也不能走了。

（近处又响起一颗炮弹，二人一惊。）

难 看！还是强走几里吧！这里还太危险！（伸手拉女）

女 （很吃力地被拖起来，可是才一动步便又跌倒。）

难 （唉！扶女唱）一见女儿难立站，不由老汉心痛酸。眼看山头去不远，待老父背你逃上山。

（用换衣时的锣鼓轻轻打着，难民慢慢背女儿提篮下。中幕随着他的步子渐渐开——赶他下去中幕也就开了——露出岔路口的景来，一青年民兵甲站着岗。）

甲 （唱）太行军区有命令，站岗放哨要小心，前方战事很吃紧，怕有奸细与逃兵。顺着大路望一阵！（向左方看）那一边来了行路人。

难 （内唱）背着小女把山进。（切住，背女上。）

甲 站住！（起板）

难 （见甲有枪，猛一惊站住。）

甲 （唱）问老乡你往哪里行？（切。白）老乡，你们是做什么的？

难 我们是逃难的。

甲 又是逃难的？你们打哪里来。

难 打磁县来。这里就是老根据地了吧？

甲 是的！（看他背上的女）这个姑娘怎么不睁开眼？

难 她受伤了？（将女放下）

甲 受了什么伤？

难 受了……唉！你们根据地人不会知道这个！（向女）女儿
（摇）女儿！

女 （睁了睁眼，然后又闭住。）唔……

难 唉！女儿呀！（唱）一见女儿叫不醒，倒叫我老汉吃一
惊！（仍叫女）
（民兵乙上接唱）

乙 前方炮声打得紧，我到区上探军情。
（切）

甲 伙计你到哪里去？

乙 到区上取情报去。

甲 （指难民）捎带把这两个难民引到救济会。（向难）老乡！我们这里来的难民太多，自己随便跑一定找不下个去处。区上有个难民救济会，你们到那里挂个号，他们分配你们到哪个村再到哪个村去。那里也可以先领一点临时救济品——有柿子、炒面、核桃，都是各村里捐的。你们跟他相跟去吧！

难 好！（看女）可是这孩子不省人事，怎么走呀。

乙 她怎么了？是不是也叫中央军……

难 唉……

乙 不要紧！昨天来了好几个都是这样，等住下了叫医生看

着。你且把她留在这里，一个人到区上去一下吧！不管分配到哪个村，回来都还得经过这里。

难 不怕中央军来吧？

乙 放心吧！已经把他们包围起来了，哪还来得到这里？

难 （摸摸女）也没有个东西给孩子盖一盖。

乙 （取下自己披的大衣扔给他）盖上这个！

难 （很感动）你！你不用吗？

乙 不要紧，走路没关系！走吧？

（难用大衣盖住女，提篮随乙下。中幕随着闭上。）

逃兵 （上、念快板）吃粮把兵当，牌号是中央，抗日打开仗，调回大后方。今年八月里，鬼子都投降，上头下命令，来收日本枪。渡过黄河来，集合在新乡，还见日本鬼，街上站着岗；日本宪兵队，招牌明晃晃；日本坦克车，守着大工厂；鬼票满街飞，货价时时涨；投降不投降，还是一尿样，心里不明白，不敢问官长。隔了不几天，上头传主张：忽然下命令，军队往北上，不缴日军械，先打共产党。听说打共党，心里冰透凉；抗战八年整，人家比咱强。一直打到底，没有离前方，咱去打人家，情理不应当。再说八路军，兵强人马壮，打了八年仗，日本也难防，咱这烂队伍，季也换不上，松毛圪淡气，哪能打胜仗？都是抗日军，实在犯不上，胜了没啥光，败了白受伤；这样一打算，有些不合账，大军一出动，我找了个空子跑他娘！

（唱）放着日军不去管，去打那八路为那般？这种傻事咱不干，我开了小差逃上山。（下。中幕随着开）

女 （微动。唱。）一场大梦已半醒。（过。）

甲 这个大姑娘似乎快醒过来了。叫她一叫吧！（张嘴又闭

嘴) 十七八岁个大姑娘, 素不识面, 可该叫人家个什么?
(想。笑。) 就叫她个小大姐吧! 小大姐醒醒啰!

女 (接唱) 耳旁猛听有人声, 睁着眼睛把神定。(睁眼见甲, 猛一惊, 挣扎起来想跑, 但又跌倒, 看着甲惊唱) 不见我爹爹原是一个兵。

甲 (唱) 这个地方很平静, 小大姐不必再担惊。(切)

女 你, 你是什么队伍?

甲 我是民兵, 这是老根据地。你爹到区上给你找住处了, 你放心歇歇等等吧!

女 恁地(那样的)? (合住掌) 不当活活的! (看大衣) 这是谁的? 我怎么盖着?

甲 我们的! 你还盖上歇歇吧!

女 民兵大哥! 你们可真是好人! (迟疑) 民兵大哥! 我真麻烦麻烦你: 我们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你要有什么吃得的东西寻给俺一点吧?

甲 还有点干粮, 分给你一点吧! (取出个烙饼来分给她一块。)

女 谢谢你民兵大哥! (唱) 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 根据地果然有好人。双手接住一块饼, (接) 吃一块饼子点心。(中幕闭。难民提篮上唱。)

难 好一块平静的根据地, 大小人说话都和气, 送我些炒面和柿子, 我拌他一碗压压饥。(切) 老根据地就是好, 除给找下住处还送了些吃的。我老汉也实在饿坏了, 拌上碗炒面吃吃再走! (放下篮子取出碗来拌了炒面一会, 往远处一看) 那个好像是中央军。躲他一躲!
(逃兵慌慌张张过。)

难 （追着看，又看后边。）一个人？一个人我就有主意了！
（唱）看见这些忘八蛋，不由我恶气往上翻。丢下炒面随后赶，我杀他一个报报冤。（追下。中幕开。）

女 老爹爹许久未回转，怎不叫人挂心间。（中幕闭）

逃兵 （跑上）急急忙忙把路盼。

难 （急追上拦腰抱住逃兵摔倒）我把儿摔在地平川！（切）
（从逃兵手中夺出枪用枪托打去。逃兵已爬起跑开了，枪托落空。追下。）（中幕开）

逃兵 （急上。跪甲面前。）老老老哥快快救命！

女 中央军！中央军！（吓得挣扎起退了兩三步又倒地。）

甲 什么事？

逃兵 有个人要打死我！

难 （追上，望定逃兵就打，被甲抢到中间拦住。）

甲 老人家！你为什么打他？

难 他是中央军！他们可把我害苦了……

逃兵 那都不是我来呀！

难 反正你们一伙子！（打了逃兵一枪托）

甲 （拦住）老人家不要这样！缴了枪不能乱打人家！

逃兵 老老老兄弟！我没有糟踏过人！我是不想打八路军才跑出来的。

乙 （取着难民的篮子上）老人家！你怎么把东西丢了？

甲 他跟这个逃兵生气——有情报吗？打得怎么样？

乙 有个好消息：新八军不愿意跟咱打了，高军长领着全军人马过咱这边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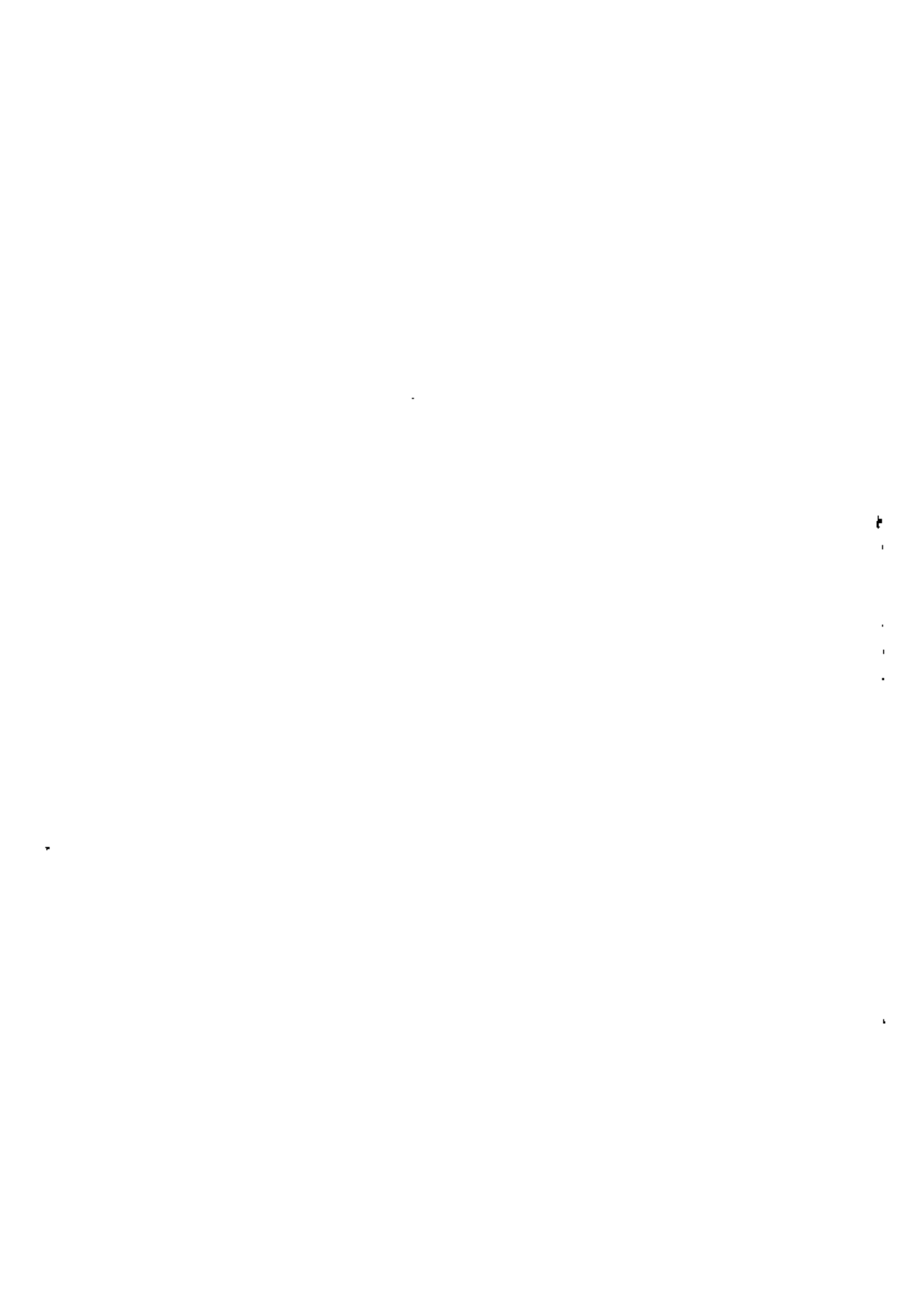
逃兵 （一跳）真的？我就是新八军的。现在开到哪了？不打八路军我就还归队去！给我枪来！

甲 不要忙！不打内战咱们就成自己人了。等一等打听他们住在哪里，我们派人连人带枪送你回去！你先歇歇！（取出那半个烙饼）饿了你先吃一点。

难 原来中央军也有不愿意乱打自己的。（向逃兵）我看你也是个好人，刚才我没有问清楚，很对不起！（向乙手中取过篮子）我还领来些柿子跟炒面，给！也给你吃些！

甲、乙、难 吃吧！不打自己咱就是一家人了！

（在热闹声中打尾声闭前幕）（完）



巩 固 和 平^{*}

(小 唱 剧)

人物

卖花生的

甲乙二青年

义务教员

(不布景，不限调，各种地方戏均可唱)

卖 (提篮唱着上) 过了一年又一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全国
和平已实现，卖个花生也心安。(放下篮子卖花生)

(甲乙从两边一递一句唱着上)

甲 过了一年又一年，

乙 今年不比往常年；

甲 全国和平已实现，

乙 依我看来还不沾。(切)

甲 怎么不沾？你这家伙连报也不看？(快板) 你这人，真可笑！为什么，不看报？一月份，十二号，毛主席，有通告：国共两方停了战，全国和平实现了。今年成了太平年，咱们可该睡大觉！(板不停)

乙 不敢睡觉！

甲 要睡觉！

* 这个小剧，最初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二月《新大众》第十六期。

（两人一递一句，乙说“不敢睡觉”，甲说“要睡觉”，重复好几遍，越说越紧，然后停板。）

甲 和平了为什么还不睡觉？你就说说，为什么不敢？

乙 我说？（快板）你这人，眼圈小，国家大事懂得少。全国都像解放区，管保内战起不了。有些人，心不好，明一套，暗一套。明里跟咱来谈判，暗里悄悄把兵调。不是咱军民一心堵得好，早把咱这呈糟踏了。虽然眼前停了战，我看将来不可靠！（不停板）

甲 很可靠！

乙 不可靠！

甲 很可靠！

（和上一次一样，一递一句，越说越紧，然后停板）

卖 喂！你两人不要吵了！这么吵也弄不清谁说得对。你们赌上四两花生，请个人来给你们评判评判，谁输了谁出钱，好不好？

甲 好！称花生吧！

乙

（卖花生的秤出四两花生，给他们倒在地上。）

甲 请谁来评判呀？

乙 （向卖）老弟！你就当个评判员吧？

卖 我不行！我看就去请义务教员吧，我也想听听究竟和平得了和平不了！

甲 你也想听，那就麻烦你去请一遭吧！

卖 （笑）可以！我去！（下）

甲 我看一定是我赢了，先把花生装起来吧！（抓起一把花生装入口袋，又抓第二把。）

乙 （拦住）慢慢慢！谁输了谁出钱，花生是伙吃啦，你为什么一个人装？

甲 那咱就伙吃！（仍把手里的一把往袋里装）

乙 （握住他的胳膊）伙吃你怎么还要装？

甲 我只装这一把了！（挣脱手）

乙 不行不行！（互扭一会，最后把甲的胳膊制住。）你为什么这么不公道？

甲 （笑）这叫最后抓一把。抓上就抓上了。

乙 抓不上啦？

甲 抓不上也就算了！（把手一松，花生落地。）

教 （在内叫板）走哇！

（丝弦拉起来。甲乙都说“不要闹了，义务教员来了！”卖花生的领义务教员唱上。）

教：（唱）过了一年又一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全国和平已实现，巩固和平最当先。（切）

甲 来了？请你给我们当个评判员吧！

教 好！你们把你们的争执说一说吧！

甲 可以！我先说。（快板）他这人（用手指乙）真可笑，不知为啥不看报。一月份，十二号，毛主席，有通告，国共两方停了战，这事他还不知道。全国和平实现了，我看该咱睡大觉。

乙 不敢睡觉！

甲 要睡觉！

乙 不敢睡觉！他这人（用手指甲）眼圈小，国家大事懂得少。有些人，心不好，明一套，暗一套。现在虽然停了

战，我看将来不可靠！

甲 很可靠！

乙 不可靠！

甲 很可靠！

教 好好好！不要吵！你们都算说对了：说可靠也可靠，可也不能睡大觉。你们说得都很好，可惜有些（叫板）没说到！（唱）今年本是和平年，这和平来的不简单：全国人民反内战，工夫也误了整半年，流了血来流了汗，因此才能有今天。（过）

甲 这算是真和平了吧？

教 和平了！

甲 （向乙）我赢了吧？

教 慢着！还有啦！（唱）全国和平虽实现，可也还有人心不甘。你不要看他笑满面，有空子就想打几拳。咱们大家要防范，休露出空子叫他钻。（过）

乙 （向甲）我说什么来？还睡大觉不睡大觉了？我赢了吧？

（向教）难道就没有个总办法，叫中国永久和平吗？

教 有！（唱）中国为啥多内战？不民主是他的总根源——少数人专权来独断，多数人反抗理当然。想叫永不起内战，除非是大家掌政权。国家大事大家管，才能把内战根子剜。争取得联合政府早实现，到那时就是太平年。（切）

卖 这么一说，我也懂得了！（向甲乙）光你两人吵，我越听越糊涂。

甲 俺两人算谁输了？

教 都没有输了。

乙 （向教）吃花生！（从地下抓起花生来给教）

教 （拈了两三颗）你们吃吧！我还有事啦！（下）

甲乙 咱们也走吧！（同弯腰拾起花生就要走）

卖 （拦住二人）慢慢慢！我的花生钱？

甲 咱们起先说得明白，“谁输了谁出钱”，现在两个人都没有输了，你跟谁要钱？

卖 （摸头）嗷嗷嗷……你们两个都该出钱！

甲乙 为什么？

卖 为什么？你听我的吧！（唱）过了一年又一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全国和平已实现！（过）（向乙白）全国和平实现了吧？

乙 实现了！

卖 你不是说靠不住吗？你输了吧？

乙 这一点算我输了，可是还有……

卖 自然还有！（唱）巩固和平最当先！（过）（向甲白）和平虽实现了，可是还不巩固，还要咱们大家，一面防备有人破坏和平，一面赶紧争取民主。对不对？

甲 对！

卖 对？对你为什么说该睡大觉。你输了吧？

甲 后来这算我输了，可是前边他输了！

卖 前边他输了，后来你输了；前后连起来，两人都输了，为什么不给俺拿钱？（切）（静默一会，甲乙互看。）

甲 伙计！怎么着？

乙 怎么着？每人给人家拿两块钱吧！（两人取钱给卖花生的后，各站一边。）

卖 这我可发财了！（念）过了一年又一年，今天不比往常年。

甲：（念）全国和平已实现。

乙：（念）巩固和平最、当、先！

（有幕闭幕，无幕同下）

开 渠

人物

韩金山——四、五、六十岁。
韩 妻——四、五、六十岁。
铁 炼——一、二、三十岁，金山子。
潘永年——三、四、五十岁。
韩小红——二、三、四十岁，金山族侄。
兰 母——三、四、五十岁。
小 兰——一、二、三十岁。
李半仙——三、四、五十岁。
王柏轩——三、四、五十岁。
张老满——四、五、六十岁。
民兵甲、乙、丙。
群众若干人。

第 一 场

〔韩金山带妻、子上。〕

韩金山 韩金山上地来长吁短叹，
半月里才盼到一个晴天。
贫穷人产业少根底太浅，

只种了四亩地还在河边。
前几年发大水冲了一半，
害得我三口人少吃无穿。
种庄稼等不得成色饱满，
黄一片割一片且过秋天。

韩 妻 这几天常常是忽雷闪电，
阴得多晴得少地皮不干。
大河水每日里只增不减，
眼看那二亩地也难保全。

韩金山 你看这一湾地连成一片，
大河水绕着它转了个圆圈。
每一次发大水都要冲涮，
冲一次少一次不能增添。
依我说开个渠将河改变，
一大圈河边地都能保全。

韩 妻 这些话你一天要说几遍，
怪不得村里人说你疯癫。
村里人都象你那倒好办，
可惜是一个人一副心肝。
话说得太远了当不了米面，
咱还是去割谷不要迟延。

韩金山
韩 妻 走着说说着走不觉路远，
一霎时来在了咱的地边。

韩金山 叫孩子小铁炼你往后站站，
河边上土松了常往下翻。

地头上插下了我的尖担，

韩金山
韩 妻

束束腰挽挽袖一齐开镰。（割下。）

〔潘永年上。〕

潘永年

潘永年我是个长工雇汉，
一个月只能赚两块工钱。
我东家王柏轩是个混蛋，
使得我潘永年日夜不安。
柿树底种下了菜园一片，
他叫我追白菜来把粪担。
放下桶我只把白菜浇灌，
两棵菜一马勺平均分摊。

〔张老满上。〕

张老满

张老满只累得浑身是汗，
又咳嗽又喘气腿疼腰酸。
叫众位都快来歇歇喘喘，
歇一歇做一阵才觉新鲜。

〔李半仙上。〕

李半仙

李半仙我本来有点懒散，
每日里来的晚歇在头前。

〔众上，韩金山、韩小红随上。〕

群 众

你说歇咱就歇歇歇再干，

张老满

我这里叫老韩又叫老潘。

韩金山

来的晚才割了不大一片，

潘永年

可是我这担粪还没灌完。

李半仙

做多少算多少不要多干，

多歇歇管保能多活几年。

潘永年 你说歇咱就歇谁给他赶，
多干活谁给我多加工钱。

韩小红 不论你叫谁来都不难办，
只是你叫不来我大伯金山。

张老满 我叫来你输些什么物件？

韩小红 叫得来我输你一盒纸烟。

张老满 韩小红你可当真？

韩小红 ——说了就算，
叫不来你也输。

张老满 ——那是自然。
我只把韩金山一声呼唤，
正商议改河道你来谈谈。

韩金山 一听说改河道打动我的心眼，
提起来就不能放在一边。
明知道张老满他把我骗，
骗不骗我总能做个宣传。
我就到柿树下歇歇喘喘，

张老满 （向韩小红）我赢了韩小红一盒纸烟。

韩金山 老满哥你不要挤眉弄眼，
我说这改河道不是闲谈。
上韩村下韩村好地连片，
大河水绕着它转个大圈。
每一次发大水都要冲涮，
冲一次少一次不能增添。
打这里开个渠一条直线，

里把远就开到下村河边。
不只是这河边地不再缩减，
大河湾还能淤它十顷良田。

张老满 依我看净是些糊涂打算，
可惜你还想得不太周全。
对面那两岔沟十里多远，
沟旁边净都是些沙石烂山。
你看那沟口外黄沙一片，
正正地对的是这个河湾。
要不是大河水年年冲散，
咱这里早成了一片沙滩。

潘永年 只要把大河道改成直线，
治一治两岔口不太艰难。
闸梯田栽树木修边垒岸，
管保那烂沙石再不下山。

张老满 这些话也不过说着好玩，
说大话倒容易顶不了现钱。

韩金山 依我说什么事都靠人办，
你不要光打岔不夹成全。

李半仙 韩金山你想得十分危险，
这本是龙戏珠风水有关。
河是龙地是珠千古不变，
改了河两村里不得安然。

韩小红 龙越大珠越小年年改变，
眼看这一条龙把珠戏完。

张老满 我记事这颗珠还在对岸，

三十年就小了这么一圈。

韩金山 张老哥你说得不错一点，
足足有三顷地被水冲淹。
你也是明白人很有远见，
为什么改河道你不成全？

张老满 人活到几十岁就要合眼，
合了眼哪管它千年万年。
真要是办起来净是困难，
一千年也说不通我怎成全！
这里的一溜地多少片段，
还有那王柏轩十亩菜园。
不用说这些户主意千万，
就算能买通了谁管花钱？
上下村又不是南北直线，
这里看下韩村偏在西边。
一开渠把下村开过对岸，
下韩村来种地还得坐船。
这些事谁还能当真去办，
上下村只有你这一个疯癫。

〔众中有人笑。〕

韩金山 张老满太顽固说他不转，
有些人跟着他笑我疯癫。
再找个正经人评评长短，

〔小兰母女蒯菜上。〕

韩金山 见小兰母女们来把菜蒯。
小兰娘咱两家住在一院，

改河道这件事我常向你谈。
你说说这件事可不可办？
也免得大伙儿笑我疯癫。

兰 母 改河道是好事我也称赞，
可惜你一个人势力孤单。
有一日你说得大家情愿，
我母女也愿意帮你成全。
——〔小兰母女同下。

李半仙 韩金山你可算找了个帮办，
找一个帮忙的也不简单。

潘永年 韩金山为大家忠心赤胆，
李半仙这个人全无心肝。
金山哥和他们这样争辩，
只能算白耽搁你的时间。
你看那东北边黑云一片，
只恐怕一霎时还要变天。
连阴天河边地很不保险，
我劝你去割谷不要迟延。

韩金山 谢过了永年弟好言相劝，
有工夫咱们俩好好谈谈。
一个人一条心事情难办，
办不成这件事我心不甘。（下。）

〔王柏轩上。

王柏轩 王柏轩闲无事地里游转，
看一看伙计们哪个偷闲。
左一摇右一摆游到河岸，

忽听得柿树底争吵喧天。
趁热闹我也到那里看看，（到柿树底）
人群里看见了伙计永年。
不想干给老子早些滚蛋，
我不能花上钱雇你来谈天。

潘永年 做一阵谁也得歇歇喘喘，
大家歇我怎能一直动弹。
不想用算了账你我两便，
到哪旦我还怕贴了本钱？

张老满 做一阵歇一歇不算偷懒，
这一会歇好了也该动弹。
王先生莫计较忍让一点，
叫永年去灌菜再莫多言。

〔张老满拉潘永年下，众也下，李半仙留。〕

李半仙 尊一声王先生多日不见，
王柏轩 连阴天闷在家觉得熬煎。
问你们因何事大家争辩？

李半仙 还是那韩金山要改河湾。
王柏轩 也不想他自己是什么眉眼，
东一犁西一耙疯疯癫癫。

李半仙 我说他想这事十分危险，
破坏了龙戏珠风水有关。

王柏轩 李半仙不用怕放个大胆，
看他有啥本领改地换天。

李半仙 正讲话东山上打了个闪电，

王柏轩 一声雷未响罢黑云满天。

李半仙 柿树上巴拉拉落下雨点，

王柏轩 急慌忙往回跑脚步放欢。
李半仙

〔二人急下，韩金山、韩妻、铁炼、张老满、潘永年、韩小红与众先后上。〕

韩金山 又是风又是雨忽然天变，
急得我韩金山肚里冒烟。
二亩谷还没有熟够一半，
黄一片割一片也不让割完。

〔喊声：“河水下来了！”〕

韩金山 忽听得水声响大家呐喊，
转眼间大河里又把水添。

潘永年 快快快请大家行个方便，
帮老韩把谷子搬离河边。

〔潘永年领众与韩金山、韩小红等齐搬谷。〕

韩小红 地边上起波浪水花乱溅，
眼看着这块地要被水淹。

〔众离，韩金山留。〕

韩金山 说话间大河水漫过地堰，
这一水淹得我实在可怜。

张老满 韩金山快出来不要留态，
韩金山 我情愿随水去

潘永年 〔急跳进〕——往外拖牵。
韩小红

〔潘永年、韩小红拖韩金山出。〕

〔韩妻与铁炼也拖住韩金山。〕

韩 妻 铁炼爹可不要寻此短见，
有人在总比那东西值钱。

韩金山 见谷子连根倒漂起水面，
谷地里起波浪滚滚滔天。
霎时间谷不见地也不见，
气得我站不稳跌倒平川。

韩 妻 铁炼爹铁炼爹连声呼唤，
铁 炼 爹呀爹爹呀爹

潘永年 金山哥
红小红 金山叔
张老满 韩金山
众 人 (称呼不一) } 快醒醒把心放宽。

韩金山 昏沉沉如做梦浑身打战，
睁开眼又只见大雨连连。
众乡亲都在我周围立站，
一个个被雨淋湿透衣衫。
众乡亲跟着我受此磨难，
真叫我韩金山心里不安。

众 人 一村人不客气谁不遇难，
你正在气头上不耐风寒。
我送你回家去把衣裳换换，
只要你好好的大家都喜欢。

〔同下。〕

第二场

〔李半仙上。〕

李半仙 李半仙我本来是个懒汉，
谈八卦论阴阳不想动弹。
王柏轩他见我聪明能干，
没有事常叫我跟他闲谈。
有时候也吃他一碗剩饭，
有时候穿他件破旧衣衫。
今日里闲无事他家串串，
到门口自进去不用相传。 （进门，下。）

〔韩金山、张老满同上。〕

韩金山 种几亩河边地被水冲涮，
我一家三口人没个靠山。
两岔口北山上荒坡一片，
王柏轩说是他王家祖传。
凭他说是他的没个证见，
村里人不服气也不敢多言。
托老满到他家求个情面，
我就到两岔口前去开山。
我是个贫穷人怕他不见，
老满哥请替我先把话传。

张老满 张老满在门外一声呐喊，
王先生在不在有事相烦。

〔王柏轩、李半仙同上。〕

李半仙 王先生你请坐我给你看看，（出看）
原来是你二位我来相传。（人禀）
来的是两个人金山、老满。

王柏轩 叫他们进来吧！

李半仙 （出）——请到里边。

王柏轩 问你们有甚事前来找俺？

张老满 韩金山想求你救他的饥寒。

王柏轩 或借粮或借钱由他自选，
我这里利不大公道取钱。
要借钱三分利半年期限，
要借粮本利对春借秋还。

张老满 不借粮不借钱只借地面，
想借你两岔口那座荒山。

王柏轩 我正愁那座山无人照管，
早就想租出去花个零钱。

张老满 未开地先要租谁管赔垫，
自古是开荒地白种三年。

韩金山 种三年那还是现成地面，
这座山自古就没有人烟。

王柏轩 没有人哪来那土窑几眼，
在古来自然是一处庄田。

张老满 是庄田为什么没个地段？

王柏轩 想必是年代久洪水冲淹。

张老满 既如此就请你行个方便，
只等他修成地再把租担。

王柏轩 我是个痛快人不遮不掩，

总得把难听话说到头前。
既要开那就得有个期限，
说三年就三年再莫迟延。
三年后把熟地丈量一遍，
每亩地一石租租种一年。
多一亩加一石随开随算，
哪一年不开了再不增添。

张老满 王先生提出来他的条件，
问金山愿不愿照样承担？

韩金山 还请你王先生往下减减，
打不够那么多不敢包圆。

李半仙 一亩地要收到三石四石，
一石租也不过十之二三。

张老满 依我看出一石也有困难，
山野地怎能比咱那河湾。

王柏轩 说一石我原是看你的情面，
旁人来我就要一石二三。
就这样成就成不成就散，
我只当没有那一座荒山。

张老满 王柏轩合了口不往下减，
这件事成不成全看你金山。

韩金山 王柏轩合了口不往下减，
这件事倒叫我左右为难。
两岔口地好坏没法判断，
村里人谁也没有种过一天，
答应下打不够谁管赔垫，

不答应没地种两手空闲。
恨只恨村里人不听我劝，
不愿意改河道修坝淤滩。
要不然十来顷好地出现，
何用到两岔口前去开山，
这样好一件事不能如愿。

张老满 韩金山你为何两眼朝天？
你快说这件事办也不办？

韩金山 什么事？对对对！我想再谈。
我不免开了它试试再看，
打不够我也能只种三年。
行行行说一石咱就一石！

王柏轩 你也是痛快人我很喜欢，
谁给咱写租约？

李半仙 ——由我承揽！（磨墨）
我也是写不好你们包涵。（写）

“韩金山无地种情愿租佃，
承租到王柏轩一座荒山，
座落在两岔口河沟北岸，
开了地头三年不把租担。
三年后每亩地年租一石，
开多少算多少清丈清盘，
多一亩加一石随开随算，
哪一年不开了再不增添。
出租人承租人两家情愿，
口为空笔为证各无异言。”

末一行“年月日”写在上面，
下面写“承租人韩氏金山”。
翻过来写中人“张氏老满”，
“书字人李半仙”也把名签。
递与了王先生你先看看，
通不通妥不妥指教一番。

〔王柏轩接租约。〕

王柏轩 把租约接在手细看一遍，
果算个聪明人写得周全。（仍给李半仙。）

李半仙 叫金山与老满你们看看，

〔韩金山接过与张老满同看。〕

韩金山 看不看反正是该我挨鞭，
在名下画十字递给老满。（画了字给张老满。）

张老满 张老满翻过来也把字签。

〔张老满画字，给韩金山，韩金山又给王柏轩。〕

韩金山 亲手儿给租约接受条件。

王柏轩 这我可发财了。

张老满 一一不必过谦。

王柏轩 事成了在我家吃顿便饭？

张老满 我们都吃过了有偏有偏。
韩金山

辞别过王先生日后再见。

李半仙 我这里替主人送到门边。

〔张老满、韩金山同下，李半仙返上。〕

李半仙 王先生这件事办得合算。

王柏轩 也多亏你替我婉转周旋。
李半仙 韩金山这一次上当不浅。
王柏轩
李半仙 想不到咱今天捉了他个老鸨。（同下。）

第三场

〔韩妻领铁炼上。〕

韩 妻 两岔口那荒坡早已租好，
山腰里也还有几眼土窑。
铁炼爹安好了门窗炉灶，
今日里咱就要搬上山腰。

〔小兰母女上。〕

兰 母 我与那老韩家合得很好，
他今日要搬家我去瞧瞧。

小 兰 一窝猫叫旁人都捉完了，
我给那铁炼哥留下个狸猫。

兰 母 进门来叫了声韩家大嫂，

小 兰 铁炼哥铁炼哥举手相招。

韩 妻 小兰娘请坐下不巧不巧，
铁炼爹把板凳送上山腰。

兰 母 坐不坐在一块站站也好，
这一去还不知何日相交。

小 兰 （向铁炼）给你这小猫儿不要叫跑了，

铁 炼 接过来我就用衣裳来包。

那一只小花猫哪里去了？

小 兰 我大姑捉去了留下个狸猫。
你以后来不亲——

铁 炼 ——我不知道。

小 兰 到那里谁跟你玩耍枪刀？

韩 妻 （抚小兰）你的娘她把你送给我了，
眼大娘到山里去把地刨。

兰 母 真要是送给你你还不要，

韩 妻 只是你舍不得你试试瞧瞧。
〔韩金山推小车上，放下。
〔村里送行人众上。

韩金山 铁炼娘出来吧车已装好，

韩 妻 小兰娘你在吧。

兰 母 ——送你一遭。
〔里外会合

潘永年 我送你一段（推车）
韩小红 （挽车）

韩金山 （抢车）——不要不要，
〔潘永年、韩小红不让。

韩金山 这这这又要把你们烦劳。
〔同下又同上。

韩金山 乡亲们回去吧！

众 人 ——不送送了。闲暇了跟孩子回来跑跑。
〔除韩家三人和小兰母女与潘永年、
韩小红外，其余人都下。

第四场

〔七人绕场。〕

韩金山 出了村走上了车马大道，
辞别了生身地亲朋故交。

兰 母 到那里盼你们越过越好，

韩 妻 只求个过得去哪敢攀高。

小 兰 山里边有什么告我知道，

铁 炼 我自己来不了谁把信捎？

潘永年 有了事你要把我们来找，

韩小红 只要是能帮忙不辞勤劳。

韩金山 在村里连累得你们不少，

有了事我自然还得相邀。

韩 妻 你娘们请回去河边已到，

兰 母 好好好不远送日后再交。

〔同停下。〕

韩金山 交给我你二位不要送了，

〔韩金山夫妇去接车。〕

潘永年 慢慢慢慢我给你送过板桥。

韩小红

〔小兰母女停，不走。〕

小 兰 到桥上你可把小猫捉好，

铁 炼 我包得严严地它往哪跑。

〔潘永年、韩小红、韩妻、铁炼、韩金山均停。〕

〔小兰母女停在左，潘永年等停在右，韩金山在正中，过桥时在后，这时表示在桥上。〕

韩金山 在桥上远望着大河一道，
左一湾右一拐滚滚滔滔。
大河水害得我吃苦不少，
恨不得展一展你的弯腰。

韩 妻 铁炼爹快来吧天气不早，
韩金山 也不过五里路太阳还高。（作下桥状）
我这里接车把

韩 妻 ——我接绳套。

潘永年 再送送。
韩小红

韩 妻 ——谢谢吧不敢再劳。
〔分头下。〕

第五场

〔韩金山、韩妻、铁炼上。〕

韩 妻 过河来走进了山沟小道，
韩金山 软黄沙夹石头忽低忽高。
走一步退半步一歪一倒，
韩 妻 左一颠右一簸摆摆摇摇。
往前走转上了山坡小道，
韩金山 累得我张着嘴曲背弓腰。
小铁炼帮你娘拉住绳套，

韩 妻 不顶事你还是顾你的小猫。
却怎样忽然间走不动了？

韩金山 这一个石圪节有点太高。
放下车我用那镢头撬撬，
左一镢右一镢撬了个壕壕。
铁炼娘你还是拉起绳套，
推上了这一段就到山腰。
左一弯右一转已经来到，
到这里咱就住这座土窑。
来在了窑门外将车落了，

铁 炼 我先到窑里边喂我的小猫。（下。）

韩 妻 窑门外停了车放下绳套，
伸伸腰喘喘气仔细观瞧。
抬起头只见那山高树小，
往下看又觉着人在山腰。
望远方只见那荆棘满道，
窑门口净是些烂草蓬蒿。
红日落西风起豺狼嚎叫，
崖头上落下了几只老雕。
山坡上灰溜溜一片烂草，
草后边黑洞洞几眼破窑。
看到此不由我伤心泪掉，
这一个鬼地方实在糟糕。

韩金山 铁炼娘你不要心中烦躁，
这是个好地方难拣难挑。
到山头你能把娘家望了，

山腰里地势高屋里不潮。
有棘针到秋天能吃酸枣，
长下了荆蓬拢不缺荆条。
有烂草咱把它沤成肥料，
干蓬蒿刨起来能当柴烧。
到夜里关住门不怕狼叫，
吓麻雀灭野兔全凭老雕。
到明年开了坡不长野草，
攒一点柴和草放在破窑。
哪一个好地方都由人造，
你跟我韩金山改变山腰。
这片坡修边堰能淤平了，
这凹里修梯田步步登高。
这一边栽下了柿子梨枣，
这一边再栽些苹果核桃。
岭头上栽松柏能长木料，
沟岸上栽上些桑树柳条。
几年后这些事都办成了，
谁不说咱俩人本领真高。
纵有人打发来八抬大轿，
不论你不论我不下山腰！
铁炼爹说的我哭了又笑，
想的到说的对有理有条。
咱一家既来了就不走了，
带着咱小铁炼改变山腰。
铁炼娘参透了我的奥妙，

韩 妻

韩金山

情愿意帮我做心不动摇。
讲话间天黑了该把饭造，
我给你搂柴火你把火烧。

〔同下。〕

第六场

〔潘永年、韩小红同上。〕

（七字调）

潘永年
韩小红

坚持抗战整八年，

最后胜利在眼前。

潘永年

县城外打着一场包围战，

八路军围了一大圈，

已经围了两天半，

不知道还得打几天，

打发民兵去打探，

这般时候未回还。

咱俩人到在村边看，

等候着民兵把信传。

韩小红

韩小红领路往前赶，

潘永年

随后跟着我潘永年。

来到村边不多远，

〔民兵丙上。〕

民兵丙

报告队长指导员，

昨天我到联络站，

县主任叫我把信传。（递信给潘永年。）

潘永年 （拆信）拆开封皮仔细看，

“上韩村队长指导员，
包围战打了两天半，
解决战斗在今天，
倘然是残余敌人往外窜，
可能窜到你们那边。
要你们大家作防范，
先把群众送上山，
民兵埋伏在大河岸，
配合大军把敌歼。”
既然是情况有改变，
打钟集合莫迟延。

〔钟声响，众上，张老满及小兰母女也在内。〕

小 兰 正在家里装炒面，
忽听得钟声响连天，

张老满 想是情况有改变，
问一问队长指导员。

潘永年 包围战打了两天半，
解决战斗在今天。
倘若是残余敌人往外窜，
可能窜到咱们这一边，
要你们大家作个防范，
退过了河西往后山。

〔除民兵外，众下。〕

韩小红 民兵同志们往前站，
注意听我把令传。
随我们去到大河岸，
准备着配合大军把敌歼。
〔同下。〕

第七场

〔韩妻与兰母上。〕
(七字调)

韩 妻 最后胜利在眼前，
兰 母 小兰娘同我上了山，
韩 妻 韩大嫂
兰 母 每逢是敌人来扰乱，
都要来你家住几天。
两家吃的是一锅饭，
谈谈笑笑很新鲜。
你一家三口都很能干，
硬把荒山变成良田，
自从前年大清算，
你可算揭了石板见了天。
韩 妻 前年冬天大清算，
在你家住了好几天。
两家吃的是一锅饭，
谈谈笑笑很新鲜。

你母女两个都很能干，
一个主任，一个队员。
讲起话来有板眼，
帮我们斗倒王柏轩。

兰 母 谈谈笑笑不觉路远，
韩 妻 为嫂的送你到后山。

〔同下。〕

〔铁炼、小兰同上。〕

（打酸枣调）

铁 炼 三月里桃花树树鲜，
小 兰 小兰妹同我上了山，
铁 炼 铁炼哥

铁 炼 出离家门不多远，
见我的狸猫在草上眠。

小 兰 猫儿猫儿你可认得俺？
咱们分手在十年前。

铁 炼 猫活十年精神懒，
人长到二十正青年。

小 兰 猫来了和你常作伴，
不知道人来你嫌不嫌？

铁 炼 猫儿来了当作伙伴，
要是人来我当神仙。

小 兰 哥哥说话很随便，
不知道你的主意坚不坚？

铁 炼 山可移来水可转，
这个主意不变迁。

小 兰 多谢哥哥答应了俺，

铁 炼 急忙上前把手牵。

小 兰 猫儿猫儿咱们再见！

铁 炼 我送妹妹你到后山。

〔同下。〕

〔二民兵押李半仙、王柏轩同上。〕

（七字调）

民兵甲 一条山道曲弯弯，
民兵乙

送他们二人上了山。

民兵甲 这座荒山无人管，
王柏轩说是他的祖传。

十年以前把人骗，
租给了人家韩金山。

前年冬天大清算，
退了人家好多钱。

民兵乙 李半仙本来是个懒汉，
假眉三道装神仙。

常跟着柏轩把人骗，
弄人家几个糊涂钱。

前年冬天大清算，
说他是狗腿装神仙。

民兵甲 打起仗来不好看管，
民兵乙

押他们二人到后山。

——〔同下，张老满上。〕

张老满 掉在后边走得慢，
张老满独自上了山。
上得坡来转过了迤，
看见了老韩的好庄田。
新打窑洞有两眼，
窗棂门户更新鲜。
有一眼挂着模范匾，
本县县长把名签。
大块地做得平展展，
小小山凹阡成梯田。
红一片来白一片，
桃李花开树树鲜。
下边有桑树柳条沿着沟岸，
岭头上的松柏护得严。
老韩的本领不敢小看，
两岔口变成花果山。
左一弯来右一转，
〔韩金山上。

韩金山 树林里走出我韩金山。

老满哥多日不相见，

张老满 又来给你们添麻烦。

韩金山 互相帮助为抗战，
大家来了我很喜欢。

张老满 金山金山你真能干，
两岔口变成了花果山。

韩金山 事情都是由人办，

有了人力就是本钱。
前几年地做好了也不算，
一半要交给王柏轩。
自从前年大清算，
我才算揭了石板把身翻。

张老满 十年前你说大河能改变，
我还说你是疯癫。
大家都像你这样干，
一定能展直那道湾。

韩金山 提起河湾我常挂念，
这几年又把谁的地淹？

张老满 年年冲，年年淤，
每年里还是要减一大圈。
现如今我也常想把它变，
可不知究竟难不难？

韩金山 能打得日军难立站，
又能管教王柏轩。
只要大家都情愿，
何愁不能变河湾。

张老满 可惜你如今不再管，

韩金山 只要开渠我还下山。

张老满 说说道道来的远，

韩金山 我送你老哥到后山。

〔同下。〕

〔民兵丙上，提着广播筒。〕

民兵丙 今天上午一场战，

把敌人消灭在城里边。
县联会来把通知散，
到明天庆祝胜利到城关。
指导员叫我到山里转，
集合群众齐下山。
我这里只往山头站，
对住号筒把话传。

（在下场锣鼓声中喊）

“都快回来吧，把敌人消灭了！”（下。）

第八场

〔潘永年上。〕

潘永年 农业社高级化规模甚大，
地归社连成片四通八达。
大农具与牲口入社作价，
集体有集体用互不拖拉。
两韩村并一社不分上下，
社外边剩几户都住山洼。
支部里给小兰把任务分下，
叫她劝她公爹报名参加。
已等了两三日不见回话，
我来到他庄上作个调查。（听见狗叫）
山庄上狗厉害我有点害怕，
庄门外没石头我假意一抓。

〔潘永年作抓石状吓狗，小兰抱子上。〕

小 兰 猛听得狗儿叫不知为啥，
原来是老支书来到我家。
永年叔请进来快请坐下，
是不是来把我的工作检查。

潘永年 你说得怎么样？

小 兰 ——还不算话！

潘永年 他们都往哪里去？

小 兰 ——垒岸堵沙。

潘永年 你公公可愿意？

小 兰 ——半真半假。

潘永年 你婆婆？

小 兰 ——她还是不愿参加。

潘永年 不愿意为什么？

小 兰 ——产业太大。

果木树成了钱现卖现花。

潘永年 你何不告她说树木作价。

小 兰 讲过了她还是哼哼哈哈。

俺婆婆愿听俺公公讲话，

除非是俺公公自己说她。

潘永年 能不能请他们回来说话？

小 兰 行行行就在这附近山凹。

出门来叫爹妈回家来吧，

永年叔找你们来到咱家。

〔韩金山、韩妻、铁炼同上。〕

韩金山 潘永年又来说入社之话，

韩 妻 这辈子再不想离开这山凹。

铁 炼 咱不如入了社回村去吧，
 韩金山 我自己没主意你问你妈。
 韩金山
 韩 妻 永年弟 }
 铁 炼 永年叔 } 你来了 }
 潘永年 你们都回来了 } 一同坐下！
 韩金山 你老弟没有事不到山凹。
 潘永年 我还是来谈那人社之话，
 韩金山 我愿意铁炼娘还有个疙瘩。
 韩 妻 不是我太顽固不好说话，
 你不知这山地是怎样开法：
 那一片荒山坡啥不是啥，
 几镢头刨一个白草疙瘩。
 在山顶放石头把边堰修下，
 到后来做得它平不踏踏。
 小山洼净是些沟沟岔岔，
 两岸上有点土下面是黄沙。
 闹成了小梯田能犁能耙，
 一亩地也能打两石七八。
 担着水栽树木直上直下，
 从岭上直栽到沟底山洼。
 木料树只长得又粗又大，
 果木树一棵棵结果开花。
 这一切是我们亲手造下，
 要叫我丢开了我想不通达。
 潘永年 韩大嫂你不知现在变化，

这许多好经验正要用它，
农业社高级化规模甚大，
地归社连成片四通八达。
两韩村并一社不分上下，
社外边只剩你们山里几家。
请你们入了社统一规划，
这山区派个队前来管它。
集体有集体管力量变大，
有事来没事走不用安家。
河湾里马上要开渠修坝，
都想请金山哥回去参加。

韩金山 一听说开河渠我劲头甚大，
我马上就入社答复大家。

韩 妻 铁炼爹为什么马上变卦？

韩金山 我本来就愿意是你把我拉。

韩 妻 你说过八抬轿也抬你不下，

韩金山 二十年老旧话何必提它。

韩 妻 开水渠改河道也是旧话，

韩金山 话跟话不一样价值有差。

八抬轿比不上统一规划，

我一定去给那河水搬家。

韩 妻 你想去你下山咱是不下，

韩金山 （背）说不通我还得好话多加。（转慢）

铁炼娘你不要净说耍话，

这件事你为什么想不通达。

在这里搞生产力量太差，

二十年才修个小小山洼。
在从前我有个开渠计划，
没条件做不到想想白搭。
一个人一条心很难说话，
一块地一个主概不由咱。
现有了高级社条件变化，
几百户成一心地不分家。
男劳力女劳力两千上下，
要改山要变水手到擒拿。
这时候正该咱干它两下，
咱怎肯当一个社外人家。
就算咱修了点沟沟岔岔，
这地方究竟是野岭荒洼。
每日里只能和石头说话，
一出门三五里没有个邻家。
短个针少条线也没处配打，
小孙孙要上学谁管教他？
前几年几块地把人牵挂，
这一回交了社咱回村安家。
村里有供销社要啥有啥，
小学校能教咱的孙儿娃娃。
上地去常常是大队人马，
开晚会闹红火嘻嘻哈哈。
你还能到民校学个文化，
争取个老模范谁人不夸。
何必要守着这点沟沟岔岔，

每日里见几只野雀老鸦。
韩 妻 铁炼爹这个人真会讲话，
说到人心眼上就得听他。
你既说那样好就听上你吧，
八抬轿还不如你这张嘴巴。
小 兰 看起来还怨咱不会讲话，
铁 炼 咱的娘不是那顽固疙瘩。
潘永年 村里人欢迎你们早把山下，
韩金山 咱一家人了社准备搬家。
韩 妻
铁 炼
小 兰

〔韩金山全家送潘永年先下，然后同下。〕

第九场

〔铁炼、小兰——抱子、韩妻、韩金山依次上。〕

韩金山
韩 妻 一轮红日当头照，
铁 炼
小 兰
全家大小离山腰。
韩金山 共产党领导好，
世道变得步步高。
二十年来旧山道，

搬家这是第二遭。
进山来为的是逢了绝道，
出山去为的是赶上高潮。
离了山沟上大道，
看见了面前河一条。
大河大河久别了，
咱老韩准备与你再相交。

韩 妻 一家大小离山道，
叫声孙儿小宝宝，
出山来真比进山好，
进山去可惜你没有赶上瞧。
奶奶在前边拉着绳套，
你爷爷推着小车弓着腰。
那时候你爹还太小，
也不过长了（手齐胸比）这么高。
你是个有福人儿生的巧，
哪管他从前苦难熬。

小 兰 （抚子）懂呀不懂你发傻笑，
那时候妈妈也才那么高。
妈妈跟着你姥姥，
来送他三人上板桥。
那时候妈和你爹玩得好，
还送了你爹一只小猫。

铁 炼 记不记猫儿卧青草，
我正送你上山腰。
到后来送猫的人儿也来了，

岂止送了一只小猫……

韩金山 一家人路上闲谈笑，
忽听得村里把钟敲。
水渠早已开工了，
午饭后上工人们涌如潮。

〔潘永年、韩小红、铁炼、众穿过场。要是
在其它剧种演，穿场可移在下场。〕

韩金山 人马挤满河湾道，
不由我金山喜眉梢。
共产党，领导好，
要给你这大河展展腰。
休笑我老汉年纪老，
上了工等我做给你瞧。
叫铁炼赶牛前开道，
催动了牛车过板桥。

〔同下。〕

第十场

〔潘永年、韩小红二人倒上。〕

（钉缸调）

潘永年 合作化规模大改变，
韩小红 要改水来要移山。
潘永年 要给大河把腰展，
韩小红 动员劳力过两千。
潘永年 潘永年支书来到河岸，

韩小红 韩小红社长跟在后边。
潘永年 咱们全都看一看，
韩小红 看一看工程还得几天。（倒下。）
〔韩妻与兰母及四女众上。〕
兰 母 妇女大队平渠岸，
又拿镢头又拿锹，
韩 妻 两千人连成一大串，
这个事儿甚新鲜。
兰 母 叫你参加你不愿，
舍不得山凹里几亩田，
韩 妻 早知道这里这样干，
〔潘永年、韩小红穿场。〕
韩 妻 不等动员我早下山。
〔铁炼、小兰及四青年上。〕
〔兰母、韩妻等下。〕
小 兰 妇女大队平了渠岸，
铁 炼 捣岸工作有青年。
青年甲 你夫妻年龄过了限，
青年乙 为什么到我们队里边？
小 兰 做重活我俩有锻炼，
铁 炼 跟着我爹开过山。
小 兰 出山来心情大改变，
〔潘永年、韩小红穿场。〕
铁 炼 至少年轻了十几年。
〔李半仙、王柏轩及二老人上。〕
〔铁炼、小兰等下。〕

王柏轩 自从那年大清算，
李半仙 改了地来换了天。
王柏轩 再也没有便宜占，
李半仙 劳动生产十来年。
王柏轩 大家说我们有转变，
李半仙 批准了人社当社员。
王柏轩 队里派我们把车赶，
李半仙 又拉石头又拉砖。

〔王柏轩、李半仙二人先下。〕

老人甲 二十年前亲眼见，
这两个人物不简单，
如今看来有转变，
可不知还有什么鬼算盘？

老人乙 他们有没有鬼打算，
谁也不能往他肚里钻。
看人只能看表现，

〔潘永年、韩小红穿场。〕

老人乙 看了一天说一天。
〔韩金山及群众四人上。〕

〔二老人下。〕

韩金山 韩金山我把石头转，
河里修坝把水拦。

群众甲 老年人该去把车赶，
群众乙

群众丙 为什么到我们队里边？
群众丁

韩金山 不要笑我是个老汉，
至少还抵一个青年。
要不信翻翻手儿看，
看你们哪个吃价钱。

群众甲 抓住虎口猛一按，
〔群众甲被韩金山翻过，反攻三次无
效。余众下。〕

群众甲 好像一把老虎钳。

韩金山 二十年来有锻炼，
哪天不把石头搬。
到社里我还要加劲干，
〔潘永年、韩小红入场。〕

韩金山 争取当个共产党员。
〔张老满上，韩金山等下。〕

张老满 张老满我是个老保管，
今年的年纪六十三。
做起重活来直发喘，
担任了个工作很新鲜。
绳子断了把麦穗挽，
筐子破了缠一缠边。
修修补补不要小看，
〔潘永年、韩小红入场。〕

张老满 千零合总都是钱。
〔潘永年、韩小红上，张老满下。〕

潘永年 男女老少精神满，
韩小红 又省时间又省钱。

潘永年 工程做了一大半，
韩小红 离完工不用二十天。

〔同下。〕

第十一场

〔开幕时，众在场。〕

〔小兰上。〕

小 兰 修成渠举行个庆祝大典，
筹备会把司仪委给我小兰。
上台来我就在台前立站，
向大家把程序宣读一番。
先宣布开了会不要散漫，
再选举主席团主持讲坛。
各系统负责人做些讲演，
模范们作一些重点发言。
党支书在最后指点指点，
讲罢话发过奖就到河边。
到河边就开闸先把彩剪，
好让这大河水一直正南。
这程序怎么样？

众 人 ——没有意见。

小 兰 再来念主席团候选名单。
头一位是社长领导生产，
再一位是乡长代表政权；
党支书代表党作个指点，

团支书来代表青年团员；
我公公韩金山是特等模范，
我的母也出席代表妇联；
张老满老大伯是模范保管，
一共是七个人，

众 人 ——十分周全。（举手。）

小 兰 通过了请上台

主席团 ——请在前面，（互让先走。）

请乡长你主席

主 席 ——好，谁先发言？

韩小红 韩小红打头炮忙往前站，
先祝贺这工程胜利成全。
农业社高级化力量发展，
这工程才修了四十余天。
亏政府帮助着测量计算，
党团员带头干事事在先。
全社人一股劲忠心赤胆，
四十天如一日热火朝天。
工作中有不少英雄模范，
能持久能突击又能钻研。
大事情靠大家才能兴办，
人多了咱就能改造自然。
望大家常这样精神饱满，
到明年再改造那十里荒山。

主 席 哪一位再讲话？

团支书 ——我讲一点，

这工程考验了我们青年。
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模范，
也还有个别人比较一般。
愿大家看一看小兰、铁炼，
他们都三十岁不算青年。
在我们队里边也是模范，
愿大家学他们积极争先。

主 席 团支书讲罢了谁还讲演？

兰 母 我也来讲几句代表妇联。
这工作对妇女也是考验，
工作中常与那男子争先。
妇女们要占到人口一半，
要发扬这精神不再偷闲。

众 人 这一回该请咱特等模范，
韩金山 在台上站起我老汉金山。

（转慢板）

韩金山离了座台前立站，
向众位提一提二十年前：
那时候的老人们一个不见，
新起来的青年们我认他不全。
这柿树比以前高了一半，
这湾地比以前小了一圈，
那时候我就有个开渠打算，
就在这柿树底做过宣传。
有些人知道我是忠心赤胆，
有些人又说我是个疯癫。

细思想那时候哪有条件，
一个人一条心各不相干。
这溜地又都是一家一片，
还有那王柏轩十亩菜园。
有钱人大部分不把活干，
贫穷人又都是少吃无穿。
开了渠下韩村就落在西岸，
不论有多少利与上村无关。
这都是那时候的实际困难，
也难怪有些人笑我疯癫。
就那天我的地被水冲涮，
我就到西岔口前去开山。
交租米要去我粮食的一半，
四三年大清算才把身翻。
农业社高级化又一大变，
人连心地连片互相有关。
一家家早已是有衣有饭，
两韩村并一社上下相连。
这一切都成了开渠的条件，
一听说要开渠我即刻下山。
我虽有六十岁身体还强健，
上了工卖老力我还抵个青年。
半夜里睡不着我也来看看，
睡不到太天明我就来上班。
社里边评了我个特等模范，
党支部通过我做个党员。

看起来我老韩幸福不浅，
那时候想不到还有今天。
三十年想的事总算实现，
看一看改河道我也心甘。

（以下转七字调）

众 人 这样的老汉真少见，
真是一个老青年。

主 席 还有谁讲？

张老满 ——我老满，
我有点感想谈一谈：
我自己从前没有远见，
还说人家金山是个疯癫。
有一次胡开玩笑把他骗，
还赢过社长一盒纸烟。
不料想现在有了条件，
一条渠才开了四十天。
咱是个中农俭省惯，
大小东西都看得成钱。
社里委我当保管，
修修补补成了自然。
开渠的活儿不能干，
接个绳头缠个筐边。
千零合总不敢细算，
倒也省了几个钱，
这一点小功也算模范，
我觉着有点不敢担。

世道变得很美满，
活一天我就要干一天。

众 人 节约的功劳人人见，
大家拥护不必过谦。

潘永年 大家讲得很全面，
我有点补充很简单。
社会主义已实现，
不过也才沾了个边。
地连成片人连心，
刚把剥削消灭完。
奉劝大家不要自满，
不要叫光明大道再绕弯！
照计划进行十年满，
生产还要翻几番。
请看金山老模范，
又治水来又治山。
只要大家劲不散，
两千劳力就是本钱。

主 席 现在就把奖品散，
各把红花戴胸前。

〔音乐起，每人一朵红花。〕
〔上下台都用舞蹈动作。〕

小 兰 离开会场到河岸，
主席团 （七人合）
绿水聚满大河湾。
就此开闸把彩剪，

〔剪红彩，群众数人作开闸状。

（大鼓长皮转紧板）

主席团 河水冲出大闸边。

千道寒光万条箭，

一霎时波浪上下翻。

再不用多绕十里远，

一条直线奔正南。

再不怕冲再不怕潮，

再不怕你把庄稼淹。

合 唱 千年的河湾今日变，（众将韩金山、韩小红、潘

永年三人抬起）

这就叫人力胜过天。

——剧终

（作于一九五六年）

十里店。

(上党梆子)

人物总表

高志新	十里店大队副大队长。	(简称高)
马红英	模范共青团员，王家骏的爱人。	(简称英)
王得胜	十里店团支书，家骏的本家哥哥。	(简称胜)
王东方	贫农。	(简称东)
东方母	东方的母亲。	(简称母)
李大正	生产队队长，外号“枣核钉”。	(简称正)
王家骏	共青团员，高中毕业生。	(简称骏)
农 妇	邻居妇女。	(简称妇)
人民警察		(简称警)
王 瑞	十里店党支书，家骏父。	(简称瑞)
王瑞妻	家骏母。	(简称瑞妻)
李 旺	爱投机、会赶车，也是社员。	(简称旺)
刘宏建	十里店大队大队长。	(简称建)
李玉屏	十里店妇联主任，刘宏建儿媳。	(简称屏)
李天泰	旧商人，李玉屏的父亲。	(简称李)
胡宗文	地主管家，李天泰的姐夫。	(简称胡)
陈焕彩	旧包工头。	(简称陈)
群 众	男甲、乙、丙。女甲、乙、丙、丁。	

男女商人各一人。

第一场 寻 根

时 一九六三年七月中旬一个早晨。

地 十里店某生产队队员李旺家大门外——以幕布代景，惟台中置一磨（以布盖一桌子代磨盘，上置假磨），作用是有时坐一下。

人 （以出场先后为序）

王东方（贫农，某生产队队员）

群众甲（贫农，同上）

乙（爱小利者，也是队员）

丙（贫农，同甲，但较年轻）

李大正（某生产队队长，外号“枣核钉”）

李 旺（爱投机，会赶车，也是队员）

刘宏建（大队长）

高志新（副大队长）

（作一个旋律象浪头，但带锣鼓的打击乐曲，于演奏中开幕，王东方、群众甲、乙、丙、李大正扛锄头依次上，绕

* 这个剧本，写于一九六四年，当时曾经有过争论。这年夏天，山西省举行新剧汇报演出，晋东南上党梆子剧团排练了这个剧，但只进行了内部演出，没有公演。一九六五年夏天，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晋祠举办读书会，把这个戏也调去演了一次。赵树理生前，对这个剧本，作过四次修改。我们根据的，是最后的修改稿，与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发表的，有很大的不同：场次增加了，第一、二、三场有大量的修改删补。

场，打击乐曲奏完，接流水过门。)

正 (唱) 过了小暑到大暑，(绕场停，但接着唱)
头伏完了入二伏，
谷子快要把穗吐，
没有劳力接(即最后培土)不出。(切)

〔均转立于台左侧，面向右后方。〕

丙 (向右喊) 李旺！(内不应) 李旺！快走，快走！
(内仍不应) 还没有起来吗？
(东方等窃笑)

旺 (内应) 哪儿来的这个“二队长”？(披衣出，打呵欠，
忽发现李大正。)

正 (怒视之) 不该叫你是不是？快回去拿锄！

旺 报告队长：我不去锄地了！大队长调我到木工厂，赶车去哩！

正 大家都去搞副业，咱们队里的地还种不种了？

旺 那个我管不着，叫我去赶车是他给我下的命令！

正 下命令先得下到我这里，他不能隔着桌子抓菜！

旺 这不就给你把话传过来了吗？

正 他要你来命令我呀？

旺 他是大队长，你是生产队长，你说我该听谁的话哩？

正 按章程办事！大队已经调过咱们队里四个人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调人要通过什么手续！就是真能再放你走，总也得经过咱队里管委会的同意吧？

旺 那不过是走个过场！哪一回你也不同意，结果不是哪一回都放了吗？

正 管委会要只能走过场的话，这个管委会早该解散了！就算

是走过场，也得先过你一回才能放！现在你还是得锄地去！

〔刘宏建上。〕

建 李旺，你怎么还不去套车？

〔大家闻声均看宏。〕

旺 大队长来了，马上就去！（向正）这是大队长的命令！

（拔脚就走）

正 （拖旺到另一侧，拦住）回来！（怒视宏，但不与交谈仍向旺）等他把你调到大队以后再命令你吧！现在我这生产队长先命令你去锄地！

〔众背宏视正，除乙外，均作赞叹状。〕

建 李大正，你是不是诚心和我顶牛？

正 牛顶到我头上了，我不顶行吗？

建 （大声）这是什么话？（声音又放平）同志们在一块惯了，遇了事自然不一定都要摆出个上下级关系来，可总也得有个平常规矩吧？

正 规矩都定在公社组织章程上（或说《在六十条》上），你就没有查一查该怎么调人吗？

建 （一怔，但稍一迟缓，就又找到了洋理）这是技术人材么！咱们要合理使用人材，大材小用是不合适的。

正 我们生产队的车就不要技术人材来赶吗？

建 你不是又培养了一个新把式吗？

正 技术是人学的，劳力可不是泥捏的！

建 劳力以后再说吧！现在任务紧急，先让李旺套车去！

正 不行！副业任务紧急，农业任务也不太消闲！地荒着哩！

建 李大正！你还服从不服从领导？

正 副业有领导，农业上也还有个领导！（向东）东方！替我去请一下高队长！

〔王东方下。〕

建 我不光是领导副业的！我是正队长，是领导全面的！找谁来也得统一安排。

正 统一安排，你怎么看着叫把地荒了？

建 你们的农业领导人哩？哄！叫他领导副业，副业不赚钱，叫他领导农业，农业荒了地！

正 照你这样无限制地调用劳力，谁来领导农业也得荒了地！

建 技术人材不能不调，荒了地我也负责！咱们这里是供应区，哪一年拨给你们的供应不足？粮食产多少算多少，缺多少给你们拨多少！用不着你多操心！

正 把地种荒了，去吃国家的供应粮，你不嫌丢人，我们可不愿意跟上你去败兴！

建 （又大发雷霆）少说废话！这个人你放不放？

正 （也大声）不放！

建 道理给你讲清楚了（正低声插话：讲糊涂了！）一切责任都有我负（正又插：先得把生产队解散了），不论你放不放（正又插：不放！），人得跟我走！

正 走不了！

建 （拉李旺左臂）跟我来！

正 （急拉李旺右臂）慢着！（向建）拼力气哩是不是？要拼力气呀，我们队里那头大黑骡那么佻皮，我也能拖得他转几圈！（右腿退一步，摆开拖的架式）拉吧！咱们就比比气力！

旺 （两臂被拖着，焦急地）慢慢慢！你们一比，可就把我撕剥了！

建 （放手）这不是比气力的事，得讲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正 （也放手）讲原则很对！等我们队里管委会开个会，先民主一下！

建 等不得了，任务紧！现在先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李旺！你是不是愿意到大队赶车？

旺 （急中生智，跳过刘宏建那边）愿意，服从大队长的命令！（说了就跑）

正 （被建拦住，不能追，大喊）要走，把你的全家都带走，队里可没有人替你生产粮食！

建 按制度办事！你可少得了他一斤了？

正 不通过管委会随便跑出去，不在农业上做劳动日，他可吃得上我们一两了？

建 你这生产队长又不是铁箍箍住的！不服从领导呀，（且走且说）通过群众罢免得了呢！（下）

正 （气极，追下两步喊）通过群众也罢免得了你这样的领导！（又气嘘嘘地返回原地）刘宏建！我斗得了呢！

（唱）李大正生来有个牛劲，
人送外号枣核钉，
不怕茅厕里石头臭又硬，
我也要碰你个小窟窿！

高 （内唱）大队问题太严重，
众 副大队长来了！
〔高志新随王东方上。〕

高 （唱）刘宏建投机不务农！（切）

正 高志新同志！咱农业上的日子不能过了啊！

高 我知道了，东方和我说了！李旺哩？

丙 人家大队长拉去了！

高 这这这还有个制度没有了？

正 高志新同志，你说怎么办吧？

丙 高队长！这回可不能算拉倒啊？

高 自然不能拉倒！这不只是一个劳力问题，这是农村的生产方向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

丙 那末该怎么办哩？

高 （凝思）办法还得研究，现在先听听你们几位的意见！

丙 我说呀，趁他还没有套好车，我们把队里的青壮年集合起来到木工厂门口等他，只要他一出门，我们拉的拉，扯的扯，抬也把他抬回来，扛也把他扛回来！

（唱）什么药治的是什么病症，
李旺那滑头鬼好说不行，
我们这青壮年全体出头，
先给他来一场突击冲锋！

乙 老弟！这可不行！别人去不去，我先不跟你去！上级三番五次提倡多种经营，今年的副业又赚了那么多的钱，咱们要到副业上去闹事呀，那是和全村群众顶牛哩！

（唱）搞副业赚钱多人人高兴！
公社里也提倡多种经营，
谁反对谁就要脱离群众，
怎敢到木工厂去打冲锋？

正 （向乙）把你的眼睛睁大一点吧！荒了本村的地去外边倒买卖，那算什么多种经营？拥护他们的又都是些什么群众？

(唱) 搞副业也得与农业靠拢，
谁许他荒了地买空卖空？
赞成的哪有个正经群众？
乱嗡嗡不过是一伙苍蝇！

甲 (向正)队长！那伙苍蝇可也小看不得呀！不记得通过私人包副业的时候，那伙苍蝇们为了自己发财，大喊大叫：真正多数老实群众，因为怕大队长过后报复，都不想出头露面，结果不是连公社派来的同志也蒙住了吗？

(唱) 那一伙急发财胡说乱蹦，
老实人怕报复都不吭声，
多数人未起到多数作用，
惯得那臭苍蝇作怪成精！

东 对！咱们生产队的情况也和全村的情况一样，真正做活的老实人不多说话，就是李旺他们那几个财迷鬼，每天去到地里，做活拣轻的做，说话拣坏的说。不要以为他们不起作用，听上他们上当的人也不少！依我说李旺走了也好！少他一只苍蝇，总能少嗡嗡几声！

(唱) 叫他做队里活能哄就哄，
说二话不眨眼开口现成，
依我看倒不如走了干净，
也只当给队里撵了只苍蝇！（切）

高 好！大家都把各自的看法、想法提出来了，我们回头通盘研究一下再说吧！

正 (向高)那么这个人哩？

高 你说哩？大家刚才提出两个不同的办法来，一个办法是往回拉，一个办法是往外撵，你说还是拉回来好呀，还是撵

出去好？

正 （略寻思）唉！反正是个气布袋，撵出去哩少一个劳动力。拉回来哩多一个病虫害！

高大正！你看得完全对，要不把他们的思想改造过来呀，拉回来固然是拉了个病虫害，撵出去也不过是把病虫害集中起来了！

正 李旺那人你还想改造他呀？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跟我们队里那头大黑骡一样，就是那个成色了！

高 你说是不是该着枪毙哩？

正 （笑）那也该不着！

高 凡是不该枪毙的人就都得改造！这是旧社会给咱们留下的包袱，咱们有责任改造他们！

东 那种人谁能改造得了他呀？

高 共产党！共产党要领导人民改造世界，难道不能改造李旺那样的人？

东 （怀疑地）共产党？

高 对！（测东方的神情）怎么？你不相信吗？

东 （支吾地）相信，相信！

高 （仍测知真伪）东方！有什么意见你大胆提出来！共产党是欢迎群众提意见的！

东 我真的相信，我小时候就跟我娘讨饭长大的，要没有共产党，我就连个家也不会有，我怎么能不相信党哩？不过现在呀……（视众）回头再跟你说吧！（向正）队长，已经又少了一个人了，咱们还不该早到地里赶趁一下？

高大正！我看你还是先领大家下地去吧，让东方留一下随后就去！

正 好！同志们！咱们先走吧！（和甲、乙、丙同下）

高 东方！你向来也是个爽快人，为什么有意见不说哩？难道也怕我报复你吗？

东 不！你不会报复人！不过说说不说不抵事！

高 就真不抵事，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东 好！我说！你觉着老瑞哥那个支书怎么样？

高 你觉着哩？

东 在战争时候、土改时候，他老哥和你一样，真是拼着命干的，不知道近几年为什么光好图个自在，遇了事总不想深管，顺水推舟，得过且过。叫我说刘宏建敢那样横行霸道呀，与他那不愿负责大有关系！

高 （大震，表示所见相同）

东 （唱）老瑞哥这几年不起作用，
不敢与刘宏建正面斗争，
枪杆儿努折了枪尖不动，
天大的要紧事都放得稀松！（过）

高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一定要给他治一治这个病！我可以把你这意见转告给他吗？

东 不用了！

高 你怕他报复？

东 他也不是那种人！不过我自己跟他说过，不抵事！（扛锄）我下地去了！我就这一点意见！（下）

高 （点头，目送东下，心绪万端地坐磨盘上。）
（大起板）
（唱）王东方——看问题心如——明镜——（彩仙桥式的小二番头，接中四六过门，唱中四六第四句韵。）

他看出——老王——瑞——不愿——斗争！

（拉流水过门，唱大板流水）

想当年八路军发动群众，（此句唱大板、余可活用）

（长皮）（起立）十里店露出了三颗红星，

刘宏建做村长当权执政，

我老高武委会领导民兵，

老王瑞在农会把主席担任，

建党后当支书也是这老兄；

到前方去参战患难相共，

搞土改也都曾烈烈轰轰；

解放后转入了和平环境，

他二人便觉得革命成功；

老王瑞虽清白斗志已冷，

纵容得刘宏建独断专行。

刘宏建就有些强迫命令，

当上了大队长更觉威风；

政治上常打击别人威信，

经济上又闹得手续不清；

被一伙投机客包围吹捧，

把副业包给些狗友狐朋。

这副业除不与农业靠拢，

反要把农业上劳力调空！（过）

（白）老瑞哥！你站起来吧！（下转紧打慢唱）

（走向台前方，二道幕闭）

（唱）十里店走错路问题严重，

老瑞哥你怎么还那样从容？

你既然得下了软骨之病，
高志新我情愿做你的医生，
今夜晚到你家把你推动，
撵你这懒雁儿展翅腾空！（下）

第二场 出 诊

时 同日晚上。

地 王瑞家。

人 王瑞（支书）

瑞妻

王家骏（瑞子）

王得胜（瑞侄、团支书）

高志新

（用一支中速但又最短的乐曲反复（弦或笛子独奏）演奏，开幕，乐不停）

瑞妻 （正搬着一把椅子向右前方走，下。又上，视桌旁搬剩的另一把椅子和桌上的零碎的物品，把这些物品移到椅上，又搬起，向右方下。又上。视桌，走近，搬了一下搬不动；转到桌子的一头，抬了一下又放下，指了指另一头，表示须再找个人来抬，往外走。）

〔王瑞上。〕

瑞妻 （相撞）（乐止）噢！来得正好，快跟我抬一下桌子！

瑞 （心不在焉地走过去和她抬起，但刚一抬起，马上又放下。）

瑞妻 （仍抬着另一头没有松手）怎么？连个桌子也抬不动了？

瑞 （不予答复，巡视了四周一下）这，这是搬家吗？

瑞妻 不！抬吧！先抬过去慢慢跟你说！

瑞 （不动）抬到哪里去？

瑞妻 东屋里！

瑞 为什么？房子要塌吗（仰视）？

瑞妻 （丢下桌子）你这人！抬过去不能再问了吗？

瑞 （摇头）我还是问明了再抬吧！

瑞妻 好吧！我就先告你说：人家李天泰修的那院新房子，今天就完工了……

瑞 人家修的新房子，叫你搬进去住吗？

瑞妻 不要开玩笑，我是跟你说正经话哩！匠人们要是没有别的事，明天就要走了！

瑞 匠人们在村里住的不是咱的房子，他们走不走，咱搬什么家呀？

瑞妻 （气愤）你怎么尽说糊涂话！

瑞 你这话我越听越糊涂！

瑞妻 等我说完你就清楚了！我想趁糊裱匠还没有走，请人家给咱们粉刷一下房子！

瑞 （仰视）好好的房子，粉刷它做什么？

瑞妻 你就没有看见上半截墙和顶棚都熏黄的了么？

瑞 黄一点有什么关系，我不要那么白！

瑞妻 看你糊涂不糊涂！不是要给咱孩子娶媳妇么？

瑞 孩子娶上媳妇，就该把咱们俩撵到东屋去么？幸亏你只有这一个孩子，再有一个的话，就该撵咱们出院哩？

瑞妻 你怎么总是不想听完我的话？谁说叫他们住这堂房？堂房自然还是咱们住，不过娶媳妇的时候，人来客去的，粉刷

一下好看一点！

瑞 我不在乎那个！亲戚朋友们谁还没有来过？谁还摸不清咱们的老底子？我不怕他们笑话！

瑞妻 新亲戚总没有来过吧？不用说新亲戚，就连咱要娶的新媳妇，也还没有来看过咱这黄顶棚哩？

瑞 你怕新媳妇笑话呀？

瑞妻 新媳妇不懂事吗？你们不是常说她爹是模范支书，她娘家是红旗大队，她自己又是模范团员吗？

瑞 谁说不是？还是全省的模范哩！不过怕媳妇笑话的恰恰不是你这黄顶棚，是十里店的生产！人家横岭大队那些山坡地，亩产都平均六七百斤；咱十里店这一抹平滩，把地都种荒了，不怕人家嗤笑吗？

瑞妻 那他笑不到我头上！

瑞 可是笑到我头上了！我是十里店的党支书！

瑞妻 不要跟我夸言了！各人有各人的责任，房子里不讲求个整齐干净人家要笑我的。我已经跟人家匠人说了，材料也准备现成了，明天一早就动工……

瑞 快快快，快去跟匠人说不要叫人家来了！就说我不愿意！

瑞妻 那种来回话我不会说！你是十里店党支书，我是十里店党支书的太太！

〔王得胜上。〕

胜 婶婶！那我自然该称呼你“老太太”了！

瑞妻 去你妈的！偏你听得那么清楚！

胜 家骏哩？

瑞妻 听说供销社有他一封信，他取信去了！找他有事吗？

胜 有点事！

瑞 坐下得胜！（一看没有椅子，想起刚才的事。）（自语）
坐到哪里？（向妻）去把椅子搬回来！

瑞妻 （扭身，背向瑞，无语。）

胜 （巡视屋中）叔叔，你们搬家吗？

瑞 问你婶婶！

瑞妻 问我就问我！这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向胜）再过个把月，家骏就要娶媳妇了……

胜 家骏结婚，还要把你二位老人家撵出去吗？

瑞妻 你怎么和你叔叔一样糊涂？堂屋自然还是我们住，不过顶棚都熏成这样黄了，不粉刷一下，不怕你那个模范兄弟媳妇笑话吗？

胜 怕人家笑话的不是这个，是咱那种荒了的土地！

瑞妻 （气愤）去你的！你们爷儿三个是不是早就串通了？你、家骏、你叔叔，三个人说的话好象一个模儿拓下来的！我叫家骏帮我搬搬家具，家骏不给搬，说你叔叔不会同意，你叔叔回来了，果然要叫我往回搬；你来了也和他们说的一模一样！不粉刷就不粉刷它！难道人家只笑话我一个人吗？

瑞 这叫“理怕众人评”，少数服从多数么！快先去搬回几把椅子来！大家总不能都这样站着谈话！

瑞妻 你想坐你不会去搬？我不去！

胜 我去！（向右前方下）

瑞妻 （仰视）看这黄不黄黑不黑多么好看！

瑞 我看惯了！

胜 （双手提两把椅子上，置于桌子两端。）

瑞 （自坐右方椅上，向得胜）坐下得胜！

胜 （让瑞妻）婶婶坐！

瑞妻 （向椅子走去）

瑞 （仍向胜）你坐你的！（起立，走向妻阻之）你想坐你再去搬一把！

瑞妻 （愤愤地向右走，但并未下，趁瑞尚未回过身来，从从容容坐瑞所坐的椅上。）

瑞 （回头见状一怔。）

瑞妻 谁想坐谁再搬去吧！

胜 还是我去！（笑，向右前方下）

瑞 （坐左方椅上，面向左扭，与妻相背。）

〔王家骏持信上。〕

骏 面向里，见状一怔，向右两步视瑞妻，又向左两步，视瑞；转身向外，仰视顶棚，点头会意；又转向里，左右视如前。）

胜 （又搬一把椅子上，见俊左右视，也左右模仿其状。）

骏 （转身与胜相遇）噢！你几时来的？（视胜取的椅子，已知其意）早就来了啊！

胜 来一会了！（放下椅子）谁来的信？是不是马红英答复你结婚的日期？

骏 是！不过又推迟了！

瑞妻 （转身，面向骏）啊？她又有什么事故了？

骏 她的来信说：横岭大队今年发明了一套记账的新办法，秋收分配以后才能看到结果。她是副会计，不愿意放弃这个试验。第二……

瑞妻 不用说什么第二了，光这第一我也不愿意！谁家娶媳妇能不做个准备？择个日子，怎么能改了又改，定好一个日子，

咱正去做准备，她改了！再定好一个日子，咱又去准备了，她又改了！这叫个什么规矩？

胜 这叫先集体后自己，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是咱们新社会的新规矩！

瑞妻 什么新规矩？你骗不了你这傻婶婶！咱十里店近几年娶的新媳妇，哪一个不是由婆家选定的日子？

瑞 人家横岭大队是红旗队，不能再按你那老脑筋办事！

瑞妻 十里店人就得按十里店规矩办事，想按他们横岭村人的规矩办事呀，除非是搬到她横岭结婚去！

胜 这个马上也说不到底，以后你们再研究吧！家骏，你不是说还有第二吗？第二哩？

骏 （笑）第二就是我娘刚才说的那个！

瑞妻 我说的什么？

骏 来信说：第二，你提的那个要求，我已经和这里的负责人说过了，他们说只要你家里和你们村里同意，我们这里是非常欢迎的！

胜 （莫名其妙）你提的什么要求呀？

骏 这！按道理说，该先跟我爹、我娘、团里的负责人商量一下再提，可是我也想先摸摸那里的底，所以先跟她说了……

瑞妻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没个头尾？你先得说清楚提的是什么事呀？

骏 什么事？我觉得我才出学校，生产上，工作上都没有经验，想到人家横岭那个红旗大队锻炼上一个时期，然后再回咱十里店来！

瑞妻 这怎么跟我刚才说的话一样哩？我刚才没有说过这个呀！

胜 （笑）婶婶怎么连这个意思也没有听出来！这不就是要搬到横岭去结婚吗？

瑞
瑞妻 （均恍然大悟）啊？

瑞 （叫板）我赞成！（起立，于流水过门中走至中前方。）

（瑞妻于流水过门中大声插：“我反对”！）

瑞 （唱）现如今十里店许多破绽，

眼看要暴露在儿媳面前，

先叫我小家骏和她熟惯，

到村来她就会有些包涵。

（回头向得胜）得胜！

（唱）横岭村是全省红旗一杆，

要学习都还得排队参观，

你兄弟他既然有此方便，

这件事咱应该帮他成全。（过）

瑞妻 不行！我不能除娶不到媳妇，再贴出去一个孩子！

瑞 过个一年半载就回来了么！

瑞妻 不！我怕她把我的孩子拐走了呢！

胜 婶婶！我支持你！

瑞妻 去你的！你不反对我就够好！

胜 这回是真的！（向瑞）叔叔！

（唱）十里店共青团缺少骨干，

团干部配备得不够完全。

家骏弟他也是团员模范，

想派他当一个团课教员。

〔长皮、高志新上。

高 (唱)老瑞哥原来是英雄好汉，
他也曾破生死斩将夺关，
现如今未老无心恋战，
我这里要劝他催马加鞭！(急切、乱)

[高入，众起立相让。俊见座位不够，从右前方下。
[高坐桌右方，瑞与他对坐，瑞妻移椅于瑞的下一位坐。
[胜见无座，欲下去取，骏取一板凳上。
噢！取来了？
[骏置板凳于左前方，胜坐。
家骏回来了？
骏 (向高点头，恭敬而不呆板。)回来了，高叔叔！(与胜并坐！
瑞妻 志新，你来得正好！我和家俊他爹正有件事情吵不清楚，
要领一领你这高人的指教！
高 家里的事情以后再谈吧！我来找老瑞哥，是要先谈一件大事情的！
瑞妻 这件事也是大事！
瑞 我们家里的事，以后我们自己谈吧！
瑞妻 不！光我跟你吵不出个青红皂白来，让他高叔叔先给咱们评评这个理！
高 (见丢不开)好好好！那你就先简单说说吧！什么事？
瑞妻 还是为了娶媳妇的事！
高 那算什么大事？不是八月底就要娶了吧？
瑞妻 人家新媳妇又来信推迟了，说是要等秋后才能决定！
高 (不胜其烦地)秋后就秋后，迟半年有什么关系？
瑞 不过咱家骏又提出来一个办法；他说他才出学校，工作

上，生产上都没有经验，想先到他媳妇的娘家横岭大队去锻炼锻炼，学习一点先进经验，再回咱十里店来……

高 好么！到人家那模范地区锻炼一个时期，进步一定会很快！

胜 高叔叔！不过咱十里店团里的骨干很少，家骏在学校又是个模范团员，又有个高中文化程度，我计划叫他当个团课教员，马上把团里的学习抓起来！

高 也对！咱们村的思想教育工作，正需要从各方面开展一下！

瑞妻 你怎么说这个也好，那个也对？我只有那一个孩子呀！

高 得胜的意见更正确一点，符合十里店当前工作需要！

瑞 我看还是先叫他到横岭去吧！一个没有经验的孩子，还是让他先去取一点经来好！

瑞妻 说什么是叫他去取经？还不是怕媳妇来了笑话你的工作落后？

瑞 （低沉而严肃地）不要胡说！

瑞妻 我胡说？这是你自己说的！你刚才不是说怕媳妇笑话的。是十里店把地种荒了吗？

瑞 （焦急而埋怨地）你……

高 老瑞哥！你这次检讨很深刻！我今天要来跟你说的本事，正是这个事！你怎么光在家里对着老嫂子检查，可不到支部会、管委会上去检讨呢？

瑞 这这这……唉！到什么会上检讨也没有用！从前检讨得还少？地还是照样种荒了？检讨首先要自觉地认清自己应负的责任！我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这样做，可是轮到刘宏建那里就行不通了！照他说起来，生产搞不好，都是因为大家不听他的话！

高 真理只有一个，地种荒了，究竟因为不听他的话呀！还是因为太听他的话，大家可以讨论么！

瑞 你又不是不了解情况，上哪里讨论去？在党内讨论，一谈到他的问题，他不是巧言答对，就是推故走开，在群众中讨论，老实人怕报复不开口，只听见他们那一把人大喊大叫，连公社都叫他们哄了，还叫谁讨论去？

高 你打算怎么办哩？咱们就看着他们这样胡闹下去吗？

瑞 马上想不到什么好办法，只能慢慢来！

高 咱慢慢来，他快快来！老虎越养越大。慢慢，慢慢！慢慢就啃到你头上了！

瑞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哩？

高 办法有的是，是你不想办！

瑞 办法在哪里？

高 一九四七年你带着民夫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区，突破几次包围圈，通过多少封锁线，那些办法都是谁给你想的？老瑞哥！

(唱)(流水)你也曾征服过难关千万，
论办法你不是不会钻研，
可惜你现如今心灰意懒，
全不象当日的干劲冲天。(过)

骏 爹！我觉着高叔叔说得对！要拿出革命干劲来，争取主动啊！

瑞 没有你说的！你懂得什么叫革命？

高 (向瑞) 他怎么不可以说话？他是模范团员、高中毕业生，不久就要接咱们的班，难道没有发言权吗？

胜 (笑嘻嘻地) 叔叔，马红英那个模范团员，也要来接你的

班啊！

瑞妻 那怕什么？来了好！丑媳妇还能不见公婆？

高 （笑向瑞妻）只怕丑公婆不得不见媳妇了啊！（向瑞）怕笑话咱们就得在这半年之内把十里店弄得象个样子！这叫
做后辈催的！

（唱）党支部对党员该管不管，
纵容得刘宏建无法无天，
咱若是不能把局面扭转，
怎不叫儿女们背后笑谈？

瑞 （点头）

（唱）（向外）十里店早走上错误路线，
扭不转这局面我也为难。
我岂能对儿女当面丢脸，
落一个老无能不敢向前？

（向高）志新！

（唱）你提的完全是正确意见，
怨只怨我王瑞斗志不坚。
我马上做一个通盘打算，
开一次支委会大家商谈。

高 （唱）你既然能这样当机立断，
就不怕扫不了瘴气乌烟！

胜高 （合唱）辞别过老瑞^{叔哥}明天再见。（瑞送，高回头）

高 （唱）但愿你从今后坚定向前！
〔高、胜别瑞出，二道幕关。

胜 （唱）老支书今夜晚态度大变！

高 不巩固！

(唱)谈一次他总能积极几天，
他好比沙滩上一只懒雁，
撵上去落下来五次三番。

胜 (唱)落一次撵一次一落就撵，
撵得他落不下就得飞天。
马红英那一个全省模范，
到他家又是个撵雁的要员。

第三场 报 警

时 同年阴历腊月中旬。

地 某县城街上。

景 先后用“集兴饭店”和“公安局”两个牌子。

人 马红英、王家骏、胡宗文、售票员、他姨夫、他姨姨，
警察。

(二道幕未开，乐队打泽州秧歌慢板带马锣的出场锣鼓，
马红英背挂包上。音乐落到大板上。)

英 (站右侧唱) (大板)

接近年关岁暮期，

(至中前方)西山路上行人稀。

(垛板)马红英今日赴城里，

独自走来独自寻思，

我的家乡横岭大队，

那是我们西山一竿老红旗。

我的爹担任党支部书记，

各方面的人材也都配得齐。
这地方本是一片穷山地，
建设了十年把它改移，
农林牧副多种经济，
年年岁岁都往上提，
近几年全县大评比，
回回是横岭得第一。
这样的—个生身地，
(大板)马红英我怎肯与它别离？
有些事不能如人意，
(流水)我不该作了人家未婚妻！
老婆母早就要我娶，
这一次再也不能推迟，
(垛板)离佳期不过三五日，
我把环境细分析：
十里店物质条件比横岭美，
优越性能数—大堆；
十里店土地平如水，
横岭村种的是上天梯；
横岭村还是老牛犁地，
十里店用的是拖拉机；
十里店政治工作赶不上去，
那生产也就出了问题——
拖拉机还不如老牛犁地，
平如水抵不住上天梯。
我这样比来又比去，

总觉得嫁到那里不相宜。
我的爹看出我不满意，
他说道“你这闺女没有出息！”
他说道“社会主义是整体”，
哪里的江山也是自己的！
去到哪里建设哪里，
不应该挑挑瘦来拣拣肥！

(流水)我的爹批评完全对，
只怨我政治水平比他低，
我既然常学雷锋办好事，
到哪里也要做个铁螺丝！
一路上只顾想心事，
三十里跑得我肚里饥，
先找个地方喘喘气， (过)

〔二道幕开，右后方有“集兴饭店”一个竖牌，表示是门外。

英 (唱) 就到这饭店吃东西！ (切)

〔胡宗文从右后方一男一女出。

男 (回身向胡操外地语) 打扰打扰！

胡 他姨夫！你怎么和我客气起来了？

女 (拉男，亦操外语) 还跟他客气呀？他不给咱们吃好的，咱们揍他！

胡 喜喜喜……他姨姨！不论大小吧，我总算个饭店经理！只要你们来，家常便饭总是可以管你们吃饱的！

〔三人同笑，男女别胡下，胡点头毕若有所思，未注意二人已去。

胡 我说今天晚上那批货呀……（猛抬头见二人已去）外！
外……（急追下）

英 奇怪！

（唱）那经理送出人一对，
听口音都不象本地的。
经理叫男的是“他姨夫”，
又叫那女的是“他姨姨”。
他姨夫，他姨姨，
这一双夫妻真稀奇，
那男的足有六十岁，
那女的不过二十几，
就把他两个算父女，
好象是中间还差一辈子！（略一过）

（摇头）（唱）马红英不管这闲淡事，
先到里边买馍吃！（进去）

〔二道幕关，王家骏上。〕

骏 （唱）厨师傅尽开些怪东西，
七拼八凑买不齐！（切）

（白）先点一点！（放下篮子，取出菜单）鲍鱼，没有。鱼肚，有了。葛仙米没有。（马红英暗上，站骏背后）蛏干，没有。吉糖，没有。松糖，有了。对丝，有了。莲子，没有，核桃仁，没有……

英 核桃仁要一大车也有！

骏 （惊，回视英）（二人均大笑）

骏 红英，你来做什么来了？

英 还不是为咱们的事？迁户口，转组织关系！

骏 都办了没有？

英 还没有办！三十里路跑饿了，先到饭店吃了点饭！

骏 在哪个饭店？

英 是个什么“集兴饭店”

骏 （笑）那就是十里店粉坊开的那座食堂！从前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英 原来就是那座宝号呀！不用说那个经理，就是那地主狗腿子胡宗文了！

骏 对！

英 你不是说十里店的情况变好了吗？这些副业怎么还是私人包着哩？

骏 他们也就剩这几天光景了！经过半年工作，村里反对他们那么做的人多起来了！听高副大队长跟咱爹说，公社党委书记为这事受了批评。说明年绝不允许再把副业包给私人干。不过这些话都还没有宣布！

英 早就该这样！（视篮中物）这都是些什么？咱家要开杂货铺吗？

骏 （笑）还不是为了咱们的事？

英 这老公爹怎么这样铺张？这象个革命家庭办事吗？

骏 这都怨咱娘，爹也不赞成！

英 （笑）这老公爹也不敢革命？（向骏）家骏！你自己敢不敢革娘的一次命哩？

骏 我早就愿意，只是想不出办法来！

英 只要有决心，办法都是人想的！

骏 （想）可以！团支书是咱个本家哥，他最会想这种办法！回去和他商量一下！

英 好！那你就马上回去和他商量去，一定在这几天里把办法想出来，办得象个革命家庭办事！

骏 好！再见！（握手告别，提篮下）

英 （忽然想起另一件事）家骏，家骏！（追上一步）

骏 （又上）

英 你不是说过包粉坊的就是胡宗文的小舅子吗？

骏 对呀！

英 他是什么地方人？

骏 就是十里店本村人嘛，你问他干吗？

英 我不过想了解一下！

骏 就是本村人，叫李天泰。李家还是十里店的大户哩！

（下）

英 （自语）“他姨姨”，不就是胡宗文的小姨吗？（向左）

哎！家骏，家骏！（追下两步）他还有个妹妹吗？（见骏远去又返回）奇怪！

（喝）在饭店那一对狗男女，

大概不是好东西！

胡宗文小舅生本地，

从哪里来这个野小姨？（路过）

他们究竟是啥关系，

看来恐怕有问题。

既要学雷锋办好事，

见坏人怎能不警惕？

我去报告公安局！

（长皮，二道幕开，绕场至右后方，一警察出。）（过）

警 同志！你找谁？

英 同志!

(唱) 要见局长报机密! (切)

警 你是哪里人?

英 西山公社横岭大队会计, 要见局长报告一件秘密的事!

警 等我给你看一下局长在不在!

英 劳驾了! (警下) (官板)

(向外)(唱)十里店我还未曾去, (仿甘家宫小生调)

先遇上这只老狐狸,

报清政府加注意, (夹白) 胡宗文!

我定要叫你露爪蹄! (切)

(警上)

警 局长请!

英 (点头谢警, 从容而入。)

第四场 挤进去

时 同前场——分别进行。

地 刘宏建家。

景 富裕的农村家景。

〔二道幕外, 陈焕彩拿电筒上。〕

陈 (快板——速度不可太快)

吃饱拨拉肚, 悠悠走几步。

要想发大财, 就得找来路。

我叫陈焕彩, 开过木作铺,

赚个轻巧钱，经验很丰富。
自从集体化，没个好去处。
等到去年冬，有了新门路：
大队木工厂，包给私人做，
这事我在行，我就包揽住；
我村大队长，暗地入了股，
每赚一千块，有他二百五。
怎知我自己，还有小路数。
随便捣个鬼，他就防不住，
去年修大桥，来了个工程处。
木料堆成山，塞满河边路，
偷了它十来车，回来入了库。
假账由我报，价钱由我估，
一千块变成几千块，

（白）大队长他呀！嗨！（起流水过门）

（唱下句）

他还是那个二百五！
今晚叫我到他家去，
谈一谈明年怎样做。（下）

〔李天泰、胡宗文各拿电筒同上。〕

合 （快板——速度同前）

为人要得富，人品不可顾，
只要钱到手，不必问来路。

李 我叫李天泰，

胡 宗文我姓胡。

李 我是他小舅，

胡 我是他姐夫。

李 当年我做生意，走过归德府。
自从回家来，没个生意做。

胡 当年我当管家，侍候大地主，
后来搞土改，成了被斗户。

合 等到去年冬，忽然有门路：

李 大队有粉坊，要包死任务。
我就包下来，盈亏由我负。

胡 粉坊又出资，城里开饭铺，
经理由我当，伙计由我雇。

李 我与大队长，关系很特殊，
女儿李玉屏，是他儿媳妇。

合 队长咱亲家，暗地入了股，
每赚一千块，有他二百五。

李 养猪几百口，大小不一律，
每天买“架子”，每天卖肥猪。
这样乱捣腾，谁也看不住。

胡 磨是饲料粮，杀是圈里猪。
饭铺有多大，谁也看不出。

合 亲家不摸底，咱们有个数。
一千块变成几千块。

(白) 咱们那亲家大队长呀! (起流水过门)

(唱下句)

他还是那个二百五。

今晚叫咱到他家去，

谈一谈明年怎样做。

〔李下，胡留。〕

胡 （快板——速度同前）

天泰我小舅，经商是能手，
不过有件事，还蒙在鼓里头。
我自进了城，遇上个老朋友，
化装跑外国，私搞进出口——
出去带古董，回来把手表购。
见到城里，请我做帮手。
手表帮他卖，古董帮他收，
每卖十个表，两个是报酬。
买来古玩意，有空我也偷。
赚下这笔钱，完全归我有，
不跟小舅说，小舅摸不透。
小舅啃骨头，姐夫吃肥肉，
这叫啥名堂，

嗨！（起流水过门）

（唱下句）

这叫个姐夫啃小舅，

（向内）

叫声天泰慢点走，

你姐夫赶你在后头！（下）

〔幕开——刘宏建家，有农村式的豪华气象。〕

〔刘宏建独坐候客，暂不摆酒具。〕

建 （唱）

由个人包副业公私两便，
试验了一年多大大赚钱。

成了功就应该肯定经验，
副队长高志新故意麻缠。
他说啥不合乎党的路线，
党支部老王瑞又把他偏。
趁公社还没有提出意见，
请几个负责人计划明年。

〔陈、李、胡相继上。〕

李等三人 （同唱）

手电筒似磷火一溜忽闪，（故意频频开关）
聚在了大队长他家门前。（切）

李 （叩门）玉屏，玉屏！

建 玉屏！（李玉屏上）开门！你爹来了！

屏 （开门）爹！姑父！陈经理！请进来吧！

〔陈、李、胡等人人内，建离坐相让，坐定后。〕

李 亲家，明年包不包的事，公社有答复吗？

建 还没有正式答复，不过有个消息。

李等三人 什么消息？

建 不忙！我准备了一点酒，咱们喝着谈！

陈 怎么好回回扰你呀！

建 没有关系！咱们赚钱了吗！（向屏）玉屏！看酒！

（唱）

与众位庆功劳备下小宴，

〔玉屏内下，王东方外上。〕

东 （唱）

我的娘病危急难过今年，
家贫寒还没有棺木装殓，

想赊口棺材来不付现钱。
我去找陈焕彩找他不见，
他家说大队长找他会谈。
心有事我只得到处乱赶，

〔玉屏内上，摆宴。

来在了大门前叩打双环！（切）

〔打门。

建 （一怔）这是谁打门？

李 听说老王瑞明天请干部，一定是他们来安客来了。

胡 （警惕地收拾酒具入盘）不要让他们看见这个！（收毕端起欲下）

屏 姑父！让我来拿！（伸手来接）

胡 不！你去开门！我也避他们一下。（向建）叫他们看见我在你家不大合适！（且下且补）咱这成分不好！（建、李报以微笑，慰其知趣）

屏 （开门，见是东）啊！有事吗？

东 陈焕彩到这儿来了吗？

屏 等我看一看。（入，向建）王东方找陈经理！

建 就说现在开会，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陈 （急止之）不不不！这是生意送上门来了！可能是东方妈不行了要买棺材。

建 （向屏）让他进来吧！

屏 （出，向东）在！进来吧！

东 （随屏人，向陈）可算是找见了！

陈 （世故地）对不起！我今天恰好有点事！（故作不知地）找我有事吗？

东 麻烦你，我想看厂里一口棺材！

陈 （假仁慈地）怎么？老人家又不大了吗？

东 唉！这几天天气坏，喘得不行！冒准备一下吧！

陈 你到厂里去看过吗？

东 看过了，咱买不起好的，就谈谈敞棚底靠西墙那一口吧！

陈 那副十六块头的吗？

东 对！

陈 那是水柏木，圆心货！说不说你用了吧！都是自己村里人，还能多算你的？

东 水柏木？没有听说过。

陈 那是外路木头，咱们此地没有，你用吧，没有错！

东 你还是说上一句吧！

陈 说不说吧，那是厂里评议的价钱——棺盖上划的有码，一百八十块钱！

东 （吃惊）啊！我当是几十块钱！

建 （向陈）要是现钱的话，价钱是不是还可以商量一下？

陈 不行！木料贵了，本钱关着的！

东 咱这家迟早还会有现钱，就是说好了的话，也得请你缓开个期限付价。

陈 那倒可以商量！

东 （考虑一过）没有再次一点的吗？

陈 没有了，那是最次的。如今哪还有几十块钱的棺材？

东 （不语良久）我回去合计合计明天再说好吗？

陈 行，你合计合计，绝不能多算你的钱，都是自己村里几个人！

东 （未听完即出。玉屏关门。东背语）我认得你！（下）

建 （向陈）我看那价钱也不能咬那么死！如今木料落价了。

陈 可是咱们也得前前后后都想到，明年能不能包还没有定哩！

建 我也是那样想！明年包得成包不成还没有准，要能卖成现钱的话，卖一口算一口！

陈 你想得不全面，咱们存着十几口棺材，要是明年包不成了，按夏天评议那价钱交出来，咱们不吃亏。这一口要是按现在的行情贱卖了，那些就得按比例往下减，结果这口多卖百把块现钱，那些就得千把块钱折。

李 （打趣地向建）折一千有你二百五！（三人会意，相视而笑）

陈 （向建）说别的我比不过你，算这个账你没有我算得快！

建 要是明年也卖不出去呢？

陈 明年卖不出去还照原价往下交，等到管委会主张减价出售的时候，减了的价就该大队负责，咱们就不折钱了。

〔胡又端盘上。〕

胡 （将盘放桌上）怎么，生意没有搞成？

陈 没有搞成也走不了，他没有现钱，到别处赊不出来！

李 （向陈）你们的生意明天再搞吧，现在先谈谈别的！（向建）亲家，你不是说公社有什么消息？

建 （向胡）他姑父，给咱们摆开，咱们喝着说！（胡摆杯盘，大家移坐）公社还没有正式讨论，只是党委书记有一次透露过一点意思，他说，原则上还是不应该包给私人，要是多数群众坚持要包的话，也只能提成奖励，不能死包！

胡 提成奖励就提成奖励，只要有口儿，就不肯不包！能包

下来，生意是由人做哩！不要打退堂鼓。
建 能包谁肯不包？问题不在公社，村里的情况也和今年前半年不同了啊！

（唱）

搞副业赚钱多用人有限，
有些人干不上分外眼馋。
背地里到一处说长道短，
把咱们说成了投机集团。
高志新对咱们早有成见，
王得胜跟着他常把风扇；
王家骏动不动就讲路线，
老王瑞又偏在他们一边。
包副业要通过多数意见，
看起来这前途很难乐观！

李 亲家！
陈 （同白） 队长！

（同唱）

以我说看事情要看两面，

（同说快板）

亲家莫悲观，事情要两面看。
队长

李 今年的总收入，
陈 副业占一半，
李 这是集体的，
陈 咱们的还不算，
李 这样搞副业，

陈 公私两方便；
李 要说争群众，
陈 这就是条件。
合 哪怕他天天讲路线，

(唱下句)

多数人还在咱这一边。(过)

建 在一般群众中间，咱们纵不能争取到绝大多数，可也能掌握一大部分，主要问题，还在干部身上呀！

(唱)

高志新老威信不可小看，
王得胜在团里掌握了青年，
老王瑞对这事也不称赞，
说句话就影响全体党员。
这主力都倒在他们一面，
纵有人向咱们也是枉然！

胡 不怕！

(唱)

依我看这阵线不难拆散，
灭烟火最好是砍倒老杆。
老王瑞这个人情面变软，
想办法弄他个不便多言。(过)

建、李、陈 咱们怎么能蒙眛住他呢？

胡 嗨！有法！他家马上就要办喜事，他老婆又是个爱热闹的。明天你们到他家赴宴的时候，给他好好一铺排，办得它又热闹又省钱。这样灌他一顿米汤，他就不便说话了！

(唱)

这米汤劳你们二位去灌，
办得它又热闹又能省钱。
事过后能叫他感激千万，
等到了包副业他怎好麻烦？

建、李、陈 有理！

李 (唱)

我姐夫这个人真有高见，

陈 (唱)

老王瑞识不透这个机关。

建、李、陈 (同唱)

但愿你赛诸葛神机妙算！

〔四杯相聚，王家骏上，打门。建、
胡警惕地将杯放下。〕

建 呀！

(唱)

这可是王家骏来到门前？ (切)

玉屏：看看是谁叫门！

胡 我还是避一下！ (收酒具入盘，取下)

〔李、陈饮酒毕，见胡已去，将二杯随手放桌上。〕

〔玉屏开门，王家骏入。建见桌上尚余二杯，急以双手分握之。〕

骏 (未理会建收杯事，近前鞠躬) 大队长！我爹说明天晌午
请你到我们家里坐坐！ (呈请单)

建 要办喜事了吧？见了你爹先替我道个喜！ (伸手接单，始
发现握杯在手，张皇失措，继而纳入两个衣袋中，然后接

单展视，一怔。李、陈亦凑近欲视)

〔建取笔签“知”，李、陈亦拔笔，忽见单上无名，颓然而止。

〔建签字毕，骏接单付玉屏，玉屏签毕，仍付骏。

建 (照例客气) 回去告诉你爹说，明天不必打扰你们，有要帮忙的事，交我们办好了。

骏 (也照例客气) 我爹说请你们一定赏光! (下)

〔玉屏关门。

〔胡又端盘上。

建 (向胡) 亲家! 你这个诸葛亮不灵啊!

胡 怎么?

建 (指李、陈) 这次偏没有请他们两位，你说怪不怪?

胡 这……这可能是王得胜的主意!

建 象!

屏 我说咱们谁也不要，让他们自己办吧!

胡 (凝思) 不! 要去! (又思索良久，指李、陈) 你们也要去!

李 你怎么糊涂了? 人家不请我们，我们怎么去呀?

胡 有法! 不过得下点本，下点本就能挤进去!

陈 怎么个挤法?

胡 你们准备下一份礼物，到了明天，别的干部进了他家之后，你们就去送礼。这时候，他们的桌上已经安排下现成酒宴，他要假意让坐，你们就趁势坐下，他要不许(指建) 亲家可以替他留客——老王瑞是个情面很软弱的人，只要你这么一来……

建 亏你想得出来! 行! 这个事我会办!

陈 马上到哪里找礼物去？
李 （向建）亲家！你去年办事接受的那些缎帐子是不是没有写过字的？要有，就借给我们一块，让我姐夫给写一写。
建 这……我还不摸底。
陈 借一块吧，回头我们照样还你！
建 我真不知道！玉屏！叫你妈给找一找！（玉屏欲下）
胡 （向屏）也给我找一点小东西，象镜子或者什么的。
李 （向胡）你出面合适吗？
胡 我不出名，只写“集兴饭店”一个款——只要他收下，咱这个饭店就算在党支部那里立过案了。〔玉屏下。
建 （向胡）亲家，你可真有两下子！（向陈、李）来！咱们大家干一杯！（取壶斟酒，发现只有两个杯，到处乱找，随后想起在自己衣袋里，含笑取出）

（幕落）

第五场 挤出去

时 前场第二天中午。
地 王瑞家。
景 同二场，惟增设坐次、酒具等。
〔二道幕外，王得胜上。
胜 （唱）
老瑞婶爱铺张说她不倒，
与家骏定下来妙计一条；
他自去渡陈仓我修栈道，
少不得再替他去把客邀。（切）

瑞 (内叫) 家骏!
胜 来了!
瑞 (持红帖上) 是你? 家骏哩?
胜 出差了!
瑞 什么差?
胜 去接个干部。
瑞 什么干部?
胜 共青团干部。
瑞 来做什么的?
胜 安家落户。
瑞 那是好事么?
胜 自然是好事了!
瑞 他几时去的?
胜 早饭以后!
瑞 几时回来?
胜 还不清楚!
瑞 你怎么派他去?
胜 他说别人去还不行!
瑞 他不知道家里还有事吗?
胜 知道! 他叫我快到晌午的时候, 替他去催请一次客。
瑞 这不就快晌午了吗?
胜 我这不就来了吗?
瑞 你去? 就劳你去一趟。(付帖)
胜 这不算什么! 自己爷们何必客气?(接帖, 二人分头下)
〔吹“大开门”, 二道幕开。〕

〔王瑞家，宴已设好，瑞在场。〕

〔建、高、胜鱼贯而入。瑞起身让坐，众各散坐——未入席〕

（“大开门”止，起“阴阳板”，李、陈分取镜子、锦缎上。）

李 （唱）

给王瑞来献礼叫人暗笑，

陈 （唱）

这一锅稀米汤全靠咱熬！

合（唱）

进门去见主人先把喜道。（过）（进门）

老支书，家骏的吉期已近了，我预先给你贺喜！

瑞 不敢劳驾！我先谢谢！（见二物）这……

陈、李合 老支书！

（同唱）

这是点薄意儿千里鹅毛。

瑞 二位！

（唱）

反铺张尚节俭党政号召，
遇上了红白事不可招摇。
这礼物还需要原璧归赵，
我这里谢二位意厚情高。

建 噢！

（唱）

老王瑞不受礼叫人急躁，
无奈何我只得为他代劳！（过）

别人的礼物可受可不受，你们两位经理一番敬意哪有不受的道理？让我替他老哥收下就是！（顺手接二物置之僻处，让王瑞接近不了，然后向瑞）老哥！这点小事兄弟替你作主了！（不等回答即反向李、陈）你们快请坐下，他老哥这场喜事正有用你们之处哩！

〔瑞情急无词。高、胜频频摇头，表示怨瑞面情过软。〕

建 （视瑞，见无留客意，视李、陈，见未落坐）唉！

（唱）

老王瑞糊涂的出人意料，
没一句人情话假意相邀。（过）

李、陈 （视瑞，见瑞无语；视建，建亦为难）

李 （向陈、唱）

这主人不开口留下不好，

陈 （向李，唱）

咱不如假意儿装个清高。（过）

大队长！老支书家的喜事，由你们主要干部出主意吧，有什么要我们做的事，请你们吩咐我们去做好了！

建 （忽然得着主意，推陈、李入坐）

你们坐下吧！什么主要次要的？副业收入占全年总收入的一半，副业经理难道还不是主要干部吗？我替支书留你们喝几杯！（向内）老嫂！请你再拿两个杯子！

胜 让我去拿！（向外表示另有主意，下）

高 啊！

（唱）

他二人怎来的这样凑巧？（过）

胜 （取二小碟上，置李、陈位前）没有酒杯了，就用这两个

醋水碟子对付吧！

高 （接唱）

哪有这当客人反把客邀？
想必是他三人设就圈套，
趁支书办喜事扯扯唠唠。
这两个吃人虫鬼头鬼脑，
与他们坐一块实在无聊，
学一个老渔翁池边垂钓，
看这些癞蛤蟆怎起波涛。（送长皮）

〔王东方上。〕

东 （唱）

我的娘病加重性命难保，
找不着陈焕彩叫我心焦。
有人说他跑到这里来了，
不管他在不在进去瞧瞧。（切）

〔入内，见势一怔，退了一步。〕

瑞 东方！有事吗？

东 （考虑）有点事，一会再说吧！

瑞 说吧！几时说还不一样？

〔瑞妻送菜上。〕

东 我妈恐怕不行了，想找陈焕彩问一口棺材！

瑞妻 （怪东）东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我是办喜事啊！

瑞 （斥妻）老封建！咱办喜事别人就不准说棺材吗？

瑞妻 （不愉快地置菜下）

瑞 老婶婶病又重了吗？

东 恐怕不行了！见不得一点凉！昨天晚上紧了一紧，可是今

天早上似乎又好了一点。反正不行，得准备！

李 还是那笔生意，送上门来了！

陈 （以肘触之）要还是说那一口，就不用看了！你抬去就行了！

东 可是那价钱……

陈 价钱我没有和你多说！大行大事，你管打听，不能多算你的钱！

东 （为难）那，那真用不起呀！

高 （向东）你看的是哪一口？

东 就是敞棚下靠西墙那一口！

高 那付十六块头的吗？

东 对！

高 多少钱？

陈 （想把话岔开）抬走吧！以后再说吧！

东 （未被陈语打断，仍向高）要一百八哩！

高 （一惊）啊！（沉一下，向陈）陈焕彩！你们以后要价钱也得有个谱啊！一个手紧一点的小家人，搁得住你们那样折腾吗？

陈 哈哈……高队长，你看你说哪里去了？我怎么敢折腾人家？那是厂里评议的价钱！

高 你们根据什么评议的？

陈 还不是根据成本吗？

高 就照那个成色，到县的木工厂里，买个三口五口都现成，哪一口也超不过五六十块钱！

陈 县里用的是国有林场的木料，来路便宜；咱的照那价钱就卖不着！

建 也不能那样比！自由买卖么！县里便宜就让他到县里买也行，咱们集体也不能贴上本钱照顾私人啊！

李 （背语）这“二百五”说了话了啊！

高 刘宏建同志！这个木工厂究竟是包给陈焕彩了没有？

建 （测知其意）包给私人，咱们集体得过包价。咱们包给人家，为的是叫人家好好经营哩，还是为的叫人家贴钱哩？

高 现在就得先算算他贴了没有！（向陈）陈焕彩！那口棺材是什么木头？

陈 （知道高是故问，未敢乱答）

东 （向陈）你不是说叫“水柏木”吗？

高 见鬼！谁认不得那几截截杉杆？（有点恼火）陈焕彩！你说是不是杉杆吧？

陈 就就是那东西！在南方也有叫水松、水柏的！

高 还没有听说过！（又放平了气）刘宏建同志！象咱们村唱戏的时候，台口上搭棚当柱子那一对杉杆，如今得多少钱一根哩？

建 现……现在那东西也缺了，咱也没有买过！

高 缺了吗？咱们木工厂的棺材大部分可是那木头啊！

瑞 总得四五块钱一根！

高 咱们就按五块钱算账：一根杆打两截绰绰有余，十六块头用上八根，五八四十块，堵头、匠工等等打上十块，五十，赚上百分之二十的红利，又是十块，一共才六十，怎么该卖到一百八哩？这就叫集体贴钱照顾私人吗？

陈 可是我还得往大队交包价呀！

高 包价有各生产队拨给厂里的劳力顶着的！要不是那个，不成了大队剥削你了吗？（向东）你去把棺材抬走吧，以后

按成本核算付价！

东 还得陈焕彩给开个条子，厂里才让抬！

高 陈焕彩给他开个条子！

建 陈焕彩！这个条子不能开！要开得先定个规矩，以后厂里卖货，究竟该由厂里定价，还是该由买主定价？

高 由他定价就该拿一块钱成本剥削贫农两块钱利润呀？过去的恶霸地主也没有放过那么高的利！

建 高志新同志！你怎么能断定他的杉杆是五块钱一根买的呢？

陈 （被提醒）可是呀！高队长！今年春天的木料行情可比现在高得多呀！厂里的木料都是春夏两季买进来的！要是把现在厂里的存货、存料都按三分之一折价出售，就是叫我倾家荡产，扫地出门，我也是赔不起的呀！

胜 价作的小了你怕破产，作的大了东方叔就不怕破产吗？

高 就让你把这一口棺材高价卖了，剩下那些卖不了的怎么办？涨价的时候卖了现钱归你，落价时候，难道还想把存货按高价交给大队抵你的包价呀？陈焕彩！你作梦！

（唱）

在旺季卖现钱你都花了，
残余货作高价往下移交。
叫群众分棺材群众不要，
你既然怕赔钱谁叫你包？

建 高志新！

（唱）

这时候谈交代有点过早，
你知道到明年包呀不包？

高 (看建, 轻鄙之, 向瑞) 支书!

(唱)

包一年就把些穷人压倒,
再这样包下去岂不更糟。(过)

瑞 这问题的确值得考虑!

建 (唱)

纵不包也得有存货存料,
谁还能不剩个末尾零梢?
倘若是交大队大队不要,
你叫他交代后怎样推销?(过)

陈 不包可以, 要是不接存货存料, 那不是要我的命吗?

高 看你说得多么可怜? 只要价钱合理, 谁能不接你的?

(唱)

一口棺材我给你估价公道,
叫你卖公道价你不开条,
你硬说那样卖成本难保,
别的货你打算怎样移交?(过)

陈 好我的高队长! 照现在的木料价钱, 我也不敢说你估的不公道, 只可惜咱的木料确实是高价买进来的, 你叫我赔, 我赔不起呀!

胜 你既然包了, 赔不赔谁管得着?

高 真要是成本高了就按高的给你核算!

(唱) 按理说赔了钱由你自找,
要不然你怎么还算承包?
大队里不把你便宜来讨,
并不是故意地盼你亏耗,

真要是原材料都买贵了，
按贵的来核算再把价标。
买材料也不能由你乱报，
一件件都需要有据有条，
倘若是哪一宗手续不到，
那就得与卖主查问低高。（过）

陈 不过木料都是零星收买的呀！

高 见鬼！农村里哪来那么多零星杉杆？

陈 （泄气）我的妈呀！

（唱）

高志新他提出要查木料，
倒叫我陈焕彩两眼发烧。
农村里收木料能有多少？
全亏了工程处修建大桥，
在河边偷杉杆捏空假报，
到哪里找卖主查问低高？
这件事刘宏建也不知道，
倘若是露了馅他要掏干我的腰包。
罢罢罢这口棺只好舍了，（还腔）东方！

（接唱）

叫东方我马上给你开条。（切）

李 （幸灾乐祸地）这笔生意总算没有走脱了啊！

陈 （以肘触李，拔笔，向东）高队长说了半天了，这口棺材
你抬走吧！价钱以后再说！（撕纸开条）

高 陈焕彩！要说是看我的面子的话，这个条子你不要开！

陈 不不不！这这这是我要卖的！（开完条付东）

东 （接条）谢谢诸位帮忙！你们办喜事，我不打扰了！（视陈一眼而出）我当你那是官价！（欲下）

〔李玉屏上，遇东。

屏 （向东）你到支书家来吗？我爹来了吧？

东 （厌恶地）在！进去吧！（下）（屏入）

李 玉屏，你怎么这才来？

屏 孩子才睡了！谈了一会了吗？

李 （见陈低头，故意打趣）谈了一会棺材！

瑞妻 （又送一菜上，视桌上）怎么还没有动？

胜 只顾谈棺材哩！

高 （见建亦低头，又进攻）支书！咱们这棺材问题可还没有谈到底啊！

瑞妻 不要尽说棺材，也得计划一下我们的事呀！

李 （见建的狼狈状，想给他解围）对！咱们是给老支书家办喜事的，怎么能尽谈那个呀？我说咱们先安排人家的喜事好不好？

高 （又欲发言，视瑞妻而止）

建 （微抬头，见幸有转弯机会，就勉强提神说）好吧！

瑞 （也无心借这场合彻底解决副业问题，便也就势转弯说）好！大家坐好，咱们喝着谈！

瑞妻 （见话头扭转，将菜置桌上，下）

胜 （斟酒一巡）

瑞 （起立，举杯让酒）

众 （以杯来碰）

李、陈 （以碟来碰，将酒倾桌上）

〔同饮，李、陈以空碟作饮状。

〔外，锣鼓声起，由略近而远。〕

屏 （倾听）这是谁家办什么事？

胜 不，这是团里去迎接一个外来的团干部！

建 （神情较前稍振）不管他，咱们计划家骏的事吧！

瑞 宏建！我有这样个打算，咱们这些接近城边的村庄办个红白事都有个铺张风气。咱们这次俭朴一点，带头改一改好不好？

建 节约是好事，不过也不要表现得太小气了！大不怕大，能办得大而不费，有什么不可以大哩？

高 （背白）我倒看你怎样大而不费！

瑞 大了怎么能不费呢？比方说：受礼不受？

建 受！

瑞 酬客不酬？

建 酬！

瑞 搭喜棚不搭？

建 搭！

李 这些都不费什么！比方说酬客吧，你秋天卖给粉坊那口四十斤重的架子猪，不是还没有得价吗？明天我杀上一口肥猪，你得上你那四十斤，剩下的拿到咱们城里食堂卖了。四十斤肉还不够你酬客？

陈 （也已经喘过点气来）这搭棚更不算什么：咱们工厂有杆、有匠人，俱乐部有棚、有幕布，拿过来一凑，就是个棚！

高 （背白）这家伙们就是有一套捧场的本事。

瑞 （向胜）征求一下你们年轻人的意见：你说受礼好，不受礼好？

胜 我觉得赶得上酬客，就受；赶不上，就不受！

瑞 （失望地）那么搭棚呢？

胜 一样！赶得上就搭，赶不上就不搭！

建、李、陈、屏 赶得上，赶得上！

高 （向瑞）这费不费，不是光怕费了你的！受礼酬客又赔不了钱，谁拿的还不够谁吃？（看建）有时候还是个大沾光的事！可是从送礼的人那方面来说，就会造成一些困难——亲戚朋友们的光景，可是家家都过得一样？拿出来的拿出来了，拿不出来的有别人比着也不得不拿！你想会不会给拿不出来的人造成困难呢？

瑞 我说要改变这种铺张风俗，也正是为了这个？

〔外，锣鼓声由远而近。〕

胜 我只愁的是赶不上！能赶上了怎么办都好！

李 怎么赶不上？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杀猪，还赶不上后天摆席？

陈 搭棚也不成问题……（被乐声所掩）

〔乐队吹打着冲进来，众皆莫名其妙，瑞妻也被惊出。王家骏、马红英随乐队上，看热闹的群众适当上一些，里外均有，乐止。〕

〔骏领英至瑞夫妇前、建前、高前、屏前、胜前，逐一介绍，英随声称之。如下。〕

骏 这是咱爹，（爹！）这是咱娘，（娘！）这是刘大队长，（大队长！）这是高副大队长，（副大队长！）这是妇联主任，（主任！）这是团支书，（支书！）——是咱们的本家哥。（哥！）

〔沉默良久。〕

英 （取信出向建）大队长！这是我的户口迁移证！ （向胜）

支书！这是团的介绍信！

瑞妻 （指英向骏）这是谁？

高 这就是你要娶的媳妇！

瑞妻 啊！ （向英）你怎么自己来了？

英 娘！家骏去叫我来的啊！

瑞妻 （向骏）你怎么今天就把她叫来了？

骏 娘！不是你打发我去叫的？

瑞妻 我几时说过？

胜 婶婶！这话是你说的！你昨天晚上亲自跟家骏说：“你去把她叫来好了！我什么也不准备！”

瑞 （向妻笑）

瑞妻 （严正地）得胜！不用说这是你捣的鬼！

胜 （玩笑地）对了！除了我，谁办得了这个事？

瑞 （向骏）事情这么办倒也好（高插言“很好”），不过你事先该说一下，不要把我们这些长辈人都玩到里边！

胜 我也那么想来，后来又想到不论跟你们谁说透了都办不成，所以……

高 对！（向瑞夫妇）跟你们说透了办不成！

瑞妻 难道就这样连个堂也不拜就算结了婚吗？

胜 要拜个堂还不容易？（拉瑞夫妇至中间）你们站好！（向乐队）给咱们吹打起来！（乐起）新郎、新妇就位！——向家长行三鞠躬礼，鞠躬！（三番）夫妻交拜行一鞠躬礼，鞠躬！向各位来宾鞠躬！（骏、英向周围鞠躬）乐止！（向瑞妻）这不就拜了堂了吗？

瑞妻 （失笑）你要气死人哩！你不先告诉我（指乐队）叫人

家孩子们来给我热闹了半天，我就连口开水也给人家准备不及！

乐队领队 还要准备什么哩？我们每天晚上在俱乐部练习到半夜，谁给我们吃什么来？

胜 婶婶要想热闹的话，就把乐器放到这里，叫他们每天晚上到你这里来吹打都行！

乐队领队 好！事情顺利成功，我们回去了！

骏、英 谢谢你们诸位！

〔乐队吹奏而出，散众亦随之退，骏、英、胜送出而返。〕

胜 （从僻处取出两种礼物向瑞）叔叔！咱们这事已经赶不上酬客了，把这礼物退了人家吧！

瑞 对对对！（向李、陈）对不起！得胜把事情已经办成这样了！

陈 （接锦缎）这……

李 （持镜向瑞）这是他们食堂捎得来的，人已经走了！你收下它，以后给他们送一点什么吃的，不就算酬了客了吗？

英 （视镜）“集兴饭店”，（向家骏）饭店跟咱家有什么来往？

建 孩子！这是咱们大队在城里开的食堂！

胜 不！是大队开的粉坊，粉坊开的食堂！

英 大队开的粉坊，粉坊开的食堂？那也是集体的呀？集体给私人送礼，那账该怎么起呀？

胜 咱村的副业是私人包的，跟你们横岭不一样！

建 （焦急地）得胜！不要解释那么多了！那是三言五语解释得清楚的吗？（向英）孩子！你究竟是当过会计的，一想就想到记账问题！（向李）你还是把那给他们拿回去吧！

集体怎么能给私人送礼哩！

〔李、陈颓然接礼物。

陈 （拉李，背语）就是借他的，叫他拿回去不对了吗？

李 （以肘触之）

〔二人同出。

李 这锅米汤没有熬成！

陈 连锅也砸了！

（幕落）

第六场 查卫生

时 上一场三四天后。

地 贫农王东方家。

景 简朴的农民家庭。

〔二道幕外，李玉屏上。

屏 （唱）

李玉屏，不简单，
小人材长得赛牡丹，
装模作样会表演，
在学校混入共青团。
自从回到十里店，
又在妇联作了官。
只因我俊俏又能干，
我的爹把我当貂蝉。
大队长，刘宏建，
他在村里掌大权，

我爹把我往他家献，
封了个经理大赚钱。
他有权，他有钱，
我玉屏如鱼得水混在中间。
也只说光景常美满，
却不料近来起波澜，
王家俊回到十里店，
在共青团里当教员，
终朝每日讲路线，
把贫下中农捧上了天。
穷小子听了他的劝，
在我们背后起闲言，
马红英又和他来作伴，
进门来三天就入妇联，
她在省里是模范，
这个影响不平凡——
倘若是妇女们跟着她转，
岂不要挤掉我这芝麻官？
凡事总要早打算，
趁此时我还得专一专权——
检查卫生归我管，
我给他制造一点小为难。
叫声众位小伙伴，（女青年甲乙上）
本主任和你们谈谈天。（切）

我问你们个事：你们说是咱们家里边卫生呀，还是贫下中农家里卫生？

甲 当然是咱们家里卫生了！

屏 咱们这次查卫生，评分数可得公道啊！

甲、乙 那自然要公道了！

屏 你们说象俺姑父家能评几分哩？

甲 我说该打一百分！

乙 就不打一百分，也得打九十好几！

屏 （指甲）你家哩？

乙 她家也得打九十以上！

屏 （指乙）你家哩？

甲 她家跟我家差不多！

屏 象我娘家哩？

甲、乙 那没有问题该是一百分了！

甲 那崭新的房子，住着多么痛快哩！

屏 象王东方家哩？

甲、乙（轻鄙地）嘘！

乙 要比起咱们几家来，他家连一分也评不上！

甲 也不能一分也没有，不过总不会及格！

屏 要按公道评，该有就有，该没有就没有！这可不能象王家骏一样，讲什么路线！

乙 路线是路线，卫生是卫生，讲路线就能把家里讲得合乎卫生了吗？

三人合 哈哈……

屏 现在咱们也安排个“路线”，咱们先从我家、我娘家、我姑父家和你们家查起，先树立个卫生标准，然后再到王东方他们那些贫农家里查去！这样一来，就把他们比下去了！

〔马红英与女青年丙丁同上。〕

英 人都来齐了吗？

屏 齐了！就等你们了！走吧！（同下）

〔二道幕开，王东方家——一般贫农家庭。东方母依枕坐床上。〕

〔姑且定为大起板开幕，乐调低沉。〕

母 （唱）

家贫穷年高迈又多病患，
东方儿未成家形影孤单。
土改后本应该步步如愿，
却不料这几年情况倒颠：
小宏建又站到剥削一面，
有利事都不让旁人沾边。
这样的伤心事谁能再看？
咽不了这口气且度残年！

〔李玉屏引四青年（女）及马红英上——马红英在后。〕

英 （唱）（转流水）

想了解十里店日子太浅，
趁这次查卫生正好参观。
已看了好几户家境丰满，
都不象庄稼人朴素简单。
也许是城边人富裕一点？（过）

〔入门，众作巡查状。〕

英 （唱）

这一户为什么这样贫寒？（过）

母 （远向屏）那是玉屏？

屏 （吮唇相认，不答）

母 你们都来做什么来了？

甲 查卫生！

乙 看这屋里乱七八糟摆得象个啥样子？

母 （怒视，昂头欲言，又忍气而止）

英 （唱）

东西多却放得有条不紊，
想必是只有这一个房间。（过）

〔玉屏与甲、乙乱翻衣被。〕

英 （唱）

她的儿莫非是孤身鳏汉，（鳏：此处念“夸”）
没有人给他家缝缝连连。（过）

甲 看这！好象一辈子也没有拆洗过！

母 你不知道我没有人做？

乙 打几分？

甲 零分！

英 （向母）老奶奶！你家要是没有人做活的话，以后有活叫我一声，我帮你做！

母 （视英，不识）这个是谁呀？

丙 是人家家骏哥的新媳妇！

母 唉！看这小瑞多么大福气呀！又一辈子也成人了！

甲 （以炊帚擦锅底）看这锅底尽是黑！

母 你管得着吗？你家那锅底是白的？

丁 （向甲）不要故意惹老奶奶生气！

屏 卫生不能不查，谁惹她来？

乙 她气是她自己找的！几分？

甲 零分！

英 （唱）

这几个都穿得光光灿灿，
见穷人他们就擦掌摩拳，
十里店真走了错误路线，
到如今还会有这样的青年？（切）

甲 （下视）怎么地上还堆着一堆土？（踢了一脚，扳起来揉，又审视地下）萝卜呀！怎么把萝卜埋在土里？（以另一脚又踢了两下）

母 你们家的萝卜都锁在箱子里呀？怎么踢开了你怎么给我埋住！我的萝卜犯什么罪了？跟抄家一样！

英 （点头自语）好，这老奶奶顶得住！（埋萝卜）

甲 不用给她埋，什么宝贝！

母 那就是我的宝贝！你不知道我穷？

屏 穷也罢，富也罢，总得把屋里打点得象个样子！看这（且翻且说）又是煤、又是土、又是锨、又是锄、锅锅碗碗、缸缸罐罐、破鞋烂袜、油盐酱醋，都塞到一座房子里，简直象个烂货摊子！

母 你不知道我穷！修不起房子？我东方要象人家那些昧着良心胡捞摸的人呀！我还不会新修上一院！把什么都放得舒舒服服的！

屏 这老婆这大了，说话跟拉着棘针一样！新修房子也是什么短处！

母 难道只有我埋几个萝卜才是短处！（喘了口气）

英 老奶奶！你歇歇吧！（扶母）

屏 穷你怨谁？如今是按劳分配，谁富也不是偷来的！

母 真要是按劳分配呀，小玉屏！你喝水！（英插语，顶得好！）

（唱）

我东方只磨得满手是茧，
看你们两只手软软绵绵，
不劳动修下了新房大院，
劳动的住的是破瓦碎砖，
不劳动每日里穿绸摆缎，
劳动的常常是少吃无穿……
倘若是按劳动分粮分款，
刘宏建、李天泰劳动过几天？

屏 （唱）

谁家富是谁有经营手段，
难道是偷来的不敢见天？
公是公私是私有账可算，
哪一家没本事不要眼馋！（过）

母 呸！恶心，那种来路不明的钱财我不眼馋！我也不会算账，我只知道平分土地的时候，我家分的东西和你们一样！我只知道我母子们都劳动，你们家不劳动！你给我说说你们修房盖屋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你们会经营！你姑父早替你们讲过啦！

（唱）

这道理不用你玉屏来辩，
地主们早比你讲得周全！
我老婆不会写也不会算，
土改时还记得一句常言：

“只能是劳动者创造财产”，
普天下不会有现成的银钱，
哪一家剥削了群众血汗，
吃的是昧心食他怎敢见天？

屏 (唱)

你从前只落得沿街讨饭，
村干部照顾你才把身翻！
到如今忘了本心怀不满，
出恶言骂干部你无法无天。

母 (唱)

讲翻身我比你有点经验，
可惜你小娃娃记不得从前。

(垛板)

你姑父给地主当过总管，
在村里吼一声动地惊天；
土改时斗得他磕头捣蒜，
口声声求我们把他容宽；
你的爹还替他隐瞒财产，
被我们查出来哑口无言。

(转)

刘宏建他倒是坚决勇敢，
都说他与地主不共戴天，
谁知他近几年坏了心眼，

屏 啊！这话可是你说的呀，指着名骂大队长，我看你老婆有多大本事！

母 我才骂开头呀！

(唱)

同一伙剥削鬼滚成一团。
一自从和你家结为亲眷，
你的爹你姑父一步登天，
你们把大队的副业包办，
不是亲不是故不得沾边，
你姑父那一个地主总管，
又出来当经理摇头晃肩！
小玉屏你也敢把我教管，
难道说真成了你们的江山？
不止是我老婆心怀不满，
谁想到十里店地主变天。

屏 (唱)

说我们霸副业可有证见？

母 (唱)

见证人也不止上万成千！

屏 (唱)

你跟我见队长去把理辩，

母 (唱)

刘宏建搬不动我这尊神仙！

屏 (唱)

依你说人老了就该造反？

母 (唱)

造反的是你这仗势的青年！
到我家就好象查抄家产，
又好象捉住贼来把赃翻。

我母子又不是贪污罪犯，
也不曾给地主藏过银钱，
平白地搜查我是谁造反？
这不是仗势力欺我贫寒？（凑到床边）

屏（唱）

我们来查卫生公事公办，

母（唱）

这卫生你不管我多活几天，（勉强下地）

屏（唱）

既然是查一次我就要查遍！（过，命甲、乙“查！”
甲、乙翻）

母（唱）

破上我老性命对你个青年！（投身向玉屏撞去，
英等急扶，虽未倒地，但已昏迷，乃抬至床上，急切呼
救）

屏、甲、乙（见势而逃）

英（抚母胸）奶奶，奶奶！（旁视，不见屏）主任哩？

丙她们跑了！

英倒走得干净！

（向丙、丁）你们能把她们拖回来吗？

丙可以！我们多叫些人去！（与丁同出门）邻居们都快来
呀！玉屏把小屋奶奶气死了！（同下）

〔邻妇等急跑上至床前与英同呼救。〕

妇嫂嫂！嫂嫂！

（向英）玉屏哩？

英跑了！

妇 跑了就算了呀？不行！

〔一男青年拖屏，原丙、丁拖甲、乙上。

男 （将屏甩在地上）跑的倒快！只有你们活的了！

屏 （站起）死也是她骂人累死的！我给她抵不成命！（仍欲走）

妇 （跑过来拖住屏）回来！死了你不用给她抵命，等她活了给赔情！逼死了人命，你还这么厉害！（向男）把咱村的主要干部都请来，给咱们评评理！

男 （出门欲下）

丙 （追出）一定把高队长和团支书请到啊！

男 （点头）知道！知道！（下）

东 （内唱）

一听说我的娘出了危险，

（上唱）

恨不得一步儿跑到床前！

战兢兢我只把老娘去见！（过）

（摸母口鼻呼吸）

（唱）

只剩点悠悠气闭口无言！（过）（巡视床铺、锅灶、农具、烧土，最后向屏）

李玉屏，你来！（拖屏）

屏 （被拖，无力挣扎，只得随东手势进退）

东 （一手拖屏，一手指室内各个角落）

（唱）

查卫生为什么这样捣乱？

我以后住房子还有权无权！

(又拖屏至床前)

我的娘倘有个三长两短，

定要你李玉屏把她的命还！

(将屏推出，屏立脚不稳，退了几步。)

妇 东方！

(唱)

你的娘真有个三长两短，

连装殓带出殡要她承担——

定向她要一副柏木材板，

省得用陈焕彩那一副杉棺！

〔王瑞、高志新、王得胜、刘宏建随男青年上。〕

瑞 东方家出了事，

高 东方家出了事，

(唱) 急忙去看！ (过)

胜 东方叔家有事，

建 小玉屏闯下事。

〔进门，至床前抚视。〕

〔新到四人连前众人均大声呼救，称呼不一。〕

母 (喘上气来，头频频动)

众 (加重声音急呼二次)

母 (咳出声，起溅板)

(唱)

小玉屏你把我老命摧残。(切)

建、屏 (精神松弛下来，表示过了一关)

〔众各易位，随势坐立。〕

东 (已释重负，对众略施主人礼，仍倚床侍母)

瑞（居中坐定）怎么能闹得这样严重？刚才都谁在场？

英、丙、丁（趋瑞旁）

屏（无可奈何地也向前凑）

丙（向瑞指甲、乙）还有她们！

甲、乙（凑如屏状）

瑞 你们查个卫生，为什么要惹老人生气？

甲 是她先骂我们的！她不让我们查！

丁（指萝卜）看你给人家“查”成什么样子了！

胜（指房中杂乱状）照这样查法，谁也不让查！这哪里象查卫生？这和抗战时期日军来过一趟差不多！

乙 那是她自己捣乱了的！

妇 说瞎话也得有个影子！她一个来月就没有下过床，会来捣这个乱呀！

屏 我说！

妇 你把人气死了还会没有理？还是让别人先说吧！

英（忽有所悟扫视众人，背语）马红英！

这是你讲话的时候了啊！

（唱）

家骏说十里店黑云弥漫，
今日里一件件摆在眼前，
老奶奶讲出来历史演变，
前后事一对照十分自然。
刘宏建虽有进步一段，
可惜他滚进了投机集团，
若要想压一压他的气焰，
就须得把错误当面揭穿。

趁此时集中了领导骨干，
贫农们又站在进步一边，
有这样凑巧的工作条件，
我何不作一个现成教员？

众位！

姐妹们倘若是碍口碍面，
我这个新来人可否发言？（过）

高 （向瑞、胜）各位！让这新媳妇谈谈，
一定可以客观一点！

瑞、胜 可以！

建 她是个新媳妇家，可能摸不着情况吧？

英 大队长！

（唱）

我来到十里店日子很浅，
对谁家也不会有向有偏，
（瑞、胜、高插话，“对！你谈吧！”）

倘若是哪一点讲不全面，
老奶奶与主任都还在跟前：

（转垛板，缓慢地）

姐妹们介绍我入了妇联，
今日里查卫生我也随在里边！
开头来跟大家走了几院，
一家家都显得舒服安闲。
这几家都有个共同特点，
哪一户也没有锄耙镢锨。

（胜插：哼！人家还用得着那个！）

我有心把他们都讲一遍，
怕的是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只说说那一座四合小院——
有一位老太太打扮得新鲜——
金耳环金戒指明光闪闪，
青绸袄青绸裤月白包边：

（胜插话：胡宗文老婆）

（高、瑞点头）

房子里擦摸得一尘不染，
有几幅古字画墙上高悬，
几案上摆着些磁瓶磁罐，
床上有锦缎被毛毡绒毯。
李主任说人家是卫生模范，
评了个一百分称赞连连，
临去时跟人家屡把头点，
连声说“老姑姑麻烦麻烦”！
看见了这些户生活美满，
暗自与我娘家比较一番——
我想是城边人富裕一点，
生活上强似那野岭荒山。（下转流水）
查到了这一户情况大变，
与那些比起来相隔天渊。
若说他不劳动性情懒散，
明晃晃摆的是锄耙镰锨。

（指一角落）

象这样贫穷户我还是初见，

(胜插：咱十里店可不少这个！)

为什么他一直穷到今天？(过)

高 啊！这问题问得有意思！(向瑞)你给孩子解释一下吗？

瑞 唉！(略摆头)

高 (向建)宏建同志！你说是为什么呀？

建 (搔头)这，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吧，还是应该先谈查卫生的事。

胜 这不就谈的是查卫生的事吗？

建 咱们要听的不是查到这里怎么发生了争端吗？

高 事从根起，我觉得听听这老根上的情况也很有好处！(向英)孩子！你往下说吧！

英 众位！

(唱)

这一家虽贫穷并不懒散，(垛板，杨排风调)
可能是只有这小房一间。
屋里边东西多有条不紊，
粗是粗细是细秩序井然。
李主任进门来看不顺眼，
老奶奶招呼她她扭过一边。

(屏向英呶嘴表示抗议)

有几位姐妹们横眉竖眼，(甲乙呶嘴)
东挑挑西剔剔任意乱翻：
在床上把人家被褥抖乱，
用炊帚刷人家锅底的煤烟；
把地上烧土堆一脚踢散，

在土里埋好的萝卜露出外边。

(转流水)

一样是村里人每日见面，
她们和这一家有什么仇冤？

(过)

甲 不要让她说了！尽是加油添醋地瞎说！

丙 瞎说？（指床上）大家看！（指地上）大家看！

丁 （取过炊帚举起）大家看！

妇 （夺过炊帚）人家洗得净净地，为什么给人家擦成这个样子？（向屏）玉屏！这碍你们的什么事？（伸向屏脸上）

屏 （急闭目躲避，但未躲及，被抹了个黑鼻子）

高 （向瑞）你说这些孩子们，和东方家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瑞 唉！（又略抬头）

高 （向建）你说哩？

建 （怒向屏）唉！你们是怎么搞的？

胜 哼！人家都是在什么样的家里长大的？

高 （向英）讲讲讲！往下讲！

英 众位！

(唱流水)

老奶奶见把她东西抖乱，

说他们不讲理欺负贫寒。

(妇插：这明明的欺负人嘛！)

主任说如今是按劳分款，

谁家富也并非偷来的银钱。

(建插：对嘛！)

奶奶说劳动者满手是茧，
看你们两只手软软绵绵。
十里店真要是按劳分款，
大队长与你爹劳动过几天？

（过）

建 （微笑）你看这老人家！每个人的经营计算本领不同，就是同样劳动吧，日子能过得完全一样吗！

英 大队长！主任也是那样说来啊！

（唱）

主任说谁叫你不会计算，
只怨你没本事不要眼馋。
奶奶说劳动者创造财产，
普天下哪会有现成银钱。
不劳动就都是剥削诈骗，
吃的是昧心食不敢见天。（切）

建 （怒，但压制了一下）这老人家骂得我们有点过重了！难道我，我真是个只顾自己的人吗？（向瑞、高）翻身的时候，咱们也照顾过她呀！

英 （向建）唉！主任也跟你说的——一样啊！（唱垛板——中速，借用流水过门起）

主任说奶奶讨过饭，
干部照顾她把身翻，
翻身忘本心不满，
才对干部发狂言。
只惹得奶奶气难按，
她把那土改的老账端：

她说我翻身有经验，
可惜你娃娃记不全；
你姑父给地主当总管，
你爹替他藏过银钱。
他们瞒不过群众的眼，
在斗争会上过不了关——
你姑父磕头如捣蒜，
你的爹一旁口难言。

（转流水）

大队长那时候坚决勇敢，（加速）

（建精神大振）

都说他与地主不共戴天！

谁知他这几年——（拖）

（建、瑞、胜均注视，胜插：怎么样？）

……坏了心眼！（过）

（建对英问：啊？我坏了心眼？）

英 大队长！这是奶奶说的呀！

（唱紧垛板）（仿母神气）

与那些剥削鬼滚成一团，（仿母指屏）

他与你家结亲眷，

又把那“总管”捧上天。

大队副业你们包办，

非亲非故沾不了边。

你玉屏也敢把人管，

又该你们坐江山。（转洪板）

不止我老婆心不满，

谁肯叫十里店地主变天？

(瑞、建、高、胜同大震，但建与瑞互视，高、胜则视建)

(一声锣转散板)

李主任辩不过又要查检，
老奶奶强挣扎想把她拦。
老奶奶身带病气息奄奄，
一踏地站不稳跌在床前。

瑞 (起立唱)

小红英她真有阶级观点！
两件事问的我不便回言，
老婶娘也看出危险的演变：
这问题要解决再不能拖延！

众乡亲！

十里店这几年如此混乱，
主要与党支部领导有关。
我王瑞这个人情面过软，
无原则纵容了执政的党员！

宏建！

近几年你和党越离越远，
与那些旧渣子扯扯连连。
今日里要你个鲜明表现，
愿作人愿作鬼倒在一边！

东 老瑞哥！

(唱)

这番话你何不早讲当面，

省我们摸不透世道的变迁。

妇 (唱) (向身边邻众)
新媳妇把公公气都问断，
就该叫小家骏早娶几年！

高 (唱)
好一个马红英有识有胆，

胜 (唱)
一阵风吹动了满天云烟。

高 (唱)
党支部与群众态度明显，

高、胜 (合唱)
看一看刘宏建他倒向哪边！

建 (唱)
满屋里俱都是枪声炮弹，
震得我刘宏建坐立不安：
欲待说认了错——不敢，不敢，
认起来简直是罪恶多端，
欲待说不认错再去答辩，
马红英揭得我没了本钱！ (过)

有了！
不如我巧辩解态度和缓，
表面上认错误实际推翻。

众位！
我只说旧渣子成分改变，
解放后改造了十五六年，
倘若是对他们长期冷淡，

怕他们待久了情绪不安，
这怨我丢掉了阶级观点，
只想了一面理照顾不全。

东 大队长！

（唱）

自古以来劳动者千千万万，
都压在石板底辈辈相传。
十几年就算是长期冷淡，
难道说就该把我们冻干。

建 众位！

（唱）

有些事咱农民不会举办，
还不得不用些技术人员。

东 （唱）

缺了人就得用地主总管，
劳动者算不算已把身翻？

妇 （唱）

小宏建你原是长工雇汉，
却怎么学会了字眼算盘？

建 （唱）

群众们问得我无言答辩，
认一笔糊涂账暂且过关！

支书！

这一阵我觉得头脑昏乱，
是不是允许我想想再谈？
我保证仍站在党的方面，

与那些旧渣子割断牵连！（切）

屏 （扭身抗议）

瑞 好！欢迎你先向大家表示这样个态度！（握建手）

高 宏建同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还讨出你一句话来！

（握建手）欢迎你这个勉强的开端！

瑞 仅仅是个宣言，连开端也说不上，不过这也是好的！（向众）同志们！今天不是因为查卫生引起了问题吗？我觉得十里店的卫生须得从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查起！

（内汽笛声由远而近，且可听到停车，门开关）

众 汽车，汽车！

瑞 不要管它！（续前讲话）党支部、团支部要着重查思想，大队要着重查经济和用人！我们要趁这春节前后彻底清查一下，把这几年的乌烟瘴气消除消除！

胜 对！那才真是讲卫生哩！

〔骏跑上。〕

骏 爹！大队长！县法院来了个工作组到咱村查案来了！请你们到大队部去哩！

瑞 查什么案？你问来没有？

骏 听说是胡宗文勾结奸商盗卖国宝，县里把他捕了，不知道跟咱们村里还有什么牵连！

屏、建 （大惊失色）

旺 （急至建前）大队长！（掏钱）我要交代一件事，一共一百五十块钱。这是五十（递钱给建）你且拿住，回头我再给你那一百……

建 （拒接）什么钱？

旺 你接住我才能跟你说！

建 （坚拒）不、不、不！你不欠我的……

胜 （向旺）我替你接住！什么钱？你说！

旺 是木工厂偷杉杆的时候，陈经理私自给我的。

建 （斥旺）你不要趁火打劫！木工厂的杉杆，是花了两千块钱买人家钻探队的破架杆！

旺 这你瞒不了我！杉杆是在大桥边偷的，我装的车，一共偷了十五车！

建 （如梦骤醒）啊？（大怒）陈焕彩，你认得我刘宏建吗？

高 他认得你，可惜你认不得他呀！

建 我真是个——唉！二百五呀！

高 （向建）你看那些人本事大不大？

瑞 （向建）县里来人了，咱们看看去吧！（同建向外走，众亦有随之下者）

英 （向青年）来！咱们给老奶奶收拾一下房子！（大家动手）

（幕落）

（剧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焦裕禄*

(上党梆子)

第一场

时间 一九六二年冬。

地点 兰考车站。(附车皮一景)

布景 台中横遮布做的车皮,上开三窗,此景只用四尺高,车皮后用幻灯反射风沙盐碱地,从右往左退去,表示车在行进中。

人物 焦裕禄

王连发 六十余岁老贫农。

王大娘 连发妻,略小于夫。

李彩云 连发之儿媳,二十余岁。

李呈祥 彩云之父,略小于连发。

小 胖 铁匠,三十余岁。

小 虎 铁匠,亦三十余岁。

群 众 三四人(视条件而定)

* 这个剧本是赵树理同志一九六五年写的,是他最后一部作品,还只写了三场,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搁笔了。

车站服务员一人。

〔由汽笛声开始，稍奏一段打击乐器，接奏弦乐《渡灵英》乐子曲牌，能象微风声的曲牌亦可，杂以火车前进之效果声，由远而近，由快而缓，转速度较快之《一马三箭》。在唱腔中火车效果声时大时小，直至本段唱腔完毕为止。

焦裕禄 （内唱）陇海路道贯东西，
〔幕开，焦裕禄在正中车窗里向外看。
（接唱）来到了兰考老灾区。

擦擦车窗看仔细，
风沙滚滚压天低。
汪汪积水冰封死，
碱起如霜枯草稀，
村庄罩在灰尘里，
一片荒凉好惨凄。
省委调我来当书记，
与兰考人民共呼吸。
灾难重重我不怕你，
幸福都是人造的。
要领导人民斗天地，

不向灾难（缓速）把（汽笛短鸣）头低。（汽笛长鸣）

〔二幕关，内换景。转“流水”，节奏又慢于前，火车效果声亦随之。

〔王连发背行李与王大娘同上在幕前。

王连发 （连句唱）

一口气接不上一口气，

这两条寒腿步难移。(坐地)

王大娘 看你这老头子，我说不去吧，你偏要逞强，你不走？

(急俯身搀扶)

[广播声：“各位旅客们，兰考车站到了，列车在兰考停驶五分钟，在兰考下车的，请你赶快下车，兰考车站到了！兰考车站到了！”

[虎子担风箱、工具等物，胖子随之上，虎子慌慌张张向前去，风箱将碰王大娘背，急停。

小 虎 快起来，车已经进站了。

王大娘 (回身视虎) 能起来他不早起来了？

小 虎 连自己也顾不了，出去干什么？靠边些！

王大娘 再迟三十年你跟他一样，你这急发财。

小 虎 少说废话，发财不发财你管得着？你这老婆子！

王大娘 小虎子，我这个老婆子把你怎么样了？

小 胖 虎子，不要跟大娘吵，跟这边挤一挤不就过去了吗？

小 虎 不，我得问问他凭什么挖苦人！

王大娘 “急发财”是队长在大会上说你的！

小 虎 他都管不住我，你还想管我吗？你说就不行！

小 胖 走吧！不要说了！

小 虎 不行！我小虎也不是好欺负的。(向大娘)你不是急发财，你出去干什么？

王连发 (斜身强坐) 我出去找我的孩子，不是到外边抢钱去！

小 虎 我抢是我有那本事。你不抢？

王大娘 我们还要顾个脸哩！

小 虎 你这老婆……

小 胖 走吧，快开车了！（虎一惊，靠里边挤过去，胖随虎急下）

王大娘 （向虎去向）说了你了，急发财！急发财！（扶连发起，并代背行李同下）

〔二幕开，左侧幕上挂“候车室”一牌，后幕用幻灯映出小车站上简单景物一角。开幕时有三、四群众欲入候车室，被服务员挡住。胖、虎同上，虎急向前冲，风箱撞在一个群众身上。〕

被撞者 （回视虎）真冒失！

〔小虎挤至前边硬要进去，焦裕禄出在右后方，观察现状。〕

服务员 老乡们不要挤了，这次车已经满坐，等晚上那一趟吧！

小 虎 我们开的有证明！

服务员 都有证明，可是这一次车已经满坐了，等下一趟吧，天天有往外迁移的，一天有两趟，车留的有坐位，可惜要往外去的人太多，只好挨次上车，晚上再走吧！

小 虎 那么多的车厢，多上一两个人有什么关系！（仍挤）

服务员 不行，车站有车站的制度。（急挽之）

〔广播声：“旅客们！往东去的客车马上开车了。”〕

小 虎 （与胖示意低声）快，挤！

〔小胖摇头。小虎又一次冲。〕

服务员 （推虎，严词拒绝）不行，这是制度！

小 虎 什么制度？多挤上去一个就能多走一个。（向后打招呼）咱们大家一齐挤！

〔众有随之者，有的摇头。〕

焦裕禄 （急跑来，与服务员共同挡住虎）什么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通制度！你带的什么头？

小 虎 （听出焦的外地口音，又见焦的服装与农民无异，挂着个包儿，只当是外地农民才下车）你这外路人管不着俺兰考的事。

焦裕禄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维护国家制度。

〔广播声：“到车站送行的，请你们靠后一点，列车就要开动了！”〕

〔汽笛声，小喇叭声，火车开动声，车行声由缓而速，音量由大而小，将消失时，王连发与王大娘随声跟上，一声锣，王老夫妇止步，虎子放下担子。〕

小 虎 唉！（唱）

听见开车可真泄气，（过）

王连发 怎么？车已经开了？

小 虎 （视发）嗨！（唱）

你俩害得我真倒霉。

〔李彩云上。〕

李彩云 （唱）

连年灾荒少柴米，

多少人家各东西。

公婆要往商丘去，

苦苦挽留不肯依。

要死要活在一起，（发现连发夫妇）

急忙上前夺行李。（切）

（从大娘肩上取下行李置地上。）

爹！娘！昨天晚上已经说好不再去找他了，我去搂了点柴禾，你们怎么又跑了。

王大娘 我说不去吧，你爹还是那股牛劲。

王连发 傻孩子，有办法谁肯往外走。

李彩云 我不是跟你说过有办法吗，我是个全劳力，出勤不比别人少，人口也不大，就咱们三个，咱们要没办法，人家那些五口六口的就都不过日子了吗？

王大娘 就这两副老骨头，还愁得他睡不着觉哩！

王连发 找着他总会比光靠你有办法，商丘又是个方便的地方，怎么也要比兰考好活一些。

焦裕禄 老大爷，你要到商丘找谁呀？

小 虎 （向胖）这个人真管得宽。（向焦咧嘴）你管人家找谁哩！

王连发 （视焦）你是山东人吧？（焦点头）在商丘呆过吗？

焦裕禄 到过，没有多待。

王连发 找我的孩子去！

李彩云 找着也不行，他那工作是流动的，又不在于一个地方安家。

焦裕禄 （指云向发）这是你的女儿吗？

王大娘 （代答）是俺的儿媳。

焦裕禄 你的儿子做什么工作？

王大娘 是水利什么……什么队呀？

李彩云 （代答）勘探队！

焦裕禄 水利勘探队呀！老大爷，你不要去了，那种工作流动性很大，等你到了商丘，就说不定他还在不在商丘哩。

李彩云 是呀，我跟他老人家说过多少次了，就是说不转他。

王连发 只要见了面，不管他往哪里流，他总不能把他的爹娘扔了。

李彩云 唉，爹呀！（唱“流水”）

你的儿他在勘探队，
今日里东来，明日里西。
留下我照顾家里事，
拉（干）公拉（干）私两相宜。
你到工地找他去，
他那里自然没处推。
顾了工作顾不了你，
岂不是制造新问题？

焦裕禄 这个青年真懂事。（向发）老大爷，看这媳妇想得多周到，孩子干的是国家工作，是为大伙服务的，有这样好的一个儿媳妇在家照顾你，你何必出去给他添麻烦呢？

小 虎 （向胖）听这口气，这个人好象是当过干部的。
〔李呈祥匆匆上。

李彩云 （见祥，向发）我娘家爹也找来了！

李呈祥 （走向发）亲家，怎么不吭气就跑了？逼你那两条好腿哩？

王连发 要有两条好腿我倒不跑了。

李呈祥 腿不好，跑一下就好了吗？

王连发 腿好不了，跑到个好地方，总比兰考好活一点。

李呈祥 你倒成了个老蝗虫了。

王连发 能吃不能干了，还比什么老黄忠哩。

王大娘 人家谁说你是老黄忠？

王连发 亲家说的呀。

王大娘 说你是老“蝗虫”！

王连发 老蝗虫，这还差不多。

李呈祥 亲家，这个当蝗虫的思想可不对头呀！

（唱“流水”）

那蝗虫自古就不种地，

哪里好了往哪里飞。

灾区人民都象你，

那就要吃光丰产区。

焦裕禄 （笑）嗨，讲的好！（向祥）老大爷你贵姓？

李呈祥 我姓李。

焦裕禄 （指发）这位大爷呢？

王连发 我？

李呈祥 他姓王。同志你贵姓？你是山东人吧？

焦裕禄 （向祥）是的，我姓焦。李大爷，怨不得你这女儿那么懂事哩，有你这样当爹的，就会有那样懂事的女儿！

李呈祥 懂得什么！我们是庄稼人。

焦裕禄 我也是庄稼人，可不要看不起自己，咱们劳动人民最容易接受真理。

王连发 道理都懂得，就是生在这沙窝里难活人。

李呈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难道全兰考三十六万人都跑光了吗？

王连发 没处去的自然也只得瞎熬，不过困难就是了。

李呈祥 没有搞得好的地方吗？

王连发 有搞好的地方也不让咱去呀！

李呈祥 咱去人家那里干什么？咱们自己搞。

（唱）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沙窝里也能树红旗。

普天下没有容易事，
一切事情在人为。（送二板）

焦裕禄 对啊！（唱）
兰考人民都象你，
克服灾难没问题，
到处能造新天地，
困难只把软人欺。

（向众）众位！

（唱）李大爷这人有志气，
愿我们大家都学习。

（向发）王大爷！

（唱）他的意见你考虑，
我觉得那是好主意。

〔广播声：“喂！新来的县委焦书记，焦裕禄同志，站门外有人找！”〕

焦裕禄 （抬头，侧耳听）

〔广播重播一遍。〕

焦裕禄 喽！有人找我，（向祥等）再见！（下）

全场人 （同望焦后影）焦书记？（起“流水”）

小 虎 （唱）那就是县委新书记？

小 胖 （奚落地）（唱）

好象是当过干部的。

外路人管不着咱兰考事，

小 虎 （唱）我这话说得也太冒失。

王大娘 （唱）看人家说话多自己，

王连发 （唱）没有一点官架子。（或“句句话说在咱心里。”）

李呈祥 （向发）（唱）我提那意见你考虑，
李彩云 （向发）（唱）要同意咱们都回去。
王连发 （唱）你们说不去咱就不去，
王大娘 （唱）懂话的才是……好孩子。
王连发 去你的！
〔发、大、祥、云取行李同下。〕
众 咱们也不走了！
众之一 （唱）焦书记劝咱们立大志，
其他众 （合唱）在沙窝里边显本事。（众同下）
小 虎 （向胖）
（唱）剩下咱俩省得挤，
到候车室里去休息。
小 胖 （唱）
你要去你就独自去，
我不再跟你当财迷。（从工具箱里取锤还虎。）
你这柄大锤我还给你，（挑起担）
你往东来我往西。
小 虎 （拉胖）（唱）把家具借我使一使，
小 胖 （推开他）不行！（唱）
回队里我还要打农具。（昂然挑担下）
小 虎 （唱）他们大家都回去，
剩下我这个……（想不出说什么好，忽然看见大锤，
拾起）
（接唱）——卖锤的！
胖子不去我也不去，
我还得跟他合（念格）伙计。（往下走） （落幕）

第二场

时间 数日后。

地点 张书记办公室。

布景 一桌二椅。（摆法由导演定之。）

人物 焦裕禄。

张书记。

〔幕启：二道幕前焦裕禄上。暂定“西皮原板”过门上。〕

焦裕禄 （唱）天边月早被那沙尘笼罩，（原板）

地上人早睡得静静悄悄。

为只为治风沙盐碱内涝，

月光下把情况详细解剖。

这几天在乡下（转二行）见事不少，

见群众苦挣扎勇敢勤劳。

抗灾中有许多发明创造，

综起来就都是成事的根苗。（抬头看）

见老张房子里灯光外照，

为此事我何不找他聊聊。

焦裕禄（截开）趁月光（拖开）步至甬道！（下）

〔二幕开，张在座，又转原板。〕

张书记 （接唱）为兰考遭灾难叫人心焦。

救济车如流水赶不上需要。

逃难的挤满路东奔西跑。

有一些干部们要求外调，

还有些虽不走情绪不高。

看不出这局面（转“二行”）何日是了，
这一副千斤担怎样来挑。
上级党为加强县委领导，
前几日又派来一位老焦。
我找他他已经下乡去了，
且等他转回来再把他邀。（转“摇板”）
心有事睡不着翻看材料，
〔焦上打门。

半夜里是何人来把门敲？

（张开门见焦）

张书记 （握手）老焦，刚想到你，你就回来了。快请进来！

（焦进门，同坐）

张书记 这几天跑的地方不少了吧？

焦裕禄 地方大了跑不遍，跑了几个重灾区。

张书记 老焦，我是个本地人，被灾荒缠得看不着头尾（念以），
你是刚来的，一定比我清醒一些。你看咱们这个地方
有没有好转的希望？

焦裕禄 我是头一次下来，了解的情况太少，不过还见到一些
积极因素。（张精神略振）我觉得有困难，有办法，
还是个大有所为的地方！

张书记 啊！（精神大振）老焦，（伸食指）就这句话，听听
也过瘾，在兰考早听不到这句话了呀！（暂不定调）

（唱）兰考县早已被灾难压倒，
许多人提起来常把头摇。
就这句壮胆话也难听到，
听一听它也能给人撑腰。

问老焦你看出什么奥妙？

焦裕禄 (唱) 有群众几十万勇敢勤劳，
这些人只要有党的领导，
又何愁兰考县灾难不消！

张书记 (唱) 这原则也不是都不知道，
只可恨灾情重火烧眉毛。
论自然是盐碱风沙内涝，
论群众难糊口东奔西逃。
论干部有些人坚持不了，
有利的好条件不占一条。
上级党委我们来作领导，
你看这千斤担怎样来挑？

焦裕禄 老张同志！

(唱) 张同志你既然生在兰考，
对兰考详细情况早已明瞭，
那许多消极因素被你看到，
作一个负责人难免要心焦。
须看到好中有坏坏中有好，
咱们要一分为二详细解剖：
论群众三十六万留多去少，
在难中艰苦奋斗勇敢勤劳。
为抗灾也有许多发明创造，
封沙丘翻碱地排水挖壕。
这经验没有把它总结成套，
任凭它在各地点点滴滴翻来复去自长自消。
干部们对工作前途渺渺，

自不免影响情绪常把头摇。
依我看主要问题在于领导，
党委的责任心急需提高。
党既然让我们领导兰考，
那就得把困难全揽全包。
好条件要大家积极去找，
与群众战天斗地决不辞劳。
干部们看到咱领导可靠，
那就能听号令不再动摇。

张书记 老焦！

（唱）老焦果然有奥妙，
你的见识比人高。
怎样动步你可想到？
何不趁此聊一聊。

焦裕禄 老张呀！

（唱）这几天晚上睡不着觉，
对此事也曾想过好几遭。
要想叫兰考变面貌，
领导上改变思想是头一条。
先把咱负责同志招齐了，
到难民群里看分晓，
要能把群众疾苦感觉到，
再研究千斤担该怎挑。
回头来再用《毛选》作对照，
都把那错误根子刨。
领导思想得改造，

然后把改造自然当成目标。
抽调干部分组下乡细查考，
摸一摸自然灾情根和梢。
把群众抗灾经验总结成套，
发动起千万群众大战沙窝逞英豪。
三五年改掉旧面貌，
兰考县红旗到处飘。

张书记 老焦！

（唱）你讲此话开了我的窍，
这才是光明路一条！

焦裕禄 （唱）就此告辞不打扰，
（张送焦出门）

合： （唱）到明天咱就试试瞧！
（张视焦下，回头作关门状）

（二道幕随张手关）

（幕落）

第三场

时间 一九六三年夏。

地点 贫农王连发家。

布景 高低座位三、四个，其中有一把柳圈椅。

人物 王连发、王大娘、李彩云、李呈祥、小王（连发之子）、
焦裕禄、小赵、小刘（二工作人员）。

〔幕启：王连发编筐，彩云帮他捺条，王大娘做针线活

（幕前乐曲另定之）

王连发 （唱）大雨不住天天下，

王大娘 (唱) 房子里漏得滴滴哒。

李彩云 (指房顶) (唱)

看那个窟窿指头肚儿大，

杈 (念卡) 一把茅草堵上它。 (放下条向外走)

〔李呈祥上。〕

李呈祥 彩云!

(唱) 大水泡了顺河坝，

抢救迟了就要塌。

拿上张铁锨快走吧，

全家的劳力齐出发。

王连发 (唱) 那事比咱这事大，

保护着一湾好庄稼。

编筐子湿了也不怕，

修坝回来再堵它。

〔云取锨随祥下，王大娘仰首上看，又低头左右顾盼，发现洗脸盆、瓦罐等物。〕

王大娘 (唱) 洗脸盆接在这个窟窿下， (取盆放中左方)

回头再把瓦罐拿。 (取罐放中右方)

脸盆里边哒哒哒，

瓦罐里边巴巴巴。

(念) 哒哒哒，巴巴巴，

哒巴哒巴哒哒巴，

哒巴哒巴哒哒巴。

王连发 嗨!

(唱) 那么大老人你还贪玩耍，

不想个办法堵一堵它。

王大娘 (唱) 我这个草鸡上不了架，
你两条拐腿怎么往上爬？
咱只能空口说白话，
有什么本事去堵它？
(锣鼓效果，表示大滴)

王连发 (吃惊) (唱)
这一边怎么也滴下，

王大娘 (急取一口锅) (唱)
随手就把大锅抓。(放一漏处)

王连发 (唱) 接不接已经不抵啥，(指顶上)
你看那茅草往下滑。

王大娘 (拉发起立，且推且唱)
(唱) 咱们赶快出去吧，(推发出)
是不是房子就要塌？

焦、赵、刘 (内唱) 翻一道沙岗看一洼，
〔三人上，焦忍痛以手按胸，刘、赵急扶，焦挥手笑止之。〕

焦裕禄 (唱) 忽见面前有人家。
有两人站在屋檐下，
浑身淋得湿啦啦。

小 刘 (唱) 外边雨下得这么大，

小 赵 (唱) 你们为啥不回家？

王大娘 (回视三人，知道是下乡的干部) 唉，同志呀！
(唱) 外边下得啦啦啦，
里边漏得沓沓沓，
外边雨也不比里边大，

在外边不怕房子塌。

焦裕禄 (向刘、赵) (唱)

是不是房子就要塌?

里里外外查一查。

(焦领赵下, 刘入内, 向上察看, 出, 擦脸。)

小 刘 (唱) 梁不扭, 檩不斜,

小 赵 (上唱) 四堵墙壁稳踏踏。

焦裕禄 (上唱) 后坡的茅草往下滑,

小 刘 (唱) 把中间撇了个跌格啦。

焦裕禄 (唱) 咱马上把它补一下。(引赵, 刘下)

王连发 (唱) 哪来这些干部帮助咱?

王大娘 (向内唱) 同志们你们歇歇吧,

先烧点开水冲一杯茶。

小 刘 (返上唱) 大娘莫说客气话,

干部群众是一家。

快回去看看哪个窟窿大,

哪里要紧先补哪! (又下)

(王连发与王大娘亦返家)

焦裕禄 [在内, 表示在房上。

(唱) 不动砖来不动瓦,

房顶原是茅草搭。

茅草溜到屋檐下,

中间成了个大格啦!

小刘! 小赵!

快把茅草捆成把, (锣鼓)

一把一把往上叉。(念卡) (锣鼓)

新草旧草接上茬，
哪里漏了往哪里搭！（锣鼓）

王大娘 好好好！把大格啦堵住了，那边，那边，往上往上，
对对对！

焦裕禄 还有哪里？

王大娘 西边靠墙那里——

〔李呈祥与彩云上。〕

李呈祥 （唱）三个月修了一条坝，
一水冲了个光咣咣。

（视天）下！下！下！把坝冲光了你也不下了！

李彩云 爹！坝已经没有了，心疼它有什么用？先到我们家歇歇吧！

（李呈祥摇头，随云入，站王大娘背后，王连发与王大娘均抬头向上，未注意有人来。）

王大娘 快下来吧，不漏了！

李彩云 娘，你跟谁讲话？

王大娘 （回头见祥）亲家来了，有几个干部给我补修房子哩！

李呈祥 哪里来的干部？

王大娘 呀！你看我也忘记了问人家！（向上）同志！快下来吧！

李呈祥 你这老傻瓜，没有窟窿就听不见了，到外边叫！

李彩云 （跑出）同志们，快下来歇歇吧，补好了！

（赵、刘拥焦上）

李彩云 （视焦）咦！这不是焦书记！（兴致勃勃向内）爹，娘，县委书记来了！（王连发、王大娘、李呈祥均应声出迎）

王大娘 （挤向前，已到焦身边）在哪里？在哪里？

李呈祥 这不是！（上前握焦手）焦书记你好！（向大娘）你

真不记事，去年冬天你们要往商丘去，不是焦书记劝你们回来的？

焦裕禄 你就是那位李大爷吧？你好！（向王等）王大爷、王大娘，你们好！

王大娘 焦书记，我谢谢你。（向发）那次要不是碰上焦书记，说不定咱俩到哪里讨吃去了。（除赵、刘外均大笑）
（焦裕禄笑声突止，急以手按胸）

赵、刘 （急护焦）焦书记！焦书记！

焦裕禄 （挥手止之）没有什么！

李呈祥 怎么，焦书记受伤了？

小 刘 不，焦书记有病。

王连发 呀，你怎么不早说？怎么能让焦书记带着病给我们修补房子！

焦裕禄 没关系，是点小毛病，慢性的。

王大娘 快先到屋里歇歇。（均入。焦、刘、赵脱去雨衣放下图夹。）

王大娘 （搬过圈椅放中间，拉焦就坐）焦书记，你躺一躺。
（按焦躺下）

焦裕禄 （急以手护胸，又坐起）不，不，不，还是坐起来好一点！

小 刘 你让焦书记随便一点。

王大娘 裤腿都湿了。（向云）去弄点柴火来让大家熏熏！

李呈祥 不，这时候又不冷，况且这满地是水，也点不着火。

焦裕禄 不，我们都用不着烤火，有个要烤火的，毛柴火也不抵事！

小 赵 没有谁要烤火呀！

焦裕禄 咱们画的那个图。

李呈祥 谁呀？

焦裕禄 李大爷，我们是来查看洪水的，在一路上画了几张图，有些淋湿了，可是用毛草柴不好烤。

李呈祥 那好办。（向云）彩云，你把它拿到小胖子他们那铁匠炉上烤一烤。叫他们停一下活吧，这可是重要东西！

赵、刘 我们跟你去。（赵取图夹）

焦裕禄 你们去吧，我和这几位老人拉一拉村里的情况。
（云、刘、赵均下）

李呈祥 焦书记，你太辛苦了，洪水这么大，为什么不等天晴了再出来呢？

焦裕禄 李大爷，我们就是为了查看洪水才来的，怎么样？这里的灾情又很严重吗？

李呈祥 提起洪水，真是恨煞人呀！

（唱）前几年这里的灾情大，
群众的生活靠国家。
今年有了新计划，
自力更生想办法。
三个月修了条顺河坝，
挡住河里的来路沙。
茂盛盛长了一湾好庄稼，
却不料今日一水刮。

焦裕禄 乡亲们！

（唱）呈说是洪水淹庄稼，
战天斗地志可嘉。
生产好比把仗打，
常与灾害去冲杀。

打一次败仗也不要怕，
摔倒就得往起爬。

〔小王上。

小 王 (唱) 工作地点有变化，
调来兰考把水查。
顺便到家里看一下，

〔赵、刘、云上遇小王。

李彩云
小王 (唱) 走到门口碰上了他她！

李彩云 (向王) 你回来了？

(小王点头)

李彩云 (向刘、赵) 这是我爱人。(向王) 这是跟焦书记来咱们这里查看洪水的。(指刘) 刘同志，(指赵) 赵同志！

(三人各点头打招呼)

小 王 回家里坐吧。(同人)

(向发等三人) 爹，妈，大爹，你们都在家，(指焦)
这位是……

王连发 这是县委焦书记。(向焦) 这就是我想去找的那个孩子。

小 王 (兴致勃勃地上前握焦手) 焦书记，我被调到咱们兰考来了。

焦裕禄 好，水利厅调来的吧？

小 王 对。

焦裕禄 那是县里申请的，来了几位？

小 王 来了四个人，他们都往县里去了，我顺路回家来看看，晚上还得赶到县里去报到。

焦裕禄 你们是一个勘察组吗？

小 王 不，勘察队就抽调我一个人，其余的是在别的岗位上抽调的。

焦裕禄 那你就算报到了，就暂且跟我们这一组工作吧。（向刘）一会到公社集合汇报的时候，顺便打电话和县里联系一下。

小 刘 好！

李呈祥 这是查水的碰上查水的了，（众笑）咱村东头那顺河坝全被水淹了，你看见吗？

小 王 看见了，我上次回来不是就说过涨小水有用，涨大水没用吗？东边那一洼死水是没出路的，水小了流不满，水大了就要往回倒流。

李呈祥 就是倒回来了嘛。不过在春天你说那我也不信——活几十岁的人，谁也没有见它满过！

焦裕禄 李大爷，他的看法很科学，水没有出路总是会满的，要是平均一百年满一回，活几十岁就不一定看得到！（向王）你究竟是专门搞水的，看得出门道来，你看有没有彻底消灭这种灾害的办法呢？

小 王 办法倒有，不过工程很大。我这么胡想，要是从那洼地东南上向东开一条大渠，开五里地不就把水送到大河里去了吗？

焦裕禄 （点头）对。（回视赵）和咱们想到一个路上去了，取咱们的第五图来，让这位小王同志看看，提提意见。
〔小赵打开图〕

小 王 焦书记，你和我们年轻人太客气了。

焦裕禄 不，你们是专门搞水的。（焦从赵手中接图展视，众皆围上来）

焦裕禄 （指图）这是这个村子，（另指）这是那水洼。（另指）这可能就是冲了坝那个地方——我们画图的时候还有好多人在那里！

李呈祥 对，那就是我们想把坝加高，加着加着水就漫过来了。

焦裕禄 （续指）周围这十来个村庄，恐怕也和这里一样，好多庄稼都叫水泡了，（众应声：对！就是……）要是从这里……这个沙岗的最低处往东开上这样一条渠，这一洼水就可以流出去。（向王）你看怎么样？

小 王 焦书记，你也是搞过水的吧，比我想得周到。

李呈祥 能那样做，自然是再好没有的了，不过咱们修了那样一条小坝就误了三个月，那么大工程得做几年呀？

焦裕禄 李大爷，你们一个村三个月能修一条坝，要是这十来个村动员起来干他一冬一春呢？

李呈祥 这十来个村属于三个公社，要干，除非县里说话。

焦裕禄 嗨，县里不只要说话，还要直接参加领导哩！

（唱）只要人多力量大，
劈山倒海都由咱。
这次硬仗定要打，
县委亲自来参加。

李呈祥等 焦书记！

李呈祥 （唱）县委既把决心下，

李彩云 （唱）制伏洪水有办法。

小 王 （唱）天大困难都不怕

众 （同唱）定把灾害根子挖。

焦裕禄 （向刘、赵、王）到公社听汇报去！

（刘、赵、焦、王向发等挥手下。） （幕落）

三 关 排 宴

(上党梆子)

第一场 联 络

〔焦光普带辽兵甲、乙抬礼品上〕
焦光普 (唱) 肖银宗打败仗情愿和好，
到三关践盟约刻日离朝。
她聘我焦光普来作先导，
趁此时回故国喜上眉梢。
远望着帅字旗三关已到，
〔随辽兵绕场一周，下马〕
递手本拜元帅太君年高。
(白) 小鞞郎！
辽兵甲 有！
焦光普 上前传递手本。
辽兵甲 是！谁在？(宋中军上)
中 军 何事？

辽兵甲 辽邦使臣焦光普，奉了国主之命，押送贡礼到此。还要面见你家元帅，安排会盟之事。这是手本，要你往里传禀。

中 军 （很吃力地听完，搔头）巴答巴答说了一大堆，怎么连一句也听它不懂？（看远处的贡礼，又看辽兵手里拿着的手本，误认为婚帖，点头会意）噢，是了，这两国界上，百姓们常有彼此通婚之事，想是辽邦哪个地方官员，聘下了宋朝百姓之女，来下聘礼，也是有的。（向辽兵甲）喂！你们这些土兵可真不会办事！你家主人聘的是谁家姑娘？你们既来送礼，就该认得个门户，为何拿着婚书庚帖，往帅帐来投？

辽兵甲 （很吃力地听完）都说了些什么呀？（转向焦光普）大人，我不懂南朝人的话呀！

焦光普 （盯辽兵甲一眼，接过手本）站过去！（走向中军）中军大人请了！

中 军 还礼了，有何事见教？

焦光普 咱家是辽邦使臣焦光普，奉了国主之命，押送贡礼到此。还要求见元帅安排会盟之事。这是手本，请中军大人给我传禀传禀！

中 军 原来如此，你这南朝话儿说得（举姆指）真利落呀！

焦光普 咱家本来就是南朝人嘛！

中 军 （鄙弃地夺过手本）拿过来！（背面自语）南朝人为什么给辽邦办事呢？（进门）有请太君、元帅！（宗保、桂英、太君、排风相继上）

余太君 何事？

中 军 有个辽邦使臣押送贡礼到来，还要求见元帅安排会盟

之事，有手本在此！（递手本给宗保）

杨宗保 （看手本，注意重看）焦光普！

余太君 （凑近同看）焦光普？（中军也注意）此人当年已同你八姑回朝，为何又到辽邦去了？

杨宗保 禀祖母！他当年回来之后，我父又命他重往辽邦京都开设酒店，随时打探敌营动静。此番却不知他如何讨得肖银宗这份差使。

余太君 原来如此！（向中军）快快请他进来！

中 军 是！（自语）这是个有来历的。（出门，向焦光普）有请焦、焦、焦先生！

焦光普 （背面窃喜，自语）我又成了“先生”了！（向中军拱手）有劳了！

中 军 （向二辽兵）二位请在客帐待茶！（二宋兵接贡礼引二辽兵从右方下。中军暗下。焦光普进门，宗保、桂英起立。）

焦光普 小侄焦光普叩见太君老伯母。

余太君 快快请起来！（焦光普起）

杨宗保 小侄拜见焦叔父！（与桂英同揖，欲拜。）

焦光普 （拱手相阻）啊呀元帅，末将不敢当呀！

余太君 一同坐了！（三人同坐）

焦光普 小侄身在外邦，一向未曾问安，伯母可好？

• 《三关排宴》原名《忠孝节》，又名《忠节义》，是上党梆子优秀传统剧目，由赵树理亲自参加整理，一九六一年发表于《电影文学》九月号。曾由晋东南上党梆子剧团演出，由赵树理担任总导演。一九六三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片。

佘太君 有劳贤侄关怀，老身倒也罢了。光普！

焦光普 伯母！

佘太君 你在辽邦不过开了个小小酒店，如何讨得那肖后这份差使？

焦光普 老太君，老伯母！此番辽邦兵败，君臣上下闷闷不乐。命我到宫门送酒与他们消愁解闷。那日我正到宫门，有一侍儿对我言道：“国舅爷传你入宫问话。”侄儿我一听此言，只当是泄露了什么机关，吓得出了一头冷汗，战战兢兢随着那侍儿去见肖天佐，那肖天佐问道：“你是焦光普！”“是！”“为何不抬起头来？”“草木之人不敢仰面朝见。”“恕你无罪！”“小店主多谢了！”是我抬头一看，见那肖天佐面无怒色，我的心儿就放下了一半。那一肖天佐又缓缓言道：“焦光普，我的焦掌柜！你在我京都开设酒店，我辽邦人士待你如何？”我说：“承你们多年照顾，小店开得十分兴隆。”他又言道：“既知感恩，就该报德！”我说：“以后多送好酒报答大恩就是。”“噢！不是那样报法！你是南朝人，惯讲南朝话。吾有心借你的口才，到在南朝办一宗大事，你可愿去？”当时侄儿我听了此话，一时摸不着头脑，不敢冒然答应。我说：“小店主我是个草木之人，不晓什么朝廷大事，也称不起有何口才。不过会说几句南朝话儿。有何吩咐请讲当面——讲出口来，小店主我办得了的自然不敢辞劳；办不了的还望别请高明，小店主改日报效罢了！”那一肖天佐见我半推半就，这才向我言道：“焦掌柜有所不知，如今辽宋两国议和，国主要到三关宋营赴

会，特命你押送贡礼一份，先期两日到在三关，去见那杨元帅，安排吾国人马食宿之事。你可愿去？”侄儿在外日久，回朝心切，闻听此言，心中暗喜。我说：

“小店主别的大事办它不来，若说铺设帐篷，安插炉灶，是我们这穷店主干惯了的营生，小店主我情愿就此报效。”“好！既然愿去，详情可与行营总管商量。吾今赐你兵士两名，快马一匹，明日起程，速往三关去做安排。国主大驾随后就到！”侄儿我听了此话，别了那肖天佐，见了他的行营总管，问了详情，领了礼物。次日早起跨了坐马，押着礼物，我就直奔三关来也！

（唱）

十余载离故里归心似箭，
跨上了千里马一直正南。
不怕它荒草地风沙扑面，
心有事我只管快马加鞭。
穿云峰过雪岭山高路远，

（白）老伯母！

且喜得今日里得见慈颜！

余太君 贤侄！

（唱）光普儿你果有忠心赤胆，
十余载羁辽邦不忘中原。

（背唱）猛想起四郎儿无耻反叛，

降辽寇招驸马不肯回还。

见旁人想自己方寸已乱，（重尾）

我只得且忍泪强作笑颜。

〔宗保与桂英背商〕

杨宗保 （唱）老祖母讲话间神色大变，
恐想起四伯父暗自心酸。

穆桂英 （唱）咱二人上前去宛言相劝，
劝祖母到后帐暂把神安。

杨宗保 祖母！
（唱）年迈人见不得乍寒乍暖，

穆桂英 祖母！
（唱）我搀你到后帐换换衣衫。

佘太君 不用！
（唱）话说在兴头上有点气喘，
这也是平常事莫把心担。

（向焦光普）贤侄！

（唱）你既与肖银宗来打前站，
还有那正经话未曾开端。

（白）光普，我来问你，那肖银宗到咱三关践盟，
可有多少人员随行？

焦光普 卫士千余名，臣僚数十位。

佘太君 肖银宗呀肖银宗！你也可太多心了。我大宋乃礼义之邦，岂能暗害与你？我若和你一般见识，也给你排一个“双会大会”，你那千余名卫士又中何用？（向焦光普）光普，想那辽邦将士和我大宋将士到在一处，倘有什么口角相争，不说他不仁，还说咱不义。依老身之见，要你到在关外寻觅个柴水方便之处，老身着人为他们安排宿营之事。等你见了那肖银宗，就说：
“三关杨元帅言道，一来城池狭小，二来两国言语不

通，双方将士到在一处恐有不便”要他们的人马在关外扎营。

焦光普 伯母所见甚高，小侄记下了。（余太君点头）老伯母，那肖银宗送来一份贡礼。（袖内取出礼单）这是礼单，请老伯母过目。

余太君 （接住礼单，审视两次）辽邦哪个文臣写得这一笔好字？

焦光普 老伯母，想是四——（忽然有所踌躇）四——似乎写得很好。（宗保、桂英、排风都似有所悟）

余太君 （一怔）你可知是谁写的？（焦光普巡视每个人的神情，排风示意阻止。余太君顺着焦光普的眼神回头看，发现排风神态。）你这丫头！（以手抚排风，又向焦光普）不用往下讲了。想是那四郎畜生写的，你说是呀不是？

焦光普 我猜也是四哥写的！

余太君 你怎知道？

焦光普 那肖银宗对四哥十分宠爱，闻听人说辽邦向咱宋朝来的公文，都出于四哥一人之手。

余太君 这样说来，那肖银宗对这畜生是十分信任的了。

焦光普 信任便信任，只是和咱宋朝排兵打仗，可不要他出马。

余太君 可见她对那投降之人还不是十分相信。（又向焦光普）光普，我再问你，肖银宗此番到咱三关赴宴，四郎畜生他来呀不来？

焦光普 老伯母，我想他要来！

余太君 你怎知道？

焦光普 那肖银宗离朝，一定要带桃花公主随行。桃花公主要来，怎么会不和四哥一同来呢？

佘太君 （寻思，若有所得，点头）这就是了！（转向宗保）宗保！

杨宗保 祖母。

佘太君 自古礼尚往来，不可怠慢，人家既有礼物送来，要你准备一份礼物回他。就请你焦叔父带去。

杨宗保 孙儿记下了。

佘太君 打发你焦叔父到馆驿安歇。

杨宗保 遵命！焦叔父随我来！（宗保、桂英、焦光普同下）

杨排风 老太君，那位焦爷是个什么人呀？

佘太君 你还记得你六爷帐下那一焦赞吗？

杨排风 记得，我还和他比过棍子哩！

佘太君 他是焦赞的堂弟，名叫焦光普。

杨排风 他那张嘴可真能说！

佘太君 倒算得个说家。排风，方才人家讲话，讲到你四爷头上，你为何背地阻拦？

杨排风 一提到四爷你就要生气，我怕惹你老人家生气呀！

佘太君 你真是我的好丫头（以手抚之，排风跪，太君抚罢，挥之使起）排风，你家四爷若来赴宴，你猜他还回辽邦不回？

杨排风 我想他还要回去！

佘太君 怎样见得？

杨排风 他和那桃花公主怎么离得开呀！

佘太君 猜得有理！（起立，自语）杨延辉，小畜生！老身要打搅你的好梦了！

（唱）十余载皇驹马南柯之梦！

此一番管教你转眼成空。

我杨家保大宋满门忠勇，
岂容你小畜生叛国求荣？（同下）

第二场 坐 宫

〔起三更。

杨延辉 （内唱）朝罢王下殿来心烦意乱，（上）
在宫中陪公主辗转难眠。
辽邦兵屡败后不能再战，
为议和肖国主要赴三关。
她命我随御驾同临盛宴，
怕只怕露真情我心似油煎。（过）

（白）本官杨延辉，十余年前，投降辽邦，改名木易，被招为东床驸马。今日辽邦兵败，三关议和，国主命我随驾前往。宋营之中，我母太君代主践盟，侄儿宗保执掌帅印，到了那里倘被道破真情，如何是好？唉！

（唱）肖国主她对我十分宠信，
作一个皇驸马快活如神。
倘若是到三关显形露影，
我是她仇家子她怎能宽容？（过）

（白）想我与桃花公主乃是恩爱夫妻，我若对她先把真情讲了，求她在国主面前与我周旋婉转，定能逢凶化吉也。

（唱）贤公主她与我情深义重，
祸临头还要她保我安宁。
欺瞒了十余载今夕告禀，

又怕她心恼怒翻脸无情。

〔桃花上。〕

桃 花 唉！驸马，更深夜静，还不安眠，在这里嘟囔什么呀？

杨延辉 多谢公主关照，公主先去安眠，本官随后就到。

桃 花 驸马，我看你这个劲儿，一定是有什么心事哩。

杨延辉 啊呀公主！

桃 花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杨延辉 本官并无它意，公主休得过虑。

桃 花 唉，驸马！

（唱）老母后她要你随驾赴宴，

左托辞右推委不肯向前。

回宫来又熬到更深夜半，

独自言自语疯疯癫癫。

咱既是好夫妻休要瞒俺，

有什么心里话剖腹畅谈！

杨延辉 （唱）贤公主看透我心事一片，

试试她肯不肯替我周旋！

（白）公主！

（唱）到明天随母后三关赴宴，

怕的是塌天祸就到眼前。

望只望贤公主搭救与俺！（过）

桃 花 随着母后前去赴会，能有什么大祸呀？（向延辉）驸马，你纵有塌天大祸，想我母后乃是一国之主，只要咱家一说，管保无事，要你快讲！

杨延辉 公主！

桃 花 说呀！

杨延辉 唉！（欲言又止）
（唱）道真情就如上刀山。（打四更）
（白）呀！
（唱）猛听樵楼起四点，
霎时五鼓要赴三关。
（白）唉！公主！
（唱）虽说咱夫妻恩不浅，
有一宗心事未敢言。
你可知本官是哪一个？

桃花 闷了半夜。怎么才闷出这么一句话来？谁不知道你是木易驸马呀！

杨延辉 唉！公主！
（唱）那是我改名换姓将你瞒。
木易并非我的真名姓，

桃花 啊？你是哪个？

杨延辉 （唱）我本是……

桃花 哪个？

杨延辉 （唱）……杨继业老将第四男。

桃花 啊！你是南朝杨家后代？

杨延辉 公主宽恕！公主宽恕！

桃花 啊呀！
（唱）听此言气得我浑身打战，（坐，切）
（白）杨四郎！四将军！强盗！
（唱）强盗做事胆包天！

杨延辉 啊呀公主！
（唱）非是俺故意把你瞒，

怕露真情起祸端。
天明要往三关地，
万般无奈才明言。

桃 花 你胡道！

（唱）再休巧言将人骗，
谁知你打什么鬼算盘？
将豺狼养在深宫院，
陪伴自己十余年。

（白）杨四郎，你来！（拖杨延辉）

（唱）你随我去把母后见！（杨延辉跪拦）

杨延辉 （唱）万望公主且容宽！（送）

（白）啊呀公主，想你我十余载恩爱夫妻，本官有错，该打该骂，任凭公主所为，千万禀不得母后。倘若禀知母后，母后一怒之下将我斩首，那还了得？

桃 花 吾国与你杨家原是世代冤仇，你今隐姓埋名，潜伏宫中，来做奸细，你……还想活呀？

杨延辉 啊呀公主！本官虽是杨家后代，自被辽国招为驸马，上对母后忠心报效，十余年来始终如一。你我夫妻形影不离，可曾见本官为南朝通过一信？献过一策？请公主不要冤枉好人呀！（连连叩首）

（唱）公主一向多明鉴，
何愁不能辩忠奸？
十余载夫妻常相伴，
还望公主数流年！

桃 花 唉！

（唱）我见他磕头如捣蒜，

战战兢兢好可怜。
不向母后将他献，
他总是仇家一儿男。（过）
十余载言行我亲眼见，
他果然不曾作过奸。
若禀母后将他斩，
一夜夫妻百岁缘。（过。起五更）

（白）我的冤家，你起来吧呀！

（唱）你好比糖糕撒上胡椒面，
辣不辣来甜不甜！（送）

杨延辉 多谢公主宽恕！（桃花听见有人，急掩杨口，宫女上）
官 女 国主起驾，有请驸马、公主。
桃 花 知晓了。（宫女下）
杨延辉 公主，此番到在三关，倘有不测，还望你与本宫周旋婉转！
桃 花 驸马，此番到在三关，倘被道破真情，母后驾前有咱家一面承担。只是还有一事，教咱家不得不虑。
杨延辉 公主所虑何事？
桃 花 万一露了真情，你可和你家老母相认吗？
杨延辉 露了真情，推托不过，自然要认。
桃 花 倘若你家老母要你回往南朝，你该怎样？
杨延辉 公主不必过虑，本宫在此深得母后信任，又与公主多恩多爱，哪有再回南朝之理？
桃 花 万一推托不过呢？
杨延辉 如今两国就要议和，万一推脱不过，母子相认——也不过是一门亲戚罢了。

桃花：好一门路途遥远的亲戚呀！母后起驾，你我更衣去者。

〔同下〕

第三场 赴 会

〔四辽兵、肖天佐、韩昌、二宫女、杨延辉、桃花、司舆者、肖银宗先后上〕

肖银宗 众卿，此番议和，好不烦闷人也！

肖天佐 国主，胜败乃军家之常，无须烦闷！

内白：“焦光普接驾！”

韩 昌 禀国主，焦光普接驾！

肖银宗 住辇！（焦光普上）

焦光普 参见国主！

肖银宗 免参！

焦光普 多谢！

肖银宗 命你出使三关，事儿怎样？

焦光普 上禀国主：南朝余太君替那宋王将贡礼收下，又着小店主带来一份回礼。有礼单在此，国主一观！

肖银宗 （接，看，点头）罢了！南朝人总还是通情达理的。

肖天佐 （向焦）命你安排食宿之事，你可办妥？

焦光普 上禀国舅爷，小店主与那杨元帅谈起此事，那杨元帅言道：“一来城池狭小，二来两国言语不通，双方将士到在一处，恐有不便。请辽邦将士在关外扎营。”

韩 昌 咄！好你焦光普！竟敢与南朝串通一起蒙眛国主！国主御驾亲临三关，随行将士如何离得？你，你，你……

焦光普 慢，慢，慢！韩元帅不必动气！小店主我也是这样说来！我说：“国主御驾亲临，如何离得随行将士？”那一杨元帅言道：“贵使有所不知：我大宋幅员广大，邻国众多；失礼于辽邦，就是失礼于天下，此事非但本帅所不为，也是我皇上所不许的呀。”

肖天佐 话虽如此，想这两国相交，谁能担保无事？

焦光普 小店主我也是那样讲来。那杨元帅又道：“我大宋乃礼义之邦，绝不为此背信越礼之事！倘若本帅不守信义，想这三关乃是我帅帐所在之地，兵如兵山，将如将海，贵国的千余名卫士，在这千军万马之中，又如何能保无事？”

肖银宗
肖天佐
韩 昌 (均惊愕) 这……

韩 昌 那杨宗保尽是大话吓人！南朝既然兵多将广，为何不敢放我随行将士入关？启禀母后，依儿臣看来，南朝必有歹意！

焦光普 上禀国主、韩元帅：小店主我也是那样说来。我说：“三关既是杨元帅帅帐所在之地，兵如兵山，将如将海，让辽邦千余名卫士入关又怕着什么？杨元帅何不给他们这一片小小容身之地？”

韩 昌 他又怎讲？

焦光普 他说：“三关城池虽小，也并非再容不得千余人马，只是双方将士到在一处，万一因为言语不通，惹起事端，惊吓了你家国主，失礼于辽邦，宋王怪下罪来，本帅我也在不便之处呀！”

肖银宗 众卿，你们大家看来，还是去者好，不去者好？

焦光普 （背）噢！她不想去了！（向银宗）上禀国主，小店主又曾向那杨元帅言道：“不让辽邦卫士进关，倘若国主见疑；不来赴会，不是又和议不成了吗？”

肖天佐 他又怎讲？

焦光普 他说：“贵使为何如此多疑？我大宋与辽邦相交已是年深日久，战也不只一次，和也并非一遭，每在我大宋国土之内议和，我大宋可曾有过失礼之处吗？”我说：“小差官我是初次奉命，过去之事一字不晓！”他说：“贵使既是初次奉命，自然不晓前情，要你回去奏明你家国主，你家国主自会知道！”

肖银宗 这……倒是不曾有过失礼之处！

肖银宗
韩昌 倒也不曾有过失礼之处！

肖银宗 驸马，你意如何？

杨延辉 母后，深入虎穴，不得不虑。依儿臣之见，着一心腹大将留在关外率领随行将士，倘有意外，也好相机而行。

肖银宗 驸马言之有理，你们哪个当此重任？

杨延辉 儿臣不才，愿效此劳。

肖天佐 国主，驸马乃随驾重臣，边关赴宴如何离得？

杨延辉 国舅爷，俺木易率兵关外有何不可？

韩昌 住了！我看你推三阻四不愿赴宴，定是别有它意？

杨延辉 你道俺有何意？

桃花 噫！咱家驸马忠心报国，韩元帅为何介意？母后，还是让驸马率兵关外才是！

焦光普 （背）哈哈！“他”又不去了！（向银宗）上禀国主：小店主见那杨元帅不肯让辽邦将士入关，只得到在关外，寻了个柴水方便之处，一安排停妥。此处虽属南朝地界，可是与辽邦边防将士宿营之处，相隔不过一箭之地，那里的边防将士都属二国舅统领，四——

杨延辉 啊！你“四”着什么？

焦光普 可你忙着什么？那里的边防战士，都属二国舅统领，四平八稳，万无一失。依小店主之见，驸马是国主近臣，又系南朝人士，既通语言，又晓地理，此番入关还是去者为妙。

桃 花 噫！大胆焦光普！你是何等人，竟敢议论我们皇家之事？

肖银宗 皇儿不要怪他！他虽是个小小店主，可也言之有理！驸马还是入关保驾罢了！（杨延辉、桃花表示丧气）

焦光普！

焦光普 在！

肖银宗 要你头前说与那杨令婆、杨宗保，就说孤王随后就到！

焦光普 领旨！（背笑）（杨延辉、桃花表示恨他多口）

〔焦光普下。〕

肖银宗 韩元帅！

韩 昌 在！

肖银宗 要你说与随行将士就在关外扎营，与二国舅兵马暗中相连！

韩 昌 遵旨！孩子们！要你们就在关外扎营，与二国舅兵马暗中相连！（众应）

肖银宗 国舅、驸马、韩元帅，要你们小心保驾来！

（唱）两国兴兵一局棋，
一着高来一着低，
为社稷议和三关地，
虎离深山防人欺，
酒席宴前加仔细，
时刻保驾莫远离，
孩子们与孤把驾起，（除肖银宗和司辇宫人
外，余人下）
但愿得平安无事回！（同下）

第四场 排 宴

〔宋兵、宋将、中军、杨宗保、穆桂英、杨排风引余太君上。辽兵、宫女、肖天佐、韩昌、杨延辉、桃花引肖银宗上〕

余太君 国主上关来了？

肖银宗 老太君出关来了？

余太君 国主你好？

肖银宗 太君你好？

余太君 好呀！哈……

肖银宗 国主请来头行！

余太君 还是老太君头行！

肖银宗 国主到来是客，理应头行！

余太君 老太君，你我并行了吧？

佘太君 并行不恭!

肖银宗 恭的!

佘太君 恭的?

肖银宗 恭的! (同笑) 好呀, 哈! ……

佘太君 国主既然不肯, 宗保、桂英照客!

杨宗保
穆桂英 遵命!

〔吹牌子, 过场。辽兵先下。佘太君伴肖银宗, 穆桂英伴桃花下。杨宗保让众辽将, 肖天佐、韩昌下, 杨延辉惶恐地掩面下。杨宗保下, 宋兵下〕

〔中军上〕

中 军 令出! 执事人等听命! (内应) 太君元帅正在大帐与辽邦国主议和, 要你们小心准备筵席, 议和完毕即刻开筵! (内应) (下)

〔二道幕开, 宋兵, 侍儿摆筵过场。中军上查看毕〕

中 军 禀太君, 筵齐!

太 君 (内白) 国主, 列位请了!

〔辽宋两方主从人等应上筵者同上。〕

佘太君 宗保、桂英拜见国主! (宗保、桂英拜肖银宗)

肖银宗 驸马、皇儿拜过老太君! (延辉、桃花拜佘太君, 太君、排风注视延辉, 延辉掩面。)

侍 女 宴齐!

佘太君 请!

肖银宗 请!

〔女主女宾分别就座〕

佘太君 列位将军请在宴上。宗保奉陪。

杨宗保 遵命！列位将军请！

众辽将 请！（宋将、中军引众辽将下，杨宗保下。）

佘太君 国主，请酒！

（唱）一自从匈奴国兴兵犯汉，
数不尽刀兵劫历代相沿。
今日里咱两国罢兵息战，
肖国主可称得女中英贤！

肖银宗 太君！

（唱）老太君见识广智谋深远，
悉韬略晓礼义名不虚传。
从今后守信义各不相犯，
息干戈庆升平放马归田。

佘太君 国主高见！

肖银宗 过奖了！

佘太君 侍儿！

（唱）侍儿看过莲花盏，
敬祝国主玉体安。
议和之事已如愿，
有一桩往事愿商谈。

肖银宗 （唱）接过太君莲花盏，
背转脸来祭苍天。

（白）太君！

（唱）有何心事讲当面，
请赐教益启愚顽。

余太君 国主驾前大臣，有系我们南朝人氏，他等对国主如何？

肖银宗 老太君，孤虽不才，颇晓以德化人，天下贤才尚不相弃。

余太君 有一驸马名叫木易，此人对国主如何？

肖银宗 木易驸马他也是你们南朝人氏，归降我邦，为孤忠心报效，屡建奇功，果算个多才之士！

余太君 （苦笑）哼！……（杨延辉上偷听）请问国主，他因何流落贵邦，被招为东床驸马？

肖银宗 老太君，那是当年双龙大会，金沙滩鏖战，被我国所擒，当时就要杀他。是他跪在尘埃苦苦求生，言说他南朝父母兄弟妻室一无所有，愿为孤终身效劳。孤看他少年英俊，不肯伤害他的性命，并将他招为东床驸马。

余太君 你可知他的家乡住处，真名实姓？

肖银宗 他也是你们晋阳人氏，姓木名易。

余太君 国主，你受骗了！

肖银宗 孤怎样受骗了？

余太君 此人失落贵邦之时，家中父母兄弟妻室俱有，至今尚有老母在堂、娇妻在室、侄儿侄媳当大宋要职，并非姓木名易呀！

肖银宗 这样说来，他系何人？还望太君当面赐教！

余太君 国主！

（唱）他用巧言将你骗，
瞒哄国主十余年。
要知他的真名姓……

肖银宗 他是哪个？

佘太君 国主！

（唱）他本是杨延辉我的儿男！（送）

肖银宗 怎么？他是你的儿子？

佘太君 是我四郎儿子！

肖银宗 他当真是你四郎儿子？

佘太君 怎能瞒哄国主！（杨延辉下）

肖银宗 （大吃一惊）桃花，驸马到底姓杨姓木，还不从实讲来！

桃 花 母后啊！

（唱）驸马他本是杨家后，

老太君讲的是实情。

肖银宗 既有此事何不早讲？

桃 花 母后！

（唱）十余年来隐名姓！

起程赴宴才讲明。（送）

肖银宗 说什么从前不晓，看起来你们是通通作弊。

真乃气煞——孤也！（杨延辉上）

桃 花 母后醒来！母后醒来！

佘太君 四郎，我把你这不忠不孝的畜生哪！

杨延辉 母亲宽恕！（跪向太君）

桃 花 母后！母后！（向延辉）驸马，我把你这个忘恩负义之人哪！（杨延辉转向肖银宗）

佘太君 四郎！（杨延辉转向佘太君）

桃 花 驸马！

佘太君 四郎！（杨延辉两边应声，最后下决心站在肖银宗身

旁。太君气极)

肖银宗 (唱) 想当年只怨孤将人错认!

桃花 母后! 母后! (肖银宗不语) 国舅爷! 韩元帅, 你们都快来呀! (肖天佐、韩昌、杨宗保上。)

众辽将 公主为何惊慌?

桃花 我家母后昏倒了!

众辽将 领我去见! (同进门) 国主醒来!

肖银宗 (吐血、昏倒、复苏)

(唱) 把一个仇家子招为皇亲,

在深宫养猛虎改名变姓。(离座, 逼视延辉)

[延辉低头退缩, 又看太君, 太君亦怒, 遂默然下跪。

肖银宗 (唱) 孤知人知面不知他的心! (过)

众辽将 国主, 这是为何?

肖银宗 众卿!

(唱) 那木易他本是杨家后代, (过)

众辽将 啊! 木易是杨家后代? (肖银宗点头) 此话从何讲起?

肖银宗 (唱) 余太君酒席间道出真情。(过)

众辽将 怎么? 此话是余太君讲的?

肖银宗 正是!

韩昌 大胆木易, 竟敢欺瞒国主, 依儿臣之见, 就该……

肖天佐 (挡) 住! 事已至此, 不可鲁莽。桃花, 你家驸马是杨家后代, 你可晓也不晓?

桃花 国舅爷!

(唱) 十余载他不曾通过名姓,

临起程那一晚向儿讲明。

肖银宗 就该责他见孤请罪。

桃 花 母后！

（唱）儿当时要同他人宫奏禀，
他那里跪在地苦苦求情。
他说他对母后忠心耿耿，
与南朝并无有一息私通。
禀明了怕母后一时恼怒，
辨不清忠和奸斩首施行。

肖银宗 （唱）桃花女一番话也还可信，
势到此也只好相机而行。

（白）太君！

（唱）回头来把太君一言奉请，
且不提当年事单讲如今。

（白）老太君，我邦驸马既是令郎，你我两家便是儿女亲戚，可也算得一喜！

余太君 哈……本主官高攀上国主你这门亲戚，可也算得三生有幸。只是这一畜生欺瞒国主，玷辱公主，罪在不赦！还望国主依法惩处，勿以本主官为念。

肖银宗 木易罪孽深重，怎奈他系令郎，孤也只好罢了！

余太君 国主既然不肯，本主官代你雪恨。四郎，畜生！你竟敢欺瞒国主，玷辱公主，罪该万死！宗保！

杨宗保 有！

余太君 吩咐校尉将四郎推出斩首！

桃 花 慢来！慢来！（跪向余太君）啊呀，老太君，老婆母，
看在你儿妻面上饶恕了他吧！（太君不语）啊呀母

后，快与驸马讲个人情吧！（肖银宗万般无奈地挥手令桃花站起）

肖银宗 老太君暂息雷霆之怒，听孤一言奉告。令郎纵有不赦之罪，如今木已成舟。你若一怒将他斩首，一来他还未报你那养育之恩，二来孤皇儿失去丈夫。唉！还望太君看在我母女面上吗？……（示意桃花下跪）

余太君 啊呀，公主快快请起。四郎，上前谢过国主、公主与儿讲情！

杨延辉 是！是！多谢母后、公主讲情！

桃花 不用谢了，谢过你家老母亲去吧！

杨延辉 是！儿谢母亲不斩之恩！

余太君 唉！非是为娘不斩，多亏国主、公主与儿讲情，暂且恕饶，与娘站过一边！（杨延辉站到余太君身旁，肖银宗母女惊）国主，本主官有句不敬之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肖银宗 老太君有何贵语请讲当面。

余太君 我有心带着小儿回往南朝，埋葬他父兄尸骨。国主你可依从吗？

桃花 啊呀母后啊！

肖天佐 老太君，自从令郎到在我国十有余载，我家国主不曾错待于他。你今将他带回南朝，岂能再回我邦？

肖银宗 老太君，你莫非别有它意？

余太君 国主，这畜生不忠不孝无恩无义，你何必对他如此器重？

肖银宗 老太君，令郎在孤驾前忠孝两全，又与小女恩深义重，为何以种种罪名责怪与他！

余太君 国主，本主官实不相瞒，我将畜生不忠、不孝、不义

之事奉告一番，国主可爱听吗？

桃花 老婆母，过去之事，还提它做甚！

肖银宗 （摇手止桃花）太君请讲！

余太君 国主，列位！

（唱）一不忠背宋王罪比山重，
二不孝违母命灭绝天伦，
三不义抛结发又把妻聘，
弃国土忘根本怎能为人？（送）

肖银宗 老太君，自古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令郎感孤薄德，情愿报效，此乃人之常情，老太君请
勿介意！

余太君 国主，你待他恩重如山，象这偷生之辈，倘遇国乱之
年，命他出马，再要被人擒去，招为东床驸马，贪图
享乐，岂不又把国主、公主待他的好意，白白给枉费
了吗？

（唱）这也是为父母缺少教训，
家不幸出了这不肖子孙。
降辽邦他愿把国主孝敬，
怎保他到后来不降旁人？
我讲这肺腑言国主思忖，
体留这无廉耻他……不义畜生！

肖银宗 （唱）听此言倒叫我心灰意冷，
这等人怎能保再无二心？
倒不如做人情放他归宋，（过）

桃花 母后，驸马十余年来忠心报效，并未见有半点歹意呀！

肖银宗 放不得也！

(唱) 孤皇儿她讲的也是真情。
趁此时再试试他的禀性……

(白) 木易!

杨延辉 母后!

肖银宗 驸马!

杨延辉 国主!

肖银宗 (唱) 或在南或在北凭你的良心!

杨延辉 (唱) 儿情愿对母后终身侍奉,

余太君 (怒视延辉) 啊! (延辉吃惊)

杨延辉 (唱) 也不敢违母命灭了天伦。
辽邦义南朝恩我报之不尽,
此番去三两月定回辽营。

肖银宗 (背唱) 暗骂声小木易良心丧尽,
遇烈火才知他不是真金。
到南朝他去把仇人孝敬,
纵回来该把他怎样看承?

桃 花 驸马!

(唱) 在宫院你说是亲戚相认,
到如今看起来尽是哄人!

杨延辉 (唱) 贤公主你不必苦苦追问,
俺不久返北国但请放心。

桃 花 (唱) 逢着你无义人一言难尽,
(白) 也罢!

(唱) 咱夫妻同去同归一路行!

杨延辉 (唱) 好便好只恐怕母后不准!

桃 花 驸马你放心吧!

(唱) 与驸马紧相随我才放心。(送)

(白) 禀母后，儿随驸马到南朝去吧!

肖银宗 啊! 儿要随同驸马到南朝去吗?

桃花 儿与他是同去同来的啊!

肖银宗 驸马此去他是回不来了!

桃花 就怕他回不来孩儿我才要去。有几一去，他就不敢不来!

肖银宗 他来与不来，尽在于他罢了!

桃花 啊呀母后! 儿与驸马誓同生死，任凭赴汤蹈火，要死也与他死在一处!

肖银宗 你与他誓同生死吗? (看桃花，又看四郎，反复数次。看太君，考虑，点头) 要你上前问问那余太君，看她容你去，不容你去!

桃花 (向太君) 老太君，(跪) 老婆母! (辽方众人气极) 儿要随同你儿到南朝去，你老人家是叫去哩，还是不叫去哩?

余太君 (略一寻思，温然一笑) 公主请起来! (桃花起) 公主，你晓得嫁夫随夫，老身岂能不容公主前去? 只恐你家母后不允! 只恐你家母后不允呀!

桃花 罢! 罢! 罢! 这就好了! (向肖银宗) 禀母后，老太君容儿前去!

肖银宗 (出乎意外地一怔，看太君，恨之入骨。目光徐徐转向桃花，语气低沉) 我儿你真要去?

桃花 当真要去!

肖银宗 (忽然) 凭你一人深入南朝国土，如何还能回来?

桃花 (见银宗怒，低头) 母后，还有驸马他哩!

肖银宗 他吗……他是余太君的儿子，杨元帅的伯父，南朝还

有他的前妻，哪有再回辽邦之理？你既然与他誓同生死，孤王也不难为与你。你同他……去、了、吧！

（偏坐，低头）

（唱）自家女儿心摇动，
还望旁人尽什么忠！
孤王要你中何用？
任你南北与西东！

桃 花 （倒退几步，神痴气馁）

（唱）为驸马又惹得母后动气，（过）

韩 昌 （向桃花）快快去吧！再不要惹国主伤心了！

桃 花 （唱）倒叫我桃花女心冷如灰！

往日里对母后说一不二，
到如今只落得人人笑痴。（过）

杨延辉 公主！想这临别伤心，也是人情之常。还请公主宽怀，随本官去了就是！

桃 花 （突然怒向延辉）杨四郎！你的好梦到头了！

（唱）想当年只怪我错打主意，
被你这忤逆人鬼话所迷。
你说你对母后忠心不二，
你说你在南朝无靠无依。
十余载天地恩抛到海底，
回南朝投靠你慈母娇妻。
害得我老母后将我抛弃，
又惹得众朝臣个个生疑。
我桃花也曾是英名盖世，
岂与你负心汉比翼齐飞？

（转向银宗） 母后！

（唱）老母后请恕儿不孝之罪，（叩拜）

（转向四郎，怒逼之）杨四郎！

（唱）请享你天伦乐恕不奉陪！（跑下碰死）

肖天佐
韩昌 稟国主，桃花碰死！

肖银宗 桃花，啊呀儿呀！

（唱）一见桃花把命尽，

哭断肝肠痛碎心，

满面掉下伤心泪，

（向杨延辉）孤为你绝了这条根！

余太君 国主！

（唱）贤公主秉性刚只把命尽，

纵然是一身死万古留名。

这都怨不肖子一人招引，

愿国主保玉体莫过伤心。

来，将公主尸体用白绫裹了，送下关去！

〔内应：“是！”〕

肖银宗 孤要告辞！

余太君 宗保，排队相送！

杨宗保 遵命！

肖银宗 桃花！娇儿！

肖天佐
韩昌 起驾！（同下，复上，辽兵上）

余太君 送国主！（肖银宗还礼，余太君、穆桂英同下。）

杨延辉 （跪）木易送母后！

肖银宗 木易！驸马！
焦光普 国主，小臣跟随驸马如何？
肖银宗 尽在于你！桃花！
肖天佐 起驾！（辽方人士同下。杨延辉绝望地目视辽方）
韩昌
杨宗保 请四伯父回关。（杨延辉无奈地随宗保同下。）

第五场 责 子

〔接第四场音乐——大开门。太君、排风、杨延辉、宗保、桂英、焦光普相继上。太君正中落坐，排风侍立。余人同揖太君。按长幼列侍左右。乐止〕

余太君 光普！
焦光普 在！
余太君 你多年身居外邦，为国宣劳，今日回朝，算得个有功之人。老身明日回朝奏明情由，好与你讨个官职。
焦光普 尽在伯母！
余太君 （看四郎，四郎低头）四郎！
杨延辉 在！
余太君 你可知罪？
杨延辉 儿我知罪！
余太君 罪在何处？
杨延辉 这……不忠不孝！
余太君 畜生呀，畜生！（四郎跪）是你叛国求荣，认敌作母，国法家规，皆所不容，如今虽是母子重逢，唉！老身也顾不得你了呀！（拭泪）桂英！（桂英应）要你吩咐准备公文一件，囚车一辆，将你四伯父解往京都！

穆桂英 这……（不知如何是好）

余太君 快去！

穆桂英 （略迟疑）遵命！（愕然下）

杨延辉 母亲！啊呀老娘！儿纵有不赦之罪，还望母亲看在母子分上，容儿一时！

余太君 你说这母子之情吗？唉！（起立）

（念诗）虎斗龙争数十秋，

七郎八虎一无留。

眼前重见亲生子，

反惹老身满面羞！

（唱）提起来母子情令人难受，

众儿郎一个个血染荒丘。

只剩下这一个亲生骨肉，

十余载分南北转恩成仇。

看起来有你在不如无有，

有你在叫老身气塞咽喉！（过，坐下）

杨延辉 娘呀！

（唱）自从我兄弟们幽州分手，

兄的兄弟的弟尸骨难收。

不孝儿总还是杨门之后，

求老娘高高手把儿收留。

余太君 畜生！

（唱）小畜生算什么杨门之后，

我杨家忠烈名岂容你丢。

（垛板）想当年那辽邦设下虎口，

你弟兄去赴会大战幽州。

你兄长一个个命丧敌手，
不成功已成仁壮烈千秋。
唯有你小畜生投降肖后，
配了她桃花女得意悠游，
十余年来事敌寇，
直到今日不肯休，
还将银宗称母后，
老身叫你懒回头。
畜生你算杨门后，
你教我杨家羞不羞？
得新忘故主不如猪狗，
还妄想返辽邦与虎为俦。
我大宋锦江山天阔地厚，
也无处容你这无耻的下流！

杨延辉 啊呀娘呀！（欲起牵太君衣，太君拂袖，延辉重跌倒。排风、宗保扶太君下。焦光普随之欲下）

杨延辉 （唱）叫一声焦贤弟快把我救，
你替我到后帐去把情求。

（白）啊呀贤弟！你看我家老娘恼我太重，要把我打人囚车解往京都。贤弟就该到在后帐，劝我老娘回心转意才是！

焦光普 唉，四哥呀！

（唱）老伯母一番话风雨不漏，
想当年你就是大理不周。
千不该万不该投降敌寇，
到如今只落得复水难收。（送）

杨延辉 啊呀贤弟！为兄的底细别人不知，你还不晓，为兄当年是被那桃花公主亲手擒拿，招赘与她，也是万般无奈呀！

焦光普 唉！四哥呀：

（唱）老令公遭围困不能逃走，
碰死在李陵碑宁死不投。
为大将舍不得抛头断首，
当年间你还要闹什么幽州？（送）

杨延辉 啊呀贤弟，这只怨为兄一时糊涂，后来常有回朝之意，只可恨宫庭内外，人多眼杂，不敢贸然行事。还望贤弟将此心情向我老娘讲明，请她体谅才是！

焦光普 唉！四哥呀！

（唱）分明是恋桃花不肯逃走，
说什么皇宫院人多眼稠。
要腰牌要令箭随时都有，
想回朝何愁你不得自由？（送）

杨延辉 贤弟，照你这样说来，为兄没有半点好处，这个人情你是不肯替为兄求的了？

焦光普 唉！四哥呀！

（唱）自己事自己知不要强口，
想求情你就得认错低头。
叫四哥你且在这里等候，
待为弟到后帐替你哀求。
（背唱）依我看不成功十有八九，
多不过还只有二分想头。
不管它成不成且去走走，

自然是成了好不成也罢休！（入内）

杨延辉 天呀！

（唱）施一礼叫皇天（跪）暗中保佑，
保佑我老母亲将我收留！（起）
怕只怕囚车到逼我就走！（过）

〔绕场，每绕一周往里看一次，凡三次

（唱）也不知焦贤弟他怎样哀求！（送）（站到帐门外低声地）焦贤弟！焦贤弟！（排风从后帐走出）

杨排风 四爷，不要叫了，你让老太君歇歇吧！

杨延辉 老太君怎么……

杨排风 睡着哩！

杨延辉 那位焦爷呢？

杨排风 等着哩！

杨延辉 太君几时才能起来？

杨排风 四爷，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杨延辉 啊呀排风姐！你看囚车一到，马上就要把我解走，请你行个方便，把太君叫醒，让那位焦爷替我求个人情吧！

杨排风 四爷，我实对你说吧！那位焦爷求情，太君不准；太君又怨你不识进退，也不让那位焦爷再出来见你了！

杨延辉 （大吃一惊，呆若木鸡，良久）呜呀天呀！实想老娘不过一时恼我太重，不料竟是如此绝情，难道我杨延辉竟成了不赦之囚了吗？

杨排风 四爷呀！

（唱）

只因你说了个杨门之后，
倒惹的老太君老泪横流。（转垛板）

自从你在幽州失落敌手，
老太君就为你日夜担忧。
只盼你有一日逃出虎口，
回到了天波府重新聚头。
到后来听得你投降肖后，
气得她老人家大骂不休。
每逢着亲友们将你问候，
老太君就觉得气塞咽喉。
来议和她早把主意拿就，
要讨你回朝来依法追究。 (转流水)
老太君主意定不好转扭，
劝四爷再无须苦苦哀求。
真要是老太君把你宽宥， (又转垛板)
回杨府我还是替你发愁。
全家人禀忠心扬眉昂首，
你算个什么人混在里头。
手下人也不愿把你侍候，
对外人又不便让你出头。
象这样活下去将将就就，
也不过是一个无期长囚。
劝四爷你还是思前想后，
老太君她怎好把你收留？ (唱毕少停，下)

杨延辉 (唱) 老母亲她不愿把我宽宥，
小排风一番话讲出情由。

(白) 娘啊!

(唱) 你把儿原当作连心之肉，

只可恨不孝儿不肯回头。

看起来我竟是无路可走，（过。思想异常矛盾，看见架上武器，下了决心，抽出剑来）也罢！

（唱）不如我一身死万事皆休！（下）

〔穆桂英上，看右方惊。〕

穆桂英 有请祖母！（太君、排风、宗保、焦光普同上。）禀祖母：我家四伯父自刎了。（所有人同看右方）

佘太君 四郎！你死了？你死了好！哈哈！（转低）哈哈！（怆然）哈！……（以袖掩面，宗保、桂英、排风、光普均搀扶）宗保，吩咐将你四伯父尸首收殓掩埋。

杨宗保 遵命！

（剧终）

（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邺 官 图 ·

(上党梆子)

人物表

- 石 虎 十六国时代后赵的天王，羯族，公元三三五年——三四九年在位。戴软王冠，穿黄对帔或开氅红胡。由大净扮演。
- 张 群 后赵的尚书。尖翅纱帽，紫蟒，苍满。由大净扮演。
- 刘贵妃 石虎的妃子。黄对帔。由花旦扮演。
- 石 闵 后赵的征虜将军。纱帽，绿蟒，黑三髭。由正生扮演。

*《邺官图》是描写农民起义的戏，写于抗战期间（史纪言同志在一篇怀念赵树理的文章里说是写于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抗战时期，演出场次不少。剧本没有正式发表过，也不见流传下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晋东南地区文化局栗守田同志在襄垣县秧歌剧团找到这个剧本的第一本，（一九四五年的演出本）但有缺损，经过栗守田同志和几位老艺人作了审订和补充。

几点注释：

- 一、襄国、古县名，后赵都城，在今河北省邢台西南。
邺、古县名，后赵石虎的新都，在今河南省临漳县西南。

刘 群 后赵的中书令。纱帽，红鳞或白鳞，黑三髭。由正生扮演。

贝丘户曹 由小丑扮演。

郝牛儿 监工头，由二净扮演。

公 差 贝丘县公差，由小丑扮演。

乡 正 由小丑扮演。

大太监 由小丑扮演。

四内侍

二卫士

全副銮架

四兵卒

李 宏 青年农民，后为起义领袖。素色袍帽，由小生扮演。

李宏母 女，老年农民，土色袍。由老旦扮演。

玉 兰 女，青年农民，素对帔，由小旦扮演。

民 夫 甲、乙、丙、丁。

二、胡人、胡王、胡兵的胡字，是古代汉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带有蔑视的成份。因保留原貌，故未改。

三、“小裁板”、“四六”、“小二行”、“官板”、“滚白”、“介板”、“垛板”，都是上党梆子的板腔。“四六”和“官板”是基本板腔，使用最多。“四六”擅长叙事、抒情；“官板”又名“大板”或“宏板”，比较高亢激越。

“四六”和“官板”的上句，有“圪圪句”和“破句”的两种唱法。“圪圪句”是把全句连起来唱；“破句”唱半句后插段过门，再唱后半句。

“垛板”也有款、中、紧的不同唱法。“慢板”就是“慢垛”。

时 间 东晋成帝咸康元年（公元三三五年）。

地 址 后赵邺都。

第 一 场

〔大太监、四内侍引石虎上。〕

石 虎 （引）数十年干戈未休，
夺得来凤阁龙楼。

（诗）司马君臣逃过江，
几人称帝几称王。
东征西讨无虚岁，
石氏威名天下扬。

孤家大赵天王姓石名虎字季龙，幼年在叔王石勒驾前，南擒刘岳，北走索头，西定秦雍，东平齐鲁，夺得中华九分之八；不久平灭东晋，就要统一中华。只因这襄国都城，城小地窄，不象帝王气派，因此要在

四、扬、流、过、送、栽与还魂腔，都是上党梆子唱句的不同处理方法：扬、也叫扬腔，是上句的末尾拖长，扬起，表达激越奔放的感情；流，是角色唱完一个唱段，把最后一句拖慢，让别一角色接着再唱；过，就是“过门”，是使唱句拖稳刹住，不停止音乐，插进长短不同的道白；送和栽都是唱段的结束，送比较平稳悠扬，栽比较短促紧快；还魂腔，是悲痛凄楚时，把上句末尾的四个字或三个字再唱一遍，以加深表现力。

五、“三腔”、“鱼底鱼”、“朝天子”、“五福堂”、“清鼓”、“迎仙客”都是上党梆子表现各种不同情感的牌

魏郡邺县建立新都。前日命尚书张群打造图样，却不知他画成了无有。大太监！

大太监 有。

石 虎 宣尚书张群入宫来见！

大太监 旨下：尚书张群入宫来见！

〔张群上。〕

张 群 （对）画就邺宫图，

果算帝王都。

臣张群见驾，愿天王千岁！

石 虎 爱卿少礼！

张 群 千千岁！（站旁介）

石 虎 命你计划建都邺宫之事，你可将图画就了么？

张 群 图已画成，就此献上，天王一观！（呈图）

〔大太监接图，献于石虎。〕

石 虎 待孤一观！（“三腔”，看介）唔呼呀！我观此图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漳河直贯南北，虹桥横接东西，

曲。

六、“长皮”、“乱家伙”、“掩镜”、“小军战”、“尾声”等，是上党梆子锣鼓牌曲，表现不同动作和情感。

七、“四眼浪头”、“浪头”、“七锤”、“跌回来”是上党梆子唱段起板的不同处理方法。“一声锣撞死”，“哑家伙”是锣鼓点根据剧中人感情的不同处理。“顶打”是在“四六”起板的过门前，加的两声小鼓点。

八、“跌一参”是角色在台上表现摔跌的动作。“拈攒盘”是上党梆子武打的一种表现手法。表现一员大将战敌方四个小军，并把他们战败。

秦之阿房，汉之两京，不过如此。果然是帝王之都城也！

（唱）看罢了邺宫图孤心欢喜，
跨漳河架飞桥连接东西。
宫墙外转一圈四十余里，
有亭台与殿阁密如围棋。
几进门几转弯都要熟记，
记不住走错了定把路迷。
张爱卿画此图正合孤意，
工成后孤把你官往上提！（送）

张爱卿画图有功，工成之后，孤把你官往高升！

张 群 微臣谢恩！

石 虎 慢来！且莫谢恩。里边只怕有点小毛病！

张 群 请问天王，哪里有毛病，待臣修改。

石 虎 不用修改，毛病不在图上。你画此图工程浩大，修起来就得个十年八载。（手捧胡介）象你我君臣这大年纪，如何等它得到哇？

张 群 启奏天王：司、并、燕、冀，有的是中华人。依臣之见，抓它二十万苦工，不用二年，就可能修成了。

石 虎 （看图）可是呀！孤王治下，有的是中华百姓，抓它二十万民夫不在话下。哎！不对！内中还有多的毛病……

张 群 天王，还有什么毛病？

石 虎 这样多的楼台殿阁，孤王和那千百个嫔妃宫女住在里边，你找不见我，我寻不见你，岂不是冷冷清零零落落吗？

张 群 启奏天王，天下有的是女人。我主挑选几万个美女，住在那里边，陪王伴驾，人多了可自然就热闹了。

石 虎 哈！……爱卿言之有理，待孤传旨！孤传旨意：命各郡县挨门挨户征调民夫，挑选民女三万人入宫，勿得有误！领旨出宫！

张 群 臣领旨！（下）

石 虎 唔呼呀！此图画得美貌，不免将刘贵妃唤出，叫她也观观此图，长长见识。大太监！

大太监 有！

石 虎 看你刘娘娘起床来了没有，就说孤王请她出来看画来吧！

大太监 领旨！（向内）天王旨下：请刘娘娘前来看画图来吧哟！

刘贵妃 （内白）晓得了！
（内唱“小栽板”）
清晨起下床来以的哪以哪嗨哪呀嗨，好不痛快以以哪以哪呼以呀嗨，以以以以哪呼以呀嗨！

侍儿带路！（快步带四宫女出场，跌“一参”，宫女扶起介）
唔呼呀！
（接唱“四六”）
又忽听大太监一声宣传。
昨夜晚在深宫陪王饮宴，
饮到了三更后未曾安眠。
梳洗罢整一整云鬓花钿，（过，整头）

唔呼呀！

（唱）轻移步见天王前去问安。

忽听天王一声宣，

不由我刘妃喜心间。

进得官来一旁站，（过）

小妃参见天王。

石 虎 （在桌后）不用！不用！嘻……（从桌后走出介）梓童请坐！

（接唱“四六”）

叫梓童前来把画观！（裁）梓童哪晓，孤王要在邳郡修建新都，命张尚书画了一个图样，十分排场。赐与梓童一观。

刘贵妃 领旨！

（唱“小二行”）

接住了以的哪以哪呀嗨，以以以以哪以呀嗨哪呀嗨，（过门）邳官图真来高呀兴，以的哪呀嗨，以以以以哪，以以以以哪，以哪以哪呼嗨，以以以以哪呀呼儿嗨，（过）

（左观，右观，再观，向石虎问）天王！

石 虎 梓童！

刘贵妃 你看这五步一楼——

石 虎 唔！（很轻浮地）

刘贵妃 十步一阁——

石 虎 哎！

刘贵妃 （唱“四六”）

果然是帝王家一座都城。

有楼台与殿阁密密层层，
人少了住里边冷冷清清。（栽）

噢，天王！我观此图倒也十分排场。就是有些宽大，
住在里边恐怕十分凄凉。

石 虎 梓童不必担惊。孤已传旨，挑选民女，将来选它三万
宫女住在里边，自然就热闹了。

刘贵妃 哎嗲！（怒介）哪怕你选十万，由你选的去吧！（将
图掷地介）唉！奴命好苦也！

（音乐奏“四眼浪头”）

石 虎 （在音乐中间拾图）动不动就使厉害！

刘贵妃 （唱“四六”）

那昏王传旨把妃选，
不由我刘氏恼心间。
新人贵了旧人贱，
旧人的罗帏新人眠。

好昏王！

（唱）老色鬼贪多嚼不烂，
好起来不过两三天。
从今后休见奴的面，
去陪你新人万万千！

（流）

石 虎 唔呀！

（唱“官板”）

小小女子生的贱，
动不动哭俩红眼圈。

（流）

〔“长皮”石闵上。〕

石 闵 (唱) 昏王有旨往下传，
又要民女又要男。
少不得进宫把他见，
也免得华人受熬煎。
(穿场下)

〔刘群上。〕

刘 群 (唱) 平西将军有了难，
着人回朝把兵搬。
昏王不在金銮殿，
急慌忙进宫奏一番。
(穿场下)

石 虎 (在唱中扶刘贵妃，给擦泪；刘贵妃不让擦。)

刘贵妃 唉哪！

(唱) 红眼圈不要你来看，

石 虎 (唱) 不叫看你就出外边。

刘贵妃 (唱) 要撵你就早些撵，
撵了我你去倒新鲜。

石 虎 (唱) 这贱妃与我来比胆，
老子可也够野蛮。
把贱妃拖出皇宫院。

〔石虎拖刘贵妃介。石闵上，碰倒刘贵妃，石闵急以笏遮面。石虎又扶刘贵妃起介，拉转介。刘贵妃又碰石闵介。〕

石 闵 (唱) 俺石闵见驾宫门前。(过)
(不用跪) 孙臣征虏将军石闵参见祖王。

〔石虎后退一步。刘贵妃指石虎脸介，不语，下。〕

石 虎 这是石闵？

石 闵 是孙臣！

石 虎 孤王不曾召你，进宫为何？

石 闵 孙臣听说祖王征调民夫、挑选民女，恐怕劳民伤财，引起民怨，因此入宫谏驾。

石 虎 这样说来，你也是个反对孤王的？

石 闵 孙儿不敢，只求祖王三思！

石 虎 噯！孤王主意已定，还三思着什么？好个孙孙，竟敢搅乱孤心，卫士们！

〔两卫士上。〕

两卫士 有！

石 虎 将石闵绑下处斩！

两卫士 是！（绑石闵，押下介。）

〔刘群上。〕

刘 群 刀下留情！（向大太监）公公大人往里传禀，中书令刘群有要事见驾！

大太监 是！禀天王，刘中书令有要事入宫见驾。

石 虎 真正麻烦！宣他进宫来见。

大太监 （向外）刘大人入宫来见！

刘 群 （入宫）启奏天王，征虏将军石闵身犯何罪，为何要绑下处斩？

石 虎 是他顶了孤王几句，因此就把他绑出去了。

刘 群 启奏天王，因为口角相争，处斩大将，也太可惜。平西将军张伏都被张骏杀败，差人回朝搬兵。依臣本奏，就命石闵戴罪出兵，如若得胜回来，亦可以将功

折罪。请天王三思！

石 虎 就依爱卿本奏。（向大太监）将石闵放回桩来！

大太监 天王旨下：将石闵放回桩来！

〔两卫士押石闵上。〕

石 闵 多谢祖王不斩之恩！

石 虎 非是孤王不斩与你，多亏中书令讲情。孤王命你前去征西，平灭张骏，得胜回来，将功折罪。领旨出官去吧！

石 闵 多谢祖王！（与刘群同白）启驾！

〔石虎与大太监、四内侍同退下。“乱家伙”。〕

刘 群 （对）昏王无道太猖狂，

石 闵 （对）中华人民受灾殃。

〔“乱家伙”，同下。〕

第二场

〔“乱家伙”跌回来。玉兰抱小孩扶李宏母上。〕

李宏母 （唱“四六”）

胡王石虎乱中原，
只闹得处处不安然。
我的儿上镇把集赶，
倒叫老身挂心间。
这般时候未回转，
还不知出了啥事端。

〔李宏急上。〕

李 宏 （唱“四六”，圪囫句）

胡王有旨往下降，

各州郡县不安康。
要修宫殿抓丁壮，
为选嫔妃要女郎。
与胡人难以把理讲，
我举家该往何处藏？

（栽。进门介）

啊呀！母亲、贤妻，不好了！

李宏母
玉 兰

惊慌为何？

李 宏

那胡王要在邺县大修宫殿，又要挑选嫔妃宫女，黎民百姓又遭大难也！

（唱“官板”）

昏王有旨往下传，
无故又生事两端：
征派民夫修宫殿，
要选民女万万千。
家家妇女都要验，
个个壮丁要抓完。
昨日里公差出了县，
只恐大祸在眼前。（流）

玉 兰 呀！不好！

（唱“四六”圪囫句）

听说胡王生事端，
怎不叫人心胆寒。

李宏母

（唱）眼看咱举家要遭难，
该到何处把身安？（栽）

啊呀儿呀！这样说来，你夫妻都在不便之处，咱举家该往哪里逃躲？

李 宏 唉母亲呀母亲！自从晋朝君臣逃往江南避难，长江以北一概都成了胡人的天下，哪里还有一片净土？不如与儿拼了吧！

李宏母 住口！宏儿不要着急，你看咱一家四口，老的老，小的小，如何与贼拼得性命？为娘当年与你父在太行山里逃荒，见那地方山高路险，地广人稀，不如就逃往那里去吧！

李 宏 就依母亲之言。玉兰贤妻急速准备逃难可！

（唱“官板”）

只恨胡人闹中原，
黎民百姓受熬煎。

玉兰妻！

（接唱）速速下去忙打点——

（扬腔，玉兰下。）

〔公差、乡正上，穿场下。〕

李 宏 （唱）只恐怕公差到乡间。（栽）

〔公差、乡正又上。〕

乡 正 （念）老爷出火签，

公 差 （念）抓丁万万千！

这家可有壮丁几人？

乡 正 待我查过册子！（查介）这一家只有壮丁一名，名叫李宏。

公 差 可是胡人，可是华人？

乡 正 是个华人。

公差 是华人，自然就得派他。一同进去。（二人进介）
〔李宏母、李宏、玉兰齐惊介，一同退至台边。二役站正中间。〕

乡正 李宏，圣上有旨，要修宫殿。县里公差来征民夫，册子上有你的名字。要你立刻准备起身吧！

李宏 请问老叔，这民夫是怎样个征派的？

公差 李宏，你就不用问。凡是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要是胡人，两丁取一；要是华人，一律同去！

李宏 几时才能回来？

公差 一年修不成二年，二年修不成三年。死就死了，死不了，修完了工，自然就回来了。

李宏 什么？唉，我后悔逃的迟了呀！
（“七锤”接“官板”）
举家人正讲——逃难话，
却不料公差已到家。
是胡人两丁只取一个，
是华人一律齐征发。
恨晋朝君臣江南下——江南下，（“长皮”）
把华人撇与胡家杀。
我不如与贼拼了吧！（过）
哎！拼不得！
（唱）连累我娇妻幼子年迈妈！（过）

公差 走了吧，不要磨了。

乡正 李宏，天不早了，收拾行李吧。

李宏 唉！罢了！
（“浪头”，唱）

少不得我跪下说好话，

（“长皮”）

望定了二位把头磕。

可怜我老母年高大，

还有我弱妻与姣娃。

倘若是家里离了我，

她三人生活没有法。

单求二位多宽大，

高一高手儿容过咱。

（过，叩头介）

老王头，乡正，就该饶了我举家性命吧！

公 差 唉！这是公事，别来他娘这些罗嗦！

李宏母 唉！

（唱）我的儿求情求不下，

玉 兰 （唱）咱婆媳上前把头磕。

李宏母 （唱）饶了吧来饶了吧！

玉 兰 （唱）我举家老小全靠他。

（指生介。流）

乡 正 （唱）小的小来大的大，

乱吵吵跪了一地下。（栽）

公 差 啊呀！你们不要乱七八糟跪下一地，还是早些收拾起身了吧！

李 宏 老王头，若能容俺，是你的人情；不能容俺吗——哎
呀！俺也只得去了就是。

公 差 去吧，我也没有办法！

〔李宏一家三口站起介。〕

李 宏 唉！老母亲，势到如今，儿不得不去。玉兰妻，下去与我准备行李。

玉 兰 是！（哭泣下）

李 宏 啊呀母亲！昏王还要挑选民女，眼看此地不能存身了。儿去之后，你们逃往太行山里去吧！

（唱“官板”）

实指望山中去逃难，

迟了一步入了圈。

那胡王还要把妃选，

恐怕再有大祸端。

儿去后此地难存站，

要你们速速逃上山。

（唱一段“滚白”）

李宏母 儿呀！

（唱）我的儿说罢泪涟涟，

举家人当下不团圆。

此一去山高路又远，

也不知何日得回还。

〔玉兰带包裹上。〕

玉 兰（唱）公差、乡正不容宽，

不由玉兰泪涟涟。

哎，夫哪！

（唱）这本是破烂衣裳四五件，

也有棉来也有单。

出了门焉有人顾盼，

千万莫教受饥寒。

亲朋邻居回家转，
叫他们常把家信传。

李 宏 哎，妻呀！

（唱）夫与你留下千斤担，
全家重担你一人担。
高堂老母勤照看，
好好照管咱小儿男。
你们在家难存站，
随老娘逃往太行山。
咱举家扯心挂肠难分散，难分散（“还魂腔”）
（“长皮”转场）
还不知何日得团圆。

（下）

李宏母 （远望介）

（唱）眼看我儿去得远，

玉 兰 （唱）撇下咱婆媳好可怜。

李宏母 儿妻！

（唱）准备行李快逃难，
咱就逃往太行山。
婆媳们急速忙打点，

（换衣。）

〔李宏母背包取拐杖，玉兰背孩子介。〕

李宏母
玉 兰

（同唱）还不知何日得团圆。

（送）

哎呀，^儿夫呀！ （同下）

第三场

〔贝丘户曹带二差役上，奏“海底鱼”。〕

贝丘户曹 咱，贝丘县户曹是也。天王有旨，上司有命，命我
下乡挑选民女。人役们！

人 役 有！

贝丘户曹 催马！（“海底鱼”同下）

第四场

〔李宏母与玉兰同上，“长皮”。〕

李宏母 （唱）咱婆媳二人去逃难，
想起我宏儿泪不干。
胡王抓他修宫殿，
还不知何日得回还？

（流）

玉 兰 （唱）只因为胡王把妃选，
逼得我举家逃外边。
此一去山高路又远，
何日里得到太行山。

李宏母 儿呀！

（唱）红日偏西天色晚，
走得我腰疼腿又酸。
强打精神往前盼，

（扬腔，转场）

〔贝丘户曹引人役从下场口上。〕

贝丘户曹 （唱）叫人役上前把她拦！

（送）

人 役 呔！老少民女慢走，户曹老爷要问话哩！

〔李宏母、玉兰同跪。〕

李宏母 户曹老爷宽恩，放我婆媳过去吧！

贝丘户曹 （背白）噫！这个小媳妇生的果然不错！（向二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李宏母 是逃荒的。

贝丘户曹 她是你的什么？

李宏母 她是我的儿妻。

贝丘户曹 天王有旨，上司有命，命我下乡挑选民女。象她小小年纪，为何不在家候选？人役们！

人 役 有！

贝丘户曹 将这一小民女带了！

二人役 是！起来！（拖玉兰起介）

李宏母 啊呀，老爷宽恩！我老婆年迈无能，全仗儿媳奉养。求老爷饶了她吧！

贝丘户曹 天王选她入宫，哪管你年老年轻？滚蛋去吧！

玉 兰 啊呀老爷，小妇人已有丈夫，如何能入宫陪王？

贝丘户曹 唉！有了丈夫，有什么要紧？你又不是米面油盐，少了四两，多了半斤，怎样不能入宫？

玉 兰 你看我背着孩子，怎能入宫？求老爷饶了吧！（又跪介）

贝丘户曹 一个毛孩子有什么要紧？扔了就是！（由玉兰背上抓下小孩，扔在地上。）

〔小孩哭两声。

玉 兰 啊呀儿哇！

贝丘户曹 带了带了！

李宏母 啊呀，儿妻呀！
玉 兰 婆婆

〔李宏母拉玉兰介。被二人役推倒介。二人役拉玉兰下。“乱家伙”变“掩饶”不住。

李宏母 （挣扎起来欲下追玉兰，小孩哭两声。急返回抱起了小孩）啊呀，孙孙呀！（站正介）唉！这成了什么世道呀！

（唱“官板”）

自从有了贼胡王，
不论男女都遭殃，
为修宫殿抓丁壮，
抓去我儿好心伤。
选民女又把儿妻抢，
撇下了孙孙没了娘。

孙孙呀！

（唱）老身怎把你抚养？（过）孙孙呀！（惊介，摸小孩口鼻，更惊介。又摸全身，细看介）唉！孙孙呀！

（唱“官板”）

却怎样口中无气浑身凉？（过）

孙儿！孙儿！孙儿啊！

（唱）方才那贼发鲁莽，
扔得我孙孙一命亡。（送）

唉！孙孙啊！（“三腔”，又摸一遍，用拐杖剜土介，再用手刨，埋完小孩介。）且住！想我举家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撇下老身孤孤零零，该往何处而去？噢，有了！我不免到在邺县，找见宏儿，拿一主意！

（唱“官板”）

我家遭下风波浪，
死的死来亡的亡。
丢下老身无法想，
找见我宏儿拿主张。

贤儿妻！小孙孙！唉！好苦也！（下）

第五场

〔“乱家伙”，张群带郝牛儿和四兵上。〕

张 群 （对）奉王旨意修宫殿，
抓来民夫几万千。

老夫，尚书张群，奉了天王旨意，要在邺县修建新都。郝牛儿！

郝牛儿 有！

张 群 此是东宫地基，要你监督清河郡六县民夫，在此修建，不得迟误！

郝牛儿 尊命！尚书请下！

〔张群同四卒下。〕

郝牛儿 咳！（向内）清河郡六县民夫往这里来！

〔李宏同民夫甲、乙、丙、丁同上。〕

五人同 参见军爷！军爷有何吩咐？

郝牛儿 （用鞭指）要你们就在此地，凿石的凿石，抬土的抬土，哪个偷懒，吃我一鞭！（抡鞭打众介）

五人同 （各挨一鞭）啊呀！饶命啊！

郝牛儿 你们喊叫什么？这不过是呈个样子，叫你们尝一尝滋味。你们哪个如要偷懒，“老鼠拖木橛，大头在后边”，要你们仔细着！哼哈！……（下）

李 宏 唉！这成个什么世道也！

（唱“官板”）

恼恨胡人太猖狂，

平白无故把人伤。

满腹冤枉难忍让，（一声锣指死）

唉！咱们佣工上来。

〔李宏与民夫甲、乙用捶作打石状，只用梆子小鼓。〕

〔民夫丙、丁下，抬一筐子上作倒土状，又下。〕

〔打石声中，郝牛儿带二兵上，穿场巡视下。〕

〔李宏母上。〕

李宏母 （望甲）宏儿！（又望乙）宏儿！（又望李宏）
宏儿！

〔李宏同母互着。〕

李宏母 （同唱） 突然间低头见儿郎
李 宏 抬 头 见 老 娘。

（送）

李 宏 （拉母）你是老娘？

李宏母 是为娘！

〔众友停工同着介。〕

李 宏 母亲为何来到这里？

李宏母 啊呀儿呀！自你去后，为娘领着你妻逃出门来，不料路途遭了大难也！

李 宏 （夹白）噢噢噢！

李宏母 （唱“官板”）

逃出虎口入罗网，

遇见户曹下了乡。

半路上他把你妻抢，（过）

李 宏 怎么说，他把我妻抢去了？

李宏母 抢去了！

李 宏 啊呀妻哪！（哭）

（唱）哭了声玉兰妻女贤良。

夫妻们永远见不上，

玉兰妻哪！玉兰妻哪！（哭介）

（唱）一番恩爱无下场。

你去后老娘谁奉养？

（过）

老母亲，你的孙孙哪里去了？

李宏母 唉，儿哪！

（唱）提起来孙孙好悲伤。

那胡贼他把你妻抢，

把孙孙摔死大路旁。

李 宏 好恼！

（唱）听此言来心火上，

骂了声石虎贼胡王！

与华人设下天罗网，

害得我家破人又亡。

民夫甲 唉！

（唱）方才听了老人讲，

民夫乙 （唱）引得你我痛悲伤。

民夫丙 （唱）那胡人乱把华人抢，

民夫丁 （唱）恐怕咱家中也遭殃。

〔郝牛儿上。

郝牛儿 （唱）这一批工人不稳当，

不做活儿闲嚷嚷。（送）

啊！你们乱七八糟，吵个什么？（向李宏母）

啊！这一老乞婆为什么到这里捣乱？

李宏母 我是来找我的儿子！

郝牛儿 你的儿子来此做工，怎能由你乱找？

李宏母 胡人把我儿妻抢去，难道也不许我告诉我儿知道！

郝牛儿 啊！天王有旨，不准提起胡字，老乞婆竟敢胡人长、
胡人短！（抽刀介）吃我一刀！（杀死李宏母介）

李 宏！ 唉！母亲哪！（跪，“三腔”，哭介）

郝牛儿 不要哭！

李 宏 （起）你将我母杀死，难道哭也犯法！

郝牛儿 不叫哭就是不叫哭！难道你能反了不成？

李 宏 反了吗——啊！反就反了吧！

〔李宏夺过郝牛儿剑来，扭住他的右手。郝牛儿跪地上。李宏用脚蹬住郝牛儿背。

李 宏 好恼！

（唱“介板”）

小小胡儿太猖狂，

为何把我老母伤？

狠一狠切了儿头项，
(杀郝牛儿死)
(接唱) 定把胡人一扫光。(送)
〔李宏同民夫乙抡锤转场，表示用锤砸碎郝牛儿尸介。〕

李宏 众家弟兄，你我都是中华百姓，落在胡人手里，人人受他欺压。愿报仇的，跟我李宏来！

民夫^甲_乙 杀贼报仇，哪个不愿，请！

(同下)

第六场

〔民夫丙丁二人抬筐子上。〕

民夫丙 (唱) 遭了殃来遭了殃！

民夫丁 (唱) 怕挨皮鞭走慌忙。

民夫丙 (唱) 压得我气也出不上，(过)

〔内喊：“反了！反了！”〕

民夫丙 听，有人反了！

〔内又喊：“反了！反了！”〕

民夫^甲_乙 唉，咱也反了吧！

(唱) 我倒抬你日你娘！(送)

〔二人扔下筐。民夫丙抽出抬杆作兵器，民夫丁握了一下拳头。〕

民夫^丙_丁 反了！(同下)

第七场

〔四胡兵引张群上，绕张群转。〕

张 群 （唱）十万工人把工动，
俺张群马上喜心中。
工成后天王看得重，
又是老夫一大功！（过）

〔内大喊“反了”，四兵停转。〕

张 群 呀！
（唱）人声呐喊如潮涌，
因何事这样闹烘烘？（过）

〔内又喊“反了”，张群向内望。内再喊“反了”。〕

张 群 呀，不好了！
（唱）人多势众来得猛，
〔老鼓“长皮”，李宏带民夫甲乙丙丁上，穿场下。〕

张 群 （唱）木棒铁锤举在空中，
恐怕是民夫起暴动，
（扬腔）

〔张群带四兵转半个场，李宏带民夫甲乙丙丁，由台后部上，转半个场，拦住。〕

众 同 （唱）活捉奸贼定不容！（送）

李 宏 奸贼，哪里走？

张 群 呸！大胆野民竟敢造反，难道没有王法了？

李 宏 啊！好你奸贼，随着胡人欺压中华百姓，哪里容得！
众弟兄！

四民伙 有！

李 宏 拿了！

〔打开。四兵护张群，李宏与四众拥下。〕

第 八 场

民夫甲 （内白）呔！

〔“小军战”家伙。民夫甲上耍场，一个胡兵上，二人开打，胡兵败下。又一胡兵上，开打，民夫甲败下。民夫乙上，开打，胡兵败下。另一胡兵上，开打，民夫乙败下。民夫丙上，开打，胡兵败下。第四个胡兵上，开打，民夫丙败下。民夫丁上，用拳头开打，胡兵败下。民夫丁下。〕

李 宏 （内白）呔！

〔老鼓战鼓，李宏上耍场，四胡兵上，“揸攞盘”打，四胡兵同败下。〕

〔张群上，被李宏瞞头一拳，打了一个黑眼窝，头破了，逃下。李宏追下。〕

第 九 场

〔在“哑家伙”清清清中，张群上，他表示半个脸流血，一个黑眼窝，频频回顾。〕

〔内白：“拿住老贼！”锣鼓“的圪冬仓”。〕

张 群 唔呀！（锣鼓“读隆仓”，“乱家伙”中，张群跑下。）

第十场

〔李宏领四民夫上。〕

李 宏 众弟兄，你我十万余民夫声势浩大，就此道出邯郸，围攻襄国，杀死石虎，夺得天下，何愁冤仇不报？只是兵马不可无头，需得举个头目才是！

众民夫 李兄长，你就当个头目，我们大家愿听号令。

李 宏 既然如此，一同请了！

（念）一举出邯郸，

众民夫 （念）杀贼报仇冤。（同下）

第十一场

石 虎 （内唱）自那日传旨选女姣，
〔大太监、四内侍引石虎上。
音乐“跌回来”。

石 虎 （接唱）惹得那刘妃泪滔滔。
每日里与孤胡吵闹，
只闹得孤王好心焦。
孤有心把她丢掉了，
可惜她容貌太好瞧。
前思后想心烦恼，
一肚子闷气没处消。（送）

你叫怎说，自从那日传旨挑选民女，惹得那刘贵妃每日啼哭，叫孤王坐卧不安。有心将她开发了，又舍不

得她的花容月貌。哎嗙！好叫孤愁闷也！

大太监 啊呀天王，这几日来，你总是闷闷不乐。待奴婢领你到后宫各院遛一遛吧！

石 虎 后宫各院，有什么好处？虽有嫔妃女史成千上万，除了你刘娘娘，哪还有一个顺眼的？

大太监 禀天王：近几天司、并、燕、冀各州选来许多民女，难道说，其中还能没有几个好样的？

石 虎 新选的民女，孤王还没有看过，谁知都是些什么货色？

大太监 启奏天王：奴婢还有一计，可以给天王解闷。

石 虎 唔，你快快讲来！

大太监 请天王驾登灵风台上，奴婢手拈宫花在台下伺候，叫那些新选民女从台下经过。哪一个打中天王眼目，天王用手一点，奴婢就在她头上插花一朵。等她们全部过完，将那些插过花的，宣进宫来，陪天王作乐，就可以消愁解闷了。

石 虎 唔！……此计倒也很好。吩咐他们与孤王顺辇，灵风台前走着！

大太监 领旨！内使们，与天王顺辇，灵风台前走着！

（拖音。）

〔笛子曲，慢吹“朝天子”。“五福堂”亦可，“清鼓”亦可。銮驾上。石虎上辇同下。〕

第十二场

〔音乐不休止，石虎等原人上。石虎下辇，銮驾退〕

下。石虎站台上，大太监手拈花朵站场上。乐止介。

大太监 新选的民女，由东过西，灵风台下来着！

〔锣鼓读读冬冬冬，奏“迎仙客”。小太监押领四个民女——最后一个即玉兰上，穿场。

〔石虎用手指玉兰。大太监将手中花插在玉兰头上。玉兰等同下。

〔石虎下台，顺辇，原人同下。

第十三场

〔音乐不休止。石虎等原人上。从人退下。石虎坐桌前椅子上。乐止介。

石 虎 大太监，吩咐将那个插花女子领上来。

大太监 是！宫娥们，将那个插花的民女领上来。

玉 兰 （内白）哎！

（内唱“介板”）

贼胡王有旨往下传。

〔音乐切死。“乱家伙”中二宫女引玉兰上。

玉 兰 李郎夫！娇生儿！唉！我玉兰好苦也！

（唱“垛板”）

胡王有旨往下传，

害得俺举家好可怜。

夫妻婆媳各分散，

将我儿摔在大路边。

郡倒郡来县倒县，

押解我玉兰到此间。
此一番见了胡王面，
破里求全用巧言。
说得他一时心意转，
也许能把我放回还。
倘若是那贼不放俺，
（转“慢大板”）
也过我死在贼面前。
舍生忘死进宫院——

〔“长皮”，二宫女引玉兰进介。二宫女下。〕

玉 兰 （唱）跪在了地上叫冤屈。（送）天王在上，小民妇冤屈！

石 虎 这一小民妇，千万人中，孤王把你另眼看待，你还有什么冤屈？要你抬起头来！

玉 兰 多谢天王！（抬头介）

石 虎 呀！哈！……好一个绝色美人也！

（锣鼓“顶打”接“四六”板过门。）

〔玉兰害羞，用袖遮面介。〕

石 虎 （唱“四六”板“圪囫句”。）

小民妇露出来桃花面，
不由得孤王心喜欢。
孤只说刘妃生得好看，
怎比得此女颜色鲜。
把此女留在后宫院，
不要那刘妃红眼圈。

（流）

玉 兰 唉！

（唱“官板”）

那胡贼骗我抬头看，
看了看吓得我心胆寒。
高大鼻子欧豆眼，
一大把黄胡髯胸前。
挤眉弄眼多轻贱，
恐怕他不肯放我还。

（送）

上禀天王，贝丘县公差、户曹，害得小民妇家破人散，求天王放小民妇回去吧！

石 虎 家破人散，一心无挂，正好入宫陪孤，你还提它做甚？

玉 兰 上禀天王，民妇原是贫寒出身，不晓官庭大礼，如何能入得官庭？

石 虎 唉！只要孤王爱你，不用什么大礼！

玉 兰 上禀天王，小民妇早已嫁夫，生子，焉能入宫陪王？

石 虎 嫁夫生子，有什么要紧。你又不是米面油盐，少了四两，短了半斤，怎么就陪不得孤王了？

玉 兰 （怒介）老胡贼，你放屁也！

〔起“官板”过门。〕

石 虎 （夹白）说着说着就骂起来了！

玉 兰 （唱“官板”）

胡贼讲话如放屁，
轻嘴贱舌啥东西！
苦害华人不讲理，

仗着势力把人欺。
有一日华人起反意，
反进宫来剥了你的皮！

（流）

石 虎 奴才！

（唱）小奴才竟敢发脾气，
大胆不知高与低。
手执宝剑杀了你！（取剑介）

玉 兰 （唱）我纵死不做胡人妻。（过）
老贼你杀！你杀！（说一句逼一步）

石 虎 奴才！

（唱）你想死孤偏不杀你，定叫你做个胡人妻！强动手不怕你不愿意——

〔拉玉兰绕场一周。石虎一手揭开床帐，一手用力拖玉兰。〕

玉 兰 （唱）急慌忙抓破贼面皮！

〔玉兰手上暗染红色，涂在石虎脸上。石虎脸上流血介。〕

石 虎 （以袖掩面）真她妈的好大脾气！大太监，将奴才暂且打在冷房，着人小心看守，千万莫叫死了！

大太监 是！（向玉兰）下去！

〔大太监押玉兰下。又上。〕

石 虎 （用手在脸上按了一下，又看手）唉！女人真不是个好玩的！大太监，与孤取镜来，待孤一观可！

（“浪头”接唱）

小小女子秉性强，

抓得孤满脸冒火光。

取过镜来望一望——

〔大太监取镜，石虎接镜看介。〕

石 虎 唔呀！唔呀！

（唱）只羞得孤王无处藏。

（双手掩面，流。）

〔张群在“长皮”中上，歪带帽，斜穿衣，乱须，黑眼。〕

张 群 （唱）修邺宫起下风波浪，

报与天王作提防。（送）

（跪地，以双袖掩面。）

大太监 （看石虎介。回头看张群介。）禀天王，张尚书入宫！

石 虎 就说孤王有病，叫他改日再来吧！

张 群 微臣已经进宫来了！

石 虎 （向后一退，稍停介）怎说张爱卿，你倒进宫来了？

张 群 微臣进宫来了！

石 虎 爱卿 哪 爱卿 哪里？

（同时）在 里， 在 （互相一

张 群 微臣 这 微臣 这里！

看）噢！（各用袖遮面介。）

石 虎 爱卿平身！

张 群 多谢！（站起介）天王为何这般模样？

石 虎 孤王是……是擦伤了。

张 群 （细看介）好象有人抓了一把。

石 虎 啊！明明是擦的，哪里是抓的？

张 群 嗯，是是是，擦的，擦的。

石 虎 爱卿为何这般模样？

张 群 这般模样还算好的，要不是为臣跑得快点，恐怕连性命也都完蛋了。

石 虎 什么事情，那样危险？（二人都放下袖介。）

张 群 天王容禀！
（唱“官板”）
 十万民夫齐反了，
 李宏为首武艺高。
 要杀天王灭大赵，
 顺扑邯郸反进朝。

石 虎 呀，不好！
（唱）忽听张群一声报，
 吓得孤冷汗如水浇。
 该到何处把兵调，
 武将们个个不在朝。（送）
 啊呀爱卿，十万民夫起反，如何了得！武将们东征西讨，不在朝中，该命哪家前去平反？

张 群 启奏天王，义阳王石鉴才从关中回朝；征虜将军石闵戴罪征西，才到内黄。依臣之意，就命义阳王带领襄国守军，攻打邯郸；征虜将军从内黄回兵，攻打邺都。南北合击，大功必成。

石 虎 就依爱卿之言，待孤传旨。孤传旨意：命石鉴带领襄国守军，攻打邯郸；石闵从内黄回兵，攻打邺都。爱卿领旨出宫去吧！

张 群 臣领旨！（下）

石 虎 （对）因为修邺宫，
里外受夹攻。

（在音乐“尾声”中，又擦了擦脸，看了看手，随大
太监下。

（第一本完）

茂 林 恨*

(鼓词)

一道长江万里长，
长江两岸好风光。

三年前来了日本鬼，
大小官员都逃亡。
老百姓跑来跑去无躲处，
好象孩子没了娘。
青年人个个起了火，
要打鬼子保家乡。
叶项将军一声唤，
十万大兵起两江。
新四军就是这样起，
打得鬼子难提防，
——今天破了京沪路，
明天又来破沪杭，
也打城市也打镇，

* 六篇最初发表在一九四一年《抗战生活》革新号第一期，署名王甲上。

又截军火又截粮。
只打得鬼子大叫苦，
走一步路儿也惊慌。
江南北有了新四军，
老百姓才敢回家乡。
那鬼子，虽然常常来“扫荡”，
新四军、老百姓，军民合作力量强，
弄得他“扫荡”一次败一次，
偷鸡不着贴米粮。

那鬼子，三年来常算这笔账，
算来算去不沾光；
他言道“新四军大半都是共产党，
他们的领导比人强；
打他自然打不下，
更休想骗他来投降。”
那鬼子，想来想去有了计，
猛想起他的忠孝郎：
“在中国还有亲日派，
挑拨内战是内行，
他们是未出娘胎都反共，
政府里边有反共王，
趁势挑他起内战，
先教他自己闹一场。”
鬼子们，如此这般做一遍，
亲日派一道命令出中央：

“新四军限定日期往北上，
要撤到黄河以北去驻防！”
新四军忠心耿耿奉了命，
集合队伍来渡江，
却不料，亲日派早把消息漏，
鬼子们开动军舰来堵挡。
李品仙，三师人开到芦江去，
暗与鬼子联了防。
新四军，来得早的渡过去，
来的迟的未渡江，
江南还留人一万，
叶军长再与当局做商量。
顾祝同给他指路线，
命他们绕道苏南去渡江。
还说道“沿途国军做掩护，
保管一点也无妨”。

亲日派骗了叶军长，
新四军二次绕路去渡江，
一万人走到茂林地，不好了！
忽听得周围开了枪，
都只说鬼子来“扫荡”，
谁知道却是家贼暗里藏：
原来是，亲日派命令“擒叶项，
还要把新四军一扫光。”

顾祝同调来兵七万，
撒下了天罗地网害忠良。
都只想，亲日派也必是父母养，
谁知是人眉人眼贼心肠：
军火用的是百姓款，
军队吃的是百姓粮，
今天落在奸人手，
帮着鬼子打老乡。
新四军，只因遵令中了计，
被他们四面围个不漏汤。
望着周围高声叫，
叫声“友军众老乡：
我们奉命江北去，
为什么对着我们开了枪？”
只听得周围高声应，
“新四军兄弟听端详：
咱们哪会有仇恨？
命令逼得打老乡！”
新四军拼命往外闯，
只可恨两边力量不相当：
对方的人马多七倍，
重重叠叠万堵墙。
只杀得天昏日又暗，
血花火焰冒红光。
新四军一直冲了六七日，
断了子弹绝了粮；

项军长生死不明无下落，
叶军长被擒又带伤；
七千人马遭杀害，
遍地鲜红染雪霜。
常言道：“明枪容易躲，
暗藏家贼最难防。”
新四军，一贯为着保国土，
杀敌的威名天下扬，
如今中了奸人计，
七千人死得真冤枉！
新四军，江南人马遭暗算，
亲日派又下令一张，
上写道“新四军不遵法令是反叛，
顾祝同先斩后奏理应当。
新四军番号取消了，
先把叶挺转中央……”
新四军江北还有人九万，
听此事人人眼里冒火花。
都骂道无耻汉奸亲日派，
玩什么法令装什么腔？
抗战有功是“反叛”，
陷害忠良反“应当”，
明做妇暗当娼，
又搬法令堵门窗。
贱骨头不要玩漂亮，
早知道你先来防共再投降：

到处捉拿爱国犯，
到处的救国志士遭杀伤；
在西北为了防共修碉堡，
重重修成五道墙；
在华北调集军队几十万，
暗为反共布下防。
不怕你奸贼做得巧，
全国人有眼明晃晃。
你想投降自己滚，
谁能跟你赴东洋？
新四军一纸命令去不了！
也算你错做梦一场！

要让那亲日派奸徒闹下去，
怕只怕中华民国更遭殃。
共产党中央为救国，
向政府提出了一十二个好主张：
第一项、立刻停止挑内战；
第二项、要承认这次命令不应当。
第三项、要惩办这次事变大祸首：
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
第四项、礼送叶挺重当军长。
第五项、要交回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项、要安抚新四军伤亡将士。
第七项、华中的剿共军队全撤防。
第八项、平毁西北封锁线。

第九项、被捕的爱国人士释放光。
第十项、实行民主真宪政，
要取消一党专政太上皇。
十一项、要认真执行三民主义，
再不要羊肉馆里卖狗汤。
十二项、要逮捕亲日派首领付国法，
审他个水落石出是非昭彰。
自这些救国主张提出后，
揭破奸人假皮囊，
全国的爱国人士都拥护，
都说道：“这些话提得最正当”！

自从揭破奸人相，
全国电报闹嚷嚷：
八路军声讨亲日派，
盛世才通电出新疆，
美洲洪门请团结，
陈嘉庚通电发南洋……
都只为怕上奸人当，
都只为加强团结救危亡。

中国人爱国都有份，
谁能让奸人卖个光？
只要是人人反对亲日派，
中华民族不会亡。

战斗与生产相结合

—— 一等英雄庞如林

(鼓 词)

丝弦鼓板响叮咚
叫众位听我表英雄
一不表征东的薛仁贵
二不表征西的小秦英
三不表唐朝的瓦岗寨
四不表宋朝的水浒兵
古来的英雄咱不表
不谈古来只论今
南委泉开了个群英会
到会的英雄数不清
论生产要数李马保
李仕亮杀敌是头名
又闹生产又打仗
要数寿阳的庞如林
庞如林家住寿阳县
人多地少很贫穷
十二岁与人把羊放
长到十六任长工

长工住到二十岁
那一年敌人来进攻
八路军华北来抗战
庞如林放下锄头参了军
六月里害病退了伍
病好了又去当“交通”
交通员当到二十二
回家种地当民兵
今年刚刚二十六
在群英大会出了名
若问他怎样上了英雄榜
卖工队是他的新发明

共产党提倡生产新作风
各村里互相大变工
这作风传到如林庄子上
进步的人们都赞同
开了一个动员会
要学互助好作风
组了三个互助组
每组选了个负责人
一个组长叫成海
一个组长叫拴成
还有一个小组长
就是英雄庞如林
虽说有了互助组

有名无实很稀松
除了那如林组里人四个
别的人光说空话不变工
若问他为啥不起劲
出了个特务庞二红
庞二红从中说坏话
凭空谣了一股风
他说道：现在时行共产党
听人说将来也不中
倘若是出头露面跟他走
中央军来了定不容
互助变工说得好
到将来打下粮食要归公
有些人听了这些话
不知真假受朦胧
到四月县府开大会
奖励生产众英雄
村村都有英雄到
会场挤得热轰轰
分别等第受过奖
一个个满面带笑容
散会后回到各村去
都说道：劳动英雄真光荣
这个消息传出后
二红的谣言落了空
大家要他说实话

庞二红这才坦白吐真情
他说到：特务二猴投日本
暗地里和我有拉拢
他命我破坏互助事
到他那里去报功
到如今才知上了当
还请大家把我容
从今后发誓大转变
不说空话看行动
倘若是大家宽容我
我情愿参加互助来变工
庞如林说道：好好好
只要你改过那就中
你就参加到我组里
跟我们大家来变工
自从二红坦白了
互助组又添许多人
常言道：人多好做活
做起活来有赶趁
庞拴清一旁不服气
他说道：互助不抵啥事情
人多了不过凑热闹
一个人只抵一个人
庞如林说道：不一样
还是人多有赶趁
不信与你把工变

试一试我们行不行
与拴清变工担了一天粪
拴清的算盘才打清
往日里能担八遭粪
还要摸到黑洞洞
这一天担了十二趟
可见互助能省工
庞如清一见互助好
也加入如林小组中
有一个二驴是懒汉
只睡懒觉不劳动
庞如林有心改造他
发动村里众儿童
发动儿童捉懒汉
庞二驴睡不到太阳红
后来也入了互助组
到如林组里来变工
还有两家无粮户
裤带勒得紧绷绷
如林组凑了一石米
借给他们把饥充
把他们编入小组里
吃饱肚子能做工
借小米收来无粮户
担粪收来庞拴清
捉懒汉收来庞二驴

反特务收来庞二红
别的人哪个看见互助好
只要参加就收容
庞二红坦白以后一月地
如林组发展到四十一个人
人数多了难领导
重新开会把组分
两组男来两组女
还有一组是老人
互助组共成一个队
大队长选的就是庞如林
决定了工资立下规矩
这一个大队才组成

谷苗长到二寸长
如林大队锄地忙
大队里许多无粮户
要请如林拿主张
都说道：咱们的大队组得好
做起活来比人强
只可惜十有八九饿着肚
恐怕将来干不长
想干就得想个法
向那个好户借些粮
如林说：恐怕借不上
咱庄上是个穷地方

全庄上不过四顷地
还是些荒坡野圪梁
好年景打下粮食不够用
何况这连年遭灾荒
我到想起来个小办法
讲出来大家再商量
敌占区离咱不多远
被敌人扰得不安康
小谷苗长成马鬃样
锄不出来干着慌
每一工小米二升半
想雇短工没人当
咱队里人多地太少
算起工来有余长
不如组个卖工队
到敌占区里赚米粮
赚来了小米不饿肚
又帮助敌占区里众老乡
利己利人两方便
比在家里饿着强
有个队员胆子小
他说道：这办法有点不妥当
倘若是敌人出来了
咱们如何作提防
庞如林说道：不要紧
这年头哪有太平乡

咱庄上离敌不过十来里
也不比敌占区里太安康
依我说在家在外都一样
对付敌人凭武装
庞如林说罢这番话
众队员拍手齐赞扬
青壮年选了十二个
到外边卖工赚米粮
除了卖工的十二位
其余的队员留在家乡
临起程开了个队员会
定下了规矩好几章
卖工队外边赚来的米
先借给无粮之户来渡荒
卖工人自己地里有活做
家里的队员来帮忙
卖工队回来再算账
工算工来粮算粮
卖工人这番出门去
三大任务要担当
要介绍咱们的根据地
宣传咱党政军民的好主张
要帮助各地成立互助组
再成立游击小组保家乡
出门去还得守纪律
要给人家好影响

群众利益莫损害
不许去逛坏婆娘
人家吃啥咱吃啥
不许说短又道长
定下规矩立下法
十二条好汉整行囊
一个人拿了锄一把
又各把武器带身旁
共带了三个地雷八颗手榴弹
一门小炮两支枪
两个尖兵前开道
庞如林带领队伍离了庄
第一天卖工到东岭
喜坏了东岭众老乡
三言五句搞停当
拿起小锄带上武装
一个人山头去放哨
东家伙计一齐忙
地宽了大家一齐上
遇见了窄地分两厢
好一支年轻力壮的卖工队
锄起苗来真快当
一天锄了七八亩
还是两头见太阳
到了晚上算了算账
一共赚了三斗粮

庞如林接住三斗米
打发队员送回乡
庄上人一见小米到
男女老少喜洋洋
都说：这还比树上结得快
省到人前把口张

东岭庄三次来了卖工队
这一回不比那两回
鬼子常到各村去
卖工队恐怕晚上有是非
白日里东岭把活做
到晚来别的庄上把觉睡
有一天早晨往回走
忽见那村外人马一大堆
那尖兵叫一声：队长不好了
你看那村外的人马都是谁
庞如林山头往下看
许多人散在东岭转周围
枪上刺刀明闪闪
一个个头上戴钢盔
有几个正去摸岗哨
眼看着站岗的老乡要倒霉
庞如林看见情急了
叫一声：大家听指挥
快忙散开齐动手

再迟了村里定吃亏
众队员各找地形遮住体
一个一个抖虎威
放下小炮装上弹
步枪里子弹也往上推
没枪的队员挽挽袖
在腰里取出捣蒜锤
只听得砰砰隆隆连声响
鬼子们趴倒在地象乌龟
村里人半醒还半睡
猛听得山上一声雷
抖起裤子跳下炕
摸不着东西与南北
庞如林山头高声喊：
众位老乡听指挥
大家快往西沟退
别的去路被包围
东岭人听了这句话
顺扑前河去如飞
那鬼子看见山头的卖工队
舍了东岭往上追
机关枪哒哒哒如雨点
冲锋号儿连声吹
卖工队见势不好早撤退
那鬼子追了一股灰
直等到鬼子撤退了

东岭的老乡才返回
都说道：这一次不是卖工队
咱村里定要吃大亏
卖工卖到向阳坡
向阳坡有个汉奸窝
那汉奸他向敌人讲：
这几天小麦正收割
请皇军出去抢粮去
顺路给我把盐驮
鬼子听了他的话
民夫牲口拉了许多
到在各村抢麦子
给汉奸把盐捎到向阳坡
卖工队看见鬼子到
就与鬼子设下网罗
向阳坡前要路口
埋了地雷两三颗
那鬼子摇头摆尾不在意
却不料地雷走了火
只听呱啦一声响
飞沙走石往下落
鲜血淋淋流满地
炸死了两个鬼子两头骡
炸伤了鬼子五六个
一个个哭声娘来叫声爹
卖工队早已埋伏好

还要叫鬼子吃家伙
枪炮炸弹一齐放
那鬼子一个个脖子往回缩
都说道：开路开路快开路
这里的八路大大的多
受伤的鬼子不能动
拉的拉来拖的拖
向后一转跑步走
这一会苦了他们的大皮靴
那鬼子慌慌张张逃命走
卖工队拍手笑呵呵
共得了三百斤咸盐三百斤麦
庞如林队长来分拨
他说道：鬼子抢来老乡的麦
咱通知原主叫他来驮
咸盐本是汉奸的货
咱们每人分几颗
众队员都说：好好好
应该怎着就怎着
分拨已毕回村去
村里人迎面叫声：众大哥
这一回不是你们卖工队
一定又苦了向阳坡
村里人送了六十斤面
又送猪肉六斤多
卖工队打了胜仗受过礼

又说又笑又唱歌

卖工队今日走到东
东庄上学习互助大变工
卖工队明日走到西
西庄上学会打游击
东庄上来了卖工队
互助小组把他陪
西庄上来了卖工队
游击小组紧相随
东也有人陪、西也有人随
人人称赞有声威
卖工队好比鱼在水
在敌占区里满天飞
一共卖工二百六
赚下了小米一大堆
东岭山头一场战
给东岭老乡解了围
向阳坡前打一仗
打得鬼子血花飞
这真是对己对人两方便
生产战斗双占魁
庞如林上了英雄榜
果算英雄不是胡吹
哪一位不信我的话
不论到寿阳去问谁

(一九四五年)

为啥要组贫农团*

(快板)

谁把贫雇剥削干？
地主富农老封建。
分土地，反封建，
贫雇站在最前面。
穷苦人，一串连，
大家组个贫农团。
带起头来分土地，
才能彻底把身翻。
村里没有贫农团，
贫雇翻身难上难。
一直翻了一年半，
好多窟窿没有填。
东村没有贫农团，
地主富农假转变，
改头换面当干部，
假扮斗争把人骗。
西村没有贫农团，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新大众》报。

全是中农当骨干，
只有斗争很和平，
哪管穷人多困难？
南村没有贫农团，
流氓当权胡作乱。
斗争果实还没分，
自己先要抓一半。
北村没有贫农团，
几个贫雇当了权，
只顾自己翻透身，
不管别的穷苦汉。
虽然村村有成绩，
还有这样些缺点。
只要组织贫农团，
这些缺点都能免；
地主富农捣啥鬼，
穷人早就看得见，
只要有了贫农团，
管保不受他的骗。
中农也吃封建亏，
一时不想破情面；
只要有了贫农团，
他们就能跟着干。
一个人，两只眼，
他看你来你看俺。
只要组成贫农团，

谁想贪污也不敢。
有些人，得了权，
好打自己小算盘，
只要组成贫农团，
没有空子叫他钻。
贫农团，贫农团，
穷人靠你把身翻！
平分土地这件事，
带头任务你承担。

.

.

.

!

!

!

!

!

石不烂赶车

(上)

“贫农石不烂，
故事一大串，
有人告田间，
写了《赶车传》。”

这四句话，原是《赶车传》上开头的四句。《赶车传》是田间同志作的一本长诗，叙的是石不烂赶车的事，咱老赵就拿这个故事编了一个鼓词。

听书的朋友们或者要问：既有了田间同志的《赶车传》，为什么还要你来编鼓词呢？朋友们！这可以说是各有各的路道。各人的爱好不同：有爱读诗的，有爱听鼓词的，可是诗不能当成鼓词唱。诸位想听鼓词，就听我的；想读诗，请你再买一本田间同志的《赶车传》——《赶车传》是《人民文艺丛书》中的一本，新华书店出版。

来历交代清楚，就说起来吧：

说的是：七月初四月弯弯，
挂在山头小店边，
山腰里有个赶车汉，
赶着辆盐车走上山。
说此人姓石外号石不烂，

腿又拐来腰又弯。
在这条路上常来往，
住店房不用问价钱。
这一天坡又陡来天又晚，
石不烂手中响着一条鞭。
不多时赶到山顶进了店，
店掌柜和他闹着玩：
掌柜说：“石不烂你还没有烂？
这老石说：“烂了我你赚谁的钱？”
店掌柜拿来灯一盏，
石不烂卸下车子把骡拴。
石不烂喂好牲口洗了个脸，
坐在铺上抽旱烟。

石不烂进着店来，和掌柜嘻嘻哈哈开着玩笑。一溜一拐卸下车子，拴住牲口，添上干草，取下行李，找好铺位，秤上麸料，报过饭，洗过脸，回到房子里来，只见他的铺位左右已经住满了客；坐的躺的，说说话话，十分热闹，自己也就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吸起旱烟。

这些客人们，见石不烂走起路来一溜一拐，有的觉着可笑，有的觉着奇怪。中间有个苍白胡须的老汉，眼睁睁看了他大半天，就问他：“老兄弟！你这个腰是怎么一回事呀？”石不烂看了他一眼说：“你问我这腰呀？要说起这个来历，最好是到了明天，你也不用走，我也且住下，让我给你说他三天三夜，差不多就可以说明白了！”那个老汉说：“咦！不料你这老弟也是个会讲话的！咱们哥儿俩都一样：车子都放在院里，骡子都拴在槽后，只要你能说三天，哥就不能只陪你两天半！”

两个老头子这样一答上话，引得满屋子里的人哈哈大笑，有个小伙子说：“得劲！你两位算是配搭上了！”

这时候，石不烂又朝着门口喊了声：“店掌柜！”掌柜的远远答应：“知道！马上就来！”石不烂说：“你知道什么？”掌柜说：“还不是你那老规矩？”说着就送上一壶酒来。石不烂说：“不错！你算个孝顺的！”掌柜说：“赶驴子三年，还摸不着驴屁股？”

石不烂接住酒壶，随便向大家谦让了一下，也不用杯，也不要菜，倒转酒壶一鼓劲灌下去。他喝过了酒，又给牲口添上草料，店里就送上饭来。

吃饭中间，大家见石不烂面红耳热，满头大汗，知道他已经带了几分酒，等他吃到第三碗饭，以前和他说话那个小伙子就故意撩拨他说：“你说你那腰的故事能说三天，人家就有人愿意陪你三天，你为什么还不说起来呢？”石不烂说：“你这个后生！人家陪我，我自然要给人家说；你要想听，你陪不陪？”小伙子说：“陪！”石不烂说：“好！谁愿意听我这个腰的故事，总算看得起我石不烂。你们河北省八路军老根据地的穷苦人，村村闹翻身，人人倒苦水，咱石不烂在你们河北没有立过户口，就把咱的苦水倒在这个小店里吧！”

石不烂推开饭碗开了腔，
叫一声：“众位老同行！
我姓石外号叫个石不烂，
在山西孟县有家乡。
在家里本是个穷佃户，
那地主叫个朱桂棠。
我有个女儿叫蓝妮，

朱桂棠强要逼她作偏房——
在二十五年遭荒旱，
家家的地里不收粮。
朱桂棠差他的狗腿朱二黑，
送给我红纸帖一张。
这狗腿嘻皮笑脸先道喜，
他说道：‘东家照顾到你头上，
东家说今年夏天没有下雨，
到秋来遭下大灾荒，
十个穷人九饿肚，
大量你家也断了粮。
咱的东家，为积阴功行方便，
愿娶你蓝妮做偏房。’
那狗腿说罢这番话，
气得我两眼冒火光。
朱桂棠那年五十岁，
八字胡须寸把长，
三尺半个子挺着个肚，
好像一口半截缸；
见了人一副黑丧脸，
说话好像扛着枪；
吃人咬人不说理，
人人叫他‘活阎王’。
像这样一个狗东西，
怎配我一十九岁大姑娘？
若不是他家势力大，

我定要劈面揍他两耳光！
可恨我是他一个穷佃户，
不敢与他论短长。
我只把恶气变成好气，
跟他的狗腿好商量。
我说道：‘东家有心照顾我，
阿弥陀佛我烧香，
只可惜穷人家女儿不懂事，
沾不了东家这个光。
烦劳你管事的回府去，
在东家面前帮个腔：
你就说我老石不敢答应，
还请东家多原谅！’
那狗腿听了我的话，
把他的狗脸一黑丧，
他说道：‘送给你脸面你不要，
枉费了东家好心肠。
你今年一颗租米也没有给，
去年还欠三斗粮，
你若是从下这件事，
那两笔账儿我承当，
倘若你有点不情愿，
快快交租咱无话讲。
两条路你拣一条走，
还要你自己拿主张。
东家的脾气你知道，

人送外号是“活阎王”，
你若是一下惹恼了他，
给你个味道够你尝！’
那狗腿说罢噙起了嘴，
一副黑脸赛城墙。
把红纸帖子扔在地，
掉转屁股走他娘！”

那个小伙子听到这里说：“哈哈！这不是在活人眼里伸拳头吗？不能到县里告他去？”

石不烂说：“你说告状呀？老弟！我告过了。那狗腿走后，我越想越忍不下去。我想欠租只说欠租的话，怎么能叫我用闺女来顶？我就跟他打打这场官司！第二天我一怒气起了个五更，赶天明跑到城里闯进了衙门，就在那大堂口连声喊叫：‘冤屈！冤屈！’喊了半天没有人答应，又喊了几声，在那大堂后边走出一个人来，头上留着短头发，披着一件大褂子，看样子好像才洗过脸。他一出来就指着我说：‘噢！哪来你这个疯子？怎么大清早跑到大堂口来唱戏。’我说：‘我是告状，那里是唱戏？’他说：‘拿状来看？’我说：‘我不会写，就凭的是口说！’他说：‘哈哈！我说你是唱戏你还不承当呢！这当堂喊冤是戏上的办法，真正告状有告状的规矩：第一步是写状，第二步是呈状，第三步是候批。要是批准了，第四步才是传入审讯，若是批不准，还得再写、再呈、再批。你当就是那么简单呀？’我说：‘我们乡下人不会写状，能找个人写吗？’他说：‘可以！你拿五块现大洋来，有的是写家！’我说：‘写个状就要那么多的钱呀？’他说：‘你真是个没有告过状的。

“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休进来”，衙门口的路是钱买的。

不说写状，呈一呈状也得花你个一块两块，送一送批也得花你个块二八毛，不破出一两石小米来，不用想打完一场赢理的官司，要是输了就更没有底了！’他这么一说，说得我凉了半截。糠窝窝还吃不起，哪里找一两石小米去？我说：‘拉倒吧！这个状咱告不起！我算惹不起朱桂棠就是了！’

那人本来要往回走，见我提起朱桂棠，扭回头来打量了我一下说：‘好家伙！你还想告朱先生？你这个来头可真不小！告他什么事？’我听他这话音，一定跟朱桂棠是一伙，不过他既然要问我就敢说——满理的事情怕什么？我说：‘朱桂棠要霸占我的闺女！’他说：‘不像！朱先生不是讹人的人，一定还有别的缘故！’我说：‘朱桂棠说我欠他的租，要我拿闺女来顶！’他说：‘欠人家的租，还有什么话说？你把租还清，他还要你的闺女吗？’我说：‘我哪里欠他的租呀？谁不知道今年遭了旱灾，一颗粮食也没有打下？我还没有吃的，难道就给他长出租粮来了吗？’他说：‘算了！我早就知道你是个疯子！不论打不打粮食，租粮还能不交吗？朱先生愿意和你结亲，还不算提拔你吗？朱先生来到县里，县长还得陪人家打个牌，你凭什么能告倒人家？傻瓜子！去吧去吧！’他就是这么唧唧喳喳教训了我一顿，掉转头又回大堂后边去了，冷冷清清一个大堂又只留下我一个人。我朝着那大堂后边鞠了一躬说：‘咱老石领教了！’

那个人骂我是傻瓜，
我在背地谢了谢他。
听了他的一番话，
懂得了他们的好国法：
懂得了衙门口没有穷人的路，

抬手动脚要把钱花。
懂得了不打粮也得交租米，
该叫我的闺女往斗里爬。
懂得了霸占人家的大闺女，
不算欺负算提拔。
懂得了衙门人不论上和下，
都与那地主是一家，
算了吧来算了吧，
惹不起这伙狗忘八。
我不是没有去告状，
我的老弟：
你看这官司怎么打？”

那小伙子说：“你们山西就是这样的衙门吗？”

石不烂还没有答话，那个苍白胡须的老汉就抢着说：“你们年轻人从前没有打过官司，不懂得这个。在咱们翻身以前，咱们县里的衙门还不是这样吗？不差！老兄弟，你还是接着说吧！后来怎么样？”

石不烂说：“后来呀？后来可就麻烦得多了：

三日的期限两日过，
朱二黑送来个小包裹：
内里边一件夹袄一条裤，
一副簪环一对手镯。
他说道：‘今天已是第三日，
想你也准备得差不多：
要是有米就交米，
没有米就该蓝妮她出阁。

趁早点打扮起来送过去，
免得咱明天再罗嗦！’
那狗腿说罢扬长去，
倒叫我一家大小没奈何；
二老爹娘干瞪眼，
小蓝妮一旁把泪落。
俺娘说：‘今年的年景这么坏，
一家四口没有吃喝，
依我说蓝妮你就嫁他吧，
总比饿死强得多。’
蓝妮说：‘忍饥受饿儿情愿，
不愿去见那“活阎罗”，
索性死了也干净，
只当我爹娘没有生下我！’
蓝妮儿说出伤心话，
疼得我心里似刀割。
我说道：‘你的娘死后只留你一个，
爹怎肯把你送给“活阎罗”？
今天我且不理他，
哪怕他明天把皮剥！
不怕他朱家势力大，
一个命顶得他没话说！’
我正和蓝妮讲着话，
我的爹过来拦住我。
我爹说：‘朱桂棠害死过多少命，
哪在乎多你一个扑灯蛾？

凡事要从实处想，
人家的气力大得多。’
我有个朋友叫金不换，
头脑聪明主意多，
他听说我家出了这场事，
就在这时来找我。
他说道：‘朱家的势力那样大，
你的人口又这样多；
要拼你也拼不过，
想逃走你也逃不脱。
依我看暂且忍一忍，
事情只能走着说。
听人说延安府有了共产党，
和咱们穷人是一伙，
去年冬来到山西洪洞县，
打了一仗退过黄河。
听人说老营扎在延安府，
也有人马也有家伙。
有一日来到咱这里，
管保叫朱家砸个锅！’
金不换说罢这段话，
蓝妮开口向我说，
她说道：‘那个阎王不好惹，
爹爹拼他拼不过，
你自己吃苦不用讲，
爷爷奶奶谁养活。

倒不如索性苦了我，
可以救活你们三个。
倘若是我到朱家死不了，
也许有金叔叔说的那一着。
我的爹把儿舍了吧，
等孩儿慢慢跟他走着说。’
大家说：‘如今只好这么办，
这个主意也使得。’
小蓝妮哭哭啼啼把衣换，
我牵过老牛套上车，
催着蓝妮把车上，
一家人哭得难分割。
蓝妮说：‘爷爷奶奶自将养，
还不知后来见着见不着！
我的爹呀！
你叫老牛慢慢走，
让孩儿多在车上坐一坐！’
咱老石大车小车都赶过，
还赶过一趟这个车。
赶着牛车送闺女，
送给了仇人去折磨。
那老牛摆着方步慢慢走，
五里路走了一晌多。
赶到朱家大门口，
门里边出来了狗腿朱二黑。
我的老同行！我石不烂赶车以来，还赶过这么一趟车。我

的村子名叫五里村，我住西头，朱家住东头。我把这趟车从我家赶到朱家，一路上牛也不想走人也不想走，五里长街走了一晌还多，可惜路只有那么长，走了一步少一步，到了傍晚，已经走到朱家大门口，蓝妮揉了揉眼睛，看了看朱家的红漆大门说：‘我的爹呀！你的牛车我再也坐不上了！’

这座高大门楼里，两扇红漆大门紧紧闭着，也没有挂灯彩，也没有贴对联，门外连一个鬼也没有。这哪儿像娶亲？人家哪儿把咱当成人呀？不多一会，只见那两扇门开了一条小缝子，从中间钻出来个狗腿朱二黑。他出得门来气势凶凶的说：‘为什么磨到这时候才来？东家吩咐把车停在门外，你们进去！’我这个朱女婿，娶亲就是这种娶法，不进去有什么办法，进了大门没有一个人，进了二门，楼梯上只站着个小丫头说：‘二黑大叔！老爷叫我先把新姨太太送到楼上去哩！’那狗腿指着小丫头吩咐蓝妮说：‘你跟她到楼上去！’蓝妮说：‘我的爹！从今以后你顾你吧！不用挂念你这苦女儿了！’

小蓝妮向我摇摇头，
骨碌碌眼泪往下流：
叫一声：‘爹爹你顾你！
不用为儿再担忧……’
她好像还要说什么，
在狗腿面前不自由。
小蓝妮眼泪有根擦不尽，
愁眉苦眼哭上楼。
看着我蓝妮上楼去，
那狗腿把我猛一揪：
他叫声：‘老石走走走，

咱东家赏你一壶二锅头。’
他把我推进一个小房里，
桌子板凳灰溜溜，
当桌上一盘豆腐一壶酒，
那狗腿向我点点头：
他说：‘老石你喝吧！
这是喜事不要害羞。
其实你喝与不喝都一样，
反正是闺女上了人家的楼。’
那狗腿说出抢白话，
不回他几句不甘休。
伸手提起那壶酒，
鼓了鼓劲儿灌下喉。
我正要借着酒劲骂狗腿，
迎门跑来小丫头。
那丫头望着狗腿叫‘大叔’，
气喘嘘嘘汗满头。
她说道：‘姨太太只顾哭脸不讲话，
老爷要使皮鞭抽。
别人讲情讲不下，
请大叔快去把场收！’
小丫头报罢这个信，
吓得我屎尿往外流。
朱二黑只在头前走，
我紧紧跟他上了楼。
只见那‘活阎王’举着马鞭子，

照着我蓝妮腿上抽。
我的儿从小在我手心里长，
这一回把她送在火里头。
我把鞭梢猛拉住，
跪到地下苦哀求，
我说道：‘小家女儿不懂事，
什么礼体也不讲究，
不论是哪里得罪你，
还请你东家高高手！’

我一到楼上，正见那一条鞭子飞在空中，向我蓝妮的腿上打来，急得我跑上前去，一把握住鞭梢，跪在地上向那活阎王哀求着说：‘我的东家！我这个闺女是个小家人出身，不懂什么礼体，若是有什么言差语错得罪了东家，看在我这个穷佃户面上高高手放她过去，以后叫她改了就是了！’

那狗腿朱二黑也上前解劝，不过狗腿子说的又是一路话。他说：‘东家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要紧。打她两下是小事，要是把东家劳着了谁担得起呀？’

我那朱女婿停住了打，用他的马鞭子指指划划教训我说：‘我要你的女儿是图快活，不是叫她来哭丧！你好好劝劝她：欢欢喜喜我就留着她，再要哭丧，叫她小心她的骨头！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说得到就做得到！愿死愿活由你们去！’说罢把那马鞭子往地下一丢，头也不回下楼去了。

那狗腿朱二黑又吩咐别的用人们说：‘咱们都走，让老石劝一劝他的闺女。’说着把大家向外一推，他自己也随着走出去，回手把门关上。

这时候楼上只留下我父女两个。我说：‘蓝妮！看今天这

样子，你在这里留着恐怕死多活少，爹把你送到这个火坑里，不能明明白白看着你送死，不如咱父女们往外闯他一阵，闯不出去，也不过一死罢了！’蓝妮悄悄向我说：‘他们人多势众，闯是闯不出去。我上得楼来天还不黑，看见这窗子外面有棵树紧靠着窗口，可以溜下去；下面是花园，园墙不高，可以跳出去，我看咱父女们不如趁这没人时候逃走了吧！’我说：‘蓝妮儿你这个好主意！爹先打开窗子把你溜下去！’我打开后窗，果然有棵树紧贴着窗口，我先打发蓝妮顺着树身子溜下楼去。可惜一开窗子，吸了一口冷气，肚里涌上一口酒来。我的老同行！这酒性一发作，就坏下事了；

一股酒劲冲上胸膛，
想起仇人朱桂棠：
咱老石与你何仇恨？
为什么霸占我的姑娘？
蓝妮儿被你逼到楼上，
还说她不该哭你的丧。
进门来还未喝你一口水，
为什么就拿皮鞭把她伤？
不用夸你的脾气大！
休提你杀人不抵偿！
不怕那县长跟你是朋友，
也不怕衙门人都会帮你的腔！
常言道：‘人急不要命，
狗急了也会跳一跳墙’。
咱老石这会不怕了你，
冒上个四处逃难不回乡！

反正都是我没理，
索性放火烧了你的房，
我把那灯油倒在被褥上，
用火一点冒红光。
点着火正要往外跳，
却不料人家早提防：
忽听得楼门一声响，
朱二黑大喊一声开了枪。
子弹穿破我胯下的肉，
我咬住牙关跳上窗，
顺着树身溜下去，
急忙忙撕破裤子裹住了伤。
在园中摸了几步路，
手把着柳枝跳出院墙。
也不知蓝妮哪里去，
想要喊叫不敢声张。
伤口疼得我爬在地，
只觉着一个村子实在长，
连爬带滚摸回去，
在家里等坏我的二爹娘。

楼也没有烧了，落了个血窟窿，爬到半夜才爬到自己的门口。我在外边一叫门，我娘说：‘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把我和你爹可等急了！车哩！怎么没有听见车响？’我说：‘人还不知道谁死谁活哩！哪还顾上说车？’我娘听我说得要紧，赶紧把门开开，见我半走半爬，才把我搀扶到家。我走到灯下，着见满身是血，把我的爹娘吓了一跳。两位老人家问起情由，我

把进到朱家的事情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我爹听完了说：‘看你这冒失鬼！受了这么大伤且不说，明天朱家迫起放火的事来，还吃得消吗？’我说：‘我也想到这里，可是逃也逃不走了，该怎么办呀？快去请金不换来大家想个计策吧！’

我爹依了我的话，去把金不换请来。金不换问明了情由说：‘我的老哥！你怎么这样冒失？’我说：‘事情已经是闯下了，只说有什么办法没有吧！’他想了一会说：‘这样吧：看这伤口是没有伤着骨头的，只是马上走不得路。依我说咱们马上好歹吃上点东西，我背着你，把你送出孟县地界，你慢慢寻茶讨饭，一边养你的伤一边往东走，走到河北地界就不要紧了！’大家想了一想，也再没有什么办法，就依着他的话，胡乱吃了点糠窝窝，他把我背出了孟县地界，嘱咐我说：‘老石哥，我不能远送你了！以后要真有共产党来了，咱弟兄们还有见面的时候！你慢慢去吧！’

从这以后，我就慢慢寻茶讨饭，往你们河北省来了；

一自从金兄弟送我出罗网，
寻茶讨饭养我的伤，
慢慢来到河北省，
伤好了又入赶车行，
到如今算来七年整，
不敢回我老家乡，
见不上我的蓝妮女，
见不上我的老爹娘，
见不了兄弟金不换，
也不知老家有没有共产党，
我的腰就是这个来历，

你看凄惶不凄惶？”
石不烂把他的伤腰之事讲明白，
以后的事情还很长：
后来他回到山西去，
到山西找着了共产党，
准备着五里村中大算账，
准备着斗倒“活阎王”，
准备着打救蓝妮出罗网，
再去找个好夫郎。
这些都是后来的话，
三言五句不好收场，
说到这里住了吧，
等到了下期细细讲。

(下)

说的是：七月初四月弯弯……

你不是上一次就说过了吗？

上一次说的是上次的。这次来听书的人，不一定是上一次来过的，因此就得再说一次。

你要再说一次，我就等下次再来。这个我听过了，你叫新来的人听吧！

我说朋友你不要这样性子急！这次若完全和上次一样，那我何必再说；若完全不提上一次说的，新来的朋友们就听不出个头尾来。为了两下照顾，就得把前边的事情交代几句。俗话说得好：“说书的嘴，唱戏的腿”，他要有多快就能有多快，这次

叫他快一点好了。

闲话少说，还是说正经的吧！

七月初四月弯弯，
挂在山头小店边。
小店里住下个石不烂，
谈起话来没有完。
那月亮听不完他的话，
悄悄密密溜过山。
剩下他一直谈了多半夜，
大家听着好凄惨。
他说他原在山西盂县住，
五里村中把家安，
二十五年遭荒旱，
欠下了地租无法还，
那地主霸占了他的女，
气得他舍命放火报仇冤，
却不料白白地挨了一颗子弹，
只落得腿又拐来腰又弯，
流落在河北把车赶，
到如今算来整七年。
石不烂说罢他的伤心事，
两眼老泪擦不干。
众同行听了他的话，
谁也想替他报仇冤。
苍白胡须那个老汉，
叫一声“石家兄弟听我言：

前几天我曾到你们盩县去，
那边的情况我了然：
日本鬼子住在城里，
八路军和他作对住在乡间，
到处都有共产党，
到处都有新政权。
到处都在作土改，
劳动人民把身翻。
你的冤枉这样大，
何不回去见见天？”
石不烂拳头一举说了声：“好！
毛主席照顾得真周全！
谢谢你老哥多指点，
咱就回去见见天！”
说罢了喂好牲口睡了觉，
第二天赶着车子过了山。
初五晚上交了货，
初六日辞职得了工钱，
初七起程回家去，
路上走了八九天。
这一日回到故乡天气晚，
正赶上七月十五月儿圆。

石不烂从初七起程走到十五，总算回到自己的五里村来。这天天气晚了一点，他趁着月亮一溜一拐找到自己的家门口，见院子里的房子，被日本兵烧得只剩下他爹住的那一座，纸窗上透出一点红红的灯光，里边好像有人讲话；又走近几步，看

见窗户外边还站着个人在那里偷听。他喊了一声：“那是谁？”那个人扭转头就跑。他又是喊又是追，可惜他那一溜一拐腰腿不抵事，人家早从一堵破墙的缺口上溜走了。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朱桂棠的狗腿朱二黑。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呢？其中有个缘故：

原来五里村这几天正在作土改工作。当七月初四那一天，石不烂住在小店里说他那伤心的故事，孟县的县农会就派人到五里村来发动群众作土改。朱二黑打听这事，当下报给朱桂棠，朱桂棠跟他的大老婆说：“你看！说着就来了吧？来就来吧，我知道早晚免不了有这一回，不过咱们也得准备一下。土地房屋那已经是讲不起了，我只怕的是人受伤——咱们从前伤的人太多，当面向咱诉起苦来，仇如山海，怎么得了？”他的大老婆说：

“我看也许不要紧：经过几个灾荒年，西头人少了一半，与咱有命案关系的苦主们，死绝的死绝了，逃走的逃走，只要把如今还在村里的穷鬼们买哄买哄，不是谁自己的事，谁还一定要追究呢？”朱桂棠说：“外边人好对付，家里人呢？”大老婆说：“你说蓝妮呀？她要敢说什么坏话，我剥了她的皮！”朱桂棠摇摇头说：“不是那么简单吧？那小东西常是憋着一肚子气，只是平常不敢和咱们较量罢了！如今天下不是咱们的了，那些穷鬼们人多势众，大家一鼓动她，她又摸得着咱家底细，把那些说不得的事一锅子给你端出去，你怎么办？”大老婆说：

“可惜你舍不得你那小妈！害了她不就干净了吗？”朱桂棠听她这么一说，又是发急，又不敢声张，急得拉了她一把，低低的说：“我的奶奶！这哪里是舍得舍不得的事？要是像前几年害了能没有事的话，她就真是我的妈，我也要把她害了。如今没有人命我还怕吃不倒，再去造上个人命案，那不是自己找死

吗？依我看，咱们对这东西，也得买哄买哄。你要是懂事的，你就帮我个忙；要不是懂事的，你就仍照平常打她骂她，逼得她到那群众大会上给你端出来了，治死了我，可也跑不了你！”大老婆说：“就算是不敢害了她吧，怎么还能让她出去跟那些穷人们开会呢？”朱桂棠说：“由得了你？这个我可打听得多了，只要是在地主家里常常挨打受气的人，人家就都要动员。人家就是那种做法，谁敢不依？”大老婆想了一想说：“也算！帮你忙就帮你忙吧！只是你准备怎样买哄她，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怎么个帮法呢？”朱桂棠说：“我自有办法，你只要不反对我，我说什么你赞成什么，也就算是帮忙了。”大老婆说：“我什么也懂不得，由你吧！”朱桂棠说：“这不就对了么？——二黑！请你姨太太到这里来！”

朱二黑远远答应了一声，通通堂堂跑到楼上，向着蓝妮用手一点说：“姨太太！东家请你到大奶奶房中去哩！”

蓝妮听他一叫，心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暗暗想道：“这可又不知道找着我的什么岔子了！”

小蓝妮听他一叫心胆寒，
心里边扑通扑通跳连番。
她想道：“只要叫来就没有好事，
不知道又要找我什么事端。
辩不得理由回不得话，
准备着又得挨他一顿鞭。
罢罢罢来由他去，
把我的命运交与天！”
无奈何战战兢兢把楼下，
穿过了客厅进套间。

只见那活阎王坐着把罗汉椅，
大老婆陪他坐在床边。
小蓝妮照着规矩先施礼，
低下头来不敢多言。
活阎王上下打量她多一会，
八字胡须慢慢掀。
未曾开言先带笑，
他说道：“看你这娃娃多么可怜！
只因为家庭不和常生气，
累得你成天挨皮鞭。
我本来舍不得多打你，
常怨你这位奶奶把我缠。
今日里我两口已经讲和了，
从今后谁也不与你为难。
在从前千错万错我们的错，
还请你这小心小肺多包涵。
从今后咱们同吃一锅饭，
拿出些时行衣裳叫你穿。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千万莫听外人言。
咱村里有些穷光蛋，
仗着八路生事端，
倘若是他们拉你去开会，
到会场千万不要发言。
八路军几条破枪抵什么事？
哪里能够得江山？

谁若跟他们通了气，
日本兵捉住就要把眼刺……”
朱桂棠半软半硬讲了一套，
小蓝妮不言不语细盘算：
“阎王为什么有笑脸？
大老婆为什么软绵绵？
为什么陪情认错说好话？
为什么给我好吃与好穿？
为什么也肯放我去开会？
到会场却又不叫我发言？……
反正总是些吃亏的事，
有便宜哪里轮得上咱？
失家的把戏猜不透，
谁知他又打什么鬼算盘？”
小蓝妮不说长来不道短，
辞别他夫妇走出套间。

蓝妮听了朱桂棠的一番鬼话，虽然猜不透究竟是个什么把戏，反正知道没有自己的便宜，因此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等了一会，见他不再开口了，就问了一句：“不再说什么了吧？”朱桂棠说：“就光说这个！要你好好记住我的话！”蓝妮正没话说，就仍然装作不敢回话的样子，慢慢地退出套间，仍然回小楼上去了。

朱桂棠吩咐过蓝妮以后，向他的大老婆说：“只要把这小东西对付好，事情就轻了一头了，以后还得温存她几天。这件事交给你做吧，我就要对付别的事情了！”

朱桂棠先把老婆交代完，

又把二黑叫上前。
他说道：“既然人家动了手，
好歹就在这几天。
还要你勤去打探多报告，
我这里看着风色用机关。”
朱二黑领了他的命，
每日里竖着耳朵到处钻。
只探得：县里的干部到村后，
工作布置得很周全：
初五开过干部会，
初六日召集群众作宣传，
初七日成立农会筹备会，
各家各户去串连，
干部分成好几路，
一直作了八九天。
这一天农会开过成立会，
正赶上七月十五月儿圆；
村里人匆匆忙忙好多日，
朱桂棠在家也没有闲：
初五日揭开地窖藏东西，
初六日千谋百计造谣言，
初七日差人收买穷佃户，
又送米来又送钱。
主仆们顾了头来顾不住尾，
一直忙了十来天；
听人说十六日要开讲理会，

已经是七月十五月儿圆。

七月十五黄昏的时候，朱二黑向朱桂棠报告说：“人家今天开的是农会成立会，听说明天就要开大会跟咱说理了！”朱桂棠躺在一把藤椅子上，睁了睁眼说：“天呀！明天就要见高低了！今天晚上你要好好想法子打听他们明天怎样布置。”

朱二黑领了这个命令来到村西头，找了半天找不着门路，后来远远看见金不换往石家去了，才算得着了一点主意。他想：“金不换是政治主任，也就是共产党的头子，只要能听到他的话，那就是可靠的消息了！”想罢，便悄悄溜到老石家的窗外边来。他听得里边有好几个人讲话，好像是开什么会，可是还没有来得及细听，后边就有人喊叫起来，吓得他三脚两步从一个墙缺口上跳出。他清清楚楚听得是石不烂的声音，赶紧回到东头向朱桂棠报告。

朱桂棠听罢吓了一跳说：“坏了！这一个人回来就不好对付了！”说罢，歪着头想了半天也得不着个主意。朱二黑说：“东家！我倒想起个办法来：姨太太过门已经七年了，难道还不能跟他认个亲戚吗？我看今天夜里准备些酒饭给他接一接风，在吃饭时候再奉承得好一点，他明天在会场上，也许就不好意思跟咱过不去了吧？”朱桂棠说：“这个也许抵一点事。我吩咐人准备酒饭，你就去请他去！”朱二黑说：“光我去恐怕他不来，不如叫姨太太亲自去走一遭。”朱桂棠又想了一想说：“也好！不过还是你陪着她去，防备她说出什么有妨嫌的话来！”朱二黑答应说：“对对对！这事在我。”朱桂棠就叫把蓝妮叫来向蓝妮说：“听说你爹回来了，我准备给他老人家接一接风，劳你的驾，跟二黑去把他老人家请来，务必请他老人家赏个光！”

蓝妮一听说她爹回来，马上眼开眼笑，心里暗叫：“我的

爹呀！我可算又见着你了！”

小蓝妮听说她爹回到家乡，
眉开眼笑喜洋洋。

暗想道：“接风不接不要紧，
先向我爹爹诉诉冤枉。”

自己的主意先打好，
假意应付朱桂棠——

她说道：“要你们在家备酒饭，
请客的事情我担当！”

说话间跑出朱家大门外，
两臂上如同长了翅膀。

朱二黑紧赶慢赶赶不上，
也觉得这个村子实在长。

他二人正在路上跑得快，
石不烂正和邻居叙家常：

大家说：“你的腰怎么成了这个样？”

老石说：“当年间不是挨过一枪？”

老金说：“好年头总算熬到手，
到明天就要斗争朱桂棠。”

老石说：“咱村里有没有共产党？”

老金说：“政治主任是兄弟当。”

老石说：“我的爹娘谁照应？”

他爹说：“全凭咱穷苦邻居帮个忙。”

老石说：“我那个蓝妮女儿怎么样？”

这时候，

门外边闯进来蓝妮他的姑娘。

小蓝妮进门来见了石不烂，
不由得两眼泪汪汪，
正想把七年冤枉诉他个尽，
朱二黑气喘嘘嘘跑进房。
蓝妮看了看朱二黑，
低下头来暗思量：
她想到：“金叔叔说话靠得住，
他说过共产党会给咱们拿主张。
朱桂棠硬说共产党不抵事，
为何他自己先着慌？
共产党若是不抵事，
怎么敢准备斗他朱桂棠？
共产党若是不抵事，
我的爹为什么敢回乡？
看起来世界已经变了样，
再不回他朱家过时光！”
小蓝妮重新打下好主意，
放开胆子把话讲：
她说道：“自从爹爹逃命走，
那阎王逼得儿无主张：
他说道：‘你若是跟我好好过日子，
不追究你爹烧我的房，
你若是别别扭扭不愿意，
把你爹拿住送到公堂。’
从那时孩儿被他吓唬倒，
忍气吞声不敢逞强。”

他那个大老婆是个老贱货，
离不开她那活阎王，
倘若是阎王住到儿的楼上
大老婆与儿闹饥荒，
三天骂来两天打，
打得儿浑身上下断不了伤；
七年来孩儿就是这样过，
我的爹呀！
你看儿凄惶不凄惶？”
小蓝妮说出老实话，
急得那狗腿把嘴张，
张嘴叫了声：“姨太太，
有什么伤心话儿以后再讲！”
又朝着老石叫：“爷爷！
这几年你老人家可安康？
俺东家听说爷爷回来了，
惦记你在外多年受风霜，
准备下一顿便饭一壶酒，
一定请爷爷赏个光！”
石不烂一见狗腿心火起：
“我认得你们的好心肠！
记得你逼我送闺女，
记得你打我那一枪！
给你那阎王东家捎回信，
就说我老石还很刚强。
明天跟他到会场上见，

要他趁早作提防！
你给老子快快滚，
站在我面前我嫌脏！”
朱二黑没有敢抬头就退出去，
细想着：“这一回差事碰了墙。
在这头挨了老石一顿骂，
回那里东家还得骂一场。
吃了苦再受两头的气，
真好似老鼠钻了风箱。
到明天要开讲理会，
跟上这东家也沾不了光。
常言道‘树倒猢猻散’，
不如我趁早溜他娘！”
朱二黑想出偷跑计，
往西一拐溜出村庄。
西头跑了个朱二黑，
在东头急坏了朱桂棠：
一更调成酒碟子，
二更里作出饭、菜、汤，
三更三点排开了座，
还不见老石来赏光。
等到了四更五更都打过，
一会儿天明出了太阳。

朱桂棠全家忙着把酒饭备好，整整等了一夜，客人也没有来，两个请客的一个也没有回来，熬得他实在支持不住，就躺在藤椅子上呼噜呼噜打起鼾声来。他正做着个梦，猛觉着

有人在他腿上敲了几下说：“快起快起”。他一睁眼把个好梦忘得干干净净，只见太阳已经照明了半个窗，他的大老婆慌慌张张向他说：“快起！村里都已经吃过早饭，农会来叫你去开会哩！”他从藤椅子上起来，又见椅子背后站着两个青年佃户向他说：“快走吧！不要磨菇了！”他想：“这两个后生也这么神气？若是从前，怎么配进我朱家的大门？唉！世道变得不像话了呀！”想虽是这么想，走还是得跟上走，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跟着那两个后生往庙里去。

大会场设在本村的大庙里。他一进庙，见正殿阶台上摆着些桌椅，金不换在当中主席，两旁坐的是十来个村干部，大半也都是佃户，在他朱桂棠看来，都是些只配干个粗活的人物。下边的群众，就地坐着，占满了半个庙院。中间留着一条路，好像专留给他自己走的。他从这人群中慢慢穿过去，走到前排，看见石不烂坐在最前边。他强笑了一下向石不烂点头说：“你老人家回来了？昨天晚上候了你老人家一夜，你老人家也不肯赏个脸，教我认错也没个认处……”他还预备再说下去，有个青年说：“快上去吧！少说废话！”这样一挡他的马头，他也就不再说了。

主席金不换站起来说：“如今要取消封建制度，地主的财产和土地有关系的要分给农民，地主本人要改造成劳动生产的人。可是咱村的朱桂棠和一般地主不同，做过好多害人的事，不叫他好好反省一下不能改造。这回叫他来向大家反省，反省得好了，就容过他；反省不好，就送到法庭上治他的罪。现在就叫他讲吧！”

朱桂棠这一回很温和。他说：“我过去因为脾气不好，对大家有好多失礼的地方，很愿意请大家给我提提意见。我以后

好改过……”又说了好多客气话，就等着大家提意见。

前面说过：和朱桂棠有大仇大怨的人，经过几个灾荒年，死的死了逃的逃了，因此开头发言的人也不多，提出来的事，也只是哪一年多算了几斗租，哪一次强接了一笔债；朱桂棠看来都是小意思，也就一一答应下了。

空了一阵子没有人说话了，石不烂冷冷地说：“我的好女婿！你看这个！”说着就站起来一溜一拐走了几步给朱桂棠看，引得大家都笑了一阵。石不烂坐下接着说：“别的我且不讲，要你先给我把腰腿治好。这个若不能办到，这个会我也不跟你开，咱们到县里打官司去！”朱桂棠笑了笑说：“你老人家也没有个孩子，若不嫌弃我这个女婿的话，我情愿养老送终。真要打起官司来，当日间二黑开枪是开得鲁莽一点，可是你老人家烧楼能没有一点责任吗？依我说你老人家搬到我家去住好了，当年的事情不必再提他。”石不烂先不和他争辩，站起身扭回头来向大家说：“你们听一听他这算是反省了没有？不但不想反省，还想治我个放火罪哩！大家说说！我为什么烧他的楼？”大家说：“因为他打你的闺女！”“我为什么到他家里去？”“因为送闺女！”“为什么送闺女？”“因为欠租！”“为什么欠租？”“因为灾荒年！”“不打粮食就该缴租吗？缴不起租就该使闺女顶吗？把闺女送去就该闺女挨皮鞭吗？”大家说：“你叫朱桂棠他说！”石不烂扭回头来指着朱桂棠的鼻子说：“朱桂棠！你自己真把你算成我的女婿了吗？你好厚的脸皮！你是抢我闺女的强盗！你还想治我个放火罪！你要知道今天的政府，不是你朱家的衙门了！”

石不烂用手一指骂土豪：

“你不要嬉皮笑脸暗逞刁！”

五里村中出下个你，
就好比大家养了个大野猫——
大家把你养肥了，
你把大家骨头嚼。
你朱家趁着灾荒买好地，
还盖得院又大来房又高，
穷人们家里米粮断，
你偏要逼他把租缴。
只逼得：
多少人为你吃野草！
多少人为你往外逃！
多少人为你卖儿女！
多少人死绝了后根苗！
佃户们死的逃的一大半，
算一算这些血债怎样消。
放着这些你不检讨，
你却要怨我不该把楼烧。
依我看你也不用真改造，
我情愿陪你到法庭走一遭，
谁该枪毙就枪毙，
谁该坐牢就坐牢！”
石不烂说罢这番话，
群众们拳头一举喊声高。
那阎王一见势不好，
又点头来又弯腰，
老老实实作了检讨，

只求大家把他饶。

群众们要他写下悔过状，

保证他以后跟着群众跑。

讲理大会开罢了，

五里村封建势力彻底取消。

在这个会上，朱桂棠立下保状彻底改过，愿受全村群众的监督，保证以后好好参加劳动重新做人。

朱桂棠的土地、房产、牲口、家具由农会分配：除分给他自己一份以外，按着穷苦人们窟窿的大小，该填补多少填补多少。

轮到石不烂头上，大家说老石受的苦大，把朱家院里蓝妮住过的那座楼房，楼上楼下一齐分给他。又说他当日送闺女时候赶的牛车，连车带牛一齐叫朱桂棠扣了，如今把朱家的骡车连车带骡子一齐分给他作为赔偿。

石不烂说：“翻身是大家的事，我可不能便宜那么多。房子我可以要，反正总要有个人去住；车骡最好是卖给村里合作社大家分钱。大家要是想照顾我，我老石是个赶车的，以后就给合作社赶车好了！”大家说：“这个也很好。”就把车骡一同作了价卖给合作社，让石不烂给合作社赶车。

一个月工夫，一切分配完毕，该得房子的都搬到朱家院里去住，石不烂自然也搬进去了。

八月十五那天晚上，朱家大院的新邻居们，打了一点酒，就在朱家花园里过节。石不烂这天把金不换也请来，喝过几杯之后，就向金不换说：“像我这种人能不能入共产党？”金不换说：“可以！你这样积极为大家，党里边一定要你！明天你填个表，我给你当个介绍人！”石不烂说：“罢罢罢！咱老石

也算找着了共产党了！”

这时候，孩子们见这花园很宽绰，就扭起秧歌来。有个调皮孩子，先把好多大人也拉进去，又拉住石不烂说：“石大爷你也来扭一扭！”石不烂说：“我这腰腿不好！”那孩子说：

“就这个腰腿，扭起来才得劲哩！”

那调皮孩子笑呵呵，

强拉着老石扭秧歌。

小蓝妮早就跑到当中去，

石不烂一溜一拐紧跟着。

这些人一边扭来一边唱，

各人唱着各人的歌。

别人的歌词没有记下，

石不烂父女的歌词记了许多：

蓝妮说：“看见了楼来想起了楼，

七年来住得我好发愁，

若不是来了共产党，

一辈子我也熬不到头。”

老石说：“看见了树来想起了树，

当年没有这么粗，

抱着树身往下溜，

鲜血流了一屁股。”

蓝妮说：“看见月来想起了月，

缺了圆来圆了缺，

七年来看够你一百遍，

如今熬到了新岁月。”

老石说：“看见墙来想起了墙，

当年间堵得我好心慌，
若不是柳枝救了命，
早被那狗腿把我伤。”
蓝妮说：“看见我来想起了我，
我的灾难受得多，
七年来由着人糟踏，
以后的身子由了我。”
老石说：“看见车来想起了车，
把我的老牛换成了骡，
车骡卖给合作社，
我给大家去赶车。”
这些人一直扭了多半夜，
嘻嘻哈哈好快乐，
大家感谢共产党，
帮助着自己改变了生活。
这个故事讲完了，
只有蓝妮没有着落。
你若问后来蓝妮嫁哪个，
田间同志他就没有说。

王 家 坡

(小调)

用《哭长城》或其他类似的小调均可唱

后面一座山来前面一条河，
正中间有个王家坡，
姑娘们到了婆家常挨打，
男人们个个打老婆。

山叫黑虎山来河叫玉女河，
王家坡自古有个传说：
说“黑虎要吃小玉女，
就该妇女受折磨。”

花满田园草满坡，
王家坡的儿女好事多：
有个后生叫王金锁，
交了个姑娘赵玉娥。

三月三日好天气，
玉娥的妈妈去赶集，

留下了玉娥一个人，
王金锁悄悄溜到她家里。

进门来叫声“玉娥妹”，
只见那妹妹掉下泪。

“几天不到你家里来，
好象是隔了好几辈！”

“几天不见我的金锁哥，
头也不想抬来话也懒得说。
只要哥哥你来一趟，
见一见面儿也快活！”

“不怨哥哥我不来，
只怨你的妈妈看不开，
见了我瞪起她那两只眼，
瞪得我头也不敢抬。”

“哥哥好比牵牛郎，
妹妹我好似织女娘，
我的妈好象河一道，
把咱俩隔在两岸上。”

说妈妈来道妈妈，
直说到妈妈转回家，
进门来没有说一句话，

每人每给了两个耳刮。

从门里溜走了王金锁，
家里苦了赵玉娥——
挨一顿笤帚把，
哭成了两只红眼窝。

玉娥妈憋了一肚子气，
憋来憋去有了主意：
“找上个主儿嫁出去，
省得在家里招是非。”

玉娥挨打走了风，
金锁爹听了怒冲冲。
他把金锁骂了一顿，
也要给金锁订一门亲。

王家的媒人过了东庄，
赵家的媒人上了西庄。
王家给金锁说下媳妇，
赵家给玉娥找下夫郎。

过了清明是谷雨，
三月里说媒四月里娶。
日子都是四月八，
要拆散这一对好儿女。

王金锁换了新衣裳，
上下打量好排场。
“要是娶了我的玉娥妹，
管保她见了喜洋洋。”

赵玉娥穿起了石榴裙，
左右端详很时兴。
“要是嫁给我的金锁哥，
管保他见了很称心。”

东庄近来西庄远，
往来的工夫差一点：
王家的媳妇下了轿，
赵家的迎亲花轿才到门前。

王家的门前放了一挂鞭；
赵玉娥听了心一颠：
“别人来占我的金锁哥，
闪得我玉娥好可怜！”

赵家的门前放了三铙，
王金锁心里扑通通：
“别人抬走我的玉娥妹，
何年何月再相逢！”

王家的媳妇下了轿，

头上盖着个红绸罩。
里面罩着个什么样的人，
大家谁也不知道。

赵家的玉娥起了程，
头上盖着块盖头红。
花轿抬着她左右转，
转来转去头发矜。

王家的新媳妇去了红绸罩，
两道愁眉一处靠。
“陌生的姑娘你愁什么？
莫非你娘家也有相好？”

赵玉娥取去了盖头红，
见一个披红男子带愁容。
“这一个一定就是新女婿，
想必是外面也有私通。”

一天短来两天长，
谁家有事也难藏：
金锁的媳妇也有个旧相好，
玉娥的丈夫恋着个大姑娘。

赵玉娥常想王金锁，
王金锁常想赵玉娥。

玉娥在婆家常挨打，
金锁也常常打老婆。

割罢了麦子收罢了秋，
家家的媳妇往娘家走；
两回能住三个月，
各自会一会老朋友。

金锁还是牵牛郎，
玉娥还是织女娘，
一年两次常团聚，
地上的佳期比天上长。

女儿们都有她的牵牛郎，
小伙子都有他的织女娘，
爹妈都是些糊涂蛋，
捏成了一大串子错鸳鸯。

一月两月容易过，
暗中的夫妻两分割，
姑娘们仍回婆家去挨打，
男人们自然还是打老婆。

玉娥向妈妈诉过苦，
妈妈说她是“二百五”，
“黑虎山来玉女河，

“玉女怎能斗过黑虎？”

黑洞洞的日子长又长，
玉娥盼不到出太阳；
背地里拜了一拜金锁哥，
一条麻绳自悬梁。

听说死了赵玉娥，
气得金锁着了魔，
一把镢头拿在手，
疯疯癫癫走上山坡。

为给玉娥报冤仇，
跑到山上刨石头。
口里不住说疯话，
张牙舞爪叫个不休。

“平倒黑虎山来留下玉女河，
山底下找回我的赵玉娥，
姑娘们再也不挨打，
男人们也不再打老婆。”

疯金锁每日里手不闲，
平山平了几十年，
一把把的镢头磨成了杵，
妇女们仍然受熬煎。

王家坡开了解放花，
男女学过了婚姻法，
再不用爹妈胡包办，
自己的亲事自己当家。

还是那座山来还是那条河，
青年男女好快活：
姑娘们谁也不再挨打，
小伙子也不再打老婆。

还是那条河来还是那座山，
青年男女好喜欢：
婚姻大事凭自愿，
心上的人儿各团圆。

王金锁一见喜洋洋，
多年的疯病好了个光，
“为婚姻折腾了一辈子，
后辈的儿女见了太阳！”



“春”在农村的变化*

(快板)

从小过春天，只说春天好，
谁知我的爹，因此添烦恼？
他说“孩子家，你们不知道：
年年到春天，情景都不妙。
遇着好秋景，打粮也不少，
可惜欠下债，人家要催讨，
够吃不够吃，粮食总得祟，
祟得冒了头，春天吃不饱。”
东院老大伯，一旁发苦笑，
他说“穷人家，就怕春来到。
人家有钱人，另外是一套：
秋天囤下粮，春天往外祟，
拿上一吊钱，赚你两三吊。

* 这首快板，最初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后来，很多报刊都转载了，有的报刊还以《乘胜前进，大干一春》为专栏标题，把赵树理的这首快板转载在里面。有些研究赵树理创作的资料，把《乘胜前进，大干一春》作为赵树理的另一篇文章，是错了的。

人家到春天，怎能不欢笑？
咱们凭什么，跟着凑热闹？”
这些老人家，未遇好世道，
明明好春景，偏得把泪掉。

后来农村里，换成新面貌；
土改分了田，地主权失掉；
粮食行统购，私商捞不到；
高级合作化，产量往上冒；
分粮有标准，谁也少不了；
余粮集体卖，换成人民票；
多劳便多得，不劳不得要。
这种新生活，满有新味道。
人人到冬天，都盼春来到。

有些投机客，光想取点巧，
不得发洋财，就说社不好。
一样分粮食，他说吃不饱。
有钱浪费掉，没钱向社要。
想吵他就吵，想闹他就闹。
总想闹散伙，去找鬼门道。
有些中贫农，不识这一套，
学着人家走，跟着人家叫。
中了人家计，惹得人家笑。
咱们离了社，生活没有靠。
再要不统购，粮价上下跳。

春天粮食涨，秋天粮食落。
落了人家囤，涨了人家袋。
咱们没钱买，卖地人家要。
那些苦春天，过得不算少。
咱的上辈人，早已领过教。

今年过春天，事事大飞跃——
生产要提高，思想要改造。
咱们中贫农，休戴落后帽！
识清大是非，只走阳关道。
那些投机客，让他亮亮宝。
摸着他的底，帮他开开窍。
思想也要整，生产也要搞。
整风与生产，两下结合好。
村村修水塘，社社开渠道。
开山崩石头，到处响大炮，
上工没男女，做活没老少。
把个好春天，过得很热闹。
前辈老人们，可惜去世早。
咱这好春天，他们未等到。

谷子好

(快板)

谷子好，谷子好，
吃得香，费得少，
你要能吃一斤面，
半斤小米管你饱；
爱稀你就熬稀粥，
爱干就把捞饭捞，
磨成糊糊摊煎饼，
满身窟窿赛面包。
谷子好，谷子好，
又有糠，又有草，
喂猪喂驴喂骡马，
好多社里离不了。
谷子好，谷子好，
抗旱抗风又抗雹，
有时旱的焦了梢，
一场透雨又活了；
狂风暴雨满地倒，
太阳一晒起来了；

冰雹打的披了毛，
秀出穗来还不小。
谷子好，谷子好，
可惜近来种的少，
不说咱们不重视，
还说谷子产量小，
想想近来好几年，
咱对玉菱怎关照？
深翻地，勤锄草，
密植保苗追肥料……
天天钻在玉菱地，
常把谷子忘记了，
谷子好象前房子，
玉菱好象亲宝宝。
亲生儿子应亲看，
前房儿子怎丢掉？
谷子好，谷子好，
一到分粮想起了——
少配一斗撅着嘴，
多配一斗哈哈笑。
谷子好，谷子好，
一喂牲口想起了——
要是多种几亩谷，
哪用天天割野草？
谷子好，谷子好，
一遇灾情想起了——

要是多种几亩谷，
哪用国家把粮调？
谷子好，谷子好，
应对谷子多关照，
谁对谷子看不起，
快把偏心早去掉。
也深翻，也保苗，
追肥浇水样样到，
你和玉茭一样待，
看看它能打多少！

小 经 理 ·

(鼓词)

——原为小说现改为鼓词

山在东来水在西，
山腰里有个村子叫岭西。

住！你这个书说得真不地道：不论人家说哪一本书，总得先交代一下故事出在哪省哪县，没有见过你这一开首就先说村子。什么岭东岭西？象这种普通村名，哪省没有，哪县没有？全中国数算起来，叫岭西的村子恐怕也有个一千八百个，你说的是哪个岭西啊？

算了吧朋友！不是我不会说，恐怕是你不会听。一部书的真假，全看它合不合情理——只要是人情入理，不论他出在什么地方，就都可以当成真的来听；要是不近情理，你就说他出在北平某街某巷，也靠不住。你也不用管他是哪个岭西，全听他合不合情理好了。闲话少说，咱们就还说这个岭西吧！

山在东来水在西，
山腰里有个村子叫岭西。

* 这一篇是在赵树理同志的遗稿中发现的，究竟是遗稿有损失还是本来没有改写完，无从查考。改写的具体年月，也无法查出；但根据所用的稿纸和字迹分析，大致可以确定是解放初期在戏曲改进局任职的时候。录在篇末，供研究参考。

这村子——

离山顶足有二里地，

离河边不过半巴里；

上有崖来下有岸，

只有中间是平的。

站在山顶往下看，

这个小村，好象坐了一把太师椅。

村里边——

花花绿绿几颗树，

树下的房子很不整齐，

差不多都是石头垒，

只有那，三五处瓦房露着屋脊。

村子下边——

河滩里好地平展展，

正中间开了一条水渠，

天气旱了浇一浇水，

不下雨也能吃上东西。

村子上边——

一块块地堰都是石头砌，

凑起来好象一架上天梯。

每块地都是长条子，

弯弯曲曲宽窄不齐：

到宽处，也不过横过一条扁担；

那窄处，过不去个小毛驴。

天旱了，把庄稼晒得如火燎；

要是雨多了，山太陡、水太急、冲了我的、砸了你

的、花啦啦、唏哩哩、一块一块塌到底。
论户数不过五十几户，
论人口也不过二百六七，
家家的情况不一样，
人人的生活也不统一。
这个岭西村，
大概就是这么个样，
故事就出在这个村子里。
你不要看这个村子小，
还不能一家一户细细提。
书中先表个王大嫂，
有个小孩很伶俐，
乳名叫个王三喜，
不论干甚都有出息。

住住住！我还得打你一次岔：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口，你为什么偏要说个小村里的小孩子哩？

我说朋友！你要想看人多呀，你不要上这里来，最好到前门外那火车站上去！那里的人呀，隔一会就是一大批，一个人是一个样，管保你一辈子也看不完。要听我这部小书呀，对不起！还得听这个孩子——因为故事出在他身上，我不说他说谁呀？

这个小三喜，虽然生在个小村子里，可是个十分能干的孩子；从小就爱拿斧子弄锯子，做个什么小玩意很有意思，每逢过年过节，搭个彩棚，扎个花灯，比别人玩得高；说个俏皮话，编个小口歌，也是出口成章，非常得劲；什么活儿一看就懂，木匠、铁匠、泥水匠到他村里做活时候，缺了手他就好帮个忙，一下手就跟学过几年徒弟一样。一九四二年阴历正月，这个

小三喜刚刚从十七岁变成十八岁，村里又要在正月十五挂灯，这就又该他忙起来了！

正月里来正月正，
正月十五挂花灯，
岭西村，家家想起小三喜，
扎个花灯数他扎得精。
邻居们，你拿几根竹签他拿几张纸，
都送到三喜他的家中；
东边一堆，西边一叠，
白的自来红的红。
三喜揽下这买卖，
不赚工钱白误工；
从初五扎到十四日，
还剩了几盏没有完成。
小三喜正在家里赶着做，
忽听得门外有人声，
来了个邻家老太太，
后跟着她的闺女名叫菊英。
母女们，拿着些材料把门进，
三喜母子笑相迎，
只让得母女落了座，
三喜斟上茶两盅。
见面的闲话扯了几句，
菊英娘的谈话转了锋——
她说道：“我今天又来麻烦你，
也请你三喜给俺扎个灯！”

三喜娘说道“那也不算个事”，
小三喜连忙说声“那可不行”：
三喜说：“今晚就要把灯挂，
只恐怕赶到天黑也扎不成！”
菊英娘说道：“俺这好办，
只要是一对灯儿就能行！”
小菊英叫声“三喜哥！
请你给俺扎个老鹰！”
三喜说：“不论扎甚都可以，
请菊英妹妹帮个工！”
菊英娘答应“好好好！
只恐怕菊英她不中！”
菊英说：“让我试一试，
还不知能行不能行！”
他两家三言五语搞停当，
两个孩子就要动工。
小菊英拉过一个小板凳，
她与三喜坐了个平。
小三喜有意无意扭头看，
上下打量小菊英：
只见她，
头上梳了个大辫子，
扎了一条红头绳，
小脸上不打胭脂不抹粉，
自然是白里带着粉红，
两眉间常带几分笑，

一双大眼忽玲玲，
深红小袄藏青裤，
半新不旧很干净，
看身材好象个大人样，
看举动还是个小顽童：
小三喜，虽然是有意无意看了一眼，
小心里扑通扑通好几扑通。
暗想道：“多扎对花灯不算个事。
难得你这样个妹妹来帮工，
有心跟你搞个恋爱，
只可惜咱们都太年轻——
要到区里去登记，
俺十八、你十五，咱两个谁也不够那个年龄！”
小菊英完全不在意，
只把那三喜哥哥叫一声：
“你说叫我帮助你，
可叫我做点什么事情？”
三喜说：“这是竹圈十二个，
要套成一对绣球灯，
我把这竹圈捏在一处，
你就在交叉上边绑上绳。”
小三喜拿起竹圈子，
小菊英拿起细麻绳，
一个捏来一个绑，
四只小手不消停——
三喜的两只小手胖不腾腾，

菊英的两只小手白各生生，
胖不腾腾、白各生生，
四只手共扎一盏灯。
绑了一处绑一处，
眼看这个绣球快绑成，
小三喜有意开个玩笑，
竹签缝夹住菊英的红头绳，
小菊英绑完绣球忙站起，
三喜只把手一松，
小菊英正要夺着看，
却不料绣球吊在半空中。

三喜见这个小菊英长得伶俐活泼，有意跟她开个玩笑，等到一个绣球灯架快要扎成，在绑末了的一道绳子的时候，暗暗把菊英那辫子上的红头绳梢儿夹在里边。菊英见把这六个竹圈子套在一处绑起来，就绑成了圆的溜溜一个绣球灯架，觉着新鲜有趣，就笑嘻嘻的站起来说：“让我先看！”说着就用双手来抱，三喜见她伸手来抱，不等她接住，就顺手向她那边一扔说：“你看！”菊英还没有赶上来接，那绣球就从她的脚下骨碌碌滚到背后。她随着绣球转过身来一看：“咦！滚到哪里去了？”三喜也不告诉她，只是哈哈大笑。三喜娘和菊英娘在炕上听得他们闹，扭头向地上一看，见菊英背后吊着个绣球找绣球，不由得也笑起来。菊英又打了个转身，转得那绣球往前一摆，才知道原来吊在自己身上，不由得自己也笑了。她把自己的辫子连绣球从肩膀上提到脸前来解，因为绑得很结实，一时也解不开，就凑到三喜跟前说：“快！快替我解一下！”三喜笑着说：“不要解了，吊在后面就很好看！”她央告了一会，三喜只是笑。最后她也顽皮起来，她向三喜说：

“三喜哥！你是解不解？不解我就走了！”说罢就嘻嘻笑着跑出去。三喜怕把绣球玩坏了，赶紧追到门外又把她拉回来说：“好妹妹，防着给人家弄坏了！”说着就替她往下解，费了好大劲才算解下来。菊英顺口问了一声：“这灯儿是谁家的？”三喜说：“我也不知道——娘！这灯是谁家的？”他娘说：“是人家太和公的！”三喜说：“太和公的呀？我不伺候张太那个老杂种！”说着把绣球扔在地上一脚，就踩成个扁的了。菊英见他踩坏了绣球，除不拦他，又在上边加了一脚说：“我也不伺候张太那个老王八！”

这个“太和公”是一家什么字号，“张太”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两个孩子都不愿伺候他们哩？这事还得交代明白：

说起太和公，
当年很威风：
东家叫张太，
掌柜叫王忠。
放债本对利，
到期不宽容。
欠下他的债，
不怕不受穷！

（以上念，以下唱）

好一个张太吃人虫，
在岭西开下了“太和公”，
三间瓦房作门面，
坐北朝南好威风；
张太自己当经理，
用了个掌柜名叫王忠；
称名是个杂货铺，

（未完，下缺）

考 神 婆*

(唱) 神仙鬼怪哪里来，
都是愚人瞎安排。
神婆马匹胡作怪，
装神弄鬼为发财。
平顺县驮山村出了一件事，
那个村有个孟六孩。
孟六孩女儿得下病，
生了个孩子没有奶。
到安嘴请来个神婆子，
一看就说是鬼怪。
鸡蛋要了八十个，
三姓人送了两黑来。
驮山请来神婆子，
邻近的村里都传开。
北头村有个民事主任，
跑到驮山请神来。
主任见了神婆子，

* 本篇是平顺县北头村集体创作，由赵树理改编。

叫了一声“老太太：
我村教员得下病，
请你给他消消灾。
他家也在你二区住，
管保对你好招待。”
神婆子说道“好好好！
照顾乡亲理应该。”
随主任就往北头去，
到小学里看病来。
村里人一见神婆到，
男男女女跟上来。
一直跟到学校里，
前后坐了好几排。
只见那教员躺床上，
盖着被子打唉唉。
旁边还有个申同志，
他替教员当招待。
把神婆让到床上坐，
开言叫声“老太太！
我家也在二区住，
和我这教员一道来。
不知他得下什么病，
眼也不睁头也不抬。
八九天没喝一口水，
满口胡说打唉唉。”
神婆子揭开被子看，

只见那教员嘴一歪。
长长出了一口气，
把头摆了好几摆。
神婆趁空摸了摸手，
一口断定是邪灾。
要一碗凉水三支筷，
又念道：“是神是鬼上柱来。”
把筷子立在凉水里，
她说：“这病很厉害。”
申同志说道：“对对对！
依我看也难治过来。
老人家你要能治这个病，
麦子给你两布袋。”
神婆子一听满面笑：
“乡亲们不用讲钱财。
只要能治好他的病，
喝口开水也痛快。”
老申说：“我村有个老猪精，
也许是我带将来。”
神婆说道“对对对！
你看他嘴又张来头又摆。”
老申说：“除了猪精来作怪，
你看他还有什么灾？”
神婆说：“他的父许过关爷五斤肉，
临死不愿费钱财。
因为欠下这笔债，

关老爷把他的真魂押起来。”
神婆这里才说罢，
那教员少气无力把口开。
教员说：“老人家说得实在对，
一说我就想起来。
果然许过五斤肉，
到后来忘了没有买。
只要老爷饶过我，
顶高好戏唱一台。”
神婆一听更有劲，
她说道：“当下免你三分灾。
关老爷差了十二个鬼，
时刻与你紧相挨。
要知道都是哪些鬼，
先问你每日梦见是谁来？”
教员说：“这几天闭住眼睛就做梦，
是神是鬼分不开。
梦见起荣和三虎，
还有连柱和瘦孩。
申法群来王全有，
还有些认不清楚是谁来。”
神婆说：“王全有是个屈死鬼，
只是开过一次怀。
后来得下月经病，
临死没有使棺材。”
神婆子讲出这句话，

男男女女笑起来。
神婆子不知大家为啥事，
只当是夸她好口才。
这才越说越有劲，
顺口随便瞎铺排。
二十个鸡蛋五斤肉，
还要一桌全供菜。
香烛纸马样样有，
七尺青来三尺白……
老申说：“这些东西没处买”，
神婆说：“且用草棒顶起来。
要是缺了哪几样，
到以后折成价钱我去买。”
暂且舀上一碗水，
我先给他去去灾。
要你们三撮面来三撮米，
我给你送到大门外。
申同志给她弄停当，
那神婆咕咕嘟嘟念作开。
正端着水碗往外送，
急得教员跳起来。
教员叫声“申同志：
你看这事该不该？
我本来没有一点病，
你们叫我假装灾。
上场说是一小会，

为什么尽管胡日摆？
把我闷了一下午，
闷得我气也上不来。”
神婆子一见瞪了眼，
内里的机关解不开。
全体群众哈哈笑，
小孩们笑得跌倒起不来。
申同志只把神婆叫，
听我给你讲明白：
“我的名字申法群，
区上派我到这里来。
我领导群众反迷信，
你用迷信发洋财。
因此我们定下计，
弄一个哑谜叫你猜。”
老申指着村干部，
一个一个数起来：
“这是起荣这是三虎，
这是连柱这是瘦孩。
这个大汉王全有，
你看他开过几次怀？
这些人一个一个都还在，
谁给关老爷出个差？”
神婆子知道自己的错，
低下头来不敢抬。
她只说：“千错万错我的错，

只怨我想取轻巧财。
申同志这回放了我，
再不敢装神弄鬼做买卖。”
老申说：“今天不能放你走，
到明天要你来坦白。”
第二天开了个群众会，
把这神婆子叫上台。
叫她说了真实话，
大家对她批评开：
这个说：“原来都是你作怪，”
那个说：“你这家伙会发财。”
哪一家上过她的当，
都来跟她算账来。
神婆子一见她也后了悔，
坦白以后马上改过来。
这就是考神婆破除迷信，
愿大家别信神婆那纯粹是骗钱财。

山西第四师范同学合影题诗

萍草一样的漂泊，
或许是我们的前程。
此间一度的欢聚，
不知何时再会。
朋友们啊，
我们的归宿，
让我们分头去找。

（一九三〇年六月 潞安）

赠盲艺人赵高升师徒*

不受权门白眼睛，
朱弦鼓筒独天真；
香灯伴我朝连夕，
残话留人去复停。
事涉惊奇心向古，
情临激处调转新；
歌喉一止方睡去，
来日东君喜笑迎。

*这首诗，是山西晋东南地区田文高、粟守田同志收集的。据他们的说明，是赵树理在一九三六年夏天赠给沁水县郑庄公社中乡大队说书老艺人赵高升师徒的。赵高升老人现在还健在，当时，他去沁水县潘庄公社尉迟村教徒弟赵世贤，就在尉迟唱了几天。赵树理同赵世贤是紧邻，听了两师徒的说书，很高兴，就在赵高升的扇子上题了这首诗。

由于赵高升师徒都是盲人，只能背诵字音，收集的同志根据字音记录出来的诗句，第二句第一字是“竹”字，第五字是“读”字。我们认为，“竹”字可能是“朱”字之误，黄庭坚《登快阁》诗有“朱弦已为佳人绝”之句，朱弦即染成朱红色的琴弦，是琴的代称。第五字“读”字可能是“独”字之误，

杜甫《旅夜书怀》诗“危檣独夜舟”和陈子昂《感遇》诗“幽
独空林色”的“独”字，都是读为仄声的。

贺 喜 对 联*

抹抹擦擦是为了治病救人
说说唱唱是为了教育群众

* 这是赵树理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间），为当时县级机关一对青年（男的是演员，女的是医生）结婚时写的贺喜对联。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古来数谁大	皇帝老祖宗
如今数谁大	工人众弟兄
世道一变化	根本不相同
还是这座庙	换了主人翁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是太庙改的。太庙，是过去封建皇帝供祭老祖宗的庙堂。解放后，首都人民加以修整，改做劳动人民文化宫，毛泽东同志亲笔题了匾额，于一九五〇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式开放。这首诗是赵树理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写的。

《活人塘》四人赞

作赞缘起

我读了《活人塘》这篇小说的稿子后，觉着内容充实，送给田间同志（他是我们的编委）看了一下。田间同志说：“……近来创作中，能够如此打动我心的还不多。其中的人物，虽然没有经过精雕细刻，但他们也令人忘不了……”他主张早日全部发表。

可是我们的《说说唱唱》地盘只有那么大，一期总登载不完，并非故意卖关节、找扣子。为了照顾急性的读者，让我先把后半篇的大意交代几句。

后半篇的故事是这样：一方面是地主孙在涛，结合蒋匪军继续在新河集刮粮、抓丁、杀人、放火，另一方面是刘根生与新河集以外的共产党接上头，领导着群众抗粮、抗丁，反对烧杀。斗争坚持了十五个月，经过各种灾祸，死了好多人，最后我们的军队大反攻，才把那些恶魔彻底平灭。

在我们反攻的那一夜里，刘根生领着当地的同志们作内应，并且亲自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弄得敌人军心大乱，不战而溃。

最后，群众发现了孙在涛，薛陆氏恨得一口咬住他的耳朵死不肯放。第三天，军队要去解放别的地方，刘根生归了队随军出发，大风把他送到河边，和他握了一下手，告诉他说：“你

不要忘记：以后虽说是天南地北，我总是等着你！”

算了！这样交代只能说算是提个影儿。真正动人处，绝不是凭这几句交代能说出来的，只好请大家等到下一期再看原文。

田间同志并且劝我写一段介绍文章，我觉着本文就在本刊上发表，也不需要另作介绍，为了表示我的读后感，我用新辙口作了四首半生不熟的旧诗，来赞扬其中的四个人物，不论好歹，写出来讨大家一笑：

一、刘根生赞

狂敌迎锋倒，碉楼触手摧。
临危坚不屈，视死坦如归；
得救知群力，相依渡久围；
时机才一到，拔地一声雷。

二、薛陆氏赞

白发残年百难身，冤仇未报恨沉沉。
雪中埋去连心肉，墓里刨回舍命人。
茅屋成灰尤放胆，糟糠吃尽不灰心。
黄昏斗到太阳出，敢把豺狼一口吞。

三、大风赞

十五月来惟一事，小心翼翼护同志；
包伤喂饭病床前，递信传书生死地。
并坐还装姐妹行，相亲不避雌雄异。
船头携手一叮咛，脱尽寻常儿女气。

四、七月子赞

伶俐聪明小女孩，无辜血肉委尘埃。
遗尸也有功劳在，换得英雄雪恨来。

其中值得赞扬的人还多得很，从此也可以认识什么叫做

“军民一体”，只是我对作诗之事太不熟练，恕不能一一赞扬下去。

（一九五〇年十月四日）

美帝是人类的公敌 *

只要不是傻子，
都应该认识美帝是什么东西。
美帝是什么东西？
它的老师是东条英机，
它的伙计是苍蝇、蚊子……
它们要把病菌撒遍了世界各地。
所有愿意生存的同胞，
都应该立刻注意：
我们都知道消灭病菌，
都知道要消灭扑杀苍蝇、蚊子……
那么也就应该知道怎样对付美帝！

•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新民报》。

花好月圆*

——电影《花好月圆》主题歌

三里湾 三里湾
对着水 靠着山
青枝绿叶上下滩
自从有了农业社
又治水 又治山
人定胜过天

三里湾 三里湾
对着水 靠着山
青枝绿叶上下滩
自从有了农业社
人连心 地连片
事事随心愿

三里湾 三里湾
对着水 靠着山
青枝绿叶上下滩
自从有了农业社
有情人 成亲眷
花好月又圆

*根据赵树理小说《三里湾》改编的电影剧本《花好月圆》，由赵树理作主题歌，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号《中国电影》。

春日寄战士

九年解放九度春，
一年春比一年新。
春风为我传微意，
传与英雄解放军：
昔日春光年年到，
花自芬芳鸟自叫，
可怜枷锁系人心，
不逢解放怎欢笑？
一自井冈树红旗，
春光一缕透园篱，
初春难解冰千尺，
万水千山费转移。
红军一往西北转，
顿使西北生意满。
闻说岭南总先春，
此时亦逊西北暖。
春讯无脚到处传：
“西北消却昔日寒。”
传向东西南北去，
四方志士奔延安。
延安春满关不住，

突破妖魔重重雾。
敌后遍立解放区，
就中种得花千树。
外来狂魔终被降，
国中犹自有魔王。
魔王最妒春光好，
厉雪凄风猛摧戕。
春雷一动声威壮，
我军过处人人望。
降魔伏怪向无前，
海内妖氛为扫荡。
扫尽妖氛露碧犬，
遍将春色布人间。
人民会得英雄日，
万户千家尽欢颜。
解放以来重建设，
英雄建国心尤热：
筑路不避昆仑高，
分洪哪怕荆江阔？
丛林植满南海滨，
棉麦绿遍天山侧；
更于沿海建屏维，
迫使妖氛近不得。
我敬我军志不凡，
鞠躬尽瘁三十年。
赢来海内三春暖，

撑住亚东半壁天。
春来愿携一樽酒，
漫逐春风遍地走。
随时酌奉解放军，
慰此英雄老战友。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告 艾 克 *

家住美国到别处去抢人，
是你一辈子的营生。
抢人原是强盗的本性，
强盗中多你一个也算不了甚。
全世界人民看得非常分明，
何须你东拉西扯弄鬼装神？

说什么“保护侨民”？
哪个国家也有人到外国谋生，
哪个国家也住有外国的侨民。
没听说有过这样的国际规定，
说“哪一国有了侨民就不准革命”。
十八世纪的英军曾在你们家乡
 保护过侨民。
你们的国家就在那次革命中诞生。
你们的祖先享受革命的光荣，
想不到未满二百年就生下你这不肖子孙，
听说人家革命就气得脸肿鼻青，
全不怕替你的祖宗败兴！

*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

往日不过是李承晚、蒋中正——
几只巴儿狗汪汪了几声，
今日的夏蒙还没有来得及打扫嗓门，
就急得象热锅上蚂蚁遣将调兵。
向美国人民要钱要人，
组成了陆海空军专供出聘，
难道不是古今奇闻？
问一问美国的广大人民，
愿不愿为你那几条巴儿狗捐款、卖命？

再不要东扯西拉自作聪明！
“掩耳盗铃”才是典型的愚蠢！
全世界人民向你发出另一种邀请：
请你们的军队从别人的国土上快滚！
这是山崩地裂的呼声，
你要敢于充耳不听，
你最后的命运要由全世界人民来决定！

（一九五八年七月于山西长治）

告艾森豪威尔*

你这无耻老头，
世界罪魁祸首，
刚在巴黎丢丑，
又来亚洲奔走。
亚洲有你什么，
无非几只走狗，
有的已经落水，
有的正在挨揍。
你竟当做宝贝，
不惜万里相救，
不想救它不了，
惹起人民怒吼。
马尼拉的石头，
首先为你祝寿；
日本人的呼声，
使你闻风退后。
你到我们台湾，
我们大炮迎候。

* 这首诗分别发表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文汇报》和六月二十二日《工人日报》。

朝鲜狗座已空，
只留许政看守。
他正造下洋罪，
要你赔他去受。
你像一只苍蝇，
到处追逐粪臭，
哪里出了坏蛋，
你就攀为亲友。
借他做个招牌，
实权落在你手；
你想扰乱和平，
把他推到前头。
世界广大人民，
认得你这一手，
不许你这瘟神，
拿着火药兜售！
你要胆敢玩火，
小心你的骨头！
人民决不容你，
不要自作自受！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

微妙的夜半*

岸信介政府的官房长官象只夜猫，
在三月十八日夜半凄然喧叫，
说“自然通过”卖国条约的时刻已到。
用时间来代替参议院的审议，
是岸信介热心卖国的发明创造——
他以为这是“自然通过”，
“自然”的规律本来就很微妙：
譬如烤白薯，翻得迟了就会烤焦；
再如煮鸡蛋，捞得晚了就会煮老。
至于这卖国大事，
自然得掌握个日、时、分、秒。
呸！你这半奴半盗！
不要闭住眼睛来开这样的玩笑！
烤白薯也要看火大火小，
煮鸡蛋也要看汤多汤少，
更重要的是要看你
烤了点什么货色，
煮了点什么原料。
你搞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卖国条条，

*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日《光明日报》。

人民自始至终声明不要——
人民的怒火，早已把这块烂白薯当做柴烧，
人民的沸汤，早已把这个臭鸡蛋化为浓泡，
而你却闭着眼睛，
还望它会在你的官邸门外生效。

你又说谁不同意你的卖国条条，
就算是“少数人”胡闹。
你可知道这“少数人”究竟有多少？
北自北海道，南至冲绳岛，
不论在任何地方登高一呼，
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少数人”应声而到。
他们能叫艾森豪威尔中途改道，
又能叫他在美军完全占领的冲绳岛上
 用直升飞机匆匆“起吊”。
就在六月十八日那个通宵，
东京市就有四十万“少数人”给你凑了一
 场热闹：
他们叫警视厅开不得门，
叫美国大使馆睡不得觉。
他们把你行凶的现场——国会借作灵堂，
对被你屠杀的桦美智子举行哀悼。
他们叫你在你的官邸坐牢，
逼得你玩弄那夜半的“微妙”。
别的场面暂且不表，
这场热闹还不够你领教？

你还嫌人数过少？

人民的怒火越烧越高，
一定要撕毁你“自以为”通过的卖国条条！
一定要把你和你那个国会一齐打倒！
最后一定要把美帝赶走！
你要识点眼色还是早走为妙，
否则难逃这无情火燎。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日）

戏为美国总统献策 *

美国总统生气，
亚洲之行不利；
虽有打手护车，
还是砸伤同事；
虽有军事占领，
大路仍被堵死；
派了几次前站，
日本终不能去；
走到中国台湾，
招来大炮轰击；
最后到达朝鲜，
总统更加仔细，
直升飞机随行，
准备随时吊起。
我看这个办法，
尚非万全之计，
总统再要出行，
听我一个建议：
先备木箱一口，

*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六〇年七月号。

内装一张睡椅，
总统躺在里边，
然后钉上盖子，
外用火漆封口，
再写两行大字——
一行“易碎物品”，
一行“切勿倒置”，
想到哪里访问，
就向哪里邮寄，
等到访问完毕，
原件发还原地。
这种安全办法，
总统不妨试试。
包装虽说麻烦，
沿途管保省事。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一年到吉林左家特产 研究所参观驯化的鸟兽*

一到左家来，已入神仙境。
仙鹤不避人，梅鹿呼之应。
新奇海狸鼠，紫貂有胜名。
虽说万物灵，一一听人命。

* 载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吉林日报》。

竹枝词二首 *

油田远眺

任他冰封与雪飘，江山再造看今朝。
钻林不作银蛇舞，也与天公试比高。

吟地质工作

一队英才来摸“底”，千层岩石始交“心”，
重新写部《石头记》，敢笑“西天”经不真。

(一九六二年)

* 这两首词最初发表在《诗刊》一九六四年四月号。

学 雷 锋

你也学雷锋	我也学雷锋
雷锋向谁学	毛选启其蒙
毛选人人看	原文部部同
学来何以异	每在力行中

（一九六三年）

题赠黑山底大队

树在黑山腰，村人志气高。
一心趋集体，千亩变丰饶。
合作十年九，收成四倍超。
从兹常不懈，红旗永飘飘。

(一九六四年五月)

题赠陵川第一山林场

栉风沐雨种油松，
日计无多岁计丰。
莫道眼前犹似昨，
重游过客识英雄。

（一九六四年五月）

咏 松 *

峻岭苍松古，
朝朝映赤霞。
风凄偏见劲，
日暖不眩华。
出众还依众，
居哪变乐哪。
涛鸣浑似海，
晓夜彻天涯。

(写于一九六四年)

* 一九七八年《上党文艺》第四期上发表。

在文化大革命初写的大字报
以诗为题

尘埃由来久，未能及时除，
欢迎诸同志，策我去陈污。

（一九六六年）

“三”字到“万”字·

老乡给我讲这个故事：

孩子入学，三天学会了“一、二、三”三个字。想来“四”字必是画四道，“五字”当然就画五道，以此类推，可见写字不难。于是废学回家，岸然以为自己已经把握住了造字的原理。不料恰巧有人叫做“小万”，要请写个“万”字，孩子画了半天，还没有画到一半，母亲看着孩子辛苦，停下织布机，慨然曰：“你拿我这织布怪去拓。”“怪”者，所以约束经线者也，有篾三四百根，所以拓起来当然比一道一道画快得多。

据老乡讲这故事的意思，当然是在说明孩子既犯了教条主义，又犯了经验主义，不用说更就是主观主义。但我说这就是怨他没有略微耐心一下，第四天多学一个“四”字之过。盖“四”字在现在即并非画四道也。

孩子固然是笑话中的人物，但我们却亦可怜得很，实在和这孩子差不多。听说法西斯最后必然失败，就把希特勒比作鸡蛋；听说显微镜能看见细小物件，便以为大概也能够看见电子；听说古者是封建时代，就对岳飞文天祥也加以讥评；要之：知“三”不识“四”，皆“怪拓万字”之流也。

但问题还不在于不识“四”，而在于自以为“四”就是四根横道子。照旧话说来，这就叫做“强不知以为知”。我们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华北文化》第二卷第一期。

知识缺乏，是我们的种种社会条件造成的，或由于我们穷得念不起书，或由于过去学校办得不好，或由于学习的方向发展得太不平衡，或由于这个，或由于那个，总之：我们现在的文化知识太差，这却是事实。但这也并不是羞耻，只要知道自己还是个“不识四”的孩子，赶紧补充学习，自无问题。不料却相反，我们有些人，正走了孩子的路线，不但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四五，而且以为已经知道了千万，更有甚者，认为除了自己所知的以外，也许就再没有什么，至少也再没有值得学习的什么。然而自己究竟知道什么了，知道几个社会科学的名词，却还不了解其意义。所以张如心先生说这叫做“共产主义的夸大狂”，很有害于共产主义事业也。

拿实例来说：如今有些读物，大家叫它做“中级读物”。中级读物者，就其内容水平说，当然不足语于渊博宏通之林者也。但读物虽是中级，我们却不一定果然宏通。然而“怪拓万字”者流却又出来了：我岂可减低地位，自托于“中级”等辈而去看那些东西？！于是抗大的历史课本没人看，《抗战生活》没人看；尤其是科学小品之类更没人看。不看是因为不爱好可以；是因为不懂也可以；是自己果然超乎中级，不必去看也可以；然而并不是这样回事，是我们自以为早就渊博宏通，为顾全面子起见，所以悍然曰：“那是中级的人读的，我们应该不屑于看”也。

讲历史的，会讲“宋英宗被异族虏去”（见《晋察冀文化道报》）；讲国际的会说：“门罗主义就是门户开放主义”；讲哲学的，会说“時計小了叫做表，这是钟的突变”；诸如此类，这算是有了中级的文化水准了呀没有？但是不屑于看中级读物者，大约就正是这种人。

平心说来，我们的知识发展方向是很不平衡的。读得懂《资本论》的人，当然不必再去读《经济学浅说》，因为那只是中级读物；但他也许不知道疟疾的成因，那就不说中级，我看翻一翻“初级”卫生课本，也并不丢人。会分析时事的，自然晓得世界的形势，无需再去看《怎样读报》；但他也许不知道周瑜不是孔明气死的，那就很该读一读历史小书，并不就为降级。不这样认识自己的人，不这样认识领域广大无边的人，那才真没有办法，真不免于做“怪拓万字”者流。虽然他很不屑于把自己算作“中级”，很耻于在人前翻看中级读物。

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四五以至千万”者，这种人还可以救药。只要“向他们大喊一声说：‘你知道得很少呀！’使他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学习”。但以为自己应该算成“通人”而羞于读中级读物，这却没有办法。

以为“除了自己所知道的以外就再没有什么”的人，这也可以医治。只要给他说明几个社会科学名词并不是全部人类文化知识的代用品，使他扩大眼界，不敢妄自夸大，认为世界上再没有了学问。但以为自己已经不需要了那些“不正确”的知识的人，却没有办法。“不正确”者，此辈人给马列主义以外的知识所加之简单名词也。

说来说去，这里就有了四种人：不知道自己没有知识的人，不知道知识领域广大的人；这是前两种。为面子而不屑于读中级读物的人；认为“不正确”的知识没学头的人；这是后两种人。

这四种人的结果无它：拿显微镜去看电子，“怪拓万字”而已矣。我自己未敢除外，也曾是这类人来。但我总希望我们赶紧改一下。

平凡的残忍*

某年的旧历年关，我和一批同伴行军至某处，大家商量起吃菜问题，我提议买一些金针海带。某同伴几乎笑掉了牙齿，冷冷然曰：“看吧！山西菜又出来了！”

某同伴一见到吃南瓜或和人提起吃南瓜之事，总要反复说明南瓜在他的故乡只能喂猪。

某工作人员，叙述平顺人所喝之汤曰：“一把玉菱面，调一点臭酸菜，每顿剩一点在锅底，第二顿把水添进去，”他还说“这是正经味。”

住，不要零零碎碎往下举了，这些事在各位读者脑子里或者还不乏其例吧！

金针海带在山西如我这等人的心目中，确实认为可以过年；南瓜据说在某些地方也确实不是人吃的东西；平顺人所喝之汤，就如我这等人，喝起来也觉着不大可口，上例的发言人倒也没有造谣情事，说的也是实话，只是在态度上都犯了一点无心之错，因而从另一个观点看去，好象有点残忍（“残忍”这一词或许太重，但也再找不到个适当的字眼。姑用之）。

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要不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华北文化》第二卷第三期，署名“王甲土”。

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们出苦海，那还要革什么命？把金针海带当做山珍海味，并非万古不变的土包子；吃南瓜喝酸汤，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贱骨头。作革命工作的同志们，遇上这些现象，应该引起的是同情而不是嘲笑——熟视无睹已够得上说个“麻痹”，若再超然一笑，你想想该呀不该？

记得抗战初期，某士绅在一个群众大会上骂群众道：“日本人敢欺负中国，就是中国太不象样。看你们一个一个的样子：头也不剃，脸也不洗，纽扣也不扣……象这样的国民，如何能不受人欺负呢？”好象是说：“日本人打进来的原因，就在于一般中国人不剃头不洗脸云云。”这道理自然不值一驳。你试把那些不剃头不洗脸的任何一位，从小就送入苏联的托儿所，一直养到大学毕业，管保穿西装吃西餐住洋楼坐火车都成了他的生活琐事，何劳某士绅侃侃训斥？

不过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后一代都送到苏联的托儿所。苏联在二十五年前也和我们一样，正在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自求振拔，经过苦斗，才有今日的局面。目前正在我们抗日根据地吃南瓜喝酸汤的同伴们，正是建设新中国的支柱；而以金针海带当山珍海味的我，还马马虎虎冒充着干部，为将来新中国计，何忍加以嘲笑？

我们的工作越深入，所发现的愚昧和贫苦的现象，在一定时间内将越多（即久已存在而未被我们注意的事将要提到我们的注意范围内），希望我们的同志，哀矜勿喜，诱导落后的人们走向文明，万勿从文明自傲，弄得稍不文明一点的人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也！

艺术 与 农村*

只要承认艺术是精神食粮的话，那末它也和物质食粮一样，是任何人都不能少的。农村有艺术活动，也正如有吃饭活动一样，本来是很正常的事；至于说农村的艺术活动低级一点，那也是事实，买不来肉自然也只好吃小米。

在历史上，不但世代书香的老地主们，于茶余酒后要玩弄琴棋书画，一里之王的土老财要挂起满屋子玻璃屏条向被压倒的人们摆摆阔气，就是被压倒的人们，物质食粮虽然还填不满胃口，而有机会也还要偷个空子跑到庙院里去看一看夜戏，这足以说明农村人们艺术要求之普遍是自古而然的。广大的群众翻身以后，大家都有了土地，这土地不但能长庄稼，而且还能长艺术。因为大家有了土地后，物质食粮方面再也不用去向人求借，而精神食粮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一步。因而他们的艺术活动也就增多起来。

农村艺术活动，都有它的旧传统。翻身群众，一方面在这传统上接收了一些东西，一方面又加上自己的创造，才构成现阶段的新的艺术活动。

据我所见到的，成绩最大的是戏剧和秧歌。凡是大一点的村子，差不多都有剧团，而秧歌在一定的季节，更是大小村庄差不多都闹的。按传统来讲，这两种玩意儿，在过去地主看不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起，穷人们玩不起，往往是富农层来主持，中农层来参加，所表演的东西，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彻头彻尾是旧的，只是供他们乐一乐就算。群众翻身以后，自然也不免想乐一乐，可是在农村中，容人最多的集体娱乐，还要算这两种玩意儿，因此就挤到这二种集团里来。可是新翻身的群众，对这两种玩意儿感到有点不得劲——第一他们要求歌颂自己，对古人古事兴趣不高；第二那些旧场旧调看起来虽是老一套，学起来却还颇费工夫，被那些成规一束缚，玩着有点不痛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对这两种东西加以大胆的改造——打破了旧戏旧秧歌的规律，用自由的语言动作来表演现实内容。这种做法出来的东西，不但是懂艺术的看了不过瘾，就是村子里学过这一道的人，虽然一面也参加在里边，一面却也连连摇头，大有“今不如古”之叹。不管这些人怎样不满，而这种新戏新秧歌却照常办公，并且发展得很快。从他们每一个作品的整体看来，虽然大多数难免不成所以，但差不多都有它的独到之处，而这些独到之处又差不多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农村的音乐，其传统与戏剧秧歌同，只是现阶段成绩比较坏。在农村中，自乐性的“吹吹打打”集团，名义虽有“八音会”、“十样锦”等之不同，但其为“吹吹打打”则一，在历史上也是地主看不起，穷人玩不起，只有富农领着中农干的。群众翻身以后虽然也把它接收过来，但没有耐性去学细吹细打，只能打一打大锣大鼓。

与音乐相近的则有歌曲：这方面在历史上虽有小调存在，且也有人利用过，但却不能说就是小调的发展。农村的小调倒是农村无产阶级的东西，不过大都是些哼哼唧唧的情歌，不但是唱的人自以为摆不到天地坛上，就是勉强摆上去也不成个气

派，因此在过去就不能在公开的场合去唱。可是一般人都有“唱”的冲动，而历史上没有唱的东西，在实在憋得吃不住的时候，就唱几句地方旧戏来出出气。抗战以来，作音乐工作的同志编了一些抗战歌曲，填补了这个历史上的空子，于是就开了农村唱歌之风。群众翻身以后，此风更发展了一步，几乎是男女老少无人不唱，无时无地不唱，碰上下乡工作的同志便要求教他们些新歌，可惜这方面的供给量太少，以致于有些把打蝗的歌拿到结婚的会上去唱的。此外，在小调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运用在戏剧上。

在图画方面，群众也有要求：翻了身的群众，有了桌子，桌子上也有了插瓶镜子之类，墙上却也有了字画。他们对那些旧的中堂字画感不到满足（也可以说是没有那些雅兴），并且为了不忘共产党，也都爱在中间挂几张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袖象。他们买不到时，好写写画画的人就自己画。这些画往往还画得象个人形，可是你要硬说象谁就很难确定，原来画的是毛主席，下边写上朱总司令，别人也看不出来。把这些画象贴到中间，在旁边还挂上一些不知何时何人结婚的龙凤喜联。

在诗歌方面，空白很大：文化界立过案的新旧各体诗，在现在的农村中根本算是死的。而新旧小调、歌谣、快板之类，虽然也有浓厚的诗味，但究非好的诗作。目前《王贵与李香香》、《圈套》这一类作品确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但产量还少；仍须大家多写。

最后谈到小说：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和新诗一样，在农村中根本没有培活了；旧小说（包括鼓词在内）在历史上虽然统治农民思想有年，造成了不小的恶果，但在十年战争中，已被炮火把它的影响冲淡了，现在说来，在这方面也是个了不起的

空白。

这一切（此外或者还有，但不必尽举了），除了空白以外，其余活动起来的東西，不论它怎么不象話，也得承认是属于艺术范围内的。就那么多的成绩，就那么多的缺点，就那么多的空白，我们在艺术岗位的工作者，对这应取什么态度呢？按这活动的现象说，实在难令人满意，可是我们老向他们表示不满，自己就在不便之处，因为我们即在这岗位上，人家就会把这笔“不满”的账过到我们名下来。

为大家服务的任务是肯定了的，我们的工作崗位是暂时确定了的，那么我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满足大众的艺术要求”，因此就要求我们各种艺术部门的工作同志们（在前方直接为兵服务者除外）分别到农村对各种艺术活动加以调查研究，尽可能分时期按地区作出局部的总结，再根据所得之成绩及自己之素养，大量制成作品，来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

农村所需要的艺术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有时都出乎我们想象之外。办一份杂志，出一份画报，成立一个剧团，作一篇小说，很容易叫文化工作者圈里边的人普遍知道，可是一拿到农村，往往如沧海一粟，试想就晋冀鲁豫边区这一块地方，每一户翻身群众要买你五张年画，你得准备多少纸张？每一县一个农村剧团的指导人，就需要出多少戏剧干部？在这人力不敷分配的时候，后方艺术界的同志们，即使全体总动员投入农村，也只能是作一点算一点，作一滴算一滴，哪里还敢再事踟蹰呢？

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制作一些更高级的作品，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在更伟大的任务之前，这只能算是一种副业，和花布店里捎带卖几条绸手绢一样，贩得多了是会占去更必要的

资本的。至于说投身农村中工作会不会逐渐降低了自己的艺术水平，我以为只要态度严肃一点是不会的。假如在观念上认为给群众做东西是不值得拿出自己的全副本领来，那自然不妥当，即使为了给群众写翻身运动，又何曾不需要接受世界名著之长呢？织绸缎的工人把全副精力用来织布，一定会织出更好的新布，最后织到最好处，也不一定会引诱得巴黎小姐来买。

我们执行土地法不许地主富农管*

地主和旧富农，是剥削咱们的人；土地法就是为了取消这种剥削制度才定出来的，在执行的时候，地主和旧富农一定要使些阴谋来破坏什么的。同样的一句话，我们说出来为的是把事情办好，地主富农说出来，就是别有用心。比方某人多占了果实，某干部应该撤换，我们提出来是民主，应该称赞；地主富农提出来就是挑拨，应送人民法庭受审。因为果实分得公不公，干部合适不合适，都是我们大多数被剥削的群众的事，与地主富农一字无干，他要来管，就是说的的事实，也是挑拨、捣乱！这一点我们要认识得清清楚楚。

土地法里规定给地主分同样的一份，给富农留同样的一份，为的是叫他们维持生活来改造自己，原是我们大多数农民的宽大，要是他们吃上这份再来挑动是非，那就成了犯罪行为，我们对他们绝不能客气。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新大众》报。

休想钻法令空子*

——研究土地法第十六条

土地法大纲第十六条规定：在土地法未发表以前，已经平分了土地的地方，要是农民不说非再分不可，就可以不再分。

边区政府防备有人钻空子，又在补充办法第十四条上规定：要是分得合乎土地法上的规定，可以不再分；要是有人多占，或者肥瘦不均，弄得一部分贫苦农民仍然吃着亏，那就还得重分，或者再抽补抽补。

不过看法令不可只看一条。在土地法未发表以前，已经分了地的地方，就是真正分得合法，只能说不再分地，可不能说就不执行土地法。如土地法第十五条规定，保障农民在各种会议上的民主权利，自然必须执行。为了执行这一条，这些分过地的地方，和别的地方一样，也得有贫农团、农会、农代会这些团体，因此在执行土地法时候，不论土地再分不再分，这些团体是一定得成立的。

再说不成立这些团体，也一定弄不明这地方的土地，究竟分得合法不合法。因为凡是分过还分得不公平的地方，占地多的，占好地的，一定都是利害人；在这些利害人还利害的时候，吃了亏的农民，谁敢要求再分？要是吃了亏的人不敢要求，利害人说：“农民不要求重分了，可以不分了”，那不是又钻了法令的空子？因此不论土地用不用再分，先要按法令成立贫农团、农会、农代会，经这些会里通过，都说不用重分，那才可以不重分。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新大众》报。

穷苦人要学当家*

这次平分土地，要咱们这些贫苦农民，组织成贫农团来领导。法令上就是这样规定的。既然叫咱们领头，咱们就要挺起腰来当一当这个家。

为什么要咱们来做当家人呢？从减租减息起，直到后来的填平补齐运动，好多事情证明非咱们当家不行。五六年前的减租减息，为的是教咱们贫苦农民翻身，咱们没得翻透彻；一年半以前就闹填平补齐，直到如今咱们还是窟窿户，你看靠别人当家行不行？去年九月共产党开全国土地会议，看出这个问题来，因此在土地法大纲上规定了一条，叫咱们组织贫农团，领头来分土地。

咱们这些穷苦老实农民，因为受的压迫太多，压得自己没有喘过气来，常好说些没出息话。有的说：“咱一辈子只会劳动，啥也不会说，人家叫咱干啥咱干啥吧！”有的说：“不论人家怎么分，分给咱多少咱要多少吧！”这都是太看不起自己了。“穷苦”、“老实”、“劳动”，不只不是我们的短处，还是我们的资格，三步功名缺了一步，不能入咱们的贫农团，和从前那个不是大学毕业不能作官一样。不要小看自己，这种资格是受苦受难换来的，别人想装也装不象。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新大众》报，署名“王甲士”。

既然要咱们当家，咱们除挺起腰来担当以外，还要研究一下怎么当才当得好。

咱们都是老实人，办事先要登一登底，平分土地的老底，是十六条土地法大纲和边府十四条补充办法。把这两份法令吃到肚里，办起来就没有错。有不明白的地方，报纸上有说的就看报纸，报纸上没说的就问上级，不要听别人乱讲解，防备他讲错了。

咱们这些老实人，都没有多经过事，办起事来似乎有点困难，不过众人是圣人，遇事多开会多讨论，什么困难都挡不住咱们，因为大家出主意，容易公正，总比过去那些凭着个人小聪明办事公道得多。

平分土地是与大众都有关系的事，做起来的时候，群众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咱们听了这些意见，也要好好讨论，分开对付。分别这些意见哪些对哪些不对，全看他是不是合乎土地法？是不是为翻身不彻底的人打算？是不是为全村最大多数人打算？分清以后，该接受的接受，该解释的解释，该辩驳的辩驳。群众的意见复杂，接受不接受，还得咱们贫农团自己拿主意，不要叫好多不同的意见搅得自己底不清了。

靠法令，靠团体，听了群众意见，自己要拿主意：这就是咱们老实人当家的简单办法。

干部有错要老实。

——评晋城马坪头“劳资合作”

本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出晋城马坪头村实行了“劳资合作”的消息，并且指出他把中农与贫雇农的关系，算成出卖劳力的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是十分错误的。

我除同意指出这个错误以外，觉得还该追一追根。这消息里边说全村共一百二十六户，就有二十五户是贫雇。这二十五户，大部分只有能吃一个月的粮食，可见还是赤贫。为着给他们能解决困难，全村开了三天会，打通了一回中农思想，才弄成这个“劳资合作”。事实即是这样。那就要问，一年多的填平补齐运动，马坪头村是怎样做的？马坪头的地主富农并不算少，究竟斗透了没有？要是没有斗透，为什么不斗？要是斗透了，果实都分给什么人了？为什么直到如今，赤贫户还占全村五分之一？为什么这五分之一的户口，没有翻身资格，直到如今还只能去和中农“劳资合作”？填平补齐的工作就是这个吗？

这一年的填平补齐工作没有做好，村干部应当负责，不能把二十五个窟窿堆给中农去填。要是全村的地主富农都斗透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新大众》报，同年一月十五日《新华日报》太行版转载。本书根据的是《新华日报》太行版的转载稿。

了，贫雇都翻了身成了中农，余下的二十五家赤贫雇是些村干部，那自然可以发动群众填补填补，要是这二十五家尽是群众，村干部或是放松了地主富农，或是自己多占了果实，或是把果实分给另一部分人忘了这二十五家，那就都不能叫中农和这二十五家来“劳资合作”一下算拉倒。

好在土地法公布出来了，照法办事，就可以纠正这种错误。怎样做，谁来做，土地法上都有规定。赤贫户不用担心，将来组织贫农团，自己就是合法的分地人，再不要怕别人耽搁了自己。中农不用担心，照土地法办事，中农跟不动一样——土地在平均数以上的只拿出一点地，平均数以下的还要得一点地，浮财一点也不动，并且还能参加农会，当合法的分地人，绝不会再叫你拿东西搞“劳资合作”。村干部只要不是地主富农钻了革命的空子，虽然出了一些错误，只要老实，也用不着担心；多占果实的，只要照土地法补充办法老老实实退出来，就没事了；放松了地主富农的，或分果实没有照顾到全面的，将来执行土地法的人，会替你把这些错误改正了，也不再追究你的责任。不过这就得你真正老实。要是在填平补齐时候既然没把工作做好，到现在执行土地法又想捣点什么鬼，来抵抗抵抗，那就是犯了罪，就要送到人民法庭去受处分。

中农不要外气*

边府公布的实行土地法补充办法第四条乙项，有这样的规定：

富裕中农的土地，得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下酌予抽出，但不得动其浮财及房屋。

这上边明明白白写着不动中农的浮财和房子。可是，有些富裕中农，或者连富裕也说不上中农，听说土地法公布出来以后，就砍树木、卖牲口，大吃大喝，好象这一次就要弄到他头上一样。

要是地主富农这样做，有他的原因，就是不想交给农会；全村农民对他也有办法，因为他破坏了群众应得的果实，可以送人民法庭判罪。中农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也许是听了地主富农的什么谣言，也许是自己摸不着公事瞎操心。将来全村农民对这些事有什么办法呢？说他是破坏群众果实吧，这些东西又是他自己的，法令上规定不准动他的浮财，自然不应归群众；说他没有罪吧，村里摸不着公事的中农跟着他也浪费了许多东西，弄得人心不安，也难说真正没罪。

我觉着这些中农做得太不上算了：消耗的财产是自己的，自然是自己吃亏。土地改革过后，别的中农都去犁地，你把驴卖了看人家犁；别的中农的猪长肥了，你早把小猪杀了，看人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大众》报。

家吃肉、卖钱；别的中农的树长大了，你的小树早做了抬杆，看人家做梁做柱……看见人家别的中农人农会，你去报名，人家嫌你顽固，不要你。这些都还是小事，要是你带了个顽固头，好多中农跟着你上了当，以后人家上当的人追究起这事来，更加麻烦。那就叫“费了东西不讨好”，两头吃苦。

这些自找苦吃的中农朋友，再不要那样做，自己找外气了。政策上是紧紧的团结全体中农，只要你确实是中农，不论富裕不富裕，在这次平分土地中间，不会动你一点浮财的，土地法已经给你立了保状。

谁也不能有特权*

按照土地法，村里成立了贫农团、农会、农代会这些新组织，就要准备平分土地。这个工作很简单：要认真计算全村的土地、人口，认真评议好地、坏地，认真挨门挨户划分阶级，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和浮财，要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浮财，要接收村公产，在老解放区，还要接收从前没有分了的果实，要接收多占果实的人退还的果实……事情多得很。把这些事情做好，平时才能顺当。

特别在老解放区，这些工作作起来更麻烦些。因为老解放区，做过一年多填平补齐运动，表面上都说是把地主富农斗完了，斗争果实也分完了。要是仔细检查，保留下来的地主富农也还不少，没有分了的果实也还不少，分得也不够公平。不过，凡是保留下来的地主富农，都有他一点小路道：有些是改头换面在村里当了干部、当了共产党员，或者跑出来钻进各机关里去，有些是军属、干属、烈属，靠子弟的势力保存自己。没有分了的果实，有的说保存在农会，有的说入了合作社，实际上是拿着群众的钱，几个掌权的人作了自己的生产本钱。多占了果实的，不是党员和干部，就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凡是有这些毛病的村子，在外边参加工作的地主富农分子，一定包庇家属，村干部、党员一定不民主。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新大众》报。

我们贫农团、农会、农代会的同志们，在工作中间，碰上上边说的这些情况，不论他是什么人，一点也不能让步，要按土地法办事。有土地法就显不着他们的厉害。他们犯了错误，应该照着土地法来改正；土地法不能按他们的意思修改。比方划阶级，是地主就得划地主，是富农就得划富农，只要经过开会公议，事实不差，不管他是村长，不管他是政治主任，不论他是哪个机关的大干部，都不能随便改，不能象从前一样，由他们自己想划成什么就划成什么。又比如多得果实，也不论他是干部、是党员、是在外参军的，只要比应该平分的一份多了，就得把多余的拿出来。

只有这样做，才算是实实在在执行了土地法。老干部老党员，只要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人人有眼，到什么时候也不怕没有人拥护。可是犯了上边说的那些错误的人，不为人民服务，叫人民为他服务，人人有眼，早就看出他捣的是什么鬼，只是惹不起他，现在一执行土地法，我们群众从下边起来了，就要审查审查这些说理不走理的人。这些犯了错误的人，只要老老实实，照着土地法规定的，该退果实的退果实，该交出财产的就交出来，我们就照着土地法，按他们犯罪的轻重，分别发落；要是他们仍然摆起老资格来欺人，或者仍然想在土地法以外保存他的特别权利，我们就有权送他到人民法庭受审判。就算他们有过功劳，也不能算成犯罪的本钱。执行土地法以后，谁也不能有法外的特别权利。

不要误解行政命令*

惠民同志：

我们检查工作作风时候，说：“行政命令”，是指那些下了命令就算作了工作的官僚主义作风说。取消行政命令，就是说取消光下命令不检查的官僚主义作风，并不是说行政上连命令也不用了。

不过你说那些统治贫雇的坏干部，光用命令也压不下，他敢阳奉阴违。今后执行土地法，要靠土地法上规定的合法执行人（贫农团、农会、农代会）来执行，不能再靠那些坏干部做。至于他们要破坏的话，就用边府定出的《破坏土地改革治罪条例》治他的罪——可以预告他们说。

附许惠民致编辑部的信

编辑同志：

这次有个同志在县府受训回来，告我说行政命令要一律取消……我想在贫雇方面不能用行政命令，可是有些坏干部，在村上统治力很大，不用行政命令压一压，贫雇不敢抬头，不好发动，该怎么办？

辉县六区所许惠民问

*这篇最初发表在《新大众》报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大众信箱》栏，署名“理”。

再谈行政命令·

前一期《大众信箱》里，答复惠民同志的问题，对“行政命令”到底有啥坏处？为啥一定要取消？这两点没讲圆满，还该再申说申说。

县上讲：“行政命令要一律取消”，意思就是说：有些干部，作风很坏，有啥工作下来，动不动强迫命令。口头上讲“打通思想，群众通过”，实情却是干部通，群众过，不通也得通，完全是专制做法，国民党老爷派头。这种作风，有的地方，已经发展成一全套，结果把咱们党和政府的政策法规，弄走了样。本来对群众十分有利的事，经他们强迫命令一下子，反转成了群众的负担，引起很多不满，坏了老大事情。现在要坚决实行《土地法》，该咱农民起来当家，大家的事大家办，这一套作风，当然非彻底取消不可了。

* 这篇最初发表在《新大众》报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大众信箱》栏，署名“理”。

停止假贫农团活动， 不能打击贫雇*

从野河村的问题来看，不是土改村的贫农团停止活动，也不是个简单问题——停止一定要停止，不过在停止时候还得做些工作。我们收到假贫农团的材料，有好多种，有干部为了响应《土地法》组织的，有坏干部为了抵挡《土地法》组织的，有坏分子趁机组织的，有为了闹宗派组织的，有县区干部在没有组织工作团以前凭热诚组织的。认真说起来，有好几种不能算假的，只是没有搞填补，就不应该先组织。说到作用，都只能叫村子里混乱，因此，凡不是工作团到过的村子，所有的贫农团都应该无条件停止活动，一律转入生产工作。可是无论什么样子的假贫农团，参加的人大多数是真贫农，停止活动只是为了避免混乱，安心生产，并不是说这些参加的贫雇本身犯了什么罪，因此对这些贫雇一律不该打击。这些贫雇，因为没有坚强的工作团领导，可能犯过些错误，只要将来有工作团去领导他们，那些错误自然可以改正，不能凭没有整顿过的村干部先和他们算账，因为那样做，会给将来发动群众造成十分不利的条件。象野河村干部，歪曲事实，打击贫雇代表，以至区

* 本篇最初发表在《新大众》报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大众话》栏，署名“理”。

上还把孟德贵扣押了五十多天（调查的时候还未放出），都给以后整党、民主、抽补工作造成很大的妨碍。现在这村子里的问题，虽然暂时解决，可是还有些干部，坚决要证明贫农代表张三元的父亲，在五六年前当过南新庄的伪保长，足见他们仍没有完全取消报复思想。希望领导方面在生产里，继续调解这村的干群关系，以免再有混乱现象发生。

发动贫雇要靠民主*

从各地来信中看，现在的发动贫雇工作，下手时候有两种毛病：第一种是多数人没有真正起来，少数能说会道可是不很正派的人当了委员或者积极分子。第二种是因为怕犯第一种毛病，就不敢放手，只是一家一户地访问，十来天才发动起几个人来。

每个村子里，都有一种灵活的滑头分子，好象不论什么运动，他都是积极分子——什么时行卖什么，吃得了谁就吃谁，谁上了台拥护谁。这些人，有好多是流氓底子，不止没产业，也不想靠产业过活，分果实迟早是头一份，填窟窿时候又回回是窟窿。可是当大多数正派贫雇农还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偏好推这些人出头说话，这些人就成了天然的积极分子。这些人也不是真不能改造的，不过想改造他们，只有多数的正派人都被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都有了民主权利，有了组织力量，那才能有效；要是大多数正派人都还没有当家作主的时候，就依靠他们出来作积极分子，或是让他们当了领袖，他们更会把别人踏到脚底下，工作一定要搞坏。因为怕他们当权就不敢放手发动与组织贫雇，不止收效太慢，赶不上工作需要，并且仍然防不住这伙人钻进来。他们这些人，在正派人中也有一些私人朋友。假如你十几天功夫发动几个正派贫雇，而这几个人中，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新大众》报。

有一个人介绍了这样一个朋友进来，其他几个人觉着自己惹不起人家，不敢向你反映真实情况，这个人就仍能被你认为正派人。要是全村贫雇共有一百个人，一齐发动起来了，其中有几个这种人，大家对他们提出意见，这时候纵然他们各人都有个别的私人朋友，谁也不敢当着大多数人面前来包庇他们。

从另一些村子里的工作经验中看，个别访贫雇也是必要的，不访不容易了解贫雇的标准情况。可是必须先作公开宣传，再去个别访问，访问过几户之后，再依靠他们去串连。在三五日内串连起大多数来（差不多是全体）。这时候虽有不正派的人混进来也不怕，因为比起全体来他们一定是少数。在建立贫农团或农会组织时候，每个人都要进行一次自我批评，比一比劳动，比一比行为。作这一步工作，要注意发扬民主，绝对禁止少数人操纵会场。只要能叫多数人说话，不正派的人纵然能说会道，和别人一比他就不得不低头了。这一步工作作过后，就可以选举委员。这时候，再把告农民书上规定的委员条件一宣布一讨论，那些不正派的人就不容易当选，纵然有个别的人误被选出，不久也会被群众发现。

（附：在老区发动贫雇，要连贫雇出身的新中农发动在内。）

“自愿”不是“自流”*

互助组以自愿为原则，是说“谁的思想打不通，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不是说自愿就不要领导。最近有些地方，干部和群众都把自愿解释错了，劳力强的只愿意跟强的碰组，有牲口的也只愿意跟劳力强的碰组，把几分劳力或者半劳力的人都推出来，人家情愿按把式定分，等价交换也不要。全村只组织了几个好汉组，这些好汉组，不只编不成队，连个小组长联席会也开不成，生产委员也管不了，一管就说干涉了“自愿”。因此定什么计划也是空的，什么数目字也只能到事后来计算。虽然有委员、有小组，事实上对生产毫无帮助，有没有都一样。

像这样想组就组，不想组就罢；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叫做“自流”。“自流”就是没人管，弄成啥算啥。这完全不合乎上级提倡互助的精神。借着“自愿”的名，弄成了“自流”，实在不成话。互助的好处，就在组织起来，用合理的分工，避免劳力的浪费。像春季送粪，只要掀得下驮子来就行。要是家里没有这么一个人，不互助起来，一个好小伙子，就得赶上驴把十分工磨了；要是家里只有个半劳力，互助起来，春天送上一个月粪，换下的工就够犁种用；不互助起来，到了犁种的时候自己干不了。又像夏天割麦子与种晚秋，挤到一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新大众》报。

块的时候，互助起来，一个好种家，架起一张耒来，给这家种罢，接着就给那家种，一个驴一个人一天能种十五亩（或多到二十亩）。他光管种地，麦子自有组里人给他割。各人都按活算账，谁也不吃亏；要是不互助，不论你有三亩或者二亩地，都得扛耒赶上驴去种一回。好几户合起来一算，说不定要多误几个工。要是有好劳力的和有牲口的怕吃了亏，只要在等价交换和定分上求得合理，问题就可以解决。现在把互助工作搞得自流的村子是半劳力有劲用不上，好汉组有工省不下，按全村计算，要少打多少粮食？这还不算，现在仍是战争时期，参军的、参战的、支差的，他这次走了，你不管，你再一次出差，他不管；这一次把他的麦子长焦了，小苗长荒了，再一次把你的谷子长沤了，麦地误犁了，看看是坏了谁的事？听说内邱一个“自愿自流”的村子，财粮主任到区上去开会，自己的麦子长焦了且不讲，他和另一个人合伙给一家军属代耕的地，人家那个人只管了一半，把这一半还给他留着，军属对他很不满意。这种自流办法如何得了？要是有了紧急差务，出个百把人，走他月余四十天，难道就荒上几顷地吗？

互助的正当做法，仍得由生产委员去组织领导。上级提出的“自愿”，只是怕你去组织人家时候，人家实在不愿意就强迫人家，并不是叫你不管事，弄得好多愿意入组的也找不到门路。

这种问题，多出在新区或半老区，因为没有经验，才对“自愿”有了糊涂的认识。因此，除了希望领导人好好领导以外，还希望老区的同志们，多多介绍一些互助的经验，多多介绍些互助组成立和改造的历史。

从寡妇改嫁说到扭正村风·

壶关常家池岱云来信说：“常家池常三则，去年病死了，他妻愿意改嫁给徐家沟徐海兴。这寡妇要和徐海兴到区上登记，常家池干部不给写介绍信，表面上说‘商议商议再说吧’，背地里说‘咱村多少光棍汉，简单给她写介绍信到外村结婚？倒容易！’这样说，自然是不让寡妇出村了……”。

从这封信上看，常家池的封建统治，还利害得很。除了封建社会，一个寡妇要改嫁一个男人，不论什么人都干涉不着，村干部还要跟谁商量？有什么商量头？不论你村有多少光棍汉，与人家什么相干？

常见有些村干部到区上訴苦，说群众对他的意见多得不得了，叫他领导工作，他消极抵抗，要求区上给他撑腰。这里边固然有一部分好同志，在发扬民主的风气中间，被错误大的人连累了；可是也有许多错误大的人，光说群众那一面，不提自己这一面。像常家池阻止寡妇出村的这个村干部（或者不止一个人），真正叫群众给他提起意见来，恐怕不会很少，因为对一个人的终身大事还是想左就左想右就右，比这小一点的事，自然是可以大胆放手胡干了。

反封建既然是我们革命干部的任务，学封建自然就成了大错，你想把这作风保存到什么时候？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新大众》报。

每个村子里的干部都有正派人，希望这些正派同志们，遇了事出来说个公道理，免得让他们那些不正派人横行霸道，最后把你这正派人也染赖在里边。如果你们是多数，合理合法跟他们开支部会或干部会，和他们那些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如果你们是少数，也应该常和上级反映真实情况，要求上级帮着你来把村风扭正。最后希望常家池的正派同志们先来做一些，起个模范作用。

躺倒不对，起来怎干？*

——村干部思想问题

今年三四月间，雨水不缺，地里的三种要紧活儿挤到了一块，又要锄苗，又要割麦，又要耩晚秋，哪头赶不上趟，哪头就吃不上了。在这时候，村里领导生产的人，正应该好好起作用，先作出按家计划，再作出通村计划，把人力畜力都调剂得很适当，才能保证这个阶段的生产按期完成。可是有些村子里，纠缠工作还没有作，生产仍没有组织，或者只有个空架子，错斗户没有补偿，地主也没有安插，他们想生产也没有地。没劳力的，只有半劳力的，没牲口的，有地也做不合(念格)节。只有一个人手的虽然劳力很强，也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村干部和党员们，因为怕群众提意见，啥也不敢管或者不想管，就叫村里的生产这样自流下去了。

区上为了搞生产，不知道召开了多少次村干部会议。这些村子里的干部和党员们也去参加，可是人家别的村子都解决了问题，他们村子里的问题却还拖着。你要去打通他们的思想，他们却尽有理由。他们说：“群众要民主，干部说话人家谁还听？不说领导，就连个会也开不起来。”他们说：“群众对咱提的意见那么多，现在是把整党搁住了吧，将来再整起来，还不是该咱倒运？少作点工作就能少找些麻烦。”这话也不尽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新大众》报。

是假，只是太夸大了些——有三分就说成十分了。

不过主要问题不在这里，主要问题是有一部分人思想上不愿意站起来。愿意站起来的人也受了他们的传染，跟着他们做了尾巴，大家成天垂头丧气，光想困难不想办法。在群众方面，今年春天确实有些村子里，把民主认识错了，认为民主就是不要领导。不过后来代耕也没人管了，打起架来也没人问了，互助组也没人成立了……大家很快就觉着这样不行，多数人希望干部重来领导。村干部和党员，如不趁这机会恢复工作，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就是情愿看群众的笑话。可是这一部分人就能这样看下去，一直看到群众的麦子焦了割不起来，谷苗荒了锄不出来，地干了耩不上——看着叫他把个好年景耽搁了，这还不该好好检讨一下吗？

只要思想上愿意主动解决问题，一切困难都难不住人：黎城北流村是个做过填补的村子，在今年春天整党时候，党员争取得主动，没等群众提意见，自己就先检讨了个彻底，群众再没话说。到成立农代会的时候，不论哪一组里都想要个党员。他们说：“没有党员没个领路的。”赶到抽补时候，支部就领导起工作来了。涉县甘泉村，是个没有做过填补的村子，今年春天，贫雇小组给干部提意见，干部躺倒不干了，后来思想上解决了问题，主动领导生产，组织群众打了一千五百多只狍子，如今得到全村人的拥护。从这两件事看起来，只要党员、干部主动想解决问题，群众是拥护的。要是思想上不想站起来，群众见他跟自己不是一条心，过个一年半载，恐怕就想站也站不起来了。

不要以为群众对自己提了意见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意见如果是正确的，那一定是该咱自己负责——本来早就有意见，只

是从前不敢提，现在提出来还不比闷在他心里跟你记一辈子仇强吗？只要你愿意主动跟他解决问题，这仇恨不是就消除了吗？意见如果不正确，那也不怕：只要你能先把那些正确的意见平心静气答复了，叫大多数群众心平气和，把那些不正确的意见留在后边，群众那时候就会替你把他顶回去。

介绍一本好小说——《高乾大》*

《高乾大》是欧阳山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写的一本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小说。书中的故事是这样：——

一九三六年，任家沟村开了个合作社，因为主任任常有不懂群众需要，办了五年，不止没有发展，还弄得亏了本。他每年依靠区上的行政命令，强向群众摊派股金，遭到无数群众的反对。副主任高生亮（就是高乾大），是个挑货郎担子游乡的，了解合作社与群众的矛盾，一心要改变一下任常有的主张，得不到任常有的同意。

他们请示区公所，区公所的意见也不一致——区长程浩明死啃教条，支持任常有，区委书记赵士杰群众观念很强，同情高生亮，争论了两个月，最后赵士杰主张让高生亮照他的计划试办一年。任常有不满意这个决定，赌气请假休养。他的女儿桂花原和高生亮的孩子拴儿订过婚，他强迫桂花和拴儿解除婚约，作为对高生亮的报复。

高生亮得到试办的允许后，发展得很快。开头群众因为有病没人治，要求开个医药部，高生亮就从这件事上着手，得到群众拥护，扩充了好多股金。以后又从包缴救国公债、运盐等事情上，把个合作社扩大了好几倍。

不过高生亮的试验也不完全顺利：任常有的一把子（一个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七日《人民日报》。

采买兼保管主任、一个乡长和一个乡书记)时时和他找空子闹气。巫神郝四儿,因为合作社有了医药,影响了他装神弄鬼的生意,他便和一伙巫神们联合起来,向落后一点的人们散出谣言,鼓动退股,并且假造鬼神,闹得一村不安。区长程浩明虽是个正派人,因为思想上有偏差,无形中听信了坏分子的话,给高生亮一些冤枉批评。再加上任常有把他女儿嫁给巫神郝四儿,高生亮的孩子与她割不断旧关系,被郝四儿抓住把柄,威胁着他参加弄鬼集团,从内部捉弄他父亲。就这样内外上下夹攻,把个高生亮捉弄病了,最后又差一点死在郝四儿手。不过高生亮斗争性强,虽然在精神、肉体上都斗得精疲力竭,后来总算得到胜利,把反动力量都打垮,给合作社开出一条新道路。

这故事的简单轮廓就是这样,详细情形,只有读了原书才能知道,因为全书十六万字,绝不是几句话能包括完了的。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虽在解放区到处遭到反对,可是据我所见,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品能象本书揭发得那样彻底。书中的区长程浩明,便是个正牌子主观主义兼官僚主义者。他有两大特点:第一是不要情况——不只不调查研究,别人供给他现成材料他也不要,他只凭他一套现成公式处理问题,而这一套现成公式就连狭隘的经验主义也不是,不知是从哪本书上记来的还是从哪里听来的。第二是不要创造性——他认为凡是脑子里没有的,就都是要不得的。

上边有买什么的,下边就有卖什么的。有了程浩明,任常有的一把子人就可以发卖教条,压迫高生亮,郝四儿的一把子人也可以捏造事实尽量破坏。正因为他不要情况,没有养成分析情况的习惯,任何假情况来了,在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在他

就还能信以为真。如乡长弟弟罗志旺的老婆，胎儿死在肚里，合作社的医生给他用药打了，身体还没有复原，罗志旺又请巫神郝四儿给她医治，郝四儿用柳条鞭子活活把她打死，乡长报告了程浩明，说是合作社应该负责，程浩明一方面虽然批评乡长不该迷信，另一方面还要叫高生亮批评合作社的医生。又如巫神白从海、杨汉珠，结合了七、八个捣乱分子到合作社柜上故意闹气，拆合作社的台，乡长罗生旺却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说：

“……这回事情，乡上没有调查研究，不好表示意见。不过既然‘老百姓’有了‘呼声’，合作社就该好好考虑。‘老百姓’对合作社有意见，乡政府和区政府都是知道的……，‘老百姓’应不应该对合作社有意见，我想是应该的……‘老百姓’应该提出自己的要求……”

这样有意支持着坏分子和高生亮打官腔，已经是由闹意气发展到故意破坏的程度了，可是后来闹到区上，程浩明又用以下的话把事情推开。他说：

“……你们能够对合作社提意见是好的。任家沟合作社是民办合作社，你们提出意见来，合作社自然会依照你们的意见解决！……”

这话虽然比乡长说得和平一点，可仍是不解决问题的和平官腔，仍是有利于巫神白从海等七、八个人的，因此那七、八个人都胜利地欢笑而去。

这些事，在程浩明主观上还以为是听取群众意见，而真正的大多数群众意见他没听见过。在他眼前的高生亮，可以说是任家沟一带群众意见的大海，可是程浩明偏要用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两贴膏药把自己的眼睛贴起来，诚心诚意当骗子。

有点创造性的人们，一碰到程浩明一类人的领导之下，如无其他好条件，管保可以闷死。象高生亮这样能掌握全部情况热心为人民服务的人，要不是斗争性特别强，早在这夹攻中被害死了。

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曾经大家反对了好几年，可是只能说比过去少了些，却并没有彻底肃清。在目前的大生产中（连农业生产在内），尚遇到只有花样和数字的工作，并未深入研究其实效，这恐怕也是程浩明、任常有式的思想方法作怪，我觉着大家都读一读本书，可以避免走任家沟的弯路。

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本书的中心主题。此外还附带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了解问题，一个是对反封建迷信的重视问题。这两个问题在本书中都得到合理的解决。虽然有团总式的（地主武装领导人）财主也给合作社入了点股，但他们并不能起到什么操纵作用，合作社还是群众的。

关于本书的内容，我因为读得粗疏，只能发表这点观感。大家读了原书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在写法上，我特别赞成作者描写现实的本领。象写程浩明，一方面写出他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写出他主观上是诚心诚意在那里为革命。同样，写高生亮，一方面写出他用全副精力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写出他的事务主义和迷信。他把这两个人的特长和特短，常常表现在同样事件中，使人感觉到缺了哪一方面也不象个真人，两个人都是好心好意但却都坏了点事。只有这样才不是伪造，也只有这样才使人感到改造自己之重要性。至于结构的完整、描摹的细致、行文的优美等，也只有读了原书才能享受到，我也就不多作介绍了。

对改革农村戏剧几点建议·

改革旧戏问题，现在已为文、艺、宣、教各方面所重视，我也想趁这机会，对农村戏剧改革运动，提出一些建议。

按目前农村戏剧活动（不包括广场秧歌），大致可分为两类地区：一类是早已有人作过工作的戏剧先进地区，其余则为一般地区（包括虽有工作而尚未得到显著成绩者在内）。这两类地区，因为现有的基础不同，作起改革运动来就得有不同的计划。我想先把我所见到的两种不同的基础介绍一下，然后再提具体的建议。

一般地区，历史上就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戏曲组织：一种是在各个农村轮回卖戏为职业的，一种是本村好戏的人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娱乐的（后一种除个别地区叫“自乐班”以外一般都叫“会”）。他们的活动都有季节性：职业性的每年都可以卖十个月戏，阴历十月以后，露天的戏场冷得站不住人，便不得不停业；娱乐性的只在每年正月十五前后或本村、邻村有庙会的时候才出演。以唱戏为职业的人技术较高，于每年停演的两个月中，常有被娱乐性的戏剧组织聘为教师的。这些戏剧组织，又可分为大戏小戏两个类型——一个大戏班子，要用到五、六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而小戏班子往往在三十人以下。他们演的戏也不一样——大戏多演的是历史故事，小戏则演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华北文艺》创刊号。

是家庭故事。这就是一般地区农村戏剧旧有的基础。这些基础，不论在组织上，在戏剧本身上，都有很不易克服之弱点：职业班子，在组织内部，存在着习以为常的封建制度——经济上有差别很大的等级制、有剥削性的师徒制、有互不关照甚而互相幸灾乐祸的分工制。旧艺人个人方面，由于旧社会不给他们以平等地位，造成他们对自己人格的不重视，苟且求得一点小便宜就算，根本不想争取在社会上做人。娱乐性的戏剧组织，在个人方面虽无这个缺陷，而在组织上也或多或少受他们那个传统的影响。说到戏剧本身，那更糟一点——在内容上，不论大戏小戏，为帝王服务的政治性都很强，哪一本戏没有封建毒素都“管换”。只有在形式上轻看不得，不论大小戏，也不论哪种地方调子，都各自有它完整的一套。

抗战以后，有些地方，有人在这基础上做过些长期而艰苦的工作，使这个基础有个基本的改变，成为戏剧运动先进的地区。就我所见到的，这些地区对一般地区原有基础上弱点的克服，都有很多成绩和经验。他们改造过人，改造过制度，改造过戏。经过改造的旧戏班子（现在都称“剧团”），旧艺人政治上、文化上都有了相当的进步，再不把自己当作下人看；制度上有了新的领导系统，正常的会议制、新待遇制、新分工制、新学习制（包括小孩子的技术学习在内）。说到戏剧本身，内容上已经能反映一部分现实生活，形式上也开始打破旧套子，只是还不见得完整。你叫他们谈起改造的经验来，每个剧团或每个问题，差不多就可以写成一本专书（不在本文范围，暂不叙及）。这就是先进地区现有的基础。不过他们也有他们不易解决的问题：长期作这工作的同志们，其出身往往都是乡村知识分子兼戏剧爱好者，或有志改革的旧艺人。这些同志们都有

无限热诚，可惜限于自己的政治文化艺术水平，不能使戏剧本身更向前推进一步（指一般情况说），有时自己也因此感到苦闷。现在存在的问题：在创作剧本方面，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创作的基本知识，只能把现实故事编排成戏，尚未能更经济地反映更广大的现实生活。在形式方面，能把旧形式中不适用的部分加以淘汰，尚未能补充一些新的东西，致使其构造不完善，无论领导同志或一般业务上的同志，都感到这改造了的形式似乎有点不得劲，可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两种地区也有它相互的关系。在我们解放区，哪个角落里也不是自甘落后的，在戏剧上，一般地区与先进地区接触，或多或少总要跟先进地区学习一点，因此也或多或少在原封不动的旧基础上沾染了一些新风。一般地区有些竭力从新的剧团，或同一先进地区中后来者要向先进者学步，无形中建立了一种见习的制度，常戏名为“留学”，即后起的剧团派人到先进的剧团中学习个较长的时期，然后回去改革自己的剧团。这种做法现在虽未普遍，却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办法，值得大大提倡。

两类地区两种不同的基础以及二者之关系既已说明，以下我便提出我的建议：

一、建议领导方面大量配备干部。据先进地区的经验，哪县舍得给县府直接领导的剧团派好干部或多派干部，哪个县的改革成绩就大。现在因为两种地区的基础不同，则派出干部也应有分别：一般地区，重点应放在改造旧艺人和改造旧的组织领导制度上，因而派去的干部应是长于组织领导的人材（不过对戏剧也不能太外行了）。先进地区，重点应放在戏剧本身的提高上，因而派出的干部应是专门的戏剧人材。

二、建议被派去的同志们，重视当地原有基础。不论赴哪

种地区工作，到达之后，都得先把那地方原有的基础毫无成见地加以分析研究，作为工作的依据，忽视了这点便不易得到当地的从业者（即工作的对象）的信任。曾记得某同志给一个小戏班排戏，她要拉丝弦的直接看她手指头的指挥，打鼓板的便呆坐在椅子上发愁，这便是忽视自己在什么基础上做工作之一例。政治上、文化上、艺术上修养有素的同志们，自然有许多最宝贵的东西值得农村戏剧从业者学习，不过农村从业者向来既是靠戏吃饭，其独到之处，也有许多值得作戏运工作的同志们重视的，千万不要抱“放下你的一套来学我的一套”之痛快想法。

三、建议推广留学制度。这个剧团赴那个剧团去留学，所见到的是那个剧团的全部活动，比别人介绍的具体得多。我建议各剧团所属的行政领导机关，打听有比自己好的剧团，可以派人进去跟人家学习，后起的剧团可以派人到先进的剧团里去，先进的剧团可以派人到更高级的剧团（如华北区的人民文工团或各行署领导的较高的剧团）里去。这样做，也抵得住增加干部进去。

四、建议各先进剧团多向外介绍自己的经验。各先进剧团既已从十年八年的摸索中取得了成绩，如果加以整理、介绍出来，一般地区后起的剧团，便可避免走许多弯路。

五、建议先进的职业剧团，仍与娱乐性的村剧团保持师承关系。改造后的新职业剧团，在停演期间，除受县里的集训外，仍可到各村当教师。

六、建议地方行政机关，明令改定农村演戏场数。这一小问题，是向来农村戏剧改革者最感头痛的事：按旧习惯，农村里演戏，每天是两个日场一个夜场，共要演十一、二个钟头。

旧戏班子，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就是演戏，所以不感到有什么问题；在改革中或改革后的剧团，每天要有开会、排戏、研究、学习等事，非取消一个日场实在挤不出时间来。有些剧团迫于需要改为两开场，而其它不改革的剧团仍是三开场，群众因此不欢迎改革中或改革后的剧团。这习惯，固然也有个别想出个新办法的（暂不介绍），但总不如明定一下使两开场成为合法的。

这就是我所要提的几点建议，提出来以作各有关方面的参考。

也算经验*

近几年来，有些朋友们，要我谈谈写作的经验，可是我一次也没有谈。一个并非专门写作的人，写了几个小册子，即使有点经验，也不过是些生活和其他工作中的经历，作为“写作经验”来谈，我总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又有几位朋友要我谈，我用上边的理由回答了他们，他们有人说：“那些‘经历’也可以谈谈。大家既然要你谈，你要太固执，人家就要误会你是摆架子。”好！谈就谈谈吧！

先从取得材料谈起：我的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因为我的家庭是在高利贷压迫之下由中农变为贫农的，我自己又上过几天学，抗日战争开始又作的是地方工作，所以每天尽和我那几个小册子中的人物打交道；所参与者也尽在那些事情的一方面。例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我父亲的缩影，兴旺、金旺就是我工作地区的旧渣滓；《李有才板话》中老字和小字辈的人物就是我的邻里，而且有好多是朋友；我的叔父，正是被《李家庄的变迁》中六老爷的“八当十”高利贷逼得破了产的人；同书中阎锡山的四十八师留守处，就是我当日在太原的寓所；同书中“血染龙王庙”之类的场合，染了我好多同事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

* 这篇是《赵树理选集》的序言，曾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染到旦边去……

这一切便是我写作材料的来源。材料既然大部分是这样拾来的，自然谈不到什么搜集的经验，要说也算经验的话，只能说“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是两个取得材料的简易办法”。

再谈谈决定主题：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道以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

语言及其他：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与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可是一带出那等腔调，立时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鸡叫”“狗咬”本来很习惯，何必写成“鸡在叫”“狗在咬”呢？至于故事的结

构，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我以为只要能叫大多数人读，总不算赔钱买卖。至于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我以为那是另一问题，不过我在这方面本钱就不多，因此也没有感觉到有赔了的时候。这些就是我在运用语言和故事结构上所抱的态度，也可以算做经验。

我所能谈的经验只此而已，至于每个具体东西的写作过程，都是普普通通不值一谈的，因而也就不多谈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

会 师 前 后·

七百余人的文代会即将在故都开幕，这是中国文艺界空前的大会师。

会师之前，虽然大家都在艰苦作战，但正因为各有“艰苦”，仗都打得有点不得劲——在蒋区因为有“蒋”匪那样一批“管”家（中间也并无一段因抗日而不管），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得住他们那伙镰师，咱们就只好钻在“地下”。这时候咱们戳空子固然要打，可是打得不妙了就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解放区虽说没有那种顾虑，可惜因为当时蒋管区很大，把咱们“管”在几个格子里，虽在“地上”，也很难打出圈外。总之：那时候的仗都不好打。如今咱们的武装部队，撑破了原来的格子，在全国范围内到处会了师，“文装”部队之一的我们，也就得到这会师故都的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一大喜事。

会师不等于完成任务。武装部队会了师，正好彻底消灭敌人的武装；同样，文装部队会了师，消灭敌人的文装（他们遗留下的封建思想与殖民地思想）也须彻底，而且这种仗也只有文装部队才能打，所不同者，是人家的任务眼看快要完成，而我们的任务似乎还得个十年八年。要说我们过去的仗打得有点不得劲，那末会师之后，正是我们打“得劲”仗的时候，只要好好打，我们可以预祝彻底胜利。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文艺报》第九期。

农村剧团的地方性与农村性*

最近又一度看了人民剧团与光明剧团的演出，使我想到了农村剧团的地方性与农村性。

这两个剧团都是从地方秧歌戏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在晋冀鲁豫太行军区的农村戏剧运动中说来，他们的历史较久（仅次于太南的胜利剧团），经验很丰富，创造性很大。他们都能以自己创造的形式（是秧歌、旧戏和话剧三种成份的混合形式）表演当前的现实内容，因而都很为当地地方政府所器重，为当地群众所欢迎。可是近一年来，他们因故离开了生根的地方，使他们在发展上受到了几点限制：第一、因为有些人不愿离开地方跟着剧团走，分散了一部分人力。第二、已经减弱了人力的剧团又离开了地方，因为语言、歌调和风俗习惯等不为新到地区的观众熟悉，就不能发生充分应有的效果。第三、不熟悉新到地区的环境，随时随地搜集材料创作新剧本，不如在本地那样容易。第四、为农民演的戏，不一定合乎非农民观众的口味。因为有这种种限制，使他们的进步赶不上他们自己与观众们双方共同的要求。

从上述的各种限制看来，有这样两个问题值得研究：农村剧团应不应局限于一定的地方一定的观众？使他们能起作用的

* 原载《农村新文艺运动的开展》，一九四九年武汉人民艺术出版社编选，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圈子放大一点是不是也算一种提高？

从农村戏剧运动上着眼，以先进地区的成绩作为示范来推动落后地区是必要的，所以一个好的农村职业剧团，应尽量扩展其出演地区。按晋冀鲁豫边区说来，太行、太岳两军区的农村戏剧运动开展得相当普遍，使传播封建毒素的纯粹旧戏旧秧歌的市场大大缩小，而河北平原或接近河北平原的地区则仍是旧戏占着正统，到处用满清时代统治阶级所批准的剧本来教育着我们新时代的人民，虽有些有志改造旧剧的同志们在那里多方努力，可是这也是一种社会风气，非少数人力在短时期内所能转移，这就需要有丰富的改造经验和成绩的农村职业剧团逐渐扩展到他们的附近来影响他们。

从戏剧的一般作用上着眼，农村剧团不必把观众局限在“农村”的圈子里，因为我们解放区的部队、机关，大部分驻在农村，而他们自己的剧团也不多，依然要看农村剧团的戏。但既然是农村剧团，其主要的观众仍是农村人为多，所以在剧本的创作上和演唱技术上，仍应使其适合于农村，只要真正作到好处，也能为非农村的观众（如机关部队人员）所欢迎。军区文工团去年在邯郸演出广场剧，观众在马路上跟来跟去挤得水泄不通，便是一例。

能使演出的地区和观众范围扩大，是剧团本身提高的标志之一，不但是客观的要求，也是农村剧团（尤其是农村职业剧团）主观的愿望。可是这种扩大，仍得根据地方与农村的特点逐渐往大处扩，否则效果不大，本身还要受到损失。如人民剧团与光明剧团原来都生长在山西的襄垣和武乡，后来演得好了，走到河北的武安、涉县，仍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可是人民剧团归了后勤部走到人地生疏的新解放区邯郸，就感到诸多

不便；光明剧团归了太行行署，机关人员看起来就觉着不很得劲：这便是脱离了地方与农村的基础造成的结果。

现在人民剧团又回了襄垣，预料没有什么问题了，而光明剧团留在太行行署会不会还有问题呢？我以为即使有也不会很大。这剧团在太行行署是归教育处领导的。从领导机构上看来，他主要的任务是在于社会教育方面，在于为所属各地的农村剧团示范，借以开展各地的农村戏剧改革运动，而给本机关及各直属机关人员演戏，仅仅是个附带的任务。光明剧团所演的戏，在太行区除了豫北、冀西、晋中等边沿上几个少数县份，其余的地方都已看得惯了，地方性的限制不大；既然为了给各地的农村剧团示范，农村性也不坏事；虽然给机关人员看来不尽合适，却也不一定完全不合适，况且一年也轮不着看几次，迁就一点也就过去了。请原谅这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

至于将来他们会不会把出演地区和观众范围更扩大一些来更完满的完成自己的任务呢？那自然会，因为他们日在提高中，其成绩的大小完全看自己的努力和其他方面的帮助。不过有一点要注意：不论自己努力也好，其他方面帮助也好，忽视了原有的地方性和农村性，便是脱离基础的提高，不会比重新成立个剧团更省力。

参 观 之 外 ·

我们这十五个人的小小代表团，这次到了苏联，除参加十月革命纪念典礼外，承主人的招待，引我们参观了许多好去处。在十余天的逗留中，我们每天起来忙到晚，迎接我们没有见过的新事物。不过我是个第一次出国的人，既不通外国语言，又没有外国常识，很不容易把我所参观过的新事物介绍出来。好在我们十五个人中出过国的占大多数，我说不出的不愁没有人说，因此我不妨说说另一方面——以一个中国老百姓的眼光，叙述一下我所见到的苏联群众生活。

我是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对农村兴趣比较大一点，早就想看一看苏联农民的生活，可惜这次不凑巧——一来是冰雪满地的时候，二来莫斯科附近不是农业区域，所以没有接近农民生活的机会，只不过在火车、汽车、飞机上见到几点迹象。这些迹象虽仅仅是东一鳞西一爪，也可以说明苏联农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这老百姓眼光看来也羡慕得很：在飞机上，看到大片的田地，虽然没有庄稼，还看得出用机器大规模耕种的遗迹。过了西伯利亚，就有种着小麦的农场（不过不是每个农场都有，可能不是主要产麦地方），都是很大的整块，按那附近的房子大小作比例推测起来，每块都在百亩以上。这些麦田上，往往用播种机种成些奇怪的花纹——有的种个圆圈，有的种个螺旋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形，有的种成一两个外国字，显见得都是整块种完了之后又加上去的，从此也可以想到他们当日播种时候的兴致。农场上的房子排列得很稀，但很有规律，可以说是从一个整个计划中建筑成的。

在火车和汽车上，每当车身穿过一丛丛的农村小木房，都使我觉着新鲜：他们的房子都是木质的，但不是用木板而是用整段的树身子砌成的。房子的排列也与中国农村不同——没有用四个房子碰起来的方块院子，都是在篱笆中各各独立的。小一点的房子是单独的房间；大一点的分隔为几个房间，向四面开着门窗。门窗的构造虽然简单却也很精巧，可惜白天玻璃反光，晚上又都关着窗帘子，看不见里边的陈列。有一次，遇到了一座背光的房子，看见里边的桌子和床子都罩着洁白的布单子，可惜车走得太快，一晃就过去了。这些房子大部分有水电设备，这是从小型水塔和通进去的电线可以看出的。房子外边，常搭着长串子洗濯过的衣服，这些衣服都很干净漂亮，没有破破烂烂的，可以说明他们日常穿的衣服好、多，而且洗濯得很勤。也许是因为冬天的缘故，不常见有人在房子外面活动，只能见到些上学下学的儿童，这些儿童们，精神都很饱满，几乎无例外地都穿着皮大衣。

这一次我看到的农村现象就仅仅这一点点，以下我再谈谈在莫斯科见到的群众生活方面。

我是个怕冷的人，于出国之前，从地理上推测莫斯科要比北京冷得多，所以买了好几件御寒的衣服，准备和这冰雪世界英勇地斗争一下，可是一到了莫斯科，就知道我这种精神准备完全落了空——火车、汽车、飞机、电车，旅馆、博物馆、工厂、学校、戏院，几乎是除了街道上，任何地方都有暖气，拿

去的衣服，都变成了累赘的行李。

街道上的干净，也是我不曾见过的。我有个吐痰的毛病，可是莫斯科的街道就纠正了我这个习惯，因为看见地上没有比痰更脏的东西，就不好意思吐了。

街上的行人，除了极少数正在工作中的人，男人没有不穿大衣的；妇女没有不穿裙子的，而且不论男女，衣服都很干净整齐。

我所见到的行业中，有男就有女——固然有些行业男多于女（如司机），但另一些行业则女多于男（如学校、商店），足见他们的妇运工作作得很彻底。

群众的文化程度一般都很高：每个戏院每晚都演奏着高级的戏剧或音乐，门票都是先期购买。他们并不为了招待外宾演什么特殊的好戏，这种普通售票的戏，在我们看来，都已经成了特殊的好戏了。

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都是兴致勃勃的。十月革命节那一天。群众都排成队从红场中走过。在刚到红场之前，因为人太拥挤，总得等待一小会。他们在这等待中，也不甘寂寞，青年们就趁空子各自练习舞步，成人有时候也参加。不知谁的旗子上落下一朵红花来，两个青年把它当做思想的足球用足尖争来夺去，接着好几个成人也参加进去，好象形成了个足球队。这种兴致，在中国只有过新年才能见到，但也只是孩子们才有，而他们的成人也活泼得象孩子一样。

以上这印象，虽然都只是得自十多天中的浮光掠影走马看花，但已足使人陶醉，故不惮繁琐写了出来以表示我的羡慕之情。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谈群众创作·

我在太行山里的时候，曾遇到两次和大众创作接触的机会：一次是一九四四年春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动了个农村娱乐竞赛征文，叫我去看过一个多月的稿件；又一次是我和几位同志办过个《新大众》小报，我当了个把月编辑。来到北京以后，这种机会我又遇到过一次，那就是去年十月间看了几场工人戏剧竞赛的演出。

在好多群众作品中，我见到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不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是多样性的。第二、他们写出来的具体生活，有好多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事先不易体会到的。看了他们的东西，使我感到自己接触的社会面太狭窄、肤浅。

自然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在群众文化程度尚未提到一定高度的条件下，凡是我们的见得到的事物，容易比群众写得出来，否则我们文艺工作者便没有什么作用。可是从客观条件上说来，有些地方我们不能不比群众所见的狭窄肤浅。社会面是很复杂的，而群众正是这些复杂面的直接组成者。我们文艺工作者，不但不是每个角落都有，而且也不一定直接参加群众的生活，如何能不比群众所见狭窄和肤浅呢？即以我自己为例吧：一不生产，二不打仗，三不出公粮，四不支长差，五不养家口，六不度灾荒……所有的社会麻烦，都直接麻烦不到我头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〇年二月《文艺报》第一卷第十期。

上来，即使自命为感觉比较敏锐一点（待考），可是能摆到桌上的菜只有那么几味，其余不常吃到的东西，就不容易品得仔细，至于不曾见过的食品，那就更难猜测得出是酸的还是甜的了。

在我看征文稿件那一年，太行山里流行的文艺作品，有《诉苦翻身》、《劝夫参军》、《杀敌英雄》、《劳动模范》等几个类型。这些自然都是值得写的，但只有这几面构不成个社会，可惜大家都不易跳出这个圈子。及至看了些群众写的剧本，我才又发现了些我们的笔墨还不曾走到的新世界。例如山西平顺县南庄沟村有个人叫王元，写了个小剧本叫《秦富宝放牛》（已被选人人民文艺丛书），里边写到放牛孩子过去的苦处，写到当时他们十二个村子的洋歌比赛，写了些本村人物小评，轻轻悄悄反映出土地改革后人民的快乐。又如山西辽县人写了个小剧叫《神虫》（也见前书），写他那地方遭了蝗灾，大家正打蝗虫，有个老头却在那里用符咒来镇蝗虫，最后看见自己的符咒不顶事，就拿着画了符的木板参加到群众队伍里打起来，也是没有费很大气力就写出一个老年人的思想转变。这些都是以说明群众各人有各人的社会生活圈子，合起来比我们的生活圈子大得多。

根据我自己那一点点关于群众创作的经验，我觉得上述的缺陷，是可以发动群众创作来弥补的，因而我建议各级政府的文化机关和各级各种文化团体，联合地、有计划地、经常地来发动群众创作。

假如我这一建议能被采纳的话，我更愿意给作这种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以下的几点参考意见：

一、发动的时候，应以搜集成品为主，勿下令定货。群众

都有创作欲，只要每年能定期搜集、评奖，已经就是发动了。这样的发动，是能和群众的自愿相结合的，因而所得到的作品，在内容上往往是充实的现实生活。我们在办《新大众》小报的时候，每天要收到几十件信件。这些信件中，虽然大半是要我们给他们解答问题，但所叙述的问题原委，往往就成为朴素的、有文艺性的小故事。相反的情况也有：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征文那一次，上级虽然也不是下令定货，但传达下去，群众的了解就不很一致——有的为了迎合工作人员的所好，造了些生硬的故事，其中硬加了些政治口号；有的认为是一种负担，只拿些不关痛痒的滥套子来搪塞，结果虽然也有好的，但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么多。这两种事例，足以说明群众自己要写，就能写出充实的东西来；别人要他写，他便不知该写什么好了。

二、评选的时候，应完全以内容为主。群众因为文化程度的限制，莫说形式的完整与否、有创造性与否不能计较，单就稿子上写的字来说，也是有核桃大的同时也有瓜子大的。他们用的稿纸，不但没有格子，而且也不分大小和新旧，有时候把那一面印的旧书拆开翻过来当作稿纸用，不分章节、不留边沿，黑墨笼统写成一片。我们看稿的时候，假如从这种外观上加以否定，那就几乎没有什么选的了；假如把这些印象置之度外，只从他写的生活面来看问题，往往有好多新鲜的东西。不过这新鲜的东西，在一个作品中也不能求其十分饱满：比方在一个剧本中，有一场是可取的，或在一场中有一两段对话是可取的，那就是收获，就值得给奖。沙里淘金常是沙多金少，可是在沙外没有更丰富的金矿的地方，金还只能在沙里淘，淘得多了也会得到多量的纯金。在形式方面和在内容方面的情况也

有相同之处——往往也有创造性很大的，只是比内容上的收获少一点。有好多内容很充实的东西，其所用的形式比配不上，因此不可列为一条必要的评选标准。

三、评选给奖之后，对选中了的稿子有四种处理办法：

（一）不改或略改一下就可发表的，直接发表了就算了，那是最便宜的事。（二）内容很饱满形式太不像样的稿件，可由负责的人改作一下，不过这种改作要忠于原作，万不可把原作中有用的任何材料改丢了。（三）内容太单纯的稿子，可以合数稿改作为一稿。（四）仅有点滴内容的稿件，可以从多数稿件中把这有用的点滴分类摘录下来作为素材，由负责人把它组织为一个或几个作品。（二、三两项在发表时可以写明某某人原作某人改作，第四项在发表时可以不署原作者姓名）

假如这样作的话，我以为是会得到我们自己作不出来的好作品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否可能，还请大家讨论。

北京人写什么？*

我回国以后，本会要我来讲“苏联近况”，我想这个题目以后是有机会讲的，今天却想谈一谈“北京人写什么”，因为我回北京以后，遇到本会小说组的同志们，曾谈到这个问题，以为老解放区作者下过厂，到过农村，有东西可写；北京人没到过农村，没下过厂，写什么好呢？

其实北京解放以来，十个多月的时间是有不少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时倒不是老解放区的人所能了解的，因此北京人能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不是老解放区的人所能写出来的。我以为北京人写东西倒不必非写老解放区和农村不可。人是社会的动物，是有社会性的，北京人脱离不开北京这个圈子。所谓北京人，不是在北京从小长大，就是在北京已经住了相当的时期，他们不一定是工农出身，但对北京的社会却能各自了解其一部分。这就要说到立场问题了：不论是什么阶级出身，只要从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上着眼，都可以写作，而且不论你写什么阶级也可以，材料是很丰富的。立场两字也不是多么神秘的，立场就是全看你为哪种人打算，如果为大多数人打算，眼光常放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上，就是大众立场。共产党的领袖马、恩、

* 这是作者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从苏联访问回国后在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一次讲话，后来收入一九五〇年四月出版的《把北京文艺工作推进一步》。

列、斯，以出身论，都不是无产阶级，而且当时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就没有研究学问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员中也有出身于地主、富农阶级的，后来肯替大多数人打算，不就成了共产党员了吗？若不是只为个人利益打算，那么什么材料给我们，也是有用的。

北京解放后，领导上指示我们：要把这一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这一点就是为劳苦大众着想的，如果你不站在大众的立场，你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消费城变为生产城是有重大意义的：北京城内是消费专家集中的地方，以前的代表人物是满清的王爷，可是自从皇帝垮台以后，他们的气派渐渐小起来，摇摇摆摆踱鸟的也渐渐不存在了，可是另外有一种老爷又来了：乡下的地主，刮地皮刮得乡村供不起他的消费了，就搬进北京城来，置些房产，盖个花园。军阀政客们下了野，也拿着民脂民膏盖房子买别墅，都以老爷的姿态来出现。有了“老爷”就少不了有“太太”，也少不得有一帮捧老爷的人们，如姑爷、舅爷、表舅爷等一大串——就象《红楼梦》里小红嘴里说得那一些人，姑奶奶、舅奶奶也来了。更有一批侍候这些爷们的人，家里的厨子、老妈子、丫头等男女仆人，外边如旅馆、饭店、舞场、澡堂、古董店等，都专供爷们的享受，许多店铺为了招徕老爷，也都添上洋这个，洋那个，于是老爷家的设备也都洋起来。不但老爷太太们享受，附庸于老爷太太的也都要享受，整个社会都在供养他们，构成这么一个消费城市。这些人也不能说他都不劳动，特别是供应他们衣食煤水车马的干粗活的，每天也是忙得要死，可惜他们的劳动只是侍候少数享福人，没有生产意义。所以这一个城，除了三十多万产业工人以外，劳动者固然还不少，可不能算是生产

者。好了，帝国主义的洋货，也就乘虚而入，来给老爷们凑趣，日子久了，弄得北京顾不住北京，非仰仗帝国主义不可。这也就是领导上要我们把这消费城变为生产城的原因。

北京解放后，十一个多月来的变化很大，外来的人对这变化观察不大清楚，北京人可是一桩桩一件件都很清楚，那么只要换一换立场——不为少数老爷们打算，而为劳苦大众打算，那么各个阶级在这变化中的材料，都是很丰富的。比方拿舞场或商店来说吧，舞场生意不好了，首饰店洋货店纷纷转业了，旅店也萧条了，寻找它的原因就是好材料。这还不过是本人肤浅的观察，如果老北京从你熟悉的人中加以细心体察，什么人进步，哪些人没有进步，象以前大家庭的人，或藉着国民党的人情而做事的人，现在有的进了南下工作团，或是参加生产工作，有的却还在卖自己家中的古玩、字画、皮货，卖掉了改卖落花生、白薯，可是渐渐地也会走上生产的。再如算卦的，没有人去问祸福也会转业的，都是环境使得他们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消费生活，而投入生产部门（王爷、老爷转入生产的也不少），反正这些人谁是主动的，谁就是觉悟的，有便宜的；被动的就是落后的，吃亏的，你身边周围有这么多的模型例子，假如去仔细访问一下，就能得到不少转变过程的材料。

以上所说材料，只要你的立场和观点正确，这些材料写出来都有助于革命，在未熟悉工农生活以前，不一定非写工农不可。我们党员中也有好多是少爷出身的，他的材料就比我们丰富。我写《李家庄的变迁》时写过两种人，一种是半流氓半老爷式的，一种是过去的知识分子，走老爷路线的，当时材料就比较枯窘，因为我没有过过这种生活。写那个参谋长，也只因为我替他当过两星期的差，温过水，端过洗脸盆，才多少有些材

料。你们如果对某人十年八年的经验，那么写出来的题材自然就丰富的多了。所以不管你写劳苦大众也好，写消费者也好，写少爷也好，只要把十个多月来的社会转变经验写出，能够给北京人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便是很大的贡献。

其次讲到改变立场和观点，这一点比较难一些，可是还是那句话，就看你肯不肯把大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了。消费城变为生产城以后，也许你自己的生活首先受到一种约束，比方你从前住过北京饭店，那里设备俱全，很多事用不着你自己动手，现在你却住在一间小房里，没有各种设备，没有人侍候你，也许生出如今不如从前的心理，可是这种心理不是为了大众打算，还是你立场不明确，反过来你要肯为大众打算，就不会这样想了。工农大众就从不这样想，他们连床铺、火炉都许不全，可是他们为了将来北京每个人都能享受好的设备，有好的生活，他们就觉得特别有劲了。希望大家真正来为现在的大多数群众打算，不要只计较个人的享受。

在消费层中生活过的人，很容易发生今不如昔的牢骚，但是只要认识肯劳动的总比不劳动的好，认识过去的享受是对不起劳动者的寄生生活，也就成了。转变立场和观点全在乎个人设身处地，平心静气地为群众打一下算盘。

改变立场也并非说到就可办到，也不一定非先读完马列主义理论不可。不过过去如果是知识分子，最好先改造历史的观点——可先参看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另外还可以参看《人民文艺丛书》，那些作品内容丰富，作者都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写群众，我们写小资产阶级的转变，最好用为参考，拿来研究北京的事。

老解放区的写作同志们，有时候自以为理论立场都够正确

的了，但有时经政治修养比自己高的人一看，还有好多应该改正的地方，可见为群众打算也不是件容易事，自以为对也不见得就真对，总要虚心接受批评。过去所谓文人自尊心应该适当地和主观主义区别一下，不要把固执错误也算成自尊。这一点老解放区同志们，一般是已经克服了的。

最后我谈谈处理旧材料的问题：有人问“是否也可以写过去的材料”，我想北京解放是有历史意义的，没有过去的历史也不会造成今天应有的转变，从若干年前写起，联系到现在，不但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也只有那样才能真正写出转变来。

《金锁》发表前后·

《金锁》这篇小说，在《说说唱唱》上发表之后，收到读者的意见如下：

人物不真实，侮辱了劳动人民。

下三烂话太多。

结尾矫揉做作。

摹仿《阿Q正传》。

为了答复读者对《说说唱唱》的爱护热诚，“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开了三次讨论会，把这篇作品逐字逐句检查了一番，并将检查的结果整理发表。可惜这三次讨论，我只赶上在第二次参加了个会尾巴，有些意见不曾谈出，再加上在编辑过程中我还有值得检讨的地方，现在把它一并写出来，作为对讨论会的一个补充和对作者、读者及其他编委的道歉（其余在讨论总结上提到的，这里不重复。）

一、编辑经过

在收到这一稿件后，“大众创研会”小说组的几个人和少数编委传阅了一下，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1、故事轮廓脱胎于《阿Q正传》。

· 本篇曾经发表在一九五〇年五月《文艺报》第二卷第五期（即总第十七期）。

2、解放以后的尾巴是加上去的（自原文第十章中“七七事变后……”起）。

3、假如删去了尾巴看，主题只在于暴露恶霸的罪恶，而未给被压迫者指出出路。

4、在趣味主义支配下，用了些不必要的人物，强调了些不必要的段落。

稿子传到了我，我主张发表，理由是作者真正了解未解放以前的农村，虽用了《阿Q正传》的架子，其内容并无抄袭之嫌，也没有一般写农村者只写概念的毛病，发表了可使人了解革命势力未到以前自然状态下的农村具体情况如何。

也有人提议改一改，我主张不大改，理由是尊重作者。

主意一定，发稿期也到了，没有和其他编委商量，就那样发出去了。

二、自我检讨

处理这一稿件，我有两点错误：

第一是其他编委提出来的意见自己不同意，不和人家再商量，就按自己的意见处理了，在作风上欠民主。

第二是以迁就毛病为尊重作者，其实就是对作者不诚恳。《金锁》的作者孟淑池曾要求对他这个作品提出意见，我自己和看过这篇稿的编委也曾看出作品的毛病，但在谈话时候，忽然觉得一个作品发表出去能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就算了，不必强叫人家和自己的观点完全一致，因此就和人家客气了两句就走开了。现在检讨起来这是个原则的错误——因为正确的观点只能有一个，自己对了就该说服人家，自己错了就该服从人

家。从这篇作品上看，局部地从趣味出发，因而损害了对事物的选择与批判，原是艺术观点上的错误，而我则既不向作者提出，又不在文章上改正，对作者是一种“外气”，对读者也没有负到应该负的责任。

三、一点辩护

读者意见中，有一条是说这篇作品中的主角金锁是不真实的，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我以为这是不对的。我所以选登这篇作品，也正因为有些写农村的人，主观上热爱劳动人民，有时候就把一切农民都理想化了，有时与事实不符，所以才选一篇比较现实的作品来作个参照。事实上破过产的农民，于扫地出门之后，其谋生之道普通有五种：“赚”、“乞”、“偷”、“抢”、“诈”，金锁不过是开始选了个“乞”，然后转到“赚”。

“有骨头”这话是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人才讲得起的，凡是靠磕头叫大爷吃饭的人都讲不起，但不能就说他们都不是劳动人民。他们对付压迫者的方法差不多只有四种：“求饶”、“躲避”、“忍受”、“拼命”，有时选用，有时连用，金锁也不例外。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参加革命：有的是在革命势力未到以前自动找去，有的是在革命势力到达以后，得到了土地，再加以组织教育，才能挺起腰来。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这种人虽不占多数，可也不是个别的，只是容易被一般人（连贫农在内）忽略，因为在一般人的意识中没有给他们列下户口。

作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如果事先把农民都设想为解放军那样英雄好汉，碰上金锁这类人就无法理解，其实只要使他的生活有着落，又能在社会上出头露面，他并不是没骨头的，解放

军中象金锁这一类出身的人也不少，经过教育之后，还不是和其他英雄一样吗？

这篇作品中对金锁这个人物的处理，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写出他进步的过程——也就是尾巴接得太短了一点，使金锁一类人读了不知道该如何挺起腰来，“瞎闯王”、“么二楞”等农民读了不知道对解放后的金锁在日常生活中应取什么态度，作农村工作的人读了不知道对金锁该如何做工作。虽有这个缺陷，只能说是美中不足。并不能说是没有真实性或是作者故意侮辱劳动人民。

北京市文代会闭幕词

四天大会胜利地结束了。在这四天之中，有三项大的收获：

第一、听过了各位首长的讲话和本会的几个报告，经过了简短的讨论，使我们有了一致的方向。也就是说：明确了我们的队伍有多么大，主要的服务对象是谁，这个“务”是如何服法。假如用唱戏来对比，就是明确了我们的班社有多么大，座上是什么观众，因而就决定了这一场应该演些什么节目，怎么样才能演好。

第二、成立了文联，使我们各个部门的工作者今后容易取得有机地联系，遇上了问题有个商量的处所，并和群众取得联系，但也还有些各自打地洞的现象存在。比方说有些工作部门苦于得不到专家的指导，同时是不是也有些专家们感到无用武之地呢？我想是有的。今后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团体组织，我们这一百单八将就容易彼此配合得更好一点了。

第三，提出了好多重要问题。因为大家都有工作岗位，使我们的会不得不在这短短几天中结束，因此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各位代表提出七十多件提案，把比较重要的问题都提出来了。这些问题虽不能一下解决，但是总可以逐步解决。要是没有这次会议，发现一下这许多问题，还说不定得磨多少时间，这也是本会一项很大的收获。此外收获自然还有，但以上三点，是本会的最大胜利之处。我们这个会就在这胜利中闭幕。

（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

《说说唱唱》第三第四两期上，发表了淑池一篇题名《金锁》的小说，作者对于农民作了不正确的描写，我在编辑的时候，没有接受其他编委的意见，未把可能改正的地方改正，以致发表出去之后，引出文艺界同人和其他读者好多意见。我收到这些反映后，曾在《文艺报》第十七期上作了检讨和辩护（题名《金锁发表前后》），但检讨得不够详尽，辩护得不够正确，我现在感觉有重新来检讨一下的必要。

一、对“检讨”的检讨

我在原来的检讨中，虽然也曾提到原作是“局部地从趣味出发，因而损害了对事物的选择和批判”，也曾提到这是作者的错误，可是只那么略略提到，轻轻放过，其原因是着重检讨自己，不愿多把错误向作者身上推。我在那时对原作的看法是这样的：

从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上看，也不过是“一个流浪的难民，流落在一家恶霸地主家里当长工。恶霸地主欠下他的工资不给，又用公家的粮食骗来了另外一个女难民，名义上是替他这个长工娶妻，实质上别有用心，后来因强奸不从，竟将男女一

* 本篇曾经发表在一九五〇年七月《文艺报》第二卷第八期（即总第二十期）。

同治死。不料男的没有死去，投入解放军，最后把案情弄明了。”要是正正派派写，这个题材没有多大毛病（略有点公式化），可惜作者嫌它不足，故意把主角（长工）丑化了，又加上些除了色情再无其他的低级趣味部分来凑趣，竟弄得这篇东西局部地变了质。

这便是我原来对这篇小说的认识。原检讨中不足之处是没有把“对事物的选择”问题看成立场问题——以为对“金锁”本人的挖苦只是“语言”、“口吻”的无选择。现在看来，这一点是非常不正确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立场问题。作者主观上是要替劳动人民说话的，可是因为生活、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有些脱离（虽然作者原来是农民家庭出身），因而就不能把劳动人民的事当做自己一家人的事来讲。例如：小说中一开始介绍了曹家的“驴宅”（这个词也有毛病，不应把宗族和阶级混为一谈）之后，接着便说“金锁这个人虽然也姓过曹，却不是“驴”家的正支正派……”这就等于说：“这个忘八蛋与那一伙忘八蛋虽然都是忘八蛋，可是不同种”。这种口吻，贯注于全篇，使人读了不知道作者是站在哪一方面说话。

二、对辩护的检讨

我的辩护中需要检讨之处甚多，现在先举两条重要的：

一、好多人指出这篇小说“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我的辩护说“不是”。大家是对的，我是错误的。把恶霸地主和农民平列起来，一例地挑着眼用俏皮话骂下去，还能说不是侮辱劳动人民吗？

二、说“有些写农村的人……把一切农民理想化了，所以

才选一篇比较现实的作品来作个参照”也是错的。指导我作这样辩护的思想是自己有个熟悉农村的包袱。当时收到的稿件中，《……翻身记》就有好几篇，可惜都好象新闻，看不出农村的生活，而看到《金锁》之后，觉着其中写到的事物有不少地方和我自己观念中已有的事物都相差不多，因此就说它是“比较现实的作品”，还要叫给别人作个参照。仔细一想，别人如果真的参照了这个讥讽农民的风格来写东西，不是都讥讽起农民来了吗？因为自己有了熟悉农村这个包袱，在感情上总觉着千篇一律的概念化的作品讨厌，没有认识到，只有概念或千篇一律固然不好，但是写的人主观上诚诚恳恳的歌颂劳动人民，自己如果比人家多知道一点什么，应该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给人家作个参考，为什么要以为人家的作品“讨厌”呢？

三、对辩护的保留与保留中的检讨

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作农村工作的人怎样对待破产后流人下流社会那一层人的问题。这一层人在有些经过土改的村子还是被歧视的，例如遇了红白大事，村里人都还以跟他们坐在一块吃饭为羞。我写《福贵》那时候，就是专为解决这个问题。福贵的前期遭遇并不比金锁好，假如只从“现象”上挖苦起来，恐怕要比金锁还难看。我在辩护中说，他们讲不起“骨头”，只是说“讲不起”，并非说他“没有”；说“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人”才讲得起，指的是比金锁稍强一点，在社会上还有人愿意跟他谈话的人，而并非指什么能挤到地主边上的人。我对这一层人的分析还认为没有大错，不过要是选举农民代表，当未作过适当工作之前我可也不选他们。

这一段分析不论对与错（错了再研究），写在辩护中也只能算是狡辩，因为《金锁》这篇小说根本不是以解决那个问题为主题的。根据这种说法推论下来，就得出原辩护中末一段的结论：“……对金锁这个人物的处理，最大缺陷是没有写出他进步的过程……”其实是这样吗？假如补出他的进步过程来，该算一篇呀该算两篇？补出进步过程来就能把前边立场上的错误撤消了吗？显然是不妥的。

四、对作者的认识

最后，我仍认为作者具有写农村的特殊条件：生活熟悉、文字通俗流利，只要经过相当的政治学习，一定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

杜鲁门的“文化程度”问题·

杜鲁门七月二十六日的侵略声明，早被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批驳得不值一提。可是其中有些字句，我还想举出来让大家看看杜鲁门的脑子糊涂到什么程度：

一、“进犯军”。杜鲁门把反抗反动军队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叫做“进犯军”，这证明他完全不懂什么叫“进犯”。一个国家派遣部队去侵略其他的国家——如美国派兵到朝鲜与中国的台湾那样——才叫“进犯”，杜鲁门是了解错了的。

二、“共产主义”。杜鲁门说：“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而且立即会使用武装的进攻与战争。”这好象说“共产主义”是个人，或者是个别的活东西，“对朝鲜”会“攻击”会“战争”。事实上“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真理，并不是具体的人或别的东西。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各国都有，当别人不曾“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曾遣兵调将去“攻击”过别人。抵抗朝鲜败类李承晚的，一个个都是朝鲜人民，没有一个人是从别国“攻击”进来的。用李承晚作工具，企图“颠覆”朝鲜“独立国”的人民民主政府没有成功，便“立即”“使用武装的进攻”在朝鲜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〇年八月出版的《人民文学》第二卷第四期。

国土上“战争”起来的是杜鲁门，这已“无可怀疑地说明”不是“共产主义”。杜鲁门对“共产主义”是了解错了的。

三、“安全”。杜鲁门说朝鲜和中国统一了，会“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因此就派兵进攻台湾和朝鲜，并以成群的飞机轰炸、扫射朝鲜和平城市的妇女、小孩。杜鲁门以为这样做起来，太平洋地区就“安全”了。

四、“合法而必要的职务”。原来联合国的参加者都只有一个共同的职务，就是彻底消灭法西斯侵略者的势力，并不曾规定过要防止被压迫国家的独立与统一。而美军执行的却是一面放纵日本战犯，支持日本法西斯残余分子，镇压日本反法西斯最彻底的共产党；一面派兵干涉中国和朝鲜的内政，防止这些国家的独立与统一。这些“职务”，在已经露出侵略本像来的杜鲁门，自然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帝国主义者认为“侵略”便是“职务”，然而能算“合法”的吗？什么宪章上曾是这样规定过？要说这些美军是为联合国执行职务，联合国没有此项规定；要说是为美国执行职务，美国和这些地方用三万华里的桥梁也连不起来，为什么偏会在这地方产生了“职务”呢？

从这些字句上来看，杜鲁门的脑子实在糊涂，还应该聘请个教师好好补习几天文字课。

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大家都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其实我并不是家——假若一定要说成个家，那我只不过是个热心家。我常到天桥一带去，看见许多小戏园子里，人都满满的，可是表演的却不是我们艺术界的东西。我们号称为人民文艺工作者，很惭愧，因为人民并未接受我们的东西。广大的群众愿意花钱甚至站着去听那些旧东西，可见它是能吸引住人的，它的内容多半是以封建体系为主，表扬“封建君主的尊严”、“某公子中状元”、“青天大老爷救命”、“武侠替天行道”、“神仙托梦”、“一道白光”……等等。这些题材，基本上都是歌颂封建体系的，拿这些很为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却灌输给群众许多封建性的东西，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虽然群众很需要新的文艺作品，而我们也急于把我们的作品深入到群众中去，但两下接不上头，互相结合不起来。就天桥来说，我们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卖到天桥去。因此我们感到有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必要。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

*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成立，本篇是赵树理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后收入《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会刊》第一集。

人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

旧文艺界在一些老解放区已经有了进步性的组织，而且得到了相当成绩，但还不够。拿农村来说：已经作过十多年的旧戏曲改革运动，但只要识字的人，就仍存有旧戏本、唱本，由此来看，它远超过我们的新文艺或改造过的东西；在技术上我们也赶不上旧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在技术上、内容上努力超过旧的。在这里，现在新旧文艺界都在努力，不过有的还只是开始：解放以来，旧文艺界虽然不写“一道白光”之类的作品了，但写新的还不能掌握政策，所以我们要好好学（每天报纸上的政策和文件，都应好好学习），渐渐学得能掌握政策，才能有好的作品产生。新文艺工作者，应丢掉轻视旧戏剧旧曲艺的观点，要认为它们低级，或觉得很简单容易，随随便便就可以写成，那是不对的。过去农村中，唱戏唱新的，但是不久就又唱旧的了——因为新的太简单，太容易，唱几回就腻了。我们要重视这些东西，要细心研究。为什么许多人愿意花钱去看去听呢？这其中是有道理的。

这里我特别再向旧文艺作者提一件事：旧文艺作家缺乏新观点，怎样建立这个新观点呢？第一要了解政策，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二要研究群众：了解群众需要什么、如何表扬模范例子；要了解新老解放区的乡村、城市、工厂等各种群众的情况，想办法使写的东西给群众解决问题，使群众听得舍不得走。我们的作品是否吸引住群众，受群众欢迎是最重要的。旧形式和新内容是否配合，新写的是否比旧的受群众欢迎，都不是简单的问题，我们应该下一番工夫研究——无论形式内容，都要下工夫研究，不能随随便便对付。

我们应该大家做学生、做先生，共同学习讨论。过去文人

有一个毛病，就是自己写的东西，别人不能动一笔，实际上让大家一讨论，会有很多的漏洞经过多次修改才能完全。这个认为自己写的作品别人不能修改的包袱是必须丢掉的。我们这个会就是为了使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学习、创作、研究才成立的。有了作品，要彼此修改、批评建议，再拿到群众中去考验，使其成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文艺作品。

纪 念 话 ·

——纪念大众文艺创研会一周年

我们成立这个会的目的，是想给大众作出点作品来。从这一年的成绩上看，还没有违背了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书籍刊物，卖到大众手里了；我们的剧本，搬上舞台可以营业了；我们的鼓词评话，在游艺社唱了，在电台广播了。我们的会员们，不论在北京，不论在外埠，到处都可以见到或听到本会同人的作品了：这些都证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真正是为“大众”做了点事。

可是还有种现象使我们不能够满意，那就是我们的作品比起旧的来，在量上不够多，大部分在质上不够好。

怎样就能更多？那就只有努力创作。怎样就能更好，那就只有热心学习，细心研究。努力创作、热心学习和细心研究，就是我们克服缺点的法宝。

我们最高的愿望是“所有大众能够接触文艺的场合，完全成了新作品或经过改造的旧作品的市场”。这种浩大的工程，单靠我们这个会是完不成的，但我们要在这全部工程中，尽到我们可能尽到的力量，来和其它文艺部门的工作人员配合。

愿我们大家为我们的愿望努力，并且预祝我们将来的成功！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北京《新民报》。

文艺作品怎样反映美帝侵略的本质*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高潮中，我们北京市文艺界曾发表了宣言，文艺工作者个人都先后发表着谈话和作品，热烈地支持着这一爱国运动。

可是从作品上看起来，直接写运动的多，深入地反映美帝侵略本质的东西显得少了一点，所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想也许是因为过去对美帝的行为分析和研究不够。我想我们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者们，既不曾参与过蒋匪的高级行政机构，大多数又不曾亲自到美国去过，在北京见到而且能接触的美国人（接不上者除外），又不过是一些教堂的传教士或教会学校的美籍教职员，虽然他们的事业也被美帝算作侵略政策中之一部分（说见后），但他们中间，有的连自己也不知道是被利用了，有的纵负有特殊使命也不轻易向群众透露，因此我们从他们身上也不易直接得到美帝侵略本质的表现。

美帝侵华的本质，在上边提到的这些人身上虽然见不到露骨的表现，可是在别的人身上却表现得很透澈——近一百年来，从提倡“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直到完全掌握了他们的活宝贝蒋介石，可以说把中国变成了和世界上任何一块帝国主义殖民地比起来都毫无缺陷的殖民地。这中间的详细历史过程，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北京文艺》第一卷第四期。

请大家看看新华书店出版的《时事手册》(半月刊)第二期《怎样认识美国》一文,或者再找些别的介绍美帝的参考书,我这里不再叙述,我只把他们这一百年来精心经营的最后结果略提一下:钦本立先生根据蒋美两家的大小公密各种协定(例如《中美通商航海协定》、《双边协定》、《中美航空协定》、《美军驻华秘密协定》、《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中美警宪联合勤务议定书》、《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议》……和数也数不完的各种协定),在他写的《美帝经济侵华史》的总结中写道:“他(美帝)已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从这看来,每个帝国主义宗主国在他的殖民地上所掠夺到的权利,也不过如此:这才是美帝侵华的本质。如果有人要问“美帝到中国干什么来了?”就是来干这个来了。等到中国大陆来了个全部解放,他们一百年来经营成了的殖民地落了空,因此就又确定了武装进攻的计划。根据去年十二月五日美联社的报道,美国前总统胡佛说:如果“中共威胁着侵略台湾,美国应用装有十二吋口径大炮的战舰在台湾巡回。”“我们应以海军保护台湾”(美国到台湾算“保护”,中共反成了“侵略”)。今年三月十五日社鲁门批准了一项支持李承晚和蒋介石的法案,要在四个半月内用八千六百万美元给予朝鲜和台湾。从这些事实中看来,美帝早就把侵略中国和侵略朝鲜算在一笔账上了。这便是今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的由来,仍然是美帝侵略本质之继续和发展。

这里还须作一点补充:前面曾提到我们从在北京所能接触

到的美国人身上不易看到美帝侵略的本质，为什么说他们的事业也是美帝侵略计划中的一部分呢？让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是怎样说的：有一位在中国住了四十多年的传教士斯密斯，在一九〇七年著了一本书叫“今日之中国与美国”。这本书上说：“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在精神的、商业的影响上收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如果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又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讲，也能比用别的方法收获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杜威在一九二二年写的一篇论文里说：“美国教会大学，是把美国的课程及训育观念移植过来，造就的毕业生，不是做发展民族工业的领袖，而是由于他们的英文训练，做外国公司的职员。”他们这一位宗教家一位教育家，一前一后，正足以说明这些宗教文化事业与侵略政策的关系。他们在这方面的计划，虽说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并不如他们想得那样圆满，除了极少数受毒过深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的教徒和教会学校的师生，在反帝运动中仍是站在中国人这方面的。

从概念化的材料中可以见到美帝的本质了，但直接体现这种本质的人我们都不曾接近过，因此写起作品来便会感到素材的困难。但这种实质，难道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反映或是反映不多吗？不，这种反映到处都是，只是我们这个国家一向就在帝国主义宰割之下，挨了打的人，有的呼救无门自认晦气，有的挨得多了皮肤失了痛感，时候长了，反而不以为怪。例如一九四七年上海文汇报统计，因美货的倾销，上海著名的九福火柴

厂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关门，美国毛织品一九四五年八、九、十三个月在上海倾销量是一百万码，国产品是五十万码，大纶、亚中两厂关门。制袜厂五百余家，因美制品之充斥，大部分每天把做工时间缩减到三小时，有的则干脆关门。罐头工业因美货充斥，据一九四七年一月统计，由一百八十家缩减到五十余家。其他如草帽、皮革、卷烟、造纸等业，也都因美货影响一落千丈。这一类统计，也不过是在上海市的局部材料，然而其中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活问题，难道还不算有社会性的反映吗？再如解放以前，蒋匪帮中的美籍人士，一个个摆着旁若无人的太上皇架子，开着吉普车撞遍全国，抢掠幼女、撞死行人的事件，从重庆东至上海北至北京，各大城市日有所闻，难道不算有社会性的反映吗？又如美帝通过蒋匪帮在华取得应有的特权后，用一点猫儿哭耗子的所谓援华物资来收买人心，而另一面却大量以军火供应蒋匪，使他们在华杀死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当时我北京各大学师生识破这一点，联名宣言拒绝这种猫儿哭耗子的配给，难道不是侵略者和爱国者针锋相对的反映吗？

这一切事例，其中都有身历其境的无数的具体人物和经过，各人就自己所见的范围内，把这些与美帝侵华本质有关的具体事件综合一下，是可能写出作品来的。不过我们对这些材料，要发掘到深处，否则会把有社会性的材料写成了偶发的事件。我对城市的事太不熟悉，让我再举个农村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九三三年蒋匪借到了美国棉麦借款之后，在旧历年关，便影响到山西的粮价。当时山西长子县的小米落到三毛钱一市斗（十六斤），农民原来差不多都有点外债，赶到年关清债的关头，米价落了百分之六十二点五（原来八毛），这一来，就得卖掉原计划中的两倍多，有的全部卖尽还不够用，但是又不得不卖，

只好卖了现有的，再去向高利贷主借粮（当时的高利贷主放粮不放款）。来年山西安泽县，因为粮价太低，农村工资涨到每人每日五升米（八斤）（原二斤），有些地主觉着无利可图，干脆让很大一部分土地荒了。像这情形，在经济论文中讲起来不过“谷贱伤农”四个字，可是在被伤了的农民那一方面，就成了成千成万人的生死问题。同样，被美货挤垮了的民族工业，其中不论资本家，不论工人，其命运何尝不和棉麦借款下农民的命运一样呢？其他类型的事例也莫不如此，如果向深处发掘一下，内容可能是很丰富的。

可惜我最近十多年来和这类事实接触得过少（老解放区这十余年来生活上虽说很吃苦，可是早就彻底摆脱了殖民地因素），实感不多，不易写出这方面的东西来。在北京的诸位作者，虽说不幸多被蒋匪统治了几年，但对蒋匪太上皇美帝如何吹胡子瞪眼睛来作中国的主人，可是亲眼见到的，希望能向深处发掘一下，写出好多足以反映这种本质的作品来。

关于《邪不压正》·

我的《邪不压正》发表了之后，先后读到了六篇^①谈这篇东西的文章——其中也有批评的，也有辩护的，我读了都很感谢，不想再说什么。一篇文章发表出去，有人愿意提出意见，也是重视这篇作品；其所提的意见，作者认为对的，就接受下来，认为不对的不用接受算了。人家又不强迫，何必再去声辩？况且即使自己认为不对，往往也是自己的文章有不周到之处，否则为什么会使人家发生不同的观感呢？（反动者的意见自然除外）

最近有个同志劝我写个总的答复，使读者得到我自己一个解答。使读者得到我自己一个解答我愿意，但也不必去把那六篇文章逐一评论一番。我只把我写那篇东西原来的意图和某些必要说明的安排写在下面作为读者一个参考。

* 本篇发表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①这六篇文章登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这六篇文章是：

读《邪不压正》后的感想与建议（韩北生）

《邪不压正》读后感（党自强）

漫谈《邪不压正》（耿西）

读了《邪不压正》（而东）

我也来插几句——关于《邪不压正》争论的我见（乔雨舟）

关于《邪不压正》（王青）

我写那篇东西的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

当时当地的土改全部过程，简单介绍如下：

一、在土改之前，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流氓甘作地主之爪牙，狐假虎威欺压群众。贫雇农固然直接受其压制，中农也常被波及。

二、发动土改之初期，封建势力受到削弱，但余威尚未消失。这时候其他各阶层之表现甚为复杂：①中农因循观望。②贫农中之积极分子和干部，有一部分在分果实中占到便宜。③一般贫农大体上也算翻了身，只是政治上未被重视，多没有参加政治生活的机会。④有一部分贫农竟被遗忘，仍过他的穷苦生活。⑤流氓钻空子发了点横财，但在政治上则两面拉关系。

三、上级发现了被遗忘了的群众没有翻身，追查其原因，多分了果实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只说是封建势力尚有残余，而没有说到自己多占了一部分果实，所以只决定了追究残存的封建财产。在追究时，少数占了便宜的干部明知残存的封建财产数目很可怜，怕解决不了被遗忘的贫农的问题，就想把富裕的中农也算到封建势力中去。流氓更喜的是混水摸鱼，惟恐天下不乱。这两下一结合，就占了上风，正派干部反成了少数，群众没有说话的机会，结果残余的封建势力固然被打倒了，而中农也因受了连累，人人自危，无心再过日子，生产也因之停顿。

四、所谓“纠偏”，就是纠正上述现象，其具体过程是追清了错误责任，教育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安定了人心，使农村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那地方的土改总过程大体如此。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

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且和聚财写得比较突出一点。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分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拖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作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其次是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新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因为过去所有当权者尽是一些坏榜样，稍学一点就有利可图。我以为这两件事是土改中最应该注意的两个重点，稍一放松，工作上便要吃亏。我所以套进去个恋爱故事，因为想在行文上讨一点巧。要是正面写斗争恶霸、穷人翻身，少数人多占了果实留下穷苦窟窿，二次追究连累了中农，一直写到整党、纠偏，篇幅既要增长，又容易公式化，所以我便想了个简便的方法，把上述一切用一个恋爱故事连串起来，使我预期的主要读者对象（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从读这一恋爱故事中，对那各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工作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

小宝和软英这两个人，不论客观上起的什么作用，在主观上我是没有把他两个当作主人翁的——例如刘锡元父子、聚

财、二姨、锡恩、小四、安发、老拐、小昌、小且等人，或详或略，我都明确地给他们以社会代表性，独对于这两个人，小宝勉强还可以代表不当权的小干部（也只是临时加委的），软英则除与小宝有恋爱关系之外，我没有准备让她代表任何一方面。

这个故事是套进去的，但并不是一种穿插，而是把它当作一条绳子来用——把我要说明的事情都挂在它身上，可又不把它当成主要部分。我在写《李有才板话》的时候，曾以这样的态度来用李有才，这次又用了一下软英和小宝。这种办法，我没有多见别人用过，我也不敢自以为是一种什么手法，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偷偷用了一下算了，以后也没有准备再用。

拉拉杂杂说了好多，仍说的是自己主观上的意图和安排，至于客观效果与自己主观愿望相差多远，我一时还得出准确的结论。

那大小六篇文章的作者虽然都参加过土改，但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又都说的是我们艺术界的本行话，而我希望的主要读者对象，除了有人给我来过一封信之外，我还没有机会了解到更多一些人的读后感，因此还断不定一般效果如何。不过我这种看法绝没有轻视内行话的意思。我对内行话的重视要超过对一般读者意见的重视，因为内行的感觉是要比外行敏锐的。我的主题及主人翁已经能在内行中引起争论，至少也可以证明是自己没有把它写明确以至于引起不同的看法吧。其所以不能因此作出结论者，我只是怕所看的重点不同。比方作一件棉衣，一个裁缝批评起来，往往是说胸前的棉花厚了些，或下摆宽了些……这些意见没有一条不值得重视。如果发现人家确实说得对，下次就能做得更好一点，然而却不能因此就断定那件

棉衣根本要不得或者恰合适，等到穿棉衣的穿上去，你问他怎么样，他如果只说不好挺胸脯或者腰松一点，那就还马马虎虎能穿，如果他说穿不上或者说穿上很凉快，那就算吹到底了。

我的答复就如此了。

此外，我还须写一点声明：我那篇东西是在山里发表的，那时候各个解放区还没有连成一片，各地辗转翻印，有些竟错得一塌糊涂，谁也读不通，希望读者不要算到我的账上。

《方珍珠》剧本读后感·

老舍先生的新著剧本《方珍珠》现在上演了。这剧本刚刚脱稿的时候，我已得到“先睹”之快，因此趁着这上演的时候写一点读后的感想。

这剧本写的是一个女曲艺艺人翻身的故事。现在是人民翻身的时代，写翻身的人自然多得很，但正因为写的人多，就不容易避免重复。这剧本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便是其中的任何构成部分都没有和其他写翻身的作品重复了。但又都是翻身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毫无“出奇制胜”之嫌。

剧中写解放之前，反动军官、特务、流氓、行会把头、市侩文人，有机地无机地，共同形成了个统治铁网。对一个女艺人，从剥削她的业务收入一直逼进到占有它的肉体。解放以后反动派倒台了，有缺点的得到改造了，因而我们的女主角，不但解除了所有的束缚，而且成为社会尊重的人物。

这剧本使我感到舒服的有二点：

一、通过小故事、小人物写出了新旧不同的两种社会动态。剧中除了个别彻底的反动者在解放之后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退场外，其余的人品没有增减，但在旧社会制度下，每天演的是勒索、敲诈、把持、砸园子、抢人等悲剧，解放以后则变为团结、合作、学习、创造等场面。因而社会制度的改革，推

· 本篇最初发表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北京《新民报》。

动人们进了步。又因为人进了步，就自己的生活小范围里建设着的新的生活方式，更充实了新的社会制度。我以为这是解放后新北京的一种普遍情况，不止是艺人小圈子里的事。

二、对人物的前途有分寸。不属于反动阶级的人物，在反动统治者当权的时候，也会跟着作点坏事，但在反动势力垮台之后，这些人如果觉悟了，仍会回到人民大众这方面来。这剧本对这方面反映得恰如其分，而且写出了这些人的进步过程和段落。我以为这一点符合于普遍的现实，所以读起来便感到都是水到渠成，非那样不可。

这剧本的长处自然还多，缺点或许还有，可惜我读的太粗疏，不曾留有更多的记忆。只能写出这点感想，别的部分，只好留待别的同志们去谈了。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武训”问题介绍*

满清末年，山东堂邑县有个要饭的名叫武七，这人当年受过地主的欺负，误以为因为自己没有念过书，才比人家低半截，因此想弄些钱办个“义学”，让穷人的子弟们也能读书上进。主意一定，他就一边宣传一边做。

那时候，正是满清朝廷、地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各种压力压得农民不能过日子的時候，办个义学，也不过能叫少数穷孩子念了五经四书，功成名就，回头帮着反动的统治者再来压迫别的穷孩子罢了，哪里能解决穷人受欺负的问题？懂事的穷苦农民，知道那个不是路，因此成千成万的人都去参加太平军、捻军去打满清的官兵，却没有一个人来帮他办义学。

地主阶级的官员和士绅，非常懂得这些道理，因此就非常看中武七——他们见农民革命压不下去，穷苦农民的心都不稳，急切想不出办法，恰巧遇着武七宣传“义学主义”，就都自觉的，不约而同地捧他的场，想借他这个怪想头来稳定一些人心，因此文武举人就帮着他出放存款，知县官又请吃饭又送银两，山东巡抚赐他官印缘簿，学台也捐银，士绅也留他住宿……。不几年功夫，就帮着他办了三座用举人进士当教员来教五经四书的奴才小学，乐得他摸不着头脑，和人家算成一伙，不过还觉得比人家小几辈子，不敢和人家平起平坐。后来

* 本文发表在一九五一年六月《说说唱唱》第十八期，署名“吉成”。

反动政府从西太后到蒋介石，对他都各有封号，连他的“训”字还是一个州官给起的，用意也都和当时的官绅一样。

解放以后，有些人把他当成民族英雄，用电影、图画、传记来宣传他，因此才又有些人写了好多批评文章登在报上，叫咱们大家认识这武训的本像。

这就是近来报上登着的“武训”问题。

对发表《“武训”问题介绍》的检讨*

本刊上期登了一段介绍“武训”问题的短文，事后检查该短文作了错误的介绍，而我们也没有负到纠正的责任，谨向读者道歉。兹将其错误之点指出如下：

一、武七开始虽说要过饭，可是结识了地主阶级之后就逐渐变成了地主兼高利贷者，最后弄到有土地二百三十余亩，钱二千八百多吊，不能以“要饭”来说明他的身份。

二、地主、官、绅作了他的后台老板，帮着他变作地主和高利贷者之后他才兴学，该文说“帮着他”办了三座奴才小学太含糊，好像还是地主、官、绅们帮着一个叫化子兴学来的。

三、据调查他的三座“义学”的学生完全是地主阶级的子弟，连一个穷孩子也不曾有过，该文说他为了穷孩子也是错的。

四、该文说“……有些人把他当成民族英雄……来宣传他，因此才又有些人写了好多批评文章登在报上叫咱们大家认识这个‘武训’的本像”，模糊了原则是非，没有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好像说宣传他和揭露他“本像”的人只是原被双方在报上打官司，与自己无关，不曾指出宣传者是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者是拿着马列主义的武器来和这种反动思想作战的，因此，就不能叫人感觉到反动思想是应该打倒的。

* 本文是以编辑室的名义发表在一九五一年七月《说说唱唱》第十九期。

我与《说说唱唱》·

我与《说说唱唱》已经有二年关系了，趁着这次文艺界整顿思想，我把这二年来在这刊物上经我手弄出来的错误检查一下。

这二年来经过我手在这刊物上弄出来的具体思想错误有三次：第一次是发表了歪曲农民形象的小说《金锁》。发表这个作品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理论水平低和固执着从旧农村得来的一些狭隘经验；另一方面又以为“不必强叫人家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见第一次检讨）。第二次是写《武训问题介绍》中说“有些人”捧场，“有些人”批评，故意把“阶级”观点字样避开。第三次是发表了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的《种棉记》，以为只要使不愿种棉的人读了去种棉就行，也不必给农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产生这三次错误有一个相同的根源，就是不懂今日的文艺思想一定该由无产阶级领导。因为我们的文艺是要教育人民的，传播了错误的思想，就会把人引到错误的路上去。我们这国家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要是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就不能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这个道理，在今天早为参加革命

• 本篇发表于一九五二年《说说唱唱》一月号。

的各阶级人民所拥护。而我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反抱着一种糊涂想法，不是去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是故意把阶级面貌模糊起来，甚而迁就了非无产阶级观点，以至造成不断的错误。

再一个错误是在选稿问题上，由要求“形式通俗化”走到了“形式主义”。在形式问题上，我们开始只规定“力求能说能唱，说唱出去大众听得懂、愿意听”，并不是一定要用“旧形式”，更不是不管内容，只要能说能唱就行。可是有些作家往往不习惯于通俗的形式，不能多来稿；有些掌握了说唱形式的人，对新的政治生活未必熟悉，写来的东西，在内容上有的太单薄，有的一般化，有的有错误，而我们选稿的时候偏又得从这些来稿中去挑，结果就从形式上比高低，在内容上自然仍以单薄的、一般化的为最多，甚而发表了有错误的东西。这样就把形式放到第一位而把内容放到第二位了。就是单从形式上讲，也只是为了给掌握旧技术的艺人拿去当下可以说唱，并没有多注意到丰富和改变那些通俗的形式，使它们适切的表现生活中的新因素，而符合于毛主席所指示的“从普及基础上求提高”。不论我们编辑者在客观上有什么原因，拿出去的货色大多数既然是这样的东西，投稿者就照样制货，结果每月收到五六百件稿子，大部分是一些《几婿拜寿》、《儿女夸夫》、《某甲翻身》、《某乙改造》的千篇一律的故事加了一些陈腔滥调的敷衍，到了发稿时期无好稿可发，仍旧发的是这些。这真叫做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面。

还有个错误是事前缺乏计划，弄得完全被动。每逢有了重要的政治任务，就临时请人补空子，补不起来的时候，就选一些多少与该问题有点关系的来充数，简直有点和政治任务开玩

笑。

经过这次整顿思想，我和几位有同样毛病的同志们，深深感到错误的严重，因此就和这几位同志约定，今后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加强对读者的责任心，务使不犯旧错，并望文艺工作者和读者诸同志随时加以监督。

忆王春同志*

王春同志和大众文艺的关系有十九年之久。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他又不是专业文艺工作者，自然不是每天管这件事，但也不曾因非本业而忘怀，所以又常常管点事。在这十九年中，他在这方面所作的事，不是我这一篇短短的小回忆所能容纳的。我在这里只举几件事作为例子。

在一九三三年，他读了我半篇未完成的通俗小说（以反对阎锡山搜刮山西的财力人力造成地方的混乱为主题），引起他提倡大众文艺的动机，写了一篇理论性的文章说明其重要性，但以当时山西没有进步的报刊，终于没有找到发表的机会。自那时起，他的兴趣就引到这一方面。

抗日战争开始后（一九三九年），他得到了个编小报的机会，就约我去编副刊（报名《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名《山地》）。便把多年的理想化为事实——其中形式上鼓词、快板、童谣、故事等无所不包，而总的政治内容以发动人民抗日、揭穿阎锡山反共反民主的阴谋为范围。那时的小报与任何报纸的面貌都不一样，贴在各县城的街道上，凡认得字的都愿看看，往往弄得路为之塞。

在一九四四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以后，王春同志更加注意了普及工作。到了一九四六年，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北京《新民报》。

太行山的文艺界往往说我们有门户之见，王春同志便将延安所出之《解放日报》和能搜罗到的几份地方报上登载的合乎大众化的短篇小说选了三个集子，以证明提倡并实际写大众化文艺作品的人都是不谋而合的，而绝不是我们要在一处山地里树立什么门户。这种工作乍看来似乎很平常，而实际上则是把好几年来《解放日报》、各地方报上的文艺作品都过一下目才能决定。在作的时候，因为不是岗位工作，不能占工作时间，须在业余挤时间来做，又无编辑费之类的个人报酬，是件比较苦的事。

大众文艺，只是他注意力集中的一个部分，实际上他全面关心的是大众文化，这方面我也举个例：前几个月，他着手编大众字典，往往面对着一个字坐夜，好像一个老和尚坐在那里参禅悟道：有时候则乱打电话找人问计——“老赵，一点两点的‘点’字怎么解释？照几何学上的定义讲，大众不懂；离开那个讲，又错误，……词性又很不统一：一点、两点；重点、要点；优点、缺点……点头、点句、点豆腐……点缀、点心……算了，算了，究竟分几义，让我慢数。请你给我出个主意，用什么语汇来解释？”已著成的文稿，看来果然浅显易懂，各尽其义，的确是群众学文化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可惜才著到一半他就病故了。

这些印象数起来是数不完的，容我以后有工夫再给他写个详细的传记吧！

决心到群众中去*

我近三年来没有多写东西，常常引起关心我的同志们、朋友们口头的和书面的询问，问得我除了感谢之外无话可答。我之不写作，客观的理由找一百个也有，可是都不算理由；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现在趁着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十周年纪念，我用他这篇划时代的文件的精神来检查一下自己，作一次公开的检讨，以回答关心我的同志们、朋友们的盛意。

毛主席要我们写作者到群众中去吸取养料哺养自己，我究竟把我自己哺养得怎么样呢？为了彻底检查起见，我不妨揭开箱子让大家看一看底，看看这箱子里究竟还装着什么，最缺少的是什么，最近急须要进什么货。

一、我是在农村中长大的，而且在参加革命以前，家庭是个下降的中农，因此摸得着农民的底。这是我自以为幸的先天条件。

二、抗日初期（一九三八年）我当过四十天区长，作的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抗日自卫的工作。后来参加了文化机构（报社、书店），作过机关驻地的群众工作。在这中间（一九四八年）又作过八个月的土地改革工作。在作这些工作的时候，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副刊《收获》。

虽然也还是每日和群众接触，可是只能在一些政治场合上相见（多半是开会），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方面所见就不多。

一九四八年冬我回到我的故乡过了个年，住了两个月，逐户访问了本村的邻里（共五十二户），拜访了六个亲属。这一次，因为有历史关系，群众把十年来的情况变化毫无保留地供给我，可惜这地区在抗日时期是个没有军事意义的接敌区，我方的地方干部照顾得较少，新的力量当时还没有很好地成长起来。

这便是我到北京以前在农民群众中所吸取到的全部养料。同志们、朋友们对我所写的作品的观感是写旧人旧事较明朗，较细致，写新人新事较模糊，较粗糙。完全正确，其所以那样，就决定于这全部养料。我已写出的作品，其题材全部是农村的事。要写什么就得了解什么。我和我写的那些旧人物（自然不是那些个别的真人），到田地里作活在一块作，休息同在一株树下休息，吃饭同在一个广场吃饭；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我既然这样了解他们，自然就能描写他们。对新的人物，大半是在会议时间碰一碰头，如何能发现每一个人的思想性格和每个人各个阶级各种关系的全貌呢？在会场上的收获也不少，可是只能写非文艺性的报告，不能写文艺作品，因为只能了解到群众生活的某些方面，而不能了解到全面，就是这些方面还只有概念，没有形象，如何谈得到描写呢？会议之外，自然也还有些别的接触机会，例如土地改革中的串连诉苦，生产中

的访问劳动模范等，但所接触者又和开会一样，都是只接触某一方面，而且时间也很短，就事论事写个印象记还差不多，据以写一个又自然又生动又合乎进步规律的新的完整人物是不行的。我并不是每个作品都准备写社会全面，不过人是社会动物，即使只写一个人也要牵连社会几个方面，而这些方面在对那个周围的全面没有个适当了解之前，就不易认识得准确。我在写新人新事的时候，所要涉及的事，那些在我已有个粗略的形象或已有过个印象的我就略加描写，那些是我连印象也不曾有过的我就用几句话交代过去。可惜是所有的形象或印象比起需要来太少了。至于那绝有把握的、能象我对旧人旧事那样了解得面面俱到，可以尽情描写的新人新事，可以说更少得很。所以在—一个作品中同时新旧都有的时候，新的方面便相形见绌。

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争中，在新人新事这方面，我自己一向就是养料不足的。一九四九年到北京以后，和群众接触的机会更少了，来源更细得几乎断绝了。为了要挽救这一点，我也曾下过一次工厂，但试验了一个月，觉得路子太生，又想折回来走农村的熟路。折回来了，并且也到了农村了，可是仅仅两个月工夫，临时回到北京来开了个会，又被些不成理由的客观原因拖住没有得返回去。所以除了三年之中写了两个小东西（《传家宝》和《登记》）以外，所存的原料再也写不成个能给人以新感觉的东西。

回顾—下自己从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个结论：从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来，渐渐以至于完全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如不彻底改变—下现状，自己的写作历史是会从此停止的。怎样改变呢？还只有温习毛主席的话：“必须长期地无条件

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自从从群众中来了以后，所参加的群众工作，是短期地、或分一部分精力参加的。在作驻地工作的时候，虽说时间较长，可是自己以帮忙者自居，群众及其直接负责干部对自己也以帮忙者看待。自己随着方便能帮多么大个范围就帮多么大个范围，能帮多久就帮多久，提得起放得下，对方自然没有把全面的情况和问题时时向自己表露的义务和必要。也有全身心参加的时候——四十天区长，两次八个月的土地改革和到北京以后又到农村去的两个月中的一个，都是以全副精力掌握了全面情况做的，可惜为期过短。就这短短的时期中，其收获已算不少，否则比较粗糙的新人新事也不见得能写出来。原因是认真负责地跟着新人物办新事，能得到较深刻的新印象，并把这些新印象自然分成一些系列，形成一些新的印象（虽然为时很短，不够很完整）。回忆一下我所写的东西，其中新的部分，大半是从当区长和作土地改革工作中取得原料的，假如早能长期那样作，可能早已写出较多而较好的作品来了吧？从这些经验教训中也足以体会到除了照着毛主席的话，下决心改变一下自己的现状回到群众中去，是再没有第二个捷径可以保证今后能写出更多而更好的作品来的。

在这个纪念日，我保证立即排除一切客观的理由，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群众中去吸取养料，写出作品来，用作品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的十周年。

郭玉恩小传

郭玉恩同志，今年三十六岁，山西平顺县川底村人。从他祖父到他自己，三代都当过雇农。他不愿世代代伺候地主，曾在一九三七年到本县公安局当过一次警察，但当时的政权还没有经过彻底的改革，他觉得错投了门路，便又回家种地。种地自然是他的熟路子，可是他家四口人只有三百多地，又拖着二百元现洋的高利债务，困难却也不怎么好对付。好在他和他父亲都勤苦过人，他父亲仍给人当长工，他除了种自己一点仅有的土地外，有时还打短工，所以不但克服了困难，还竟有些节余。

一九四二年，太行山区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起减租清债运动，郭玉恩同志参加在这一运动中和地主算账，算回来四亩多地，扩大了生产条件；同时在这一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次年（一九四三）便参加了共产党。

这一运动是太行山区贫苦农民翻身的开始。当时贫苦农民虽然已经得到少量的土地，但牲畜、农具都不全备，再加上日寇的扰乱，连年的旱灾，仍然不得好好生产。政府在这一运动后（一九四三年），紧接着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自救。郭玉恩同志在村里首先响应政府号召，说服群众，组织互助组，开荒修岸，种秋菜渡荒，从此打下“组织起来”的基础；后来组织的范围及影响逐渐扩大，经过八年的时间，全村九十四户，就有八十八户参加了互助组。在八年的生产中，群众集体劳动的

习惯逐渐养成了，能领导生产的干部逐渐增多了，集体劳动的制度逐渐形成了，耕作技术逐渐提高了，特别是各户的财富逐年增多了，互助组的公有财产逐年积累起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后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的条件。

但互助组发展到一九四八年之后，因私人财富之增加和自卫战争之结束，老区农民普遍产生了“生产到顶”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成分，对互助显得有点松懈，若不增加新的因素，就不易再进一步。川底村虽然基础较好，仍然能逐年增产，可是也不免受到上述客观环境的影响。到一九五一年四月，长治专署在一个互助会议上提出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郭玉恩同志感到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好克服二年来互助组不易提高的困难，所以虽然计算着在第一年自己要吃几石粮食的亏（后来因为增了产，也没有吃了亏），可是也很乐意地接受了试办的任务（当时计划在十六个县中只试办九个社，都是自愿报名的）。他接受这一新任务后，回到川底村，以两个互助小组为基础，组织了十八户，成立了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社成立后，由于统一使用土地、劳力、肥料、农具、牲畜等优越条件，在七个月（从建社到秋收后）生产中，农副业每人平均总收入量已超过一九四九年百分之三八·八，大大启发了社外群众，至今年春，除本社增加到四十六户外，又影响着一个附属的自然村（圪台）成立了个二十二户的新社。有这两个社的新生力量，川底村在今年秋季评比总结时，又被评选为丰产模范村；而郭玉恩所领导之社，也成为丰产模范社。最近这两个社又开了合并会议，并为一个较大的社，并又吸收了十二户新社员，明年生产中已有更大的优越性，其成绩也将比今年更大。

郭玉恩同志所以能在领导互助合作运动中取得那样的成

绩，是和他的特长分不开的。他有四个特长：第一是善于分析群众思想。在开始建立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群众摸不着底，先后均出现了“吃大锅饭”、“共产”之类的谣传；在组 and 社的前进中，也时时产生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郭玉恩同志每逢有了这些问题，都能根据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来分析问题的本质，然后再想具体的对策。第二是他能耐心说服群众。他的头脑很冷静，很少发脾气的时候。有些很不易说服的人都被他说服过。第三是他的计划性强。从开始成立互助组起，有组的计划、组员家庭计划；农业计划、副业计划；一年有一年的计划、一个季节有一个季节的计划，即在每一小段中也都是作着第一步想着下一步，不让工作脱了节。第四是他接受新事物快。上级开始号召互助，他就组织互助组；开始提倡合作，他就试办合作社；即在新的生产技术和农具上，无论浸种、育种、改良行株距离、用温度表、喷雾器、新式犁……他每见一样，都能细心钻研，收到上级农业部门预期的效果。

因为他有这些长处，深得到党内外的信任。他于一九四三年入党后，次年即被选为支书，一直担任到现在。在生产组织中，一九四三年组织互助组，次年即被选为前晋冀鲁豫边区劳英会的劳动英雄，并在以后逐年继续当选为出席县劳模会议之劳模。

（一九五二年于平顺川底）

一张临别的照片*

去年（一九五二年）秋冬间，我为着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曾到山西平顺县川底村住了三个多月。当时有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记录片摄制组在那里摄制片子，还有好多与农村互助合作工作有关的单位的好多同志们在那里协助工作，曾有一度相当热闹。临别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们和我们共同拍了一个像片，作为这一度欢聚的纪念。最近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同去的同志把洗制出来的像片给了我一张，我一见之下，觉得不像当日那个场面——其人数之多，几乎像个群众大会；仔细一看，人的面孔都是熟悉的，不但没有增加一个人，还有好多干部没有在场（因为有其他工作没有赶到），只是在拍照时候，面对的是空旷的河滩，而拍到像片上的不过是面前的几尺空地，所以觉得人多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种新兴的农业生产机构，要做多少事，要用多少人，都是出乎我想像之外的。我先提出几个奇怪的数目字让大家想想看：他们的合作社在去年秋收后扩大到七十六户，而应有的干部岗位就有六十几个，不能兼差的至少要五十一个。这仅仅是合作社的干部，要连党、政、军、团，群众的各种组织机构的干部一同计算起来，恐怕要够一百多个岗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后收入《三复集》。

位，可是这个村的户数，连远在五里之外的小山庄上的五户计算在内，一共才有九十四户。大家想想这个村，这个社的干部与户数的比例是不是叫你吃惊？

这个可惊的比例，在川底本村的人看起来是正常的，是缺一不可的——大小缺一个，大小总有一种事没有人办。我们的农村，是我们国家中最广泛的基层组织。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中央有什么机构，在多数的情形下，他们都得有与该部门有关的机构（将来应否调整或缩减、合并，那另是一回事）。既然是一个村，就得有村政府；有一定数量的党、团员，就得有党、团支部；有民兵，就得有武装组织；有群众，就得有群众团体，于是就得有村政府主席、副主席、民事、财粮、建设、文教、卫生、优抗、调解等各委员会，党团支书、支委、小组长，民兵队长、政治主任、组长、妇联主席、组长……缺一不可。他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种着几百亩地，养着几百只羊和几十头耕畜，培养着许多山林和果树，经常要修渠、修坝、修房子、打窑洞……处处有收入，处处有开支。对社内的社员，对社外的供销社、银行、保险公司、兽医、药铺……各有经济往来，如果没有足够的干部分头负责，不但生产效果无法检查，每天该准备多少现款、多少粮食的开支就无法计算，于是就得有社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正副主席，农业上的正副队长、正副组长，造林，养羊，管理耕畜，管理基本建设，经营副业，做文化教育福利工作，都须有负责的正副主管人，除文教外都得有会计。为了便于检查生产成果，各部门就都得有成本核算制度；为了统一掌握收支情况，就都得定期编造预算。有了这些经济制度，就得有管理这种制度的总机构，于是就得有总财务、总会计、现款保管、粮食保管、农具和其他公物的保

管、出纳、采购等人员。这些还只是生产上不可缺少的机构和人员。又因为社会分工赶不上这种新兴的生产组织的需要，就还得成立一些生产以外的补充机构。例如一个八口之家的主妇，每年要把三四十石粗粮作成米面，要做二十多双鞋，十几套衣服，每天要做三顿饭，还得照顾小孩；一个单身人，对这些杂活虽说比较少一点，但是数量可以减少，项目却少不了许多（不过没有小孩）。这一些人，要想参加社里的劳动是很困难的。为了解除他们一部分困难，就得开磨房，开食堂，办托儿小组，就又得用人。总之：事是人办的，要办事就得有人。

有那么多的人吗？新人能办新事，新事也能锻炼新人。他们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及正在继续进行的支援抗美援朝的人民志愿军，不但炼锻出现有村级的党、政、军、群各种干部，而且还出去了几十个县、区级干部，人民解放军军官和战士。同样，在生产上，他们也已经从互助合作中锻炼出大致足以胜任的各种干部，把我前边所说的生产中那些许许多多的任务，也都担当起来了。

我从前常为他们的文化程度担忧，现在从实际中看来，文化程度不足固然还是个困难，但也不像我估计的那样不济事——他们在技术上，也有少数人可以运用新式簿记，也懂得温度表，也懂得百分比；拿到一本简单的新式农业技术的书，也会照书行事；拿到一种简单的新式农具，也会按图调节。总之：新的生产组织，新的前途观念，推动着他们接受新的事物。他们自己也感到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够对付现在和将来的事物，因而在火热的生产忙碌中，每天早晨都还要参加文化学习。他们把他们每一个学龄子女都送入学校。他们曾派着优秀的干部到专署所在地去受专署主办的农业技术、会计、水利等训练。他

们把优秀的青年送到县立中学去学习。这一切也都说明他们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决心。

这个庞大的干部群，不论党、团员或群众，大体上都有相当成熟的政治锻炼和相当高尚的政治品质。他们除了村政府主席有少数的津贴外，全部是不脱离生产的义务职（现在才考虑合作社主席脱离生产问题。在合作社里为社事误了工，原则上虽有可以记工分红的规定，可是有些零碎工根本无法上账，所以仍有许多义务工）。说他们毫无怨言也不近事实，不过当他正说着误工太多的话，马上接到了赴县开会的通知，便能嘻嘻一笑去准备干粮。且让我举一两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人到社长郭玉恩家里去找郭玉恩，他家里的人往往说：“怎么来家里找他？”好像是说：“你真没有常识！他什么时候会在家里坐一会？”党支部书记郭地长，家里一群孩子，只有他一个人能参加农业劳动。在秋收快结束的时候，县里要他去开劳动模范会、党代表会、合作社会。他一连参加了半个月这些会。他的老婆正等着他回来商量买布换季，不料他接到专署通知要他去受水利训练（四十天），连家也没有回，就从县里往专署去了。村长郭秋魁，在秋收后被社里选他负基本建设总责，他说他不兼了，分配给他的工作（领导打土窑）他不干。隔了一天，社里正准备派专人说服他，可是第三天他便自动地干起来了。像这些人，这些事，只要你住到那村子里，管保你每天都能碰到。特别是老干部、老民兵（即抗日时期的民兵）和在抗日战争时期出过力的群众，在为公众服务时候，都能既不抱怨，也不居功，不言不语，若无其事。这些人，有的随着正规部队打过很大的仗，也攻过碉堡，也捉过俘虏；有的当民工抬担架，跟着刘、邓部队到大别山区走过一年之久。那些英雄事例，在

他们都觉着平平常常作过去了，现在只不过开开会、算算账、定定计划、作作总结、给军属拨拨工、给外来干部派派饭……自然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事了。自然他们身上也不免有缺点或者缺点还很多，但他们的觉悟是一天天提高的，缺点是一天天减少的，而且愈集体化，落后面起作用的机会也愈少。

我能和这一群英雄们共处三个多月，自然是使我满意的事。只可惜这张像片还没有把他们照全。

“侵略”浅释·

“侵略”这个字眼儿，本来没有多少难解之处，按照我们一般正常人的了解，只是“直接用实力或以实力作后盾来侵犯自己领土以外的其他地方的主权、领土、经济利益、人民自由等等”的意思。但对那些以侵略为职业的人们来说，这种正常的解释自然就妨碍了他们的勾当，因而他们也就要造出另一套奇怪的解释。

美国好战分子们把亲手为李承晚策划的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叫做“武力统一朝鲜”，把朝鲜人民的抵抗叫做“侵略”，而美国侵略者挟着联合国的招牌亲自出马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勾当，又叫做“制止侵略”。中国人民为了保卫自己，和他的紧邻来抵御隔着半个地球跑来的美国侵略军队，也叫做“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抗拒从欧洲开来的法国远征军叫做“侵略”，美国每年以十亿美元的军火帮助法国远征军屠杀越南人民叫做“制止侵略”。台湾明明是中国领土，美国侵略者却无耻地强占，勾结蒋介石卖国匪帮，把台湾当作美国的殖民地，对我国沿海进行骚扰性的和破坏性的战争，妄图进攻我国大陆，而这，在美国侵略者说来，也是为了“防止”中国的“侵略”。

到这里，“侵略”一词的意义就更加荒谬绝伦了：哪有自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四年《文艺报》第十七期，署名“王甲士”。

己“侵略”自己的呢？但美国好战分子说话向来是不讲究通不通的。各国发生了人民的解放运动，好战分子就大嚷什么“共产党的侵略”。他们就一直不断地在那里叫喊：“中国共产党侵略了中国”、“越南共产党侵略了越南”。而当谎话说的太离谱，再没人相信的时候，就把“侵略”改为“扩张”、“渗透”等等字样。藉口防止这些所谓“侵略”、“渗透”和“扩张”等等，就到处组织什么防务集团，订立军事同盟、建起了军事基地。其实，参与这种集团或同盟的、允许建设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里一些头脑稍为清醒的人，也都会懂得，多参与一分这些事务，就多失去一分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直接取得这些国家的主权的，正是美国这位“盟主”。那些过去头脑还不够清醒的人，今天也已从事实中看到：“渗透”和“扩张”到他们那里去的，并不是什么共产党，而正是那些口口声声要来防止什么“渗透”和“扩张”的战争掮客。

至于那些并不和人民执掌政权的国家连界的地方，在美国侵略者看来也有到那里去“防止侵略”的必要，据说所要“防止”的是“可能性”。为了防止这“可能性”，就要订非常“现实性”的同盟和建造非常“现实性”的军事基地，或者就干脆发动武装进攻，把别人的主权拿过来。美国侵略者在危地马拉所做的肮脏的血腥勾当，就是一例。

今天，明白这样事情的人是愈来愈多了；美国好战分子所要防止的所谓“侵略”及其“可能性”，其实是并没有的，倒是所谓“制止”或“防止”的措施，却已经“直接用实力或以实力作后盾，侵犯了好多国家的主权、领土、经济利益、人民自由等等”。那么究竟谁是侵略者呢？任何头脑稍为清醒的人们都会从“侵略”这个字眼儿的通常解释得到结论。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会本着“侵略”的通常解释来认识美国侵略集团的阴谋，也一定有力量制止这些好战分子在别人的国土上玩弄侵略的把戏。

谈 六 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杂感

从这次大选①中，附带解决了个中国之谜——确切统计出中国人口的数字是六〇一九一二三七一（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的调查数字）。

统计人口似乎不应是十分难办的事，可是在解放以前的中国是办不到的。中国在解放以前，人民根据屡试无误的痛苦教训，知道统治阶级和自己从降生那一天起就是仇敌，因而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愿使他们摸清自己的底——万一被他们逼着隐瞒不过全部的时候，也是能隐瞒一分就隐瞒一分——在登记户籍这件事上也不例外。例如在日、伪统治下，谁家有大姑娘就成了惹祸根源，因而生了姑娘能不报就不报，有已经长到十二三岁的姑娘，给管户籍的人一点小贿，把年龄永远停在这个数字上（即姑娘长到十七八岁，在户籍册上看来仍是十二三岁）；在蒋介石统治下，实行的是“抓兵法”，谁家有了成丁的青年男子就成了惹祸根源，因而对于男孩子用的也是上述办法，不过贿赂的钱数要多，隐瞒的办法也要多——管户籍的得到贿赂

* 本篇最初发表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六日《北京日报》，后收入《三复集》。

①这里说的大选，是指一九五四年全国基层选举。在基层选举工作中，各地首先进行了人口调查登记。

之后，可以用逃亡、迁徙等名义把名字从户籍册中除去；至于当时成千成万的革命者，几乎全部是逃亡、失踪分子，很少能在户籍册上找到名字。中国的迷信传说中，说人的生死权操在阎王爷手中，阎王爷有全人类以及高等动物的一份清册叫“生死簿”。在旧中国时期，人民便把统治阶级编造的户籍册叫做“生死簿”。我佩服第一个使用这一名字的人的讽刺技术。在那种情况下，隐瞒人口是人民保存自己的一种值得赞扬的智慧。可是正因为如此，便没有人能找出中国人口确切的数字来。

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但消极地逃避着“生死簿”上的登记，而且不断地积极反抗着阎王爷，最后终于摧毁了那些阎王爷的权力，自己起来作了主人，在老解放区经过了几十年或十几年、在新解放区经过了五年的锻炼，学会了主人应该怎样当，感到了当主人的畅快，自然都愿意出头露面了，所以一经大选，便登记清了主人的全体数字——六亿。

过去我们虽没有找到人口的确切数字，可是我们的“人口众多”是我们自己和世界各国都感觉到了的。那时候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不是凭我们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好多灾难是无法渡过来的。人口众多，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条件之一。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和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杀死我们的人，虽然也没有统计数字，我估计可能也够组织一个不太小的国家，要不是我们的人口众多的话，恐怕不止灭亡过一次了。法西斯主义者常以他们驱使人民的方式来推测我们，说我们用的是“人海战术”，那叫做“以小人之腹度君子”——因为他们自己是为了自己的一小撮人的利益驱使着千千万万人为他们当炮灰，所以只会把人的行动都作为“战术”来看。我们这六亿人也确实像“海”，不过这种海本来

是平静的，要是被什么人损害着它，它便会沸腾起来，淹没那些损害它的人——它曾淹没过清朝、蒋介石的宝座、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侵者，在今后如果谁还想来统治它、侵犯它，它就还要淹没谁。

人是活宝。我们今天是以不太高的物质条件完成着我们伟大的生产建设要求的，“六亿”这个数字恰好是我们一个很有效的补充条件。例如我们近几年来所做的大规模的治水、筑路等使深山大泽低头的工作，发生了水旱灾情互相支援的工作……假如不是凭“六亿”作靠山，恐怕就会感到很吃力或者根本办不到。

有些西方人士耽心我们人口多了不易改善生活，或者耽心我们在革命之后会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子。我感谢他们的关怀，不过可惜他们仍未能完全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地下资源，也和我们过去的人口一样——是个谜，只就现在已经探测清楚的部分说，在几千年之内也不会用完。我们的农业资源，根据某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少量土地上所作的尚不太科学的丰产试验，已经发现有等于现在五倍以上的潜在生产力（例如玉蜀黍从三百斤增至一千五百八十斤、棉花从百余斤增至千余斤——每中国亩）未发挥出来，另外还有好多可以扩大成为耕地的广大荒原还未被利用。正因为我们有六亿作了主人的人民，我们这些资源在数十年内是会被应用起来的。我们的人口自然也要增加，不过这要比我们的财富增加慢得多。“人口过剩”之说，仅仅有被帝国主义者作为侵略借口的作用，在事实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没有了剥削制度，全体人民依靠科学发展的条件来发展物质生产，人口的增加率总是要比财富的增加率慢的——科学越发这越是这样。而我们现在所注意作的，正是逐步

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工农业生产。

我们有的是资源，正需要以我们的六亿人民的努力把这些资源应用起来。自然任何一个国家的物资种类都不是十全的，不过那可以用互通有无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用不着、也绝不愿学习帝国主义者到别人的国土上打主意。但是也绝不容许任何人到我们国土上来打主意。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也正是为了这个。

开发我们国土上的资源，保卫我们的国土，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迈进，是我们六亿人民神圣的任务。我为“六亿”这个数字祝贺。

（一九五四年十月六日）

我对戏曲艺术改革的看法·

中国各个艺术部门，都有以下三份遗产：

一、古典的。它是封建时代的文学艺术家们屡次从人民大众中吸取来的艺术精华、并加以提高而成的。每次的成果为封建统治者利用后，就慢慢发展为只为他们捧场而脱离群众的东西。好在人民大众，不论别人怎样对待他们的文学艺术，他们自己是接着自己原有的传统另行发展它们的，于是过一些时期，就会另有文学艺术家来吸取他们新的文学艺术精华来加以提高……这样节节前进，就造成各个艺术部门的发展史，就汇成各个段落的丰富遗产。

二、民间的。前边说过，人民大众是接着他们自己的传统来发展他们的文学艺术的，因之，现在还有好多具有特种风格的民间文艺、民间艺术在人民中间流传着。

这两份遗产，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产物——其中也有外来的，但因时间悠久，已和中国的化而为一，而且也是封建时代的。因为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就没有表现封建社会以外的生活的基本因素，不能表现后来受了资本主义影响的新事物，更不用说表现现在向着社会主义迈进的生活。自然民间艺术是会吸收新事物的，不过在自然状态下的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在新事物变成群众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之后），赶不

• 本篇最初发表在一九五四年《戏剧报》十二月号。

上现在需要。

三、外国的。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生活变化得太快，原有的各艺术部门中，都没有表现这种新现实的基本因素（如艺术的词汇、歌曲的基本情调、绘画的线条和色彩、舞蹈的基本动作等），单靠自己的创造马上又补充不起来，于是就从资本主义国家中学来一些中国没有的东西（如话剧、西洋歌曲、西洋画、电影等）以补其缺。

此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还吸收过好多社会主义苏联的文学艺术，但那只能追算在新中国的账上，而不能算作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

在有了第三种遗产之后，文学艺术界曾有一度对待前两种遗产取过消灭的态度——以为应该和对待封建王朝、孔子哲学那样，只在历史古物中为它留一席之地，而在人民生活中消除其影响——但实际上那两种遗产未被消灭，幸而借着爱好者或艺人们的继承和那些无缘得见或无心享受第三种遗产的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保存下来。

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对旧中国留下来的遗产，就开始采取了推陈出新的改革办法；等到新中国成立，更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国，使这一工作走上了正路。特别对戏剧这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因为知道它在群众中的势力大，所以注意得更多一点。

既然对前两种遗产在以前曾一度出现过消灭政策，而且又不曾真被消灭了，在这过程中就产生了“消灭者”和“保存者”两种人。消灭者有它一套消灭的理论（如陈独秀的论调），而保存者则大多数只是爱好的感情支持着的。现在“接受、改革”的道路被肯定下来了，受过“消灭论”影响的人偏注意了

“改革”，而仅有爱好的人则偏重视了“接受”，于是便产生了“粗暴”和“保守”两种偏向。

粗暴者，不细心研究而乱改之谓也；保守者，不愿改动之谓也；而正确的办法则应该是细心研究着改革。

以上是各个艺术部门在对待前两种遗产方面的共同情况——遗产的来路同，遭遇的过程同，对待的偏向同，应采取的正确对待办法亦应同。

以下我本着上边的认识单独谈谈对改革中国旧戏（还只好借这个名词）的看法：

中国旧戏是“歌舞剧”，其主要构成的部分是歌和舞，其他如对话、音乐、人物形象、舞台形象等都是帮助歌舞或补充歌舞之不足的。歌和舞表达感情时候，有它自己的特种方法，不能以说明现实生活的说法来说明它的现实性——它不但没有把现在人的生活原封搬上舞台，而且也不曾把古来人的生活原封搬上舞台。例如在现实生活中，不论古今人，哭的时候都不会配上曲子唱着哭，胡子也都挡不住嘴，袖子上也都不另加水袖；在外国也一样，芭蕾舞中的人可以连转十来个圈子，现实生活中也没有那样陀螺式的人物。它是把生活歌舞化了然后才拿上舞台的。

在旧戏的好多剧种中，我自己的分类办法是分为大戏、小戏两类，大戏属于古典的，小戏属于民间的。小戏大概是以歌为主，长于抒情，其舞蹈的部分仅仅是从大戏中学了点小的动作；有些小戏，从唱词中看来，很像是从鼓词之类的艺术变来的（没有考据）。大戏中的昆曲是歌舞两种成分配合得很紧的。这种戏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它和其他古典艺术在没落阶段的遭遇一样，不但后期的作品言之无物，而且其唱词也只能为

封建的士大夫阶级看着书本才能听懂，完全脱离了群众；再一个是歌和舞配合得太紧，一方面演员演唱起来太吃力，另一方面用歌来传情的时间需要占得长一点，没有那么多的动作来配合歌，歌的部分就受了限制。京戏也采用了其他古典艺术在新兴阶段采取的办法，接受了昆曲可接受的部分，又从小戏（民间的）中吸取了些新的歌唱语言、新的歌唱方法弥补了昆曲的两个缺点——例如大段的唱词是演员站稳了唱的，其中有舞的地方就舞，不应有的地方就没有。不过京戏比起地方大戏来也与昆曲有个性质相同的缺点，那就是士大夫气还显过重——在吸收民间小戏新因素的时候，只选着合乎士大夫气派的选，更泼辣、更合乎人民大众口味的东西取得少。地方大戏（像高腔、梆子等）和京戏似乎是从相同的路子上发展来的，其中接受昆曲的成分和从小戏吸取来的成分也像京戏一样明显，只是更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接近一点。它比起京戏来也有个缺点，那就是每个剧种吸收新成分的范围小，不像京戏那样搜罗的东西多，所以还有地方性。

它和其他兄弟艺术一样，不论属于第一种遗产（古典的）和第二种遗产（民间的），都是封建时代的产物，缺乏足以表现封建社会以外其他现实的基本因素（歌的基本情调、舞的基本动作，以及帮衬那些情调和动作的东西）。例如把刀马换成驳壳枪自行车，原来很有工夫的演员也无用武之地。要是还在封建时代，新的事物在一个世纪中只增加那么有数的几件，也还可以吸收、消化，变作歌舞搬上舞台——小戏从生活中吸取养料丰富自己，大戏丢掉了脱离群众的部分，再从小戏中吸取精华以补其缺，问题就都解决了，无如近几十年来新事物纷至沓来，一下子消化不了，以至于不论大戏、小戏，还只能穿

古人的衣服、演古人的故事；年代越长，那些古人古事脱离群众的生活越远，了解的人越来越少（如击掌、盟誓等古人认为有关生死的生活顶点，在今天的青年看来只觉好笑而已），市场自然就越来越小，要不是其歌舞形式还为民族所喜爱、演员们还有点真工夫尚为别的艺术所不能代替的话，光凭内容，早就见得有人看了。一种艺术的内容已经到了不能迎人的时候，再不从增加新内容上打主意，不论其形式如何完美、技术如何高明，都是挽救不了其死亡的。

在革命时代，就要用革命办法。五四以后文学艺术界曾有一度采取过不理办法、消灭办法、用外国东西取而代之的办法。这些办法也不能说不是革命的，只是那样做是彻底粗暴的。放着在全中国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现成基础不拿来利用、改造、补充、提高，却只想把它平灭了再弄一些洋花洋草来代替它，光从浪费时间上着想也是不合算的。洋花洋草应该搬——多一种有一种的好处，不过那并不妨碍我们同时培养土生土长的东西。从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把这种彻底粗暴的偏向扭转过来了，只是受过那种精神影响的人，有时候不免有些不太彻底的粗暴。例如创造出话剧加唱的戏也是功劳，但硬要以话剧加唱来代替、排斥一切旧歌舞剧，也不能不说是粗暴之一种。

正确的革命办法，应该用人工缩短旧剧在自然状态下发展、变化时要占去的年代。要本着这个精神做，就得照顾到旧剧的特点、发展的规律、当前的缺点、各剧种的差别等等，否则仍会粗暴。

第一、要照顾到旧剧的歌舞作用。我们试把各剧种所唱的《祝英台》剧本中的唱词改成朗诵，或让京戏中《打渔杀家》的萧恩穿上普通渔民服装、照普通渔民走路，那两个戏虽然也不一

定绝对没有人看，可是看了总得不到在歌舞中的祝英台和萧恩的形象。这些歌和舞，是古人把生活歌舞化了，又让演员们从小就在那些基本情调、基本动作上练出工夫来的。要让这些演员们穿上制服、推上自行车来扮演男女公务员，旧工夫一点也用不上，新工夫根本还不知道该怎么练，原因是这些生活还没有化入歌舞中——还没有人把这些生活集中为歌舞中的基本情调、基本动作，而歌舞应特有的化装、服装、道具、音乐等也没有本着这些生活发明出来。这些地方，正是要借重于音乐、舞蹈、美术等各种专家的地方。专家所以可贵，就在于专家能运用他的科学知识来适当对付当前的现实——也就是他有创造的资本；我们这些不是专家的人，往往只能东搬西凑抓一些现成东西，弄得古一块、今一块、中一块、洋一块不成体统，仍不能说不是粗暴。

第二、对于大戏和小戏要分别对待。小戏一般说来都不太成熟。这虽是小戏的缺点，同时又是个优点。小戏在历史上容易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养料，恐怕也就是因为它一向就是不太成熟，把没有歌舞化了的东西增加进去不觉着太刺眼，有时候出一点笑话也觉着可爱，加进去以后，慢慢也就歌舞化了。用人工帮它发展的办法，就是帮它对新的养料吸收得快一点、消化得快一点。大戏虽然比小戏脱离得现实生活更远，可是旧的资本雄厚，容易保守。用人工帮助它的办法，一方面仍遵循它的发展规律，丢掉一些彻底脱离群众的东西，再从小戏中吸收一些从前在封建思想支配下漏掉了的精华（不过要缩短时间：从前在丢掉一种旧东西的时候，一直要等到绝对没人理了才罢，现在应该用科学方法分析一下，该丢的就忍痛割爱。在吸取小戏精华方面，已经有观摩、会演的办法可以缩短时间了）；另一方面

要越过小戏直接从生活中提出精华来化为歌舞，使其面目改观（不是脱离基础的改观，而是像昆曲和京戏的差别那样大，甚而更大一些）——因为小戏本身还没有在现代生活中吸取到多少东西，光凭集中小戏的精华仍没有多少现代生活的成份在内。

第三、对成就最高的古典节目（包括地方大、小戏的代表节目）要保存下来作为借鉴。《小女婿》一类的新节目演遍全国，作用很大，但像周瑜、赵云、罗成那样的人物形象还不多，要把我们今天的人物歌舞化了，化成像周瑜他们那样动人形象，起的作用不更大一点吗？要保存一些借鉴，就可以使年轻一点的人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新人物还歌舞化得不够或者还没有化、需要化；要没有借鉴，他们可能以为歌舞戏不过就是那么个样子。苏联现在也是这样做的。保存戏的借鉴，和保存诗、文、画等不同，因为它在活人身上，所以还得学习下去。

我对戏剧改革工作的看法就是这样简单。对于戏剧这种艺术说来，我仅仅是个热心家，只把我的观感说出来供大家参考，不对的地方请付之一笑可也。

至于我上面提到的第三种遗产——从外国取来的，在戏剧方面为话剧、歌剧、舞剧——是自成体系的，在旧戏改革方面是些重要的借鉴，但其本身和中国旧戏是两回事，所以这里不谈。

论“吃社果”说法的错误*

有个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土地少或土地薄的农户入社公开拒绝。他们“发明”了一句讽刺话，把这些户叫做“吃社果”（意思就是“剥削”社的生产果实）。这样说法，在政治方面固然违反了依靠贫农的政策（因为贫农的土地一般是比较少比较薄的），在经济核算方面也是毫无根据的胡说。现在我试从经济方面和他们算一算账。

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应该说有它的决定作用，要不然就用不着经过土地改革从地主手里收回土地。可是在一个农业生产单位（一个户或一个社——互助组不算）有了差不多足以发挥劳力的土地以后，这种决定作用就不存在了。比如有一户的劳力，最多可以耕种十五亩土地，要是只有十亩的话，照样可以在这十亩地上取得十五亩的产量。让我举两个实际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我的家乡，每个全劳力，通常可以种二十亩旱地（保证达到常年的平均产量），可是种不了三亩菜园；而三亩菜园要真种好了，那产量价值可以超过二十亩旱地。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九五二年试验了一亩玉蜀黍丰产地，用二百二十担肥料（厩肥、人粪尿），耕锄三遍，产到一千五百八十斤，而这一亩地在土地改革前不过是四五百斤产量的地。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政治学习》第三期。

要是连那三亩园地也没有，自然不能种菜；要是连那一亩试验地也没有，也便没处试验丰产。可是和菜园子并排着的地为什么不都种成菜园，和丰产地并排着的地为什么不都加上二百二十担肥料、耕锄三遍呢？那便是因为劳力不足了。

假如有个社，每个全劳力只平均三亩土地，而这些土地又不一定能做菜园地或者作丰产试验，这个社自然站不住。可是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的农村是经过土地改革的，土地差额不会有那么大。又假如有个一百户的社，每户一个全劳力平均有十五亩地；另外有二十户，每户也有一个全劳力，可是只有三亩地；这二十户加入了社，每个全劳力平均土地数成了十三亩（总数为一千五百六十亩），难道在增加了二十个全劳力以后，在每十三亩地上不能找出十五亩地的产量来吗？在一千五百六十亩土地中，难道找不出足够发挥多余的二十个劳力的园地、试验丰产地或其他可以增产的机会来吗？只要社干部肯用脑子的话，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光从人家每人只有三亩地来看问题，好象和原来社员的土地相比是一比五，可惜忘记了全社是一个生产单位。假如从前有一个拥有一千五百亩土地的经营地主，要是有一年多雇了二十个长工的话，他是会从这二十个人身上剥削到和其他长工一样的劳动果实的（这二十个人，每人连三亩地也不用带），因为他为了剥削肯用他的脑子。难道一个领导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长，不应该比一个剥削者更会用脑子吗？

集体经营土地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可以有重点地使用土地——因为有比较大量的土地可以选择重点，又有相当多的劳力、成本可以加在重点上。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要是发现在重点上增加劳力和成本比把劳力、成本平均用在每块土地上合

算的话，甚而让一些质量很不好的土地休息几年都可以——因为种地为的是产量，只要产量多，不在乎产在哪一块地上。

有些人见土地少的人入社以后的收入有很大的增加，就觉眼红，以为人家是占了大家的果实；也有些人入社以后看见自己土地上的产量有很大的增加，也觉眼红，以为要不入社的话都是自己的，入了社别人占了他土地生产的果实。这些说法也都是站不住的。土地少的人在入社以前收入少，可能是自己的少量土地没有足以加工的条件，以致窝了工；也可能是虽然有可以加工的土地而自己的经营方法保守，不善于利用这种条件；还可能是剩余的劳力虽然找到出路，可是受了别人的剥削（如给人做短工）……。入社以后，这些情况都消灭了，自然会充分发挥出他的劳动力，并且得到足够的劳动报酬。社的经营如果恰当的话，没有他这个劳动力，在总产量方面就要减少，别人仍然不能多分。他增加的收入，正是他的劳动果实，并没有占别人的果实。个人的土地在入社以后增加了产量，可能是你过去的劳动能力差，也可能是社在你的土地上加了成本加了工。这种增产是社里集体增出来的，不是你的土地自己增加的。假如你能增加的话，在入社以前多年耕作中为什么不增加？难道你不是每年都想尽量增加吗？这种增产既然是集体力量的成果，自然就该归大家享受，你自己也得到了一份，别人没有占了你的果实——假如要把增加的部分全归了你，那倒是你占了别人的果实了。

要把土地多、土地好算作入社的标准的话，会把贫农和土地数量、质量较差的中农排斥在外，会鼓励尚未入社的农民投机买地，使失去土地的人更增多起来；会使社员在社内的地位以入社土地多、少、好、坏为标准（即土地多而好的人才能当

领导干部)；会使社内强调土地分红而轻视劳动的价值；会强调土地的自然条件而使经营、耕作的方法都偏重保守；会使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农村中一种特殊的以富农思想为基础的小集团。这和国家在过渡时期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是不相容的。希望农村的基层领导同志们注意检查、纠正这种严重的偏向。

《三里湾》写作前后*

一、为甚么要写《三里湾》

中国革命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过渡时期的开始，全国人民在这种新的历史任务之下都经过了个创造新经验的时期。在这时候，文艺界在创作方面虽曾有一度不太活跃，可是作家们并没有闲着，大部分都到各种社会主义工业或农业建设的业务中，跟着大家摸索经验。我是愿意写农村的，自然也要去摸一摸农村工作如何转变的底，于是就在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又到我所熟悉的太行山里去。

这地方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初期就开辟了的老解放区，群众觉悟较高，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长期保证着战争的一切需要，而且在战争中老早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自一九四二年减租减息（土改的初步）开始后，就出现了初级形式的互助组织。可是在革命由新民主主义性质转变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性质的时候，领导这地方的农业生产工作者也曾有一段觉着工作不太顺手：第一、在战争时期，群众是从消灭战争威胁和改善自

*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一九五五年十九期。

己的生活上与党结合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宣传接受得不够深刻（下级干部因为战时任务繁重，在这方面宣传得也不够），所以一到战争结束了便产生革命已经成功 的思想。第二、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互助组织，原是从克服战争破坏的困难和克服初分得土地、生产条件不足的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而这时候两种困难都已经克服了，有少数人并且取得向富农方面发展的条件了；同时的好多年中已把“互助”这一初级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再增加更能提高生产的新内容，大家便对组织起来不感兴趣了。第三、基层干部因为没有见过比互助组更高的生产组织形式（像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在这时候，全国只有数目很少的若干个，而且都离这地区很远），都觉着这一时期的生产比战争时期更难领导。

我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委会（山西长治专区），碰到他们也正在研究上述那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他们根据当地的情况，又参考了一些苏联和各民主国家的办法，拟定出一种合作的形式，决定在本专区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拟定办法和动员工作，并于动员之后往两个愿试办的农村去协助建社。

这次新的试验，果然给领导生产的县区级干部开辟了新道路，给附近农村增加了发展生产的新刺激力——虽然生产动力和土地所有制没有变动，但以统一经营的方式增加了土地、劳力、投资等的生产效率，以土地、劳力按比例分红的办法照顾了土地私有制，保证了增加产量和增加每个社员的收入——试验的结果良好，附近农民愿意接受，中央也批准推广。

我从前没有写过农业生产，自他们这次试验取得肯定的成

绩后，我便想写农业生产了，但是我在这次试验中仅仅参加了建社以前的一段，在脑子里形不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面貌，只好等更多参加一些实际生活再动手，于是第二年便仍到一个原来试验的老社里去参加他们的生产、分配、并社、扩社等工作，一九五三年冬天开始动笔写，中间又因事打断好几次，并且又参观了一些别处的社，到今年春天才写成《三里湾》这本书。

二、为甚么写了那样几个人

在农村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然是共产党。有些好党员，在办社的工作中显示出高尚的品质、丰富的智慧和耐心、细致的作风——他们都是不脱离生产的人员，但是能够把领导工作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生产放在第二位，经常为了会议、为了计划、为了解决个别问题……而废寝忘食。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甚高，但是对人对事都能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作出非常实际的具体对策。千头万绪的事情碰在一个时期，在他们是见惯了的，可以分开轻重缓急一件一件处理，不会弄得手忙脚乱。正因为农村中到处有这样一些好党员，才把推广农业生产合作社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为了表现这种人，所以我才写了王金生这个人物。

接受党的领导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快的是翻身贫农，而就我见到的翻身贫农参加社的，更有两种可爱的人：一种是在生产上创造性大的人，这种人每遇到传统的生产技术不如自己想象得顺利的时候，就产生改良工具或改变作法的念头。他们作些新的研究、试验，得到一些成功，从而把自己的兴趣逐渐

从生产目的（经济收入）转移到生产工作上上来，只要新的试验有成绩，赔一点本也满意。他们在个体经营的小块土地上耕作，那些发明创造一来需要有限，二来试验的地盘太小，三来也得不到鼓励或帮忙，入社以后，社是新扩大了的生产组织，有些地方常感到在经营小块土地时候的传统办法不够用，须要接受一些和创造一些新的事物来补那些空子，领导者把这些责任委托了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必要的土地和材料、用具，使他们发挥其才能，所以他们都觉着参加了社如鱼得水，都以忘我的精神时时为这种新的生产组织增加新的生产效能——这种效能，在动力未变之前，对增加生产是有重要意义的。再一种是心地光明维护正义的人，这种人往往是在解放以前和地主阶级斗争最激烈的人。他们经过了斗争的锻炼，受到了解放区民主生活的教育。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认识了地主阶级假公济私、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爱财如命……种种丑恶的品质，并且恨之入骨，久而久之，便给他们自己造成一种疾恶如仇的性格。他们对一般农民的错误也恨，不过很自然地和对付地主阶级有所不同。不论哪个农民，只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就有和地主阶级相同的一面；不过当他还没有发展到变质的时候，他仍然保有与一切劳动人民相同的一面。上述那种维护正义的人，对待一般农民的错误，往往恰好掌握到这个分寸。他们有个说法叫做“对事不对人”。他们对一般人没有什么私仇，只是见到不平的事他们要说话。这种民主精神，大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的集体生产组织所需要；而他们也乐于参加到这种容易发挥民主精神的集体生产组织中来，以便逐渐消灭他们自己所痛恨的事。为了表现这两种人，所以我才写王宝全、王玉生、王满喜等人。

在办社工作中还有一种新生力量是青年学生。这些人，不一定生在贫农家庭，自己对农业生产工作也很生疏，然而他们有不产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而没有一般农民传统的缺点。一个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逐渐向着完全社会主义化方面发展，对这样的新生力量是应该重视的——因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任何部门都是需要一般知识的。为了表现这种新生力量，我所以才写范灵芝这个人。

但原来的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思想上都有倾向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一面，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正是为了逐渐消灭那一面。但是那一面不是很容易消灭的。目前的农村工作中，几乎没有一件事可以不和那一面作斗争。那一面对农业生产合作化是一种离心力，而这种离心力时时影响着的一部分社外群众，侵蚀着一部分社员、一部分青年，甚而侵蚀着一部分党员。在办社工作中，党对于这种离心力也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斗争。为了批评这种离心力，我所以又写了马多寿夫妇、马有余夫妇、袁天成夫妇、范登高、马有翼等人。

三、写法问题

中国在解放以前，文化很不普及，人民大众所享受的传统文艺作品，大部分是通过戏剧和曲艺艺人口头的传播才领会到的；五四以来，中国文艺界打开了新局面，但是过去这种新的作品还只能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广大群众依旧享受的是原来享受的那些东西。这样一来，中国过去就有两套文艺，一套为知识分子所享受，另一套为人民大众所享受。

既然有这个差别存在，写作品的人在动手写每一个作品之前，就先得想到写给哪些人读，然后再确定写法。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但是照顾传统的目的仍是为了使我所希望的读者层乐于读我写的东西，并非要继承传统上哪一种形式。例如农民在传统上也听评书，也听鼓词，也听识字人读章回小说或说唱脚本，也听口头故事，也唱民歌，也看戏；有创作才能的人，也把现实中的特殊人物、特殊事件加以表扬或抨击，加油加醋说给人听，编成歌曲到处传唱。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在的文艺生活，我究竟继承了什么呢？我以为我都照顾到了，什么也继承了，但也可以说什么也没有继承，而只是和他们一道儿在这种自在的文艺生活中活惯了，知道他们的嗜好，也知道这种自在文艺的优缺点，然后根据这种了解，造成一种什么形式的成分对我也有点感染，但什么传统也不是的写法来给他们写东西。同时我这种写法也并不能和大多数作家的写法截然分开，因为我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面——中国民间传统艺术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

中国民间文艺传统的写法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呢？我对这方面也只是凭感性吸收的，没有作过科学的归纳，因而也作不出系统的介绍来。下面我只举出几点我自己的体会：

一、叙述和描写的关系。任何小说都要有故事。我们通常所见的小说，是把叙述故事融化在描写情景中的，而中国评书式的小说则是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的。如《三里湾》第

一章写玉梅到夜校去的时候，要按我们通常的习惯，可以从三里湾的夜色、玉梅离开家往旗杆院去写起，从从容容描绘出三里湾全景、旗杆院的气派和玉梅这个人的风度仪容——如说“将满的月亮，用它的迷人的光波浸浴着大地，秋虫们开始奏起它们的准备终夜不息的大合奏，三里湾的人们也结束了这一天的极度紧张的秋收工作，三五成群地散在他们住宅的附近街道上吃着晚饭谈闲天……村西头半山坡上一座院落的大门里走出来一位体格丰满的姑娘……”接着便写她的头发、眼睛、面容、臂膊、神情、步调以至穿过街道时和人们如何招呼、人们对她如何重视等等，一直写到旗杆院。给农村人写，为什么不可以用这种办法呢？因为按农村人们听书的习惯，一开始便想知道什么人在做什么事，要用那种办法写，他们要读到一两页以后才能接触到他们的要求，而在读这一两页的时候，往往就没有耐心读下去。他们也爱听描写，不过最好是把描写放在展开故事以后的叙述中——写风景往往要从故事中人物眼中看出，描写一个人物的细部往往要从另一些人物的眼中看出。

二、从头说起，接上去说。假如我在第一章里开头这样写：

“玉梅从外边饱满的月光下突然走进教室里，觉着黑古隆冬地。凭着她的记忆，她知道西墙根杈杈零乱的一排黑影是集中起来的板凳……”这样行不行呢？要是给农村人看，这也不是好办法。他们仍要求事先交代一下来的是什么人、到教室里来做什么事。他们不知道即使没有交代，作者是有办法说明的，只要那样读下去，慢慢就懂得了；还以为这书前边可能是丢了几页。我觉得像我那样多交代一句“……支部书记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便到旗杆院西房的小学教室里来上课”也多费不了几个字，为什么不可以交代一句呢？按我们自己的习惯，总以为事

先那样交代没有艺术性，不过即使牺牲一点艺术性，我觉得比让农村读者去猜谜好，况且也牺牲不了多少艺术性。在每一章与另一章衔接的地方也有这样性质的问题。我们通常读的小说，下一章的开头，总可以不管上一章提过没有，重新开辟一个场面，只要等把全书读完，其印象是完整的就行，而农村读者的习惯则是要求故事连贯到底，中间不要跳得接不上气。我在布局上虽然也爱用大家通常惯用的办法，但是为了照顾农村读者，总想设法在这种办法上再加上点衔接。如我写《三里湾》的第二章从玉梅回家写起，就完全为了照顾农村读者这个习惯，否则这一章尽可以一开始就写打铁的局面，而且根本不让玉梅在这一章出现也可以——因为这一章没有表现玉梅特点的地方。

三、用保留故事中的种种关节来吸引读者。评书的作者和艺人，常用说到紧要关头停下来想办法来挽留他们的听众（如说到一个要自杀的人用衣衫遮了面望着大江一跳的时候便停下来之类），叫做“扣子”，是根据听书人以听故事为主要目的的心理生出来的办法。这种办法不一定用在每章章末，而有许多是用在中间甚而用在开始的。例如有一本说秦琼打擂台的评书，说秦琼一上了擂台就被早已要捉拿他的官府捉进狱里去，并有消息说第二天午间就要斩头，他的一个朋友听了这消息，就赶往各处通知他的许多英雄朋友第二天到刑场来抢救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来一个个地写他的英雄朋友，并且每个人初出现都附带着一些小故事，说起来要说两礼拜的工夫才能说到刑场抢救的事，而在每一段落上又都各有些“扣子”。这种办法的作用很大，但有个毛病是容易破坏章节的完整。我在不破坏章节完整的条件下也往往利用这种办法，不过不一定用在章末。

在《三里湾》中我也试用过一些——明显的如“刀把上”的一块地、一张分单、范登高问题、灵芝与有翼的关系等就是——不过远不如评书伏下的“扣子”那样有力。

四、粗细问题。细致的作用在于给人以真实感，越细致越容易使人觉着像真的，从而使看了以后的印象更深刻。我们看一张细致的油画，见到画面上的人物神情、服装、所携用具、周围景色以至远处的水光、山色、春天、白云……件件逼真的时候，有时觉着自己也可以进到画中去，看了以后可以很久或终生忘不了。我们读了写得细致的小说也有同感（当然艺术品的细致都应是有选择的而不应是自然主义的堆砌）。不过小说和画究竟有所不同，因为小说是用文字写成的。看一张细致的画，在细看的时候固然一花一草都能看到，但即使在粗心大意的时候，也可以领会了其中突出的事物，而读小说却不能很自然地把次要的事物跳过去而看出突出的事物，因而就要对不同习惯的读者对象作不同的安排，以便于使他们愿意从头到尾——读完以后领会得深浅，也和看画一样是各有不同的，不过要不能使他们读完，就会连个浅的印象也没有。前边谈到叙述和描写的关系中，曾提到中国评话式的小说是把描写情景融化于叙述故事中的，但为了少割裂故事的进展，为了使读者于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读完，在通常小说写得细致一点也不算过多的地方，在这种形式的小说中可以简到很少甚而不写。例如我在《三里湾》中第一次写到马家院，只写了它的大门上的栓子、搭子、腰栓、楔子、顶门杈、黄狗等而没有写院内秋收时候应有的景物，马多寿家几个人的声音、面貌等。本来院中的景物和这些人物的外观写上去也不为多，有好多地方还可以使人对马家的印象更深刻，但不写上去对于了解马家的影响也不大，而且

可以节约读者多读几百字的时间负担。过去的评书艺人在这些地方是描写的，而且有时候写得很长——相传有个艺人说《西厢记》中的莺莺在进一重门的时候，说了一个礼拜还没有进去，而听众还不觉得厌烦。我以为这是过去评书的一种毛病：过去在茶馆里说书的评书艺人是每说一段收一次费的，而听众又有些是有闲阶级（可以说是职业听众），每天可以误上整天工夫来听书。这一类听众，要求的是轻松扯淡的小趣味，而并不打算在其中接受什么教育。艺人们为了照顾到这一批长期顾客，有时候就得加油加醋以适应他们的需要。不过一般听众仍是要求故事进展得快一点，主要的内容厚一点的。今天那样一类有闲的听众没有了，所以写莺莺的时候，写到她突破封建婚姻制度的地方不妨多花点笔墨，而对她进门的姿态、风度尽可以少写，至于有闲阶级要求加入的色情的部分则要去掉，以便于使我们的新的听众尽可能在少的娱乐时间里，接受到一整本足够深刻的《西厢》故事。

究竟什么地方应粗、什么地方应细呢？我以为在故事进展方面，直接与主题有关的应细，仅仅起补充或连接作用的不妨粗一点；在景物和人物的描写中，除和以上相同外，凡是直接的读者层最熟悉的可以不必细写（只要提及几点特殊的东西，读者就用他们的回忆把未写到的给补充起来了），而他们较生疏的就须多写一点。我一向是这样做的，只是在应细的地方而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则作得不够。

关于写法我谈这几点。中国评书中的技术有它自己已经形成的比较完整的道理，只是这一套道理还在好多艺人同志们的头脑中，没有人写成书。以后我还准备向他们作一次全面的学习。

此外还有语言问题。我对运用语言方面的看法，一向不包括在写法中。我以为这只是个说话的习惯，而每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说话时候都有他们的特种习惯，但每一种特殊习惯中也有艺术的部分，也有不艺术的部分。写艺术作品应该要求语言艺术化，是在每一种不同语言的习惯下的共同要求，而我只是想在能达到这个共同要求的条件下又不违背中国劳动人民特有的习惯，结果在“艺术化”方面只是能“化”多少“化”了多少（根据我的能力），而在保持习惯方面做得多一点而已。

四、还有几个缺点

我在抗日战争初期是作农村宣传员工作的，后来作了职业的写作者只能说是“转业”。从作这种工作中来的作者，往往都要求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这种要求本来是正当的，是优点，可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不够，所以又存在着以下三个缺点：

一、重事轻人。在实际工作中，任何事都是多数人做的，其中虽然也有骨干，而骨干也是多数，每个人发挥出他一部分积极作用就把事办了。在一个作品中自然应该集中一些，节约一些不必要的人物，突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要做到这一步，自然就应该更深入一些去体会每个人的积极面。我因为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够，所以常常写出一大串人，但结果只有几个人写得周到一点，把其余的人在故事中用一下就放过去，给人一个零碎的印象。

二、旧的多新的少。在转业之前我接触的社会面多，接触的时间也长，而在转业之后恰好正和这相反，因而对旧人旧事

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了解得浅，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现在较以前好一些，但还是努力不够。

三、有多少写多少。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我往往因为要求速效，把应有而脑子里还没有的人和事就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

这三个缺点，见于我的每一个作品中，在《三里湾》中又同样出现了一遍——如对魏占奎、秦小凤、金生媳妇、何科长、张信、牛旺子……就只是见了见面而没有显示出他们足够的作用。又如写马多寿等人仍比金生、玉生等人突出。再如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用，因为我自己见到的不具体就根本没有提之类。

这一切都只能说是在创作之前的准备不充分。为了迅速地配合当前政治任务，固然应该快一点写，但在写作之前准备得不充分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赶紧把不充分的地方补充准备一下然后再写，而不是就在那不充分的条件下写起来。我愿意在今后努力克服这些缺点，准备以缺点更少的作品和大家再见。

（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

谈课余和业余的文艺创作问题*

——答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来信

近几年来接到青年文艺爱好者很多来信（大部分是中学生的，小部分是各种岗位上的工作者的），其内容大致不出以下的三种要求：要我谈生活经历、写作经验、写作方法。我对这些来信，回答的虽说也不算太少，可是比起来信的数量来，是相差太远的——往往是回了几封，把其余的留在桌子上；桌子上堆起来，用纸包住批上“待复”字样放到抽斗里；可是信还是源源而来，待复的那一包还没有来得及复，桌子上就又积够一包，终于一包一包把抽斗塞满，移到柜子里。现在因为整理柜子，翻出历年的积信来一看，居然还有一九四九年的。这真是罪过——那时候的初中一年级生，现在已是高中毕业生了。

回得太少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主观努力不够，另一方面也因为信中要求的内容不太容易回答得清楚、准确。现在我可以先谈谈困难之处：来信的人所以提出要求，自然是想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一点什么好处（或者说是帮助）的，因而在回信的时候就得考虑到回信的实际作用。如果照来信常提到的三个内容直接答复，不会有多大好处，甚而还有些副作用。

例如谈我的生活经历吧：我虽出身于一个下降的中农家庭，可不是一个安心生产的农业生产者；我上过师范学校，可

*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学习》1955年第11期，后收入《三复集》。

又不是个安心学习的好学生；我当过小学和初级师范教员，可又不是个安心于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因为时代不同，我当时的不安心是对的——那时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正希望一切劳动人民安心于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所谓“本分”，永远为他们服务——可是把这种经历介绍给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学生和各种生产、建设岗位上的文艺爱好者，又有多少参考价值呢？要是作为传记来看，也许对人有点鼓舞作用，不过在先进的革命者中间，其革命精神比我胜过千万倍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要读我的传记，何如读他们的传记呢？要我写我，何如我写他们呢？况且提出要我写经历的人，其目的是想用我的经历作为他走上写作之路的参考的，万一我解释得不周到，就会害得他们不安心学习、不安心生产、不安心工作而脱离现有岗位去找“写作之路”（事实上已经有几个人是这样来找过我了），这样，岂不是比不回信的罪过更大吗？

谈到经验，也有同样的困难：一个人的经验是和他的出身、经历不容易分开的。我曾在一篇题为《也算经验》的小文章里谈过：我的经验，就是我的出身和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阶级斗争，而出身是每人一个样子，谁也不能和谁学习；至于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斗争（应包括生产斗争在内），也只有希望大家从生活和工作中取得经验，事实上大家也都自然在这方面增长着经验，而取得的方法又是多种多样，远远超过我自己那点狭隘经验的。

至于写作方法，在一封信里能谈到些什么呢？无非是劝大家深入生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认真参加各种斗争；劝大家多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劝大家多读文艺作品、文艺理论。也许有人想在一封信、一席话或一本小书里得到某一门全

面知识或某一种简便方法（我当学生时候也曾这样希望过），可是取得任何一门知识都不会那么便宜。一席话、一封信或一本小书能告人以学习或研究的路子，但不会把前人花费过无限精力所取得的东西全都放到里边去。常见一些学生不去系统地复习各种功课而去读一本《投考指南》一类的书，结果多数还是升不了学，其原因就是为了想找简便的办法而把自己的知识弄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统，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因为从实际效果出发考虑到以上一些问题，所以我对于回信的工作不太积极，虽然有时候一封信也能写到好几千字，但很少是正面回答来信所提出的三个要求的。

下面我可以把我在近几年来所写过的回信中的内容，分为给课余者（中学生）和业余者（非中学生）两方面概括叙述一下，作为我对所有积压信件中提出三个要求者的总答复。

对中学生中的文艺爱好者

一、爱好文学是好事，正如爱看戏、爱看电影一样，应该人人都爱好，但如果把它当成自己的“业务”，放弃了学校里的功课，那是不对的。无论看戏或读文艺作品，都只能算是课余的活动。

二、爱好文艺的时间一定要放在课余。有些人对“课余”的解释不正确，常常对每一种功课都还没有十分的把握，没有做到十分熟练的程度，以为下了课就是课余了。在自习时间，对课堂上学到的新教材大致看了一下，以为没有问题了，就去爱好文艺去，那是不对的。例如数学和外国语文，如不经过足够的练习过程，演起来、读起来常是手生、口生，仍难免用时困难。

三、不要想在中学生时代当作家。作家有个最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要懂得社会。中学生生活的圈子只是学校和家庭，所接触的社会面太狭窄。自然家庭和学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毛主席告诉作家们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学生所知道的社会情况太少，而且也没有学会怎样研究。只是这一个条件不具备，就不要打未出学校先当作家的主意——因为可写的太少，基本知识也太少。

四、不要乱投稿。第一、乱投稿是把文艺创作看得太容易的表现。中学生中，各自有自己的爱好，因而各自有自己的志向——比方爱好数学的将来想当数学家，爱好理化的将来想当工程师或医生等。但爱好别的科学的，他们一般希望的是“将来”成为专家，并不希望在未出学校、连基本知识也没有学会以前就成为数学家、工程师、医生等，而有些爱好文学的人却偏希望的是“现在”，难道不是以为世界上只有文艺创作才用不着什么知识吗？第二、写作多了一定妨碍学习。有些人来信中说他们一年中投了几十篇稿，都被一些编辑部用千篇一律油印的退稿信给退回去了。他们对这些编辑没有给他们以具体帮助大为不满（还有人把退稿的油印信件寄给我看），并且说相信我要比那些编辑们对他们负责。这一类信我大部分是回了的，不过回信的内容不是帮助他们创作下去，而是诚诚恳恳劝告他们不要急于创作，其理由和我现在写的这篇文章说得差不多。我现在除了写作没有别的业务，可是一年半载也不能保证必然能写出一个东西来，因此我不相信他们有那么多的“课余”时间。两个月以前，山西某县一个高中二年级生到北京来找我谈写

作，并要我给他在文艺界找工作，我问明他的来历，才知道他去年在他县里的石印小报上投了个稿，发表以后得了一等奖，从此就当县里的文化人，经常参加文化活动，慢慢就退了学。我劝他回去恢复学籍，他说恢复不了。我问他是否自然科学跟不上，他笑了笑说是的。这难道不是被投稿所害的吗？这难道不是惨痛的教训吗？第三、练习写作不一定要投稿。有人接了我劝他不要投稿的信，来信反问我：“我不是想当作家。我的投稿只是练习写作。难道练习也是不应该的吗？”不论将来当不当作家，运用语文的技术都应该是从学生时代就获得的，因此，练习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练习运用语文的阶段，最能帮助你的人是你的语文老师，而不是文艺杂志的编辑。试想一个班级的语文老师，只帮助四十个人的习作往往还忙不过来，如何能希望一个志杂的编辑对每一个投稿的中学生给以具体帮助呢？假如每一所中学每一个班次只有一个人每年投几十篇稿，恐怕每个志杂社就连油印的退稿信也印不出那么多来了。假如你真有“课余”时间，又爱好文艺，那么，参加学校的课外文艺写作活动，多练习写几篇也好，多学一些文艺上的道理更好，只是仍不要轻易投稿。比方一个爱唱歌的人，在课外多练练嗓子，多唱几个歌也是很好的，但千万不要轻易卖票公演，尤其不要牺牲了学习去卖票公演。

五、不要以为将来当作家可以不学文艺以外的知识。知识是一切人都需要的。当一个作家不只自己要做人，同时还要在作品里表现各种阶层的人，因此对任何知识都不应忽视。在学校时期，为了爱好文艺和练习写作而放松了别的学习是很不应该的。也有人以我为例，说赵树理没有学过多少科学既然可以写作，就可以证明作家是不要多少科学知识的。不行！时代不同

了！我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学习写作的，而且写的是农村的生活，你们是在社会主义工业时代学习写作的。在我开始写作的时代，除了大城市有一点进口机器以外，绝大部分生产者都还用的手工业工具；到你们开始写作或者稍后一点的时候，不论城市和农村，都是向着电气化、原子能化迈进的。在我开始写作的时代，全国的成人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到你们开始写作或者稍后一点的时候，这个百分数会倒过来，而且中学毕业生要比今天的粗通文字者还多，再往后中学教育还要成为一般人民的起码教育。到那时候，我写不了的东西正应该你们来写了，你没有科学知识如何能行？千万不要放弃了中学时代这个学习机会。假如有机会的话，我自己还要补一补课。我以为中学的同学们，好好把自己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再参加一段社会生活，或更上几年高等学校，然后再计划写作，一点也不算晚——要比我开始写作的年龄还早得多。

有人要问“中学生从事创作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呢？”特殊的例外是有的（如在入中学以前就参加过社会生活的人），但不能当作方向——假如有十万人当作方向走，其中即使能出十个作家，害得其余绝大多数一事无成，不也够惨痛吗？况且这十个人为了学得更饱满的知识晚几年写作，不是会成为更好的作家吗？

我这几年写给提出前述三个要求的中学生的回信，大致不出以上这几点内容。

对业余的文艺爱好者

前边提过，业余文艺爱好者给我来的信本来就不多，而且

大部分我已经各按具体情况回过了，剩下的也仍只是恐怕起到副作用的那一部分，因此我在这里谈到的业余文艺活动，只是谈我对这件事的一般看法，不尽是——而且大部分不是——以前对这方面回信的内容。

业余的文艺爱好者，其具体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以职业性质论，包括各行各业；以文化程度论，从受过高等的专业教育者到粗通文字者都有；在政治锻炼方面，有久经斗争的老干部，也有刚刚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在文艺修养方面，有发表过文章、出过书的，也还有刚刚阅读作品的……但是这一切人共同有个和中学生不同之点，就是这一切人都已经各自成为社会业务部门的一个成员。只有参加了社会建设事业，才容易热爱这种事业；只有大小负过一些责任，对人对事才容易从实际出发去深入了解。这是文艺创作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业余的文艺爱好者是已经具备或容易取得这条件的。业余文艺爱好者要想创作的话，在这方面不但比中学生便利得多，而且有时也比职业作家便利。

现在的职业作家，很少不是从业余来的，而且这种情况也不会很快就变动，因此可以说业余文艺爱好者中的从事创作者是未来作家的后备军。

业余文艺爱好者的作品，是文艺食粮的重要来源之一。要把全国各个大小不同的文艺杂志发表的作品作个统计的话，我以为业余作者的作品还要占多数。

业余，是有着充分学习写作的可能的。我曾听过一位苏联工会工作者关于工人俱乐部工作的报告，他说苏联的工人们无论有什么才能，都可以在业余得到深造的机会，甚而在个人需要研究室的时候，文化宫也准备了这种研究室；有些工人已经

成为各种不同的专家了。还听过一位中学校长说，他们在业余可以学习一种高等函授学校的课，毕业以后可以取得和在高等学校学习毕业的人同等的学位。我们的国家在物质上虽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但在工作制度上，业余学习时间是有的，物质生活是稳定的，文化、娱乐组织是有的，书籍供应量是很大的，只要自己努力，个人是可以学习的。

对业余的初学写作者，我想提出以下的几点参考意见：

一、业余创作一定要保证“业余”性。在业务方面自己不愿意争取模范，那就不能保证你热爱模范，也就不能保证你热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业务，从而也就不能保证你在作品中表扬的对象是最值得表扬的，批评的对象是最应该批评的。我曾接到过几封刚从中学毕业回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和作小学教员的人的来信，说他们响应报上的号召，已经到职业岗位上去了，但接着就说他们是文艺爱好者，要我告他以创作方法。响应号召参加职业是很好的，但刚到职业岗位上，总得有个时期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钻研业务方面，同时还要和同事们以及业务范围以外其他要发生关系的人们互相了解。在这些时候，应该是顾不上创作的，待到对业务熟悉一些，对周围的人了解得深入一些，才可以想到创作。

二、创作的动机。为创作而创作，也和为说话而说话一样滑稽。当你见到一些好人、好事、好环境、好东西就会高兴，见到一些坏人、坏事、坏环境、坏东西就会生气，那就是对这些表示了态度。这些好的或坏的一切给你造成的印象如果太深了，你见了和你谈得来的人必然会源源本本叙述给他听，有时候还会加枝添叶造成种种风趣，用文字写出来就可以算文艺创作。不论你是用口说这些还是用笔写这些，都有一个目的，就

是你想用感动过你、给你造成深刻印象的事物去感动别人、给别人造成深刻的印象——把你的爱或憎传给别人，使别人共同和你爱或憎。有了这些印象不一定能创作，或只能作成坏的作品，但根本连这些印象也没有而就想创作，那便和为说话而说话一样，还会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来呢？

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文艺爱好者，否则文艺便失去了普遍的作用。到将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会写文艺作品，正如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画画、唱歌一样；但不应该每个人都要把兴趣集中到文艺创作上，否则别的事就没人做了。各个业各部门中，有好多干部——特别是有好多领导干部——都是文艺爱好者。他们的政治锻炼、文艺修养都很高，足以指导我们这些职业作家，但他们都很少要创作；有时候偶然写点东西，写得很好，我们职业作家们还不一定写得出那样的成品来，但他们没有东西要写的时候，或者虽有要写的而顾不上写的时候，便先要服从工作需要。为什么有些人偏要在刚刚走上职业岗位的时候就要写呢？我不敢说这些人的写作动机都不纯，但恐怕其中有些人是误以为文艺写作比他参加的业务高贵，因而在就业之前就打下了转业的主意的。

三、文化程度。有些人来信说，他想写作，但是文化程度太差，问我如何克服这种困难。我想，其克服的办法是暂时放弃写作的打算，先加入本单位的文化补习班补习文化。也有人引高玉宝同志为例，想证明不补习文化也能写作。像高玉宝同志那样斗争经验丰富的人是可以学习写作的，不过要学仍得从补习文化课学起——高玉宝同志正是从补习文化学起的。

四、参加政治学习，端正自己的思想。有个老问题是：思想不对头了会把事物看错——前边提过的那些好的、坏的——

切，思想不对头了会把它们都倒过来。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到了新的农村，一定不能正确地了解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而会把它看歪了；同样，有旧的小农经济思想的人进了新的城市，也不会正确地了解城市生活的真实面貌、工业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它和农村的关系；只有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见到这两种现象，才能心中有数地知道到了物质思想文化都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就能消灭这种差别。用这三种思想指导写作，对同一件事就会写出截然不同的三种作品来。这虽说是谈过几万遍的老问题，但它永远是学习写作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点。

五、有些人爱找“创作方法”，其实创作方法和作家的政治修养是分不开的。例如对英雄有否侮辱、有否歪曲等问题，假如自己的立场和感情完全和英雄一致的话，问题就不会产生。一般人对外人谈起他的爱人或者父母，总不会插上侮辱的字样，其原因不是他们从哪里学来了描写爱人或父母的“方法”，也不是他的爱人或父母是绝对应该歌颂的人，而只是因为他们爱自己的爱人或者父母。而一个有马列主义思想的作家，如果和英雄的感情一致的话，难道还会把英雄侮辱了、歪曲了吗？又如在运用词藻方面，一个人对自己的爱人感情太好了，会造出许多从不见于书本的亲昵的称呼，对一个仇人恨得太甚了，也会造出许多从不见于书本的刻毒的评语，难道都不能算作创作上的发明创造吗？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有了真正的情，难道偏对建设中的积极分子找不出适当赞扬的词藻来、对建设中的破坏分子找不出适当的谴责的词藻来吗？只要他真感到有那种需要，就会用尽一切办法去创造或学习。这些可以证明创作方法的问题是和政治修养分不开的。

六、文艺学习问题。被文艺作品感动过，是爱好文艺的开

始，也就是学习文艺的开始。读一首好诗、一本好小说，和看一个好戏或一部好影片一样，第一遍就已经被它感动得深入脑海不可拔去，到有机会看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越看越体会得细微。对有些作品，一遍一遍地一直读得好多地方可以背诵了，但一有机会照样想读它，照样能被它感动。就这样对作品一个又一个读下去，对其中顶好的一遍又一遍读下去，慢慢就成了文艺爱好者。长期读着文艺作品，长期受着它们的感动，自己的思想感情，也为它们影响着、变化着、提高着。这正是文艺的作用所在。在读者方面说来，也是享受，也是政治学习，同时又正是文艺学习。在这开始的时候，最忌先把“取得写作方法”的目的放进去，否则就会什么也得不到。曾见某语文老师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的时候，先给学生以分析作品的任务，结果有些学生只顾上猜测“主题”是什么、“结构”如何、哪些部分“描写”得最好，而自己的感情顾不上跟着书中的人物走，以至于把书读完了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感动。这不是说不应该指导学生分析作品，而是说不要在阅读之前先给他们那样个任务，我以为一开始就这样做是失算的。作品读得多了，对文艺的感受性敏锐了，对各个作品也有了比较了，进而想研究一下作品如何构成，为什么有的写得好有的写得不好，这时已算有了分析比较的基础，便可以由浅入深读一些文艺理论的书。要把文艺作品比作人体的话，文艺理论就好像是些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治疗学、药理学等，其作用就是使人知道文艺是怎样构成的，如何才能使作品好。创作方法自然也包括在文艺理论中，但无法抽出几条简便的办法来让人在一个晚上就全部学会。作家们的创作经验在学习文艺理论方面也是有参考价值的，但它不能代替文艺理论学习，因为无论哪个作家，都很难

把他多年学习的内容系统的全写到一个短短的报告里去。

是不是一定要学习过文艺理论然后才可以创作呢？不是的。任何一种学问，都出现在它所研究的对象产生了之后，文艺也不例外。例如先有了农业然后有农艺学，先有了牧畜业然后有牧畜学。我们不能说没有学过农艺学的人就不能种地，没有学过牧畜学的人，就不能养羊，同样也不能说没有学过文艺理论的人就不能写文艺作品。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业务岗位上的人，于业务中发现了真正动人的事和人，自己被感动到逢人便想叙说的程度，即使没有学过文艺理论，甚而语文程度也不太好，有时候也可以写出好作品来。不过对已经有了理论的事物，只有学过那种理论，才能更有把握，文艺也不例外。以种地为例，没有学过农艺学的人固然能种，但要庄稼长得好，出了毛病，要确有把握知道毛病究竟出在土壤上，还是肥料上、病虫害上……并且用最适当的方法来对付，还只有学过农艺学的人才有可能。不学习文艺理论固然也能写点东西，但要使自己的东西写得好，写出的东西把握大一点，或者即使不准备创作，而为了帮助自己欣赏作品，都是需要学一学文艺理论的。

以上这几点意见，仅仅是供各个业务部门中初和文艺接触的同志们参考的。指导业余文艺活动的同志们也可以作为参考，并希望从你们的工作经验中给我提出修正的意见。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八日）

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信*

我于十一月三日出发赴太原，正赶上山西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得于会议中听到各地方（县及基点组长）的报告。十三日随长治地委赴会的同志们到长治专区，十九日才到潞安县的瓠寨乡。

这个乡是潞安县的模范乡，有三百户以上的大社，现在正准备转为高级社，今天就要开党团员大会，研究全面规划问题。

这里也和其它模范地区一样，经常住有外来的人。现在这里住有国务院法制局的一个调查小组、北影一个新闻摄制组、河南一个参观团、山西省委一个考查三定的组和副县长、县委宣传部长等多人。谈材料成为干部负担的现象在这里依然存在，现在正想法克服。

我初到这里，一切情况都不熟悉，也不愿再为干部增加任务，所以就旁听一些谈材料、解决问题的会议。我觉得这样足以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我想在这里住一个较长的时期（一两个月）然后再到别处。

* 这封信曾经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编的《作家通讯》一九五六年第一期。

和青年作者谈创作*

——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发言

在分组讨论创作问题的几天里，我参加了小说组第二分组的讨论，和我们一部分青年写作者谈谈心。通过这几天交谈，我知道同志们绝大多数都还在各种实际工作岗位上，直接参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都是直截了当有甚么说甚么，不摆架子，不绕弯子，表现出青年和实际工作者的特点。发言的内容是提的问题多，谈的教训多，谈的经验少。开会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有问题提出来是好的。交换经验是走群众路线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家写的东西还不多，不愿多谈经验固然是虚心的表现，不过在本行里彼此交流经验和发表文章、作报告有所不同，谈谈还是有好处的。小组会上没有谈好，在大会空隙里仍不妨自由交谈下去。

大家所提出的问题，有好多是在小组讨论以前听过的几次报告中事先解决了的，希望大家把那几个报告作为以后学习的资料。我今天的发言，只是对小说组第二分组同志们提出的问题中，抽出一部分来谈一谈，说明我个人对那些问题的理解，说错了的地方还请大家纠正。

* 本篇曾经发表在《长江文艺》一九五六年五月号，后来收入《三复集》。

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文艺的作用问题。在这次讨论中，好几位同志提到“生活内容丰富而写不出来”的问题（茅盾同志在《关于艺术技巧》的报告中已经谈过了），不过各人所讲的内容不完全相同：有的说：“面太广，头绪太多”；有的说：“材料记下来了组织不成作品”；有的叙述了对某些事的经历，说“不知应从何处说起，强调哪一部分”；有的说“如实地把生活写出来，文艺杂志的编辑们说不是文艺”；有的说“新的工作一个接一个，根本轮不到有创作的时间”……诸多内容中，固然包涵着技巧问题在内，但有些还是研究技巧以前应该注意的事，在和大家谈的时候，我提出写作的“目的”问题（严文井同志当时说他也曾想到有些文章目的不明确。他说“我曾想过：这些文章为什么要写？”）这倒不是说“文艺应该为什么人”（那问题毛主席早已给大家讲明了），而是说“是不是所有的实际生活都得写成文艺作品”。在这以前，我们也曾见有些人还没有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经历的事写出来，就参加了解放后的其他工作，殊觉可惜。我也以为可能有可惜的一部分，但大部分的“可惜性”是不大的——我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所经历的事大部分没有写出来，写出来也许还能“动人”，但我觉得即使“动”过了“人”，给人的感染也不一定有教育意义。通过什么形象来感动人，使人受了感动后思想意识上可能发生一点什么变化，是写作者在计划一个具体作品之前应该首先考虑到的事，不是见到了什么人什么事都有写成文艺作品的任务。“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辛稼轩词）正好说明为写作而写作的心情，我们应引以为戒。作家有时也有写一写传单、标语、章程、合同……之类的义务，但自己要认识那是用另一些形式的东西为社会服务，而

不要希望都把它变成文艺——社会上也不应要求作家如此。写作者赶任务的原因有二：一是自己没有当了变革现实的先驱者，等到别人把一种事物变革的一段过程推向高潮的时候自己才意识到（这点以下再谈），一是有些作实际工作的同志们要求写作者用文艺这种武器来完成文艺以外的任务。后一种例如有些地方文化部门，要求他们所领导的剧团，按时配合具体工作——要剧团把春耕贷款、抗早点种、防治病虫害、夏收、夏购、秋收、秋购……一套长年工作按时编成戏来上演，编剧本的人就只好赶在任务之后，刚写完了春耕贷款就到了除苗的时候，药剂拌种才排了一遍麦子就割得了……一路“赶”来，越赶越远，越赶越不象戏，越不象戏群众越不爱看，既耽误了宣传，又破坏了艺术，两不上算。在一长串的日常工作中，找出决定性的关键和这关键上的主要模范事例，写成剧本，对于日常的任何工作，都起着推动作用，即使这些模范事例离得当前工作较远一些，同样也起着推动作用。难道受了《董存瑞》影片感动的人，不能把董存瑞精神发挥在开渠、打井上吗？平常工作中自然不必象董存瑞那样牺牲，难道还不能鼓舞得人们加一把劲吗？为什么偏要让群众在打了一天井的工作之后，再到戏台下去看台上的打井去呢？艺术都是宣传，但宣传不一定是艺术，希望在宣传工作岗位上的写作者自己分清这一点，并且也不要要求别的写作者这样作。

第二我想谈谈实际工作与写作的统一问题。我们年岁大一点的写作看，写自己身边的事容易写得好一点，但有好多自己最熟的身边琐事是旧时代的，与今天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关系很少，所以写得不多。为什么写那个就容易写好一点呢？就是因为从前是在那生活中泡大了的，写起来可以说是

“左右逢源”，“头头是道”。你们诸位最熟悉的自然也是身边的事，可是你们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生活中泡大了的，因而那些身边的事就不能说是“琐”事。你们最熟悉的事，正是我们要下乡下厂去了解的事，因而你们写起来是“近水楼台”。有些同志提出那个“生活内容丰富而写不出来”的问题牵涉到的方面很多，实际工作与写作的结合也可能是一方面（时间冲突另谈）。不论实际工作或者写作工作，都要争取主动，首先是在实际工作中争取主动。在实际工作中争取主动，就是在日常工作中找出推动工作的关键来，划分开工作阶段，在每一阶段中首先作出成功的事例来推动一般。在写作方面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在认识工作关键，认识先进事物这一点上和实际工作是统一的。在实际工作中，自然也希望每个参与工作的人都认识关键、认识先进事物，但是做不到的时候，只要领导同志争取得到主动，被领导的同志们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逐渐能领会也可以做得下去。一个业余写作者，即使在实际工作中是被领导者，也不能等到工作过程中再去领会领导者的精神，而是要学会全面看问题，连贯地看问题，有时候可以帮助领导者作决定，有时候可以比一般同志们提前领会领导者的精神。要想做到这一点，自然要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一定的思想水平，不过假如有两个政治热情、思想水平相同的写作者，一在工作之中，一在工作之外，在工作中的要占很大的便宜。不论是在实际工作岗位上的，不论是从哪个岗位以外来的，都不应只打搜集材料的主意，而要多管事，管全面的事（有同志说是“管闲事”，有语病，并非“闲事”）。从这点上看，实际工作对写作是大有帮助的。

第三我想谈谈材料与创作的关系。有几位同志提出“曾被

新事物感动过好多次，想写，也非名利主义，只是写不出”。老舍先生当时和大家交谈了一下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回答大家说，这是因为想都把它写成“小说”的缘故。老舍先生的原话我忘了，意思是说有些小材料是供写通讯、小诗、笔记等的材料，而不一定够写一篇小说。我很同意。还有几位提出也有好多连贯性的材料，有的说组织不成小说，有的说写出来了某编辑说不是小说。我想把我对小说材料的理解谈出来，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材料在自己的记忆里，有整块的，有化了的。整块的就是真人真事；化了的就是某个人或某一类人物的一连串的特殊（不是一般）印象。整块的材料在我说来用处不太大（特别是真“事”），因为它不是为某一个主题而产生的，而某一个主题也不可因为迁就它而缩小其普遍性。化了的材料虽然在脑子里或者笔记本里查不出来源，但是积累得多了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主题要求它干什么它就能服从命令。我们碰到一个生环境，或者出了个什么事故，便可以想想让自己的父亲在场应有什么表现，哥哥在场应有什么表现，爱人在场应有什么表现，而真要是让他们来了，他们表现的会大体上和我们想象的差不多。我们凭什么替他们规定出“表现”来呢？这完全是凭材料，可是那些材料的来源分散得很，一一追查是查不出来的，但又都是见过若干遍而且又掌握了构成那些材料的思想规律的，我所指的化了的材料就是这一类。只要掌握了这一类的材料，便可调遣你的人物到任何环境中去。我以为古人创作所掌握的材料也是如此——果戈理掌握了市侩们的这种材料构成了《巡按》；吴敬梓掌握了酸秀才们这种材料构成了《儒林外史》；曹雪芹能使林黛玉在幽居独处中感到孤独，也能使她在稠人广众中感到孤独；能使她在秋雨之夜制作

《秋窗风雨夕》诗，也能使她在欢娱节日中制作出《更香》的灯谜。不论哪个人（小孩除外）都有一大批这样的熟材料，只是因各人环境、时代的不同而其用处有大有小罢了。我觉得我们的青年同志们都是从实际工作岗位上来的，积累的这样熟材料，要比我们所掌握的有用得多，只要多研究一下用法用出来就好了。

我所谓业余创作者比专业创作者便宜之处，除了上述容易找到工作关键和先进事例以外，也包括容易积累材料、溶化材料这一点。

材料与写作，最理想的关系应该象百货公司进货、销货的关系——进的时候是广为搜罗，销出的时候是可以配搭成套，可惜我自己是有些旧货象隔了朝代的服装，永远卖不出去，而时兴货又时常脱销。本来时兴货就是容易脱销的，补救的办法只有坐庄采购。你们诸位在这方面比我优越得多，大部分就是时兴货工厂的直接生产者。

第四、我想谈谈如何读理论文章的问题。任何理论（即“学”）都有它的研究对象，也都应该是从具体的对象研究到抽象的规律，不应该不与对象对照而只把若干抽象的规律割裂成一条一条来理解。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文艺作品，应该和作品对照起来读。小组讨论中有些同志提出些问题是属于这一类的。例如说“如何写矛盾”、“如何写正面人物和英雄”、“缺点能不能写”、“从落后到转变是否还可写”……这些话都是从近几年的批评文章中看到的，不过那些批评文章都批评的是些具体作品，不但应该对照着那些受了批评的作品看，而且应该对照一些没有被指出的缺点的作品看，以便于理解那些用语涵义的范围。假如抽象地分别来谈以上的若干问题，会造成若干

新公式，例如谈“怎样写矛盾”，就会产生写矛盾的公式；谈了“怎样写英雄”，又会产生写英雄的公式（实际上这些公式已经又局部产生了）。一本名著里，也可以有矛盾、有英雄、也有缺点、也有转变……也可能多这一项缺那一项，但整体看来他是安排得适如其分的（自然也有在今天看来成为妨害的部分）。一种情节，放在这一个作品里是有害的，放在另一个作品里说不定还会有点好处；要是抽象的理解，“写英雄必须写缺点”的公式被纠正了，“一切作品不许涉及人物的缺点”的公式就又产生了；尽写外表的毛病被纠正了，不许写外表的毛病就又产生了。还有些同志对“细心观察”、对茅盾同志报告中的“先有人物”也理解得不全面……我建议读批评文章对照着文章所指出的同一类型的作品来看，读其他理论文章把人家全文的精神连贯起来看，不要单纯强调其中某些字句。

最后我想谈谈群众文艺供应问题。我们的代表中，有一部分是作这门工作的。这门工作的内容是供销社性质的，管采购和推销文艺食粮。食粮是必需品，应统一规划，统购统销，照顾到灾荒。完成了“供”的计划就是产生了作品。高级作品，应该产生在这里面（如《不能走那条路》），否则道理上不易说通：第一、供应粮食应供应好粮食，不应该只供应糠，而把好粮留着叫自由出售；要比作“雪里送炭”的话，应该送的是火力甚强的好炭，而不应送些麦秸。第二、群众最需要的粮，才正应该是走在时代前面、能指导现实的好作品；供应这种市场才是克服作品落后于现实的好办法。第三、正因为我们的国土大，需要广，而且各地的需要不太一致，又要及时，所以才需要扩大我们的生产队伍，否则只要扩大印数就行了。

谈得拉杂，请原谅！

给长治地委××的信

最近有人从沁水县嘉峰乡来，谈起该地区农业社发生的问题，严重得十分惊人。兹举数例如下：

一、供应粮食不足：每人每月供应三十八斤粗粮，扣购细粮，不足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有儿童之户尚可，只有大人的户不敢吃饱或只敢吃稀的，到地里工作无气力。在产粮区可以享到三定之利，而产棉区则否，这问题在过去提过，但得不到解决。不论说多少理由，真正饿了肚子是容易使人恼火的事。在转入高级社的时候，说了好多优越性，但事实上饿了肚子，思想是不易打通的。

二、缺草：缺草问题也是老问题，只是现在更严重了。嘉峰乡的草拨在离那里六十里的郑庄，连运费在内，合七分五厘钱一斤，而小米价才六分五厘。群众觉着社里的生产品，一部分叫牲口吃了。

三、缺钱：近几年来没有多少副业收入，群众手头没钱，常是凭借贷过日子，而社里又无钱可借，信贷社也不作普遍贷款。从前的中农户，本年用的是上年的收入，贫农才是先行借款，凭本年收获还债。固然从前借的是高利贷，但现在就是出高利，也贷不到手。

四、命令太死板：对棉花、花生不但要实物数字，而且播种面积也不得活动。养蚕的任务也太重，桑叶不够了，往往要跑几十里去买。牲畜老得不能用了也不让卖（社务委员通过卖

了一个牲口，工作人员撤换了一个负责牲口的人，虽经社务委员多方解释也不能挽回）。

五、买煤难：分散的小煤窑不让开了，只有指定的几个窑出煤。这样一来，距离远，买煤人集中排队，花的功夫就太多了。

六、基本建设要求太急：打井、修地（改变地形）分到若干年去做是可以的，做得太快了，别的活就做不了。

七、地荒了、麦霉了，由于运粮、运草、买煤、买桑叶、修地、打井等杂事误工太多，没有抓紧锄草、打麦两项工作，后来一遇到连阴天，非常被动，以至于地里的草比苗高，麦子垛在场上沤着。

以上一些问题，在领导工作者看惯了，虽然有时也表同情，但并不认为是一定得到限期解决的问题，结果“不可终日”的事可以终“年”，甚而可以“多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有一次因为发粮不及时，群众几乎要打乡长。因为缺草和撤换管牲口的人，谁不愿对牲口负责？撤的撤了可是换不上人。因借不到钱，群众在看戏的时候，大量吃社里卖的熟食品，吃了不给钱要社里借给钱再还，哪个村也不愿意演戏，因为待不起客（各村却都欢迎别的村唱戏）。这一些小事都可以说明，群众对公家、对干部、对社的情绪。群众靠这种情绪来办社是很难办的。反映这些问题的人，一个是我的女儿，一个是我的外甥。他们在暑假期间回家住了半个月，无孔不入地接近了好多人，比我这文化人的官僚主义好得多。群众对我谈问题有些顾忌——怕我到上级乱说他们的名字——对他们则大

胆得多，也琐碎得多，所以他们了解得更为具体。

我相信我们县级干部都是勤勤恳恳作工作的，但勤勤恳恳的结果，做得使群众吃苦，使群众和我们离心，是太不上算的事。大家都是给群众办好事的，可惜不能使群众享到好事之福，反而受到好事之累。我建议地、专双方派个组到当地确实调查一下关键所在，及时解决问题，以挽回群众在转社时期的积极性。

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也许我的估计不准确，给人家戴了大帽子，但“任务”却完成了，“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反比以前增加了许多，严重了许多，都是事实。我希望迅速改变这种事实。

我希望在地委开会的时候，讨论我提出的情况。

余候再谈！

敬礼

赵树理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各组座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言摘要·

(一九五六年六月七日，六月二十二日)

我感到创作上常有些套子束缚着作家，如有人对我的《传家宝》提意见，说我没给李成娘指出一条出路。也有人批评我在《三里湾》里没写地主的捣乱，好象凡是写农村的作品，都非写地主捣乱不可。

我最近写了一个小秧歌剧，剧中没有说白，一直唱到底。这个戏第一次演出后，就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就有人说这个戏不合乎戏剧规律。我觉得在戏剧上也可突破一些旧的规律。

过去我们写东西，要求各种人物都要有——党员、团员、群众等——结果一个也没写好。我认为不必照顾那么多，只写一个人物也可以，能写好就行。

• 本篇曾经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编的《作家通讯》一九五六年第六期。

《买猴儿》讽刺了谁？

马大哈这位老兄错误百出，他的事人人关心，我想对他所引起的事也发发言。

一、马大哈事故（买猴儿）是否讽刺了我们的新社会？我想，马大哈这类作风是旧社会造成的。解放以后，我们新社会对马大哈式的人物，全部接受过来加以改造，但是从解放到现在仅仅六年，尚不能宣布“对马大哈式的人物改造完毕”，因为某些正在改造中的马大哈还残存一段旧尾巴；新参加工作的个别同志不留神，也受马大哈一些感染，都是会有的事。既然还有马大哈和马氏作风的残余，就还有讽刺一下的必要。有些同志抱着投鼠忌器的心情说《买猴儿》这篇相声讽刺了我们的新社会，我以为不足虑的。投鼠应该忌器，但投鼠的人事先如果对投掷物的分量、投掷的准确性和器的坚固性，事先都有一番估量，就不会打破了器。《买猴儿》这篇作品虽然准确性稍有偏差（后面再谈偏差），但对其他条件是估量了的。马大哈式的人物，在旧社会里，假如不会逢迎上级，或者和上级有什么私人关系，是不会凭着他的作风找到职业的；假如会逢迎或和他的上级有私人关系，是不但不会受到惩罚而且还会得到升迁的。但是表现在《买猴儿》中的马大哈却是十手所指、屡遭惩罚——孤立的。要在旧社会里讽刺马大哈，应该是写他害得

• 本篇曾经发表在《文艺报》一九五六年第十三期。

人买猴儿又写他升官。现在作品中是写他出了事故受到群众的指责和行政的处分，因而不能算讽刺了我们的新社会。

二、这作品是否讽刺了百货公司？有些同志认为《买猴儿》是讽刺了百货公司，但我以为它并没有讽刺百货公司，作者恨的是旧社会的渣滓。马大哈式的人物或遗风，在何种行业中现在也不能保证已彻底肃清了。既要写到作品中，就总得给他设一个岗位，不能把他放在火星上。要说把被讽刺的人物放到哪个行业里就算讽刺哪个行业，讽刺文艺便无法写了。讽刺文艺也可能讽刺一整个的行业（如《送亲演礼》侮辱了整个农民阶级之类）。但听了《买猴儿》的人，只觉着马大哈坏事，而并未感到百货公司应该改组。

三、这作品的作用。自从《买猴儿》流行以来，有些人遇上了马马虎虎满不在乎的人，常用半开玩笑抱怨的口气说“你真是个马大哈”；对方听到这句话，也往往不是道歉，就是辩解，可见这篇作品是起到它可能起的作用的。

四、是不是能写得更好些？我以为，这个作品把一个采购员作为表演者用第一人称表演的对象，以至于抛开马大哈，把大段文章用在买猴儿过程上，未免有些喧宾夺主——那些过程中的笑料对马大哈帮助不大。象相声一类的短小作品，最应该讲经济——浪费一半以上的闲文是失算的。过去的老作品，虽然都从闲话叙起，有时也叙得过长（名为“勺把子”）；但好的闲话是和后面的高潮有密切关系的（也有不相干的，不过不能算好作品）。

五、夸张问题。有人以为有些地方夸张得太过火，我同意。相声的夸张几乎没有不过火的，但是也不应太过火——不过火不易使人感到兴趣，太过火也容易使人感到不真实。对口

相声不能以小说的一般规律为准则。它对于不合理的现象，往往更加发展一小段，好象是说“这样贯彻下去，一定会如此如此”。而在一般情理中是不会发展这一小段的。不过这种假设的发展也有它事实的限度，超过了事实的限度，便要使人觉得是节外生枝。如食品公司买了桐油，家具公司买了香油，回去一倒出桶来就能发现（可以从中找出噱头），不至于炸成大量食品、油出好多家具；采购员接到买猴的通知可以误以为有正当理由（例如送给无猴的国家动物园之类），而不应强给人家讲“买猴儿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否则食品、家具两个公司的人员及百货公司的采购员也成了应讽刺的人物了。

“百花齐放”声中的上党戏*

现在我家乡的地方戏——上党戏来京公演了。前几年我常常以这种戏未到北京演过为憾，现在看来，他们来的正是适宜的时候，要比前几年来了强得多。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这种戏也和其他地方剧种一样，在戏剧改革中，也走过些曲曲弯弯的道路，在前几年把它弄得失去了本剧种的特色，而在今年的“百花齐放”的口号下才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我是个什么剧种都爱的人，但我很少说哪种戏比哪种戏好，因为各有各的好处。我以为上党戏的好处是激烈、痛快。我爱那种痛快的气氛。从前在农村的时候，常好一个人唱几句，只是限于嗓子的条件，唱得很难听，在自己虽然痛快了，在别人听了却很难受，所以到北京以后，除了带三分醉意经人怂恿破例唱几句外，从不乱唱——没有偷唱的机会。

在抗战期间，对付戏剧的“左”风甚炽，人们常用土地改革时候划阶级的办法为古人划阶级、定成份，因而把传统节目几乎全部“扫荡”了。当时我也是参加这种“扫荡”工作的积极分子，只是一面公开“扫荡”，另一面得空就还偷唱几句。一九四九年我到了北京，参加过一些有关戏曲改革工作的讨论，才知道不是那样容易改，从而发现自己过去那种“扫荡”之风是错的——不合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精神，才赶快给

* 本篇最初发表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北京日报》。

我们过去参加“扫荡”的积极分子们去信说明过去的错误，这才没有继续扫下去，只是已经扫了的也没有得到恢复。近四五年来，那个地方逐渐纠正了“扫荡”的残风，逐渐把已经改行的名老艺人请回各个剧团，恢复了许多老戏，成立了几个小型戏剧学校，赶到我去年冬天回家乡的时候，才算又看上真正的“上党戏”了。

这个剧种是综合六个剧种（昆、梆、黄、罗、赚、乐）而成的。它的历史，已无明文可考，从保存的剧本风格看，它接受过秦腔（《天波楼》、《龙图案》等）、苏昆（《长生殿》、《东坡游湖》等）、汉剧（《打金枝》、《牧羊圈》、《余唐关》等）等的舞蹈、唱腔，而其中的列国戏（如《二子沉舟》、《齐鲁界》、《东门会》等）纯朴洗炼，不知从何而来，可能是原剧种的创始剧本。“上党”虽是秦时的郡名，而这种戏的活动地区却只限于山西东南部十九个县。这个地方，因为是太行山的主峰所在，交通不便，不常与外界往来。但正因为如此，未受到城市影响，剧中将不合乎士大夫口味的人民斗争性全部保留下来——所有的剧本中，不杀人的很少；有些戏，和京戏的剧本几乎完全一样（如《一捧雪》、《四郎探母》等），后来京戏在音乐、唱腔、作派方面都向柔和处发展了，而这种戏却还保存着它原有的强烈风度。

近几年来我常向文艺界的同志们鼓吹上党戏，不过听我唱过几句的人总觉着不大高明。我只有那种太不高明的本钱（嗓子），向大家辩解不清。凡是和我辩论过上党戏的同志们，最好请你们趁这几天看一看原剧，以后咱们再谈！

供应群众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报告。

我现在就文艺的普及工作发表一点意见。

随着经济生活的提高，群众对文娱活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更多、更高、更合于自己口味的东西。我们文艺界虽然不能象经济部门那样分门别类定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生产数字，但是也得在这全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迈进的途中，把自己的步伐走得象个样子，因此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仍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事。

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也和经济上的增产一样，要根据现有的基础——我以为毛主席所说的在普及基础上求提高也包涵这个意思。

我以为近来还有些人对“普及”的理解有些偏向——把“普及”和“通俗”的意义混为一谈。“通俗”是普及的一个条件，但那只是照顾到群众的语言习惯和知识范围（如学术上一些概念）而不是照顾到群众文学艺术基础的全部。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的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一个人长到几

十岁，很少是白吃饭的。每个人对事物接触的范围有广狭，理解的程度有深浅，但各有其多方面的生活，也各有其集中精力的方面，而文学艺术在他们的生活中，往往或多或少已经成为构成部分，有的甚至精通了某种民间艺术。我们恃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形态的文学艺术源泉，正在这里。可惜我们有些人在为自己吸取养料的时候才注意这个，而在直接为群众服务的时候又把这个丢在一边，害得我们的事业未能和广大的群众更紧密地发生联系。例如有些作文化馆、站工作的同志们，为群众选作品的时候，只注意配合当前的中心工作和文字的通俗易懂，而接受了他们的订货单的写作者，也往往写一点连自己也不认为是艺术的小东西来回答他们的要求——双方都以为群众只要有了这些就足以娱乐了，要是多注意一下群众平常爱听什么书、爱看什么戏、领略惯了那些东西之后其精神状态有过些什么变化，就不至于把既不艺术，又宣传不好政治的东西强往群众眼睛里塞了。

任何一个作家，只要对社会主义事业某一部分感到兴趣，愿意写，不论用什么体裁、什么风格写出来都是有益的——总合乎某一部分人读——但广大的群众缺乏合适的文化艺术食粮，似乎也是我们的责任。有些人把普及和提高的界限分得太清楚，但又都只愿当提高工作者，我以为是不太妙的现象。广大群众没有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食粮，作家应该负相当大的责任——我们在这方面的负责任的供应太少了。我以为只要我们对广大群众有责任感，只要不轻视群众文学艺术的基础，在创作方面普及与提高是有很大的统一性的——例如已经为群众所欢迎的话剧《新局长到来之前》是普及了的，难道不能算高级的吗？这个作品，其所以能普及，是因为其人、其事、其言、

其趣在群众看来都不生疏，其所以是高级的，是因为它的政治性、艺术性都达到应有的强度。群众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作品。我们有责任满足他们的需要。

我这个希望是否和“百花齐放”的方针冲突呢？我以为不冲突。群众需要的也是百花，不应把群众性大一点的作品只算作一花。《董西厢》、《水浒传》、《白毛女》、《新局长到来之前》都是普及的、都是高级的，又都各成一花，谁也没有仿模谁。不过，我以为在百花齐放的时候，各人应该要求自己要放之花更为多人所爱，因而也希望大家多多注意研究广大群众在文学艺术方面现有的基础，以便把自己之花培植得更为他们所爱。

我在创作中的一点体会*

国外的读者朋友们中间，常有人来信要我谈谈我个人的生活，可是我总觉得一个作家来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生活，还不如用这个时间多写一点作品来回答读者朋友们的关心更为实际一点，所以对自己的生活一次也没有写过。现在想来，以前的看法也不太对——不正面回答朋友们的关心，在礼貌上也说不下去——所以才又来写这篇短文。

亲爱的朋友们，我的生活，在中国的作家们中间，是比较更幸福的。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这就是使我的生活较为幸福的原因。我说得这样简单，你们一定不会懂，让我来作一番解释——我这篇短文，只是为了解释这一点。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就得多方面和人民接触，不然便很难塑造人类的灵魂。中国古代有一句对诗人的评论是“诗穷（做不到官的意思）而后工”，就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在阶级社会里的知识分子，越是政治地位低，就越容易和劳动人民接触，恰好只有劳动人民才是人类的绝大多数，所以越是没有得到特权的人，对人类的接触面、了解面就越广，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之处就越多，吸收的由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成品及半

* 这篇文章，是《人民中国》编辑部为了向国外读者介绍，约请赵树理写的，分别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七、八月份中、英、日文版的《人民中国》上。

制品也越多，因而其作品也就为多数人所喜爱。和这相反的一面：和劳动人民接触越少的作者，好像缸子里养的金鱼，不论鱼缸如何美丽，和劳动人民之海比起来是比不得的，所以表现在作品中的，没有鱼缸以外的天地。

在古代的作家，常以自己的自然遭遇为转移——虽然从历史上总结出“穷而后工”的规律，但在事实上只要能得到官做，便不愿意放弃了做官而去当作家。现代的进步作家有了自觉性，知道自动地去到劳动人民的大海中丰富自己的灵魂了，可惜中国在解放之前遇到了蒋介石这个专制魔王，竟专制到不许知识分子随便和广大的劳动人民接近。假如有比较天真的人，要在过路的旅馆里的登记簿上填明自己的职业是作家，要在某工厂或某农村去体验生活，管保会被警察叫到特务机关问话，或者被特务们暗地监视起来；不过作家们谁也知道统治者那一套，从来也不会未被统治者侦察清楚之前而自己先作一番暴露。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敌后方有了革命政权，为作家们开辟了深入劳动人民之海的自由天地，不论是我们的老前辈还是初学写作的青年，都爱向我们的革命圣地延安去。这时候的反动统治者，在延安的南边西安，专为往延安去的人设立下许多关卡，把大批的人们堵截回去。不过中国是个大面积的国家，决心找自由天地的人们，绕过了好多路程，终于还是回到了目的地。

至于我自己，在抗日战争以前，家乡就在农村，不用找任何理由就可以常年和农民在一起；抗日战争以后，我的家乡又恰好在革命势力可以到达的敌后，虽然也常有和反动势力斗争的时候（如我在《李家庄的变迁》中所写的情况），可是总比完

全在反动势力统治之下的地区去接近劳动人民有保障得多。这就是我所谓我比别的作家幸福的地方。

一向被封锁在一定范围里的人们，初到了劳动人民的大海中，其思想、感情、生活风度等等，开始总有点不适宜，所以我们的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在这大海中锻炼自己。从我的出身看来，我似乎又该是比大家幸福的了，不过在这时候，事实却不如此：我所生活过来的劳动人民大海，到了革命政权之下，时时刻刻起着变化，变化得使我的生活本领不适用起来。我所熟悉的海，是痛苦不堪的海，而后来海渐渐甜起来。吃惯了苦的人会说苦，至于才尝到的甜味，领略得还不深，而且这种甜味时刻不停地在增加着，才要说它如何甜的时候，它就比自己说的更甜了——用作家们常用的语言来说，就是时时觉着自己的作品落在现实之后。在这方面，我除了开始在生活风度上比较容易接近劳动人民之外，别的都和其他作家们一样要从头来锻炼自己，使之适合于在这甜海中生活。

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是客气，完全说的是老实话。凡是读过我的作品的朋友们，是会感觉到我所写的新人物没有我所写的旧人物生动、具体，其原因就在于对原来的苦海熟悉而对经常起着变化的甜海还没有来得及像那样熟悉，所以写起来就不能头头是道，还有待于自己的努力，这种努力也包括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不过长期深入劳动人民之海是其中一个有决定性的项目。

亲爱的朋友们：愿你们对我的努力加以监督。什么时候看到我的新作品中的新人物比旧人物更生动、具体了，那就是我有了新的进步了。

摩勒的妙文*

法新社法国北部鲁贝九月三十日电，报道了法国总理摩勒在鲁贝发表的演说内容，全部大意是不承认埃及有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法国总理不承认埃及对运河有主权，已经算不得什么新闻，然而这位总理所持的理由，却有许多妙处，特举出几点以供大家欣赏：

他说埃及在一八八八年接受公约的时候是同意放弃主权的，并且指出这是“重要的一点”。他又指出这项公约的规定：即使埃及处于战争中，它也不能制止船只通过这条运河。一伙强国迫使一个弱小国家放弃自己的主权，并且要它答应在别的国家打它的时候，它也得乖乖地听任对方在它的内河运兵，这在一八八八年那样的殖民主义盛世倒是很时行的，但是摆在今天，这种强盗式的理由就不见得那样体面。摩勒总理对着正义的法国人民讲这番话的时候，脸皮有没有什么变化，可惜法新社没有报道。

摩勒总理说他不相信埃及能使运河照常通航，可是事实上运河自埃及收归国有后是照常通行的，于是这位总理就说如果埃及“成为运河的绝对主人，那末可能在任何时候对各使用国或其中的某些国家行使最严厉的压力，或者甚至进行实际的讹诈”。他也知道这种算命式的推测不足以服人，于是又加了一

* 本篇曾经发表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北京日报》。

点更无力的补充说：纳赛尔还没有做这件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明天不会那样做。接着他从他这些巧妙的预言里推断出埃及是“泛阿拉伯扩张主义”，并且又拟定了些“制止扩张”的办法。收回主权叫“扩张”、夺取别人的主权叫“制止扩张”也不过是这位总理学了杜勒斯先生两个习惯用语，不算什么新的创造；他并且学得了杜鲁门侵占朝鲜和台湾的新创造，不但没有等到“明天”，而且早在他发表这篇演说之前就把军队“扩张”到塞浦路斯去对埃及“行使最严厉的压力”“进行实际的讹诈”去了。

摩勒对他自己在安全理事会告下的状有点不放心，于是他在这篇演说中说出了以下的话：“应该不惜一切来保证和平，但是以任何代价来取得和平，象在不顾正义的情况下所维持的慕尼黑和平将是否定国际组织的一切努力而且否定联合国本身。”这确实是一段好话，应该受到称赞，不过在对运河问题来说，这段话应该是埃及说的——因为摩勒总理衷心希望埃及以放弃主权为代价，并且他自己和他的几位西方同伴已经在伦敦布置了两次慕尼黑式的会议了。

摩勒总理又说：“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辩论的前夕，追述一下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不是一种投降的精神，是有益的。”的确是有益的：宪章中没有规定有些国家应该放弃主权、没有规定应该为任何国家的“明天”算命、也没有规定某一些特殊国家有权讨论对别的国家的内河进行“管理”，埃及如果对这些让了步，便是一种“投降的精神”，按摩勒的话说，是最不合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的。

摩勒总理在这篇演说中说了句很老实的话。他说：“顽固地寻求一个和平解决意味着由于疲倦而接受一个既成事实。”

这真是经验之谈。不论是法国还是其他殖民主义者，在允许一块殖民地人民独立的时候，在退还一块侵略来的土地的时候，不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开始总是气势汹汹死不放手，最后总是“由于疲倦而接受一个既成事实”。只要殖民主义者还要顽固地执行他们的殖民政策，这个规律就不能改变——被压迫人民的觉悟是与日俱增的。摩勒总理如果想免于“疲倦”，“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早一点撒手。

“小 戏” 小 谈*

这几天来看了两场泗州戏，又唤回我从前看小戏的心情。我看过的地方小戏，差不多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这些戏的故事虽然都很单纯，却往往都有点浪漫成分——惊心动魄之处虽然不多，而异想天开的部分却不少，常使人觉着娓娓动听、触手成趣。第二、这些戏的唱腔，有时候简单到只有上下两句，但就那两句也能引人入迷，听进去好像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泛舟，一点也用不着吃力，心情自然随着剧情荡漾起来。一个人要是在一个平淡的环境中待久了，想借戏剧来大大振奋一下，这些小戏不能起到那种作用；若是在劳动之后，抱着休息的心情去看这些小戏，却能得到和风细雨式的愉悦和教益。在从前的庙会上，这些小戏常和大戏对台演，在平常情况下是各有各的观众，而遇上了特殊好的小戏班社也能把大戏对输了——自然是特殊好的大戏班社也能把小戏对输了。

有些同志一看见小戏就以为那只是原始性的东西，要不马上丰富一番、发展一番就站不住，我以为这种看法还有值得商量之处。我承认戏(剧种)无论大小，都有它可以丰富和发展之处，不过都要从它自己的现有基础出发，顺着它自己发展的规律去发展，当事者既不应该不尊重它们的基础，又不应该操之过切。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后收入《三复集》。

所谓尊重基础，先要认识传统方面的长处。例如这几天来泗州戏演出的《夜访》、《思盼》、《打干棒》、《拦马》等节目，尽管在词句方面偶然还有一些传错、抄错的地方须待校正，但这一类剧本还不是像我这样的专业写作者所能写得成的。假如有人把这些剧本交给我，让我大拆大改来丰富它一番，我便要抗命；因为我觉着这些剧本中不缺少什么东西。假如我不顾人家原有的基础，想趁势露一露我的才华，我就重新翻腾一下，作上一些新的诗句把人家的唱词换掉，布置上一些围墙、狗窝、楼台、松林、酒店等景色，加上管弦乐队，加上一些风雨车马声音的效果……这样一来，富则富矣，可是要我自己去看我是不会再看的，因为中央实验歌剧院要比他们的家当还富，我不如上那里去看。所谓不要操之过切，就是说不要把艺术创造看得太容易了。一个成功的传统节目，往往都是经过师徒几代的创造才完成的。就算我们生在这幸福的时代，既掌握了科学方法，又接受了前人遗产，然而从创作（或改编）剧本到排练上演，三年能完成一个同成功的传统节目差不多的好戏，已经比古人快了好多倍了；要是想在一年中把一个剧种的传统剧目全部翻修一遍，都把它丰富、发展一番，往往能弄得面目全非。有些剧种已经在这方面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才又逐渐扭转回来，从我举的那几个泗州戏的节目看来尚无此病。

我希望所有的地方小戏在发展中都能保有它的“小戏”风格。大家一致公认地方小戏容易表演现代内容，不过就是演现代内容也还应该有点限度好——多演《李二嫂改嫁》之类的戏，而把改编《万水千山》等戏的事让给大戏去想办法。

（一九五七年四月）

“出路”杂谈*

我本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虽然上过几天私塾，我的父亲可并未打算叫我长大了离开农业，突然在我十四周岁那一年，我的父亲被一个邻居劝得转了念头，才让我上了高级小学。这位邻居对我父亲自然费了很久唇舌，不过谈话的中心只有一个——“出路”。他无非说：“在家种地没出路”，“念书人腿长，说上去就上去了”，“为了孩子的出路，应该花点本钱”……至于“出”到哪里去，“上”到哪里去，他们好像心照不宣，一句也没有解释。我虽是小孩子，对他们所说的“出”和“上”好像也有点懂得——因为听他们说的向上爬的故事太多了——只是不大具体罢了。

等到我上了师范学校，接受了一点革命道理，才理解到他们要我“出”，是要我从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中走出来；要我“上”，是要我向造苦造难的压迫者那方面去入伙。既然理解了那个，就不想继续完成他们所赋予我的任务，后来革命组织被反动势力破获，我便逃出了那个学校。这时候，我的故乡对我的舆论是这样：“念了一阵书做了个什么？”“命中没有莫强求？”“那孩子落魄了！”……我当时听到这些讽言冷语有点恨他们不懂事。我想：我本来是个学种地的孩子，中间念了几

* 本文最初发表在《中国青年》一九五七年第九期，后来收入《三复集》。

年书又回来种地，一点也没有降低了身份，怎么叫“落魄”了呢？难道真要我入了压迫者之伙回来压迫你们这些同难的父老，才是我的“出路”吗？然而“出路”的传统的错误的解释，在当时正是他们所说的那样。

除了他们那种错误的“出路”解释而外，在当时真有所谓“出路”问题，因为摆在人们眼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维护原有的阶级社会制度，自己在那制度的支配下或者躺下来受压迫，或者爬上去压迫人；另一条则是摧毁那种不合理的制度，然后建立一种人和人平等的无阶级的社会制度。在事实上，中国的革命领导者和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都先后采取了后一条出路，才推翻了旧的阶级制度，建立起今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制度。在今天这个制度下的人们，尽管有些人还受着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但在这过渡时期的继续改造中会把它们逐渐改掉，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肯定了的，因此今天已经不存在“出路”的问题了。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旧思想要算很难改造的一种对象。不幸三十年前农村中对于“出路”那种传统的错误解释，今天仍旧在农村起着一定的作用，最可恨的是它还影响着农村中一部分青年。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中学生，在毕业以后要是仍然回家种地，他的家长和亲戚、邻居，往往又和在三十年前责备我一样地说：“念了一阵书做了个什么？”“什么也干不了！种地吧！”说这一类旧话的人自然仍受着他们旧思想的支配。他们对当前的农村内部是有新认识的——他们当然意识到农村没有了地主的统治和剥削，意识到农业合作社高级化了以后生产资料成为集体所有，因而再不会有人把社会财富集中到个人手里重新变成剥削者——只是他们对农村以外的变化了解的不具

体，仍然以为进了城就可以高人一头，就可以取轻巧钱，以为“万般皆上品、惟有种地低”。

老人们这样想，情有可原；中学毕了业还这样想就不太应当了。中学生对农村以外的事虽然也不会了解得太具体，但书报杂志总看过一些，政策、时事讲话总听过一些，因此就不应该像老人们一样连社会分工也不知道，连城市人们是不是“取轻巧钱”、“高人一头”也不知道。

我们承认农村和城市有差别，而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中就有个任务是消灭城市与农村的基本差别，不过这种差别的主要标志是在生产规模的大小上，在生产机械化、电气化的程度上，其次才在生活方式和生活程度上。有些青年只愿到城里找“出路”，只愿当干部不愿回农村，也有些老人们希望青年到农村以外去找出路，戳穿了底子，这都不过是要去找“职位”，找“享受”，而对于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多少务，则算不到账上。有个别青年接受老人们的这种意图，可能在理由方面发展了一些——可以说是“为了有更多锻炼自己的机会，使自己能成为更有用的人”，然而这些理由也不过是一种说词，至于哪个行业最合乎“锻炼”自己，锻炼过之后比现在更有点什么“用”处，那就不容易说的具体了。职位越高，对社会负的责任越大，越不是只有一点书本知识而毫无社会阅历的人所能胜任的。我自己除了当过四十天区长之外，再没有当过什么“长”；自己也不敢再要求当什么“长”，因为所有带着“长”字的职位我都不在行，在过去干部缺少的开辟时期还可以勉强担任一点外行工作，现在社会分工比过去严了，自然就不需要那样做了。今后的干部是要从各个行业中选拔的，否则不能胜任。不要把“寻找机会锻炼自己”的理由说得振振有词！难道

在自己生身的农村中还好不好“锻炼”，偏要去找一个连自己也没有见过的职业去“锻炼”吗？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农村与城市在生活方式、生活程度上还有差别，那末农村人到城市去就了业过一过城市生活的要求也是合法的。”合法固然合法，只是想用这种办法来消灭生活方面的差别是不会有有效的。我们的国家是个大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各方面极不平衡，在生活方面从利用现代化的科学利器到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都有，要说差“别”，可以说是“千差万别”——大小城市有别，工业城市和非工业城市有别，四季常青的南方城市和冰天雪地的西北边疆有别；在同一个城市中，各个行业的生活也不尽同；在同一行业中，各种劳动的价值也不尽同；即在农村，也有山区、平地、产粮区、经济作物区、南方、北方等等差别，假如每个人都不愿意在当时当地的社会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而为了向最高的生活看齐每天在那里搬家、转业、离开岗位去找事，一切社会事业就都会在这搬来转去中停顿了。认识差别为的是消灭差别。不安心就地工作的人，不是为了消灭差别而是利用差别来找空子钻，和每天流着汗从事生产建设的人比起来，难道不是不太光荣了吗？只有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使农业生产科学化、机械化，才是消灭农村与城市差别的基本办法。农村的同志们努力增产支援国家工业化，国家为农业培养人材制造机器，正是消灭城乡基本差别的有效措施，等到村村有公路、社社有汽车，差别就小得多了。就以目前说来，每个劳动日分红在一元五角以上的农业社的社员，就不会羡慕城市里每月四五十元报酬的职业。这还不足以说明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会因农业本身的进步而消灭了吗？不安心农业生产而跑到外边去

找空子钻，不但对消灭差别没有帮助，恰恰成为消灭差别的消极因素。愿我们头脑清醒的青年同志们不要甘心当这种消极因素。

也许还有人说：“农业社的劳动都是体力劳动，而上过学的人应该成为脑力劳动者，因而就不应该再去种地。”这种想法和普及教育有直接冲突。过去的体力劳动者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合理的，我们不应该说以后的体力劳动者就不要文化。苏联人民的普遍受教育机会是十年或七年，也就是每一个小孩，除了白痴或神经病者，都要成为高中或初中毕业生。我们现在虽然因经费和教师的不足还不能作到那样，可是要逐步作到的。假如每一个人一上中学就不准备再参加体力劳动，教育普及了生产不就停顿了吗？或者有人以为到了那时候，一切生产都自动化了，用不着体力劳动者了。不，机械化只能减轻体力劳动而不能不用体力。到任何时候，机械还得由人使用。教育越普及，生产越机械化，越没有不用脑力或少用脑力的体力劳动。现在的农业生产，就常使农民同志们感到自己的脑力不够用。例如我们有一些效力很大的农药，因为分量不容易掌握（用得过了量坏事太大），就不敢推广，难道不是因为知识分子太少吗？有好多新的农业技术传授不到农村，难道不是因为知识分子太少吗？有好多农业社的计划不精、账理不清，难道不是因为知识分子太少吗？每个有社会主义热情的农村的中学生，在毕业之后想着手管这些事，不但不会感觉到屈了自己的才华，反而会感觉到凭自己在学校取得的那些知识，要管这些还马上管不了，还得先向社干部们学习以往的经验。况且一个体力健全的人，有发挥体力的机会也是一大快乐。我自己从小就没有锻炼成很好的体力，不过从小参加过农业劳动，还落下

了个劳动者的身手和习惯，至今仍以为是乐事。我自从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算是过了七年城市生活，但是下了乡和农民吃起一锅饭来，既不觉着营养不足，又不会引起消化不良病，完全保持了当年的胃口；三五十里山路，走起来虽不像当年那样轻便，但大体上还保持着两条可以走路的腿，可惜把挑行李的本领失掉了，是个很大的损失，在一个地方住下来，烧炉子、扫地、洗衣服、拆被子……一些生活琐事，大体上还能作到事事不求人。我觉着保持了这种身手和习惯有很大的趣味，不到衰老得不能动的时候我是不愿意随便失去这些的。在现阶段我承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仍有较大范围的分工，但我以为一个脑力劳动者要是体力还好的话，也应该找一些发挥体力作用的地方，而且要把两种劳动平等看待，不应当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来分社会地位的高低。

也许又有人说：“城市人路道宽，发展头大；在农村的体力劳动者，只能种一辈子地，没有什么发展头。”假如他所谓“发展”仍指的是个人名利，即使在城市也是可耻的思想；假如指的是事业方面的发展——是成大事，那在任何岗位上也一样可以发展。曲耀离创造千斤棉花丰产，石玉殿创造新的接果树法，都正是农村体力劳动者的创造。每一个体力劳动者也同时都有脑子，只要他在自己工作岗位上有那样高的社会主义热情，就都会有所创造。“创造”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了解了某种事物的全面情况，掌握了它的发展规律，找出了它还可能发展的关键，然后推动得它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社会主义热情高的人，必然忠于自己的业务，尽量使自己在业务中的工作效率高，因而对业务情况最熟悉，并且经常用脑子研究它的规律和发展关键，就常常有所创造。城市人不是“路道宽”而是

“行类多”，但他们也是每个人只干一种业务——老教授、老医生、老司机、老乘务员……他们都一辈子忠于自己的行业，肯用脑子的人在业务中也都有许多发明创造，正和农村的人种地一样，并不像旧社会少数投机分子那样今天跑行商、明天当卫兵，抱粗腿、拜干爹，钻来钻去，无非找一点个人便宜。

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还仅仅是个开始，即使是成绩最大的社，在组织领导、经营管理各方面，也都还不是那么很理想地顺理成章，正需要你们这些既有文化又有体力的新力量、新血液在热烈参加体力劳动的过程中多用一用脑子来熟悉它、研究它，和老人们一道把它改造得健全起来。我认为这是知识青年同志们的神圣任务。现在的社会出路和个人出路是统一的，只要你能在职业中全心全意为集体利益打算，逐步做出了特殊的业绩，人民大众就会逐步把更重要的责任委托给你来负。

（一九五七年四月）

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

——答长沙地质学校夏可为同学的信

夏可为小友：

你的来信，沈部长（即茅盾、文化部部长）和我都看过了。沈部长要我来答复你，我便把他的意见加上我自己的意见来给你写这封回信。

从你的年龄和学历看来，你是很聪明的，只是从你的生活安排上看来有些不切实际和本末倒置，结果白白耗去了好多有用的时间。你说你在十二岁时候就开始美术创作，后来由于“程度低”，作到近百幅都没有成功。十二岁孩子练一练作画技术准备以后学美术是可以的，但要把那认为是开始了美术创作就不妥当。美术创作者，至少要学会从生活中集中许多最有代表性的印象，一个十二岁尚未参加过社会生活的学生如何办得到？你所谓“程度低”就不知何所指，在我以为不懂社会生活正是“低”的地方。你说你在十五岁以前的语文课不太及格，恐怕与这乱画有关系，结果画也没有作好，语文学习也误了。你说地质学校的学习任务繁重、功课难以理解，但你却又说你曾写过一篇论宇宙生成的文章寄给李四光部长。一个对地质学校的

* 这封信，最初发表在《文艺学习》一九五七年第五期，后来收入《三复集》。

功课都感觉难于理解的人，为什么偏要先去论“宇宙”问题呢？你到地质学校以后，一方面面对着繁重而难于理解的功课，另一方面又写短篇小说又写诗，最近又开始了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但同时却又说你的重大困难之一是“没有写作方法”。要是社会经历丰富而仅仅不知道写作方法的人，经人帮助是可以写作的（如高玉宝），只是你是个直到今年十月十七日才能满十八岁的人，除了十五岁时候休过几个月学以外没有离开过学校，又没有写作方法，那么怎样产生了这四十万字的写作计划呢？这一切都是些不切实际的打算。

你来信提到的第二个重大困难问题的时候是这样说：“第二、我对创作的热情没有以前那样高了，当然这是由于学习太紧，在思想上、情绪上好象也形成包袱似的，但这并不是我不爱创作。”你所谓困难，是作为“创作上的困难”提出来的，好象说学校的功课成了创作上的包袱，这是非常不妥当的。一个学生，创作是业余呢还是学习是业余呢？要说创作是业余的话，在功课繁重而又觉难于理解的情况下就是“业”不“余”，业既不余是不应当干业余的事情的；要把学习当作业余，那就是专业创作者，而你在一个社会经历不多写作经验也不多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提前专业化的。放弃了自己最主要的学习任务而把主要精力用在任务以外的事情上就是“本末倒置”，其结果会象你在十二岁时候进行美术创作一样，弄得两头都误了。

我以为你既然上了地质学校，就应该集中力量把专门的功课学好；假如还有点空余的时间，应该在语文方面用一点自修的工夫把文法弄通。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会运用文字。从你的来信中看，你在这方面错误还多。例如“……我在文学方面，我也有极大的兴趣。我记得我，我在十五岁以前，语文我是学得

最差的……”用这么多“我”字，你难道不觉着互相顶撞吗？不过即使把语法学通以后，也不一定要马上开始文学写作，必须有点社会经历。你应该好好学习，毕业后好好就业，等到就业之后有了些社会经历，想写还可以写，只是在就业之前要仍以写作为目的，那不但作不好业务，而且也不会有正确的足以供给写作的真情实感。

给部长们写信，把稿子寄给部长或诗人私人，对于一个中等学校的学生说来都不太恰当——至少是对自己的老师和各个刊物的编辑部不信任。我建议你以后如再写科学的或文艺性的文章，先请有关方面的老师看看，老师如认为可以，便可以向有关杂志投稿。部长们所管的事往往都是全国性的，很难有时间来为中等学生批改文章，我们这些专业文人，也没有人肯为了自己的一篇文章去打扰他们一次。诗人（或其他写作者）一年有半年不在家，在家时候也还有他们自己的事，为中等学生阅稿，一来不是他们的职责，再则中学生有几百万人，想看也看不了那么多（至于臧克家本人虽是诗刊负责人之一，但阅稿基本上靠的是编辑部，凭他个人阅，有五个臧克家也是阅不过来的）。你或者以为中学生虽多，但别的中学生不会也把稿件直接寄给他们。自然找这种不恰当的门路的是少数，不过也不止你一个人，部长们和作家们收到的这类稿件，已经都不太少了。望以后不要那样做。以上意见供你参考。祝你努力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

赵树理

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

“普及”工作旧话重提·

文学艺术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自从毛主席十五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了话以后，很少再有人提起，因为在理论上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话，再没有什么可争的，不过从实际上看来，直到十五年后的今天，似乎也还有提一提的必要。

普及工作一向是靠哪一方面做的？做得如何？提高工作是否真正为普及所决定？是否真正指导了普及工作？工农兵还算不算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直接为他们服了多少务？这一切问题，好像早已都解决了，而实际上，不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工农兵绝大多数就还不知道社会上有那么一“界”，叫“文艺界”。就工农兵三者而论，近几年来文艺普及工作在部队中做得最好——因为他们的集中性更大，而且能把文化生活算做训练业务之一部分——工人次之，农民最差。而三者所占的人口数量则是部队最少，工人次之，农民最多。“为工农兵”的文艺方向没有人反对，“为”了多少，空下了多少，虽然没有作过普查，而在工农大众聚居的地方住过的同志们，都会感觉到与文艺有缘的人不可多得。

情况既然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再要不想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改变，我觉得就连毛主席的讲话也不必再读了——假如不准

• 本篇最初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北京日报》。

备用它来指导行动，再读十五年也没有什么意思。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须要对这种情况作一番分析研究。现在我把我在普及工作方面的看法写出来，以供关心其事的朋友们参考：

两个传统及其关系

这笔账至少应该从“五四”算起。在“五四”之前中国正统之“文”载的是孔子之“道”。因为这个“道”阻碍着思想的进步，进步的知识分子便掀起了打倒这个道统的运动，并因“道”及“文”，做了文学认识上和文体上的改革。只是这种正统之“文”在当时并不曾为广大的人民大众所赏识，而人民大众在自然状态下的文艺生活则是听书、看戏、唱小曲、唱秧歌等。这种书词、戏本、小曲、秧歌等东西在当时的自然状态下虽然也难免受到一点孔子道统的影响，可是究竟和孔家的往来不多，要能及时得到进步的新文艺界领导的话，大有发展的可能，可惜未被当时的新文艺界所重视，虽不曾多挨拳脚，却也未曾得到批准——说得更确切一点，可以说只被承认其中的杰作有参考价值，其艺术本身生命则未被承认有延续的价值。自此以后，中国文艺仍保持着两个传统：一个是“五四”胜利后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文艺传统（虽然也产生过流派，但进步的人占压倒优势），另一个是未被新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新文艺是有进步思想领导的，是生气勃勃的，但可惜也与人民大众无缘——在这方面却和他们打倒的正统之“文”一样。民间传统那方面，因为得不到进步思想的领导，只凭群众的爱好支持着，虽然也能免于消灭，可是无力在文坛上争取地位。

两种艺术境界

戏台上挂上桌裙、搭上椅披，书场上摆开了鼓板、弦师寅起弦来，玩高跷、竹马的打开了场，广大的群众便立刻进入了艺术境界，而接受过新文艺传统的人往往不能承认这些里边会有什么真正的艺术。钢琴揭开盖了，合唱队站齐了，朗诵者拿出稿子来了，新文艺爱好者便立刻进入艺术境界，而没有接近过这种传统的群众，往往一边听着，一边瞪着眼找不到有何妙处。

两种普及的前途观

上述的从两个艺术传统中培育出来的人，在艺术兴趣上往往是互不相入的，可是毛主席的讲话中是要让后一种人去向前一种人作工作的（也只能如此安排），因而对普及的前途就产生了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听了毛主席的话，先向群众学习，深入体会群众的文学艺术兴趣，然后从这个基础上运用自己的艺术本领，为群众造出既合口味又有进步意义的艺术品。这种艺术品是高级的，但同时也可以普及。我以为这正合乎毛主席所讲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提高与普及的分工不应该是严格的。“提高”能给“普及”以指导，正是要指导它“提高”一点，否则何必“指导”？《白毛女》、《周子山》、《王贵与李香香》都不能说不是高级作品，然而又都很普及。同样“提高”要为“普及”所决定，其目的之一正是图它能迅速“普及”（另一个目的则是适合劳动人民自己的需要）。第二种对普及前途的看法则是不承认群众的传统能产生艺术，而要以新文

艺的传统来代替。他们对广大群众不能接受并不着急，而以为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说现在的群众没有进过学校，没有足够接受这种艺术的文化基础，等到下一代教育普及了自然就接受了。我对这种看法不完全反对，只是我觉着有两个缺陷：第一是把再没有机会进学校的人们关在艺术大门之外，第二是用一个传统消灭另一个传统。经过“五四”所创之统是宝贵的，是应该继承的，但为更多人所熟悉所喜爱之统就不应继承吗？再不能上学的人就不应该有接受艺术的机会吗？我们的下一代把两个统都继承起来不更好吗？为什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来消灭一个呢？我以为把民间传统继承下来是有必要的。“为工农兵”首先应该为今日的工农兵，至于对几十年后的工农兵自然也有责任，不过那个主要责任还是让几十年后的作家们、艺术家们自己去负好了。不幸的是在今天的文艺界中抱第二种前途观的是多数。

两个阵营及其服务范围

在两种传统下的文艺队伍，以总人数论是民间传统方面的多，以思想、能力论是新文艺传统方面强得多——作家、艺术家、文学艺术团体、各种报刊杂志，几乎全部是新文艺传统的成员。至于民间传统方面的力量可怜得很，写写不出来，印印不出来，按理说应受着“提高”的指导，实际上也理解不了指导之处何在，如何接受指导，旧的遗产不尽合乎现代精神，新的创作还远远赶不上旧的水平，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可是以服务的范围来说，新文艺传统方面的工作，面对的是干部和受过中等学校教育以上的知识分子，而民间传统方面的工作则面对

的是数量超过前一种对象若干倍的广大群众。这种分工自然是不合理的，但限于两方面成员不同的修养基础，还不能互相调换。

普及工作不利条件大体如上。尽管条件这样不利，由于文艺界以外的党政军民领导者不放弃这一工作，事情还是做得不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化部对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是很关心的。例如在戏曲工作方面纠正了粗暴之风，对戏曲、曲艺和其他民间文学设置了好多研究机构，把以前粗暴地否定了的遗产重新作了正确的估计；近年来中央和地方都组织了好多次民间戏曲、音乐、歌舞等艺术会演，近年又成立了中央和各省市的艺术馆来领导文学艺术的普及工作……所有这些措施，对于普及工作都有决定意义。各省市文化部门，在中央的指导下，普遍设立了文化馆、站和其他有关普及的机构，可惜能抽调来的现成干部不多，大部分靠的是在工作中培养，所以工作情况还相当艰苦。

• 部队对普及工作抓得紧、做得快，而且能使两个传统的艺术同时并进。例如连队的俱乐部中，既有人读大部头的中外小说，又有人唱快书、说相声而且做得很成熟。部队的好处是特别集中，只要领导上发现什么事情需要，一个命令就可以很快地普遍作起来。可惜这种方法别的人们不易学习。

工会领导下的俱乐部，虽不象部队那样集中，却也重视了群众的传统基础，从去年的曲艺会演中，可以看到其成绩的一部分，但就这一部分已经是洋洋大观了。

在普及工作中还有个特殊的成就，那就是相声的发展。不论到什么地方，相声好象是无孔不入的，也没有人特殊提倡、

大力推广，可是它很快地就普遍起来（原因还不曾追究过）。

在农村普及工作比较差，但也有突出的部分，那就是地方戏。过去在粗暴精神的影响下，地方戏虽然受到一些挫折，但现在的原气又恢复了好多。农民群众在没有其他娱乐条件的情况下，夜里往往愿意跑到十里之外的村子里看戏去。有好多农民群众都是地方戏的内行，好多村子在过年过节时候，自己就能演唱起来。

这一切对普及工作说来都是有利的条件，都可以作为我们继续工作的基础。

文艺的普及工作本来是文艺界的事。可惜我们一向没有足够的重视，现在非文艺界已经做起来了，我们至少也应该配合一下。

由于有历史形成的不利条件，配合起来有若干困难，但不论有多少困难还是应该做，否则不合乎现在的整风精神。要作这种事，首先要配备这种力量。我们能继承民间传统、能理解知识分子以外的广大群众欣赏艺术的心理状态的人固然太少，但少不等于无。要尽量把这一些为数很少的人组织到可以作普及工作的环节上来。除了我们文艺界自己的力量外，还可以广泛地联系社会力量。部队上会说快书的也不多，可是部队的领导者认为需要，就把高元钧请去当老师，结果就造成桃李满天下。我们不懂的，只要有人懂，就不怕断了种。至于我们只接受过新文艺传统的同志们，不一定要改行去写鼓词戏曲（勉强去做，会弄得两败俱伤），但应该支持其事、关心其事——利用自己的理论基础，对成品提一提意见，也就是参与其事了。

总之：我们近来是把普及工作忽略了，现在需要迅速把这一课补起来。

初看蒲剧的时候*

蒲州梆子虽然老早就在我的原籍山西沁水县流行，可是当我长到二十二岁那一年才看到它。山西沁水县在古来属泽州，与蒲州为邻，东半县是上党梆子的流行区，西半县才是蒲州梆子的流行区。我的家乡在东半县，因而从小只看过上党梆子，对于别的剧种，虽说也还有些偶然能看到的机，只是在当时我的地方偏见过深，很不容易看进去。在二十二岁那一年，我到了蒲剧流行区当教员，因为那地方除了蒲剧再没有别的戏可看，所以才变成蒲剧的观众——在开始自然仍难免有点看不惯，看了往往故意找几个别扭的“地方字眼”学一学，讽刺一番，可是这种情况消失得很快，不久就被他们的好戏征服了。

首先使我佩服的是他们的做工。那时候我看了他们的《高平关》，觉着赵匡胤上关来的马上姿态美得很，架子多得很——这些架式，在旧年画里也常见到，只是没有那么多，更不会用活的动作把它们穿连起来——一条简单的马鞭子，拿到他手里，就成了变化无穷的宝物，再加上胡须、腰带、朝靴，配着这马鞭子有节奏地飞来抛去，凑成了赵匡胤的英武形象，使人看过之后永远忘不了他。不论文武戏，他们都有很洗练的做工，因而所表现的人物形象往往都很鲜明。他们有好多特技（如翎子、翅子、甩发等），但用得很节约，不到该用的时候不卖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天津日报》。

到了该用的时候用出来使人感到得劲。

再一个突出的地方是好剧本多。我们家乡的上党戏素以节目丰富见著，可是当我初次看到蒲剧的时候，很少有我看过的熟戏，而且往往都是在文艺方面站得住脚的好戏，直到我看了许多其他剧种的今天，这个印象还不曾变。各种地方戏的剧目，往往都是两头小中间大——特别好和特别坏的戏少，演来无大害但也并没有多少文艺价值者多——在蒲剧方面我虽没有统计过，但就我看过的节目加以回忆，好的这一头似乎要大得多。

至于唱腔特点之一的激昂慷慨，有和上党戏相同之处；其柔和婉转的地方虽与上党不同，但也十分动人，所以我一开始就不是很接受不了，只是因为地方偏见作怪，有点故意挑剔，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所以能很快就变成蒲剧的忠实观众，除了佩服他们的做工和剧本之外；唱腔也是个很大的魔力。

使我能消除地方偏见欣赏各种地方戏的启蒙老师是蒲剧。我很感谢它。

一九五四年我又在太原看了两场蒲剧，好象又见到了久别的老友，引起了青年时代好多记忆（不在这里一一叙述），去年冬天和今年初夏，又两度在太原饱看蒲剧好多天，觉着现在的蒲剧不但挖掘出从前好多的传统好戏、继承了传统的做工唱工，而且接受了好多其他剧种之长，舞台布置和人物装饰比从前更净化、美化，做工比从前的色样更多，音乐唱腔的变动虽然不大，但凡是变动了的地方都与遗产十分调和，很不容易发现有生硬的部分，比起从前来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要挖断可右之根*

当右派分子为了向党进攻到处拉人的时候，他们的魔爪也曾伸到曲艺界来拉了一番，曲艺界为了自己队伍的纯洁，也和其他界一样掀起了热烈的反右派运动。现在运动正在健康地进行着，预料经过这次运动能使整个曲艺界的政治水平提高起来。

最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挖断可右之根。要作到这一点，除了在运动中的突飞猛进之外，还要把政治学习经常化，长期坚持下去。解放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对曲艺界照顾得也还差不多，只是教育得少了点。这个恐怕是使右派分子敢于在里边拉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从思想上挖断可右之根，才能不被右派利用。

解放以前，曲艺艺人最感苦恼的是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问题，而到解放以后这两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是艺人追求的目的，也是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目的，二者是统一的。可是在前途打算上，对社会主义思想接受还不太深的艺人，就不是那样和党一致的了。艺人是自由职业者，也属于小资产阶级，不能靠他们自己产生社会主义思想，要是思想改造工作作得少一点，他们自然还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当一个人还是个人主义思想占支配地位的时候，个人欲望发展起来是永远得不

* 这篇文章，曾经发表在一九五七年《曲艺》八月号上，后收入《三复集》。

到满足的——他不顾整个社会前途、不顾整个行业前途，而对自己的前途则有无限要求，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不但今日之章罗不满于部长，古之皇帝还有长生不死的奢望。象北京曲艺界的×××，左一个团长、右一个主任、东一个委员、西一个代表，一人身兼数职，并不能算不露头角的人物了，可是因为个人野心支配着他，他不但以这些为满足，反而利用这些资本作为投奔右派的进身之阶，利用这些场所作为辱骂党政的讲坛，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所幸者，自从解放以来，党对曲艺界的政治教育工作虽说做得少一点，却也花过相当大的力量；广大的艺人群众的政治学习虽说有点赶不上现实要求，却也都尽过很大的努力，因此右派的拉人勾当在这一界也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顺利；真被他们拉过去的是极少数，其余被“拉”了一下的人们，因思想进步程度不同而作出各种不同的表现。

想考验一个人的身体锻炼得如何，往往是和他拉一拉手——要是拉他不动，就得承认他有了功夫；要是能拉得他晃摇两步，便可以向他说：“不行！还得炼！”右派分子向曲艺界拉这一下，对曲艺界也是很好的一次考验。考验的结果：除某些脓包被人家拉离了家门之外，其余大多数人站得住脚，也有少数人“还得炼”。

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作长期锻炼是有好处的：站得住脚的多炼一炼就站得更稳；被人家拉得晃摇过几下子的，不但要作普通的锻炼，而且一定要查清楚其所以晃招的原因，以便作克服同样事故的特殊锻炼。参加运动可以使人突飞猛进，对立脚还不太稳的人说来应该是更为显著。不过其主动之权操在他们自己的手里，要是自己不趁此机会来努力，运动一过就很难免

有一段搁浅的时候，要是仍有进步的决心，自然最后还能取得人民谅解，只是要经过比运动中长好多倍的时间。至于真正被拉过右边去的人，只要他们能认真改过，“社会主义大门是向他们开着的”；要是他们决心自绝于人民，那末别人也就挽救不了他了。

从党政领导方面说来，对曲艺界的思想教育，误了的课要迅速追补，今后的课要尽量不缺。

这样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双方的目的一致起来，行动一致起来，使社会主义思想在曲艺界成长饱满起来，右派分子便再也无从施其拉拢伎俩了。

（一九五七年七月）

青年与创作·

——答为夏可为鸣不平者

由于我回答夏可为的一封信被刊登在《文艺学习》五月号，引来了好多来信。这些来信，也有赞成的，也有怀疑的，也有反对的，还有问罪的。我对前一种不准备说什么，而对后三种，却须要作个总复，因为他们同情夏可为的错误，或者比夏可为想得更不对头。他们对我的责问大致有以下几个内容：

1. 夏可为满腔热情，为何只能换得你一瓢冷水？
2. 一个有作为的青年，对他的前途难道不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志愿、幻想吗？
3. 鲁迅是如何帮助青年，而你是如何打击青年？
4. 刊物编辑部退稿不提意见，而你们作家又不给青年阅稿，今后的青年想学写作还靠谁指导呢？你难道生来就是作家吗？你在青年时候就没有要求过前辈指导吗？
5. 学生生活难道不是生活吗？为什么说一定要深入社会才能写作？
6. 杜甫八岁能诗，刘绍棠在中学上学就发表作品（并举出普式庚、裴多菲等少年成名者），难道年龄能决定一切吗？

* 这封信，最初发表在《文艺学习》一九五七年第十期，后来收入《三复集》。

根据这些内容：我分条答复如下：

我复夏的信是否冷水？

夏可为小朋友是个未满十八岁的地质学校的学生，学习现状是学科学感到吃力，学语文还不够通顺，然而已给两个部长、一个诗人、一个我写过信、写过稿，难道不是思想上有点不对头的地方吗？这事情要发生在我们成人身上，有一大堆合适的帽子可以往头上戴，然而他是个青年，要把那些帽子给他戴上他是不会接受的；要不提出他的错误，也不合乎爱护青年之道，所以才给他写了那样的回信。老实说，我给他写这封回信的时候要比我写个短篇小说费的劲儿更大些。恕我在这里夸耀一下我那封复信：那封信，把他的错误指出来了，道理也都说清楚了，然而没有一顶大帽子，没有一句斥责的话。就那样的内容，写成那样的文字，在我算是极尽宛转之能事了。我自然不是说别人就不能写得更委婉些，不过不太容易，不信请试试看。

发表这封信也有疏忽的地方，那就是可以不发表夏的名字。不过那事故出在另一个刊物的编辑部。原来某编辑部和我约定“如遇有代表性的复信，转给我们发表一下”。我写了复夏的信，亲自交给这个编辑部的负责同志，嘱托他们发表的时候不要发表夏的名字（因为原信还要托他们寄出，不能涂去名字），而他们的刊物因为五月份延了期，便将此信转给《文艺学习》提前发表，而转稿时候没有交代清楚，故将夏的名字刊出了。不过这封信的本身并没有伤害夏可为小朋友的地方，发表后我又接到夏的来信表示感谢，而我也又一度作了答复。

前途、理想、志愿、幻想等

南京三中某同学来信中有这样的话：“……在学校中提出四十万字的创作计划，老师、同学定会说他是‘自狂’、‘神经’，因此他才想到他所热爱的作家伯伯，可是用热情与希望写成的信，只换到个大标题‘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标题不是我标的，可是我同意。——假如我自己标的话，我会把“多”去了，因为它的毛病不在于多而在于性质不合适。幻想的性质有两种类型，一种的内容往往是当时人们还得不到的美满境界、美妙事物；另一种的内容则为当事人不应追求的个人名利。这两种幻想都有传统，但前一种足以启发人们的创造性和改进世界的要求，而后一种却只能助长人们“自我扩张”的野心。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前途上，后一种幻想是不应该提倡的。可惜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开始不久，传统的个人主义幻想还刻印在许多人心上，不易马上消灭，以至于有些青年人沾染了这份有毒的思想遗产，并且理直气壮地坚持着、传播着，这是非常不妙的。从收到的来信中看，有好多人把夏可为的想法、做法说成了“伟大的理想”、“卓越的志尚”、“有作为”、“有毅力”、“不怕失败”、“能和困难作斗争”。这些词句固然足以鼓励人，但要用这些词句来鼓励一个不安心正当的学业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四面八方找个人出路上的一个青年，会得到个什么结果呢？×××不就是那样漂浮出来的吗？浮出来以后不是就对党不满以至于驾乎党之上了吗？在今天鼓励个人主义，只能鼓励出反党分子来。淮阴中学某同学来信中有过这样的话：“我们是党培养下的青年。我们有卓越的志尚。我们有远

大的理想。我们不愿像拉磨子的牲畜一样活在人世界——因为那样，几年后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可悲了。”这话应该是旧社会中的被剥削者说的，说在今天一个在党培养下的青年口中就不适当了。鲁迅先生所谓“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意思，就是甘心为人民拉磨。我们虽不像鲁迅先生拉得那样卖气力，但作为一个为人民拉磨者，性质是相同的，过去没有偷过懒，今后仍不会偷懒。这位同学的远大理想和卓越志尚是从学生一变而为“不拉磨的作家”，把社会主义之磨让给他以为甘心愿像牲畜一样的劳动人民去拉，这真是地道的剥削阶级思想，成了功也不过是×××第二。假如大家都打他这种主意，才正如他说的“几年后，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可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都是人中人，没有人上人——领导同志不过是负的责任更大的人中人。一个人想负大责不是坏的幻想，不过作起来要先从负小责作起——负小责负得有了“卓越”的成绩，周围的人自然会把较大的责任交给你负——只是负较大责任之后如果又产生不愿拉磨的思想，委托他的人民仍会把他拖在一旁。

鲁迅时代之青年与今日之青年

好多来信中都把我和鲁迅相比，说鲁迅如何爱护青年而我如何打击青年。鲁迅先生是我们的前辈大师，拿我去比他很不相称，不过问题还不在于相称与否，而在于时代不同，因而有些办法不能学习。在鲁迅先生活着的时候，大部分中国的土地上是颠倒黑白、暗无天日的。在当时，除了××之流几个投机分子之外，凡是请教于鲁迅先生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有点革命倾向。像鲁迅先生那样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人，遇到每一个有

革命倾向的青年，如何肯放过不理呢？假如他不理，那些人再找不到革命门路，万一再屈服于旧势力，对革命就是损失。鲁迅先生当时对青年的帮助，主要在于给青年们灌输革命思想，而帮助写作是次要的，有时候仅仅是以阅稿作为开始的。这种进行思想教育的办法是手工业式的，而在当时只能如此。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的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各个地方都有党、团委机关，各个学校都有党、团组织，思想教育的书籍到处大量发行，每一个青年只要愿意接受革命的思想教育，随时随地都不缺乏机会，因此鲁迅先生所用的那种方法就不太重要了。不过我们这些文艺写作者，对这种已经不太重要的方法并没有完全放弃，遇着可用的时候还是要用一用。在我自己，像答夏可为的那样的信，每月总还要写个十封八封，只是没有发表罢了。至于有些人说我的信是泼冷水，那也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是以热情写的，他们偏要当冷水喝，那该怨谁呢？衡山一中一位姓曾的同学来信说：“我们希望的决不是放冷枪、泼冷水来扑灭我们雄心上的熊熊火焰。”你们的“雄心”上既有“火焰”，喝点冷水也有好处，可以去一去火气，至少烧得慢一点。他们既把那封信看作冷水，那么这个总答复可以说是冰块了。就让他们更凉快一点吧！

青年写作由谁指导？

衡山一中一位姓李的（不是那位姓曾的）同学来过一封心平气和的信，信中显然也说我对夏可为泼了冷水，可是他的理解与其他来信者不同——他所谓冷水，指的是我在批评了夏的错误之后，没有正面指出创作之正路。在这封信中他还写出他

对中国文艺队伍的看法。他说：“现在我国文艺队伍并不十分壮大，解放几年来虽然增加了不少的新生力量，但人数仍然少得可怜……因此作家们就有责任培养更多的后代来扩大文艺队伍。当然其主要对象是专门学文的人，但对那些业余作者，我们的作家也不能毫不理睬，这股力量目前在我国文艺界仍然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这支队伍里出现了不少的作家。好像我记得赵树理作家原先就不是学文的，也是从一个业余作者而成为作家的。现在夏可为同学的文章写得并不太好，但是谁也不能武断地说他将来一定不能成为作家。我想他只要不断地努力，理想总归有一天会实现的。”这样看法很大部分是正确的，只是有几点和我的看法还不尽同。我不妨提出我的见解来和他商量：第一、这位同学提出业余写作者之重要性了，但提得还不够重要。今后要培养的“主要对象”不是“专门学文的”，而是业余写作者。古今中外的作家，绝大部分都是由业余转来的，今后还想不到会有怎样显著的变化，因此还只能说业余写作者是今后文艺界的基本后备军。第二、培养文艺界的新生力量要靠党的文艺政策、文艺领导机构和文艺书刊，而不能靠作家个人。我自己和我所认识的作家们，很少是经过哪位前辈具体指导的（我自己在从事写作之前，不曾给任何作家写过信），往往都由爱好者变成业余写作者，又由业余变成专业的。但是每个爱好者又不一定都变成业余写作者，每个业余写作者后来也不一定都专业化，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才能，而是因为社会要求没有那么多，个人志趣也不一定都趋向写作。这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为什么说培养新生力量不能靠作家个人呢？因为写作这个业务有点特殊，它既需要专门知识，又不能设立专门学校来培养（进修则可），其所以不能靠学校来培养，是因为它

需要的最重要的一门知识是社会经历。“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当一个人“不识愁滋味”的时候，任何老师都无法传授，非让他“愁”过了不行，否则他只会“为赋新诗”而“强说”。学校尚且不能完成这种任务，作家个人又有什么办法？至于一个作家向一个请教者说“要多学习马列主义，长期地到劳动人民中去，多读作品，多研究理论，多练习写”，我想每一个作家对向他请教的人们都不止一百遍二百遍说着这样的话，然而请教者绝大多数不以此为满足而一定要对方授以秘诀，可是天哪，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秘诀呢？现在我们的国家虽然进入社会主义，但人们对自己的孩子们总还有点偏爱呢？假如写作有什么秘诀的话，作家的孩子们不也早已成为作家了吗？然而直到今天还很少听说哪位作家的孩子已经成为作家了。第三、他说“只要不断地努力，理想终归有一天会实现”，也说得对，只是还须要认清努力的方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努力认真参加社会生活，努力读作品读文学理论书，在政治、文化、文艺学习达到一定水平时候，在有了一定的社会经历时候，再加上努力练习写作，理想是会实现的；要是在以上条件不具备的时候，荒废着学业或应付着职业来努力写作，努力给部长们写信、投稿表现自己，其所能实现的，恐怕只是要不得的理想了。

政治、文化教育可以靠党、团或学校，社会经历可以由参加社会生活取得，而文艺知识是否只能自学呢？我自己和我所知道的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是自学的，而且现在青年自学的条件要比过去好得多。过去的文艺书刊，固然有在党的领导下刊印的，可是这种进步的书刊是被反动统治者认为非法的，而反动的书刊则是合法的，究竟应该读什么，要靠青年自己去选择。

那时候因为接触不到党的领导而走上歧途的青年是无法统计的。现在所有的出版机构都有党的领导，带有方针、政策性的文章都已印成专册到处发行，文艺刊物有《文艺报》、《文艺学习》等，还有各地方文联或作协分会所出的刊物，一个有一定文化程度而又爱好文艺的青年，在任何地方都不愁找不到学习门路。这要比作家个人指导得普遍得多，经常得多。一个青年文艺爱好者，只要不是想找什么根本不存在的“秘诀”，在这样经常、普遍可以得到指导的环境中，又何必去找作家个人呢？

找个人指导还有个危险：从前××的“指导”热情很高，只要遇到一个到处投稿均未被刊登、到处写信均未得到鼓励因而对文艺界不满的青年，他绝对不会放过机会不来“指导”，不过他的“指导”有个目的，一定要“指导”成××××。党内的××也是那样；所以受过××特殊“指导”的人，很少有不受其思想毒害的。野心家们要得天下，要组织独立王国，自然就不能不“组织人、联络人”，招兵买马，不拿出一点所谓“热情”来，在今天他们还有什么本钱呢？夹杂着一些个人主义思想去找“指导”，很容易上野心家们的当。×××不是因此在章罗联盟的“热情”“指导”下出足了风头吗？青年人应该引以为戒。

当了学生是否必然能写好学生生活？

南京察哈尔路三十七号（不知是机关还是私人住宅）五个人具名来信中，在引述了我批评夏可为没有社会经历先订四十万字的写作计划是不切实际的打算之后，接着反问我：“在学校中的生活是否算社会生活之一种？学生是否完全过的是

学生生活？”所谓社会生活或社会经历是包括政治锻炼、政治考验、负责精神、政治热情等等在内的。夏可为在学校中热衷于出奇制胜表现自己，未有志于做个标准学生，如何能把学校生活写好呢？我的复信中先劝他在校时好好学习、毕业后好好就业，不正是要他吸取些真情实感作为以后创作的资本积累吗？现在能争取当个好学生，到以后写作起来才能把学校生活写好，否则不但今天写不好，以后也不会写得更好。“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是毛主席指示我们的办法。照这个办法办自然艰苦一点，但是除此以外没有什么讨巧的办法。业余作家所接触的生活面虽然比较少一点，可是他本身就参加在火热的斗争中，对他生活范围中的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活和斗争形式最为熟悉，所以在“业”之“余”写起来是可以写得好的。不过假如他们参加了业务而以写作为主，以“业”为余，他们便不能够理解业务中人的感情，在旁人是在火热的斗争而在他们便成了这斗争中可有可无的票友了。鼓励急于成名的学生就便写学校生活而不劝他按照毛主席的话去做，也不过是××“到处有生活到处有斗争”理论的翻版。在这种鼓励下，恐怕只能产生×××式的飘飘然的作家。

神童的声望足以毁灭天才

同前的信中之于反问我“学校生活是否生活”之后，又接着举

出杜甫、普式庚……以至×××一串少年闻名的人，问我作何解。我的理解很简单：凡是凭着天才努力学习，努力参加社会生活的就真正成了功；凡是到处卖弄自己那一点聪明而不肯学习、不肯参加社会生活的就都象昙花一现以后不知所终。例如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不在于他的八岁能诗而在于他的“骑驴三十载”、“读书破万卷”。中国历代不乏神童的记载，可是后来真正有所建树的不多，大部分是被人们象玩毛猴一样地到处玩“神童”，终于把他们的宝贵时间玩过去，弄得他们一事无成。我们是酷爱天才的，但是愿意劝天才先做些平常人也做的事，而不愿意把天才鼓励得脱离了凡人，最后遭到毁灭。

我的总答复到这里为止。至于那些破口大骂的来信，恕我不复——因为这些名利熏心的人，冷水和冰块已经扑不灭他的火焰，只好让他们熏着吧！

一九五七年九月

我与汉字·

凡是幼读孔孟之书的人，都认的是“官板正字”。这种字，在当年认它、练它的时候，吃苦自不必说；而一旦发现它的缺点想改进一下，也会成为苦事。

我自己在学了“官板正字”之后，对它发生了比较深厚的感情，在作文章、记笔记的时候，不写成这种字老觉着不洽于心，因此比别人在速度方面要差一大段时间。倡用简笔字以来，我在道理方面是满意的，只是自己一动笔使用个把简笔字，再往下写，总觉得上边产生了一些什么缺陷，为它耗去的精力，比写一个正字已经超过好多了。我自知这是一种惰性，但久久未能更正。我真羡慕现在才上学的儿童——预料他们不会产生我这种毛病。

可是现在的儿童，只能说稍微比我们当时讨了一点便宜（在某些汉字上少写几画而已），而学字的痛苦基本上还在。我自己家里就有个小学一年级儿童。这孩子在自己修时间，所苦的是写字的笔顺——找不着规律。我从前也教过小学，在教初一年级儿童写字的时候自然也吃苦不小，对笔顺的规律也开不出一个条文来，只好象我的老师教我一样，多教、多写，让他们写得多了自己去找规律。我每看见孩子面对着生字，拿着铅笔愣愣地发愁的时候，真想对他说：“不用学那个了，拼音文字快

• 本篇曾经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

要被采用了！”只是“快”不等于“已经”，所以话还不能那么说，还只得作为个辅导教师按着老规矩教他笔顺。

总之，我对汉字的感情是不统一的——一方面希望它早日改革而代之以拼音文字，另一方面在自己用它的时候又成了它的爱好者，不过这种爱好绝不影响到主张改革的积极性——我以为再不应该让孩子们染上我这种恶习。

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

（这是一九五七年九月给我女儿的一封家信，后来《山西日报》编辑部的一个同志看到，就加了个编者按，把它发表了。因觉得广建的思想问题，在部分青年中还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把它收在这里，供有类似问题的青年同志参考。）

广建：

多日不见你的来信，不知近来有何进步。

你离开学校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中，你换了三个工作岗位，最后总算“接近”了劳动人民。我想在现在的条件下，你的思想应该有所开展，因而我又想对你一年来的生活、思想情况作一点分析，作为你今后调整生活的参考。

去年你要到新疆，我同意了。在商量这件事的过程中，你驳回了我好些建议：我要你回原籍参加农业社，你根本不愿考虑；我让你在北京参加服务业，并具体提出当售票员、售货员、理发员等职务，你调皮地说售票、售货只售给爸爸，理发也只给爸爸理，其实自然还是根本不愿考虑。

从这一件事看来，当时我说你是看不起劳动人民，你不服气，现在我想你应该能够认识这一点了吧！自然你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不过不论如何复杂，其主导思想只有一种，那就是

* 这封信，最初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山西日报》，后来收入《三复集》。

“看不起劳动人民”。你有两个小小包袱：一个是高中学生，另一个是干部子弟。从旧社会传来一些社会职业评价，认为读了书或当了干部就应该高人一等，认为参加生产和服务业的人是干粗活的，俗人。这种与社会主义极不相容的旧观点，偷偷地流传到很多学生和干部子弟的头脑中，而你不幸也是接受了这份坏遗产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头脑不太笨，学售票或售货还不至于连钱钞也查点不清，学理发也不至于削了顾客的耳朵，而你所以不愿干者是怕碰上你的老师、同学或和我同事的老前辈；要是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你也要比从来没有见过庄稼的城市青年好得多，而你所以不愿去者，也是怕亲戚们和小朋友们，也从要不得的旧观点出发，说你一声“没出息”。同样的中学生，在生产就业问题上，劳动人民的子女们要比干部子弟好接受得多——他们尽管也接受过对职业评价的旧观点，可是一到了真找不到所谓“高等职业”或升不了学的时候，农民的女儿很自然地会去种地，理发师的子女很自然地会去学理发，即使思想上没有真通了，在行动上也会真做了；即使有点不满，也不至于认为见不得人。而干部子弟则往往不能那样开朗，总以为爸爸当干部儿子就不能理发，其实那有什么坏处呢？我当作家你理发，我的头发长了请你理，我写出小说来供你读，难道不是合理的社会分工吗？平等的道理，每一个中学毕业生不但能懂而且会说，干部子弟说得更会周全些，只是要让他们选择一种事业作为终身业务，他们往往偏不选择最大多数人参加的劳动生产，这除了说是“看不起劳动人民”还能再有什么解释呢？

从新疆带病回来以后，我仍动员你不论回原籍、不论到永济，最好是参加农业社直接生产，你说那是“不现实的”。你

所谓“不现实”，似乎是指你的身体不强，又缺乏锻炼，这理由是站不住的。任何劳动生产的组织中，成员们的体力条件都不是非常平衡的，每个人都有一些强弱的差别，因而每人分到的工作和应得的报酬也都有差别。每个农业社中，每个工厂中，都有体力和你相等和比你还弱的人，他们都很现实地参加在生产之中；至于没有锻炼，那只是时间问题，参加进去就是锻炼的开始，这难道还能成为什么不应参加生产的理由吗？

我和你哥哥后来答应你到永济找生产以外的工作，都是说不服你暂时对你的迁就，实际上你是不能当干部的。干部者，群众之骨干也。干部一定要比群众坚强，要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毛主席说过，世界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生产斗争知识，一门是阶级斗争知识。你和一般中学生都恰巧是缺这两门知识，所以都不适宜于当干部。你前次来信说你现在的任务是动员毕业生参加生产，而你自己却正是应该被动员的对象，难道不成了侯宝林先生说相声的材料了吗？

我相信你在这几个月农村工作中认识了好多劳动人民，懂得了一些生产中的事情，而在感情方面也应该更向劳动人民靠近一些，但我以为应该进一步在一个社里落户，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只有真正参加了生产，凭工分过日子，才能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现在是个什么阶段，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前进，才能深刻体会到生产中任何问题都与自己有直接关系——即与广大群众有直接关系。只要你在生产中真有所建树，你是会感到生产本身就有快乐的。

听你的同学说，你近来写了几篇文章（内容我没有打听），我不反对，但也不敢贸然鼓励。我是从二十多岁起就爱好文艺，而且也练习过，但认真地写还是三十八岁以后的事。业余可以

写作，今后的作家大部分仍会从业余中产生，但一定要认识什么是“业”什么是“余”，爱业务的精神应该超过爱写作的精神好多倍。你知道我也爱吹笛子，而且吹得很蹩脚；我不因为吹得不好而不吹，但也永远不争取登台独奏（在家自然只能“独奏”）。这就叫业余。业余的文艺爱好者对写作应抱这种态度——写得好了自然也可以发表，特殊好了也可以转业，也象我的笛子假如吹好了也可以登台演奏或参加乐队一样。有好多参加农业社的青年知识分子给我来信说，他们立志要当个作家，我不同意。农业社可以产生作家，只是把当作家放在第一位，而生产就成了“业余”。农业社参加的这种人多了，也许会把社变成了小的作家协会，只是不容易把社办成个模范社。

不写了！希望你参加生产，把主要兴趣放在主要业务上。

父示 九月十四日

“才” 和 “用” *

自从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劳动以来，成千上万的下放干部、成千上万的毕业学生参加了工农业劳动，给劳动队伍增加了新鲜血液，给知识分子开辟了极为广大的政治学校，双方都觉得气象一新。可惜还有若干没有呼吸惯这种新鲜空气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蝉联被旧历史所造成的知识分子特殊化的现象，故意制造一些“大才小用”或“用非其才”的论调，企图挽留他们那种不太光荣的“历史传统”，所以还有辩论一番的必要。

“才”的种类甚多：有“经邦济世之才”，有“专权弄势之才”；有“发明创造之才”，有“欺世盗名之才”；善经营者是有“生产之才”，惯敲诈者是有“剥削之才”……“才”，本来就是“知识”和“能力”，用到好的地方是越多越好，用到坏的地方是越多越坏。

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不论一般知识分子，不论专门人材，都是由劳动人民花钱培养成的——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由国家直接从劳动人民手里拿过钱来培养成的。人民花钱培养人材，为的是叫给自己办事，因此在没有托付你办事之前，就须要先考查一下你是否和他们自己一条心。当他们对你

* 本篇最初发表在一九五七年《中国青年》第二十四期，后收入《三复集》。

的心没有把握的时候，不敢只凭你的“才”就把事情交给你办，何况连你有多大的才也还不知道呢？想要考查你的心，最简便而可靠的办法就是请你到他们队伍中过一过日子，看你和他们是否一家人，或者现在虽然还不像他们的自家人，而过一个时候是否可以成为一家人。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要经过劳动锻炼”的基本道理就这样简单，不过我认为这种道理是无可反驳的。

以“大才小用”或“用非其才”为反驳理由的，一展开来谈就谈得矛盾百出，不是劳动人民所希望之“才”。《中国青年》本年第二十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黄玉麟同志给他们编辑部一封信，最足以代表这种思想本质，且引几处作为例子：

一、“党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领导上作了动员报告以后，大家都热烈响应，普遍报名，有的还写了大字报表示决心。当然我虽然还有些犹豫，但想到自己是个共青团员，不能落于人后，又估计到我的工作离不开，领导上不一定批准我，所以也报了名。隔不几天，名单批下来，我竟然被批准了。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就缩紧起来，我的计划，我的未来的希望破灭了。”

一个共青团员，听了“党”的号召，听了“领导”的动员报告，在“大家”“热烈响应”“普遍报名”“贴大字报表示决心”的影响下，开始“犹豫”，继而怕担落后之名，又估计到工作“离不了自己”，领导“不一定”批准，这才“也”报了名，等到领导上批准了，自己的“希望”反而“破灭”了。这一段响应党的号召过程，可以叫做“弄假成真”。黄玉麟同志固然自己坦白地承认了，不过其所悔恨的不是不该“弄假”，而悔恨的是不该“成真”。黄玉麟同志虽曾说过“不能

落于人后”，但实际上不但落于“大家”之后，而且也落于不愿表示响应者之后——因为不愿响应者还不曾“弄假”或无“弄假”之“才”。从黄玉麟同志这一段表现上看，不论其才大小，人民把事情交给他办是不会太放心的。

二、“我是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的，原先是个高中学生，高中毕业后本来准备考大学，只是由于组织上调动，我才服从了祖国需要而离开了学校。自参加工作后，我深深感到自己能力不高，未能学有专长，因而只能作一般的工作。自从去年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提出以来，我更加感觉到必须努力学习业务，以便使自己逐渐成为专家。我曾请求组织准许我报考大学，但是因当时本单位要求报考的人太多，组织上没有批准我的申请，我只好在工作岗位上暗自努力。”

这一段也是很坦白地埋怨组织要他工作，因而耽误了他的前程。组织认为他有“才”可“用”而用将起来，使他早日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对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来说，应该说是最偿心如愿的事，而在黄玉麟同志这样一个青年团员（虽然也称为“共青团员”）看来，却是一种妨害，而且五、六年来不能忘怀，一有机会就想溜开。是不是“大才小用”了呢？黄玉麟同志自己也不便那样说，而转了个弯说他是“有可造之才”，组织不让他“造”，因而“只能作一般工作”。在“尚未”学得“专长”之前，就不大愿意作“一般”工作了；等到学成专家之后谁还“用”得了他呢？混在“一般”工作里专心一意地“暗自”准备当“专家”持续到五年之久，这样工作态度的干部，谁敢把更“特殊”一点的工作交给他干呢？黄玉麟同志把他的个人打算说成是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自然好听一点，不过党却不是只号召他一个人，而是连作“一般”工作

者都号召在内的。党也没有说学得了科学知识之后都不要再作“一般”工作，更没有说把机关解散了大家都去投考大学。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他可以和党“同床异梦”，等到“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的号召提出来之后，连“床”也不得“同”了，于是便只好“弄假”。黄玉麟同志响应号召的态度是变化多端的。用这些态度来对付党的人，如不好好锻炼一下，不论他有多大的才，谁还敢把事情交给他办呢？

三、“正当我重新安心下来努力工作的时候，领导上要我下去参加农业劳动，我怎能想得通呢？我最大的顾虑是业务问题。我的业务能力提高，是不能在农村得到解决的……因此我个人的前途也将会暗淡了。我承认我的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缺乏政治锻炼，思想上还有不少毛病，但是我总以为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过程……难道说当几年农民就能改造好了吗？”

像黄玉麟同志这样五、六年来热衷于爬高的人，“听”到了个“参加农业劳动”的号召，马上就能“重新安下心来”“努力工作”，并且“顾虑”到“业务问题”，说句笑话，也可以说是这个号召的附带作用，不过对黄玉麟同志这个具体的人来说，光凭这个作用还不行。不顾社会需要而只热衷于个人向上爬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只能算是具有剥削阶级思想，何况黄玉麟是直接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呢？出身不能决定人之一生，只是锻炼一定得经历一下。老革命同志们是经过几十年地下工作和革命战争锻炼的，现在地下工作不做了，如不再遇到别人的侵略，仗也不打了，青年同志们不到劳动中锻炼，又该到什么地方去锻炼呢？黄玉麟同志问：“难道当几年农民就能锻炼好了吗？”我也可以反问一下：难道上几年大学就能锻炼好了吗？留在机关里就能锻炼好了吗？你在机关里锻炼了五、

六年，不是越锻炼越觉着组织屈了你这可造之才吗？和你上学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农民孩子，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就跟着解放军走了。他们都胜任愉快地各就岗位战斗着、工作着，并没有觉着屈了自己的才。你难道能说这些“干粗活的”孩子们天生“不堪造就”只有你这“豪家子弟”才是“可造之才”吗？难道当几年农民不能改造你这种思想吗？抱着这种思想，假如不经过改造，能算个好的机关干部吗？

四、“……农民也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有人个人主义、自私、落后等缺点……他们目前虽然走上合作化道路，但是时间很短，他们思想上的缺点一定还很多，是否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好的思想呢？会不会反而沾染一些落后意识呢？”

农民是有黄玉麟同志所指的那些缺点，不过哪一个缺点也不是黄玉麟同志自己所没有的，而最主要的特征是他们很少有黄玉麟同志那个不安心工作向上爬的缺点。他们的“衣食住行”虽然会使黄玉麟同志“感到极大困难”（见原信倒数第二段），而在他们自己可是习以为常，不但以他们的生产供应着自己，而且还供应着包括黄玉麟同志在内的城市人民，维持着城市生活的水平。黄玉麟同志见到上述情况，不但不对他们起敬，而且还老以为自己比他们高明得多，说如要叫自己长期当农民是“大才小用”（见原信第三段结尾）。这种特权思想如不在参加劳动中长期改造，能和劳动人民算一家人吗？劳动人民敢于把重要事情交给他办吗？

五、“……我听说下去劳动之后，一来听不到政治报告，二来没有时间学习理论。这会不会也使人落后了呢？”

好像黄玉麟同志不想下去是为了求得政治上进步快，其实仍是个挡箭牌。我们国家的政令遍行全国，在农村里，书报不

过来得晚一点，政治报告不过传达得慢一点，难道就没有学习机会了吗？况且黄玉麟同志的落后不在于文件读得少、报告听得晚，而在于思想歪在剥削阶级那一边。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农业劳动”的理论遍布于各种报刊，黄玉麟同志见得不少；领导上的动员报告，黄玉麟同志也听得不晚，然而当他的思想不曾扭正之前，这些东西不是只起到促进他“弄假”的作用吗？

六、“同时我认为思想改造应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进行，体力劳动仅是一方面，而且也不能适用于一切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工作者就不一定到农村中去（原信的下一段以他弟弟为例又说知识分子也不必要当工人）……不是有许多进步的科学家、工程师，他们并没有当过农民吗？而相反，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并不是个个都是思想健康的人。我就知道有些工农干部，思想毛病也并不多。”

对非劳动出身的人进行思想改造的确应该有“多种多样的方式”（例如《中国青年》发起的这一次辩论也正是方式之一，）但其中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劳动锻炼。这可以适用于“一切青年知识分子”，理由就是我前边说过的，“要看你是否能和劳动人民成为一家人”。农民出身的干部要是沾染了剥削阶级的思想，也应该再回农村去和自己原来的一家人团聚几年，克服一下新染上的毛病。绝不能以为农民出身的人也有不健康的思想，从而就说到了农村不能改造自己。

至于黄玉麟同志所提到的“并没有当过农民”（可能指的是体力劳动者）的“进步的科学家、工程师”，他们有好多人是愿意参加锻炼的，可是有些人工作一时放不下手，有些人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宜于参加锻炼了。我们年轻的党团员和知识分

子们，不应该和这些高龄的老先生们在生活方面争高论下。

对黄玉麟同志的信，我姑且谈到这里，至于以下的所谓“过分强调思想改造”，“不重视文化、忽视业务、轻视知识分子”，和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资”等论调，无非是为他不想参加劳动找理由。“改造”正是“重视”，“贤”应该包括“资”在内，道理非常简单，不必一一细论了。

以下我准备再谈谈知识分子到农民队伍中去是否有可学习的东西和长期当了农民是否屈“才”的问题（以下还会引用到黄玉麟同志那封信）：

这首先还得决定于下去的人持的是什么态度。假如你为的是电镀一下，取得个经过锻炼的表面“资格”，然后回到你的小圈子里更特殊化一点，那末你将会觉得一无“可取之经”，二无“用武之地”，因为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当作“他们”的事情，与你个人的所谓“前途”无补；反之，假如你决心和他们成一家人，把他们的事作为你自己的事，那末你便会感到他们的本领学不完，而你的知识不够用。

假如前举黄玉麟信中说农民“目前虽然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但是时间很短，他们思想上的缺点一定还很多”，从而便怀疑到不一定“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好的思想”。的确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时间还很短，最早的试验性初级社的成立，和黄玉麟参加工作同年（一九五一），可是全国的初级农业社在一九五五年一个冬天就大部分高级化了，而黄玉麟直到今年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的时候，据他说才算安下心来（真的安下心来了没有还无从查考）。就这样一个进步速度，已经值得黄玉麟和具有同等思想的知识分子学习一阵子。

绝大部分的农业社，不折不扣地响应着党的号召，积极完

成着四十条规划，现在不但有提前完成了规划的县、乡、社，而且大大有超额完成规划中亩产量的地方。要把这些社的主任让一个出来叫我这个知识分子来当，不但我自己不敢领盘，而且群众也不敢把这事交给我。也许有些群众不会怀疑我和他们不一心，只是光凭一心也不行，还得有那种领导生产的本领，否则他们会跟着我饿肚子。我不止当不了个全权主任，而且连个队长也当不了，勉强当个社员还不能算个好社员。一个知识分子学成个好社员是可以的，但也不容易，要耐心学下去；至于当队长或社主任，不一定每个人都有份，全看各个人自己的努力。

知识分子当初下去连一个队员也当不好的时候，只应该承认自己还少“才”或无“才”，不应该认为是“大才小用”。也许有人说这虽不是“大才小用”，而可以说是“用非其才”吧？这也不对。这是旧的看法。在旧社会，剥削阶级常以为一切劳动者都是天生就的碌碌庸才，只能“吃苦”，而知识分子自然就都是“指手划脚”的“高等”人物。要把这种观念维持下来，不是教育普及之后就没有体力劳动者了吗？你学得的知识，自有用得着的地方（下面再谈），可是你所缺乏的生产技术、组织经营能力、吃苦耐劳习惯、实干精神、平等观点等等，是非马上学习不可的。

以一个队长为例，至少要作下列一些事：决定种植、估工估产、调配人材、调配畜力、调配肥料、调配农具、安排耕作顺序、检查耕作质量、检查牲畜喂养情况、会议汇报、解决队内外纠纷、收藏、分配、审核队内开支、评定和审查各种定额、评定奖惩、带头劳动等。这些事绝大部分与每个队员都有关系，因此队员懂什么队长也就得懂什么。有些项目包括的详细内容

甚多。例如检查耕作质量一项，就包括每一个粮种从耕地到收获的一系列技术。要想全部懂得队里那一大堆事，就是好好学习，也不是一二年内所能学全了的；要说精通，那就得更长的时间。

知识分子的知识在农村中有没有用处呢？农业生产需要的而我们自己没有的知识和能力固然要学，但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学会了以后就能完全满意的话，那就不能算是个知识分子。有好多事情急待改进或创始，农民自己苦于没有这些知识不能作到，所以才需要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来作第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假如我们只能固守成规，那样何贵乎有我们去参加农业生产呢？农民想简化生产管理手续和账目，缺乏精确计算的知识；要改良土壤，没有分析土壤的知识；要加大肥源，没有分析肥料的知识；要防治病虫害，没有昆虫学和微生物的知识；因为不懂机械原理，有好多小型农具和运输工具不得改良；因为不会测量计划，有好多基本建设磨了洋工；没有病时候不会防病，有点小病也不会自己治疗……所有这一切急待要作的事，一个高中毕业生，如果不向更高一些科学工作者请教，凭自己的知识还不能胜任，不过请教之后可以完成科学工作者的意图，而一个没有人过学的农民，甚而高小、初中的毕业生还不见得能作到这一步。也有些性巧的农民已经能创造出变轴水车、抽水机带磨面等惊人的事物来，一个知识分子，只要能把农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既不怕无用武之地，又不怕做不出成绩来。所谓“屈才”的论调，是站不住的。

最后我再批驳一个大喊“屈才”的高中毕业生的论调，作为我这篇文字的结尾。有个高中毕业生，为了抵制参加劳动生产，给他的老师写了一封叫屈的信，原信过长，我只举出其中

涉及农民的部分来谈谈。他说农民是“互相嫉妒、互相包庇、互相打击、互相气人、自私自利、自高自大、个人崇拜、说话粗鲁、极端低级、吵嘴打架、消极怠工、拣轻怕重……”几乎把他能够想出来的缺德的事，全部加在农民头上。假如他把他这封信写成大字报贴在农村的墙上，农民要不把他斗争一番才算怪事。接着他又说：“这种生活环境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从此我体会到毛主席的英明。他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好象毛主席的话是要他等到农民自己把自己教育好再回去似的。请你不要这样侮辱毛主席的话吧！农民如果自己会把自己完全教育好，还用拿着粮食来培养你这种知识分子吗？你说农民“根本不听”你的意见，“硬顶撞”你。照你那样来看农民，农民如何能不“顶撞”你呢？难道他们应该把生产出来的粮食恭恭敬敬供给你吃饱，然后低头忍气来挨你的骂吗？据你的信上说，你的父兄就是本村的农民。其他出身的知识分子，还要让他们在劳动锻炼中和农民成为一家人哩，而你和农民本来是一家人，为什么偏要说两家话？持着这样态度到农村来，就非觉得一无“可取之经”、二无“用武之地”不可了。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理想的会演“准备”*

前天（四月十六日）下午，我在太谷县东关遇到了长治专区四个剧团赴省参加会演，因为有了好多老熟人，就往各旅店逐一拜访了一遍。一谈起会演的事，他们都很客气，都说时间仓促，准备得不充分；可是谈到参加会演的节目，却使我非常满意。

我以为“会演”这件事，本来应该是各个参加的剧团，把他们在—一个阶段对群众演出中所演的最为群众所欢迎的节目，拿到一个上级领导者所在的地方，互相观摩一番，并请上级领导同志和戏曲爱好者评论评论、提提意见。所谓“准备”工作，主要的在于挑选这些节目；其次就是把群众还不太满意、自己每次做到那里也觉得不太得劲而还没有来得及改动的部分，修理修理。不论挑选、不论修理，都要花一点时间，因而在出发之前停止几天营业做一做是可以的。可惜近几年来另有一个“准备”会演的风气，往往不愿把群众中经过较长期考验的节目作为会演节目，而偏要在传统节目中找一个大有发挥修改本领的节目，大拆大改，改它个面目全非，然后停止几个月营业重新排练，且排且改，改得演员们每天都在记新词，记新场，痛苦万状，直到该他们上演的前一天还要改动好多。象这样的“准

* 本篇曾收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编印的《山西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会刊》。

备”，至少有以下两个毛病：第一是不相信群众，以为群众说好不算好，只要自己发挥一下创造能力，用不着到群众中考验，自然就是好戏。第二对群众不负责。既然自己会改编好戏，为什么不早给群众看，而偏要等到会演的时候才来“赶”好戏呢？好像是说“群众只配看坏戏而领导者和同行则非看好戏不可”，难道说得通吧？

长治专区这次准备的节目有《三关排宴》、《徐公案》、《玉龙簪》、《杨金花夺印》、《劝荣花》等。《三关排宴》和《徐公案》是两个改动很少的传统节目，当年看来是好戏，现在看来还是好戏。这种戏若在我上述的那股偏风的支配下是不会被选为会演节目的——因为没有改头。《玉龙簪》虽然改动得大一点，不过改编者不想为了显露自己的才华而去抹煞古人的成就，仅仅从几条线互相穿插的连本戏中抽出一条线来编连成一单本，绝大部分仍用的是很舒服的原词原场，使人看了毫无生硬之感。《杨金花夺印》虽然是个外来的剧本，可是长专人民剧团二分团已经把它落子化了，而且在长治演了几年，早已博得了群众的欢迎。《劝荣花》是一个表现现代内容的小秧歌戏，不过它完全保持了该剧种的特殊风格，从一九四三年演到现在，一直为群众所喜爱。以上这些节目，都正是我理想中的会演节目。他们的领导者虽然都很客气地说准备不充分，而我却觉着他们的“准备”也是最合理的“准备”。

反对八股腔，文风要解放！^{*}

我没有什么准备，就随便扯扯吧。

我有这么个问题：我们嘴上说的语言，写到书上算不算语言，我有些怀疑。往往写到书上就说不出口上，语、文有不统一的现象，说的是一回事，写的又是一回事，成了习惯以后，就形成一种风气。这种坏习惯怎么形成的？我没有研究。我们有些党、政领导同志的报告，常常是数字连篇，但听起来生动有趣，我建议咱们文艺界向那些老政治家学习。我们是专干这行的，我们的党、政领导同志们不是专门干这一行的，但是写出的东西反而比我们好懂、有趣，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我的女儿在太行山上小学时，她的语文总在4分左右，到了中学就经常是3分了。后来学了一下别人常说的“伟大的、光荣的……”可是内容空泛的话，就得了4分。女儿回家问我：“照你的，还是照老师的？”我劝她：“还是照我的吧！”这股风对青年、学生都影响很大，现在已有好转。

在文艺界，话剧的语言还好，因为买票的不只限于知识分子，应该承认话剧的文风是接近口语的。

我在太行山时，在新华书店编文艺书籍，总编辑是王春同志。我们大概有些“‘左’倾冒险主义”，凡是在文章中带有

^{*}这是赵树理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文艺报》举办的文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来刊登在《文艺报》一九五八年第四期。

八股气的，一概不予出版，挨了很多人的骂。骂也没用，除非我们不干，你们来了再说（笑声）。后来有同志提意见说，语言向群众转变要有一个过程，不应该这样做。

青年人是照书本学习的，有些人原来只有一两分八股气，慢慢受影响就增加到五六分。譬如一个孩子，在没人学校以前说的是普通人的话，进了学校以后说起话来就不同了。

现在有好多小说是和口语逐渐接近了。诗的方面还不太好，也许是我看得少。在我看来，比较好懂的接近人民口头语言的还不多。歌词的语言也很不接近群众，听唱歌不象听评剧那样，每个字都可以听清楚。如在太行时，群众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唱成“自由之神在宗清阁上。”因为他们不懂得“自由之神”和“纵情”是甚么东西。

在理论文章方面，我和克家同志的意见差不多。在毛主席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有一篇解释《新民主主义论》的论文，比《新民主主义论》还长，而且难懂得多。老舍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对的，这恐怕就是思想问题。写文章应该明确对象，写给农民的就让农民懂，如写给知识分子的象“遥远的什么”这类词儿，在语言中是不大有人讲的。

侯宝林同志对语言很有研究，今天怎么没有请他来？（有人回答：他下乡去了）侯宝林在相声中讽刺过我们有些话剧的对白和腔调：“天哪，你让我怎么办哪！”（学侯宝林表演时的腔调，众哗笑）真是妙极了！好，我先就扯到这里吧。

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

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我以为曲艺工作的主要问题在于创作，估计到几方面的情况：艺人同志还不十分了解革命胜利后的新形势和生活的远景，写不出来；文艺界原走的又不是曲艺这条路，而一向是为知识分子服务的；解放区来的同志有的在解放区还有路道，进了城就认为山里那一套不算文艺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城市里的人；而从山上生长起来的同志呢，大风已经倒在这一边了，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在初进城的时候，我们的文艺部门的领导方面，把曲艺艺人列入文学艺术工作者中，有的艺人是怀疑的，在今天，已经没人怀疑自己是不是主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曲艺界还有人不能完全认识这一点，因为还存在着对上表示进步，对下压迫的曲艺界右派分子。反右派斗争中打倒了他们，曲艺界受到了教育。受政治教育并不是由反右才开始，解放以来大家的进步都不小，但反右以后是个大跃进，真正认识到自己当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当了主人，就要问一句：我为社会主义服了什么务？大家都在大跃进，我们曲艺界要配上步子。

有些人管曲艺叫“说唱文艺”，本不妥当，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我还掌握不了评书，但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

• 本篇最初发表在一九五八年《曲艺》第四期，后收入《三复集》。

为能说的，这个主意我至今不变，如果我能在艺术上有所进步，能进步到评书的程度就不错。写出来不能够说，是我做得不够。好的唱词，应该是诗，写出来还不是诗，是唱词写得不到家。诗歌、戏剧、小说和曲艺都是一家，作家的作品和曲艺是一回事。从前有人在写小说之余写曲艺，今天就应该把曲艺包括在创作计划之内。

大跃进是要出作品的，改造改造我们的文风也不容易。我们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得解决为谁而写的问题，写工农而不让工农看懂，只给知识分子看，是不对头的。搞创作的人要改变文风。大家要说唱我的作品，希望大家给我改，我很欢迎。

搞创作的人要改造思想，下乡去应当多向农民学习，演员也一样，侯宝林同志已经学会浇水了。有一段相声里写了许多叫卖货声，不接触那么多行业，写不了也演不了。我们对工农生活就没有那么留意过。

作品的公式化多，这是由于作者看不见事物的内部。到十三陵去，只看一下轰轰烈烈的场面，就写不出更细致更深刻的东西。要住下来作一个时期活，一定会发现许多一眼看不到的事物，会发现哪些人对社会主义感多么大兴趣，哪些人参加了工作以后和以前有多么大变化，等到写的时候，就不至于只写轰轰之声了。有的同志抱着找英雄的目的下去，一提写水利，就得到三门峡或是什么地方，这不是办法。我想打破这个例子，写一个抗日时当民兵，参加了革命，进城后当科长，在城市里工作，后来下放了的人物。一个人，什么事情不准干呢？主要是写一些人物的思想感情在社会主义时代起着什么作用，引导读者学习他要学习的人，反对他要反对的人，光限于水利、矿山、农业社等一方面，路子就太窄了。开一回水渠就把一个

人的资本主义思想改变了,不一定,但总要变一点。这个变动,每动一点,都是向社会主义倾向了一点,对社会主义是有利的。要把农村、工厂当成个社会来了解,接近了生活,多生活几天,才知道什么是生活。要争取到工农中去住。

现在我正想跃一下,月内或者多一点,要写一个能说的书,发表在《曲艺》月刊上。

(一九五八年三月)

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

事迹很动人，为什么写出来不动人

刚才有的同志说：在他们工厂里有很多事迹使人感动，例如在双反运动中，许多人要求降低或取消福利费，增加工作时间；有的新老工人本来不团结，经过运动搞好了关系，甚至双方抱头痛哭；还看到过有些小孩子站在门口向大人宣传：“叔叔别随地吐痰，吐痰不卫生。”……但是，怎样反映这些动人的事迹呢？有时候写出来在厂里小报上发表还可以，要经过加工整理，把很多人归纳成典型就很困难，写出来也不动人。这是什么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先让我重复讲一个我在别的文章里引用过的例子。一九五一年中宣部召集一些诗人座谈诗歌问题，会上不少人提出：他本来可以按照原定计划写作品，因为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就不能写艺术性较高的作品。我们的一位负责同志批驳了这样的意见。他讲的大意是：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中心

* 本文是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市职工业余文学知识讲习班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对工人们提出的关于写作问题的回答，经《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五八年第五期，后收入《三复集》。

任务，这个中心任务不是产生在运动来的时候，它的内容早在运动以前就已经产生和存在了。领导上是根据各个方面反映上来的意见，加以集中和总结，并作为一个运动号召下去。一个浮在生活表面的作者，平时不能作为往上反映意见的一员，所以运动一来，就感到同自己的创作计划有矛盾。这是因为他不注意政治，没有深入到生活里去。至于在实际工作岗位上的同志，感觉就不一样：运动的内容正包含了他平时提的意见，他想到的是意见提了好几年了，终于得到了领导上的重视。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写东西，内容一定是非常充实的。这说明我们学习写作的人应该深入实际生活，在实际生活中感到的一切问题，都不能轻易放过，要随时注意和发现问题。只有这样，才不会感到运动的突如其来。

像刚才有位同志谈到的福利问题，其实这问题早就存在了。如果某一个工厂或者某一个单位，他们一向把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作为中心任务，那么有人提出要求额外的福利就会感到不合理和通不过了。过去有些“福利”实在是多了些。大家看见昨天《北京晚报》上的漫画没有？画得很妙：一个妈妈站在孩子的床前，孩子尿了自己不动手，却嚷叫：“阿姨，孩子尿了。”这种现象要给农村妇女看见，简直会想揍她两个耳光子。过去的供给制本来是根据战争时期的经济条件，要干部过艰苦生活的，可是其中有的规定执行得并不恰当，妇女干部生一个孩子一个保姆，两个孩子两个保姆……做饭洗衣还得另外有人，这简直不像话。一个人得有多少人为她服务？像这样的事情如果到了反浪费的运动中才注意，就会感到没有什么内容；如果一向就感到这样的事情不公平，写某些人放弃或降低福利的时候能够联系这些人在运动前后的表现，那么我们写起来就

不会感到空洞或单薄了。

要想使你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感动人，这不在你写了几个人物，写了多长时间，写了多少字，而是要你对所表现的那个生活由表及里全部都已感受过了，是你自己心里的话。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曾这样说：如果作者自己对这个事情并不感动，要想写出的东西能感动人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自己心里放不下，逢人就想诉说诉说，那就到了可以写的时候了。比如你遇到一个英雄人物，觉得他很了不起，碰上亲戚朋友就想说一说；或者遇到一个使你生气的人，逢人就要痛骂他一顿，那就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候。这时写出来才能动人。

当然，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就是作者自己的处世哲学要正确，思想要健康，不然的话，你感到要表扬的人，恰恰不是应该表扬的，你感到要痛恨的人，又恰恰不是应该痛恨的。比如一个信佛的老太婆，她把所有信佛的人都看做好人，不管他是地主阶级还是农民，是右派还是左派，很快都会成为她的好朋友。假如有个共青团员到她家去劝说她破除迷信，她就会把他骂一顿。要以这老太婆的眼光来看人看事，写出作品，一定很糟，对我们社会没有用。

至于象有人放弃福利补助，或是小孩子们在街上制止大人吐痰，这当然是好事，使人感动，但是太简单，只就事情本身，不能写成一篇好作品，只能在作品中当作一个细节使用一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天总要遇上好几件感动人的事情，如果把每件事都写成一篇文章，那是不行的。可是，对于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这成千上万感动人的事情，我们要把它积累起来，这对我们写作任何作品都有用。因为我们要写作，就要从多方面去接触生活，你只注意一部分，其余的看到了也不管，这样

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是干巴巴的不能感动人。我们应该把生活当作大海，成天在生活的海洋中泡，把海面、海底、岸边每个角落都摸得清清楚楚：什么地方深，什么地方浅，什么地方有鱼，什么地方险要……只有这样，在写作的时候才能左右逢源，才能想写什么就写出什么来，非常自由。

写作方法和“秘诀”

刚才有同志问我写作有什么方法。其实，写作方法的主要部分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熟悉生活分不开。我想，要是写自己的父母、爱人，一定会比写别人深刻一点，因为熟悉他们。我们平时如果把一个人从内心到外表，从外表到内心都非常熟悉了解，甚至连他走路的声音都听得出来，那么只要我们的观点正确，要写他一定会写得好，写的时候也就会知道应该宣扬他什么优点，批判他什么缺点。我们一定要摸透这个人的底，估计他在什么情况下，一定会说什么样的话。比如坐在反浪费的会上，某个人听到人家提意见他就脸红，某个人听到人家提意见就一定装死，决不会跳起来瞪眼。……

如果要问：把一个人熟悉到连他的脚步声都听得出来，这经验是什么时候和根据哪次脚步声总结出来的？那谁也回答不出来。再如估计某一个人在会上受批评时就要脸红或瞪眼，这个印象是怎样得来的？那恐怕谁也很难记起了。因为熟悉一个人的特点是逐渐地自然地形成起来的，而且在形成的过程中还有修正。比如估计他在会上听到别人对自己提意见会跳起来，偏偏有一次没有跳起来，却是找些不相干的话来打岔。这时候，你会觉得他在这种时候有两种习惯。逐渐地又发现他的规律：

在什么情况下一定跳起来，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一定是胡扯。这时候，你对这个人就又掌握了一份新材料。材料积到一定多的时候，你仿佛能指挥他了。你要想写那类典型的人物，你脑子里就会来了那类典型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出现在作品里，读者就不会感到生疏，而会感到好象在哪里见过他。

有的同志问：报道特写写真人真事和塑造典型人物的小说怎样区别？还有一位同志问：他曾经访问过一个先进生产者，但是写不出来，原因在哪里？

报道和小说不同。我认为对于一个先进生产者，事后去访问访问，只能写成报道。报道，一般只是记取生活中某一些事例加以主观的渲染。写小说就不是这样，不能只在访问上打主意。如果只根据访问所得，把一个先进生产者创造出来的事迹写成小说，是有困难的。如果只单纯地访问某个人创造先进事迹的经过，而不和他在一起劳动生活，那么访问一千个一万个先进生产者也没有用。访问多了脑中也可能形成一个概念，会写出一个总结来，但也只会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文艺作品读后要对人的感情上起点作用，不是光让人家知道一件事，晓得一些概念就完了。比如访问张明山怎样发明反围盘，作为一篇报道，突出介绍他发明创造的经过是可以的，也能感动人，但作为小说，就很不够。因为发明创造仅仅是他生活中的一件事。一个人的生活面多得很，比如他怎样同人接触，他对领导的看法怎样，他对工厂或合作社的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哪些是他最赞成的，哪些是他最厌弃的，他每天对这些事情表示什么态度，他的私人生活怎样，他周围团结一些什么人，他最爱同人家谈的是些什么事情，他日常的生活风度又是怎样；在整个生活环境中给人一些什么印象……如果你同他在一起生活，把

很多很多的“他”理解和熟悉到象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一动就知道他想干什么，在什么会上他会站起来，说什么样的话，估计会后他会到哪里去，假如要找他，一定可以在哪里找到。你要熟悉到这样程度，你才能把他写得活起来，才能动人。

所以，我觉得熟悉生活和写作方法是很难分开的，不能说写作方法是一回事，熟悉生活是另一回事。你熟悉和掌握了人物的性格，可能你还没有写在纸上，但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了创作了。在生活中你观察、熟悉了许多人，你能事先知道这个人要干什么，这算不算创作方法？我认为也算——观察、分析、研究人，熟悉和掌握他的性格，都应该算在创作方法之内。

如果一面对一切人一切事是这样的注意，一面又多读文艺作品，这样你的创作本领就会提高。作品读得多，从好几百篇好几千篇作品中看到作家们种种描写人的方法，这些方法在你脑中混合了，好象熟悉人物那样，也记不起是从哪本书里总结起来的，这时候你在创作上就会感到自由，就有了创作的能力和办法。如果既不熟悉生活，作品又读得少，只想要别人告诉你一些抽象的理论，然后你按照一种固定的方法去写作，那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干巴巴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文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就可得到证明。历来在文学史上，都是作品在前，理论在后，中外都是如此。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就有很多故事传说，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在进行创作了，只不过是用嘴说的，姑且称之为“语艺”（习惯上叫做“口头文艺”，其实无“文”），后来有了文字，人们把话写到纸上，就成了“文艺”。“语艺”也好，“文艺”也好，渐渐出现多了，人们读的也多了，从中发现规律，才写成文艺理论，才谈写作方法。什么创作题材，塑造典型等等，那

都是后来的事。它是从好多好多作品中抽出来的共同规律，并把它作为理论肯定下来。这种规律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就文艺理论说，自古以来是一天天逐渐丰富的。同时由于阶级的不同，对文艺理论的观点也不同。

就我们每个人学习文艺的历史说，走的路也应该是这样。任何人都是先读作品（包括小时候听老祖母讲故事——“语艺”）然后才看文艺理论。比如我们听故事时，决不会管它的主题思想和情节结构，反正老祖母怎样说，咱们就怎样听。我觉得这个时期长一点比较好，不要过早地接触理论；或早接触理论也可以，但接触之后不要把读作品给抛开，专只从理论捉摸。最好是一边读作品和写作，一边学理论，否则就有可能使人的感情变得简单化。在人们没有看理论之前，他欣赏作品时的感情总是跟着故事、人物跑；一接触文艺理论后，就往往带着批评家的眼光来看东西了。对小说如此，对戏剧也是一样。出来一个人，你就光注意他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这个人的思想怎样，他是否主角……如果净是注意这些东西，就把欣赏的兴趣打跑了。例如过去有个中学的一班学生去看电影，老师给他们规定任务，要他们一面看一面记笔记，回来后讨论分析。这样一来就把自己的感情和戏里面的人物的感情分家了，影响对作品感受的深度。

上面这样说，不等于提倡对作品只许欣赏不要评论分析，我的意思是不要故意去分析。如只是注意分析人家的作品，跟作品里的人物和事件不发生感情，就很难从人家的作品中学到东西，而且有时候分析的也不一定就对。据我看，以前我们有些理论工作者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接受就不是太够。近几年来还好，解放初期，有些搞理论的人，对《红楼梦》、《水浒》等古典

作品是研究的，至于对评书之类的东西，就认为是低级的，不值得一提。但是这些东西群众很欢迎，你到了说评书的地方，站上三分钟，就不想走，听了一次下次还想来。我们的东西有时候拿去朗诵，人家一听就跑了。所以，究竟谁是低级的，谁是高级的，恐怕还是个问题。对于象评书这样受群众欢迎的东西，不注意是不对的。搞文艺理论的就应该研究它，承认它是一种写作方法，一种技术，只要它的主题思想正确，把一些为了营业而加的不必要的琐碎叙述删掉，这样的东西是没有坏处的。

所以，我们不要强调追求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创作方法。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多读古今中外的好作品。理论是研究和分析作品的，而理论是从许许多多作品中来的。如果作品读的不多，只根据理论来组织故事，就往往会形成公式化概念化，写多少也跳不出那个框框。在每个作品中不论大的结构还是小的细节都各不一样。比如为突出刻划一个人物，有的是先描写面貌，有的是先描写服饰；象评书里边介绍英雄，往往是先把对方形容得非常有本领，然后再写这位英雄怎样把对手打败了，这样就更突出英雄的本领了。而这也是一种方法。总之，要多读些作品，不要只想从理论中死啃出写作方法来。

也不要期望有人会告诉你塑造人物的“秘诀”，好象掌握这个“秘诀”后就能塑造人物了。只有多读作品，才能学会多种的塑造人物的方法。我对写作方法可以说是囫囵的学法，无非是多看人家的书，这个人怎样写，那个人又怎样写，看多了，自己也会塑造了。这里边有好多地方是学人家别人的，只是记不起这个方法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方法又是从哪里来的。也许你有了独创的方法，但那是千百个塑造人物的方法帮助你创造了新

的方法。如果有人问我：《三里湾》中的“糊涂涂”是根据哪个人做架子写的？那我答不上来，因为中国农村里有“糊涂涂”性格的人很多，说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六决不夸大，不过他们不完全是“糊涂涂”，只是带有“糊涂涂”的性格。至于哪个“糊涂涂”才是最象书中的“糊涂涂”，做这书中“糊涂涂”做过的事情，我就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同样，要问我塑造“糊涂涂”这个人用的是谁用过的方法，那我也答不出来。

语言和诗的语言问题

再谈谈语言问题。

在旧社会，受教育的人和劳动人民分了家：劳动的人不到学校教育，受教育的人不劳动，于是就有了所谓知识分子和文盲。因为这样，他们的语言也各有各的圈子，知识分子在一起说话是一套，劳动人民在一起说话又是一套。记得过去有人在反对古文时，曾举了这样的例子来嘲笑旧派，他说如果告诉听差：“咨！汝刘仲，粢盛余！”那听差一定不懂，一般人也不会懂，其实就是：“喂！刘二！给我端饭来。”平时谁这样说话呢？最近《人民日报》转载了一篇叫《妙语惊人》的相声，同志们大概已看过。那个爱讲“妙语”的人写了一封信给爱人，结果爱情吹了。象那样的信如果写给工人看，不要说恋爱搞不成，会根本连看都不看。我们写作品要写成那样就糟了。

我们也不能说知识分子的语言都是资产阶级的，一无可取。有时候学过科学的人用词比较准确，尤其科学上的名词不能乱改，比如把铝改成“锡铁”那就不象话了，但是知识分子语言中有一种特殊的口吻我们不取。如“咨！汝刘仲，粢盛

余”这样的话，那是用不着说了。再如“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代表我自己向你致以光荣的、伟大的、崇高的、热烈的……敬意”

（《妙语惊人》中语，可能有记错的地方）这样的话，说起来实在不好受，要先练习深吸呼才能说，听的人也不舒服。这类话和国际友人讲，表示对他们的尊敬是可以的，但写成作品给自己的劳动人民看，那就不必要用这些外交辞令了。打开收音机，侯宝林、郭启儒讲话是一种口气，我们新文艺工作者讲起来又是一种口气。倒不是新文艺工作者有意这样，他们现在好多人是在努力学习劳动人民的口气，但还没有学好，那是可以原谅的。问题是如果你提倡那种语言，就不能原谅了。

毛主席告诉我们说话要准确、鲜明、生动。文艺工作者应该比一般人说话还要准确、鲜明、生动。因为讲话无法起稿，不能让大家等着你逐句逐字的推敲。写在纸上就不同，今天写上半句，明天再写下半句，印出来谁也不知道这里隔了一天。所以写文比说话容易，它可以尽量打扮，把语言写得更准确、鲜明、生动。准确、鲜明、生动是互相关联的，不准确（写坏的内容）的鲜明，越鲜明越糟糕。所以准确是第一。不鲜明使人看了晦涩，因而也不能生动。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干干净净的。过去有个笑话：有个不识字的人托老秀才给母亲写信，开头写了“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一大套，那个人说，我要给娘寄十两银子，你写上“捎银十两问娘好”不就得了？母亲的回信起先也是请老秀才写，也是先噜苏一阵，这位母亲不满意，要秀才改成“银收母好”四个字。这多痛快。

至于准确不准确，不完全是语言问题，它同个人的政治修养有联带关系。

要照着原话写，写出来把不必要的字、词、句尽量删去，

不连贯的地方补起来。以说话为基础，把它修理得比说话更准确、鲜明、生动。关于语言的问题就谈这些。

对于诗，我谈不出什么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我对新诗的语言是有些意见的，我老觉得新诗的语言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同群众的语言对不上头。诗的语言应该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过去某个地方有好的民歌一出来很快就传诵各地，可是目前的新诗，包括爱好新诗的人在内，却背不出几首来，记起来也非常困难。原因何在？是不是古人的诗比较有规律，几言几句，组织简单？也不见得，象李白的诗就变化多端，不是每首都有规律。民歌的规律也不是很死板的，它就能叫人记住，爱念。不少新诗诗意很浓，读了使人感动，但总觉得如果变个方法写，一定会更好。主要原因恐怕是新诗的语言不对头，音节、声调等等不是主要问题。我认为写诗的人应该多读一些民歌和旧诗，吸收其中好的语言。民歌、唱词等都应该把它当做广义的诗（当然，坏的唱词、民歌又是另外一回事），新诗的语言方面要跟这个传统接上头，否则，就不可能象过去的民歌那样令人爱读和到处传诵。至于外国诗，主要是学习它怎样进入和取得诗的意境，怎样加强诗意，翻译成中国文的语气倒不必求全责备——自然顺一点更好。

读诗也象读其他形式的作品一样，要多读。读多了，自然能融会贯通，读得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因为问题是临时提出的，我的回答是以问题提出的先后为顺序的，所以不作什么总结，到此为止。

万里同心*

——答瓦连津·奥维奇金

瓦连津·奥维奇金同志：

感谢你对我们这些下乡的作家们的关心！这种关心，表明我们生长在社会主义国度里的人民脉搏的一致——用我们中国一句老话说，叫做“心心相印”。我们彼此间，可以说是超出个人范围的“知心好友”。

作家下乡参加劳动这件事的重要性，在中国说来，要比你所估计的更大一些。苏联的人民已经有了四十年的社会主义生活史，因而有好多作家是真正从做了主人的劳动人民家庭中生长出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只在开始时期，翻了身的劳动人民的孩子们还没有长大，能动手写作的人，绝大多数虽然也都愿意为劳动人民服务——其中有的已经服务多年——不过差不多都不是从劳动人民家里长大的，因而对了解劳动人民来说，要比你们的作家们差一个原来的基础。你是知道的：用“文艺”来为社会服务多凭的是直接材料，没有哪一方面的观感，便不能描绘哪一方面的事物；不了解什么人，便不能写或者写不好什么人。我们中间，也曾有人提过“不写劳动人民写别的人行不行”这个问题。自然不写劳动人民也不是绝对写不成作品，

* 本篇曾经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文汇报》，后收入《三复集》。

只是在劳动人民作了主人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号称作家的人，避开这些最大多数的社会主人不去写，究竟能避多么久呢？在旧的文艺作品中，我们的劳动人民出不了场或占不了正位，难道在劳动人民翻了身之后，我们的作家们还可以不让他们在作品中出场或不让他们占正位吗？自然谁也不能说可以如此。不写不行，要写不摸底，其结果会有两个：一个是写不好瞎写，再一个是到劳动中锻炼。我们不愿意瞎写，所以就非锻炼不可了。

至于你所提到的如何保证创作时间问题，在我们这里也想了一些办法。我们下乡的人，在乡下是以各种身份参与农村生活的——有的当县里的基点工作干部，有的直接当乡干、社干，有的仍以协助工作的身份随时自选重点参加工作……农村的领导和同事们对作家的生活也都谅解，因而在安排岗位的时候，差不多就给作家们留着机动的余地。不过，作这样的安排，还不是把我们这些下乡的作家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人，而是以为有了我们会把工作搞得更好些，我们走了也不会使某一部分工作停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会因写作而损害农村工作，也不会因放不下农村工作而停止写作。自然每个人在任何一项工作中都有他一定的作用，突然加一个或去一个也不能是一点影响也没有的，只是每一项工作都有它自己的段落，在农村工作特殊紧张的段落中，作家自己也不会想到马上要退出工作而进行写作，等到这个紧张阶段过去了而另一个紧张阶段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抽出一个人去写作，对工作影响不会太大。

为了感谢你对我们的关心，我也把我们这点简单的情况告诉你。望你今后仍对我们多加指点。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情愉快！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我爱相声《水兵破迷信》·

这段相声，是用第一人称说出一个迷信书本、迷信外国的假科学家在实际生产中处处碰钉子的故事。故事的轮廓是这样：一个在美国学过造船修船的人，平常只凭书本指手划脚，在大跃进中水兵自己要修船，上级派他去帮忙，他便带着一大箱子书到船坞上去。在实际工作中，他不但不能帮一点忙，反而说人家都没有专门知识，根本不能修；不过水兵们有了实际困难来向他这位有专门知识的人请教，他反而比人家还没有知识——因为书本以外的东西他根本没有见过——结果看着人家把船修好了，他只好搬起书箱离开那里。自然故事到了相声里不是这样死板板往下说的——也可以说根本不是故事——不过主要内容大概是这样。假如你没有听过这段相声而先看了我这一段内容介绍，恐怕要以为这是个概念化的作品。我这里先向你解释一下：我是先听了人家有真情实感的作品，然后化成了“概念”才给大家介绍出来的。这“概念化”是我“化”了的，与作者无关。

这个作品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对假知识分子作了透彻的分析。他介绍这位假知识分子是读书论吨、迷信外国老师、有事找最高领导、不愿同凡人答话，漫夸科学神妙、毫无感性知识。

* 本篇曾经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后收入《三复集》。

第二是夸张的地方恰好突出事物的本质，很少有单纯逗笑的闲文。例如说这位先生平常到图书馆借书都要带秤，不够分量的不看。事实上挑大部头书不必用秤，可是这样说就更能突出这位先生的嗜好。又如一个水兵问：“大轴发热怎么办？”这位先生说：“什么是大轴啊？”自然，学过造船的人还不至于连大件数也认不得，只是嗜书本的人成天埋在书里，在实际工作者口头上常叫的物件名称和他书本上的往往有出入——如把“开关”叫“电门”、把“真空管”叫“灯泡”之类，谁不接触实际，都会碰到这问题——再加上即使是他认得，有了毛病他也马上回答不出怎么治，因为嗜书本的任务往往是到了“认得”为止。接着水兵们提出好多问题：“油管子漏水怎么办”，“铁锚生锈怎么办”……他的每一个回答，都是“送工厂去”。自然有些事谁也可以看出不必送工厂，只是要从这位先生嘴里说出来，谁也觉得该那样挖苦他一下子。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把我学的一本《生理卫生》课本给我父亲看。他看了和我说：“这书可以不用念！屁大点病都是‘延医诊治，或送医院’，还‘卫’得个什么‘生’？”可见“送工厂去”这一指导思想是有传统的——就是“知识”学到“认识”为止，再进一步就都得技术部门。

此外，即是有点闲文，也离题不远，而且触手成趣。例如这位先生当出发到船坞之前，回家把孩子们都哄出去说：“走走走！爸爸要看书！”一会，孩子抱着个东西送进来说：“爸爸！给你！”他一看，是个秤砣。他说：“玩这个干吗？砸脚！”“爸爸！你不是要称一称吗？”“好孩子！这都称过了！”说读书用秤称已经够夸张了，够说明他的特性了，再用孩子送秤砣来奚落他，仍是秤书余文，没有也不算缺陷，有了

就更觉有趣。

我很爱这段相声。我认为这是一篇思想鲜明、文章精练的好作品；是一篇既能普及又很高级的好作品。有了这样的作品，就足以回答“普及一定要降低政治和艺术水平”的错误看法。

当心棒子*

我抱着极大的耐心，才读完你——杜勒斯的那篇语言错乱的好战声明。我觉得你的话全部是梦话。只有神经错乱的人，才会想出那样错乱的词儿来。

声明的开篇是这样几句话：“我已经同总统仔细研究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海峡地区侵略性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严重局势。”我佩服你和你的总统一样糊涂。既然你们“仔细研究了”，就该找一些适当的字眼来用，可是你们一开始就不得不用糊涂字眼。“侵略”这个词儿的意义，指的是一个国家以武力侵犯了其他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例如美国的第七舰队把中国的台湾霸占起来，才符合于那个词儿的意义。你和你的总统难道真不懂什么叫“侵略”吗？我知道你们的苦心。说清楚了对你不利。中国是“国”，美国也是“国”，美国第七舰队的行动是“军事行动”，把这军事行动施加到中国领土上是“侵略”，一点也不难懂。你和你的总统自然不会明明白白这样说，所以才“仔细研究”出那样一些糊涂字眼儿来。

你的声明的第一条说台湾、金门、马祖各岛“从来没有处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管辖之下”“一直处于自由中国、即中华民国管辖之下”。把六亿人民的中国说成“中国共产党人”，把用美国船只抢运过台湾海峡的蒋匪帮残余分子说成“自由中国”

* 本篇曾经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

或“中华民国”，自然也是你杜勒斯和你的前后两任总统早已“仔细研究”出来的糊涂字眼儿，事实上却是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追歼蒋介石残匪的时候，你们美国就以“军事行动”把我们中国的台湾、金门、马祖各岛连同你们抢运过海峡去的小巧玲珑的所谓“自由中国”一同置于你们的“管辖之下”了。我要提醒你们一下：不但台湾、金门、马祖各岛是中国的岛屿，应该由中国治理，就连蒋介石匪帮残余分子也应该由中国人民来处理。美国干涉这些事务都是犯罪的行为。

你在你声明的第二条中说你们和你们抢运过海峡去的蒋帮残匪有“条约义务”，并且说你们的国会联合决议让你们的总统保护你们霸占中国的岛屿。你们把对我们为害的盗匪窝藏起来，又和他们订下条约继续帮助他们对我们为害，难道也能算一条见得人的理由吗？你们“美国”的“国会”对这种事情所作的决议，难道是见得人的“决议”吗？

你的第三条声明用了一条比较露脸的原则，即：“任何国家不应使用武装力量来夺取新领土”，可惜你和你的总统的历史、地理常识都差一点。从地理上说来，你们用武装力量霸占着的台湾、金门、马祖各岛恰恰不是“美国的”旧“领土”；从历史上说来，远在你们“美国”还没有诞生以前，这些岛屿已经是“中国的”老“领土”。你用这条原则究竟能说明什么，你和你的总统“研究”得还欠“仔细”。

以下的糊涂字眼儿还多得多：埋怨我们每次广播中不该把我们的台湾和沿海岛屿“联系在一起”呀，公然宣称要掌握不属于你们自己领土的“西太平洋岛屿锁链”呀，说我们解放我们的领土金危及“美国的安全”呀……厚颜无耻地连篇乱嚷，我这里不准备逐条列举。

杜勒斯！我们六亿中国人民不准备只和你这说梦话的人“斗嘴”！我劝你们还是老实一点，把你们的“武装力量”从我们的“领土”台湾、金门、马祖各岛和我们的领海内撤走，否则我们便要以实际行动作为棒子来敲醒你们的头脑！请你和你的总统再“仔细研究”一下！

曲艺工作者动员起来·

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挑衅，妄图把侵略扩大到沿海岛屿，阻挠我国解放金门、马祖，阴挠我国解放台湾，这是无耻地干涉我国内政，这是我全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周总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义正词严，代表了全国人民反对侵略，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决心。文艺界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拥护政府的声明。作为文艺尖兵的曲艺工作者，要以自己的艺术武器，走上街头，深入农村、工厂，奔向国防前线，为打击侵略者而写作、演唱。不达解放台湾的目的，誓不罢休！

·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新文化报》（文化部编）第二版以“全国动员起来，粉碎美国军事挑衅！文化工作者们，随时准备听从祖国召唤”通栏大标题，发表郭沫若、茅盾、梅兰芳等文学家、艺术家响应号召的文章，赵树理的《曲艺工作者动员起来》就是其中的一篇。

从曲艺中吸取养料*

我的意见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东西。

我认为曲艺的韵文是接受了中国诗的传统，评话是接受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的。我觉得把它作为中国文学正宗也可以。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曲艺应该产生高级的东西，而且事实上已经产生过高级的东西。曲艺是高级的，同时又是普及的。当然，不是每一个作品都是高级的，而是好坏都有。其他的文学也一样，能说今天的新文学作品都是高级的吗？如果从直接为工农群众服务来看，曲艺还是比较直接一点，它的读和说差别不大，听了叫人懂，不但懂，还使你感兴趣。中国几部重要的小说，如《红楼梦》、《水浒》等，基本上都是评话体，流传了好几百年。王少堂的评话和高元钧的山东快书，可以说是发展了的《水浒》，已经同原来的本子有所不同，他们把它生活化了，说得更加生动了。

一个简单的故事，只要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为人民群众真心喜爱，就会被人民群众中的艺术天才们不断地丰富它，使它成为很高级的作品。白蛇传、祝英台故事等就是那样发展来的。曲艺艺人中就不断产生那样的天才，所以常把好多简单的

* 这是赵树理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文学》编辑部邀集的一次曲艺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在《人民文学》第十期，后收入《三复集》，个别地方作了一些修改。

作品丰富起来，使它成为好的曲艺作品。如杨七郎打擂，在原来的《杨家将》小说上占的篇幅并不太多，后来的艺人加以发展，发展得使杨七郎从离开杨府去到擂台上就得说好几天，上了擂台到打起来又得说好几天，而且每一个细节又都足以增强杨七郎的英雄气概，英雄品德。不过这种作法也有作得不好的。这是因为从前的曲艺城市化了，主要的听众不是真正的工农劳动者。一个艺人到一个园子里，为了守住园子经常演出，就得想办法来迎合他的听众，而听众主要是小市民层。这里面带有营业性。艺人要维持他的生活，有时就不免节外生枝，添加一些不必要的东西，虽然听来也有趣，但同整个的主题思想毫无关系。有一部评书说一个姑娘下楼，说了半个月还在楼上。这里面有些是为长而长，为细而细，为迎合小市民的心理，就添了些小市民趣味的东西进去。尽管有这种毛病，并不能掩盖其成绩，如果把王少堂的评书不遗一字地录下来，就可以看出这方面的比重是不十分大的。

我总算写过一些东西，但每听一次好的评书，总感觉到我们赶不上它。倒不是我们现在的人没有比古人强的，武松、李逵再好，也总不能加入共产党。我们应该比古人强，应该刻划出比古人更突出的英雄形象。但有些地方实在比不上他们。拿戏曲来说，古人把古人的生活歌舞化了，而今人还没有把今人的生活歌舞化，或者说化得不足。现在有些人把现实生活搬上舞台去，看后总感到有些生硬，是现实生活原样的再现。改变这个情况，成为好的艺术品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目前应该承认有这样的实际情况存在。评书也是这样：古人把话艺术化了。从政治上说，它也有政治性，虽然没有成套的大道理，但它的目的是达到了。拿《红楼梦》来说，作者的确是把

他的政治目的化为艺术了，而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我们对今天人民的生活入得不深，而古人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入得很深。今天的工农大众对自己的生活是深入的，但知识分子还没有深入到工农大众的生活中去。古传说中的武松、李逵、穆桂英、秦琼……等人，都是理想化了的英雄人物，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所以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些人给群众的印象，比我们的人物深刻得多，虽然我们也塑造了白毛女、刘胡兰那样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但为数很少。我们听评书说穆桂英，明知这样的人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我们还是要听。我们听郑子明打店，听到把大枣树连根拔起来，明知这是夸张，谁也不能有这样大的力气，但听起来就觉得过瘾。这样的人物又是现实的，又是浪漫化的，他使人关心：英雄走到哪里，人们关心到哪里。荃麟同志曾说，我们的作品有些就是缺少新的浪漫主义的英雄人物，而许多古代的英雄却在群众的脑子里生了根（大意似乎如此，要错了是我的事）。应该承认旧的东西有一定的历史关系，它不是一个人创作，而是许多人创作，又经过千锤百炼，在人民群众中长久考验过的。就拿《水浒》中的武松来说，我们在话本中看到的是一个样，王少堂的评话和高元钧的山东快书说的武松，就跟话本不同，何况说书的不止他们两家。再如戏，也有很多《水浒》戏。这些书和戏都已经超出了施耐庵原著的范围。至于象我前边提过的《白蛇传》、《梁祝哀史》的故事，在前人笔记中就有，但非常简单，经过后人发展，不知道出来多少《白蛇传》和《梁祝哀史》，经过很多作者丰富和加工，加上每个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把他自己的生活变成了艺术。

这些东西实在不能小看，各地演出的《白蛇传》的作者，

可以说都是了不起的，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比我们的高（虽然这些东西不是一个人写的），我们有些东西还不能形成他们那样深刻的印象，而他们形成了。评书（以及曲艺中的其他曲种）直接和群众在一起，是和群众没有脱离关系的文学形式，我们小看它就会犯错误。象山东快书，乐器简单到只有两块铜板，评书只拿一把扇子，甚至赤手空拳，什么都没有，他走到哪里都有人听他的，还有人给他钱。象王少堂、高元钧这样的专家，都是有办法的。他们随便走到什么地方都能博得人们的欢迎，这难道不是本领吗？

我们学习的时间比较长，读的书和写的东西可能比人家多，但决不能因此说人家的东西不值得学习。他们的作品值得学习，他们的技术值得学习，首先是学习他们怎样直接为工农群众服务。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及其干部服务。我们新文艺工作者直接为工农兵服务的务似乎比曲艺少，而对所“及”的干部则比曲艺多。我以为要向曲艺学习的重点正是这“直接”。

现在，艺人们说来说去还是一些古代的英雄人物，他们不是不需要表现新英雄人物的作品，而是我们供应不上。我们有这样一个文坛，而艺人们仍不得不取材于古代，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要努力学习。我们现在写的东西还不能给他们说。我愿意努力向曲艺学习。这不是我偏爱它，而是它有用，对工农大众有用。

有人说：我们的东西历史短，群众不知道；曲艺等等东西历史长，在群众中已生了根。事实上听众不一定知道什么历史关系，听的人比如小孩子吧，高元钧上去一说，小孩子下来就学起武松来了。小孩子并不知道《水浒传》的历史来源。这说明一个作品只要和群众感情接近，马上就能为群众欢迎，不一定非有多么长的历史不行。要说有历史渊源的话，那就是这

种作品中，所说的人和事在群众听来不生疏，所用的语言也和他们日常说惯了的话有些相同之处。我们为什么放着这些现成条件不利用，而偏要用那群众不熟习的东西去代替它呢？

我们不要把群众看得那么狭隘。群众可以接受知识分子的东西，知识分子的东西至少也是百花中的一花。“五四”以来，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写了很多的书，那部分书不读也是可惜的，群众掌握了文化后还是会读的；但是，不能用知识分子的条条把群众的语言彻底“改革”掉了。不能把群众的文艺风度全部扫掉了。我们本来没有的，比如电影，可以接受外国的，把它拿过来。如果牵强附会地说皮影戏才是中国电影的传统，要求电影在皮影戏的基础上发展，那是不对的。但是小说咱们有，诗歌咱们有，为什么要丢掉自己的，去学人家的？学人家的长处可以，但学了以后最好是把它化为自己的，化不了也不过使它作为另一种形式，不能因此把咱自己的传统丢掉。有些人误以为中国传统只是在普及方面有用，想要提高就得加上点洋味，我以为那是从外来艺术环境中养成的一种门户之见。即使文化普及之后，也不应该辛辛苦苦去消灭我们这并不低级的传统。

我觉得我们的东西满可以象评话那样，写在纸上和口头上说是统一的。这并不低级，拿到外国去决不丢人。评话硬是我们传统的小说，如果把它作为正统来发展，也一点不吃亏。它是广大群众都能接受的。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偏，但有这么一两人偏有好处，也许因此一激，就写出比较好的鼓词或评话等民间传统的作品来。当然，如果大家都这样说，也许会产生关门主义，把别的东西关住了，不过现在没有这个危险——现在是曲艺作品才挤开文艺大门的时候，怕是还有或多或少的人对它关

门，而它自己还无门可关。

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在理论上早已解决，在实践中并未解决，至少还没有全部解决。一定要写的人拿起笔来就想到这是为谁写的，读了以后要他们作何观感。如果一本书读不读都一样，它就不起任何作用。我们写的东西能起作用，但往往只能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起作用。鲁迅先生的文章读者对象很明确，就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因为那时的工农大众还在敌人统治下，别说学文化，连吃饭也说不上，群众还没有掌握文化，能左右舆论界和思想界的人是知识分子，所以鲁迅先生选择的读者对象也是知识分子。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解放了思想的群众已远非昔比，古今中外任何农业科学家都根本想不到稻子可以亩产五六千斤，能够左右生产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群众。这样有创造性的群众在大跃进中，很快地就要掌握文化，成为有文化的生产者。我们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他们。这些新的有文化的生产者，在文学趣味方面不曾染得洋风而却从口头上接受过一些传统的东西。没有染得洋风，让他们染一些也可以，只是不要把推广洋风代替传统作为一个任务，主要的方面应该放在继承传统上。我们的传统既不低级又为多数人所熟悉，继承起来是能够又好又快地直接为群众服务的。

我们提倡群众的作品，同时也不小看专家的作品的作用。照现在的情况看来，专家作品的作用有时好象低于群众，但我们不能因此说这个专家就一无所长。既然是专家，他总有一点专的东西。如果这个专家是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的，那他还是要比群众服得好的。现在一般的情况是：专家向群众学习得不够，对群众关心得不够，群众等不及了，自己来，白手起

家，弄多少算多少。在这样情况下，群众创作的东西，比我们专家的还要实在一点，只从这一点说来，群众是超过了专家的。

其实，如果专家努力向群众学习，他的作品还是要为群众服务得很好的。比如最近《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农民创作的画，画的是一个人站在玉米棒子上看泰山。这样的内容专家应该想得出来，而没有想出来，那是由于专家对群众的生活不热心，不象群众，看到自己的玉米长得那么高，就情不自禁地拿它来夸张一番。所以向群众学习是关键性的问题。我们的画家如果掌握了群众这种感情，一定会画出比那更好的画来。

我们过去的专家，应该说有两种：一种是专业艺人及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爱好者；另一种是新文艺工作者。这两种专家之间，好象有些隔阂或者说是门户之见。

这两种专家对群众也都有点隔阂。新文艺工作者熟悉中国民间文学传统的不多，而掌握了中国文学传统知识的专家也不是很接近群众的。艺人中的专家比较接近群众，但也有局限性。他们靠演出生活，说一天书吃一天饭，要他为人民服务进行创作，他下不起本钱。大家知道创作要经过一个过程，写一个东西要有一定时间，再加上写成后还要有一个熟练过程，然后才能演出。艺人缺乏这个本钱（时间），所以他掌握了几本旧书后，就不再写新的了。这说明艺人也有他保守的地方。

两种专家互相有门户之见，两种专家对群众都有些隔阂。这就向新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如下的双重任务：一是努力向群众学习，一是热爱民族艺术，热爱群众爱好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把他的专家当好。

《五千一》这个作品我是推崇的。我们写不出来。它是“服务性”的文章。故事并不奇突，一个正面的支部书记，一

个反面的落后老乡。但是，它有非常形象的只能用于种庄稼方面的语言。那上面说的收麦子时的情况，我们也能想到，但作者决非只凭想象，而是凭他的目睹。一定要把它当作很高级的东西，也不见得，但它有“服务性”。那个地方粮食亩产五千一，他一说全国都知道，所有丰产的地方的农民都高兴听，听了也能鼓舞自己。

对于群众的作品，我们不能“求全责备”。比如那张站在玉米上看泰山的画，在技术上是比较粗糙的，但不能就此说它不好。我认为现在某些群众作品，在技术上真正经得起推敲的还不是太多，因为人家本来就不是专业的。你说人家的不是太好，可是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有我们写不出的部分。我们搞文艺的没有别的，只是掌握了文字工具，其中也许有人甚至连文字这个工具都没有掌握好。其实掌握了文字工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有工具还得好好的使唤，光有锯没有找到大树，还是无用。所以我们对群众作品不该要求过高。希望每个作品都是高的，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专家专了那么多年，不还是有高有低的吗？

至于传统的东西是不是都好呢？也不一定。正如新文艺作品中还有公式化、概念化一样，传统作品中，也有才子佳人、灾难、报仇、团圆……这样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近一时期来写龙王的很多，群众可以说“龙王辞职”，因为他想不出别的东西来表现；可是专家却不能跟着来一个“灶王辞职”。作为一个专家，他要能掌握他那个行业的科学规律，文艺专家就是要掌握文艺的规律。把群众的东西拿过来，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找出规律来，掌握了这个规律以便于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这是专家的事情。我们要认真体会毛主席说的那

“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关系，把我们民间文艺传统中所特有的东西先熟悉一番作为“感性知识”，然后从中找出些特有的规律来以补充世界一般文学理论之不足。任何科学理论都得随时作这样的新的补充，否则都会变成过了时或不合当地情况的教条。我们学的一些条条，有些已经不够用。比如按照外国的公式，悲剧一定要死人，这个规律对中国是否适用呢？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我们也应该懂得团圆。

我们专业工作者要好好的接触实际，研究实际中的东西，真正发挥专业的作用。我们不否认专家，专家有他的作用。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专家没有做，群众做了，我们觉得还不大满意。必须专家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东西，然后把它提高，真正使人满意的东西才会出来。专家要提得怎样高？现在谁也不知道，总之还是要先向群众学习，向传统学习。新文艺工作者对传统的东西有些成见，还没有真正的去学习，只听了那么一两段，就不耐烦了，说什么这玩意儿不过如此，有些什么样的毛病……。很可能他第一次听的评书，正好碰上才子佳人的套子，而没有听到象王少堂老先生那样的东西，就匆匆忙忙的下结论了。我们不要求全部都听过，但要大致上听得差不多，能够在自己脑子里形成完整的概念，然后再说如何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早已决定了的，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按照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走，而不是按照我们不问客观情况自以为是的方向走。

我对评书一贯抱着学习的态度，我也在学习着写。我推崇这个东西，但也没有真正深入到里面去研究。学习评书要多听，然后才能有真正的领会，才能形成比较完整的“评书”概念，

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在曲艺中，有些形式比较迎合城市上层人士的趣味，如四川的琴音，北京的单弦、梅花大鼓，音乐性比较强，曲调比较多，多少带有一点封建上层社会的感情。文的如《妙玉听琴》，武的如《单刀赴会》，女艺人说起来也是男架子，象起霸那样。这种形式有它够味的地方，城市里的人比较欣赏。另一些形式是直接来自乡里的，象山东快书就是农村里来的东西。再如韩起祥那样的说法，北京人听起来不一定习惯。这些形式好象能更直接一些表现劳动人民的感情。就这两类形式的发展趋势说，我觉得应该偏重乡里来的东西，它比前者朴素，更具有民间的本色。我们应该重视这一类东西。不论语言上、感情上，它都比前者更有生活气息，值得学习的地方更多，但也不要轻视前者，因为它也是可以发展的。

总之，每种曲种都有它的习惯和特点，我们要都搞一搞，摸透它，我们要首先掌握了它，然后再发展它。

彻底面向群众*

去年有些同志们想在首都办一个通俗文艺刊物，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并且和大家在报上登过启事，写过文章，后来因为没有找到主编人，没有办成。我们曾有一度和北京市文联商议请他们兼办，北京市文联愿意将他们原有的刊物《北京文艺》彻底改变为面向广大群众的文艺刊物，以代替我们拟办的这个刊物的作用。这自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现在《北京文艺》这种改革措施已经成为事实，我敬向他们致贺！

“通俗”这个词儿虽然大家习用已久，可是我每次见到它的时候都觉得于心不安。“俗”字本来是旧社会的所谓“上流人物”轻视和侮蔑劳动人民的字眼儿——如说“世俗之徒”，“凡夫俗子”之类。“俗”的对方是他们自己的特殊性，他们名为“雅”，就是一切语言、行动与“众”不同的意思——例如行动方面的讲话摇头晃脑、走路踩不死蚂蚁，语言文字方面的“古”一点、“洋”一点、“奇怪”一点、“麻烦”一点之类，就都属于他们那“雅”的范围。要从文艺中划出一块小小地盘来叫做“通俗文艺”，那么保留下的那个大地盘该叫做什么“文艺”呢？用这个词儿，不但对普及工作者有点下眼看待，就是对占着大地盘的“文艺”也未免有点不敬。把《北京

*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北京文艺》一九五八年十月号，后收入《三复集》。

文艺》彻底改为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则不须再加上什么“通俗”字样，“通俗”这顶帽子首先可以在首都摘去了。

这样一改，也许会有人为“提高”耽忧。我以为彻底面向广大群众，对于提高不但不会妨害，反而会为提高造成非常方便的条件。“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话在我们的文艺界没有人反对，只是十多年来认真按照这个话办事的人不像我们理想中那样多，所以成效也不是那样理想地大，“普及”固然受到些影响，“提高”也不见得很多——因为不曾都放在“基础”之上。假如我们十多年来更注意一点普及工作，到了现在，提高工作的基础要比已经具备的高一点。虽然是这样，提高工作仍应该从这个基础上作，否则仍会是脱离群众的。误了的课一定要补，跃进只是说要加快脚步而不是说要脱离基础。在全国大跃进的高潮中所涌现出来的群众文艺创作，就是这个“基础”的大展览，从前要花好多时间才能搜集到的东西，现在只要睁开眼往街上走，想不看见也不行，难道不是非常方便的条件吗？

一切专家，都是作提高工作的，文艺也不例外。“专家”之所以为“专家”，无非是对他所“专”的事物经多见广，从中找出许多规律来，再用这些规律指导他的工作、传授他的学生，并且不断从工作中发现新现象、新问题，随时修正和补充他已经掌握的规律，以便把工作作得更好，把徒弟教得更出色。业余工作者也能发现一些规律，应用一些规律，不过因为自己没有专贵，所以往往掌握不了全面，只是能做多少做多少。一个专家要能随时注意业余工作者的新发展、新创造，他的专业本领就能迅速提高。业余工作者固然对一种行业不象专家那样有全面知识，可是也不像专家那样有清规戒律，因而他们的新发现、新创造往往不是遵循着专家的思路想出来的，往

往是专家不敢想的，而且他们人数又比专家多得多，除去重复了前人和专家的发现、创造之外，剩下来的还都是专家未接触过的新天地。农民在农业上放出去的卫星接连不断地超出世界上一切农业科学家理想框子之外，就是个有力的证明。最近的群众文艺创作之多，多到我们无法估计，其中有多少特殊优秀的作品，多少出乎我们思想框子之外的新思想、新方法，都正待我们去发现、去总结，难道不正是给提高工作者拟出来的无穷无尽题目吗？即以河北民歌为例，今年可能要有一千万首；每首平均以三十个字计算，就有三亿字；一个人读书的速度每天以十五万字计算，要读完这些民歌，就需要五年零六个月。河北的群众文艺创作不止有民歌，中国的群众文艺创作又不止河北一省有，这个文艺的海洋，虽不是深不可测，可是真够为数不多的专业文艺工作者测几天的，何况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于“测”，而更重要的在于沿着他们自己的前进方向给他们写出更高的作品来，总结出更合乎实际的理论来呢？我们可以断定，专家越是面向群众，越没有“失业”的危险；要是脱离群众，反而会被从群众中来的新专家顶出门来。

《北京文艺》在近几个月来也和其他文艺刊物一样，随着大跃进的浪潮变得更接近群众了，现在再实现了酝酿已久的彻底改革，将会使群众更加欢迎，将会使专业文艺工作者更有用武之地，因此我觉着特别值得祝贺。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朝鲜农村印象记·

感谢朝鲜作家同盟对我的邀请，使我有访朝的机会。

我是生长在中国北部农村的人，所以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还是容易偏注意当地的农村，这次到朝鲜来也还是如此。现在就这方面发表一些我的观感：

渡江而南

列车开过鸭绿江来，知道已经入了朝鲜境内，可是从车窗里向外望去，仍然都是乡土景色——长满树林的小土丘，环抱着一片一片的小盆地，接连着从眼前飞驰而过，真象中国古诗中所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这些地区，大部分都有天然的水源，不但水稻田里不缺水，就连美帝杀人罪证的炸弹坑也变成了无数的小水坑。我虽然也是丘陵地带的人，可是中国的北部没有这样多的水源，所以对水源特别爱慕，经过有水的地方，总觉得列车开得太快。

好多农村都盖了新房。同车的同志们告诉我说这些地方都遭受过美帝严重的破坏，这些房子都是从轰炸过的废墟上重新盖起来的。这足以说明朝鲜的农民不但是卫国的英雄，而且是建设的能手。

* 这一篇和后面的《开城之行》、《“马上”掠影》两篇，是赵树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访问朝鲜时应朝鲜报刊写的，国内都没有发表过。

东海之滨

从平壤往元山去的时候，乘的是夜车，不曾见到大山中沿途的景物，等到天明，就已经穿过了长白山，又到了我所喜爱的丘陵地带，不多一会就到了元山这个滨海的城市。

我是中国北部山区的人，只到过一次中国的南海。南海虽然也给了我个波澜壮阔的印象，只是对海边的风，觉得有点受不了。朝鲜的东海，在地理书上是有名的无风海岸，这次一见，才觉着果然是名不虚传，连在海岸上工作的人们彼此讲话都可以保持平常的声调，一点也用不着高声。

从元山赴金刚山的时候，使我坐着汽车对这无风的海岸赏识了三个多钟头。这一路上经过的仍然都是丘陵地带和被丘陵环抱着的小平原。这里的平原比西部的平原更有趣：北、西、南三面被小丘陵环抱着，西边丘陵的背后靠着高大的长白山，东边对着无风的大海，好象一张一张的大沙发。农民们都在这舒舒服服的大沙发上，进行着他们的具有社会主义规模的农业生产，建设着他们的新的社址和居室。

名山四处

到了金刚山，我住在温井旅社。这是个群山环抱万木参天的地方，地面上虽然也有象小丘陵围成的那样一块小盆地，可是山高树高，象一个周围建立了高大围墙的大公园，和丘陵地带异趣，人一走进这个圈子里，就有走进一座大厦里的感觉。狭窄的山谷中流出一条小河来，旅社修建在这河东边的山麓上，

是一座三层楼房。到楼上可以听到周围传来的松涛声，初听起来好象是起了大风，其实一点风也没有。

午后，乘汽车出了这座露天大厦向东进发，通过了一段河滩，下了车，爬上了一个不太高的山头。这山头上，屹立着好多象楼房大的大石块。这种石头，从形状上看，很象河里被水转动得磨光了的石块；可是从体积上看，无论大到什么程度的河流也不能转动这样大的石头。我想这地方在古来可能是海底，这石头是被海水冲洗成这样子的。石头旁边有好多土坟，陪同我的同志们告诉我说，这些坟里埋的是在战争时期被美帝屠杀在这里的劳动党员，为了纪念他们，就把这崖石名为“血崖”。听了这一番介绍，我对这些烈士们肃然起敬。

上到血崖的顶上，便看到崖石的下边就有平静得象镜面一样的一个湖泊。这个湖西边靠的是和血崖并列着的许多石峦，南北两边紧接着石峦就是土石合成的丘陵，越往东越平，最东边可以看到广阔的稻田和更远的海面。湖的周围，不论是石峦和土丘，都长有茂密的松林，给这平静得象镜面的湖水镶了个弯弯曲曲的绿边。这地方叫“三日浦”。为我们开汽车的司机同志对我们叙述了美丽的传说，说当日有一位仙女到这湖畔来会情人，因为留恋景色不觉着就过了三天。这样景色确实有点迷人，可惜天黑了没有住处，所以我们游过一阵之后，还只得爬上汽车匆匆赶回温井旅社。

第二天上午，为了看九龙渊的龙涎瀑布，又钻进了一道山谷。这山里最引得我注意的是石缝里长的松树。这石头不是一般松软的石头，是可以凿上孔、打上钢锭来吊钢绳桥的硬石头；缝也不是宽缝，只是连在一处的崖石上的普通裂缝；长的松树又不是卷曲伶仃的寒松，而是粗壮笔直的红皮松：这就不

能不使人觉得奇怪了。我本想采一些松子到中国去培养，可是也没有时间，后来在别处山上又见到生长情况很不好的红皮松才放弃了这个念头——觉着光带种子不行，要带，还得连那石头缝带上才能解决问题。我想这可能与石头缝里的水分有关系，因为这些水分是从山上的密林里渗漏下来的，可能带有很充足的肥料。

从许多钢绳吊桥上过来过去，沿着山谷的左右两侧往上游走，越走地势越高，转了好多弯，才到达悬往龙涎瀑布的崖下。在路上也曾有好几处瀑布从很高的崖上泻下来，只是那些崖石的坡度大一点，不象最后见到的龙涎瀑布得势罢了。

陪同我的同志们告我说瀑布上边有八潭，是瀑布的水源，并且也有流传着的神仙故事。我每到有水的地方，总是想看看水源的，可惜这次来得迟了一点，山上的道路被雪封了，不得上去。同志们还告我说这山上的积雪，直到五月才能消完。我想这也许正是能保养水源的地方。把雪存放在高山头上让它慢慢溶解，也和把水存在水库里慢慢放出来一样，可惜这种办法还不能由人来运用。

回到旅社吃了一顿饭，又钻进了西北边的另一道山谷。这道山谷，有盘山的公路，可以坐着汽车上去。汽车开上山去，下车不远便走到金刚山名胜区之一的“万物象”。中国古人把尖削的群峰形容为“山如剑排”，这地方的山峰似乎也有点相象，不过不大象剑，而象中国古代武器之一的竹节钢鞭。也许是哪一位象孙悟空那样性格的调皮神仙，用了好多不方不圆的石头，垒成了这样无数奇怪形状的高塔，工程虽然做得很巩固，可是在人的感觉中，推倒这样一个高塔，好象用不着费很大的气力，而且推倒一个，会把其他一切高塔撞得噍哩花拉翻

个一塌糊涂。我虽然有那样的感觉，可没有真去推它们，倒不是怕推出事故来，而是还没有爬到接近它们的地方，就累得我喘不上气来了。

这天晚上回到旅社，给金刚山区的四个地方作了以下的奇怪结论：温井旅社是适于住人的地方，九龙渊上的八潭是适于住神仙的地方，万物象是连神仙也不能住的地方，而三日浦则是神和人都很喜欢居住的地方。

胜 境 重 重

回到元山后，有一天下午去访问一个农业社，在路上又发现了好多有趣的地方。这个路线就非常有趣：向西、向北、向东、向南、又向西，简直象钟表里的游丝形，最熟悉当地情况的司机同志还找错了一次路。不过公路还是翻山越岭尽可能取直线开辟的，要按着自然地势转来转去，恐怕两天也转游不到目的地。这地方虽说也是丘陵地带，可是和以前走过的那些丘陵地带有些差别——不是若断若续的小土丘，而是连在一块的丘陵网。松树在这里好象变成了丛生的灌木，往往密集得钻不过兔子。处在网络中间一些小盆地，往往只有一个排水口，而且东西南北各随所向。村庄大部都建设在向阳的山麓上，平地则多为稻田，没有水的小盆地，可能是杂粮区域。所有这些地方，都是和暖无风的，虽然小雪已过，还有点春天气息，松叶还象初夏的蒲草那样绿得可爱。

中国古代（晋）的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是理想中的一个隐居之所。我想假如让他当时到朝鲜东海边的丘陵地带游历一番，也许他会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在那个没有汽车和

飞机的时代，到这些地方来避一避乱世，是没有人会找到他的。

后来从元山乘汽车往咸兴去，在路上又遇到了更多的这种境界。住在这些地方的农民，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了。

登高远眺

在平壤、元山、咸兴等地，先后访问了四个农业社（平壤郊区的万景台、江元道的九浦里、咸镜南道的作港和富民社）。在访问中，听他们叙述了如何在贫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近几年在生产和建设上得到怎样的胜利，明年的生产如何布置，将来的远景如何规划；此外还向他们学习了些养蚕、种麦、养猪、培植果树等具体的农事措施——因为篇幅关系，都不在这里一一详谈。

特别使我注意的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气派。三个社的管理委员长，都在高地指给我他们社里新合并的村庄和所经营的土地山林范围，只有作港社是偏重渔业的，所以委员长和我谈话的地方是海边。他们所提的增产指标、增产措施、种植区规划、购买汽艇汽车、新建社址、迁移居民……一切大事，都是小规模的小社所不能举办的。已经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农民，是会把自己和后代子孙的命运越改变越好的。

我愿意把我们在野外的谈话，象征性地叫做“站得高、看得远”（海边虽说不是高地，可是看得更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开 城 之 行

上月二十九日至本月二日，我到开城去游了一次，除赏识了沿途风光外，特别拜谒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殉难烈士公墓，参观了名胜古迹和很有政治教育意义的板门店，参观了水利工程。

和前几天到东海岸一样，又是坐了汽车去的，对沿途风光又领略得很不少。这一路上的农村人口，似乎比东海岸公路旁的人口密一些，见到的群众集体活动比较多——深翻农田、筑路修桥、挖渠筑坝，处处都是高插红旗的劳动队伍，处处给人以移山换水的感觉。新翻过的土地、新铺着土石的道路、新掘开的沟渠、正在清理着的水库坝基、才运到河边的桥梁器材……所有这一切用人工改变着大自然的新成绩，几乎覆盖了地面。这种新的气象，一直排到离军事分界线两公里的中立区边缘上。这种新气象，使人百看不厌——从平壤到开城，汽车要走四五个钟头，但是在这次往返中，我的眼睛没有片刻离开车窗，而且一点也没有觉得疲倦。

在开城，曾特地去参观了离开城不远的政治教育意义很深刻的板门店。这地方，主要的教育意义表现在会场的席位和会议的办法上。本月一日是秘书长会议。朝中方面是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秘书长坐着首要的席位，对方则是美国人为首，李承晚的代表坐在最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在发言时候，朝方先说朝文而后才译成英文，对方则是先由美国人说英文而后才被译成

朝文。板门店是朝鲜的地方，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军事代表团是在这里当主人，而李承晚的代表则是在本国的土地上看美国人的颜色行事。自然美帝国主义者直到现在还盗用的是联合国的旗号，其实这场怪戏在全世界上谁都摸得着是怎样演的——全世界正义人士知道得清楚，因为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不是联合国宪章上所规定的任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更知道得清楚，因为每个炮弹壳上都有美国军火商的商标；美国人民也清楚，因为被赶到朝鲜来作过战的人，在战场上没有见过几个其他国家的同伴；派过象征性军队的国家也清楚，他们知道自己派过几个陪客的，打过几发子弹；只替美帝举过手的人根本不会考虑这些事情的性质，他们在联合国的任务只是替美帝举手；李承晚当然彻底清楚，因为他没有一刻不被美帝牵在手里；不幸的南朝鲜人民，更应该知道美帝的骨头，因为他们刚刚得到个可以摆脱日帝统治回到祖国怀抱里来作主人的机会，可是马上就被李承晚把这主权又送给美帝，因而自己直到现在还没有当过一天主人，他们难道会把这第二任的统治者误以为是什么“联合国”？谁是主人、谁是侵略者、谁是巴儿狗，板门店的会场上摆得很明白，愿包括南朝鲜在内的全体朝鲜人民深深体会这一点。

此外，我又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南大门的门楼、高句丽皇宫故址和恭愍王陵墓等。这些宏大的古迹，都标志着古代的文明，说明朝鲜是文明古国。文明古国的人民，本来就都有民族自豪感，再加上有最先进的政党——朝鲜劳动党的领导，更是任何外来强权都不能征服的，所以虽然一度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三十年之久，一度遭到美帝国主义残酷地破坏，可是终于打败了帝国主义，真正在自己祖先生活过的国土上行使着自

己的主权，迅速地恢复了战前的建设，并以排山倒海的规模改造着大自然，向着美好的前途迈进。

无赖的美帝，在停战以后死赖在朝鲜的南部不走，把“军事”分界线弄成“人民”分界线，不让和平的居民往来，否则便可以邀请朝鲜南部的和平人民到分界线这边来参观一下什么叫“当家作主”，什么叫“新气象”。

“马上”掠影

——访朝三周略忆

我自入了朝鲜国境到现在，不觉已经过了二十多天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承朝鲜作家同盟的照顾，给了我许多方便，使我看了很多有代表意义的事物，只是想要获得一个国家的全面概况，却不是这二十多天所能完成的事，只能说是看多少算多少；记得多少算多少。中国有个形容粗枝大叶看事物的比喻，叫“走马观花”。用这话形容我访朝的收获十分恰当——因为朝鲜的好花遍地开，在我走过马的路上看不到几朵；何况即使看见了，而“马”还是“走”着的呢？虽是如此，我还是要谈谈“马上”的印象，作为我对朝鲜朋友们的临别谈心。

我以为：

朝鲜是景色宜人的地方——依山、面海、开朗、广阔的平原，重复、连环、幽静、清新的丘陵地带，以及金刚山、三日浦等地方的飞瀑、温井、湖光、山色，不但可以引起人游览的兴趣，而且有好多地方使人愿意长期在那里住下来。

朝鲜的物产是丰富的——我所走过的农村，打谷场上的稻谷都堆积如山。元山海岸上才卸下船来的明太鱼，看来好象要用在海岸上筑堤。工农业展览馆里所展出的煤铁和其他宝贵的矿产种类繁多，假如对每一种只注意看一看名称和产地，就等于读一本小书。开城一带所产的人参，更是举世闻名的珍贵药品。

朝鲜是文明古国——从历史博物馆中所展出的古物来看，可以见到朝鲜古代在制陶、冶金、描绘、编织等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在平壤和开城两地所见到的幸免于美帝战火的一些古建筑物，也标志着朝鲜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之伟力。

朝鲜的人民是和平的，是勤劳、俭朴的，是英勇的，是先进的，是久经锻炼的，是富有积极性、创造性的——从历史上看来，朝鲜民族自古没有侵略过别的民族。从民俗展览馆所展出的古代民间文物（生产工具、器皿、服装、居室等）看来，朝鲜的劳动人民自古就过的是勤劳、俭朴的生活。这样一个和平、勤劳、俭朴的民族，生活在他们世代相传的这个东亚半岛上，浸浴在天然的优美风景中，开辟着这个半岛上的土地，开采着这个半岛上的天然物资，虽然也曾产生了阶级，但那也只是朝鲜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根本碍不着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一点事。可是以侵略为天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偏爱上了这块土地，疯狂地抢到手统治了三十七年。但朝鲜人民是英勇不屈的。听陪同我的同志们谈着群众与日帝作地下斗争的故事，知道他们一天也没有忘记统治他们的是外来强盗，即使是敌寇统治后才出生的人，也识得统治他们的和他们自己不是一个种族。朝鲜的人民思想是先进的。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革命政党劳动党和革命军队的组织者，用最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武装了自己、武装了自己的队伍，解放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又武装了全体劳动人民，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停战以后的快马加鞭的生产建设中，人民的这种先进思想都起着最根本的决定作用。朝鲜人民又是久经锻炼的。这种锻炼不同于一般锻炼，而是长期的、全民性的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尖下、生活在美帝国主义所造成火海血泊中的。祖国解放斗争博物馆和祖

国战争纪念馆所展出的实物、图片，系统地说明着朝鲜人民这一些革命斗争史。朝鲜人民又是富有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对革命事业都是积极的，但是朝鲜人民的积极性表现得更突出一些：我曾看过一部控诉美帝在朝鲜破坏的影片，那简直是把朝鲜的好多大城市捣毁成一片瓦砾。这次见到的朝鲜野外地面上的炸弹坑，几乎密到使人不能相信的程度，好象恨不得连朝鲜这个半岛也炸沉了。然而短短五年中，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凡是住着人的地方，差不多恢复得都看不见有战争的伤痕了。

朝鲜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五年之间几乎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筑物全部翻修了一遍，难道是个普通速度吗？但其成绩还不止此：扩充了的改建了的大工厂，新修的和正在兴修的水利工程，正在挖掘的运河，正在深翻的土地……处处活跃着活泼迅速的人群。在这一切事业中，大家又都发挥着无穷的创造性：钢铁不足，木头也可以做起重机；小工厂也能制成汽车和拖拉机；能使稻苗分蘖，能使蚕茧产量增加两倍……有敢干的人，就产生着不常见的事物。

朝鲜也还有坏东西，那就是赖在朝鲜南部不走的美帝国主义者派来的杀人凶犯。在板门店会议室的窗外，看到与朝鲜毫无血缘关系的美帝国主义者坐在会场上和朝方的代表胡扯混赖，隐隐就好象他代表的是南部朝鲜。即使只从眉眼上看，朝鲜也没有那样的怪种。他们到朝鲜来的任务，只是杀朝鲜人，破坏朝鲜人的财产，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当朝鲜的统治者。美国人远渡重洋来杀朝鲜人本来就没有什么理由，现在战争已经停了五年，住在这里就更连个临时借口也找不到了。南北朝鲜如何统一，双方的朝鲜人自己会商量，与远隔重洋的美帝没有丝毫相干，

勉强呆在这里只能作为一种活的资料来向全世界人民说明美国是个不讲任何道理以武力侵略别人的强盗国。

现在我将要离开朝鲜这个可爱的友邦回中国去了。敬向招待我的主人朝鲜作家同盟和帮助我了解朝鲜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上对我帮过忙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谢礼！

给邵荃麟的信

荃麟：

我这次到乡间来，没有任何一次顺利，原因是摸不住工作规律。人民公社，按性质说来，优越性很多，但在初建时期，主要的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而搭起公社架子之后，高级社所有的规章制度，借用得上的不多，新的都还在创制中，起草、研究、和群众讨论都需要时间；另一方面，生产必须按时前进，不能等一切都弄好了再生产。目前的生产虽然也按时进行着，但因为新的制度、新的办法不够健全，干部和群众对它也不够熟悉，所以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不象我们理想的那样高，不合乎更大更全面的跃进精神。县地两级正在忙于积极想办法，预料需要几个月工夫，才能把生产、生活各方面的事安排得更稳妥一些。

我自离京之后，经由山西省晋东南专区，到达阳城县委会，前后参加了县委召开的队支书记会议、乡干（即公社干部）和扩干会议、地委召开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到公社住了一个礼拜。到家乡住了一个礼拜。现仍在阳城县委会，一两日可能到一个公社去。现在，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向你作个简单的汇报。

一、群众对一九五八年的丰产甚为满意。尽管在大搞钢铁时候安排劳力欠仔细，影响了一些农业生产。但除此以外，农村所得到的收获量还是大大超过一九五七年。在工业方面，除

了大搞钢铁时间，因技术赶不上出了一些废品已由国家照顾补贴外，其他方面也都丰产。阳城向来有煤、铁、硫三大工业产品，铁在去年虽然有点亏本，可是总产量仍超过以前若干倍，而煤因炼铁的需要也大大增了产；硫磺也因国家的订购而增产一倍。硫是值钱东西（三百七十元一吨，本年产三万多吨），硫的增产是本县一大财源。

二、此地公社化，是白吃大灶化起的。大灶化以后，大大解放了妇女劳力。去年搞钢铁正是收秋时期，如没有这一措施，收秋就会成大问题；大灶化了，秋粮大部分是解放了的妇女收的。

三、由于公社供给伙食，使一部分人口多的农户应头入灶，可以安心生产。

四、公社虽然还是集体所有制，但集体的范围扩大了。斤斤计较私人小利的人，在这样大的趋势下，也都闲得多了。我所熟悉的那些一毛不拔的人，现在也再不象从前那样和社顶牛了。

五、一连好几年不得痛快解决的喊叫的缺粮现象，一经大灶化，好象变戏法的人揭去了被单，谁也再找不着叫的理由了。

以上都是以前没有的好现象。

随着公社化而来的新问题也很多，主要的有以下几个：

一、政治挂帅还有点强调得不够，特别表现在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方面。在此地，一般行的是伙食供给制。此地每一个人口的收入是六十到七十元。而伙食费用都平均在四十元以上（不符合中央所规定的工资部分大于供给部分），因此一般农民对争取多劳多得的方面积极性不大。在评级的时候，一般人不争取高级，以为级低了可以少受一点累，级高了也不多得几个

钱（由一级到六级，工资是由每月一元到两元）。

二、社干多为以前的乡干，这一级干部，在过去好象是代表国家方面的多，直接经手搞生产的少，所谓领导生产，大体上只是搜集、汇报数字，真正经营者是队干（即以前的高级社管委会），现在由原来的乡干直接经营生产，他们还用的是过去那种工作办法，召集会议作报告、下达指标、批方案、要数字、造表册，总以为下边是照他们的布置执行的，而实际上距离事实颇远。例如历年来布置积肥，省、专、县都要求的是每亩二、三百担，乡催促各高级社逐日汇报积肥数字，完不成就一直催，直催到报够了为止，结果是都报够了，而实际上每亩则只有二十至五十担（表面上自然是二、三百担）。肥料数字容易虚报，到秋后的实产粮便虚不过去——因为粮库购粮和群众留粮都需要实数，所以每到秋季，核产就成了问题。每亩施二、三百担肥，只产二、三百斤粮食，谁也知道不象话（真正施到二百担肥，产量都要在一千斤以上），可是年年这样报，也过得去，因为真正负群众生活责任的是高级社，今年再由这办法直接经营生产，是有危险性的，但这些同志们只习惯于这样做，马上变不来另一套。

三、城市工业、农村工业和筑路吸收了一大批强劳力，因而农业上的劳力减少，工具改革马上补不起这个空子来，妇女虽然比过去出勤多了，但要求她们完全能抵住男青壮年还不可能，再加上今年要求的生产指标比一九五八年的实产加了一倍，看来是有困难的。

四、一九五八年的粮总产量虽然有增加，但还没有赶上非农业人口增加的需要——粮食数字一加大，有好多队留粮都比去年减少。

现在我所能想到的对策和县地两级所想的办法基本上一致，但在具体作法上还有些出入（自然都是以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县委书记愿意让我在一个管理区试作。我想即使在一个管理区试一下也好，否则无法下手。不过我所谈的办法，不在一个公社试行，是不能全部试出来的（有一位县委书记已同意我的做法）。

我的具体做法：

一、验收所有大队长或村支部为公社社员代表（即管委会委员），选出其中优秀的作为常委（即公社正副主任、各部长），规定这一部分常委不得少于全体常委人数三分之一，而且一定要有人作副主任。现有的公社干部（即原来的乡干）将一部分下放到队，以腾出位置接受由队调上来的人。确定每年改选，使队干部有当常委的机会，而且使已选出之常委不致于把现在的当选认为升官（认为如无错误，升得降不得），这样做，才能免除公社与队的隔膜，才能免除只看报表数字而不了解真实情况之弊。

二、农业方面，公社与队按劳动量计算分配的差别，将队中所有的生产、服务项目都算出每一个劳动日应作的定额，然后把全年的劳动日以队为单位合计总数，把全年的产值按人民币计算分为公积和服务部分，集体分给各队。各队如何分配，可以自由一点，这种劳动量（即劳动日）可以与出勤率不一致，以鼓励巧干和队的计划性。劳动量是因分工的不同，产值（合人民币）可能也不同，但按劳动的需要讲，大体上是一致的。社发给队的产值，包括供给部分在内；队自用粮食、蔬菜、肉类、油类等都是从应得的产值中扣除，把其余部分作为工资给队员。这样做，队和队员的积极性都可以发挥出来——即

能意识到增了产使他们有些什么直接影响，这一条，用文字说，很麻烦，而且不易说明白，等我回去再作口头说明。

三、粮食问题，主要把希望寄托在今年麦子丰产上。今年的麦田措施用的工夫较多，雪也下得多，再加上去年的水利基础，如无不可抗拒的灾害，是可以丰产的（约可等于去年两倍）。其次是以一部分非基本农田种植青饲料，以代替今所留的饲料粮，群众因为伙食供应关系，对留粮多少不太计较——他们以为总不叫自己饿肚子。但越是这样，社和队就越不能不注意节约用粮。

此外，象以改良工具解决劳力不足问题，重点利用各种条件解决增产问题，我没有意见，县、专两级已有布置。

及时把这些情况反映于文艺作品中我以为还不是时候，因为公社的主要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在工作中也没有发现先进的、成功的例子。作品无非反映人和事，而这两方面现在都没有新的发现。所以我打算再参加一段工作再说。

暂且反映这些吧！其它容后再报！

敬礼

赵树理

一九五九年

如有机会见到中央管农村工作的同志，请把我的意见转报他们一下。

群众创作的真繁荣*

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不论工矿、农村和大小城市的街头巷尾,处处张贴着群众的诗、画,连大字报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艺术性很强的妙文;各种艺术专刊,各报刊的文艺栏和画页,都从群众的创作大海中,选取了大量的精华,革新了自己的面貌;各个主管文学艺术部门,更把好多群众创作精华汇成专刊以广流传;所有这一切,汇合起来,构成了创作上的繁荣景象。这是“真繁荣”,应该永远繁荣下去。

这种繁荣,是要以在群众的各种活动场合中张贴着的、演奏着的、传说着的、背诵着的……为主。张贴、演奏、传说、背诵等等,正是群众的文学艺术生活。群众在这些活动中,随时体会着创作和欣赏的乐趣。被选入书刊的,仅仅是这些成品的一部分精华,其作用是为群众形成交换创作经验的方便,使群众在交流经验中互相提高,而并不能以这一部分代替群众创作的全部成绩。群众创作的目的是以作品参与当时当地的文娱活动,并非为了入选。从音乐方面来看,更加明显一些:好的“八音会”有被介绍到北京参加全国民间音乐会演,但参加会演的是绝对少数,而大多数没有参加过会演的也不因而停止吹打或吹打得不起劲。

*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学知识》一九五九年第四期,后收入《三复集》。

我以为不论掌握了文化的劳动人民，不论下放干部，不论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参与或辅导群众文学艺术创作的时候，都应该本着群众原来的精神，把创作上的繁荣稳定在群众生活中，并且逐渐扩大，使任何不繁荣的角落都繁荣起来，使较低的水平逐年逐月有所提高。我们也可以把群众的好作品介绍到刊物上去刊登，自己的作品有时候也可以向刊物投寄，只是不要把群众引导到专为人选而创作的道路上去，否则会弄成只有刊物编辑部的桌子上繁荣，而街头，墙头，俱乐部反而变得冷落起来。

创作有只供自己欣赏和与人共赏的两种目的。自拉自唱，主要的兴趣在于拉和唱，别人听不听他不管；不便告人的个人悲欢，只写在各人自己的笔记本上，一般都不愿意让别人欣赏。不过这种作品，在每一个创作者的创作总量中占的比重不大，在一般情况下，更多的是愿意与人共赏，也就是“发表”。刊登在刊物上固然是发表，即贴在墙头、传在口头也都是发表。作品所要求的读者对象不同，发表的地方也因之而异。古代文人所写的悼亡诗往往不公开，座右铭也不过挂在自己座位旁边，都是只给自己看的；墓志铭是给被纪念的死人的子孙们看的，发表在该户的祖坟上；创修什么庙碑，是给谒庙的人们看的，发表在庙院的某个角落里；言志的诗文是写给自己的亲友看的，其中最得意的作品往往发表在自己的屏风上，客厅的墙壁上；与友人唱和的诗，是互相发表给对方看的……总之：他们每写一篇东西，在动笔之前，对象就非常明确。这些正是文艺的运用。创作这些东西，是他们生活的构成部分，也可以叫做艺术生活。这些作品，写得好了，为多数文人所赞赏了，也有抄传印刷的（为了抬高身价自己花钱印些臭文出来送亲友

的，不能算数）。有人那样做，作者自然也愿享受那种光荣，但他们在写的时候，主要的目的不是那个。否则写出几篇来没有人抄，没有人印，以后就再不写了，而事实上则往往是即使没有人赞赏，他们也会活到老写到老（自然不是作为职业每天写）。

古代的劳动人民，也有他们的创作生活。他们的创作往往都是真情流露（不会象有些无聊文人把男盗女娼的地主歌颂成德隆望重），爱上了张家姑娘，就编几段曲子称赞一番；恨上了李家恶霸，就写一张黑帖骂他一顿。爱写快板的人，不是现在才有，他们自古就是作家。他们每作一个作品，也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对象。他们的好作品，也被人们传诵得很久、很远，但那也是写出来以后的事，而在写的时候也只是为他们肯定了的对象写的。这也正是文艺的运用。创作这些东西，也是这些作者生活的构成部分，可惜当时的文化武器没有被他们掌握，否则会更繁荣一些。

刊物的出现，是印刷工具现代化了以后的事。有了刊物自然是好事——它使好的作品传播得既快且广，为古人所不可及。但社会需要的创作量，要比刊物所能容纳的多得多；各种作品的欣赏对象与刊物所发行的范围也不尽相合，所以刊物虽然能帮助创作的繁荣，而真的繁荣却不能都表现在刊物上，更主要的要表现在群众的文娱生活中。两个青年相跟着往地里担粪，前边的一个向后边的一个说：“小三子，你休强，一会叫你跟不上！”这是前边那个向小三子下的挑战书，也是他对小三子发表的创作。这个简短的作品，对当时当地固定的对象小三子说来，算得一篇能打动心弦的好作品。创作和发表这个作品，也是作者和小三子两个人的文艺生活（一个创作者，一个欣赏

者)。在群众的各种活动场合中,经常有人发表着类似的作品,正是创作繁荣的表现。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们,和这些作者共同在一块生活着、劳动着,随时创作一些同类而较高的作品出来,使这些作者有所参照,得以提高,也就是“辅导”;辅导到一定程度,配合着他们学文化的进度再讲一些创作上的道理,使他们在创作上逐渐都成为内行,便可以算是把这种繁荣推向更高阶段。对其他部门的艺术辅导也应如此。

较有普遍意义的好作品,可以向刊物上投稿,不过不要把群众创作的兴趣引得偏到那方面去。把写作的目的仅仅缩小到“发表在刊物上”,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大部分人运用文艺的范围不那样狭隘。象向小三子挑战的那一类作品,不论怎样提高,不但发表到刊物上读者不会太感兴趣,就是有个“小四子”和他一路担粪,听了也没有多么大作用——因为他这挑战书是只向小三子发出的。假如这位作者把他的创作目的局限到向刊物投稿上,便不会产生这篇作品;大家都不作不合乎刊物用的作品,那就会形成只有读刊物才是文娱生活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时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了,人人都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了,那时候,人人都象古今的文人一样,吟诗答对,琴棋书画都来得几手,把文学艺术运用得象旋刀、锄头那样熟悉,兴趣浓淡虽然也各有不同,但或多或少每人都有所作。那时候的社会环境,到处都经过艺术化,各人的作品虽然不能象现在那样写在色泽、大小各不相同的纸块上到处乱贴,可是都还有各种不同的发表场所那是肯定的,绝不是都发表到刊物上。那时候的小三子和他的朋友可能都学会了开动机器,但口头上的口头文学不是只在担粪时候才能发表,开着机器一样可以那样做。那时候,每个公社可能都出了刊

物，但小三子的朋友还是不需要通过刊物就能向小三子挑战，而且即使每个生产队办一个刊物，也容纳不下队员们的全部创作。

到那时候，虽然每个人民公社都有了较大的剧场、影院、乐队、剧团、文娱刊物（文艺、美术、剧本等），但各个队仍会有较小的剧团、乐队等等，因为他们不但要听、要看专业的，而且自己也还要拉、要唱、要写，要用自己的诗篇画幅来装点自己的房间，要用自己的歌喉来发抒自己的感情……总之：要丰富自己的文学艺术生活、发挥自己文学艺术创作的才能。这样才能算作更大的繁荣。

（一九五九年三月）

新食堂里忆故人·

我的故乡，在太行山南端的西边。我不但在那地方生长、上学，而且直到全国大解放以前，都在那个山区工作。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关系，我在解放以后虽然离开了那里，但一有机会，总想回去看看。

这个地区，远在一九三七年就成了抗日战争的老根据地；解放以后，自然也和其他老根据地一样，虽然不能说事事走在前边，至少也可以说事事不甘落后。我每次回去，总能碰到一些新鲜的事物。我所写的小说，大部分取材于这个地区。

去年（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又回到我的故乡去。去年是个大跃进年，新鲜事要比往常多。首先使我感到新鲜的，是公社化以后新建的食堂。这是一列座北向南的新房子，西头是厨房，东头是饭厅。厨房里有井——是把一眼旧井包在这新房里的，用水不要到外边挑；灶火的添煤口和出灰渣的坑都在墙外，里边用火不见火，没有一点灰尘。饭厅里摆着两列方桌，每张桌周围有四条板凳；中间留着相当宽的路，烧着两个地炉。还探不着桌子的孩子们，在吃饭时候都爱围着火炉子吃。

当我在这食堂吃第一顿饭的时候，便先向大队干部发表我的感想。我说我首先感觉到的是食堂修得很得劲，但在建立公社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后收入《三复集》。

之初，以一个七十来户的力量来修建这样一列房子，未免有些铺张浪费。队干部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的话，附近几张桌子上的人就一齐笑了。有人提出来让我估一下费用。我不太在行，一时估不出，正在估计中，有人劝我说干脆不要费那个事。后来大家才告诉我说，修这房子不但没有请什么匠人，购什么材料，而且正规的劳动日也没有占用好多，大部分是社员们在下工之后拾石头、捣土坯，用业余时间搞起来的，而且只突击了十来天就落成了；材料也是大家拼凑的。劳动人民创造起什么来，有时候真像变戏法。

看到这样个花钱不多、质量不坏的食堂，固然使我很高兴，可是一看到食堂的地基，就慢慢联想起好多故人来：

这地方叫“南院门口”。南院的前院里住着我的一户本家，原是弟兄三个，论年岁都和我父亲的年纪差不多，只是按辈数和我是平辈。老大哥名叫喜贵，当年因为没有地种，在安泽县种山地，没有结过婚就死到那里了。老三名叫各轮，青年时期要算当地的劳动英雄，后来也因为没有好地种，坏地产量太少，无心受苦，改学梁上君子，结果被族里人打了个半死埋了。他的遭遇和鲁迅先生写的阿Q有点相像，当年我也曾想给他写“正传”，后来终于没有写成。这两位老兄，就是这样被贫困夺去了生命，连个后代也没有留下。

食堂的东头，叫“窰头上”。这院从前也住着弟兄两个。他们也和我父亲的年岁相仿，姓吕，老大名叫拴成，我称伯伯；老二名叫随成，我称叔叔。这两位，除了住的房子以外，再没有什么产业。那位老拴成伯伯是伤寒病死的，死后留下两个孩子，大的在一个灾荒年饿死了，二的一直住在舅家，直到土改时候才回来，现在是一位小队长。随成叔也和我那位喜贵哥一

样，没有结过婚，被一块中了蛇毒的死牛肉给吃死了。

食堂的南边有一户姓冯的，父子两代都没有一亩地。孩子名叫福归，我称哥哥，也是在外讨饭被饿死的。我写的小说《福贵》，有一部分就是他的生活。

福归哥的房背后，有个院子叫“东头院”，住着一户姓吕的，弟兄四个，我对他们其中两个称伯伯，两个称叔叔。他们都会木工，但只有几亩很坏的地。在我的家乡一带，当工匠差不多是副业，完全靠它生活是困难的。他们四位，只有老四在三十岁以后才结了婚，三位当哥哥的都没有结过婚（老二到五六十岁也找过个老伴）。他们都爱好民间音乐，八音会的乐器长期存在他们家里。我爱打打锣鼓大半也是在他们家学会的。现在他们都去世了，只老四留下一个孩子。老四叫六牛。这位老叔叔也是灾荒年逃荒出去死在外边的。他的孩子已经在外边落了户。

东头院的东北，当年有一株大核桃树，树下有两孔古石窑：连门窗都没有。不过这两孔石窑庇护的人可真不少——河南遭了水灾逃荒到这村里的人，开始差不多都在这里住过，有的短时期找不到住处，还有住过几年的。我写《李有才板话》中的“老字辈”人，好多取材于这里。我们村里当年逃荒出去的人，到外边开始当“老字辈”人的时候，未必都能碰到这样好的住处。

.....

这些故人，数起来要上百（连邻近村里的数要够好几百）。这些熟悉的善良的面孔，东逃西散，死的死亡的亡，大多数连个后人也没有留下。假如他们不是被旧社会的贫穷和灾荒逼死而能活到现在，一定有好多是领导干部或者劳动英雄，这时候

一定都欢聚在这个新食堂吃饭。

我因为数算这些故人，饭吃得慢了一点，没有注意到大人们都已经吃过饭干活去了，只剩下围着火炉的一群学龄以下的儿童。这伙小宝贝们也不认生，见大人走了，有几个围着我来，问我是哪里来的，其中有个叫出我的名字来（可能是大人指着悄悄跟他说过的）。我以两只手在他们头上摸来摸去，又指着每个问他们的名字。嘴快的指着每一个介绍给我说他叫小什么，他叫小什么，可是我连一个也没有记住，每一个名字前边只记了个“小”字。我觉着这也可以说是些“小字辈”人物吧，不过比我在《李有才板话》中写的那些“小字辈”人物幸福多了。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懂得什么叫“逃荒”。

（一九五九年五月）

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表现新英雄人物问题

要表现新英雄人物，先要认得新英雄人物。识别的界限是，要看他是否真正在那里忘我地建设社会主义，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目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碰到许许多多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一声不响，勤勤恳恳地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别人知道他，也是这样干，别人不知道他，也是这样干。

我是喜欢这样的英雄。例如平顺县的武侯梨，他在一九四四年就当了劳动模范。十四年以来，他一直在他的家乡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不管别人参观不参观，都是一样干。他的家乡，原先是荒山秃岭，山上有几条条梯田，平时风很大，一下雨又是山洪暴发。他看这种现状不改变不像话，就一心一意领导群众改造山区，要把它园林化。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在这里满山沟都是密密麻麻的果木树、松柏树，山洪也被控制住了。群众的收入，大大增加，平均每年

* 本篇是赵树理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在山西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曾在《火花》杂志一九五九年六月号发表，后收入《三复集》，个别地方作了修改。

每口人可以得到一百五十块钱。这样的人，我觉得应该好好表扬。现在我国在农业上还不能一下子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他们只凭着两只手，十多年来竟能把山区园林化，改变了山区的旧面貌，若说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认为写这样的人最有力量。

表现英雄人物，我觉得要着重写他们的英雄品质。而要想把他们的英雄品质写得像、写得好，就先要了解他们，就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英雄的品质，存在于每个具体的人身上有多有少，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就要选择典型的。这就是说，他们既要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风格，又要有充足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事事站在群众前头，又要时时刻刻站在群众当中。他们是群众的表率，又是群众的一员。这样才是新英雄人物的特色。而认识新英雄人物的这些特色，就得跟群众经常生活在一起。平常咱们写的英雄人物，有些免不了概念化、公式化，就是因为没有跟群众生活在一起，对英雄人物的品质、生活、形象，不熟不懂，上级有什么号召，就去找什么材料。这种赶任务的办法，往往是写不出好的作品的。有一位领导同志谈“赶任务”问题时候说：人离开了群众，才有赶任务的问题，不离开群众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上级作为任务而提出来的号召，都是在群众中早已存在的问题，不过这时只是由领导把它总结出来，再普遍号召下去。如果自己生活在群众中间，自己也出过一份力量，那你只要把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新鲜事物写出来，就会和上级的号召相吻合，不致感到突然，也不致感到在赶任务。因此，我觉得在工作中去认识、熟悉英雄人物的办法是最好的。我下乡以后就把写作暂且搁过，一心参加工作。我这样想：虽然暂时不能写出东西来，

但在另一方面还是做了些工作，这对建设社会主义也有帮助。假如我们下到那个公社，因为我们和群众一道做了工作，找着了增产关键，粮食多打了几万斤，我觉得这不是件小事；虽然这时没有写出精神食粮，生产出来物质食粮也不错。

我们一深入了工作，跟群众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就认识了许多人，熟悉了许多人。在这些人当中，有的很好，帮助过你，你就自然对他们发生热爱；有的不好，甚至你碰过他的钉子，你就自然对他们发生厌恶，这样在思想感情上就会爱憎分明。一九四九年，我在我写的《也算经验》一文中说过：在工作中打过交道的人物，常常在脑子里闪现，想躲开也不行。写跟自己打过交道、认识深刻的人物，就会比较生动。我还说过：自己最受感动的、最拥护的人，逢人就想称道他一番。虽然说话也有技巧问题，但是他真正受了感动的事情，还是会说得很动人。每个人都听过朋友、家属和自己谈心，在谈话中也有他捧的人，也有他骂的人，因为这些人和他打过交道，说得都很生动。如果把他们的谈话用文字写出来，就是作品。因此我说，写英雄人物不只是个写法的问题，主要是自己同英雄结合和热爱的程度如何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只在写作方法上打圈子，就不好办了。

二、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任何事情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希望一个地方没有矛盾，那是不可能的。既然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我认为什么矛盾都可以写，但不一定要把任何矛盾都写进去，只要把每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写出就好。到底写人民内部矛盾呢，还是写

敌我矛盾呢？我觉得写作的题材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就写什么矛盾，不必机械地划一条界限。因为在一个写作的题材中要涉及的矛盾有的是敌我矛盾，有的纯系人民内部矛盾，有时两种矛盾搅在一起，如果在确定题材之前首先划个界限，只写哪一类矛盾，有时候也不符合实际社会情况。

一部作品或一篇作品，只能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不可能把社会问题都反映出来。过去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讨论电影剧本时，往往一讨论，不是没有这个矛盾，就是没有那个矛盾，结果都加上了，什么矛盾也不突出了。文艺作品不是百科全书，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包括进去。要分清主次，抓主要的东西，省略次要的东西。写人民内部矛盾，也得去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看准了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动力，怎么写都可以，不必篇篇都要写上个支部书记。运动中出现了问题，是谁来解决的呢？一定是党来解决。干部根据党的政策办事，有了问题，又根据党的原则解决，写上这些，不是也就写了党的领导吗？

写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我觉得不在于规定哪一种矛盾一定要占多大比例、要有多大幅度，主要是个立场观点问题。立场观点对头了，在处理题材时哪些事情可提，哪些事情不可提，哪些事情该怎样提，哪些事情不该怎样提，这样写对人民有好处，那样写对人民有坏处，自然就有个分寸。譬如同写一个题材，立场对头不对头，结果会有两个样子。我们工作中有成绩有缺点，立场观点正确的，就会热情地肯定成绩，恰当地指出缺点，鼓励人民克服缺点继续前进。反之，就会看不见成绩，专门挑剔缺点，给人民的革命热情泼冷水。现在，在我们同志中间，一般说来，立场观点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在

实际工作中，在感情上，有时候还解决得不好。例如，有些人，在理论上承认劳动人民是伟大的，也表示愿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但一和劳动人民接触，又嫌他们这长那短，思想感情与他们格格不入。有了这股情绪，自然就无法把作品写好，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也就掌握不住分寸，笔锋常常下偏，伤害自己。

现在就以我写的几篇小说为例来谈谈我的体会。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例如我写《李有才板话》时，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这篇小说里有敌我矛盾，也有人民内部矛盾。又如写《三里湾》时，我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社还是应该扩大，于是又写了这篇小说。这篇小说里对资本主义思想和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写的。有人说其中没有敌我矛盾是漏洞，我不同意。再如《锻炼锻炼》这篇小说，也是因为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中农当了领导干部，不解决他们这种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这种现象虽然不是太普遍的，但在过去游击区和后解放的地区却还不太少。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们一顿，犯不着，他们没

有犯了什么法。可是他们思想、观点不明确，又无是无非，确实影响了工作进展。对于他们这一类型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事实摆出来，让他们看看，使他们的思想提高一步。现在各地虽然都已经公社化了，但这类思想还是存在着的，我认为写写还有用处。

三、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我认为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提高（普及也包括思想性和艺术性）；另一方面是文章的安排，也就是文章的结构、语言问题。毛主席说的从普及基础上提高，我看我们对“基础”二字的含义理解不深。我们搞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叫它能够起点作用。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先看基础，也就是说先看看群众现在吃的什么精神食粮，再看看自己供给的精神食粮群众能不能吃进去，顺口不顺口。从这里出发，不论思想性也好，语言也好，技巧也好，都要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尽量想办法使群众能够接受，然后从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另一种看法是不考虑群众现在的接受程度，说群众不懂得他的作品，不是他写的不好，而是群众文化程度太低。他说他的作品语言优美，又科学化，群众现在不能接受，将来他们文化程度提高了就会接受，如果从群众现在的基础出发，那就是“迁就”，迁就群众是不对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写进作品里的语言应该尽量跟口头上的语言一样，口头上说，使群众听得懂，写成文字，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群众看得懂，这样才能达到写作是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如果把语言分成两套，说的时

套，写的时候又是一套，这样我觉得不大好。《人民日报》上曾经登过一篇《妙语惊人》的相声，那上边说东屋二婶子到他家里来，他很欢迎。但是他不这样说，而是说：“我很荣幸，因为我这古老的房间里，光荣地降临了我们的最亲爱的二婶子。”这种语言不能说不科学吧，但跟日常生活中二婶子到自己家里时说的话，距离却相差得太远了。即使群众文化程度提高了，在这种场合是不是这样说，我看也不一定。

群众的语言，一定得从现有的基础上加以提高，而且群众的语言一定会跟着生活的需要而不断提高、不断丰富的。比如硫酸氨，从前群众中没有，现在到农村中说硫酸氨，群众都知道。有些语言，开始群众了解的不确切，不深刻，但一跟他们的生活需要有联系，慢慢也会懂得。有人说，群众语言太少，没有知识分子的语言表达力强，其实恰巧相反，群众的语言最丰富。老舍先生有一次讲笑话说，你不要说群众语汇不丰富，在北京大杂院里，找一位老太太，你去跟她骂一架，看谁的语汇多，保管她骂你三个钟头不重样。群众中有很生动很丰富的语汇和说法，为什么我们不多用群众的语言呢？如果不懂，应该努力学习。因此，我觉得能不能多用群众的语言来写东西，恐怕是普及工作中的一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

不论提高的作品也好，普及的作品也好，我认为都要有思想性和艺术性。譬如写一首儿歌，这可以说是普及的作品，但是把它写好很不容易，写好了，艺术价值并不低，就是象“小汽车，滴滴滴，里边坐着毛主席”，也不是随便作的。又如旧剧，在民间很流行，群众喜见乐闻。但是原先在文学上并没有立案，自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才立了案。从前，有些人不承认它，说它没有文学价值，到了

“五四”时期，有人只承认一种话剧。陈独秀批评旧剧说：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又说脸上有谱，还算什么脸！他把广大群众喜爱的旧剧贬得一钱不值。但是我们能说一概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吗？群众喜欢旧剧，我们就应该重视它，逐渐把它改造、提高，使它对群众更有营养成分，不应该只把群众不喜欢的或暂时不能接受的东西，硬往他们的手里塞。比如，群众现在喜欢吃面条、大米、馒头，我们暂且不要硬叫他们吃面包、黄油。想要他们开开口味，可以在食堂里排上一些让他们选用。但我们不能说，面条、大米、馒头是低级食品，只有面包、黄油是高级食品，你们非吃这个不可，这个“维他命”最多。硬这样做，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精神食粮又跟物质食粮不大一样。物质食粮不论这个那个还可勉强凑合，精神食粮就不好办。如果你给他一本小说，上边净写些风呀月呀，又写得离奇古怪不好懂，他就不看了。过去，稍识几个字的农民，常爱看一些二、三流的甚而毒素很大的小说，如《六月雪》、《秦雪梅吊孝》等，下地时候还装到兜里。现在我们印的书，整整齐齐，可是有许多他们就不喜欢看，更不装在兜里，你说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把这个看成一个问题，到群众最多的地方去考察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印的新书。没有，就得想个办法。否则，我们写作是给群众服务的话岂不落空了吗？

为群众服务得好，就得深入群众，对群众的东西感兴趣。不要一看就说人家的东西水平低，感到腻烦，而要细心研究其中的道理，找出群众为什么喜欢看它的原因来。如河南梆子，群众很喜欢，但有人说它很单调，不如西洋歌曲。我觉得河南梆子群众所以喜欢，是因为它唱的每个字都很清楚，想听不清

也不行。有些模仿西洋的歌曲，群众说只听得大琴嗡嗡响，听不清楚唱的是什么，戏里边的字都叫音乐“吃”了。因此我想，我们搞艺术创作的人，要为群众服务服得好，就得照顾群众的习惯，使我们的兴趣与群众的兴趣取得一致。我承认知识分子的兴趣与群众的兴趣是两个来路。还以音乐为例，知识分子一听钢琴响，就进入了这个钢琴的艺术环境，群众一听锣鼓响，就进入了这个锣鼓的艺术环境，来路不同，兴趣各异。劳动群众是否能接受西洋的一套，将来可能接受，但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改造、提高我们的传统艺术，但提高不是以洋的东西为正宗。我国艺术有精华的一面，也有糟粕的一面，我们要继承与发扬精华的一面，去掉糟粕的一面，使它日臻完美，不断提高。我们不能再象“五四”时期那样，因为反封建打倒孔家店，连不是孔家店的東西也打倒了，孔家店里是包不下这些好東西的。西洋的好東西我们要学习，但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東西就见不得人。

解决我们创作与群众的关系，光靠下厂下乡调查一下群众喜欢什么，照着做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与群众在一起生活几天，把这项当作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我们不是提倡每年有多长时间与群众共同生活吗？这个制度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这样。这样下去，时间长了，我们的思想感情才能跟群众溶解在一起。思想感情一致了，写文章时候就知道该用哪个字，不该用哪个字，哪句话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这时再写东屋二婶来到自己家里，一定说：“二婶子，来啦？”不会再说：“我很荣幸，因为我这古老的房间里，光荣地降临了我们的最亲爱的二婶子”了。

四、关于写作技巧问题

决定作品的好坏，首先是内容问题，其次才是写作技巧问题。没有内容，只在技巧上打圈子，是写不出来好的作品的。冬烘先生把写文章归纳为波澜擒纵、烘云托月等法，只求气势流畅，音韵铿锵，但看过之后，里边却没有东西，空空洞洞，这不能算作好文章。有些人写的文章，文字虽然写的不大好，但很有内容，虽然也不能算好文章，但只要在文字方面加以努力，要比只会说空话而无生活锻炼的人进步起来容易得多。

对于写作技巧，我自己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我写的作品是不是有技巧，也很难说，所以很难系统地来谈。

写作技巧，我看可以分成两点意思来说：一点意思是指文章上的技巧，这种技巧就是文章的解剖，其中包括对主题的分析，题材的处理、剪裁、结构，等等。这是带有一般普遍规律性的东西，读读文学课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点意思是指怎么创作的技巧，这就没有一定的规律了，也没见过这种“操作规程”。如果都按一定现成的规程去创作，那就会变成千篇一律的东西，也无所谓创作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主张先读一些书。过去的老先生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话有一定道理，的确读的东西多了，自然可以从摸索出一些办法来。例如看戏，看的多了，外行慢慢可以变成内行。起初看戏是看热闹，看的多了，自己就对剧团、演员、剧情有了评价。对作品的看法也是一样，读的多了，就能看出它的好坏，写作时也就有了一定办法。如果不读书，就先来研究如何写好文章，那一定会走弯路。

对于喜欢创作的和有一定写作修养的同志，分析一定的文学作品是有好处的。不过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作文学作品分析时，理论方面举的外国的例子多，中国的少，使人了解比较困难。外国的例子不是不可以举，但同时举些中国的例子来说明，更会使中国人感到亲切。我们中国的文学作品很多，有知识分子方面的，也有民间文学方面的，内容很丰富，而且在技巧方面，历代都有发展，挖掘挖掘这方面的东西，多给大家讲讲，会有很大益处。特别是在民间文学的技巧方面，我认为宝藏很多，迫切需要研究。最近，我看了一些传统剧目，觉得人家的技巧真高，很值得学习。当然旧剧中也有写得不好的，我们不能要求一切旧的作品都象《红楼梦》。但是有些技巧，《红楼梦》里没有，别的作品中却有。所以多看看传统的东西、民间的东西，是可以从中得到启发的。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究竟比外国的东西容易接受得多。我常常说，说话各人有各人的习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外国人有外国人的习惯。如西洋小说这一章和那一章中间可以没有接连，我们就有接连。比如写过了十年以后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的写法就要写上一句“过了十年以后”，人家的写法恐怕就是叙述一下房子换了主人，门口的一棵树已经长大了之类。这种表现方法固然不能说不可以，但写成“过了十年以后”快呀，还是写十年的变化快呀？我认为还是写“过了十年以后”几个字快。至于房子换了主人，就写房子换了主人，那树如果与人有关系就写，没有关系就不写。我们写景，跟人物结合得很紧。《红楼梦》里写林黛玉进贾府，不是专门在写景，而是与人物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这节采用西洋小说的写法，就一定是先写贾府的门子是什么样，桌子是什么样，把环境写好之后，然后再提到人。自然我这样说，是指

外国作品的一般情况，并不是说篇篇如此，有些大作家也不都是这样写的。但是，我们有些初学写作者学习人家的时候，优点没有学到，恰恰学了公式化的那一部分。

我们还要虚心学习群众创作。群众中有许多天才，他们的创作虽然有很多是半成品，但里边的营养成份很多，它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使我们的脑筋开窍，思路更广。吸收这些营养成份，再来进行创作，会使我们的作品内容更丰富，更有光彩。创作毕竟是创作，不要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我在写作上有些别扭劲儿，就是不愿重复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我本来计划写个什么东西，准备怎样写，如果有人这样写了，我就只好改变原来的计划。我在写作之前，也不愿意参考同样性质的作品。土改、复仇、翻身等伟大运动，我没有正面去写，因为我要写的时候别人已经写了好几本。别人把这条道路走了，我就另想别的办法。多看别人的作品，会对自己进行创作有一定启发，但不应该照抄别人的写法。别人这样写，自己就不要再这样写，得另外想新办法，才能算“创作”。对于创作，固然不要把它看得太神秘，认为它是高不可攀的东西，但也不要把它看得太简单，认为一动笔就能写成好作品。要想写出一点好东西，非刻苦钻研、反复磨练不可。

下乡杂忆·

趁着一个隆重的节日回忆往事，已经成为人们的习惯。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大庆之前，我想谈谈我的下乡。巧得很！我下乡的历史也恰好只有十年——因为十年之前我根本生活在乡间，无所谓什么下不下，自从一九四九年来到我们的首都北京，才把再到乡间去称为下乡。

到了北京之后，我曾担任过一点地方性工作。在这期间，我也曾想就地熟悉一些地方情况，把北京作为我新的根据地，可是略一试验，便觉得写作上的根据地不那么容易创造。不易办到的事，多加努力自然也可以成功，不过我觉着放弃一个自己已经熟悉的地方，再去熟悉一个不太容易熟悉的地方，事倍功半，无大必要，因此才又决定下乡。

我们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固然可爱，但粮棉油料产地的农村也是可爱的。假如要问二者相较哪方面更可爱，我以为这和问荷花与菊花哪个更可爱一样——不同类的事物不能作比较。一个写作者不应该是兴趣主义者，可是一个写作者总得对自己熟悉群众生活的根据地永远保持着饱满的兴趣。即从物质享受方面来说，城市和农村也是各有千秋的。例如农民晚上在打麦场上开会，坐在打过麦子的麦秸上。这种坐位使人另有一种舒

• 本篇曾经发表在一九五九年第十九、二十期《文艺报》和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后收入《三复集》。

服感，要换成北京工人俱乐部的椅子，恐怕还要差一点——自然要把北京工人俱乐部铺上麦秸，就不如椅子合适，不同类的事物不能互换。再如城郊农民头一天把青玉米扳下来，第二天到城里煮着卖，要是又卖到一个农民手里，这个农民啃第一口就知道这玉米是隔了夜的。可是城市人很难吃到当天扳下来的玉米，所以不易尝出新玉米的鲜味。城市人吃饭自然也吃得很细致，但是吃新鲜农产品的机会却少于农村。我从小曾锻炼了一个消化小米的胃口和两条爬山的腿，这两种生理的性能，我将永远不让它退化。也许有人认为将来物质条件提高了，再用不着吃小米和爬山，可我想即使是那样，有爬山的习惯，吃炒小米捞饭的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好。

田园风趣固然使我留恋，但更值得留恋的还是和我们长期共过事的人。太行山是老解放区，这里的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和我们共同抵抗过国外、国内的敌人，共同消灭过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我个人在这些时候曾和他们共过事，又曾写过他们这些斗争，所以才把这地方作为我熟悉群众生活的根据地。当我在一九五一年重新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机关驻扎过的一个山村的时候，庄稼长得还像当年那样青绿，乡土饭吃起来还是那样的乡土风味，只是人们的精神要比以往活跃得多——因为我们有了中央政府，老乡们都以胜利者的姿态来欢迎我这个回来的老熟人。

我曾其他地方说过，我个人熟悉农村生活的方法就是和人“共事”。毛主席告诉我们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我觉着在共事中间，既好做学生，又好做先生。毛主席要我们到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

这好多“一切”，看来好象千头万绪，不易面面俱到，其实只要和群众长期共事，即使想叫哪一面不到也不行，现实的社会本来就是由千头万绪组成的。我在这十年下乡生活中，不过是和以前共过事的人们继续共事，不同的只是十年以前共的是民族、民主革命之事，十年以来共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事而已。

和这种老战友们共事有个痛快劲儿，那就是他们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养成了些不计个人得失的忘我精神。例如农业合作化在全国是一九五三年才开始大搞的，而在这个地区则是一九五一年试验、一九五二年推广的，越乡越县互相支援兴修水利在全国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事，而在这个地区则是从一九五六年就开始的。他们虽然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农民，但也是些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们遇上了新鲜事物，不但顾虑不多，并且兴趣颇大。当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从太行山南下大别山区作开辟工作的时候，曾组织过他们几万民工随军参战达一年之久。在这一年中间，他们曾拿着扁担押解过俘虏，有的干脆就留在那里作了地方工作，直到现在谈起这段事来他们还认为是很有趣的一段生活。大跃进的劲头，在他们看来只是这种革命精神的继续，一点也不生疏。

十年间，我又曾和这些老战友共过好多事。我们所共的事是：从互助组一直共到公社化，从栽接苹果树一直共到苹果上市场，从扫盲缺教员一直共到乡乡有中学，从两条腿爬山、交通员送信一直共到县县通汽车、村村安电话。和他们共的事多一点，写的作品就少一点，不过我觉着这也不是什么赔本的事——能在实际工作中贡献一点力量，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不会比作品小；同时，凡是自己认真作过的事，过一个时期大部分都还会

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而且或者还会反映得更准确一点。我将长期地这样做下去。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

一、重新认识政治挂帅的重要性

我们常好把“政治挂帅”与“书记动手”连起来讲。在做一件大事上，书记亲自动了手只是政治挂帅的开始，其精神是代表党对该项事情认真负责，其作用是使参与其事的全体人员都能感到其事的重要性，除动手之外，同时还得用好多人、好多方法从思想上启发群众的自觉性，鼓舞群众的积极性，最后作到人人以自觉的头脑来发动他们自己的工作劲头，才能算全面的政治挂帅。

根据这样一些情况，公社对各管理区的政治领导工作，应该要求做到：认真加强各系统（特别是党、团支部和管理区社员大会或代表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务使其活动正常化、经常化、民主化，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民主方式拿到各系统组织中经常运用。

判断一个地区的工作是否政治挂帅了，是要看参与工作的大多数人的工作热情是否是由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支持着的。

*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篇文章是赵树理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写给《红旗》杂志的，原文有一万多字，这只是摘录。经过文化革命的变乱，原文无法找到了。

二、劳动力在现阶段农业生产中的决定作用

我们的农业生产，在机电化尚未占到一定比例以前，劳动力的多寡、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每年农产品的总产量多寡这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这个因素的决定作用仅仅次于政治挂帅。

劳动力有一个就是一个，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虽然有它的伸缩幅度，但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都有个最高限度。能把每个人的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在一定时间内都发挥到最高限度，就是大跃进。

人力是无限的，但那是说明我们的社会有不可限量的发展前途，并不能适用于我们作短时间的生产安排。

远在小农经济时期，包括经营地主在内的每个农业生产单位（户），都是按它掌握的或可能掌握的（如靠一部分短工）劳动力来计划它的生产的。在合作化初期，有些社在一个短时期内，因为生产规模的扩大，马上掌握不住这一规律，在生产上吃过一些亏，但它们自负营（盈）亏的分红单位，吃了亏不要等到收获期间就能察觉出来，所以不几年就多走上按劳动力安排生产的常规。不过它们是这样做了而没有当成道理去说，以致乡一级行政领导方面对劳动力的决定作用感觉不大深。

三、农业上集体所有制特点的利用

为了省事起见，先抄几段书：

“国家对集体农庄的计划领导有它的特点，这种特点根源

于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依靠集体农庄群众的自动性对集体农庄实行计划领导。……”

“正确的计划制度，要求由中央计划机关给省、边区和共和国规定农业生产和向国家出售农业产品方面的基本的和决定性的指标和任务。……”

“为了最有效的利用土地和获得更多的农产品，规定农业生产的年度计划和远景计划直接在集体农庄制定……”（抄自人民出版社本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第四七七页）

从这几段文字里我们来看看苏联国家对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的计划领导管些什么事、不管些什么事。①为了包括集体农庄人口在内的全民需要，规定农业生产方面“基本的和决定性的”指标。②为了非农业人口的需要，规定集体农庄向国家出售农业产品方面的“基本的和决定性的”任务。③为了发挥集体农庄和庄员的“主动性”、“经营的积极性”使其能够“最有效地用土地和获得更多的农产品”，规定“由集体农庄根据向国家出售农产品和畜产品任务自行规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畜牧业的产品率和各种牲畜的头数”、“年度生产计划和远景计划”，（最后批准权是集权农庄全体社员大会）①和②是国家要管的，③是国家不管的，但不管并非为了省事而放弃领导，而是为了发挥集体农庄和庄员的主动性和经营积极性，并且是使其自行规定计划时候，把保证完成国家市场需要的出售任务包括在其计划之内的。

苏联的计划我们固然不能死搬硬套，但是在领导集体所有制下的农业生产方面，我们应该使由生产单位自行规定的事比苏联更多一点，而不是更少一点。

因为第一、我们的农业生产集体化的时间比苏联短，其集体内部已成定律能为国家所掌握的事比苏联少；第二，我们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也比苏联短，各地人民物质生活程度又极不一致，因而未纳入国家计划（或不必纳入规划）的农副产品品种，数量也要比苏联多；第三，我们的农业生产现代化的程度比苏联差，各地由于自然条件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不平衡性比苏联大。目前我们的国家从中央说来已经是这样做的。

在苏联今天认为“基本的和决定性的”产品，有一些（如奶类、果类等）我们还没有定为“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只是有些地区有些具体领导农业生产的同志们，管得多了一点。其所以要管的目的固然为的是促进生产，可是实质上往往不如利用集体所有的生产单位主动性更为有利。再则，本书是全面研究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单纯的苏联领导生产经验的介绍，我们如未发现与我国实际情况抵触之处，是应该作为普遍理论来遵循的。

我想本此道理研究一下我们的公社对管理区的：①指标、②计划、③措施、④评比，管到什么分寸比较有利（因为目前我们的公社在领导农业生产方面大部分还只是个乡联社性质而非基本核算单位，故把管理区做为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所有单位来看）。

①我认为每个管理区需要有两列生产指标。第一列是分担国家所规定的“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各项产品产量指标；第二列是管理区根据国家市场的要求所给予自己的出售任务和自己的需要，与超需要及可能来规定的产品产量指标。第二列指标包括第一列所规定的在内，所以实质上则只有一列指标。

在制定实现这种指标的年度生产计划时候，连同指标数

字均由各管理区自行规定，公社可以派人参加做顾问性的协助，也可以不派人参加而根据其计划草案做顾问性的建议，但最后决定权要留在管理区的全体社员大会上。

只有这样做，指标才有作用，才能使生产者自己觉得完成指标有把握。这样会不会出现指标过低的现象呢？假如有了其它原因就会出现，否则是不足为虑的。指标的作用，在集体所有制单位中与国营企业中不同。集体所有制的多劳多得，就是个无限度的争取指标，其中没有人是想把可能争取的收获量降低的。

②前边提过，从小农经济直到合作化，农业生产计划基本上都是生产单位按其所掌握的劳动力自行规定的一般经营与重点经营相结合的计划。公社要代表政权替管理区规定的只是要他们把国家市场需要的而应该它们分担的那一部分计算在他们的计划内。公社以生产管理者的身分和管理区共同经营生产应该把重点放在组织领导、政治教育方面来充分发动管理区干部、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至于制定年度生产计划方面，前边提过，应处于顾问性的协助地位。

为什么要这样提呢？这倒不是认为公社干部的能力不及管理区，而是公社对管理区的一切生产条件，不象各该管理区自己那样熟悉，又因为不依靠在那一个管理区分红来维持生活，所以在生活上的需要又不象他们自己的感觉敏锐，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做计划的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

要相信管理区只要干部不靠贪污和投机为生，他们及其领导下的全体社员为了他们赖以生之的全年收入，在长年的作业安排上是不会比不分红的人想得更不周到一点的。

评比：由于集体分配的关系，一人努力多人得利，一人松懈多人减收，因而内部就有自动互相监督的因素，不必多靠评比、竞赛来鼓励——自然在适当的（就是副作用不大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发动评比、竞赛的。

总之，公社在领导管理区生产方面，凡是能利用集体所有制的特点使管理区自行规定对生产更有利的事，就尽量不以政权身份代管，以便减少好多不必要的工作量，腾出工夫来把必要管的事管好。研究管什么不管什么这件事本身，在目前就还是公社以及有关部门的一件工作。

四、任务交换、分配、生活（消费）等问题

向国家出售应售产品这种任务与一般所说义务不同——因为国家是付价的，实质上是个交换关系。农业人口所需要的非自给性物资是要用现金购人的，而现金的来源就是出售产品，也可以说是国家对农民完成了一项任务，其所以采取统购方式不过是不愿使私人有囤积居奇的机会而已。

国家对农产品是否购多点了呢？有没有粮食不足之感呢？据我了解，这种“感”是有的……

党号召我们领导农村工作的同志们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

关于生产方面前边已经谈过一些，现在不妨再谈一谈生活方面。所说“抓”应该理解为“认真领导”的意思，而不是

“督促”或不单纯是“督促”之意思。领导生产中的主要工作是逐渐认识生产中的规律并且依据或利用那些规律逐渐为生产造成有利条件。同样，领导群众生活的主要工作也是逐渐认识生活中的规律并且依据或利用那些规律逐渐为生活造成有利条件。本此，领导生产不是群众的司务长，而应该是群众生活方面的参谋长。

所说“抓生活”，就是以搞好生产作为物质基础，通过思想教育和时间安排，使群众有钱花、有粮吃、有工夫伺候自己，可以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地参加生产。

谈文艺卫星*

在一九五八年的生产高潮中，同时出现了文艺高潮。这次高潮的形成，文艺工作者固然地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但主要的成绩是群众自己作出来的。劳动人民鼓足了干劲，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好多轰轰烈烈惊人的局面，取得了千古未有的生产成果。这些局面，这些成果，既鼓舞着自己，又互相鼓舞着。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愿意把自己的感触表达一番，而有说话天才的人往往会用巧妙的语言说出同伴们所要说的话，会写的就以笔代口把它写下来，成了文章。这些文章，从量的方面来说，要比专业写作者所写的不知多多少倍，从质的方面来说，大部分说的是心里话，放空炮的很少；在文章风格上，虽然不一定都很出色，但出色之处往往也为我们专业写作者所不能及。近半年来，全国各地的文艺刊物因为吸收了这类文章的一部分，就使自己的面貌为之一新。

中央和地方的文化领导机构、文艺团体、刊物编辑部门、专业写作者以及机关、团体、学校、厂矿、农村的文化娱乐部门，大家都注意到这一现象，纷纷编选专册，同时更广泛地发动大家继续创作，准备把这高潮推向更高处，从中放出更多的文艺卫星。这是文艺界空前的大喜事。

我十分愿意参与这一工作，因而想在作法上发表一些意见：

* 本篇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前进》第二期。

我以为作这种工作和开水渠有点相似，应该“因势利导”。参与在大跃进行列中的劳动者愿意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是个趋势，但在这趋势下不一定都形成文章——有的只和自己的朋友随便发表过一些观感，有的听见人家说过了，自己只表示了个同情，有的想写成文章而不会写，有的平常就会编个很顺溜的话写出来。大家都觉有趣，有的更会写成故事或者剧曲……“要作发动工作，最好是以话引话、以文引文，让要说的人都愿说，要写的人都愿写。”

我所能想到的发动创作的具体办法有以下三个：

第一是选。在一个工作单位里（如工厂、农村等）的文艺工作者，把群众创作的好作品选出来展览；较高级的文化领导部门（县级以上的文化科、部）、文艺团体（文联等）、文艺刊物编辑部门，选印专册。用这些办法，把群众的好作品选出来再送到群众手里，让一些有天才而尚未参与创作的人一看了发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心情——暗自说：“这就是文章？那末我也会写！”第二天有些人就真能写出东西来。

第二是评。群众虽然不一定学过什么文艺上的道理，但听书、看戏、开晚会都还参加得不少。他们对听过的看过的东西，也常常议论好坏。文艺工作者应想法组织一些群众评文会，对大家共同欣赏过的东西（不论是专家写的或是群众自己写的）加以评论——赞成说个赞成的道理，不赞成说个不赞成的道理，对有长有短的就说个长短。这样谈得多了，既能提高欣赏能力，又能引起创作兴趣。

第三是辅导工作。文艺领导部门，专业写作者，研究者，文艺刊物编辑者，文艺课的讲授者，都可以参与辅导群众创作这一工作。选择对象是这一工作的头一关。文艺和其他事业一

样，人人都有学习的机会，但不一定人人都要写——正和人人都能学会做饭但不一定人人都要做饭一样。过年过节，大家都动手做过几顿饭，管事务的同志尽可以从中挑选最有做饭才能的人培养成炊事员。同样，文艺领导部门也可以在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挑选些有才能的人加以辅导，使他们逐渐成为专业的或突出的业余写作者。辅导的办法，虽在大跃进中，也不能完全采取突击的方式——文化程度低的，仍要使他们上普通民校学习文化；仍要使他们由浅入深地学习政治、阅读作品、学习文艺理论。在大跃进中，步调可以快一些，但不能超越必要的步骤。例如以前曾有人主张把一个不识字而有写作志愿的同志单独培养成个写作者，于是派专人辅导了好几年，后来虽然也成功了，可是辅导的人仍然是从教语文课做起的，假如开始先把他送到普通的学校去，辅导的人不就能省几年事吗？大跃进也应该有成本核算，否则会浪费不必要的人力。

就这样三条普通办法，能不能放出卫星来呢？我以为可以，不过要先弄清楚是什么文艺卫星。我以为文艺卫星，不外以下三件：一是作品空前的多，造成文艺上的繁荣景象。二是有空前的好作品。三是培养出空前多而好的新作家来。此外便想不到什么能算卫星了。去年生产大跃进，就出现过空前多而好的群众作品；只要今年在生产方面能有更大的跃进，再加上我们文化工作上的引导，自然会产生更多更好的作品。第一第二两条办法，可以推动得更多的人动手，而且又能提高他们的创作水平。第三条办法，可以发现和培养很多新的作家。

在文艺写作方面，我只主张培养人们的写作兴趣而不主张分配任务。比赛本来也是一种好的发动办法，但人们运用得不好，便成为分配任务。我曾经见过两个干部家属回家去求他

爱人代写诗篇，说是街道上比诗，每人一首，谁不写好象就有点落后嫌疑。有个县的剧团，全体一共三十二人，一九五九年写作任务定为诗歌六万首，大型剧本四十个，中型剧本一百个，小型剧本一千五百个，更主要的任务是演出大小节目五千三百个场次（平均每天十五个节目），更有一位县团委，直接命令本县各机关团员每人在一九五九年交作品一百篇。他们所谓卫星就是多少万篇，实际上这正是放卫星的大障碍。写艺术作品缺乏写作兴趣是不会写出好作品来的。所谓发动只应该是使兴趣不足的人的兴趣加大，没有兴趣的人因见别人的作品引起自己的兴趣，但这种兴趣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仍然和其他事情一样——即以娱乐作比，也不能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拉胡琴或者唱小曲。照他们那样规划任务，使人在头痛的情况下写文章，只能造成一种假繁荣，而且会被这种假繁荣把本来可能放出来的卫星也挤破了。编过文艺刊物的人对假繁荣往往有点体会，来稿的采用率超过千分之五的在过去还不太多。去年大跃进中这种情况幸而起了变化（投稿者由青年知识分子占多数一变而为生产岗位上的人占多数），如果成千成万分配起任务来，再度造成了假繁荣，可能还不如从前的假繁荣，因为写作者的兴趣已被数字压下海底去了。一百篇文章，每礼拜平均就要写两篇，专业写作者在去年大跃进中突破这个数字的即使有也是绝对少数，而一个负有工作任务或学习任务的青年，要赶这个数字，会赶成些什么样的卫星呢？要照这样数字交卷，集中到一个阅稿的地方，即使其中有卫星，想挑选一下也不是三五个人一年半载可以挑选得出来的。我以为文化领导部门应该下令禁止这种假征硬派的作风，以保护一九五九年可能放出来的卫星。

曲艺沿着工农兵方向继续前进*

——在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扩大理事会上的开幕词

一

曲艺是中国民间早已流行的说唱艺术，很容易表达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深为中国人民所喜爱，所以党对它和其他富有群众性的传统艺术一样，远在全国解放以前就给以足够的重视。

在旧时代里，剥削阶级对曲艺虽然也有欣赏的时候，只是这种欣赏是玩弄性质，对艺人是极端不尊重的。在新社会，曲艺艺人和其他一切文艺工作者一样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不但生活有了保障，在政治上也得到应有的地位。这种翻身感大大鼓舞了曲艺艺人，使他们心情舒畅地在党的领导下，愿意为新社会贡献出自己可能贡献的力量（韩起祥同志的《翻身记》就可以代表翻身艺人的这种心情）；同时，文学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也认识到曲艺界是他们的同伴，自愿和曲艺界合作，为曲艺写新词、改旧词。这样一来，曲艺就迅速走上了革新的道路，在业务上打破一向抱残守缺的局面，说唱起新创作和新改编的书词来。

*这篇开幕词，曾经发表在一九六〇年《曲艺》第七、八期。

在革新开始较短的一段时间里，新编新演的书词难免有点浮浅，原因是在广大新解放了的地区，不论编者演者，对革命的新人物、新事物接触得还不够深、不够广，往往是把报纸上的新闻演绎成书，使人听了常常产生说明过多，形象不足之感。尽管如此，我们对这一段时间的成绩仍不可低估——有了革新的勇气，就是一大胜利。

在参加抗美援朝的反帝斗争中，曲艺得到意想不到的发展机会。那时候曲协这个组织虽说还没有形成，可是各地的曲艺艺人在当地的文化部门的领导下，因工作关系早已组织起好多曲艺团、队，有些团或队激于保家卫国热情曾赴朝慰问过志愿军，就在慰问中体验了战斗生活，和英勇卫国的战士们发生了深厚的感情，编演出鼓舞士气、歌颂英雄的书词，深为部队所欢迎。部队的宣传部门，发现了曲艺这种轻便的艺术很便于为兵服务，就聘请艺人做教师在部队中广泛培养曲艺人材，为部队的文娱工作增加了曲艺这一新的项目。部队的长处是集中性强，培养人材可以有计划地进行，不久，曲艺便在部队中普遍生了根。

在部队中学曲艺的同志们往往是从前文工团的成员。他们在文化、文艺、音乐等各方面，绝大部分都有一定的知识，掌握了曲艺编、演技术之后，在不脱离曲艺特点的原则下，很善于推陈出新，所以在很短时期就写出并说唱出好多象《一车高粱米》、《战士之家》等很成熟、很有分量的作品来；这些作品又大大启发了曲艺界的革新工作。

党在一九五三年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曲艺在工人中又得到一次意想不到的发展机会。工人同志们对曲艺本来就有夙好。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各大厂

矿的文娱工作者（主要是俱乐部）为了鼓舞工人积极发展生产，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革命热情，又重视了曲艺这种轻便的艺术，发起了工人的曲艺创作和表演的竞赛，全国总工会组织过全国性的职工曲艺会演和文艺会演。通过这些措施，又使曲艺在全国的厂矿中普遍生了根，创造出象《虎胆红心攻尖端》、《万能积木式机床》等大批反映厂矿生活的较深刻、生动的作品，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业余说唱者，既丰富了曲艺创作，又扩大了曲艺队伍。

部队和厂矿曲艺的发展，为整个曲艺界增加了两股动脉，它们将源源不断地继续为曲艺输送新鲜的血液。

专业的曲艺艺人们的政治、业务水平，写作水平，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加上自己的努力，本来是逐年逐月提高着的，到一九五八年党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曲艺又大大地向前跃进了。这种跃进，具体表现在曲艺工作者大量的下乡、下厂参加劳动上。在这以前，也有过下乡、下厂的事，但不象这一次的踊跃——这一年几乎是全体出动过了。大跃进以来的两年中，曲艺界同志们自己创作的作品比以前同样长的时期中要多得多，也好得多。如《昨天》、《夜逛千亩田》、《金门宴》、《一定能办好》，都是他们在这两年创造出来、博得广大听众一致好评的。

在这一个时期，不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文艺刊物，刊出的曲艺作品数量都是空前的；活跃于生产建设岗位上（除厂矿、部队而外，还有漫山遍野的水库工地、筑路工地、建筑工地）的职业和业余的曲艺演出之多也是空前的；创作质量上，象《老将军让车》、《高速》、《水兵破迷信》等那样水平的作品，在以前也是不易多见的；同时有二百余种不曾多见过的

偏僻的地方曲种也重新活跃起来，使曲艺这个百花丛中的花朵，开得更加灿烂。

与创作并行的搜集和整理遗产、改编新书的工作，成绩也是值得称道的。可以上口的长篇评书，现在还没有多少创作，而把长篇小说改为评书，恰足以补充这一缺陷。这种做法，在有分量的曲艺创作还赶不上需要之前，是值得大加提倡的。我们的遗产，有好多是这样改编而来的。

从上述曲艺的革新和发展的进程上和取得的成绩上看，曲艺工作是找着了正确发展的道路的。靠近党，接受党的领导是曲艺革新发展的开始。接受党的领导，不仅应该表现在随时接受所在地区党政领导机关的具体工作指示上，更主要的表现在认真遵循党所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上。曲艺革新和发展的经验证明，每向深入工农兵迈进一步，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新的事物产生于新的环境中，谁不亲眼见到或亲身体会到，谁对这些事物就没有感性知识，写起来就无法具体化、形象化。解放初期的新曲艺创作中，有好多以词藻、格律的工整取胜，而实际内容空洞单调的作品，原因就在于没有深入到工农兵大众中去——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对工农兵“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及至后来为部队和厂矿领导文娱的部门所重视并且分别培养出创作和说唱的队伍来，创作和演唱水平就能迅速提高，原因又正在于他们是“兵”和“工”，自己写自己、说自己、唱自己，没有不熟、不懂的毛病。不过，当时部队和厂矿的重视曲艺虽然给曲艺添了新的血液，作为整个的曲艺界说来，还没有开始全面的跃进。一九五八年党的三面红旗树立起来之后，全党全民共同汇成了一个洪流，整个曲艺界自然也不甘落在这洪流之外，而迅速地、全面地、干劲十足地投

身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生产斗争中去。曲艺工作有基础的地区是这样做了，有些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也是这样做了。两年来创作数量的增多，质量的提高以及偏僻曲种的重新活跃，正是这种措施的收获。这种措施正合乎党所提出的工农兵方向下的百花齐放的文艺道路，坚持下去将会收到更丰富的果实。

二

曲艺尽管找到了正确发展的道路，但在继续前进中不是已经没有了问题。任何前进的事物都永远是在老问题不断解决、新问题不断产生的情况下进展着的，曲艺自然也不例外。

目前曲艺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创作赶不上需要这个老问题。尽管近两年来的作品在数量上增多了，其中也产生了高质量的、在反映新事物方面有分量的作品，但是这一类的作品，比起诗歌、戏剧、小说等数量上，还差得远，远远赶不上全国几百个曲种说唱的需要——连风行全国的京韵、西河、坠子等曲种也不得不唱一些自己也认为较一般化的作品。

再一个重要问题则是我们的工作偏重了几个大城市，而对一般地区——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则注意得有点不够。例如大多数的县都有它们流行的曲种和职业艺人，宣教部门也曾把他们组为曲艺团、队到各公社、各大队巡回演唱；这些艺人同志们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精神鼓舞下，也都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他们自己编写了不少的新书词，但是无论从数量、质量说都很不够，曲艺创作界对他们又没有足够的供应。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是注意过搜集遗产工作，而忽略了在这种遗产的基础上如何推陈出新。

此外，在对待遗产、艺术革新、培养后代、理论工作等各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只是这些问题不象上述两个问题的迫不及待，而且有的另有专题发言，有的可以在工作中逐渐作个别解决，所以这里就不再谈它们了。

前述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着的两个根本问题。党所以重视曲艺，是因为曲艺和他种艺术一样能为工农兵服务。曲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好多职业的和业余的演员用好多曲种为工农兵说唱好书，间接地又要求好多作者为说唱者编写好书。没有足够的好书供说唱的人说唱，就不能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如果对他们说些坏书，就反而可以起坏作用。“工农兵”三者之间，“工”和“兵”的方面似乎接近解决——因为在他们内部已经产生了自己的写作和说唱的队伍，而“农”的方面问题不解决，“工”和“兵”的方面也得不到完全解决，因为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业绝大部分建设在农村，而兵则是在入伍之前和复员之后长期生长在农村里的。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地区，构成问题的情况虽说有些差别，而问题的性质则是相同的。越是文字不发达甚而没有文字的地区，流传在口头上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韵文——越丰富，而且有好多史诗式的高级作品。应该承认这些遗产中“好书”不少，只是那些好书是反映前人生活的，其中虽说仍有不少足以鼓舞今人的东西，但总不如反映今人生活的来得直接。这些地方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在遗产的启示下努力创作出反映今人生活的好书”，而我们现在尚未着手这一工作，有一点苗头也还在象钻探队深山探宝那样的阶段。

三

我们今后的总的任务是要让写作者写好书，艺人说唱好书，工农兵听好书。所谓“好书”就是思想内容好，艺术性也高，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的斗争事迹和思想感情，能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书。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得象个样子，须要做到下列一些事。

一、全体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以明确前进的道路，统一步调，继续前进。曲艺团体机构的成员要学习，因为这是决议的执行机构，时时刻刻都不得忘记了方向。各大城市有代表性的演出团体要学习，他们有风行全国的曲种和全国知名的艺人，各地的曲艺团体和艺人是会学着他们走的。曲艺创作者要学习，他们是供给部，要随时供给出最合乎需要的好货来。工作开始较晚地区的曲艺团体和艺人更要学习，以便加快脚步准确而迅速地赶上来。总之，大家干的是一样事，走的就该是一条路，不明确方向步调是不会一致的。学习的内容应该包括身体力行在内。例如从文件上学到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就得真“去”；文件上叫去做什么，就是真做。这样才能算真正学过。

二、千方百计开展曲艺创作，培养曲艺作家。中国曲协和各地文联以及其他曲艺机构，尽可能与一切写过较高水平曲艺作品的业余作者取得联系，请他们随时给写东西。在写作上有较高成就的曲艺艺人应该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帮助他们进行创作。动员把小说改编为曲艺改编得成功的人到曲艺有关部门担任改编工作。动员诗人、剧作家、小说作家而又爱好曲艺者尽

可能为曲艺写些作品。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招集有一定艺术水平的青年曲艺爱好者成立曲艺创作训练班以培养青年曲艺作者……总之：可以随时随地按条件想办法发动创作，以得到较多的好书为目的。

三、面向全国，面向农村。以前我们把力量花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几个大城市的流行较广的曲种上，并且做出相当大的成绩。这在工作开始时期是需要的。这是试验田，种好了可以示范全国，并从中取得经验到处推广。现在这种试验已经成功，应该是推广经验的时候了。现在，推广经验应该从工作薄弱的地方推广起。从前，部队和大的厂矿，因为集中性强，领导方面一注意就迅速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曲艺队伍，而分散的农村和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领导方面虽然也早已注意，而工作的开始可没有那么容易，薄弱点或空白点还有的是。我们今后应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这方面。应该经常供给他们好的作品；应该动员比较可以为广大听众接受的曲种的演员到广大的农村和边疆巡回作示范演出；应该与当地曲艺领导部门取得联系，并给他们以必要的帮助。

四、在战斗中解决问题。只要认清方向，鼓足干劲，投身到群众中去做工作（无论是领导者还是业务工作者），任何困难问题都是可以在工作中解决的。例如培养下一代的问题就不能有全国统一的规定。全国几百个曲种，有的人口兴旺；有的已经拼凑不起场来；有的有力量设立学校；有的实行革新的师徒制；有的还接着老祖师的办法带徒弟，有的竟连一个徒弟也没有。不过，不论现状怎样，只要某一个说唱单位是政治挂了帅，热诚地为群众说好书，有的群众会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他当徒弟，有的地方文工团或公社、工厂俱乐部会聘请他们的人当

教师，总要设法让这个曲种的寿命延续下去。

以上这些看法和意见供同志们参考。希望大家多动脑筋，多多加以补充、订正，以利于我们今后的工作。

谈 “久” ·

——下乡的一点体会

我衷心拥护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大会致的祝词，完全同意周扬同志、茅盾同志的报告，并愿遵照这些文件所指示的精神努力奋斗。

我生长在农村，解放后仍然常和农村保持着一些联系。现在让我谈谈我在下乡时候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一点局部体会：

毛主席要我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我是老老实实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遵照着的。为了避免下去作客，我每到一个村子里，总要在生产机构中找点事做——后来有了干部下放的制度，这事就不需要自己找了。我常把我的做法叫做和群众“共事”——即共同完成一样的事。现在有了“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说法，要比说“共事”完全得多了。不和群众在一块作事，群众没有义务向我们报告生活情况；要和群众在一块作事，自己就变成了群众生活中一个成员，重要的情况，想不知道也不行。关于这一点我不打算细说，因为有了下放制度之后，绝大多数同志们已经都有了亲身的体会；比我体力强的同志们在劳

• 这是一九六〇年八月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的发言，曾分别发表于一九六〇年八月七日《文汇报》、一九六〇年八月号《人民文学》和一九六〇年九月号《火花》。

动方面还要比我更踏实、更为劳动人民所赏识。

我想着重谈的是“长期性”的作用。按我的体会，到一个地方，应该住个一定久的时间，其好处是：

一、久则亲。到一个村子里，要是只看几片丰产田、几处山林、几个猪场……自然也有一定的收获，这些印象虽然也能引起自己的爱，但是这种爱也象抚摸了托儿所几个娃娃一样，比较单纯。假如我们参加过这个村子里的土改、互助合作、建社、扩社、高级化、公社化、水利建设、工具改革等改变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重要工作（或只参加过一部分），每当作完一个段落要离开的时候，都会感到还有若干未完的事放不下手，还有若干安排得不合适的人没有调整得各得其所；每隔几天总还要写封信问一问我们离开之后的变化。对于那地方的人，一想起来就都是在具体事实中活动着的有代表性的人们，其中每个人在我脑子里都已经形成爱憎分明的印象；对其中的重要人物，想忘也忘不了。毛主席解释“大众化”的意思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我想在一个村子虽和群众共事能共到走不开的程度，就可以说是和群众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程度的融洽了——自然是更深入就可以更融洽。

二、久则全。农村是个广大而具体的社会面，所包涵和所联系的方面甚广，不待到个相当长的时候，是不容易把它的重要方面都接触到的。即以了解一个人而论，也要在多次共事中才能了解得全面，只共一两件事是只能了解他一小部分的。在集体生活中，多人办多事，每个人的完整的阶级立场、世界观、积极性、作风等等都要在这多次出场中才能表现出来。一个人常好向他最熟悉的人说：“我把你摸透了！”我们要熟悉

一个农村，是要把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从共事中摸透了的。是要把其中有决定性的事从工作中摸得了如指掌的。要完成这个认识过程，一定得有个相当长的时候，而且按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来理解，是愈久愈全面的，愈久愈能随着它的发展趋势来变革它的。

三、久则通。初到一个村子里，发现一个问题，往往会操之过切，要求人家马上来单独解决。看到问题熟视无睹的自由主义态度是不应该采取的，但是只看到一点就作孤立的判断也未免为时过早。一位下乡的同志问一位老农民同志每亩麦子应该下多少斤种子，这位老农民同志反问他：“什么季节种？什么土头？渗土怎么样？种什么麦种？”一般老人对密植可能有点保守，但除了保守的那一面，这位老人提的这几个条件还是应该考虑的。老人对于种麦可以说有融会贯通的全面知识，知道一个条件变了其他条件也应该随着有所改变。他可能是从多次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掌握了麦苗在哪些条件下分蘖才有效的规律的。目前农业生产的组织领导经营计划、安排、管理等诸方面的事，其间的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促成、互为因果）之处比起种麦子的一件事来要复杂得多，待得时间长了才不至于把某些不易理解的方面理解得简单化了。对现实能作融会贯通的理解，在作品中就容易避免简单化。

四、久则约。每到一个农村，开始往往觉得情况简单，过几天逐渐发现不太简单，再后甚而会感到千头万绪，但是更久了反而又会觉得不过就是那几个重要头绪。我以为从觉得情况简单到千头万绪是感性知识迅速增加的阶段，好象小学生拿到一本新课本，每一课都有足够分量的生字，而这些生字越是马上认不熟就越觉着多。过一个时期是形成类概念的阶段，好象那

个学生以前的生字都熟起来，后半本每课的生字数量又少而熟字反复使用的次数又多，趁这时候便把这些熟字在脑子里分类归了档，所以反而觉着不多了。但这种不多不是简单化了，而正是深刻化了、摸透了而放过了一边。这种深刻化也不是真象把文件放入柜子里一样，而是在继续工作中遇上了与哪一方面有关的事，马上就会联想起那一串材料来，并据以作出对策；在写作中想起它们来，也可以形象分明地在脑子里画成一个或一些轮廓。

待得久了也有两个毛病：第一、对那个具体的地方因为爱之过切，就容易产生本位主义；第二、因为只深入一点，就容易以偏代全，据以推测广大地区的情况。不过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深入还是应该深入，有毛病只说防止毛病。多学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遇事从全国着眼；多读其他各地区农村情况的报道，尊重人家工作的成绩，时时学习各个地区的长处，便可避免上述的毛病。

按我自己的经验，在一个农村里参加一段或几段具体工作，不一定每次都有产生作品的可能——勉强写是什么事情也能写的，只是我们不是为写而写，估计作用不大就不写——但是脑子里的活材料积累得多了，写起来一联系到就是一嘟噜，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点得劲之感。

我不敢说我这种体会和做法就能合乎毛主席文艺理论的精神，只能说主观上是按照毛主席文艺理论的精神来做的，特提出来就正于诸位同志们。

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

——与杨一明同志谈理想和志愿

读了“中国青年”上一期发表的杨一明同志给他哥哥的信和六位农村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或主任针对杨一明同志的一些错误思想所写的六篇文章，我便也想给杨一明同志提一点参考意见。

杨一明同志是个高小毕业生。他在信中透露的理想是“升学、升学、再升学”，将来当“伟大的工程师、科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原子学家、万能的科学家、杰出的宇宙飞行家”。后来因为未得升学而参加了农业生产，觉得“理想、志愿也就付诸流水，象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消失了”。“眼看着许多同学，有的升了学，有的到城市、工厂、矿山、机关去工作了”，就以为“他们真太幸福、太有前途了”，而自己则是“论知识还未入门，论劳动既不能犁耙、又不能担背，真是文也文不得，武也武不得”，于是既没有“信心和决心”、“勇气和毅力”来“自学”，又“没有心肠去搞劳动生产”了。他对参加农业生产的估计是“整天在农村，白天顶着太阳，晚上陪着月亮，手拿锄头、镰刀，成天和地球打交道，天天照常，真是太倒霉、太没出息了”。

六位公社党委书记或主任的文章，都是苦口婆心地用生动的事例说明和地球打交道是大有出息的事，说明农业正在走向现代化，很需要知识青年，而且只要脚踏实地搞好业务就可以为

* 本篇发表于一九六〇年《中国青年》十六期。

人民作出贡献，劝他自觉地建立革命人生观。

六位同志的文章，我读了很受感动，觉着他们和他们文章中所举出的脚踏实地搞农业生产的青年们都正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人物。我预料杨一明同志以及有同样思想的知识青年们读了也会很受感动，并且会因而改变过去对农村的错误看法。但为了使道理更显豁一点，我不妨也发表一点意见来作为对他们六位同志文章的续貂。

张仁才同志的文章末尾指出杨一明同志的思想“归根到底还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看不起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这是一针见血的说法。目前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城市与乡村、工人和农民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差别还没有消灭。共产主义者早已把逐步消灭这些差别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杨一明同志却想从这些差别中为个人寻找名利，并把它当作了理想和志愿。

杨一明同志列举的“家”和“师”都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但他意识中的这些人都是有学位的脱离体力劳动的（虽然事实上不一定）。象周金维同志文章中所举的郑兴珍，徐建春同志所举的徐建民，赵振江同志所举的孙立英等从劳动生产中生长出来的专家，成了专家之后仍无学位、仍不脱离体力劳动的人，虽然普遍存在于绝大多数人民公社中，但在杨一明同志看来是不能算数的。这除了说明他看不起体力劳动而想当个脑力劳动者来利用“差别”找一点个人名利外，还能说明什么呢？我不是说那些“家”和“师”不可当——那也是社会需要——而是说不要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家”、“师”高。这些“家”和“师”都正在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下乡下厂参加劳动，改造思想，锻炼自己，逐渐完成着知识分子劳动化；而广大劳动人

民，也正在积极参加到业余学校或训练班学习文化，逐渐完成着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劳动群众知识化，这正是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之正路。一个“文也文不得、武也武不得”的小学毕业的青年，正应该一方面参加劳动，一方面参加业余学习，和大家共走一条路，怎么可以因为升不了学，当不到自己所想当的“家”和“师”，就连参加劳动的心肠和自学的勇气也没有了呢？

杨一明同志最高的理想是“家”和“师”，次高的理想则是到城市去，到工矿上去，就是想从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中来找一点个人便宜。他除了对升了学的同学羡慕之外，还羡慕到城市、工厂、矿山、机关工作中去的同学，以为他们太“幸福”、太有“前途”了。一听说到“城市”，不问到城市去做什么，先觉着是“幸福”是有“前途”，这“幸福”和“前途”指的是什么呢？不正是想从“差别”中找点个人便宜吗？

我们说，不论在城市、在工矿工作也好，在农村工作也好，既然都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也同样都是有很大的前途的，能为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样也都是最大的幸福。问题就在于要正确地看待这些工作。杨一明同志说在农村是“白天顶着太阳，晚上陪着月亮，手拿锄头镰刀，成天和地球打交道”是“太倒霉、太没出息”的事，那么按照他这样的思想，到了工厂，白天对着黑烟，晚上对着红火，手拿扳子钳子，成天和钢铁打交道；到了矿井里，白天不见太阳，晚上不见月亮，手拿钻头铁镐，成天和石头打交道；到了机关里，白天对着窗户，晚上对着电灯，手拿铅笔钢笔，成天和纸片打交道，比起参加农业生产来，更大的幸运，更大的出息究竟都在哪里？除了说明是想从“差别”中找一点个人

便宜外，又能怎么解释呢？

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要经常和自己的工作对象打交道，每天作同一性质的工作，看起来好象重复，甚至难免有点机械，其实，事业就在行动中向前发展。有革命责任感的人，在业务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性，所感到的是活动的愉快和成功的慰藉；有剥削阶级思想的人，以为享受是自己的事，而劳动应该是别人的事，勉强让他参加一种职业，他就感到机械，毫无乐趣。杨一明同志所以把农业描绘得那样没出息，正是这种思想作怪。只要这种思想还存在，即使更换一千种业务，也不过是造成一千种机械感罢了。

工程师、文学家、天文学家、原子学家、宇宙航行家等等，固然可以当，只是抱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去寻求这些，即使可以升学、升学、再升学，将来也是当不成的。因为在升学、升学、再升学的年代中，这些“家”、“师”的岗位也早就变得没有个人便宜可图了。杨一明同志如不放弃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到了那时候，即使能当上这些“家”或“师”，其所谓“理想和志愿”，仍然不免要觉着是“付诸流水，象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样”，“破灭”、“消失”。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杨一明同志如果不彻底放弃从三种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的怪梦，六位同志文章中所阐明的农村远景和农村知识青年之正路，他是听不进脑子里去的。不破不立。希望杨一明同志赶快把那些五光十色象肥皂泡一样的个人打算主动地付诸流水，仔仔细细地读一读六位同志所写的满腔热情的文章，踏踏实实在参加农业生产中，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又红又专而为人民所需要的真正专家。

（一九六〇年八月七日）

《三复集》后记

“三复”的本意是“反复寻味”，而我这里所收入的文章，其“味”十分简单，一目了然，本无可“寻”之处，其所以借用这个名字，只是借用个字面，应解作“再三重复”——因为“重复集”太不像个书名，才借用了这个较雅的“三复”。

重复得最多的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学生为多）对“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问题”的看法，和基于那种看法所产生的学习创作的动机。一个共产主义者要把消灭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作为任务，而受过旧思想感染的青年知识分子则是想利用这种差别找一点个人便宜。我们的社会需要大量的包括作家在内的脑力劳动者，但是不应该允许把利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来找个人便宜作为目的。当我每次接触到抱有这样目的的来访者或来信，我就得重复谈一遍我的意见，见之于文字而收到这本集子里来的只是一部分。

随着一九五八年以来生产上的大跃进，真正的群众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作品和作者之多使人无法统计。这些作者，绝大多数都不是为追逐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歌颂生产上的胜利、鼓舞自己的同伴而写作的，其作品的新鲜、充实，不止是轻视体力劳动专想在写作上找个人出路的人写不出来，就连我们这些号称专业写作者的人也往往相形见绌。这种到处摆在眼前的事实，已经使学习写作的动机不太正确的青年人们受到了教育、改变了自己的打算。可惜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所

得到的物质、文化生活上的差别尚未根本消灭以前，那种思想还不能完全消灭，所以我有时候仍然会接到和以前的来信和作一些重复的回答。不过这种情况也正在改变着——以后会逐渐由于生产上的四化、生产技术的革新和革命、劳动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文化的普及、稿费制度的改革、城乡人民经济生活的集体化等关系，使脑力劳动者（包括作家在内）和体力劳动者在劳动强度上和物质、文化生活上的差别缩小到无足轻重的程度。到那时候，就很少再会有人耽搁着学业或应付着职业找机会去利用上述那种差别了。到那时候，我不但不会再重复去说这一种内容的话，而且已经说过的也会完全消失其作用。

再一个重复较多的内容则是写作过程中一些片断经验。我是个半路出家、写的东西又不多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写作经验，因此下定决心不谈。可是这种决心很难坚持：每当有人约我谈经验的时候，我总以为经验不足，谈起来像摆架子，可是有些人反以为我的不谈是摆架子。后来我觉着双方都有道理——本来不多，故示丰富是摆架子；虽然不多，连少的也不乐意谈，难道不像摆架子吗？想不使人怀疑自己是摆架子，最好是有甚说甚，说完拉倒。自从改用了这个主意之后，每到一个新地方去，有人要求，有工夫就谈一点，不过往往采用座谈会的形式，以话引话，提起什么来有经验就谈，没有就直接说没有。既然谈的是经验，每次想不重复都不行，不过又不会完全重复，因为以话引话，引出来的重点不同。

文学形式、语言的民族化、群众化，在这本小册子里也是个重复过多次的内容。不过在这方面我没有作过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只是说明我自己在写一个作品之前，总要先注意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讲的读者对象问题，问一问这东西写

给谁读，如何能使读者更多。其所以也有重复的原因，第一是约我写文章或讲话的地方出了同样的题目，第二是附带在其他谈写作的文章中谈的。这问题在绝大多数作家都已经注意了的情况下，在文化迅速普及着的情况下，在群众创作已经开始繁荣起来的情况下是会迅速得到解决的。

不重复的只有前边那几篇小杂感，因为篇幅过少，虽然性质不同，也只好捎带在这本小册子里。

全部内容大体如上。要我自己给它加个评语，我以为用“老生常谈”这个成语十分合适——自己既是“老生”，文章又是“常谈”，其稍可自慰者是我所主张做的事与我做的还大致统一，而且往往是做过才说的。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对上党戏曲的继承传统与整理

改编的看法*

今天在这里谈一谈在上党戏曲的继承传统与整理改编方面自己的一些看法，不一定正确，提出来与同志们研究。

我们上党戏曲的改革工作，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有些问题已经提到过好多次。近来中央和各级领导，都总结了十多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今天我谈的，就是听了一些报告，结合晋东南区戏曲工作的情况和自己的感觉。

现在，首先谈一谈现状，也就是说谈谈我们上党戏曲工作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就是剧团多，演的戏少；上演外来节目多，上演本剧种传统节目少。

过去的老艺人，出演的节目多，而且有好多人都能“抱本”。就是到现在，如请上二十多个老艺人，再配上些老音乐家，只要白天念一念，晚上就能上台演出。展览演出二十来天，也可以不重一出。青年演员就不行了。如果调来五十个青年演员，恐怕连十个、八个也不容易凑起来。这说明我们现在的剧团，“戏路”越演越“窄”了。本地传统节目上演的少，外来的节目演的虽多，也是一个剧团演一个样，而且演一个丢一个，二年不演就都忘完了，也没有保留住。这样就形成了“走

* 这是赵树理同志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晋东南专区戏曲编导会议上的讲话。

马灯式”，一个赶一个。把人也累坏了，也搞不出好节目来。

为什么能形成这种现象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两个：

第一、我们传统剧目的水平高低不齐；

第二、片面地理解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

提起传统剧目的水平来，确实是有高有低，良莠不齐的。象上党二黄就比较好一些（上党二黄据传说是由汉黄移植而来，在古来也算是外来节目，可是在上党地区年代很长，早已经“上党化”了）。传统剧本的来路，一般说来有三个：照古代剧本改写的，照古代小说改写的和古代的剧作家创编的。象《昊天塔》、《天波楼》、《夺秋魁》、《湘江会》等，就是根据古代剧本改写来的；有关《三国》、《水浒》、《封神榜》的一些剧目，是根据古代小说改的。古代的剧本和小说，质量也各不相同。根据质量高的剧本、小说改的节目（象“三国戏”）质量就高些；根据质量低的剧本、小说改的剧目，质量就低一些。象《说岳全传》水平就差一些。写“岳家戏”的水平，比《说岳》还要差一些。根据古代戏曲、小说改写剧本，也要适合本剧种特点才行。上党戏不适合于表现爱情戏，所以《西厢记》质量虽然很高，全国各剧种都有移植的，上党传统戏就没有。根据古戏曲、小说改写剧本，同样需要有创造，一出戏有一出戏的特点才行。象《甘泉宫》的秦始皇和《黄鹤楼》的周瑜，虽然都是武小生，但两个角色的风格就大不相同。一样的大板长皮，唱出来就各有特色。

创编剧本也要符合历史真实，不能任凭作者心意，想写成什么就写成什么。有些作者原来的意图可能是好的，但因为对历史知识毫无所知或者知的很少，就会闹出笑话。比如上党梆

子《仙云盞》的作者，本意是写反恶霸，意图倒不坏，可是你把剧情略一推敲，就会发现很多情节很不合理。从调戏民女、混抢民女来说，要是《清风寨》里的山大王，《徐公案》中的宦家公子就象，要是作为维护封建法权的代表人物的当朝丞相来为自己的儿子抢亲，就不象了。真要他这样做，当时的皇帝、丞相就不好当了。何况还公然下令派总兵带上人马去抢呢？丞相能办坏事，象闹宗派、害忠良等，就合理；派总兵带上兵马为自己孩子抢亲，就不合理。知县能办好事，可是让他与被害者联合起来，反击丞相，杀死总兵，就不够合理。好象这位作者就不知道丞相是什么职位一样。又如在《洞房归山》中的苏金蝉，从自己的口里说出自己为了投唐，如何如何杀死许多本国兵将，也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再如“岳家戏”的连台本（《复金陵》、《失金陵》等就稍好些）里，写牛皋在御史府杀死张匡以后，为了迷惑知县，带上人头走了。还能说过去；可是，怎么能带上走几千里呢？又怎么能在急急促促窃取皇杠时，再把人头放进、贴好封皮呢？本来省里解来粮银，皇帝只要责令户部仔细查收就行，为什么要在金殿上开杠呢？作者为了故事离奇，为了把几个故事连串起来，就设计了这么个情节，也不管合理不合理。稍稍推敲推敲，就会发现漏洞太多。

在传统剧目中，除一部份好的以外，在一般水平不高的剧目里，也包含着许多精华部份。象《送印杀差》、《打午门》就都是大本戏里抽出的精华。《观花宿庵》写李伯祥胆小，怕受了朋友的累，罗成唱的几句也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可是罗成出来时“盘路”的一段表演，确实不简单。屯留剧团演的《杨八姐救兄》里，杨八姐的几个架子就是从这里继承来的，很美。要是把罗成这两下子丢开，就不成上党风格了。

剧目少的第二个原因，是片面的理解政治与艺术的关系。

过去，我们有些同志对旧遗产，有一种“扫荡主义”。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在抗战中的一个时期，我和有些同志都认为那些旧文化都是封建的东西，是地主的，不是工人农民的。所以，在解放辽县（现在左权县）时，在一个地主家发现了一套《四库备要》，我们就翻过来做了笔记本。最近，文化部门一个领导同志谈过，我们革命胜利了才十来年，要是个人来，才不过戴上红领巾。不要以前的，就衔接不住。比如这些住的房子，要是认为它也是封建的，要拆掉重修，我们能站到街上去等着盖新房吗？在这种风气下，有许多同志把剧团变成了化妆宣传队。各编各的，各演各的，互不交流，晋城编晋城的劳模事迹，戏再好阳城也不演，阳城只演阳城的劳模。同时，还硬要古代人接受现代人的任务。土改时，李自成、黄巢起义的剧目满天飞，其他戏被禁演或变相禁演的很多，认为好多戏都“没有积极作用”。进了北京以后，中央文化部戏改局马彦祥局长主持的一次剧改会议上，讨论了五十五出禁演戏，讨论不下来。还有，有些同志硬要《焚绵山》里的介之推负担造林、开荒的任务，让《卧薪尝胆》里的越王勾践负担宣传养猪和劳武结合的任务。可是该给《清河桥》、《东门会》、《甘泉宫》安上什么任务呢？还有人批评《杨门女将》里的人“没有群众观点”，好象只有让杨文广戴上红领巾，让穆桂英入了团，让佘太君成为党的老干部才行。这样，“任务”给的越多，戏路就越来越窄了。其实，传统戏可以戴上的帽子很多，真是“磨道里寻驴蹄”啥时也现成。毛主席告诉我们，艺术要配合一定时期的革命任务，但不能配合一定时期的具体工作。是的，要是为了配合发展牲畜，弄上满舞台毛猪，那算什么戏呢？梅兰

芳同志去劳军，不唱《木兰从军》，而唱《贵妃醉酒》。要是到太行山上来，就可能通不过去。有些事在全国许多地方行得通，来太行山就行不通，真是件怪事。

如何正确地理解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呢？强调艺术不要政治是错误的，一定要把文艺工作当作整个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来看待。但是，搞艺术工作，在政治方面，只要明确自己的服务对象，服务目的就可以；解决具体的问题，还是要靠业务。政治要挂帅，但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的需要都不相同，不能要艺术事事都去配合。比如，我们机关需要一个理发员，在政治方面要忠实可靠，没有问题才行；但业务方面必须会理发。只政治可靠而不会理发是不行的。再如汽车司机，除了政治条件以外，还必须会开汽车。政治上可靠而不会开车，汽车不会自己跑起来的。要是业务上不精通，就是开动了，也会跳崖撞沟，闯出事故。我们要求政治上严，艺术上宽，不是只管政治，不管艺术，是说艺术上应该放手一点。要知道，艺术工作的思想性是在艺术本身内部包含着的。不能另外去加，硬加上去也是不沾不靠另外一回事。我们看戏，戏里的张飞、赵云、黄忠等人，都没有喊一句口号，可是我们被感染了。《定军山》里黄忠的形象，是没有口号的形象，我们能被感染。几年来，我们编过许多新戏，其中好多是没有形象的口号，虽然喊了一通，可是过后，人们就都忘记了。

我们中央一个领导同志曾说过，艺术的形成也和理论的形成一样，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把实现的东西化成艺术。没有“艺术化”的过程是不行的。如果要求过急，就会出现两个毛病：不是以古代今，把封建的原封不动搬过来；就是割断历史，自我做起。正确的对待方法，只有在历史的基础上，有批

判地进行接受古代文化，加以补充，加以发展。不要古人的是不行的。通过艺术形象来感染人，人才能忘不了它。

以下我谈谈戏曲的编改工作和戏曲编写人员的业务修养问题。

我们提倡“百花齐放”。所谓“百花齐放”，就得有人“赏花”，就得在“百花”中认识它的精华才行。作为编剧人员，一定要多读人家的本子，才能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看的少了，容易形成个框框，来回乱套。不合框框的就要批评，这是最有害的。我们说理论重要，就是因为理论是现实事物的总结，有了丰富经验，才能得出正确的理论。这里举两个例子：比如研究植物学，一定要观察、分析许许多多种植物才行。不去分析、观察，只坐在家里“研究”是不行的。再举一个小故事：过去有一个老秀才骑着毛驴进城。给他赶驴的是一个老农。路上看见地里一片豆子长得十分茁壮。老农说：“这黑豆长得不错呀！”那老秀才不相信，他说：“你怎么知道是黑豆？”等他下了毛驴，剥开豆荚一看，才大为惊异，说老农“你真可以，你会‘隔皮断货’！”其实，那老农的经验也是分析、研究了许多种豆子，才得出正确的辨别能力的。

对待别人的作品，要先欣赏人家的长处，不要先批评。多欣赏几个，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准确些。为什么有好多戏，象《借箭》、《祭东风》、《摘星楼》、《女娲宫》等等，在北京，在全国许多地方能演，在太行山就不行了呢？难道说北京的政治理论水平比太行山地区还低吗？为什么太行山禁演或变相禁演的戏多呢？其实，上面提到的几个戏，如果给它戴帽子是很容易的。可是象在贯彻婚姻法时，我们编过好多争取婚姻自由的新戏，都经不起舞台的考验，被淘汰了。《白蛇传》、《梁祝婚

姬》却永久不能被人忘记。（虽然法海是代表天神的，白蛇是个妖精，最后也还皈依佛法。但人们总是同情白蛇，而不同情法海。）这说明个什么问题呢？这就说明了优秀的戏剧节目是如何同样的感人至深了。

五一、二年我从北京回来，王聪文告诉我“三年学个莽大夫，十年学个不敢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编戏，改戏方面，可以说是“三年学个莽大夫，十年学个细大夫。”剧团没有编剧人员，文化部门从学校或者其他地方调来一个，作为培养对象，指引他读剧本、看戏、参观学习，是完全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能今天才调来，就限定三天、五天写出剧本来，比如有了汽车没有司机，让一个人慢慢学习，学会了再来开才行。如果调来一个生手，就让他去开汽车，一定会闹出乱子。学习编剧，一定要多读剧本，多看戏。只学理论，不读作品，很容易产生框框。理论本来就是实际的总结。看十出戏，艺术风格各有不同，你就可以得到十种风格的知识。如果只看了三出，那么其余的七出的风格自己就无从知道。咱们过去有一本书，叫《曲海总目提要》收集了六、七百种古代戏曲的剧情大概。所谓“曲海”，就是说是戏曲的大海。我们一定要知道戏曲是“海”才行。已故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辑印了四集《古本戏曲丛刊》，收集了近千本古代戏曲，这都可以说明我们过去的遗产是如何丰富。这里面有多少精华需要我们去继承。对遗产，我们是既要继承，又要发展。目前是我们继承的还很不够。要知道，不继承而想批判的去接受，是会落个既没批判的，也没接受的。

对传统节目的恢复上演问题，有人主张“先验证、后放行”。就是说要先“审查”一遍，再决定是否上演。但我本人

主张，“先放行、后验证”。就是先放出来，再去验证。叫谁“验证”呢？应该交给社会上的人去办，而不要几个人包办。其实，在恢复上演传统节目的时候，不论哪个剧团，都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观众的要求，排起队来分批进行。这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当然，在恢复上演时，原来表演中的一些不妥当的词句、表演、场道，也可以稍加修饰或增删，需要大加工的可以稍推后一些。这样多演几出戏，让青年们看看，不会有什么害处。就是有些戏没什么内容，甚至还有点毛病，但其中有些部份很有参考价值，也值得我们演一演，学习学习。

有些传统节目需要作较大的修改。当我们去进行修改的时候，必须作为创作来看待，态度一定要严肃。为什么要改呢？就是因为这个作品从你说来又爱它，又有些不够满意。所以，首先要看得出人家原作的长处，要先欣赏后批评，不要先批评后欣赏。一定要它值得改再去改。象田汉同志改写《白蛇传》前后，就酝酿了十来多年，解放后才拿出来。晋城剧团搞的《抗金点元》，是一种抽筋的修改方法，扔去了消极的东西，但词句中有些推敲的还不够。象唱词“杀死了庶民家……”的句子，就没有原来“依你说王该活百姓无命，宋王爷也不能倚势欺人”有力。

态度端正了，就要收集材料。首先要熟悉原来的本子。最好多演几场看一看。《抗金点元》改的许多地方很得劲。就是因为修改者对旧本子熟悉，是个“通家”，知道原来本子的精华所在。其次要收集古代的本子和有关资料，从中看窍门，看长处。比如象改“岳家戏”，除了看戏外，还得再看看元曲的《精忠传》、《夺秋魁》等，看看小说《说岳全传》，看看《宋史》的《岳飞传》（当然看了正史，并不是要你以正史来代替戏曲

故事的)。把所有资料里的好的部份，能吸收的就吸收进去。象“岳家戏”连台本的作者，水平就比《说岳全传》的作者低一些。《说岳全传》里有些情节（象牛皋这个人物和他在相国寺听书、小校场夺状元的情节就都很富有戏剧性），都可以作为修改的参考。所以改“岳家戏”，有些地方不妨就按“说岳”的情节扭过去。当然，修改后不合适还可以返回来。

收集起参考资料，多看看，看稳了再去下手。因为你要看不准，改过来改过去，叫演员跟着你受罪。当然，你看稳了再动手，也不会保证不返工，不过可以尽可能少返些工。有时候，你认不得精华，也会丢下了好的，留下了不应该留的。象《抗金点元》中的“岳母刺字”就可以不要。当时舞台气氛也不够协调，为了刺字，就得把几个小弟兄先赶下去，刺过字再让他们上来，如果不刺字，不下场就行。又如岳母的一段《中四六》唱腔，虽然好听，可是戏吃不住它来拖。所以我认为保留原来的四句唱腔和原来的音乐风度，就可以。原来的四句唱腔，头两句可以不换，只要换一换后两句。保留施全的几句戏，因为他是个丑角，既然上场，就该有点戏，但和这个戏沾不住，就不要要它。

改戏有好几种方法。连台本抽筋是一个办法。《抗金点元》、《兰英进京》都是用这个办法。可是这不是唯一的办法。三国戏质量高，尽是“筋”，就无法去抽。杨家将戏有些质量虽少差一些，但前后延续七、八十年，也不容易组到一块，所以办法还是要多想一些。

有一些人用“突破论”的“理论”来指导改戏，本本都要突破一下，这也是不正确的。越是好戏，越不应该“突破”的多了。

“突破”一定是不得已的。不能为长而长，为“突破”而突

破。《三关排宴》改的就显多了一些，留的少了。我还想把改的再删去一些。四月份改的本子，第一场是《八王传旨》，如今又写了一个《纳贡》，两场全保留也行。但有一场能说明问题，就不要浪费两场的时间。结束时，四郎在三关自刎。有人主张到金殿去死，保留下两个场。让他在三关不死，回到金殿再死也行。这样，一场接旨，二场纳贡，三场坐宫，四场赴会，五场排宴，六场三关，七场金殿，五个钟头也演不完。所以前头只用“纳贡”，后头不用“金殿”，就形成了现在的面貌。其实《小坐宫》也可以不要，因为改成后时间长了，在观众中立了案，暂时还保留着。总之不论小说，不论戏曲，都要尽可能短些，不要随随便便不负责任地多浪费观众的时间。

改戏不论改成什么样，都应该保留原本。让旧本和新本并存、甚至可以一起演出，请观众检验。直到经过考验，确实证明新本比旧本好。群众欢迎新的，旧本自然就被淘汰下去，郑振铎先生保存资料就好，《古本戏曲丛刊》就是影印，完全保留着原来的面目，让人家可以校对、评比，有了老本，迟早都可以参考。有时，自己的水平提高了，感到修改的不好，还可以返回老路上去。

做编改戏曲工作，不要贪多，象中国京剧院，在编导和演员、音乐方面，都拥有好多专家，他们一年也不过改一半本好戏。成熟的编导，一年能改好一出戏，就是了不得的成绩，因为戏曲是艺术工作，需要花费巨大的劳动才行。在工地是绳担箩头，到舞台上还是绳担箩头，就没有人看。穿上八卦衣说：

“本帅朱德是也”，穿上制服去喊“众将官、稍息”，在四九年还能胡演几天，现在就不行了。搞这个工作着不得急，急了就会形成“扫荡主义”了。要当作艺术作品去创作，每个剧团一

年能落住一个戏，十年就是十出。我们全区三十多个剧团就是三百多出。这还不是个了不得的成绩吗？没有三百个就有一百个也不错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搞好戏，不要怕误时间，所谓“宁要少些，但要好些”，就是这个意思。

以上所谈的只是个人的一些感觉，如有错误，还希望大家批评。

挤三十*

——农村旧话之一

我的故乡，有一种简单的数字游戏，名曰“挤三十”。其法是两个人接替着数一个月的日数，每人每次只许说一个或两个，不许说两个以上——例如甲说“初一初二”，乙可以接着说“初三”或“初三初四”——轮到谁该说“三十”谁便算输了。这种游戏极容易找到规律，本身没有多大意义，而有意义的倒是这个名称的来源。旧历的末一个月叫腊月，是各行各业结账的时期，在农村是贫农、下中农受逼的时期——在月初就开始，越来越紧张，挤到月终，押地的、卖地的、破产的、逃亡的……一年总要有一大批，俗名“挤三十”（“三十”不过是月终的混称，遇上小建，只有二十九日）。

农民们欠的外债，分有利贷款和铺账两种。有利贷款是遇了急事向高利贷主贷的。

贷款的时候要出具借约，借约上写明本钱、利率、结算时期、抵押品（不动产）。在我们家乡解放以前，放这种债的人，除地主、富农外，还有小商业资本家。利率一般是每年30%（即一百元每年出三十元利息），或每月3%；结算期一般是自立借约之日起，每年结算一次，至还本为止；借约上写的抵押品一般都是耕地——并不立即交出，但债户如在结算时

* 本篇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人民日报》。

期付不了利息，债主便将抵押的土地经管起来。这种贷款，在现在看来，利率高得惊人，可是在当时的农村还算是比较正常甚而比较便宜的。比较恶劣的放债办法种类繁多，兹略举数种以见一斑：一、内扣利：即预先把利息扣除，写成无利借约，到期归还。例如你借七元现款，要写成十元无利借约，一年还清，再借仍是七当十。二、八当十有利借款。例如借八元现钱写十元有利借约，利率还是每月百分之三，一年后本利全归，再借仍是八当十。三、“吃拔”。吃拔是挨打的意思，就是借约上写钱数而给你的不是现款而是高价商品。例如地主或小商业资本家开有土缫丝厂，你找他贷款，他说他只有蚕丝，以丝代钱，每斤八元，而实际上丝的市价是五元，每斤要赔三元，借约上自然写的还是钱。这三种办法，都超出寻常每年三分或每月三厘，更恶劣的还会把结算时期缩短为半年或三个月一次。这些贷款的结算时期，不一定都在年终，但不论原来在什么时候，赶来赶去，往往都赶到了年终。

当铺也应该说是一种高利贷，不过利率比较低，时期也比较长。向当铺贷款，是以动产的实物作抵押的——贷款人先交抵押品，当铺给他应贷的本金（约为实物三分之一的价钱）和还钱赎物的票据，名曰“当当”；利率是每月百分之二点五，三年为期，许早赎不许晚赎，过期便将抵押品没收变卖，名曰“死号”。“当当”的本来也不一定都在腊月只是腊月天当铺的生意特别兴隆——当的也多，赎的也多。当的多自然是因为腊月钱紧，穷人们要用钱；赎多的原因有二：一是有个封建老例，腊月赎当只按每月百分之二算利息，名义上是照顾穷人，实际上是让点便宜以增加现金的周转量，便于更多地吸收新当号；二是穷人们当入的东西，大部分是自己的或借人的衣物、

首饰，在过年时候要用，过了年仍然可以抵当进去。

铺账是商店里赊销给农民的日用货物价款。这种赊销，也带有点高利贷性质：农村集镇上的小商店，常以农民为主顾，而农民手头常缺现钱，因此就不得不赊销。赊销自然会影响现款周转的速度，但是却影响不了利润，因为这些商人们早把这种可能影响的部分加入赊出去的货价中了。这种赊销的付价时期有三个——收夏、收秋付一部分，年终付清。

开设这种商店的资本家往往是由高利贷主转来的，因而这种商店里也往往兼放高利贷，以便把年终收不齐的货款、转作贷款放给欠钱户；本金稍大一点的，还把夏秋两季收来的抵还货价的粮食，利用季节差价作价出放。

在农民中，铺账是各阶层都有的，而且是阶层越高欠的贷款也越多；贷款的是贫农最多、下中农次之，一般中农也很难免有一点；佃农和雇农，因为没有土地，很不容易贷到款，俗话叫做“舍着屁股也挨不出打来”。

每年一到腊月，商店的伙计、高利贷主的小管事就普遍在农村各住户中走动起来——在开始时候，因为户数多、来的人少，在每一个具体农户中，还显不出很浓的逼人气氛；半月之后，富农、富裕中农、一般中农的铺账已还清；中农（包括开始下降的中农在内）借债也付过息，讨账的人们便逐渐集中到贫农、下中农的家里来，往往形成座上客常满，人情赔不完，情愿去找门路，也得起早就离开家，否则被这些人包围起来，白磨了时间也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弄得越挤越紧。

还债的门路都有些什么呢？

一、卖粮。农民的主要收入是粮食，还债自然也以粮食为主。农民各个阶层中，除了雇农无粮可卖外，差不多到了腊

月，都要或多或少卖点粮食。俗话说：“腊月小秋天”。腊月里，上市的粮食多了，粮价便要大落一下。

千万不要以为大家都卖的是余粮，在旧社会农民的粮食是先尽卖的，越是贫农越得卖，往往会把粮食卖得剩不到一个月的口粮。贫农可以作为抵押的土地本来就不多，欠的债（有利的）又往往比别人多，所以一到腊月便找不到借债门路（债主们怕放空了讨不了），最后把仅有的口粮卖得连来年正月都吃不到底，就得以未来的谷物作抵向囤粮户（往往也是高利贷主兼小商店资本家）借粮。这种借贷的条件苛得很：往往是春借秋还，各按时价折合，再按每月百分之三算利息。旧社会的粮食季节差价差得很远，平常年景，春天的粮价约等于秋收后的二倍，各按时价折合，春借一斗，秋天就得以二斗多来归还。你要让囤粮户自己说，他说他是很公平的。他说：“我要是春天把存粮卖了，每斗所得之价，到秋后也要买到二斗。”可惜贫农在这种“公平”条件下，二斗粮也抵不住一斗吃了。

二、东拆西补（即举新债还旧欠）。走这种门路的往往是开始下降的中农。这种户爱装门面，生怕别人以为他穷。他偶尔因为某种原因而贷不了款，到期付不出利息，又不想让原债主知道内情，就到另一个放债户家里贷款来支付原债主。

三、贯利。顾不住虚为门面的，就不再怕人说自己没钱，到了付不出利息的时候，要求债主将本年应得之利并入本金，重换借约。例如借了一百元，利率每月百分之三，到一年头上付不出利，就求债主给他换成一张一百三十六元本金的新借约，仍按原利率行息。走这种门路有个条件——写在新约上准备作抵的土地价格，定得超过本金和下年的利息，否则债主不会答应。

快要死的当号，也可增加抵押物贯利换票。

四、积零为整。好多债主中有愿意出放贷款的，就从中总贷一笔以还各户（其中包括铺账）。

五、铺账变贷款。把原欠数作为贷款的本金，换成借约，清了铺账。

六、交地。将借约上写明作抵的土地交给债主经管（至少须交出一年），俟下年或更下年有款付息时再抽回。

七、卖地。如欠好几家有利贷款，每块地都交出，自己就无地可种，因此每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卖死一块以抢救其他各块（自然卖地的原因非只此一种）。

八、破产。产不敷债，各债主按债权金额比例分尽该户之产（旧法律有“破产法”）。

以上各种门路，并非想找就能找到的。“舍着屁股挨不出打来”，不止雇、佃农为然，有时连中农也会碰到同等情况，穷人们往往把腊月后半月全部工夫都用在找门路上，找到了才能叫做“过了劫”。

逃债不过是暂时逃出讨债者的包围，积极去找门路。债是不能逃的——贷款有土地抵押，铺账逃过了下年便不能除购，而且终于也不得不还。

我是被债务挤过十几年的，经我手写给债主的借约（有自己的，也有代人写的），在当时，每年平均总有百余张，其中滋味，有非今日青年所能理会者。

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 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会上发言）

我知道的农村情况说一说。

“五风”的引起有种种原因。恐怕还是工业资金积累过多了一些。浮夸风从五三年开始，那年我和康濯到一个老民兵英雄那里去，余粮要卖五万斤，卖过了还要挖潜，他答应三万，还说保守。结果他想，你们能完成，我也完成。就开动员大会。但做法不实事求是，后来只完成了一万多，大家完不成就算了。五四、五五年我去晋东南，吃的粮食少了，吃油一年更只有一斤油料一斤芝麻，小煤窑都集中在大队上。这说明第一次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就已经出来了。农民自己的麻、粮、棉、油感到不足了。但当时市场还不觉得不足。到了五六年，市场上也觉不足了。农民觉得有了钱买不到东西。过去没有统购，他也要卖粮，因为要钱用。轻工业品不够时，他就觉得卖粮是单方面的任务了，因为拿到钱买不到东西，使人觉得征、购都是征。农民的积极性本是从工农交换上得利产生的。收购多，物资少，这是个问题。农民把大量农产品卖给城市，城市一定要供应大量的日用物资，要钱才有意思。旧社会农村问题解决不了，一是靠死人，死活不管；二是靠生活的鞭子，高利

贷等等。地主搞了粮则到城市换高级用品。一般中农户还要装个门面，要穿个直贡呢袍马褂，女的要穿个绸裤子，戴个首饰，要买点城市的物资。过年放个鞭炮，挂个桌裙，挂点字画。农民要花钱，就要卖粮。农民不够吃，他也要卖掉，因为别人贴字画，他也得贴，鞭炮也要放等等，想把生活过得象个样子。

统购以后，对子愈贴愈窄，以后三个门贴一副对子。连窗纸也糊不上，只好补补，只过眼前了。他们说是劳改队，日子愈过愈困难。过年连火柴也买不上。一个县城，十味药，十有八成买不到，当归也买不到。这是五八年以后，愈来愈少，少得不象话。分了钱，只能买包花椒面。人把日子过成这样，就没有情绪生产。我们那里浇麦子，一亩田浇一车水，结果没有浇，说没有骡子，骡子是给矿上运煤，一天六十元；麦子浇成了，我不一定吃上。快收割，核产量，就留一二十斤，他就不愿搞了。六十条里的一条，包了产就动员起了很大的积极性。

去年，我那里大队粮产十二万斤，棉花二万斤。五八年粮才十一万斤，棉花一万多斤。去年年成比往年强，吃粮五八年三百八十斤，六一年三百斤，农民就没兴趣了，说增了产也吃不上。

钱，农民也是要的，还是要买些东西。六〇年过年，是二两红糖，四两海带，几个门窗分几张纸，一户半斤煤油，两包火柴，有的农民因为半斤煤油闹分家。所以也要点钱买买东西。农民是觉得所有生产资料入了社，没钱就向社要。说你账上没钱了，他不管。过去中农户有时能省也省一点，现在不了，也不省，该用就用，没有就借，变成超支户，几年也还不清。劳力少的，本来要省点，现在他就不了。别人买什么，他也买什么，有时超过一二百块钱。劳力少的过共产主义生活，没有就

跟国家要，劳力多的过的是社会主义生活。

我们说话舌头软。麦子快成熟了，公社去核产，核算了，到收秋后，还不叫分配，还要到社里批再分，结果大量瞒产。我那个大队，可收四万五千斤，他们报了三万六千斤。我说你们不向上级说实话。支书说别的村一个报九十斤，一个报九十五斤，说老实话吃十来斤，不说实话吃四十斤，只隔二里地，村里就要骂他。减产的地方都是吃丰产的。我曾和公社说，不核行不行，遭灾，有虫害，冰雹，二成以上灾，该减多少减多少。社里说县里要核，县里说专区要核，这样不核就不行了。

所以，在下面做工作，对农民说保证不加任务，有时又做不到。

过去和队长心里话都说，现在也是瞒着。我要看账，他又说锁着了。五二、五三年时，对集体与个人，基本上靠集体过日子。以后不同了，觉得集体长好了不一定是他的，只有自留地是他的，不管产量，不计征购，他先搞自留。六十条下去，积极性起来了些，但还不全信。

近几年，对“五风”顶得住的干部，群众真看到实效的，对集体还是关心的。比如有个村搞了林场，办了学校，搞了抽水机，买了骡子、大车，群众看见的还是关心的。有的大车出去五天没回来，群众也都打听的。干部好，顶风也是自然的。如果他是勤勤恳恳建设社会主义，他总是要顶的。软顶硬顶，能顶多少顶多少。有的想出风头，就放什么卫星。

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有一个书记说，凡是能走路的都要上火炉。这太过火了。

因为要收豆子，有个地方把锅子搬到工地上去，不去也不行，孩子回来没饭吃就哭了。这些干部是怎么想的呢？孩子也

不管了。刮五风，有些是顶不住，顶多少也好。这些不顶的干部也助长了政策上的毛病。

物资保证没有，只凭思想教育是不行的。辛辛苦苦一年，过年过不成，那是说不过去的。你真是实实在在地搞，有东西在那里，他看得见，他挨点饿也甘心，否则他就没意思。最缺的是穿，吃的东西马马虎虎过得去，穿有时过不去。土布现在农民又织起来了，不织过不去。

物资保证要靠政策；一个是包任务包定额，一个是轻工业供应农村。

教育问题首先是支部。农村是不产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带领的还是靠共产党。现在支书当成大队长用，管党的工作太少，组织生活不健全；有的党员甚至退到落后农民那里去了。

有的地方干部不好，有人称他是县里的收购干部，要花生、要蜂蜜，不给，他人小权大，他找麻烦，这样就不好办。有的一个大队就送了一千五百斤花生。

一个大队两个书记也真顾不上管。如果有五、六个人能当队长就行了，可以检查监督。有的队长当上五年不换，别人也不懂，当不了，就没办法。一个医生也拿架子，打一针三个劳动日。皮下一针三个劳动日，太容易了。支书说再培养一个，结果还是这样，他说多少算多少。队长有几个人换，支书有几个人换，就会好一些。

不论大队，小队杜绝超支是件大事，这是政策问题。超支，家在农村的干部超支很多，一个小干部寄回家十来元，开粮款也够了。你要特殊，洗脸要用香皂，要穿毛衣，把钱花了，吃饭就超支。军烈属是照顾的，工教干属是不该照顾的，

但这些人超支是不少的。农村不能负担教员，只能特殊照顾。一个小队城市有几户五属就成问题的。

现在这种统购，只和集体联系，不和个人见面，所以感不到卖粮的需要。要钱只和大队要，过去是要花钱就卖粮。现在不够吃就怨大队卖得多了。可是不想自己花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总要解决一下，要让农民知道卖粮不是单方面的任务。

小队干部如果不具备力量，像通县还有个地方，那里生产硝，牌价是六分，黑市是一角二分。两个队长从群众中收来，晚上拉去卖，一天平均可得十元。主要干部推了小车卖硝，也不好经营计划，那个队就说不上什么样了。小队一个干部没有，是不行的。能不能派一个人移户借将？农村和工厂不一样，厂长撤了查办，工人工资照发，农民就没有人赔他。所以派人不能是薪金制，要他自己也是在那里参加分配的，搞不好他也有份，这样，他就会更加关心生产。

集体经营管理都走上常规，国家、集体、个人统一起来，矛盾只是个别项目，个别人，国家与集体的矛盾不是很大的，有的只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领导好的队，就一致性大，问题比较少，矛盾小。

人和人的关系，户是生产队的核心单位，分配是按户论的。生产上是队和大队；生活上，经济核算单位是户。

青年是两面拉：落后势力与党团力量拉。他们去开会搞了半夜，他父亲就会说，别人不开会，刨了二亩地。

有的封建性。一个老头四个儿子，有的是先分后算账，分完了，一个孩子负担我多少。有的是，干了，向我交账。这是封建性的。媳妇就不愿意。我一个月挣了三十元，要一元挺难，她就闹意见。她就找种种原因，搞得过不下去。

妇女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婆婆把媳妇看成外人，打官腔；一种是说姑娘是外人，媳妇是自家人。靠媳妇的，姑娘来了只当客人。有的是娘家婆家都是外人或者都是自己人。

男孩有的与媳妇站在一起，有的跟父亲母亲走。

我是倾向于分家的。分得太小也有些毛病，做饭占劳力。但牵扯太大，统制太多，还不如分了，积极性更大一些。

农民入了社，本来俊妇女婚姻美满嫁了个好丈夫，可是一瞎指挥，这个丈夫又变成了旧社会从没见过面的生人丑汉，只得好赖过下去。

（八月五日会上发言）

康濯同志昨天提的主流问题，主要问题我的看法是：现在是不是我们建设的低潮？低潮是过去了，五风的十二级台风是过去了，只剩点风尾巴。粮食问题和物资问题，中央对这件事情是准备花大力解决的。现在粮食一般有三百斤。主流，这几年不管怎么过，有的抖起精神过了，有的哭哭啼啼过了，好也罢，坏也罢，有问题过得去的是多数。过不去的局部地区只好单干了，但在全国说不是主流。韧性的英雄，如老坚决、实干家，不是太少数。抗风是各种形式的，因为这些人他没有脱离群众。五八年后，我那个大队增加了两驾大车，开一座油坊，养了蜂，建设一所小学校，这都落下了。外债是借了些，但是抵得住的。产量除六〇年少数减产，没减产的是大部分，对集体基本上是依靠的。自留地增了一定的产，比集体地种得好一点，因为自留地收的完全是自己的。但集体的地并没有耽误了多少。粮食物资好转后情况会变好。这种人物并不是不可以写的。抗风也有调皮捣乱很巧妙的方式。有的还跟县委调皮。但有好

多事不好写、不能写。在狂风大浪中闯出了种种生活门路的还是可以写。对模范县是好“帮助”之风还没有完全过去。模范不能学习，就是因为某些领导的“帮助”坏了。从五五年后我是有这经验，不写模范了，因为模范都是布置叫我们看的。咱们下去生活最好不要看模范、写模范村。领导生产现在有一个假象，瞒产是层层往上堵。在过去是往往夸，但谁夸得多谁的负担重。现在，接受了教训，又走到另一面去了。五二年我们山西出现过“一年早知道”，一年预算生产计划和分红，这个恐怕不准确。五五年北京的《政治学习》小刊物，我还写了个《进了高级社日子怎么过》，他们认为我的文章不够水平，转到《河北日报》登了一下。到了五八年在《山西日报》有人把它提高了一下，搞了个“一年早知道”，这种精神——通过群众逐块下田细查——是可以写的。这是扎扎实实的民主精神。但现在去搞这不行。他有小瞒产，怕你摸底。不过这比浮夸好。分配中有好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写，但他用种种方法不叫你看。主流层有好多文章可做。主要问题办内部文艺刊物不好办。可是有些事情还是只能拿整五风的办法解决。如十二条、六十条政策等。但这些问题，如文艺好反映就反映，不好反映就算了。很微妙的来写它，找不到微妙的办法不写也可以。束为同志谈的集体和个人的矛盾很得几年写。

（插话）

八月三日会上，康濯发言中插话：

“农民不是需要什么计划什么，城市要什么就得有什么。不管农民剩不剩下来。”

八月五日会上周立波发言中插话：

“我们乡下一个队十几个妇女，都不愿意嫁农民了。”

“哪里卫星多，哪里没有粮食。”

当周立波谈到写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插话：

“现在迟迟不写，我想知道大家的想法。生活就是生活。干部每天去农村解决各种各样的事就是生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写得很多，也不是因为这是主要的，而是因为好写一些。写人物总要写环境。写吃饭也要写吃饭的场面。现在情况好转了，但究竟靠得住靠不住，这是他们考虑的。一九六〇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走五十里就要带粮票。我想到农村一个是粮食，一个是日用品，过几年大概还是可以写的；但现在写，为什么可以不写这些呢？怎么避得开？我常常一想就碰墙。希望同志们谈谈。”

同次会，李准发言后插话：

“就做一个人物的生活记录来写，行吗？到村里去问农民，近几年你生活得怎样？好象那一段都不好写。我们自己也生活过，自己写自己是不是代表了真正的生活呢？好象也不好写。”

茅盾发言后插话：

“集体和个人这个矛盾、斗争还是多的。比如山西，每村总有这么几个落后的人，但比较消沉。这些人也没什么威信，农民也不听他们。我们村有个人，捣腾了个骡子，三百元的成本，卖给大队就想赚一笔，结果卖不出，还是大队用三百收了。农民现在定自留地，自留地比集体分的还多，对社地就没兴趣了。有这么三五人，对农民出身的队长也不尊重。支书也不认识这种阶级矛盾，不给撑腰，为了三个工分就把队长打了。还是我去那里，公社司法人员来了，有几个人代打人的人

作证，被打的，不会讲话的反而不站起来讲话。后来我建议仔细调查才搞清楚。这种斗争，集体与个人是有的。”

接着，邵荃麟发言后插话：

“现在克服五风，集体化也不讲了。我们说优越性，农民会问：‘增多了粮食是不是我们的呢？’过去党员轰轰烈烈，现在正经话都不说了。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先把党员组织起来去干，这还好办。去写，就容易带上主观主义色彩。”

八月六日会上李束为发言后插话：

“晋北要是允许开自由地，那他就不会关心集体了。”

“他不种集体地是因为粮食不归他，征购多。”

“你如果把任务都不包下来也不行的。”

“晋南是出麦子的，所以有交换问题。”

（八月十一日会上发言）

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写法有些想法。

《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象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怎么给时代以影响。有些作品是民主革命，还没到社会主义革命。写生产，也还是由集体主义的鼓舞。《套不住的手》这个老头要写社会主义的鼓舞，或写或讲，总觉得不自然。是不是有点自然主义？现在我们写领导

人物总不免外加些。《三里湾》的支书，也很少写他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些农村人物是符合共产主义的。农民是同盟军，是因为有一部分相同的，我就写同盟这部分，至于其他，就需要外面加进去的。一个队真正有一个人去搞社会主义，就很了不起了。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反映不充分，脚步慢一些。自己没看透，就想慢一点写。

同次会，李准发言后插话：

“很多同志发言，对我很有启发。主席《讲话》发表二十年了，我一方面没有写文章，一方面感到阵地还没有完全占领。为工农兵及其干部的作品倒有，但为工农兵为得怎样？以前我仅看成文字语言问题不能服人，实际上也牵涉到写人物。主席文章是面对普及和提高，是讲得很辩证的。但是我们提高的东西是不是放在普及之上？前十年我这样叫喊了，后来再喊就已引起有的人讨厌。我们有些作品是普及基础上提高了的，也还是很普及的，如话剧《抓壮丁》，是提高了的，实在又是普及的。《白毛女》也是，但仍有美中不足，生活面不够广。鲁迅的《祝福》既广阔，又深入。《阿Q正传》也是，阿Q、小D、假洋鬼子等都很丰富，一点一滴都是生活的真实部分构成的。生活是普遍的，人也是普遍的；但是提高是对他们的认识，社会效果是提高了的。再方面是艺术的手法。自然，生活使他艺术化，再加上语言文字方面。这都是普及基础上提高。有些却不是，也不光是印发份数问题。我写的东西用评话题材完全可以，而我自己还没有这个本领，那个行道也是满丰富的。二来我是那样写了人家不能演，这个关我们没有敢于打破，是不是路，我还抱有如此希望。两方面兼顾，事实上两方面都照顾不到。后来写的这几篇，我知道对象不是农民了，刊物份数

一减，很过意不去，因此不写了。艺术形式上我究竟走哪边，我还打不定主意。我要写的《户》，恐怕还并不是给群众看的。另一方面大胆提倡评话，在文艺界恐怕要吵一阵子才行，而我又不想跟人家吵这个。我建议通俗出版社成立个改编部，有些东西实在需要改编。还有，作品广大群众都读，是不是把作品降低了？我看不一定是。有些作者把工农兵估计得过低，如义和团故事，我今天听的，觉得比较讨厌。很多自然主义的说法再加上浪漫主义，不知把我们群众水平估计得多么低。你好比蒸糕撒上胡椒面，辣不辣来甜不甜。不但失去提高意义也失去普及意义。封建势力消灭了，封建文化阵地并不是怎么容易夺到手。县剧团演传统戏，有的把人家情节改样了，原本也没有留下。但是群众每天要看东西。群众喜欢老本，比对改得不好的新本更有兴趣。这个阵地大得很。《三里湾》改湖南花鼓戏改得很好，但花鼓戏现在恐怕改编得不好的占很大成分。对传统节目我是主张先放出后再改，而不要先改了后放出，否则很多好的东西搞丢了。我们作家至少能够供应给群众一些编戏的故事也好。过去《三国》、《水浒》戏的本子很多，广益书局印的。而现在群众能读的小说就少了。到群众中去，说不是我们的事，确实难说。我一人孤军作战实在不行，我的年龄也不行。过去还能叫喊一下，今年五十六岁，再叫十年实在是不是还叫得出来，也不一定。”

（八月十三日下午发言）

今后的作家主要靠什么方式选拔出来？青年作者主要来源是什么，这在我是一个谜。有些青年来信怎么回？

作家这一行道，首先应把这个业务和其他业务平等看待，

并不是那么难。天才和好嗓子，千人中必有好嗓子。其他行业也是。人是不是有天才？特长，我承认。但特长用于哪方面完全是偶然的。我十五岁是农村吹打八音会的小票友，十五岁可以打鼓，按自然条件很可以成为剧团乐队的领导人；也可能成为比较有点名的。学理发也许学得很快，成为很好的理发员。作家这一行是不是也需要才能呢？我们重点培养一个人，几年以后，可以成为比较专门的人材。如梁启超《饮冰室文集》，都是二十几岁写的，是不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不过因为他是个世家子弟，考在剧团或许成个马连良、周信芳之类。因此，培养作者，我看也没有特殊的难处。从五四以来都是自由市场方式，来了就算。中国人口这么多，人口和作家要不要成正比例？我有怀疑。要万分之一，就有七万作家，恐怕也用不了那么多。才能一好，在各行业都冤枉不了他。这几年在我们写作中感到是问题，不知青年业余作者怎么样？再，我们的努力差，没有产生《红楼梦》那样的作品；也许还没有发现大的天才。什么都有学校，历史上没有作家学校；但历史上也没有挖煤学校，现在都有了。总之，完全像过去那样靠自然的方式，好像还不好。我收到很多青年作者的信，想做作家，要求告诉方法。我有很多信都没有丢掉，又不好回。真正把那些来信中的好作者，挑四分之一、二，训练七八年，恐怕也很成个队伍了。恐怕不能这样办，但也兴许可能。为了当作家而产生神经病的，总会有这样的人，在全国说来恐怕也是浪费人力的事。用什么办法培养作家，我也想了二年多的办法，但结论还是糊涂。寄希望于我们大家来研究。

（八月十六日上午会上发言）

刘树德同志发言引起我一些话。过去同志们对我提意见，常说我钻在一点。过去我有个错觉，老以为作家们总是单干户，把单干户看得过死就不好。过去我老跑一个据点，而且比较固执的是，人家说我去的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在我看来实际上是比较进步的。但即便如此，多看看也还是对的。会议以前听人家说在农村有单干户，不大相信。现在看来，应看得全面点。这个局面要打开。不只是山西老陈醋，应换点茅台、大曲。再，我们写作是单干户，总也可以交交朋友，走走亲戚，因为有了这样的关系，也比较容易了解情况。同志们帮我打开了眼界，我过去老觉得生活多而无用，也不能翻旧的，又不服老。其实，生活多，有些还是有用的，旧的也可以写。

再者，觉得参观多了不好，参观项目减一点，或轮班参观行不行？开会是否去些别人不太参观的地方？走亲戚也不必去休养区。如到湖南还是希望立波同志带我到他的据点去，那也是个体养嘛。

与读者谈《三里湾》*

作家出版社把我写的小说《三里湾》选入《工农文艺读物》里，并且要我写一篇序。这本书本来没有什么深奥难解之处，用不着多加什么介绍，不过既然要作序，总得说几句话，所以就趁这机会和读者同志们闲扯一阵子。

小说是说“人”的书，《三里湾》也是如此。《三里湾》说的是我国在农业合作化初期（一九五二年）山区农村一些人的表现。书中说到的人虽然不一定是真名实姓，不过都是我当时在农村常碰到的。其中我赞成的人，我就把他们说得好一点；我不赞成的人，我就把他们说得坏一点。作者的目的是要争取读者的同情的。同志们读了这本书，如果能同意我的看法，跟着我表扬我所赞成的人、批评我所不赞成的人，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假如不同意我对某些人或某个人的看法，也请来信指出，以便斟酌修改）。

那时候，农村开始建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共产党的农村支部带领着一些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人已经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为了保持个体生产的阵地，便千方百计来阻碍集体化的顺利发展，这样就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两条道路上，各有代表人带领着同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一九六二年《文艺报》十一月号予以转载。

情自己的人作为一个方面摆开阵势，不过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关系，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虽然费尽心机，也拖不住农业向着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最后他们只得分别认输。《三里湾》书中所说的人，就是在这两条道路上一些有点代表性的人。我们说他们“摆开阵势”，说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不过是为了说话方便打的一些比方，实际上这两种势力的区别，不象打仗或者走路那样容易叫人看出个彼此来。尽管是同在一块做活、同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一家人，甚而是夫妇两口，在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也不一定同站在一方面。就以一个人说，也有今天站在这方面，明天又倒向那方面，在一件事上站在这方面，在另一件事上又站在那方面的。但是总的看来，阶级出身或思想意识接近的人们，就又是有意无意地互相拧成一股劲。双方都是这样。例如书中的马多寿，为了想保留他朝着富农方向发展的阵地，就借用他家世代相传的封建规矩来控制孩子们，但是因为时代变了，他虽然费尽心机，四个孩子只拖住了一个半；书中的袁天成，在参加党支部会议时候接受党的领导，可是一回到家便要接受他那个“能不够”老婆领导，“能不够”把她领导袁天成的办法传给她的女儿小俊，可是小俊用那办法去领导王玉生，王玉生便不认账。在这些具体的每个人身上，父子、夫妻都不一定走的是同一条路，一个人在每一段时间每一件事情又表现得不一定统一，但在总的方面，不但“两大份”袁天成和他的“糊涂涂”连襟马多寿愿意亲上做亲，就连村长范登高也能和外来流氓李林虎在抵制开渠那件事上心照不宣地彼此配合。

那时候，我国的农业集体化虽然才开始不久，但是广大农民远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接受过党的集体思想教育，受过战争和

土改等集体行动的锻炼，有过互助组的集体劳动经验，所以多数人很快就觉悟到农业合作化对自己有利。在这种形势下，以范登高、马多寿等人为代表的那条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势力虽然也有它一定的顽强性，可是比起以党支部书记王金生等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上的势力来要弱得多。所以在斗过几个回合之后，他们的队伍就溃散了，最后就连马多寿那样顽固的人也得缴械。

在这种斗争中，不论哪个人，也不论自觉不自觉，他们的思想都或多或少起着变化。一开始就站在社会主义那方面的人有不断的胜利鼓舞着信心，就不必说了；在资本主义方面的人或者只有一只脚踏在这方面的人，每打一个回合就要重新拿一次主意。两只脚踏在两条路上的人，在看清大势之后，会把资本主义道路上那只脚移过来。袁天成的革命属于这一类。原来打算顽强地坚持资本主义阵地的人，后来在抵挡不住的时候，就节节后退、步步为营，直到再无立脚之地的时候才肯缴械。马多寿就属于这一类。挂着先进的假招牌，暗自和资本主义势力联合起来的人，直到露出马脚掩盖不住的时候，才放弃那种勾搭。范登高属于这一类。……不论属于哪一类，在这种斗争中，都起着变化，而且除了该杀的反动分子（本书没有说这类人）之外，都是或快或慢向着好处变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是改造制度（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是改造人。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向着好处变的人，也正合乎改造的目的（改造人的主要方法，自然还应该是正面进行思想教育，使大多数人在自觉的情况下进行自我改造）。

总之，《三里湾》这本书，就是叙说那个时候、那个地区、那些人们在那种斗争中的那些表现的。

读者同志们或者会有人问：那个时候，那种斗争已经过去了，再去看那些人们在当时的表现还有什么作用呢？同志们！小说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帮助读者分析各种人的思想，而在于带领读者在感情上拥护其中应该拥护的人、反对其中应该反对的人。书上写的那个时期、那些事情虽然过去了，可是和当时那些人具有同样思想的人，在另外一些时期和另外一些事情上会以另外一些行动、言论表现出来。知道了他们在历史上各自有过的种种表现，对于对待眼前类似的人们应该抱什么态度，是会有帮助的。况且人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想在一两次讲课中或事实教育中完工是不可能的。《三里湾》书中说到的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们，最后是以他们入了初级社作为缴了械的表现的，其实入初级社只能说是初步放弃了个体所有制这一块阵地，至于入社之后，再遇上某一些关节，他们的资本主义残余思想，还是会各按其改造程度之深浅，或多或少出现的。例如在任劳任怨上、在分配与扣除的比例上、在高级社、公社化运动中、在遭灾歉收的情况下，不但马多寿的表现不会和王金生一样，就是最后能冲出马家包围圈的中学生马有翼的表现，也不会赶得上才上识字班的王玉梅。知道了他们在历史上各自有过的种种表现，对于推测眼前类似的人们在当前某种情况下会作什么表现，也是会有帮助的。我同意把这本书选入《工农文艺读物》里，也正是根据这种看法决定的。

就谈到这里吧！最后要求读者同志们在发现这本书写得有什么漏洞的时候，随时来信指正！

做生活的主人*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到群众中长期落户 在工作中认识人

有些同志问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的？其实，我原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在旧社会，我做过小学教员，同时又是农民家庭出身，干过农活，对于种地的活路也还熟悉。那时家境不好，常常受高利贷的盘剥，因此我跟贫苦农民感情上有些沟通，在他们中间有些根子；参加革命后，虽作过几度报刊编辑工作，在这种岗位上，有时候就需要写点什么零星文章；自从写了《小二黑结婚》后，领导上说，你会写，就写吧！以后我就脱离别的工作干起这一行来了。

深入生活的问题，我在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不曾意识到的。因为，从前在家里做活路时，总得和当时当地的社会打交道，想不深入也躲不开。象我开始写的那几篇东西——《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大部分素材得自当日的自然生活中。到我被称为专业作家后，困难就来

* 本篇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广西日报》。

了，虽然还是在农村工作，搞过减租减息、清债反霸，土地改革，可是，当地农民有户口，咱没户口，到底隔了一层。和农民共事一阵，认识了一些人，运动结束了，关系也就断了。所以，解放以后，我想这关系可不能断，因此，每年都有几个月下乡，虽然时间少，总比没有的好。

我以为深入生活最好是时间长一些。生活在不断变化，时间短了观察得不深刻，也不全面。当然，深入到生活中去，首先还得树立做主人的思想，要参加一定的工作。因为农民没有义务把一切都告诉你，参加了一定的工作，有了责任，有些事情经过自己处理，才有亲身的体会。我觉得最理想的办法是在一定的地方立个户口，和农民过一样的生活，与农民的关系才更密切，不然，至少也要到一个核算单位去，不一定要有什么名义，但必须要有做主人的思想，不能做客人。我曾到全国劳动模范郭玉恩的社里去，因为抗日战争时我在这地方住过两三年，和这里的人有层老关系，当地的干部把我当自己人，给我一点事做。记得建立农业社的第二年，社里要搞经济核算，合理分配，建立一套会计制度，因为我是个有文化的人，他们让我协助管这件工作，还管生产计划的制订。我在那里搞了几个月，摸出了一些分配工作的经验，比如收割时如何边收边分，既不分过头，也不剩太多就找到了办法，我在做这件工作时，就没想过对写作有啥帮助，会计业务都是数目字，跟写作有多大关系呢？可是，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工作认识农村的人的。要真正深刻地认识一个人，一定得在工作中多次观察，靠一同打鼓唱戏，或者喝酒应酬，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在工作中涉及到各人的切身利益关系时，农民才会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看出他的动向。

“架上经常有货”

我很羡慕业余作家，业余业余，业余了才写，业不业就不写。业余作家都担任一定的工作，为了搞好工作自然就注意研究人，比如搞土地改革，为了要斗垮地主，就要研究地主的各种特性，他们对待农民的各种手法，也要研究农民的思想情况，掌握了人物的特点，在工作中就能调动他，即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在工作中能调动的人物，写作时也可以调动他。在现在的一个核算单位中，有几十个人，就有几十个样子，哪些人是真响应号召，哪些人是假响应或者不响应；哪些人肯干工作，哪些人不肯干工作；哪些人爱集体，哪些人光顾打自己的小算盘，……为了要搞好工作，你不想了解就不成。比如赶毛驴往地里送粪这样的小事，有些人路过自己的自留地与集体地交界处，总是赶着毛驴往集体的地上走，可是驴子拉出屎来，他却用脚踢到自己的地里去。要靠这种人拉大车去卖棉花，准靠不住。象这样的事，在工作中不是常碰到吗？要搞好工作能不了解吗？可是，了解了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好处呢？写东西的人，每到一个地方，每做一件工作，熟悉了一些人，不管你现在写不写他，总是有好处的。不能说有些东西没有写出来就没有收获。这个阶段认识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写作时无形中用进去了；当然，也可能了解的东西成了“滞销货”，一辈子都用不着，那也没有损失。我们搞创作好像当门市部主任那样，要边进边出，架上经常有货，不能卖完一批再进一批。我们的作家不应当平时不注意，到要写作了才去熟悉人。最好长时期地到一个岗位上去生活，首先是搞好工作，工作搞

好了，自然水到渠成，写作的素材也就有了。

有人问：我的生活比较丰富，却写不出东西来，恐怕与技巧有关系，这也许是的，但也有些人主要不是技巧的问题。比如有个工人作者，他想写个同行的劳动模范，去访问过几次，还在他家吃过饭，可是，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好。这位同志可能是没有注意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他不写自己熟悉的车间生活，却去写自己不熟悉的另一个车间的生活，这是舍己之田，耘人之田。有的人说，我们那里的确没有生活，这话说不通。担任一项工作，就得接触一些人，比如作工会工作，总认识几个工人吧，当业余学校教师，总认识一些业余学员吧，每个机关的人事科长，认识的人更多、更深刻，写这些不行吗？明明是在生活的海洋中，怎能没有生活呢？

以主人翁的态度要求自己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理解革命的现实主义。一个革命作家要以主人的责任和态度要求自己，要做生活的主人。我们的生活中有种种东西，进展与挫折，成就与缺点，令人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作家要表现生活，首先要看这对革命事业，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下笔要讲究分寸。十九世纪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与当时的社会是对立的，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地刻绘，但我们今天不同，我们的作家要对向上的、向幸福方向发展的社会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咱的江山，咱的社稷”，遇上了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只许打积极改进的主意，不许乱踢摊子！

有的同志问：如何把素材提炼成作品？我以为首要的问题

是目的性——为什么要写？在生活中过了一段，只要认真做过主人，就会觉得有些什么感触非写不可。这个问题明确了，作品的“纲”就立起来了，根据这个“纲”再去集中合用的材料，就不费事。

时刻想到读者

有的同志问：作品的语言如何才有中国气派？我的理解是：作品语言的选择，首先要看读者对象。写给农村干部看，用农村干部能懂的语言，写给一般农民看，用一般农民能懂的语言。如我在写《小二黑结婚》时，农民群众不识字的情况还很普遍，在笔下就不能不考虑他们能不能读懂、听懂。不知你们留心没有？我在《小二黑结婚》里没有用过“然而”、“于是”这类词儿，为什么？因为这在知识分子虽然是习用语，写入作品，当时的农民群众却听不懂、读不惯。可能有的同志会说：“文学作品应当走前一步，担负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呀！难道不可以写得稍深一点么？”我却认为：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是该文学作品以外的各种手段（如学校）担负的。终究说来作品是要求读者即时能读懂，能及时起到它的社会作用的。但这同时，我也注意，不使作品的语言落后于社会语言的发展。例如现在每个生产队都有了中学生，而我在写作中也就不再忌用“然而”、“于是”等词了。此外，在用地方语汇时，也得照顾到不妨碍广大读者的欣赏。比如说：山西农民说话很有风趣，生动、准确，是书本上找不到的。但全用这种山西方言写作，别的地区、风土人情各异的读者群就会看不懂，所以也最好不用。

有的同志问：“你在作品中如何作人物的心理描写？”其实，我过去所写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里面，不仅没有单独的心理描写，连单独的一般描写也没有。这也是为了照顾农民读者。因为农民读者不习惯读单独的描写文字，你要是写几页风景，他们怕你在写什么地理书哩！今年四月份《人民文学》登了我的小说《互作鉴定》，是反映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例外地对主人翁刘正作了一些单独的心理描写。这是因为近年来接触到不少有关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见得多了，想写这么一篇激励激励青年，起一点作用；既然是写给青年学生看，单独的心理描写，用用也无妨。何况，作品要反映的是他在参加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思想斗争，刻划他的心理状况，也是必要的和很自然的。

与青年谈文学*

——在旅大市文学爱好者会上的讲话

我随便发表些感想：大家都是文学爱好者，我自己也是。恐怕每一个专业作者，一开始都是爱好者。爱好者占多数，假如每个爱好者都是作者，你写的我读，我写的你读，那就成了“交换文学”了。比如看戏，很多人爱看戏，有的成了票友，有的成了演员，但大多数还是爱好者。有的同志从事的业务和文学挨不上边，他读的作品比搞专业创作的同志还多，我知道去年逝世的化工部长彭涛同志读过的作品就比我多好几倍，但他始终只愿作个爱好者。有了广大的爱好者，对我们专业作者是个鼓舞，如果台下尽是演员看戏，那不成了“交换戏”啦！看戏的大多数不是演员，这样戏才有作用。爱好者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比如戏剧爱好者，看完了戏出去就议论，这个演员唱得怎样，那个演员唱得怎样。这种议论，对演员很有帮助。希望文学爱好者读了书以后，也要议论。

创作和演戏以及和其他行业究竟不一样，一般专业人材，可以在学校里培养，但是从学校出来就成为作家的，古今中外却不多见。哪个专业作者一开始都是业余作者。业余作者比专业作者有很多方便。一个演员几天不演戏，人家就会问这个演员上哪儿去了？怎没演戏？若是票友就没人问了。业余作者好比票友，愿

* 本篇发表于一九六二年《鸭绿江》十一月号。

搞就搞一点，不搞也没人问，专业写作就不行。其次，业余作者都有个专业，或是在工厂或是在农村，每天都在生活中间。我过去就在农村，对农村很熟悉，抗战时候我在太行山，整天和农民在一块。现在虽然有时也到农村去，呆半年或是几个月，但不能解决深入生活的问题。自己若在农村有个户口，那里有什么活动，都与自己有关。就是在农村当个教员，什么事也少不了，每天就在生活中间。业余作者就有这个方便。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应为工农兵服务。是不是不写工农兵就是不为工农兵服务了？当然在革命胜利以前，有些人这样讲是别有用心的，说“哪里有生活，哪里有斗争”，目的是说在上海也能抗战，不一定要去延安。现在革命早已取得了胜利，各行各业都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都在一个大队伍中，不要认为自己不是工农兵就不能写了，而原来是工农兵的就不要熟悉其他行业的生活了。我觉得业余作者就主要在你工作的岗位上、在你能接触到的生活范围认真的生活。写作虽然也是个社会行业，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不一样，不象在一个机关或一个工厂是个集体，写作是笔杆，连互助组也不是，所以这个行业虽然也是社会主义行业，但本身不成个社会。

有的同志问：我们在生活里很多年了，总也写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六亿多人每天都在生活里，若都写出书来，读也读不尽，就是印也来不及印了。写不出来的原因很多，每个人的政治修养、文学修养各有不同，因而对生活感受、理解，就不一样。比如听戏，开始就是听着好听，以后自己也哼两句，再以后就能听出板眼，再以后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听出来是“言派”还是“程派”了。这是在生活里慢慢摸的，每个人是不一样

的。邵荃麟同志曾讲过观察、感受、理解、概括几方面的关系，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们在生活中应好好锻炼，努力作到这几方面。现在，往往是：工人穿上工作服上班了我知道，下班一脱工作服，上那儿去了就不知道了。其实上班只八个钟头，下了班的生活，才有更大的社会性。我们写小说的若不知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那就很难写了。公式化概念化就是把人简单化了。

在生活中观察、感受、理解是联在一块的，不能分开，看一个人，对一切事不能无动于衷。业余作者在社会上除了要作一个好的从业员，还要作一个好的公民，对周围的事情不能不关心。这也是属于政治修养方面的问题，没有这个，对生活就会熟视无睹，对生活感受、理解的也不会一样。说各行各业都可写，是不是提倡写身边琐事呢？我们说写自己熟悉的事不一定是琐事，有的琐事能反映出大问题。比如，有一个大杂院，住十来户人，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有。这里发生的事，并不都是没有社会意义的琐事。如买米买面，小孩子打架，琐碎是琐碎，可是在琐碎中可以见人心。再比如，在这大杂院里，有一家，三、四口人住三、四间房子，另一家，三、四口人住一间，住三、四间房的人把屋里打扫得很干净，正好另一家的煤没地方放，堆到他家门口。这里就有了矛盾。就说小孩子玩玩具吧，那一家的孩子小鼓打的都不爱打了，又买个汽车，也许邻家孩子连个皮球也玩不到。那家孩子把汽车拿出去玩，邻家孩子摸一摸都不行，孩子们打开架了。这里又是矛盾。对这些矛盾怎么看？假如住三、四间房子这一户是我们的工作干部，就要对他要求严格些。社会主义时期，虽然还承认人们享受的生活资料有差别，但作为一个公民，不能用这种差别欺侮别人。

如你孩子有五、六样玩具，邻家孩子玩玩有什么不可以？给他一个有什么不可以——当然不是恩赐观点。他的煤是放在院里让水冲掉好呢？还是放在你廊下好？我看就放在你廊下算了。有的大杂院锅台炉灶什么都没个次序，公共厕所三天不打扫就出事故，是自己多干一点，组织大家清扫一下，还是不管？作为一个公民，怎样对待这些琐事？这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这作为你小说故事的一小部分有什么不可以？一部《红楼梦》中，有好多人的性格是通过日常琐事表现出来的。

小说的主要任务不是写事而是写人，要通过人去教育人。但也不是读过写英雄作品的人马上就能变成英雄，不过每一个英雄的品质对读者都有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我是农民家庭出身，住在山区，我小孩时，常赶着驴子驮煤，晚上若看了罗成戏，在路上和小同伴们玩，就当起罗成来了。侯宝林同志有一段相声，说一个小孩拣了邻家一只小皮鞋，回到家他妈问鞋哪儿来的？说拣的，他妈不但不叫送回去，还说“一只鞋怎么穿呢？”就一句话概括出一个人物来了。每件事都能表现出人物性格，小孩子打架妈妈出来说话，也有人物。理解人有个立场、态度，才能发生爱憎，有了作一个社会主义公民强烈的观念，才能产生强烈的爱憎。也有感情用偏的时候，这和政治修养很有关系，即与每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原则等有关系。爱也好，憎也好，先是感动了自己，感动不了自己那就是假的。当然文学修养、写作技巧也有关系，这还是次要的。例如一个文盲，见了朋友，有很多话想和朋友说，感情抑制不住，话说得很好，特别是说起他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说得兴致勃勃、滔滔不绝、而且能感动人。对事物的感受强烈点，自己感动的多点，写出的东西才能感动别人。

写人物需要概括，如写一个地主，是不是把所有的地主的特征都抽一点加在一块？也不是。都说老年人精，因为他见得多了，对你看上一眼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山西若和地主谈上几句，就知道他是哪个类型的地主，如果在东北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住长了，处惯了，总是对一批人熟悉的，脑子里总有那么一些人物，取不出名子，但能说出他们是哪一类哪一种人，这就有概括了。

所谓观察、感受、理解等，不过是为了说话方便用的词头，不是先观察，过一会儿再感受再理解——实际上是同时的。我觉得业余写作的同志们在生活中是左右逢源的，写人物时把熟悉的人（不一定是真人）放在哪个场合也一样。如《三里湾》里胡涂涂这个人，他在人社时是那么个表现，要在大跃进时候他会另有一种糊涂涂式的表现，如果胡涂涂和支书他们两个人一起进城，两个人对城里的事物一定是两个感想。虽在同一环境里，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特有的表现。有的老商人一见小偷就操上心了，一眼便能看出谁是小偷，就因为看小偷看得多了，实际上小偷的长相并不一样，他却能看出一样的东西来。小偷呢，也有很好的观察力，会看什么人好偷，什么人不好偷。对人熟悉了，甚至可从以足音辨出来是谁。对生活熟悉了，人物也就出现了。

写作没有什么秘诀，艺术修养是无止境的。多读理论还是多读作品？我认为应多读作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谄”。从前读古文时，老先生总是叫你念，念多了就会作了，这是有作用的。那时也有关于指导写作的书，这些书对我们写文章，用语法有帮助，但只是小帮助，基本上还要靠念。因此要在文学理论书上找到什么写作秘诀是没有的。卤水可以点豆

腐，但被点的必须是豆浆，如果不是豆浆是一锅白开水，再放多少卤水也不行。任何科学都是先有了对象，然后才有理论，先有植物才有植物学，先有动物才有动物学。文艺理论就是把文艺作品当作对象。如果没听过戏或没听到一定时候，不用说谭派马派，连河南梆子，河北梆子也分不清。光看介绍谭派、马派的书，还是听不出谭派和马派来的。

读作品先要抱欣赏的态度，不要先想去分析。小孩子看书跑故事，大人不一定都跑故事。看电影也不一定先去分析，就是分析也是先抱欣赏态度。有一位中学老师组织孩子看电影《红旗谱》，先告诉看完明天就讨论。孩子们看时，当朱老忠一出来，就忙着记，记两句再看就找不到朱老忠了。看作品若先忙着去分析，对作品的感受，读时的感情便会被打断。不先分析研究也能认得作品的好和坏。在没有理论以前，作家也能写作品，人们也能理解作品，有了理论，人们可以用理论帮助自己进一步理解作品。若不先抱欣赏态度读作品，那就连理论也不易理解。总之要多读作品，象听戏一般，听多了，慢慢会哼，板眼也会了，嗓音也有了，到一定时候就融会贯通了。这时候，爱好者中间就有一部分人很自然地变成“创作”者了。

地方戏和年景*

今年我又得在我的故乡过了一次端午节，并且在端午节之后（阴历五月初七日），到邻村看了一次本地的地方戏。在端午节之前数日，有一天，看见街头墙上贴着一张海报，才知道邻村确实要演戏；未见到海报之前，只听到一些不曾落实的消息。

这个要演戏的邻村，村名叫“嘉峰”，是由村西边一个突起的山峰得名的。村里在每年的端午节都起一次庙会，并且要演戏祀神。这里祀的神是五瘟神，神台上并排塑着五尊男像；两旁还塑着两个站像，一个拿着一本账簿，据说是应得瘟病各户的花名册；另一个一手提了个桶子，一手拿着一把勺子，据说是准备向应得瘟疫各户散布疫苗的。这一帮子泥人儿，人们在过去都觉着惹不起，所以要给他们维持香火；解放以后，就在这里设了个卫生站，使他们失了业。他们的香烟断绝了，只是地方上还利用这个时间、地点，把香火会改成了物资交流会。本年的戏也应该在端午节演，可惜因为剧团过忙，及时请不到，所以推迟了两天。

当我见到海报的时候，村里有人和我开玩笑说：“咱们专区不论哪个剧团都有你的熟人，今年秋天能不能通过你的关系，请个最好的剧团到咱们村里来演几天戏？”我也开玩笑式

* 本篇发表于一九六二年《红旗》十九期。

地回答他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哩？要早说的话，前二年我就请得来了！”他说：“前二年用不着劳你的大驾，我自己也请得来！”说着彼此都会心地笑起来，在旁边听着了的人也都跟着我们笑了。

说老实话：像前二年那种年景，这村里可真演不起戏。看戏买票虽说是各自花钱，可是亲友们到村里来看戏，总不能连一顿饭也不管吧？在那连续几年的灾荒中，要是把度荒吃的那种家常饭拿出来招待客人，谁也不会有那么厚的脸皮；要是另外做一点好饭，就会打乱了度荒的粮食安排，大村演戏招待小村的客人还勉强过得去，而我家所在的村子是个不及百户的小村子，便不敢那样铺排。村里好几年没有演戏了，今年的年景有点好转，麦收以后便想演几天戏，可惜另有个不凑巧的地方——请不到剧团。剧团倒不算太少，只是几年没有演过戏的小村子，今年差不多又都有了演戏的要求，这一来剧团便有点供不应求了。

嘉峰村演了三天戏，我便去看了两天。我是个流动性较大的人，看戏的机会多得很，其所以要去，与其说是为了看戏，还不如说是为了会亲友——借着这种机会，差不多可以把直径十里之内各村庄的亲友会遍了。

这地区演戏的习惯是每日两场——下午的一场似乎是专给老年人和小孩子们演的，青壮年只看夜场。看夜场戏的外村青壮年人，都是在家里吃了晚饭才赶来，散了场又都各自回家，顾不上到亲友家里去作客。虽是这样，各户的客人并不见得少，因为正经亲戚家里的老年人如果不自动地来，当主人的也要去把他们接来。

我是自动去的。第一天，当下午的一场戏结束之后，好多

亲友要邀我到家里吃饭。我的目的本来是去会见他们，自然要到他们家里走走，只是吃饭的机会太多了也会变成一种负担——每吃一次，起码吃一碗，东一碗、西一碗，跑过几家之后，再吃就只能举行个吃饭仪式了。这一天的饭以饽饽为最多，饽饽之外又佐以油条。这油条大半都是亲戚来时拿的礼物。最后我到在一家，因为吃得过饱，竟连仪式也不能举行了。主人仍然以为我是客气，便指着灶边的一口锅说：“不要客气，你看还剩下多少？”主人怀疑我是客气也不无根据：前二年我也都在故乡住过几天，那时候每逢要到亲戚朋友家里去，在吃饭方面，是抱有那种戒心的，不过自从去年秋后我就安心了，因为我看到了当时的收成已经比前二年好得多。

在剧团方面情况也一样——今年能够得到的供应，在前二年即使愿意加倍花钱也不见得能买到。

连续几年的灾荒，对地方戏的发展固然有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和历史上的情况比起来还是很值得庆幸的。在解放之前，这地方演戏还没有卖票制，只演敬神的戏——哪个村敬神由哪个村包场，外村人看戏则是白看。据我的经验，看外村的戏心情比较舒畅，看本村包来的戏，即使是丰年也往往无心欣赏。

敬神的原由大概不外三种：一是本村掌殿之神的出生、逝世等纪念日，一是遇上了水、旱、瘟疫等灾情求神保佑许下的愿，而最普遍的一种则是常年和丰年秋收之后的酬神，前两种除了某些神圣的纪念日不在秋季（如阴历正月初七祀火神、二月十九祀土地、三月初三祀观音之类）外，一般都是尽可能和秋季的酬神仪式一并举行的——在演戏时候加演一天。所以在剧团方面看来，秋季是旺季，其他各季是淡季。

剧团的淡季也正是农民没有收人的季节，村里包了戏，又

要花钱又要待客，经济上受到了压力，便把看戏的兴趣给压低了。即在丰年，本村酬神演戏的时候，一般中、贫农看戏的兴趣也不见得高。像现在贴海报那些墙头上，在过去演酬神戏的时候，往往贴着这样的通告：

“兹以三时无害，万宝告成，皆赖神圣之灵，风雨之助。报恩崇德，人所应然。本村谨择于×月×日起，洁治樽俎，虔修牲饌，兼督俳优，献戏三日，以酬圣泽，而明感戴……此项费用，按以地亩均摊——每亩耕地，应摊×角×分，仰闾村居民，于三日之内如数扫繳，以光神事！
执事维首×××等白。”

这种通告，写得也好像是振振有词、端端有理，可是“闾村居民”所关心的不在“词”与“理”，而在于每亩耕地究竟要摊“几角几分”，看明之后，就须在三日之内，出卖新谷，了此冤债。在这种情势下，还有什么心情去欣赏艺术呢。

不过在那时候，丰年究竟还是好过一点，若是遇上了灾荒，剧团便得散伙，甚而连剧种都有消灭的危险。据我祖父说，这个剧种在两次大灾荒中都几乎消灭了：第一次连他也记不得确切的年月（仿佛是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那时候的戏班子差不多全散了伙，只剩了一个班流亡到汉口一带，过了几年才又回到本地，而且还学会了汉口一带的地方戏——这种戏至今还流传着，只是汉口一带现在也没有那种唱法了，可能是某一个剧种的老腔老调。第二次是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这一次家乡人口死亡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小一点的村庄都全部覆灭，灾荒过后，绝大部分土地都荒芜了；戏班子不但流散得一无所有，而且连职业演员也死得不剩几个人了。也和

上次一样，有几个班子流亡在外省，灾荒过后也有回来的，也有在外落籍的——山东的瓜子戏和河北的西路梆子（流传在永年县一带）就是这种流亡班子传下来的。瓜子戏已经变得另成一种样子了，河北的西路梆子却还保持着原腔原调。因荒年流亡而得到艺术交流的结果，固然也可以解释为不幸中的收获，只是当年取得这种成果的老辈艺人，就吃尽苦头了。

前二年的灾荒，不论是地域之广、时间之久，都超过了近百年来那两次最大灾荒的程度，幸而政权的性质改变了，对人民利害无人负责的时代过去了，所以剧团的营业在一个短时间内虽说有点清淡，可是尚没有遭到那种失散流亡之苦，而且年景有了点转机，马上就又恢复了像过去的旺季式的经常营业。这在解放以前的历史上是不会出现的景象。

谈谈花鼓戏《三里湾》*

关于《三里湾》，最近作家出版社把这个小说选入《工农文艺读物》时，我写了一个序。我想在这里再重复说一下序文里的意思：《三里湾》写的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并不是摆开阵势两边旗鼓相当地打起仗来，也不是说把农村的住户分成一半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一半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或者多一点少一点。实际上，这个阵势不是这么个摆法，有时候在一个家里边，这个人走这条路线，那个人走那条路线；在一个人身上，也可能有社会主义思想，也有资本主义思想，他有时在这一段资本主义思想多一些，到另一段资本主义思想又可能少一些。人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嘛！从旧社会带来旧思想的尾巴，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有的占了他思想的控制地位，有的已经退到不重要的地位，或者很小的地位。人就是这么纷繁复杂地组织起来的。这样来认识和处理人物，是符合客观的情况的。不过，这些人物都在那里变。假如再写个一九五八年后的《三里湾》，把原来

* 赵树理出席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观看了省花鼓戏剧院演出的《三里湾》，与部分戏剧界代表、花鼓戏《三里湾》主要演员一起座谈。花鼓戏《三里湾》改编者、导演及主要演员等就戏的情节安排、人物处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赵树理同志的发言基本上是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谈的。本篇文章就是赵树理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的记录稿，后曾在一九六三年一、二期《湖南文学》发表。

的人物保留下来继续发展，他们都要变，变得也还不一样。比如糊涂涂度荒年，和王金生度荒年一定是两回事。各个人按照原有的思想基础来变，某种条件好一些，变得快一些；条件差一些，变得差一些。范登高过去比较好，这一段不好，如果思想真正解决了问题，进步更快一点的话，在《三里湾》这个时候比他好的人日后赶不上他的进步，也未可知。这个变也是复杂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戏里头，也应该掌握这个情况。对于一个人，不可能象小孩子那样简单地一眼判定：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小孩子在某种年龄总是容易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好人，一类坏人。我们处理现实人物，就不能这样简单化地好人好到底，坏人坏到底。人物性格不是绝对地一成不变的。夸张是可以夸张，某些时候也不必把一个只有六分坏的人夸张成十分坏。这当然也要看我们对这个人怎样对待，对待敌人，有时夸张到十二分也可以；对待自己人，就不一定那样做。表现在《三里湾》这个戏里，也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我觉得戏里有几个人物是表演得比较恰当的。比如糊涂涂，他装糊涂，不赞成合作化，但是这个人跟凶狠的地主不一样，还没有变得那么坏心眼。他不肯牺牲自己的利益，本来是自己落后，却把落后帽子推给常有理去戴，自己好象很开明。这个人，说话是那么酸酸的，一看就象农村里勉强装糊涂的那种富裕中农。常有理也是这么个味。这两个人物没有往更坏处发展，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是马有翼的父母。原小说也是这么安排的：一方面，他们是那么落后；一方面，他们的儿子，两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青年团员，这个家庭的组织相当复杂。就因为这种复杂关系，使糊涂涂不能把他那真正的落后面貌摆出来：“我就不干！我就是不搞合作化！”这个人后来被我们争

取过来了，争取过来以后，他还是咱们干部的爸爸，我们还得承认他，太弄坏了就不好办。

范登高的风度，戏里表现得很对头。他有过一段进步史，爱摆一点老资格，看去象个老干部；实际上走资本主义路线，做小买卖。不过在演出中这个人身上有两件事失掉了分寸。一件是与糊涂涂订“攻守同盟”。要他去劝糊涂涂拿出刀把坵，他不过是在那里向糊涂涂打官腔，表面上他也在做说服工作，他自己当了村长，又是党员，他不敢把“话把子”露到糊涂涂那里，公开表明他赞成糊涂涂的什么东西，共同来抵抗合作化。这样做是不合乎他的身份的。小说里曾有这么一段，李林虎对糊涂涂说：范登高村长既然会顺水推舟赞成咱们，咱们先跟他联系一下好不好？糊涂涂说：“那可不行！你让他自己说，他会帮着我们说话，要是当面和他说破，他反而不敢帮我们——因为他怕别的党员抓住他的把柄。”另一件事是雇小聚。小聚过去给地主赶过骡子，有点流氓气，但基本上是个长工，靠劳动过日子。他在范登高这里，虽不象过去那种雇工，却还是雇工身份，赚一点工资，被范登高利用起来，跑跑腿搞点小买卖。他和范登高的矛盾还是个雇工与雇主的矛盾，而不是范登高利用了一个坏分子。假如说范登高与一个被斗争过的地主或者面目不清应该劳动改造的人共同搞小买卖，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离他的转变就远了。至于范登高的转变，小说里没有解决，他变是变了，会上大家说服了他，他在发言时说明还要带头，有些丑表功，那个转变不是怎么好。戏里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否一定要经过一个诉苦反省的过程呢？“忘本回头”这样的情节，在别的小说或戏剧里是重复得多了一些，是否可以避免不这样处理？我觉得范登高的转变过程不一定非写出来不可，让

灵芝来说说，其他的人来说说，说得他半通不通负气地表示表示态度，第二天想起又如何如何……。我的办法一时也想不出来，不过觉得现在的演法有点“僵”，与整个戏的风格不调和。这段戏不好演。

小俊这个角色，戏里演得还适当。这个女孩，在她妈妈那里接受了一些坏教育，并没有“毕业”，虽然出嫁了，也不能算是变了样的，可以小孩子气多一点。假如写坏了，王满喜是个正面人物，日后和这么一个需要劳动改造的人结婚，也不太好。小俊与玉生离婚，是她妈妈提出来的，她开始时无条件地服从了妈妈，因自己跟玉生生了气。“你衣裳也不跟我买，我跟你干什么？我跟你就是穿衣吃饭嘛！”在负气之下，妈妈一鼓动，就离了。离开以后，想起了玉生的好处，有些留恋。戏里说青年团要去做工作，劝她不离，是不是把她的留恋表现得早了一些？因为说她离的时候就想起了玉生的好处，不愿意放弃，妈妈又劝她，被妈妈拉得强放弃了，不太恰当。没离以前她就想起了妈妈想拉她离，这个妈妈也太坏了，姑娘对自己的爱人还有一些感情，她就来挑拨。

戏里把能不能演成能干婆。这个人物在外观上有城市里旧式的房东太太、妓院里鸨母那么个派头，丑化是不是多了一些？我在《小二黑结婚》里写过一个三仙姑，这个人用我们的家乡话来说是有点妖魔，但她不刁。能干婆一类的人是刁，在农村叫刁人，但她并不妖。三仙姑妖而不刁，能不能刁而不妖，我们掌握她应该刁一点，不要演得太妖了。比方她嗑瓜子那个风度，流氓习气就多了一些。这个人还是把妖气去掉一些好，让她与三仙姑有个分工。同时她是党员的老婆，以后还得改造，还是一家人，不要太弄得不好看。

如果说灵芝当了团支书就不许活泼了，我不同意。青年团与活泼恰恰是联在一起的，当了支书就板起面孔说正经话，也不太好。当然有的时候还是要板面孔说正经话，比方批评马有翼，看马有翼那个检讨；在其他生活方面，就不应该这样了。小俊离婚，灵芝没有去说服，我看这也不怨灵芝。作为团支书，没有这个责任。小说里金生是玉生的哥哥，是党支书，还处理不了这个事情。这个在村子里已是出了名的事，与灵芝没有多少责任关系。如果小俊不是没离之前就有点留恋的话，更不存在灵芝劝不劝她的问题。不过，我觉得有个情节，前后摆得不合式。灵芝给有翼送糖，应该先是灵芝听说有翼与小俊订了婚，理解成为真的。小说里是这么摆的：有翼“忌生人”，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的情况，糊涂涂在外面放空气，又是买布，又是买东西，说有翼订了小俊。灵芝认为有翼真是订了婚，自己与玉生订了婚以后，就去送糖。如果她知道有翼订婚这件事在后，准备送糖在先，灵芝就好象有些刻薄。也许原作有这么个毛病，不管放在什么时候，让她自己去干这个事是不太好。我原来写的时候主观上认为是善意的，客观上也许有点刺激性。原作有毛病，希望同志们给改一下，不要让人认为灵芝有些刻薄。

玉梅的扮相很象农村姑娘，小说里给她安排的情节少了些，给她写的戏也就少了。这个人物给人的印象是正派、健康、很好的一个形象，我一见她出场，就感觉写小说的时候想到的正是这么个人物，很自然，两个形象碰了头。戏里的人物基本上对头的多，范登高摆老资格的架子，糊涂涂、常有理那个劲等都是。我想象的是那么些形象，扮相是那么些扮相，风度是那么些风度，有些地方经过演出，立体化了，比我写的活泼得多。满喜也符合我想象的人物，跳跳蹦蹦，非常调皮，是

个正面人物。不过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写小了一点，他拿着碗对着台下低下去看，头一场就是寻饭锅里有不有面，象个反派、小丑似的，这就和他的本质稍微离开了一点。同时这一场似乎形成一个“罢工斗争”的场面，也不太好。

至于戏的情节安排，以三对青年的爱情作主线，走《花好月圆》的路子好；还是用别的线索好？小说是从扩社开渠写到渠上开工，但戏里可以大胆些，不必照那个线。小说写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夜，从满喜找房子起，到玉生算场上轱辘的大小结束；第二部分是一天，区上工作干部张信去查有不有面，玉生离婚，都是一天的事；第三部分是一月，记者去那儿的那天，好象是阴历七月十五，写到八月十五，《花好月圆》便是从这个观念来的。整个工作从争取刀把坵到扩社，扩了社以后开渠，到水渠开工。我原来计划写四部分，第四部分是一冬，写完三部分，觉得基本问题已经解决，就没有写了。戏里的集体结婚场面我同意，我原有这么个打算，把它写在春节时候。袁天成革命以后，小俊参加了劳动生产。开渠施工中，满喜受了伤，一个人在家里自煮自吃，腿痛得不能动，饭吃不成。领导上派人去照顾他，派的人正是小俊，他们就在那里发生了爱情关系。冬季，县里办了两个训练班，玉生参加水利建设训练班，灵芝参加会计训练班，他们两人在训练班进一步建立关系。经过一冬，几对青年的关系确定，到春节集体结婚。但写过一月之后，主要事情都包括了，不必往下拖了，一冬就并在一月里了。小的地方也许不能省略那么一部分，大的情节从经济打算，少使点文字，也还合式。戏里并没有因为三对青年集体结婚而把扩社开渠的事放弃，虽提得不多，这也不要紧。文学作品不能光去写工作，戏里写多了开渠抬土，是不适

合的。农民会说：我们白天在地里抬土，晚上想看看戏，看看别的，台上一出来又是抬土，我晓得上地里抬土，也不要看你的了。我认为扩社开渠在戏里已经解决了，能意识到马多寿已经入了社，刀把坵拿出来了，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其他的东西少它一点算了。原小说中一个支书，一个主任，戏里把他们合并成一个，删掉了王金生，这样删是可以的。这是个喜剧嘛！假如插入个王金生，他是玉生的哥哥，某些地方可能妨碍喜剧的进展。戏里还删掉了菊英分家一条线，与有翼合上去，也是可以的。改编的戏不一定跟小说一个样，小说是小说，戏是戏，加入减入，加事减事，可以按戏剧的要求来决定。我们要承认，改编也是创作，如果觉得原作中某个情节发展得不够，可以加进自己的创作。只要符合原作精神，没有什么不可以发展的。至于作者本人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

戏 外 话 ·

解放以来，各个艺术部门为农村服务较多的要数戏剧。从普及基础上求提高的角度上来看，戏剧的现有的基础最为深厚，而且大部分地区都是曾经有过而且继续进行着提高工作的。不过我们这国家是个多民族、多剧种的大国，各个地区、各个剧种的戏剧工作者、领导者，对自己所参与、所指导的剧种的发展前途，都各自有些什么看法、想法，因所在地区的条件千差万别，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一致，因而各按当地现在的社会要求来研究一下如何提高，提往何处去，仍是有益的事。

不过兹事体大，我个人如道得不多，因此我不准备谈编、导、排、演等戏剧内部的事，而只想就不同剧种的组织大小、流布疏密、领域广狭、交流频疏、声调强弱、动作粗细、剧情繁简等传统习惯以及如何对待这些习惯，发表一些个人意见。

传统习惯之所以存在，固然不一定是合理的，但也都是有它存在的条件的，我们对它也和对待其他遗产一样，要批判地接受。它之所以存在，有以下三种情况：一种是它本身直至现在大体上还合乎当地人民大众的需要；一种是它本身虽然早已落后于当地条件的变化，可是维护它的人思想上有惰性，不愿及时放弃它；再一种则是它本身虽然已经不合乎总的时代要求，可是在当地尚没有创出足以改变它的社会条件——特别是

• 本篇发表于一九六三年《戏剧报》五月号。

物质条件。传统习惯存在的情况既然有差别，我们作思想工作的人就该按其具体情况分别对待。戏剧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

我不妨先从“剧团组织规模大小”谈起：一个地方传统剧种的剧团大小，是与当地人口分布的疏密相适应的。如二人转（以及类似的小剧种）之流行于东北、内蒙和西北、西南等边远山区、林区，是因为那些地方地势辽阔、村落稀疏、交通不便，大剧团到了那里，不但活动上有困难，而且台下的人还没有台上的人多，生活也难以维持。华北各省山区交通条件虽说也不甚好，可是村落较密，人口也较多；华中丘陵地带虽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可是道路平坦，而且往往有船只往来，所以这些地方便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二、三十人不等的郾鄏、小落子、四股弦、曲剧、黄梅、泗州戏等小剧种。至于秦腔、汉剧以及各路梆子等百人上下的大戏，则均盛行于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富庶之区。

全国解放以来，因翻身群众的需要、生产规模的扩大、交通条件和演出条件的改善，特别是因党的重视和戏剧工作者的努力，不论大小剧种，其演出单位都比原来的传统组织有所扩大。如把油灯改为汽灯（城市附近则用电灯），便须增加管灯的人（不一定是配光）；增加了幕布和布景，便须增加管理舞台的人；增加了乐器，势必扩大乐队；为丰富剧情，就得增加演员……这样一来，各个剧种的面目为之一新，尽管限于地方条件，其提高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大多数农民，都觉着比过去的戏好了。也有不顾现有条件盲目贪大，扩出毛病来的。如贪用硬景，弄得行李过重，群众感到迎送不便，不能再到山路崎岖的村庄去演；成员过多开支过大，按当地群众的富力，不足以维持营业，不能再为较小的村庄服务；特别是个别地

区，对面向农村的方针不甚明确，为了加强重点剧团，过多地吸收了多数同种剧团的名角，引起农民普遍的不满。这一些前进中的偏差，虽然也早已引起各当地领导者的注意，只是新的既成事实，也和传统习惯有同样的惰性，如不当机立断地采取措施，对改进工作也是不利的。

其次谈一谈剧团流布的疏密。一个地区须要有多少剧团，也是因其人口、经济等条件的不同，在历史上就形成了习惯的。可惜这种自然的流布太不均匀：一样都是农村，有的地区一年半载看不到戏，有的地区每月都有看戏的机会（包括在邻近村庄、集镇看的也算数）。有些地方条件已经变化得适宜于剧团存在了，可是传统上没有剧团，很长时期培养得赶不上需要。例如东北，按农村人口分布状况来讲，就是二人转也多是业余的，可是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和沿铁路线较大的乡镇，同样也没有足够的剧团在那里活动，而华北、华中若干地区县县有剧团，仍然满足不了农民群众的要求。解放以来，有些地方经过扩充或调整，情况有了好转，不过也有过扩充过多或收缩不当的。一般规律似乎是多也不可多到维持不了营业，少也不可少于历史上久已稳定下来的数量。精神食粮的供应，也和物资的供应一样，多不得少不得，多出大家的购买力之外便会滞销，少于历史上原有的数量，大家便要抢购或叫苦。

再次谈一谈每个剧种的流行范围和彼此交流的问题。一个剧种流行范围之广狭，与它所采用的语言流行范围广狭有密切关系，如用北京话的京剧、用中州话的豫剧、用吴语的越剧、用四川语的川剧，因为所采用之语言有全国普通话或地方普通话的性质，故其流动范围就较别的剧种大一些，在各省里，差不多又都有一种或数种采用各该省普通话的剧种，在本省或邻省边

界可以流行，范围仅次于上述几个剧种；至于以方言和地方风趣见胜的小剧和秧歌剧，它们的流动范围，往往只在一县或数县之间。以地势论、交通不便之山区，在语言方面往往是百里异趣，因而剧种较多、每个剧种流行的范围也较小；与之相反的交通方便、语言统一的富庶之区，往往是剧种较少而每个剧种流行的范围也较广。例如太行山之南端东侧晋冀豫交界处，即有怀梆子、靠山簧、平调、老调、高调、四股弦、武安落子等许多剧种流行，而河北、河南、华中等大平原，流行的剧种反不像那样热闹。也有些地方大小剧种同时并行，也和普通话与小范围的方言同时并行一样。如豫剧流行之区同时存在着曲剧，其他各路梆子流行之区同时存在着各种地方秧歌剧一样。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第一是因为大剧种剧团过少不敷分配、组织庞大不便在较小的村庄活动，第二是因为流行于较大区域的地方普通话在其流行范围中固然能为一般群众听得懂，但在群众听来总还不像听流行范围较小的家乡话那样亲切。

在历史上，不论哪个剧种，在其流行范围之边沿区，早已是互相交流着和互相取长补短学习着的（大剧种所以成其大，都是吸收了若干小剧种和邻近剧种之长的）。

近二十多年来，农民普遍参与了革命工作，打破从前小天小地的乡土之见，给戏剧交流工作造成良好的基础。例如老解放区，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不论新老区，凡是作过战、驻过兵的地方，连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和外省籍军人打过交道；在解放战争中，太行山的民工支援前线可以支援到大别山；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安土重迁的农民早已和外界交往频繁，眼界已经扩大了。他们在这些频繁的交往中，听惯了外路话，也看惯了外路戏，所以在

解放以后，看到了个素不相识的剧种演出，再不象过去那样不敢问津了。

解放以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指导下，戏剧界对交流工作，花了很大的工本，也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对今天为农村服务说来，真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解放以来，由中央和各省的戏剧领导部门组织过大小多次的观摩演出，组织过大小多次的轮训，组织过对抗美援朝、对康、藏、海南边防驻军、对福建前线等多次的慰问演出，使绝大多数剧种开展了眼界，打破了固步自封的保守观念来吸收兄弟剧种之长以丰富自己。如说剧团因扩大了组织有所提高的话，那只能算是造成了提高的基础，真正的业务提高，除从业人员的政治、艺术基本学习外，交流经验也起了决定作用。

在交流中也不能说就没有出过点偏差。如在交流演出中，有的剧种贪图向外扩大影响，相对地减弱了为原来流行区服务的责任心。在交流经验中，有的剧种产生了自卑感，拼命学习人家取消自己，结果学成了四不像；有的本来是演民间故事的，其传统风格对排演现代戏很有利，而却加上水袖、加上蟒靠去演自己不能胜任的古装大戏。

我认为交流也应该服从一些规律。在交流演出方面：一、同剧种之各剧团，均应在该剧种之流行区域作全面流行，而不应各守封疆。就一个剧种来说，节目往往是丰富的，而在一个剧团里，拿手好戏不见得太多，如每个剧团都死守一个小地区（如一个县），观众便会觉着看俗了。二、每个剧种在它流行区域的邻近地区，每年也要有适当的交流演出，以调济一下观众的口味。三、语言相差过甚之剧种，除大城市外，暂时不必交流，一俟两地人民有足够往还以后再说。四、最重要的是

不论任何剧种，均须以在原来流行区域服务为主，因为熟悉的语言、熟悉的地方风趣是有助于使感情深刻化的。此外，无剧种和少剧团的地区，领导方面可以有计划地调动一些与其语言相近的剧团去，使之久住并且就地生根——即使以后变成另一种风格也无碍于为当地服务。在交流经验方面：一、以本剧种为主体，吸收兄弟剧种之长，经过消化，变成本剧种艺术构成的有机部分来丰富自己，不要以兄弟剧种之长来代替自己的特色。观众要看某个剧种的戏，正是要欣赏该剧种的特色的，你一取消了特色，人家就不愿看了。例如北京人也爱听豫剧，可是他们要听的正是河南人唱的豫剧，假如都换成了北京的演员、或河南演员学成地道的北京话来唱，他们就不见得爱听了。服装、音乐、演技等也莫不如此。二、接受兄弟剧种的经验，要考虑本剧种流行区域的社会条件是否能与之相适应。例如置备了硬景是否搬运得了、大戏上小舞台与小戏上大舞台有否问题、剧场的条件如何（有否电、有否顶棚、有否围墙、有否座位等）等。总的说来，不论是交流演出，不论是交流经验，都应该是以为农村服务服得更好为目的。

再次谈一谈声调强弱与动作粗细的问题。这问题与上边提及的剧场条件有密切关系——剧场条件变了而不加改变或剧场条件未变而强行改变，都是不会产生好的效果的。一般情况是：适应观众在千人以下的小剧种，往往是声调柔和但音量较小，颜面表情多、粗放动作少；适应观众在千人以上或观众流动不定的庙会广场者则反是。解放以来，由于农村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善，把为神（其实也是为人，不过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戏改为纯为劳动人民服务了，多数农村为了改变由少数人所决定的摊派性的包场制，便按自己经济力量之所能及，

分别修建或改建了质量、规模各不相同但是都能卖票演出的剧场。这样一来，乐队使用不着为了镇压杂音而特制的声震瓦屋的大锣大鼓，演员也再不需要用过分粗狂的假嗓子拼命喊叫。不过限于经济条件及其他社会条件，现在农村剧场的建筑、设备和观众习惯，仍不能与大城市的现代化条件较高的剧场相比，因而其声调强弱、动作粗细也仍不能全向流行在大城市的剧种学习，而仍须保留一些农村传统的唱法、作法。例如多数农村剧场乃是有围墙无顶棚，也不设座。再者任何一个村子都无常期演出的剧场，群众对看戏的时间没有选择余地，剧团流动到村里的时候，你要不看，它便流动走了，因而每逢剧团到村演出，全部妇女都要看，也只好把所有的小孩都带进场。在这种场合下，台上如不拿出点强烈的东西来，台下就会比台上热闹得多。（传统剧种对付这种场面似乎都有点经验，我们的话剧下乡演出或者在农村成立话剧团，须得先对这种场面拟出对策。）

最后谈一谈剧情繁简问题（此项和上项似乎已经谈入戏中去了，其实仍是戏外话，因为只涉及群众习惯要求，而不在戏剧业务内部出什么主意）。一般的情况是大剧种表演的多是国家大事——如两国战争或两派朝臣的政治斗争等，因而往往是头绪纷繁、人物众多、场面复杂；而小剧种表演的多是民间故事——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平民反抗权势的阶级斗争等，登场人物多是婆媳、翁婿、姑嫂等家庭小人物，即有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也不过是一个员外呀、知县呀、状元呀，随从一个家人呀、两个衙皂呀……所构成的故事往往是一条线。这样看来，我这里所说的繁简，不过是剧目题材的社会面广狭而已。其所以在习惯上形成这样的差别，是被剧种的演出单位组织机构大小所决定的。

但这种情况很容易引起一些剧本作者的误会（特别是对小剧种），误以为农民思想感情简单化，偏爱看简单化的戏。其实不然。老一代的农民，尽管识字的不多，但文盲并非是社会盲、艺术盲，他们的生活经验是丰富的，也是多看过戏的，其中有些人对本地流行的戏是非常内行的，简单化的东西是满足不了他们要求的。登场人物少、故事线索少不等于“简单化”。林冲夜奔、周仁献嫂难道能算简单化吗？

也有人以为演传统戏简单化了不行，但是给农民演新戏（即现代戏）就须要把水平放低一点。现代戏也和传统戏一样，有《八一风暴》、《柯山红日》等（已改为传统形式的）大戏和《刘巧团圆》、《罗汉钱》等小戏之分，只要在题材上离农民所能理解的生活不太远（《日出》写上海金融界的斗争之类，农民自然无从理解），农民还是要看水平高的。与此相反，简单地写农业上的定指标、竞赛、发奖，农民反而只看一个开头就不爱看下去了。

我以为给某一剧种写剧本时候，照顾到其剧团组织之大小来使用人物是应该的，但即使使用最少的人物也不应该使内容简单化了，否则是会伤害农民的胃口的。

上述各项与戏剧为农村服务有关的戏外传统习惯，不过是举例性质，虽不是“挂一漏万”，但是想到的不一定比没有想到的多。例如专业剧团与业余剧团之关系、戏剧在农村的淡季旺季，在一个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主团客团关系等，也莫不各有其传统习惯及其宜兴宜革之处，兹不一一赘述。我之所以不避烦言多所陈述，无非为了引起有关方面（包括作东道主的生产队干部）研究剧外习惯的兴趣，以便逐一加以正确的对待，使戏剧更好地为农村服务而已。其中若干个人论断，有的所人未深，

只能就现在接触到的情况姑妄言之，希望在实际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们根据更深入地了解加以指正；有的仅就一般常规而言，如果与各级有关领导方面在因时因地特殊的情况下所作的规定有所抵触，也希望有关同志们只把本文作为一般参考品，而不因之动摇执行上级规定的决心。关于后者，我还想赘述几句：

领导方面在某一事上所作的规定，都是以下级所反映的情况和其他一些客观条件来决定的，因之，从长期看来，它非随着工作的继续深入和其他客观条件的变化而逐步变动不可，可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新情况的继续发现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还不足以普遍起到决定作用之前，除特殊地区可以经过请准作一些局部变动外，都不应该自行改变原来的规定——这也正是民主集中制的广义的运用。戏剧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

拉拉杂杂谈了许多外行话，还不知有否参考的价值，姑止于此吧。

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农村的读者同志们：

这本小书是专给你们印的，所以叫做《下乡集》，一共八篇——除《实干家潘永福》是真人真事的传记外，其余七篇都是小说：除《登记》外，其余七篇都是一九五八年以后写的。趁着打发这本小书下乡的时候，我想和它未来的读者说几句话，提个要求。

我是农村出身，是在华北的太行山区长大的。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在全国解放以前，常常能直接听到农村读者的议论。可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我的作品的主要读者不止是太行山人了；在全国看来，我们的农村人口要占到五亿以上，每一本书的印发数量都无法满足你们那个象大海一样的要求，而你们又都分别住遍我们国界以内任何地方，风俗语言各不相同，因此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行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着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目前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各方面都在大力支援农业，我们文艺界也发起一个面向农村的运动，我这本小书便要趁着这个机会去和你们广大的读者同志们见面，这样便给了我一个向你们征求意见的机会。

让我先来谈一谈我自己的主观意图，请同志们读过之后，提醒我一下哪些部分和你们自己的看法一致，哪些部分和实际

不符还须要重新了解，再作修改的打算。

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从前有些写小说的硬说他们自己的目的只是为“写小说”，一提到小说是劝人的他们就火了——他们自以为有了“劝人”的目的就俗气了。其实不论他们自己赞成不赞成，他们仍然是为了“劝人”才写。凡是写小说的，都想把他自己认为好的人写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认为坏的人写得叫人反对。你说这还不是劝人是干什么？说老实话：要不是为了劝人，我们的小说就可以不写。

劝人有劝对了的时候，也有劝错了的时候。我们的农村，在土改之前，地主阶级占着统治地位，一切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或是由地主阶级安排的，或是受地主阶级思想支配的，一般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尽管有极其浓厚的反抗思想，可是对久已形成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又多是习以为常的，有的甚而是拥护的，思想敏锐的人们即使感到不合理，也往往是无可奈何的。在那时候说的书、唱的戏、尽管也有好多是反抗旧制度、为人民大众说话，因而得到一般农民真心赞许的，但是绝大部分（只以数量说）是站在地主阶级方面来维护旧制度的旧公式化的东西，农民听了看了也往往跟着地主阶级的观点评长论短。合作化以后，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方面看，农村的阶级是消灭了，可是由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还没有消灭，因此人们对人对事的认识，就不一定完全符合于最大多数人最长远的利益。要用那种不正确的认识去劝人听从——如把实质上的坏人当作好人劝人去学习，把实质上的坏事当作好事劝人去继续仿效，便是劝错了。

我们写小说的，想叫自己劝人劝得不出错，就得先端正自己的认识。不过我们也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谁的思想上也难免受过一些旧社会的沾染，想消灭这种坏影响，一方面要靠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锻炼自己的思想感情使它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融洽起来，简截地说来，就叫做政治修养。这种修养工夫是无穷尽的——修养一年有一年之工、修养十年有十年之工，其成果要在事实中考验——对于我们写小说的人来说，就是要把作品送到读者手中去考验，让你们读者同志们广泛地评论一下，发表些观感，我们便可以从你们这些观感中核对一下我们的主观认识有几分是对的。

再者，我们写小说的意图虽说在于劝人，可是和光讲道理来劝人的劝法不同——我们是要借着评东家长、论西家短来劝人的。小说里写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是真名实姓的（人真事不真叫“演义”小说，现在没人写了）；小说里写的事情，也没有一件是真帮实底的（有时候也写真人真事，不过那不叫小说），可是类似那样的人、那样的事，又是随处可以找到的。为什么要那样写哩？因为不用真名实姓和真实事件，便容易把各类人物的特点集合在少数人身上、通过比较简短的故事表现出来，让读者作者都省点事。初看起来，那样写好象比写真人真事自由得多、容易得多，而实际上却是要比写真人真事困难得多。评论一篇小说写得好坏，首先就要看书中的主要人物代表性如何，因此写一个有代表性的小说人物，就不能象写真人那样只了解被写的那个本人，而是要了解性格相同的一大串人；在了解的次序上还不是先了解一个人而再去找寻和他性格相同的人，而是在生活中无意地先后接触到那样一串性格相同的人，然后才概括成为那样一个人。我们主观上自然是想写出有普遍

代表性的人物来的，实际上作到了几分，也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政治修养、深入生活的程度及概括能力如何来决定的。这也是只有把作品送到读者手里去考验一下才能知道的。

此外，还有个写法上的巧妙问题：写小说不能先和读者订合同，读者没有非读不行的任务，全看作品本身写得能不能把读者抓住。想要让读者读得下去，就得先摸一摸读者的喜好，用说书来比，也就是须要先了解一下听书的人爱听哪一种说法——如怎样说人家便能听到底，怎样说人家听个头便听不下去了。要摸这个底，只有个笨办法，那就是多和读者接触——多在一块读书、听书、看戏，随时注意大家的反应，久久才能摸着规律。摸住读者的喜好了，还须进一步研究大家所喜好的东西，看看其中哪些说法是高明的，应该学习的，哪些是俗气的、油滑的、调皮鬼喜好正经人厌恶的，学不得的，把值得学习的办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一套写法。我们用的写法，主观上自然也是以为能引得你们读开头就放不下的，可是实际上能达到个什么程度，还是要看我们在理解你们的心理方面、学习前人的成果方面和自己的摸索练习等各方面所下的工夫深浅而定。这也只有把作品送到你们手里听一听普遍的反应再说。

这本小书就要和同志们见面了。在本书各篇中所表现出来的我自己对好坏人、好坏事的认识有几分正确性，所写的人物有多少代表性，在写法（也可以叫“说法”）上能不能引得同志们看下去，统统希望同志们在了之后给我提出些宝贵的意见来，以便于在重印的时候加以改正，在再写新作品时候写得更合乎大家的要求。

（一九六三年五月）

戏剧为农村服务的几个问题*

今天我和大家谈几个问题，很不系统，也没有充分的准备，说不上是报告，我不是干这一行的，只是爱好者，从观众的角度来谈自己的感想吧。

我常跑农村，比较了解戏剧在农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农民非常喜爱文化娱乐，但他们欣赏的机会都比城市里的人少得多。我是写小说的，过去我只注意让群众能听得懂、看得懂，因此在语言结构、文字组织上只求农村一般识字的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一听就懂，这就行了。不久以前我才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农民买书的机会很少。全国五亿多农民，估计有四分之一都能读书，缩小到十分之一吧，也有五千万，可是小说的发行量却小得多。《三里湾》第一次印了三十万册，以后几次，每次也不过五万，需要的是五千万册，差得很远。而且工人、干部、学生都需要一部分，下到农村的就没几本了。我们说文学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农民懂诗歌散文不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隔阂；小说也接触得少，戏剧这个

*一九六三年十月，山东省菏泽地区枣梆剧团、河北省永年县西调剧团、郑州市越调剧团、晋城县上党梆子剧团在晋城县联合举行观摩演出。赵树理观看了部分节目，并在演员职员座谈会上作了三次报告，即《戏剧为农村服务的几个问题》、《运用传统形式写现代戏的几点体会》和《若干问题的解答》。

形式就成为最接近农民的了。尤其咱晋东南的群众，有欣赏戏剧的传统习惯，每年总要看上几次。虽然也有电影，人们看了电影还是要看戏。晋城是个农村小城市，两个剧团演上一个月，还有好多人看。所以说戏剧虽不是唯一的，但也是重要的为农村服务的好形式。我们一定要利用这种形式为农村服务。从各级党政领导对各地剧团同志们的生活、工作与学习等方面的关心来看，说明领导上是重视这一工作的。我们戏剧界的同志们对戏剧这一行业为农村服务的重要性应该有足够的认识。从农民要求的角度，从农村主人的身份来要求自己。农村工作有各种技术人员，我们和他们一样，也是农村工作的社会分工；农民种地打粮食给我们吃，我们给农民演戏。这种主人翁身份就是群众观点。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要辜负农民对我们的要求。有的村一年只能演一回戏，人们象过节日一样，邀请亲戚朋友来看戏，碾粮食，换新衣，非常隆重地迎接剧团的到来。我们在这短短的三四天中给人家一些什么呢？我们必须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向农民群众负责的问题。

编戏，为谁编？改戏，为谁改？为农民群众。不是为上级，为汇演，也不是为和别人比。过去我们有些剧团为了汇演，为了夺锦标，关起门来搞，这不对头。好戏应该处处受欢迎，农民群众欢迎，领导欢迎，才是真正的好节目。参加汇演的节目有的是久经考验的戏，如《李双双》。有的则是请些专家关起门来加工又加工的，反而不受欢迎；有些没加工的不受重视的戏相反地获得好评。例如五六年咱们赴京演出《两狼山》，也花了很大力气，并没有引起人家注意；《三关排宴》只合了一个下午，演出以后都认为是好戏。这就因为《两狼山》是为上级准备的。我在北京看过好多会演，出现这样情况非止

一次。

我们都是农民出身的人，家庭都是公社社员，我们应该为农民服务，对农民负责。夺锦标、出风头，个人犯了错误不好，就是集体有了这种方向不明的倾向时，也同样会犯严重的生产路线的错误，成为一种爱出风头，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集体。我见过一个生产队农业自己经营，副业是雇人经营，而百分之六十五的红利是靠副业，这是什么经营方式呢？我们文艺界离名利两字最近，最容易引起风头主义。农业上有几亩好庄稼，人们去参观不一定每块地都走到，去看看，可是戏一出来就有人看。曾记得有一位领导同志说：“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英雄们不一定人人都出名，可是写《上甘岭》的人却出了名，为战斗牺牲生命的人反而没有写一篇文章的人出名。”这就说明我们是容易出头露面的，必须时时告诫自己不要有这种坏思想，千万不要为一时的名利所迷惑。有低级趣味，爱出风头的人就爱表现自己，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赢得了掌声，招来一些不正常的效果，因而引导人们往不好的路上走。《打面缸》本来不是低级趣味的，但是有人往坏处改，改来改去越改越低级。再加上有些观众要求保留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于是就保留并发展起那些不正常的效果来。特技表演也是同样情况，有些乱向不合理的部分发展。《三家店》中秦琼有一个“朝天蹬”的动作，这本是一个雕塑美的动作，但有的演员学了这个动作之后，就搬起脚来转三圈，群众一鼓掌他又再来一次，很没意思，完全是为迎合部分观众的低级口味。有个别演员就是吃不住掌声。有掌声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加工再加工”，这是不对的。要弄清楚群众为什么鼓掌，然后再决定取舍。《杀四门》的女兵也有“朝天蹬”动作，若是为了迎合部分观众低

级趣味，发展这一部分动作，《杀四门》就不成其为《杀四门》了。《双绒花》的家郎要去翻个跟头就坏了事了。《连环计》王允、吕布要是为了效果增加一些不适合身份的动作，也同样会弄糟的。我们对观众的掌声，要很好地研究、认识。我们希望多听掌声，但要考虑为了什么。群众看越调《三审刘玉娘》判清案子以后，热烈鼓掌，这是为内容鼓掌。《八一风暴》结场时，公安人员打死敌连长，及赴宴中胜利而归，都引起热烈的掌声。这都是给内容鼓掌。不能是凡鼓掌的地方就该发展。我们编戏改戏都不要有个人风头主义或者集体风头主义，而要考虑给农民一些什么东西。演三天戏，只给了人家些无害的戏，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有什么帮助？我们说主题思想，就是指让群众看了戏，思想上起什么变化。没有没主题的戏。我们对每一个节目都应该滤一滤，主题思想不仅仅是概念，要通过人物表现出来。写小说塑造好人物就解决了一半问题，如果没有人物，或者人物仅仅是个概念就不行。五八年我们农村的同志，好拿古代戏剧人物来比，比如穆桂英、老黄忠、罗成、佘太君等，成了人人宣扬的英雄榜样。历史上的罗成、穆桂英究竟如何，不见有多少记载，这些人物形象，都是从戏剧方面来的。

戏剧要通过人物表现，人物要写不活，教育意义就不大。这种教育，有时只是说说，有些就当模范来对待。《三里湾》中几个反面人物对人民起告诫作用。好人是教人学习，让人同情；坏人要使人恨，或引以为戒。襄垣剧团演《小二黑结婚》后，魔魔道道的人都怕人叫她“三仙姑”。过去也有些人意图很好，但写不活。《送印杀差》的马强，人们就不易忘掉。

《杀寺》也很好，但党飞雄这个人物给人的印象就不太深刻。徐林、张飞、刘都裕都不一样。《党飞雄杀寺》政治意图好，但

人物塑造没有前几个好。这些都是塑造古人，但作者又都参考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三国演义》不是三国人写的。《红楼梦》开始的一段议论也是写书人对文艺的认识，没有提这是哪朝哪代的事，说上汉晋隋唐反而不如不写好，艺术上有真实性就行了。古代人写作品，都是把当时的人物写进去了。文艺界曾经在写历史剧问题上有过争论。我没有参加这个争论。但我认为，历史剧是否必须符合历史情节？这要先给历史剧下个定义。郭老写的《武则天》是历史剧。他搜集了许多有关武则天的历史材料，运用正确观点，分析人物，找出典型事件，组织人物。沈部长写了一本书评《卧薪尝胆》，也是谈历史剧。

小说戏，光凭历史记载，构不成戏剧，小说戏要对历史材料永远也对不上。《九锡宫》就是这个情况，程咬金有一百二十岁，最小的孩子也得六十岁，这些细节就不能细考究。既是小说戏，就看小说如何，不好的小说不一定写。《连环计》的人物是《三国演义》中就塑造好了的。小说底子要不好，很难改；人物不很突出，也不好改。不论哪个戏，人物是一个关键。没主题思想当然是不行的，但人物还是主要的。不论新戏老戏，都要以写人物为主。戏剧的教育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效果不一定那么快，但人们是会受影响的。我小时候晚上跑十五里到湘峪去看戏，看完戏回家天就明了。现在我没这么大劲儿了，但还跑四五里去看。农民们可比我腿勤，十几里远也去看。看了戏不一定变成戏中人，但还受思想影响。八路军三八年到太行山来动员参军，那些受地主、日寇压迫的人参加了革命，他们有浓厚的革命英雄气魄，也有拿起枪杆就害怕的人。当然阶级意识是一方面，但和他们在生活历程中，看戏所受到的影响也有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记得我小时候去驮煤，走

过两个河滩，三五个小孩就你扮罗成，我扮张飞打起架来，这就是同我小时候看戏联系起来。剧中人对我起了作用。这就是戏剧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看戏不一定那一次，也不一定是什么时候，就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每看一次有一次小变化，集中一二十年变化就多了。我们总结一下过去就知道，戏剧感动人的是人物，不是故事。公式化的小说，如公子投亲遇难，小姐赠金，中状元，大报仇或者继母虐待、报仇雪恨。说书的说得更多：《三红传》（周天榜投亲）、《金镯玉环记》等等。虽有名作，也跳不出圈圈。我们从小就看它，看多了就串了，这是故事情节雷同的缘故。但张飞、徐猛、秦始皇、周瑜、赵云这些人物就串不了。戏好戏坏，人物不是唯一的标准，但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准。

政治意义，主题思想第一。主题不好，艺术性越高，危害性越大。《奇文传》中故事是斯文人胡里胡涂遮盖丑事，让胡奇梅认了错，包揽起来就拉倒了。这出戏如果作为讽刺戏演，倒还可以，但把剧中人作为正面来表扬，老师傅调解纠纷，硬叫胡奇梅认下私生子，这算什么问题？叫人学习什么？反对什么？《珍珠衫》（四川叫《酒楼晒衣》），一个坏旦拿着珍珠衫夸口占了妇女的便宜，使得无辜的妇女遭受不白之冤，这出戏演得越好，作用就越坏。《转运汉巧逢洞庭红》就是一个投机商人贩上桔子，到海外发了财，这个商人完全是碰运气，人物写得越生动，就越起坏作用。所以主题思想还是第一。政治标准必须放在第一。

上党戏传统东西很多，但是好的少，不好的多。有的不用改就可以演，有的需要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最近一期《戏剧报》上谈到怎样推陈出新。已经谈的不少，大家可以看看。

咱们剧本有一个常常不统一的现象，有时滤几百本戏，滤不出好的来，有的可以打打主意，但要费很大力气。我们对戏剧遗产应该分一分类。打一个比方说：在战争时期，有些村子做了战场，战争过后，只剩下劫后余灰，房倒屋塌。咱们到了那种地方，就得根据情况分别对待，看看哪些地方需要修补的，哪些整理整理就行，还有哪些要大修，哪些可以拆砖拆瓦。有些是连砖瓦也拆不出来的，又该怎么办？戏剧传统也就和这种情况差不多：有些架子很好，只要稍加整理即可；有些架子不好，但还有些可用之处，如《雕翎箭》中有《杀督》一折可用；有的则百无一用，连砖瓦也拆不出一块，就只好不用，不能勉强。面对这些情况，应该就戏弄戏，不能一概而论。古代的作者不知道有社会主义，不可能替我们打算，但古人塑造的好样的英雄人物对我们也有借鉴的作用，小罗成、穆桂英都可以用来鼓舞现代的人们，这就是我们对待遗产应有的态度。

选择遗产有两个标准：主题思想与人物。主题思想正确，有鲜明的人物（正面的，反面的）这就是好戏。如果主题思想好，人物概念化，就不好办。主题思想不好，人物却很突出，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不能迁就，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这些问题。

概念化的戏，例如公子遭难，以后又中了状元，得以报仇雪恨。对这样的戏，我们在认识上很不统一。有人认为这是正义事件，鼓励了正义。这种说法值得考虑，我们必须估计（它）的实际作用，这种中皇榜，大报私仇的情节和《水浒》中梁山泊好汉劫富济贫的情节完全是两回事。梁山好汉是官逼民反，成立了另一组织和统治阶级作对。但是这些高中皇榜的公子们却是投降于统治者，或者说是“人伙”到统治阶级中去。

旧社会有的穷家子弟上学读书，大学毕业了业，当了区长，还给阎锡山卖土、收税，结果是入了统治集团的伙，不入伙，就当不了官。和他有关系的人也因为“一人成佛，九族升天”，爬上了统治阶级。中状元报仇，就是这类思想，这种思想还有一种副作用，穷小子一旦得中，有轿有马，呼奴使婢，洞房花烛。这对今天中学毕业后，还乡生产的青年学生们，会起极大的副作用。我们只要从群众角度来看问题就很容易看清这些问题，也许我们看得狭隘些。等思想提高以后，发现了错误再说。但是在现在我们只能这样看问题，只能就现有的水平，先从每个节目在农村起到的具体作用着想。

有时有的戏稍加整理，消消毒就是好戏，我们看了几天戏，就会发现一些苗头。地主和长工的故事，是民间传说，这是人民的创作，描写长工用智慧摆弄地主。《双绒花》、《锦缎记》就属于这一类（《锦缎记》是枣梆移植二夹弦的）。当然其中有一些缺陷，好象破墙一样需要修补修补。例如《双绒花》中“休书”这个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就向青年们解释清楚。而且休书的内容都是封建标准，旧社会休妻就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不起好作用。怎样改呢？应该保留其中的风趣，休书可以改成退婚文约，撕文约。对文约，仍可保留下来。前面加的卖绒花情节可以去掉，邓文化到崔府借钱进京赶考，虽然有点公式化，但并不妨事，应该紧紧抓住地主和长工两个人物。两个老婆是次要问题。戏应该从长工与崔能开始，长工让地主花钱，必须让他能掌握情况，送银子不是为地主服务，而是让地主出丑。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还得姑娘上堂对质，小二可以表面反对，实际却是他安排的，当然他是高兴的。戏的尾巴可以不要，崔能叫小二，小二叫崔能，然后小二牵马走就

很好，不必再去侍候邓公子。申科同志说让小二去运输，这有什么不好？其它地方也还有别的小问题，我一时还想不起来。总之，我觉得这个戏架子不错，只是门呀，窗户呀需要修补。虽然现在没有地主剥削，但阶级斗争还是有的，新的资产阶级也还有，农民有智慧和他们斗一斗智，有什么不好呢？就是方法不太正大光明一些也没啥，我写的《三里湾》中满喜就有这种性格。

《杀父劈兄》是《云台山》中一折。整出戏很一般，但这一折给人印象很深。这戏要不要保留，怎样修改？我还没考虑成熟。大家可以研究一下。《雕翎箭》本来是《女秀才移花接木》发展的，很不合情理，别的印象很不深，但《杀督》一折就保留下来了，整个戏不好。《雪花山》也属这类，同志们可以看一看。

改戏中抽一段、补一段，补的必须和人家原来的差不多才行。越剧《红楼梦》改得很好。小说改成戏必须有取舍，换块砖有高有低就不好。《天波楼》就不太好换，好比砖房补块土坯就不好。改戏要认真，不要苟且从事，多考虑考虑有好处，考虑成熟再搞最好。写小说也是一样，有的人写出草稿改了又改，有的是考虑得差不多最后一遍就成，两种办法都可以用，不过都得认真。写东西要时间，不要光图快，光图快就没有质量，吃现成饭可以多一些。搞创作几年搞出一个好的来就不错，前几年我们赶过快，搞一个戏唱几天就丢了，不能保留下来，快反而是慢，慢倒反而是快。

要搞好一个作品，准备工作很重要。而这个准备工作又是一个长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要经常学习。特别是编导，要掌握全局，政治文化都是必修课。政治学习是政治认识问题，我个人有一个体会，二十年前我打过主意想“扫荡”旧戏，出

一个新戏，“扫荡”一个旧戏，犯了粗暴的毛病，后来渐渐的才改过来了。

第二是文化学习，这包含读戏剧以外的作品，尤其是一些文学名著，都需普遍地读一读。《日出》、《雷雨》、《八一风暴》、《红楼梦》都可以看一看，读一读，扩大自己的眼界。有时在剧词里出现一些奇里古怪的字或词，这不是学得多，而是学得少，学得不深不透。读过唐诗的人编个快板也不一样。那些难以费解的词句，说明作者读的少，乱用词藻。我们必须多读书，读了很多书才能分辨高低。每个人的作品都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记得我小时候看《黄自元贴》，就认为他写得很好；后来见到别的好字——如这次印的剧本封面的魏碑体等——才感到黄自元贴差了。会写好的，就是流水账也写得很好。看了《长生殿》以后，咱们可以想想，就那么个故事，我们能不能处理成那样子？表演上也是一样，要参考高的。主席说，给农民讲革命道理，也要讲半点钟哲学。咱们学习的时间虽然不充分，光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也好。

还有一点就是重点补课，政治书籍读得少光读文艺作品，就得补补政治课。文学作品读得少就得补一补文化课。文化低有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老军官，他们生活经验也很丰富，文化水平低，就不一定写出好作品。如同高玉宝同志没文化，补补文化课。有的同志不熟悉生活，就补一补生活课。这都是非补不可的课程。要把一般学习和重点补课相结合，演员们也不例外，同样要学习。

总结经验是科学的第一步，有的同志经验丰富，但是说不出道理。例如大将出场亮相，老听锣鼓，人站住不动，那是为什么？那就是敛神聚气，表现大将的身份、气质，象这些东西

都需要很好的总结才好。

限于时间今天不再多说，关于经验和科学这两个问题以后再讲吧！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晋城）

运用传统形式写现代戏的几点体会

今天想具体谈谈创作问题。创作（不论演员和编导一样是创作）离不开生活基础。我不爱谈创作经验。创作不多，净谈经验，没什么意思。谈剧本创作经验，也实在差劲。我写过《万象楼》和《开渠》。现在就谈谈《万象楼》的形成过程，然后谈谈理解。

《万象楼》是反迷信戏，主题有广泛的教育意义，是一九四二年写的本，距今已二十一年。写反迷信这一类戏，我有点生活基础。同志们赶不上那个社会，赶不上体验那种生活，只好不体验，也不需要体验。我祖父因是三圣教道会的信徒。我舅父信的是清茶教，我老丈人信的是太阳教。三圣教道会总堂口在磁县，清茶教在阳城固隆。三圣教道会有两支，我祖父信的是三华堂，我随祖父念三圣教道会经，桌上摆九宫，九件器具，每天吃斋，吃饭前打供，每天烧香四次。三圣教领导人叫先生，清茶教叫掌柜——神在柜中，柜中放两半盆清水，清水上放筷，平时不开。教徒不用烟酒葱蒜。每天检查一次水缸。缸里若有了什么东西，如蜘蛛等，认为是得罪了神。柜里筷子受到震动开了叉，也认为是得罪了神。太阳教一年四季大敬神。我碰上过大敬神，摆大供（素供）完了之后，就吃供献。太阳教会按摩，得了病，请教给治病，治好了病，入教，一人一对，两口齐入，我高级小学毕业就十七岁了，已结了婚，和前妻一起加入。入了之后，也敬神，上过坊口。敬神在楼上，四乡八

方都来。各村有位置的小头头可以上楼,其它在下面。新人教时准上楼一次。清茶教敬神不让外人接近。小时在外祖母家,人家敬神,就把我圈起来。我当时所处的环境,就是这样一种宗教的迷信的环境,只好在那里活下来了,没有那种生活的人,不要体验它。“五四”运动时,我在高小。后来上长治第四师范,接受了“五四”精神,才反迷信。在那时,认识了阳城一个王春同志,比我小两岁,但比我高两年级。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当时迷信,不吃肉,敬惜字纸,把带字的纸收起,烧成灰,撒到河中。王春开始奚落我,我和他辩论,每次都输,输了才接近他。我二十一岁才开斋吃肉,当时还怕犯咒语。我是半途还俗,到现在是吃肉的半把式。原来我自己是很迷信的,以后才懂得了一些道理。据说,三圣教等二支都是白莲教的遗教,组织农民暴动被镇压下去,就改了名字。立教时还有进步意义,以后被人利用。我从师范回去反迷信,反到舅舅家,被教训了一顿,说不服他。到了抗战开始,我又碰上王春。我被学校开除。王春勉强毕了业回家当了教员,后当了县志的编辑。我在长治参加了牺盟会。他是在阳城参加的。我调回阳城,又碰到了他。有一次我和王春谈起我舅舅在教的事,说不管迷信不迷信,人家还是行善的。他说你还不了解清茶教的底,我给你露露。王春在固隆教书,掌柜的在楼上,王春去打牌。王耀庭老师也去过。他描写那个楼说,佛前有方桌、有条几。打牌时,把方桌往前移,几桌下,放个尿盆,大家在那盆里尿尿(就在佛祖位下)。在那楼上,有里外间,里间可以过瘾,可以腐化,可以打牌,佛坐前可以尿尿。他们的弟子在河南、湖北都有。远路弟子来了,大敬神,就不让打牌尿尿,收拾干净;徒弟走了,再干。听罢这事,我想写戏,但因抗战开始,没时

间。这是一九三八年的事（在这以前，我就编过《巫婆祭灶》一出小戏）。一九四一年到了涉县，黎城离卦道打过抗日县政府，破了案。我当时在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工作。领导问我能否写反迷信的戏，我就把迷信、反迷信的材料，作了剧本的主要来源。那李积善是农民，虔诚的教徒，这种人我常碰上。受骗，一直受，并没有发现自己受骗的人很多。这个戏，主要素材就这些。

这些天，看了两个新戏，解决了一些同志认为新戏农村没人看，卖不了票，只能配搭的思想。看了这两个戏，情况不是这样。《三里湾》常在晋城演，但上座还是不错。我见到润城的人，听他们说，在乡村也是受欢迎的。听宣传部田部长说，在农村一个台口演三天戏，农民要求得有一天演《三里湾》。《朝阳沟》场场满座。新戏不上坐的话靠不住。新戏得是好戏，不好的当然不看。

我今天谈谈运用传统形式创作现代戏的一点体会：

材料的来源，非从生活中来不可，任何作家（不管是戏剧、小说、诗）离开生活不能写东西。在生活中，细心观察人和事，在我看来，这是次要的。作为旁观者，作为观察员是这样，作为生活主人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热情，有自己的人生观，碰到和自己人生观统一的，就赞成；不同的，就反对，不是注意不注意的问题。在我迷信时，有人说不信佛，我就和他斗争，维护佛爷尊严。我不迷信了，我就要说明那些迷信的人，和他们抵触。他忘不了我，我也忘不了他。参加了革命，我就和维护宗教一样维护革命。对革命有利的，参加革命、同情革命的，自然就成了朋友。政治热情放在第一位，注意观察是附带的。和自己主张一致的、反对的，你都忘不

了，想忘记也不行。我在一九四九年写过一篇《也算经验》的文章。我说我的人物不是找的，是工作中碰上的，想走也走不开的。一个生活，一个政治热情，一个认识。政治、文化、艺术、学习、生活体验都是经常的。政治认识对了，热情才准确，认识错了，会把事情闹错。如果迷信时，我一定会写个拥护老佛爷的戏。《黄氏女游阴》就是颂扬鬼神的戏。那不是文学？那不是人作出来的？所以说，政治第一位。这几个方面要齐头并进，哪方面有缺陷，在一定时期，就须要突击补课，不补起来不能干。要满怀政治热情，和自己有关系的忘不了，生活细节要观察，但不是主要的。

谈谈主题。主题的确定，写作动机，达到什么目的？这也是政治热情，责任感。碰到离卦道打了县政府，领导上没叫写，也要写。领导上号召某个任务，如果开始就是群众中的一员，时刻注意群众中的政治问题，会比领导发现得早，帮助领导了解群众中的问题。碰到该表扬的就表扬，该批评的就批评。作家应该走到时间的前边，至少对上级的号召，不应该感到突如其来。如反“五风”，知识分子会感到突如其来，还得领导介绍若干材料，才会相信。可是住到有浮夸的地方，就会在中央未发现问题以前先发现问题。中央不知道就应该反映，有没有这种人？有。不然，中央不会知道，也不会有反“五风”运动。正因为有好多责任心强的同志把问题反映到中央，才造成运动，最后还是正气压到邪气。作家应该早发现早写，不要等上级号召才去写。《河北文学》上有人写了《老坚决外传》，《火花》上有人写了《四年不改》，都是早发现早写的。这次阶级教育也是这样。几年灾荒，助长了新资产阶级的出现，助长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弄到钱就剥削人。这些事早就抬头

了。我们应该早发现。“当干部不如种红薯”，有好多落后干部因此回了家。地富乘机活动，买卖婚姻，阴阳先生，牛鬼蛇神等等。我们就没看见？写作者的亲戚、邻居不能没有这些事。这次阶级教育，作为全国性运动，如果在生活中早注意就会早发现，不用去找材料。领导上的号召是启发，不是压力。比如说，如何打击投机倒把，建立贫下中农委员会，我们就应该写写这方面的经验。有了上级的启发，应该正合自己的意思。平常不注意滑过去了，受到启发，回忆起来，再写作也可以。如果热情再低一点，平常没有注意生活，到领导上号召时，现去找材料，那整天赶任务也赶不上。每个作者都应有生活根据地，以主人的身份帮助他们把工作搞好。如果谁搞破坏，哪个干部叫人拉跑了，你还感觉不到。如果上级下来了任务，也会感到突如其来。

人物的形成是积累的，我写何有德不是根据一个人。我在涉县一个村里碰到一个收核桃仁的掌柜，谈起话来，总有不遇时之感，总感屈了自己的架子。另外，还有我小时敬神老师的形象；有王春说过的场面。何有德上场那段唱，就是说，没有共产党，没有你们这些人，我是大的。何有功和吴二是流氓，什么人也吃。一个是滑溜溜的流氓，一个是铁杆子流氓。如何有功介绍自己身份那一段，就说明他的流氓性质。何有德和吴二原来是上下级，吴二和日本人勾搭上，地位高了，又来勾搭何有德。如他说作洋官，吃洋饭，当了副队长，便把何有德给吹住了。铁杆子流氓，好时嘻皮笑脸，翻脸就不认人。当何有功没有答应下来时，他翻脸要去找别人！就是这么个东西！李积善是一般道徒中的小头头，老老实实，受人欺骗。一当他发现被欺骗，报复也是厉害的。我把农民的老老实实的善良性和

报复性结合起来。反迷信，最好从内部揭发，现身说法，比八路军揭发说服力更大。事实上从内部出来这么个人物不容易。剩下的人物不说了。

集中人物不是加法，不是这一个加那一个。是某一种人某一类人总起来形成的。访问英雄模范，写不成英雄模范。只能说，不能表演，事过后才去访问是写不出来的，要写出来，必须熟悉生活（也就是要有感性知识）。生活要广泛，要有积累，积累多了就好办了。要爱憎分明，只有爱憎分明才注意的细致，对好朋友，访问他的长处，你会说他一二百件事，这叫摸透了。和他一起上街，你知道他要干什么，到了百货公司，还知道他要问什么东西的价钱；分开了，你知道他要到哪家朋友家去喝酒，到哪家戏院去听戏。对仇人也要摸透了。如向地主借钱，找什么人去说，说什么话，地主才借，说什么话，他不借，这也摸透了。然后，移花接木，把同一性格的人的事可以移过来。如写李积善，我知道某些受骗的人，发现了自己受骗时的报复性，把报复性给他安上。如《水帘洞》，摸透了猴性才能演猴。

设计题材编造故事。编故事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人物。从事情发生的过程中，表现人物的特点。故事是为人物而设的。摸透了人，才能任意驱遣他，把他放到任何环境中去。叫“糊涂涂”参加公社行不行？参加了公社还是“糊涂涂”性格。这些人不是死的，有的往坏处发展，有的往好处发展。范登高到了六〇年能不能破坏？很难说。要看个人的努力和环境的影响。个人努力多了，可以克服环境的影响，努力不够，环境会影响他。《三里湾》可以写到高级社，也可以写到公社。

故事的结构务求集中，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多的效果。在戏

剧上更是这个要求，集中但要具体，这和生活经验有关系。没见过的，不太熟悉的，具体化不了，不能展开场面描写。如战斗场面我没直接参加过，在我的小说中，就没描写。要写自己见过的，类似的生活细节可以嫁接，没有见过的就不行。真正虚构的没有，不是借这块就是借那块。我看四股弦《贺后骂殿》，太宗夹着玉玺来回跑，也是借农民的生活，如正位要求，就和帝王生活脱节。不过用在这里丑化他一下也可。小的细节没见过，总是写不好。戏要求时间集中，前因后果要补叙，但必须尽量避免无感情的叙述，尽量避免人物单纯为叙事服务。叙事要带感情，也可以分开来叙。过去我写过《打倒汉奸》的小戏，演半点钟，都是叙事，这种叙事是带感情的。

戏的分场分幕。一幕，是一个大段落。老戏打一个大回场，也算是一幕。新戏是连续的，一个情节在一个时间内发生。每个段落要使成为一个体系，一个风趣。《雁门关》中，《坐宫》、《探母》、《刺宗》各成一个风趣。《万象楼》让吴二等人出出洋相，叙叙关系也算一种风趣，李积善动员他女儿赴会又是一种风趣，楼上又是一种风趣。有时，戏虽是原场，内容截然不同，还是拆开好。

道具性的人物应压缩到最少的程度。主要人物不应出场过迟。老戏中，有的快完了，又出个主要人物，这不好。总得在一场二场弄出来。

伏笔要伏得稳，正常，不要叫人感到多了一块，自自然然才好。《万象楼》中伏了满街香上楼。本来她可以不去，为了作证明，把她伏上。伏笔要伏的叫人不注意，到时候出来。

矛盾双方的人物，在次幕出现时，线索要弄明。老戏中常用一方主帅上场下场，另一方元帅上场下场，然后双方见面打

起来。有些戏把子乱用，容易弄错了视线。

突出写人物，无非是语言和行动，再没别的办法。环境是陪衬，是烘托气氛，象《雷雨》中的雷，《四明山》的雷等。主要应是语言和行动。语言要符合人物身份。何有德听见吴二来了，他以过去的绅士派头对下边人物就不在乎。当何有功说吴二穿得光溜溜，可能与日本人有勾搭，他才注意起来，让吴二来见。何有功对吴二的态度不一样。这符合他软性流氓的身份。吴二是巴结人的小人，会应酬，所以他一见何有德就叫局长。何有德正不得意不愿人家叫，吴二就马上转了口气，叫何先生。他会应酬。何有德一发感慨，他就乘机而上。何有功是势利眼，一听说有官可做，马上同意。何有德比他成熟一些，得闻闻吴二有多大的来头，但不便直接问，找了个好称呼的借口，问他担任何职，吴二很精明，知道对方不相信他，就吹了何有德一下。何有德马上改变态度，叫开了吴大人。这是出他的洋相，其实生活中不会这样马上叫吴大人，这是传统戏的夸张办法。话剧里不许这样做。每一句话要符合人物的身份。要设想是谁在这里说，是谁在这里唱。老戏中有“水词”，有时是代表音乐。如“迈开大步把门进”、“钢刀一举人头落”，做了就做了，你说它干什么？在新戏中不要用“水词”，人物的话不能随使用，要逐字逐句考虑到身份。

谈谈风格。传统戏注意它的歌舞性。话剧是从生活中加工。歌舞可要把生活改为歌舞。《万象楼》注意舞蹈性不够。这里说的舞是指广义的舞，如写信有写信舞，骑马有骑马舞等。歌舞把生活变了。侯宝林先生说：演员骑马把马头马尾砍了，只骑个马肚子。姑娘骑马只能骑上个蛔蛔。那是骑马舞，已经不是骑马了。他又说：“戏上请客，不摆席，菜也不配，连花生

仁也不要，一盅酒中什么维他命也有了。”把生活变了，不是生活原样了。歌，等于作诗，不是原话。“静静悄悄，并无一人，待咱下手吧！”“想当年在税局瞒上欺下”等都不是生活中原有的，在生活中不一定说。舞台上有些话是表明心迹，不能算话。何有德上来唱那段是心上的话。道名姓本来不是现实生活。隔着袖子说的话，不能叫对方听见，袖子产生了隔音效果。唱词是念诗，不一定是话。但也有诗里诗外，有些地方还是话。如何有功上楼时唱的，“在楼下听大哥一声呼唤，耽搁我何有功半口大烟，迈开了报丧腿上楼去见，问大哥有啥事与我商谈？”第四句是话，是诗外，而当诗来说的。

行文气势。有的文章谈起来清清利利，有的排山倒海。戏，也要讲戏气。音乐上四十八榔的跌断桥，文章也有突如其来的转折。“文似看山不喜平”。《万象楼》第三场开始闲闲散散，和和随随，一直到何有功想出了计策，改《流水》为《大板》，到李月桂和何有德在场，这是冷场。等吴二出来调戏月桂，到强奸，戏就紧了。什么时候断、什么时候连，我考虑的比较多。戏，有时候想几回就能想起什么时候有劲，什么时候无劲。从李月桂开始戏紧，但也有顿挫，后又紧，但线索分明。

话可以重复三遍两遍。如打抗日县政府，何老二说了又唱，何有德复又向弟子重复了一遍。三遍意思一样。这样重，不讨厌，就应重。文章有繁简，该繁就繁，该简该简。如李月桂上楼多唱几句，但没那么多事可说，所以就安了四句唱。

词句问题。句句落实。特别是唱词，能不放空，就不放空。在《万象楼》中也有个别句子，如“讲说一遍”，但不多。句句要配合人物感情、口吻，不合人物身份的、没用的，

不要错过。要用上下韵，上仄下平。我宁可放一年不写，也不错韵。既是韵文，就要都用韵，不凑韵。《万象楼》中只一句“倒在了平川”。平川是凑韵用的，不是个事，是楼上，不是平川。自己作过的文章，有一个不如意，我能记十年；有时，别扭地方在稿底哪个角落，我都记得。不能凑韵，要返，要妥实。“戴珠冠，穿霞帔，大堂所过”，“所”字就不通。“好把奸贼”的“把”字也是个好奸贼之讹传。有时通了，但不妥实。如“迈开大步把门进”，通是通，不妥实。不要用生僻的字。《三关排宴》中有些词也生僻，如“请示教益启愚顽”，象酸溜溜的老先生说话。有些话是说的，如“互相合作闹生产”就不是唱词。唱与说的关系不是因说的多了，唱一会，唱的多了，再说一会。该说的唱了不得劲，该唱的说了不得劲。到该唱了，哪怕是水词也得唱，水词到那里就不水了。哪怕只有个“嘀咕嘀咕嘀咕”也行。动感情的地方，有诗意的地方，要唱，非唱不可。说理的地方，唱不如说。《蝴蝶杯》、《三堂会审》就是唱不如说。

就说这么多吧！我没有充分准备，只能感想式地想到什么说点什么了。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晋城）

若干问题的解答

——写戏、改戏的标准

关于写戏、改戏的标准很难说，现在读两段文章供大家参考。一篇《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正确估价戏曲遗产》（《江苏戏曲》·田夫）一篇《论整理戏曲的工作》（《戏剧报》一九六一年九·十期合刊）。

这两篇文章的精神，前者谈到历史剧虽有作用，但有它的局限性；后者谈到虽有局限性，但仍有它的作用。想打个比方：过去有一个人，为了救父亲打伤了人，被打伤的给师爷花上了钱，叫重重处罚打人的人，师爷在状上写了“虽系救父情切，无如伤痕太重”，打人的人又花更多的钱要师爷成全，师爷就给他改成“虽系伤痕太重，无如救父情切”。虽然反正都能说，但总有一个更接近合理。前篇文章理由是对的，但不够全面。后一种说法就比较公允。仍以修房子为例：封建时代修的宫庭殿宇，琉璃瓦，大屋顶，现在修洋楼，再仿造庙宇去修就要受批评。有钱去修饰下边。如果上边花的钱比下边还多，那就不合算了。谁去上边去住呢？可是，已经修起的也不必要再去拆了，要加以利用，还要加以保存。拖拉机虽好，但不能扔掉锄头，去等拖拉机呀！能用就用，能改就改，改得不合理，就不如不改。比如：衣服是封建社会的，都是一个领子两袖口，现在我们的衣服也是呀！就是到共产主义也不能改成两个领子一个袖！不过，古代人的衣服跟现代人的衣服也有不同之处，现

代人的衣服更适用更合身罢了。

罗成这个人，在广大群众中还是有些鼓舞作用的。我小的时候就曾和我的朋友玩耍过“张飞”战“罗成”。要说瓦岗寨，是农民起义，领导人是不是全是农民呢？就说罗成吧，他是宦官家庭出身，后来参加了农民起义，最后又投了唐，被统治阶级利用了。这样看，罗成是不应该表扬的了！看问题不能片面。罗成的故事没有说他怎样压迫农民，后来投唐投的是李世民，这是个有建树的皇帝。再说，故事也不是写罗成投唐后的事。就拿张文英演的《罗成辩帐》说吧，罗成就给人以鼓舞作用。在《乌鸦山》中，罗成去劝说杨柏（杨柏虽和隋炀帝有矛盾，但他有忠君思想），两个人都说道理，但观众是同情罗成的。

阳城剧团提出要改这个戏，我考虑这个戏是封建文人改坏了。原先第一场出现的人，后边就没有了；《观花》一场也没有什么意义。我看直接写成阳关就行。再说李伯祥这个人，第一场出来坐了坐场，观花时碰了一下就跑了。有的说，到《咸阳关》时，那个李贤士就是李伯祥。这个戏的根据后来在鼓词《破孟州》中找到了。故事里有乌鸦山，乌鸦兵，被瓦岗兵破了，杨柏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有杀子之仇。杨柏守的是怀庆，不是咸阳。李伯祥与瓦岗有连系，可能与罗成谈心事。尼姑可能是杨翠花师姐。李伯祥被剿府，杀出去投了瓦岗。隋炀帝不信任杨柏，杨柏被两面夹攻，与瓦岗和了，投了瓦岗。四个无聊文人可能是告密者。我建议国辅同志照这改回来。

对待革命利益要全面理解，从当时当地了解，站到群众这边想一想。不要说一声好就干，说一声不好就停。就戏论戏，全面看问题，分析它此时此地起什么作用。《罗成辩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不要先给罗成划成份。我上一次说到状元戏，也不

是说状元戏都不能要。《锦缎记》也是状元戏，但是很好。不过，宣扬状元威势的场子可以不要。有副作用的戏也要看副作用对主题思想有多大影响，影响不太大的，也可以演出。仍以住房子为例：梁柱全坏了的，无论它油漆的怎么好也不能住，如果仅仅是掉一点土，仍可修补居住。

政治性再强而没有艺术性，也不过是种概念性的讲话，人们是不会喜欢看的。当然，没有政治性是不行的，政治性是第一，但要通过艺术性来表达出来。

谈谈风格问题

过去老戏有两种来源：宫廷与民间。二人台，湖南花鼓，上党的锣、赚，武安落子等都是民间来的；昆曲等是宫廷来的。活动于农村的从小到大，农村的男演男，男演女；宫廷的女演男，女演女。李笠翁的戏班就是女演员，她们一般不向外演出。民间的为了行动方便，男人多些。一般说，梆子多来源于秦腔。我们上党戏的历史根据不多。过去晋城马骏有一些资料，我看过。上党戏男演男，女演女；川剧也是。头盔金色的多，银色的少。盔上的花朵男的为上下两朵，色朱红；女的满头花，色粉红。女演员花纹细，男演员花纹粗。男演员的纱帽多硬翘，女演员的纱帽多软翘，看活的资料可见这些痕迹。服装袖子有筒口片片之分。妩媚的艺术以女演员为主，粗放的艺术以男演员为主。回场也不相同，步法也有差异。京剧女演员演男的走步时两腿先靠一下，后来就形成风格了。上党戏手臂直舒，京剧是弯的。我们的戏是豪放的，健康的。就现状看，上党戏男角都象，男演女虽然尽量避免男相的流露，但总是有点

不象。我不搞这一行，也没有充分的历史根据，说的不一定对。

我们接受外来的东西，不能死搬硬套，更不能变了上党的风格，要把它溶化成我们的东西。现在有些青年人学外来的东西不少，但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也就是说，接受了很多，没有溶化在一起。“三把”是我们的基础，接受外来的要考虑如何“化”进去。程砚秋同志在太原传艺时，人家的许多程式都是成套的。我们也该总结自己的东西使之成套。新老艺人结合起来，共同搞一套上党戏的程式，不是公式，是单位，如语言中的“词”。比如咱们的黄戏，又据说是有人逃荒到汉口接受回来的。但它和京戏或其它戏都有不同。大剧种接受小剧种，在旧社会不会那么热诚。现在仍有梆子演员不愿唱落子，落子演员不愿唱秧歌。过去四义班的人也不是不会唱秧歌，可是他们不唱。所以估计罗、赚可能是原来的。我们的梆子和秦腔虽有接近，但不太直接，不象中路、北路、蒲剧那样接近。有人说明代潞安王宫廷里传出来的，也不可靠。不过，据资料上说，有个王工音律。黄戏是从南边接受来的，它具有独特的风格，它接受外来的东西并不和自己的搅混。汉剧的《打金枝》、《龙图案》，词句上就和我们的差不多。

我建议：接受外来的东西要化，古人注意不够，我们现在应注意。看人家枣梆，虽然接受了豫剧很多东西，但人家化了，形成枣梆子。河南人念上声字就念阳平。山东念阳平为去声，如“瞧”为“窍”。黎城话就有好多山东话。落子的《杨金花夺帅印》是，四将的起霸就不是上党的东西。

张海臣介绍他的学艺经验时说：要专一，要溶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金盔、朱红花，我主张还要，这东西大方。按上党的步法，用硬翅纱帽比软翅的好，软的也可用。如果女演员

要演状元投亲一类的戏，倒可以用一用，一般都不相称。

我们的戏是歌舞的。语言有抑扬顿挫，说白有音乐性，有节奏。古人把古人的生活歌舞化了，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活歌舞化，这方面有待大家努力。打仗、喝酒、骑马有舞，锄地、打枪、穿制服、骑自行车如何搞呢？一个女人在哭，假如有个好心的音乐家去给她配上音乐，那么她就不哭了。要在舞台上，不配音乐就不行。生活是基础，搬上舞台就必须舞蹈化。《八一风暴》演得不坏，但上党化、歌舞化还不到家，要下一番功夫。舞蹈化的例子很多，豫剧创造了许多表现现代生活的艺术手法，希望我们的同志也来研究。我只能提出一些问题，也提不出积极的措施和办法。

对政策的理解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阶级教育，要注意全面理解政策。农村里受教育不多，一般都是受家庭影响较深，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个人成份和阶级出身要分开来定，成份是“娘家”，但如要都划人打击对象，那么团结的就不多了。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我们一个领导说，土改十几年了，阶级互有渗透，完全拿土改的面貌看问题就不全面了。成份档案要看土改的底子，发生了问题要查查根源，没有问题就另作分析。据调查，贫农女儿到地富家，受人家影响的占多数；贫农娶到地富的女儿，也受人家的影响。我们要注意，一定要我们改造他们，不能让他们改造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不该枪毙的都要改造，不注意阶级教育不行，一定要弄清是谁改造谁，谁跟着谁走。规规矩矩接受改造的地富可以表扬，但千万要注意，不

能让他们执政。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份只是家庭出身，过去的大学生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但他们摆脱了个人家庭，走向了无产阶级队伍，我们就应以革命同志对待。但是，填表时是什么成份仍要填什么成份，出身和现在的表现要分开看待。地富及其子女没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或改造不深的，很容易“想娘家”。写文艺作品不要唯成份论，但划一划阶级是有好处的。

以上三个问题是一个性质，都是想把事作好，但对问题理解不全面、认识不足，就容易出偏差。所以要继续学习业务，学习政策。

戏剧发展方向要时刻记住为农村负责，为革命负责。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正确方向。个人或集体的风头主义都不好。布景不能无限制地发展，否则，三十户、五十户的山庄演戏就很困难。究竟发展多大，以什么为标准？要以为农村负责的态度来衡量，不必发展过大。

有的戏，有时能演，有时就不能演，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要看具体情况。假如到灾区慰问演出，我们演的是因天灾人祸而引起暴动的戏，这戏对灾区农民有什么作用呢？对人民对革命负的什么责呢？又如，在欢送新兵时演出《四郎探母》，这又起什么作用呢？问题是，自己对农村、对革命负责了，自己就会发现，并进行批判。

有些人，光想演主角，不想演配角，也不是从集体事业出发的。还有的工作中互不服劲，这是为什么呢？个人主义思想一定要取消。如果都想演主角，不想演配角，工作就无法进行。再说，拉幕的就更不想拉了，支部书记也不想当了，因为

他连一次面也和群众见不上呀！老年人过去的疾苦，我们要知道，还得比一比，否则就不知道今日的甜。

有人说：农村一年才演三天戏，而我们是天天演，太出力，没法过了。我的意思是要认真演戏，不是让你卖死力气。认真对待工作应该怎样就怎样，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对了。

有的编导说：“写不出剧本来交不了账，怎么办？”这也算是责任心吧。不过，有点把创作看得太简单了，好象三月、两月就应该写一个剧本。我看，这正是责任心不足的表现。自己是革命者，只要能认真对待，一年能搞个好剧本，那真是喜出望外的了。

“吃现成饭”问题，这要看具体情况。问题也是对革命、对农村负责的问题。比如：现在配合形势，映出《夺印》、《槐树庄》、《李双双》等就很好。自己写不出比人家水平高的东西，吃一吃现成饭又有什么不好？北京、上海、太原等地都映《日出》，难道他们不会再写一个吗？问题是，要考虑哪些对目前工作最有利。吃现成饭不一定是坏事。一般说，现成饭是好饭，应当吃，但也应该重视自己的写作。

“创作根据地要不要？”我看还是要吧！

有人说，现在正面人物好找，反面人物反而不好找了。找不到反面人物倒也是个好现象。反面人物是讽刺打击的对象。达到大家都恨他的目的就对了。我们不能因演小偷演得不象而去请小偷来当老师。

上党梆子学习外来调子也可以，不过要改，要化。“昆、梆、罗、赚、黄”变成“昆、梆、罗、赚、黄、枣”也可以呀！我谈这些，都是即兴感想，如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晋城）

“起码”与“高深”*

《火花》编辑部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份发表了一篇社论性的文章，题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其中涉及形式、语言方面，主张“顺当、口语化、群众化”，有点“风土人情”味，因而引出一篇“义”愤填胸为“民”请命的文章来，责《火花》编者“没有将广大读者、作者和他们自己放到‘工农兵’之列去，而是高高地站在‘工农兵’之上进行发号施令”的。

此文题目《群众化和低标准》，发表于《火花》一九六三年九月号。自此文一出，引来了一连串批驳的文章（见《火花》一九六三年十、十一、十二月各号），于是作者所期的“百花”未放，而《火花》读者的百家先鸣矣。我初见到该文时候，也想发表点个人意见，但在迟迟未动笔的当儿，接二连三见到先我而发的若干篇文章——特别是肖林同志《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那篇更详尽的文章，都几乎把我要说的话说完了。不过我还觉着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说是说了，还不够显豁，因而又想作一点补充。

《群众化和低标准》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文学语言的“顺当”、“口语化”和“风土人情”（原文如此，后者不便算作“语言”）仅仅只能（原文如此）作为文学语言的起码标准，而不能将它作为“语言美”的典型。

* 本篇发表于一九六四年《火花》二月号。

且不论“仅仅只能”如何，该文作者表面上承认运用群众的语言是为工农兵写作品的“起码标准”还是对的。起码比连“码”也不起好。旧时代里因为有若干条件不具备，起码的人太少，待到抗日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文学艺术直接为工农兵服务有了较多的条件，又经过毛主席及时的提倡，起码的人才逐渐多起来；二十余年后的今天，自然是大多数文学艺术工作者都“起码”了。

不过情况也还不尽合乎理想：也有些同志，主观上虽然正在努力学习群众语言，可惜运用起来尚不十分惯熟——写出来不太象。这个不必着急。学习什么也需要有个过程，只要起了码，再过一个时期是会好起来的。也有些同志为了担任着较大量的文化岗位其他工作，没有足够时间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致使欲起码而不得。还有少数人，对于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没有多少积极性，因而无心起码。更有极少数人，既无心为工农兵服务，又对古的和洋的文学形式看守得很紧，因而自己不起码，也反对别人起码——以为谁只要在这方面起了码，他就只能生产低标准作品。该文作者就属于这后一类人。

要把“起码”当作“出发”来解释，则世界上各种物体的运动，有各式各样的出发方式。学习群众语言的出发方式，要比作赛跑则容易理解，比作打高射炮就不太恰当——因为高射炮弹一离开炮筒，人们赶不上欣赏就不见了。赛跑的起码条件，是当事人的两条腿会向前左右递伸；起了码之后，虽然会出现跳越高、低栏等复杂的姿态，但仍要以两腿向前左右递伸为主要动作，而且就在这主要动作上见工夫（也就是见“高深”），不同于高射炮弹之出筒。学习群众语言也正是这样：离开两腿向前左右递伸的主要动作去出洋相，创造不出多少跑步的“美”

来；同样，离开了群众惯用的语言，想要创造语言的“美”也是非常有限性的。

起了码就不应该再走回头路。其实此“码”也不自今日“起”，明、清两代的小说家早已“起”得很好了，其中虽然不免有“低标准”作品，也有好多世所公认的“巨著”。这些作者起了码之后，不但没有表示后悔，并且还接力前进。至于“民间文学”，则此“码”起得更早——唐已有之，只是文多残缺，难判其“标准”之高低了。

该文作者说历史上的“文人”能“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向前提高一步”，而“按照《火花》编辑部的意见”就“只能停留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怕“再高了”工农兵不懂。《火花》的编辑们真要怕“再提高”，那是应该打屁股的；要说怕提得工农兵不懂，尚可宣告无罪。把“高”和“不懂”联系得那样紧，是该文作者特有的逻辑，而历史上的“文人”还不如此。民间文学的《宣和遗事》，经过历史上的“文人”提高为“水浒传”那样并非太“低标准”的巨著，是提得叫群众“不懂”了呢，还是“更懂”了呢？要按《群众化和低标准》作者的“标准”，则《水浒传》需要再提高一下——提到当时的群众不懂、将来（？）的群众才能懂的框子里，才算有“压倒民间文学”的资格。

该文中又有这样一句话：“无论‘浅显’的文章也好，‘高深’的文章也好，在目前我们都是需要的。”“浅显”本来是大家用惯了的词儿，重在“显”字，和“明显”的意思差不多，要和“高深”对列起来，便把重点移到“浅”字上。该文作者给这两词巧妙地配了一配对，便把用“顺当”、“口语化”了的群众语言所写出来的文章逐出“高深”圈子之外，我们试

把它再换成“明显”，说“明显的文章也好、高深的文章也好……”则不成文理矣。

我建议我们文艺界的同志们以后再不要用“浅显”或“通俗”等词来说明群众语言的特色。严格说来，文章有“浅”而不“显”者，有“显”而不“浅”者。相传有个人爱在人前卖弄风雅字眼，他的父亲小名叫“白狗”，反对他的人问他说：

“你何不说‘家父小字素犬’？”“白狗”是要比“素犬”“显”一点，但一定要说“素犬”比“白狗”有何“高深”之处，恐风雅之士亦难言之。毛主席写的论文《论持久战》“明显”不“明显”呢？难道说就“浅”了吗？其中的道理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吗？我们说惯了的“深入浅出”一语，也应作为“深入显出”来理解，不应理解为大学教授讲小学课文。“深入显出”的文章，是真正“高标准”的文章，“浅显”一词，不足以尽其德。至于“通俗”之“俗”字，是对“雅”而言的，以之注释“群众语言”，则对群众好象有点不敬，所以也是以不用为宜。

该文又说：“我们既不能单为具有大学水平的人写文章，也不能单为具有初小水平的人写文章。”这话是仿着毛主席的口吻说的。不过毛主席说是应在普及基础“上”求提高，而该文则为的是说明应在普及基础“外”求提高——即为大学水平写文章需要写得使一般人不懂（原文说是“一时闹不懂”）。其实文艺欣赏能力和兴趣的高低，与文化水平不尽吻合。例如演出歌剧《白毛女》的时候，使一个思想、立场未经彻底改造的恶霸地主儿子去看，无论他是初小水平还是大学水平，都会产生反感——因为台上的黄世仁母子是他爸爸和奶奶的化身；要使中农以下的各阶层农民去看，则会因对旧时代生活的感受不同

而所得各有浅深。我姑且假设这样个例子，一个十五岁、初中毕业的农村青年，陪他一位贫农出身，七十多岁又是文盲（即该文所谓不能算作“读者”只能算作“听者”的人物）的老祖母去看《白毛女》的演出。他们两人该是谁的欣赏水平高一点哩？只怕是直到看完之后回了家，这位小宝宝还要请他的老奶奶给讲解半天。真正不“低估劳动人民鉴赏力”（该文作者给《火花》编者们的评语之一）的人，才有心去理会一下这种关系。不过我所设的例子，只限于看语言象《白毛女》那一类“顺当”、“口语化”而又公认为“标准”不太“低”的戏，假如要演出经过《群众化和低标准》的作者或具有同等“标准观”的人来挑选或改编、提高过的剧本，那就想不到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了。比方说要把喜儿唱的那“昨夜晚爹爹转回家心中有事不说话……”改成五古式的“昨宵父归来，戚然无一语……”或改成有点洋味儿的“噢！昨晚，那个一年一度足以使人们欢愉的除夕，我那始终和欢愉没有缘分的、被痛苦的命运捉弄得终年得不到慰借的……的父亲，竟晚到别人快要起床的时候，才拖着他那迟钝的步子，无精打彩地踱回家来。从他那凝聚得死一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有象长江大河那样多的心事要向人倾吐，可是他竟那样地沉默，以至于使人在五步之外，就能听到他那沉重的脉搏在急剧地跳动着……”上述那两位观众听了会得个什么效果呢？他们首先感到的不是语言“美”了多少、标准“高”了多少，而是老太太听不懂，小宝宝讲不清。按该文作者的估计，可能是“一时闹不懂”，等他们的文化程度提高之后，“终究”是会“接受”的。可见语言不对头了反而会妨碍群众已有的欣赏水平。

该文接着上边摘引的那句话又说：“我们既需要通俗易

懂的普及文学，也需要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文学巨著。”求“巨著”不在于反“起码”，前边已经谈过了，不再重复；但是我们应如何看待巨著，倒又是个值得谈谈的问题。

不止该文作者，并且包括一部分不反对上述那个“起码”的同志们在内，从“巨著”上着眼，都还有点“今不如古”之感——在这些人中间，“厚古薄今”者固在所难免，而“恨铁不成钢”者亦大有人在，不应一概加以责难。我认为造成这个观感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出于错觉。文人学者书架上的巨著一定是“古多于今”的。古代的巨著是“故”人著的，现在的巨著是“活”人著的。把几千年来的故人集中起来自然要比现在的活人多。第二是阶级观点那个老问题作怪。我们所有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的文艺写作者、工作者，虽然主观上都愿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无产阶级化，可是在“化”的道路上各有浅深，因而对“巨著”的认识就不太统一。例如把《西厢记》与《白毛女》古今两个剧本作比，问哪个更算得“巨著”，恐怕会产生若干不同的答案。可能有人会说《白毛女》只算达到了“起码”的标准。第三是主客之势不同。历史上的作者，不论是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都是人家本阶级的家里人，从小就是在那种环境里泡大了的，写他们自己的人容易写好，而我们则是下乡、下厂，象释迦牟尼一样从太子宫里逃出来去体验“众生疾苦”的，所以“一时”还产生不出许多的“巨”著，不过只要我们有迁移户口的决心，我们的“著”“终究”是会“巨”起来的，我们的后代和工农兵的后代都成了自家人，而且又都掌握了文化，他们会产生更多的“巨著”。

至于说将来的群众文化程度都提高了之后“语言”如何发展的问题，我们也不妨设想一下。有朝一日，我们的国家，把

国民教育最低标准规定为高中毕业，那时候社会上所有的男女成年人，对古书洋书都念过一点，是不是他们说起话来就要用“文”“语”参半，“中”“西”合璧的语言呢？我想用不着。我们学古语为的是便于读古人的书，学外语为的是便于读外国人的书，但是读了之后，说起话来仍然说的是今日的中国话。例如郭老是精通楚辞的，但是不论说话还是写作品，连一个“兮”字也不用。至于在新事物不断出现、老词汇不够用的时候，包括文盲在内，都自然会按需要来接受新词汇。十余年前的山区农村，哪里见过什么“抽水机”、“发电站”、“硫酸氨”、“六六六”？现在有了那些东西，不是就都会说了吗？将来那些读过古书洋书的国民，凡是用得着的“古”词“洋”词都不避忌，但是也不因为增加了新词而就要改变原来的“风格”“腔调”。那时的文学家们就要依据这种风格腔调的基础创造出异乎寻常的“美”的语言来。

最后我想谈谈该文作者以毛主席作挡箭牌这种战术的要不得。该文引了毛主席两句旧词之后接着写道：“……也只有读这样的作品才能收益更大，才能真正的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得到教育’。”这无异于说“毛主席坐了火车出去，就证明汽车坐不得；毛主席爱吃大米就证明别的粮食没有养料”。该文在一开始，把“百花齐放”写了若干遍，而后来竟又说起“只有”读什么什么“才能”如何如何来。能自圆其说吗？人各有其文化生活。在业余时间里，写写旧诗词也和拉拉小提琴、下下象棋一样。毛主席写旧诗词完全是他自己文化生活范围内的事，一年写一首也说不定，三年不写也说不定，而且也不打算发表（发表于诗刊创刊号的，那是《诗刊》编辑部讨来的，有发表于同期的毛主席给他们的信为证）。假如该文作者

自己也想写，一天写一百首也没有人干涉，只要不因此去反对负有工农兵写作责任的人在学习群众语言方面“起码”。其实毛主席事先料到有该文作者这样一些人，所以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就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词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不易学。”若按该文作者的逻辑推测，则应该说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写那种使读者“收益更大”和“真正”能起到“潜移默化”教育作用的作品了。

新的一年来了，请把我这篇迟到的补充，作为这一期《火花》的一点花絮吧！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日）

首先要求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在曲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当前曲艺工作的主要问题，在于创作赶不上需要。这问题早在全国解放初期就提出来了，而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自然也是解决了些的），也就是说好的作品在数量方面尚不足以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带有副作用的东西抗衡。为什么还停留在这个局面上？如何能使这个局面改变得比较快一点？我有以下一些意见：

我们曲艺工作者要树立雄心壮志，为中国革命和世界人民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对社会主义曲艺工作，要有坚定的革命事业心，把它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不计较什么名利。回想中国共产党在地下活动时期，所出过的临时刊物是数不清的。那些作者们不说拿稿费，有时候连纸张、印刷费用还是由自己自动捐出来的，至于出名则更谈不到，一次换用一个笔名，也要被特务们列入黑名单。那时候的人们为什么愿意写那些没名没利的文章呢？原因很单纯，因为要革命。有人要是缺那么个革命的劲儿，怎么能作好革命的曲艺工作呢？周总理在一次文艺工作者的会议上要求我们“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应该作为我们随时检查自己的标准。

*本篇发表于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

社会上对曲艺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地位，认识也不太统一。例如评书是不是小说、唱词是不是诗、有说有唱的说唱大鼓和词话是不是一类作品、相声是不是可以列入喜剧等一系列问题，社会上现在都还没有统一的答案，一般习惯上的看法又往往以为前者都低于后者，可是你要举出古一点的《水浒》和《董西厢》来，答案马上又会倒过来。这叫习惯，我们不一定计较它，只是我们曲艺写作者自己要心中有数，要以一个作家自居！评书就是小说！唱词就是诗！说唱大鼓就是词话！相声就是变体喜剧！你不承认我自己承认！这倒不是为了骄傲，而是为了更严格地要求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中国文联召集同志们来开会，证明文学艺术界重视我们；邀请得党中央宣传部参加指导，证明党重视我们；群众爱听我们的书，证明群众重视我们。这就够了。习惯上如果还有人重视不够，那只能说是习惯的惰性，过一个时期就好了；不过有个条件，需要我们拿出货色来。

文艺界写其他形式作品的人对曲艺支持不够。我自己写得太少也值得检讨。在讨论中有同志说“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这话应该说是有点发脾气性质。我认为这脾气发得对！各种体裁的曲艺脚本，应该说都属于文艺，文艺作者都应该供应。因为我们文艺界作得不够，现在居然让曲艺界看作“外援”，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只有今后努力补偿好了。

“曲艺是文学上的尖兵”这句话，只是说明它演出方便，可以提前和群众见面，理解得绝对化了，对曲艺写作也是不利的。有好多兵种有“尖兵”，但“尖兵”自己不能成为兵种。即席赋诗可以说是尖兵性的了，但叙事诗便不易即席赋出。比较大型的曲艺作品，创作之前的准备条件，大体上和他种文艺

作品相同，所不同的只是用曲艺的特种形式写出罢了。社会上对曲艺的要求，也该体谅这一点，求之过急了反而生产不出好东西来。

重视改编工作较迟，也是曲艺作品产生得较慢的一个原因。在戏剧和电影方面，不论从前还是现在，由小说改编成的要比直接创作的为多。历史上的曲艺作品也是改编的多。改编比直接创作要快一点，因为有些创作过程已经由原小说作者做过了。改编者和演唱者都要熟悉生活，只是他们和原小说作者所熟悉的生活，可以在范围上略有差异——原作者是要从全面生活中提炼，而改编者和演唱者可以只体会原作品所触及的生活面（全面体会了自然更好）。不过改编也非易事。大家在讨论中，认为改编要把原作“揉碎重组”正是经验之谈，因为在小说里安排得合适的，到唱词中那样安排就不见得合适。不过不论你怎么揉、怎么组，总还得有深入体验生活的基础——一样的鱼儿，清蒸和红烧是两种口味，不过你如果不了解鱼肉的特性，那就怎么做怎么难吃。

以上几个问题是曲艺创作方面特有的。至于和他种文艺创作上相同的问题——如政治修养、艺术修养、生活体验、技巧锻炼等方面，有好多基本理论的文章可参阅，我就不在这里谈了。

同志们还有好多是领导曲艺队伍的。对这一方面，我也想谈一些观感：

各地方各曲种，各自都有传统队伍，解放以后，我们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组织、领导、革新、发展罢了。十多年来，这部分工作要比创作方面作的的成绩大一点，不过问题也还不少。做工作也就是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不怕有

问题，而是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整个曲艺界的社会地位由革命而翻身的，从业的人员都是拥护革命的；可是他们又都是在旧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也有些思想、习惯是不合乎现代要求的。不但曲艺界如此，各行各业的成员都一样，凡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都需要经过一番自我改造，否则赶不上时代。本此，我们在组织曲艺队伍之初，在思想上不能求之过苛，可是在组织起来之后，便不能放松思想教育，因为这队伍不但要在新社会上做普通公民，而且还负担着广泛教育别人的责任。

首先要求每个成员都有充沛的社会主义主人的责任感。从权利方面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曲艺界的代表，从首都到各省、市、县又都广泛地有曲艺团体，曲艺艺人到处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可是在社会责任方面，还有些人虽说已经成为团体组织中的成员，自觉性仍有点差，好象还是票友。我们做组织领导工作的同志们，须先认清我们所领导的队伍中，谁是主人、谁是票友，并且设法把票友改造成主人。

曲艺队伍中有些老红旗——象王尊三、韩起祥等同志。这些老同志们，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的，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打退堂鼓。这是真正的主人气派。当时还有些艺人也鼓起勇气从城市（敌占区）跑到解放区，但是经过几番“扫荡”，吃过一个时期粗粮后，便觉着受不了，依旧跑回城市去。有勇气到解放区去一下总算比不去好，不过也只能算个票友而不是主人——主人是不逃跑的。

全国解放以后参加曲艺队伍的人，怎么还会有票友呢？我且举出几种样子来，大家看是不是票友？

一是报恩主义，为知己者用。在一个组织中，有个领导者

个人对他有好处，他以给朋友捧场的心情参加了组织；万一他这个老朋友有个调动，他便不愿再待下去。

二是凭老本事吃饭，不问政治效果；只许你跟我来，不许你改造我；合得着来，合不着去。

三是只准捞鱼，不准晒网——过得旺季，过不得淡季；光想进城，不想上山；听说学习就头疼，遇上困难就离队。

四是你划定范围我说书，对社会教育有了副作用由你负责。

这些人只能说是以票友身份参加曲艺团、队的。好的团队，在开始自然也很难免有这些人参加，可是后来都经过自我改造变做了主人。这些人，即使在历史较短的团队中也是少数，不过一个组织中，即使只有那么一两个人，也会搅得大家心神不宁，是不可放任自流的。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一定要让这些一些人，和其他好的成员一样，有充沛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人感，以革命者的身份自居。让他们感到自己做的工作是神圣的社会教育工作，不是为了报谁的恩、帮谁的忙，不是为了赚钱吃饭或者表现自己，不是当雇员只做雇主指点的活儿。在什么场合上应该做什么事，做了主人自己会摸索——谁也不会在一个朋友结婚的时候给他送上个花圈，或者在人家出丧的时候去说一段相声，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该说哪一类内容的书，还不和这个道理一样吗？有了充沛的主人责任感，就会知道江山社稷是咱们自己的，只准成全，不许伤害……

不论搞创作还是做组织领导工作，首先都得要求自己、要求组织中的所有成员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谈“助业作家”

——纪念毕革飞同志

我们通常把文艺作家分为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两类。约定俗成，也只好那样称呼，其实非专业的作家，似乎也不能一律名为“业余”。例如宣教部门的领导者，对其所属机构中的文艺团队，没有直接创作的责任，可是这些领导同志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因觉着其所属文艺团队演唱的节目不甚合乎宣教工作的需要，往往亲自出马编写说、唱、表演的材料；更有些生产、战斗基层单位的直接负责同志也往往那样做。这些人固然不是以写作为职业的专业作家，可是和利用业余时间自由写点什么的业余作家也有不同。这些人的写作是为了服从本行本业的直接需要的，略象传统小说中所谓“自将中军”，而不是有了空余时间来为一般社会读者写作品的。通常把这些作家归在业余作家中，不是我这篇短文所能更动得了的，但为了说话方便，我在这篇短文里不妨称他们为“助业作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化部前部长、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革飞大校，当年正是这样一位“助业作家”。

• 本文是赵树理同志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毕革飞快板诗选》所写的序言，曾在《解放军文艺》一九六四年五月号发表。

毕革飞同志是身经百战的部队政治干部，在二十四年（一九三八年——一九六二年）的部队生活中，就有十四年（截至抗美援朝归来）生活在战斗的前线，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在敌人的装备优于我军的情况下，参加过山西长子、垣曲、曲沃、襄陵、运城、临汾、祁县等一连串的攻城战和解放太原的外围战，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在这些战斗环境中，每到了最艰苦的时候，也正是他产生作品最多的时候——因为是最需要作品的时候。毕革飞同志不止写过快板诗，也还写过通讯、小说、剧本等形式的东西，不过以快板诗为最得手。这也是战斗环境的需要使然。

助业作家有以下一些特点——这些特点都在毕革飞同志身上充分得到体现：

专业和一般业余作家，对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哪个应列为第一，往往发生问题，而在助业作家中，这方面发生的问题要少得多。助业作家是为了帮助业务才写的，其着眼点首先是“能否助业”的政治标准。毕革飞同志在他的《漫谈快板》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工农兵群众写快板，是不受艺术特征、定义的限制的……他们觉得需要什么就写什么。当哪一种技术问题被广大群众认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正有人创造了先进经验，他们就用快板去宣扬推广。不考虑这样的快板是不是艺术作品……在现实斗争中涌现出值得大家学习的先进人物，他们更不放松用快板去歌颂他……他们写作是从革命斗争需要出发的，不是为文艺而文艺，而是拿文艺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这段话，虽是在谈群众创作时候说的，可也正好说明助业作家为什么能把两个标准的主从关系摆对。助业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和这些积极创作的群众一致的。

助业作家经常是要直接发动群众来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的，对上级、对群众都要经常直接见面，因此在理解大政方针和深入群众方面，要比我们这些在其他业务上不直接负责、只是“在上边听听、到下边走走”的人认真得多。这意义，毕革飞同志在谈到他写兵的经验的时候说得很透彻。他说：“……必须真正地从思想上钻进兵里边，从下往上看……首先在对于战争的感性认识上和战士们一致起来，爱兵之所爱，恨兵之所恨，乐兵之所乐，忧兵之所忧。假如我们对战壕生活、坑道斗争，没有实践过，只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或者只是坐在家里想象的……总不会有正确的认识。对斗争没有正确的认识，反映在作品里，当然不会正确，再去指导斗争，那就更成问题了。”“另一方面……从上往下看，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站得越高看得越宽，不仅仅是从表面上跑到领导机关去转一转，而是要确切地了解领导意图、战役的步骤和所采取的手段等等……在战役中，群众思想情绪和领导意图常常有发生矛盾的时候。比如领导上从全面看，需要多准备几天，再发动总攻，而群众情绪呢，恨不得马上下命令总攻……如果不了解领导意图，只是埋头地站在下边去写快板诗，作鼓动工作，那就会钻进牛角尖里，鼓动出毛病来。”不只是写兵应该如此，恐怕写什么行业也得这样；进一步看，不只写作应该这样，做其他领导工作也不例外。“工作要抓两头”正指的是这种作法。只有从上级的领导意图追溯到党的大政方针，才能热爱党，衷心地听党的话；只有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才能热爱群众，赏识群众的优点，珍惜群众点点滴滴的成绩。

自己写的东西是否合乎当前现实的要求，在专业作家队伍中不但是讨论不休的问题，而且是常好出偏差的方面，而助业

作家则几乎不产生这个问题。凡是我们当前提倡发展之“业”也就是现实需要之“业”。助业作家的作品第一个要求是能迅速起到助业作用。“业”既为当前现实所需要，对它已经起到帮助作用的文艺作品会变作当前现实不需要的吗？不过要让作品准确地起到助业作用也还有个窍门，不注意这个窍门便不易准确地收到客观效果。毕革飞同志对这个窍门说过这样的话：“……创作一段短小精悍的快板诗，写的时间并费不了多长……更多的时间是花费在瞅‘点子’上，也就是发现群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对解决这个问题在群众活动中已经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积极因素。要想瞅准这个‘点子’，也就是发现创作主题，必须对战役的特点有个概括的了解，对政治工作的要求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这正是使作家的作品合乎当前现实要求的窍门，不过这个窍门也不是技术性的，而仍是以上述的艺术服从于政治和了解大政方针、深入群众为依据的——也可以说是解决了前边两个问题后应该产生的结果。

助业作家的作品发表得快，也是专业作家所赶不上的。专业作家的作品，总是要经过编排、印刷、发行等等手续才能和读者见面的，而助业作家的作品则是写出来马上就与读者见面的，效果如何也是马上就会知道的。毕革飞同志在十四年战斗中究竟发表多少快板诗，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本书所载的七十六首（内有为战士改作一首）仅仅是他逝世后别人在一些有关资料中收集到的那一部分，其中还有一些已非当年那种直接助业性的（发表于前线的仅存三十四首）。助业作家发表作品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要说艺术起源于劳动，则今日的群众创作仍是古代群众创作的继承和发展，而助业作家基本是和群众过着共同的创作生活的，只是比群众更有计划、有选择、

政治性更集中一点罢了。现在仍可以借毕革飞同志论群众如何发表快板诗的话来说明助业作家发表作品的办法。毕革飞同志说：“人民群众在劳动、战斗和历次运动中，广泛地利用快板抒发自己沸腾着的热情，表达自己不怕一切困难的乐观主义豪迈情绪；用快板写挑战书、应战书、决心书、公约；用快板表扬好人好事，批评、讽刺不良倾向。这样的快板反转过来又鼓舞和提高了他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的决心和信心。工农兵群众写快板原本没有考虑当作家，也没有计划在刊物上发表，顶多有一部分是在本单位的黑板报上登载。把快板写在大街上就叫它街头诗，写在枪杆上就叫它枪杆诗。有的干脆就是口头快板，在娱乐的时候说就叫做文娱节目，在劳动战斗中说就是群众性的自我鼓动工作。”助业作家也常是和群众在一块，用这些场合来发表自己的作品的。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另外的人就叫“发表”，印刷不过是更广泛的发表罢了。要是把助业作家或者群众已经在口头上、黑板上、决心书上发表过的作品汇集起来再印成书，只能说是再发表，或者也可以说是先使用后发表——不过“使用”也就是“发表”了。

由“助业”转为“专业”的作家，假如能继续联系群众，是最讲实效的专业作家。这一特点不须要再加说明——因上述的特点都足以作为这一特点的解释。毕革飞同志本人后来要不是继续担任更重要的政治职务，一定是会转为这样一个作家的。

毕革飞同志的家乡和我的家乡只相隔百余里，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在一个地区工作，当时曾经识过面；一九四九年来京以后，又在推广说唱文学方面共过好久的事，可以说是老相识了。遗憾的是直到为了写这篇短文来看这本快板诗集的时候

候，我才发现以前对这位已故的老朋友认识不足，毛病就还出在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主从关系那个老问题上。当我这次看到他在战争时期那些快板诗的时候，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后来才想起我在北京市文联编《说说唱唱》的时候，他把那部分稿子给我看过；我也曾选用过一些，可是把大部分又都退还给他，仿佛认为是内容重复过多，有些韵脚不稳等等。我虽出身于农民家庭，但受过几天冬烘先生的教育，对文字方面有点瞎挑剔的坏习惯，后来在理智上虽说也懂了点“政治第一”的道理，可是一不小心就又会挑剔起来——对老朋友的文章尤其不想让别人在文字上抓住什么把柄。现在看来，毕革飞同志那些内容重复的快板，在当时确实是应该那样写的——因为现实本身就有重复性。例如一连攻了七八个城，仗都是那样打的，给敌人制造土飞机（大型爆炸）是制了一次又一次的，表现在为战斗服务的快板诗上如何能不重复呢？再如说蒋介石是“运输队长”也不得不重复，因为他不接受教训，一次比一次运输得多，光解放军活捉蒋军军官名单就够印一本不厚不薄的书。难道这样积极的运输队，还不应该多“表扬”几次以增强我军战士们最后胜利的信心吗？要从政治上着眼，就是连每首战壕诗后边注明的那“某年某月写于某前线”，也足以令人鼓舞，也比那些文从字顺、合辙押韵、空空洞洞、言之无物的诗好得多。

毕革飞同志不幸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就逝世了，享年才四十三岁，正是创作力旺盛的时候。这是文艺界一大损失。只有这本快板诗集是他留给我们的纪念品。我特向这宝贵的纪念品致敬。

（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于北京）

语言小谈*

我没有研究过有关语言的科学，只是根据我自己运用语言的经验漫谈一下。

语言是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为了很好的传达思想感情，在语言方面应作到以下的两点：一是叫人听得懂，一是叫人愿意听。想叫人听得懂，就须说得通；想叫人愿意听，就须说得好——或者“说得技术”。写文章和说话一样，只是把“说”变成“写”；在接受者方面只是把“听”变成“读”或“看”。写文章比说话容易一点，因为话需要接着说，如果每说一句话的中间隔五分钟，那任你怎样说得通、说得好也没人听；而写文章就活动得多——写了上一句想不好下一句，隔一天再写也没有关系。比方这段文章究竟写了几天，你们是不会看出来的。

“文法”是研究语言通不通的规律的。“修辞学”是研究语言好不好的规律的。这两种学问，对运用语言很有帮助，应该学习。可是这种学问只是语言的解剖学，光从那里边学不到语言。比方学骑自行车的人，懂得车子的构造要比不懂好得多——因为更容易掌握车子的规律；可是光懂得车子的构造而没有练习过骑，骑上去仍然会摔倒。

那么学语言究竟应该从哪里学呢？应该从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中学。见的人多就听的话多。广大群众就是话海，其中有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四年七月《通讯往来》第七期。

很多的天才和专业家（即以说话为业务的人）他们每天每时都说着能为我们所欣赏的话。我们只要每天在这些人群中生活，那些好话和那些好的说话风度、气魄就会填满我们的记忆。

学语言不能只凭记录，因为不论说话和作文，要是查着记录来拼凑语言，那只能证明他的语言还没有学到足够应用的程度。有些人在作文的时候，想起一句好话来，即使不太合适，也想转弯抹角把它用上去。那也是因为语言不够丰富的缘故。比方好衣服不太多的人，过中秋节也就穿起漂亮的棉袍子来，如果他有漂亮的夹袄便不至于那样子。曾记得有一篇讽刺说快板公式化的相声，一开始是一个人打着竹板说：“打竹板，迈大步，前行来在棺材铺……”，另一个人打断他的话说：“我不开棺材铺！”他说：“你开一个好不好？”另一个说：“我开的是估衣铺！”他说：“你最好还是开个棺材铺，我没有估衣铺的词儿！”我们学语言一定要学到见景生情，要甚有甚，不应该象他那样会说棺材铺不会说估衣铺——自然更不应该强拿棺材铺的词儿到估衣铺门前去说。

要说到那样程度是不是太难呢？要是在师资缺乏的条件下从头学起，自然很难，好在我们既不是从头学起，师资又不缺乏，所以不见得太难。每个人都是不到一周岁就开始学说话的，学到会写文章的时候，起码也已经学过十几年了；只要长期泡在广大群众的话海里继续学下去，到处都不愁没老师。

不过我们这些老师既没有收我们的学费，也没有拿教育部门的薪金，所以对我们不负直接教好的责任，这个责任还得由我们自己负。他们每天每时说的话，也有生动活泼的，也有庄严有力的，也有锋利尖刻的，也有诙谐有趣的，……可是也有千篇一律的，也有丢三落四的，也有枯涩呆板的，也有油腔滑

调的，……他们只是按他们自己的需要和能力来说话，并不是为了教育我们，要学什么不学什么，还得由我们自己来选择——用现成话说也叫“批判地接受”——其选择的标准仍是看它能否传达我们的思想感情，能否传达得使人听得懂，愿意听——或看得懂，愿意看。

写文章既然比说话容易(不受时间限制)，那就应该要求比说话说得更好——也说是应该要有更多的加工。一番话从哪里说起，说到哪里为止，应该以说得最少又说得最周全为标准。在用口说的时候，开始考虑合乎那个标准了，说到半当腰纵然发现有更合乎那个标准的说法，也无法更改，因为说出那一半追不回来了，想再加工也误了；而作文则可以废了重来。既有那条件，那就一定废了重来一下。在说话时候多说了个“这个”想要去掉，只能声明不算数，可是当你一声明，除没有把已说出去的“这个”去掉，反而多了个“不算数”，就显得更拉杂；而写文章的时候，尽可以轻轻圈了它。不要心疼好词句，不论好到什么程度的词和句，只要是多余的都得圈了——既没有穿西服，就不要结领带；既穿了西服，外边就不要再加马褂。把拉拉杂杂的部分去完了，文章才能干净。同样，在不受时间限制的条件下，说话办不到的加工，作文都要办到——从一词一句以至章节结构。写了不适当的可以换成适当的；写了拙笨的可以换成巧妙的；写得臃肿了，可以删得玲珑一点；写得干枯了，可以添得丰润一点……总之：能加工尽管加工，直加到再不能加为止。

从群众的话海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再经过我们充分的加工，把我们的语言锻炼得要说什么就能恰如其分地把什么说清楚，也就是能把自己要传达的思想感情百分之百地传达给读

者，我们学习语言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此外，书本上的语言，是别人从群众中取材和加工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学习语言时候的重要参考资料。

前 岭 人

——中共沁水县委副书记何洪义同志家史

前 言

为写这篇家史，曾参考了几篇别人的家史，可是越参考越觉着难写。因为这一家的历史遭遇和别家的雷同之处太多。平心一想，这也不奇怪，同一时代同一阶级，自然会有同样的遭遇，没有雷同之处，才是奇怪的哩。

情况倒是合理的，但这就给后来写文章的人造成一个难题：别人的文章在前，自己的文章还没有写，要让它和别人的文章雷同下去，读者既读了别人的就不愿再读自己的；要是离开事实去照顾文章的别致，那还算什么“家史”？

为了对付这种困难，我想把与别人雷同的部分叙得粗略一点，而对有“地方特点”的部分多说几句。我把这种办法姑且叫做“省同详异”。能否写得象个样子，试试再看。

闲话少叙，言归“家史”。

何明亮老人的生平

何洪义的父亲何明亮老人，生于一八七一年，基本上是沁水县东乡现属潘庄公社的前岭庄人。为什么说“基本上”是

前岭庄人哩？这是何明亮老人自己肯定的。他生于“七坡”，长于“石沟”，初安家于“马凹”，不久又迁到“前岭”，晚年又迁“马庄”，得了无法医治的食道癌之后，他说他是前岭人，死也想死在前岭，孩子们就按照他的吩咐，把他送回前岭他女婿家，不久便病故；所以他说“基本上”是前岭人。

七坡、石沟、马凹、前岭、马庄，都是沁水河沿岸大、小谷中一些小山庄，下边就谈谈这位老人一生为什么要在这些地方搬来搬去。

1、无偿劳动阶段：

他在出生后五岁（以下所有年龄均按习惯上的虚岁计）以前就丧去父母，寄养于外祖父家（时间考证见后）。

他的外祖父姓牛，是一个曇花一现的小地主，这人是“石沟”人，当年因为家贫，跟着别人到河南学做生意，后来遇到了一次兵变，商店托他藏金银，而这个商店被毁，金银便归他自己所有，他得了这笔外财，回到家来，正赶上光绪三年（一八七五年）历史上少有的大旱灾，趁便宜买了周围小山庄（包括马凹、前岭）上好多耕地。这要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可以成为较大的地主，而这次灾荒越出常规——在山西、河南等较大面积地区的人口，损失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有些小村庄遭到全部毁灭，他买下的土地，租也租不出去，卖也卖不出去，为了避免赔田赋，把外庄的地尽量白送与人，送也送不掉的，只好赔上田赋荒了地——在石沟本庄买的地，留下来自己经营着。

一般地主，在他们发财的初一代，往往是有钱无势，通不得官府，因此一方面向当地士绅进一些贡物，或攀个亲戚庇护着自己，另一方面赶紧供第二代读书求名，挤入统治者群中。这个牛氏小地主，一来是个小小山庄的人尚未懂得那样做，二来

遇的时机不巧，没有赶上那样做，所以一辈子不敢见官，谈官如谈虎。

他有个女儿嫁给七坡何家，生了第三个儿子(就是何明亮)之后丈夫死去。何家户族中有人想霸占他这份财产，就说她和人通奸，捆送官府，被送到中途，她气愤而死。他的父亲是个不敢见官的人，不会为女伸冤，只好把这些孤儿收回来抚养。

何明亮老人究竟是几岁上被收到石沟已无人记得。按当时情况推测，当在光绪三年之前——因为据说那次灾荒之后，有好几年没有人争产业。相反的倒是怕有哪家绝户的田赋应归自己负担。一八七一年生，到光绪三年本人才五岁，所以只好说是五岁以前。

在旧社会，一般人(尤其是第一代的地主阶级)为亲族收养孤儿，实际上是利用其无偿劳力，收养孤女，实际上是为了养大卖钱，牛家小地主也不例外；至于何明亮老人的外祖父去世，他舅舅当家的时候，更是那样了。这地方的荒坡大，小孩长到八岁就能放牛。何明亮老人就这样从牧童升到辅助劳力，又从辅助劳力升为主要劳力，一直到二十五六岁才告一段落。

人大心大，这种无偿劳动也不能无限度利用下去。按当时一般地、富对这种收养下来的人最后的待遇是送给三间房、十亩地、给订个婚。何明亮老人的舅舅大体上也还按这个习惯办事，不过他没有把他石沟的房和地送给外甥，而送的是马凹一处庄田，十亩地中只有二亩是熟地，其它八亩是荒地(一吊钱可以买几亩)，并为他订了前岭郭姓(下中农)女儿为妻。这样何明亮老人就到马凹落户去了。他的两个哥哥，一个长大又回了七坡，另一个给他舅舅放了一辈子牛，几年前才死去，但因不在本文叙述范围，故不多赘。

2、小山庄上的外来户：

此地的谚语说：“城吃镇、镇吃乡、乡人吃到老荒庄”。这不只说明在旧时代里小山庄是地主阶级最后剥削的基地，而且说明小山庄人的社会地位比城、镇和大乡村一般人也要低一点。尽管如此，小山庄上也自有其地头蛇、户族首脑等势力。到小山庄上去落户，一般勉强能独立生活的人还不如一个佃户容易站住脚。因为地主要保护他的地租就连租佃人也保护了，而别的外来户就抗不住地头蛇或本地户族——有势力的不会到小山庄落户。

何明亮老人在马凹落户，遭到了马家的忌妒，结果荒地也开垦成熟地了，自己反而站不住脚了。他买了个厕所，马家有人说没有通过人家的户族。就为了这点小事，马家合伙把他打了个半死。他觉着再呆下去性命难保，这才把马凹地卖了，到前岭再买地安家。

在马凹是外来户，到前岭仍是外来户。前岭这个小山庄，山外地主占的土地多。这些地主们不用说不卖地，就是卖的话，也还有他们自己的本家户族。只要价不太大，就不会卖给山里人。前岭本庄郭、张两姓户族中，也有几个富农和富裕中农，一样价钱，户族中有人买就有优先权。外来户买地，要有钱的话，出上特大价钱也许能买上好地，可是何明亮老人当年哪里出得起特大价钱哩，卖了一处买一处，亩数倒比原来的多了四亩，可是那地真不容易种，最小的地块，一亩就有十几块。

前岭的人事条件，对何明亮老人来说，要比马凹好得多；第一、依靠着岳丈家，人力、家具上有什么困难可以互助；第二、郭家在这庄上算个大户，自己总算是郭家个女婿，这件封建外衣在当时还有点一般作用（郭家如是地主，自然也会剥削

姑爷)。第三、半佃户的贫农户多，这些户不几天便和他处得很好。只要人和得来，地坏一点就坏一点吧！何老人当时便安下心来，一住就住了三十多年。

一般小山庄上人出了门，都爱把附近的大村庄借作自己的村名。比方前岭离李庄最近，前岭人到城镇去买货物，要说是李庄人，仿佛就能得回高一点的称头。何老人不借他们大村的光，以为“前岭人”就很光荣——因为这个称号也来之不易。

3、吞食他的地主群：

何明亮老人住在前岭这三十多年中，也曾遭遇过若干次较大的变故：丧过妻，又续娶过妻，生过大病，给二孩子订过婚，家庭人口也曾增到五男二女，遇到过光绪二十六年大灾荒……，一个贫农户，遇到这样许多大事，自然不能不举债（其间也曾遇到过象辛亥革命那样的国家大事，不过辛亥革命对这小山庄上的具体影响，只是在写契约、立帐薄的时候不写“宣统四年”而改写成“中华民国元年”而已）。高利贷者剥削何明亮老人的花样，和本册其它各篇家史所描绘者大同小异，不再一一细述。只是他借得太零星，债务户数过多，每到年终结帐的时候，上门讨债的象办红白大事那样热闹。他的二女婿给他献计，让他找一两个较大的放债户，借总还零，减少户数，以免多人干扰。听了女婿的话这样一合并，债主户数果然减少了，只是旧债成了大宗，永无归还之可能，而为了付利，新债又不得不举，这样挨到一九三三年，终于没有逃脱了破产的命运。

为了认识一下当年沁河沿岸属沁水地区的地主统治网，对何老人的破产不妨多说几句：

自从“赐进士出身”的贾景德作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秘书

长之后，沁水县的封建势力中心便移到贾景德出生之地的端氏镇。既成势力的中、小地主，都拼命与贾家（及其宗族）攀亲。但沁河两岸尚有一部分在河南、山东等地经商的商人，其中不时出现些暴发户。这些人一时虽未能攀高结贵，但也有相当大的经济实力，其出放高利贷之多也不亚于前一种地主。此外，大小村庄都还有些小规模的新发户，心眼活动一点的，很快就做了那些大户的爪牙，借着大户的钱和势，回村庄上去当二把手。何老人破产的时候，准备了一锅饭，把所有的债主都请到家，其中为主的有贾老六的小舅李文彬，贾三的亲家李文亨，在山东制造金丹棒子发了财的商景德，尚有其它小户共十余人。这些人先后到达，无例外地都先对何明亮老人加以严厉地训斥，把可能说的难听话几乎都说尽了。何老人从小接受过外祖父的“忍”字教育，不论听到多么难听的话都忍下去。

这些地主们训过何老人之后，便开始了他们的分赃会议。李文彬有六老爷那座靠山，未发一言别人就先给他除出一份，其余的人便大叫大嚷地争起来，连贾三的亲家李文亨也压不住台，吵到声嘶力竭之后，才算把何老人那点赖以生存的可怜的小家业分吞下去。

4、对付地头蛇：

何老人于破产之后，带着全家人到沁河西岸另一道山谷中的“马庄”当佃户。

马庄这一家地主名叫李耀祖，不属于山外地主任何一系，只给贾家亲属王友贤进一点贡求得庇护。你不要看他势派小，在马庄人看来好象比贾家还要厉害，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也正是此意。他利用无利小借贷，使马庄绝大部分贫农户都欠他一点钱，到农忙时候，别人雇零工要花高价，他

只要说句话就能叫所有欠钱户都来给他做活，工价由他自定，也不再付现钱，只在其借款中收一笔帐。他有一百二三十亩地，只租出来五六十亩，自己经营七十来亩，除雇一个长工外，全用这种办法吸收零工。

何明亮老人自从破产以后，把家事交给何洪义同志（是他的次子，长子在外住长工）经营。何洪义同志的性格和老人恰好相反——老人抱的是“忍”字哲学，而何洪义同志换成了“打”字。他是从替人放牛时候就打出名来的。他也懂得在当时没有替穷人说理的人，所以就采取了以非法对合法的办法，遇上了忍不下去的事，即使冒着最后吃亏，也要先把对方揍一顿；有时候被别人打得遍体伤痕，但伤好之后，遇上了机会仍然会再打下去。这个“打”字要比“忍”字效果好得多，有些地主爪牙们为了怕吃眼前亏，至少在话头上也得客气一点。

何家初到马庄时候，李耀祖没有摸清何洪义同志的脾气，竟向何洪义同志发起他地头蛇的威风，被何洪义同志间接教育过一次。在一次锄苗工作特忙的日子里，李耀祖要何洪义同志给他做零工。自己把地租给人家，在忙时候又拉人家的差，在前几千年皇帝统治下农奴身份过严的时候是合法的，但这时候的租约上毕竟写成“民国某年某月”，连李耀祖也记不得当年佃户见了地主要称老爷了，何洪义同志便回绝他说自己租种他的地里的苗也正要锄，没有工夫给他做。在马庄，李耀祖说出话来是没有人敢驳回去的，现在碰了佃户的钉子，面子上如何下得去哩？可是何洪义同志不欠他钱，他也借不上个强迫的理由。恰好李耀祖有个帮手叫李忘八的，曾经借给何洪义同志的钱，李耀祖便唆使李忘八找何洪义同志索债。何洪义同志锄着苗，被李忘八拦住要钱，便知是李耀祖所唆使，当时再也按捺

不住自己的火性，就和李忘八打起来。李忘八见势不利，早想逃走，却被何洪义同志扭住不放，从一垛梯田上且滚且扭，一节一节滚将下来。最后李忘八抱头鼠窜，何洪义同志以为打下了祸事，听候他们作合法的报复——出乎何洪义同志意外的是他们反而没有回音，就那样挨了。

5、回前岭去：

何明亮老人不幸在一九三五年患食道癌症，对他生活过三十多年的前岭十分怀念，好在他的二女儿已搬到前岭落户，便回去依靠女儿送终（经济上仍由何洪义同志负担）。这位老人家就这样可怜怜度过了一生，临终总算落了个“前岭人”。

老人临终用了某小地主一口棺，某小地主打发他的外甥来讨债，和何洪义同志打起来。这次是他们好几个打何洪义同志一个，何洪义同志受了好几处伤才逃掉。架打过了，债总是得还。何洪义同志无法还债，只得负伤远逃，直逃到汾河流域参加了筑路工程队。

何洪义同志走后，他的母亲带着他的弟弟们也丢了马庄的佃地搬回前岭依附女儿，他的弟弟们仍旧去当长工养活母亲——不过他们也都又成了“前岭人”。

和其它家史中所叙及的一样，何洪义同志在筑路队里也被包工头把工资克扣一空，由一九三七年沿途打着短工回到“前岭”。穷亲戚朋友们又帮着他在前岭弄到一些荒地，重新安起家来。

“前岭人”远征

一九四二年，八路军的地方工作组来到沁河沿岸的郭壁

村，曾派人到前岭发动群众和地主算剥削账。当时首先响应的人是郭尚仁，被选为小组长。这个郭尚仁，虽然也贫一点，但有三分流氓气。他首先算了一户本庄的中农，然后就抖起组长的架子，并管理着本庄原有的公共财物——祖师会（教真武神的迷信组织）的存粮。

有一天，何洪义同志想借祖师会一点粮，去找郭尚仁，郭尚仁从从容容摆起架子采向他说：“孩子！我吃得到粮食，那是我有那种本领！你们没有本领的，只能看我吃！”要是在前一些时候，何洪义同志保证要先揍他两耳光，可是何洪义同志这次不那么办了。何洪义同志想：“你找得到工作组，难道我找不到工作组？”有了自己的靠山就用不着非法手段了。

何洪义同志的妈妈，曾通过地主爪牙豆有生的手借过郭璧地主王元的钱，何洪义同志找到工作组，问这账能不能算，工作组说能算，并且要他联络其它借钱户一同去算。何洪义同志回到前岭，联络了七户借过王元钱的人，一同到郭璧和王元算了账，得到了赔偿，工作组便让前岭人重选算账小组长，结果改选成何洪义同志。郭尚仁那个小官官立刻下了台。

和地主算剥削账从前岭开了端，以后的场面一次比一次大：再一次算王元，算李庄的李文彬兄弟，都联络到二十多个村庄参加，每次都算好几天。把曾逼得何明亮老人和其它同难兄弟们破产的地主们，挨门挨户都被清算了。工作组见前岭人算账有了经验，敢说敢叫，发动他们到处远征，凡是局面不易打开的地方，就请他们去助威，从此沁河岸上的大村庄，哪村人也认得几个前岭人。

一九四四年，由区农会在端氏镇发动了一次向贾家大算账的会。在沁水说来，这是一次控诉封建老根的大会，共算了半

个月，参加的户数有五百余户，也记不得来自多少村庄——自然前岭人也在内。那时候，何洪义同志已当选为区农会的常委，在半个月的算账中也常在会上讲话。在他讲话的时候，群众们互相打听：“那是谁？”“前岭人！”。

从此以后，不但前岭人出门谁也不再冒充“李庄人”，甚而在一个短时期内，李庄有个别的人还冒充一下“前岭人”。

（一九六四年八月，写于沁水）

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

.....

二、我与文艺

我和文艺的关系，除参加革命行列（脱产）以前，是一个爱好者及有一点质朴的大众化观念外，可分为1、专业化以前；2、入京以前；3、在京时期三个阶段来叙述。

1、专业化之前

我是一九三七年在阳城参加牺盟会工作才投入革命队伍的（以前是教员）。因为我出生于农村，对民间的戏剧、秧歌、小调等流行的简单艺术形式及农民的口头语言颇熟悉，所以，在口头宣传及写小传单方面，有一定的吸引群众能力，也颇为工作接近的同志们所称许。

那时候，山西的政权名义上还是阎锡山的，实际上他的反动统治机构已经失灵。他也觉察到这一点，所以在一九三九年便以什么“同志会”、“突击队”等名义派下一批又一批的反

*这篇回忆，大约写于一九六六年冬。在文化大革命中，赵树理写的这种性质的东西，我们见到的共有八篇，《文集》只收录了这一篇，因为这一篇是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外界的压力还不太大，基本上是符合他自己的思想真实的。其他几篇，都是在重压之下逼着写的，那就很少是赵树理同志的本意了，所以都不录。又，收录的这一篇，我们作了一些删节。

共组织来破坏我们的地方工作。他当时出过个小报叫《黄河日报》，我们就借用他这个名义（那时还没有和他公开破裂）在壶关办了个《黄河日报》太南版，专门揭发他派来那些虾兵蟹将的劣迹。那小报的一版副刊名叫《山地》，由我担任编辑，我便利用我熟悉的那些民间艺术形式来攻他们。老实说我是颇懂一点鲁迅笔法的，再加上点群众所熟悉的民间艺术因素，颇有点威力。这报专往他们所到的地方张贴，贴到哪里读者挤到哪里。后来主编换了人，新来的主编以为《山地》不够艺术，另换了个名字叫《晨钟》，专登些新诗、新小说，并且另换了编辑，把我调作司务长管伙食去了。

那年冬天，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政变，和我们公开破裂了，那个小报再没有出的必要，领导上于结束小报时，把我和其它两个编辑调往一二九师的一个小报社（原名《晋豫日报》，后改名《人民报》）。那时这个小报又决定出通俗副刊，我又被委为编辑，文章风格上继续了《山地》之风，内容上则以教育战士为主，由领导上按当时需要授意写，形式上也不多采用文艺形式。

一九四〇年调往《新华日报》社，开始放在《抗战生活》（综合杂志）编辑部，自己很少写什么；不久，报社需增办一个专发敌占区边沿上的小报叫《中国人》，辟了个副刊叫《大家看》，我又担任了编辑，仍继续了《山地》之风，尽情地暴露敌人残暴、丑恶，发挥了点匕首之技。可惜仍是一人包写到底，连一份外稿也拉不到手。

在这三次办小报过程中，也写了几十万字的小鼓词、小小说，小杂文，有些也自以为值得保留下来，可惜没有存稿，再也找不到了。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敌人对太行扫荡频繁，小报停了刊。我写过两个剧本，一个就是《万象楼》，那是针对黎城的“离卦道”暴动在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领导下写的反会道门的戏。另一个叫《清债》，是清算一个地主的剥削账的。（油印三百份，发行到平顺南部，现无存稿。）

这一段的特点是有战斗性、群众性，缺点是几乎全是暴露敌人的，而很少有歌颂自己的成分。

2、入京以前

由于写了《小二黑结婚》被人称为作家后，接着写过以下一些作品（就记忆所及）：

《李有才板话》，是配合减租斗争的，阶级阵营尚分明，正面主角尚有。不过在描写中不像被主角所讽刺的那些反面人物具体。

《李家庄的变迁》，是揭露旧社会地主集团对贫下中农种种剥削压迫的，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的（这一任务没有赶上），其中虽然也写到党的领导，但写得不够得力，原因是党的领导工作不太熟悉。

《催粮差》，是挖掘旧日衙门的狗腿子卑劣的品质的。那是一九四六年，我到阳城去，见到好多那一类的人员，到处钻营觅缝找事干，恐我们有些新同志认不清楚，所以挖了一下。

《福贵》，也是在阳城写的。那时，我们有些基层干部，尚有些残存的封建观念，对一些过去极端贫穷、作过一些被地主阶级认为是下等事的人（如送过死孩子、当过捶鼓手、抬过轿等），不但不尊重，且而有点怕玷污了自己的身份，所以写这一篇，以打通其思想。

《地板》（土地面积的意思），这篇是在涉县写的，时间

也可能在前两篇之前。那时我们正进行反奸、反霸、减租、退租运动，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在一次说理会上，某地主说他收的租是拿地板（即土地面积）换的。当时在场的佃户们对劳动产生价值的道理是刚学来的，虽然也说出没有我们的劳力，地板什么东西也不会产生。可是当地主又问出：“没有我的地板，你的劳力能从空中生产出粮食来吗？”便迟迟回答不出。当时，我们协助工作的干部插话说：“地板不过是被你霸占了的，难道是你造出来的？”这样一来，群众也跟着喊，才把一个冷下来的场面重新扭向热潮。散会之后，仍有一些群众窃窃私议，以为地主拿出土地来，出租也不纯是剥削。为了纠正旧制度给人们造成的这种错误观念，我才写了这一篇很短的小说。故事是借一个因灾荒饿死了佃户而破了产的地主之口来说明土地不能产生东西的道理。

《孟祥英翻身》，这是一篇劳模传记，写于一九四三年。在前三篇之前，内容是一个童养媳解放后翻身的故事。

《庞如林》，这篇也是那时候写的，内容是写一个生产、战斗双带头的英雄，文体是鼓词，曾保存过一个单行本，后来不知谁借去，现无存稿。

《两个世界》，这是一个话剧本，写国民党庞炳勋部队在陵川的血腥统治的，现只有一个存本。

《刘二和与王继圣》，是连载于《新大众》小报上的一篇写抗战开始前后地主与农民对抗斗争的，只写了抗战前的一部分，可以独立存在。后因提纲失落，小报停刊，未再续（有存本）。

《邪不压正》，写土改后期（平分土地）一个流氓乘机窃取权力后被整顿的故事。在老区土改总过程中（包括反奸、反

霸、减租、减息历次复查直至平分土地,)不少地方每次运动开始,常有贫下中农尚未动步之前,而流氓无产阶级趁势捷足先登,抓取便宜的现象。这篇是一九四八年太行新华书店与晋察冀新华书店合并时在平山写的,就是为了提醒这一问题,使结束土改时不上他们的当(可能还存有一本)。

这一阶段的特点: 1、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直接为工农兵服务,在普及基础上求提高等一些道理; 2、内容上增加了针对群众思想进行教育的比重; 3、形式、结构、语言文字上仍保持力求群众便于接受的民间风格。

缺点是: 1、对主席讲话接受得有片面性,忽略了“以歌颂光明为主”的最重要一面; 2、过分强调了针对一时一地的问题,忽略了塑造正面人物; 3、仍没有学会和别人一道干——在《新大众》编辑部虽然也团结了几个编辑,和我有了同样的要求,但后来因借不上外来稿件,他们也就持之不紧了。

(附:这一阶段太行文联是徐懋庸和高沐鸿先后当政的,我的作品除《地板》(由《太行文艺》发表)外,都是由新华书店直接印出来的。当时的新华书店是我们所在的机关,太行文联领导下的作家、诗人……他们便自办太行文学出版社。)

3.在京时期

甲、在戏改局

进京时,我仍是《新大众》小报社一个编辑。这个小报被全国总工会接管后,我就被调往文化部的戏剧改进局(后改为艺术事业管理局)曲艺处当处长。这个局的正局长是田汉,两个副局长是杨绍萱、马彦祥。在他们的领导下,还成立了曲艺研究会。

乙、在北京市文联

不久我便调到北京市文联，被选为副主席。在这一年中，我自己看得多、写得少，只写了一篇宣传婚姻法的小小说名叫《登记》。

丙、入部读书

中宣部见我不是一个领导人才，便把我调到部里去。（一九五一年）

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并亲自为我选定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品五、六本，要我解除一切工作尽心来读。我把他选给我的书读完，他便要我下乡，说我自入京以后，事也没有做好，把体验生活也误了，如不下去体会群众新的生活脉搏，凭以前对农村的老印象，是仍不能写出好东西来的。

那年秋天，我便重返晋东南，接触了试办农业社的问题，写过一个电影故事名叫《表明态度》，原写的是试办合作社，后来北京对合作社有争论，不让写，才改为互助组。写的是一个老干部纠正他亲家在全国解放后产生的退坡思想的，未被制片厂采用，后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来年又到平顺川底住过一个时期，回去才着手写《三里湾》。

丁、归队——调作家协会

一九五三年调作家协会后，我便提出我那调整双重待遇问题的建议，如主张取消版税，稿费制可以再评，否则连现有的供给也不应领。

一九五四年继续完成《三里湾》。

一九五五年参加高级化运动，来年春写成《开渠》（秧歌

剧本)。虽然毛病也不少，总还算是写出在有了高级社的条件下，便能促进人们改天换地的积极性。

戊、公社化前后（仍在作协）

我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正产生于此时。

这个时期（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四年），对农村工作的观感上，有过五个小段落。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在沁水、高平两地看到高级社迅速发挥出来的优越性，具体表现为统一使用人力物力，使本年就达到大幅度增产。同时在合并地块后进行了必要的土地基本建设，兴修了一些小型（高平近中型）水利，我对这次飞跃的发展是很兴奋的。

可是，同时存在着一个几年前就已经出现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征购任务偏高，增产和增购不能按比例规定执行，结果使丰产区多吃不了多少。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县地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农民方面。

一九五八年秋前的半年多算一个小段落（第二个小段落）。一九五七年在参观高平、赵庄的大面积丰产田后，冬天又参观了丹河、陈渠两项水利设施，从现场看到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对一九五八年报上登的产量数字信以为真，我以为口粮问题彻底解决了，为公社写了建议信。

在新事物鼓舞下，需要马上回县工作。后来因出国任务耽搁了下来。这时期，我出了两次国，一次是赴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接着便是赴朝鲜访问。在朝鲜看到《人民日报》登载的阳城炼钢放卫星的消息，向朝鲜作家宣传了一番，并作诗

把“千里马”和“大跃进”用文字交织起来歌颂了一通。

回国后，便匆匆跑到太原，请求省委安排工作，省委派我到阳城县作书记处书记。

到阳城上了任（第三个小段落），一接触实际，觉得与想象相差太远。

此处二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对经验不足产生过的一些问题采取旁观态度，曾多次向有关领导提出建议。

从一九六〇年冬天的反五风到一九六二年党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算一个小段落（第四个）。在这一段里，我对农村形势的看法是1、煞住了“五风”；2、经过《八字宪法》调整，城乡人口逐步起着变化，农业劳动力恢复，城市用粮减少，解决了紧张关系；3、工业上增加了支援农业的实力。

第五个小段落是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以后，一九六四年作协整风之前。

认为农村的阶级矛盾仍以国家与集体的矛盾以及投机与“灭机”的两条道路斗争为主。后来听了几次大的政治报告及京郊的几个调查报告，看了《夺印》等戏，逐渐认识了地富篡夺领导权的可怕，回到晋东南参加黄碾的试点四清。

黄碾的试点只参加了四十天，就退出去了，原因是所见所闻尽是不想再要的材料。跑到黑山底拼凑了一点先进材料，回来写了个《十里店》。《十里店》的领导力量本来是可以写出来的，但是因为在形式上不愿意落套，就写不出一——第一不愿落“支书不在”之套（在就不能太强，强了就没有和平演变）。支书去受训或养病，村里出了问题，等到他回来把问题解决了也是一法。第二是不愿落从上级解决问题的套。第三种办法倒不是怕落套，而是避不开正面写四清。不采取常用办法，

而采取怪办法，是这个戏的致命伤。

在这八年中想得起来的作品有如下几篇：

《锻炼锻炼》，发表在《火花》上，半自动写的。

《灵泉洞》上半部，是写历史故事的，是响应大跃进号召（每个作家都写）写的。我一般不写历史题材。

《老定额》，半自动（《人民文学》约稿，自己也愿写）写的。与《锻炼锻炼》都是反对不靠政治教育而专靠过细的定额来刺激生产积极性的。

《实干家潘永福》是自动写的，是提倡不务虚名，不怕艰苦，千方百计认真做事的精神的。

《互作鉴定》半自动写的，是反对知识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的。

《套不住的手》是《人民文学》月刊动员我写的，没有什么针对性，是表扬一个支部书记的父亲（大部分以郭玉恩的父亲为描写对象）的劳动品质。

《张来兴》是纪念主席《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时，林默涵同志要我写的。是通过一个老炊事员写二十年社会变化的。

《杨老太爷》是《解放军文艺》动员写的，但也是我愿写的，也可以说是半自动写的。这篇东西是讽刺有资本主义思想的青年干部之父，故事时间是解放初期，农村有些干部的家长，对孩子在外参加革命工作，仍以“做事赚钱，发展家业”的眼光视之。不给他捎钱便以为是坏了良心，这思想应纠正。

《卖烟叶》，半自动写的。写一个投机青年的卑污行为，是我写的作品中最坏的一篇。

《十里店》，自动写的，而且是自以为重新体会到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要主题。

这八年中（公社化前后八年）我的最大错误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没有把我们的国家在反帝、反修、反右倾的一系列严重斗争中用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生产建设上所取得的不可想象的伟大成绩反映在自己的创作上。但是所写的东西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党的。检查我自己这几年的世界观，就是小天小地钻在农村找一些问题唧唧喳喳以为是什么塌天大事。而对于我们国家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突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我们的物质封锁、技术封锁创作出我们前所未有的东西（包括核武器）这样震动世界的大事反而注意不够。这是从前的个体农民小手工业者眼光短浅、不识大体的思想意识的表现。做为一个专业作家是有愧时代的。

三、关于通俗化

我的语言是被我的出身所决定的。我生在农村，中农家庭，父亲是给“八音会”里拉弦的。那时“八音会”的领导人是个老贫农，五个儿子都没有娶过媳妇，都能打能唱，乐器就在他们家，每年冬季的夜里，和农忙的雨天，我们就常到他家里凑热闹。在不打不唱的时候，就没头没尾的漫谈。往往是俏皮话联成串，随时引起轰堂大笑，这便是我初级的语言学校。

我在学生时代也曾学过五四时期的语体文（书报语，不能做口头语用）和新诗（语言上属翻译语），而且有一度深感兴趣，后来厌其做作太大，放弃了。

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已见本文之前一部分，此处不再重复，而要补叙的则是在北京的时期。

1，在北京因《说说唱唱》的失败而曾有一度把希望寄托

于曲艺。开始是在前门箭楼开阔的书场，后因作品过少、过低，不能迎人而罢。

其次是发动人改编新小说为曲艺。这事遇到的困难是作家不干，旧文人干不来，只有老艺人王尊三同志（曲协前主席）改了两本：一本因原小说《老桑树下的故事》有问题；另一本《新儿女英雄传》因作者孔厥犯了错误而废。

再次是职工业余创作会演（全国总工会组织的）时编了选集，好的很多。

再次是部队学曲艺、编曲艺的收获很大，但不归曲艺研究会管。曲艺研究会也选印了一些作品。

其后曲协成立，由陶钝负责，所出杂志及选印单行本，我就没有再管了。

2.通俗读物出版社成立时候（大约在一九五四年至五五年），我建议他们成立个改编部，将最好的小说改一份通俗的，后因有困难而罢。

3.不知什么原因，大约在一九六一年（或六〇年）通俗读物出版社停办了。该社编辑部的高鲁、高也夫，提倡办个通俗刊物，要我挂帅，我也同意了。后因种种原因，这个刊物没有办起来。

4.以作家协会为主，联合了戏剧、曲艺各出版社一些编辑，编过一部戏曲小丛书，也是由我出名的。

.....

四、我与青年

和我接触过的（包括通过信的）青年分为两大类：一是要学习文艺写作的，一是农村中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现分述

如下：

文艺这一行，在某一个阶段（特别是革命取得政权之后）说得过火一点，可以叫做“名利行”；而且好像没有个深浅，不像数学、物理等学科学会多少，就是多少，没有学过的到事实中冒充不过去。过去我对一些有名利思想表现的青年非常敏感，具有深恶痛绝之意。文艺界每谈到发动青年创作，以培养接班人，我也感到重要，可是一遇到上述那些青年来信来稿的钻营乞怜之语，我便觉怒不可遏，不过我对他们的态度仍以说服教育为主，所复之信，也不发表。

收入《三复集》的《答夏可为的信》是《人民文学》编辑部和我商量了发的。我把原信给了他们，并写好了信封，贴了邮票，嘱他们发表时勿提“夏可为”之名，而以“×××代之”。发表之后，代我把原信发出。可是后来还是把夏之名登出来了。好在我于这封信中虽对夏有些批评，可无失理之处。就在此信发表后，同情夏的人从各地来信百余封，对我兴师问罪。“罪”倒判得不够准确，却把他们自己的名利熏心的思想暴露无遗。所以我便又写了个极不平静的总答复——那种态度是错的，总不如平心静气讲使人易于接受。

从那时（记不得哪一年）我对于作家应否专业化开始怀疑，以后便肯定了不应有专业化的想法，并请示过转业，未被批准。

其次，每逢青年请我讲创作方法，创作经验时，我往往都只讲学习政治、学习文艺、深入生活三个要素，而且劝其安心于业余化，听的人往往是趁兴而来，兴尽而返，对我讲的十分不满意。我接到他们的讽刺信甚多，像“我顶不了你”、“你的经验准备带到棺材里去吗”……之类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了。

其次是对农村的初中毕业生。他们的家长有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以为中学毕业后的前途就是离开农村到外边找事，以为那才是正经出路，在家种地是大材小用，是没有出息、不会找门路的孩子。我对这些学生讲话，要讲大道理，他们听不进去，常是我讲我的，他们互相讲，他们的讲完了散会。

一九五七年（或五六年），《中国青年》约我写一篇批评上述思想的文章，并给了我几封有这种思想代表性的青年来信，作为资料，我便先后写过《出路杂谈》、《才和用》两篇文章，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也引起过一些学生来信谩骂。其实那两篇文章都是谈农村知识青年应该如何安心农业生产的道理的，都收在《三复集》里。

总之，我对要求学文艺的青年常劝其学习政治、学习文艺、体验生活，并决心从业余上打主意；对其他农村知识青年，常劝其安心农业生产，从发展农业生产上消灭三大差别，而不要利用三大差别去找便宜的主意。

《三复集》不只如上所举的几篇文章涉及上述之意，其它好多篇也有同样的意思。

五、对上党戏剧改革

我和上党戏剧的关系，开始于一九三八年。那时候，日军尚未占领长治，王聪文即领着程联考的落子剧团在中山头演出《大战平型关》。从戏的本身说谈不到成绩（新人旧装，朱总司令穿绿靠），从性质来说是个新事物，我即找他们表示支持，并表示愿与合作。其后又与一个梆子剧团接触，给他们介绍了落子的改革打算，然后把两个剧团动员到一处，合为梆落合作的一个团，就是后来属于太行四分区领导的胜利剧团，亦即现在

专一、二团的前身。

胜利剧团当年演出的节目计分四类：1、保留下来的少数传统节目（按当时的政治水平认为无害者）；2、新编历史剧。编过岳飞、黄巢、梁山等故事，也还有观点，但不太有戏；3、改编《白毛女》、《血泪仇》最为成功，略具现有的水平；4、新编生活故事戏，因抓不住正经主题，成就不大，没有保留下来的节目。

以上是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一九四六年回到长治以后，那时候剧团的特点是政治空气浓厚，保留着在山里的团结精神、民主精神。经济待遇上接近平等（在收入中先扣出每人相同的基本生活费用，剩下的才按评级的级别分配）。我参加过他们回到长治后第一次干部改选会议。那次不提候选人，但选票也非常集中，大家都满意。

我从此和他们分了手，直至一九五一年才又相聚。

在这一段里，他们虽然也学到了些外来的东西，但也走过些弯路。回到长治以后，为了和原来留在敌占区的旧势力对抗，把落子分出来作为专二团（可能又吸收了一些人），梆子与高平一个剧团合并，成为今之一团。

在业务上，请京剧老师教过武功，改过化装和服装、锣鼓，短时期唱过京戏，接受过《茶瓶计》、《祝英台》等外来传统剧本，改编和新编过一些历史故事剧——因我不在，内情、过程及先后知之不详。

第三个阶段是复古阶段。以前的复古，他们是抗不住旧势力，所以迁就。在这一段，剧协已成立，北京印发来一些文件，加上我回来给他们介绍北京情况，又为讲解文件中所谓

“人民性”，就给旧东西添了些所谓理论根据。

后来他们又看了太原一些翻箱底演出（如蒲剧的《五雷阵》、《高平关》等），回来就又抖出《黄河阵》、《九华山》等神神鬼鬼。我在那时又送来好多本本，更助长了此风。

不过我在当时对戏改也不尽是随波逐流，盲从别人的。我还有我一套虽说有错却还成体系的改革道理。我以为成规过多的梆子可以专演历史戏，而以地方秧歌、落子演现代戏。在第一次赴京演出时，我主张以吴婉芝、郭金顺作主角，用高平秧歌排我所写的《开渠》，后来他们不愿那样干，才叫落子排。

我常向戏剧界讲的古人把古人的生活歌舞化了，我们今人也要仿其意，把我们今天的生活歌舞化一番……亦即主席在讲“继承”和“借鉴”时所说：“……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引其中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之意。我认为戏剧改革应批判地接受民间艺术传统中有关歌舞之部（鼓词、道情、小调、竹马、旱船等）作为我们创作的借鉴。我这些主张，讲得虽然已经惹厌了，可惜收效甚微，被淹没于那些大而古的《红楼梦》、《武则天》及我自己参加过的《三关排宴》的大海中了。

六、对民间艺术传统

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旧诗赋、文言文、国画、古琴等是。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新诗、新小说、话剧、油画、钢琴等是。三是民间传统，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是。要说批判的继

承，都有可取之处，争论之点，在于以何者为主。文艺界、文化界多数人主张以第二种为主，理由是那些东西虽来自资产阶级，可是较封建的进一步，而较民间的高级，且已为无产阶级所接受。无形中已把它定为正统。你若以未能普及为理由去和他们辩论，他们说那只是因为多数人没有文化，只要文化普及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会接受。这种看法不限于维护三十年代传统的那些权威们，凡是学生出身的人都有这点同感。可是这不合乎毛主席所说那从普及基础上求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去普及的道理。主席所说那“沿着工农兵前进的方向，……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其提高的成品，应该另具有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特有的高度，不能是以资产阶级成品的高度为样板的，而且按那个正统所要求的東西，根本要把现在尚无文化或文化不高的大部分群众拒于接受圈子之外的。

以民间传统为主则无上述之弊，至于认为它低级那也不公平。民间传统有很多使他们相形见绌的部分——例如有些民间唱法能使人想听不清也不行，有些洋唱法，就是神仙也听不清楚。不高是可以“提”的，总比先把一大部分人拒于艺术圈子之外好得多。这个道理强烈反对的人也不多，就是愿意那样做的人太少了。

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受学校教育的学生（从中学起就是）已经把自己的文章练习得脱离了“语言”，就是在向多数人发言的时候，也以为用口头语不够格，必须作成学生腔的发言稿去念，才觉得交代得过去。在艺术生活方面，他们也只习惯于歌曲、朗诵诗，而对民间传统则无所继承。现在的尚活在中年以上的人心目中的民间艺术，因为没有新词而剩下些陈词滥调不能用了，而学生们弄那一点新东西，在他们看来技术水平不

高，引不起较强烈的兴趣。总之，老的真正的民间艺术传统形式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而掌握了文化的学生所学来的那点脱离老一代群众的东西，又不足以补充其缺。

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不甘心失败，不承认现实。事实上我多年所提倡要继承的东西已经因无人响应而归于消灭了。学生们所弄来那点东西不论如何简单如何脱离老一代，既然只剩下那个了，就须得承认它，是现在仅有的“普及的基础。”事实如此，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也。我尚未完全绝望者仍在语言。学生们作起文采，讲起有稿子的话来尽管洋化了一点，但他们无论自己互相谈话，无论与老一代谈话，基本上用的还是传统语法，有朝一日他们觉着那种书本话的调调不得劲，而想改得自然一点，这种大众语法的基础还存在，采用起来还很现成。

.....

八、离京之后

1、写英雄之计：我对创作上没有写出英雄来的错误虽说早有觉察，却还数在北京整风时候（一九六四年后半年）认识得更为深刻，调到山西省文联来便打下了写英雄的决心。

2、到晋城的目的：省里开模范工作会议时（一九六五年春），我遇到了常三毛同志，并了解到晋城本年在农业生产上要争取成为四百斤县。这一下和我上述的打算碰了头。我觉得到晋城有三个方便：第一是有常三毛这位老雇农出身的县级领导，而且过去也曾有一度认识，再深入理解一下，可以作为将来写县级领导的主要资料；第二是个面上先进的地区，将来借作背景写起来开阔；第三是语言、风俗都和自己的家乡接

近，便于深入群众。

3、先说《十里店》。这个戏在一九六四年到太原演出受到许多批评后，自己虽有想不通的地方，可是总算搁下不提了。去年夏天，李雪峰同志到太原开会，不知谁向他提起此事，他说可以到太原去作一次内部演出看看。这时候，我在晋城还只在面上跑，选了峪口那个点，还没有去接头。专梆子团通知我要到太原演剧的消息，要我来帮着再排一下，然后随他们到太原去。我是迷在这本戏里的，老以为别人的批评冤枉了自己，所以听了这个消息，便向县委请了假，来长治和剧团排了几天戏，一道上太原去了。在太原住了将近一个月才演出，演出之后，各方面又都提了好多意见（李雪峰同志的意见没有单独和我谈过，他说他向省委说过了，让省委结合各方面意见，一并告我）。我去找王大任同志，王大任同志把好多意见单子订成一本给了我，并谈了一下总的精神，说要改就需大改，改的时候可把那个本上的那些意见都考虑一下，能接受的就接受（因为有互相矛盾的，所以不一定都考虑进去）。我根据他的指示，住在太原改了一个月，改完之后，去给他送，没有见到他，找到宣传部江萍部长，江部长看了和我谈了他的意见，又送给卢梦部长看。卢看后又指出若干处要改的地方，叫改一下（主要是删）。那时候江萍同志已经往晋东南来，我向卢梦同志说，改后是否再送他看，他说不用了。我改完了，便回到长治来找剧团重排（因为改动在一半以上，所以排的时候又磨去好多时间）。这次排出之后，地委和江萍同志看了都仍有意见。这样一月、两月、三月，几乎又把半年时间投进去了，除铸成一次大错之外，又妨害了自己正业的计划，等到正式到峪口蹲点去，已是秋风扫尾，秋翻地开始的时候了。

4、点也没有蹲成：到峪口蹲点去，先遇到五个不利条件；（1）县委派人照顾；（2）村里为照顾书记，单独给我找了小房子，减少接触群众机会；（3）吃饭问题；（4）我劳力不行了，和青壮年不能在劳动中相见；（5）县委书记官衔对普遍接触群众不能算有利条件。每天也到地里去、到会场去、到俱乐部去，去谈话、讲课、娱乐，但都是自己说得多，能听到见到的生活面太少。

点上马上得不到结果，年关就到了。过年时候回太原去了一趟，在太原又想到地县两级对《十里店》提的意见，又作了一番“修改”，回到晋城又改排了一次，又耗去一两个月，《十里店》一剧真害死我也。

5、又返到戏剧上来：在抗旱打井时候，又在峪口点上住了个把月，有一次回到县城，见晋城剧团排焦作市豫剧团的剧本《焦裕禄》，觉着在技术上和上党戏有些出入，手又痒痒起来，便决定改编一次。这次本打算只在技术上改得便于上党剧团演出，可是又看了几遍之后，觉着剧本把重点放在焦之死上，便觉内容上也有改动之必要。于是就重新翻阅书报杂志上所有关于焦的材料，重新布局。在写了三场之后，专剧院便打电话约我来改准备参加会演的《两教师》。《两教师》虽没有改成，但在参加这一段工作中，使我了解到，教育改革之重要性。思想上的收获，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可以说是空前的。后来参加改《两教师》的人都散了，晋城也给我贴出大字报，此事便告一段落。

6、新书新人对我的启发：晋城给我写出了许多大字报之后，我找组织谈，组织又不和我谈。我觉问题严重，但不知从何谈起。这时戏也停改了，乡也不便再下。每天除了听一听

学毛选的青年们的报告，便读了一本《欧阳海之歌》，这些新人新书给我的启发是我已经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

九、一点解释和要求

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无论思想、创作、工作、生活各方面有何发展变化，有什么缺点、错误，也就是说是个什么成色，始终是自成一个体系的。入京以后，除在戏改方面受了些感染（也因自己本身就有爱好封建戏曲的弱点）外，其他方面未改变过我的原形，广大人民不了解内情，从某一段社会关系上把我和有些人摆也摆在一处，扫也扫在一处，但我把自己的来踪去迹向党说明之后，要求党在数年之内，经过详细调查，最后把我加一点应有的区别，放到个应放的地方。

我不要求过早地加以区别，此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事，文化界、文艺界的人们更应该是一无例外的。待到把我和我共过事的人都接触到，把问题都摆出来，我本人的全部情况也便随之而出，搜集起来，便是总结。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像。在起牌时候，落子上插错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倒正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时候，再被检点。

糊涂县长·

C县长刚到T县接事后，便接到上峰的命令，要他联合市县党部，举行破除迷信运动，打毁偶像。于是县长召集联席会议，筹备一切。

在会议席上，县长曾慎重地提出个问题。“我主张只把‘五道庙’和‘关帝庙’打毁好了，‘城隍帝’是打不得的，那儿的鬼真多。”

然而会议的结果，却偏偏第一个要打毁的，便是“城隍庙”。县长摸了摸鼻子，悄悄地坐在那里。忽然又一个问题，从县长肚里冲出来。

“啊！可以不可以先让警察在‘城隍庙’放几枪，然后我们再打？”

在座的人们，被县长两次提议，弄得肚里咕咕直响，差点没把唾液喷出来。后来还是一位县党委过意不去，才和县长说道：“县长不要问这些，明天你带着警察按时参加好了。”

第二天清早，县长便到了指定的地方。出发时，有的人拿绳，有的人拿棒，县长却挑了一个极其轻巧的炭斧。

到了城隍庙，年轻的后生们，得着好玩的机会了，争着向泥城隍爷打下去；而我们县长却蹙着眉毛，蹲在阶下，用小炭斧敲小石子。年轻的后生们好管闲事，见县长独自蹲着，便嚷：

*本篇用笔名“黑丑”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二、三日山西某报。

“县长怎么不动手？”

“啊！啊！我打！我打！”县长见人催，便连忙跑进大殿，拿小炭斧在一个小泥象肩头轻轻地、象敲小石子似的敲了三下。仅仅敲了三下，便又连忙跑出去了。——因为县长敲时，自己觉得头有点眩，心有点跳，腿有点抖，生怕小鬼和县长拼命，所以趁早溜开。

正殿，西廊，这时正打得轰轰烈烈，雾气冲天，县长的心也越跳越快，腿越抖越厉害。

“啊！手榴弹！”东廊里的人，都一拥而出。说是从神肚里掉出一颗手榴弹，好在没有炸开，人们停了停又进去了。

在县长，以为是惊醒了神，神要发怒了。便趁空从西便门溜走了。

大功告成后，点点人马，没有了县长。经过一个警察的报告，才知道县长已经逃脱了，都笑了笑，没说什么。

从此，县长的贵姓下，加了“糊涂”二字。已糊涂的大名，全城内外，无人不晓。县长唯恐他老人家的大名不确当，遂又作了以下的一件事。

打神一个月后，县里要改选财政局长。糊涂照例召集县里的几个大绅士来推举。想不到有些个学生，要参加选举，而且要求公开选举。县长刚念完《三民主义浅说》，认为这是对的，便一口承认了。

向来T县的财政局长，是由这几个大绅士轮流充任的，今年恰该是王大肚，王大肚知道学生参加，是不利于己的，便和县长说：“这是成例呀！县长怎么改变了呢？请赶快拒绝学生参加！”

“啊！成例！对对对！成例！我不让他们参加好了！”但

是王大肚走后，他又搔了搔头皮，这该如何办理呢？学生不好惹，绅士惹不得！于是只在地上打圈儿。

截至选举的前一夜，学生来了七趟，而且一趟比一趟多。他答应了七次“准参加！”绅士来了八回，一回也比一回硬，他答应了八次“不准他们参加！”

糊涂一夜翻来覆去，越睡心里越清亮。学生、绅士，几乎把他的脑子扯碎。天快亮时，才渐渐糊涂了。

“报告县长！”又把糊涂从糊涂乡里拉回来。“会场里被学生占满了，绅士们都已到齐，请县长说话。”

这一下可糊涂了，也不知是怎么样，迷离糊涂一下子便到了会场。

“县长不是说不准学生参加呀？为什么这些学生一早便来了呢？”绅士们理直气壮的问。

“啊！他们……他们……”县长抓了抓头皮。

“县长赶快发选票呀，时候到了！”学生们也围拢来。

县长又抓了几下头皮，才嚅嚅地说：“你们不要参加……”

“什么？你应许了我们参加，为什么又不要……”

接着后边是：“灰！”“堆！”“C糊涂！”

县长看势头不对，连忙堆下笑脸道：“是，是，准参加！准参加！”

可是县长一转身，又看见那些瞪着牛眼的绅士们了。又抓了抓头皮，把头低下。

停了一阵儿，县长抬起头时，前面一个绅士也没有了，便赶紧三脚两步溜到休息室里。

开会了，县长的主席。县长看了看会场：瞪着眼的绅士，

叫喊着的学生们，从门外一批一批钻进来的戴着尖顶瓜皮小帽的商人们，……真使县长有点茫茫然。

突然，县长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妙方法，意思是想用一套漂亮的演说，把人心安下去，然后再想法处理。于是把三天前看过的《三民主义》背出一段：

“诸位！兄弟好象开汽车的……”

“散票！散票！”

“秩序！秩序！”有人在拍桌子了。

“是！秩序！”究竟是县长说话，居然静下来了，于是县长又说：“诸位！兄弟好象是一个开汽车的……”

“散票！散票！”

“秩序！秩序！”

县长眼看没办法，只好散票。

“冒名出席！打！”学生们发现了被王大肚雇来的商人中，有的是学徒代替掌柜的，有的是儿子替老子，于是又怪叫起来。

“啊！啊！是！是！出去！出去！”县长也不自然的叫了几声。

选举会完了，因为王大肚雇得商人多，所以当选了。学生们不服，开始攻击，而且连他老人家也牵扯进去。这一下便把县长弄了个左右为难。

后来，他老人家心血来潮，觉得还是回家念弥陀佛，比较心里安静点。

于是在学生们给省政府上呈文的第二天，他老人家也把辞职呈文递上去了。

一个半月的县长。

到任的第一天·

一

时节已是七月，太阳的光，仍是那么热。

一辆马车，拖着，我，拖着满腹的心事，离了家，向着离家五十里的村庄走。

离家，本算不了一件什么事，这次，却觉着心头烦烦地。

这么小的年纪，还应该做做学生的，现在却是做孩子们的老师。老师，这尊称太有点威严，威严又有什么法子，父亲的愁容，母亲的眼泪，不得不把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幻想，掩藏在心的底里，开步走，走向社会去。

二

第一眼看着的是这村庄，一个很大的村庄，周围是些田，青葱的；村南一条流水，微微的风，扬着攸攸的波，在太阳下，泛着流金，蜿蜒的像一条长蛇，流着，流到很远的地方去。

从前，马上想起了在学校时的一幕，看着书，想着农村生活的优美，当时是羡慕着，能生活在农村够多么好，鉴赏自然的图画，欣赏自然的诗意，与坚实而纯朴的农夫谈话，同时把自己也打入了农民的生活队里；现在这已不是想像，已不是羡慕，是已经站在自然的怀里了。按理有点喜悦，但仍是烦烦地，老激不起一点兴趣，自己对自己，变的也有些不明了了。

三

进了学校的大门，心头更觉沉重的可以，孩子们正在院子里

*本篇用笔名“何化鲁”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山西某报。

逛跳着，对我的来，似乎感到兴趣，无数的小眼睛，都投到自己身上来。这情景，更觉着那个，差点步子迈得也有点变了。想着不久便同这些孩子们在一块生活，心头不由的跳了起来，小鹿般地。

“何先生，才来，好好，我们盼望了你好久了呢！”

面前站着三个穿长衫的人，直觉的知道了，这就是这学校里的老师。但哪位是校长，哪位是师员，第一次见面，有点弄不清楚，然而态度上，还得沉得稳稳地。看着大家都在微微地笑，自己也笑了。

“哪位是李校长？”

眼光射在了三位脸上找答复。

“是兄弟，是兄弟，伯生兄来函早已介绍过阁下了。”

不知因了什么，只这几句话，看着这位校长先生真有些俗气，想着这就是将来的同事，心中更觉沉重重的。因为是初次，表面上总得应酬几句。

“兄弟是刚跳出学校门子，以后还得请诸位指教。”

就这样，我成了这校的教师，下午我陈设开自己的卧房。

孩子们总是可爱的，他们对这初来的老师，像有点好奇，全围拢在窗底，低低地在谈论些什么。

“你们都不要在外边，到我内间来吧。”

我说了这话好一会，还不见一个孩子进来，并且都已躲到老远去了。

我很奇怪，为什么老师在孩子小眼里，是一个可怕的动物。从这一点我看出了这里的教育成绩。

夜里，我少睡了几个钟头，多抽了几支烟，今后的步骤，随着烟雾缭绕，在我的面前展开了。

我也谈谈创作*

在读了蕉圃君的《在什么时候才能创作》之后，又读了中青君的《谈创作》，当时便想写些意见，今天又读了蕉圃君答中青的文章，更促动了我说几句话的动机。

本来蕉圃君底问题的提出，就有些失检点，因为写作的事，必须得有相当的闲暇，才有握管与构思的可能，这是无须提出的一个问题；但蕉圃君说得有点太呆板、太机械，把创作与生活，机械地对立起来，似乎是在某一个阶段生活在某一个阶段创作，创作与生活，死板地割裂了开来，无形中得出了在生活的过程中，就不能有创作的结论。而承认了厨川白村的主张，这是一个大错。中青君就把握了这一点，向蕉圃君反驳，仍然没有避免了创作与生活割裂开的错误，只把创作的定义，提得高了点，否认了创作是由于“苦闷的象征”，而主张由理论的骨格出发去把握现实。虽然问题比蕉圃君提得多少有点价值，而于蕉圃君“在什么时候才有创作”，似乎没有充分的答复，这就无怪乎蕉圃君在驳中青君的文章里说他是“有些驴头不对马嘴了”。

不过，我认为在蕉圃君的《焦点所在》一文里，仍有些错误的见解。

* 本篇用笔名“何化鲁”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山西某报。

第一，蕉圃君承认“有生命的活动在里面”，便可以名之曰创作，是欠妥当性的。这问题很容易明白，我也举个例子来说。梁实秋是主张人类的文化的，也就是说凡含有感情的成分的东西，到什么时候，也失却不了它的价值。这同蕉圃君“生命的活动，便是创作”的主张，是同样错误的。但当我们读了梁实秋他们的创作之后，说它不成东西，这不成东西的批评，便否定了他存在的价值。这是不屑细致研讨的一件事，只要我们用时代的必要来看某一种作品时，你就可以断定，什么算创作，什么不算创作了。如果用人类的眼光来观察一切，论定一切，这是事实上所不许可的。假如蕉圃君再以加给中青君的“独占”两个字，加在我的头上，那也只好如蕉圃君所说“你说你的话，我说我的话了”。所以，在创作含义的观察上，我是赞同中青君的主张的。

第二，就是蕉圃君一方面承认，一方面又不完全承认厨川氏的“苦闷的象征”的主张，也是不妥当的。现实的存在，是什么就是什么，它的本质上绝对不含有两样的真理。只因为个人的主观的观察上的不同，而有存在的两面性的结论，绝没有一个人承认了这方面是对的又承认那方面是对的事。如果不幸的一个人同时承认了两方面都是真理，这就是证明了他认识的不充分。或者因了某种的条件不能跳出这认识的圈外。蕉圃君对“苦闷的象征”的两方面的承认，我们可以看出蕉圃君对创作认识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否认了，一方面又不忍放手，这个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蕉圃君承认创作是生命的活动的缘故，但须知道，用这个观点来谈创作是错误的。梁实秋担不起现代的文坛的担子，正说明了创作是怎样的东西。蕉圃君对这点，我相信是会明了的。

所论如上，不知蕉圃君以为如何？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四日夜）

神经质的文人*

“无聊的文人”这一句对所谓文人们的批判，固然得附以条件的相对的去承认；死去的，不能表示一点反响的，不必提起了；就以现存的常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大部的文人们来观察，也真够使我们感慨的说，真是些无聊的家伙。

曾今可的自吹自捧，提拔新进作家，不屑对他多费笔墨了，就是现在正红极一时的林语堂那一把子，那股幽默味儿，也着实不敢恭维。这除了宣布他们的头脑快走向凝固的路子以外，无论费上多大的精力，也找不出他们还有发展的前途。

现在所要谈到的，只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批评家们。他们对中文坛与他们自己的联系，看得太重要了，无论什么问题都要谈，并且一谈便是论战。我并不反对他们对谈问题的这种热烈的态度，我更不反对他们这种勇敢的战士身手。我所不满意的是：他们对问题的提出，太不检点，太不慎重；不问这问题在我们现在的中文坛，是不是必需，是不是必要，只见别的国家在谈论着，自己便提了出来。固然有好些问题，在现在提出是切要的，如现在正讨论着“文白之争”，与中国字拉丁化的问题，谁也不能否认了这问题在现在提出的价值。但有些问题，提得就不妥当了。“拿接受文学遗产”这问题来作例：

稍微留意点文坛消息的人们，都知道接受文学遗产这问

* 本篇用笔名“何化鲁”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山西某报。

题，是俄国现在与接受一般的文化遗产这一个总的问题同时提出来的，在俄国是因了他们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在客观环境的需要上面提出的，我们不应当因为别人上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托尔斯泰的重新估价^①，请梅博士出演中国的团圆剧，便认为我们也应该跟着别人，来时髦一下。须知道现在的俄国，在各方面的发展上，不比中国。在俄国这问题的提出，是必要的，是对的，在中国便不是必要，便不是对的了。这中间的差别，这中间的距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只要看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什么阶段，中国社会是什么现象，便清楚了，是不必我再来多咕噜了。然而这些不凡的批评家们，竟不加观察的盲目的干了，我不能不说他们跑得有点太快，把一切应当经过的阶段都搁过不提，而迎头赶上，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工作啊！这不但不能使中国文坛有发展的希望，恐怕从五四以来，死过去的幽灵，会在这一个口号下复活起来，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批评家们，应当把眼光看得近一点，不把足板站稳，而竟跑和跳，甚至飞，恐有跌伤的危险呵！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夜）

^①“托尔斯泰的重新估价”一语，含义甚不明显，说是作品的篇名，无论阿·托尔斯泰或列夫·托尔斯泰都没有写过《重新估价》这个篇名的剧本，连相近似的也没有。至于是否是说对列夫·托尔斯泰的重新估价，在二十年代的苏联，曾经有过“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未来派”要对列夫·托尔斯泰重新估价（尽管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有了估价）。另外，列夫·托尔斯泰本人也曾提出过要对莎士比亚重新估价。

欧化与大众语*

一、问题应怎样提出

因了近来一度的文白之争，接连着提出值得讨论的问题，便是应否欧化与大众语等问题。似乎这是在过去已经热烈的讨论过，而被人遗忘了的。但现在又重新提了出来，这正足以说明，是件很迫切而不容许轻视的事。那么，当我们来参加讨论这问题的时候，是应该从各家的言论中，细致的、精密的、认出他们定调的花枪，把握住他们论争的焦点，然后再加以批判的否定或接受，才能把这个重要的问题，合法的处理了。

谁都知道，现在一般的艺术至上论者，对于欧化与大众语问题的态度，与林琴南在过去文白之争时的态度同样，他们死守着艺术至上的理论，想渐渐走入艺术之宫、象牙之塔，使艺术与民众隔离起来，与社会隔离起来，而把艺术独占了，变成他们独特的少数人欣赏品，这不特把艺术的社会价值给否定了，就是艺术的本身价值，也必然的僵化，必然的凝固，因为艺术的本质，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样，可以脱离了社会的关联而存在。反之，艺术必然的是社会的、民众的，才有发展的前途，才被称为艺术品。

*本篇用笔名“何化鲁”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山西某报。

当他们谈到欧化与大众语的时候，他们坚决的主张欧化，坚决的反对用大众语来写文学作品，他们唯一的理由，便是说欧化文学在描写上比中国固有的辞藻，易于精细，易于逼真；无论怎样复杂的环境与心情，也可以无遗的描写出来。而大众语对这些任务却一点都不能担当，因为他是那样的粗鲁，那样的含混与朦胧，那样的贫乏不充分；粗鲁易流于俗，文学雅事，焉能使牛粪蔷薇花同列；含混与朦胧，易流于模糊不清，也就是说不能把一件动作，一个表情，很真实的描绘出来；贫乏不充分，易流于不足表达心情，也就是说大众语的辞藻，根本就是不足的，当然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来；因了这三个原因，所以他们力主欧化的必要，把大众语给轻易的否定了。这是个错误的见解，危险的行为，我们是必须加以检讨与批判的。

首先我以为应该慎重的是出发点的问题。须知道这问题的提出是为大众，不但是想让文学渐渐的接近大众，有欣赏能力，并且有创造的可能和机会，使文学变成社会的东西，变成为大众、由大众的东西。如果仍然固执着对文人学士说话的态度，我敢武断的说，无论讨论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把握住问题的重心，得出个确当的结论。这并不是放低文学的价值，并不是牵就，这是个事实发展的真实的过程。没有消化能力的人，若给以珍馐，必然不会接受的。

二、欧化是否必要——责龙贡公

前几天在申报自由谈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欧化的必要》，署名是“龙贡公”。他这篇文章的主旨，便同一般艺术至上论者同样，不着眼在大众身上，而只说是欧化能表达出情

景，描写的尽致，至于这种欧化的表情手法，是否能被大众看得懂，却不去理会。这种舍本逐末的主张，我是不敢苟同的。须知描写的尽致，不但欧化文字可以担得起，就是中国过去的旧文学作品上，也可以随手举出些例子来：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久被人们喜欢看的一部曲子，无论在写景方面、抒情方面，都写到微妙处。在《拷艳》一折里，红娘唱：“当日个月明才上柳梢头，却早人约黄昏后，羞得我脑背后将牙儿衬着衫儿袖，猛凝眸，看时节只见鞋底尖儿瘦。一个恁情的不休，一个哑声儿厮厮。呸！那其间可怎生不害半星儿羞。”

这把莺莺与张生当时寻欢的情形与动作，红娘在窗外等待的心境与表情，只在这数十字中，活泼地描绘出来。

再如：当红娘被夫人拷问时红娘对答的话：

“夜坐时停了针绣，共姐姐闲穷究，说张生哥哥病久，咱两个背着夫人，向书房问候。”

又如：

“你绣帏里效绸缪，倒凤颠鸾百事有。我在窗儿外几曾敢轻咳嗽，立苍苔只把绣鞋儿冰透。今日个嫩皮肤倒将粗棍袖，姐姐呵，俺这通殷勤的着甚来由？”

我想用欧化的文字，要把这些情景像这样活生生的写出来，在这样简洁的几句话中，恐怕怎样高明的手法，也写不如这样活像、这样生动吧！

又如在哭宴一折里，写莺莺看了张生走了之后：

“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

用十个字，写出了一幅图画。

“将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般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用两句话，写出了莺莺的满腔心事。

我不知道龙贡公看了上边的例子，应该作如何的想法，我以为他必定要反对我，说这些东西，是不能被大众理解的。这是我所首肯的，真的像这样含意微妙的写法，没有文学素养的大众，是不能尝出这些滋味儿。但我的主旨，并不是来提倡这种东西，更不是主张大众语的文学，应该仿效《西厢记》的写法，我只是说，描写的逼真，描写的生动，并不是欧化的文字，单能胜任，就是中国文学，也可以担负这项使命的。现在再举一个浅近的白话的科白，让主张欧化必要的龙贡公君看看：当莺莺约了张生相见，红娘催莺莺去赴约的情节。

“红娘催云：去来，去来。莺莺不语科。

红娘催云：小姐，没奈何，去来，去来。莺莺不语做意科。

红娘催云：小姐，我们去来，去来。莺莺不语行又住科。

红娘催云：小姐又立住怎么，去来，去来。莺莺不语行科。”

这不是把莺莺那种矛盾的心理，及发展的过程，有步骤的写出来么？我只问龙贡公一句，这是不是欧化的描写法？

象这样生动的手法，我可以说在中国的旧文学作品上，随处都可以举出例子来，不特《西厢记》一部书而已也。象《水浒传》的武松与李逵同样打虎，而神情、性格的各别不同；象《红楼梦》各各个性的描绘；《老残游记》听说鼓书弹琴的象征写法，能说他是欧化的么？能说他写的不逼真，不尽致么？但这些都是欧化的文字。（恕我限于时间与篇幅，不再多举例子。）

所以我以为，描写的手法好不好，并不在欧化不欧化，只在文字的运用如何而定；如果你没有表达的能力与技术，就是欧化也一样的不能描写到好处。如果自己有这种能力，能运

用适当的文字，写出适当的情景，就是不欧化，也同样能写的绝妙。但这些说话，只是站在形式的问题上立论的，其他意识问题，不在这篇文字讨论之内。

最后，我再声明一句，我并不是在否认了欧化的必要之后，便主张现在的文学，跟了过去的技术走。我只说，不欧化的中国文字也能写出极复杂的情景。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了，就是利用中国的言语与文辞，是可以写出好的作品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你能实地参加在大众的生活里，体验了大众的心情与体态，用大众的语言，是可以产出大众的作品。如果说用大众语写出来的文学，便会放低了文字的价值，那只是护道者的说法。主张大众语的人，是不会承认这些的。假若只住在租界的三层楼上，而主张大众语的文学，无论赞成或反对，都是幻想，都是欺骗。

三、大众语的问题

这问题在中国文坛上提出来讨论，本非始于今日，远在一九三〇年，就很热烈的讨论过，接连着直到现在，可以说无不在被人注意，被人研究，然而就这很长的时间，仍没有得出一个相当的结论。

这次又与中国语拉丁化、欧化的必要与否，一块儿提了出来，我们不能说这不是近年来的一次总检讨，所以我很希望能从这次的论争里，得出一个很妥适的结论，愿以后永不要在这些术语的圈子里徘徊，在必要与否的问题上来争执，必要须得更进一步，从事实的发展把统一的大众语，或者是近似统一的大众语建立起来，然后才可以谈到所谓大众语的文学。

我们都知道，所谓大众语，并不尽是“奶奶雄，操他个奶奶，妈拉个八”等等粗陋的语言。那么，当然就不能说文章里含有这些字句儿的，便是大众文学。更不是如一般浮浅者流，以为句子的简短，对话的单纯化，便是大众语文学。所谓大众语文学者，必然地是大众的一般的语言，听得懂、说得出的言语。但我们又知道，中国的地域，是那么辽阔，各地方言的不同，土语的互异，可说是复杂到极点。就以官话而言，在北方以北平语为主，在中部以南京上海话为主，在西南又以广东话为主：这各别不同的官话，不但在发音方面不同，在习用语方面更庞杂到极点。以如此杂乱的言语，写出的所谓大众文学，当然是杂乱的了，结果所至，不但一篇作品，因了方言与习惯语的不同，使一般大众无从了解。就是部分的知识分子，恐怕也只好搁过不读。文学的大众化，本来是想将文学很普遍地发展到一般人的身上，结果反使范围更形狭小起来，当然这不是提倡大众语文学的初意了。

但是有一部分人以为这些困难，都不成问题，他们理论的根据，说现在的中国，不是从前中国了，因了工厂的设立，大部分人从乡间跑到城市里来，他们在一块儿生活，把各地的方言与习惯语，逐渐地由相互理解，而相互混合，久而久之，便造出一种综合的统一的言语，这就是地道的真实的大众语言；以这种语言而写出的文学，便是地道的真实的大众文学。诚然，这意见我是相对的承认，相当的采纳的，但我们又不能如此单纯地去理解。这里横着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每天抬到天上的所谓大众，只是有言语，没文字的，他们连工具都没有，如何能理解了所谓文学呢？如果有人以为我这主张，近于苛求，说在大众不了解文字以前，而取消了大众对文学的享受，仍然

将文学被知识阶级独占起来是错误的，应该加以反驳的。我们可以写大众听得懂的文学习，读给大众听，那么我将不说一句话，让他去写让他去读吧！我永不会理解，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不识字的人民面前，怎样去读，在这全国言语庞杂到极点的现象下，怎样去写大众听得懂的文学习。

所以问题的焦点，并不在大众语的采用与否，也不在听懂听不懂，而是在中国方块字的本身上。如果不把这方块字在大众面前否定了，大众语根本就没有建立的可能；大众文学习，当然更谈不到了。中国文化在过去数千年所以成为独占的，非社会的，便是这方块字被特殊阶级独占了，他们有很闲余的时间，在这工具身上推敲，而一般人民，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民，当然没有费十数年工夫，去学习这劳什子了。

现在既然要建立大众文学习，首先就得创造大众语文，那么中国文的拉丁化，实是必要的。不过在拉丁化未曾普及以前，方块字仍可以做注释的工具。

呜呼，李长之教授！*

近来中国文坛上，有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便是“伟大的作品何以不能产生”这问题。固然这是个事实问题，不是讨论便可以产生出来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了这问题提出的价值而搁笔不语。须知道从这问题里我们可以晓得中国文坛近年来所遭的命运，作家所得到的报赏，以及新兴作家之所以不敢问津文坛的原因，由此而理解了，中国客观环境是个什么面目，中国文坛应向什么方面发展。中国作家想要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必然的得把现在的生活改变一下，从实生活中创造自己，创造作品。

但我们的大批评家李长之教授，却高喊着自傲的夸大之声，说这是不成问题的，接着这句话，唯恐别人不懂似的，卖弄的注解道：“所谓不成为问题者，就是瞧不起的意思，觉得讨论不值得。”看李教授这股子神气，像这些小问题，当然放在眼中。李教授所值得论的问题，是“建设文艺的美学。”（见《文学评论》创刊号）

李教授对伟大作品何以不能产生的原因，很聪明的说道：“事情很简单，只因为作家根本渺小。”接着又说：“什么生活压迫，什么文化统治，什么言论不能自由，这是饰词，这是遮羞。倘使生活不压迫，文化不统制，言论亦自由，伟大的作品

* 本篇用笔名“何化鲁”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山西某报。

就能出之渺小的人物么？”并举了高尔基作例，说他“受苦不算少的，但却依然有伟大的作品，何以呢？人伟大故。”

看我们伟大而不渺小的教授，怎样向云中飞。他简直不理解一个伟大作家，所需要的社会因素，所需要的充实生活。如果把一个作家从地面提到天上，而说什么伟大与渺小，那真不敢恭维我们的教授不傻，是聪明。高尔基的所以伟大，正因为他受的苦太多了，他是从实际生活中生长出来的一个人，所以他的作品能够伟大；也就是说从社会的冶炉中锻炼成他的伟大，我们却不能如李教授所说，因为他人伟大，所以虽然受了许多苦，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这种根本抹煞了构成伟大人物的条件与过程的主张，让我们的教授去自傲的吹牛吧！

我始终不承认，一个伟大人物，是从天空掉下来的，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所以不能产生伟大作品，是因为我们的作家，缺乏真实的生活，今后如果希望有伟大作品产生必得把生活打在另一个圈子里（这只是希望伟大作品，能出之现在一般作家之手的话）。而李教授只知道高尔基伟大，他的作品伟大。我不知道李教授也知道高尔基生活的历程不？如果知道的话，试看看我们中国的作家，有哪一个有他那样充实的生活。我们只能说中国的作家，缺乏高尔基般的生活，我们却不能说中国作家天生的就是渺小。伟大不能创造，渺小是天生的，那只有我们伟大的教授才会相信。如果李教授是对的，还有何说，中国现存的作家只有快快死去，把这文坛的贤路让开，待伟大的人物从天空掉下之后，再来谈什么伟大作品，现在提起来，却是废话，是不成问题。

呜呼！李长之教授，真不愧当代的批评家，象这样伟大的

人物，中国文坛前途，也真够危险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号）

给青年作家*

近年来的中国文坛，虽然遭了很大的挫折，然而新近的作家，无论作品的好坏，却也雨后春笋般的层出不穷，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青年作家的勇于写作，是文坛上的一个好现象，但另一方面却又不能说这般作家不是太把写作看得很容易而近于流产的一途。

论理，有好些作品，是没有发表的价值，无论在意识与手法方面，都显得很幼稚。然而事实的表现上，都有好些作品，是出于这般青年作家之手。这种事件的原因，我们若仔细分析，可有以下几点：

1、中国文坛文学创作的水平太低，故这些作品有刊出的机会。

2、一般存有野心的或有政治背景的编辑先生，以提拔新进作家为手段，而造自己的势力。

3、文坛也如政治舞台的各派分立，为拉拢青年，至不择作品优劣。

4、一般青年因苦于经济或多感伤，以文学作品为谋生工具与发泄愤恨之手段。

这四种原因，都不是作家们应有的观点，也不是文坛应有的现象。我们稍留心点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屠格涅夫、托尔斯

* 本篇用笔名“何化鲁”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日山西某报。

泰的作品，是经过数十年或一年改稿数次，甚至数十次，才拿出发表的，从此我们也就可以晓得中国近年来无一伟大作品，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原因，所以我以为中国的青年作家，应对写作这件事，看得慎重点。

本来作家这顶荣冠，不是轻易可以戴得起的，但现在我们这些作家，不论阿猫阿狗，有一篇无聊的作品发表出，便自命为作家，而别人也以作家目之。呜呼！作家何容易乃尔，不禁为中国文坛一哭。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秧歌剧本评选小结*

赵树理 靳典谟

本厅为推动农村戏剧运动更大的开展，今年春初，特征集太行各地秧歌剧本，聘请专人进行评选，除选出之优秀作品尽量付印并发布奖金外，现在把评选当中大家研究的意见，由赵树理、靳典谟同志执笔整理成此文发表。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第一厅编审委员会

这次剧本评选，是为着发扬群众的创造性，总结过去，交流经验，作为今后更广泛的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的一个起点。评选的收获是很大的，在数量上说，共收到大小册子二百一十七册，包括二百七十五题；从内容上看来，与实际结合是一个共同的优点，其中又分为反映战争的二十三题，生产四十七题，拥军、优抗、参军六十三题，文武学习、民主、减租、渡荒、打蝗、提倡卫生、反对迷信的有七十六题，介绍时事，传达任务是三十九题，而歌颂自己所爱戴的英雄人物竟多至二十五题；再从形式上看，戏剧、秧歌有一百三十九个，小调有七十一个，歌舞活报十三个，快板四十二个，鼓词八个，又包括了广场剧故事等，推陈出新，花样繁多。特别是大胆改造旧形式，是取得很大的成就，以地区而论，也相当广阔，除新开辟的

* 本篇原载《课本与剧作》，一九四五年七月出版。

七、八专区外，四面八方都有作品寄来，这种创作热情，也为以前所少见。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这中间并无什么名作家或戏剧家，而都是群众的创造，可见历来工农群众是蕴藏着无限的智慧，由于长期受封建黑暗统治的蒙蔽，使得聪明才干不得发挥，正如农民自己的诗：“屋漏锅破肚皮饥，债主逼债两泪啼，冬寒无衣又无被，哪有心思想别的”。一旦这黑暗统治被推翻，如拨云雾见青天，群众的惊人智慧，便被历史所发现。现在群众说：“天上有北斗星，地下有毛泽东，他是指路的明灯，使咱由黑暗里看到光明”。正因为是如此，所以人民走上了自己的时代，为讴歌自己时代，而充分发挥着创作天才，现在正是这样一个开始。

从这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四四年太行区人民在减租、大生产运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同时也就用自己的戏剧创作歌唱自己的生活斗争，各村内成立有编辑部或编辑股来进行编剧，扮演本村事来教育本村人也就自然成为戏剧的方针。然而无论是编制脚本或演出，不仅不是限在少数人身上，而且吸引参加的人非常广泛，甚至整个村的群众都动起来，这一娱乐活动，规模盛大自不待言，如临城西岭闹“大玩意”，全村无论男女老幼，无一人不参加进来，每人都自由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场面如减租、生产、打蝗、救灾等来扮演自己所擅长的角色，唱词自编，想如何就如何表演，一时闹得热火朝天，远近都为惊异。不仅是这一村如此，武乡广寒互助组在担煤时大家商量要闹“红火”，回来又在冬学发起讨论，不仅取得大家同意，而且好多人说早就有这个意见，只是未得提出来，这都反映群众对文化娱乐的热烈情绪。大人如此，儿童更为起劲，平东测鱼儿童悄悄在一个破房子里闹起“红火”，自

编自演，以铜盆木板代乐器，拾大麻子换油来点，拾煤渣当炭烧，不怕困难而且想法克服困难来搞。还有武安列江村年关娱乐没有鼓，村人张福培、杨连科用种种方法把牛皮张在旧鼓腔上，制成大小鼓各一。这虽不是文字创作，也都表现群众要求娱乐的热心来。

以上例子都说明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极力要求表现这样一个欢乐的时代，这只有在我们解放区才能有的！现在群众的要求和群众自己的创造热情，使今后开展更大规模的戏剧运动，比从前更具备着充分的条件，这就需要领导上更好的发挥群众戏剧的创作天才，特别要结合生产在现有的戏剧水平上提高一步，使今后剧运益加热烈有力，成为群众各种斗争生活中最活跃的因素。

下面是根据评选结果，提出戏剧运动上的几个问题来作研讨：

一、戏剧要为群众服务

这次征集的作品中，好的是很多的。好坏是拿什么标准来说呢？就是看能否为群众服务，能否以艺术手法取得服务于群众的效果。如平顺南沟的作者王文，利用小放牛形式，改造其陈腐的情调，放进了减租内容，而且处理得很自然。武乡教员史华甫，用小学课本的形式，把学习模范李心月的模范事迹很生动的写出来，既是群众语汇，又编排得很合音韵，可以作民校一种补充教材，也可以当快板，使人感到非常新鲜适用。赞皇裕记合作社用戏剧宣传种棉，把种棉的好处和敌人作经济斗争结合起来，通过艺术的形象传达给群众，所得的效果，较任何说

服力量都大（以上作品已托新华书店印出）。以这些作品为例子来看，它之所以称为好，不正是因为它体现群众的利益如减租、种棉，以及用群众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如李心月的学习鼓励群众前进，以达到它更好的生活吗？然而这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选择的主题是对的，但不会用艺术的手段去处理它，也是不能取得服务于群众的效果，而以上作品的例子，就不仅在于内容好，而表现这内容的艺术性也是好的。这里所谓艺术性，也并不是一个超然不可捉摸的东西，既是服务于群众的意念坚定了，艺术上的努力如何，也是求之于群众，群众所喜爱的东西，也就是艺术上所应致力的东西，面向群众来研究，也就自能提高艺术的效用，以上三作品不也正是这样一个产物吗？

相反如《迷海沉冤》这种剧本，作者原意是为破除迷信，因为服务于群众的意念不明确，因此取材不当，多半用些主观想象，在剧中说明根据地会门、道门被敌人利用作特务机关，而上当的道徒被威胁作危害人民的事情，他儿子被派到武安受特务训练，儿媳又被特务强奸致死，弄得家破人亡，结局凄惨。这样夸大了特务的厉害，看不到群众的力量，不仅不能反映抗日民主根据地群众胜利愉快的斗争生活，看来反觉得这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和敌人盘踞的地区的事实，根据地是人民的天下，哪里容得特务如此猖獗！？即以《迷海沉冤》的剧名而论，就不是根据地的东西，任何反动者加之于人民的灾难苦痛，在根据地里都能获得解除，什么人“沉冤”了呢？而剧的结尾，特务被捕，又插上个政府宽大政策的尾巴，不伦不类，使人更加迷惑不清。由于这种不合现实的写法，所以在群众当中证明它是含有毒素的。

从以上两种显明例子看来，我们今后剧作的首要问题，不是戏剧要演给群众看，看了要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吗？这样一个问题，在评选出优秀作品说来，相当给予大家今后努力的一个具体范例。虽然这些作品还不够完美，甚至某些方面还很差，然而我们是应该循着这个方向前进，而决不应该只限定在现在这样一个剧作水平上的。

二、新旧剧的形式和内容

把首要的问题弄明确了，接着便应该是演些什么，如何演——采用什么形式的问题了。

过去用本村事教育本村人，是取得很大的效果，前面列举的事实，就证明这点，再从下列事实看来，更加明显。邢西崇水峪剧团起先演出一些与群众现实生活关联很少的剧，遭到群众厌弃，经过批评提意见，剧团转变了，把本村一件继母虐待前子的事实编出剧，这剧虽然在取材上还不能说怎样好，特别是批评群众中某些落后现象，尤其注意不要过分刺激人，然而扮演得是真实的，是群众生活中的典型事件，群众就感到亲切有味，出演之后，马上得到好的反响，而这个妇女也经过教育转变了，转变好了之后，又编出新剧表演她的转变，更加鼓励这妇女进步，也教育了别人，取得群众的欢迎。这例子也说明群众需要戏剧来表现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是表扬进步呢？还是批判落后呢？显然的主要是发扬积极的一面，崇水峪剧团后编的剧，是更富于教育意义也就在于此。

表现群众现实生活，是应该选择哪些典型呢？在这次评选当中，三分区的作品反映工作面宽广而且深刻，现实性很强，

因为它是贯彻了减租，又经过生产运动，所以反映工作面宽广，也是有他的群众基础，各地区工作发展不同，如没有那样一个基础，机械的学它，必然流于形式，但它深入实际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首先在与生产结合上，如榆社大生产运动中，富人有的牲口没有人工，而认为只有贫人才要求互助，这思想阻碍互助组的发展，榆社的新生剧团便针对这种情形，演出《郝二蛮》，把互助起来都有利具体的表演出来，给大家以深刻印象；武乡广寒剧团以李马保生产快板，推动广寒全村加紧生产，除积下半年烧的煤，在今年二月底，就把粪掺完了；在襄垣，当群众还不知道怎样订生产计划，就盼望剧团能演出剧来好学，一到《李来成家庭》演出，普遍学会订安家计划，而且家庭不和的看过戏之后也都变得和睦了，建立模范家庭运动广泛的开展着。

其次配合中心工作。如武乡广寒村驻着八路军，在拥军运动的时候，军队开走了，留下几个病号，妇女们尽心竭力的关照，当中有个王一美一夜起来几次伺候病人，还有王改英、徐三花都是模范，剧团把这种事编成剧，演出之后，不但对拥军工作有了推动，而且有五个青年受了感动，参加八路军，对当时的参军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开展冬学运动的时候，武西西蛟沟群众有把上冬学看成一种负担的，一义务教员李成堂就编了一个上冬学的秧歌剧，演出后，群众对冬学的认识转变，上学的人增多了。

三专区工作发展的基础不同，所以戏剧反映面也就不同，而在边沿区，戏剧则多着重于对敌斗争，这又表现一种地域的特点。昔东赵壁剧团编出反抽丁、反清乡两剧，具体告诉群众如何采取办法对付敌人，如何武装起来对敌斗争，这样启发了

群众，结果这村的维持会被群众自动起来打垮了。

由以上例子看来，关于戏剧应该演出什么，似乎有个明确的答案了。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就是在农村，农业生产是群众生活的主要内容，群众翻身起来，要改善生活，首先靠生产；而增加抗日财富，准备反攻，以及加强革命力量也是靠生产。生产在今天，是更有特殊意义，如说戏剧服务于群众，首先就要服务于生产，这不仅戏剧内容应该表演生产上问题，符合生产运动的要求，推动生产运动的前进，而且戏剧运动本身的开展，也需要结合生产。一是适应生产季节来开展工作，演戏不旷废农时；一是戏剧经费要靠生产解决。如武乡广寒群众集体割马兰草、拾荒麻，积作经费，来搞娱乐活动。襄垣剧团自己建立生产部，做挂面、熬盐、开油房，并吸收私人入股，四个月浮赚七万元；在农业生产上，种了三十亩地，演剧时去演戏，农忙时回来生产，一切费用不依靠政府，每个团员生活上困难问题都在生产中获得解决。团员都把剧团看成是自己的家。这些都是结合生产很好的例子。今后开展戏剧运动，结合生产更应该是共同努力的方向。

再接着一个问题就是采用新戏呢？还是旧戏呢？运用什么形式最好呢？由于工作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交流经验不够，在先进地区经验有新的发挥；但在某些地区对于已经批判过了的东西，还沿用未改，在评选当中也很明显是看出这些地区的作品还是存在着脱离实际的倾向的。关于运用旧形式问题，主要是改造它，使之适合于新的内容，适合群众要求，如在旧的表演中，象道白是：“好不伤惨人也”，群众称之为“字儿话”，不感兴趣，有些唱词很多，也嫌呆板听不懂，好多剧团就听取这种反映，把道白改为群众语言，而这种新式道白，又在剧中占

相当比重，以免光唱听不懂，这样一改，演出后，群众感到很好，很新鲜，于是从这等方面更加研究改进，这与结合新内容、发挥旧剧音乐节奏的优点，已经成为今天运用戏剧形式一个努力方向。在今天决不能仍是“旧瓶装新酒”使内容受到限制，当然更不能完全是旧戏了，而某些地区还是以现代人物穿上古戏服装，新的问题仍是旧的表演手法，不伦不类，群众看着很不起劲。甚至单纯迁就旧的，有的还演出些才子佳人，淫词滥调，投合一部分人的低级趣味，为封建阶级散布毒素。如武北阳邑年关娱乐所演出的就是这一类东西。而有些同志，则竟以为群众就喜欢旧戏，存着单纯闹娱乐的观点，甚至某一机关有些同志自己就爱看旧戏，召剧团来演《四郎探母》，引起群众不满。那些偏爱旧剧，强要说群众也喜欢旧剧以为自己癖好作掩护，但实际是如何呢？黎北剧团在西井演出《钉缸》，群众嘟囔着：“非同剧团提意见不行，要求你们演新的没有啦，演《钉缸》就有啦”。以后演出《王同会》，群众说：“这才是咱们的事”。潞城南窑凹剧团，因为新戏不多，为了凑时间，演了一个古戏《双头驴》，群众都走了，弄得大家怪难为情。一专区年关演剧大竞赛时，有个剧团演的戏是新人物穿古戏衣，群众说：“不对头”。内邱白鹿角剧团演出《改组统帅部》，现代服装，新的表演，群众说：“这还不错”。另外还有左权剧团在原庄演出《土岭背》，是歌颂群众所爱戴的劳动英雄怎样组织生产。剧团路过栗城，群众要求演《土岭背》，剧团忙着要走，群众说：“你们给原庄演，就不能给我们开脑筋？！”坚持要留下演这个剧。从以上这些事实当中，不也可以看出群众的喜好究竟是什么吗？当然这里所谓新剧，不一定是话剧，更不是城市里搬来或欧化的所谓新剧，主要是根据群众见解，凡以

新的内容所确定的表演形式，包括改造了的旧形式，统谓之新剧，这正如前面事实所反映，这种剧是为群众所十分欢迎的。

三、发动戏剧创作是开展剧运的关键

我们进行剧本评选，就是期望大大发动戏剧创作运动。戏剧创作应该从何着手，谁去着手来搞呢？这个问题，从前面列举的事实可以得到确定的回答。这里特别要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戏剧创作，不是少数剧作者的事，而是广大的群众活动，因为戏剧要表演群众的生活，只有启蒙群众的创造性，发动群众参加到剧作中来，才能更深刻更正确的表现了群众。广寒村要编他村三个模范妇女拥军的事，就在冬学内发动大家讨论编写，本人也参加修正，编成剧本，再读与群众听，群众说：“这样听不出好坏来，演一演看。”演出之后，群众很敏锐的看出不对的地方，提出意见修改，再次预演才为群众通过，因此这个剧演出的效果很大。武西西蛟沟演出了本村送郎参军的故事，就由本人提出意见，补充材料，甚至这妇女要求自己上演，结果使这个剧真实动人，许多妇女都受到感动。象这样例子各处存在是很多的，就拿评选中优秀作品来看，有许多也都是群众的集体创作。如已出版的《互助好》剧本，就是平顺枣蛟马纪则六人创作，《懒汉转变》剧本，是平东测鱼村群众的创作，《韩金孩翻身》剧本，是襄垣义街村群众的创作，以及《新家庭》剧本，为武乡五高师生集体创作。这些是不胜列举，今后这方面还应该大大发扬。

在剧作运动当中，除了发扬群众的创作天才，还有一个重

要问题，就是各地文教工作者、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合，集体来创作，真正能在剧作运动中起着骨干作用。六专区有一个同志创作热情是好的，所写的作品也很多，但因为不是群众路线，不是与工农群众结合，而是自己关着门编写剧本，结果接受不了新东西，使自己作品不能脱离过去的窠臼，赋予以新的生命，变成一个空头的多产作家，这个教训，是值得一切从事农村剧作的同志警惕！这里也并不是说个人绝对不能作剧作活动，主要是个群众观点与从实际出发的问题，这问题的解决，也只有到群众中去，在群众的创作运动中，帮助群众，才能充实自己。

总之，这次剧本评选，提供我们认识的问题是很多的，遗憾的是各地剧作搜集还不太普遍，就从已交来数量上看，以武乡、榆社、邢西、武安、和东、昔东较多，但就今年元宵节秧歌竞赛来看，每县平均不下百种以上，而且许多比交来的还好，可惜不曾写出来。这里提出一点希望，就是各地工作同志，特别是文教工作者，今后要注意群众创作，帮助记录下来，勿使湮没无闻，埋没了一个优秀作品，那便是戏剧运动上的损失。

我们绝不这次评选已有的成绩而满足，相反，这仅仅是努力的开始，展开在前面的道路还很远呢。太行区有四千个村，而现在只有一千个农村剧团和秧歌队，今后向着每个村有秧歌队或农村剧团，普遍作到自己编自己演这个目标前进！

赵树理谈土改后的故乡*

作家赵树理日前曾向人民日报记者谈他的土改以后的故乡，他说：“土地改革以后，我的故乡再不是从前我所熟悉的那个穷相了”。赵树理是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人，他在一九四六年夏天和去年春天曾两次回到尉迟村。他说：一九四六年夏天，因为是到别的地方去，路过故乡，没有顾上多停，所得的印象不多。其中有一件最动人的事是互助打麦子。那一年麦子特别丰收，打麦场不够用——要按平时打法，要一个多月工夫才能打完。他们发明了一个互助法子，不几天就打完了。这法子是一个组（五六个人、一犍牲畜）同时用两个场子，每个场子一上午打两场（平常同样多的人只能打一场）。在工作的时候，牵牲口的拉着牲口碾了这边碾那边，拿杈子的挑了这边挑那边，拿扫帚的扫了这边扫那边……。木杈、木楸、扫帚……满场飞，远处看见好像演武戏。连平常时候四平八稳走路的老汉们，也跟着青年人嘻嘻哈哈跳来跳去。这种现象是土地改革以前不曾有过的。

去年春天那一次回家是阴历正月，大家都闲，我就挨户拜访了一遍。访问后，我觉得好像已经不是我的故乡。这个村子很小，只有五十二户，从前我最熟悉，那几个人住在哪所房子里我

* 本篇曾经发表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浙江日报》和同时期其他各报。

都知道。从前连我自己在内，一村有半村都欠外债，打下粮食来够吃不够吃总得先卖一部分还债，因此有好多户到了春天就得借粮。日子过得不称意了就讲不起排场，炕上的席子破了买不起新的，反拆着破席点火吸烟，越拆越小、越毛，怕人看着不好看，把窗子堵得黑一点，因此有好多人家，当你初进到房子里总看不见人。这一次我到房子里去的时候，竟没一座是黑的了，不只是有了新席子，席子上又铺了羊毛毯，被子褥子虽是粗布的，却都很新。问起来家家还有点小积蓄——落花生、芝麻、烟叶子。当时因为城乡关系还没弄好，他们积蓄的东西卖不出去，不过他们都毫不着急，有的能把烟叶子存到二三年。村子里合作社有油房，把芝麻打成油放到家里，价钱不合适就留着自己吃。

最近村里来信，说村子里去年一年买了七头骡子，还有三家修房子的。我想，他们一定是把存的那些花生、芝麻、烟叶子都卖了。总之，土地改革以后我的故乡，再不是我从前非常熟悉的那个穷相了：人也变年青了，黑房子也变亮了，打下粮食不用先卖了，该卖的卖不出去也不着急了，卖出了东西也懂得应该把钱用到什么地方了。

（新华社）

赵树理谈“赶任务”·

北京漫記

赵树理说他自己过去也没有好好地在思想上完全搞通这个问题，直到不久之前才认识清楚。

每当一个事件或运动来了之后会有新的任务摆在作家们的面前，就是平常所说的要“赶任务”，于是许多作家在这个问题上闹不通，放下原来的工作，原来的著述，去赶任务，总觉得是妨碍了自己的工作。以这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来说，即使带着应差拉夫的心情去“赶”了，有些人还会想：自己既非国际问题专家，亦非原子问题专家，放下了原来有准备的工作而去赶原来没有准备的任務，心里不舒服。

“赶临时任务”这一个名词本身已经不妥当。抗日战争在当时是一个长期任务，但每时期仍有每时期不同的任务，例如，救灾、支前、增产等等，把这些任务看成临时而去“赶”是不太妥当的，因这与大任务并不脱离，并不那么“临时”。如果本身生活与政治不脱离，就不会说临时任务妨碍了创作，因为人民长远的利益以及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只是带着应差拉夫的心情去“赶”，而是把它当作中心任务去干，很严肃的，郑重其事的，看作长期性的任务去完成。情绪与工作统一起来，不是随随便便的应付。

• 本篇曾经发表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文汇报》副刊。

认为“临时任务”一来，妨碍创作，原来大作就永远不能完成了，这种错误观点的产生基本上就是因为生活与政治不能密切配合，政治水平还不够高。所以当上级已将任务总结指出之后，应该是感激才对，因为自己不能认识到是中心任务，而别人已替自己指出来。如果认识不足，仍然认为是赶临时任务，那么这是应该放下手头的创作去赶，赶总比不赶好，只要没有大错误，赶得多总比赶得少好，写得好比写得坏的更好。有人认为自己不是军事专家，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临时任务根本不能赶好，也不见得，看作临时任务也可以写好的，只看怎样写。写出来不好还不是最大的失败，写总比不写好。

赵树理举出了自己过去写作的例子，有些创作在写的时候就与当时任务统一，有的是写完之后与任务碰上了头，有的则是“赶任务”赶出来的，例如《李家庄的变迁》是经上级号召揭发阎锡山统治下的黑暗之后才写出来，材料早已有，但当时没有认识到揭发的必要，直至任务提出后才写。

至于今后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怎样写作，赵树理说，首先要研究当时群众的思想情况，加以分析之后，针对着怎样纠正错误的思想来写。以北京目前来说，光是“渔夫恨”一类的鼓词已不够，不能停止在这一步，需要更深入，例如关于世界两大阵营，美帝在联合国的表决机器，中朝的史地关系，共同抗日的历史，李承晚匪帮，中美关系，美帝怎样援蒋反人民等等都是广大群众所知道的东西。

（黎 南）

与长治市青年文艺爱好者谈创作*

长治市《群众文化》编委会请赵树理同志与全市青年文艺爱好者进行了一次创作座谈会。

作家赵树理同志就当前有关文艺活动和创作方面的问题以及青年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进行了漫谈。在谈到俱乐部的文娱活动时他说：“俱乐部的文娱活动必须搞得活跃，必须提供群众的文化享受。它的宣传要使群众感到舒服，不能要求得太快太高，而要感染群众，又必须通过作品的艺术性才行。”赵树理同志在谈到继承和发扬我国艺术遗产时说：“……我们要向传统学习，因为传统性的东西观众最多。”他告诉青年文艺爱好者说：“不能责备古人，没有把社会主义思想加进传统艺术中去，因为历史是发展的。”赵树理同志在谈到创作方面，他要求青年们先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端正创作态度，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于发表。他说：“业余文艺爱好者，必须是在业余课余进行创作，创作时要多读多练。”他告诉青年：“创作产生在群众中，作家也产生在群众中。只要你是真正的文艺爱好者，深入群众生活，提高技巧，就会写出好的作品来。”提到对创作生活的理解方面，他说：“……我们生活在人民大众中，工厂、农业社、机关、学校都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这些环境中都有可歌可泣的事实，只要我们懂得爱憎，合乎于社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山西日报》。

会主义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去写。”

他最后告诉大家说：“写作不能凭空想，写作一定要有生活”。

（《山西日报》张文君）

赵树理同志谈《花好月圆》*

三里湾 三里湾
对着水 靠着山
青枝绿叶上下滩
自从有了农业社
又治水 又治山
人定胜过天

这是赵树理同志为电影剧本《花好月圆》创作的主题歌中的一段。这个剧本是根据他的小说《三里湾》改编的。

当赵树理同志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口气读完了这个剧本以后，他立刻创作了这首富有民歌风味的歌词，他事后告诉记者说：

“有时候写一篇短文章，两三天也不一定写得出来，但这首歌词只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写出来了。”

为了征求对这个剧本的意见，我们要求赵树理同志能抽空对记者谈一谈，并对电影文学创作方面也发表些意见。他热情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赵树理同志的新居布置得简朴而雅致，房间里除掉一张供

* 这一篇是《中国电影》记者何坪采访的，发表在《中国电影》一九五七年六月号。

写作用的桌子以外，还有几只接待客人用的沙发，在敞开的玻璃窗的窗台上，摆着一盆盛开的红艳艳的海棠花。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赵树理同志特为我们沏了茶、递了烟，然后就谈到剧本《花好月圆》的改编。

“这是一个好剧本，”赵树理同志充满了喜悦的神情说道，“虽然我只仓促地看了一遍，但给我的印象是好的：它使‘爱情’一部分戏比较完整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写出来了，而且性格也很鲜明。譬如糊涂涂吧！这一类人，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他总在打他的‘小算盘’，即使到了高级社，他还是有他的‘办法’的；再如范登高，就是翻身翻得太高了，人的经济地位大变，思想意识也就跟着起了变化，他嘴里讲的是社会主义，而暗地里却做资本主义小买卖。这些人物的特性在剧本里都表现出来了”。

“可是……”记者插了话，“有些人看了剧本以后，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三里湾》是描写农村现实生活中新旧思想斗争的作品，而现在剧本的主题中心，仅仅是写了三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看不到农村中主要生活面貌了。我们觉得通过青年人的爱情生活和斗争，同样可以看到现实农村的面貌，您觉得怎么样？”

赵树理同志笑了，他把摆在窗台上的那盆海棠花轻轻地端过来，放在沙发前面的玻璃茶几上说：“海棠花总是海棠花，放在窗台上或者茶几上有什么不同呢？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剧本都写出来了；剧本也很明确地表明它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一个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是它的人物感人，不是让它像合作手册一样去指导办社。读者看了剧本，还是反对糊涂涂、赞成王玉生，还是愿当王玉生、不愿当糊涂涂的，这个我

看是转移不了的。

“我这个小说的架子原来也就是这样的：这边是金生、玉生、满喜、灵芝、玉梅……一伙；那边是糨涂涂、翻得高、常有理、能不够等，是个不成阵容的组织。这两组人对待生活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都处在同一个环境里，就产生了矛盾。有个地方杂志上批评这篇小说，说光写人民内部矛盾。不写敌我矛盾。我想也许我以后会专门写一个有地主的小说，不过在《三里湾》这本书里，我就不准备考虑了。”

赵树理同志亲切地笑起来，他那意味深长的比喻，使我们的眼光转到这盆海棠花上。赵树理同志呷了一口茶，接着谈起他最初创作小说时的情况来。

“在创作的初期，我把小说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夜，第二部分是一天，第三部分是一月，第四部分是一冬。满喜和小俊结婚的事儿是放在第四部分里的。原来的第四部分准备从开渠开始，在开渠中，一阵风王满喜不但自己积极参加了劳动，而且还动员了妇女去开渠，他动员的办法很多，也很有趣。在开渠中他不幸受了伤，大家就派小俊去照顾他，于是两个人渐渐产生了爱情。其他两对婚姻，虽然早已伏下因素，但也准备到第四部分完成——即写过开渠之后——再写到玉生和灵芝去城里受训，玉生参加技术训练班，灵芝参加会计训练班，他们在学习期间互相帮助，渐渐产生了感情。他们走了以后，村里剩下了有翼和玉梅，有翼思前想后，觉得再追灵芝，恐怕没指望了，就去追玉梅，玉梅原来也一直爱着有翼，而且觉得有翼也有转变了，所以仍然爱他。何科长在小说开始时，到三里湾来过，后来到过阳历年的时候，到村里来看已经完工的水渠，并且参加了几对青年的结婚典礼。这就是原来考虑的

第四部分的内容。后来在写的时候，临时改变了主意，把第四部分删掉了，某些情节合并到第三部分里去了。因为我写东西的时候，常常有个替读者考虑的习惯。为农村读者打算，应该使他们花的钱少（书的成本低），花的时间少，而得到的效果大，所以我常把篇幅压缩到最少限度。现在看起来，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他停了停，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当然，如果让我自己来改编这个小说，我很可能把那第四部分戏加上去，并且还按照小说原来故事发展的线索去改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路子，过去不是有王实甫的‘西厢记’和董解元的‘西厢记’吗！两种西厢的本子各有千秋，都很好。我想：不能强调改编的剧本和原小说一样，应该图好，不该图相同。”

但是，记者还是要求赵树理同志对剧本提些意见，赵树理同志稍稍停顿了一下，一边回忆起那个剧本，一边说道：

“只是匆忙地看了一遍，而且过了好多天了，如果要提些意见的话，是不是可以从农民欣赏文艺作品的角度来考虑？譬如剧本中的序幕吧！农民观众就不一定能看懂，当他们看了序幕以后，银幕上突然出现了片名，演职员表，以为是换了一个戏了。”赵树理同志模仿着农民在看电影时的姿态说：“噢！那个片子怎么断了？放映队同志！是不是放错了！”他笑了笑，吸了一口烟：“农民看影片，欢喜从头一直看下去。”

“剧本里摔掉了陈菊英这个人物。原来我写陈菊英是为了写糊涂涂、常有理，写他们怎样虐待自己的小辈，同时也借她来写惹不起这个人物。小说中一阵风与陈菊英打扫东屋的时候，不是有惹不起在地下打滚的一场戏吗？那场戏叫‘惹不起遇一阵风。’陈菊英是三伙家，她不但受糊涂涂、常有理的虐待，还受了大伙家惹不起的许多冤枉气，没这些戏，惹不起就

变成惹得起了。当然，我这是借场面做戏，用处本来就不太大，拍电影的时候是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戏删掉。另外，我写小说总想使农民喜欢读，所以我避免静止地介绍人物和风景，按照过去写小说的习惯，叫做‘带路人’，譬如《红楼梦》里，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林黛玉进荣国府，刘姥姥游大观园等章回。让读者跟随着人物的行动去熟悉环境。古典小说总用这种办法，把环境、人物和故事情节结合起来。《三里湾》开头介绍旗杆院是比较静止的，但是，何科长游三里湾就不是静止的了。电影也可以用我这个办法，也可以不用，而另找一个引人入胜的办法。另外，我觉得有些人物写出来了，有些人物出不来就当个配角算了。不过有一个‘镜头’，我没看清楚，好象是小俊穿起从范登高那里买来的红绒衣给玉生看，这个‘镜头’在画面上很突出，这时候玉生正在专心一意地制作洗场碾的模型，一个人的心只能专注一件事，突出了小俊的穿绒衣的动作，把观众的注意力牵到小俊身上去了，是不是会不了解玉生这时的心情。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剧本，尽管它跟原小说不一样”。

赵树理同志这段谈话，立刻使我们联想起许多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来。我们的有些影片，从表面上看，好象挺忠实于原著似的，有的甚至按原著的结构，依样画葫芦地抄了下来，有的“压缩”了一下，有的“丰富”了一下，分一分场次，编一编镜头号码，就算“改编”了，其实这种缺乏创造性的改编，恰恰是违背原著的。赵树理同志虽然没看过那些剧本，但他的的话恰好对这些“改编本”作了精辟而中肯的评论。

这时候，突然从门缝外钻进一只小鸡来，它那没长齐全的纤细的羽毛，被从窗外吹来的初夏的暖风轻轻吹拂着，这个象

一团黄绒球似的小客人，在屋子里走了一圈，又摇摆着它那不稳健的步伐出去了。

“您喜欢养小鸡？”记者满有兴趣地问。

赵树理同志轻声笑起来道：“在农村里养鸡养惯了，也不嫌它讨厌了。”

谈话从剧本转移到对当前的农村影片的看法上来，赵树理同志说道：

“农民是喜欢看电影的，不过他们希望看得懂、看得下去。我不大赞成‘农村片’这种说法，因为不一定要写农民自己的事儿的作品才能给农民看，比如：《万水千山》、《智取华山》等影片，农民都可以看。当然可以有选择，如《偷自行车的人》、《腐蚀》等，让农民看也不一定适合，因为农民不一定完全理解那种生活，但是象那个《反围盘》不但农民看不懂，就是拿到纺纱厂去也不一定行。农民喜欢看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品就不是那样写的，比如有的只写一个社员向社要钱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有的为了写‘三大节约’就编了一个故事，……故事一开头，农民就猜着它的结尾了，所以看起来就没劲。这些作品很容易看出是为了达到某种教育目的、宣传某种思想而写的，或者有人就把它叫做‘教育片’。其实广义的说，艺术作品都是教育人的，每部影片都可以说是‘教育片’，但是艺术作品是能陶冶人的性情的，人们看了文艺作品，喜欢或者讨厌了那些人物，在自己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上起了一些变化，就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性情（当然，也不是一部艺术作品就可以达到这个自的的，往往是很多作品加起来的）。过去我们在太行山打游击闹革命，那些来参加革命部队的人，虽然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但他们的英雄气

概，除了是对地主阶级压迫的反抗以外，恐怕也有从文艺作品中逐渐感染得来的吧！记得我小时候常常赶着毛驴去驮炭，手里拿着一根小鞭子，唱着地方戏，走啊走的，只要心里一想到白袍小将罗成，走起路来劲头也就大得多了。我想当时的八路军，也许有好多人是被张飞、罗成那些英雄们动员他们参军的。当然，我不是说那些配合当前运动、政策的文艺作品要不得，这些作品在一定时期也有一定的作用。譬如说中学生就业吧！这个主题就值得写。国家出了很多钱，办了中等、高等学校，是为了让我们年青一代的劳动人民都有文化、有知识，可是那些中学生暂时考不上大学，就骂我们；跑到城市里找工作，暂时找不上又要骂我们；这可实在奇怪了，难道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去做科学、文化工作？那么谁来理发？谁来生产粮食、制造机器？谁来织布纺纱、做饭缝衣呢？现在有的人，一上高小就想向上爬、撞了，这种哲学不但老农民有，而且连年青人也受了传染。我从前上学的时候，想过一个小说题材叫‘双生子’，想写弟兄两个，一个找个人出路——爬、撞；一个找到社会出路。不幸现在这种题材还存在……看我扯到那儿去了，还是把话题转回来吧！

“说真的，农民常常看不懂电影，‘特写’农民倒不怕，就怕接不上，二条线三条线的跳，跳来跳去把农民跳糊涂了，《花好月圆》有些地方也跳了，有的小说也跳得厉害，但是我的小说不跳，大概我是死顽固吧！老不愿意学新的东西。”

“不！即使城市观众，也不喜欢‘跳来跳去’，我们的观众欣赏文艺作品，有自己喜爱的习惯，总喜欢故事有头有尾，循序渐进的”。记者又插断了他的谈话。

赵树理同志越谈越兴奋，而且记者也舍不得离开他的书

屋，所以忍不住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您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有外号，而且非常有趣，像二诸葛、三仙姑、糊涂涂、常有理……这些人物的浑名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

“外号啊！有人说太多了。不过我想外号这个东西很好，它便于人们记忆，譬如水浒传里的人物，人人都有一个外号，黑旋风、豹子头、花和尚、及时雨、浪里白条……这些浑名很容易被读者记住。外号常常是人物性格的标志。糊涂涂当然也做过聪明的事儿，但造成他‘糊涂涂’的那段戏，的确是他全部性格的总结；常有理总是要从没理中找理儿，这个她已经习惯了，当然，有时候她也会做出一些真有理的事来的，不过那太偶然了。农民差不多都有外号，但他们不一下子都告诉你，只要你慢慢跟他们熟悉了，他们都会告诉你的，你听得多了，会觉得农民的智慧的确很丰富，取的外号挺适合这个人的性格，我不过是把这些人每人配了一顶合适的帽子罢了！但我也不主张非有外号不行，不用的时候往往比用的时候还多得多。”

影片《花好月圆》已经成立了摄制组，演员们都已集聚在长影，开始分析角色，即将开始拍摄了，演员们闻听赵树理同志已回到北京了，便纷纷给他联名写信，要求他能抽空到长影去一趟，跟他们讲讲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影片的时代背景等。赵树理同志从抽屉里找出那几封信来对记者说：“收到她们的信以后，我立刻就给她们写了回信。你大概知道，我也很想去一趟，可惜最近事儿特别多，而且人民代表大会又即将召开了，恐怕抽不出时间去。”

“能不能把你写给他们的信，跟我们说说？”记者要求道。

“我写了好几张信纸，信是写给扮演过白毛女的那位女演员田华同志并请她转给全体演员同志们的。我建议她们最好能常到附近农村去，把《三里湾》这本小说也带去，闲时给农民读一读，这样做很有好处，农民听了《三里湾》的故事，立刻会从本村里找出类似《三里湾》中的一些人来的，这样就可以去拜访这些活的一阵风、王玉生，活的糊涂涂、常有理，和他们交朋友。当然，以后有空我还是要到长春去一趟的。”

“如果您什么时候去的话，我们很想跟随您一起去，借此机会学习学习，不知您是否同意？”记者插断了他的话，又提出了新的请求。

“好啊！只是去得成去不成还无法预定！”赵树理同志还是非常热情地答应着，可惜他接着说他还有好多琐事，不能主动预定时间。

已经是日当中午了，我们只好带着“时间跑得太快”的惋惜心情，向他道了谢，走出了他的书屋，当我们走过那个小院子的时候，那两个小鸡正围着瓦盆子转来转去，叽叽喳喳的欢闹着，争相啄食哩！

（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赵树理谈语文教学^{*}

作家赵树理同志最近在太谷体验生活，当地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热烈的欢迎他，并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提出了一些有关语文教学方面的问题向他请教。下面所记述的，是赵树理同志对当前有关语文教学方面的一些意见。

有的同志提到，现在文学教学上存在着一个公式，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是讲时代背景、作者生平、思想内容和写作方法，千篇一律，不但学生听得厌烦，即是教师自己也感到有些形式主义。

赵树理同志认为要解决怎样教文学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中等学校文学教学的目地是什么。他说，过去，语言和文学不分，是有缺点的，它造成了中学生对文学理解的混乱。这表现在学生写文章非常随便，没有文体的区别也没有一定的要求，不管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来，都认为是文学。我们知道，各门学科都有它的范围和特点，文学的特点便是艺术的形象，而形象又是概括出来的，学生对这一点就闹不清。举例来说，我曾经接到一位读者来信，要求我把他的信转给《三里湾》中的王玉生，说要请他谈一谈他在工作中的经验。诸位想一想：王玉生是个艺术形象，是我塑造出来的，并非实有其人，这封信叫我怎样转呢？这就说明了还有人不明白作品中的人物是塑造出来的。

^{*} 本篇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山西教育》七月号。

因此，我认为语言和文学分了家是有好处的，首先，可以搞清楚什么叫文学，但是，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仍是密切的，不可割裂的。讲文学一定离不开汉语，讲汉语也须引证文学作品中的例句。如果没有文学，把一切文章，都写成“政治报告”，那也是不合适的。

文学作品是写给不懂文学的人们看的，正如演戏一样，是演给不会演戏的人们看的。学生在课余练习创作，也如他们在课余练习演戏一样，仅仅是个练习，不能超过这个范围。如果练习演戏而要卖票，练习创作而要投稿，势必妨碍功课。

教文学的目的和任务搞明白了，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是不是要讲作品的“时代背景”呢？我认为要讲。讲了时代背景，可以帮助学生对作品的深入了解，同时，还可以通过时代背景的介绍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但是，在讲的时候，不要立出题目来，更不要告诉学生：“我现在讲‘时代背景’了”，如果大喊大叫地讲时代背景，那便是教师自己先把教学过程公式化了，怎能叫学生听得不厌烦呢！那么怎样讲呢？我认为最好还是结合课文讲，也就是把时代背景渗透在作品中有关的语句里。例如讲杜甫的《石壕吏》一诗，诗的开头便说“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结合这两句给学生讲明唐代是实行征兵制的。但是，唐代的征兵制和我们现在的征兵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那时候，一般人民是厌恶战争不愿去为统治阶级当炮灰的，因此，统治者就必须捉人当兵。而且白日里捉不到人，必须“夜捉人”。这样讲时代背景的好处是：既把课文讲透了，又对学生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比孤零零地、干巴巴地讲时代背景好得多。

“作者介绍”是一种专门知识，对学生讲讲也可以；不讲

呢，也“无伤大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课本上的“注解”栏里对每个作者都作了简明的介绍，教师如果不另作补充，而是灵活地、适当地利用注解，也能解决问题。赵树理同志很强调对作家进行研究是一种专门学问，很简单；要想把许多作家的生卒年月、籍贯、家世和作品的种类、意义，都记在脑海里是不容易的。赵树理同志举例说：“我和周立波同志有个时期住在一间房子里，总算很熟悉的了，可是要叫我背诵他生于何年，籍列何省何县，什么学校毕业，我是说不完全的。”

作品的“思想内容”，尤其是“主题思想”，要很好地讲，但不能凭空立论，而是要通过课文的分析，由具体到抽象，结论是顺理成章地得出来的。教师如果能够把自己对于作品的体会多给学生讲一些，那最能帮助学生理解课文，这是最实际最有用的，比讲抽象的大道理好。最要注意的是：学生对抽象的东西学得多了，自然就反映在作文上，我们不能尽责备学生写得空洞，而是我们没有教好。对学生讲理论知识，一般是要放在感性知识之后，多给学生讲些具体的东西，他们在写作文时就不致空泛无味。文学理论是一种科学，是由具体的东西总结出来的，因此，在讲的时候，先要有具体的、感性的东西做基础，才能使学生容易接受和理解。

“写作方法”也要讲，但脱离不了具体的课文。每一篇课文都有它的突出的写作特点，不结合它的特点，空洞的讲写作方法是讲不好的。我们所以要讲写作方法，目的在于：使学生在写文时，能够运用多种多样的，而且又是最恰当的表现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反映客观事实。但要明确地告诉学生：任何一种写作方法，都要灵活运用，不可生搬硬套，胶柱鼓瑟。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先学好写作方法然后才动笔去写作品的。

曹雪芹不一定懂得什么叫主题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你不能不承认曹雪芹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也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当然，有了写作方法，写时更有把握写好。

如何指导学生写作？为什么学生写作老是提不高？语文老师的时间，大部分用在批改作文上，但效果却提不高。小学生作文，总是从“为人民服务”开始，中间是“为人民服务”，收尾还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什么原因？中学生也有爱搞创作的，但是每每发表了一两篇作品后，就再也写不出来了，这又是什么原故？

赵树理同志说：自从语言和文学分科后，文学的范围是搞清楚了，但必须告诉学生，学了文学不一定要搞创作，当然，课余练习是可以的，可不要把创作当成业务，把业务变成课余。也要告诉学生，在中学时代，不要打“未出学校先当作家”的主意，因为当作家要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要懂得社会。中学生所知道的社会情况太少，而且没有学会怎样去研究社会，也没有弄好社会关系，更没有到群众中去落户，就这些条件还不具备，怎么能当作家呢？有的学生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两篇作品，便认为自己已登作家之林，不搞功课了，然而也搞不好写作。因为他把所接触的所熟悉的人写完了，再没有生活了，也就没法再写下去。这是很危险的。前两年，山西某县有个高中二年级学生到北京去找我，要我给他在文艺界找工作，我问明了他的来历，才知道他在县里小报上投了个稿，得了一等奖，当了县里文化人，经常参加文化活动，不搞功课，跟不上班，便退了学。这不是搞创作害了他吗？因此，我主张在中学阶段，不要鼓励学生搞创作，练习

是可以的，但不要误功课。

指导学生写文章首先要求他们做到“文从字顺”从小学起，就要锻炼他们写得健康。记得：象我们这老一辈人，当年开始练习写文时，不论什么题目，总是从“人生于世”开始，这可叫做“人生于世派”。今天小学生作文从“为人民服务”开头，是不足为奇的，但要纠正，不要培养他们成为“新人生于世派”。不然的话，文章就很难写得健康了。

批改作文，那怕是把学生的原文都改掉了，但必须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修改，给他们加上过多的形容词之类，是不好的，我主张照话直说。文章不是改好的，而是要引导学生从一次一次的阅读中吹取养料，一步一步的提高。另外，想要学生写得好，我认为出题目也有很大的关系。我总觉得出题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能多了解学生的生活。怎样了解呢？和学生多在一起玩，多了解他们的性格；相处要自然，自然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这才有可能对他们生活作全面的了解。出题目结合他们的生活实际，他们便不会感到无话可说了。

如何阅读文艺作品？如何指导学生阅读？

赵树理同志认为：作家不是把理论一笔一笔地写出来，而是把理论变成形象的。因此，在阅读作品时，不要一开始就要求过高过深，而要顺其自然读下去，看一遍、看两遍、三遍……越看越体会得细微，才能进行分析。如果一开始就把“看出主题思想、取得写作方法”的目的放进去，结果会什么也得不到。读的时候，主要在欣赏，把自己的感情跟着书中人物走，才能受到感动，才能体会入微，然后才能进行分析。金圣叹批小说，只写一两个字，如“细”、“我亦云然”之类，可见其读的细致；特别是《西厢记》，每分析前他都有总批，不下细工是

做不到的。当然，我们今天并不全部同意他的批语，但是他的这种读书方法是可以学习的。“桐城派”的“文章义法”固然说得空虚抽象，但也有些道理，他们是在深入研究所谓“古文”作法的结果下才得出这样的结论来。

指导学生阅读，更不能要求他们边读边分析，读一遍就写下笔记来。看小说如同看电影一样，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看下去，不能停止。如果看了一个镜头，便想把它记下来，那是办不到的，因为镜头一出现就掠过去了，它不能停着不动等待你记笔记。作品读得多了，对文艺的感受性锐敏了，就可以学会写作上的一些基本动作，然后再去运用它。这完全是从实践中体会出来的，而不是从一种“写作方法论”上学得的简便方法。读的多，体会的深，取多用宏，就能得心应手，变化无穷。所谓文学修养，也要把它看得灵活一些才好，否则很可能死搬教条，谈不上什么创作。

有些教师有生活经验，也有一定的写作水平，也想写写作品，可就是写不出来。请你谈一谈你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创作过程，给我们一些启发。

赵树理同志说：有生活，为什么写不出来呢？问题在于有生活不一定就要写成作品；如果想写而又写不出来，那一定是准备条件不够——即是在某些条件上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不能认为凡是有生活经验的人都一定是作家，李顺达同志的农村生活经验比我丰富得多，但他没有写过象我所写的那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原因是李顺达同志并没有准备写小说。

赵树理同志介绍他自己写小说的经验说：写小说搭架子最难，差不多要用去写作品所花费的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二。至于语言方面，我是用我自己的话写的。因此，我主张教学生写作文也

必需强调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写。写作文是比说话容易得多。因为写文章有构思的工夫，有修改的机会，还有停顿休息的时间；说话则完全没有这些方便。

写“对话”是比较费力的。一般的描写，是作者自己的话，容易措词；对话是人物的话，什么人物说什么样的话，捏造不来，作者的话更不能加到人物身上去。因此，对话即不是“人生于世”那一套，也不是“为人民服务”那一套。把写对话的技术提高了，作品自然也就提高了。平常指导学生写作文也是如此，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也是错不得的。比如“伟大的”、“光荣的”这一类形容词，就是要看在什么场合使用才适当，周总理可以当面对伏罗希洛夫同志说他是“伟大的、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可是一个小学生回到家中，却不能对他母亲说“你是伟大的光荣的母亲”。

写对话是须要多下工夫去体会人物的性格的。一九三六年，我在太谷北洸村教小学时，曾经写过一篇有韵的小剧本——《打倒汉奸》。剧的一开始写了两个老太太坐在炕上，手里拿着活计在闲谈（赵树理同志说到这里就把那两位老太太的对话，非常熟练而迅速地背出一段来）：

嫂：黑蛋娘，你为啥不去看看人家保官？

母：他二嫂，咱哪里有脸去看！你不看咱的黑蛋！

嫂：那不能光看眼前，各人的命运都有个早晚，要说咱黑蛋的聪明能干，十个保官咱也不跟他换。

母：什么聪明能干，哪如人家保官！听说人家在天津当什么委员，一年能挣几万。

嫂：不是咱黑蛋今天在大学也已经住满？

母：满不满什么也不算，人家见缝就钻，他不会看风使船，

他爹把我的地也快卖完，供得他念书念了十年，如今毕了业，家也不回，事也不干，闲闲地住在省城会馆。

赵树理同志说，这一段对话，是那两位老太太的话，不是我自己的话，因为写的时候磨过一点洋工，直到现在自己还能背诵。

现在中学文学课本上有的课文太长，不好教；小学取消了背诵，很不合适，你对这有什么意见？

赵树理同志认为：一般说，机械的背诵是无用的；但是机械的记忆却有用，不可不加锻炼。不但语文课里有些东西须要把它记下来，即是数理化课里有些定理和公式，不机械地记牢固，怎么能运用它呢？再拿写字来说，汉字是要一笔一画地记下来才会写，而这种一笔一画之间又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指楷书说，篆书除外），不记就不行。小学为什么取消背诵，我不清楚。

讲课文固然好，但还须要学生记；读读课文是需要的，但不宜太多。课文加长了也有好处。文学形式本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一律以短小精悍为唯一标准。有的人感到长课文大部分是口语，没有什么讲头。我认为教师的任务不一定在多讲；不讲，而采取表情的朗读，也能解决问题，因为朗读得好，就能帮助学生懂，我们的教学目的之一，就是在使学生懂。

现在语文教师，一般水平不高，迫切需要进修，希望赵树理同志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建议政府多办一些语文训练班，使得大部分教师通过训练提高业务水平，再多给参观机会，通过体验生活，创造写作条件。

赵树理同志说：教师要求提高业务水平，这是可喜的，但多办训练班，并不是好办法。全省语文教师好几千人，不可能

办那么多的训练班，主要还是依靠老师自学、互相帮助来提高。况且语文教师要学的东西很多，训练班也不能全部解决老师们所要学的东西。就拿汉字来说吧，目前普遍存在着发音不正确的现象。许多汉字，我就不认得，我曾和吴组缃同志谈过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你们当作家的幸福，会用不会读，或者读错了，并不妨碍写作。我们当教师的就不能了，对每个汉字要懂得彻底，读得正确，因为我们要教学生。”例如这个问题就不能在训练班解决。

语文教师批改作文不能说是一件苦事，而是乐事，并且是进修方式之一。一个语文教师，每学期平均以教两班学生（每班50人）五次作文计算，就要看上500本作文，这个阅读面是很广的；着了还要改，还要批，那个深度更不同于泛泛阅读。体会到这一点，我想再也不会把批改作文当成苦事了。不可否认，语文教师工作多，除备课、教课、听课、学习外，还要批改作文。但无论怎样忙，我认为应该每学期要求自己有计划地读上几本书，写一点东西，这也是一种进修的方式，而且是主要的方式。

至于参观并不是解决写作的有效办法，我所参观的地方不算少，可是我的小说素材没有一篇是从参观中得来的。大家都知道写作品要从体验生活开始，但单纯地把参观理解为体验生活那是不对的。我认为教师们能够利用假期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农村中去，就能体验出许多生活来，就有可能写作品。此外，学校的生活，也并非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狭窄和贫乏，事实上它很复杂，奇奇怪怪的事很多。一个当教师的除书本上的知识外，其它方面可能没有学生的生活多，知道得多。因为学生是几千人、几百人在一起，他们的生活面是广的，性格也各有不

同，怎么能说学校生活贫乏呢？老舍的《赵子曰》，叶圣陶的《倪焕之》，都是写教师的，又何尝简单呢？一个学校有很多的教师和学生，生活当然很复杂，从表面上看，觉得学校无非是上课下课，简单得很；如果深入到里面看，并不简单，大有可写的材料。

作家到中小城市和学生接触，对提高学生写作有没有作用？

赵树理同志说：见作家是不是起作用呢？依我看作用不会太大。而且作家和学生见了面，给予学生的影响，有时可能还起反作用。常有学生听了作家讲话以后，看不起自己的老师，这情况很不好。因此，我们在对学生讲话的时候，总是告诉他们：“在练习运用语文的阶段，最能帮助你们的是语文老师，而不是作家和文艺杂志的编辑们。”事实上也是如此。

赵树理谈评剧《三里湾》*

“往年春节，戏曲剧团在旺季里照顾业务，差不多总演些拿手的老戏。今年，中国评剧院在春节演出了新改编的《三里湾》，这可说是打破了老规矩。打破老规矩，人们是最赞成的。

“本来小说不是演戏的东西，因为它包括的人物多，头绪多，方面多。可是评剧院竟把它改编成带有歌剧性的评戏，从改编到演出，都是他们自己搞的，这很不容易！

“小说里写的纯粹是农村的事，而长住在大城市的演员，把它搬上了舞台，并且大体上反映了农村的现实、表达了农民的感情，这也很难！

“在戏里，两条路线的斗争很明显，改编者和演出者对这都抓得很紧，这是戏的一个主要特点。

“戏里的‘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一家——就是马多寿一家，给我的印象最深。常有理，我写的就是那么一个人，戏里出现的也完全是那么一个人；马多寿也好；惹不起戏不多，但是很动人；甚至戏少的三嫂——菊英，演员也表现出来这个受苦难、有认识、知大体、有斗争心的人物。

“范灵芝是在富裕中农家里长大的，为人聪明，心地善良，也有些斗争性。她愿意进步，愿意锻炼，可她没有参加过劳

* 本篇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北京日报》。

动，没担当过事情，没有深入社会生活。她是爸爸妈妈宠爱的女儿，是嘀嘀咕咕的那末个姑娘。我在小说里就写了这一面，演员演得也符合书中人物。

“村长范登高演得不错，副村长张永清，书里写得不多，可演员的表现相当突出。听说扮玉梅的演员是一个新文艺工作者，演得这样，很不易了；在有翼革命的一场，她表现得很好。

“戏是新编新排的，有待修饰的地方在所难免。作为小说的作者，我愿意等戏演过些天以后，搜集一些观众反映，再和演员、改编者碰碰头，大家一起谈谈。我想这样将会使这个戏更完善一些。”

（徐琮记）

《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曲艺》序言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国庆十周年，我们曲艺工作者谨以这本选集作为献礼。

这本选集是根据历年来各地出版的曲艺创作选集及一九五九年七月以前各报刊登载的曲艺作品编选的。所有参加曲艺书刊编辑工作的同志，在这本选集里，都有他们的劳绩在内。还有很多同志为这本选集提供作品篇目，或是协助校订工作，化了很多精力。我们向所有这些同志表示谢意。

开国十年来，我们的祖国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十年的时间，我们走了一二百年的路程。我们经历了多次惊天动地、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这是一个伟大的年代！在这伟大的年代里，党不断地号召文艺工作者，反映祖国的巨大变化，歌唱新时代的新人新事，用文艺武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曲艺号称文学艺术当中的尖兵、轻武器，它极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十年来，曲艺作者积极地响应了党的号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创作了大量的曲艺作品，及时地配合了政治运动。曲艺创作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因此，我们在编选时首先注意到其中最有时代意义，艺术上比较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注意到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在艺术技巧上也有所独创的作品。希望在提高艺术技巧更好地为思想内容服务这方面，有所推动和启发。

在编选时还注意到时期、作者、地区、曲种等几个方面。

开国以来，各个时期都有一定数量的优秀作品。总的来看，创作质量是后来居上，这是个可喜的现象。这本选集也正应该反映出十年来曲艺创作逐步提高的情况，每一时期都有作品选入，不偏重选开国初期的，也不偏重选近几年的。曲艺作者几乎全是业余的，人数众多。我们认为选集也应该反映出这一实际情况，通过选集，把多数作者的作品介绍给读者。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风格，作品也各有独到之处。多选各家之作，对读者的揣摩和借鉴就更为有利。因此对佳作多的作者也只选其有代表性的一篇。此外，在编选的时候也注意到地区和曲种。由于曲艺创作在全国各地的开展是不平衡的，各地区各曲种的创作就有先后多少之分。我们在不降低选集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照顾发展较晚，作品较少的地区和曲种。我们特别引以为憾的是少数民族的曲艺形式很多，翻译出来的曲艺作品却很少，因而选入集中的只有两篇。

选集的目次是以曲种分类为依据的，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一九五三年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以后，就以调查全国曲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直到一九五八年文化部举办了全国曲艺会演，才摸到了全国共有二百多个曲种这个底。根据它们的形式特点和历史渊源，可以分为十类：大鼓、弹词、琴书、渔鼓道情、牌子曲、时调小曲、走唱（载歌载舞的）、快板快书、相声、评书。前七类各自包括了若干曲种，流行的区域很广。同属大鼓一类，就有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山东大鼓等二十几种大鼓；同是渔鼓道情，就有陇东道情、沔阳渔鼓、河南坠子等众多曲种。前七类几乎全是音乐性比较强的曲种，大多有弦乐伴奏，有的曲种伴奏乐器达四五种之多。这些曲种的唱词基本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七字句为主的词，七字句又可变化为八、九、

十、以至于十余字，我们以鼓词作为总称。一种是按曲牌填词的，共有几百个常用的曲牌子，我们以曲词作为总称。属于前七类的曲种因此又可总称为鼓曲，共有一百七、八十个曲种，不少曲种的词是可以互相采用的，就是鼓词、曲词之间有时也可以略加增删，互相采用。鼓曲类和不用弦乐伴奏，打着竹板朗诵的快板快书，都是唱的，作品又可总称为唱词。相声是说笑话，评书是讲故事，它们讲说的本子都是散文，除四川评书是散文协韵以外，无平仄韵辙的限制。根据曲种摸底的情况，选集的目录的排列方法是两门唱的在前，两门说的在后，就是：鼓词曲词、快板快书、相声、评书。其中也有散韵结合，有说有唱的作品，看它说和唱的比重如何，唱多的归唱，说多的归说，不再另列一类。以下，试就这四类作品的内容，举例加以说明。

唱词的主要性能是歌颂，唱词的主要内容是歌颂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解放军、中苏友谊以及新社会的新人新事。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歌颂现实的文艺作品是基本的。曲艺作者和其他文艺作者一样，有义务尽情地歌唱伟大时代和当代的英雄人物。曲艺唱词作者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尽到了应尽的力量。发表在报纸、刊物、小册子、墙报、黑板报、大字报上的唱词中，歌颂伟大现实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在今天，这是创作发展的正常现象。在这里举四川车灯唱词“人造卫星大闹天宫”为例。一九五七年十月苏联的人造卫星上了天，同年十一月这个作品就写出来了，经过《曲艺》月刊的推荐，很快就流行全国，改编成为多种多样的鼓曲唱词，广泛传唱。这一作品热情地歌颂了苏联的伟大科学成就，神化了人造卫星，它上天之后，使群神震惊，玉帝沮丧。人间胜过天上，众仙纷

纷要下界。主题鲜明，题材新颖，而且写得趣味横生。这篇唱词出现以后，歌颂今天改造自然的宏伟工程的“龙王辞职”、“翻江倒海”等神话体的作品，接连着出现了。

抗美援朝，给了曲艺创作很大的推动。有很多曲艺作者和演员随着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先后去到朝鲜，慰问中朝军民。他们了解了朝鲜战争的真实情况，感受了志愿军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积极进行创作。这些作品，一方面写出了志愿军的英雄业绩，一方面也写出了全国人民支援志愿军的踊跃行动。有一部分优秀作品选入了《抗美援朝曲艺选集》。歌颂志愿军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的作品有各种鼓词曲词，我们选入了“歌唱英雄黄继光”作为代表。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写的是志愿军司机大老郭和小张智勇双全，巧抓俘虏的故事。他们运高粱米到前线，深夜和美军的汽车碰了头，趁美军司机下车观察的机会，大老郭和小张跳上美军汽车，开动车辆轧死美军司机，把一车美军开到我军阵地作了俘虏。故事是惊险的，情节是紧张的。写出了我军的大勇大智和美军的狼狈不堪。人物形象也是生动的。这个作品不仅表现了志愿军英雄人物，对山东快书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快板“战士之家”运用对口快板变化灵活的特点，写出了我军阵地上的生活、学习、文化娱乐的活跃景况。战士们把阵地美化了，建设成了战士之家，作品表现了志愿军英雄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通过作品，读者可以看到他们坚决和敌人斗下去，在阵地上长远住下去，不取得胜利绝不罢休的决心。这些曲艺作品，信服地说明了抗美援朝战争，正义是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也必然属于我们。直至今日，演出这些节目时，还能把我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生活气氛带给我们。经过反映抗美援朝这一伟大斗争，曲艺中的快板、

快书在部队中有了极大的发展。部队中不仅有了曲艺队，并且开过训练班，训练出大批的业余作者和演员。后来在福建前线的对敌斗争中，曲艺演唱也起了作用，创作也得到发展。写福建前线炮击金门岛的快板“金门宴”，表现了我军蔑视敌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是一篇极受欢迎的作品。

国家开始了五年建设计划之后，为了反映这伟大的建设面貌，出现了快板“说黄河”、单弦“蓄洪区说话”、鼓词“龙王辞职”和“月夜荡泥船”等数以千计的曲艺作品。“说黄河”从黄河为患数千年，使两岸人民流离失所说起，讲到党提出根治黄河的伟大计划，最后描绘了黄河治好以后，两岸绿化，数千里通航，变祸水为福水的美景。“蓄洪区说话”和“龙王辞职”运用了童话、神话的写作手法。前者写了荆江蓄洪工事完成后，使鱼儿游不到武汉街市，它们感到失望，还作了今昔对比。后者写的是人民兴修水利，制服旱涝，龙王不得不辞职。“月夜荡泥船”是一篇配合去冬积肥运动的作品，作者通过月夜捞泥这个具体故事，既写出社员的冲天干劲，又写出党对社员生活的关心。这段唱词里有不少优美活泼的句子。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大量的曲艺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山东快书“三换春联”是写得比较早的一篇。富裕中农老运通，要搞单干，还要和合作社比赛。他的春联上写着：“小儿参军保国，在部队屡建奇功；老汉单人匹马，第一年旗开得胜。”第二年他的生产和社里差不多，勉强把下联改成“老汉单人匹马，等来年再显威风”。到了第三年社里超过他了，若不是社里的帮助，他的庄稼会被虫子吃光。这时他才口服心服地入了社。春联换上“老汉互助合作，第三年思想打通”。作品不仅写了两种思想的斗争，写

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连斗争的过程，通过三换春联也具体生动地表达出来了。在写作技巧上也有所创造。故事的主题思想更为深刻的是湖北渔鼓“迷路记”，写的是刘介梅翻身忘本又回头的故事。刘介梅夜里偷偷地去看他的生活新旧对比的展览会，回忆起从前的苦日子。“拿起打碎的碗，看见娘的脸：哪年吃顿白米饭，死了也心甘”。这是多么深刻，又多么精湛的诗句。刘介梅事件给存在着发家致富思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民敲起了警钟，指出了正路。韩起祥写的自传体的陕北说书“翻身记”，以活生生的事实进行新旧对比，有力地反驳了右派分子“今不如昔”的谰言。一个旧社会的盲人，小时候有活不长的危险，是大人的累赘；韩起祥好不容易长大了，就背着三弦谋生，生活遭遇，十分悲惨。谁还想得到后来毛主席和他握手，成为群众爱戴的艺人呢！作品感人至深。

表现解放军的唱词，除了歌颂英雄人物的以外，还有很多是颂扬军民关系，官兵关系的。选集中选了两篇。“三只鸡”，写一个伤员转移到村里之后，因为流血过多，需要营养。张大娘把正在下蛋的鸡拿出来了，司务长不接受，她偷偷地杀了以后再拿出来。司务长要按价付钱，张大娘坚持不要。下蛋的鸡是农村老大娘的宝贝。常言说：“老大娘三件宝，闺女、外甥、鸡。”为了伤员把鸡杀掉，这是多么深厚的军民关系。

“风雨夜路”把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来写，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当排长命令陶雄来回跑四十里路送还房东一把剪刀的时候，不但小陶雄有点儿不乐意，就是读者、听众也会觉得排长执行军纪虽然是坚决的，只是机械了一些。可是当送还了剪刀，老大娘对解放军表示了那样的崇敬时，陶雄的思想转变了。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还有回去路上遇到风雨

的情节。及至听到班长抱着雨衣来接，排长温着饭等陶雄回来的时候，听书的人谁不动心？这个作品典型地描写了军民如鱼水、官兵如兄弟的亲密关系。

关于少数民族的曲艺作品，只选了内蒙古的好来宝“铁牯牛”和“夸马”两篇，都是歌颂解放以后内蒙古大好光景的。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曲艺作品，翻译成汉语的很少，能力不足是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努力不够。这种情况应尽快地有所改变。

此外唱词中还选了反映历史革命故事的“党的好女儿”和根据民间传说改写的“张羽煮海”。这都是曲艺作品中应有的题材，选此两篇，借以提倡。

以上是关于鼓词、曲词、快板、快书作品的一些说明。这些简略的解说，并不能够概括十年来曲艺唱词创作的全貌，只是就选集中的三十六篇唱词，举其重要方面，略作说明而已。

选集共选了十篇相声。内容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的，并照顾到相声长于讽刺的主要功用，和创作的各个时期。这里举几篇在相声的写作技巧上有所创造的段子谈一谈。

“飞油壶”是以自我批评的态度和手法写的，批评了不守操作规程的人，当个人和生产受到损害后，他改正了缺点，工作更积极了。这段相声突破了传统相声的旧规，以新的内容，新的手法，写出了带有喜剧性的相声作品。这个作品不仅在工厂里演出时收到教育工人的效果，也给此后的相声创作开广了道路。使大家知道，一段相声不仅可以讽刺，也可以有褒有贬。

“水兵破迷信”也是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有较多的优点。首先这作品掌握了相声艺术特点，“包袱儿”结得巧妙，抖得适时，从头到尾，一步紧似一步。揭底也揭得又幽默又意味深长。其次，这篇相声一方面讽刺了单是依赖书本不参加实际工

作的工程师；另一方面写出了水兵群众敢想敢干的精神。作品中的教条主义者不光是碰了钉子，他也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事实的教育。作品在艺术上不仅学习了传统技巧，而且有新的创造。

“社会主义好”和“英雄小八路”都是歌颂现实的作品，用相声来歌颂，获得了成功。这两篇作品演出的效果都很好。“社会主义好”运用了“乙不相信，甲来说服”的传统手法，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也歌颂了未来的美好远景。又加上了一些作为调剂的噱头。使听众沉浸在社会主义美好光景的喜悦中，触着这些噱头，忍不住要笑出来。把思想内容和笑料结合起来，加深了宣传的效果。“英雄小八路”是用的漫画式的手法，把一群少先队员活跃在前线的英雄行为突出了。尽管象漫画上的孩子那样，大眼睛大头，和这些小人儿不大相称，但是总觉得更加可爱；他们的行动、在前线所起的作用和年龄也是不相称的，可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小英雄形象总是活现在我们眼前。

“昨天”这段相声的构思非常巧妙。一个忠厚诚实的老大爷在解放前夕受尽了种种剥削和凌辱，逼的得了精神病。解放后，人民医院给老大爷悉心调护医病。十年，老大爷病好了。他却以为刚刚过了一夜。走出医院的老大爷事事新奇。首都北京的巨大变化，使老大爷瞠目咋舌，不得其解。“昨天”就是通过老大爷出院后的一连串活动，把新旧社会作了鲜明的对比，抨击了吃人的旧社会，歌颂了伟大的新中国。

由于广大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工农商学兵都喜爱相声，相声的创作有了飞跃的发展，不仅在主题思想方面紧密结合现实生活，起到了应起的战斗作用，就是相声的形式也有了发展

变化，使这一门艺术更加丰富多采。

选集中共选了八篇评书，都是短篇，评书是说的书，不同于专供阅读的小说。中国过去的传统小说，有的是先经过长时期的说之后才写出来的。今天是写出来评书，再拿上场子来说，不可能一字不差地照本宣读。事实上说的书词和写的书本，除了主题、故事和人物不变以外，连情节和结构都是有变化的，古今皆然。所以评书和鼓词、曲词、快板、快书、相声等形式的照本说唱不同。虽然必须有本，没有本，主题、故事和人物会弄得无所依据，可是专靠书本没有创造，也不能吸引住听众。经过曲艺工作者的提倡，曲艺演员的要求，评书的创作，逐步有了起色。一九五八年工农业大跃进中，评书创作也来了个跃进，出现了“小技术员战服神仙手”等较好的短篇评书。

“小技术员战服神仙手”在短篇评书创作中具有突出的作用，这篇评书未出现以前，我们虽然看到了评书在反映现实这方面有比其他曲艺形式更便利的地方，可是缺乏有代表性的反映现实的好作品作例证。这篇作品的出现，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而且从这篇作品发表以后就不断出现较好的评书作品。所以这个作品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小技术员战服神仙手”写了农业生产中敢想敢干的青年和神仙手这个老庄户的斗争。论本领，老庄户大得多，但是小技术员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有胆有识，有始有终地干下去，终于获得了生产上的胜利。这个作品掌握了短篇评书特点：有故事、有人物、有对立的两方，矛盾展开后，斗争接着规律发展下去。不轻易放过重要情节，抓住重要的节骨眼就有声有色地写，所以使读者和听众发生兴趣。这篇评书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作家，过去也并不常写曲艺。因为他参加了农业技术研究工作，对农业生产上的保守与

先进的斗争有了较深的体会，所以写得生动有力。曲艺创作除了一些老作者之外，新作者不断涌现，这是使人兴奋的现象。

作家和群众在十年的期间写出了千千万万的曲艺作品，选集只收入了五十四篇。必然还有优秀作品，由于我们搜集不广，阅读不细以致有所遗漏。还有因为选集的条件所限不能选入的，例如评弹“不死的王孝和”、“一定把淮河修好”都是好作品，演出也受到群众欢迎，因为是中篇，占的篇幅太多，没有选入。长篇评书虽然还不多，象“烈火金钢”这部写冀中抗日战争故事的长篇评书，已经在艺人中广泛说唱，效果是很好的。这些新的大书可作为单行本出版。

十年来曲艺创作遵循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配合了历次政治运动，发挥了尖兵、轻武器的作用，歌颂了共产主义者的高贵的道德品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供应了曲艺艺人的演唱需要，满足了群众文化娱乐的要求，成绩是很显著的。但是已有的成绩，和祖国一日千里的发展比起来，和曲艺丰富的积累及应当发挥的作用比起来，还是很不够的。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专业文学家、艺术家，经过艰苦的努力，用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的作品来教育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要求。”这是党和国家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殷切期望。要达到这样的要求，要出现更多更好的曲艺作品，曲艺作者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再继续前进。

从过去十年的曲艺创作来看，“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长时期来，重艺术轻政治曾经是一部分曲艺作者的倾向。他们喜欢词藻华丽，噱头连篇的作

品，却不管政治内容如何。经过整风和思想改造，大多数作者认识到了重艺术轻政治的倾向是错误的。于是又有一部分作者忙于配合政治运动，结合中心工作，写出了一些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这些作品演出时配合了当前的运动和中心工作，也收到一点宣传鼓动的效果；但是随演随丢，事过境迁，演员不愿演，观众也不愿听。所以千千万万的作品虽然写出来了，演员们却感觉可用的曲艺唱本还是少。长此下去，曲艺创作就很难提高，已有的宣传效果也不能持续。曲艺作品的艺术技巧的提高是历来存在的问题，也是今后特别应当注意的问题。

曲艺是说唱艺术，以语言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能说能唱是曲艺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作品的特点。选集中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经过说唱考验的。但是无庸讳言还有一部分作品，看起来是好作品，说唱的时候演员会有困难。

曲艺作品要能说能唱，首先要有故事性。除了少数的抒情叙事的短篇曲艺而外，绝大多数的曲艺作品是有一个紧张的故事。这故事一定有尖锐的斗争。梁山好汉，瓦岗寨的英雄，所以人人爱听，就是因为他们占山为王，杀官劫库和当时的统治阶级对抗。三国演义，是有三个国家错综复杂的斗争的。越是枪对枪，刀对刀的紧张斗争，观众越迷恋。对尖锐斗争中的两方面，作者、演员和观众一定倾向一方面：梁山和瓦岗寨是作者、演员和观众同情的方面，隋、宋皇朝是被反对的方面。刘备是被同情的方面，曹操是被反对的方面。经过说书人这样的宣传，弄得杨广、曹操永世不能翻身。曹操虽然是冤枉，我们要为他伸冤，群众还不是那末容易通过的。传统曲艺中另一种重要题材是忠臣和奸臣，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忠臣和好人作者、演员和观众所同情的，奸臣和坏人是被反对的方面。杨家

将是忠臣，潘仁美是奸臣，岳飞是忠臣，秦桧是奸臣，忠臣往往受奸臣的陷害，也正说明朝廷上的昏君之多。作者、演员和观众是站在忠臣方面的。忠臣的命运系住了观众的心，观众时刻为他们担心，可是忠臣老是不得济。观众是痛恨奸臣的，可是他们老是横行霸道。在曲艺作品中处理这类故事往往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和义士身上，所以传统曲艺作品中出现了包拯、寇准这样的人。有的被冤枉的人，经过了平反，真情大白，观众为之一快。有的被冤枉的人以至于死了，曲艺作者一定要写他的后一辈的人，把书续起来，大报仇，大祭坟。不这样就不能向听众交代。对于好人坏人的处理也是如此，吕蒙正的老丈人、方卿的姑母，嫌贫爱富，作者和说书人就一定要吕蒙正和方卿发迹，回头来对这些势利小人羞辱一顿，这是群众的要求，群众的义愤，这样处理才大快人心。固然时代的变化，共产党领导下，好人永远不会被屈；但是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生产斗争更是紧张，惊心动魄的故事不是没有，可歌可颂的人物就更多了，问题在于作者怎样选择故事，怎样处理这些故事。今天的曲艺作品中，在构成曲折紧张的故事情节这方面还是很差的。曲艺作品还可以写一些生动活泼，有趣味的故事。如传统作品中的“借髻髻”、“偷石榴”等。如选集中“月夜荡泥船”和“师长帮厨”等。虽然写的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故事别开生面，也能够引人入胜。总之，曲艺作品的故事性是创作中一个重要方面。

曲艺作品的刻划人物同样是有特点的。短篇中可以有一两个主要人物，要有名有姓，有象貌有性格。如果是两个人物的话，也要有重要和次要之分。再则是陪衬人物不宜太多，也不必有姓名和形象，只把他们和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点明就够

了。因为一个短篇，说唱十来分钟，人名多了，会使得观众连人名也没听明白就演过去了。所以只能突出一两个人物。曲艺作品塑造人物形象，全凭语言，比起戏剧的化装演唱，美术的勾画着色来，是有它自己的困难之处的。没有形象化的语言就难以给观众留下印象。曲艺作品中刻划人物的语言都是形象化的。例如描写人的眼睛就有凤眼蛾眉一类的比拟，刻划壮士的身体，就有虎背熊腰这样的语汇。不仅要有形象而且要有色彩；曲艺中的人物服装打扮是色彩分明的。写赵云，白面、白盔、白甲、白马烂银枪；写张飞，黑脸、虬髯、黑盔、黑甲、乌骓马、丈八矛。先给观众一个容易留下的印象；以后提到这个人物的一举一动、声音笑貌，甚至衣履刀马也就会使人容易辨别出来是谁。今天在创作新曲艺作品中，当然不能沿用旧的一套，但也要想出各种的办法，使自己描画的人物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例如，描写人物的外形从脸形、眼睛、鼻子、口、头发、直到身干，要顺序说出来；服装、用具和本人的身分、环境能相称，那就比乱写乱画好得多。特别注意的是所用的语言一定是形象化的语言，是群众最熟悉的语言；不能用自己编凑的生僻语汇。曲艺作品说唱出去之后，观众的欢迎与否，鲜明的人物形象是有重要关系的。

除了根据曲艺的特点提高曲艺作品质量以外，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发展各曲种的创作，采用多样的题材也是应当注意的。选集中包括的曲种还不够多，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的说唱形式，因为没有翻译，采用的还很少。要使今后曲艺创作灿烂多彩，应大力推动各地区各曲种的创作。题材也是这样，曲艺创作除了反映现实以外，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都是应该采用的题材。祖国丰富的民间故事和四千年的历史，百余年

的革命斗争，都应当用曲艺形式来表现，使它们在群众中流传不歇。创作这类的作品有待于今后曲艺作者的继续努力。此外，选集中绝大多数作品是歌颂现实的，讽刺作品只是一部分相声，当然，这是符合我国的生活实际状况的。不过还有人主张多写歌颂的相声，避免写人民内部矛盾，这就会使题材趋于单调。今天帝国主义还存在，需要讽刺打击它，和它作斗争。人民内部也还有缺点或错误，还是需要批评的。运用相声这一讽刺、批评武器，打击敌人，批评内部缺点，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因此，我们不能同意废弃相声的主要性能。

曲艺创作能获得这样的成绩是和学习传统曲艺的艺术技巧分不开的。传统曲艺作品很丰富，今天搜集记录整理出来的还有限；至于传统曲艺艺术技巧的掌握，可以说只是刚刚开始。今后要提高曲艺作品的质量，必须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我们的指示：“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开国十年来曲艺创作已经获得了光辉的成绩。今后要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创作实践中继续努力，优秀的曲艺作品的大量涌现是可是预期的。

赵树理 陶钝（执笔）

一九五九年七月，北京

和农民剧作者的谈话*

《小剧本》编者按：专业作家和工农群众业余创作者，通过各种形式的不断联系，在创作上互相关怀和交流经验，这对于推动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是有益处的。我们编辑部极愿成为这一联系之间的桥梁，尽到一些微薄的责任。最近，赵树理同志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约稿，和河南省扶沟县农民剧作者冯金堂同志安排了一次谈话。我们把这次谈话中涉及创作的部分，整理发表，希望对广大的业余作者会有一些帮助。

冯金堂：我是个农民，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学习写作了几个剧本。很早以前，我就想见见赵树理同志，希望得到老前辈们的帮助，现在得到了这个机会，心里非常高兴。我把写作上感到解决不了的几个问题提出来，请您帮我解答。

赵树理：你提出的问题，我不一定解答得了。不过，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看，人民公社今后在生产上会怎样发展？

冯金堂：我们那里，就要发展到半机械化了。

赵树理：你对公社的作用怎样估计的？没有公社这一级将会怎样？

冯金堂：那很多工作都会赶不上，河网化就搞不成（因扶沟是原来的黄泛区，现在搞成了水利网）。

赵树理：是啊。为什么我先问你这些呢？我们要关心公社

* 本篇发表于《小剧本》一九六〇年一月号。

里的大事情，虽然每天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眼光可不能光局限在队里，还要从大处着眼，积极关心公社的大事和它的发展前途，我们至少认识个八九不离十。

冯金堂：我一直在农村劳动、生活，时常感到我的一些习作中有见事不见人的毛病，我写过一个反映农业大丰收的戏《和平村生产队》就是这样。第一幕是大搞水利。我们那里打井很不容易，但群众干劲冲天，把困难克服了。第二幕写改种作物，争取由低产到高产，一部分保守分子不同意，展开了两种思想的斗争。后来又写到了向虫害的斗争和人工授粉等事情。结果，台上光见事不见人，剧中人物不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赵树理：你所说的见事不见人的问题，我没有见你的剧本，理解得不具体。我想，恐怕有着对人物不够熟悉，观察不深这个原因。我们要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去了解各种各样的人，这才能准确的掌握人物的思想、性格。说到要观察人物的特性，在生活中，有的人有爱抓头的习惯，这是特性，也不是特性。因为一般来看，这个动作并不能表现人的思想，我们主要的是必须抓住那些能表现人物思想的特性。只有写出这样的特性，人物才可能真正的突出，生动。这就要十分熟悉你所描写的人物。各人对自己的父母亲都很熟悉。我对我的家属，常常是在他们还没有发言，我就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做什么了，这只是一般而言。文艺作品给人的教育，主要还是思想的教育。

我们写人物当然要写出他们的思想，如果你对人物的思想感情很熟悉，写起来心中就先有了个人，这就会避免见事不见人了。

每个人都有思想，但是否把每个人搬到舞台上都能写成

戏，每件事都能写成戏呢？这首先要看这个人~~和事~~在生活中有没有代表性。现实中很多生动的人，有时写成戏反而不生动了，我想这和我们写的人和事本身有没有代表性有关系。怎样才能分别有无代表性，这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了。在生活中不一定就能认识生活。人总是有世界观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人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它支配着作家去写什么，不写什么，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人离开判断是不能生活的。行动受着思想的指导，指导思想错了，写到作品里的思想也对不了。落后的人当然也有他的世界观，假如他也写作品，那反映出来的生活必然是他从落后的眼光来看的生活，他分辨不清是非，甚至颠倒是非，这又怎么能真实生动的写出人物来，怎么能有教育意义呢？有个人给我寄来一本戏，写一个老头到上海去找他的儿子，儿子是派出所的所长，老头找到机关宿舍，别人拿香烟招待他，他硬要抽自己的旱烟袋。儿子回来，他看到他头发擦油，穿着皮鞋，就很反感说：“你这双鞋够我做一套棉袄还多”。而且，儿子在上海已经有了对象，他还硬要儿子回家和他代替儿子定下的一个姑娘结婚。作者究竟要通过这个作品教育我们什么呢？是儿子不该穿皮鞋呢，还是一定要回乡结婚才正确呢？那么，将来是让儿子脱下皮鞋回乡生产，还是要那个姑娘进城当太太？不明白。这个作者反映了一种狭隘落后的情绪，不会给人什么积极教育的。工业生产中讲究经济价值，我们写作品要讲究教育价值。

冯金堂：在生活中有些事，我觉得写出来能有教育意义的，但不知怎样来编写。还有，我看的是不是对头，希望能得到你的指教。一个是现在农村中个别干部还有重男轻女的思

想。有的生产队不大愿意在技术上培养妇女，觉得将来会嫁到别处去。我们那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干部，后来是有个青年从外乡娶了个会开锅驼机的媳妇回来，思想才转变了。还有，一些妇女当姑娘时很积极，开会时到处叫人，欢蹦乱跳的，可是结婚后就不积极了。这些，我觉得应当写，不知怎样才能写好？

赵树理：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是永远也写不完的。对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我们要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今天成问题的明天也许就不成问题了。这样看来，有些现象就不是什么大事。写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还是要善于抓住重大的方面。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有时也反映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值得去写了。你说的有个干部不大愿意培养妇女，后来恰好有一个锅驼机手嫁来了这才转变。当然，这也算是一种教育啰，这种思想也是一种本位主义的表现，但这问题不大，将来发展到公社统一分红，这种思想基本上就会解决。自然，那时也还可能有个别的人争干部，但代表性就不大了。关于有的妇女婚后便不积极了，据我的粗浅看法，有的妇女在娘家时，没有当门立户，家庭经济上没有什么负担，欢蹦乱跳满积极的，这样的人做姑娘时对家庭的经济不负责任，出嫁后自己成了家，就走到了另一极端，对社会不负责任。这倒也可能反映两条道路的斗争。一般农民除了忙家务，也不误生产，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象这样的妇女结婚之事，坛坛罐罐越来越多，对公社的事不热心，这种人物当然值得写进作品里，给予应得的批评。

冯金堂：有的戏写得不连贯，没有扣子，还没有演完，观众觉得下面没戏，就走了。

赵树理：戏写到那里，已经完了，还要硬拖下去，如果我们做观众，也是不爱看的。

冯金堂：我写戏有时感到矛盾冲突不容易集中，处理得也生硬，解决矛盾也不大自然。

赵树理：如果你抓到的矛盾在生活中是真实的，而且带有普遍性，那就容易处理得自然。为了有戏故意制造矛盾，那是虚假的，没有根的，当然很难处理。矛盾一假，解决起来总憋扭。你参加河网化的劳动没有？

冯金堂：参加了。

赵树理：在水利化中群众的情绪怎样？

冯金堂：最初挖沟没有成功，群众中也有泄气的。后来见到水时，大家都兴奋得跳起来。

赵树理：群众在大搞水利中的热情是十分感动人的，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些写。要作品能感动人，首先自己要被感动。没有真正的对生活的热情，是很难写好作品的。我们在生活里的人能够亲眼看到、亲身感到群众运动中最沸腾的情绪，这种直接体会到的感情，直接观察到的生活，这是创作最可贵的材料。事后的参观访问是无法代替这个的。等你去问社员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兴奋的心情，他们往往很难说得上来。

我们在生活中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是非常必要的。我有时碰上一些事，不想清楚了就很难睡觉。平时见到一些生活现象，多动点脑筋，当党有了什么决定时，常常在思想上有个准备，要配合新的政治任务，写起来就方便了。有什么自己解释不来的事应该问党委。应当处处接受公社党委的领导，了解当前的中心工作和宣传任务，要关心公社的生产大计，发展前途。

真正在群众生活中就象在船上，四周都是水，怎么抓怎么是，不怕没有写作的素材。重要的还是要学习马列主义，能正确的看待问题，才能正确的表达主题思想，正确的反映生活。

作家要在生活中作主人·

伴随着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曹靖华同志来参加我省第三次文代大会的作家赵树理同志，二十三日午在大会上作了一次漫谈式的发言。他发言涉及的范围颇多，但是他预先声明他只是以作者的身份提出些不成熟的意见，来和本行人交换，请勿发表。会后，记者又拜访了赵树理同志，征得他的同意，摘录几段如下：

谈到作家如何深入生活问题时，他很强调“要在生活中作主人”。他说：

“最近我在广西一次座谈会上谈过一个问题，就是作家要做生活的主人。当什么主人？当社会的主人。今天我们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是主人，都应该有主人感，都应该有‘咱的江山、咱的社稷’这么个感觉。在整个社会说来，是社会上的主人；在一个具体业务部门，就是一个具体业务部门的主人。主人感充沛，许多问题就比较解决。同志们提了一些问题，比如：在生活里虽然见到的东西很多，但好像找不到什么可写的。这牵涉到一个作者对生活的态度问题——他是去找生活呢，还是自己就在生活中？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不要老是去找生活，你现在那个生活就要算是自己的生活。我们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他和别的工程师有点不同。比如一个煤研工程师，他到山

• 本篇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新湖南报》。

上去找矿，那个山上没有煤矿，或者只有铜矿、铁矿，与他无关，就没有他的事，他就可以走开了。作为学习采矿的人，只要把本行本业学会了，他就可以去采矿，当采矿工程师。作家就不是这样来的，并不是有这么一个灵魂工程师的学校，上几年学以后，学会了写作的整套办法，哪里要写作，就到哪里写作去，如同哪里有矿，就上哪里去采一样。作家工作的对象是人的灵魂，社会上所有的人都与他有关。对作家来说，只有把他要写的生活变成自己的生活，他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变不成自己的生活，那他写出的作品，就会像隔了一层皮，写不好。我国古典作品中，《红楼梦》是很著名的，但曹雪芹他也不是去体验了别人的生活以后才写出《红楼梦》的，他也不可能去体验别人的这种生活。如果当时有这么一个作家，他不是封建贵族家庭出身的人，却想去体验《红楼梦》那个小姐群中的生活，人家也是不会让他去的，谁要去的话，也准要挨一顿揍，给赶出来。只有当生活的主人，把生活变成自己的，那才能扎扎实实地写生活，和写出真情实感。作为生活的主人，他在生活中一定会赞同一些什么，反对一些什么，就不会觉得没有东西可写，而是总会见到一些他要写的东西的。”

他谈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说：“我们作家到农村去，就要以农村为家。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去到农村，农村就是我的家，这个家我从小一直就没有断过联系；抗日战争中间，因为战争关系，断过那么几年，以后就接上了。我们的村子是一个大队，三个小队，不及一百户人家。我到生产队，群众把我当作他们一个圈子里的人，我既不是支书，又不是队长，但我又像什么都是，那里的干部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我商量，要我出些点子；群众也愿意我在。比如我隔了一个时期回去一次，大

家总会想办法召集大会要我讲些什么，即使只过了一个礼拜，也要问问我：你看咱们这里现在变得怎么样？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而我在要走的时候也总喜欢向他们谈谈下一步的事情该怎样怎样做。”

他又说：“如果不是这样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是不会把他们的真心话反映给你的。过去曾有过一种说法，就是想写一个劳模或先进人物，就得跟上他，每天每天注意他的行动，他的语言什么等等，那不是个办法，那好像是‘钉梢’，人家会产生误会说：你老钉着我干什么呀！所以这不行，你要熟悉他，你就要和他在一块共事，每天和他出主意办事情，过一个时期后就变成熟人了。而且不光是了解这个人，就连和他有关的别的人也都要了解到了。作家到一个地方去，在一个具体工作岗位上，熟悉和了解一部分人，仅仅是做了主人后自然的收获，更主要的是有责任把岗位上的工作做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主人感愈强，生活就愈充实，主人感愈弱，生活就愈游离。”

谈到业余写作的问题时，赵树理同志说：“业余作者有一段时间没有写出东西来也不要着急，业余作者和职业作者不同，业不余就可以不写，业有余才写，而且生活有个积累的过程，积累几年，要写的东西就多了。一个人不可能天天都有重要的事，每天尽是重要的事，人也受不了。比如打仗，如果每天冲锋，也过不了日子。重要的事情在生活中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过几年总的看就多了，以自己的地方为中心，对周围各方面也就看得广了，对周围的人事、工作、关系等也会有成套的看法，对各种人有了系统的了解，掌握了各种人的性格，也就好写了。”

赵树理同志主张作家不限于只写文艺作品，只要对革命有

利，什么应用文都应该写，而且要慎重其事地写。他说：“我在抗战初期，原没有打算当一个作家，我是在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做宣传工作的，写些什么传单呀，快板呀之类，什么都写，除此之外我没有写作的任务，连业余作者也不是。当时我所写的都不是什么文艺作品。有一次，有个人把汪精卫画成一个猴子被日本人牵着，我在画上提了这样的字：‘做了日本官，好像猴爬杆，一时不听话，就要挨皮鞭，再说不干吧，人家用绳拴，抗战胜利后，怎么到人前’。这说不上是诗，就是宣传品，散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念，有的人把它从电线杆上揭下来，往口袋里装，可见有人要这个东西。那时我写得非常多，有些现在都记不起了。我写那些东西是诚心诚意当作革命工作做，因为这对革命有利嘛。”

在私生活方面，赵树理同志主张要长期维持劳动人民朴素的生活风度。他说：“现在，我们作家都下乡，都参加劳动，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出身于体力劳动家庭的同志们，最好是不要丢掉我们优良的好习惯；出身于其他家庭的同志们，应该学习劳动人民的那种风度，使之成为习惯。我们经常要想到艰苦的生活，经常要想到今天我们广大农村的农民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这样，到了城市以后，就不会被城市生活所迷惑。在今天，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自然还有差别，但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这种差别的。在这种差别尚未消灭之前，如果我们还有意利用它的话，那我们就成了‘伪君子’了。总之，我们作家、艺术家们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做新时代生活的主人。”

不要急于写，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

赵 树 理 谈 创 作

《广西日报》编者按：全国文联参观团成员、作家赵树理先后于十一月九日、十二日与我区文艺工作者座谈小说创作问题。在九日的座谈会上，赵树理同志作了关于深入生活问题的发言，已刊十三日本报副刊。这里发表的是赵树理同志在十二日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记。

多当一个时期的爱好者

目前存在于部分青年作者中间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写不出来的时候硬要写，是鲁迅当年《答北斗社问》里指出过的老问题。赵树理同志在发言中谆谆劝告青年同志们多当一个时期的文学爱好者，不要急于写。他说：买票看戏的人，必定对戏剧有兴趣，其中一部分是爱好者，在欣赏中学点腔调、曲牌，有的兴趣浓些，成了戏迷；少数人成了票友，而“下海”的人终归是更少数。大致说来，有兴趣是普遍的，自己登台演出是少数，创作何尝不如此？因此，赵树理同志劝青年们要业余或者课后才写，业不余或课不余就不要写。他说，我是个号称专业的作家，一年半载也只不过写一、二篇，可是，有些青年学生一月就写了好几篇，影响了学业，恐怕是不适当的吧？创作是一项

* 本篇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广西日报》。

艰苦的、繁重的劳动，也是一项严肃的、需要一丝不苟的劳动，这要求创作者本身随时加强政治修养和丰富生活积累，加强驾驭材料的文字能力。多当一个时期的爱好者，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和艺术欣赏水平提高一步，只有好处，没有害处。相反地，急于求成，刚学会了两句曲调，就卖票公演，那十有八九要“砸锅”。

这里，赵树理同志附带谈到欣赏作品的问题。他认为：学习任何一种科学都该是由具体到抽象的。例如学植物学先从棉花、大豆等学起，学动物学先从蜘蛛、蝎子等学起，学文艺理论也不例外，因此，不妨多看看，多欣赏欣赏。旧社会里，学堂盛行背书，说是念念背背，久而久之就会写了。这是个笨办法，但也不无可取。我们读小说，并不要求读后在自己的创作上立竿见影，而是象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读得多了，后来自然有长进。如果先存有找创作方法的思想去读，就容易妨碍自己认真欣赏别人的作品。

不熟悉的东西不要硬写

有些青年作者苦于不熟悉自己笔下的生活。关于这点，赵树理同志就自己的经验向到会者作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他说：

“体验生活与生活是一回事，我写东西，只能是自己经历过的，如《孟祥英》里的生活，虽不是我自己的生活，可是《孟祥英》中所写到的事，普遍存在于当日的社会中，而是我所见惯了的。有些作者年纪轻轻，阅历很少，却要急于去写自己并未经历也不十分熟悉的事物，结果写出来的东西比较不易给人以真实感。有这么一件事：山西有一位老民兵英雄，现年五十多岁。陕北

红军在刘志丹同志率领下渡河东征时，他就做地下工作；抗日时期，他参加民兵，立了不少功勋；解放后，他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现在是一个生产大队长。一次，有一个青年同志准备根据他的事迹写一部小说，可是，这位同志不到三十岁，土地革命、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火热般的斗争生活都未赶上，解放后的互助合作运动也没有机会参加，这样，他缺乏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即使记录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到底觉得棘手。自己未经历或不熟悉的生活，硬要去写，光是在表面上写写事件，摸不到人物的心理、性格，写出来的作品是不真实的。我自己未经历过的事情是从不下笔的，比如今天我来写抢种水稻就不成。因为我常到的地方没有水田，从未经历过。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此，不能以此限制大家，但是，熟悉生活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总是少不得的。”

赵树理同志接着指出：古人没有以创作为社会职业的。如曹雪芹，他根据自己显赫一时的贵族生活来写出《红楼梦》，而不是为了写作才去体验生活；唯其是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才有许多话要说，说得那么好。认真生活的人不会异想天开地在笔下出现不真实的情况。听说有些青年作者写小说一味追求离奇怪诞的情节，有些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没有人物，只有政策的图解，大致上都是由于缺乏生活的缘故。

写文章也要力求经济

座谈会上，有的同志说赵树理同志的小说十分精练，希望他谈谈是怎样剪裁素材、怎样做到精练的。赵树理同志很谦虚地说，想来也无甚经验，要极简炼地写好一个人物，无非是挑

人物最有代表性的几个情节。串连起来就是了。同志们写东西都有体会，描写是最易增加篇幅的。有时我写小说，描写了好几百字，还没有接触到人物的行动，干脆丢掉，后来想想，把所要描写的事物放在人物的对话中去，三言两语就点出来了。不过这“三言两语”须要多用点工夫捉摸一下，马虎不得。写文章能简省应该尽可能简省。我们上货店买东西，总是希望花钱最少，得东西最多，写文章要力求经济也是这个道理，总希望花的文字最少，得的艺术效果最大。看古人的文章，有以繁见长的，也有以简见长的，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我是尽可能简的。

读者对象要明确

有的同志要求赵树理同志谈谈自己的创作风格是怎么形成的。赵树理同志回答说：主要是考虑到作品的对象。我所要求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农民。不要过低估计农民的艺术水平。老一代的农民，虽说有好多人不识字，可是看戏，听说书都是他们习惯了的艺术生活，一听了那些声音，马上就进入艺术环境。这个广大的艺术阵地，过去多为挟带着封建性的作品所占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尚来不及把占领这一阵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我们要接收这个阵地了。要接收这个阵地，就得先看看这原阵地上有些什么可接受的财产——也就是民间文艺传统的可利用为基础而加以发展的东西。要说我的作品有点什么自己的风格的话，也不过在这传统上学习了点皮而已——学习得非常不够，发展还谈不到，今后继续多学一点，也许还会有点长进。

努力繁荣曲艺创作·

——記赵树理同志与我区曲艺工作者的談話

十一月十三日晚上，作家赵树理同志在区文联组织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就曲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发言。

赵树理同志在发言中认为：应该重视曲艺创作，而不应该对它有任何轻视，我们文艺界如果用写小说、写诗的内容和精力来写曲艺，写出的评书、唱词的艺术效果决不会低于小说、诗歌。象董解元的《西厢》原就是唱词，它的艺术价值是很高的。除了创作曲艺作品外，把已出版的小说、诗歌改成曲艺作品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如《林海雪原》、《红岩》等优秀长篇小说都可改成评书。广西僮族地区的民间叙事诗同样可以改编成好的曲艺作品。这个工作，希望文艺界共同努力，可以由曲艺界动手，小说、诗歌作者支持。这因为有时候，曲艺工作者不象小说作者那样熟悉创作中的生活，可能改编的不当，再经过艺人表演，也许更走了样，所以要请小说作者给予协助。有时，可能是改编者写好了，但拿到艺人手里又通不过，又要改；这也需要大家共同商量、研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中国的旧小说实际上就是评书式的。如《水浒》、《三国演义》，每章开头都是“话说”。现在的不少新小说，仔细分析

• 本篇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广西日报》。

• 1932 •

起来，也和说书差不太多。所以说，好的曲艺评书也就是好的小说。赵树理同志说他写《灵泉洞》，就是想让它能说，在《曲艺》上也是作为说书发表的。

接着，赵树理同志谈到曲艺创作的特点，他说：传统戏剧，因为表演程式、唱腔、布景等方面太统一了，要想表现现代生活，有很多困难，即使勉强插进去，群众也不喜欢，演员也难演。但是，曲艺定型不太死板，容易改动，如京韵大鼓、广西的文场，要想全面表现现代各种性格的人物角色虽有些困难，但比较起京戏来，还是容易的。比如文场的调子以细腻、委婉见长，要表现粗放，可能不容易，但现代人物也是有各种性格的，只要哪个调子适合表现哪种性格，就让它表现什么好了。我们如何使曲艺中各种调子之间衔接得好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象传统戏曲一样，上一个调门必然引起下面的一起人物出场。这个工作，希望音乐工作者协助来做。有些曲调长于表现悲痛，有的长于表现喜悦，有的剧种这方面好，有的那方面好，这些地方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赵树理同志还谈到：创作曲艺作品时，不要过低估计了群众的水平。广大群众有的是文盲，但不是艺术盲，也不是社会盲。他举例说，过去，有个唱戏的，有一次叫板，忘了台词，结果台下的群众给他叫起来，他便接着唱上去，这说明了群众艺术水平是不低的。所以，创作曲艺作品时，不要以为群众只能懂一些解答式的东西，要认真，不能马马虎虎。有人认为曲艺只是配合政治运动、中心工作的一些宣传手段，这种看法也不全面。当然，曲艺是一种艺术，它和其他艺术作品一样，都可以说是宣传手段；也正和其他艺术品一样，通过它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但它决不是图解式的直接

解释，一定得使他通过艺术所具有的特点来起作用，否则会使政治和艺术两无所得。如有的同志说的，把党的一些公报写成熟艺作品，不如干脆来个时事政治讲话更好些。“配合政治任务”不应该理解为在内容上配合当前具体工作。难道看了《万水千山》所受的鼓舞，对“养猪”工作不起作用吗？一定要把“养猪”写成熟艺作品也没有必要。写曲艺还要掌握各种曲艺的特点。赵树理同志说，他改写的《石不烂赶车》，就是照顾他的家乡曲种的特点，如用北京京韵大鼓来说唱可能就不大合适。曲艺工作者创作时，掌握了这个形式特点，写作时就会运用自如。其次，写曲艺作品，不能反对地方话。有些曲艺就是由地方话形成的。在广西，也可以为广大壮语地区群众专门写些壮语的曲艺作品。别的地方的曲艺也可以发展成本地方的东西，如北京有相声，上海也有当地的相声，广西也可以有的。

有人问：曲艺是否要发展成戏剧？赵树理同志说：曲艺可以发展成戏剧。实际上，有些小戏就是曲艺发展起来的，如河南的曲剧就是。但是，并不一定都要这么做。文艺创作有小说、诗歌、戏剧，不能只要戏剧，就不要小说了。曲艺也是这样。山东快书一个人表演，一会儿变成书中的角色，一会儿恢复说书人的身份，很有特点，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发展成山东快书戏呢？何况曲艺有它很多的方便特点：人员少，场地随便，更适合广大群众接受。从表演上来看，曲艺的表演只是起协助作用，不能以一般戏剧演员的表演艺术来要求曲艺艺人，艺人的动作只要能帮助说唱就可以了。曲艺的动作有它一定的格式，演员有一定的活动范围，不能超过。有的动作只是到紧要关头才来一下，作过后立即恢复说书人的身份。以说书人的身份当作他主要的身份。正如电影里的特写镜头一样，特写镜头

过后，很快恢复到平时镜头。此外，曲艺艺人上台穿的衣服，一般以不与观众脱离太远为好。如说相声，男的只穿上大衫即可，这样，让观众把你当作说书人，而不是当一般戏剧演员看待。

（姚燕戈记）

给青年的一封信*

常爱农先生：

来信收到。

你的名字取得好。我希望这是你的真名，不过即使是在写这封信时候临时取的笔名，只要是情由衷发，我以为也比用别的名字好。

来信首先要我和其他代表们原谅你讲话不客气，正对我的脾气——我是不愿多听而且也不愿多说客气话的。

来信怀疑我是否完全了解农民，我以为怀疑得很有理，因为任何人对任何问题的了解都是活到老学到老，都是逐年逐月增加其深度的。在我自己，过去对农民有一些了解，以后自然还是继续了解下去。

你对其他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已经转达给他们，只是我作为代表之一，也要对你提出些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你在来信中肯定了这样一些事：

一、“广大的农民”都处于“最困苦的境地”，受到“最刻薄的待遇”，只有“村干部”和“个别的特殊农民”的生活好。

“城市郊区和重点的农业社”都是“高等农民”、“特殊阶层”。

*某学院一个学生叫“常爱农”的（很可能是化名），作为向人民代表（赵树理从一九五四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反映情况，写信给赵树理，赵树理写了这封回信。这是一份残稿，只存前面部分，后面部分不存在了。

二、“报纸的报道”、国家的“统计部门和粮食部门”……等机关材料以及村干部的讲话都是造谣，不许相信。

三、代表农民的代表，都不曾深入到农村去，只是“笼统地、概括全面、自报奋勇地”代表着“陌生的农民”。

四、报社到农村的记者很少，而且都不曾和农民一起生活过，因而只能写出些绝不可信的报道，应该“撤职”“判刑”。

你虽然抱着“常爱农”的心情，可惜你是个学生，每年不过两个月假期，对农村生活深入得不够。这是可以谅解的。只是你要笼统地、概括全面地、自告奋勇地代表着陌生的农民。把广大农村都说成地狱，我便不得不告诉你一点你所不了解的情况来纠正你的一些错误观念：

一、我是作家代表，不是农民代表。真正的农民代表，每省都有那么五、六、七、八个。他们不是你所说的那样每年不能有三个月至半年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而是除了来北京开个把月代表会以外根本不会离开劳动生产的真正农民。你连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为什么偏会“概括全面地”了解广大农民呢？

二、假如国家的机关都是造谣机关，干部都是造谣干部，你那个学院也早关门了——因为所有的城市供应完全凭的是那些机关的统计数字，而那些统计数字又都是那些干部供给的原始材料。

三、《人民日报》和各省的报纸，都有跑农村的记者组。那些记者除了回报社开会以外，通年住在农村，比你给他们规定住农村的时间要长得多。你要求他们多了解问题是可以的，要是让他们也参加半年农业劳动也没有必要也不合理。除了文艺写作者，谁也不能有一半时间来参加岗位以外的业务。

（未完，下缺）

赵树理著作年表

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一岁。

九月二十四日（阴历八月初七），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下中农家庭里。原名赵树礼，乳名得意。

祖父赵东丰，早年在河南周口当店员，中年以后回乡务农。粗通文字，晚年迷信神佛。

父亲赵和青，农民兼小手工业者。善编柳条器具；又会看中医，择出行，占八卦，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知识；识字读书，喜爱民间艺术。一九四三年十月被日寇杀害。

母亲王氏，是个勤劳善良，笃信神佛的劳动妇女。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七岁。

开始跟祖父学习识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孟子》、《大学》等。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十一岁。

祖父去世，入本村私塾，跟一个叫栗振田的老秀才读《四书》。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十二岁。

由于家庭经济困顿，退学回家跟随父亲种地、编簸箕、拾粪、驮炭，余暇也跟父亲读书。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十五岁。

入沁水县榭山第二高小读书。各门功课成绩都很优异，数学竞赛曾获一元奖金。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十七岁。

由父母主婚，娶沁水县牛家岭马梅为妻。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十八岁。

秋，在沁水县板堂小学教书。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十九岁。

因无靠山，被学校解雇，回乡种田。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二十岁。

春，到阳城县西冯村教私塾。

夏，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初级班读书。

开始接触“五四”以来新文学，特别喜欢鲁迅、郁达夫的作品，以及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创造社的《创造季刊》等。学着写了新诗新小说，学习欧化。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二十一岁。

大革命爆发不久，长治第四师范掀起驱逐校长姚运中的学生运动。赵是策划者领导者之一。也是起草驱姚宣言的执笔者之一。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二十三岁。

年初，阎锡山掀起反共高潮，在山西省各地抓捕共产党员。

春，长治共产党组织被破坏，长治师范有两个共产党员被逮捕，学生遭到大搜查，大家纷纷逃离学校，赵树理与同学王春相随离校，在安泽、阳城、博爱等县山区流浪，化名姓杨，以行医为生。

夏，被长治师范以“久假不归”为名开除学籍。

秋，回尉迟家中，和父亲一起收秋。妻马梅染伤寒病去世。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二十四岁。

春，沁水县招考小学教师，赵树理考取第一名，分配在沁水县西关模范小学教书。因这里薪俸较高，比农村小学高一倍，每月十块银元，引起同行嫉妒，向国民党告密，赵树理被逮捕，四个月後押送太原国民党清共委员会，因无证据，转入国民党自新院监狱。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二十五岁。

夏，获释，回到长冶，和几个要好同学合影留念。赵树理在照片上题诗一首：“萍草一样的漂泊，或许是我们的前程；此间一度的欢聚，不知何时再会。朋友们啊，我们的归宿，让我们分头去找。”

秋，和史纪言、王中青等相约，又流浪到太原，以刻写讲义为生。

冬，赵树理写了一首七言长诗，题目叫《打卦歌》，写一个失意流浪青年问卜，投寄给《北平晨报》发表。原文一直找不到，经过史纪言同志反复回忆，只记起开头四句：“铃铃金钱旋转落，憔悴游人来问卜。一掷再掷已六番，卜士敬问坐上客。”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二十六岁。

投奔河南清华镇一个开笔铺的乡亲处当学徒，在这段时间里，读了不少书报。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二十七岁。

年初，回到太原，住在满州坟，过着流浪生活。不久，找了个小录事工作，每月薪俸六元，加上糊信封、印信纸，勉强度日。后来，又到西北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呆了三个月，训练班解散后，住山西教育学院王中青宿舍里。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二十八岁。

年初，王中青、史纪言主编《山西党讯副刊》（由党的地下组织掌握的），赵树理开始在上面投稿。

秋，经同学介绍去太谷县北洸村小学教书。

冬，回尉迟，与武安村关连中结婚。

是年，作短篇小说《金字》，发表在太原某报副刊。

作短篇小说《铁牛复职》，发表于《大风报》（无存稿）。

作长篇章回体小说《盘龙峪》（未完成，无存稿）。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二十九岁。

夏，因宣传进步思想，引起当地士绅不满，被解雇，离开北洸村小学，到太原。后又回沁水洞庵小学教书。

是年，作短篇小说《糊涂县长》，发表于四月一日《山西党讯副刊》，署名“黑丑”。

作短篇小说《到任的第一天》，发表于八月十二日《山西党讯副刊》，署名“何化鲁”。

作《我也谈创作》，发表于八月十四日《山西党讯副刊》，署名“何化鲁”。

作《神经质的文人》，发表于八月十六日《山西党讯副刊》，署名“何化鲁”。

作《欧化与大众语》，连载于八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山西党讯副刊》，署名“何化鲁”。

作《呜呼！李长之教授》，发表于八月二十五日《山西党讯副刊》，署名“何化鲁”。

作《给青年作家》，发表于八月二十八日《山西党讯副刊》，署名“何化鲁”。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三十岁。

春，由沁水返回太原。曾作短诗《耳畔》，表达当时苦闷、

徬徨的情绪（无存稿）。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三十一岁。

夏，史纪言、王中青在长治办乡村师范学校，赵树理应邀到该校当国文教员，除上课外，经常接触进步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宣传抗日。

是年，写有韵小剧《打倒汉奸》。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三十二岁。

抗日战争爆发，上党乡村师范学校停办，赵树理回到原籍沁水县和阳城一带参加抗日工作，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月，作剧本《打灶王爷》，寓意打蒋介石，曾和学生一起在文艺晚会上演出（无存稿）。

七月，参加长治牺盟会宣传队，下乡宣传抗日。

秋，调阳城牺盟会，任第四区区长；后又任杨柏山区区长。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三十三岁。

春，回县城牺盟会，后党组织调他任牺公联委会公道团团长。

夏，阳城牺盟会被砸，到长治牺盟中心区，任第五专署民宣科干事、“烽火剧团”团长。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三十四岁。

夏，第五专署创办《黄河日报》路东版，赵树理主编副刊《山地》。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黄河日报》停刊。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三十五岁。

春，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报》副刊编辑。

夏，调《华北新华日报》学习，后因《人民报》停刊，留《华北新华日报》作校对。

冬，《华北新华日报》创办发往敌占区的通俗小报《中国人》，赵树理任编辑。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三十六岁。

一月，作鼓词《茂林恨》，发表在《抗战生活》革新号第一期。

春，《中国人》报停办，赵树理被调到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专门写通俗读物。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七岁。

一月，举行太行区文化界座谈会，赵树理在会上大声疾呼，要写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的作品。

五月，赵树理和王春调到北方局党校政策研究室工作。是年创作了剧本《万家楼》和《清债》。（《清债》无存稿）。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三十八岁。

五月，调华北局党校学习。

同月，根据左权一个青年民兵小队长和一个美丽的农村姑娘为争取婚姻自主被村干部打死的故事，创作了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

杨献珍将原稿推荐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彭总阅后，亲笔写了“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题词。

九月，《小二黑结婚》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仅在太行区就销行三、四万册。

十月，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写成。十二月由新华书店出版。

是年，作《平凡的残忍》，发表于《华北文化》一九四三年革新号第五期。

作《“三”字到“万”字》，发表于《华北文化》一九四三年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三十九岁。

一月，三幕话剧《两个世界》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春，赴河北涉县参加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

夏，写短篇小说《地板》。

冬，在晋冀鲁豫边区“群英会”工作。写了两篇报道：《孟祥英翻身》（一九四五年三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和鼓词《战斗与生产相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一九四五年一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群英会”后，赵树理调到新华书店当编辑。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四十岁。

春，家乡沁水县重获解放。

冬，作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一九四六年一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四十一岁。

三月，小说集《李有才板话》（包括《孟祥英翻身》、《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篇和附录两则）由冀中新华书店出版。

四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在邢台成立，赵树理被选为常务理事。

夏，回家乡尉迟探省。

八月，去阳城疗养。写短篇小说《福贵》，发表于《太岳文化》创刊号；短篇小说《催粮差》，发表于太岳区《新文艺》第三期。

是年，作小唱剧《好消息》，发表于《新大众》第十二

期；小唱剧《巩固和平》，发表于《新大众》第十六期。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四十二岁。

二月，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在《新大众》上连载（三十四期至四十五期）。

三月，短篇小说《催粮差》荣获太岳行署一九四六年文化奖金甲等奖。

五月，作《农村剧团的地方性与农村性》，发表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副刊《文艺通讯》创刊号。

六月，写短篇小说《小经理》，发表于七月一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八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和成果应该成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方向。陈荒煤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向赵树理的方向迈进”。

同月，作《艺术与农村》，发表于八月十五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同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颁发文教奖金，根据彭德怀、周扬、陈荒煤等人提议，赵树理小说获特等奖。

是年，华北新华书店编辑出版论文集《论赵树理的创作》。内收《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关于〈李有才板话〉》（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茅盾）、《〈板话〉及其它》（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郭沫若）、《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荒煤）、《谈〈李有才板话〉》（力群）等篇。

参加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会后赴河北武安赵庄搞土改。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四十三岁。

根据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先后写有许多短文：

《我们执行土地法不许地主富农管》，发表于一月七日《新大众》报。

《为啥要组贫农团》（快板），发表于一月十四日《新大众》报。

《休想钻法令空子》，发表于一月十四日《新大众》报。

《穷苦人要学当家》，发表于一月十四日《新大众》报。

《干部有错要老实》，发表于一月十五日《新华日报》（太行版）。

《谁也不能有特权》，发表于一月二十一日《新大众》报。

《中农不要外气》，发表于一月二十八日《新大众》报。

《发动贫雇要靠民主》，发表于一月十六日《新大众》报。

《“自愿”不是“自流”》，发表于一月二十一日《新大众》报。

《从寡妇改嫁说到扭正村风》，发表于一月二十一日《新大众》报。

《躺倒不对，起来怎干？》，发表于一月二十六日《新大众》报。

八月，华北文艺工作者会议召开。赵树理被选为华北文艺界协会理事。

十月，《邪不压正》在《人民日报》连载。

同月，作《介绍一本好小说——〈高干大〉》，发表于一月七日《人民日报》。

十二月，作《对改革农村戏剧的几点建议》，发表于《华

北文艺》创刊号。

一九四九年，四十四岁。

春，随《新大众》报进入北京。《新大众》报被全国总工会接管后，任《工人日报》记者。

四月，短篇小说《传家宝》在《人民日报》连载。（四月十九日至四月二十一日）

五月，写《田寡妇看瓜》，发表于五月十四日《大众日报》。

六月，《也算经验》，发表于二十六日《人民日报》。《会师前后》，发表于《文艺报》第五期。

七月，出席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作协理事。

十月，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赵树理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同月，随中国文化与职工代表团访苏。

一九五〇年，四十五岁。

一月，《说说唱唱》（月刊）在北京创刊，赵树理与李伯钊任主编。

同月，改编田间叙事长诗《赶车传》为鼓词《石不烂赶车》，发表于《说说唱唱》创刊号和第二期。

同月，《关于邪不压正》发表于十五日《人民日报》。

二月，《谈群众创作》，发表于《文艺报》一卷十期。

同月，《参观之外》发表于《新文萃》第二卷第五期。

三月，《万象楼》连载于《工人日报》（三月十二、十九、二十六日）。

四月，为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办的讲演会讲演，题目是

《北京人写什么?》(收在《把北京文艺工作推进一步》一书中)

同月,出席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理事。

五月,《〈金锁〉发表前后》,发表于《文艺报》二卷五期。

六月,短篇小说《登记》,发表于《说说唱唱》第六期。

七月,《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发表于《文艺报》二卷八期。

八月,《杜鲁门的‘文化程度’问题》发表于《人民文学》八月号。

十月,《〈活人塘〉四人赞》,发表于《说说唱唱》第十期。

同月,《纪念话——纪念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一周年》,发表于十三日《新民报》。

十二月,《文艺作品怎样反映美帝侵略的本质》,发表于《北京文艺》四期。

年底,调回中宣部。

一九五一年,四十六岁。

春,赵树理回长治专区,在武乡县临漳村参加初级社建社试点工作。

一月,《〈方珍珠〉剧本读后感》发表于十一日北京《新民报》。

五月,为庆祝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题诗一首。

六月,《〈武训〉问题介绍》发表于《说说唱唱》第十八期。

七月，《对发表〈武训问题介绍〉的检讨》发表于《说说唱唱》第十九期。

同月，在长洽专区写成电影故事《表明态度》。该文发表于《文艺学习》一九五六年第八期。

九月，《赵树理选集》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由开明书店出版。

十一月，《考神婆》出版。

十二月，《说说唱唱》改由老舍任主编，赵树理、李伯钊任副主编。

一九五二年，四十七岁。

一月，《我与〈说说唱唱〉》发表于《说说唱唱》一月号。

三月，《美帝是人类的公敌》发表于十五日《新民报》。

五月，《决心到群众中去》发表于二十四日《光明日报》。

《悼念王春同志》发表于二十五日《新民报》。

秋冬间，赵树理在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长期蹲点，深入生活。

作《郭玉恩小传》（未发表）。

一九五三年，四十八岁。

三月，小调《王家坡》发表于《说说唱唱》三月号。

五月，《一张临别的照片》发表于三日《人民日报》。

九月，参加全国第二届文代会，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和作协理事。冬，调作协任驻会作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三里湾》。

一九五四年，四十九岁。

一月，小说集《李有才板话》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九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同月，《“侵略”浅释》，发表于《文艺报》十七期，署

名“王甲士”。

十月，短篇小说《求雨》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号。

《谈六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杂感》发表于六日《北京日报》。

十二月，《我对戏曲艺术改革的看法》发表于《戏剧报》十月号。

一九五五年，五十岁。

一月，长篇小说《三里湾》发表于《人民文学》一至四月号。

三月，《说说唱唱》停刊。

《论“吃社果”说法的错误》，发表于《政治学习》第三期。

同月，出席作协召开的“汉字简化草案”讨论会。

五月，《三里湾》由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八月，《刘二和与王继圣》重新发表于《人民文学》八月号。

《我在创作中的一点体会》分别发表于中、英、日文版《人民中国》。

十月，《〈三里湾〉写作前后》发表于《文艺报》第十九期。

十一月，参加山西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后又参加山西省文联与戏曲界联合召开的戏剧创作会议，并作讲话。

同月，回晋东南参加高级农业合作化运动。

同月，《谈课余和业余的文艺创作问题——答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来信》，发表于《文艺学习》十一月号。

冬，回故乡尉迟，参加修建水库工作。为家乡购买锅驼机。

十二月，参加晋东南第一届戏曲大会。

一九五六年，五十一岁。

一月，到高平、沁水等县参加高级农业合作化运动。作《开渠》（泽州秧歌）剧本。

三月，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和青年作者谈创作》的发言，发表于《长江文艺》五月号。（后收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集》中）

七月，山西省长治专区上党梆子剧团进京汇报演出，赵树理写了《百花齐放声中的上党戏》一文，发表于十四日的《北京日报》。

《“买猴儿”讽刺了谁？》，发表于《文艺报》十三期，署名“王甲土”。

八月，电影故事《表明态度》发表于《文艺学习》第八期。

同月，给长治地委负责同志写信，提出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九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题为《供应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的发言，发表于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十月，杂文《摩勒的妙文》发表于十四日《北京日报》。

《谈曲艺工作》发表于《曲艺工作通讯》第十期。

一九五七年，五十二岁。

二月，《曲艺》创刊，任主编。

四月，《“小戏”小谈》发表于十四日《人民日报》。

《出路杂谈》发表于《中国青年》一九五七年九期。

五月，《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答长沙地质学校夏可为同学的信》，发表于《文艺学习》五月号。

六月，赵树理同记者谈电影剧本《花好月圆》，并作主

题歌，发表于《中国电影》六月号。

同月，《“普及”工作旧话重提》，发表于十六日《北京日报》。

同月，赵树理和老舍、张恨水三人邀请在北京的作家一百二十余人举行座谈会，座谈“双百”方针下，怎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繁荣大众文艺等问题，赵树理在会上发了言。

七月，去山西太谷体验生活，与太谷中小学教师举行座谈，谈了语文教学问题，后经整理为《赵树理谈语文教学》，发表于《山西教育》七月号。

八月，《要挖断可右之根》发表于《曲艺》一九五七年八月号。

《初看蒲剧的时候》发表于三日《天津日报》。

同月，赴高平参加三千会议，帮助县委制定今冬农村整风和生产规划。

九月，送女儿赵广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十月，《青年与创作——答为夏可为鸣不平者》，发表于《文艺学习》十月号。

十一月，《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发表于十一日《山西日报》。

《我与汉字》发表于一日《人民日报》，《文字改革》十一期转载。

回忆重写《金字》，发表于《收获》第三期。

十二月，《“才”和“用”》发表于《中国青年》二十四期。

冬，回尉迟，整个冬天和群众一起参加修水库的劳动和整风

学习。

一九五八年，五十三岁。

一月，任《人民文学》编委。

二月，《“春”在农村的变化》（快板）发表于十八日《人民日报》。

同月，《赵树理谈评剧〈花好月圆〉》发表于二十六日《北京日报》。

同月，出席《文艺报》举行的“反对八股腔，文风要解放”问题讨论。

四月，《春日寄战士》（短诗）发表于十日《解放军报》。
《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短论）发表于《曲艺》第四期。

《反对八股腔，文风要解放》发表于《文艺报》第四期。

五月，《和工人习作者谈创作》发表于《人民文学》第五期。

《万里同心——答瓦连津·奥维奇金》，发表于二十四日《文汇报》。

八月，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发表于《火花》八月号。
《灵泉洞》（上部）连载于《曲艺》八月至十一月号。

《告艾克》（短诗）发表于二日《人民日报》。
《我爱相声〈水兵破迷信〉》发表于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同月，曲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决定成立曲艺工作者协会，赵树理被推选为主席。

九月，《当心棒子》，发表于九月十日《人民日报》。

《曲艺工作者动员起来》发表于九月十一日《新文化报》。

十月，《从曲艺中吸取养料》，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号。

《彻底面向群众》，发表于《北京文艺》第十期。

同月十四日，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

十一月，《语言小谈》发表。

同月，根据中朝两国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文化合作计划赴朝鲜访问。

在朝写了《朝鲜农村印象记》、《开城之行》、《“马上”掠影》（国内均未发表）。

年底，到山西阳城县任县委副书记（当时阳城与沁水两县合并）。

一九五九年，五十四岁。

一月，《和工人习作者谈创作》，发表于《钢花》一月号。

二月，《谈文艺卫星》，发表于《前进》二月号。

三月，参加山西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召开的创作问题会议，并作《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发表于《火花》六月号。

四月，《群众创作的真繁荣》，发表于《文学知识》四月号。

同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五月，《新食堂里忆故人》发表于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八月，写《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寄给《红旗》杂志，并附给中央两封信。

九月，《下乡杂忆》发表于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十月，短篇小说《老定额》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号。

十二月，与陶钝合编《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曲艺》，并写了序言。

冬，回阳城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反对浮夸风。

一九六〇年，五十五岁。

一月，《赵树理同志和农民剧作者的谈话》发表于《小剧本》一月号。

四月，作《〈三复集〉后记》。

五月，作快板《谷子好》，收入《山西曲艺选》，五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六月，《告艾森豪威尔》（诗歌）发表于二十一日《文汇报》。

《微妙的夜半》（诗）发表于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戏为美国总统献策》（诗）发表于人民文学六月号。

七月，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赵树理作了题为《谈“久”——下乡的一点体会》的发言。（收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资料》中）；当选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

同月，《三复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一九四九——一九五九年的散文、论文、书信等。

八月，《曲艺沿着工农兵方向继续前进》（在中国曲协扩大理事会上的开幕词）发表于《曲艺》七、八期。

《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与杨一明同志谈理想

和志愿》，发表于《中国青年》十六期。

十一月，《套不住的手》，发表于《人民文学》十一月号。

冬，回沁水县参加反“五风”运动。

一九六一年，五十六岁。

四月，《实干家潘永福》，发表于《人民文学》四月号。

七月，参加晋东南专区戏曲编导会议，就上党戏曲如何继承传统和整理改编等问题发表了讲话。

九月，《三关排宴》（上党梆子），发表于《电影文学》九月号。

一九六二年，五十七岁。

二月，《挤三十一——农村旧话之一》，发表于四日的《人民日报》。

同月，短篇小说《杨老太爷》发表于《解放军文艺》二月号。

五月，短篇小说《张来兴》发表于十九日《人民日报》。

八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赵树理应邀出席，并在会上发言，反映当时农村中的一些问题。

会后与旅大市青年文艺爱好者会见，并作了《与青年谈文学》的讲话，发表于《鸭绿江》十一月号。

十月，《互作鉴定》，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号。

《地方戏和年景》，发表于《红旗》十九期。

十一月，《与读者谈〈三里湾〉》，发表于《文艺报》十一月号。

同月，赵树理作为全国文联和作协代表出席湖南省第三次

文代会，并以文联参观团身份赴广西。

同月，《努力繁荣曲艺创作》（赵树理同志与广西曲艺工作者的谈话）发表于二十七日《广西日报》。

《不要急于写，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发表于十八日《广西日报》。

《作家要在生活中作主人》，发表于二十五日《新湖南报》。

《做生活的主人》（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十三日《广西日报》。

一九六三年，五十八岁。

一月，《谈谈花鼓戏〈三里湾〉》，发表于《湖南文学》第一、二期。

五月，《戏外话》，发表于《戏剧报》五月号。

六月，《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发表于二日《文汇报》。

《开渠》（泽州秧歌），发表于《人民文学》六月号。

《学雷锋》（诗），发表于《北京文艺》六月号。

八月，赵树理在长治市黄碾公社曲里大队参加“四清”运动。

九月，短篇小说集《下乡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十月，赵树理到晋城观摩四省戏剧会演，在戏剧创作座谈会上，谈了《戏剧为农村服务的几个问题》、《运用传统形式写现代戏的几点体会》和《若干问题的解答》。

十二月，《开渠》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四年，五十九岁。

一月，短篇小说《卖烟叶》，发表于《人民文学》一至三月号。

《首先要求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曲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曲艺》一月号。

二月，《“起码”与“高深”》，发表于《火花》二月号。

四月，《竹枝词》二首，发表于《诗刊》四月号。

五月，《谈‘助业作家’——纪念毕革飞同志》，发表于《解放军文艺》五月号。

同月，赵树理在陵川县黑山底大队采写全国三八红旗手董小苏的先进事迹。

七月，《十里店》（上党梆子）初稿写成。

同月，作《语言小谈》，发表于《山西日报》的《通讯往来》第七期。

八月，晋东南上党梆子剧团在太原“山西现代戏调演会”上内部演出《十里店》。

九月，赵树理为沁水县委副书记何洪义同志写了家史，题目为《前岭人》，收在沁水县志中。

十一月，文艺整风后，作协党组把赵树理调回山西省文联工作。

一九六五年，六十岁。

一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春，为便于深入生活，赵树理兼任晋城县委副书记。在县里没住几天，就到南村公社峪口大队去蹲点，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户》。

一九六六年，六十一岁。

春，赵树理为焦裕禄事迹所感动，专程到兰考跑了一趟，回来即动手创作《焦裕禄》剧本，只写了三场，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中，赵树理身心遭受严重的摧残。但他仍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继续在构思长篇小说《户》，他盼望有一天能走出“牛棚”，把这本书写出来奉献给人民。他还想写《石头底》、《灵泉洞》下集，然而他的愿望竟成终古之恨。

一九七〇年，六十五岁。

九月，赵树理因多次被批斗，屡遭暴徒们恶毒殴打，胯骨被打裂，肋骨被砸断，已是身残病重，十八日，还被揪到太原湖滨会堂参加批斗大会，当场晕倒在地。五天后，即九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的优秀文艺战士赵树理同志终于含冤而死。

《赵树理文集》跋

康 泽

今年九月二十三日，是赵树理同志逝世十周年。由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学合编的《赵树理文集》，正好也将出版问世。这是对赵树理同志十年忌日的最好的纪念。周扬同志为《文集》写了热情、真挚的序，对老赵的为人和作品做了确切而深刻的高度评价、赞扬和肯定。出版社还为《文集》写了说明，作了注释，介绍了编辑过程中的有关情况：比如从作者存稿中找到并编入了若干珍贵稿件，象已发表、未写完的儿童中篇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中部分未发表的续稿；也编入了用“王甲土”“何化鲁”等笔名发表的几篇文章，和搜集到的部分信札。这当然都是纪念和研究赵树理同志的重要资料。由于我是出版《文集》的最早建议者之一，编辑过程中又提供过若干情况和意见，出版社也要我为《文集》写几句跋。我和赵树理同志虽有较深的友谊，但限于自己的水平，对其人其文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深，除了在别的文章中写过一点怀念之情，已很难再写出有分量的话，只就老赵和人民的的关系，补谈一点个人的粗浅体会。

赵树理同志毕生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特别是对农民更极其关怀、爱护和尊重，也极其了解；对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更了如指掌。进城以后，往往是任何事物也都要联系到农民头

上。买一块手表，他默算一下，说：“够农民买五头驴呢！这是五驴表。”一本小说拿了稿费，也要算算够不够买抽水机。这习惯，曾使人感到过未免偏激和过分狭隘；然而相处一久，就会体察到他对劳动人民一腔火热的情意。因此，家乡的干部每找他协助集体买机器，他总是解囊相助。家乡亲友找他解决个人生活上的困难，要三十元，他总拿五十，为此并向我说明过：“人家找我开口不容易，总要替我着想，把自己克紧一些嘛！”赵树理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感情，深深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勤劳、善良和朴实的优美品格。

这种品格同样表现在他的创作上。有的同志知道，赵树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所写，不过生活中的小二黑是被封建势力迫害致死，艺术作品里的小二黑则争得了欢乐和胜利的结局。我曾问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他说：“要把小二黑写死，我不忍。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的艰苦环境里，要鼓舞人民的斗志，也不应该把小二黑写死。”但另一方面，在同一小说特别在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和另外一些作品里，赵树理又曾以他在生活中深刻的洞察和思想上勇敢的胆识，尖锐揭露了解放区农村某些基层党政组织的严重不纯，有的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人，或是披了画皮的恶霸地主；然而即使如此，这些作品却从没使人感到过任何的灰黯和消极，倒还总总是光明朗朗，直至胜利。赵树理同志就是这样嫉恶如仇而对自己人则尽情地歌颂，这更反映了他同人民之间亲切关系的至为深厚。

正是这种至深至亲的关系，才使得赵树理在我们文学中能够最早地并且一贯地敢干和善于大胆、尖锐揭露和批评我们队伍中的阴暗和落后，而同时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写下的这

类作品，倒更其充满鼓舞革命斗志的力量；解放后在一九五八年一片大跃进声中写的这类作品《锻炼锻炼》，尽管当时曾遭到一些同志认为“不合时宜”的误解，但随着时间的流走，在今天反而愈见其引人的光辉。至于赵树理的整个创作当然决不是止于揭露的，从革命现实主义来说，暴露、批评和歌颂本来就是任何事物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老赵的作品有的虽偏于暴露或批评，更多的则主要是歌颂。特别在六十年代初期党和人民正努力克服三年暂时困难之际，赵树理写了衷心歌颂革命实干精神的《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等小说，对当时的文学和读者都影响极为深刻。可见赵树理创作上不论歌颂和暴露、批评，都是从自己同人民至亲至厚的感情出发，严格遵循着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这在今天和今后，显然都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赵树理同志在艺术上的追求和实践，也是从他与人民至亲至厚的关系出发的。在青年时期，他曾把当时某些新文学作品称为“交换文学，”意思是指不注意大众化通俗化的作品只能在文学工作者之间交换看看，而不能为广大群众特别是为农民所接受。这种看法虽然未免偏颇，但其心意怕也未可厚非。他在艺术上毕生追求和实践的，也正在怎样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更好地为尽可能多的读者、特别是农村读者所接受。为此他曾长期地刻苦学习和汲取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特别是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包括评书的传统；并从长期的实践中创造了为自己所独有、为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村读者所喜闻乐见而饱含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小说创作中新的民族形式、风格和技巧。赵树理小说创作中这一富有民族传统而又独自有所创新的特色，或可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新颖的题材，深沉的思想，典型的人物，鲜明的个性，完整的故事，生动的情节，逼真的细节。

民族的、农民的生活色彩、格调、理想和精神气质，纯朴、敦厚、机智、诙谐的乐观和幽默情怀。

高度提炼得纯真、干净、朴质的鲜众语言，简洁、利落、朗朗上口的文字，不论叙述、描写和人物对话全都自然地运用群众的语言和精练的文字，避免生僻的方言土语，但也不拒绝个别常用的文言字眼和语汇；总是以叙述为主，从叙述中展开描写；不是描写为主而夹以叙述，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小说文体和表现手法。

所有这些特色，没有哪一点能够稍稍离开人民生活和农村生活的根基，没有哪一点不是发源于作者同农民至亲至厚的感情深处，也没有哪一点不是浸透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光芒。这些独有的特色还以其迷人的魅力而深深影响了我国部分作家和一代文风。目前文艺界和赵树理家乡山西的报刊上，就正在展开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即所谓“山药蛋派”的讨论。可能这一点是赵树理自己始料所不及，因为他在生活干革命根据地以来的几十年中，并不只专注于自己所写大量小说、剧本、曲艺以及论文、杂文等作品，而是同时还做了大量的减租、土改、办社、整社、生产等工作；况且后一方面的工作虽然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不竭的原料，但他自己却往往是把那些工作的效果看得比创作的影响还重要，并因而在几十年中又还写下过不少对农村各方面工作的种种书面建议和理论探讨文字，直到他身后劫余的文稿、纸片中也还有这类文字的。尽管这类文字大都没收入《文集》之中，但其事实本身不也正说明了赵树理创作源泉的深厚，正说明了同人民之间特别是同广大农民之间密

切关系的至亲至厚么！

赵树理本来就出身于农民，他的卓越才能当然也主要来自农村的深泥厚土；他和他的作品也恰如一位朴素的老农那样，看来不大才华外露和激情洋溢，实际则是寓热烈于冷静深思的“内里秀”。这又使得他在群众之中，特别是广大的农村读者之中，同样如一位朴实的、杰出的老农而赢得了深深的喜爱。读者中甚至还流传着一些关于他的为人行状乃至种种或有或无的轶事。至于他的作品对读者至少有一点也和《水浒》、《红楼梦》这些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一样，不论翻开哪一篇、哪一页并从不论其中的哪一段往下读，虽说无头无脑，却照样能很快被吸引而顺畅地读下去。这些情况，在我国现代作家中显然都是少有的。

不过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毁灭之灾，赵树理的作品近年间在部分青年中已比较陌生；文艺界的评论和研究同样不够，和他在中外读者中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因而目前出版《赵树理文集》，便愈见其必要。这对于更进一步拨乱反正，促进新时期文艺的日益繁荣，显然将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作家们在目前深入我国广阔的农村，深入对革命贡献巨大和在现代化建设中位置极其重要的农村，继承我国新文学历来重视反映农村、也善于描写农村的优良传统，更多地深刻描画当前我国农村在党的一系列政策鼓舞下，被林彪、“四人帮”搞得多灾多难后已变化急剧，新生力量从艰苦斗争中战胜腐朽、落后力量的动人风貌不断涌现，新长征的步伐也日益坚实的种种情景，从而克服当前文学中反映农村生活比起来较少的不正常现象，意义更将尤为深远。而做到这一点，显然正是同人民情感至深的赵树理同志毕生的理想，也会是使他感到欣慰而安然瞑目的。

1980年7月5日于长沙